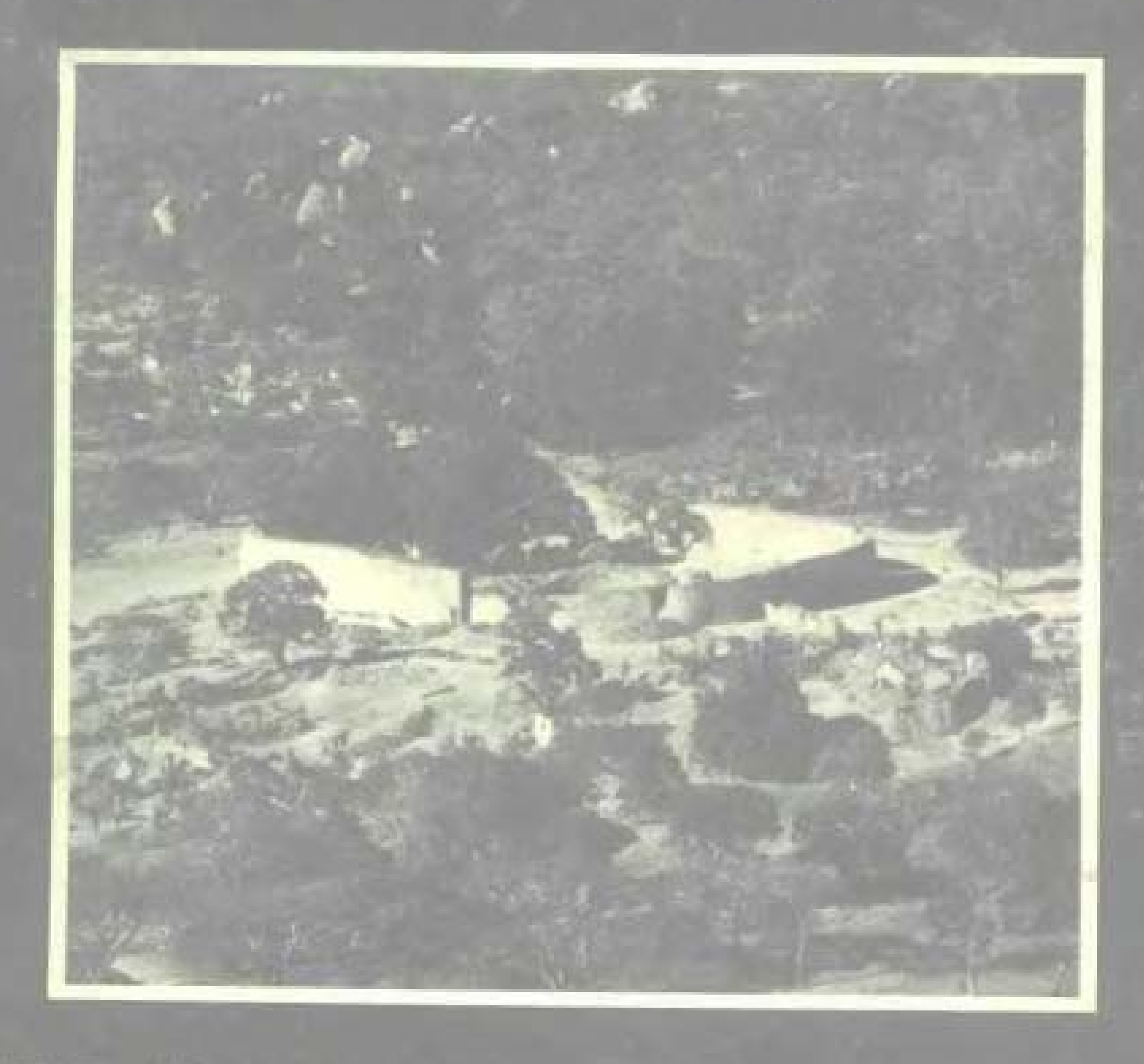
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四卷

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

主编：D. T. 尼昂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

非洲通史　第四卷

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

D. T. 尼昂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京）新登字 020 号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IV

Africa from the Twelfth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Editor D.T. Niane

Unesco ISBN 92-3-501710-6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has been prepared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责任编辑：张元一
责任校对：燕桂珍

非洲通史　第四卷

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

D.T. 尼昂主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 4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振华胶印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16 41.25 印张 字数 750（千）
1992 年 8 月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001-0184-8/K · 12
定价：58.00 元

非洲通史　第四卷

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

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

第 一 卷　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
（编辑　J. 基－泽博）

第 二 卷　非洲的古代文明
（编辑　G. 莫赫塔尔）

第 三 卷　七世纪至十一世纪的非洲
（编辑　M. 法西、助理编辑　I. 赫尔贝克）

第 四 卷　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的非洲
（编辑　D. T. 尼昂）

第 五 卷　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
（编辑　B. A. 奥戈特）

第 六 卷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非洲
（编辑　J. F. A. 阿贾伊）

第 七 卷　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80－1935 年
（编辑　A. A. 博亨）

第 八 卷　1935 年以后的非洲
（编辑　A. A. 马兹鲁伊、助理编辑　C. 旺济）

《非洲通史》中文版出版说明

第 四 卷

《非洲通史》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重要学术著作，全书共分八卷，从1980年起分卷陆续出版。

《通史》的编写工作由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任命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负责，委员大多为非洲人。可以说，这是一部以非洲人为主要力量编写的非洲史。此书史料丰富，为我国史学界研究非洲历史提供了方便，也为广大读者了解非洲情况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本卷翻译工作，得到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支持。张文淳、吕和声两位同志负责审订。我公司担任本卷译稿审定工作的是张元一同志。

本卷涉及多种学科，翻译中难免有不妥之处，希望国内读者和有关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本卷各章脚注中所列人名系指其著作而言，所列年代和页码系指其著作出版年代和页码，读者可按人名在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中查阅书名。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2年6月

本卷译者姓名

（按所译章节顺序排列）

胡　燕　张文淳　杨　彪　马秋莎　伊　安
计建民　赵世瑜　吕和声　吴　英　赵根荣
罗　毅　李力清　李树军　艾　平　庄　红
葛翠华

向提供图片者致谢

J. L. 阿尔贝〔2.1、2.2、2.4、2.5、4.3〕

J. 巴赞〔7.1〕

R. M. A. 贝多,《特勒姆人》,1977 年〔6.8 - 6.10〕

M. 伯恩海姆和 E. 伯恩海姆/阿根斯·拉福,《非洲——如梦如谜的大陆》,《读者文摘》选萃,巴黎,1979 年〔18.3〕

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7.3、12.1、26.1〕

大英博物馆,伦敦〔12.9 - 12.15〕

《开罗——千年史诗,969 - 1969》〔15.4〕

G. 坎普斯,《柏柏尔人——处于历史边缘的民族》,1980 年〔5.1〕

G. 康纳赫,《贝宁考古》,1975 年〔14.2〕

O. 达珀,《非洲纪实》,1668 年,阿姆斯特丹〔12.6 - 12.8〕

B. 德 - 格鲁纳,《燃烧中的古代西非大地》,卢万天主教大学,历史、艺术、考古丛书,1980 年〔6.11 - 6.16〕

津巴布韦,新闻部〔封面、21.5〕

J. 德维斯〔2.3、3.1、3.2〕

P. 德 - 马雷,中非皇家博物馆〔22.2 - 22.4〕

B. M. 费根〔21.1、21.6〕

W. 菲利波维亚克,《关于马里中世纪古都的考古研究》,国家博物馆,什切青,1979 年〔6.6、6.7〕

W. 福尔曼、B. 福尔曼和 P. 达克,《贝宁艺术》,哈姆莱恩出版社,伦敦,1960 年〔14.3、14.4〕

P. S. 加莱克,《大津巴布韦》,泰晤士和赫德逊出版社,伦敦,1973 年〔21.2 - 21.4〕

G. 格斯特/阿根斯·拉福,《非洲——如梦如谜的大陆》,《读者文摘》选萃,巴黎,1979 年〔17.1〕

E. 哈伯兰,弗罗贝尼乌斯社〔17.2 - 17.4〕

安德烈·赫尔德〔14.15〕

法国黑非洲学会,引自 M. M. 维雷,《苏丹 - 萨赫勒地区的穆斯林葬礼》,BIFAN 21,系列 B,编号 3 - 4,1959 年〔8.1、8.2〕

IMRS〔6.1〕

非洲历史、艺术、考古研究所，阿比让〔13.1－13.5〕
热拉尔·柯森，人类学研究所，乌得勒支省立大学，引自《古生物史》杂志，1978年第20期〔6.1－6.5〕
玛迪纳·莱〔7.2〕
K. 米哈洛夫斯基，华沙大学，华沙，1962年〔16.1、16.2〕
人类博物馆，巴黎（MH 02.28.1－28.4）〔12.2－12.5〕
中非皇家博物馆〔22.1、22.5〕
B. 南塔特〔5.2〕
《尼日利亚——考古与早期历史》，泰晤士和赫德逊出版社，1978年〔14.1〕
腊贝洛阿利逊，引自 J. P. 多梅尼契尼的一幅画作〔24.3〕
皇家图书馆（BN/GE AA2004）〔1.1〕
瑟斯顿·肖，《伊格博－乌库——尼日利亚考古学一览》，1970年〔14.5－14.1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米尼克·罗歇〔4.1、4.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纽约图画社，《埃塞俄比亚：彩绘真迹》，纽约，1961年〔17.5－17.7〕
S. 昂温〔18.1、18.2、18.4－18.7〕
P. 韦兰〔24.2〕
沃纳·福尔曼档案馆，威廉·法格《葡萄牙－非洲的象牙》，伦敦，1970年〔12.6－12.8〕
沃纳·福尔曼档案馆，W. 福尔曼、B. 福尔曼和 P. 达克，《贝宁艺术》，伦敦，1960年〔14.4〕
G. 维厄和 L. 奥特克尔，《开罗的清真寺》，巴黎，1932年〔15.1－15.3〕
津巴布韦，新闻部，哈拉雷〔封面〕

序　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

长期以来，种种荒诞的说法和偏见使得整个世界无法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人们把非洲社会看成是不会有历史的社会。尽管莱奥·弗罗贝尼乌斯、莫里斯·德拉福斯和阿图罗·拉卜里奥拉等先驱人物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工作，然而早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里，许多不是非洲人的专家仍然不能摆脱若干先入之见，认为由于缺乏书面材料和文件，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什么科学的研究。 xvii

虽然人们正确地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历史的重要来源，然而对非洲人的口头传说，即对各族人民关于他们生活中许多事件线索的集体记忆却不予承认，认为都是毫无价值的。在编写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时，所使用的唯一资料是来自非洲大陆以外，而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不像非洲各族人民实际走过的道路，倒像是作者想当然认为非洲人必定走过的道路。由于常常把欧洲中世纪作为标准，所以在设想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时总是参考欧洲的过去行事。

实际上，有人拒绝承认非洲人是具有独创性文化的创造者，而这些文化在漫长历史中以自己创造的形式繁荣发展并延续下去。历史学家们如不摈弃偏见、重新考虑他们的治学态度，是无法理解这些文化的。

此外，非洲大陆几乎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历史实体。相反，却强调这个，强调那个，力图使人相信，远古以来“白非洲”和“黑非洲”之间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人们常把撒哈拉说成是不可通过的地方，阻碍着各族群、各民族的任何融合，也阻碍着沙漠两侧逐步成长起来的社会之间物资、信仰、风俗和思想的任何交流。古埃及和努比亚的文明与撒哈拉以南各民族的文明之间，被划了一道无法逾越的界限。

撒哈拉以北的非洲历史，同地中海沿岸历史的联系，确实比它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历史联系要密切得多。但是人们现在普遍承认，非洲大陆的各种文明，不管其语言和文化多么不同，总是或多或少地代表着被历史悠久的纽带联结到一起的一群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分支。 xviii

严重危害客观研究昔日非洲的另一种现象是，随着奴隶贸易和殖民化，出现了各种种族成见，它们引起了轻视和无知，并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甚至连编史工作的基本概念

都被歪曲了。自从被认为是上等人的殖民主义者使用“白”和“黑”两个概念作为人种的标签以来，受到殖民统治的非洲人不得不既对经济上的奴役又对心理上的奴役进行斗争。非洲人可由肤色加以辨认，他们成了一种商品，被打上戳记从事繁重劳动。最后，统治他们的那些人认为，他们就是想象中的所谓劣等尼格罗种族的象征。这种伪造的鉴别模式，把非洲各族人民的历史，在许多人的思想中降到人种史的地步，而在这种人种史中，对历史和文化的实际情况的了解必然受到歪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并开始积极参加国际社会生活和作为国际社会存在理由的相互交流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史学家，使用现有的非洲资料（尽管还是相当谨慎），以比较严格、客观和虚心的观点，努力从事对非洲的研究工作。在行使其历史能动权的时候，非洲人自己也深深感到需要在坚实的基础上恢复自己社会的历史真实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中的八卷集《非洲通史》，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来自许多国家从事这项编写工作的专家，首先是为《非洲通史》奠定理论的和方法的基础。他们热切地讨论了直线的和有限的世界史概念所造成的过于简单化的问题，并在必要和可能时重新确定真正的史实。他们力求突出那些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非洲各族人民在其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演变过程的历史资料。

这一繁重任务，由于资料浩繁和文件分散而更趋复杂、更趋困难了。为了解决这个任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得不采取分阶段进行的办法。第一阶段是从 1965 年到 1969 年，致力于搜集文件资料和制定工作计划。工作任务是在现场进行的，包括开展活动搜集口头传说，建立一些地区性口头传说文献中心，搜集未经出版的阿拉伯文和阿雅密文 xix （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一些非洲语言）的手稿，编辑档案目录和《非洲历史资料指南》，这部《指南》是根据欧洲各国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材料辑成的，后来分 9 卷出版。此外，还组织了多次会议，使来自非洲和其他各州的专家们能在一起讨论编史方法问题，经过认真审查现有资料以后，确定了编写大纲。

第二阶段是从 1969 年到 1971 年，致力于使《非洲通史》具有雏形，并把各个部分连接起来。1969 年在巴黎和 1970 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两次国际性专家会议，研究并确定了有关编写和出版《非洲通史》的问题：分 8 卷出版，主要版本为英文、法文和阿拉伯文，译成斯瓦希里、豪萨、富拉尼、约鲁巴或林加拉等非洲语文版，还将出版德、俄、葡、西、中文版，以及面向非洲和国际广大公众的缩写本。

第三阶段是实际编写和出版工作。在这一阶段内，首先任命了由 39 人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其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三分之一是非洲以外的人，它承担《非洲通史》编审方面的全部责任。

工作中采用的方法是多科性的，并且以多方面的研究和多种资料来源为其基础。其中首先是考古学，因为它掌握了非洲文化和文明史的许多关键。由于考古的研究，现在人们承认，非洲很可能是人类的摇篮和历史上首批技术革命的发祥地——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还证明，埃及是世界最灿烂的古代文明之一的所在地。而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材料

来源是口头传说，长期以来它一直被人轻视，现在却成了了解非洲历史的极有价值的工具，使人们有可能追溯非洲不同民族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活动，从内部了解非洲对世界的看法，真正领会这个大陆文化和制度所根据的准则的独有特征。

我们十分感激负责编写《非洲通史》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及其报告员，以及各卷各章的编辑和作者，感谢他们真实而全面地说明了昔日的非洲，感谢他们摆脱了教条主义来研究实质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可列举以下几个：贩卖奴隶，这是一个"流血不止的创伤"，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大规模背井离乡，它耗尽了非洲大陆的元气，与此同时，却大大发展了欧洲的经济和商业；殖民化给人口、经济、心理和文化带来的影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最后，非殖民化和建国的进程，这激发了当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激情，他们至今往往还很活跃。在论述这些问题时都很注意真实性和严谨性，这是《非洲通史》一书的巨大优点。《非洲通史》对我们有关非洲的知识作出了评价，提出了非洲文化的各种观点，并对历史提出了新的看法，因此它具有以下的显著优点，既反映光明面，也反映阴暗面，并公开提出学者之间存在的不同见解。

《非洲通史》指出了对非洲的研究工作长期以来方法不当，因之要求重新认真研究编史工作和文化特性这两方面的问题，两者由于互相作用而密切关连。像任何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一样，《非洲通史》为进一步大量研究各种专题铺平了道路。

因此，国际科学委员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密切合作，决定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深入探讨一些专题，以便对非洲过去的某些方面有更清楚的了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报告和文件集——非洲通史》丛书中陆续发表的研究成果，将成为《非洲通史》的有益补充。计划编写的有关国别史或分地区史的著作也将起到同样的作用。

《非洲通史》说明了非洲历史上的团结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尤其是同美洲大陆和加勒比地区的关系。长期以来，美洲的非洲人后裔从事的创造性表现被某些历史学家不加区别地当作是非洲文化特点的大杂烩。不用说，《非洲通史》的作者们不是采取这种态度。在本书中，被运往美洲的奴隶们所进行的反抗行动，非洲人后裔不断地和大规模地参与争取美国最初独立的斗争以及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按照实际情况予以正确理解，即这一切都有力地表现了同一性，从而有助于形成对人类的普遍概念。虽然在不同地方，情况可能有差别，但是现在十分清楚的是，西半球某些国家的感觉、思维、想象和行为的方式，都有从非洲继承的标志。从美国南部到巴西北部，跨越加勒比地区以及在太平洋沿岸，非洲文化遗产到处都可以看到。在某些地方，这种文化遗产甚至加强了居民某些最重要成分的文化特性。

《非洲通史》还清楚地阐明了非洲与印度洋彼岸的南亚的关系，以及非洲通过相互交流对其他文明所作的贡献。

我深信，非洲各族人民为赢得独立、巩固独立、进行开发和维护其文化特征所作的努力，应该扎根于对历史的觉悟之中，这种觉悟一代接一代地重新焕发，敏锐地被意识到，并且流传下去。

我当过教师，并且从独立的早期起，担任过西非和中非几个国家第一个史地课程改

革委员会的主席，从中取得了一些经验，这段经历使我体会到，为了教育青年，为了使广大公众了解情况，由洞悉非洲的问题和希望、并能从整体来理解非洲大陆的学者编写一部史书，是多么必要。

鉴于上述原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目标在于保证，用多种文字出版《非洲通史》，广为发行传播，并以此为基础，出版儿童读物、中小学教科书和编排广播电视节目。非洲以及其他地方的成年人和青年人，包括小学生和大、中学生，从而可以更真实地了解非洲大陆的过去以及说明过去情况的各种因素，还可以更公正地理解非洲大陆的文化遗产和对人类总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因此这部《非洲通史》必将有利于国际合作，有利于加强各国人民团结一致争取正义、进步和和平的事业。至少，这是我最诚挚的希望。

我谨向国际科学委员会各位委员、报告员、各卷编辑、作者和所有参加这部巨著写作的人表示深切的感谢。他们完成的著作和所作出的贡献都清楚地证明，具有不同背景，但在为普遍真理服务过程中都怀有同样的善意和热情的人能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国际体制内，完成一部有巨大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著作。我同样感谢各组织和各国政府，承蒙他们热心帮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得以出版不同文种的《非洲通史》，从而保证这部著作具有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影响，为整个国际社会服务。

编写计划说明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

B. A. 奥戈特

教科文组织第十六届大会责成总干事主持编写《非洲通史》。1970年，执行局成立了国际科学委员会，委托本委员会执行这一巨大任务。根据教科文组织执行局1971年通过的章程，本委员会由39名委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二是非洲人，三分之一不是非洲人)，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任命，在本委员会任期内以个人身分进行工作。

本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本书的主要特点。本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了以下各点：

（a） 虽然《非洲通史》的目标是尽可能达到最高科学水平，但是它并不追求面面俱到，详尽无遗，而是一部摆脱教条主义的综合性著作。它将在许多方面，说明一些问题，叙述当前对各种问题所掌握的情况以及研究工作的主要趋势，与此同时，它毫不迟疑地提出存在的不同观点。这样，它就为未来的工作奠定基础。

（b） 在这部著作中，非洲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目的是说明非洲大陆各部分之间的历史关系，而到目前为止所出版的著作都是过于经常地把它分成若干部分。非洲同其他大陆的历史联系受到应有的重视，从互相交流和多边影响角度分析这些联系，以便恰如其分地说明非洲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c） 《非洲通史》特别是一部思想、文明、社会和制度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范围很广，包括口头传说和艺术形式。

（d） 《非洲通史》实质上是从内部来观察的。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洲作者如何看待自己文明的忠实反映。虽然这部著作要在国际范围内编写，并充分吸取现有科学知识，但承认非洲的遗产也非常重要，还应该说明有利于非洲大陆团结的各种重要因素。致力于从内部观察事物的做法是本书的新颖独到之处，因而除了科学质量而外，还应使这部著作具有现实意义。通过反映非洲的真实面貌，《非洲通史》就能在一个专心从事经济和技术斗争的时代提供一种特殊的人类价值准则概念。

本委员会决定，涉及三百多万年非洲历史的这部著作分八卷出版，每卷约有八百页正文，内附插图、照片、地图、图表。

每卷由一名主编负责，必要时配备一名或两名副主编。各卷编辑均由本委员会从委员中或从外部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选举产生。各卷主编和副主编根据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和

计划进行工作。在科学性问题上，他们在各卷内容、文字定稿、插图，总之，就《非洲通史》的全部科学技术方面问题对本委员会负责，或在两届会议之间对本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办公室审定最后文稿。在办公室认为文稿可以交付出版的时候，将文稿提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因而本委员会，或在两届会议之间由办公室对本书负完全责任。

每卷约三十章。每章由一名主要作者执笔，必要时由一或两名合作者协助。作者由本委员会根据其简历遴选。对非洲作者，给予优先考虑，但他们必须具备应有的资历。还尽可能特别保证，在作者中，非洲大陆的各个地区，以及与非洲有历史和文化联系的其他地区有同等代表。

在每卷编者审毕各章文稿以后，文稿送交委员会全体委员征询意见。此外，编者将每卷待审文稿送交审读委员会，审读委员会是按照委员的专业在国际科学委员会内部设立的。审读委员会对各章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办公室最后审核文稿。

这种程序看来时间长，涉及面广，但已证明是必要的，因为它最大可能地保证《非洲通史》的科学客观性。事实上，确有几次，办公室不同意原稿内容，或是坚持作重大修改，甚至另请作者重写某章。有时要去请教精通某一阶段历史或某一问题的专家，以便对某卷内容进行最后定稿。

xxv 本书将先出版英、法、阿拉伯文的精装本，然后再出版这三种文字的平装本。英、法文的节本将译成非洲各种文字。本委员会已选定斯瓦希里文和豪萨文作为第一批非洲文字来翻译本书。

还要尽一切努力保证出版《非洲通史》的中、葡、俄、德、意、西、日文等国际通用语文版本。

因此十分明显，这是一项宏伟的任务，对于非洲史学家和广大学术团体，以及对于正在主持这项工作的教科文组织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编写这样一部非洲大陆历史肯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涉及以往三百万年，要利用最高标准的学术成就，而且要动用不同国家、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学者参加。这是一部全大陆的国际性多学科巨著。

总之，我要强调这部著作对非洲和对世界的重大意义。正当非洲各族人民为团结和进一步合作进行奋斗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充分了解非洲的过去，非洲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的联系，不仅对全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是一项重大贡献，而且也是了解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源泉。

纪 年 说 明

经一致同意，采取下列方法来书写年代。史前年代，可用两种不同方法书写。 xxvii

一种方法是参照现在的纪元，即距今的年代，以＋1950年为基准年；所有的年代是相对于＋1950年的负数。

另一种方法是参照基督纪元的开始。日期前简单加上＋号或－号以表示相对于基督纪元的年代。在提到世纪时，以“我们纪元前”和“我们纪元”字样代替公元前和公元这两个用语。

举例如下：

（i） 距今2300年＝－350年

（ii） 公元前2900年＝－2900年

公元1800年＝＋1800年

（iii） 公元前5世纪＝我们纪元前5世纪

公元3世纪＝我们纪元3世纪

目　录

插图目录

图片目录

1 导言

D.T. 尼昂

本卷所阐述的是12世纪到16世纪的非洲历史。看来，那种把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划分成更小阶段的惯用方法，在这里几乎无法应用。怎能说某一日期或某一世纪对整个非洲大陆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呢？事实上，人们会提出疑问：对非洲历史作这样一种时间上的划分是否具有实际意义？ 1

虽然这个时期确实存在划分时代的问题，但是这一时期也确实显示出一定的整体性，而且不止一种意见认为，这一时期正是整个非洲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的确，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在这时期内，非洲发展了它的固有文化，并且在保留它自己个性的同时，融合了外来的影响。在前一卷有关阿拉伯的章节中曾经谈到，非洲由于穆斯林发现撒哈拉以南富裕的苏丹，而从很少为外界所了解的朦胧状态中脱颖而出；占有这个地区的是索宁克人，他们的国王或"卡雅·马汉"（*Kaya Maghan*）控制着从尼日尔河湾到塞内加尔港湾的整个西苏丹地区。巴克里曾描述这个庞大的帝国全盛时期的情况。但是，它并非当时唯一的大政治实体，与它同时代的是桑海帝国，还有向东一直延伸到乍得湖的加奈姆-博尔努诸国家和王国。

在11世纪末以后，特别是从13世纪末至14世纪末以来，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情况的文字记载越来越丰富。从15世纪中叶起，我们还能借助葡萄牙人的史料来填补空白，这些史料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关于那时西非洲沿海各王国的兴盛情况，进一步证明了过去的历史虽然缺少文字记载，但并不影响大局。几内亚湾和刚果港湾一带曾是大的文明中心。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特点，可分几个主要问题论述如下。

首先一点，伊斯兰教征服了非洲大陆的很大部分，而伊斯兰教是通过士兵和商人来传播的。穆斯林确实是出色的商人，他们逐渐控制了商业，从而在他们所到之处促成了科学、哲学、技术的进步。从整个非洲大陆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北非洲和撒哈拉以南的广大苏丹地区都打上了伊斯兰教的烙印。我们当会记得，11世纪时，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曾以包括来自塔克鲁尔的大量黑人军队，从塞内加尔港湾出征，征服了马格里布部分地区和伊比利亚半岛，并在整个西部伊斯兰地区恢复了严格遵奉穆斯林正统教义的圣行（*sunna*）教规。 2

1050-1080年期间，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与加纳帝国争战，加纳帝国终于1076年崩溃。此后是加纳帝国内部各地方争夺霸权的昏暗时期。1076年在马格里布和苏丹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年代，但是当时昆比萨利赫（加纳帝国首都）的陷落却被人们所忽略，因

为黄金贸易实际上并未中断。黄金贸易甚至还可能有所增长，因为加纳的某些富有黄金的附庸国如塔克鲁尔和曼丁，还有位于尼日尔河东面支流的古王国加奥，均早已改信伊斯兰教，他们和柏柏尔－阿拉伯人仍继续进行活跃的贸易。

另一方面，来自阿拉伯和波斯湾的商人打开了非洲东海岸，从非洲之角到马达加斯加，卷入了内陆贸易。苏法拉、基尔瓦和摩加迪沙富有的商业区已成为非洲通向印度洋的口岸。伊斯兰教从埃及进一步传入努比亚和东苏丹。但是它在这里遇到了古老的科普特人基督教王国的强烈反抗，努比亚人顽强的反抗暂时阻止了伊斯兰教在尼罗河地区的传播。尽管如此，伊斯兰教还是从红海地区，主要是从非洲之角传入内地，并在基督教徒周围扶植起穆斯林国家。这两大宗教之间的斗争在这个地区是十分激烈的，从 12 世纪至 15 世纪，埃塞俄比亚对伊斯兰教的反抗表明了这一点。在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埃塞俄比亚皇帝（Negus）得到了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新的基督教势力的帮助。

在本书第 17 章里，T. 塔姆拉特教授着重讲述了盛行于埃塞俄比亚的非洲基督教的特殊形式，它仍然保持自己原有的艺术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教堂。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圣路易”的拉利贝拉国王(1181－1221 年在位)，建立了一个他称之为“新耶路撒冷”的新都；这位虔诚的统治者希望这一首都成为臣民参拜的圣地，因为埃塞俄比亚和亚历山大主教区及基督教发源地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了。修道院遍布埃塞俄比亚高原各地，在这些寂静高耸、坚不可摧的庇护所中，僧侣们记录下帝王的历史，并筹划改革。15 世纪中叶，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处于极盛时期，它所保存的基督教早期仪式已成为非洲人的宗教仪式。古代库希特语言，在节日庆祝、舞蹈、歌唱和献祭仪式中仍留下影响。这里可以再次看到，对于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说来，非洲维护了本身的个性，正像非洲的伊斯兰教一样，完全采取了非洲的形式。

3

沿着海岸线，从非洲之角到马达加斯加，一种原始的穆斯林非洲文明在穆斯林商业区周围发展起来，这就是斯瓦希里文明。斯瓦希里语就是这种文明的表现，它保留了班图语的语言结构，又有许多阿拉伯的外来语；它普遍应用于东非洲沿海一带及大湖区，并从那里逐渐扩散到刚果河流域。这样，伊斯兰教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这些地区。

人们往往想了解伊斯兰教不仅在非洲而且在其他地区迅速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这里须记住，阿拉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北非洲柏柏尔人或“法拉欣”(*fallāhīn* 北非农民）并没有多大差异。在苏丹，除了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战争频繁的那些年代，伊斯兰教在内地的传播是相当缓慢而温和的。伊斯兰教没有象西方基督教那样设立教士或传教团。它是城市和宫廷的宗教，不去打破传统的结构。无论是苏丹的国王还是东非洲的统治者，都不曾进行以改变其臣民的信仰为目的的战争。贸易是最为重要的考虑，而伊斯兰教又显示出足够的灵活性，除对被征服人民征收捐税以外，并无他求；因此，被征服人民还能保持各自的特性。

其次，这一时期的第二个主题与伊斯兰教及其传播有密切的联系，这就是贸易关系、文化交流和民间接触的异常广泛的发展。从印度河到直布罗陀，从红海到马达加斯加，从北非洲到撒哈拉以南地区，人和货物的流通如此自由，以至罗伯特·科尼文在写到穆

斯林世界成为经济统一体和非洲的伊斯兰教在政治上不依附于巴格达时说:

> 在现代世界中，边界造成了麻烦，人们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每次都必须有护照和签证，简直想象不到有这样的统一体。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穆斯林的朝圣者或商人无论走到哪里，从印度河到西班牙或苏丹，他们会发现到处都是相同的语言、相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同的宗教，至于被视为异端的哈列哲教派和什叶派，与其把它们看作宗教方面的差异，不如说是政治方面的差异。

从 12 世纪到 16 世纪，非洲成为国际贸易的汇合处，对世界其他地区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在本书第 26 章里，J. 德维斯雄辩地论证了在中国占有优势之前，正是印度洋面不是地中海成了以阿拉伯三角帆船航行海上为基础的伊斯兰教的海。

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也同样发展起来。庞大的商队，甚至拥有 6000 匹或 12,000 匹骆驼的商队，从北到南穿过撒哈拉，驮运粮食和各种货物。在苏丹热带大草原和更往南的森林区之间，从卡萨芒斯河到几内亚湾，这地区繁忙的贸易交流并不为阿拉伯人所知；在阿拉伯人看来，除了他们所知的加奥和马里地区之外，其余地方都是沙漠。当今的考古学、地名研究和语言学，帮助我们较好地认识了热带大草原和森林之间历史悠久的联系。赤道以南并没有穆斯林的影响，但是地区间的交流也有相当大的规模，这是人口迁徙和市场交流或集市频繁的结果。 4

对非洲大陆文化的基本统一性，大概也可以从这一时期各地区之间所进行的交流来解释。新的粮食作物传入了非洲，这主要来自印度洋，栽培技术也从一个地区传到另一地区。为了揭示出苏丹以南非洲的本来面目（阿拉伯人和其他外国人还很少了解这个地区），本书第 19 章至 23 章的作者着重论述了从大湖区到刚果河、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这个广大的区域几乎未曾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在谈及上尼罗河流域，从阿斯旺到尼罗河源头之后，我们将专门论述非洲南部。除了黄金之外，非洲通过印度洋向阿拉伯和印度输出加工的和未加工的象牙。苏丹兴旺的手工业和尼日尔河谷富饶的农业对横穿撒哈拉的贸易都有所贡献：谷物、便鞋、皮革和棉织品输往北方；而尼亚尼和加奥的王室宫廷、诸如廷巴克图的市镇以及卡诺和卡齐纳等豪萨人城市则主要是输入丝绸、锦缎和装饰华美的武器等大量奢侈品。

苏丹也向马格里布和埃及的宫廷输送奴隶，女奴用于后宫，男人则充当御前卫士。值得注意的是苏丹的朝圣者也在开罗购买奴隶，特别是购买有艺术才能的奴隶，包括乐师在内。有些作者过分夸大了从苏丹和东海岸出口到阿拉伯国家的奴隶数目。必须强调指出，虽然在伊拉克、摩洛哥或马格里布一般说都有不少黑奴，但是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期的奴隶贸易，却不能同新大陆发现之后欧洲人为美洲出产糖和棉花的种植园提供劳力而在非洲大西洋沿岸进行的奴隶贸易相比拟的。本书第五卷和第六卷将集中论述这种“大出血”的奴隶贸易。

最后，第三个主题，即着重论述 12 世纪至 16 世纪非洲各王国和帝国的发展。多年来，殖民国家的历史学家和研究者总想让人们相信这样一种看法，即在撒哈拉以南发展

5 起来的国家都是受阿拉伯影响的结果。尽管苏丹－萨赫勒地区无疑是有这种影响的（其实，这地区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已经出现过一些王国），同时必须看到，如刚果、津巴布韦和莫诺莫塔帕这样一些王国，并未受到或很少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显然，马格里布和苏丹－萨赫勒城市生活之所以能较好地为人所知，还多亏有阿拉伯人的记载。

撒哈拉两侧都有商业城镇。活跃的商人阶层和文人，在西苏丹的杰内、尼亚尼、加奥、廷巴克图和瓦拉塔等地创造了生气勃勃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撒哈拉北部则有锡吉勒马萨、图瓦特、瓦尔格拉、马拉喀什、非斯和开罗。在中苏丹，在加奈姆－博尔努，在豪萨城市如扎里亚、卡齐纳和卡诺，文化和经济生活也相当活跃。这是受到万加拉人的影响，他们和豪萨人一样精通贸易之道。在非洲东海岸，9世纪和10世纪时阿拉伯－波斯人已在一些港口建立起殖民地，这使蒙巴萨，尤其是苏法拉和马达加斯加成为同印度和中国经常往来的活跃的贸易中心。



图片 1.1　伊德里西在公元12世纪所绘世界地图。图中包括埃及、阿拉伯半岛和伊朗；图右下方可以见到非洲东海岸。伊德里西此图是以托勒密早已提出的制图理论为依据绘制的（原件存皇家图书馆地图原稿收藏室，编号BN/GE AA 2004）

同时，在政治方面，苏丹有它自己的制度和社会结构，而且不曾为宫廷表面上的伊斯兰教所触动。柏柏尔人接受阿拉伯生活方式是非常缓慢的。阿拉伯语只在接近清真寺的文人和苏丹一些城镇富商中间成为交往手段，不存在任何阿拉伯化。甚至于马格里布

6 紧接着被迫接受伊斯兰教之后实行阿拉伯化，柏柏尔人的根基也还很有生机活力，直到今日柏柏尔人的语言仍在山区使用。埃及变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文化中心，它取代了不再保持圣地声誉的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其他阿拉伯城市。自10世纪和11世纪起，马格里布和西安达卢西亚便成为向欧洲传播科学和哲学的重要中心。它们在欧洲的科学和文艺复兴中起了重大作用。

穆斯林的影响还达到意大利南部，因为伊德里西于1154年在信奉基督教的西西里国王罗杰的宫廷中写出了他的名著《地理志》，书中汇集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世界各国的知识。伊德里西的书是一大进步，由于他的书，意大利发现了非洲，以后意大利商人对这个富庶之乡产生了兴趣。但是，欧洲人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从政治方面看，在把黄金从苏丹输往西班牙的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时代之后，自12世纪初起，穆斯林就很快失去了势头，他们的帝国趋于衰落。卡斯蒂尔国王阿方索六世从穆斯林手中收复了富裕的城市托莱多。1086年伊本·塔什芬一度重振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声威，曾率领一支穆斯林军队(其中包括来自塔克鲁尔的大队人马)，在扎拉卡取得了对基督教徒的辉煌胜利，在那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黑人士兵战功卓著。在非洲本土，在苏丹和马格里布，11世纪是以阿尔莫拉维德政权的瓦解告终的。马格里布和撒哈拉的卡比拉[①]之间的争斗，1087年阿布·巴克尔在塔甘特死去之后加纳各省的反抗，使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事业终止了。

因此，12世纪初，在北非洲，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在一些方面逐步退却。"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冒险入侵非洲海岸，并强迫伊斯兰教各国海盗船停舶的一些港口纳贡。但是，这种蛮横行为很快于12世纪由阿尔莫哈德王朝领导的穆斯林复兴势头制止了。东部的埃及，在阿尤布王朝时代开始复兴，特别是13世纪和14世纪在马木路克统治下得到发展。这时期基督教徒在中东加强了十字军运动，但是，埃及在马木路克王朝统治时阻止了欧洲势力的推进；十字军被迫退到"克拉克"(krak)或要塞之中避难，他们失去了对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在13世纪至14世纪，埃及遏制了基督教入侵的危险，这里各种学派兴旺发达，使穆斯林文明大放异彩。这也是苏丹各王国和帝国实行扩张和达到顶峰的时代。 7

在第6至10章里，黑非洲的专家们研究了马里、桑海和加奈姆-博尔努诸国以及位于尼日尔河湾内的莫西和达贡巴等王国的起源。例如，研究马里和莫西王国的制度，揭示出它们非洲传统的共同基础。伊斯兰教作为马里和加奥的国教，促进了知识阶层的成长。自加纳帝国形成以来，万加拉（桑海和马林克族）的商业能手们推进了这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他们组织商队前往南部森林，用熏鱼、棉货和铜制品换回柯拉果、黄金、棕榈油、象牙和名贵的木材。

马里的穆斯林皇帝以牺牲马格里布为代价，发展了和埃及的关系；这个在12世纪还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帝国，至14世纪发展到全盛时期。幸而有伊德里西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巴克里提供的情况，才使我们得知塔克鲁尔、铎、马里和加奥诸王国的生活方式。曼丁、瓦加杜和塔克鲁尔流传至今的传说，使我们了解到，在加纳帝国崩溃后，各省继承者为了夺取最高权力，相互间的斗争是多么残酷。

现在，对口头传说的研究，使我们知道，在加纳衰落和马里崛起期间，有一个索索族统治的时期；索索族是由索宁克 - 曼丁哥人分裂出来的集团，他们反叛伊斯兰教，一度统一了曾经由卡雅·马汉统治的地方。13世纪时，马里王国开始崛起。1235年，伟大

---

① 卡比拉（*Kabīla*, pl. *kaba'il*）："一个大的父系亲属集团，其成员自称是同一祖先的后裔"，他们可以"共同拥有一处放牧地区"。《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4卷，第334-335页。在本卷中，*kabīlas* 为复数。

的征服者松迪亚塔·凯塔在著名的基里纳战役中打败了索索族国王苏曼古鲁，建立了新曼丁哥帝国。松迪亚塔遵循他的祖先1050年改信伊斯兰教的传统，恢复了黑人与阿拉伯的商人和文人的联系。从1230年到1255年，他建立起各种制度，这在以后几百年间一直影响着西苏丹一个又一个的帝国和王国。撒哈拉再次有朝圣者经过，穿越沙漠的大量运输贸易重新恢复了。

商人和黑人朝圣者在开罗的大街上相遇，黑人使馆在马格里布各城市里先后建立。14世纪，在光辉的穆萨一世和苏莱曼两位曼萨（mansa）统治时期，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和经济交往格外密切。在中苏丹，加奈姆和博尔努仍继续与埃及和利比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阿拉伯的资料，包括各地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再次证明14世纪时苏丹的情景。这里应特别提到某些阿拉伯作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旅行家和宫廷秘书，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大批有关非洲的，特别是14世纪非洲的珍贵资料。

8 中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是马格里布的伊本·哈勒敦（1332－1406年）。他先后在非斯、突尼斯和安达卢西亚的宫廷里卷入当时的政治生活。遭遇各种不幸之后，他隐退幽居从事写作。他的不朽著作《历史》（《*Kitāb al-'Ibār*》一译《殷鉴书》），其中一部分译为《柏柏尔史》，是马格里布从未有过的最详尽的社会史著作，其中有一卷包含着一些关于马里帝国的著名篇章。全靠伊本·哈勒敦给我们提供13世纪和14世纪（直到1390年）历代国王的名单。他的名作《*Mukaddima*》，即《历史导论》，就其价值而论，无疑是一篇不朽的重要著述；它奠定了社会学的基础，根据有鉴别的史料确定了科学的和客观的历史学原则。

伊本·巴图塔是14世纪的真正的全球旅行家，他记述过中国和非洲东海岸的情况，还写过关于马里之行的报道，这些至今仍是人类文化学研究的典范。他的探讨几乎无所不包，其内容涉及生活方式、食物问题、政府形式、民间风俗习惯等，论述上力求确凿无误。正是伊本·巴图塔给我们提供了有关东非洲沿海一带的丰富资料和非洲各地区之间的贸易情况，他还谈到印度洋贸易的重要性。他在描述马尔代夫群岛时写道：

> 这里的货币是玛瑙贝。是人们从海里采集来的一种小生物。他们把它放进坑里，让贝肉化掉，只留下白色的壳……他们以这些玛瑙贝为媒介进行贸易，一般按4个布斯特（*bustu*）换一个第纳尔（dinar）计算，但有时其价值降到12个布斯特换一个第纳尔。他们将玛瑙贝卖给孟加拉人以换取大米。玛瑙贝也是比拉德－孟加拉人使用的货币……苏丹人（黑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也使用这种货币。1150年我在马里（尼亚尼，在马里帝国内）和古乌（加奥，桑海首都）见过出售这种玛瑙贝，售价是一个金第纳尔。

这时期，苏丹大多数王国的通货都是玛瑙贝。在马尔代夫发现玛瑙贝这一事实，恰好证明当时非洲和印度洋之间人和货物的交流有了高度的发展。

在对文献仔细甄选的基础上给我们提供准确资料的第三位作者是伊本·法德尔·阿拉·欧麦里，他在1340年和1348年间任马木路克宫廷的秘书。当时苏丹国王们在开罗

没有领事馆，帮助数以百计的朝圣者去往麦加。欧麦里自己可以使用一部分王室档案，还能向那些见过途经当地的苏丹王公的开罗市民，或来自苏丹的旅行者们搜集资料。他的《埃及以外的非洲》是中世纪非洲历史的主要材料之一。最后还有一位作者，即利奥·阿非利加努斯，他是教皇的客人，16 世纪初曾两次访问苏丹。他关于西苏丹和中苏丹的记述对我们非常重要，因它涉及“白色轻帆船”风行一时的历史交替年代。16 世纪末，苏丹全面衰落，其城镇逐渐失去往日的繁荣。

9

五个世纪之后，1914 年昆比萨利赫（在加纳）被发现并经过发掘。最近 10 年来，位于昆比和锡吉勒马萨之间的著名商业城市奥胡达古斯特的遗址吸引了众多考古学家，J. 德维斯和 S. 罗伯特教授在那里发现了人类居住过的几个层面。同时还发现了宝藏，证明奥卡尔的确是“黄金产地”。往南是马里的古都尼亚尼，一个用土砖建筑的城市，那里的古坟发掘和清理工作正在进行；还有松迪亚塔和穆萨一世曼萨的首都，这个中世纪的城市也逐年露出了它的真容。考古学越来越证明自己是不可缺少的科学，因为从非洲大地上取得的物证，比书本和传说更有说服力。

现在让我们转向伊斯兰并不知晓的那一部分非洲。如前所说，缺乏文字资料并不影响大局：关于这一点，赤道非洲、中部和南部非洲是最好的证明，这些地区的石料建筑遗址使人联想起古代埃及诸王国。远至内陆地区，在津巴布韦和马蓬古布韦，也可见到许多用巨石砌成的建筑。这些坚固的城堡和巨大的梯道是班图人建造的，说明某些技术远在使用文字之前已经得到发展了。这里没有必要去详述对这些巨石遗址的建筑者的评论，不待说，殖民主义者绝不会承认这些惊人的建筑是绍纳人或马塔贝勒人的祖先遗留下来的。殖民主义历史学家从来都不承认黑人善于用石料来构造建筑。巴兹尔·戴维森《白人来到之前的非洲》一书中第 9 章是论述中部和南部非洲的，题为“南方的建设者”。在这本书中，他对非洲历史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把本来属于非洲的非洲人祖先的业绩，公正地还给了非洲。

绕过好望角来到非洲东海岸的葡萄牙人，在苏法拉听说内陆有一个强大的帝国。他们甚至和经常来到沿海地区与阿拉伯人贸易的非洲人有过接触。最早的葡萄牙人记载中提到过贝纳麦塔帕王国。在最先描绘巨石建筑遗迹的记载中，有一篇是D. 达－戈埃斯写的：这些遗迹通过照片，现在已是众所周知。据他描述：

> 在这个国家的中心区，有一座内外都用又大又重的石头建造的城堡……非常古怪的结构，出色的建筑，据说看不出把石头粘接在一起所用的灰浆。在这片平原的其他部分，也有另一些以同样风格建造的城堡，每个城堡都有国王委派的将领。贝纳麦塔帕国王生活豪华，备受尊敬，臣仆得跪着伺候他。②

德·巴罗斯补充说：“这个国家的土著人，称所有这些庞大建筑为‘西姆巴奥’（Symbaoe），按他们的语言意思是‘宫廷’；这大概是指贝纳麦塔帕王国所在地，他们因此把国王的其他住所也称作‘西姆巴奥’，因为那些住所都是王家的产业”。③这使人联想到“马杜古”

10

② 译自D. 达－戈埃斯（D.da Goes），法文译本，未注明出版日期。

③ J.德·巴罗斯（J.de Barros），英文译本，1937 年。

(Madugu)，它是马里统治者住地的名称。

今天，由于许多研究工作者的努力，对非洲中部和南部有了较多的认识。在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建筑物和它们的创造者已经更多地为人们所了解。津巴布韦和姆韦尼·马塔帕（葡萄牙人所说的贝纳麦塔帕和现代所说的莫诺莫塔帕）都是强大的王国，在11世纪至14世纪之间达到了极盛时代；在同一时代还有北方的加纳和马里帝国。这些王国的权力都是以强有力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为基础的。如同卡雅·马汉，姆韦尼·马塔帕（这是王室称号）拥有黄金垄断权，像他们的苏丹同辈一样也是“金属之王”[4]。这些地区，即今莫桑比克、津巴布韦、赞比亚和马拉维的部分地区，是一片富藏铜、金和铁的地方。据巴兹尔·戴维森说，“成千上万的古代矿坑已被发现，其数目大概有6万个或7万个”。

年代顺序上仍有不少问题，但可以确定，葡萄牙人到来时，尽管津巴布韦和姆韦尼·马塔帕还是大国，但已开始衰落了。葡萄牙人和接踵而来的其他欧洲人的贪婪和劫掠，加速了这一衰落过程。这些地区的居民进行梯田耕作，农业相当发达。情况越来越清楚，不同的族群和当地文化都起源于班图人。人种学上有时把一些民族群体看成是不同的种族，这一点是有损于历史的；幸而语言学帮助我们重新认清了上述情况。所有从四个世纪奴隶贸易和捕猎黑人的混乱中分化出来的小群体，原来都属于同一个班图人世界。班图人在早期人群中崭露头角，他们将俾格米人和其他非黑人群体驱赶到不宜于居住的森林和沙漠中去了。赞比亚在进行文物发掘工作，年青的津巴布韦共和国提供了大有希望的研究领域。在德兰士瓦和南非其他地区，12世纪以前灿烂文明的遗迹仍然存在。

在津巴布韦和姆韦尼·马塔帕首次被认为属腓尼基人之后，关于圣经中“俄斐”产金地的美妙神话重新流传，但是研究工作者们已经转到比较客观的见解上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现在确认这种外来影响是不存在的。访问过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埃及学家戴维·兰德尔－麦基弗宣称，那些遗迹起源于非洲人。他的著作表达了科学的考古学观点：

11

> 无论任何时期都没有任何东方或欧洲模式的痕迹……巨石建筑遗址中居住者的特征，其组成部分，无疑是非洲人的……除了一些明显是中世纪的或中世纪后期传入的物品外，房屋中所发现的物品，就艺术和技术范例来说，都是非洲典型文物。

这份材料是1905年写的，但是考古学的证据并没有使“俄斐”论者放弃其主张。约25年之后，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博士写了一部关于津巴布韦文化的著作，巴兹尔·戴维森认为她以一个大考古学家的直观，透彻地证实了麦基弗在她之前所作的论述。卡顿－汤普森博士的著作是以精确的考古学研究为基础的，她写道：“从各个方面来研究现有全部证据，都不能找出一件不符合于班图起源说和中世纪年代的物品。”[5]在本书第21章中，

---

④ 某些作家认为，姆韦尼·马塔帕（Mwene Mutapa）的含义是“掠夺者之主”，另一些作家则认为是“金属之王”。

⑤ G.卡顿-汤普森（G. Caton-Thompson），1931年。

B.M.费根教授的考古资料研究，揭示了津巴布韦和南部非洲的其他文明早在16世纪以前已有很大发展，而且几乎完全不受外来影响，或者说，至少外来影响对这些文明的起源没有明显的作用。

我们很容易想象，假如那时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像他们访问加纳和马里那样，访问过津巴布韦和"金属之王"的王国，我们就会得到阿拉伯作家写的夸张的报道。他们大概会这样写："大津巴布韦和它的石建围墙，像金字塔一样神秘地耸立着，它们是那统治着居民的制度强盛而有内聚力的见证，人们建造这些纪念物来赞美他们的国王和他们的神灵"。

当葡萄牙航海者到达以塞内加尔河港湾为起点的"西方的埃塞俄比亚"（现在的西非）时，他们感到多么意外和惊奇。在塞内冈比亚，他们和马里的曼萨们有了接触，并且和沃洛夫人的君主建立了联系。这些穆斯林竞争者，乘坐轻快的帆船，刚到港湾一带航行，就打听黄金的来源。首先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政治和行政组织、它的繁荣和财富的丰裕。越是向南航行，他们越发觉得自己贫穷，贪心越来越大，从而他们那种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感也越来越少了。

在本书第12至14章，我们可以读到上几内亚的大西洋海岸和几内亚湾一带的情况，换句话说，就是关于塞内冈比亚和尼日尔河三角洲的报道。尽管所知有限，我们也了解 12 到——正如许多非洲学专家们所主张的那样——森林地区绝不是不适于人类居住的环境：这个可供研究的广阔领域，已经给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敞开了大门。贝宁的各城市、约鲁巴人的优美雕刻，都是在森林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今天在大英博物馆、柏林和布鲁塞尔的各个博物馆里，可以见到不少的铜铸头像、宫殿浮雕以及许多艺术品——过去以为不是出自非洲人之手的，现在明智的判断已经普及了，把这些艺术品放在它们的社会和文化范围内来考查，才认识到它们的创造者只能是土著非洲人自己。今天已经找到了灿烂的诺克人的陶器文明（早于基督教纪元前500年）和贝宁青铜器文明（基督教纪元12－15世纪）之间的联系。可见，关于非洲的过去，连篇累牍的歪曲费了多少笔墨，而剥夺非洲的艺术杰作又有多少罪行！

以上简短的概述，给我们说明，非洲有过许多类型的国家。氏族或世系是国家的萌芽形式；氏族成员公认一个共同的祖先，并在公选的一位首领或家长的保护之下生活；首领或家长的基本职责，就是保证集体财富的公平分配。他既是养民之父，又是裁决之主。氏族居住在一片有明确界限的领土之内，假如氏族成员是从事游牧的，他们还有一个牧区。在沙漠（撒哈拉）或森林里，各氏族所占领土或大或小，他们也往往和其他一些定居者建立共生关系，互相交换他们的劳动果实。氏族首领没有任意作决定的权力，但当集体收入增加时，首领也从盈余中得到好处，而且不再亲自参加劳动：他变成了由土地分配引起的纠纷的裁决者。

王国是由几个氏族共同组成的。在通常情况下，国王就是最强大的氏族的首领，例如，凯塔氏族就是这样成为13世纪马里帝国的创始者。国王由一个委员会辅政，其成员的生活也靠他供给；王国占据一片相当广阔的领土，但其中每个氏族仍保持土地占有的惯例，特别是保持其宗教礼仪。重要的是必须对国王忠诚，这表现为进贡和纳税（通常

是实物税)。尽管国王是政治统治者，但是他仍保持氏族首领的宗教特征，他是神圣的。这种“神圣”性，以刚果的国王、莫诺莫塔帕的统治者和马里皇帝为例证，都是很明显的：他们的臣民都用他们的名字宣誓。

那些在理论上被我们称为“皇帝”的统治者，虽然未必一定控制广大的地区，但至少也统治着一些有相当自治权的国王。例如阿尔莫哈德王朝的帝国，它包括马格里布相当大的一部分；由卡比拉(*kabīla*)或氏族产生的素丹，其下属是其他的素丹，而后者对氏族首领或谢赫(shaykh)们也有其权威。马里皇帝或称曼萨(mansa)，拥有2个王国12个省，都在他的统治之下。无论国王或皇帝，这些君主总是由一个委员会辅政；这种委员会一般是起调节作用，因为还有“法规”或“惯例”对权力起限制作用。

13

我们还提到城市国家，事实上是指一些领土限于一个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王国。豪萨人的城市或贝宁的约鲁巴人城市，是城市国家的典型例子。它们的结构组织也是相当复杂的：官员和贵族组成了国王的宫廷。豪萨各城市公认道拉为母城；约鲁巴人的母城则是伊费。这些城市国家之间常有战争，但是共同文化的纽带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们在本书的词汇中排除了“分裂”或“无国家的”社会等词语，虽然这类词语在某一时期的研究者和史学家笔下是常见喜用的。同样，我们还排除了“部落”(tribe)、“含米特人”(Hamitic)、“拜物教徒”(fetishist)等词语。在非洲某些地方，“部落”一词带有贬意。因争取独立或社会与政治矛盾而发生冲突，称之为“部落战争”，实则贬为“野蛮人之间的战争”。所谓“部族主义”(tribalism)这个词也是为了形容这种情况而使用的。最初，“部落”是一个社会文化群体的名称；今天，如再用它来写非洲，其含义就是指“原始的”或“落后的”群体了。“拜物教”一词总是贬意的，通常用来形容非洲传统宗教——如果把非洲人的礼仪称作为宗教——它就成了“骗术”或“野蛮人宗教”的同义词。用“泛灵论”(animism)来描述非洲的传统宗教，也有消极作用。我们宁可讲非洲人有传统宗教，而不提“拜物教”或“泛灵论”。

“含米特”一词有很悠久的历史，原是用来描述某些从事畜牧的白种人的，即所谓“文明的承担者”。这种设想中的牧人，连其真实性或历史存在都从未得到证明，却被认定曾经在大陆各地周游，把文化和文明带给了从事农耕的黑人。奇怪得很，“含米特”的词根“哈姆”(Ham)，在圣经中是指黑人的祖先，它怎么会变成白种人的称呼，这是一个难解的奥秘。其实，这是历史上最迷惑人的事情之一。殖民国家的历史学家总是认为牧民优越于土地耕作者，但又没有事实根据。可悲的是殖民主义使氏族之间、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对抗同时加剧了，因而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独立前夕留下了真正的火药桶，结果引起了图西人和巴胡图人的争斗。1962-1963年的迫害和流血事件，无疑应归咎于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在他们的“殖民地”各氏族之间，即在从事畜牧的“含米特人”和从事种植的“黑人”之间，比利时殖民者煽起不和的火焰，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了。

14

一定要使历史还原为非殖民化的，其途径就是要打倒种种荒谬的理论，除掉殖民主义者为建立其统治和剥削体系、为其侵略政策辩护而制造的一切偏见——这些虚伪的、非科学的论述至今在许多著作甚至于我们学校的教科书中仍可见到。总之，重要的是讲求历史的精确性，恢复其本来面目。

2 在阿尔莫哈德王朝统治下马格里布的统一

O. 塞迪

阿尔莫哈德王朝统治时期，自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中叶，标志着统一马格里布甚至统一整个穆斯林世界西部的尝试达到顶点。阿尔莫哈德王朝的统一企图，既远远超过先前的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一些后起的强国也曾力求仿效，但都徒劳无功。统一的尝试发端于阿尔莫哈德王朝著名的马赫迪（Mahdī）伊本·图马特领导的一次宗教“改革”；这改革依仗一个组织完善的“群体”，穆瓦希敦（*Muwahhidūn*，即唯一神教派），由此发展成为一项完整的政治计划。统一事业由穆敏王朝的统治者们倡导，这个王朝的创建人是伊本·图马特最早的知名密友之一。 15

这统一事业远不只是出于宗教、政治的动机和目的，它还受到经济上考虑、使命和压力的影响。两个基本因素是：一方面要控制穿越撒哈拉的各条主要商路（或至少是控制它们的北方出口），另一方面则是把先前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领土扩展到马格里布和伊弗里基亚，使马格里布各个经济发达地点和整个穆斯林世界西部一体化。

马格里布的宗教情况和阿尔莫哈德王朝的追求

正统教义和伊斯兰教

11世纪中叶，虽然埃及的法蒂玛王朝[1]政治上已经衰落，但具有改宗倾向而又崇尚经文内在含义的巴颓尼－什叶派，或称达瓦（*Da'wa*），却仍拥有实力；自9世纪中叶穆尔太齐赖派受挫以来即已开始的统一运动进展缓慢，社会还是一盘散沙。

各种各样追求统一的途径已可辨认，只是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教义。其中一种途径是基于对逊尼派传统和圣训（*hadīth*）研究的禁欲苦行思想，它容易陷入苏非派神秘主义的极端；另一种途径是从事法规汇编，往往流于形式主义，追求半机械化的礼仪；第三种途径则是对艾什尔里综合神学主张[2]的深化和提炼。 17

人们可以看到，这些与什叶派思想和哲学（*falsafa*）相对立的探讨、这些部分人但又

[1] A. 拉鲁伊（A. Laroui），1970年，第163页。

[2] 艾什尔里（al-Ash'arī，生于873－874年，卒于935－936年），见《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1卷，第694－695页。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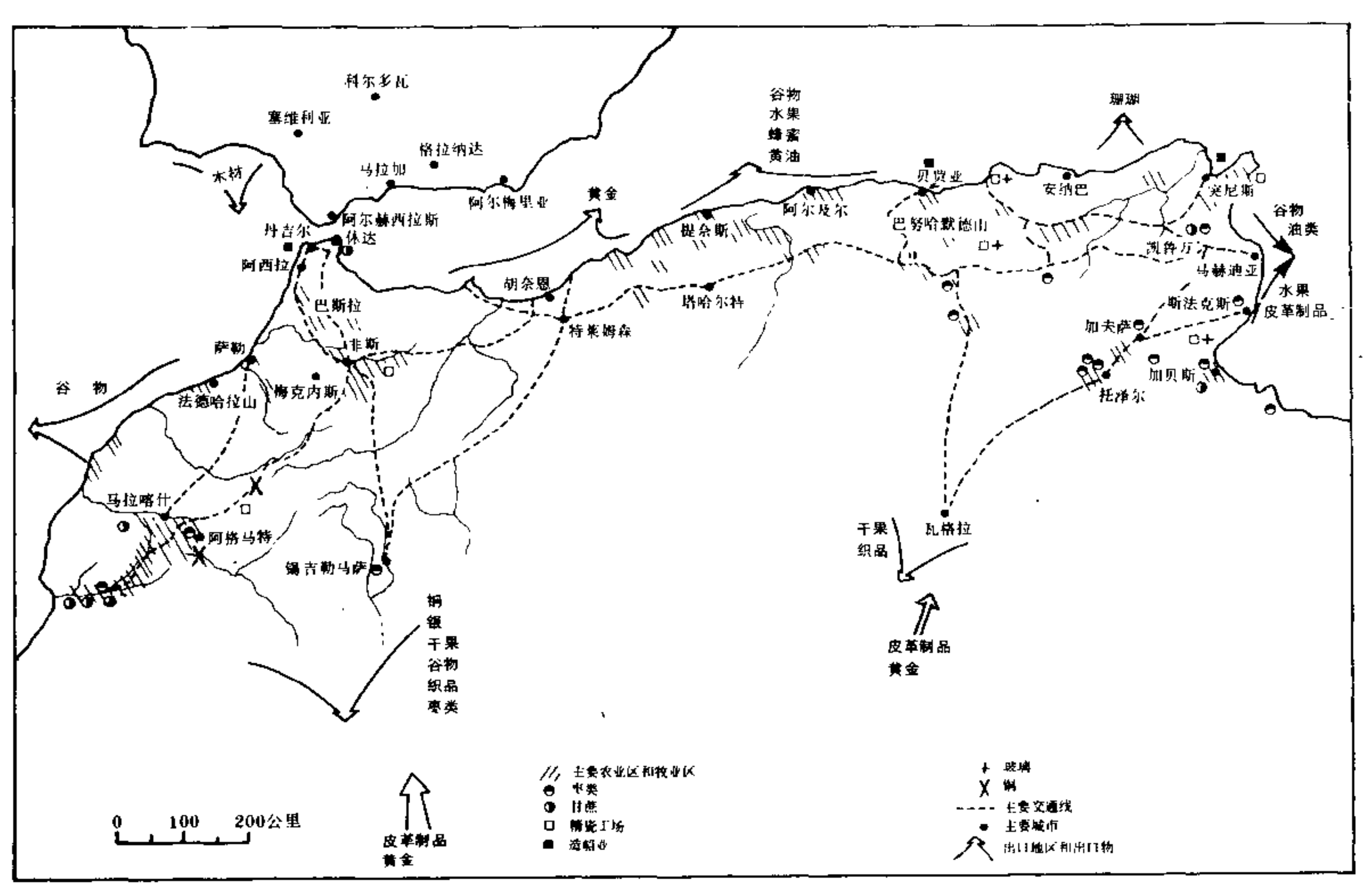


图2.1 12世纪的马格里布——经济情况（J.德维斯，据O.赛迪和C.瓦纳凯的原始资料）

不仅是某些个人所主张的对教义综合系统化的追求，其目的显然是真正致力于社会的统一，这种追求长期持续不断，在一定程度上相应也反映出伊斯兰教的分裂状况。正是根据这些发展情况，我们必须考察一下马格里布和整个穆斯林地区西部伊斯兰教及其正统教义的处境。③

伊斯兰教在马格里布很难确立其统治，也很难实现统一。④它在那里遇到以“异端”形式出现的哈列哲教派的顽强抵抗：哈列哲教派的特点是无政府思想和平均主义的混合体，对游牧和农业社会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一异端教派在思想和组织形式上利用民族传统，当时伊斯兰政权为巩固本身地位而在柏柏尔人中推行的一套特殊方法使这一异端教派得益．它的宣教士在柏柏尔人中既抨击哈里发世袭制，也批判任何一个部落（即使是先知的部落）占优势地位。⑤

马格里布的哈列哲教派在教义上态度是灵活的，所有反对派都可以利用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招牌；采用这一名称有时就表示对履行宗教义务采取漠视态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否定伊斯兰教本身。此外，我们还须记住长期保存下来的柏柏尔人习惯法仍然存在，它往往与伊斯兰法背道而驰，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优素福・塔什芬时期。

尽管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还有伊德里斯王朝和法蒂玛王朝，都曾大力传播伊斯兰教，但直到阿尔莫拉维德与阿尔莫哈德王朝时代，伊斯兰教主要的败坏现象才开始消失；其中包括相当明显的柏柏尔人异端形式。至于它所掩盖的社会经济观点则尚未充分加以研究。

马格里布的伊斯兰教还有一个流传至今的特点，即采纳马立克派的学说。马立克・伊本・艾奈斯的门徒，如伊本・卡西姆等人是通过本地的信徒在马格里布传播和巩固其教旨的。⑥凯鲁万很快成了马立克学派的中心，造就出一系列有名望的法学家；其中有伊玛目萨赫嫩（公元 776 - 854 年），他是伊本・卡西姆教派的热情宣传者，因经常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而获得成功，特别在抵制 10 世纪法蒂玛王朝什叶派的攻击时卓有成效。⑦

18

同时，由于宗教法的基础——古兰经和圣训——的地位日益缩小，富录（*furū'*，实用法学论文）手册便成了法律实践的主要权威。正如一位大学者、科尔多瓦的卡迪（*kādī*）阿斯巴赫・伊本・哈利尔的教导所表现的那样，这种倾向甚至于蔑视对圣训的研究。⑧为数寥寥无几而又缺乏自信的持不同意见者，诸如提出疑义的巴基・马赫拉德⑨面对马立克学派法学家“行会”所组成的坚固堡垒，简直无能为力。这类马立克学派法学家往往是

---

③ 显然伊本・图马特（Ibn Tūmart）是反对马格里布这种宗教状况的，这实际上反映了当地的真实情况，也表明了整个穆斯林世界西部对伊斯兰各派宗教思想的态度。

④ I・戈尔济赫尔（I. Goldziher），1887 年；M. 塔尔比（M. Talbi），1966 年，第 17 - 21 页。

⑤ 关于上述论点取得成功的情况和柏柏尔人的倔强态度，见M. 塔尔比，前引著作，第 19 页。

⑥ 伊本・卡西姆（Ibn al-Kāsim，公元 806 年死于开罗）著有《穆达瓦纳》（*al-Mudawwana*），这是伊玛目马立克・伊本・艾奈斯（Mālik b. Anas）本人名著《穆瓦塔圣训实录》（*Kitāb al-Muwatta'*）以外的马立克学派最主要的著作。

⑦ H. 莫内（H. Monès），1962 年，第 197 - 220 页。

⑧ 关于马立克学说在安达卢西亚的情况，见 I. 戈尔济赫尔，1903 年。

⑨ 关于这位科尔多瓦的教义辩护士，见《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 1 卷，第 956 - 957 页。

富有的地主。

当地形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法学家或富卡哈（*fukahā'*）对于在穆斯林世界东部流行的唯灵论教义缺乏兴趣。[30] 他们自称掌握着真主教导的“真谛”，排斥一切在他们看来只能是腐化根源的解释。这种态度不仅有其矛盾，尤其在神性问题上还遇到一些困难；因此，这些马立克学派的富卡哈被指责为拟人神论者或哈什维亚（*hashwiyya*），即主张将神人格化，他们只关注外界因素，盲从于实用法学，依靠外表上遵循法律要求来感化教徒而不容许教徒有内在的宗教感受。

既然没有更新教义或深入探求的企图，马立克学派排斥和压制一切的统治，也就把最终盛行于穆斯林世界东部的沉思冥想研究方法的少数支持者置于孤立地位。这种极端的保守主义激起了以自由思想为名的强烈反应，甚而促成了一种世界性宗教的兴起，导致多种学说并存的平行论，[31] 排除把不同教义合成一体的企图。令人遗憾的是马格里布当时并没有艾什尔里的思辨性神学，这个神学派别力图在穆尔太齐赖教派的理性唯灵论与拟人神论者的字义主义之间发现一种折中途径。就连伊本·鲁什德这样的哲学家也鼓吹在穆斯林世界的西部推行多种学说并存的平行论。这些哲学家认为广大教徒是不会接受思辨性思想的，他们甚至指责艾什尔里派打乱了平民百姓的信仰。客观上他们是为马立克学派的利益服务，因而马立克学派对他们采取了不可思议的宽容态度。

19

总之，在伊本·图马特时代，马格里布和安达卢西亚的伊斯兰正统教义首要关心的是制定法规；那时根本没有悬念或玄秘的容身之地。宗教变成为一种预想、预测和“权衡利弊”的事业；它代表着礼仪的胜利，变成某些仪式的单调重复，借以保证人们得到报偿。难怪加扎利和伊本·哈兹姆之类大思想家把伊斯兰教这一形态看作仅仅是一种仪式，一种在丧失真正信仰的危险中制定法规的程式。[32] 加扎利在他的名著《宗教科学的复兴》（*Ihyā' 'ūlūm al-dīn*）一书中，尤其强烈地抨击这种类型的富卡哈，谴责他们垄断宗教，利用宗教来统治虔诚的慈善机构和榨取孤儿的财产，以便自己过阔绰奢侈的生活。他还谴责他们用诡辩术为世俗权力的活动作辩护，面对世俗权力表现出一种根本不配称为真正宗教徒的奴性。他否定了他们为重新利用“赋予生命之水”、古兰经源泉和“圣行”（逊奈、*sunna*）而造成的那种单调枯燥的形式主义。正因为如此，加扎利成了马立克学派法学家最仇恨的对象；他们粗暴地攻击他坚持艾什尔里的教条和玄秘倾向，以致放弃了真正的信仰。

伊本·图马特的出身经历

伊本·图马特的命运、其人其事都带有浓厚的传奇、神话和幻想色彩。事实上我们对他所知甚少。[33] 据说，1075 年左右，他出生于今摩洛哥小阿特拉斯山的伊吉利兹-恩-哈

[30] 富卡哈（单数称法基赫，*fakih*）原指学者，后来变为一个专门术语，指宗教法理学专家，《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 2 卷，第 756 页。

[31] 《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 3 卷，第 868—872 页，“伊本·马萨拉”条目。

[32] A. 梅拉德（A. Merad），1960－1961 年，第 379 页。

[33] 《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 3 卷，第 958—960 页。

尔加村。[14]其父属哈尔加氏族，其母属马萨卡拉氏族，都是马斯穆达（今施卢赫）族系的分支。由于传教的需要，他按思想信仰和救世主降临说（马赫迪主义）的要求，给自己取了（仿造）一个阿拉伯名字，并以柏柏尔人编造家谱世系的方法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谢里夫祖先。[15]

他的家庭背景必定是相当好的，其父原来就有南摩洛哥一村或一个氏族集团头人的称号"安姆加尔"(Amghar)，他本人有条件外出求学，长途旅行到穆斯林世界东部完成学业。他的家族，假如伊本·哈勒敦的说法可信，是以虔诚而闻名的，[16]他本人也因为勤学和祈祷的美德而获得"火炬"（*asafu*）称号。 **20**

1107年，伊本·图马特为完成学业而开始长途旅行。有关这次旅行的路线、行程和范围的问题，曾引起相当大的争论，有许多说法。[17]确切无疑地说，与图马特的理想化传记相反，他并没有见过伟大而神秘莫测的伊马目加扎利，也未曾受其训示；[18]相传他从加扎利那里接到在马格里布实行法律改革和摧毁阿尔莫拉维德政权的使命，这是毫无根据的。[19]实际上，他很晚才求助于加扎利的名声和威望。加扎利之名始见于伊本·图马特发迹初年，那时，由马格里布神学煽动起来的对这位东方大伊马目宗教体系的仇恨心早已减退[20]。

伊本·图马特的经历可分为几个阶段。他先后被称为道德监护人，马拉喀什的神学家，阿格马特新学派的首领，公众团体的领袖，牢固树立在群山之上的廷马拉尔的理想掌权人。

看来，伊本·图马特开始是在伊弗里基亚给人们以博学和虔诚的印象的；他多次长久地住在伊弗基里亚，越来越多的信徒聚集在他周围。西行途中，他在贝贾亚（今布日伊）停留。这是哈马德王朝的辉煌繁荣的首都、德行自由之地，这里也是伊本·图马特作为道德监护人活动的顶点。他曾受到警告，面临真实的险情，于是避居到贝贾亚郊外的马拉拉，在那里似乎用了很长时间从事研究和进行思考。

这阶段的活动因其后来产生的政治意义而更显得重要，因为伊本·图马特正是在马拉拉遇见了他后来的继承人阿卜德·穆敏·阿尔维·亚拉·库米·阿布·穆罕默德，后者当时是在赴穆斯林世界东部游学途中，[21]受劝告放弃旅行而留下与伊本·图马特为伴。两人这次会见留下不少的传奇故事和神秘色彩，但应指出一点，即此后伊本·图马特不 **21**

[14] 有关柏柏尔人对"卡比拉"（*kabīla*）一词的解释，见E.莱维-普罗旺卡(E. Lévi-Provençal)，1928年(b)，第55页；R.蒙塔涅（R. Montagne），1930年，第64页。也请参阅《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3卷，第207页。

[15] 他的父亲图马特·伊本·乌加利德采取同样做法，取了一个名字叫阿卜德·阿拉赫。

[16]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法文译本，1852-1856年，第2卷，第163页。

[17] 举例而言，伊本·卡坦(Ibn al-Kattān)，M.A.马基(M.A. Makkī)编，未注明日期，估计是1964年，第4页；伊本·昆富迪（Ibn Kunfudh），1968年版，第100页。

[18] 伊本·阿西尔（Ibn al-Athīr），1876-1891年版，第10卷，第400-407页，否认有会见之事；A.维西·米兰达（A. Huici Miranda），1949年，第14卷，第342-345页。

[19] 伊本·卡坦，前引著作，第14-18页；勒图尔诺（Le Tourneau），1969年，第79页引胡拉尔·毛什亚（*al-Hulal al-Mawshiyya*）。

[20] I.戈尔济赫尔，1903年。

[21] 关于阿卜德·穆敏和他的故土，见《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1卷，第78-80页。

再是单独行动，他西行的路程似乎更有计划性，随行者越来越多。他一有训示或举行讨论，在宗教人士家里必有一系列会议。伊本·图马特开始收集马格里布远方的消息，或许还接见过一些密使。每次停留，必多方接触各界人士。[22]

从萨勒（萨拉）一路来到马拉喀什，伊本·图马特拒绝缴纳过境税。就在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首都，当着阿尔莫拉维德的埃米尔（amir）阿里·伊本·优素福的面举行过一次闻名一时的辩论，伊本·图马特的对手、那些能左右统治者的宫廷富卡哈被他驳得哑口无言。

伊本·图马特的批评超出了神学范围，因而引起险情。宫廷大臣马立克·伊本·乌海布建议将他干掉，但是另一位宫廷要人因坦·乌玛尔，保护他离开了首都。他于是退居阿格马特，[23]开始他一生事业的一个新的决定性阶段；他拒绝按埃米尔的命令去马拉喀什，公开反叛阿尔莫拉维德王朝。

从此伊本·图马特致力于有效地创立和组织阿尔莫哈德运动，其政治目的日益明显——推翻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统治。伊本·图马特渐渐发现自己处在日益壮大的各种势力的精神领袖的位置上，这些势力与其说是出于对法律或严格的伊斯兰教规的纯洁化的关心，还不如说是出于反阿尔莫拉维德的部落感情而联合起来了。

伊本·图马特所倡导的阿尔莫哈德改革

伊本·图马特在道德、教义和法律领域里推行改革的原则、思想及方案，似乎是他在去穆斯林世界东部游学而后又回到马格里布边远地区时构思形成的；同时也是他结识许多同伴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些人人数日益增多，最终随他定居于故土。[24]

22

他所提倡的首先一点是"唯一神论"（*tawhīd*），即认定神的唯一性。按照伊本·图马特的见解，就是"认定独一的神和否定并非真主的一切：神性、合一、圣人或偶像"。[25]根据各方面的圣训（*hadīth*），伊本·图马特深信，对"唯一神论"的认识是崇高的义务；这有三个理由：它是宗教的根基之一，它是最重要的义务，它是最早的也是晚近的先知们的宗教。

阿尔莫哈德派是唯一神论的信仰者，神就是穆瓦希德（*al-Muwahhid*），因而他们自称为穆瓦希敦（*al-Muwahhidūn*），后来才蜕变为阿尔莫哈德派，而且宣扬一种深受加扎利影响的神秘主义。事实上这是返回伊斯兰教的本源而与较为墨守成规的阿尔莫拉维德派相对立，因为后者注重经文而非朴素的法规研究。阿尔莫哈德派以简朴、节制和道德严肃自重，普遍得到不事奢华的柏柏尔乡下人的赞许。值得一提的是马赫迪用柏柏尔语传教，他甚至用母语写出一些短文。在政治方面，他承袭柏柏尔人的方式，依赖贵族议事会的建议，并忠实于施卢赫族系所遵循的法规。

---

[22] 伊本·图马特的旅程图必定有助于考察一些问题，特别是与阿卜德·穆敏几年以后成功的东行路线图相对比，更有意思。

[23] 关于在阿格马特的情况，见《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1卷，第250—251页；J.德维斯（J. Devisse），1972年，第63、66、70页。

[24] 515 H/1121：伊吉利兹，即他的故乡，他安居在那里一处洞穴中，后称圣穴（*al-Ghār al-mukaddus*）；517 H/1123：廷马拉尔，在恩菲斯河流域上游，距马拉喀什西南约75公里。

[25] 伊本·图马特，法文译本，1903年，第271页。

伊本·图马特采纳了穆尔太齐赖教派把“安拉”（Allah）看作是纯粹精神的思想；对古兰经中某些语义含混的短句，他也赞成作比喻性的解释，其中有物有人也有格言，尤其与神性有关的更注意比喻。这些比喻性的术语和格言，不该顺应于人类理性的限度，一个恰当的比喻绝非对比（*tashbīh*）和模式（*taklīf*），[26]这就是他指责阿尔莫拉维德派的基本点之一。[27]他把阿尔莫拉维德派看成异教徒，因他们特别在“拟人神论”（*tadjsīm*），即主张将神人格化上，是有罪的。伊本·图马特在这一点上坚持极端立场，无可避免地导致革出教门的绝罚；因为他按照原则，指出当权者应对其臣民的行为负责，结果就是使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原则上对流传于马格里布的“拟人神论”承担责任。他宣布必须以“圣战”（*djihād*）来对付他们。这更走向了艾什尔里派和穆尔太齐赖派的极端立场。

由于他坚持唯一神论，伊本·图马特否认各种神性的存在，又猛烈抨击他称为“神人合一”派（*mushrikūn*）的人或把各种属性硬加给真主的异教徒。这样，他就站在同一立场上，既反对艾什尔里派，他们认为神性中有永恒的属性，又反对传统主义者，他们认为神性与各种属性有所区别。 **23**

在伊本·图马特看来，以多种最美好的尊名（*al-asmā' al-husnā*）形容神，其意义只在于确认真主是绝对独一无二的。造物主本质上就是永恒存在的、无所不知的、有权威的、有意志的，无人能领悟所有这一切的情态。[28]

伊本·图马特既宣扬神的唯一性又强调神的永生；真主即造物主，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先他而生。真主因而是万物之首源又是万物之归宿，无始无终。[29]他还特别强调真主全能，事实证明，真主不要求创造物超越它们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伊本·图马特十分接近于穆尔太齐赖派。在先知使命的概念上，伊本·图马特采纳了逊尼派的观点，即承认通过显示奇迹（*āyāt*）说明真主使者的真实性。至于他对宿命论这种关键问题的看法则有其政治含义，伊本·图马特不同于穆尔太齐赖派承认神的全能和公正的二重性观点，虽然他坚信神的智慧，却又坚持宿命论。

伊本·图马特的教义中有一成分是明显区别于逊尼派立场的，这就是他信奉由真主引导的马赫迪（完美无缺的导师）。关于马赫迪的传统，起源于先知，相传他奉圣训之命宣告复兴者和救世主的降临，他们属于先知家族。逊尼派认为先知只有在世界末日之前才会再临人世，他将重建和振兴真正的宗教。什叶派则相信世上有一位隐遁的伊玛目，他将重现而实行神权统治。在人民群众中，对马赫迪的信仰广泛流传，因他是正义的象征。迟至14世纪，这种期待才由伊本·哈勒敦在苏斯的马萨证实。[30]

在公元661年阿里死后，伊本·图马特很快便自命为伊玛目，因而人们有义务，无论宗教上或现世各种事物上，都得无条件地盲从于他，仿效他的言行，接受他的旨意，

---

[26] 伊本·图马特给阿尔莫哈德信徒的信，由E. 莱维-普罗旺卡译出，见前引著作，第78页；他在信中告诫其信徒要反对那种把神限制在一定尺度和范围之内的倾向，否则会把神等同于一般创造物；任何人这样做，就成了偶像崇拜者。

[27] R. 布鲁伊巴（R. Bourouiba），1973年，第145页。

[28] 伊本·图马特，前引著作，第235页。

[29] 同上，第232页。

[30] 伊本·哈勒敦，法文译本，1863-1868年，第2卷，第200页。

一切都求教于他，服从马赫迪即是服从真主和他的先知，道理很简单，因为马赫迪最了解真主和他的先知。对一些人说来，伊本·图马特之自命为马赫迪，本是他执行抑恶扬善的天职的自然结果。而对另一些人说来，这仅仅意味着他在利用地方传统和信仰，拼补上伊斯兰教义，借不足凭信但能起非凡作用的圣训来号召马格里布人民。[31]这两种意义并不一定是矛盾的。然而必须着重指出，马赫迪主义的信条，又把阿尔莫哈德教义中能够促使对当时那种表面的形式化的伊斯兰教作深入探讨和使神学得以丰富的各方面内容封闭住了。

在关于个人决断的论题上，伊本·图马特采取了与扎希里学派相同的立场：他否认个人决断是谬误之源。在回答对"念功"（*shahāda*）的质疑时，他曾补充说，这并非绝对的原则（*asl*），而仅仅是在相对意义上表示诚心。[32]

对伊本·图马特说来，古兰经和圣行（*sunna*）当然是制定宗教法规的依据，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也包括公议（*idjmā'*）和类比（*kiyās*）。为了圣训的缘故，伊本·图马特崇爱麦地那，这是他急于靠近先知发祥地的证明。I. 戈尔济赫尔认为，伊本·图马特之所以崇敬麦地那的传统和经验，是因为他不想得罪于马立克学派，[33]我们难以同意他这种解释。关于"公议"（指宗教公社全体一致的意见），伊本·图马特认为只限于先知的同伴。至于"类比"，他的看法相当谨慎，当然，他谴责思辨性的类比（*al-kiyās akli*）。

伊本·图马特在陈述了伊斯兰法学体系（*fikh*）的本源之后，便强调其直接运用，而强烈谴责仅仅援引"富录"（*furū'*，实用法学论文）的那些人。他是抓住这个机会抨击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学者们，在他看来，这些人因忽视和违背传统、有时甚至于蔑视圣训，因而负有罪责。

伊本·图马特认为伊斯兰教法学体系（*fikh*）需要修正和充实，因为马立克和其他学派的领袖都不可能使伊斯兰立法原则（*idjtihād*）达到完善的止境；而任何精通法理基础或本源（*usūl al-fikh*）这门科学的人都能够从中延伸出法律。伊本·图马特指控各法学学派（*madhhab*）的成员失责，说他们抓住某个单一的问题众说纷纭、大做文章是荒谬的。如同扎希里学派一样，他着重指出，对于特殊案件，不能只用一种表示一般情况、适合正常秩序的决定来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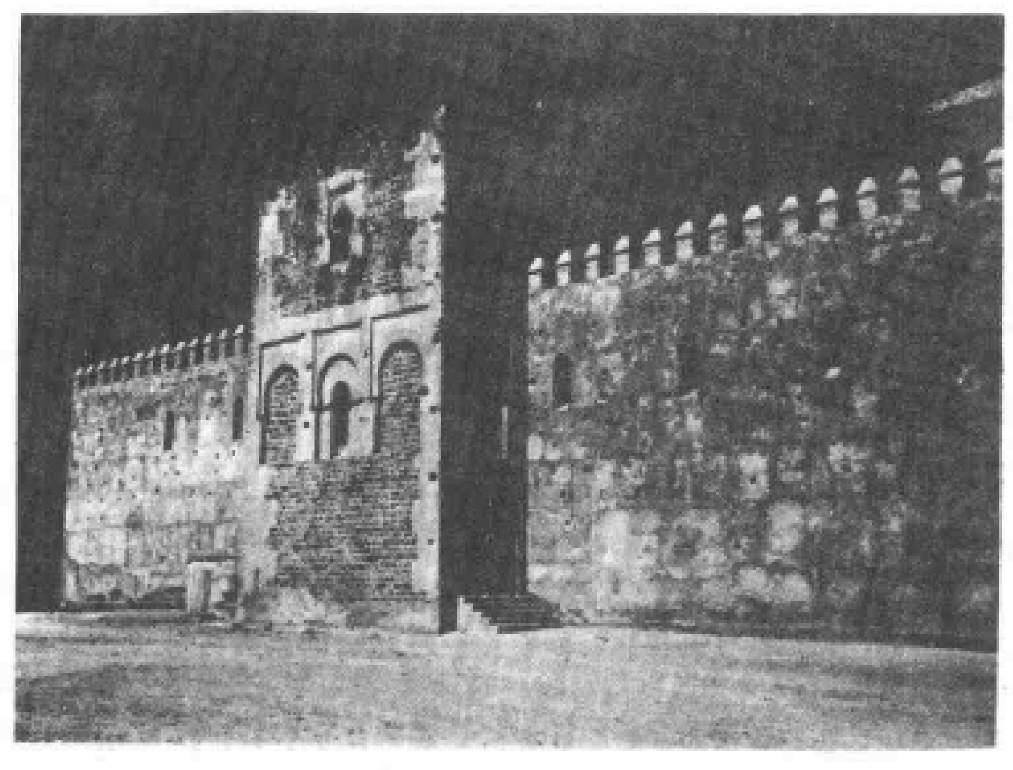
阿尔莫哈德运动的组成：一个宣传、灌输信仰和进行战斗的党派

大约在退居阿格马特之后，伊本·图马特便发觉自己日益成为一场运动的中心人物，这场运动后来的发展不仅有其宗教目的，而且还有其政治目标；它把阿特拉斯山脉的广大人民发动起来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伊本·图马特头脑里才有了自称为马赫迪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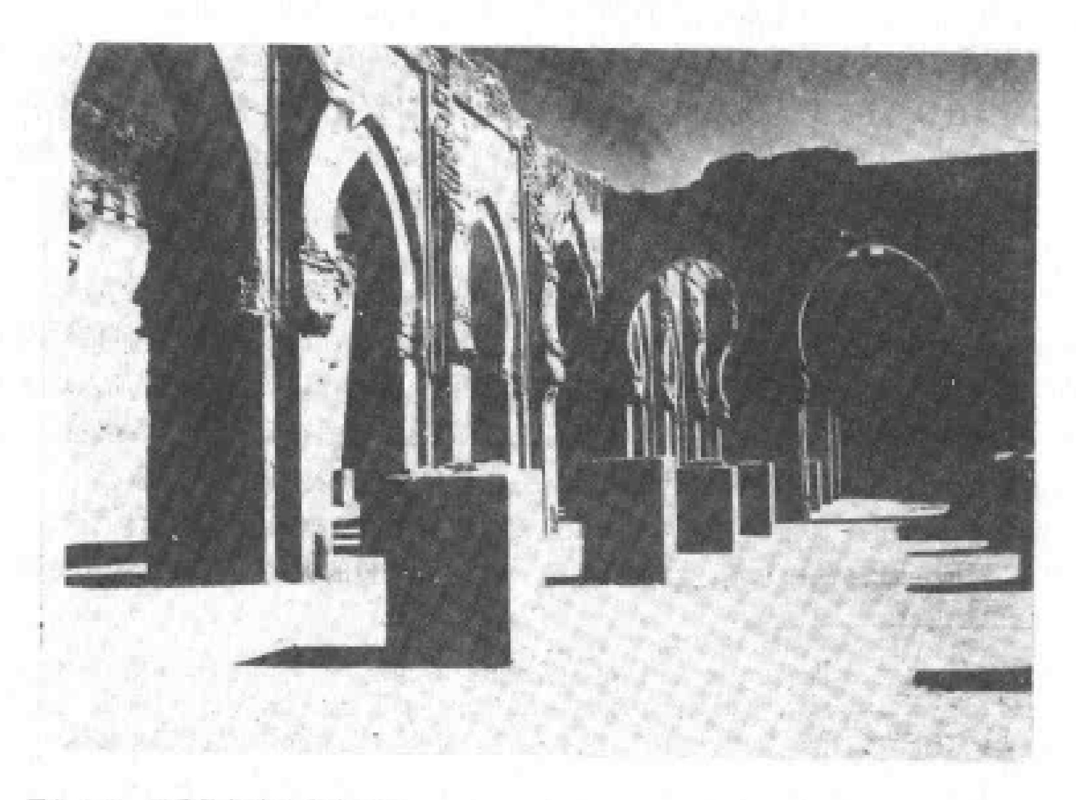
[31] 举例而言，巴尔格瓦塔的先知萨利赫、里弗的先知哈米姆。关于萨利赫，见《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1卷，第1043－1044页；第一版第4卷，第113页。关于哈米姆，见同书新版，第3卷，第134－135页。

[32] I. 戈尔济赫尔，1903年，第46页。

[33] 同上，第50页。



图片 2.1　“基布拉”（*Kibla*），廷马拉尔（摩洛哥）清真寺的东墙。这是阿尔莫哈德教徒的首要礼拜寺，其建筑和装饰的朴素作风堪称阿尔莫哈德教派的典范



图片 2.2　廷马拉尔清真寺的内院

法。1121年他一到达伊吉利兹，便处心积虑地仿效先知的言行，特别是索居洞穴之中，让人们有非他莫属的马赫迪已经降世的思想准备。他是由他的10位教友(其中就有阿卜德·穆敏）宣布为马赫迪的，这令人联想到“十圣人”（*al-'Ashara al-Mubash shara*，注定将进入天堂的10位圣人)的传说。[33]宣告仪式在一棵树下举行，与在里德万举行的“贝耶”（*bay'a*），即宣誓效忠仪式一模一样。伊本·图马特以先知身份出现，称为“麦加兹”（*maghāzī*）；他退居廷马拉尔，就山凿石、以为居所，则称为“希杰拉”（*hidjra*）；当地居民（廷马拉尔人）则有“安萨尔”（*Ansār*）——先知辅助者的荣誉称号。

在发起组织之初，伊本·图马特就发动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战斗和突然袭击，从而赢得小阿特拉斯山区的大部分地方和苏斯地区，马斯穆达所有氏族集团（*kabīla*）都全力支持他。

但是，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施加越来越强大的压力，伊本·图马特则机智地撤退到易于防守之地。1123年他“迁入”廷马拉尔山。这次迁居看来也伴随着暴力行动：阿尔莫哈德统治集团属下的廷马拉尔人已经是参杂异族的群体，或者说当地原有居民已被清洗而由阿尔莫哈德运动的支持者所取代，他们是一个混合集团。此后，由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在西班牙遇到困难，而山区各氏族集团又敌视该王朝，阿尔莫哈德运动乘机扩张势力，愈加强固。然而，在阿尔莫哈德阵营以及马斯穆达人中也有内部纷争，他们原是一些小集团，并无联合为一个大联盟的准备。

阿尔莫哈德运动的派别成份，一开始就反映在缔造国家的过程上，因此，首先研究一下派别结构，对了解阿尔莫哈德事业的基础、目标和主要特点是恰当的。

就学识、组织能力和献身精神而论，“十人团”（*Ahl al-Djamā'a*）名不虚传；在伊本·图马特自称马赫迪以前，他们都是他的教友，只有阿布·哈夫斯·乌玛尔·伊本·叶海亚·辛塔提一人除外，他原是辛塔塔大氏族集团首领之一，受过辛塔塔“唯一神论”（*tawhid*）的训练，后来加入了伊本·图马特集团。[34]顺便指出一点，这个集团没有一个哈尔加氏族集团的成员。

“五十人议事会”体制（*Ahl al-Khamsīn*）是逐渐形成而起作用的。这50人代表了阿尔莫哈德各氏族集团，正是这些氏族集团构成了这一运动的基础，在不同的阶段逐步团结到它的周围；举例而言，哈斯库拉集团直到阿卜德·穆敏统治时期才加入这一运动。[35]可以设想，这个议事会先是在伊吉利兹形成为胚胎，而后在廷马拉尔开始发挥作用的。[36]有些氏族集团，在集体加入运动之前，一定已有代表加入“五十人议事会”。

27

塔拉巴（*talaba*）似乎比上述两个组织还要成立得早些。据马拉库什所述，伊本·图马特——在他自称马赫迪之前，经常就派遣一些他所信赖的人去劝说各部落支持其事

[33] 《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1卷，第693页。

[34] 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Ibn 'Idhārī al-Marrākushi），1949年版，第188页；另见《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1卷，第87页。伊本·阿比-扎尔（Ibn Abī Zar'），拉丁文本，1843年，第113页；另见《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3卷，第694－695页。伊本·卡坦，前引著作，第87页；A. 维西·米兰达，1956年，第1卷，第103页。

[35] E. 莱维-普罗旺卡，1928年(a)，第35－36页，28页，76页；伊本·卡坦，前引著作，第28页，92－93页；伊本·哈勒敦，法文译本，1956年，第6卷，第476页。

[36] A. 维西·米兰达，1956年(b)，第1卷，第103页。

非。[38]可见，塔拉巴是这一运动的宣传鼓动机构，在伊本·图马特称马赫迪之后，他们自然仍在继续进行活动。[39]这三个团体各有其特殊的作用，掌握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清楚地了解它们

十人团——贾马阿（*Ahl al-D̲jamā'a*）

事实上，史料中这个议事会的两个名称通用，或是“十人团”（*as̲hara*），或是“贾马阿”（意指“社团的代表”）；以至我们难以理解，这名称是指其成员的人数，还是指机构本身，对此史料中说法不一。例如，贝达克只称他们是贾马阿。其他材料中也表明，有7人、10人或12人不等；这使我们看到，所谓“十人”原是指先知的同伴，议事会人数则有增有减；有的除名了，如法基赫·伊弗里基，有的人选则由别人替补。某些作者还提到，当时个别人既属于“十人团”又属于“达尔”（*Ahl al-Dar*，马赫迪的“枢密院”），这种情况表明，两个组织有一定的灵活关系和职能交替。[40]

其次，从史料中还能看到，十人议事会的名单在排列顺序上常有变动，我们很难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各自所起作用的重要性。大多数史料是把阿卜德·穆敏排在首位，或许因为他是马赫迪的继位者。但是，有些书把阿卜德·瓦希德·阿什-夏尔基排在首位，或者把著名的“塔姆伊兹”（*tamyīz*，1128－1129年）的主设计师巴什尔·万沙里希排在首位，他要不是死于布海拉战役也就成为伊本·图马特的最佳继承人了。[41]这个议事会——十人团或贾马阿——的成员好比是马赫迪的大臣，他们都是可信赖的，他碰到重大的问题都要和他们商讨，并委托他们执行重要决策。在他们当中，巴什尔经常是负责军事指挥的，阿卜德·穆敏、乌玛尔·阿斯纳吉和穆萨·伊本·塔马拉也曾担此重任，其他则任秘书、卡迪（*Kādī*）等职。[42]

28

五十人议事会——哈姆欣（*Ahl al-K̲hamsīn*）

在“十人团”之后是一些咨询性议事会，其中最重要的看来是“五十人议事会”又称“哈姆欣”。大多数史料均以50人之数为出发点，但也有一些史料记载各异，自7人至70人都有。[43]我们已经说明，这个议事会如何代表已加入阿尔莫哈德运动的各个氏族集团，但这一过程有其流动性，所以成员人数不稳定而在各种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述。[44]某些史料中提到的是7人，看来这只是五十人议事会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可能代表三个最有权势的氏族集团，即哈尔加、廷马拉尔、辛塔塔。至于70人这一数字，大概是“五十

---

[38] 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前引著作，第187页。

[39] E.莱维-普罗旺卡，1928年（a），第132页；伊本·卡坦，前引著作，第84－93页。

[40] E.莱维-普罗旺卡，1928年（a），第34－36页；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前引著作，第188、337页；伊本·卡坦，前引著作，第28、30、74、76、97页；伊本·阿比-扎尔，前引著作，第113页。

[41] I.U.A.穆萨（I.U.A.Musa），1969年，第59页；A.维西·米兰达，1956年(b)，第1卷，第101页；伊本·卡坦，前引著作，第102－103页。

[42] 伊本·卡坦，前引著作，第74、81－117页；胡拉尔·毛什亚，法文译本，1936年，第88页；E.莱维-普罗旺卡，1928年（a），第33、75页；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前引著作，第338页。

[43] 伊本·卡坦，前引著作，第28－32页。

[44] 在一次清洗事件后，有十几人补充进入五十人议事会（AH 524/＋1130）；E.莱维-普罗旺卡，1928年（b），第35页。

人议事会”与另一团体联合的结果。[45]

在五十人议事会中，廷马拉尔（一个混合集团）、哈尔加（马赫迪的氏族集团）和贾恩菲萨居于支配地位；廷马拉尔在阿尔莫哈德运动初期已与辛塔塔结成联盟。[46] 所谓“五十人”，在史料中被描写为马赫迪召来议事和征询意见的团体（*ashāb mashwarati-hi*）。[47]

塔拉巴（*talaba*）

此名来源并无史料考据，看来也是阿尔莫哈德运动的一项发明。甚至于马赫迪在世时已经有一大批人称为塔拉巴；1121 年他曾派遣许多塔拉巴去苏斯（据伊本·阿比-扎尔·法西记述，约计 1500 人）可见，这些使臣原是伊本·图马特的信徒，早在返回摩洛哥途中他已经通过宣讲和讨论对他们进行过指导及训练。在马拉喀什停留时他赢得更多的信徒，在伊吉利兹宣教期间（称马赫迪之前一年）必定加强了这个信徒团体。[48]

29 卡法（*Al-kāffa*）

这是指阿尔莫哈德运动的群众。他们并不是无组织的，因为伊本·图马特已经把各个氏族集团变成了政治与宗教合一的实体。他规定群众每 10 人设一名头目“纳基布”（*nakīb*），经常进行检阅（*'ard*）。[49] 阿尔莫哈德运动的各类成员均有级别（鲁特巴，*rutba*），据伊本·卡坦的材料，分为 14 级。[50]

这种组织形式便于强化教义的宣传灌输而往往行之有效，它具有双重目的，既在阿尔莫哈德信徒中培养排斥异己的情绪，又抱定敌视一切非阿尔莫哈德教派的态度。这种双重内容的态度确保绝对服从，正如教育制度的效用一样。教育制度基于三个因素：伊本·图马特的思想，由他认可的经典资料和求知态度，获取由他奠基的知识的方法。

伊本·图马特的思想绝不属于任何一种既有的教义。他的思想特色表现为一种精妙的教条式的折衷主义。看来，在真正信仰上，这种折衷主义——与其他穆斯林相比较——使阿尔莫哈德教徒养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统一的、甚至是独特不羁的感情。伊本·图马特的教义与马立克学派的实践完全决裂。阿尔莫哈德教徒连衣着上也不同于他人，他们不得不离开那些并不赞成神圣统一和在真正信仰上不愿加入他们一派的地方。[51]

这一切就是伊本·图马特孜孜不倦所传授的，起初是宣讲，后来发布了一些附有长篇释文的论著。他苦心孤诣将“知”（*'ilm*）和“行”（*'amal*）结合起来，用阿拉伯语和

[45] 或者是五十人议事会加上贾马阿，或者是五十人议事会加上达尔；参阅J. F. P. 霍普金斯（J. F. P. Hopkins），1958 年，第 90 页。

[46] I. U. A. 穆萨，前引著作；第 23 卷，第 6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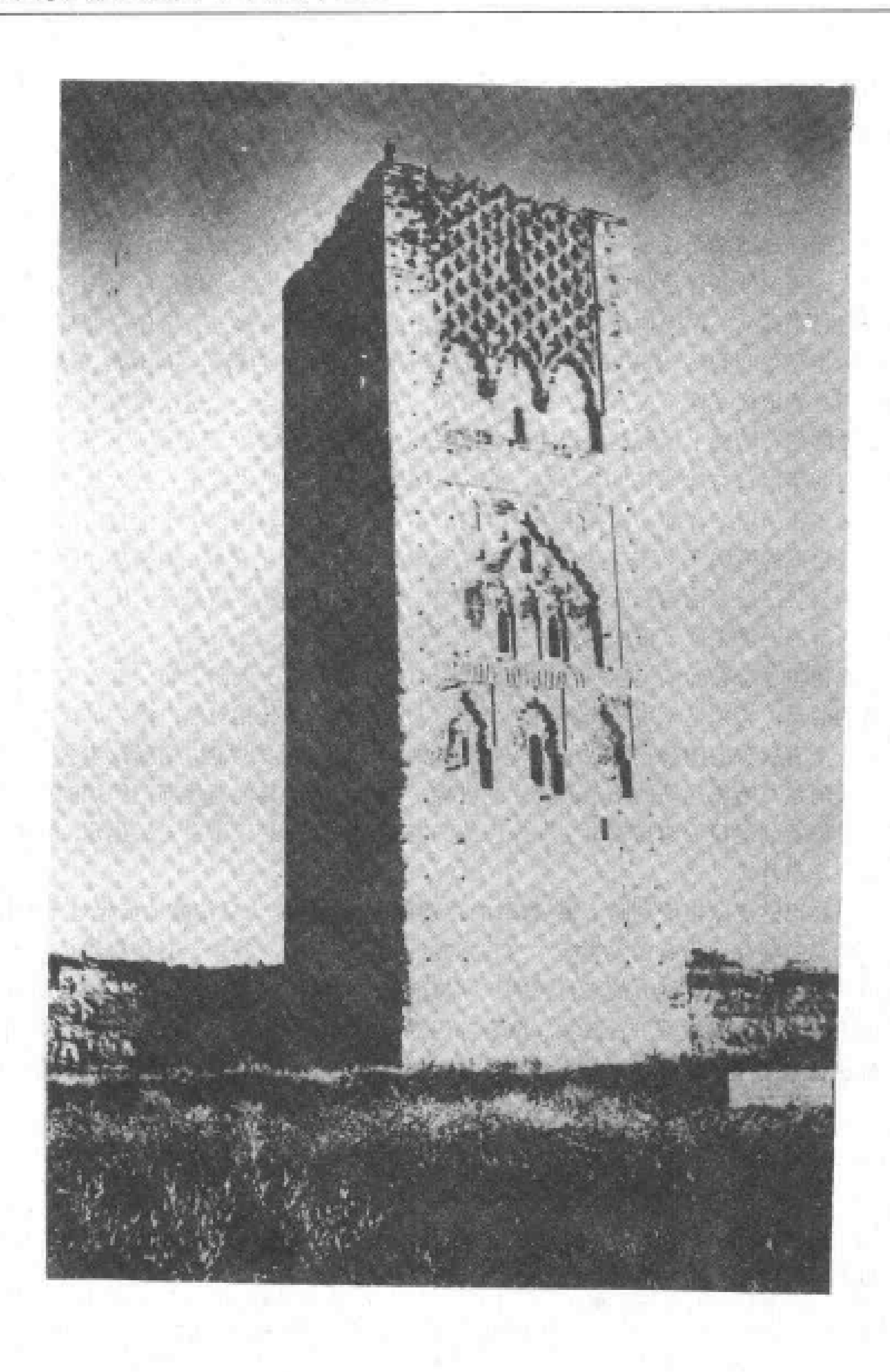
[47] 伊本·卡坦，前引著作；第 75、81 页。伊本·阿比-扎尔，前引著作，第 114 页。

[48] 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引自A. 维西·米兰达，1965 年第 3 卷，第 18 页；伊本·卡坦，前引著作，第 87、93 页；E. 莱维-普罗旺卡，1928 年（b），第 132 页；伊本·阿比-扎尔，前引著作，第 113 页；萨拉维（al-Salāwī），1894 年，第 2 卷。

[49] 伊本·卡坦，前引著作，第 27 页；胡拉尔·毛什亚，前引著作，第 89 页说，纳基布也称米兹瓦尔（*mizwār*）。

[50] 伊本·卡坦，前引著作。

[51] 伊本·图马特，前引著作，第 258－264、266－267、290、296 页；伊本·卡坦，前引著作，第 42、46、85 页。



图片 2.3　拉巴特的哈桑清真寺未完工的宣礼塔：阿尔莫哈德式建筑外形雕饰的典范

柏柏尔语，使他的传授方法适应于理解水平不同的群众。[52]这些训练方法，通常以极端严厉为特点，要求盲目服从，甚至一个阿尔莫哈德成员如有命令完全可以去杀害自己的父兄或儿子。这种严酷性经常以清洗方式表现出来，有时简直是真正的大屠杀。[53]

阿尔莫哈德的各种组织并非一成不变的。在伊本·图马特死后，“十人团”和“五十人议事会”仅在举行对阿卜德·穆敏宣誓效忠的仪式（*bay'a*）时被提到，可见阿卜德·穆敏已能抑制这两个议事会了。事实上，伊本·图马特是在布海拉战役遭到毁灭性失败后死去，当时他的继承问题似乎使阿尔莫哈德的统一一度发生动摇。阿卜德·穆敏好像发现自己很孤立，因而他必须同两个议事会中的某些个人直接进行合作，似乎这样比利用机构本身要明智些。[54]这或许能解释阿尔莫哈德运动中“谢赫”（*shaykh*）集团的出现，谢赫们竟然取代了两个议事会（“十人团”和“五十人议事会”）。这次策略上的重新组合或许是阿尔莫哈德上层骚动的根源所在，1133年发生了伊本·马尔维亚反叛事件。[55]

31

谢赫集团日益加强其重要影响，他们意图建立一个与哈里发平行的政权，以致哈里发纳西尔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会战前夕不得不对谢赫们施以沉重的打击，这也可能是此战惨败的原因。[56]但是，由于阿尔莫哈德哈里发政权日趋衰弱，谢赫集团随即又获得了新的权势；后来他们形成为一个特权等级，哈里发马穆恩不堪忍受其压力，结果，他就对马赫迪一派采取了镇压措施。

据伊本·哈勒敦的记述，在谢赫集团中有许多人是“十人团”和“五十人议事会”成员的后代，特别是辛塔塔氏族和廷马拉尔人的后代；与此相对照，哈尔加氏族却没有留下一个有权势的谢赫。[57]这大概是马赫迪的两个兄弟造反的原因。谢赫议事会也许是为了扩大阿尔莫哈德运动的基础而设立的机构，因为它成了其他新建部门组织的样版。于是，我们看到阿拉伯谢赫议事会和朱恩德的安达卢西亚谢赫议事会先后出现，虽然它们主要是军事性机关。[58]

塔拉巴这支队伍受到阿卜德·穆敏的特别重视。他们作为宣传鼓动员起过重要作用，在占领马拉喀什后仍有很大影响，这有官方信件可以证明。其中一封信显然是阿卜德·穆敏写给安达卢西亚地方的塔拉巴的（阿拉伯历543年或公元1148年）。他们还负有其他职责，在教育、教学、行政和军队各部门都很活跃。据我们了解，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抑恶扬善”。但是，随着帝国势力的发展，他们似乎主要在武装部队特别是在海军中越

---

[52] 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前引著作，第188、191页；伊本·阿比-扎尔，拉丁文译本，1843-1846年，第118-119页；伊本·卡坦，前引著作，第24、29、103页。

[53] I. U. A. 穆萨，前引著作，第71-72页。

[54] A. 维西·米兰达，1956年（b）第1卷，第102页。

[55] 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E. 莱维-普罗旺卡编，未注明日期，第3卷，第240-241页；伊本·阿比-扎尔，前引著作，第169页。

[56] 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前引著作，第3卷，第85页；伊本·萨希布·萨拉特（Ibn Sāhib al-Salāt），1964年版，第148、324、399-400页；另见《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3卷，第924页。伊本·阿西尔，1851-1876年版，第11卷，第186页。

[57] 伊本·哈勒敦，1956-1959年版，第6卷，第534、542、545-546页。

[58] 伊本·萨希布·萨拉特，前引著作，第218、399-400页；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前引著作，第3卷，第85页；伊本·卡坦，前引著作，第226页。

来越多地充当政治委员或“意识形态”指导员。[48]

长期以来，阿尔莫哈德运动一直保持着宗派态度，它是造成政治孤立的原因这一点似乎很早已被认识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马穆恩终于放弃马赫迪主义教条。[49] 32

阿尔莫哈德/穆敏王朝的哈里发统一马格里布

阿尔莫哈德运动所形成的党派，其政治目标日益明确，即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来完成伊本·图马特的改革事业。阿尔莫拉维德王朝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三次重大事件标志着对抗的开始：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对阿格马特的攻击归于失败；1122年阿尔莫哈德在基克获得首次胜利，他们随即去夺取马拉喀什。该城被围40天，但是1128年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骑兵在布海拉战役中把他们击溃。结果，这成了阿尔莫哈德的一场灾难：伊本·图马特的最得力教友巴什尔·万沙里希战死疆场，阿卜德·穆敏身负重伤，克服了重重困难才把阿尔莫哈德残余部队带回廷马拉尔。[50]

阿拉伯历524年或公元1130年，伊本·图马特在这种困难形势下去世。继承程序的安排和阿卜德·穆敏的继位（阿拉伯历527年或公元1133年）引起一系列问题。伊本·图马特葬于廷马拉尔；如果利奥·阿非利加努斯的说法可信的话，他在该地的陵墓过5个世纪后仍受到崇敬。

阿卜德·穆敏·伊本·阿里统治时期与帝国的建立（1133－1163年）

伊本·图马特死后，阿尔莫哈德运动无疑经受了相当长时期的危机，只是我们对此所知甚少。关于阿卜德·穆敏的继位有多种说法。以“部族主义”来解释，似乎失之肤浅；让·德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看到问题的核心在于阿卜德·穆敏的地位与伊本·图马特接近以及在马拉拉两人会见之后阿卜德·穆敏在阿尔莫哈德运动中所起的作用。[51] 由此看来，他的继位是克服地方分权主义的结果。另一位教友阿布·哈夫斯·乌玛尔·辛塔提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阿卜德·穆敏本人的心计。自马拉拉会见之后，那隐约出现的梦想——以严格的伊斯兰教规来统一马格里布——也许一直呈现在他心头，或者他是为了本人和家族的利益才想做帝国的缔造者，或者是两种想法兼而有之（这种可能性最大），他才设计出了一个计划。 34

[48] 此信全文见伊本·卡坦，前引著作，第155页之后；E.莱维－普罗旺卡，1941年(a)，第6页，谈到塔拉巴希命去监督贾巴尔－法思城的建设；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前引著作，第4卷，第43－44页，谈到阿尔莫哈德重新征服加夫萨城（阿拉伯历583年或公元1187年）后，塔拉巴在该城行政管理中的作用；E.莱维－普罗旺卡，1928年（a），第215页。

[49] I.U.A.穆萨，前引著作，第23页；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前引著作，第3卷，第85、263－266、291－292页；伊本·哈勒敦，1956－1959年版，第6卷，第630-637页；伊本·阿比－扎尔，前引著作，第167－168页。

[50] 关于基克战役，见E.莱维－普罗旺卡，1928年（a），第122页及以后诸页。关于布海拉战役，见《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3卷，第959页，其中指明年代是阿拉伯历524年/公元1130年；胡拉尔·毛什亚，前引著作，第94页；E.莱维－普罗旺卡，1925年，未完成稿第4部分；伊本·阿西尔，法文译本，1876－1891年，第10卷，第407页；同一译本，1901年，第536页。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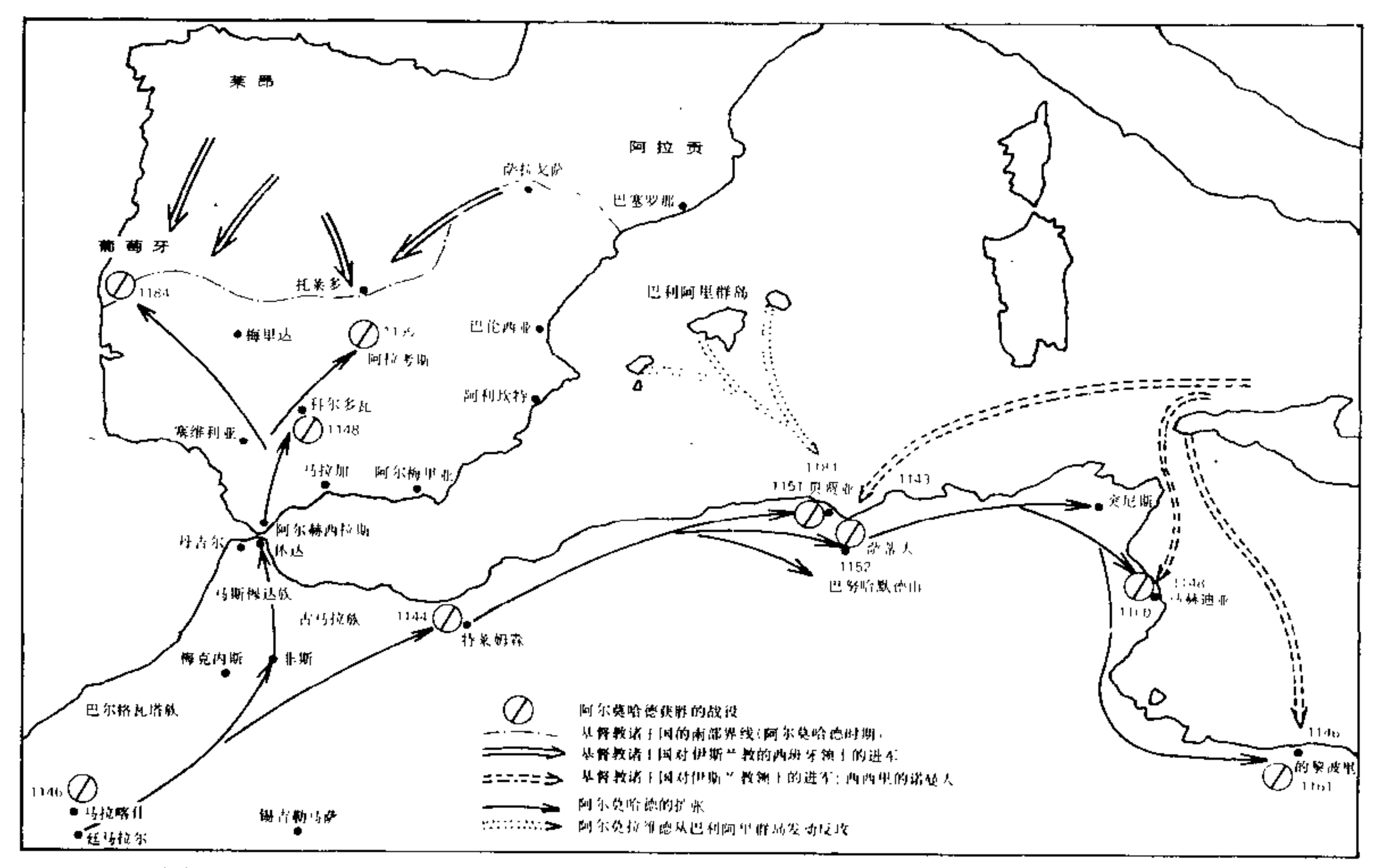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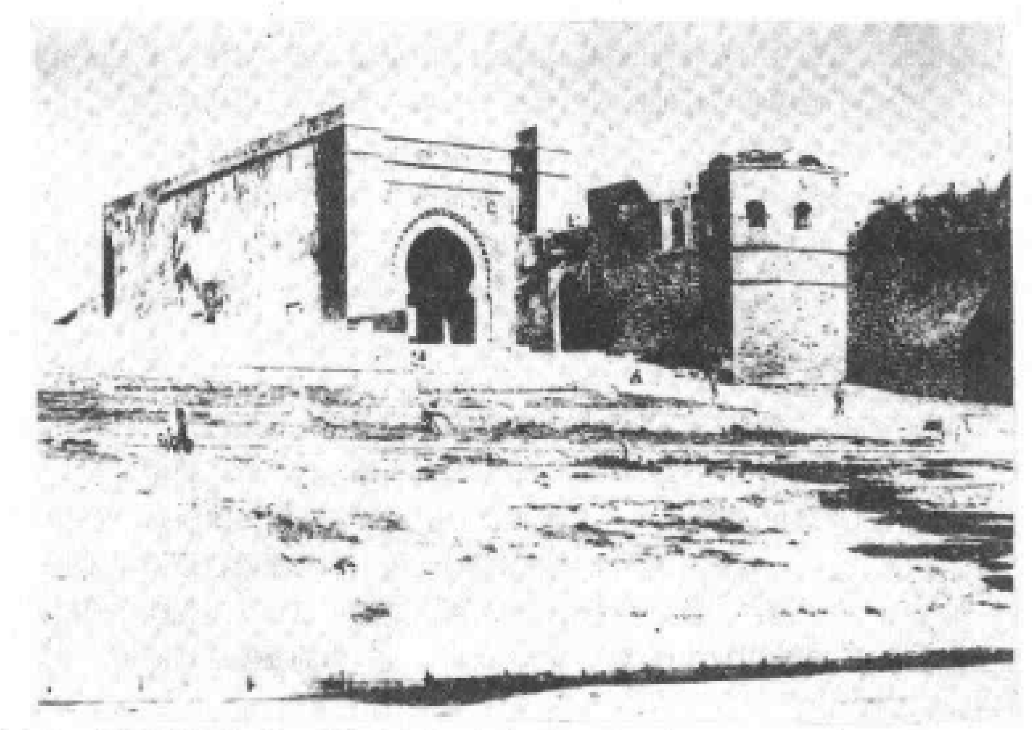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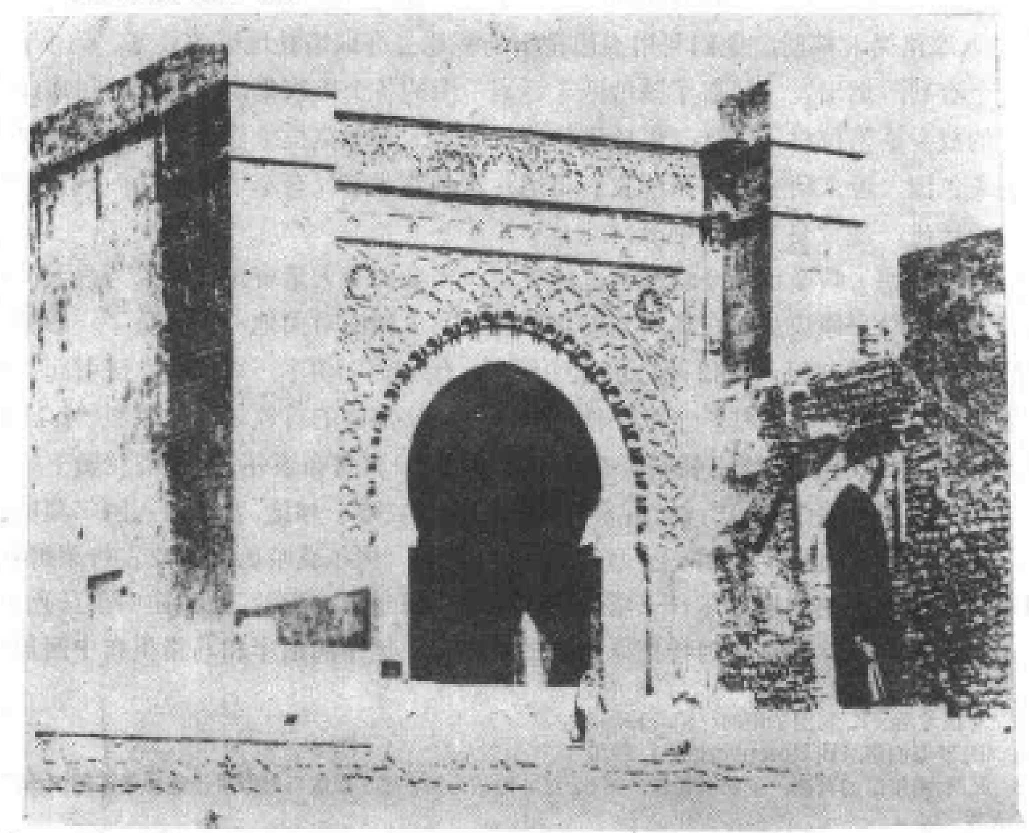


图2.2 阿尔莫哈德的征服活动（据O·赛迪的原始资料）



图片 2.4 卡萨巴城门(全景)，阿尔莫哈德王朝建于拉巴特。城门面对塞勒，守卫摩洛哥大西洋沿岸未被征服的领土



图片 2.5 拉巴特的卡萨巴城门(近景)。宏伟的阿尔莫哈德式门道雕饰，在西班牙和摩洛哥的许多城市都能见到

阿卜德·穆敏继位时35岁，在以后30年的长期统治中他显示了自己作为一名优秀的将军、能慑服成员混杂的大联盟的领袖和政治家的卓越素质。对他说来，这些素质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不能顺利实现他的双重目的——以“圣战”反对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同时重建和加强阿尔莫哈德运动，以期征服和平定马格里布，巩固政权。

这确实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其进程须依次分为几个阶段，要有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的明确的战略。[58]这里我们不想细述或罗列所有的情节，仅着重论述几个主要阶段。

征服摩洛哥

首先一个任务是占领摩洛哥；这可分为两阶段。阿卜德·穆敏汲取了布海拉战役惨败的教训，决定避开对阿尔莫拉维德王朝骑兵有利的平原地区，转入柏柏尔人山区进行征服以确保他们的商路和矿藏。[59]在降服阿特拉斯山区许多氏族集团期间，他占领了苏斯、瓦迪－达拉（德拉），[60]这些地方原是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行十分有利的商业贸易的主要地区。他把这些地区变为强固的进可以攻、退也能守的根据地，因而阿尔莫哈德部队能集中攻击环绕大阿特拉斯山以北一带的要塞，切断通往平原和首都的道路。

避开了平原，阿尔莫哈德军队便顺着边缘道路向东北方移动，目的是使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腹地陷于孤立。他们在1040－1041年占领了中阿特拉斯山和塔菲拉勒特绿洲。[61]进入摩洛哥北部时，他们利用杰巴拉山为基地去夺取塔扎地区各要塞。阿卜德·穆敏从这个有利阵地出发，降服了该地区靠近地中海的各个氏族集团，终于胜利地进入了他自己的故乡塔格拉村。这样，包抄战略获得成功，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在军事部署上受到了侧翼包围。近来研究的结果使我们相信，这条路线不仅有军事价值，而且有经济意义——山区矿产是重要的军备资源。[62]

这时阿卜德·穆敏已经是众多部队的首领，无疑拥有大量资源，自以为强大而且已有足够力量发动平原攻势，在那里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面对面地一决胜负了。形势对主动进攻也确实非常有利。1143年，阿里·伊本·优素福·伊本·塔什芬继位引起了阿尔莫拉维德统治权的两大支柱——兰图纳部族和马苏法部族的首领之间发生纠纷。1145年卡塔兰死去，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基督教民兵首领雷维特（鲁布泰尔）对卡塔兰属下一名能干而忠实的将领采取了劫掠行动；后来，泽纳塔人中的“唯一神论”者又加入阿尔莫哈德运动。于是，天平就向有利于阿尔莫哈德的一方一边倒了。阿尔莫哈德部队攻占特莱姆森，迫使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埃米尔——塔什芬·伊本·阿里退往奥兰，他在途中落马死去。

至此，远达里弗的整个阿特拉斯山区已经平定，地中海沿岸和马格里布中西部已被

---

[58] J.德维斯、R.勒图尔诺的评论，1969年。

[59] B.罗森伯格（B.Rosenberger），1970年。

[60] R.勒图尔诺的看法，见前引著作，第52页：他认为阿卜德·穆敏当时似乎还需要严格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

[61] A.拉鲁伊，前引著作，第168页；参阅《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1卷，第78页。

[62] B.罗森伯格，1964年，第73页。

控制，阿尔莫哈德的钳形运动挟住了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领土，当地政权正在瓦解中；以阿尔莫哈德社会的政治体制为基础，阿卜德·穆敏着手组织一场新的征服战争。但是谈何容易，新继位的哈里发不得不首先对反叛和阴谋施行严厉的镇压。[27]

新哈里发政权在阿尔莫哈德教派中不可能马上获得普遍的支持，而后者一时也还缺乏完备的统一性：有些人反对新领袖，另一些人则消沉地回想往日的自由。这时发生一起反叛事件：伊本·马尔维亚（原"十人团"的一位谢赫、詹菲萨氏族集团的代表）以及阿卜德·阿齐兹·伊本·卡尔曼·哈尔吉（伊本·图马特的本族同乡），他们两人发起了暴动，虽然对新的政权并未真正造成威胁。除此之外，阿尔莫哈德运动在其征服过程中还不得不克服许多次反叛和暴乱。其中三次最为严重：一次发生在非斯附近的阿贾尔西（盖尔西夫），那是一个浑名叫"双手沾污"的暴徒（*Masbūgh al-Yādayn*）发动的；另外两次发生在塔扎地区，由伊兹马欣氏族集团（桑哈贾"卡比拉"）的阿布·亚拉和加亚塔氏族集团的赛义德领导。

尽管如此困难重重，阿尔莫哈德运动仍然建立了一支武装部队，而且在苏丹地区以及东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之间打开了一条日后得到发展的商业轴线。从那时以后，苏斯连续不断的暴动，以及休达和阿加迪尔的暴动，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威胁，这些地方在经济上已不起重要作用了。[28]特别是阿尔莫哈德运动已经卷入一个巨大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战利品不断增多，他们仍坚定地团结在阿卜德·穆敏周围。他本人仍然忠实于马赫迪的教义，不敢标新立异，这样就把那些保卫阿尔莫哈德运动的利益和表示忠诚的著名的谢赫们聚集在自己周围。

然而，一场变革有多大重要性完全可以从它如何实行其主张以及有关群众的反应上得到检验。阿尔莫哈德运动的成就往往带有血腥气。在征服过程中，从来没出现过轻而易举的突击，也不可能轻易取胜，没有一个大城镇不是经过猛攻夺取的。看来，阿尔莫拉维德社会还具有相应的恢复活力的结构。[29]

根据《基尔塔》（*Kirtas*）的作者以及《胡拉尔》（*Hulal*）作者阿布·阿卜德·阿拉·穆罕默德·阿比尔-马阿利·伊本·萨马克所提供的材料，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统治时期社会上是一片和平与繁荣景象，人们肯定不会把阿尔莫拉维德统治者看成是邪恶的君主，并且他们笃信马立克学派的教义[30]。那时阿尔莫哈德运动——在马斯穆达山区以外——并未被看成为解放者，只有些一时急求摆脱收税者的不满现状的人才会这样看待他们。大多数有名的繁荣城镇都曾经抵制阿尔莫哈德的攻击，这使他们经过整整15年漫长的岁月才征服了摩洛哥全境。所以我们不必因阿卜德·穆敏占领马拉喀什之后不断发生的暴动而感到惊奇，平民参加和卷入暴动决不仅仅是由于宗教上对马立克教义的忠诚，而是出于更明确的动机。很可能是，这些暴动事件正表现出一个社会在受到一种"排他性"宗派强烈挑战时的反应，这个宗派使用残酷无情的战争手段来加强其权力。

[27] A.梅拉德，1957年，第114页及以后各页。

[28] J.德维斯，前引著作。

[29] 伊德里西（al-Idrīsī），1866年版，第8页，谈到阿格马特、非斯和扎尔卡什的情况。

[30] 伊本·阿比-扎尔，前引著作，第108页；胡拉尔·毛什亚，前引著作，第115－116页。

征服马格里布中部

阿卜德·穆敏一旦在马格里布边区重建其牢固地位，他就必然会考虑自己能否把征服活动扩展到阿尔莫拉维德疆界以外的马格里布其余地区。但是，在着手实施这一计划之前，他作为哈里发不得不先去干涉安达卢西亚事务，当地人民已不能再忍受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统治，而卡斯蒂尔的危险局势变得愈加严重。早在围攻马拉喀什期间，哈里发已经接待过一个安达卢西亚人的代表团；那时，某些城镇（例如赫雷斯在 1144 年）已经倒向他一边了。后来，他派去一支远征军，其中有马赫迪的两个兄弟阿卜德·阿齐兹和伊萨，后者称号“安姆加尔”（Amghar，即氏族集团的头人）。[32]其他城镇接着倒戈，最重要的是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但是，东部各省对阿尔莫哈德仍持谨慎态度。这就说明 1150 年阿卜德·穆敏接见对他宣誓结盟的安达卢西亚代表团时，为何没有立即使自己卷入伊比利亚半岛事务：当时他首先注视着东部，不难想见，在 12 世纪中叶这一时刻，阿尔莫哈德王朝的第一位哈里发或许在政治战略上已经形成某些清晰的思想：首先靠统一马格里布来奠定牢固的基础，然后再发起横过海峡的行动。

38

在伊弗里基亚还存在着基督教的威胁。凯鲁万和贝贾亚地方的桑哈贾王朝政权在根本上已遭到伊弗里基亚和中马格里布一个新的地域组织的破坏，造成有利于内地桑哈贾阿拉伯小邦的局面，而诺曼人在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领导下夺取了伊弗里基亚沿岸的主要港市。因此，阿尔莫哈德王朝对伊弗基里亚的远征是有理由的，特别是它宣布负有“圣战”义务之后。经过两年准备，阿卜德·穆敏前往休达，这一行动在当时被认为是他有意渡海峡去西班牙，然而他却潜回马拉喀什，在 1152 年夏初踏上东途，驱使军队直奔马格里布中部。[33]

他首先拿下阿尔及尔，继而顺当地成了贝贾亚的主人，不久又派遣其子阿卜德·阿拉率领一支部队攻占哈马德的古都卡拉，该城遭主力部队强攻，居民受尽掳掠和屠杀。哈马德王子叶海亚·伊本·阿卜德·阿齐兹逃往君士坦丁城避难，而哈马德统治者手下的大臣却把该城交出投降，于是又有一支远征军从君士坦丁出发去讨伐该地区的贝都因部落。这期间有一个叫阿布·卡萨巴的人袭击过贝贾亚和巴努扎尔达维，很像是企图谋害哈里发的一次突袭。结果引起非常残酷的镇压，阿卜德·穆敏为此驱散了参与此事的桑哈贾、卢瓦塔和库塔马诸氏族集团。[34]

马格里布中部地区的命运正在激烈转变之中，这引起了业已惨败的桑哈贾王朝的盟

---

[32] 关于阿尔莫哈德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初立足点，见《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 1 卷，第 79 页；关于远征军详情，见伊本·哈勒敦，法文译本，1852－1856 年，第 2 卷，第 183－188 页。

[33] 关于马格里布中部及伊弗里基亚从公元 6 世纪至 12 世纪的历史，见H. R. 伊德里斯（H. R. Idris），1962 年、第 1 卷、第 6 章，第 303 及以后各页、363 及以后各页。关于阿尔莫哈德在马格里布中部的征服活动，见 J. 布里格农（J. Brignon）等人的卓越论述，1967 年，第 112 页。

在马格里布中部，贝贾亚的末代哈马德统治者曼苏尔、阿齐兹和叶海亚曾经与高原地区新主人希拉利亚人建立起妥协关系，使双方贸易及海盗活动都有发展；他们还利用在马赫迪亚的齐里德人同族亲戚的困难，实行过一次真正的改革复兴。见A. 拉鲁伊，前引著作，第 168 页。

[34] E. 莱维-普罗旺卡编著，1928 年（a），原文第 115 页；法文译本，第 189－190 页；伊本·阿西尔，法文译本，1901 年，第 504 页。

友及依附者——阿拉伯人——的警觉。正当阿卜德·穆敏起程返回马格里布边区时，阿拉伯人突然赶来援救贝贾亚。在被阿尔莫哈德部队击败后，他们退散到塞提夫平原。1153年，经过3天的英勇抵抗，他们终于在该地被击溃，财产、妇女和儿童遭尽掠夺。经受战争考验的阿尔莫哈德军队，以它的组织、实力和宗教纪律胜过阿拉伯人的勇气和机动性。这次战役轰动一时，标志着新的阿尔莫哈德政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39

正在进行征服事业的阿尔莫哈德的哈里发确实以严厉和残忍而著称，但对于战败而联盟已被粉碎的阿拉伯人，却出乎意料地采取“宽容”态度。其意图是不是先对他们显示实力以加深印象，而后施行仁慈感化以使争取他们参加自己的事业呢？如果考虑到阿拉伯因素在马格里布中部和伊弗里基亚的重要性，哈里发需要扩大他的柏柏尔-阿尔莫哈德统治基础来适应他正在建立的帝国，他很可能就是这种意图。此外，他或许已经想到要在安达卢西亚以“圣战”的名义利用阿拉伯人；由于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基督教的威胁，安达卢西亚方面求援的呼声不断传来。经过这些事件之后，哈里发不愿冒险越过君士坦丁地区，宁可留下总督和军队统治马格里布中部，自行回到马格里布边区。

穆敏王朝政权的巩固

我们已经谈过，阿卜德·穆敏继位为哈里发，并未得到阿尔莫哈德运动内部一致的拥护。只是他精明强干，又不断显示其能力素质，才足以抑制阿尔莫哈德队伍中的反对派，使他们保持沉默。他的胜利，虽然给他增加了保持权力的机会，但也加剧了反对派的不耐烦情绪；造成积怨难忍的局面。结果，在马赫迪伊本·图马特的哈尔加亲族和廷马拉尔人的挑动下矛盾还是公开化了，尽管其他氏族集团并未卷入纠纷。阿卜德·穆敏处决了反叛者，同时给伊本·图马特的本家埃特“安姆加尔”（Amghar，氏族集团头人）以羞辱，将其遣送到非斯禁闭起来。这次危机之后，他亲自前往廷马拉尔朝拜，在当地大肆分发礼品，并扩建马赫迪礼拜寺，让人们淡忘最近发生的流血事件，为自建王朝铺平道路。1156－1157年，阿卜德·穆敏移驻萨勒，先是设法让他的长子穆罕默德得到人们的公认，立为继承人，然后又任命其他儿子为帝国各主要城市的首领，获得“赛义德”（*sayyid*）的称号。[38]

上述各项措施，是在各种新的帝国势力支持下实行的，其中包括希拉利亚阿拉伯人以及东部各个氏族集团(特别是桑哈贾)，但最后还是由于著名的阿尔莫哈德谢赫“阿贾尔”（杰出者）阿布·哈夫斯·乌玛尔·辛塔提表示同意，才得以顺利推行。在这些步骤行之有效时，为了安抚臣民，哈里发立即通知各省区的阿尔莫哈德“移民地”，要给穆敏王朝每一个赛义德（*sayyid*）加派一名阿尔莫哈德的谢赫（*shaykh*），让他们任副职，称大臣（vizier）或兼顾问。的确，阿卜德·穆敏经过征服和胜利，压垮了先前的显贵，但在阿特拉斯山区，氏族首领们仍不甘示弱。哈里发的这些措施，激起了好几个氏族集团的反叛，特别是东南地区出现暴动。[39] 40

---

[38] A.梅拉德，1957年，第135及以后各页；E.莱维-普罗旺卡，1941年（b），第34－37页；伊本·阿西尔，法文译本，1901年，第581页；编年记述与官方信件相同。

[39] A.梅拉德，1957年，第146页。

当时，加祖拉部族热情欢迎先前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非斯总督、休达暴动的领袖叶海亚·萨赫拉维，这引起了苏斯边境一带出现骚乱。拉穆塔、哈什图卡、兰图纳等部族也随即举起叛旗。但是，这些部族并非真正反对阿尔莫哈德的政策，他们多半只是反抗穆敏王朝各个总督横行霸道，才不得不起义的。[77]一般说来，这些事件似乎标志着新王朝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穆敏王朝的统治集团力求使它的权势平衡。

总之，这些暴乱事件——与另一事件相比——并不十分重要，更为严重而影响巨大的是马赫迪的两个兄弟伊萨和阿卜德·阿齐兹的反叛，他们在马拉喀什策划的阴谋几乎得逞。于是，哈里发急行军回到他的首都，经过调查，发现一系列文件，揭发出 300 名阴谋者，其中包括马拉喀什的 5 名首要商人。他们都被交给了愤怒的群众。

经受这些考验之后，阿卜德·穆敏看来已经成为一个帝国的元首而不仅仅是一个教派信仰者的领导人了，他和阿尔莫哈德运动一些领导人之间甚至还出现了一种冷漠的情绪。在挫败埃特"安姆加尔"的阴谋之后，根据贝达克的证述，阿卜德·穆敏把马拉喀什人集合起来，告诉他们："我现在知道，除了你们，我既无兄弟也无随从者"。[78]这究竟是真诚的痛心的自白，还是蛊惑之词？看来，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阿卜德·穆敏自此之后赋予他的政策一项新的原则：他不再仅仅依靠处于统治地位的"氏族"——马斯穆达贵族集团，而试图在其他氏族集团中，特别是希拉利亚阿拉伯人和马格里布中部各氏族中扩大他的权力基础。阿卜德·穆敏逐渐摆脱伊本·图马特的社会观念，那是以氏族和宗派作为基础的，他促成了一项真正的帝国政策，把新帝国社会各个层次的利益全都考虑在内。

41 征服伊弗里基亚[79]

到 1156 年，穆敏王朝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所有反对意见或争论几乎完全平息。[80]阿卜德·穆敏得以进行第二次东征，其结局是他前所未有地把马格里布统一在单一的政权之下。他认真作了准备，到 1159 年才决定向东部进军。在他那里避难的齐里德·哈桑·伊本·阿里不断怂恿他采取行动，伊弗里基亚人民一再吁请援助以反对基督教势力。

哈里发派副手阿布·哈夫斯留驻摩洛哥，自己于 1159 年春率领大军从萨勒出发，同时有一支可观的舰队取平行路线向东行驶。[81] 6 个月后，阿尔莫哈德军队开到突尼斯，封锁并没有多久即攻下该城。[82] 接着又攻下马赫迪亚，此城落入基督教诺曼人之手已有 12

[77] E.莱维-普罗旺卡，1928 年（a），引阿卜德·穆敏对奉命去镇压这些叛乱的阿布·哈夫斯说，"骆驼能负重也会暴跳"（原书第 177 页，法文译本第 193 页）

[78] 同上，原文第 119 页；法文译本第 198 - 199 页。

[79] 关于阿卜德·穆敏征服伊弗里基亚问题，见H. R. 伊德里斯，前引著作，第 1 卷，第 384 及以后各页。

[80] 第 17 号官方信件告诉我们，阿卜德·穆敏的一次朝拜是哈里发及其随从者外出视察。他先去伊格利兹而后到了廷马拉尔，旅途中接见许多氏族集团的代表，他们有的一开始就效忠于他，有的几经波折才被征服，现在一齐都对他表示忠诚。他告诫人们要加强对阿尔莫哈德教规的信仰。他回到马拉喀什时（阿拉伯历 552 年斋月 28 日，即公元 1157 年 11 月 4 日），已能举行开斋节（'Id al - Fitr）会礼，庆祝穆敏为马格里布边区奠定和平。另见A. 梅拉德，1957 年，第 154 页。

[81] 关于这支军队的人数，许多资料均有详细记载：见A. 梅拉德，1957 年，第 154 - 155 页。

[82] 详情见伊南（'Inān），1964 年，第 1 卷，第 289 - 302 页。

年之久，这时受到7个月的包围和强攻，只得投降。哈里发之子阿卜德·阿拉拿下了加贝斯、加夫萨两城市。同时，斯法克斯和的黎波里也落入阿尔莫哈德军队手中。伊弗基里亚内地处于沿岸舰队和南部骑兵的钳形攻势下，纷纷降服。至此，在伊弗里基亚，那些同齐里王国合伙分赃的小邦全都灭亡了，诺曼人被赶出了原有的海岸据点，马格里布终于得到统一。

准备干涉安达卢西亚事务
与阿卜德·穆敏统治的结束[49]

与此同时，安达卢西亚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宁。安达卢西亚大贵族之一伊本·马尔达尼什已经反叛阿尔莫哈德政权，其暴乱威胁到整个东部地区。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伊本·加尼亚正煽动各地区起来反对阿尔莫哈德势力；而在安达卢西亚北方，基督教势力越来越多地发动袭击。[50]

42

阿卜德·穆敏一回到摩洛哥便着手准备干涉西班牙事务。他派去一支援部队（包括阿拉伯兵），在巴达霍斯及贝雅均获胜利。回到马拉喀什，他得到纳税者的支持，组建了自己的护兵队伍；1163年，他前往萨勒，亲自训练一支远征西班牙的大军。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死去，未能实现远征计划。他的遗体从萨勒运到廷马拉尔，葬于马赫迪伊本·图马特的陵墓附近。

没有必要多费笔墨评述阿卜德·穆敏作为军事领导人和战略家的才能，重要的是他在征服事业的方法步骤上显示了巨大的组织才干，而且对这个国家和军事学都有足够的知识。最明显的事实是他的征服政策具有经济目的，因此，他把摩洛哥大西洋沿岸一带（在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统治时与撒哈拉有广泛联系的地区）同非洲的联系切断，转而确保达拉（德拉）至奥兰这一轴线的控制权，以后这里就成了大批来自西苏丹的黄金和物产的商道。

这位哈里发不能不注意北方及东部，因为地中海对马格里布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基督教势力正进行全线进攻的时候。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阿尔莫哈德王朝统一事业的艰巨和困难，的确，同时要保住安达卢西亚和伊弗里基亚是不可能的。

然而，马格里布在阿卜德·穆敏领导下还是实现了政治统一，而长期以来它的经济和文化业已统一。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是继承西班牙－伍麦叶传统而产生的，阿卜德·穆敏则与这一传统绝裂，他为整个马格里布建立起一整套行政管理制度，既考虑到帝国地域辽阔所造成的政治紧张状态，也照顾及那些一开始就顺从阿尔莫哈德运动的柏柏尔人的感情。阿卜德·穆敏的许多行政法规，在当代摩洛哥的马赫曾族的组织中仍有保留。阿尔莫哈德的信徒求助于安达卢西亚人，或求助于在安达卢西亚受过训练的马格里布人，往往是为了行政管理技术上的需要。双方既都有其政治目的，这具体表现在穆敏王朝的维义德和阿尔莫哈德的谢赫两种官职的双重存在上，也都有其意识形态目的，这反映在

[49] 详情见伊南('Inān)，1964年，第1卷，第289－302页。关于西班牙的发展情况，见第304－411页。

[50] 关于伊本·马尔达尼什和伊本·加尼亚，见《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3卷，第864－865页；第2卷，第1007－1008页。

“宣传鼓动员”塔拉巴（*talaba*）和真正的“政治委员”胡法兹（*huffaz*）同时并存。

43　这种大不同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体制是靠一种新的税收制度来维持的。据传阿卜德·穆敏从伊弗里基亚回国时（阿拉伯历 555 年或公元 1160 年），曾着手对马格里布全境（从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拜尔凯，到南摩洛哥的努尔）进行一次考察；[55]估计山脉和不毛之地占三分之一，其余地区则可征收“土地税”（*kharādj*）——或是现金、或是实物。自古罗马以后，阿卜德·穆敏是提出土地注册的第一人；这在这位哈里发的计划中是一种开辟财源的主意。他要所有的居民交纳土地税，因而就把他们放在非穆斯林的同等水平上。实际上，除了阿尔莫哈德教徒之外，居民并非真正的穆瓦希敦（*muwahhidūn*，唯一神教派）。当时，希拉利亚人可能早已在东马格里布确立了类似的税制，阿卜德·穆敏只不过是加以推广，利用希拉利亚人自己来征税。唯有阿尔莫哈德运动成员的土地是不纳税的。于是，中马格里布和伊弗里基亚被看成是征服地区。统一只有利于战胜者，因而要维持马格里布的统一就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阿尔莫哈德运动的思想意识仍过于偏狭，尽管阿卜德·穆敏作了一些修正，也不能达到“心灵平静”的境界。[56]

阿卜德·穆敏虽然扩大了原先马斯穆达族系的核心队伍，但他似乎更多地依靠他的陆军和海军，而不重视真正的统一政策的实行。由于征税和流通制度相当健全，阿尔莫哈德运动得以维持一支庞大的陆海军；但是，以组织、训练有素和作战力强著称的这支阿尔莫哈德大军从来不是团结一致的，这越来越被证明是一大弱点。

阿卜德·穆敏统治的另一特征值得一提，这就是通常所谓的“放逐”希拉利亚人的政策，这在目前研究的限度之内一时尚难作出评估。贝都因部落的迁移则是对很多动机的一种反应，而且引起多种多样的后果，这也很难以一言蔽之。已故的R.勒图尔诺断言，这是一场“灾难”，但我们决不该被法国殖民时期的偏见搅昏了头脑。[57]

稳定与平衡的时代

阿布·雅库布·优素福统治时期（1163－1184 年）

阿卜德·穆敏的继承人并非 1154 年所立的穆罕默德，而是他的另一个儿子阿布·雅库布·优素福，直到 1168 年他才用了哈里发的称号，即埃米尔（*amīr*）穆明宁。因此，

44　可以断言曾有过一次继位危机，其背景大概是摩洛哥北部休达与卡比尔堡之间的古马拉族骚乱。这场骚乱扩大到近邻桑哈贾及阿乌拉巴族的居住地，而且出现了一个似乎曾自铸货币的领导人。从《基尔塔》（*Kirtas*）一书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骚乱是因新哈里发遣散阿卜德·穆敏所征集的安达卢西亚远征军而引发的，但官方信件（第 24 号）则对这次暴动从宗教原因作了解释，据说骚乱领导人名叫萨巴·伊本·马纳格法德，骚乱持续了两年之久。[58]这种解释有点道理，因为休达地区的马立克教派仍在反抗，又有著名的

---

[55] 伊本·阿比·扎尔，前引著作，原文第 129 页；法文译本，第 174 页。

[56] A.拉鲁伊，前引著作，第 171－172 页。

[57] R.勒图尔诺，前引著作，第 59 页。

[58] 《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 2 卷，1121 页；A.梅拉德，1962 年，第 20 卷，第 409 页及注释；伊本·阿比·扎尔，前引著作，原文第 137-138 页，法文译本，第 295-296 页。

卡迪、伊亚德在鼓励他们。

鉴于骚乱情况严重，新哈里发不得不亲自出马讨伐。据伊本·阿西尔记述，1166－1167年，他和两个兄弟（乌玛尔和乌斯曼）指挥军队平叛，以一场大屠杀而获得胜利。[39]于是，阿布·雅库布·优素福乘机采用埃米尔穆明宁的称号；在胜利完成这次战役之后，任命他的兄弟为休达总督，并监视里弗地区。

安达卢西亚战役

新哈里发先让他的兄弟乌玛尔和乌斯曼出征，他们在1165年击败了伊本·马尔达尼什及其基督教徒雇佣兵；但是，首都穆尔西亚坚持抵抗，这小邦恢复其独立达5年之久。同时，在西边的葡萄牙也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危机：阿尔丰索·恩里克斯的著名将领希拉尔多·塞姆帕博在1165年夺去许多据点，不久又随其国王围攻巴达霍斯，而该城只能指望阿尔莫哈德王朝的盟友——莱昂的费迪南德二世前来解救。

正当此时，伊本·马尔达尼什在东边的威胁力量却被阿尔莫哈德的军队轻易克服了。他因与自己的岳父又兼副将的伊本·哈姆什克（基督教编年史上称赫莫契科）不和而被大多数部众所废，1172年死后全功尽弃。他的家族投靠阿尔莫哈德王朝，充当很有利用价值的咨询顾问。但是，对韦特（瓦布达）的围攻，在1172-1173年失败了；这里是人口重新聚集而对昆卡和黎万特边区造成威胁的地带；围攻的失败，只能说明阿尔莫哈德的军队指挥失灵和哈里发缺乏勇气。卡斯蒂尔军队一逼进就解除了当地的危局，迫使阿尔莫哈德部队退到穆尔西亚，而且溃散了。1181－1182年，哈里发率领军队回到马拉喀什，由阿拉伯人的谢赫、阿布·希尔罕·马斯乌德·伊本·素丹指挥的阿拉伯部队也从伊弗基里亚赶来会合。

阿布·优素福·雅库布·曼苏尔统治时期（1184－1199年）　45

这位王子似乎从来都不曾被指定为哈里发的继承人。当阿尔莫哈德运动把他推举上台时，从他的兄弟乌玛尔、穆尔西亚总督到其他人都有异议和争论。但是，他必定很快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因为他本来是以精明强干著称的。他曾经是他父亲的得力助手，当过大臣，因而熟悉国务活动。[40]不过在他统治初年，困难重重：当时不仅是马格里布中部和伊弗里基亚的骚乱正在扩大，而且还有决心向阿尔莫哈德统治秩序挑战的巴努加尼亚人的敌对势力在煽动暴乱。

马格里布中部的巴努加尼亚人

此族得名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公主加尼亚，她是由阿尔莫拉维德的素丹、优素福·伊本·塔什芬作主，嫁给阿里·伊本·优素福·马苏菲的；生有二子，叶海亚和穆罕默德[41]

[39] 伊南，1964年，第2卷，第23和以后各页；《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1卷，第160－161页。

[40] 关于这位王子的统治年代，见《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1卷，第165－166页；A.梅拉德，1962年；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前引著作，原文第189、192页，法文译本第226、229页；E.莱维-普罗旺卡，1941年（a），第27期，第158-162页；后列著作对哈里发阿布·雅库布·优素福未下定论。

[41] 《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2卷，1007页；A.贝尔（A. Bel），1903年。

在阿尔莫拉维德统治时代，这两兄弟起过重要作用，特别在西班牙很有影响。穆罕默德在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倾复时是巴利阿里群岛的总督，他把他的管辖地变成流亡者的避难处，宣布独立，使群岛成为败落王朝大群支持者的退却基地。其子伊沙克继续执行他的政策，并以从事海盗活动使这个小王国发达起来。伊沙克之子穆罕默德倾向于承认阿尔莫哈德王朝的宗主权，但其兄弟们将他废黜而支持另一兄弟阿里，并决定对阿尔莫哈德王朝进行无情的战争，阻止他们夺取群岛。[82]后来主要出于商业上的考虑，阿里等人很快又把战争扩大到马格里布。这的确不是一次简单的反叛，而几乎完全变成为一场对马格里布人民具有深远影响和对阿尔莫哈德王朝也会带来严重后果的政治斗争。阿里（人称阿里·伊本·加尼亚）为自己对阿尔莫哈德王朝不共戴天的仇恨心所驱使，坚决投入战斗。

新哈里发优素福·雅库布继位时的条件很难说是有利的。贝贾亚的哈马德（*Hammadid*）桑哈贾人并没有失去重掌政权的希望。马约尔卡岛的阿尔莫拉维德部队抓住有利时机，发起一次大胆的突击，结果于1184年11月12日占领了贝贾亚。[83]出于自身的考虑，他们后来着手重建哈马德王国。这次成功的突击只用了一支小部队——20个分队，共骑兵200名和步兵4000人，可见当时阿尔莫哈德王朝兵力分散，它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马约尔卡部队自然就把阿尔莫哈德的总督赶回特莱姆森了。

46

阿里·伊本·加尼亚受到激励，他让兄弟叶海亚留驻贝贾亚，自己在阿拉伯族系的里亚赫人、阿思巴吉人和朱达姆人援助下领兵西进，其目的在切断马格里布中部与阿尔莫哈德政权的联系。他成功地攻下阿尔及尔、穆扎亚及西部地区，尽管还不敢去同支持阿尔莫哈德王朝的特莱姆森地区人民较量。此后他又回师东向，占领卡拉；君士坦丁城经过坚决抵抗，终于沦陷。直到阿尔莫哈德哈里发的军队逼进，阿里·伊本·加尼亚才退却，最后逃之夭夭。这是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余党的第一次冒险行动，虽然历时短暂，却也引起巨大的震动。《穆吉布》（*Mu'djib*）一书的作者把它看成是对马斯穆达帝国的第一次明显打击，这种观点是言之成理的，其影响在他写书的时候（1224-1225年）仍可以感觉得到。[84]

从马约尔卡来的一伙人把所有反阿尔莫哈德的势力都煽动起来，而后者无疑也发现阿里·伊本·加尼亚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领导者。伊本·哈勒敦就曾经谈到阿拉伯人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马约尔卡人。[85]然而另一方面，阿尔莫哈德中央政府反应迟钝，过6个月才采取行动，这就足以使一些本不愿同阿尔莫哈德政权挑战的人们思想混乱了，这也是原因之一。

伊本·加尼亚利用了新哈里发统治初期的困难；但新哈里发从塞维利亚回来之后便特别注意到准备反击。他从休达发动了一场以阿尔及尔为目标的海陆军联合进攻。阿尔

[82] 伊南，前引著作，第1卷，第148页、305及以后各页，特别是第314-315页；第2卷，第144及以后各页；《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2卷，第1007页；A. 梅拉德，1962年，第42页。

[83] A. 维西·米兰达认为是1185年5月22日。

[84] A. 梅拉德，1962年，第424页；伊南，前引著作，第2卷，148及以后各页，其中156-158页阐述阿里·伊本·加尼亚在马格里布行动时巴利阿里群岛的状况。关于《穆吉布》一书，见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前引著作，第230页。

[85] 伊本·哈勒敦，1852-1856年版；A. 梅拉德，1962年，第427及以后各页。

莫哈德军队成功地重新占领了先前失去的土地；但军队指挥官赛义德·阿布·扎伊德（哈里发的侄子）却犯了严重错误。他看到伊本·加尼亚远逃至南方的莫阿布就认为万事大吉了，殊不知伊本·加尼亚及其兄弟们是在伊弗里基亚避难处重新组织力量，准备卷土重来。

巴努加尼亚人在伊弗里基亚

由于丧失舰队，贝贾亚的桥头堡也被阿尔莫哈德军队夺去，巴努加尼亚人不得不改变反阿尔莫哈德战争的方式。他们转入游击战，利用居民经常处在分裂状态的沙漠地区作为退却和重新聚合的基地。阿里·伊本·加尼亚回到杰里德，借当地阿拉伯人的力量夺占了加夫萨城。由于受到托泽尔居民的反抗，他又决定与阿尤比·萨拉赫·丁（萨拉丁）侄子的一个放释奴、亚美尼亚人卡拉库什联合，后者当时以一支来自古兹族的土库曼部队占据了的黎波里地区。伊本·加尼亚在途中还争取到兰图纳族和马苏法族，并得到巴努苏莱姆阿拉伯人的支持，[58]因此他的地位相当巩固了。于是他采取了充分暴露其政治野心的步骤：他向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纳西尔上书宣誓效忠，从纳西尔方面得到支持和援助的许诺。据说阿拔斯王朝——假如伊本·哈勒敦的记述可信的话——曾促使萨拉丁支持卡拉库什和伊本·加里亚结盟，[59]而这次合作很快就有了成果。那个亚美尼亚人把加贝斯变为他的主要基地，而马约尔卡人占领整个杰里德地区，结果在突尼斯西南部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统治集团。

从这片地盘出发，两个同盟者继续对整个伊弗里基亚施加威胁；他们的袭击远达博恩海角，幸免于难的只有突尼斯和马赫迪亚。[60]帝国政府采取行动已属必不可少。

阿布·优素福·雅库布入侵伊弗里基亚

虽然穆敏王朝（穆敏家族）内部焦虑不安又犹豫不决，但哈里发阿布·优素福·雅库布还是决定亲自带一支军队去讨伐东部。[61]1186年12月间，他率领2万名骑兵奔向突尼斯，伊本·加尼亚听到消息后，退避暂时，其部队撤至杰里德。阿尔莫哈德骑兵6000人紧追不舍，他便引诱他们进入腹地，准备在加夫萨附近的乌姆拉接战：1187年6月24日，他在这个地方使阿尔莫哈德部队受到重创。这时，哈里发亲自督战，他向凯鲁万进军，切断了伊本·加尼亚在加夫萨的退路。1187年10月14日，伊本·加尼亚在哈迈受到打击，几乎全军覆没，他本人负重伤，但仍“逃遁”入沙漠；哈里发一时出错，没有尽力追捕。雅库布转而对付卡拉库什，1187年10月15日攻下他的基地(加贝斯)，掳获其财物及家属，但还是饶他一命。

几次胜利之后，哈里发着手在这些麻烦多事的地区重建阿尔莫哈德王朝的统治。他

---

[58] 尽管哈里发优素福给了警告，巴努苏莱姆人的一些分支仍不愿离开他们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的土地；见E. 莱维-普罗旺卡，1941年(a)，第26期，156页。

[59] 伊本·哈勒敦，1852-1856年版，第93-94页。

[60] 伊本·阿西尔，前引著作，第607-608页。

[61] A. 梅拉德，1962年，第2卷，第432及以后各页。

对杰里德——敌方富庶的供应基地进行了大扫荡，攻占了纳夫扎瓦(托泽尔)、塔克尤斯、纳夫蒂，经过一场艰苦的攻坚战，他重新占领了加夫萨，并严厉惩罚了阿尔莫拉维德的官吏；但是，对古兹族却十分宽容，显然是要他们加入自己的精锐部队。

48

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武装力量遭到消灭，基地沦陷，同盟者也已溃散，整个突尼斯南部地区再一次归属阿尔莫哈德王朝统治。战役结束后，阿布·优素福·雅库布对朱达姆、里亚赫、阿辛姆等部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放逐”，把他们大部分安置在塔马斯纳；这地区遭受过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征服战争，又受到阿尔莫哈德王朝的讨伐镇压，土著居民——有名的巴尔格瓦塔族早已迁散一空。[illegible]在摩洛哥，阿拉伯人的因素有了明显的增长。

有一系列事情说明伊弗里基亚的局势远非平静的。叶海亚·伊本·加尼亚继其兄阿里之后又以非凡的能力恢复了反阿尔莫哈德王朝的联合势力。他所进行的反阿尔莫哈德帝国的战争，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给它以沉重的打击。他在帝国东部进行颠覆活动，给它造成巨大的困难，使它日渐衰弱。

巴努加尼亚人在伊弗里基亚和中马格里布恢复活动

巴努加尼亚的新领袖叶海亚重组军队，再度与卡拉库什结盟，并重振过去的一系列活动。他绕开伊弗里基亚（那里的阿拉伯游牧部族在1187-1188年“大放逐”之后势单力薄），转而集结兵力去进攻马格里布中部。他似乎是想通过这些行动达到滨海一带以便和马约尔卡恢复联系。[illegible]但是，他对君士坦丁的进攻失败了，他不得不退到南方设法与卡拉库什取得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保持了。

当时，卡拉库什放弃了与阿尔莫哈德联盟的策略[illegible]。他在里亚赫阿拉伯人的酋长马斯乌德·布尔特的帮助下恢复了他原有的占领地——从的黎波里一直延伸到加贝斯。[illegible]叶海亚成为比斯克拉的主人之后，他和他的这个同盟者再一次控制了整个突尼斯内陆地区。1195年，两个同盟者之间的关系破裂了。叶海亚的兄弟阿卜杜拉从巴利阿里群岛派来一支舰队进行干预，叶海亚得以把卡拉库什赶进奈富塞山。至此，他成了从的黎波里塔尼亚直到杰里德这一整片土地的主人。

另外，阿尔莫哈德阵营内部的一次危机也进一步削弱了他们在伊弗里基亚的地位。1198年，阿尔莫哈德部队的一名军官穆罕默德·伊本·阿卜德·卡里姆·拉格拉基（因抵抗游牧部落的袭击而在故乡马赫迪亚城颇有声望）与阿尔莫哈德王朝的突尼斯总督发

49

生争执，他竟自行宣布独立，并采用了“穆塔瓦基勒”(*Mutawakkil*)的称号。[illegible]他的冒险行为未能得逞，但他的死却给叶海亚带来天赐良机，得以在短短的两年内夺取了这一

[illegible] E.莱列维-普罗旺卡，1941年(a)，第31期，32期，第218页，第33期（马赫迪亚附近的曼齐尔·阿比·赛义特，拉比时代II，10)，584页；1941年(b)，第63-64页。

[illegible] A.贝尔，前引著作，第89页。

[illegible] 这也许是萨拉丁的使臣未能说服优素福·雅库布·曼苏尔的结果，时在阿拉伯历586年（即公元1194年)；见伊南，前引著作，第181-186页。

[illegible] G.马凯（G.Marçais)，1913年，第203-204页。

[illegible] 详情见A.梅拉德，1962年，第440页。

带土地，成了贝贾、比斯克拉、特贝萨、凯鲁万和安纳巴的主人。

阿尔莫哈德王朝的突尼斯总督最后投降了。奈富塞山哈列哲教派的一次出击恰巧发生在伊本·加尼亚加强其地位的时刻，他现在是马格里布整个东半部的主人，其权势达于极盛。

阿拉克（阿拉考斯）战役和雅库布统治的结束

东部发生的这些严重事件和在西班牙发生的同样严重的困难是同时出现的。[105] 阿尔莫哈德王朝面临的窘况——不可能两面同时作战——以最难以应付的形式表现出来。雅库布怎样对付呢？史料中的记载是互相矛盾的：但我们可以从 1194 年谈起，哈里发似乎在这一年就实际上放弃了伊弗里基亚，听天由命，而集中全力来处理西班牙事务。[106]

1190 年与卡斯蒂利亚订立的休战条约即将满期，阿方索八世的军队正向塞维利亚逼近。哈里发再次渡过海峡，于 1195 年 7 月 18 日著名的阿拉克（阿拉考斯）战役中战胜了卡斯蒂利亚人。这次胜利使他得到曼苏尔·比拉赫（*al-mansūr billah*）的称号（意为体现真主意志的胜利者）。翌年，趁卡斯蒂尔、纳瓦拉、莱昂三邦之间发生纠纷的时机，雅库布发起一次破坏性战役，直逼马德里城下。然而，这种进攻仅仅是一种突袭，没有什么前途；哈里发必定看到这种局势，所以他很快接受卡斯蒂尔的停战要求，因为卡斯蒂尔已同阿拉贡结成同盟去反对莱昂了。

1198 年 3 月间，哈里发雅库布离塞维利亚而回到摩洛哥。刚一回国就病弱不起，他只得宣布立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为继承人；据说他自己隐退以便考虑大局，直到 1199 年 1 月间死去。

阿布·阿卜德·阿拉·穆罕默德·纳西尔统治时期（1199-1214 年）

穆罕默德·纳西尔的继位并未引起纷争（虽然《基尔塔》（*Kirtas*）一书的作者提到古马拉人居住的地区在阿拉伯历 596 年/公元 1204 年有过一次叛乱事件）。[107]然而，当时的局势并不平静，只有摩洛哥经历了一段和平与繁荣的阶段。西班牙的权力平衡状况未有变化；至于伊弗里基亚，在驻突尼斯的总督投降之后，伊本·加尼亚已经成了统治一切的专制君主。

新哈里发首先考虑到伊弗里基亚的情况，派出一批部队去牵制伊本·加尼亚。可是，后者越来越向西扩张领土，自己任命总督；而且，据伊本·哈勒敦记述，伊本·加尼亚还以“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名义做祷告。 50

哈里发穆罕默德·纳西尔这时不能在东部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因为在苏斯地区和加祖拉族中同时发生了暴动。这一叛乱的领导人名叫阿布·卡萨巴，他自称是人们期待中的“卡赫塔尼”（*kahtani*）。暴动期间，高举马赫迪的旗帜坚守摩洛哥的阿尔莫哈德教徒

---

[105] 详情见伊南，前引著作，第 2 卷，第 196 及以后诸页。

[106] A. 梅拉德，1962 年，第 443 页；伊本·阿西尔，前引著作，第 613 页。

[107] 伊本·阿比-扎尔，前引著作，第 153 页。

受到了挫败。哈里发甚至非得依靠军队中古兹族士兵的帮助，才有可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把暴动平息下来。他痛心地指责当地人民不该让阿布·卡萨巴运动在阿尔莫哈德运动的发祥地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08]

这表明12世纪后期的阿尔莫哈德教徒已大不同于早期的卫道者（"信仰虔诚的骑士"）和信仰唯一神论的改革者。他们中间普遍感染了冷漠和厌倦的情绪；对暴露出精疲力竭情绪的阿尔莫哈德运动说来，这真是最严重的危机。而这种消极失败情绪，在处理伊本·加尼亚问题时又更为明显。哈里发身边所有的顾问中，只有阿布·穆罕默德·阿卜德·瓦希德（著名谢赫阿布·哈夫斯·乌玛尔之子）一人反对与阿尔莫拉维德势力讲和的想法，主张把阿尔莫拉维德余党一劳永逸地赶出伊弗里基亚。[109]预兆帝国思想衰败的这种消极失败情绪，甚至传到哈里发的随从中间。然而哈里发穆罕默德·纳西尔却以一阵突发的热情，决定对伊本·加尼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

纳西尔对巴努加尼亚人的进攻和阿尔莫哈德王朝在伊弗里基亚重建统治

纳西尔攻势的特点是采取新战略：他首先攻陷阿尔莫拉维德余党在巴利阿里群岛上的避难处，接着在1203年12月猛攻占领了马约尔卡，这样，巴努加尼亚就失去了海军基地，而且也失去了他们赖以同一切反阿尔莫哈德势力（阿拉贡、热那亚和比萨）紧密联系的商业基地。[110]当时，阿尔莫拉维德分子在伊弗里基亚势力仍很强大，而且在1203年12月15日拿下了突尼斯。但一旦哈里发摆开战场，伊本·加尼亚却把他的家属和财物转到马赫迪亚，自己退入内地。[111]他转移到加夫萨，该城是他最可靠的要塞之一。阿尔莫哈德军队在突尼斯登陆之后大肆屠杀；[112]他们分两路进攻，哈里发向马赫迪亚进军，而谢赫阿布·穆罕默德则去追击伊本·加尼亚。

51

经过持久而困难的围攻，马赫迪亚终于陷落。当地总督阿里·伊本·加齐（伊本·加尼亚之侄）于1206年1月11日投降后加入了阿尔莫哈德阵营。哈里发回到突尼斯，用一年时间重新组建行省，把再次征服和平定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兄弟阿布·伊沙克。后者降服了马特马塔和奈富塞两地，穷追伊本·加尼亚（他那时在塔吉拉被哈夫斯家族的阿布·穆罕默德击败、财物失尽）远至拜尔凯地区，但未能捉住他。

根据主要助手所提合理建议(虽也可能出于私心)，哈里发决定任命塔吉拉战役的胜利者、辛塔塔氏族集团的谢赫、阿布·穆罕默德·阿卜德·瓦希德（阿布·哈夫斯·乌玛尔之子)为伊弗里基亚总督，这是一个重要而艰难的职务。作为"帝国的显贵"，阿布·穆罕默德接受了这次使他离开中央权力中心的微妙任命，其条件是他拥有最高权力，能以其总督职责过问一切意向和目的。[113]这个自作聪明的决策却又把阿尔莫哈德帝国的功

---

[108] 伊南，前引著作，第2卷，656页；A.梅拉德，1962年，第448-449页；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前引著作，第276页。
[109] 伊本·哈勒敦，法文译本，1852-1856年，第2卷，第220-221页。
[110] 关于马约尔卡的沦陷，见E.莱维-普罗旺卡，1941年(a)。
[111] 这些战役的详情，见伊南，前引著作，第2卷，第257-270页。
[112] 伊本·哈勒敦，法文译本，1852-1856年，第2卷，第221-222页，第286-287页。
[113] R.布伦什维格（R. Brunschvig)，1940年，第13页。

业引入了另一道败途。

1207年5月哈里发启程重返摩洛哥，伊本·加尼亚又卷土重来，他在许多阿拉伯族系（里亚赫人、苏莱姆人、达瓦维达人）支持下企图切断道路；但是，他的军队在谢利夫平原上被击溃了。此后，他沿沙漠边缘撤退，然后又出现于伊弗里基亚南部。新任总督阿布·穆罕默德这时已降服苏莱姆的大部分臣民，于是挥师南下，在1208年将伊本·加尼亚的部队歼灭于瓦迪沙布罗（特贝萨附近）。

伊本·加尼亚逃往沙漠，又出现在西部。他一直冲到塔菲拉勒特一带，掠夺锡吉勒马萨，击毙了特莱姆森总督。这次战事期间，他践踏了整个马格里布中部地区；直到14世纪，伊本·哈勒敦还写道："当地荒凉无人烟，不见炊烟，不闻鸡鸣"。[14]

伊本·加尼亚在这次破坏性战役之后回途中遭到了伊弗里基亚新总督阿卜德·瓦希德的阻击，大败于谢利夫附近，失去了全部战利品。这个马约尔卡人及其盟友不得不退入的黎波里塔尼亚，潜伏待机，准备再一试最后反抗阿卜德·瓦希德的运气；但在1209-1210年，他又被阿卜德·瓦希德打败，连众多的阿拉伯族系（里亚赫人、奥夫人、达巴布人、达瓦维达人和泽纳塔人的一部分）也都在奈富塞山下溃散了。此后，由于新总督的努力，伊弗里基亚至少享有10年的和平。[15]伊本·加尼亚逃向南方的瓦丹，因与那里的旧盟友和竞争者卡拉库什反目而于1212年将他杀害，并取而代之。直到1233年，伊本·加尼亚才被阿卜德·瓦希德的继承人所擒。 52

巴努加尼亚人急风骤雨的史诗般的活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它那奇特的航海岛屿与撒哈拉游牧生活密切结合的背景，使人不禁联想起阿尔莫拉维德史诗的开端。关于这一特点，在各种不同的论述中均有反映。只以乔治·马凯为例，他注重结果而不深究原因，认为这是希拉利亚人"灾难"的延续，所以他"谴责"马约尔卡人把阿拉伯贝都因人的"灾祸"扩展到了马格里布中部。[16]可是，对希拉利亚问题，我们今天也要作冷静客观的研究；那种认为贝都因人给文明带来灾难的说法，已经被研究工作者和史学家彻底否定了。

当然，我们不能把巴努加尼亚的冒险活动只归结为没有政治目标的骚乱或一般性的暴动。显而易见，这是一场反抗穆敏王朝的持久斗争，甚至可以说它反对的是整个阿尔莫哈德体制。简而言之，这是巴努加尼亚人发起的致力于取代阿尔莫哈德统治的权力斗争。他们坚韧不屈，在斗争中绝不动摇，表明自己是有深刻动机而承担了一项必须忠实奉行的事业。在这场战争中，勿庸置疑，政治及思想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因为所有反对阿尔莫哈德运动的势力都汇合在一起：业已倾复的各王族的成员，马立克教派，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支持者，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氏族集团，还有的黎波里塔尼亚急求脱离山区孤立境地的柏柏尔人。这里，确乎需要对上述各个反对力量及他们在所谓"马约尔卡史诗"中的作用做一点研究。

[14] 《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2卷，第1007-1008页。

[15] A.梅拉德，1962年，第2卷，454及以后各页；伊南，前引著作，第2卷，第271-276页；伊本·哈勒敦，法文译本，1852-1856年，第2卷，第290-291页。

[16] G. 马凯，1913年；参阅《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2卷，第1007-1008页。

有两方面的因素可以帮助我们至少粗略观察一下马约尔卡人取得相对成功的经济原因。首先，马约尔卡是一个海军、商业和外交的基地，它的陷落预告巴努加尼亚人的末日即将来临；其次，与巴努加尼亚势力影响的地缘范围有关，在马格里布，这包括从东边的瓦丹和的黎波里亚东南部，直到西边先前哈列哲教派定居区（中马格里布的南部）一带。这是一片狭长地带，既能向北也能向南延伸，拥有富饶的绿洲和不同意向的居民；更重要的是，这里早已成为穿越撒哈拉的几条传统交通要道的出口（本书有好几章都谈到这些交通要道的重要作用）。的确，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在马格里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因素。

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把巴努加尼亚人的斗争看成是为了重新获取法蒂玛王朝、齐里王朝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在此商业关键地区的遗产。相反，阿尔莫哈德王朝——尽管看重西班牙——似乎基本上仍停留在以阿特拉斯山东、西两端为轴心的地区。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产生和发展相比较，阿尔莫哈德运动是处在一个不大顺利的时代：在北方，它遇到逐步推进的西班牙复土运动（*reconquista*），同时，它对富裕的苏丹地区看来也缺乏商业上和战略上的深远认识——苏丹的黄金源源不断地给地中海经济注入活力。

53

伊卡布（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的惨败和纳西尔统治的结束[17]

1195年的阿拉考斯战役已经给基督教徒敲响了警钟。他们在很短时间里消除彼此间的分歧、重新组织起来，恢复了反对阿尔莫哈德王朝的活动；休战协定即将满期，纳西尔的抗议也就不值一顾了。1200年，卡斯蒂尔的阿方索八世已威胁到穆尔西亚地区；1210年，莱昂的佩德罗二世对巴伦西亚造成巨大破坏。这些行动是基督教阵营出现新势头的预兆。在著名的托莱多主教罗德里戈·希门尼斯·德-拉达的推动下，西班牙重新开始征战的活动成了消除基督教内部分歧而获得整个欧洲支持的一场真正的十字军战争。由于教皇英诺森三世同意十字军讨伐，托莱多主教的鼓动获得成功。

对阿尔莫哈德方面来说，不幸的是缺乏实力和团结。纳西尔渡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最初措施之一便是清洗军队，甚至把一些老军官都处决了。因此不足为怪，1212年7月16日阿尔莫哈德军队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中遭到惨败，溃不成军。

基督教阵营显然夸大渲染了他们的胜利。不过，一位西班牙学者安布罗西奥·维西·米兰达却记述了真实情况；正如他所指出的，穆斯林在西班牙的阵地并未完全崩溃。[18]但这次战役具有深远的意义，毕竟是联合起来的基督教徒第一次战胜了哈里发亲自率领的西班牙和马格里布的穆斯林。这次战役轰动一时，因为失败者不仅是阿尔莫哈德军队，而且是哈里发统治的阿尔莫哈德帝国。

在这次惨败中，除军事上失利之外，阿尔莫哈德体制的脆弱性也暴露无遗。比一次军事上的失利更为严重，这既是一个接近于瓦解的统治权力的政治上的失败，也是一个丧失战斗意志的军事机器所遭到的挫折。阿尔莫哈德帝国确实还有几年的光辉时代，但

[17] 详情见伊南，前引著作，第2卷，第282-326页。
[18] A. 维西·米兰达，1956年(a)，第219-237页；1956年(b)，第2卷，第428-429页。

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却是这个政权开始解体的无可否认的征兆。或许更重要的一点 [54] 是，这次失败之后，整个穆斯林世界西部竟然既无反应也不感到震惊：麻木不仁。连哈里发本人也抱消极态度。他很快回到马拉喀什，情绪低沉，直到1213年死去。这不禁令人联想起他的父亲1198年死时的情况。

阿尔莫哈德帝国的崩溃和
阿尔莫哈德体制的解体

纳西尔的继承人优素福·蒙塔西尔（或称穆斯坦西尔）尚未成年，即位时就受到阿尔莫哈德运动领导集团的束缚，权力有限。他不打算在敌方领土上长期保持阿尔莫哈德王朝的驻军，却又及早发了薪饷。国家事务一时陷入混乱状态。[9]

然而，相对说来，帝国统治还是平稳的，尽管在桑哈贾和加祖拉族中有两人自称是法蒂玛王朝的后裔和马赫迪的后代。平稳状态维持到1218年，不料巴努马林人首次在非斯附近出现了。当时的和平局势本来就是虚假的，事实上，基督教势力的威胁日益严重，巴努加尼亚人也正重新崛起。巴努马林人，先前还被阻止在帝国的撒哈拉边境一带，这时却插入马格里布边区的心脏，先是在塔扎和梅克内斯之间，继而进抵非斯地区。[10]至于国内，大臣们争权夺利，接管了国家实际事务。

因此可以说，穆斯坦西尔统治时期是一个外表平静的间歇时期；不久，各式各样的新竞争者纷纷上场，帝国危在旦夕。穆斯坦西尔死于1224年，此后事出多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混乱和痛苦挣扎的时期。[11]在此期间的统治者中，有两人比较能干而突出：马穆恩（1227-1232年在位）及其子嗣赛义德（1242-1248年在位）。但是，他们的复兴企图也注定要归于失败，因为分裂势力过于强大。[12]

最严重的危机在于军事力量薄弱。过去善于征战的阿尔莫哈德军队，现在已变成了杂牌军；他们无力守护多方面的阵地，最后在步步逼近的西方十字军的压力下终于退出 [55] 历史舞台。[13]既然军力瓦解，其他弱点也就暴露出来，特别是阿尔莫哈德王朝已无力保持教义领导权，穆敏家族与阿尔莫哈德的谢赫们离心离德。1224年以后，谢赫们试图恢复权力，特别要向伊本·贾米等大臣们报仇，但又缺少领袖和明确目标，他们的企求显得幼稚可笑，只能加剧混乱状况。朝廷的需求越来越大，它征收捐税和巧取豪夺的行为使得谢赫们与之决裂，而后者则以人民的保护者自居。

穆斯坦西尔死后，阿尔莫哈德的谢赫集团也曾推举一位年迈者为哈里发，只因安达

[9] A.梅拉德，1962年，第2卷，第459-460页；伊本·哈勒敦，法文译本，1852-1856年，第2卷，第227页；伊本·阿比-扎尔，前引著作，原文第161页，法文译本第186-187页。

[10] 巴努马林人的基地是在菲吉格高原，他们并未承认阿尔莫哈德的权威；这在当时只是许多实例之一，表明阿尔莫哈德政权已不再控制马格里布中部山区以外地方；见勒图尔诺，前引著作，第90-91页。

[11] A.维西·米兰达，1956年（b），第2卷，451及以后各页；1954年版。

[12] 参见本书第4章。

[13] 从穆斯坦西尔统治时期起，或者更早，阿尔莫哈德王朝已调动摩洛哥的基督教民兵来保护政权。见C.-E.迪富克（C.-E.Dufourcq），1968年，第41页。

卢西亚沿岸诸国反对，纳西尔的兄弟阿迪尔在那里被宣布为继承人。阿迪尔一度也曾确立了统治地位，但是，谢赫们策划阴谋，特别是与基督教徒勾结，杀害了阿迪尔（1227年）；这引起了一些氏族集团的反叛（包括库尔特在内），从而开始了一段自相残杀的时期，基督教势力和阿拉伯氏族集团在其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

阿布－拉拉·伊德里斯于1227年在塞维利亚自称为哈里发马穆恩，他同卡斯蒂尔国王费迪南德三世达成一项协议，即以放弃安达卢西亚的一些要塞为交换条件，哈里发得以召募基督教徒组织一支民兵队伍；此后，他就利用基督教民兵去对付他的竞争者叶海亚·伊本·纳西尔，因后者在马拉喀什也已被拥立为哈里发，而且得到廷马拉尔和辛塔塔氏族集团的支持。

1230年，马穆恩控制了整个帝国。他采取了两个重大步骤。一是对基督教势力实行宽容和谅解政策；其次，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正式废除了阿尔莫哈德的教旨，包括马赫迪教义及马赫迪一贯正确这一原则。[13]这一措施引起不少争议，可又有多得不胜枚举的解释。是旨在反对阿尔莫哈德的贵族集团？还是给马立克教派作出友善的姿态？看来，无论如何，马穆恩采取了一种从根本上说是机会主义的决策，借以窃取帝国的合法继承权，但其结果则是自家王朝的倾复。[14]

1230年以后，马穆恩就受到指责，因他依靠基督教徒雇佣兵而给了他们许多特权，造成了基督教徒在摩洛哥经商牟利和希拉利亚阿拉伯人包收捐税的祸根。1232年，当要去讨伐在马拉喀什重新得势的竞争者叶海亚时，马穆恩死于瓦迪乌姆拉比河谷。

马穆恩之子、14岁的拉希德继位；他的母亲哈巴达原是基督教出身的奴隶，所以能勾结基督教民兵领袖，设计把他扶上宝座。他带来一个无政府的派别争斗的混乱时代，而基督教势力也就乘机获取更多权益，特别是在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港口。[15]直到1242年12月临死前，拉希德仍不得不同他的敌手叶海亚战斗，后者总是很快逃进阿特拉斯山区，又很快下山出击；同时还对巴努马林人作战。

拉希德死后，继位者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年轻的赛义德（马穆恩和一个女黑奴的儿子）。赛义德继续执行同样的政策，又经常受到巴努马林人和来自特莱姆森的阿卜德·瓦迪德王朝的骚扰。他死于1248年，这又是一段十分艰难的漫长岁月的开端；直到1269年，巴努马林人征服了马拉喀什。从1269年到1275年，在廷马拉尔仍维持着阿尔莫哈德的"政权"。它带有返回起点的奇异的象征色彩。

阿尔莫哈德王朝的痛苦挣扎先后有半个多世纪之久，在许多外敌和日益加强的离心力打击之下，它所控制的地区不断缩小。起先是伊弗里基亚脱离帝国。接着，叶海亚·伊本·加尼亚进行长期顽强的反抗，此人在东部挫败了帝国所有的军事行动。[16]哈夫斯家族的阿卜德·瓦希德之子阿布·扎卡里亚于1228年掌握权力，1233年俘虏了伊本·加尼

---

⑬　见C.-E. 迪富克，1968年，第43页。

⑭　1232年死前，马穆恩曾恢复阿尔莫哈德正统教义和马赫迪伊本·图马特原有的崇高地位，这是在阿尔莫哈德谢赫们压力下采取的措施。见B. 布伦什维格，前引著作，第1卷，第22页，注4。

⑮　C.E.迪富克，前引著作，第54-55页。

⑯　B.布伦什维格，前引著作，第1卷，第18-23页。

亚；不久，阿布·扎卡里亚又利用马穆恩死后的改组为借口，宣布独立，甚至要求获得哈里发的称号。

自西班牙失控和脱离帝国以后，形势又回复到11世纪初以来人们早已熟悉的那种格局。权力分散在阿尔莫哈德各个地方总督手里，总督们给安达卢西亚人作了让步，而安达卢西亚人却求助于基督教国王们，一段时间之后干脆向基督教国王投降。[13]有此先例，各种企图自立为哈里发的人物纷纷寻求基督教势力的支持。这种局面给以前一些地方王朝的后裔开辟了前程，例如巴努·胡德和巴努·马尔达尼什就是如此，他们建立的埃米尔政权不可避免地必然变成了基督教统治者的附庸。1230年，阿尔莫哈德政权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消失，取代它的或者是代表远方衰弱的“阿拔斯王朝”的宗主权，或者是伊弗里基亚哈夫斯统治者的宗主权。然后，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城市一个一个地相继落到卡斯蒂尔国王（如科尔多瓦在1236年）或阿拉贡国王（如巴伦西亚在1238年）的统治之下。

[13] 穆斯林世界西部地区统一的瓦解和基督教势力对其内政的干涉，预示着穆斯林对地中海地区统治的结束。

3 马格里布文明的传播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M.塔尔比

阿尔莫哈德王朝时代

57

顶峰时期

一种文明在何时达到它的高峰，其影响又是在何时最大，这是很难一言断定的。就马格里布来说，究竟是在9世纪伊弗里基亚的武力威胁着罗马而且称霸地中海的阿格拉布王朝统治时期？还是在10世纪法蒂玛王朝使马赫迪亚成了与巴格达相抗衡的哈里发统治中心的时期？或者应该选择阿尔莫哈德时代（1147－1269年），即是确确实实由当地柏柏尔人的王朝统治、而从的黎波里远到塞维利亚结成一个大帝国的时期？我们必须承认有过好几个高峰，在曾经出现过的几次高峰中，12世纪的那一次当然不是最小的一次。

那么，就西班牙而言，又该怎样说呢？众所周知，它肯定是从旧时阿卜德·拉赫曼二世（912－961年在位）统治以后、或是从独裁者曼苏尔·阿比埃米尔（即基督教历史上著名的阿尔曼佐尔）统治时代后就失去了政治大国的地位。但是，西班牙和马格里布的情况是可以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情况来比拟的：西班牙两次战胜了它的野蛮的柏柏尔入侵者——阿尔莫拉维德和阿尔莫哈德王朝，而且还把它的历史悠久的艺术和文化传统遗产给予了他们，使他们也成为一种文明的创建者。因此，从12世纪起，整个穆斯林世界西部的文明就是西班牙文化和马格里布文化的融合，其融合程度比以往更大。

这一文明中有一部分——尽管我们很难说清这部分究竟有多大——是由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黑人建立的。这种黑人在摩洛哥和整个马格里布地区随处可见，数量颇大。相互通婚没有引起反对，倒是相当普遍，因此，自然产生出某些生源文化的影响，其性质很难明确断定。[1]西班牙也有黑人，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有时以奴隶身份，有时以自由人身份，在军队和经济领域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带来了本土的风俗习惯。[2]他们中有些人（诸如吉恩·拉丁，西班牙一位大学教授），在知识界具有极高声望和地位，给西班牙马格里布带来了相当强烈的非洲特色。

58

[1] 见R.布伦什维格（R.Brunschvig），1940年，第2卷，1947年，第158页。

[2] 见本书第26章。

艺术与建筑

在我们探讨的这一时期，这个文明的中心是在马格里布西半部。当时凯鲁万已经日趋衰落，伊弗基里亚也已丧失其显赫地位。我们应该注意到，阿尔莫哈德王朝统治时期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处于统治地位的时期（1061－1147年）属于同一个世纪。就他们的文明而言，除了不属本章重点关注的宗教方面外，这两个王朝之间并无中断。[③]尤其是阿尔莫哈德的艺术，它完全是在阿尔莫拉维德统治时期从西班牙传入或得到发展的，并在此过程中臻于成熟。

阿尔莫拉维德人是伟大的建设者。他们有少数非宗教建筑遗址一直保存至今，但更多的则在人类的战乱和狂风暴雨的岁月里毁坏殆尽了。马拉喀什和塔格拉特的宫殿早已荡然无存，各地城堡所剩无几；我们完全不了解他们的工程设施，尤其是灌溉系统的情况。然而，一些壮观的宗教遗址，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最富特色的，都在现今阿尔及利亚境内。不幸的是马拉喀什大清真寺早已在阿尔莫哈德运动的浪潮中毁灭。非斯的卡拉韦因清真寺并非完全由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所建，而是经过改造扩建的9世纪中期的建筑。但是，1096年前后兴建的阿尔及尔大清真寺，却确乎是阿尔莫拉维德时期完成的，它在14世纪和土耳其人统治时期建筑物的改造中并没有大的改变。同样还有奈德罗马的清真寺。最漂亮的建筑无疑是特莱姆森大清真寺，它外观庄严，长60米、宽50米，约1082年动工，1136年竣工。它将撒哈拉的雄伟气派和安达卢西亚艺术的精致优雅结合起来；G. 马凯写道："无须强调特莱姆森大清真寺的重要意义，它有独特的设计，安达卢西亚式的棱圆形屋顶与伊朗风格'穆卡纳斯'（*mukarnas*、钟乳石）状的梁托外凸融为一体……它在穆斯林建筑中占有崇高的特殊地位"。[④]

阿尔莫哈德统治时期继承和发展了阿尔莫拉维德统治时期的艺术，阿尔莫哈德的建筑艺术以规模宏大、体积均称、装饰华丽著称，显得更是高雅。它们真是整个穆斯林世界西部的艺术的顶峰。其中有一颗明珠，它就是马拉喀什的库图比因清真寺（*D̲jāmi' al - Kutubiyyīn*），堪称伊斯兰最珍贵的创作之一。它的设计是仿照王朝奠基者阿卜德·穆敏（1130－1163年在位）所建的廷马拉尔清真寺，6层宣礼塔（还有形态各异的拱顶大厅）拔地而起，高达67米以上。5座钟乳石形状的圆屋顶（"穆卡纳斯式建筑史上登峰造极之作"）使横向的正殿大为生色[⑤]。有花纹的叶状或扇形拱门比特莱姆森大清真寺的还多，它们架在17座正殿和7个壁洞上，交叉环列，给人以开阔和宽敞的感觉。阿卜德·穆敏之子和继位者阿布·雅库布·优素福（1163－1184年在位）主持建造了塞维利亚大清真寺，这也是阿尔莫哈德艺术中的一颗明珠。西班牙"复土运动"之后，它被改建成一座大教堂，今天只剩下那闻名全球的塔楼"吉拉尔达"。这是由阿布·优素福·雅库布·曼苏尔（1184－1199年在位）主持建成的，16世纪时它的顶上加了一个基督教建筑式样的钟楼屋顶。

59

③ 见本书第2和第5章。
④ G.马凯（G. Marçais），1954年，第196页。
⑤ R. 布伦什维格，前引著作，第237页。

最壮观的古迹莫过于哈桑清真寺。它开始由阿布·优素福·雅库布·曼苏尔在拉巴特兴建，一直也没有完工。但我们仍该赞赏那耸立的石柱，它们挺立在一片长183米、宽139米的空地上；还有那庄严的宣礼塔，即著名的哈桑塔，它高耸在清真寺正面中央。马拉喀什的卡萨巴（卡斯巴）清真寺也是由阿布·优素福·雅库布·曼苏尔建造的，但后来作了很大的改造，已不能准确地反映阿尔莫哈德的艺术特色。

阿尔莫哈德和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由于相同的原因都没有保护好非宗教建筑，首都的宫殿和大医院均已荡然无存。在拉巴特、阿布·优素福·雅库布·曼苏尔为长达5公里的土城建造的两座城门至今尚存，称为鲁瓦赫门（*Bāb al - Ruwāh*）和奥达亚门（*Bāb Oudāya*）。阿尔莫哈德的成就还有巴达霍斯的“卡萨巴”堡（*kasaba*）、瓜达伊拉的卡拉要塞（*al - Kal'a*，离塞维利亚15公里）以及可以眺望瓜达尔基维尔河上来往船只的著名的12边形“金塔”。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阿尔莫哈德艺术中，庄严、雄伟的气派是加上明快的装饰和用彩虹颜色来衬托的，特别还用了彩陶（*zallīdj*）。这是一种成熟的、有力量的和崇高的艺术。

文学

12世纪也以辉煌的文学成就而引人注目。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和阿尔莫哈德王朝时期最初对于诗人和世俗文学作品的种种限制，总的来说，很快就被西班牙炽热的太阳熔化了。这两个王朝的王公都因袭了阿拉伯君主的传统，他们视野宽广而不带偏见，鼓励文化发展，对文人施加恩赏。

60　在文学领域，西班牙马格里布的西部也有光辉的成就。只是伊弗里基亚并没有出色的表现。在此期间，唯一值得提到的作家，或许只有伊本·哈姆迪斯（约1055－1133年）；他出生在西西里，是一位声名远扬的诗人。他年青时不得不离开被诺曼人占领的“西西里祖国”，后来以感人的思乡之情，吟唱或详述他对故土的思念。他在塞维利亚的穆塔米德·阿拉伊拉赫（人们常称为穆罕默德·阿巴德·穆塔迪特）宫廷中生活过短暂时间，以后大半生是在伊弗里基亚度过的。

在马格里布边区、主要是在西班牙，文艺、美术、音乐方面人才辈出，成就显著。才华出众的文艺界人士有伊本·阿布敦（1134年死于埃武拉）；伊本·扎卡克·巴兰西（约1133年故去）；伊本·巴基（1150年逝世），他一生往来于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创作了“穆瓦什沙赫”（muwashshah）诗体，以后成为笔调浪漫的“哈尔贾”（*Khardja*）风格。还有阿布·巴赫尔·萨夫万·伊德里斯（死于1222年）；阿布尔-哈桑·阿比·哈里克（死于1225年）；穆罕默德·伊德里斯·马尔吉·库尔（死于1236年）；伊本·迪赫亚，他从西班牙到马格里布周游全境，在突尼斯住过一段时间，最后死于开罗；伊本·萨赫勒（死于1251年），塞维利亚人，属犹太血统，富有诗的灵感，1248年他家乡城市落入费迪南德三世之手后，他参加了休达总督的部队；以及阿布尔－穆塔里弗·阿米拉（约死于1258年），后者出生于巴伦西亚，曾在摩洛哥几个城市中为阿尔莫哈德王朝最后几位君主效力，后来在突尼斯为哈夫斯王朝服役时死去。

在这一大群明星中有两颗星大放异彩、不同凡常：一位是伊本·哈法贾（1058－1139

年），也就是上文业已提到过的伊本·扎卡克·巴兰西的叔父；还有一位是伊本·库兹曼（生于1086年后、死于1160年）。伊本·哈法贾出生于巴伦西亚省阿尔西拉一个富庶家庭，他并非宫廷诗人，却为当时权贵歌功颂德，颂扬阿尔莫拉维德君主阿布·伊沙克·易卜拉欣·塔什芬。然而，从主要方面讲他还是作为一位无与伦比的吟唱大自然的诗人而名垂青史。在他给人以美感又富于浪漫主义情调的诗句中，歌颂了生活的乐趣、河流和池塘的一潭清水、花园和鲜花、累累果实以及生存的欢乐。他被人们称为“吉安南”（*al - Djannān*，园丁诗人）、无论是新旧诗集都选录他的诗作。他是最优秀的古典阿拉伯诗人之一。

伊本·库兹曼是公认的“通俗诗歌王子”（*imām al - zadjdjālīn*），他作诗不咬文嚼字，而是用西班牙-阿拉伯口语生动地表达思想感情。伊本·库兹曼身材高大、容貌奇丑，一脸红络腮胡须，还长着一对小邪眼。他过着一种目空一切、放荡不羁、无法无天的生活。他嗜酒如命，全然无视严禁通奸（*zānī*）和同性恋（*lawwāt*）的法令。他总是囊中空空、身无分文，所以常往来于西班牙各城镇之间，意欲寻找慷慨的赐主和寻花问柳。他当然也尝过蹲监狱的滋味，幸亏有一位阿尔莫拉维德的显贵穆罕默德·西尔出面为他调解，才没有被鞭打致死。他穷困潦倒，但却富有灵感，而又粗野下流，他的非同寻常的命运酷似阿布·努瓦斯或弗朗索瓦·维荣。甚至他们的悔悟也都一样——直到老年时期悔悟确乎是真诚的了。他的大部分行吟诗（*zadjal*）都是献给他的保护人的，它们有的很短（只有3节），有的很长（42节）。在这种诗歌中，他破除了传统的诗体，创造了新的格律和改变了韵律的排列。题献诗歌结果成了一种歌功颂德的献词，这类作品的写作技巧非常一般。然而，在他所有的歌颂爱情与美酒的非题献诗作和写在题献诗歌之前的“善意取笑”中，诗人的艺术开出了绚丽之花。在这些作品中，他的灵感得到了自由发挥，我们从中看到了一幕幕他的同时代人的栩栩如生的滑稽剧。他使他们都“活现”在他们酒醉时的吵闹、“戴绿帽”者的羞恼，以及其他同样滑稽可笑的日常琐事的情景中。他描写轻歌曼舞，仰慕开化的大自然——花园以及健美的沐浴者在水中展示自己的身姿。他的作品相当粗俗但并不可憎。总之，他具有真正大众化的艺术才华，显示出了罕见的洞察力和永不减弱的热情。他创立的自己运用自如的一套写作方法不仅由他的同胞马德加利斯继承下来，而且很久之后，甚至在东方都有人模仿。

61

没有评论家和文集的编纂者，也就不可能有流传于世的文学作品。伊本·巴萨姆（死于1148年）有时自己也涉猎诗歌，但主要热衷于捍卫和阐述他的西班牙祖国的文学。与东方人追求的优越感相反，他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促使他编写了《文学集》（*Dhakhīra*），这是一本巨大而才华横溢的文集，也是我们现在了解11世纪与12世纪初西班牙文学的最佳资料。我们还应该感谢他的同胞伊本·巴什库瓦勒（1101－1183年），他是帕斯库阿尔的儿子，给我们留下了《安达卢西亚人物志》（*Kitāb al-Sila fī ta'rīkh a'immat al-Andalus*）一书（完成于1139年），人们把该书看作是伊本·法拉迪（1013年被杀）所著《传记》（*Ta'rīkh*）一书的续篇，它收入了伊斯兰西班牙1400位人物的传记。

语文学以两位杰出专家为代表。伊本·哈伊尔·伊什比利（1108－1179年），他的《书目》（*fahrasa*），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所有教学用书籍的资料。尤为重要的是伊本·玛达·

库尔图比（1119－1195年），他的著作比现在有些人大力提倡的简化语法要早几个世纪；他所著《语文规范》（*Kitāb al-Radd 'alā'l-nuhāt*）一书，对阿拉伯语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谴责那过多而又毫无意义的繁杂的语法规则。[6]

不可能一一列举这时期所有优秀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但有一位地理学家是非提不可的，他就是"伊斯兰世界可能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伊德里西（1099－约1166年），[7]他生活在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的宫廷中。现在，意大利的学者正在编辑他的作品。[8]

62 **哲学、医学和科学**

阿尔莫哈德时代是哲学取得特别重大成就的世纪，以一系列光辉的人物为代表。他们是伊本·巴吉贾（又名阿文帕赛，死于1139年）；阿布·巴克尔（又名伊本·图费勒或安达卢西），他被基督徒称为阿布巴塞尔——死于1185年；伊本·鲁什德（即阿威罗伊，1126－1198年）；还有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伊本·麦蒙（摩西·美莫奈迪斯，1135－1204年）。除了最后提到的这位学者早于1166年前移居埃及外，其他哲学家都曾为阿尔莫哈德效力，虽然有些人暂时受过波折，他们大多享受到王朝的保护和资助。除了他们在哲学上的特殊才华外，他们对于宗教教义也都有颇深的造诣；他们还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过各种实用科学，如数学、天文学、植物学，尤其是医学。此外，他们的姓名改为拉丁名字，表明他们已被中世纪的基督教所接受，并长期受到其思想影响。

我们不可能在每人身旁逡巡不前，但是让我们停下来看一下这一星群中最灿烂的一颗明星吧。伊本·鲁什德（科尔多瓦人），也就是西方中世纪著名的阿威罗伊。他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宗教法理专家（*fakīh*），阿布·雅库布·优素福任命他为塞维利亚的民事法官（*kādī*）。他作了许多次天文观测，并写过一本名为《医学通则》（《*Kitāb al-Kulliyyāt*》）的医学著作。决定他一生事业的是在1169年前后他的朋友伊本·图费勒把他介绍给了哈里发阿布·雅库布·优素福，这位哈里发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抱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有许多晦涩难懂之处。于是，伊本·鲁什德应哈里发之请，对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作了提要、注释和评介；他作为古代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灵感的解释者和继承者留名于后世。

尽管有哈里发的支持和保护，但由于当时不容异说，伊本·鲁什德的见解仍然不能充分发表。他受到神学家们的责难，蒙受耻辱，并遭到流放。他的著作被焚毁了。因此，他的著作只有小部分是以阿拉伯语流传到我们手中，其他大部分作品我们所看到的是拉丁或希伯来语译文。除了他的《评注》之外，还应该特别提到《实证论文》（*Fasl al-Makāl*），他在这一著作中力图解决信仰和理智之间难以消除的内在冲突；还有《矛盾的矛盾》（*Tahāfut al-Tahāfut*）一书，此文经周密研究后，对于正统伊斯兰教最杰出的神学家加扎利（1058－1111年）的作品《哲学家的矛盾》（*Tahāfut al-Falāsifa*）逐点予

⑥ 1947年在开罗出过一版。

⑦ A.米埃利（A.Mieli），1966年，第198页。

⑧ 伊德里西（al-Idrīsī），1970年，拉丁文版；T.莱维基（T.Lewicki），1966年，可以从中了解到伊德里西著作的科学性。

以驳斥。

对于伊本·鲁什德的思想和贡献，人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评价截然不同。争论的重点在于他的思想的两重性，也就是他给世俗人讲的正统道理掩盖了他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观点——后者是他说给精英杰出人士听的。实际上，许多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作品对于伊本·鲁什德的思想还没有作出定论，甚至还差得很远。至今还没有人对他的思想进行全面的探讨，也没有人透彻地阐述他通过阿拉伯语、希伯拉语和拉丁语著作中所表述的思想的发展过程。诚然，伊本·鲁什德像中世纪所有的哲学家一样，他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亚里士多德。但我们不能忘记，他的思想是在与整个阿拉伯哲学思潮接触中形成的，而经常又处于这个思潮的对立面。此外，我们还必须十分谨慎，不要像人们有时所做的那样，把作为神学家的伊本·鲁什德与作为哲学家的伊本·鲁什德绝然分隔开来。依我看来，他无疑对于宗教是虔诚的——由于这种虔诚是进步的，所以被人怀疑。至于对亚里士多德，他是一位无可否认的天才的评注者。用 A.R. 巴达维的话来讲，他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哲学方面的评注者。"[9] 但他同样还是一位思路宽阔、学识渊博和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尽管有些人认为他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实证论文》中，而另一些人认为主要表现在《矛盾的矛盾》中，人们全都异口同声地强调指出他的思想的丰富和灵活，也就是说在神学或宗教法理学（《实证论文》）和在纯哲学方面（《矛盾的矛盾》）都同样是灵活自如。他的天才充实了穆斯林世界西部的哲学。

63

阿尔莫哈德时代也因有一批著名科学家而自豪。必须简单介绍如下：医师阿布尔·埃拉·朱尔·阿卜德·马立克·穆罕默德（西方学者称之为阿波利）和他的儿子阿布·马尔万（阿文佐尔，约 1092/5－1161 年）；科学家伊本·鲁米亚；草药专家阿什夏布（死于 1239 年）；兽医专家伊本·拜塔尔（死于 1248 年）；此外，还有三位 12 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天文学家：贾比尔·阿弗拉赫，比特鲁贾，扎尔卡利。

落日余晖

阿卜德·穆敏建立的帝国没有能逃脱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惨败的劫难（1212 年）。它在对外战争中被弄得精疲力竭，又加上内部的侵蚀，终于瓦解成四个独立王国；这四个王国中有一个在西班牙，另外三个在马格里布（见本书第 4 章，原文第 75－95 页）。

格拉纳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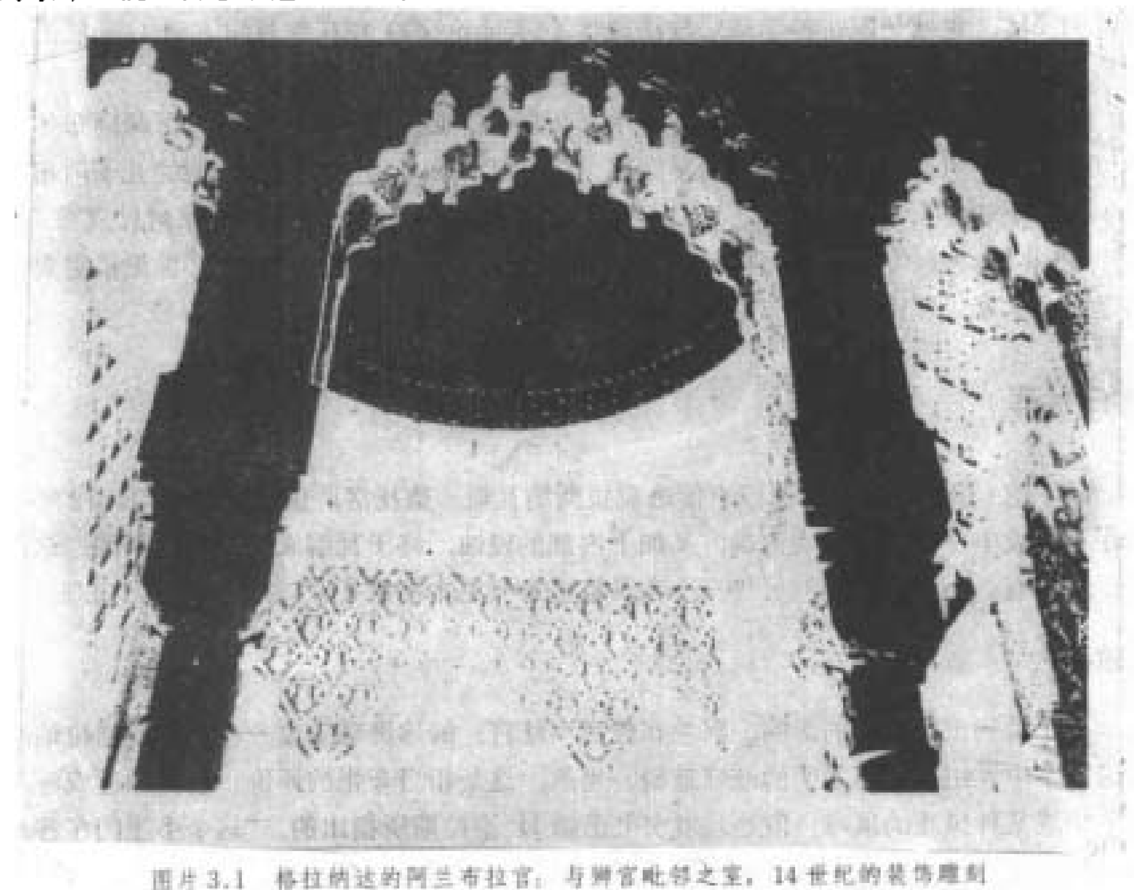
由于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阿兰布拉宫（红宫）的珍贵珠宝盒——小小的格拉纳达王国成了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登峰造极。当然，这是相当夸张的评价。格拉纳达或许仅是奢华或某种风雅的顶峰。但是，事实上正如 H. 泰拉斯所指出的，"这个小王国在各个方面都是科尔多瓦哈里发政权后期的缩影"。[10]

格拉纳达的奈斯尔王朝留下了许多民用和军事遗迹，其中最为壮观的是阿兰布拉宫。

---

[9] A.R.巴达维（A. R. Badawī），1972 年，第 2 卷，869 页。
[10] H. 泰拉斯（H. Terrasse），1958 年，第 203 页。

64 它给参观者留下了天方夜谭般的神奇印象。一扇扇对开的门窗、修长的大理石柱与一排排石雕花纹拱门互为辉映，一片片阳光、一块块绿荫、一曲曲走廊、一条条长廊——整个设计好像是想要灵活运用对比效果，想在每个转弯处都别开生面，而且还用巧妙的、使人眼花缭乱的远近配景法来打破封闭空间的单调感。这种相互间毫无联系的布局仅仅只是表面上的。如果从外面远处看，人们可以从高处俯视发现，遗址的形状十分对称、安排十分协调，这一切都使人叹为天下无双。然而最令人神往，一开始就把人迷住和给人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还是装饰的丰富多采和无与伦比的豪华（见图片 3.1）。这里并没有什么新鲜的构思，只是熟练地运用了西班牙马格里布艺术家的特长和经验以及高超的技艺。钟乳石圆顶、彩木天花板、泥塑雕像、油画和壁画，所有这一切就像是用严谨审慎和积极进取的格调谱成的一曲交响乐——各部分结合得天衣无缝，创造出充满宁静和安逸的进入梦乡般的气氛。格拉纳达的艺术憎恶空虚孤独。这里墙上到处画有花卉、写着铭文或者是呈现几何花形的窗花格。这是一种抽象的、寓言般的艺术，给人以空间感和深远感。各条线伸展出去，向四方散开，形成方格图形，然后又向上延伸，最终互相交叉，成了永无终止的狂舞。多少世代以来，这里的人们按照伊本·扎姆拉克的词写成的乐章，使人留恋忘返，甚至不期而至的游客都为之陶醉。这是一种富有魅力的艺术，



图片 3.1 格拉纳达的阿兰布拉宫：与狮宫毗邻之室，14 世纪的装饰雕刻

65 但我们又不得不说它是缺乏活力的艺术。它是这一文明的尾声，它越来越封闭在自身曲折的道路中，它是各种梦想的安乐窝，它再也无力复兴或正视生活现实。

奈斯尔王朝统治时期的文化也具有与此相同的特征，它是往昔的延续和延伸，在某些领域中也可能显得相当出色，但在哲学领域里已开始走下坡路，已经不再产生有价值的代表作了。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它既标志了时代的特征，又不断趋于衰落。若公平对待，我们还是应该一提医学家伊本·哈蒂玛（死于1369年）和数学家卡拉萨迪（1412-1486年）。

在文学方面，格拉纳拉始终保持着某种特性。这个王国从来就不乏语文学家、诗人和文雅的文体家，他们创作了受到有教养人士称颂的优美的散文，他们的作品是装点阿兰布拉宫墙的艺术品。他们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叫伊本·哈蒂布·利桑·丁（1313-1375年），他是当时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至今仍然被公认为是伟大的阿拉伯经典作家。他的朋友伊本·哈勒敦把他看作"散文和诗歌、科学和文学的真正奇才"。[11] 他作为奈斯尔王朝的公卿和大臣，得到了最高荣誉，在各种学识方面都名声卓著，如诗歌、编纂各种文集、各种信函、各类游记、历史、神秘主义学说和医学。他至少写了60部著作，他独特的风格和运用语言的精湛技巧更使他赫赫有名。但这位艺术魔法师却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有些权贵人士诽谤他异道邪说——其中有他的门徒、诗人伊本·扎姆拉克，此人后来接替他的职务，作了大臣，他则被绞死在非斯的一个黑暗的地牢中，甚至尸体也遭到焚烧。他的后任的艺术成就并不比他逊色，其结局也同样悲惨。伊本·扎姆拉克（生于1333年）是又一位韵文和散文的语言魔法大师，终于在1393年后不久，被埃米尔派人暗杀。他的诗歌并没有流传下来，但他有些诗篇"被变成绮丽的象形文字，变成了形体字优美的书法"，至今还被装饰在阿兰布拉宫墙上。[12] 对奈斯尔时期艺术和文学之间的微妙的相互影响，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表达方式了。

格拉纳拉文明是一种学者拘泥于文体字句和建筑以追求阿拉伯风格为最终目的的文明，它优雅的风格，像博物馆的许多展品一样，都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格拉纳达怎会听从伊本·胡达伊勒（死于1392年以后）的劝告呢？他颂扬马术运动的男子汉气概，意欲将这个国家从迷梦中唤醒而毫无效果。

阿尔莫哈德王朝在马格里布的后继者

至于其他方面，穆斯林世界西部地区在任何领域都失去了活力。在马林王朝统治时期、阿卜德·瓦迪德王朝和哈夫斯王朝统治时期（一直到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马格里布的历史完全是发展缓慢的僵化过程。本文不想追溯导致衰落的那种停滞状态的历史根源，尽管这一重要现象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66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基督教西方发生真正的人口爆炸时，穆斯林世界西部的人口却在逐渐减少。从11世纪中叶开始，这种下降趋势已能明显看出，到了14世纪中叶，似乎达到了最低点。伊本·哈勒敦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正确地指出这是导致文明趋于衰落的因素之一。农业，尤其是林木在减少；游牧在扩大；城市和村庄不是一个

[11]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法文译本，1956-1959年。
[12] E. 加西亚-戈梅斯（E.Garcia-Gomez），引自 H.泰拉斯，前引著作，第211页。

个消失，就是人口锐减。在9、10两个世纪曾经有数十万居民的凯鲁万，此时却变成一个小镇了。利奥·阿非利加努斯谈到贝贾亚时说，该镇只有8000户人家，然而供24,000户居住仍绰绰有余。[13]

如果我们想要对这一时期有所了解，研究人口历史是非常必要的。现在，通过判断，我们能估计到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为什么会这样呢？瘟疫——它不仅仅是原因，而且也是结果——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不管怎样，马格里布人口锐减这一事实，比其他一些次要事件更能说明地中海南岸和北岸之间不断加大的不平衡状态，正如伊本·哈勒敦所说，北岸的文艺复兴犹如旭日东升，而南岸，直到当时的纳赫达地方，却长期笼罩在层层沙尘迷雾之中，而人口爆炸（偶然的？）迄今仍在继续发展。[14]

在建筑学方面，安达卢西亚风格，也就是格拉纳达的影响在马格里布，尤其是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西部仍在延续；这一点在伊弗里基亚不太明显，那里哈夫斯王朝的遗迹被保存下来的也就相对少一点。那个年代杰出的建筑者是马林王朝。我们不可能把他们的成就都一一列举，我们只要注意到标志13世纪建筑特点的一种新式建筑物——"马德萨"（medersa）的遗迹也就足够了。这是效仿东方模式建筑的高等学府。其设计方案可以说是相当简单的：它的中央是一个有喷泉的内院，四周是连接学生宿舍的阳台；它的一边是饰有壁龛（米哈拉布，*mihrāb*）的大房间，兼作教室和小礼拜堂用。所有马格里布都城以至不少大城镇都有各自的"马德萨"，其中最宏伟的是非斯的阿布·伊纳尼亚（建于1350－1357年）。随之出现的另一种新型建筑是"札维亚"（*zāwiya*），它被用作宗教团体的会厅以及埋葬创建者的祭坛。总之，阿尔莫哈德王朝在马格里布的后继者的艺术可以被看成一种成熟的艺术。它代表了某种古典风格。它的技巧是完美的，但没有再前进一步，它很快就成为固定不变的了，因而也预示着它的衰落。

67

文化呈现了与建筑相同的特点，伊本·哈勒敦以他所特有的敏锐的目光，发现当时的马格里布"知识的进步完全停滞了"；他后来在有关理性科学的文章中又进一步补充说，这些科学"已经事实上完全消失了，除了几个遭到正统学阀非难的学者之外，很少再有人在这方面苦下工夫"。[15]他把这种沉闷状态归咎于文明的衰落和人口的锐减（*tanākus al 'Umrān*）。

摩洛哥人伊本·班纳（1256－1321年）是最后一位享有盛誉的数学家，而伊弗里基亚人伊本·卡马德则是最后一位名声卓著的天文学家。至于哲学，我们应该提到特莱姆森的阿比利（1282－1356年），他的主要成就是为培养伊本·哈勒敦作出了贡献。描写地理景观的游记（*rihla*）大师是摩洛哥人伊本·巴图塔（1304－约1377年），他曾经游历过印度、中国和非洲各地，其所到之处远远胜过他的同代人和竞争对手阿卜达里、哈立德·巴拉维和提贾尼。我们不能举出所有历史学家的名字，但其中突出的是伊本·哈勒敦(1332－1406年)；同样，还无法列举所有圣徒传记、一般人物传记和各类文集的编纂者。

---

[13] 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法文译本，1956年，第2卷，第361页。
[14] 伊本·哈勒敦，法文译本，1956－1959年，第700页和866页。
[15] 同上书，第789、866页。

诗人和散文作家倒有不少，尽管也有些成功之作，但在我们所谈的这一时期，整个说来是没落倾向占上风。作家们都很自然地去写“卡西达”(*kasīda*)，即一种日趋浮夸的颂扬文章，今天看来实在荒唐可笑，与当时现实的差距已达到荒谬的程度。诗人们也写“里塔”(*rithā*，悼诗)，替一些重要人物掉几滴鳄鱼眼泪，极难得因真正悲痛而深情感动。[16]他们以推敲描写手法为一大乐事，喜欢写百合花和杏花转瞬即逝的美，甚至也会为水车叹息。他们歌唱神秘的爱情，也为美酒而引颈高唱，还会自愿陶醉于色情诗歌的暧昧的诱惑力之中，这些色情诗歌中，情妇的侧身形像常与年轻的阿窦尼(Adonis，丰产神)相混淆。

所有这一切自古以来就是普遍的主题，此时此地又原封不动地加以使用。诗人们写的都是“古式诗句”，根本没有任何“新的思想”。他们的力量已渐渐衰退，只剩下完美的技巧，而人们欣赏的也是艺术创作者的魔术师似的灵巧。他们喜欢在平庸的作品中来回挑剔，不管什么作品，只要形式完美，他们就看成佳作。这是躲在艺术芳香之后，或沉溺在往昔气氛中的那些高雅人士的文学，也是诗句和艺术性很强的散文句子拼凑而成的文学(往往夹杂在优雅的书信里)，其中有许多是精雕细琢而成的小玩意文学。它们的精致构思，使人联想起装饰宫殿和城镇自由民府邸的那些精巧优美的阿拉伯风情图案。 68 它们在形式上的确是刻板的、颓废的，但也显示出一种真正的文化——城镇自由民的文化。当时人们爱好书籍，藏书风气之盛是前所未见的。教育(包括妇女教育)相当普及，人们爱好音乐，安达卢西亚的影响已占有主导地位。利奥·阿非利加努斯谈到泰代利斯(即代利斯)这个地方时说：“当地人民心情舒畅，过着愉快的生活。他们几乎都是出色的琵琶演奏家和竖琴师。”他后来又补充说：“贝贾亚人相当随和。他们的生活自得其乐，能歌善舞，特别是贵族”。[17]这些就是一种日薄西山的文明放射出的余晖。

马格里布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尽管穆斯林与基督教西方相互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彼此又有完全不同的命运，但是，物质和文化的交流却从未间断过。为了作出公平合理的论述，我应该先简单地概括一下物质交流的特点，当时，西班牙是文化交流的主要场所，而文化交流又比物质交流更为广泛，所以，我将侧重谈西班牙的情况。

物质交流

与西班牙的贸易，同与欧洲其他地区的贸易一样，受一系列确定程序和协调个体商业活动的协议的支配。已经懂得如何进行竞争的伊比利亚人，按照这些协议，控制了整个马格里布的所有大港口、以至内地许多地方(诸如特莱姆森和马拉喀什)的整个“芬

---

[16] 里塔(*rithā*)，指的是挽歌体风格的作品。*marthiya* 一词更多地用于写这种悲哀和伤心的作品，这种风格的作品一般都矫揉造作、千篇一律。

[17] 利奥·阿非利加努斯，前引著作，第2卷，352、361页。

达克"网（*funduks*）。所谓"芬达克"即是商队旅馆（包括小礼拜堂、厨房、餐室等）以及仓库和办事处，成为一个整体，它们通常由代表同一教派而与地区当局打交道的人来经营。

马格里布人不十分精明（这是没法否认的事实），在基督教国家中没有相应的组织给他们撑腰，在海洋运输方面他们的作用也微不足道。城镇自由民适应了商业的发展，从中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利润，但并没有因此真正成为商业资产阶级。他们没有什么事业心，也没有为了出口在国内刺激生产的雄心壮志。他们的利润一般采用由外国人支付酬金的方式获得，绝大部分上交以支援国库。[19]

产品交换中也有不平衡状态。双方的进口在原则上是没有限制的，但出口却受到限制：对某些食品（如谷类）规定了限额；对于战略物资（如武器、钢铁和木材）则有禁止出口的命令，它们必须不同程度地予以遵守。伊比利亚人向马格里布出口金属、木材、五金器具、从东方买来的香料、染料、酒类、纸张，尤其是各类纺织品。他们进口羊毛、皮革、椰枣、地毯和其他工艺品、以及蜡——布日伊（贝贾亚）城的名字就是法语中蜡烛一词，而布日伊（*bougie*）一词又从法语转为英语，但它在英语中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词。阿拉贡王国常常要求在本国商人支付的税金中扣除一部分，并千方百计从各个方面企图控制巴塞罗那-马约尔卡-特莱姆森-锡吉勒马萨一线商路，这是一条通向苏丹黄金产地的道路。[20]

马格里布在物质交流的层次上处于劣势。它大宗出口的是非物质产品，即它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却不再能得到很好的欣赏或被有利地利用，基督教西方非常高兴地发现这些都是无价之宝，随之，西方的文艺复兴也就在各个领域里得到了推动和发展。

文化交流

马格里布具有双重作用。它是一个媒介，是把穆斯林阿拉伯文明所有珍贵的东西传播到西方的必经渠道；它也同样输出自己的文化遗产。下文我们集中谈谈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因为它很少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

气氛和动机

将逐渐发展起来的许多珍贵文化传到基督教西方去，这在穆斯林世界西部是受到鼓励的，特别是12和13世纪，因为那时宽容之风正占上风。这种气氛在格拉纳达衰亡（1492年）之后，开始严重恶化，此恶化现象一直延续到1609年由宗教法庭判决驱除摩里斯科人（生活在格拉纳达、受基督教统治的穆斯林）才告一段落。对那些珍贵文物采取开放政策原因有二：其一是不存偏见的同情，另一则是推行一种宗教战略。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1105－1154年在位），由于个人兴趣爱好，招来一批阿拉伯学者。他的这种做法至弗里德里希二世（1197－1250年在位）统治时期仍在延续和发展，因为弗里德里希二世

[19] 有关与欧洲的贸易和基督教势力对公海的控制，见本书第26章。

[20] 至于阿拉贡在马格里布活动的大致情况，见C.-E.迪富克（C.-E. Dufourcq），1966年，第664页。

深深地赞赏穆斯林思想。在西班牙，"阿拉贡的佩德罗一世（1094－1104年在位）在他的书信上是用阿拉伯文签字的，而且还铸造穆斯林式的钱币。"[29] 这些做法中也存在着策略上的考虑，尤其是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们，他们念念不忘进行精神上的征服。研究阿拉伯语和穆斯林文化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研究者们抱着一种策略目标大力支持传教士的活动。但这一策略并不完全排除宽容大度，这种精神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 70 拉蒙·鲁尔（1235－1315年）可以说是它最好的代表。拉蒙·鲁尔是西班牙中世纪时期最突出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都在寻求与穆斯林"对话"。他用阿拉伯语起草协议书，在摩洛哥、突尼斯、布日伊（贝贾亚）冒着失去自由和丧失生命的危险进行讲道。

然而，尽管鲁尔宁愿把哲学看作能将穆斯林从异教中解救出来的方式手段，但他还是鼓励恢复十字军，他接连不断地于1294年向教皇塞勒斯廷五世、1295年向教皇博尼法斯八世、1298年向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美男子)、1302年向教皇克雷芒五世请战。在1311年召开的维恩教务会议上，他一方面提议建立学习阿拉伯语的高等学府，另一方面又主张建立镇压伊斯兰教的军队。在这双重性的十字军目标上，学习阿拉伯语显然只是众多武器中的一种。这位比谁都卖力去锻造这种武器的人，决不会想到后世会因为他接受了西班牙伊斯兰教最著名的神秘主义者伊本·阿拉比（1165－1240年）的影响，而把他看成是一个"基督教的苏非派"。总之，策略考虑和不存偏见的同情两种原因汇聚在一起，为穆斯林阿拉伯文明对基督教西方的影响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这样说，当时基督教西方充满活力、生机勃勃而又有热情。

阿拉伯语学研所

阿拉伯语这一文明是沿着两条道路传来的：通过西西里和意大利，或者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西班牙和法国南部。与曾经盛行一时的一种看法恰恰相反，宗教战争仅仅只起次要作用。

第一个通过意大利传播阿拉伯科学的学研所是在萨莱诺，由非洲人君士坦丁（君士坦丁纳斯·阿非利加努斯）创立。他1015年生于突尼斯，原是一名医生和商人，信仰伊斯兰教，后来才皈依了基督教，去世时（1087年）是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主持。然而，来自巴勒莫的支持力量，更使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扩大；这主要归功于弗里德里希二世（1197－1250年在位）及其子嗣曼弗雷德（1258－1266年在位）以及早期的安茹（金雀花）王室。在西西里，这是将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的黄金时代，也即星相学家西奥多、巴勒莫的约翰和摩西，以及苏格兰人迈克尔·司科特（死于1235年）的时代，他们都是弗雷德里克二世的侍臣。此外，还应提到一位犹太作家、阿格里琴托的法拉吉·萨里姆，他为法国安茹王室的查理（1264－1284年在位）服务。

在西班牙，从10世纪卡泰罗尼亚著名的里波利修道院开始的翻译工作，一直不为世人所知。该院修道士吉尔伯特在公元971年曾参加去科尔多瓦拜会哈卡姆二世的使团，他后来被选为教皇，即西尔维斯特二世（999－1003年在位）；直到12世纪最初25年，这类翻译工作的情况才略为人知晓一点。最早从事翻译工作的是巴塞罗那的学者，其中 71

[29] C.-E. 迪富克，前引著作，第23页。

第一流的翻译家有柏拉图·提比尔蒂纳斯和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亚伯拉罕·巴尔－希亚（约1136年逝世），即著名的萨瓦索尔达（萨希布·苏尔塔）。他们合作译成了几部有关占星术和天文学的著作，其中就有东方学者巴塔尼（又名阿尔巴蒂格尼或阿尔巴蒂纽斯，公元929年逝世）所绘的星象图。

继起的是托莱多城，它以自身的异彩使其他城市黯然失色，欧洲各地的学者——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以及达尔马提亚的学者——纷纷来到这里。西方基督教文化接受了阿拉伯穆斯林的营养，在这一过程中，托莱多真像9世纪崇尚希腊化遗产的巴格达一样，起了同等作用。卡斯蒂尔国王阿方索十世（智者，1254－1284年在位）与马穆恩（813－833年在位）极为相似，两人都十分敬仰亚里士多德。托莱多学研所的活动，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来说明：在第一阶段，倡导者是大主教雷蒙德（1125－1152年）；在第二阶段，则有另一位主教罗德里戈·希门尼斯·德-拉达（1170－1247年）。最初，传授阿拉伯语的是一些犹太人或摩扎拉布人（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基督教徒）。翻译工作通常须经过几段程序：阿拉伯文先要译成希伯来文或卡斯蒂利亚文，最后才转译为拉丁文，因而难免有些错误。

第一阶段的翻译家有塞哥维亚的副主教多米尼科斯·贡迪萨尔乌斯（1181年逝世），他是西班牙中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深受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影响。他的合作者是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吉恩·德斯帕格涅·阿本达乌德（1166年逝世）。但学研所最杰出的人物则是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伦巴第人，1114－1187年），他在摩扎拉布人加利普斯（加利卜）的指导下学习阿拉伯语，很快掌握了熟练使用阿拉伯语文的知识，不知疲倦地从事翻译，给我们留下的译著不下70部。有两位英国人也应该提到：巴思的阿德拉德，凯顿的罗伯特；后者为克吕尼修道会改革家彼得（1092－1156年）译成了《古兰经》的第一部拉丁文本（1143年）。此外，还应提到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

托莱多学研所的第二阶段以两位翻译家为代表：苏格兰人迈克尔·司科特和德国人赫尔曼。托莱多巨大的成功富有感染性，投身学研所的人越来越多。1236年，修道士们在巴黎集会，建议凡是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有接触的地方都应该学习阿拉伯语。1250年，穆尔西亚的伊本·拉什克赞扬当时仍为穆斯林城市的托莱多的修道院，在那里可以遇到精通阿拉伯语和《古兰经》的修道士（自然是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同时，突尼斯的阿拉伯语学研所也非常活跃，它是在阿拉贡国王詹姆士一世（征服者，1213－1276年在位）的建议下，由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创建的，有七位传道士，还接受了《指向穆斯林和犹太人的信念之剑》（《*Pugio Fidei adversus Mauros et Judaeos*》）一书的作者雷蒙·马蒂尼（1230－1286年）。雷蒙·马蒂尼所编的阿拉伯－拉丁词典，证明他精通阿拉伯语。[23] 1256年，经阿方索十世的提议，在塞维利亚也建立了学研所，由埃希迪奥·德-塔瓦迪斯和佩德罗·德-雷吉奥领导。维拉诺瓦的阿诺德（死于1312年）是该学习所最后一位杰出人物。1269年，阿方索十世将穆尔西亚（1266年被征服）的学研所，委托给当地一位穆斯林哲学家拉库蒂主持，1280年这个学研所迁到塞维利亚去了。1276年，方济各会修道士拉蒙·鲁尔在马约尔卡创建了著名的米拉玛尔经学院，有13名年轻修道士在

72

---

[23] 这部词典于19世纪在巴黎再版，1961年以西班牙文再版。

这里学习阿拉伯语，准备负起使伊斯兰教地区人民改信基督教的任务。最后，根据鲁尔在维恩教务会议（1311年）上的提议，牛津、巴黎、萨拉曼卡、罗马和波伦亚，都开办了阿拉伯语学研所。利奥·阿非利加努斯（约1489－约1550年）直到16世纪仍在波伦亚学研所执教。

在法国南部，应该特别注意来自格拉纳达的犹太人蒂博恩一家的活动。叶胡达·伊本·蒂博恩（1190年死于吕内勒）和他的儿子萨穆埃尔·叶胡达（1232年死于马赛），给我们留下了从阿拉伯语译成希伯来文的许多作品。这个家族的译书传统由他们的子孙后代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

安达卢西亚和马格里布著作的翻译及其影响

哲学

虽然直接传授的潮流从未中断，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古代思想遗产是在基督教中世纪时期，经过穆斯林阿拉伯哲学家之手笔才为后人所真正“发现、赏识和了解”；在众多的哲学家中，安达卢西亚和马格里布的学者居重要地位。

伊本·巴吉贾（拉丁文名字是阿文帕塞）著作的拉丁文本已经失传；只有希伯来文本流传到我们手中，其中有一本是《独居养生法》（*Tadbīr al - Mutawahhid*），14世纪中期由纳博讷的摩西出版。[24]伊本·图费勒（拉丁文名字阿布巴塞尔）的情况也是如此，他的哲学小说《哈伊·本·耶格赞的故事》（*Hayy b. Yakzān*）译成希伯来文的时间已无法考查，但在1349年由纳博讷的摩西用同一文字（指希伯来文）作了注释。波考克的译著以《哲学自修文集》（*Philosophus Autodidactus*）的书名出版，是最早为人所知的拉丁文译本，1671年问世。可以肯定地说，在拉丁文通行的中世纪，伊本·巴吉贾和阿布·巴克尔·图费勒·凯西尔，都是以他们的拉丁文姓名闻名于世。

73

然而，这时代的大师还是伊本·鲁什德（即阿威罗伊）。他的著作，很多都有译本，其中留传下来的大部分是拉丁文本或希伯来文本，这引起了热烈的探讨。在翻译阿威罗伊作品的众多翻译家中，迈克尔·司科特名列前茅。这位苏格兰学者被看作是传播阿威罗伊思想的先驱。德意志的赫尔曼（死于1272年）也有他自身的特殊地位。他们两人原来都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侍臣，又同在托莱多工作。此外，还应当提到普罗旺斯的蒂博恩一家人的努力，他们在犹太人中间传播了阿威罗伊思想。阿威罗伊的著述获得极大成功，因此早在13世纪就有许多种译文《注释》。

在拉丁文通行的中世纪，伊本·鲁什德（作为加扎利的对手）著有《矛盾的矛盾》（*Tahāfut al - Tahāfut*，拉丁文译本书名 *Destructio destructionis*）。他理所当然地以理性主义和反教条主义提倡者的面目出现。结果，基督教西方分裂为两个阵营：阿威罗伊派和反阿威罗伊派。阿威罗伊的狂热支持者是巴黎大学的西热尔·德-布拉邦特。这些被看成是阿威罗伊派的人特别强调世界的永恒性，否定个人灵魂不朽之说，所以能够把

[24] 索洛蒙·芒克（Solomon Munk）将此书希伯来文本译成法文本，1859年出版。

教会的捍卫者们动员起来。大阿尔伯图斯（1206－1280年）、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和拉蒙·鲁尔（约1235－1315年）曾发起一次猛烈的抨击。但是，阿威罗伊思想仍有巨大的吸引力。直到1277年，这种思潮才受到官方的压制。西热尔在1281年遭到悲惨的结局，他被逐出教门而后下狱。所谓罪责，原不过是译注上有一点无关紧要的错误。朱尔·罗曼曾在《多诺古》（*Donogoo*）这一讽刺剧中描述了犯错误的后果会有多么严重。阿威罗伊引起了一场巨大的思想骚动。他激发人们思考，无论他们是赞成者还是反对派。

阿威罗伊的成功及其所唤起的热情有一个明显的标志，那就是他成了画家作画的对象。他们把他看成是怀疑主义的化身。在比萨，安德烈亚·奥尔卡尼亚把阿威罗伊安排在衬托坟场的地狱画面上，给他在穆罕默德和反基督者的身旁安排了一席之地。在圣卡塔利娜教堂里，有1340年弗朗切斯科·特拉伊纳所作的一幅画，画中阿威罗伊是倒在圣托马斯的脚下。然而伊本·鲁什德恰恰是因为受到嘲弄、倒运，反而对所谓的胜者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圣托马斯既是阿威罗伊学说的最强对手，但也可以肯定说，他又是这位伟大的注释家的主要弟子"，欧内斯特·勒南所作的这个论断，得到了阿辛·帕拉西奥斯和何塞·玛丽亚·卡西亚罗的赞同；后者曾发表《圣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阿威罗伊主义》（*Theological Averroism of St Thomas Aquinas*）一书，其中编选了这位伟大哲学家的语录约503条。经过修订或比较全面的注释，在14世纪还是伊本·鲁什德（阿威罗伊）成为胜利者。英国加尔默罗（圣衣会）教派的领袖培根索普的约翰（死于1346年），74 就被称为"他那个时代的阿威罗伊派巨头"。至于1473年，路易十一改组哲学教育，他也推荐"阿里士多德哲学及其注释家阿威罗伊，他们的思想早就被公认是有益和可信的"。[23] 但阿威罗伊学派获得持久而辉煌的成功却是在帕多瓦大学。这所大学最后一位大学者是切萨雷·克雷莫尼尼（死于1631年），他继承了阿威罗伊学派的传统，一直流传到18世纪仍未完全消失。

科学

中世纪的哲学家，往往也是医学行家。因此，基督教西方世界接受了伊本·鲁什德的医学著作。1255年，他的《医学通则》（*Kitāb al - Kulliyyāt*）由一位犹太学者博纳科萨在帕多瓦翻译成书名《通论》（*Colliget*）的译著出版。著名的凯鲁万医学院有不少行家的优秀著作，其中如伊沙克·伊姆拉恩（死于893年）、伊沙克·苏莱曼·伊斯拉伊利（死于932年）、伊本·贾扎尔（约死于1004年）的著作，早于11世纪已经由君士坦丁纳斯·阿非利加努斯翻译成功，并在萨莱诺用于教学。直到16世纪末，伊沙克·伊斯拉伊利的医学著作仍享有盛誉。1575年，他的著作曾以《伊沙克医术》（*Omnia opera Ysaac*）为书名在里昂问世。伊本·贾扎尔的《行医者使用的祭坛》（*Zād al - Musāfir*）一书也相当出色，它不仅有拉丁文译本，又还有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译本。安达卢西亚的扎赫拉维（又名阿布尔－卡西姆·哈拉特，或称阿布尔卡西斯，936－1013年）所著《医

---

[23] E. 勒南，第3版，1866年，第236、317页。

书》（*Kitāb al - Ta'rīf*）一书，经由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节译出版，此书在中世纪也有很高声誉，特别是用于外科。最后，阿布·马尔万·伊本·朱尔的《医术》（*Taysīr*，写于1121－1162年间）一书也有帕拉维西乌斯的拉丁文译本，1280年在威尼斯出版。至于阿维森纳（波斯人，即伊本·西那）所著《医典》（*Canon of Medicine*）更是被中世纪的医生奉为圣书。以上所列举的科学著作，尽管发行不广或权威性不够，却对基督教西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了重大而有益的贡献。中世纪药物学方面的成就，应归功于安达卢西亚的伊本·瓦菲德（即阿本古埃菲思，988－1074年）的一部基本的药物著作（*Liber Albenquefith philosophi de virtutibus medicinarum et ciborum*），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将它翻译为书名《阿本古埃菲思的医学和药物学》的译著出版。

安达卢西亚和马格里布在向基督教西方传播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所作的贡献，也同样相当重要。巴思的阿德拉德翻译了马斯拉玛·马吉里蒂的《天文表》（*Astronomical Tables*）；这是续穆罕默德·穆萨·哈里兹密（死于844年）的作品，在公元1000年左右完成的。1254年，叶胡达·本·莫谢把伊弗里基亚的伊本·阿比勒-里贾尔（死于1037年后）的天文学巨著《里贾尔星象学大全》（*Kitāb al - Bāri fī - ahkām al - Nudjūm*）译成为卡斯蒂利亚文本；在此卡斯蒂利亚译本的基础上，以后又有两部拉丁文译本、三部希伯来译本，还有葡萄牙文、法文和英文译本各一部，足见这部天文学百科全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则翻译了扎尔卡利（阿扎奎埃尔）的《测算表》（*Tables*），此即流传于中世纪欧洲的《托莱多测算表》（*Tablas Toledanos*），还翻译了贾比尔·阿弗拉赫（或称杰伯尔）的《对托勒密天文学大成一书的修正》（*Islāh al - Madjisti*）。比特鲁吉（或称阿尔佩特拉吉乌斯）的《天象论》（*Kitāb fi'l - Hay'a*），由迈克尔·司科特翻译成拉丁文本，又由莫谢·伊本·蒂博恩翻译成希伯来文本（1259年），在此希伯来译本的基础上，卡洛尼莫斯·本·达维德又译成另一个拉丁文本（1528年），在威尼斯出版（1531年），这标志着比特鲁吉《天象论》进一步得到传播。最后，我们还应当提到比萨的莱奥纳尔多（约生于1175年），这是一位大才数学家；他长期住在贝贾亚，其父是当地的律师；他深受阿拉伯教育的影响，长于代数学，阿拉伯计数法即是由他引进欧洲的。　75

语言、文字和艺术

关于阿拉伯文学对中世纪欧洲的影响问题，争论很多而且经常十分热烈。行吟诗在12－13世纪广泛流传，韵律、韵脚、意境、高雅的爱情主题都很新颖，它是不是来源于阿拉伯呢？安格拉德否定这种说法，他认为："内容和形式全都是行吟诗人所创造"。然而，在里维拉看来（特别是经过浪漫主义文学权威专家梅嫩德斯·皮达尔的研究），这肯定源自阿拉伯。[28]谁也不会否认穆斯林西班牙的诗歌体裁，如本书提到过的以伊本·库兹曼为大师的"穆瓦什沙赫"（*muwashshah*）诗体或吟唱诗（*zadjal*），与以普瓦蒂埃的纪尧姆九世为代表的朗格多克诗歌（Languedoc）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况且，在西班

[28] R.梅嫩德斯·皮达尔（R. Menéndez Pidal），1941年。

牙，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常有交往，有时甚至十分密切。在这样的环境里，岂能没有影响呢？但是，当代一些专家，如勒·让蒂尔等，仍持相反见解，以致讨论未有结果。

关于但丁的《神曲》（*Divine Comedy*），以往的争论费了很多笔墨，现在这场论战看来可以结束了。阿辛·帕拉西奥斯在《穆斯林的冥世观和但丁的神曲》（*La escatologia musulmana en la Divina Commedia*）这篇典型作品中就明确指出，《神曲》肯定受到穆斯林阿拉伯的影响。当初并非人人都接受他的见解，为了证实这一见解肯定正确，还缺少一个重要环节。而现在，原来缺少的那个环节终于在《米拉吉》（*Mi'rādj*）的一个版本中发现了。《米拉吉》也即关于穆罕默德升天的民间传说故事，这一传说在西班牙穆斯林中是广泛流行的。曾经为阿方索十世把这一传说故事译成卡斯蒂利亚文本，此译本虽已失传，却有以它为蓝本而由意大利人锡耶纳的波纳文图拉所译的拉丁本译本，另外还有一个古法文译本。因此，E. 塞鲁利等人认为，已可断定但丁是知道《米拉吉》的，这当然无意要贬低但丁的天才。[25] 现在唯一尚需讨论的问题是穆斯林对于《神曲》的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还应补充一点，中世纪的欧洲也受到阿拉伯伦理哲学著作的影响，这类著作在西班牙流传很广，并由佩特鲁斯·阿方西等人在西班牙人中传播开来；佩德鲁斯·阿方西为阿拉贡的阿方索一世（1104－1134年在位）所写的《教士守则》（Disciplina clericalis），直到现在仍被认为是成功之作。

穆斯林世界西部和基督教西方、欧洲和讲阿拉伯语的非洲地区的这种长期而密切的联系，在欧洲各种语言中都留下不少痕迹。像代数（algebra）、对数（logarithm）、天顶（zenith）、天底（nadir）、关税（tariff）、方位（azimuth）、蒸馏器（alembic）、酒精（alcohol）、糖浆（syrup）、食糖（sugar）等词、阿拉伯数字以及其他数百个数学、天文学、医学、化学、植物学和日常生活用词中的术语，都起源于阿拉伯语。在西班牙，这类词汇约有4000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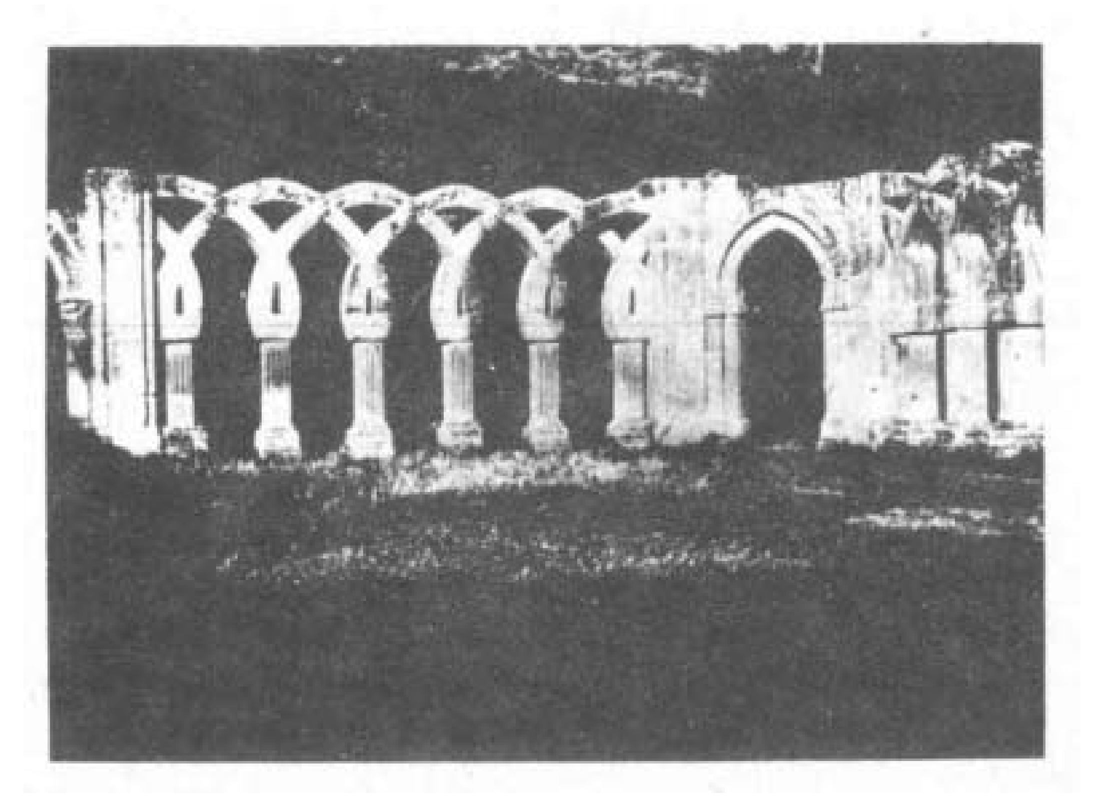
在艺术领域里也可以看到不少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穆德哈尔风格的艺术中，正像G.马凯指出的那样，这是西班牙－摩尔人建筑学中"秋天的花朵"，而且也表现在罗马风格的艺术中（见图片3.2）。这第二方面在E.马莱所作的分析中已有阐述，而其他人的研究则使之更为清楚明白。[26] 最后，正如罗丹松所指出的那样，就连中世纪欧洲的烹饪，某些方面也应归功于阿拉伯人烹饪艺术的影响。

结　论

由于有横跨地中海、联结非洲和欧洲的两座文化桥梁——西西里以及特别是西班牙所起的作用，两个世界、两个大陆之间的物质和文化交流从未间断过。12世纪，非洲文化之火最后一次在安达卢西亚和马格里布熊熊燃烧，此后它的光亮就消失在衰落的黑暗之中。人口的锐减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萧条、停滞或倒退，导致了文化的衰退。各种形式都变得毫无生机。正因为如此，非洲北部边界和穆斯林西班牙所积累起来的文化遗产

[25] E. 塞鲁利（E. Cerulli），1949年。

[26] G. 马凯，前引著作；E. 马莱（E.Mâle），1923年。



图片 3.2 索里亚修道院的走廊，伊斯兰文化对西班牙基督教艺术影响的典型例子

让欧洲取走了，而欧洲当时正处于人口大爆炸的时刻，因此能满怀热情地发现其难以估量的文化和策略价值，这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因素。

现在，该轮到马格里布和整个非洲处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了。正因为如此，它们面临着一种危机，即抵制现实和现代化思想的某种良心上的斗争。结果将会怎么样呢？

4 马格里布政治统一体的崩解

J. 赫尔贝克

78

阿尔莫哈德王朝的衰亡

在1212年的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阿拉伯语称伊卡卜）战役中，阿尔莫哈德军队被西班牙各基督教王国联军所击败；一般认为，这就是阿尔莫哈德帝国衰落的起点。即使如此，帝国并不是突然崩溃的，但其衰亡也非时间漫长的过程；分崩瓦解起于战争带来灾难，开始时较为缓慢，后来越来越迅快，也越来越剧烈。阿尔莫哈德王朝统治者实际控制的领土不断缩小；分裂先是在东面（伊弗里基亚）和在安达卢斯（安达卢西亚或穆斯林西班牙）开始，接着扩大到中马格里布（特莱姆森），然后又发展到摩洛哥，最后马林人在1269年占领了摩洛哥南部——阿尔莫哈德王朝的最后堡垒。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一强大王朝衰落的诸种原因时，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有些因素是紧密相关的，而另一些因素，初看起来并没有多大联系。

尽管阿尔莫哈德王朝的许多统治者都修筑道路以加强帝国内部的交通联系，但是辽阔的疆域——包括安达卢西亚和整个马格里布——就足以给中央政府造成极大的困难，首都马拉喀什偏远的地理位置又使其统治难上加难。

在帝国两端——西班牙和伊弗里基亚——进行的战争，耗尽了帝国的国力；帝国不仅要同外来的敌人作战，还要对付国内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巴努加尼亚族、各柏柏尔人部落群体以至各城镇居民的暴动和叛乱。阿尔莫哈德王朝的军队失去了原有的战斗力，越来越多地从阿拉伯人、泽纳塔族，甚而从基督教教徒中招募雇佣军。阿尔莫哈德王朝中的贵族只顾保护自己的特权，而把非阿尔莫哈德的穆斯林一概视为异教徒；这些"异教徒"中许多人失去了土地所有权，承受着沉重的租税负担。臣民群众与基础狭隘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分歧是导致马格里布及安达卢西亚多次反叛和起义的原因。阿尔莫哈

79

德贵族本身也分裂成两个敌对的派别：一方是阿卜德·穆敏的后代，即赛义德集团，他们得到自己的氏族集团（*kabīla*）、卢米亚部族（泽纳塔族的分支）及一部分阿拉伯人的支持；另一方则是马斯穆达族系的阿尔莫哈德贵族，他们是各氏族分支的头人或首领以及宗教上的谢赫。这些谢赫与安达卢西亚官僚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因为后者的宗教信仰并不同于阿尔莫哈德教派，他们只忠于哈里发。

在纳西尔（1199－1213年在位）死后继位的几个昏庸的哈里发，也加速了由于内讧

而分崩离析的阿尔莫哈德王朝的灭亡。就在1230年，阿尔莫哈德王朝的谢赫集团与王朝赛义德集团之间的抗争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时，阿布·优素福·雅库布的兄弟马穆恩，率领一支由卡斯蒂尔国王提供的基督教徒骑兵，从西班牙杀回国内，击败了当朝哈里发和阿尔莫哈德的谢赫们。他自立为埃米尔穆明宁，直到1232年死前，他仍领导一个强大的反对宗教上的谢赫集团的运动，甚至公开否定阿尔莫哈德的教规，从而使自己的王朝摆脱了原有的宗教正统的约束。虽然他的继承人拉希德（1232－1242年在位）企图恢复马赫迪教规，并与谢赫们达成协议，想借此办法来克服内部纷争，但为时已晚，帝国已无力消除无政府状态，它最终分崩离析。王朝退缩到摩洛哥一块日渐缩小的领土内苟延残喘，直到1269年最后一位阿尔莫哈德的哈里发瓦蒂克（1266－1269年在位）被马林王朝所废黜。

马格里布的一分为三

阿尔莫哈德帝国的垮台使马格里布回到了法蒂玛王朝兴起之前所处的那个阶段。[1]那里出现了三个独立的往往又互相敌对的国家，它们都由于王朝内部的冲突和国内的反叛而日趋衰弱，后来又越来越多地受到信奉基督教的外敌攻击的威胁。[2]这三片国土后来成为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诸国的基础。它们虽有不少共同之处，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发展。

关于阿尔莫哈德王朝衰亡之后的马格里布社会情况，将在下章详细叙述；我们现在只谈这三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一般特征。它们各自都由一个起先是柏柏尔人的但后来彻底阿拉伯化的王朝来统治，而他们又都得到各马赫曾氏族集团[3]的支持。他们的统治范围，实际上只限于城镇和有人定居的平原。山区和类似于旷草原的广大平原地区，则由柏柏尔山民或阿拉伯游牧民所占有，后者随时准备袭击马赫曾人领土的边缘地带。统治者的命令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遵守，这决定于他的实际权力或能力。其中两个王朝——哈夫斯王朝和马林王朝的统治者，先后都追求过哈里发的称号，这至少是争取那些容易作乱的臣民精神上承认的唯一方法，但是，他们的要求也只在他们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得到响应，除了在13世纪中期麦加的谢里夫和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对哈夫斯家族的穆斯坦西尔有过短暂的承认外，这些西部的"哈里发"都无力与开罗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影子"政权相抗衡，未能取得普遍的承认。 **80**

阿尔莫哈德统治垮台之后时期的另一个共同因素，是反抗基督教各国对整个马格里布不断施加的压力，主要是反抗伊比利亚半岛各王国，其次是意大利、西西里和法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压力结合在一起，这是西欧与地中海伊斯兰国家之间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马格里布三国也曾想方设法去对付基督教各国新发起的侵略性进攻，虽然他们受到一连串较小的挫折，也未能挽救穆斯林西班牙的最后一个据点格拉纳达落入基督教

---

[1] 参见《非洲通史》第3卷，第10章。

[2] 参阅本书第3章。

[3] 马赫曾氏族集团（*Makhzan kabilas*）：马赫曾，原意为财富；后来在摩洛哥用作政府官员制度的称谓。《伊斯兰百科辞典》，第1版，第3卷，第166－171页。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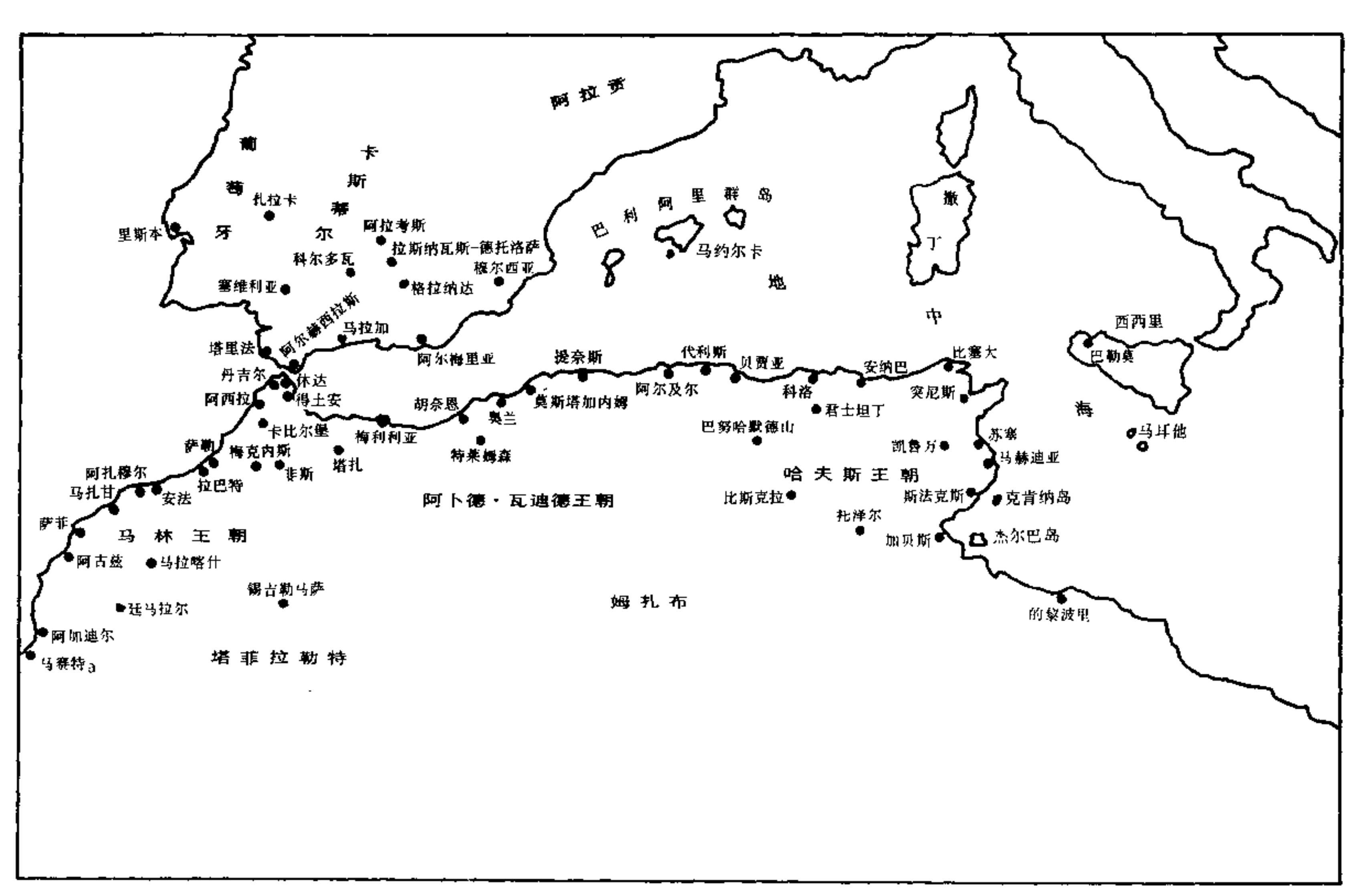


图4.1　阿尔莫哈德帝国的分解(I·赫尔贝克)

徒手中的危运，但他们还是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传统。然而，整个马格里布，至少是它的东部，在16世纪时肯定会遭到与格拉纳达相同的命运，如果不是出现一个类似奥斯曼帝国的新兴穆斯林强国，如果这个穆斯林国家没有在决定性的时刻恢复地中海地区力量的平衡。当然，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的伊比利亚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正日益卷进海外冒险事业中去，这分散了它们的注意力和人力。

三个王朝取代了阿尔莫哈德王朝的统治。它们瓜分了马格里布，并在本文涉及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保持实际统治。它们是哈夫斯王朝（1228－1574年），其中心在突尼斯；位于特莱姆森的阿卜德·瓦迪德王朝，或称为扎扬王朝（1235－1554年）；以及在摩洛哥的马林王朝（约1250－1472年）（见插图4.1）。我们首先概述一下这三个王朝历史中某些重大事件，然后转向整个北非历史中几个关键问题。

哈夫斯王朝

以其族名来命名的哈夫斯王朝的先祖是马赫迪伊本·图马特的著名同伴谢赫哈夫斯·伊本·乌玛尔，他是辛塔塔族系的柏柏尔人，曾为阿尔莫哈德帝国的光辉业绩作出过重大贡献。他的儿子阿卜德·瓦希德·伊本·阿比·哈夫斯于1207－1221年间，以几乎完全自治的政权形式有效地统治伊弗里基亚，从而为它以后的独立奠定了基础。1228 **82** 年，阿卜德·瓦希德的儿子阿布·扎卡里亚因在与伊弗里基亚的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最后的代表者巴努加尼亚族的斗争中表现出色而成为总督。阿布·扎卡里亚借口保护阿尔莫哈德运动的真正教义和精神（这正是阿尔莫哈德王朝的哈里发马穆恩否定这种教规的时候），[①]他从礼拜五的“呼图白”（*khutba*），即宣讲师（*khatib*）的讲道中，删去了哈里发的名称，并于1229年接受了独立埃米尔的称号。7年后，他的君主权，由于在“呼图白”中写上了他的名字而得到了正式确认。

虽然阿布·扎卡里亚否定了阿尔莫哈德哈里发的政治权力，但他却没有否定阿尔莫哈德的教规；相反，他还以此借口为他夺取权力的行动进行辩护，说那是为了重新树立起真正的阿尔莫哈德正统教义。结果，他获得部分成功，他在摩洛哥和安达卢西亚几个中心地区被承认为合法的哈里发。1234年，他最终消灭了伊弗里基亚南部的巴努加尼亚反叛势力。他在胜利的西征中成功地占领了君士坦丁、布日伊（贝贾亚）和阿尔及尔；而在东面，整个的黎波里塔尼亚沿海一带也都被他征服了。从此他把要成为哈夫斯王朝领土的地区联成了一片。甚至连阿卜德·瓦迪德王朝的创立者亚格穆拉桑·扎扬也屈从于他的统治，马林王朝和格拉纳达的奈斯尔王朝也都承认他的宗主权。

有了和平和安全，经济随之得到迅速发展，首都突尼斯又开始常有外国商人出入，他们来自普罗旺斯、加泰罗尼亚和意大利各共和邦，与西西里的关系变得相当友好，在1239年，哈夫斯王朝统治者开始向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进贡，以换取参与海外贸易的权利和进口西西里小麦的自由。

阿布·扎卡里亚在1249年去世时，给他的儿子和继位者阿布·阿卜德·阿拉·穆罕

① 见本书第2章，第55页。

默德·穆斯坦西尔（1249－1277年在位）留下了一个繁荣和安定的国家，它在北非洲的霸权地位从未受到挑战。穆斯坦西尔也未受到阴谋和叛乱的危害，但其统治却不断受到阿尔莫哈德的谢赫们与安达卢西亚难民和移民之间的敌对行动的骚扰；当时，这些难民和移民已组成了一股相当有影响的政治力量。1253年，他自封为埃米尔穆明宁；1259年，麦加的谢里夫承认他为哈里发，一年后，连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也承认了他的称号。然而，他在穆斯林世界东部得到的承认，没有保持多长时间，他是在一种特殊形势下得到承认的。1258年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被蒙古人杀害，哈里发职位空缺，人们因而承认他是哈里发。到了1261年，马木路克王朝的素丹拜巴尔斯在开罗推出一个阿拔斯王朝的傀儡哈里发，从那时起直到1517年整个穆斯林世界东部就只承认这个哈里发体系了。尽管如此，穆斯坦西尔所取得的短命的哈里发地位还是证明了哈夫斯王朝在伊斯兰世界中享有威望，它是公认的稳固而强大的国家。

83

几年以后，穆斯坦西尔因经受住了1270年由法国圣路易发动的反突尼斯战争的考验，他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声誉又得到提高。这一次迟迟发生的"十字军"战争，真实原因至今还不清楚，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⑤]据说伊弗里基亚的财富给法国人以诱惑，正如伊本·哈勒敦所描述的那样，一些普罗旺斯的商人鼓动起这次远征，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捞回他们借给突尼斯人的金钱。据说路易本人还相信穆斯坦西尔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徒，希望伊弗里基亚也会变成进一步对埃及作战的跳板。这次远征是缺乏准备的，直到战争爆发前的最后时刻，安茹王室的查理（西西里国王和路易的兄弟）才接到消息。基督教十字军在迦太基登陆，但在几个星期之内就染上瘟疫，连国王也成了军营中瘟疫的牺牲者。

安茹王室的查理很快同敌方缔结和约，因为他对这场宗教战争并无兴趣，而且还急于同哈夫斯国家恢复友好关系。穆斯坦西尔一开始也宣布这场战争是"圣战"（*djihād*），并在许多城镇和阿拉伯游牧民中调集了部队。然而，他同查理一样希望结束这次不幸的事件，因为他属下的一些游牧民同盟者正开始向他们在南方的冬季牧场撤退。和约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哈夫斯王朝的哈里发同意在征收小麦进口税的同时，继续向西西里进贡；他还保证，将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遗老遗少驱逐出伊弗里基亚，他们是在被安茹王室的查理推翻后逃到非洲土地上来的。未曾料到的是这次最后的"十字军"战争带来另一个后果，即双方又恢复贸易，其规模比以往更大了。

哈夫斯帝国在阿布·扎卡里亚和穆斯坦西尔统治时达到了它第一个兴盛高潮。它的霸权已在全马格里布得到承认，其权力在西边扩大到穆斯林西班牙，向东则延伸到希贾兹；地中海西部的欧洲各国都不得不重视它的实力，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统治者都希望与它结盟。

穆斯坦西尔死后，形势急转直下。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哈夫斯帝国乱作一团，王族成员之间经常发生内讧，阿拉伯人的叛乱以及许多城镇和各个地区的骚动更使帝国的统治基础动荡不定。这种情况，在贝贾亚和君士坦丁地区特别明显，那里相继出现了各自为政的、与统治王朝为敌的许多小君主国。在中央政府衰落时期，这些地方性

⑤ 参阅M.莫拉（M.Mollat），1972年，第289－303页。

倾向变得更加突出。有时，竟然会有三个或更多城镇的哈夫斯统治者对突尼斯王位提出 84 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马格里布权力的钟摆便会摆到西面摩洛哥的马林王朝一边：在1348年和1357年，哈夫斯帝国的重要部分，包括首都突尼斯，曾两度被马林王朝的军队占领。当然，这两次占领为时不长，侵略者被阿拉伯游牧民打败了。在阿布·伊沙克（1350－1369年在位）统治末年，贝贾亚、君士坦丁和突尼斯分别由三个独立的哈夫斯统治者管辖，而南部、东南部和海岸地区的一部分（萨希尔）仍独立于突尼斯之外。

哈夫斯政权的复兴始于阿布尔·阿巴斯统治时期（1370－1394年在位），并在其后继者阿布·法里斯（1394－1434年在位）和乌斯曼（1435－1488年在位）的长期统治下继续发展。阿布尔·阿巴斯成功地重新统一和整治国家，他废除了土地转让制度，制止了地方上的反抗，恢复了王朝的声威。由于特莱姆森有内部纷争，阿卜德·瓦迪德和马林两个王朝又公开敌对，使他不再惧怕西面出事。他的儿子阿布·法里斯完成了重新统一的大业，并消灭了贝贾亚、君士坦丁、的黎波里、加夫萨、托泽尔、比斯克拉等地的王公势力；他从他的自由民中选派各地方总督，后来又完全控制了特莱姆森的阿卜德·瓦迪德王朝，并经常干涉摩洛哥甚至于安达卢西亚的事务。取得这些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阿布·法里斯对阿尔莫哈德、阿拉伯、安达卢西亚居民中的主要阶层执行了挑拨离间的政策，使他们互相敌视。虽然他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对犹太人却表现出宽容态度。他享有崇高声望，有以下几个根本原因：执政注意公正，对虔诚的教徒大加赞赏——不论他们是乌里玛（*ulamā'*）还是谢里夫（*sharīf*），禁止非法税收；另外，他在建筑方面颇有成就，又重视穆斯林节日的盛大庆典。

阿布·法里斯的孙子乌斯曼在位头几年的统治，虽由于与反叛的亲属作战而受到干扰，但总的说来，他的统治是长期稳定的，这位素丹保持了国土的统一。乌斯曼统治的第二阶段曾蒙上饥荒与瘟疫的阴云，南方还发生了阿拉伯人的骚乱，但不管怎样，他仍能克服困难，控制住特莱姆森，并得到了非斯的巴努瓦塔斯新王朝（瓦塔斯王朝）缔造者的承认。乌斯曼的统治在最后几年黯然失色，他重又任命他的亲属担任各省区总督，这似乎就是为以后的动乱播下了种子。虽然他本人个性相当坚强，能够制止亲属们自然分离的趋向，但是，他的继位者却软弱无力，不能抵挡住无政府状态扩大。

哈夫斯王朝在第二时期与第一时期一样是突然垮台的。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这个王朝又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再没有力量去对付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争夺霸权所造成的严重形势。然而，哈夫斯帝国为了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上保持其独立，进行了艰 85 难的斗争。这段历史，将在下一卷中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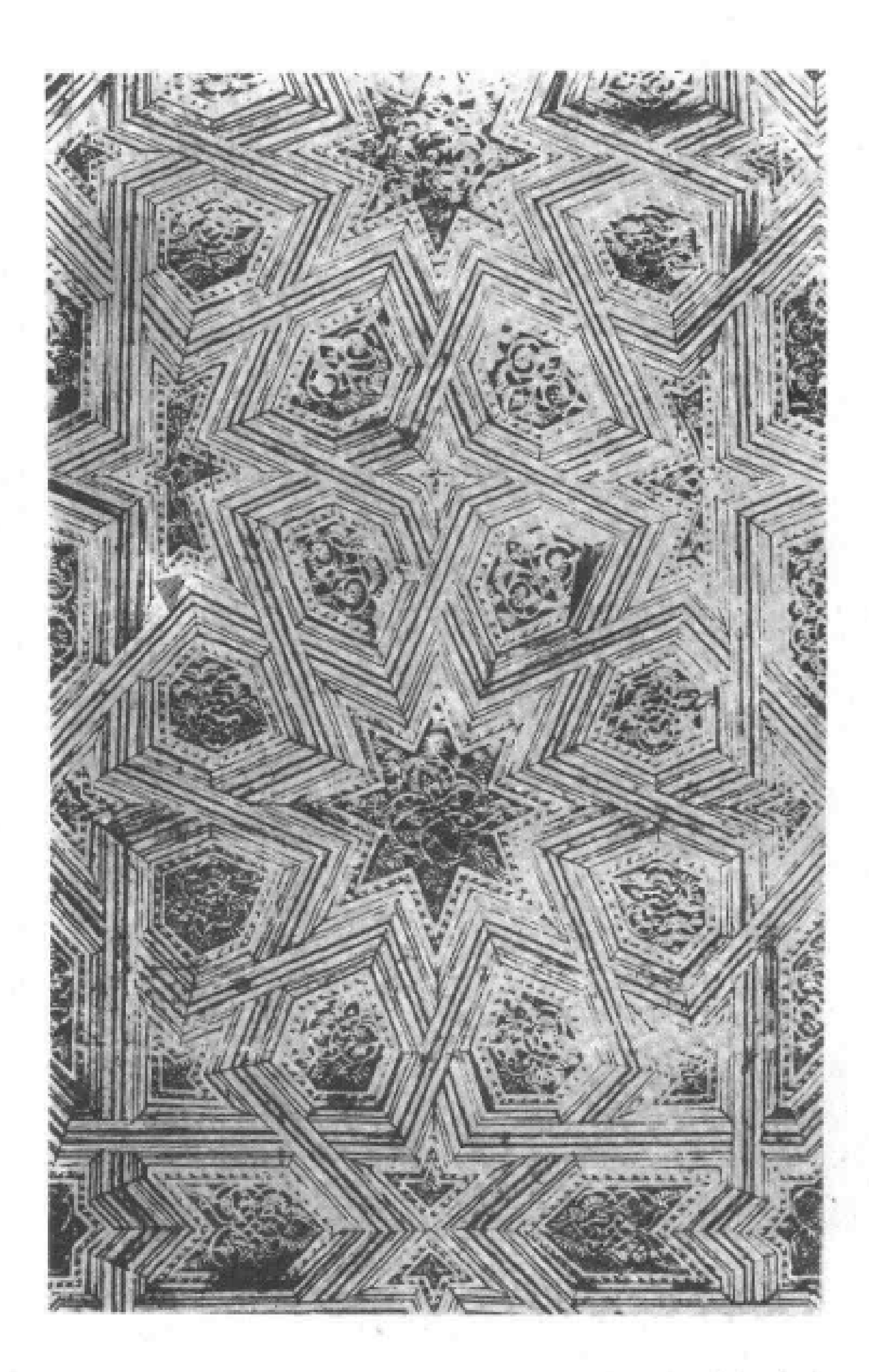
马林王朝

这个王朝，“起源于沙漠地区，其成员原是泽纳塔人的贵族，他们来自扎布（阿尔及利亚境内一地区）。他们不知金银及货币为何物……也不懂得农业和贸易。他们的财富全都是骆驼、马匹和奴隶”。⑥马林王朝的出现真好比是伊本·哈勒敦所描述的游牧民王朝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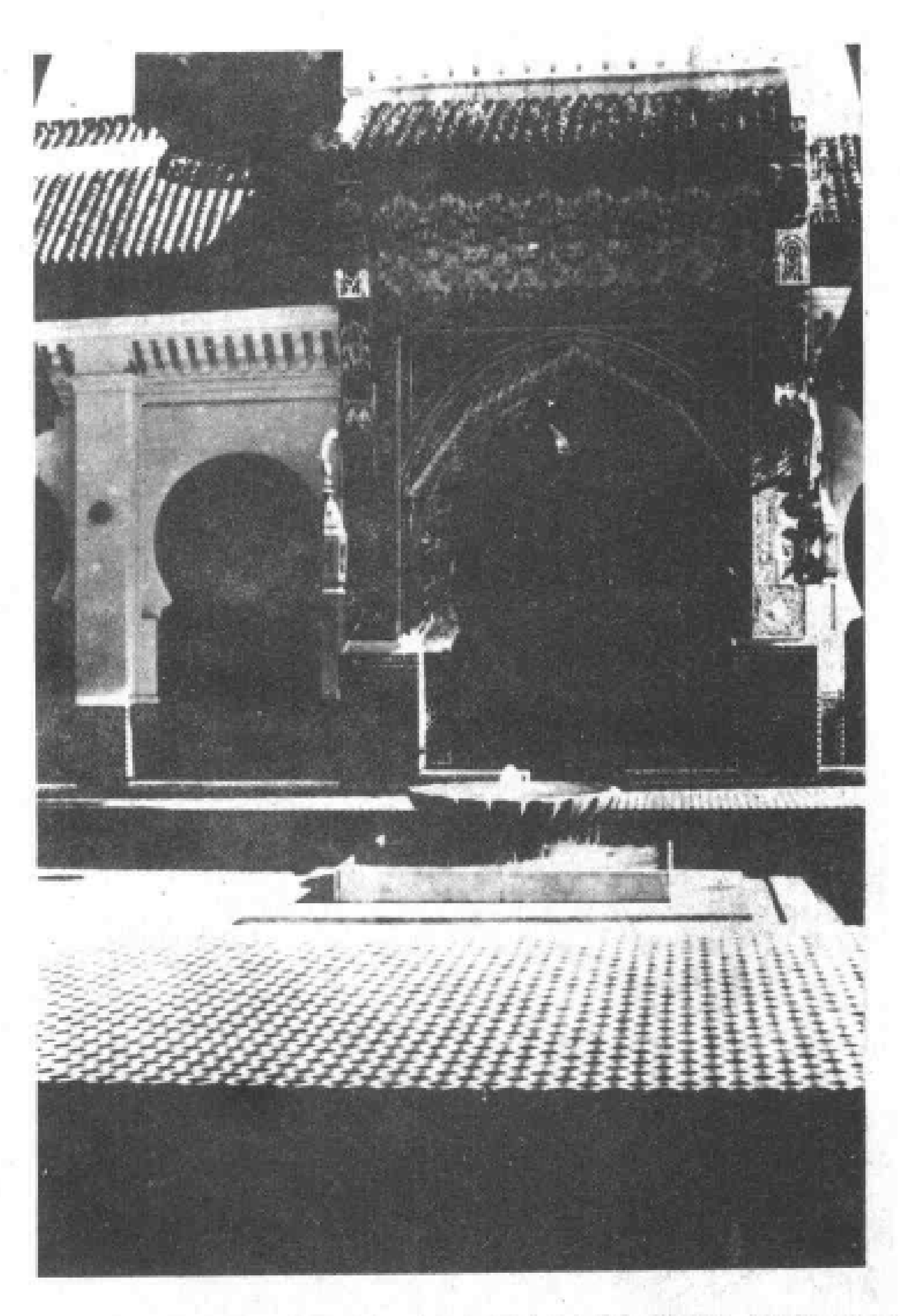
⑥　伊本·阿比·扎尔（Ibn Abī Zar'），引自法文译本，1860年，第401页。

86

图片 4.1 菲斯的博乌-伊纳尼亚-马德拉萨（古兰经学院）：庭窗近景（14 世纪）



图片 4.2 非斯的博乌-伊纳尼亚-马德拉萨（古兰经学院）：门嵌近景（14 世纪）



图片 4.3 非斯的卡拉韦因清真寺：修复工程完成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时期，图中所示为庭院和正门进口

其部落意识('asabiyya)的典型，他把这种力量看作是促使游牧民族离开沙漠去占领他国土地和建立国家的动力。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1212 年）之后，原在塔菲拉勒特和菲吉格之间撒哈拉前沿草原上生活的巴努马林人，开始入侵摩洛哥东北部；他们发现阿尔莫哈德王朝的统治疲弱，便在当地从事农业的居民中夺取统治权，并迫使塔扎、菲斯、卡比尔堡等城镇进贡财物。起初，他们也像其他游牧部落一样仅仅是谋求财富而不顾邻近地区定居人民的利益，然而，后来他们的贵族首领就有了越来越大的政治野心。

1240 年，马林军队在围攻梅克内斯时曾经被阿尔莫哈德的军队打败；但到了 1269 年，马林已能占领马拉喀什；在此期间，他们的争战是时断时续逐步取胜的。关于这样长时间的征服过程，可以解释是由于他们根本缺乏曾经促使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和阿尔莫哈德王朝去实行征服事业的那种宗教动力；然而，在 1248 年第一次进攻时，他们已能获得成功，当时他们的领袖阿布·叶海亚（1244－1258 年在位）夺占了菲斯、塔扎、梅克内斯、萨勒和拉巴特。马林素丹国的真正奠基者是阿布·优素福·雅库布（1258－1286 年在位），在这位埃米尔统治时期，原来由阿尔莫哈德王朝统治的最后一些领土——大阿特拉斯山区、苏斯以及马拉喀什地区，都逐渐合并到新的王国中了。1269 年，马拉喀什被征服，阿尔莫哈德王朝的统治到此结束。

新王朝选择菲斯以代替马拉喀什为首都，阿布·优素福·雅库布在那里建立一个新城——菲斯贾迪德（新菲斯），以区别于旧城——菲斯巴利（见图片 4.1－4.3）。马林的统治者不可能提出任何宗教上的合法传统，但他们很快就自封为阿尔莫哈德的后代，并企图恢复这一教派的传统。他们首先强调伊比利亚这一组成部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有利的时机向东部扩张。这是一种奇怪的历史现象：安达卢西亚的绿色山林和平原对这些来自沙漠、草原和山区的柏柏尔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对阿尔莫拉维德王朝、阿尔莫哈德王朝以及马林王朝都一样。

89

与哈夫斯王朝一样，马林王朝经历了两个高峰阶段，但要短暂得多。阿布·优素福·雅库布及其子阿布·雅库布·优素福（1286－1307 年在位）统治时期是第一阶段，阿布尔-哈桑（1331－1348 年在位）及其子阿布·伊南·法里斯（1349－1358 年在位）统治时期则是第二阶段。然而，马林王朝是直到后一阶段才真正称霸于马格里布的，而且历时也不长。

在马林王朝统治时期，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阿拉伯人在摩洛哥所起作用越来越重要；早在阿尔莫哈德统治时期，阿拉伯游牧民已开始渗入摩洛哥，改变了当地原有的单一柏柏尔人特点。巴努马林人对阿拉伯人实行的政策由于其追随者泽纳塔族人数较少而受影响，他们十分看重阿拉伯游牧民的支持，泽纳塔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阿拉伯化了，马林王朝的马赫曾人就是由这两者混合组成的。上述这些情况为阿拉伯人在摩洛哥扩张地盘创造了条件，大部分阿拉伯人住在摩洛哥平原上，那里的许多柏柏尔人部落被他们所同化。与阿尔莫拉维德和阿尔莫哈德王朝军队使用柏柏尔语的习惯相反，在马林王朝时代，阿拉伯语变成了通行的和官方的语言。

阿拉伯游牧民地盘的扩张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游牧民的地盘扩大了，农耕者的土地就缩小了：耕地、果园和森林，相继被游牧民占用为牧场。游牧经济的发展，给以后几

百年摩洛哥社会结构的演变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以致摩洛哥居民划分为游牧民、城镇居民和山区部落。

这一过程，在政治上表现为素丹的中央政权只能掌握城镇及郊区的行政管理权，而包括阿拉伯人和泽纳塔族的马赫曾人却享有极大的自治权，他们向农民征收捐税以代替兵役。由于游牧民部队既不忠诚又无能力，马林王朝只能像前朝统治者和邻国一样，越来越多地依靠驻扎在各大城镇的雇佣奴隶军队。阿特拉斯山区、里弗和吉巴尔地区的柏柏尔人从来不受政府的约束，虽然他们有时也承认素丹的统治权；到了王朝衰落时代，他们就逐渐渗入马赫曾人的领地（*bilād al-makhzan*），把其中一部分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或保护之下，从而扩大了“有争议的土地”（*bilād al- sibā*）的范围。

随着安达卢西亚移民不断迁入摩洛哥，城市生活及文明重新充满了生机活力；他们带来了精美的建筑、艺术、手工艺和文学风格。首都非斯，自然成了摩洛哥首要的文化中心；而故都马拉喀什从此一蹶不振。由于城市生活及文化日趋繁荣，城乡差别也更加明显，各自形成独成一体的生活环境。这种差别，在宗教生活方面尤其突出。举例而言，非斯及其他大城市，那里有不少高等学府——卡拉韦因清真寺和形形色色的古兰经学院（*madrasas*），都受到马林王朝素丹的保护，马立克学派的正统教义占绝对优势；但在乡村地区，居民们却越来越多地被“扎维亚”（*zāwiya*）所吸引，这种小舍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兄弟会（*tarīka*）从事活动的场所，它们各自有传教的据点，只崇拜当地的圣人（或隐修士）。这后一种倾向，始于阿尔莫哈德王朝统治时期，加扎利教派（即安萨里教派，加扎利本人死于1111年）的学说与神秘主义教派的学说混同起来，再加上伊斯兰教的外衣，形成官方伊斯兰统治格局。在马林王朝统治时期，由于苏非教团（*Sūfi*）的建立，神秘主义教派已经制度化了，其大部分是卡迪里教团（*Kādiriyya*）的分支。这种普及的伊斯兰教为农村的伊斯兰化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它渗透到了摩洛哥最偏僻地区的柏柏尔山民之中，他们这时才开始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90

虽然我们将在后文论述基督教在非洲西北部挑战的情况以及穆斯林对此的反应，这里也还须简要地讲一下马林王朝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干涉。阿布·优素福·雅库布在巩固了他在摩洛哥的统治地位之后，于1275年跨过了直布罗陀海峡，在伊斯蒂贾（埃西哈）附近与卡斯蒂利亚人作战，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位素丹在西班牙还进行了三次战役，1279年，马林王朝的海军击败了卡斯蒂利亚人的舰队，一度使基督教势力对格拉纳达和摩洛哥的威胁受挫。第四次战役后达成了一项协议，按此协议卡斯蒂尔国王保证不再干涉西班牙穆斯林领地事务，并归还了基督教势力以前所夺去的阿拉伯文手本。1285年和约在马林王朝看来是一次胜利，为之欢呼雀跃。

素丹阿布·雅库布·优素福不得不对付摩洛哥南部一连串的叛乱，费尽心思去征服特莱姆森和肃清扎扬王朝的势力。因此，他并不想分散他的兵力、跨过海峡去进行侵略。然而，卡斯蒂尔国王于1291年撕毁了1285年的协议，阿布·雅库布·优素福迫不得已发动了一场历时不长的战役，这次战役未能取得积极的结果；这位素丹随后又转而对特莱姆森作战。

素丹阿布·雅库布·优素福遭到谋杀，在他死后，马林王朝经历了一段衰败时期，

其间主要是一个反叛者发动暴乱，他夺取摩洛哥南部很大一片土地，并控制了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叛乱直到1331年阿布尔-哈桑继位后才告平息。在这内乱时期，马林王朝被迫放弃了进攻西班牙和马格里布的政策

阿布尔-哈桑无疑是马林王朝的一位最伟大的素丹：他即位不久就重申非斯对摩洛哥南部的权力，结束内乱，并恢复了征伐政策。在他统治的前一阶段，他竭尽全力在西班牙重建穆斯林君主权，1337年卡斯蒂尔国王再次发动对格拉纳达的战争后，他更是变本加厉地加紧进行这项事业。早在1333年，马林军队就已跨过海峡而且征服了阿尔赫西拉斯。以后6年中，阿布尔-哈桑和格拉纳达奈斯尔王朝的埃米尔一直在训练军队，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对基督教的西班牙发动最后的总攻。这一威胁使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结成同盟：马林王朝的舰队在几艘哈夫斯王朝舰船的支持下，控制了海峡，并在1340年同卡斯蒂利亚舰队的海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穆斯林军队随即开始围攻塔里发要塞，久攻不下，塔里发最后还是等来了基督教军队的增援。1340年，穆斯林军队在萨拉达河畔一场大战中遭到惨败。这是自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以来还从未有过的一次失败。到1344年，阿尔赫西拉斯便由基督教军队收复了。虽然直布罗陀仍在马林王朝军队手中，但是萨拉达河战役的失败、随后在伊弗里基亚发生的灾难，使素丹阿布尔-哈桑迫不得已放弃了他在西班牙的事业。此后，无论是马林王朝还是以后摩洛哥的任何其他王朝，都再也没能积极干涉西班牙事务，只留下格拉纳达的埃米尔政权成为以往在西班牙盛极一时的穆斯林帝国的残余势力苟延残喘。 91

在14世纪上半期，哈夫斯王朝的衰弱，给特莱姆森的扎扬王朝和非斯的马林王朝提供了扩张领土的机会。阿布尔-哈桑十分机灵地抓住时机，借口援助哈夫斯王朝免受扎扬王朝统治者的干扰，在1335年侵入中马格里布，并在围攻两年之后拿下了扎扬王朝的首都特莱姆森。这是马林王朝对它传统老对手所取得的一次胜利，它在穆斯林世界的友好君主们当然得知一切消息，于是阿布尔-哈桑重新统一马格里布的梦想又有了实现的前景。当时，扎扬王朝的领土已经被马林王朝的军队占据，哈夫斯王朝实际上也变成了马林王朝的附庸。1347年，在哈夫斯王朝再一次陷入继位纷争时，阿布尔-哈桑毅然进占突尼斯，将哈夫斯王国并入了他的国家。这是阿布尔-哈桑统治的极盛时期，自然也是马林王朝的鼎盛时期。[7]

随后是一个衰落时期：阿布尔-哈桑对伊弗里基亚的阿拉伯氏族集团（*kabīla*）采取征服政策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暴乱；1348年，他的军队在凯鲁万附近被打败，连他自己也被困于城内。虽然他设法逃走，不久又在突尼斯恢复一些权力，但这次失败也表明马林王朝对马格里布的统治是相当虚弱的。特莱姆森摆脱了他的统治，接着，贝贾亚、君士坦丁、安纳巴（今博内城）的哈夫斯王公贵族随后也纷纷脱离了马林王朝。阿布尔-哈桑之子、阿布·伊南在非斯自立为素丹，宣布废黜父王。1350年，阿布尔-哈桑曾率领其残部，企图夺回统治权，但是被阿布·伊南的军队所打败，只得躲进山区，一年后死去。 92

[7] 大史学家伊本·哈勒敦曾寄望马林王朝重新统一马格里布，阿布尔-哈桑未能成功使他大为失望。参阅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法文译本，1852－1856年，第4卷，第253页。

阿布尔－哈桑的一起一落，真可以说是马格里布在柏柏尔人历代王朝统治时期一场悲壮的史诗剧：各种力量逐步缓慢地聚合成长，进入一个不断取得成就的漫长时期，突然间——在即将达到宏伟计划的最高点时——大厦倾覆，一场灾难来临，前功尽弃；最后，各派势力分崩离析，马格里布陷入了无政府的分裂状态。如以阿布尔－哈桑终于失败的原因与阿尔莫哈德帝国衰落的原因相比较，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征服战争，耗尽了国内的人力和物力；再就是不照顾部落或地方的特殊利益，财政上不稳定，王朝内部缺乏向心力。

阿布·伊南最初几年的统治，与其父上20年前的统治一样是相当有成就的；他抱有阿布尔－哈桑一样的雄心，自封为哈里发，号称埃米尔·穆明宁，一心要再次去统一马格里布，1352年，他再次征服了特莱姆森；一年之后，他吞并了贝贾亚。1357年达到胜利顶点，他占领了突尼斯。然而，他的失败命运来得也快，正如其父王一样，失败的原因也相同，阿拉伯人的反抗又迫使他放弃伊弗里基亚而退回非斯，不久他就被一个大臣暗杀。在他死后，马林王朝的中兴时代结束了；从此以后，直到15世纪马林王朝灭亡时，这是一段充满无政府状态、各处叛乱和政治、经济及文化全面衰落的时期。

1358年至1465年之间，至少有17位素丹在非斯执政，但是，全都无力制止国内反对派和外来势力的威胁。大臣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自1420年以后，朝政完全由巴努瓦塔斯氏族成员把持，他们原是泽纳塔族的一个旁支。被称为瓦塔斯的这一氏族逐步稳当地强大起来，在以后50年间成了拥立国王大权的操纵者，到了1472年，经过6年反对谢里夫（*sharif*）的斗争之后，穆罕默德·谢赫在非斯被拥立为素丹，谢里夫们则自称为非斯城创建者伊德里斯二世的后裔而企图夺取政权。谢里夫的兴起，是与崇拜圣人和信奉对圣祠以及在更大程度上对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神祷”（*baraka*）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对摩洛哥所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已引起人民普遍的不满情绪和对马林王朝的反对，这个王朝已经再也无法有效抵制异教徒的入侵了。

93

瓦塔斯王朝的第一位素丹、穆罕默德·谢赫（1472－1505年在位）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布尔图卡利（1505－1524年在位）都曾经把非斯素丹国的权力恢复到一定的高度，他们成功地平息了谢里夫发起的运动，但是，他们无力阻止葡萄牙人在大西洋沿岸的扩张活动。瓦塔斯王朝的权力只限于非斯及其周围地区，摩洛哥南部实际上还是独立的，并不在它的控制下。正是在这些地区，16世纪初一个谢里夫家族领导了新的民众武装，对沿海一带葡萄牙人的要塞发动了圣战，同时也为最后推翻瓦塔斯王朝铺平了道路。[8]

扎扬王朝（阿卜德·瓦迪德王朝）

另一位由阿尔莫哈德王朝派驻特莱姆森的总督亚格穆拉桑·扎扬出身于泽纳塔族中一个较小的支系，他于1235年脱离分崩离析的阿尔莫哈德帝国，如同阿布·扎卡里亚在突尼斯所做的一样，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个王朝存在3个多世纪，直到1554年才告结束。它从存在之日起就受到东西两边比它更强大的邻国以及南部阿拉伯游牧民的威胁，

[8] 这些事件的具体情况，将在第5卷的第8章中探讨。

它能生存这么长的时间真是一个奇迹；这都是因为有几个颇为能干的统治者的灵活政策的缘故，他们中最有成就的是建国者亚格穆拉桑·扎扬（1235—1283年在位）和阿布·哈穆二世（1359－1389年在位）。在这两位领导人的统治时期，特莱姆森的这个王国屡次向马林王朝和哈夫斯王朝发动进攻，旨在占领东部的谢利夫河流域和贝贾亚，并向西逼近非斯。这一切往往进行得并不顺利，扎扬王朝的军队往往被迫转入防守，特莱姆森反而经常成为马林王朝攻击和围攻的目标，14世纪时摩洛哥人将扎扬王朝的大片国土占领了几十年之久。

在这个王国实力不济的时候，阿拉伯游牧民经常有组织地渗透到它的中心地区，而且把周围的几个省份一一隔离开来。与此同时，泽纳塔族柏柏尔人的阿拉伯化过程也在逐步加深，以致阿尔及利亚西部失去了它以前十分显著的柏柏尔特征。

这个王国的主要弱点在于幅员狭小和单一的经济基础：其领土只是特勒的一隅之地；居民人数不多，而且还有成群的游牧民，他们在南方受到阿拉伯人的压挤，失去牧场而流入扎扬王国境内。由此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对当时的社会和统治王朝的内政，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有一点似乎也颇为令人惊奇，扎扬王朝竟然能够在马林王朝和哈夫斯王朝的庇护之下，(后来又在阿拉贡国王的庇护之下)延续生存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94**

在如此不利的政治及经济条件下，简直不可想象这个国家怎能维持到16世纪中叶才由奥斯曼帝国最后来征服。它的基础在特莱姆森，该城已取代塔哈尔特而成了马格里布中部的贸易中心。特莱姆森位于从奥兰（瓦赫兰）通往撒哈拉绿洲以及更向南到苏丹的南北大商路上，这条商路又和从非斯到伊弗里基亚的东西商路互相交叉；因此，它很快就排挤其他城市而成了欧洲－马格里布－西苏丹之间贸易的集中点。此外，特莱姆森还与穿越撒哈拉商路的北端终点（锡吉勒马萨）直接连接，两个敌对的王朝——马林王朝与扎扬王朝之间的斗争，或许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争夺穿越撒哈拉贸易的控制权。最早而又及时利用这个重要因素的人物就是亚格穆拉桑·扎扬，他虽然在1257年有过一次失败，却能在1264年征服锡吉勒马萨，占领达10年之久，从而将撒哈拉商业贸易的两个最重要的口岸——特莱姆森和锡吉勒马萨，首次置于同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尽管扎扬王朝很快又失去锡吉勒马萨(它被马林王朝夺去)，但是，特莱姆森仍继续引来大宗贸易。

这个富庶的商业城市引起了马林王朝和哈夫斯王朝的羡慕。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只有马林王朝企图征服特莱姆森，1299－1307年间，阿布·雅库布·优素福曾经围攻该城，并在它对面建立了一座新城——曼苏拉，即通常所说的新特莱姆森（*Tilimsān al-Djadīd*）。它很快也发展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大部分贸易一度转到新城。尽管如此，马林王朝的军队在阿布·雅库布·优素福死后还是撤退了，特莱姆森解围，扎扬王朝紧接着的第一个行动便是摧毁与之抗争的曼苏拉城。

在以后30年间，特莱姆森恢复了它在商业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再次吸引来大批欧洲、马格里布以及穆斯林东方各国的商人。当时，它大约有4万人口。[9] 现今特莱姆森还流行一句谚语："防治贫困的灵丹妙药在苏丹"；此话不假，使人们回想起当年特莱姆森从穿

[9] 在几乎同一时代，非斯和突尼斯城各有10万居民，马拉喀什约有6万人口。参阅Y. 拉科斯特（Y. Lacoste），1966年，第50页。

越撒哈拉的贸易中聚积了巨大财富的往事。当马林王朝陷入内乱时，特莱姆森的王国已恢复了较多的政治自由，对衰落中的哈夫斯王朝采取了进攻的政策。

只是在阿布尔-哈桑继承马林王位之后，才制止了扎扬王朝的对外扩张：特莱姆森曾经被围困两年，于1337年陷落，从而撒哈拉大商路的两端又再次落在同一个政权（这次是马林王朝）的控制之下。但如前所述，阿布尔-哈桑企图恢复马格里布统一的行动历时短暂，就在这位素丹和他的儿子争夺政权时，特莱姆森重新得到独立的地位。

95

特莱姆森国家在14世纪后半期是欣欣向荣的，它处在有能力的阿布·哈穆·穆萨二世（1359－1389年在位）统治的繁荣时期；然而，特莱姆森也曾经两次被马林王朝素丹的军队占领，同时还受到阿拉伯人的入侵和叛乱的骚扰。大史学家伊本·哈勒敦当时正生活在特莱姆森，充当阿布·哈穆与阿拉伯游牧部落领袖谈判的协调顾问，因而他对政治生活和多变的联盟关系的内幕有深入的了解。他还给扎扬王朝的文化作了确切的评述："在这里（特莱姆森）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均有其成就：这里产生了许多学者和杰出人物，他们甚至在其他国家也享有盛名"。这座城市因有许多纪念性建筑而闻名遐迩，这些古迹一直保存至今，使特莱姆森成为马格里布中部穆斯林建筑的最重要的中心。

在阿布·哈穆的王位被他的儿子阿布·塔什芬二世（1389－1394年在位）篡夺之后，特莱姆森国家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衰落时期，它时断时续地沦落为非斯或突尼斯的附庸，在马格里布的政治活动中只能起微小的作用。15世纪时它完全变成了阿拉贡的保护地，到15世纪末又分裂成许多小块领地，以致特莱姆森的扎扬埃米尔政权仅局限在这座孤城及其近郊范围内。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埃米尔们仍为王位继承纷争所苦，甚至不得不去寻求西班牙人的帮助，依赖于他们的基督教徒雇佣军，以至后者反倒成了事实上的统治者。在接下去的那个世纪里，特莱姆森国家至多不过是在西班牙与奥斯曼帝国的长期斗争中充当一名小卒，到1554年，它终于在奥斯曼帝国的宰割下灭亡了。

基督教欧洲的挑战

从13世纪到16世纪，穆斯林世界西部与基督教欧洲的接触比前一时期更加紧密。可是，绝不能误以为它们各自是单一的实体，或以为它们始终采取互相对抗的既定政策。在阿尔莫哈德王朝灭亡之后，穆斯林世界西部就已经分裂成为前面探讨过的四个政治实体：格拉纳达的奈斯尔埃米尔国，摩洛哥的马林素丹国，特莱姆森的扎扬王国和突尼斯的哈夫斯素丹国。它们在地中海北岸的那些对手们则分得更为细小。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有卡斯蒂尔王国、阿拉贡王国和后起的葡萄牙；在意大利，主要是热那亚、比萨、威尼斯和西西里（被阿拉贡兼并之前），它们全都采取独立的往往又互相对抗的政策。在圣路易发动的最后一次失败的十字军以后，法国人退居次要地位，在马格里布只起很小的作用。

96

由于列国纷争给各种联盟相互作用提供了许多可能，而联盟又往往超越宗教界限，所以，假如仅仅是从两个互不让步的对手（受伊斯兰"圣战"思想鼓励的一方和满怀十字军热情的另一方）之间残酷好战的斗争这个角度来观察这一时期地中海西部穆斯林和

基督教徒之间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了。这并不是说这些现象没有存在过；的确，在某些阶段，它们往往还是决定性的推动力。但是，透过这些现象往深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相互矛盾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这就是穆斯林和基督教国家之间难以理解的联合与反联合纠纷的根源。鉴于本书第26章将在广泛的大陆整体范畴探讨这些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涉及穆斯林国家和基督教国家关系的政治方面。

13世纪中叶，地中海西部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基督教徒的“复土运动”在征服安达卢西亚腹地的战争中达到了高潮。[40] 以下这些穆斯林的中心相继落入了伊比利亚各王国手中：1229年巴利阿里群岛（马约尔卡），1230年巴达霍斯，1236年科尔多瓦，1238年巴伦西亚，1243年穆尔西亚，1246年贾扬（哈恩），1248年塞维利亚，1249年加尔卜－安达卢斯（阿尔加维），1260－1262年卡迪斯（加的斯）、赫雷斯、拉布拉（奈布拉）相继陷落。从那时以后，伊比利亚半岛大约90%的土地已处于基督教势力的控制之下，穆斯林的残余领土只限于1232年建立的格拉纳达的奈斯尔埃米尔国一地。只是由于卡斯蒂尔和阿拉贡两个王国互相对抗，部分地还由于得到马林王朝（至少在其存在的头一个世纪）的支持，格拉纳达才能幸存到1492年。奈斯尔的埃米尔们有时也曾积极干预北非的政治事务，促使政治局势复杂化，然而，作为地中海上独立强权的穆斯林西班牙已不复存在。

起初，势力对比的变化并不明显，而且如我们所读到的那样，马林王朝曾多次企图在西班牙维持它所希望的暂时平衡局面、甚至企求恢复阿尔莫哈德帝国原有的全部领土。到了14世纪中期，势力对比的局面才明显改变了，它明显地偏向有利于基督教势力一边，马格里布被迫处于守势地位。 97

前面已经提到一些造成穆斯林各国政治及军事力量衰落的因素。首先，在政治权力方面，我们看到各个新王朝在其初期权力都高度集中，后来总是受到日益加强的地方势力的干扰，不管它们是统治家族的叛逆、游牧部落的领袖、基督教徒雇佣军、苏非派的谢赫，还是谢里夫头头（谢里夫或贵族世家首领），所有这些势力都希望分享政权，或要求尽可能多的自治权，它们本来也没有共同的目的。其次，在倾向外部贸易的沿海城镇与农村地区之间，在游牧部落和定居人民之间都有分歧，结果，社会分化为越来越多毫无共同之处的派别。

在马格里布不断加深的危机中，还有一些内在原因。与地中海沿岸其他国家相比，

[40] “复土运动”（*reconquista*），在伊比利亚（以及欧洲）历史编纂学中，是指基督教徒反抗穆斯林统治的过程以及从伊比利亚半岛上清除伊斯兰教势力的多次战争。这一过程包括从722年（科伐栋加战役）到1492年（收复格拉纳达）的整个时期。近年来，某些西班牙学者开始批判“复土运动”这一概念（直译为“再征服”），他们指出公元722－1031年和1252－1481年间并没有基督教的征服战争，也没有再征服的战争；他们认为，即使沿用“征服”一词，（1）或许只能指1035－1262年间，特别应指1085年征服托莱多和1249年征服安达卢西亚全境之间的年代；（2）或是指更晚的年代，即从1481年到1492年，那是收复格拉纳达之前的那段时间。参阅M.克鲁斯·埃尔南德斯（M.Cruz Hernández），1970年。

这地区的人口相对不足，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人口的增长率一直很低。[①]从安达卢西亚涌来的难民人口只比14世纪中期因黑死病流行而损失的人口稍多一点。在许多地区，封建统治下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又使农耕地荒废。16世纪初期以来的文字资料，提供了大量有关土地荒废和先前有农耕及居民的地方人口散失的证据。土壤的贫瘠化也是一个因素，游牧部落的迁移践踏、在干旱地区过度的耕作，都耗尽了土壤的肥力。再说劳力不足，使马格里布再不能恢复它先前的生产水平。

几世纪以来，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一直是马格里布经济繁荣的可靠源泉；但自14世纪50年代以后，大宗贸易日渐转向埃及，这一变化不仅商人阶层已有感觉，各国政府在更大程度上也已觉察到了，因为过境贸易的关税收入是每年税收的可靠来源。

所有这一切因素，都是在基督教各国致力于巩固它们政治、军事及经济力量的时期起了作用。当时，在哈夫斯王朝统治下的马格里布东部地区，虽然还没有像西部地区那样受到基督教国家的严重威胁，但是，哈夫斯王国也经历过外来侵袭和战争的苦难。早在1282年，安茹王室的查理已占领科洛；由罗杰·德－洛里亚指挥的西西里和阿拉贡联军也已占领了杰尔巴岛、克肯纳岛和哈里兹港（卡莱港）。在1335年之前，基督教徒所控制的杰尔巴岛一直是哈夫斯王国侧翼的肉中刺。14世纪末，基督教国家的舰队重又在沿海一带发动攻势。当时是法国联合威尼斯，于1390年围攻马赫迪亚没有成功；巴伦西亚与马约尔卡的舰队，在1398年曾攻打代利斯，1399年又攻打安纳巴；1424年和1432年，阿拉贡军队攻击过克肯纳岛和杰尔巴岛；直至15世纪末，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仍在不断地袭击或攻打的黎波里与阿尔及尔之间的各个港口。这些军事行动和马格里布海盗活动虽然使哈夫斯王朝与基督教各国的政治关系日益恶化，但未导致关系破裂，彼此间的商业贸易仍如以前一样活跃。在政治上，意大利人并未造成任何严重的威胁，因为他们主要是追求商业利益而较少领土野心。一般说来，穆斯林统治者和意大利商人之间的关系，要比他们和伊比利亚人之间的关系容易处理些，因为后者主要是在政治上抱有野心。

98

马格里布中部及西部的形势不同于东部，而且更加复杂。在整个14世纪以及15世纪的上半叶，阿拉贡国王与摩洛哥保持友好的政治关系，对特莱姆森则施加强力影响。他们采取这样的政策，是由于他们仍在与卡斯蒂尔抗争，同时又对意大利和地中海中部地区抱有政治野心。另一方面，卡斯蒂尔和葡萄牙正等待时机，企图干涉摩洛哥事务。萨拉达河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摩洛哥人对西班牙领土事务的干涉已经一去不复返；此后，卡斯蒂尔和格拉纳达之间的斗争变成了封建的宗主国与其附庸之间的纠纷，而不再是基督教势力与穆斯林相抗争的性质了。卡斯蒂尔把马格里布的穆斯林视作真正的敌人，并力图制止摩洛哥人入侵和日益活跃的私掠船队的威胁。

地中海上的海盗活动始于何时已经难以查考，但中世纪以来穆斯林和基督教势力都进行过这种活动。西班牙基督教势力的“复土运动”（或“再征服”）给这种原来以掠夺财物为目的的海盗行为加上了宗教色彩。15世纪及以后一段时间，穆斯林海盗，尤其是

① 在16世纪末期，马格里布全境人口，估计约300万。同一时期，伊比利亚半岛的人口约近900万，法国约1500万，意大利约1200万。参阅J.蒙劳（J. Monlaü），1964年，第39－40页。

从安达卢西亚流放出来的海盗，把他们的掠夺行为视作“圣战”，是对他们被放逐所采取的报复行动。在马格里布一些主要的港口，海盗们建立起独立的“共和邦”，经常做出许多触犯官方政权的事情。马林王朝、瓦塔斯王朝和哈夫斯王朝同样都对海盗采取一种既给予支持又力图掩盖其掠夺行为的政策，掩盖海盗行为是为了避免来自基督教国家的惩罚性战争。在北非沿海一带发生的某些袭击，实际上是对穆斯林海盗攻击基督教船只或西班牙船只的行为施以报复和反击。 99

从历史观点看，穆斯林之劫掠敌船，可以说是针对基督教势力的挑战所能作出的一种积极反应，因为这时马格里布三国政府已经衰弱，再也不能对欧洲人的进攻作出任何有效抵抗了。与此相仿，15 世纪和 16 世纪在摩洛哥内地发生的民众运动也是反对那无力将葡萄牙人逐出国土的中央政府的，虽然这些民众运动的领导者是谢里夫们和虔诚的穆斯林隐修士。

在卡斯蒂尔与阿拉贡于 1479 年联合之前，从西班牙内部情况看，那里从来还没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力量能够对抗马格里布。1399 年，卡斯蒂利亚人一度占领过得土安，当地居民半数惨遭屠杀，残存者沦为奴隶，但这不过是长期以来伊比利亚人对摩洛哥本土所进行的唯一一次严重入侵事件，历时短暂。直到 1492 年穆斯林的格拉纳达陷落之后，伊比利亚人才重新发起进攻。

事实证明葡萄牙人更有危险性和侵略性，他们是马格里布和整个非洲的真正克敌。早于 1385 年获得政权的阿维什骑士团王朝，在把摩尔人全部赶出自己的领土之后，已决定再接再励对非洲大陆上的异教徒进行斗争。他们抱有复杂的动机，既有宗教的狂热，又希望获得领土和财富，还要同穆斯林海盗决一胜负。

1415 年，葡萄牙国王若奥之子恩里克亲王（后称“航海者”亨利）和费尔南多亲王率领的海陆军在一场简短的战役之后，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港。这是葡萄牙人开始海外殖民扩张的第一步。在欧洲史甚至于世界史上，普遍认为休达的沦陷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这正是欧洲人越出他们大陆的边界向外扩张去实行征服和殖民活动的起点。对这种看法应加上一点说明：不可忘记，十字军早就抱有同样对外扩张、控制东方商路和征服非欧洲国家及其人民的企图；这并不是否认 1415 年标志着西欧国家向海外扩张的开端，因为在此后不断征服的过程中，欧洲人逐步夺得了其他大陆的控制权，发现了后来成为殖民侵略目标的新土地。所有这些情景，将在《非洲通史》第五卷绪论中展开论述；这里要探讨的问题，只能集中在葡萄牙人对非洲西北部、尤其是对摩洛哥的侵略上。

葡萄牙人自然不仅仅是要占领一个港口（休达），他们还想吞并整个摩洛哥国家，其目的就在于夺取那有利可图的黄金贸易。如前所述，马林王朝已经不能抵挡这种威胁势力，只有成了实际统治者的大臣阿布·扎卡里亚·瓦塔西还在那里试图动员全国进行抵抗。1437 年，葡萄牙人又在他们那两个亲王的指挥下进攻丹吉尔（丹贾），企图加以占领，但遭惨败；当时，葡萄牙也曾答应将休达归还给摩洛哥胜利者，并将费尔南多亲王交给摩洛哥作为人质，但是葡萄牙国王杜亚尔特坚决拒绝放弃他在非洲土地上的立足点，结果，他的兄弟费尔南多死于非斯狱中。 100

在丹吉尔的失败，使葡萄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它的扩张策略和计划。显然，一次

单独的正面强攻是不能夺取摩洛哥以及苏丹商路的控制权的，因此葡萄牙人不得不另外寻找通往黄金产地的路线，同时指望在摩洛哥南方找到一个同盟者以备进攻穆斯林时得到帮助。当然，这些都不过是策略上的改变，决不意味着葡萄牙的君主及商人阶级会放弃他们对非洲西北部的侵略计划；但是，事实上葡萄牙人的注意力确是渐渐转向大西洋沿岸一带。从15世纪中期以后，他们成功地占领了摩洛哥沿海各城市：卡比尔堡(1458年)，安法（1469年），阿尔西拉（1471年），马赛特（1488年），阿加迪尔（1505年），萨菲（1508年），阿扎穆尔（1513年），马扎甘（1514年），阿古兹（1519年）。1471年，他们终于占领丹吉尔。在葡萄牙人看来，摩洛哥不仅是他们在非洲沿海一带肆行扩张的场所，它还有内在的价值。他们任意劫掠这个国家内地的城镇及农村(甚至于在1515年侵入马拉喀什)，葡萄牙因此增加了国库收入。在此过程中，摩洛哥城乡居民不是遭到抢劫，就是被俘去变卖为奴隶。但是，葡萄牙人同时仍和摩洛哥人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从中得到财物，主要是谷物、马匹、羊毛纺织品等等，然后他们又用这些财物去西非换取奴隶和黄金。

正当葡萄牙人成功地沿着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扩张，并继续往南去寻找黄金和那个反穆斯林的盟友(中世纪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从而开创了地理大发现和殖民帝国形成时代之际，西班牙人终于在费迪南德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的领导下实现了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的联合。经过一场历时10年的战争，他们于1492年征服了格拉纳达；在同一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开始他的第一次航行，在航海中发现了通往新大陆——后称美洲的最短航路。

西班牙向海外扩张的视野大大展开了，但它并未忽视眼前的北非敌人。根据1494年由教皇认可的一项协议，马格里布在伊比利亚两国之间瓜分：休达以西地区割让给葡萄牙，而东部地区则归西班牙所有。西班牙人迅即利用这一协议以及扎扬王朝和哈夫斯王朝的弱点，在1496－1510年间占领了地中海沿岸的一些重要港口，包括梅利利亚(至今仍属西班牙)、卡比尔、奥兰、贝贾亚（布日伊）、的黎波里。但是，他们没能深入扩张到内地，驻军只限于几个有海上供应的港市，这样他们就很难对付其他的海上强权势力。

101

到15世纪末，马格里布的穆斯林已陷入危运十分严重的时期：原属于他们的大西洋及地中海的港市，差不多都转到了基督教势力手中；他们本国的中央政府软弱无能，国家又已分裂为若干个相互对立的宗派；经济生活极不稳定，完全受制于变化不定的世界权力对比形势。虽然在下一个世纪，马格里布还曾有一次生机复苏，但由于穆斯林世界西部出现了一次强大的民众运动，而穆斯林世界东部则遭到土耳其海盗和奥斯曼帝国的横加干涉，马格里布各国再也没有恢复阿尔莫拉维德王朝、阿尔莫哈德王朝以及哈夫斯王朝和马林王朝初期统治者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5 阿尔莫哈德王朝消亡后的马格里布社会

*R. 伊德里斯**

有关马格里布本卷所述时期的历史编纂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然而这个地 [102] 区的社会史却仍有待研究。这种状况是缺乏综合性著作的反映，因此需要我们着手对原始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和解释。[①]对中世纪伊斯兰教进行综合研究或许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然而穆斯林世界东西两个部分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发展的不同形态必须加以重视，尽管这些差别的显现既模糊又缓慢。[②]

游牧经济占优势以及当时的城镇经济

游牧民

11 世纪以来，定居生活方式和游牧生活方式之间历史悠久但不稳定的平衡状况，因受巴努希拉尔族以及 12 世纪巴努苏莱姆族等阿拉伯游牧民的入侵而遭到破坏，并朝着有利于游牧生活方向发展。13 世纪初，他们的“大劫掠”毁掉了庄稼，使伊弗里基亚和马格里布中部陷入一片混乱。[③]阿尔莫哈德王朝出于军事和经济战略的原因，将他们大批迁移到大西洋沿岸平原，把那些地方让给他们；而其他贝都因部落如巴努马基尔族，则占领了摩洛哥阿特拉斯山区的南部和东部。马格里布与穆斯林世界东部被切割开来，它与苏丹的联系也遭到破坏，它的文明，特别是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文明，被迫退向了地中海 [103] 沿岸。

农村人口

农民——牲畜饲养者、种地人、森林伐木人、经济作物种植者等等，依赖于各自的

*这篇文章是R. 伊德里斯 (Roger Idris) 教授逝世后发表的，他死于 1978 年 4 月 29 日。

① 无论如何，还是有两部有价值的著作：G. 马凯 (G.Marçais)，1913 年；R. 布伦什维格 (R. Brunschvig)，两卷本，1940 与 1947 年。

② 有关城市史(在本章中占重要地位)，为了比较研究，可参考 A . H. 胡拉尼 (A. H. Hourani) 和 S. M. 斯特恩 (S. M. Stern)，1970 年主编的一部研究东方城镇的文集。

③ 历史学家对“大劫掠”这一提法众说纷纭．A. 拉鲁伊 (A.Laroui)，1970 年，第 139-146 页，他对此的批判很有影响。

土地，构成了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尤其是在小集市城镇和乡村之间已有人口流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自古以来，这里的农业一直发展缓慢艰难，农业需要大量劳力，但不是农奴，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是小型家庭农庄。尽管少数权贵拥有大量财产，但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共有制是常见现象。大量的小块土地是领受者自耕或租给佃农耕种的私有或公有的“哈勃斯” *(habous)* 。[4] 许多农庄（恐怕是大多数）根据与所有者签订的契约来经营；庄园出租给众多的所有者，存在着多种形式的租耕制和收获分成制，



图片 5.1 南摩洛哥蒂吉尼特地区弗里-弗里的阿加迪尔（设防粮仓）

[4] “哈勃斯”或“瓦克夫”（*Wakf*）是一种宗教性质的捐赠或遗赠，对产业以永久性经管形式赠送给私人或公众，其收益只能给予领受者（可以是镇上的贫困者、社会团体、特定的家庭或学生）。

一般都要缴纳收成的五分之一。分成制佃农（哈马斯，*khammās*）并非总能维持生计，他们的境况常常十分悲惨，特别是在年景不好时。每家从其自有的或向他人租种的土地上获得的收入十分微薄。农产品、牲畜、乡村和城镇的手工制品都在季度或每周的乡村集市上进行交易；这些集市往往能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城镇，即当地居民、半游牧民与游牧民互通有无的中心地。

由于缺乏资料，再要进一步分析乡村社会结构就十分困难。社会结构的变化，往往与地理位置有极大关系。在那些使用柏柏尔语的闭塞地区，社会情况至今依旧如故。其他地区经受了游牧民的冲击，却也没有被吞没；因此，社会结构的新的平衡，基本上是过去的延续，连续几个世纪保持原状。

城镇居民

关于当时的城市生活，我们对马格里布三国将从影响最大的西部地区开始，分别进行分析。首先，有几点一般的特征是很明显的。本书没有必要对穆斯林阿拉伯社会的特点多费笔墨，如家长制家族、异性隔离、城市妇女以面纱遮面、一夫多妻制、纳妾、氏族内部通婚、自由民与奴隶的区分、穆斯林与属国之间的差别等等。同样，对传统的穆斯林城市生活情景，如位于露天市场中间的宏大清真寺、狭长曲折的街巷、土耳其浴室(*hammām*)、筑有城门的城墙毗连墓地和市场和郊区等等，[5]也无须多加赘述。进口的织物陈列在布匹大厅(*kaysariyya*)出售，其他商品则摆在商队旅馆(*funduks*)叫卖，旅馆的各个房间都可通向一个内院。住在港口的欧洲商人在商队旅馆中按国籍聚居，他们都有自己的领事。随海盗船带回的奴隶，主要充当仆人，基督教僧侣有时为他们赎身。 105

由于遭受基督教徒迫害的犹太难民大量到来，14世纪末犹太人数量明显增加。他们靠自己的财力、天份及其与欧洲犹太人的联系，在经济生活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许多人定居于特莱姆森和贝贾亚（布日伊）。在伊弗里基亚，他们受到欢迎，但他们虽经一再努力，却从未得到在摩洛哥得到过的高位。在非斯，马林王朝初期和末期，都发生过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事件。15世纪后半期，图瓦特沙漠绿洲中犹太人的聚居地也是大屠杀的目标。

然而，在西班牙"复土运动"中先后流入马格里布的穆斯林移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移民接连不断的蜂拥而入，在13世纪前期至15世纪末期这一段时间里达到了最高潮。这些安达卢西亚人主要定居在各个港口，结为紧密的集体，其成员从事社会上形形色色贵贱不等的职业：文人墨客、音乐家、律师、文书、士兵、商人、织工、石匠、花匠和农民，各个层次的人都有，各国素丹和王公们往往就从这些人中选择自己喜爱的人。

由于黑人男女奴隶源源不断地流入以及阿拉伯人与黑人妇女的非法同居，在城镇以

[5] 土耳其浴室：源自加热器一词（阿拉伯文：*hamma*，意为"变热"，希伯来文：*hāmam*，意为"使温暖"），是一种热蒸汽浴。那是些孤立的建筑，与街道或市场相通，装有颇为富丽的门。《伊斯兰百科辞典》初版，第2卷，第253页。

及某些乡村或游牧部落中，都出现了一些混血种人。

阿拉伯-柏柏尔人的这种"共生"现象，随着征服占领而迅即开始，到9世纪初已有相当的发展。[⑥]然而，即使是在最有利的环境(即城市生活中)，这种"共生"也未能消除特定的部落传统，这种传统虽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从阿拉伯人以及商业和商队城市中滋生的伊斯兰教，以偏向城市著称；因此，在述及城市生活时，我们必须谈到13-16世纪之间基本上已经伊斯兰化的马格里布社会的宗教演变。

马立克教派的胜利：神秘主义的发展趋势

阿尔莫哈德教派并未能在马格里布动摇马立克教派的根基。前者，原是马斯穆达族系用来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的一种非正统教派，它随着马斯穆达统治集团的倒台也就受到一次致命的打击。马斯穆德统治集团的后继者、马林王朝以及阿卜德·瓦迪德王朝都没有本身独特的宗教教规，他们都遵循马立克教派的正统教义。为扶植马立克教派，他们建立了许多收容及训导教徒的伊斯兰经学院（"马德拉沙"，*madrasas*），并从经学院学生中选拔官员，安达卢西亚穆斯林的影响很快就在这些伊斯兰经学院中显露出来。至于东部的柏柏尔人居住地区，情况迥然不同。哈夫斯王朝是信奉阿尔莫哈德教派的，106 他们最早的一些经学院也曾竭力宣扬和传播阿尔莫哈德教义。然而，他们没有成功，因为伊弗里基亚人深信马立克教派的教义。并且，在12世纪后半期，还有些杰出的学者给马立克教派增添了新的光辉，因此这一教派在所有宗教机构、地方行政组织和经学院中都占统治地位。哈夫斯王朝不仅容许这种演变，而且同马立克教派的学者建立起真正的合作关系；由于著名的伊本·阿拉法的倡导，马立克教派在14世纪后半期获得了胜利。

马立克教义并非导致宗教划一的唯一因素。早在12世纪，马格里布民众的虔诚信仰就已经深深地染上了神秘主义色彩。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墨守法规、思想狭隘和死板严酷的司法裁判，对于加扎利著述中所宣扬的"信仰行动"（*auto-da-fé*）简直是一种倒行逆施，摩洛哥人对此早已深受其苦。阿尔莫哈德教派徒劳地在摩洛哥人民中灌输一种灵活的极端倾向于理性主义的教义，他们宣扬救世主马赫迪的圣洁，又谴责现行的宗教法律，结果得罪了在人民中间根深蒂固的马立克教义；这时，为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摩洛哥人便转向崇尚神秘主义的苏非教派了。随着阿尔莫哈德王朝的消亡，就在摩洛哥，神秘主义思想运动便在安达卢西亚苏非教派和本地传统的禁欲主义影响下更加扩大（禁欲主义是由一些被奉为圣洁者的神秘主义倡导人传布开来的）。以后，这一运动扩散到了马格里布中部以及伊弗里基亚。

出生于塞维利亚附近的阿布·马德扬·安达卢西（西迪·博乌·麦迪涅）曾经同摩洛哥人一起研究神秘主义，以后又到穆斯林世界东部探寻其根源。他在贝贾亚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来马拉喀什的哈里发慕其名而召见，在赴特莱姆森途中去世（1197-1198年）。当时，西迪·阿布·阿里·纳夫蒂同他齐名；他的门徒中有出身于凯鲁万平原的贝都因部落人达赫马尼（1224年死）和马赫迪亚的马赫达维（1224年死）。赛义迪·阿布·

⑥ 见H. R. 伊德里斯(H. R. Idris), 1973年(b)。

赛义德（西迪·博乌·赛义德）也曾经在突尼斯及其附近地区宣传苏非派教义。

阿布·马德扬的另一个学生穆莱·阿卜德·萨拉姆·马希什，是这一地区有名的圣职人员。他的门徒西迪·阿布尔-哈桑·萨迪利（西迪·贝勒·哈桑），1197年左右出生于得土安以南，最初是在突尼斯周围地区布道，经过一段时间隐居于扎霍安山区修行，又回突尼斯定居，他周围有相当多的信徒。他自称出身于谢里夫家族，是哈桑·阿里的后裔，因而被怀疑为阿里教派的鼓吹者，不得不隐退到东部，但1258年死后在突尼斯仍有他的众多追随者。他所热情宣扬的未加提炼的苏非教义，倾向于崇拜圣者（伊斯兰教的隐修士、神祷、幻术、清贫、怪行、在小修道院或"扎维亚"中生活），追随教派兄弟会；后来发展成为萨迪利教派。

据哈夫斯王朝时期伊弗里基亚的传说，萨迪利教派曾有50名教友，其中有一妇女名叫拉拉·曼努比亚（1267年逝世），她言行怪诞，却为人们所敬畏。法官要逮捕她，君主竟表示反对。她的各种怪行，很快传开也不再引起异议。穆加尼（死于1300年）是一位活跃于"扎维亚"的谢赫，他与宫廷和正统神学教派保持着良好关系。 **107**

这也是西迪·本·阿鲁斯成名的时代。阿鲁斯死于1463年，他出身于邦角，经营小本生意，后辗转于突尼斯和摩洛哥学习苏非派教义，曾在摩洛哥长住；回到突尼斯，他成为一个隐修士，又是托钵僧 *(gyrovague)* 。[7]他还是一个幻术师，言行古怪，甚至触犯宗教法规，因而法官都憎恨他，但他仍享有盛誉，受到好几个哈夫斯王朝头目的关照。当他死后下葬于自己的"扎维亚"中时，无论是贱民还是贵人，全民都来悼念，认他是西迪·马赫雷兹（5个世纪以来突尼斯人最崇拜的圣人）之后的第一位圣者。他有众多的追随者，但直到16世纪才建立起阿鲁斯教派的兄弟会。这期间，伊弗里基亚全境都有禁欲主义者，还有伊斯兰教隐修士的氏族集团，其中如萨巴伊亚氏族集团，甚而以凯鲁万为首都建成国家，后来还奋起反抗西班牙人和土耳其人。然而萨迪利教派最盛行的地方，还是在摩洛哥（该教派创始人萨迪利的出生地），特别是在阿格马特和马拉喀什一带。1370年，在拉格拉加建立了一座萨迪利教派的"扎维亚"，他们的传教士遍及摩洛哥南部平原和山区。

最后是哈朱利（死于1465年）的出现，是他给苏非教派以新的动力，将其教义引向崇拜隐修士和谢里夫。这位柏柏尔人来自苏斯，根据传说被认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1437年，在他降生同一天，非斯一座清真寺中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令人惊奇的遗体，当即宣布这是非斯城创建者伊德里斯二世的遗体，于是穆莱·伊德里斯成了狂热崇拜的对象。在梅克内斯和非斯，伊德里斯派的谢里夫结成一些有势力的团体，马林王朝同意他们各有一名代表，称纳基布 *(nakīb)* 。哈朱利接受并宣扬萨迪利教义，他很快有了大批追随者，他们可能结成了兄弟会。在摩洛哥南部涌现出许多隐修士，他们涌向东部和北部，最远到达的黎波里塔尼亚。谢里夫的追随者和隐修士们紧密结合在一起；学者和法官们曾对苏非教义敬而远之，这时却也卷入了兄弟会。哈朱利逝世时，他的一个门徒在苏斯组织了一场强有力的叛乱，将他这位谢赫的遗体护在身边达20年之久；哈朱利的

[7] 托钵僧或行游僧，原是中世纪拉丁文的称呼，指在各省区各修道院游历的僧侣，每处留住三、四天，行乞为生；他们也被称为苦行僧 (Messalians)。

108 遗体置于棺木之中东来南往。最后，在 1524 年，萨迪安的谢里夫阿拉格把这具遗体与其先父的遗体一道运到马拉喀什，安放在同一座陵墓内，这样，哈朱利教派就与这个新王朝联结在一起，从而确保了它的胜利。

圣纪 *(mawlid)* ——穆罕默德诞生纪念日，回历 3 月 12 日——在穆斯林世界东部 13 世纪初的阿尤布王朝已开始庆祝，如今摩洛哥的柏柏尔人也以宗教仪式欢庆这一节日。早在 13 世纪中叶，这一节日庆典在休达已有初次记载，1292 年由马林王朝的阿布·雅库布·优素福规定为法定节庆。14 世纪中叶，在特莱姆森，阿卜德·瓦迪德王朝的阿布·哈穆也以盛大游行庆祝。但在突尼斯，哈夫斯王朝的阿布·叶海亚（1318-1346 年在位）依样而行，却遭到法官们的强烈反对，以致不得不中止举行。直到阿布·法里斯(1394-1434 年在位）统治时期，伊弗里基亚才最终像摩洛哥和特莱姆森一样，以大量诗歌、音乐、歌曲以及各种装饰来庆祝这一节日。这里，同样主要是兄弟会提倡并随之把持这一节庆，以此加强谢里夫的威望。

王朝政权和社会结构

马林王朝、阿卜德·瓦迪德王朝和哈夫斯王朝都是由柏柏尔征服者部落建立的，获胜的氏族成立国家，称作马赫曾 *(makhzan)*。然而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差别，与传统的"哈萨"(*khāssa,* 指统治者个人、朝臣、政治-军事头头、上层名流）和"阿玛"(*'ammā,* 指平民、群众、庶民）之间的区别大不相同，这后一种区别是法官、史书编纂家和统治阶级所制造的。况且，伊斯兰教基本上的平均主义已为人所共知；"哈萨"常指读书治学者，而"阿玛"则往往指目不识丁者。同时，在非斯，和在特莱姆森和突尼斯一样，中等阶级，即有巨大同化能力的中小自由民，一直致力于推翻理论上分成两部分人的社会结构，并力图冲淡社会等级意识。任何人在生活中只要运气好，或通过良好的教育，或甚至于通过某位贵人的怜悯或宠爱，便有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马林王朝

马林王朝只是在战时才从马格里布中部和阿拉伯人中招募泽纳塔族来补充自己为数不多的骑兵。他们麾下约有 8000 名外籍雇佣骑兵——土库曼人、法兰克人、安达卢西亚

109 人和叛教者[⑤]——以及一支素丹卫队，大致都是泽纳塔人。泽纳塔族构成该王朝的政治-军事领导层，凡是高级官吏和大臣都从他们中选拔，势力日增而又相互勾心斗角的家族也皆出自他们。其中，巴努瓦塔斯家族为最后一位马林王朝素丹推送了若干名摄政者，并自行建立了控制非斯城及该国部分地区的王朝。大臣们的办公室事务及财政事务都托付给由摩洛哥人或安达卢西亚人充任的秘书长（卡蒂布，*kātib*）去办。素丹的宫廷内侍（哈吉布，*hādjib*）大多是那些已获得自由但并无政治权力的奴隶；不过也有例外，一名担任过阿布·雅库布·优素福（1286-1307 年在位）宫廷内侍的犹太人后来官居政府总

⑤ 这些叛教者往往背叛原来的基督教信仰而当雇佣兵，多数来自西班牙，应募在马格里布军队中入伍。

管。最后一位马林王朝素丹由于欠犹太人债款，也曾派他们中的两人担任收税官。贾恩达尔 *(djandār)* 驻守在宫门两侧，负责传达君主的命令；[39]他们的头目叫米兹瓦尔 *(mizwār)*，他负责监护在达尔·阿玛（*dār al-'ammā*, 平民居住区）举行朝拜时的隆重礼仪。法定继承人的确立与权力的运用紧密结合在一起。重要省份的总督往往由具有王室血统的王子、或泽纳塔和阿拉伯人的领袖充任。

阿特拉斯山区实际是自治的，那里驯顺的氏族集团 *(kabīla)* 受从忠于王朝的贵胄中选出的有权势的埃米尔管束。各氏族集团都有权征收捐税或有伊克塔 *(iktā')* 权，[40]谢里夫和圣职人员有权得到一部分税款，而兄弟会则获有免税权。

非斯于 14 世纪中叶达到鼎盛时期。阿布·优素福·雅库布一旦掌握了摩洛哥的大权，便离开被征服的阿尔莫拉维德首都马拉喀什，迁都非斯，1276 年又建立了新非斯城作为行政与军事的首都．它包括王子住区、基督徒住区、后来的“马拉赫”（*mallāh*, 犹太人住区）。那些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不是居住在“马拉赫”的犹太人）已与穆斯林融合在一起，并成为批发商人。大批安达卢西亚难民的到来，充实了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商人队伍的中坚势力．不少人成为名流精英。

为涌来非斯的学生提供食宿和教育，阿布·优素福·雅库布以其哈勃斯 *(habous)* 基金在旧城建立了马林王朝第一所著名的经学院。1320-1322 年间又建立了另外四所．1346-1347 年建起第六所；尔后，阿布·伊南（1342-1358 年在位）也建立了一所以其名字命名的经学院（参见图片 4．1，4．2）。

这里与西班牙、葡萄牙、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业往来十分兴旺发达。在一位称为“共同领事”（葡文 *feitor*）的管辖下，基督徒商人们聚居在一所大厦之中，犹太社团则有他们自己的领袖和行政管理机构。由穆赫塔西布——监督官 *(muhtasib)* 控制商业活动。[41]然而，以往非斯的繁荣文化与经济已随其王朝一起衰落了。萨迪斯家族夺得王位时，选择长期凋敝和实际已成废墟的马拉喀什为首都，非斯就很难复兴了。

110

阿卜德·瓦迪德王朝

特莱姆森的阿卜德·瓦迪德王族原是马林王族的一个支系，后反叛出来，他们像过游牧生活的柏柏尔人泽纳塔族一样，逐渐成为一个定居国家的领导者。王朝的创建者亚格穆拉桑·扎扬（1235-1283 年在位）30 岁之前是在帐篷中生活的，他只会讲柏柏尔语。

[39] *Djāndār*（或 *djandār*）：“诺巴特·贾恩达里亚 *(Nōbat al-Djāndāriyā)* 在马木路克王朝和马林王朝是素丹在他宫廷中或出巡时的卫兵；其职责还有在埃米尔们朝见或向素丹致敬时担任引导。”《伊斯兰教百科辞典》初版，第 1 卷，第 1014 页。

[40] *iktā'* 一词，与其所表示的法律和财政概念一样，很难用欧洲语言表达其含义（参见《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 3 卷，第 1088 页）。这里指的是征税权。

[41] “*muhtasib*”，即督察，是由哈里发或他的大臣任命，负责监督伊斯兰教戒律的遵守与否，发现和惩罚违反戒律者，……。在某些方面他的职责是与卡迪 *(kādī)* 平行的。但是 *muhtasib* 的司法权仅局限于与商业交易、货物重量或尺寸不足、买卖欺诈行骗以及拖欠债务之类的事务。《伊斯兰教百科辞典》初版，第 3 卷，第 702-703 页）。

大臣一职最初均由王亲担任，但自阿布·哈穆一世（1308-1318年在位）起，该职转入科尔多瓦几个货币兑换者家族的成员手中。他们在特莱姆森周围广置田产，妥为经营。他们中有一位名叫马拉赫者，是亚格穆拉桑·扎扬的财政大臣。哈吉布选自法官，既是宫廷内侍，又兼管大臣的办公室及财政事务。阿布·塔什芬（1318-1373年在位）任命一个讲安达卢西亚语的自由民卡塔兰人希拉勒为“哈吉布”（掌礼官、宫廷内侍或总理），执掌行政大权。

亚格穆拉桑·扎扬召募那些曾为阿尔莫哈德王朝服役的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基督教徒做雇佣兵（1254年后不再用基督徒），但军队中的骨干则由巴努希拉尔族组成；他们被授予重要的财政特权（征税权，*iktā'*），负责征收捐税，其中一部分可截留归己。亚格穆拉桑·扎扬信教十分虔诚，特莱姆森和阿加迪尔的每一座大清真寺都修建了宣礼塔。马斯瓦要塞的建造也归功于亚赫穆拉桑·扎扬，他本人就住在这个要塞里。他的继承者建立了西迪·贝勒·哈桑清真寺（1296年）；阿布·哈穆一世创建了一所经学院以供两位学者传经授业；后来他儿子也建立一所经学院，并建筑了三座王宫，此时的特莱姆森达到了它的繁华顶巅。

在特莱姆森被围攻期间（1298-1306年），马林王朝的阿布·雅库布·优素福修筑了一座曼苏拉兵营城（新特莱姆森），此城后来由阿布尔·哈桑在第二次围攻时（1335年）再次占领并进一步加以巩固。1337-1348年马林王朝首次统治特莱姆森期间，他们鼓励对阿布·马德扬的崇拜，整修了他的陵墓并增建了乌拜德清真寺和一所经学院。在马林王朝的军队第二次占领期间（1352-1359年），阿布·伊南建立了一座附设经学院和“扎维亚”的清真寺，以纪念一位曾于13世纪初定居特莱姆森的安达卢西亚人、圣者西迪·勒哈尔维。马斯瓦要塞的黄金时代是在阿布·哈桑二世（1359-1389年在位）统治时期。在“圣纪”节日（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夜晚，贵人和平民都受到盛大的款待，每当此时，那座带有移动人物像的巨大时钟*(mangana)*受到交口称赞。哈穆二世在附近建筑了一个巨大的宗教建筑群，包括家族寝陵、一所经学院和一所“扎维亚”。阿布尔·阿巴斯（1430-1461年在位）建造了一座寝陵和一个清真寺，以纪念西迪·拉赫桑（死于1453年）。

111

特莱姆森在它的政治兴衰的全过程中，似乎从未有过黯然失色的时刻，其财富之广总是那么光彩照人。那里的商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穆斯林——都是那么富有，这全都仰仗其兴旺发达的对外贸易。在大清真寺附近，从欧洲进口的纺织品被卸入货栈并在布匹大厅*(kaysariyya)*中出售。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人们有他们自己的商队旅馆*(funduks)*。手艺人十分活跃，他们生产毛织品、小地毯、陶器、马具和染色皮革。海上交通经由胡奈恩和奥兰。最后，特莱姆森看来已取代马拉喀什，成为对撒哈拉贸易的中转站，而这种贸易在13、14世纪时又有所复兴。黄金和奴隶从锡吉勒马萨通过一条由巴努马基尔族控制的路线到达特莱姆森。

哈夫斯王朝

作为商业港口、海盗基地、文化与宗教中心和有时作为国都的贝贾亚（与特莱姆森一起）是马格里布中部有吸引力的城市。其船厂所需要的木材和沥青来自卡比利亚森林。除过往的外国人、偶至的旅客以及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外，还居住着卡比尔人和安达卢西亚人。这座城市既没有经学院，也没有"扎维亚"，而与它规模相同的君士坦丁城却有好几所。此外，君士坦丁还有一个很大的犹太人社会和一个形成已久的富有的城镇自由民阶级。

在东巴巴里，哈夫斯王朝继续保持阿尔莫哈德王朝的制度。男性亲属分组听命于一位称为马兹瓦尔·加拉巴 *(mazwār al-garāba)* 的头目。当时行使权力的人主要是各省总督，都拥有埃米尔的头衔。他们的孩子在宫里与素丹和朝廷大员们的孩子一起得到抚育，并充任侍从官 *(sibyān)*，都受到良好教育。在王室仆从中，那些从前是奴隶而后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在文武官员中的影响不断增长，内廷总管是个阉人。在阿尔莫哈德谢赫（军人贵族）集团中，也有最初的阿尔莫哈德部落的后裔；他们全都服从一位最有权势的国家栋梁，即穆瓦希敦谢赫 *(al-Muwahhidūn shaykh)* 的领导（这是终身官职），每人上面都有一个马兹瓦尔。[12] "大谢赫"分成团：三人团、十人团、五十人议事会、[13] "小谢赫"参加各种典礼。与阿尔莫哈德教义所信奉的平均主义相适应，包括素丹在内，每位谢赫的薪俸是一样的；此外他们还能够得到一份不动产以及每年以现金或实物形式支付的年金。他们的势力后来逐渐衰落，这对安达卢西亚人和自由民是有利的，但他们也有个别人重新得势。议事会（舒拉，*shūrā*）由阿尔莫哈德贵族和其他贵族组成。哈里发经常召集会议，包括公开的或私下的，每周还要举行一次由教法官（卡迪，*kādī*）和教法说明官（穆夫提，*mufti*），即首都的法官们参加的会议。哈里发亲自肩负制止各种违法乱纪行为 *(radd al-mazālim)* 之责。

112

早在哈夫斯家族还是阿尔莫哈德王朝的总督之时，他们总要任命一位相当于总管的卡蒂布 *(kātib)*，作为代理人。阿布·扎卡里亚（1228-1249 年在位）手下有三位大臣：一位负责军队——大谢赫，或甚至是阿尔莫哈德的谢赫，他行使总理职权；一位负责财政；还有一位负责大臣办公室。到 13 世纪末，又出现了一个主要负责宫廷内务的官员，称哈吉布 *(hādjib)*，这一官职源自西班牙人，当时由安达卢西亚人执掌，其势力不断增长。到 14 世纪时，哈吉布已成为总理一切事务的人，伊本·塔富拉琴（1350-1364 年任职）就曾独揽大权；在他之后，这官职虽依然保留，但已是一种荣誉称号了。财政大臣过去是从阿尔莫哈德的谢赫中推选，后来则从政府官员或安达卢西亚人中提拔。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初，自阿布·法里斯起，穆纳菲德 *(al-munaffid)*，即王室开支的掌管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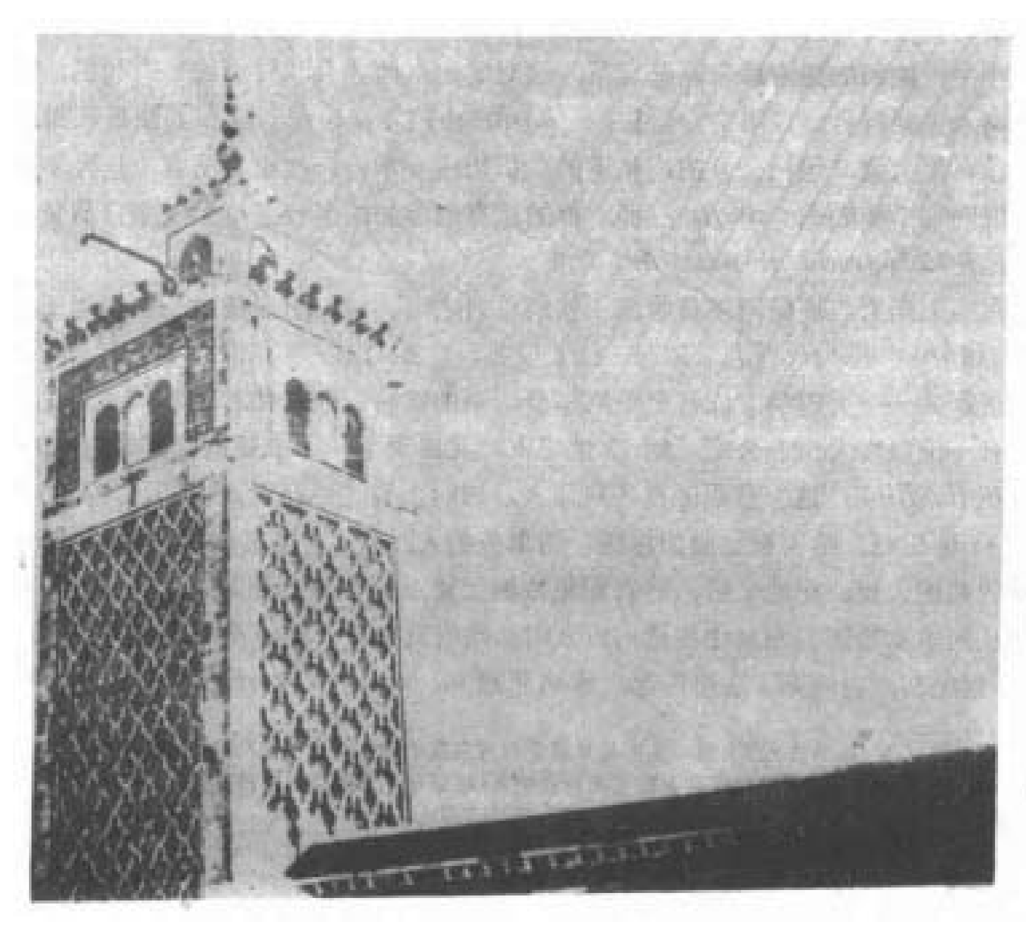
[12] "米兹瓦尔（或马兹瓦尔）这一头衔最早见于与阿尔莫哈德体制有关的马格里布历史中，含义是一个派别或一群人的头目，当时与此相应的官职常常与监护人（哈菲兹，*hafīz*）或监督官（穆赫塔西布，*muhtasib*）等官职相混淆。"《伊斯兰百科辞典》初版，第 3 卷，第 543 页）。

[13] 关于这些团的起源，参阅 O. 赛迪 (O. Saidi)，本书第 2 章。

最终取得了执掌国家财政的大权；1462年，在阿尔莫哈德谢赫和哈吉布之职不复存在之后，穆纳菲德攫取了统治集团中的首席地位，而财政大臣则降职为司库。到15世纪末，马兹瓦尔本已身兼四职：宫廷大总管、引见官、卫队长和侍从长，又攫取了军权，从而使自己成为仅次于穆纳菲德的第二号人物。安达卢西亚人过去担任多数文书职务，如今逐渐让位给伊弗里基亚人。

阿尔莫哈德的谢赫最初负责各省事务；到14-15世纪时，这一职权落到往往是奴隶出身的地方官员即卡迪（*kādī*）手中。哈夫斯王朝常常从其男性亲属中，特别是他们的儿子中选择重要省份的总督（尤其是长子，都要被派去先行见习）；每一位总督都有一名助手，最初是卡蒂布（*kātib*），后来是哈吉布（*hādjib*）。各部落的谢赫，则从已居显赫113 地位或已由素丹授爵的家族或氏族成员中选择；他们负责指挥每年由他们的氏族集团派来的部队，为国库征收捐税，并颁发钱财和田产的特许权。

军队成份复杂，包括阿尔莫哈德教派、以游牧经济为生的阿拉伯人、来自马格里布或伊弗里基亚的柏柏尔人、东方人、安达卢西亚人、信基督教的法兰克人等等；但所有这些成份与伊弗里基亚的阿拉伯人相比则相形见绌，后者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还有关于城市民兵、安达卢西亚民兵、土库曼雇佣军和来自西班牙及意大利的基督教骑兵的史料记载（后者组成素丹卫队，仍保持其宗教信仰，驻扎在首都郊区）。此外，基督教的叛教者，因其中大多是获得自由的奴隶，所以构成了军队中的可靠成份，将军们往往是自由民或叛教者。由政府或商人举办的海船竞赛起着重要作用。一旦发觉海洋更适合其生



图片5.2 突尼斯的卡萨巴清真寺

存，哈夫斯王朝就再也不想返回伊弗里基亚的故都凯鲁万了，该城早因巴努希拉尔族的入侵而变得毫无价值。原有的城市人口大量下降，他们被踏平了大平原的贝都因游牧部落赶跑了。那里的手艺人由于能够获得游牧民产品，在某种程度上仍很活跃。城中建有许多"扎维亚"。

突尼斯是一座繁华的都市。阿尔莫哈德王朝的卡萨巴或加萨巴清真寺由阿布·扎卡里亚改建，变成了一座小行政城市。1240年前后，在宰图纳大清真寺（见图片5.2）附近，他建起了北非最古老的萨马伊亚经学院 *(al-Samma'iyya)*。15世纪初，王子们和公主们又相继建立了十几所经学院，"扎维亚"在麦地纳城区和城郊成倍地增长。在港口地区，耸立着供基督教商人住的商队旅馆 *(funduks)*，他们按国籍分别居住其中。在郊区，安达卢西亚人管理着大量的菜园和果园。园林和豪华宅邸比比皆是；早在1420年就有关于巴尔多宫的记述。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伊本·哈勒敦（1332-1406年）就诞生在突尼斯城。有关他生平的一些具体情况以及对他所处时代的一些看法可作为本章的结论。[49] 114

伊本·哈勒敦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

哈勒敦家族是祖籍也门的阿拉伯人。自从征服塞维利亚之后，便定居于该地，在这次征服中他们起了政治作用。随后，他们先是移居到休达，在复土运动 *(reconquista)* 之后，又迁至伊弗里基亚。伊本·哈勒敦的祖先曾在波尼为阿布·扎卡里亚效力。其曾祖父是阿布·伊沙克的财政大臣，其祖父曾先后担任过阿布·法里斯驻贝贾亚的哈吉布、阿布·哈夫斯·乌玛尔的总理、阿布·阿西德的代理哈吉布以及阿布·叶海亚·阿布·巴克尔的宠臣。其父潜心于文学、马立克教派的法学 *(fikh)* 及敬神，1349年死于鼠疫。当时，伊本·哈勒敦年仅17岁，已在突尼斯受过良好教育。在马林王朝入侵期间（1347-1349年），许多学者云集突尼斯，伊本·哈勒敦受益于他们的教诲；此后他被任命为阿布·伊沙克二世的文书 *('alāma)*。当君士坦丁的埃米尔入侵伊弗里基亚时，他逃到伊斯兰世界西部，经历曲折多变的生涯，能够随机应变而又多心计。在非斯为马林王朝的阿布·伊南效力期间，他完成了学业，但因卷入谋反案件而遭到逮捕，身陷囹圄两年之久（1357-1358年）。出狱后他成为大臣办公室秘书，并受聘为阿布·萨里姆写颂文，此后又被任命为马扎林的法官。经过一系列的密谋，他动身前往格拉纳达住上几年，在那里受到他的朋友伊本·哈蒂布大臣的欢迎。1364年他出任驻暴君彼得所统治的塞维利亚的大使。次年他当上了贝贾亚的哈夫斯统治者的哈吉布，这位统治者不久即被其在君士坦丁的堂兄推翻，伊本·哈勒敦也于1366年献城归降。随后他不得不避难于达瓦维达阿拉伯人之中，又寻求比斯克拉的巴努穆兹尼族的庇护。他拒绝了特莱姆森素丹阿布·哈穆二世聘他为哈吉布的提议，声称他希望致力于研究学问；实际上他并未放弃政治。他力主突尼斯的哈夫斯王朝统治者与特莱姆森的阿卜德·瓦迪德王朝统治者结为反对贝贾亚的哈夫斯统治者的联盟，后来他又为非斯的马林王朝统治者招募阿拉伯人。

在中马格里布、非斯和格拉纳达历尽苦难之后，1375年伊本·哈勒敦出现于特莱姆 115

[49] 也可参阅本书第4章。

森，这里的素丹阿布·哈穆二世请他出使达瓦维达，他便借此机会隐退于提亚雷特附近的阿克拉·伊本·萨拉马，闭门四载，埋头于著作——即著名的《历史导论》(*Mukaddima*)。为收集资料以续成这一著作，1378年12月，在获得哈夫斯王族准许后，重返突尼斯，在这里一面执教，一面撰写这一巨著，后来他把此书副本献给了素丹。1382年，以法官伊本·阿拉法为首的一个秘密集团怂恿他前往麦加朝圣。此后，他在开罗度过了一生的最后时光；他在开罗一所大学任教，并几次担任相当于马立克学派大卡迪的官职。逝世前几年，他住在大马士革，那时大马士革正受突厥帖木儿的包围，因此有机会与蒙古征服者相接触。然而，伊本·哈勒敦的著作源于他在马格里布的经历，他从中受到鼓舞，提出了许多令人惊服的创见及结论。

《历史导论》是他以50年之观察与经验而深思熟虑的硕果。在撰写这部有关历史认识论的专著时，他意识到这是一门"新科学"——文明的历史。他的目的在于：理解并解释史料服从于特定法则的方式，详细阐述历史哲学。他考虑到两个基本因素：生活方式与部落文化。他把原始游牧生活与文明的城市生活加以比较。前者以氏族集团(*kabila*)和部落意识(*'asabiyya*)为基础，是建立新帝国和不断威胁已有政权的实际力量；后者，起初欣欣向荣，继而枯萎凋零，最终则在新的游牧势力下完全消失。在他看来，巴努希拉尔人的入侵与"大瘟疫"从根本上动摇了穆斯林世界西部人们的生活，因此他提到一个"新世界"观念。他的这种轮回演变观，既不是悲观的，也不是乐观的，但却是根据于他所观察到的事物的本性。这也适用于解释他的历史观：君主统治只能延续四代。

伊本·哈勒敦的思想，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现实主义，毫无先入为主之见而有其科学结论，简言之，即是现代性。因此，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位富有灵感的历史哲学家一直被誉为"全面的"历史学——社会经济、近代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先驱，虽然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他身上发现了他那个时代和环境给人们造成的许多特点。他的不朽之作，结构严谨，在以观察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和阐述及演绎必然法则的理性主义之间，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平衡；如果对它要作出不合时代的评论，那是一种亵渎。他的《历史》(*Kitāb al-'Ibar*)这一巨著，并没有采用他在《历史导论》序言中介绍的方法。与传统的穆斯林阿拉伯编年史完全不同，《历史》一书首先研究的是阿拉伯各氏族集团和他们王朝的历史，而后研究柏柏尔各部落和他们王国的历史。由于这个时代与作者关系密切，所以它包括了当时基本的史料文献。[15]

116

[15] 伊本·哈勒敦，法文译本，见J.库奥克(J. Cuoq)，1975年。



马里和第二次曼丁哥人的扩张

D. T. 尼昂

曼丁哥人由许多大小不等的部族群体组成，他们散居于苏丹—萨赫勒全境，即从大西洋沿岸一直到阿伊尔高原，包括贝林湾深处森林地带的一些地方在内。12世纪初，曼丁哥人的居住地还没有这样广，在加纳帝国极盛时，即11世纪末，曼丁哥人分为三大族群：第一个是索宁克人（萨拉科尔人），加纳的缔造者，基本上住在瓦加杜（阿乌克尔）、巴哈努、卡尼亚卡诸省区；南边有索索人，住于库利科罗山下，以索索城为首府；再往南则是马林克人居住的地方，称为曼德或曼丁，位于尼日尔河上游的康加巴与锡吉里地区之间。索宁克人又称马尔卡或瓦科尔（万加拉）人，他们创建的加纳帝国正是曼丁哥人扩张的最早表现。[①]据马哈茂德·卡蒂在《法塔史》（*Ta'rīkh al-fattāsh*）中所述，"马里帝国是在卡雅马汉王朝垮台之后建立的，其权力扩展到整个西部地区所有行省"。[②]就在加纳受到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不断攻击而趋于崩溃之时，索宁克人从瓦加杜故土大量外流，与尼日尔河两岸原有居民混合，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定居之地。为寻找金矿，他们又进一步南迁到森林地带边缘。人们普遍认为，杰内（15世纪时达到极盛高峰）原是索宁克人所建城市，那可能是在阿拉伯人到来之前很久。 117

这里，似有必要对杰内城的发展略加说明。近年来，人们对该城市及其周围环境的历史了解得越来越多。考古学家对其古代遗址"杰内－杰诺"的现场发掘研究，证明这个城市的发展并非由于9－10世纪之后阿拉伯人穿越撒哈拉的商业贸易所促成。事实上，杰内－杰诺的最早居民点可一直追述到公元前3世纪；它是由务农居民以及牧民和铁匠们建立的。[③]除了尼日利亚（包奇高原）之外，这个古城是那时在西非洲唯一证明有冶炼业的地方。大约自公元1世纪起，这个地方就开始种植稻谷，非洲谷种（*Oryza glaberrima*）的栽培可追溯到如此久远的时期，这有力地否定了那种认为非洲水稻来源于亚洲的理论。杰内－杰诺当时就是前后四周都延伸出许多小农庄的一个大城市，与尼日尔河 118

① "万加拉"一词在法文中是"旺加拉"（Ouangara），原是富拉尼人和豪萨人对曼丁哥人的称呼；"瓦科尔"一词一般是指索宁克或萨拉科尔人，而"瓦科尔"与"万加拉"属同一词源。人们又把科特迪瓦森林地带的曼丁哥人称之为"迪尤拉"人，在马林克语中，"迪尤拉"的意思是商人。"万加拉"和"迪尤拉"也是同义词，指从事商业的曼丁哥人。

② 马哈茂德·卡蒂（Mahmūd Ka'ti），法文译本，1964年。

③ 见R.J.麦金托什（R. J. McIntosh）和S.K.麦金托什（S.K.McIntosh），1981年。

和巴尼河两岸一系列大村庄紧密相连。[4]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在公元500年前后即已存在，因为在杰内－杰诺发现的那时期的一些铜器，只能是来自塔凯达一带的撒哈拉矿场。那时，该城面积扩展到最大的时候约计34公顷；1977年的考古发掘证明，杰内已有许多拥有众多人口的郊区。

人们为什么而又于何时离开杰内－杰诺而去杰内居住的呢？很可能是因为这座古城里以穆斯林为核心的商人想与众多的异教徒分开居住的缘故。大约在公元800年，这个城市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商业中心，与热带大草原和萨赫勒地区各国都有联系。杰内与尼日尔河三角洲的伊格博－乌库一样，也大量进口铜，然后用铜在南方交换黄金、柯拉果和象牙。[5]在杰内和伊格博－乌库发现的8世纪前的铜器表明，阿拉伯人只是进一步扩大了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万加拉人或迪尤拉人的商业活动始于阿拉伯人到来之前；战争和贸易使他们得以在各个方面广泛扩大自己的影响。

对于11世纪末昆比萨利赫陷落之后那个时期的情况我们了解不多。从1076年前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占领昆比，到1235年松迪亚塔取得军事胜利和建立马里帝国，这段时期关于西苏丹的文字资料，我们手头寥寥无几。第二次曼丁哥人扩张的时间与马里帝国兴起的时间相一致（见插图6.1）。马林克人各部落从他们在尼日尔河上游的基地向西发动的战争一直延伸到大西洋之滨；以后，他们在塞内冈比亚定居下来。14世纪时，曼丁哥商人将伊斯兰教传入豪萨地区，并继续向南扩展，甚至深入到森林地带；他们从那块地方尚未受伊斯兰教影响的人手中购买珍贵的柯拉果和黄金。这次曼丁哥人的扩张具有军事与和平双重性质。在豪萨人居住区和在南部地区扩张的代表人物是商人和伊斯兰教隐修士；而向西在塞内冈比亚，则首先是武装占领，然后才是大批商人和隐修士接踵而来，这样西部各省成了古曼德族的附属地。曼丁哥帝国在15世纪开始衰落。即便如此，向南部的扩张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与此同时马林克人还建立了不少贸易中心，其中最重要的是布龙或阿肯国的贝戈，该地盛产黄金。

我们的研究旨在确定曼丁哥人扩张的起始年代及其从13至14世纪的发展，辨明曼丁哥文明的基本要素。然而，有两个问题必须首先予以回答：一，12世纪初西苏丹的形势如何？二，昆比陷落之后，该地区民族和王国的分布情况如何？

12世纪西苏丹各王国和省份

加纳首都昆比萨利赫于1076年落入阿尔莫拉维德人之手。我们对12世纪苏丹的历史所知甚少。从1068年前后巴克里提供宝贵的资料之后，到1154年地理学家伊德里西撰写出他的报告，中间这段时间是一大空白。

虽然如此，由于西非洲诸国如今都已获得独立，我们能够借助于收集到的口头传说

[4] 考古学研究证实了《苏丹史》（*Ta'rikh al Sudan*）一书的叙述，杰内地区人口稠密，村庄相近，国王的命令只需在城墙上宣读，即可从一村传到另一村，两条河流沉积的淤泥特别肥沃，适于种植水稻。

[5] 见本书第14章第361－366页关于伊格博－乌库的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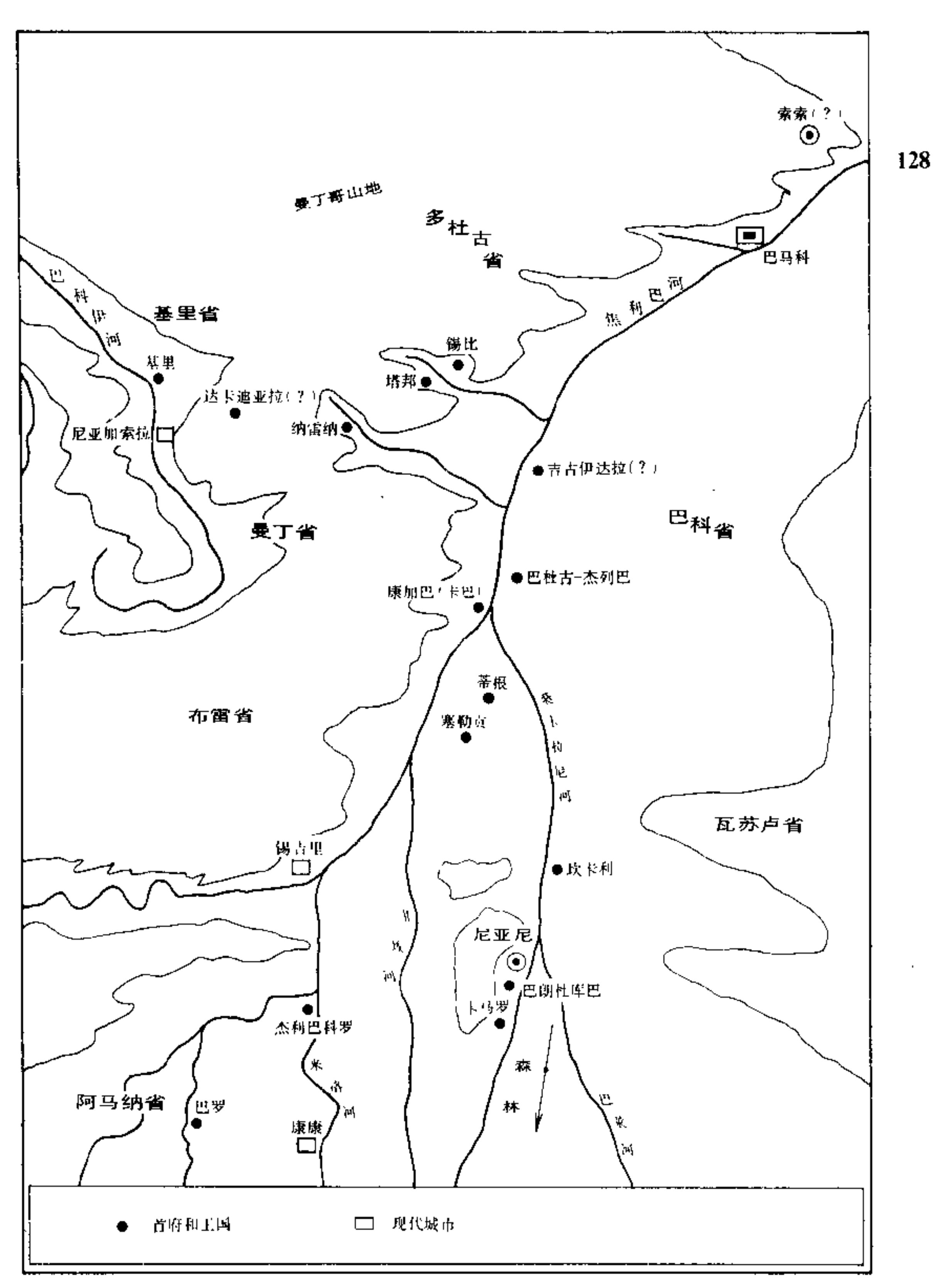

索索（？）
曼丁哥山地
多杜古省
巴马科
巴科伊河
基里省
焦利巴河
锡比
塔邦
基里
达卡迪亚拉（？）
纳雷纳
尼亚加索拉
吉古伊达拉（？）
曼丁省
巴科省
巴杜古-杰列巴
康加巴（卡巴）
蒂根
布雷省
瓦苏卢省
锡吉里
尼亚尼
巴朗杜库巴
杰利巴科罗
米洛河
森林
阿马纳省
巴罗
康康
巴莱河
首府和王国
现代城市

图6.1 古曼丁（D·T·尼昂）



120

图片6.1　昆比萨利赫：一个清真寺发掘出土的部分场景（该清真寺建于10－11世纪期间）

来了解昆比陷落后加纳的内部历史。[6] 以口头传说为依据的两部12世纪苏丹古典史书有几个重要的章节概括谈到了西苏丹。另外，考古研究也作出了越来越重要的贡献：昆比、奥胡达古斯特、尼亚尼的遗址20多年来一直是考古发掘的中心，这为进一步证实大部分口头传说提供了大量事实证据。[7]

塔克鲁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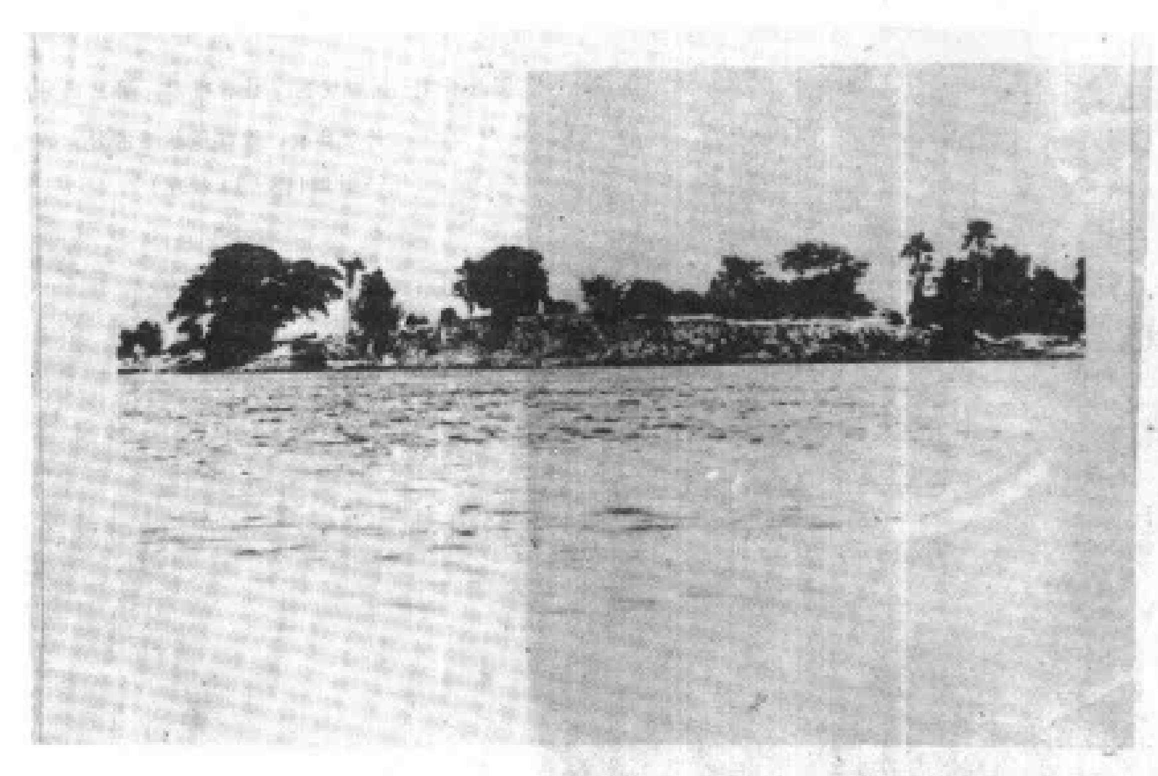
像曼德（曼丁）和塔克鲁尔这样一些最重要的省份，早在11世纪中叶就已摆脱了加纳的统治。[8] 塔克鲁尔的国王瓦尔贾比，作为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积极参加了阿尔莫拉维德人发动的圣战；他的儿子拉比或拉巴继续保持了与阿尔莫拉维德人的这种联盟，而且在1056年与他们共同作战反对戈达拉人。[9] 塔克鲁尔控制了塞内加尔河，实际上垄断了加拉姆的黄金生产，它还一度取代昆比成为一个贸易中心。伊德里西把塔克鲁尔

[6] D.西拉（D.Sylla），197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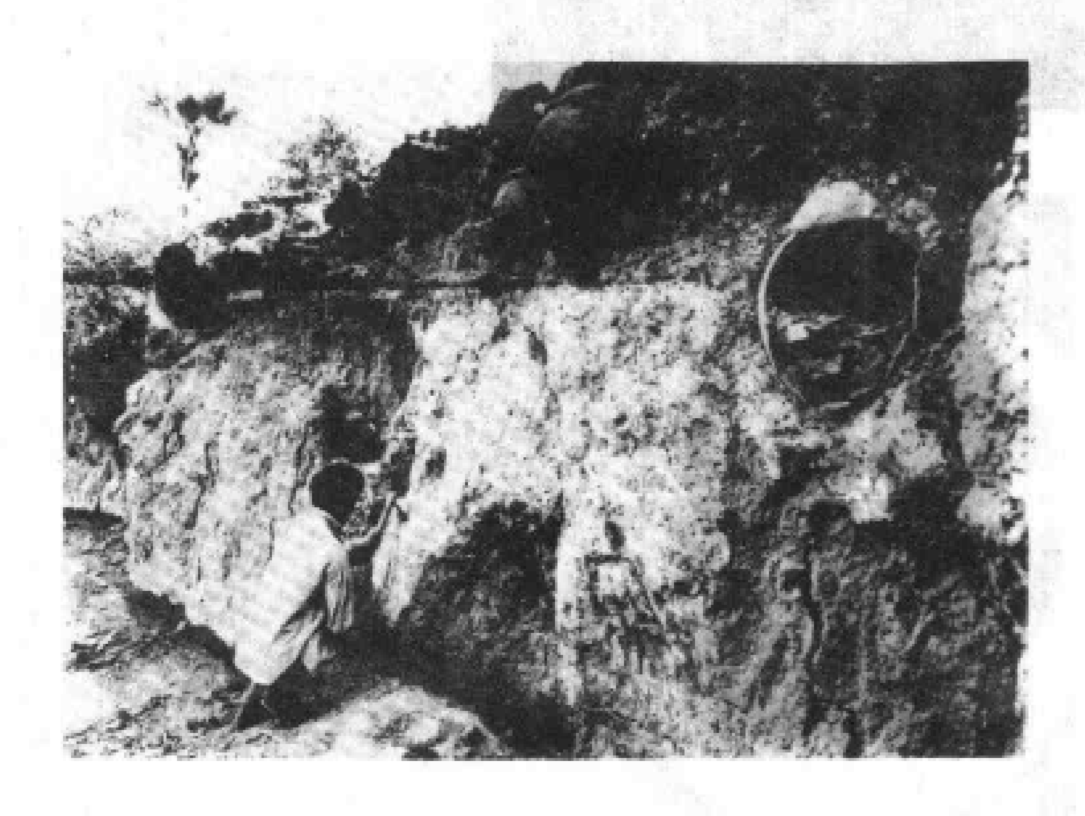
[7] D.罗伯特（D.Robert）、S.罗伯特（S.Robert）和J.德维斯（J.Devisse），1970年。

[8] 伊德里西（Al-Idrīsī），法文译本，1866年，伊本·赛义德（Ibn Sa'īd），见J.库奥克（J.Cuoq），1975年。

[9] 戈达拉人或格达拉人是桑哈贾－卡利拉柏柏尔人的一部分，他们原来住于撒哈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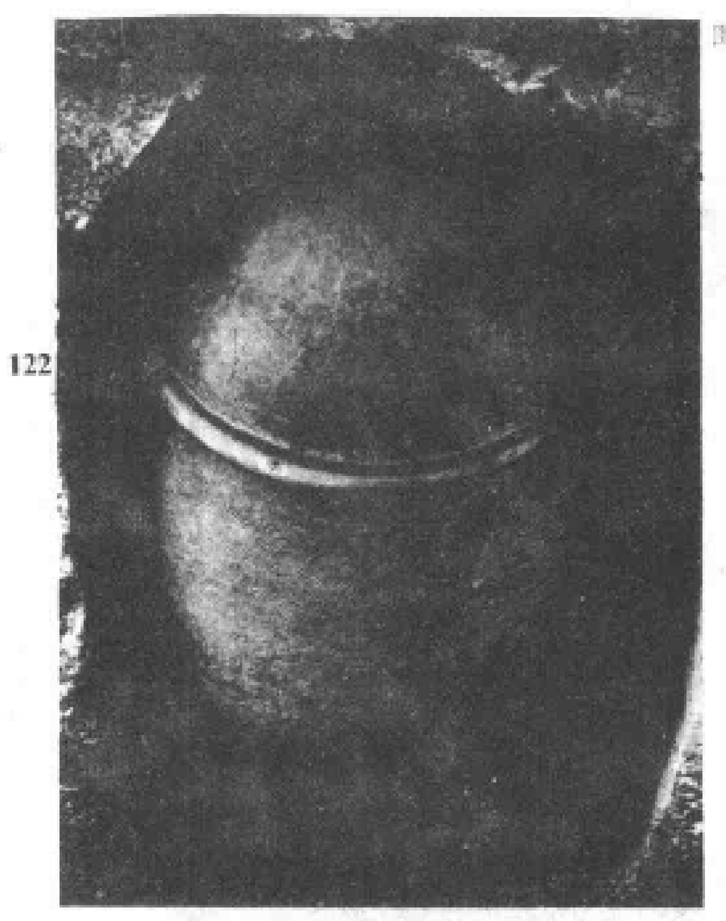


图片6.2 江古埃雷－加利亚：巴尼河对岸叉口处全景(从西面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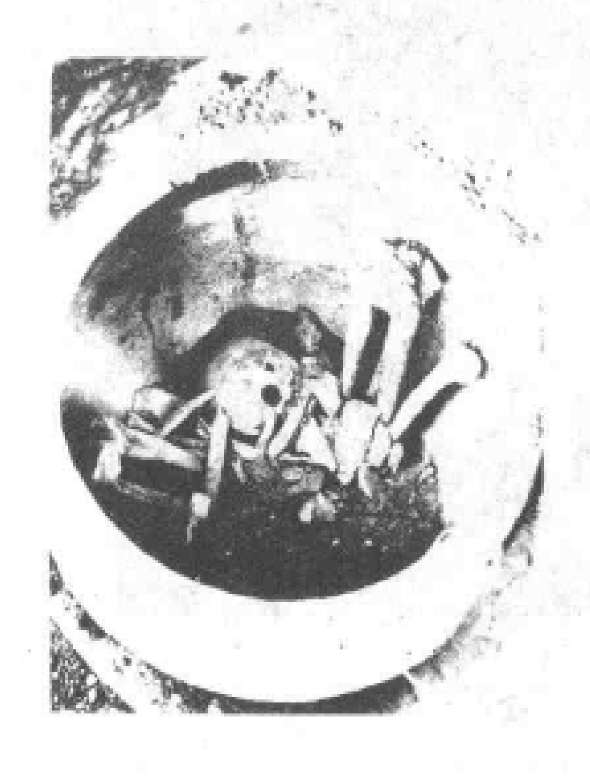


图片6.3 江古埃雷－加利亚：三个发掘面上的墓穴 第二时期(1600年－?)

122



图片6.4　托古埃雷-杜香维尔：第三部分，一个葬瓮，盖口用粘土密封。第一时期（13—14世纪）



图片6.5　托古埃雷-杜香维尔：第三部分，葬瓮内有一具成年人的骨骸，像是男性，呈蜷缩状。第一时期（13－14世纪?）

描述为12世纪的一个强大王国，它的权力扩张到了塞内加尔河，这是不容置疑的。它吞并了巴里萨城，而且控制了奥利尔的盐矿。继加纳之后，塔克鲁尔是12世纪阿拉伯人心目中最人所周知的王国。塔克鲁尔商人胜过加纳商人，因为加纳商人受到国内战争的牵制，这场战争使瓦加杜、巴库努、卡尼亚加和梅马这几个索宁克人省份遭到蹂躏。塞内加尔河可以一直通航到贡迪奥鲁（卡伊地区），这是一条方便的交通线，塔克鲁尔的商人利用这条航道远行到巴里萨，用奥利尔的盐换取黄金。[10]

日益可以证明，塔克鲁尔的全盛时期大约是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中叶之间。在索索国和马里国兴起之前，塔克鲁尔的经济居于领先地位。因此，阿拉伯人把整个西苏丹都称为塔克鲁尔也就不足为奇了。柏柏尔阿拉伯商人经常出入于桑加纳、塔克鲁尔和锡拉这些城镇，[11]昆比的陷落并没有中断黄金贸易，反而促进了它进一步发展，塔克鲁尔一度填补了昆比留下的真空。巴克里把它描述为一个大都市，与昆比一样，也有一个柏柏尔阿拉伯人居住区。但是，这个王国满足于在塞内加尔河流域扩大它的影响，并没有参加索宁克人和马林克人向索索人夺取霸权的斗争。 123

桑海

加纳并没有把它的统治权扩大到桑海。这个古王国早已与马格里布建立了联系：桑海国王们于1010年前后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吸引了许多柏柏尔阿拉伯作家和商人来到库克耶和加奥[12]。11世纪末，桑海人从库克耶出发，沿尼日尔河而上至登迪，他们占领了尼日尔河湾；之后，他们又将首都从库克耶迁至加奥。公元1100年前后，即伊斯兰教纪元回历5世纪末期，图阿雷格人马格查伦建立了廷巴克图。据《苏丹史》（*Ta'rikh al-Sūdān*）所载，"人们到这些地方来放牧牛羊……一开始陆路旅行者在这里就遇到了航海者"。[13]桑海人很快就占领了整个尼日尔河湾的土地；既然他们已立足于廷巴克图，这里便成了各地区商业交叉路口上的新中心，加奥国王们也决定尽量在这一地区起政治作用；他们向尼日尔河内三角洲扩张势力，正好证明了实行这种政策的决心。但是，他们的时机尚未来到。

索宁克人各省份

昆比的陷落，引起了一系列的战争和索宁克人的大规模迁徙。在昆比落入阿尔莫拉

[10] 伊德里西，前引著作；也见伊本·赛义德，前引著作，第201—205页。

[11] 巴克里（Al-Bakrī）、伊德里西和伊本·赛义德都提到过塔克鲁尔、桑加纳和锡拉这几个城镇，但目前人们对这些埋于沙漠之下或毁于战火之中的城镇的遗址还没有进行过任何重要的考察研究。巴克里著作的译本相当陈旧，但今天人们再次参看此书，仍然可以认出一些地方和民族的名称，可是桑加纳、塔克鲁尔和巴里萨这几个城镇的位置，迄今尚不能断定是在塞内加尔河沿岸。

[12] 参见《非洲通史》第3卷第3章。扎-科索伊国王于1010年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一个穆斯林：见萨迪（al-Sa'dī），法文译本，1964年，第5页。巴克里提到库克耶或加奥时说："那里的居民是穆斯林，运往该地的商货主要是盐、玛瑙贝、铜和大戟"。引自J.库奥克（编），1975年，第365页。

[13] 译自萨迪，前引著作，第36-37页。

维德人之手前，有许多穆斯林已经隐身于当地商人之中。巴克里记述了一个与皈依伊斯兰教的国王关系十分密切的人的情况："阿卢肯城……有一个名叫坎默尔的统治者，他是'贝西'（国王）的儿子。据说他是个穆斯林，但他隐瞒了自己的宗教信仰。"[34] 我们不应忘记，早在 8 世纪，加纳与马格里布已经有了贸易关系。柏柏尔阿拉伯穆斯林在宫廷里占有重要位置；[35] 而人民大众一般仍忠实于他们自己的古老传统宗教信仰。错综复杂的斗争，经常使一个省份反对另一个省份，而在各省内部，氏族与氏族之间也经常以兵戎相见。

124

瓦加杜中央省被内乱搞得四分五裂；有一些仍忠实于古代习俗的索宁克部族群体被迫逃离本土而定居于梅马省；[36] 类似的斗争也使卡尼亚加省的居民分裂。马哈茂德·卡蒂写道：

> 卡尼亚加省有一古老而重要的城市，它很早就在扎拉王国建立，而且是扎拉的首府；当时该城名叫萨因登巴，它是迪亚富努族（通常称为迪亚富农克人）的主要城市。它在卡雅马汉统治时期就已存在，但该王朝衰亡时也在战乱中遭到破坏而变成一片废墟。
>
> 扎拉王国是在卡雅马汉帝国灭亡之后建立的。帝国的有些居民迁移到库萨塔，他们也就叫做库萨人。其余部分移居扎拉，以后被卡尼亚加的法林所征服，他占领了扎拉王国，并制服了远至图图蒂、提希特、塔卡纳卡的阿拉伯人。[37]

扎拉（迪亚拉）王国为争夺霸权而与索索人发生冲突，随即大肆扩张。

索索人的霸权

索索人占优势的时间很短，那是 1180-1230 年间。12 世纪末，索索人曾经在坎特王朝的领导下，奋起反抗穆斯林。

索索人

索索人是马林克族的一部分；据传说，他们的首府索索城遗址是在库利科罗地区，即在巴马科以北 80 公里外的山区。[38] 但是，直到今天，这个遗址还没有像加纳和马里的

125

[34] 译自巴克里，前引著作，第 335 页。

[35] 见《非洲通史》，第 3 卷，第 3 章。

[36] N. 莱扶济昂（N. Levtzion），1973 年，第 46-49 页；C.蒙泰伊（C.Monteil），1929 年，第 353 页。

[37] 译自马哈茂德·卡蒂，前引著作，第 70-71 页；参阅 C.梅拉苏（C.Meillassoux）、L. 杜库尔（L. Doucouré）和D. 西马加（D. Simagha），1967 年，第 9 页关于库萨的论述。

[38] 索索城居民称为索索人。索索人是马林克族的一支，区别只在于马林克族和他们的国王信仰伊斯兰教，而索索人敌视这种新宗教，他们仍保持祖先的传统。

那样得到考古研究。实际上，索索人只是马林克族的一个氏族，他们擅长于铁器铸造。从 13 世纪中叶以后，这一支炼铁为业的氏族就已明白显示出拒绝伊斯兰教的倾向，他们开始夺取索宁克人的件地。[19] 据传说，迪亚里索的索宁克氏族早在昆比城陷落之前就已经脱离加纳而独立：坎特人当时统治索索人和卡尼亚加人，并建立一个王朝。索索人的国王凯莫科将卡尼亚加和索索人合并为一个王国，直到 12 世纪末期。他的儿子苏马古鲁（苏马奥罗）·坎特继位后，继续其征服事业。

苏马古鲁·坎特

根据曼丁哥人的口头传说，苏马古鲁·坎特（1200-1235 年在位）有军事征战的丰功伟绩。[20] 据说，在征服索林克人各省份之后，苏马古鲁便向曼德进攻，曼德的国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苏马古鲁曾 9 次"攻破"或洗劫曼德城，每次作战之后，马林克人都能重整军队进行反击。[21] 曼德国王纳·法·马汉死后，他的长子丹卡伦·图曼主张与索索人讲和，以为这是比较明智的对策。为表明诚意，他把自己的妹妹纳纳·特里班公主嫁给了苏马古鲁。此后，索索人的统治权扩大到加纳王国曾经控制过的各个省区，唯一例外是曼丁。口头传说特别提到苏马古鲁的残暴特性，他在曼丁实行恐怖统治，使"人们不敢聚谈，唯恐谈话内容让国王得知"。苏马古鲁还掌握魔法，他的魔力与征战本领一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作为一个魔法师或男巫，他令人畏惧，被称为巫王。[22] 据推测，"巴拉风"（一种木琴）和"丹"（猎人中的史诗吟唱者或赞颂歌手所用的一种四弦琴）就是他的发明。 126

在坎特人铁匠中征询传说，又了解到苏马古鲁另一方面的形象：苏马古鲁想要取缔索宁克族的奴隶贩卖，但这种贩奴活动是在马林克人纵容下进行的。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苏马古鲁都是伊斯兰教的强悍敌人，他一手征服和处死过 9 位国王。这个巫王的苛捐杂税政策引起了"曼丁卡"再次反叛，他们呼吁曼德国王丹卡伦·图曼来掌权，他却害怕苏马古鲁的镇压，因而逃进南方森林；虽然他在那里建立"救世城"基西杜古，但还是出现了权力真空。反叛者后来又吁请纳·法·马汉的次子松迪亚塔出来领导，当时他还

---

[19] N. 莱扶济昂，1973 年，第 51 页。

[20] 依据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提供的各朝国王统治年代长短资料，M.德拉福斯（M. Delafosse）编出了马里王国的年表：这个简略的年表截止于马汉三世登基的 1390 年，此后不久，伊本·哈勒敦的名著《历史》（Kitāb al-I'bār）一书问世。

[21] 关于苏马古鲁的传说，见 M.德拉福斯，1913 年；C.蒙泰伊，前引著作；D.T. 尼昂（D.T.Niane），1960 年；第一次巴马科国际讨论会，1975 年；G. 英尼斯（G.Innes）（编），1974 年。

[22] 见第一次巴马科国际讨论会资料，1975 年。西非商业公司（SCOA）基金会研究人员从基里纳一名"格里奥"（*griot*）瓦·卡米索科处收集到一个传说：苏马古鲁开始仅仅只是想把索宁克族奴隶贩子驱逐出他的王国，但是马林克人反对索索族的这项建议。人们认为，进一步研究各个秘密会社和各个猎人兄弟会的情况，肯定还能收集到更多有关这一时期的可靠资料，因为这些秘密团体像服务于马里王公的"格里奥"的后代一样，都是非官方的口头传说的保存者。附注：这里仍使用法文 *griot* 一词，指传统的史诗吟唱者（班巴拉语中叫做"迪埃利" *dieli*），虽然有时会引起误解。如须充分了解 *dieli* 或 *griot* 的原义及译者的解释，可参阅《非洲通史》第 1 卷中 A.哈姆帕特·巴（A. Hampatē Bā）所写的第 8 章，特别是其中的第 187 - 192 页。

在梅马流放。[23] 这里，在叙述年青王子松迪亚塔的征战和胜利之前，让我们先简单地谈谈马里帝国的心脏——曼德的情况。[24]

松迪亚塔统治时期之前的曼德

文字资料

最早在书面资料上提到马里的是巴克里，他称这地区为马勒尔（Malel），他同时提到12世纪的铎（Do）王国。

> 阿杰姆的黑人，人们称之为农加马塔〔万加拉〕人。他们是生意人，从伊尔塞尼获得金粉，然后转卖到其他地区。面向这个城市，在塞内加尔河对岸有一个幅员广阔的王国，穿越其境需8天行程，那里君主的称号叫多乌（Dou），臣民都用弓箭作战。在这王国的另一边是马勒尔，其君主的称号为穆斯林马尼（al-Muslimani）。[25]

一个世纪之后，伊德里西也提到巴克里所说的上述情况，还增加了一些有趣的细节。据他描述，在巴里萨（即巴克里所说的伊尔塞尼）之南有一个拉姆-拉姆国，经常受到掠取奴隶的塔克鲁尔人和加纳人的袭击。这位阿拉伯地理学家也提到两个城市：马勒尔和铎，两者之间相距约4天路程。[26]

127 上述两位学者都谈到马勒尔（或曼德）和铎，认为这是两个政治实体，同时又都提到万加拉的商人。有趣的是伊德里西还提到加纳人和塔克鲁尔人劫掠异教徒，把他们变卖为奴隶；在伊德里西的记述中，拉姆-拉姆人以烙印或刀印纹面，这些细节同样见于他对尼日尔河上游和塞内加尔河居民的描述。[27]

口头传说资料

这种资料告诉我们该地区的一些内幕史料。这是历经20年，走遍整个热带大草原才收集到的。曼丁哥地区，包括康加巴附近的凯拉在内，有许多口头传说传授中心（或“学校”），由迪亚巴特氏族的“格里奥”们主持；尼亚加索拉、杰利巴科罗、凯塔和法达马

[23] D.T.尼昂，前引著作。

[24] 为避免引起混乱，本章中“曼德”一词是专指原来马林克人的核心部分。“曼丁哥”一词则是指语言上与索宁克和马林克人有联系的所有部落。在几内亚、马里、塞内加尔、几内亚-比绍、科特迪瓦、上沃尔特、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地都有曼德语族，虽然族名不同。这种由一个中心向外扩散的现象，发生在12-19世纪之间。

[25] 译自巴克里，前引著作，第33页。在这段记述中，他还描述了住在王宫里的一个穆斯林客人使曼德国王皈依伊斯兰教的情况。

[26] 伊德里西，前引著作，第132页。

[27] M.德拉福斯，前引著作；C.蒙泰伊，前引著作，第320-325页。“马勒尔”，或“马里”，指的是马林克族在建立马里帝国时对他们的核心地区所用的名词。

（见插图6.1）。[28]主持这些学校的“语言大师”们（贝伦蒂古伊，*Belen-Tigui*）所传授的是马里历史全书丰富多采的变形，全都集中于松迪亚塔个人的传说故事。马里历史起源的基本要点以及马里帝国创始人的显赫武功在各校反复传颂，所不同的仅仅只是多一点或少一点细节而已。

上述资料证实，当初确实存在两个独立王国，即铎王国和基里（或曼德）王国，“曼德”一词，后来用以称呼整个马林克人地区。铎王国（也称多杜古）的居民包括孔德氏族各部落；基里（曼德）王国位于南方，是科纳特氏族和凯塔氏族的住地。卡马拉氏族有两个主要城市：锡比和塔邦，他们逐渐征服了尼日尔河右岸地区；特拉奥雷氏族据有基里的一部分，但他们大部分仍住在后来称为甘加兰省的境内。

强大的多杜古王国拥有12座城市，只是口头传说中没有提到它们的名称。尼日尔河右岸（巴科或马尼）有4座城市。[29]历史传说证实了文字资料的记载，那里至少有两个王国，——铎和马勒尔（或是口头传说中的基里）。马勒尔统一全境，“铎”这一国名从此消失。据巴克里说，马勒尔国王在昆比陷落之前即已皈依伊斯兰教，而伊本·哈勒敦则进一步提供这位国王的名字，叫贝雷蒙丹纳（或是塞雷蒙丹纳）。[30]他在曼丁哥国王世系表中，可认定是贝雷蒙（曼萨），——这份世系表是马萨·马坎·迪亚巴特在基塔收集到的。[31]尼日尔河上游的这些小王国，都是在11－12世纪间被凯塔氏族的国王们兼并统一的。据伊本·哈勒敦所述，国王贝雷蒙丹纳皈依伊斯兰教，曾去麦加朝圣。由此可以推断，当时铎和基里已经合并为一个王国，或者是“马勒尔”十分强大，可以支持国王远行去麦加。 129

创建马里国家的凯塔氏族，自认为是比拉利·布纳马（或比拉尔·伊本·拉巴赫）的后裔；相传此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忠实仆从，是穆斯林社会的第一位宣祷师，他的儿子拉瓦洛住在曼丁，建立了基里（基）城。[32]拉瓦洛有一子，名叫拉塔尔·卡拉比，后者

---

[28] 在今马里共和国距康加巴10公里的凯拉村，就有一些格里奥还保存着凯塔王室的口头传说。每过7年，凯拉村的迪亚巴特氏族都要举行一次重建“卡加巴的卡马布隆”（茅屋礼堂）的仪式，他们在举行这种节庆典礼时总要回顾松迪亚塔的事迹和马里帝国的起源故事。基塔是口头传说的另一传授中心。当地格里奥家族的成员马萨·马坎·迪亚巴特已将有关他著名叔父凯勒·蒙松业绩的传说收集和记述下来；见M.迪亚巴特(M. Diabaté)，1970年。在几内亚境内有两处口头传说传授中心，一处是尼扬当河畔的法达马，由孔德族的格里奥主持；另一处是杰利巴科罗。在尼亚尼也可收集到口头传说，当地的凯塔村正好坐落在几内亚古都的遗址上。在塞内冈比亚，由格里奥传授历史；他们除传颂松迪亚塔的传奇故事之外，还十分重视宣扬他手下名将蒂拉马汉·特拉奥雷的事迹，是这位名将征服了这些地区，因而他被认为是冈比亚河与里奥格兰德河之间的加布王国的缔造者。

[29] 可以引用一首歌谣：

Do ni Kiri	铎和基里
Dodugu tan nifla	多杜古，12城市之邦；
Bako dugu nani	巴科，4座城市的王国。

C.蒙泰伊，前引著作，第320－321页，认为这两个王国即北马里和南马里，而后者在松迪亚塔统治时期发展成为马里帝国。凯塔氏族的发祥地在曼德山区，周围城镇有：达卡迪亚拉、纳雷纳、基里。甚至如今几内亚境内，锡吉里地区仍有一个省份称为肯代（曼德）。富拉尼人称曼德为马里；柏柏尔语则称为迈里特(Mellit)。

[30] 伊本·哈勒敦；引自J.库奥克，1975年。

[31] M.迪亚巴特，前引著作。

[32] N.莱扶济昂，1973年，第53－61页；C.蒙泰伊，前引著作，第345－346页。在苏丹各国宫廷中，承认来自东方的穆斯林祖先是常见之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凯塔氏族所承认的并非白人祖先，而是一个阿比西尼亚的黑人，即比拉尔·本·拉巴赫。关于基里城，基（*Ki*）字原意为工作业绩，凯勒·蒙松在歌颂其起源和业绩时唱道：“一开始就有功和业。”见M.迪亚巴特，前引著作，第9页。

之子名叫拉希拉图尔·卡拉比，这才是第一个去麦加朝圣的曼德国王。他的孙子名叫马马迪·卡尼，是"杰出的猎手"。正是马马迪把凯塔王国的权力扩大到铎、基里、巴科和布里。上述国王大多是身强力壮的狩猎好手。实际上，曼德王国的第一支军事力量很可能是由猎手们组成的。[33] 直到最近，在马林克人住地，猎手们仍组成一种紧密的集团，据信他们对丛林和森林秘密十分熟悉。"西姆邦"（*simbon*，狩猎能手）的称号，从来是人们花尽心力所追求的。据传说，猎手们是各村社最初的保卫者。马马迪·卡尼将他们组成一支军队，他同时巡访了所有氏族——卡马拉、凯塔、科纳特和特拉奥雷。马马迪·卡尼的统治年代，大约是12世纪初。他有4个儿子，其中一个名叫"西姆邦"巴马里·塔格诺戈凯林，后者的儿子叫姆巴利·涅内。后者的曾孙名叫马汉·康·法塔（或法拉科·马汉·凯格尼，又名纳·法·马汉），他正是马里帝国征战创建者松迪亚塔的父亲。马汉·康·法塔统治时是13世纪初，索索人在坎特王朝的统治下已将他们的扩张事业推向最高潮。他死后，他的长子丹卡伦·图曼继承王位，但是，索索国王苏马古鲁兼并了曼德。

130

传说在松迪亚塔之前有16个国王。[34] 他的先辈的世系表，因各学校传授不一而有差异：据基塔的凯勒·蒙松所提供的世系表，其中有位曼萨名叫贝雷蒙：正如前文所说，很容易认出他就是伊本·哈勒敦提到的贝雷蒙丹纳。锡吉里的口头传说提到拉希拉图尔·卡拉比的名字，并且说他是第一个去麦加朝圣的曼德国王。无论如何，所有传说都强调前几代国王是优秀的猎手，或称"西姆邦"，而且还都指出伊斯兰教早已传入曼德。

猎手们在马里国家的起源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松迪亚塔的母亲，就是由特拉奥雷氏族的猎手们许配给马汉·康·法塔的。[35] 这些氏族的成员原来控制着一片广阔的地区，即布雷西北部的甘加兰，就在法拉科·马汉·凯格尼执政前不久，这地区被并入曼德。

马林克各氏族的联合

丹卡伦·图曼统治时期，马林克人再次起来反对苏马古鲁。正如前文所述，那位国王逃入森林。于是，马林克人便请求他的兄弟松迪亚塔出来领导斗争。曼丁和索索之间的战争发生在1220至1235年期间

松迪亚塔的业绩

如果伊本·巴图塔在1353年，伊本·哈勒敦在1376年未曾在他们的作品中谈到这位伟大的征服者，很可能欧洲的历史学家们还会认为松迪亚塔此人只不过是一个神秘的传奇人物，口头传说把他在马里历史上的作用说得实在神乎其神。

---

[33] D.T. 尼昂，前引著作，第14－17页。
[34] 同上。
[35] Y.西塞（Y.Cissé），1964年，第175－176页。

> "在这些君主中最强有力的是那位征服苏苏人（索索人），占领他们的城市，夺取他们最高权力的国王。人们称他马里－迪亚塔，马里（Mari）在口语中是埃米尔的意思，迪亚塔（Diata）意为狮子，我们尚未发现这位国王的家谱，但已得知，他统治了整整 20 年"。[36]

131

伊本·哈勒敦的记载是可靠的。他也是唯一报道了苏苏（索索）人情况的作者，他们当时是索宁克人和马林克人居住地区的统治者。

但是，我们对松迪亚塔又究竟了解多少呢？文字资料几乎没有，口头传说又往往夸大他的业绩。[37]他的童年相当坎坷，长期腿瘸，他的母亲索戈隆·孔德因而受到国王其他妻妾的嘲讽。但一旦恢复行走能力，他便成了同年龄组人的领袖；由于受到丹卡伦·图曼的迫害，他不得不与母亲和弟弟曼德·布加里（阿布·巴克尔）一起逃亡。[38]这次逃亡，（或称 *nieni na bori*）经过许多岁月。当时，没有一个马林克酋长敢给他提供栖身之所，因此，他只得去了加纳。他在昆比受到热情的接待；但最后还是与母亲和弟弟在梅马定居下来。梅马的国王（曼萨）通卡拉（或梅马的法林通卡拉）很欣赏这位年青"迪亚塔"的勇气，委他以要职，曼丁哥的信使就是在梅马找到他的；国王送给他一支军队，并送他返回了曼德。

基里纳战役

松迪亚塔到来的消息极大地激发了马林克人的热情。所有氏族都组织起自己的军队。主要将领，如塔邦·瓦纳（塔邦·加纳），都是与他同龄的年青人。塔邦·加纳（或瓦纳）是卡马拉氏族部分成员的首领，他的堂兄锡比（位于锡吉里和康加巴之间）的卡马迪安·卡马拉，则是卡马拉氏族另外那部分成员的首领。法奥尼·孔德、西亚拉·库曼、科纳特和帝拉曼，所有的将领都同意为共同的事业而团结战斗。于是，他们缔结联盟，与松迪亚塔会师于锡比平原，并推举他指挥军事行动。

132

在尼日尔河右岸的尼亚尼、塞勒古古和蒂根，卡马拉氏族各村庄率先揭竿而起；他们在卡拉·诺罗曼萨的领导下进行了反抗苏马古鲁的战斗。苏马古鲁在马尼的大捷应归功于总指挥、其侄法科利。卡拉·诺罗曼萨的军队身披铁甲，战斗十分惨烈。但是，他的王后把他出卖给了法科利。

为庆祝胜利，苏马古鲁在马尼举行盛大庆典；其间他与法科利大吵一场，因为他十

---

[36] 译自伊本·哈勒敦，前引著作，第 344 页。

[37] 自出现《松迪亚塔——曼丁哥的史诗》（*Soundjata, ou l'épopée mandingue*）之后，口头传说的收集工作系统化了。参阅 G.英尼斯，前引著作，他在塞内冈比亚收集到有关松迪亚塔生平事绩的三种传说。另见 S.M. 西索科（S.M.Cissoko），1981 年（a）、和 1981 年（b）；M.莱-塔勒（M.Ly Tall），1977 年和 1981 年；西非商业公司（SCOA）研讨会资料，1975、1977、1980 年；桑戈尔基金会卡布口头传说研讨会的资料，1980 年。

[38] D.T. 尼昂，前引著作，第 56－73 页。除少数例外，各个口头传说传授"学校"所传颂的松迪亚塔生平事迹在主要点上是一致的：他童年的坎坷经历，他逃亡到梅马，派遣信使去寻找他，他随之归国，各氏族酋长联盟和宣誓，苏马古鲁被打败和逃匿失踪，松迪亚塔得到拥立成为曼萨。

分欣赏侄媳凯莱雅·康康的烹调技术，竟把她从法科利手中偷抢过来。受辱的法科利要施行报复，便带兵越过尼日尔河，加入了锡比联盟军。苏马古鲁失去了最得力的将官，但仍然发动进攻；在两次未决胜负的战斗之后，马林克军队士气大振。相传两军决战于基里纳。这处村落的位址很难肯定，因为在口头传说中它建立不久；据说，苏马古鲁拥有一支大军，但其人数多少也很难说得清楚。他的将领中有一位乔洛夫族的国王，名叫乔洛芬曼萨；此人原是基塔的通卡拉人的首领，相传是一个大魔法师。苏马古鲁的骑兵久负盛名，其攻势很难抵挡。

但是，松迪亚塔军队的士气很盛，联盟军的将领们也信心十足。松迪亚塔的妹妹纳纳·特里班曾被迫嫁给苏马古鲁，此时已设法逃出索索而加入到松迪亚塔的军队中来，与她同来的还有凯塔王室的“格里奥”巴拉·法塞克，他掌握着破坏苏马古鲁力量的诀窍。在古代非洲，魔法可以用于一切事物。苏马古鲁刀枪不入，他的图腾（*tana*）是一只白公鸡的趾。据说，由于他妻子和“格里奥”的逃离，他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泄露，临阵萎靡不振，缺乏指挥军队的傲然神情，但又压住心中的不安；战斗开始后，索索人一败涂地，松迪亚塔一直追逐敌人到库利科罗，只是未能捉到苏马古鲁本人。他的军队攻占索索，该城夷为平地。

基里纳战役的胜利，对联盟军而言，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而且在政治上加强了民族之间的结盟。这次使用魔法和拜物信仰的战争保证了凯塔王朝的胜利，但它也是伊斯兰教扩张的序幕。就松迪亚塔而言，其先辈在11世纪时已皈依伊斯兰教，这时他就俨然以穆斯林世界的保卫者自居；当初派出去寻找他的那个代表团中就包括伊斯兰教隐修士。13世纪的阿拉伯学者并没有在作品中提到那位伊斯兰教隐修士的姓名，基里纳战役也未载入阿拉伯编年史籍。然而伊本·巴图塔告诉我们，是一位名叫穆德里克的人劝说松迪亚塔（马里·迪亚塔）皈依伊斯兰教的，此人的孙子曾在穆萨曼萨的宫廷里生活过[⑳]。口头传说只提到马林克人的救星。

松迪亚塔的军事征战

在几位优秀将领协助下，松迪亚塔几乎完全占领了以前加纳统治下的地方。口头传说留下了蒂拉马汉·特拉奥雷和法科利·科罗马两人的名字。前者由松迪亚塔派往乔洛夫与国王乔洛芬曼萨作战，因为这国王逮捕了“迪亚塔”派出购买马匹的一个商队。打败这国王之后，蒂拉马汉又在塞内冈比亚进行战争，占领了卡萨芒斯和卡布（加布）高原，即现在的几内亚-比绍。西曼丁哥人把蒂拉马汉看作是几个王国的创建者，其中最

⑳ 伊本·巴图塔（Ibn Battūta），法文译本，1966年，第63页。

重要的是卡布王国。[40]法科利·科罗马占领了伸向森林地带的南部地区和塞内加尔河上游地区。[41]松迪亚塔本人则战胜了苏曼古鲁的同盟者迪亚汉（迪亚富努）王和基塔王。这样，他恢复了西苏丹的统一。他的儿子和将领们继承他的事业，兼并了加奥和塔克鲁尔。

马里帝国制宪经过

曼丁哥人的口头传说，将习惯法和禁律的制定归功于基里纳战役这位年青的胜利者；这些习俗和禁律至今仍一方面约束着曼丁哥各氏族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约束着他们与西非洲其他氏族的关系。甚至有许多后来才发生的事情也都说成是这位非洲亚历山大的功劳。但马里帝国宪法的制定和行政结构的主要轮廓却确是出于松迪亚塔之手。他有许多名字：在索宁克语中他被称为马汉或松迪亚塔王；在马林克语中他被称为马里（君王）-迪亚塔（狮子）。他还曾被人称为纳·马汉·科纳特或科纳特王，意为纳·马汉之子；又称西姆邦萨拉巴，即狩猎能手，或猎手首领，为此而受到尊敬。

134

据传说，那次格巴拉（制宪大会）是在离康加巴不远的平原上一个叫库鲁坎 富加的地方召开的。实际上，那是联盟军在其取得胜利之后不久召开的一次制宪会议，大会通过了以下几项决定。

（a） 大会庄严宣告松迪亚塔为曼萨（在马林克）或马汉（在索宁克），意为皇帝，即王中之王。联盟军各个首领在本省的称号（法林）都得到认可；只有梅马和瓦加杜两地的首领享有国王的称号。

（b） 大会规定，皇帝必须从松迪亚塔家族世系中产生；各王子必须永远不变地从孔德氏族中选择自己的第一位妻子（以纪念纳·法·马汉和松迪亚塔之母索戈隆·孔德的幸福婚姻）。

（c） 依据古代传统，采用兄位弟继的继承制度（fratrilineal）。

（d） 曼萨也即最高审判者、全族之长、所有臣民之父；因此全国民众用“姆－法－曼萨”（M'Fa Mansa，“国王、我父”）称呼国王。

（e） 马林克人及其同盟者分成16个“佩带箭袋”的自由民氏族或贵族集团

---

[40] 在松迪亚塔的传奇事迹中，关于乔洛芬曼萨一节相当重要。乔洛夫国王曾与苏马古鲁结盟，和他一样对伊斯兰教持敌视态度。这国王没收“迪亚塔”的马匹，只还他一块马皮，说让松迪亚塔用这块马皮做鞋穿，因为他既不是猎手也不是一个配骑马的国王。松迪亚塔对此十分震怒，闭门多日不出。重新出现后便召集将领们，命令他们出兵攻打乔洛夫。蒂拉马汉请求独自带兵前往，说召集全军没有必要。他坚持己见，并以死相谏，于是，“迪亚塔”答应了他的请求，并给他一个团的兵力。蒂拉马汉征服了乔洛芬曼萨，占领了塞内冈比亚和卡布，他的业绩今天仍为卡布的格里奥在木琴伴奏下以长诗形式歌颂。今天，有几个卡布村庄都声称是蒂拉马汉的安葬之地。但有些甘加兰传说则说乔洛芬曼萨的这位征服者事后返回了马里。（见S.M. 西索科，1981 年（a）和 1981 年（b）；和M.莱－塔勒，1981 年）。冈比亚河上游和塞内加尔东部的口头传说尚待收集；就了解曼丁哥人向西扩张的情况而言，这些地区有十分重要的遗址和城镇。

[41] 法科利·科罗马的后代是西索科氏族、敦布亚氏族和科罗马氏族；他的征战业绩和人们对他的崇拜，可在当今几内亚共和国诺拉索巴地区的科罗马村中见到。曼丁哥人一般保留小型博物馆专供少数知识分子和有特权的人参观。一些古老的遗物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Tonta-Djon Tanni Moro*)。[62]

（f）　包括图雷人和贝雷特人在内的5个伊斯兰教隐修士氏族是松迪亚塔联盟的首批成员：他们曾在松迪亚塔流亡期间积极寻找他，因此，他们被宣布为5个"伊斯兰信仰的捍卫者"（*Mori Kanda Lolu*）。这一集团还包括瓦加杜的西塞氏族，他们已皈依伊斯兰教，并且也是松迪亚塔政治上的同盟者。

（g）　从事特殊行业的有4个氏族(*Nara Nani*)，其中有格里奥氏族、鞋匠氏族和铁匠氏族。大会承认，各曼德氏族的名称可与苏丹地区各族群名称相一致出现了"谐趣关系"(joking relationships)，这种关系在松迪亚塔时代之后继续存在，对缓和族群间的紧张关系起了有益的作用。[63]尼日尔河上的船民，索莫诺人和博佐人，由于对战争有贡献也受到了嘉奖，松迪亚塔宣布他们为"江河主人"。口头传说赞扬松迪亚塔"划分了世界"，换句话说，他确立了各个氏族的权利与义务。

135

（h）　对索索人采取了特殊措施。他们的领土被宣布归帝国所有，并将他们分成不同的行业氏族或种姓。他们中许多人迁移到了西部。

这次制宪会议十分重要，而且意义深远。它再现了加纳帝国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每个地区的特点都得到了承认。此外，松迪亚塔制定了行业氏族制度，这样各行各业就变成世袭的了。似乎在加纳时代，每个人都从事他所选择的职业，但从此时起，儿子必须从事与他父亲同样的职业，特别在那4个行业氏族或种性中情况更是如此。

松迪亚塔政府

松迪亚塔建立了一个由他的伙伴组成的政府。除了士兵和征战领导人之外，松迪亚塔周围还聚集了一批来自伊斯兰教隐修士氏族的黑人学者，他们和凯塔氏族是"具有谐趣关系的哥们"。还可能有些阿拉伯商人经常出入他的宫廷。伊本·巴图塔曾经提到有一个名叫穆德里克的人说服马里-迪亚塔皈依了伊斯兰教，此人的后裔在苏莱曼曼萨的王宫里生活过；但口头传说则强调松迪亚塔是曼德人的救星，是被压迫人民的保护者，而并不强调他是伊斯兰教的传播者。

当时，省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最早与松迪亚塔的事业结盟、其国王仍保持自己称号的省份，如加纳（昆比）和梅马，[64]第二种是被松迪亚塔征服的那些省份，它们都有

[62] 箭和箭袋，是自由民的象征，唯有他们才有权佩戴武器。15世纪时葡萄牙人注意到马林克贵族在城镇中行走时身上佩戴有箭的箭袋；他们从不放下可以识别他们身份的武器。

[63] 举例而言，沃洛夫的孔德氏族的某人被恩贾伊氏族中的人视为兄弟，迪奥普人把特拉奥雷氏族的某人当作兄弟对待。在沃洛夫居住的特拉奥雷人可以用迪奥普氏族的名称，反之亦然。这种戏剧性的关系，氏族间称兄道弟的关系，现仍在西苏丹起着重要作用。松迪亚塔死后，曼丁哥人与他们所居之地——几内亚、利比里亚和科特迪瓦森林地带的其他居民建立了新的关系。

[64] "这位君主（曼萨）的王国所属各地，只有加纳的统治者得以保持国王称号，而他也只是君上的代表而已"，见欧麦里(al-'Umari)，法文译本，1927年，第57页。这段话反驳了M.德拉福斯的认点，后者认为马里-迪亚塔在1240年摧毁了加纳。口头传说看来是可信的：瓦加杜、西塞和梅马的国王从一开始就是松迪亚塔的同盟者，因而他们享有某些特权。

一名地方长官（或称法林）代表曼萨与原来的首领一起执政。松迪亚塔尊重被征服省份的传统制度，所以，行政管理体制相当灵活，这时的国家很像是各王国或省份组成的联邦，而不像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但曼丁哥人的部队驻守在各主要地区，保证帝国的安全，这支部队同时还是一支威摄力量。松迪亚塔看来应该对这个帝国被分为两个军事统治区之事负责。"王子统辖两位将军，一南一北；南方军区的将军叫桑加·祖马，北方军区的将军法伦·苏拉。他们各有一批亲兵和士兵可供调遣。"[45]

马里的首都尼亚尼

136

尼亚尼城，位于桑卡拉尼河畔卡马拉氏族的地域。许多年来，研究工作者一直在寻找马里首都的位置：众说纷云，直到莫里斯·德拉福斯才正确解释了欧麦里的记述。实际上，正是欧麦里的书稿提供了马里首都的确切名称。它名为尼亚尼（或尼耶尼，Nyeni），按M.德拉福斯的考证，就在桑卡拉尼河边的尼亚尼村庄附近（如今马里和几内亚两国的边境）。[46] 如前所述，凯塔氏族长期居住于达卡迪亚拉、基里和基里纳；实际上，只是在战胜了苏马古鲁之后，松迪亚塔才决定在马尼地区建都，因为这里盛产黄金和铁矿。[47]

历史学家或许还无法解释，为什么松迪亚塔要选择马尼而不在达卡迪亚拉的老村庄建都；达卡迪亚拉是历代国王的住地，然而松迪亚塔有以下的考虑：

（1） 他这位征服者在达卡迪亚拉受到自己亲族的包围，并不觉得安全。

（2） 达卡迪亚拉位于群山之中，交通不便。

（3） 尼亚尼，环境优美；位于桑卡拉尼河畔广阔平原上，三面环山，有天然屏障，马尼库鲁山高处控制着四周山隘；桑卡拉尼河水深，常年可通航。

（4） 尤为重要的是马尼地区和尼亚尼靠近森林地带的边缘，林区有黄金、柯拉果、棕榈油之类丰富的资源，马林克族的商人常来这里出售棉花和铜制品；虽然这个城市不大，只是因为它的国王反抗苏马古鲁而出名，但它位于南方，远离萨赫勒游牧部落的动乱地区。

尼亚尼在大平原上发展得十分迅速。它是两条重要商路的起点。其中一条是曼丁商路，通往北方的曼德；另一条则通往东北方向，叫做萨拉科尔商路。[48] 这后一条商路，通

---

[45] 译自萨迪，前引著作，第20页。"法伦·苏拉"一名肯定有误。在曼丁哥语中，此名是桑卡伦·索马，即桑卡拉的酋长；桑卡拉是南方一省份，包括尼日尔河上游盆地及其支流地区。"法伦·苏拉"此名，依我之见，应读为"苏拉法林"，即北方地区的首领。苏拉是指毛里塔尼亚人和图阿雷格人所占的萨赫勒地区，马林克人称他们为苏拉人，或是苏拉卡人。

[46] 关于尼亚尼的历史，见M.德拉福斯，1912年，第2卷，181－182页。在P.维达尔（P.Vidal）、J.加亚尔（J.Gaillard）到尼亚尼遗址现场考察之后，M.德拉福斯又考证了伊本·巴图塔的旅行记录；他得到确切的结论，认为马里帝国（曼萨）的首都就是尼亚尼。

[47] 尼亚尼位于马尼地区。尼亚尼的最早居民点是锡比的卡马拉氏族所建，位于巴马科与康加巴之间大河左岸的山区。参阅第一次巴马科国际研讨会，1975年（Y.西塞的论文）。

[48] 马林克人一般称索宁克人为马尔卡人或萨拉科尔人。索宁克或苏农克在他们的传统宗教中是马林克的同义词。在塞内冈比亚的传统宗教中，索宁克又是曼丁哥的同义词，实际上，萨拉科尔这个词在那里很少用。曼德－锡拉（*Mande sila*）的意思就是曼德商路；萨拉科尔－锡拉（*Sarakolle sila*）的意思也就是萨拉科尔商路。前者通往北方，后者则向东去。



图片6.6 尼亚尼：第29站，尼亚尼－库鲁斜坡上的火成岩巨石（此处发现大量陶瓷碎片），可能是祈祷地点



图片6.7 尼亚尼：第1站，居住区棚屋地基全貌（平面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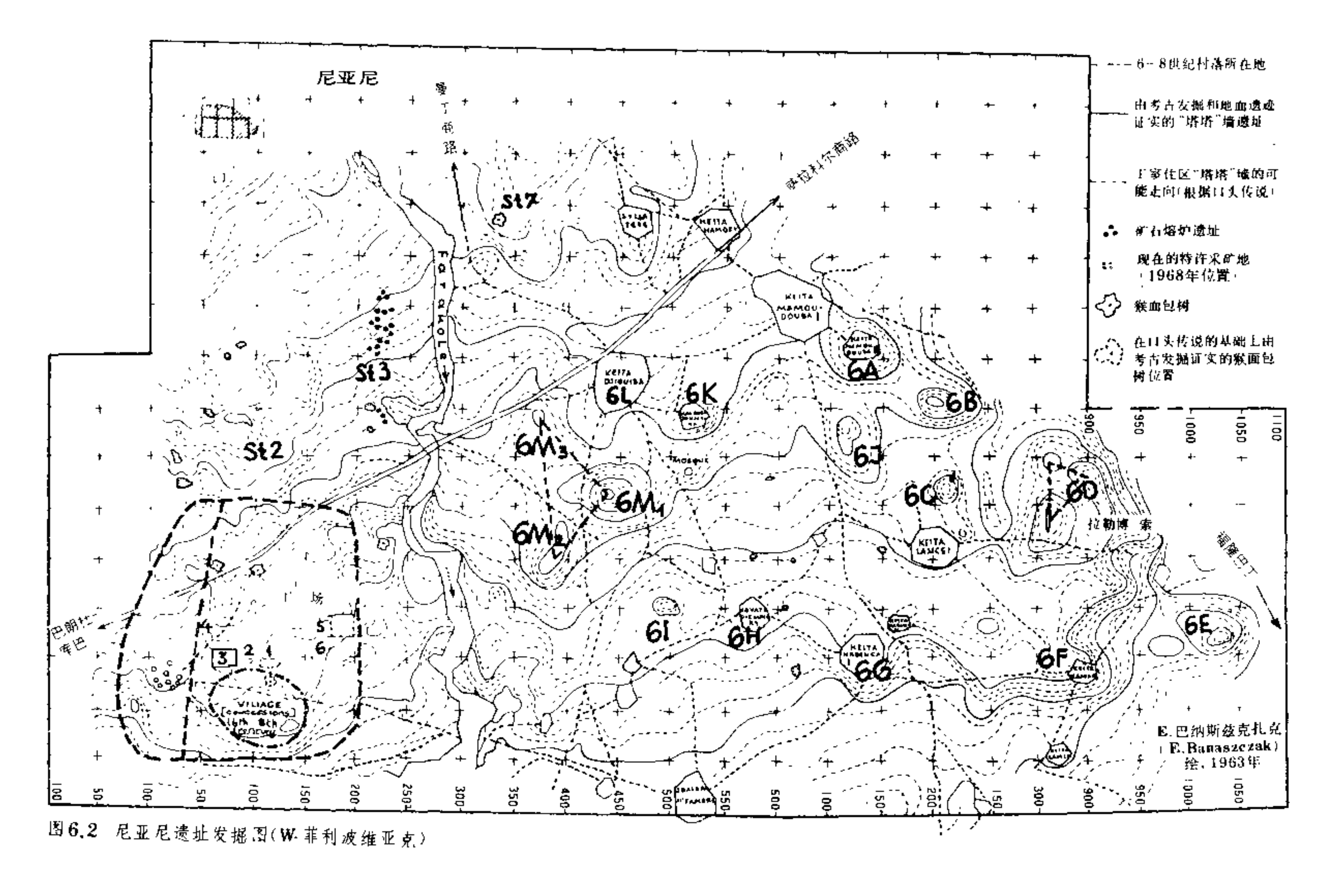


图6.2 尼亚尼遗址发掘图（W.菲利波维亚克）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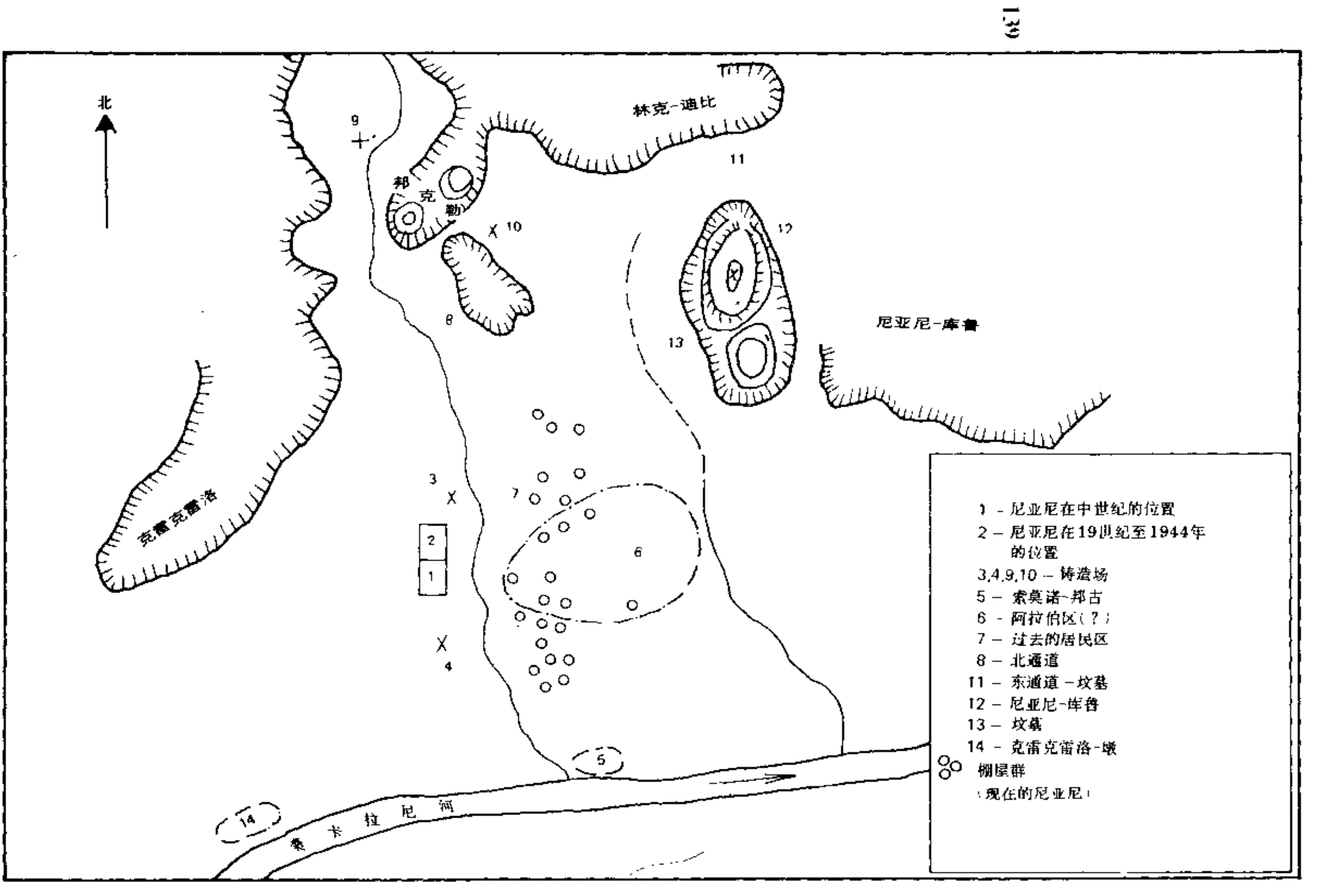


图6.3 尼亚尼:锡吉里地区遗址平面图(D. T. 尼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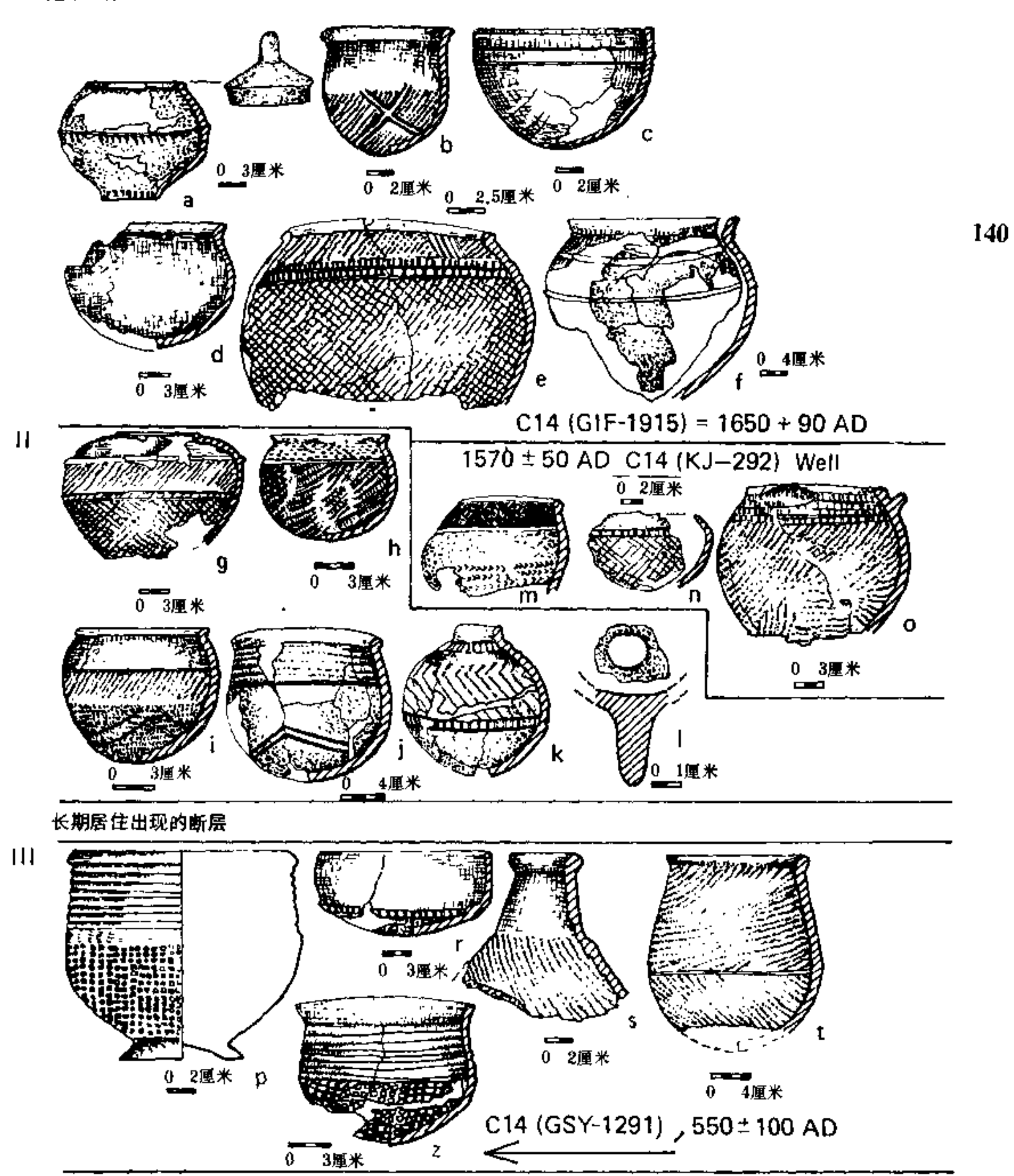


图6.4 尼亚尼：第1站，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的地层Ⅰ－Ⅲ的陶器选品
（根据W.菲利波维亚克，19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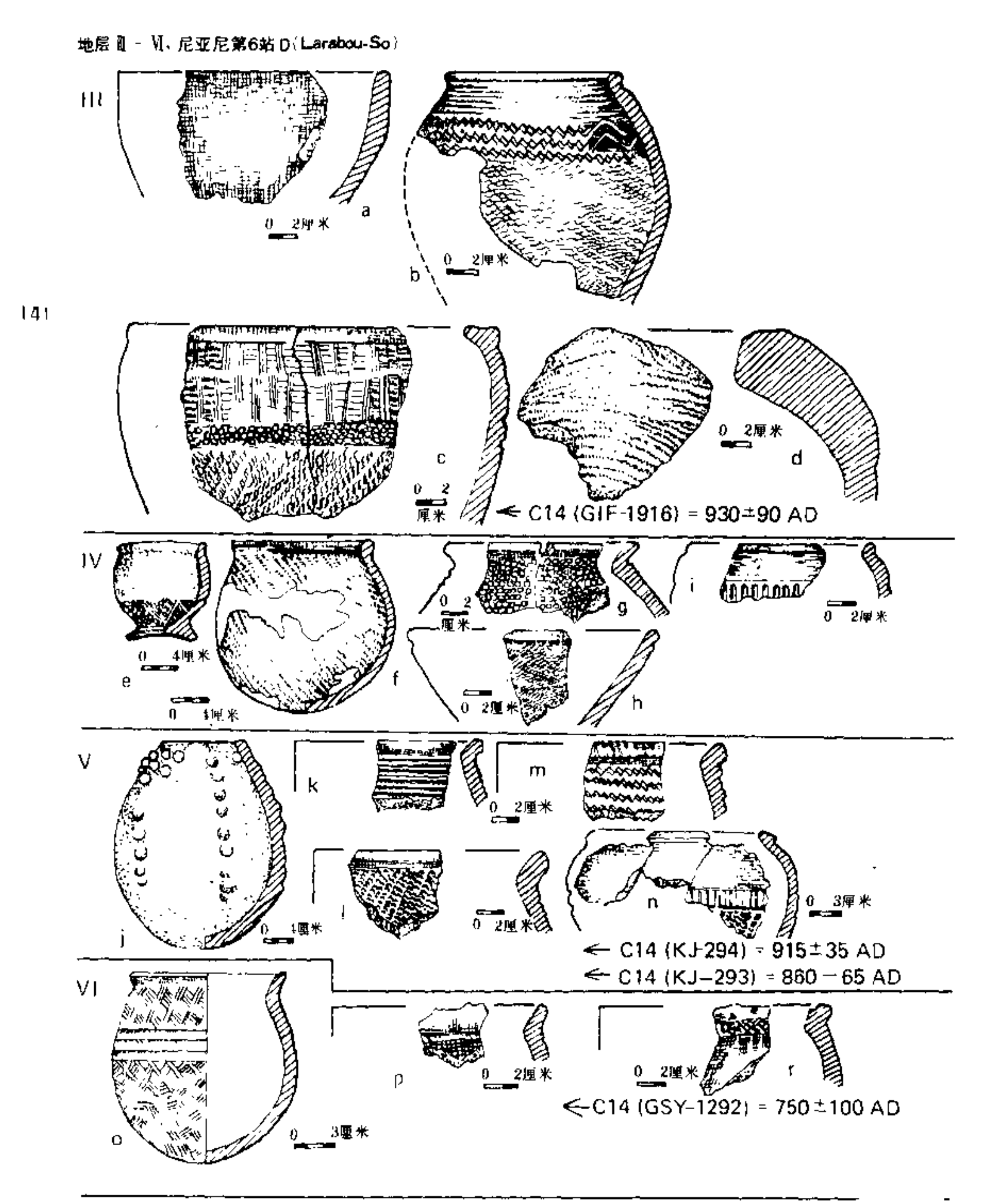


图6.5　尼亚尼：第6站D（阿拉伯区），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的地层Ⅲ－Ⅵ的陶器选品（根据W. 菲利波维亚克，19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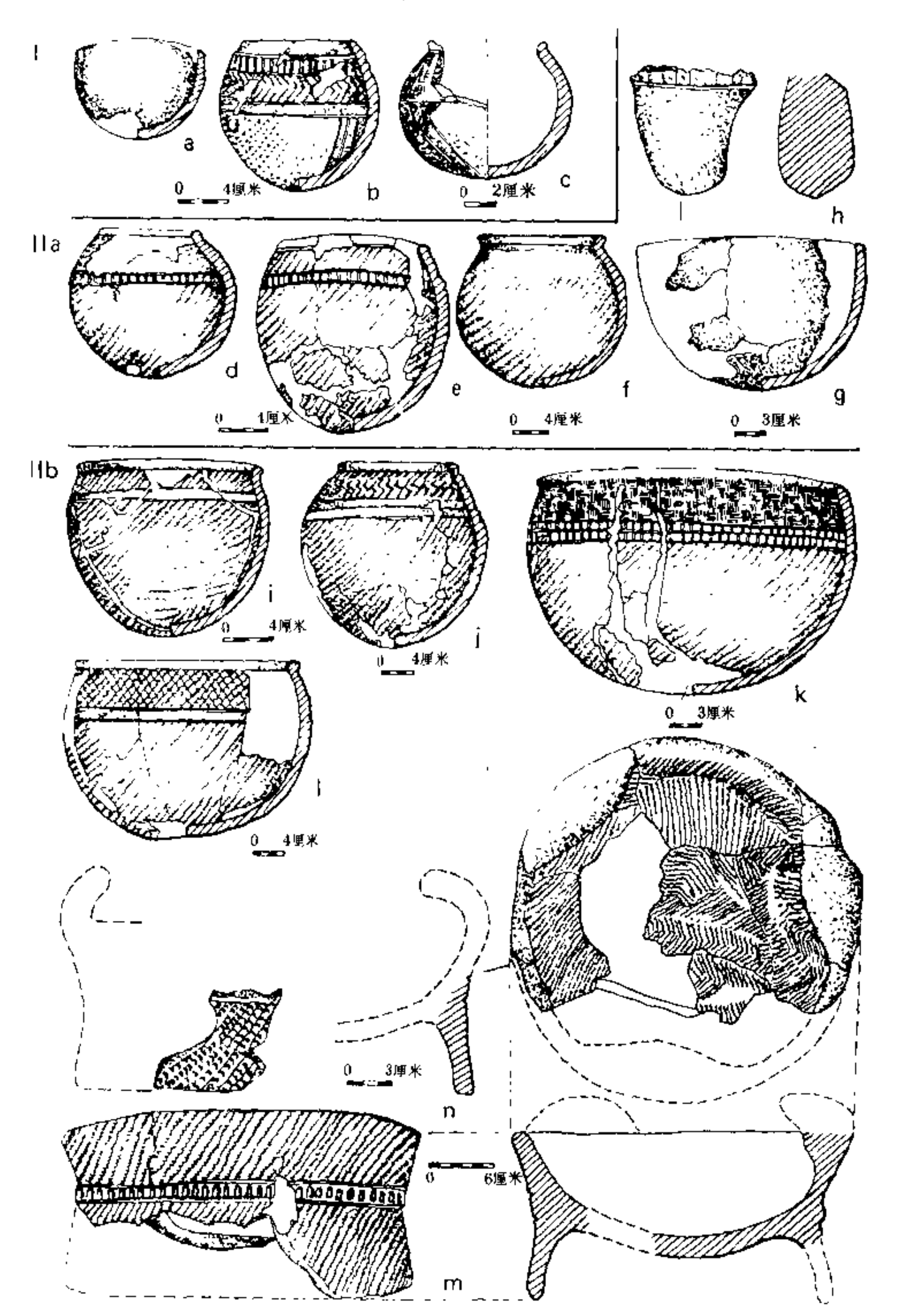


图6.6 尼亚尼：第6站D(阿拉伯区)，从地层Ⅰ－Ⅱb出土的陶瓷选品
(根据W. 菲利波维亚克，1979年)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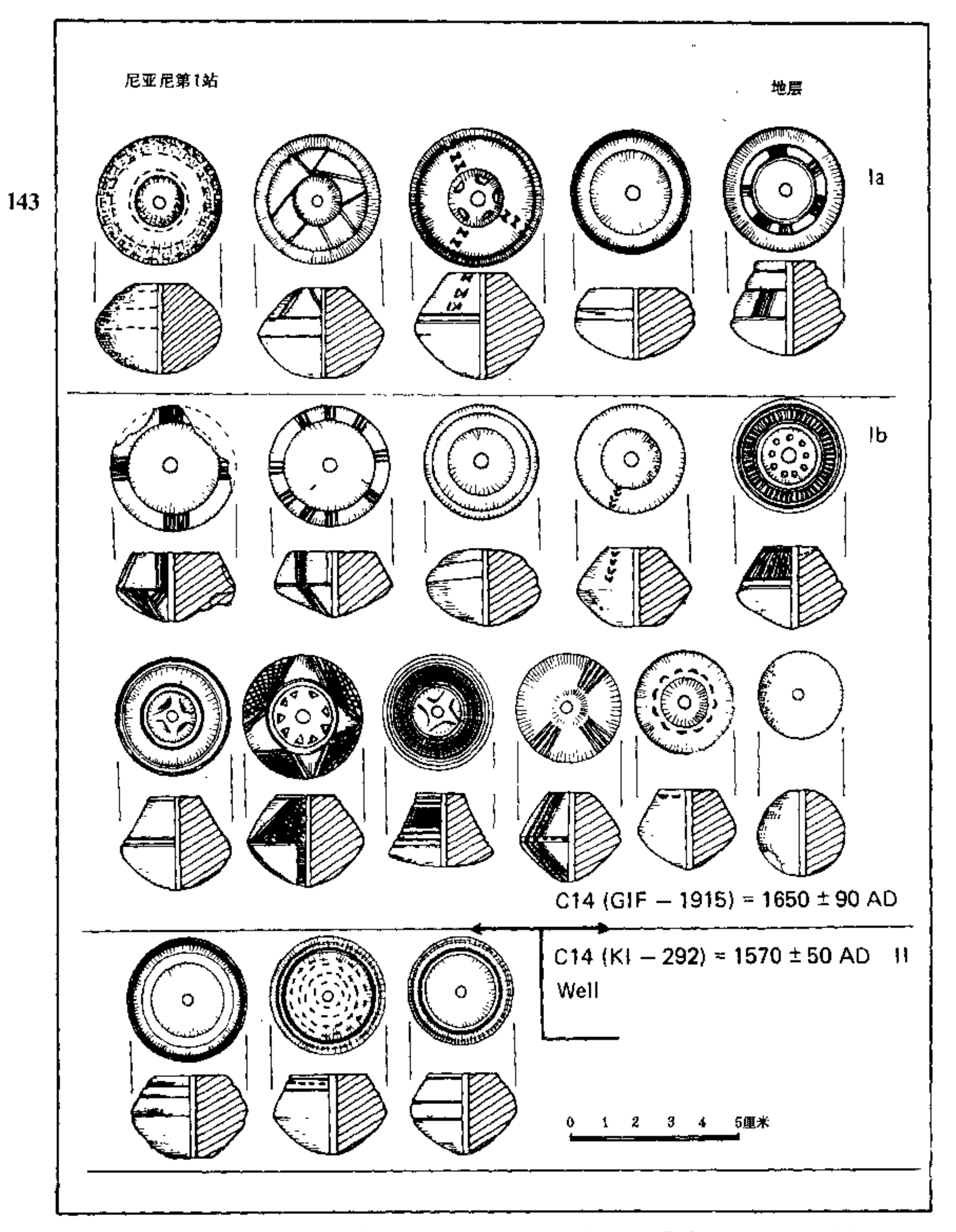


图6.7 尼亚尼：第1站，在王室住区地层发现的纺锤一舵盘选品（根据W.菲利波维亚克，19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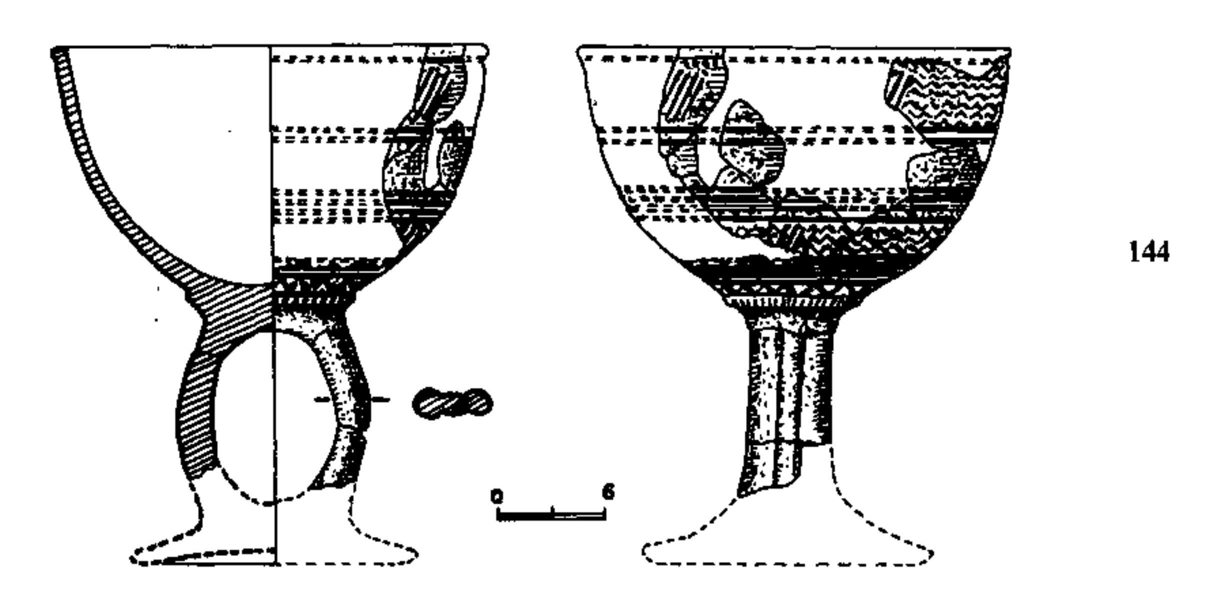


图 6.8　尼亚尼：第 32 号（墓地），在一一号墓被挖掘出土的[illegible]

144

过尼亚尼山和道莱尼－库鲁山（红门山）之间的关口。尼亚尼逐步发展成了帝国的政治和经济首府。

尼亚尼同时引来了黑人商人和柏柏尔阿拉伯人。伊本·巴图塔在 1353 年到尼亚尼城访问，称它为“马里”（Malli）。欧麦里的记述较为详细：“马里地区是国王的住地，国王住于尼耶尼城内，其他各地区都从属于尼亚尼；它称为马里，是因为这个王国所属各地区都认它为首都”。[49]

尼亚尼遗址于 1920 年前后发现，从此，大批研究人员纷至沓来。[50]但只是到 1968 年才开始进行重要的发掘工作，一个由几内亚人和波兰人组成的工作组从那时起一直在这个遗址现场进行考察。目前，考古学家们已经认出阿拉伯人居住区和王室住区的遗址，他们已将一些石屋的地基以及王城中一座清真寺的壁龛（*mihrāb*）与地基清理出来（见插图 6.5、6.6、6.7）。王室住区围墙的走向也已查明。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有的建筑都是用土坯建造的。欧麦里写道：

> “这座城市的房屋都用土坯砌成，和大马士革花园的围墙一样。制坯的程序是：先将湿泥制成三分之二腕尺厚的土坯，然后让其自然干燥（腕尺，肘至中指端的长度——译者注）。一批批地制作，直到制出全部所需土坯为止。屋顶采用桁条加芦苇，大多数呈圆顶形（即圆锥形）或驼峰状，与拱穹相似，房屋地面是用泥土和沙夯成的。”[51]

145

[49] 译自欧麦里，前引著作，第 57 页。

[50] M.加亚尔，1923 年，第 620－636 页；J.维达尔，1924 年；R.莫尼（R.Mauny），1961 年；W.菲利波维亚克（W.Filipowiak），1970 和 1979 年。

[51] 译自欧麦里，前引著作，第 54－56 页。

欧麦里所描述的上述建筑风格，一直沿用到殖民者入侵时，他们带来了砖版；然而在曼丁哥热带大草原，迄今仍随处可见人们用稻草铺盖的圆锥形屋顶，房屋内仍用泥土压筑地面。欧麦里的描述十分清楚，所以研究人员都按他的指点去参照传说中的记述；欧麦里还写道：

> 尼亚尼城市的长度和宽度是一样的，长约一贝里德(*berid*)，宽度也差不多是一贝里德。这里没有围墙，房屋大多数分散不相连接。国王有一处宫廷，四周筑有护墙。[52]

考古学家发现当地人们居住得相当分散；在上城周围，有各行各业的氏族村落：铁匠村、渔民村等等。现在人们见到的这片遗址，从尼亚尼一直延伸到西迪基拉，长约25公里。

松迪亚塔宣布尼亚尼为帝国领土，是他所有臣民共同享用之地。[53]这座城市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从各个省份来的都有，而且各行各业的人都汇集于此。这位征服者恢复传统，按卡雅·马汉时代的规矩，把各省总督(法林)和藩王的子弟都召集到宫廷里受教育。

松迪亚塔之死

关于这位英雄人物去世的经过情况，有多种传说。由于掌握口头传说资料的人们说法不一，我们现在只好按理推论。无论如何，在曼丁哥人的家乡、历代伟大国王的坟墓是绝对禁止发掘的，况且曼丁哥统治者的墓地或葬地也无人知道。据莫里斯·德拉福斯听到的传说称，松迪亚塔是在一次庆典仪式上突然中箭身亡；但据我所知，他是在桑卡拉尼河落水淹死的，死因肯定不正常，虽然原因不明。人们都知道，从尼亚尼上溯10公里处，地名是松迪亚塔深滩(*Sundiata-dun*)，这段河流水深而又多漩涡，独木舟划行至此须小心翼翼方可通过。在河流两岸，凯塔氏族设置了不少的祭坛，这位征服者的后代经常推选代表去那里供奉家禽、绵羊、山羊和牛，祭祀祖先。

146

有些村落至今还保留松迪亚塔的祭坛。尼日尔河上的基里纳，就有“传统派”的马米索科人在一处被认为是神圣的森林中设祭坛祭奠他。尼亚尼东北方，在蒂根，卡马拉氏族居住地有一处灰堆，人们称为本达林(*Bundalin*)，据信那里埋藏了松迪亚塔的鞋、佩刀和盔甲。在康加巴，有一处称作卡马布隆的茅屋礼堂，那里也有松迪亚塔的遗物，每过7年就举行一次祭祀。[54]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第一部曼丁哥古典音乐是“松迪亚塔时代”(*Sundiata tele*)，他的英雄事迹随着特定的音乐伴奏而得到颂扬，这部史诗(*Sundiata*

[52] 译自欧麦里，前引著作法文译本，第57页。
[53] 据作者收集到的传说记述，见第一次巴马科国际讨论会资料，1975年。
[54] 本章作者1968年在尼亚尼征集到的口头传说。

fassa）是松迪亚塔的“格里奥”巴拉·法塞克创作的。还有一首歌曲，题为“博洛巴”（*Boloba*，伟大的乐章），是苏马古鲁的“格里奥”们所作，松迪亚塔在曼丁哥战士中普遍推广，也就是说，任何曼丁哥人都可以要求“格里奥”为他演唱此曲，随歌起舞。乐曲“战士的光荣”（*Fanjon*）是为歌颂法科利的英勇战绩而作；乐曲“蒂拉马汉史诗”（*Tiramaghan fassa*）歌颂了马里帝国西部诸省这位征服者的勇敢精神和战功。[65] “杜加”（*Duga*）是一首古老的战歌，创作于松迪亚塔时代之前，它是为纪念帝国的杰出战士们而作，在松迪亚塔时代继续流传。

松迪亚塔的继承人

我们都应该感谢伊本·哈勒敦传下了马里帝国曼萨们的全套家族世系表（13世纪中至14世纪末，见插图6.9）。该表中的名称，在许多方面都与曼德人的历史传说相符。[66] 在他的名著《历史》（《*Kitab al-I'bar*》）和《历史导论》（《*Prolegomena*》）中，伊本·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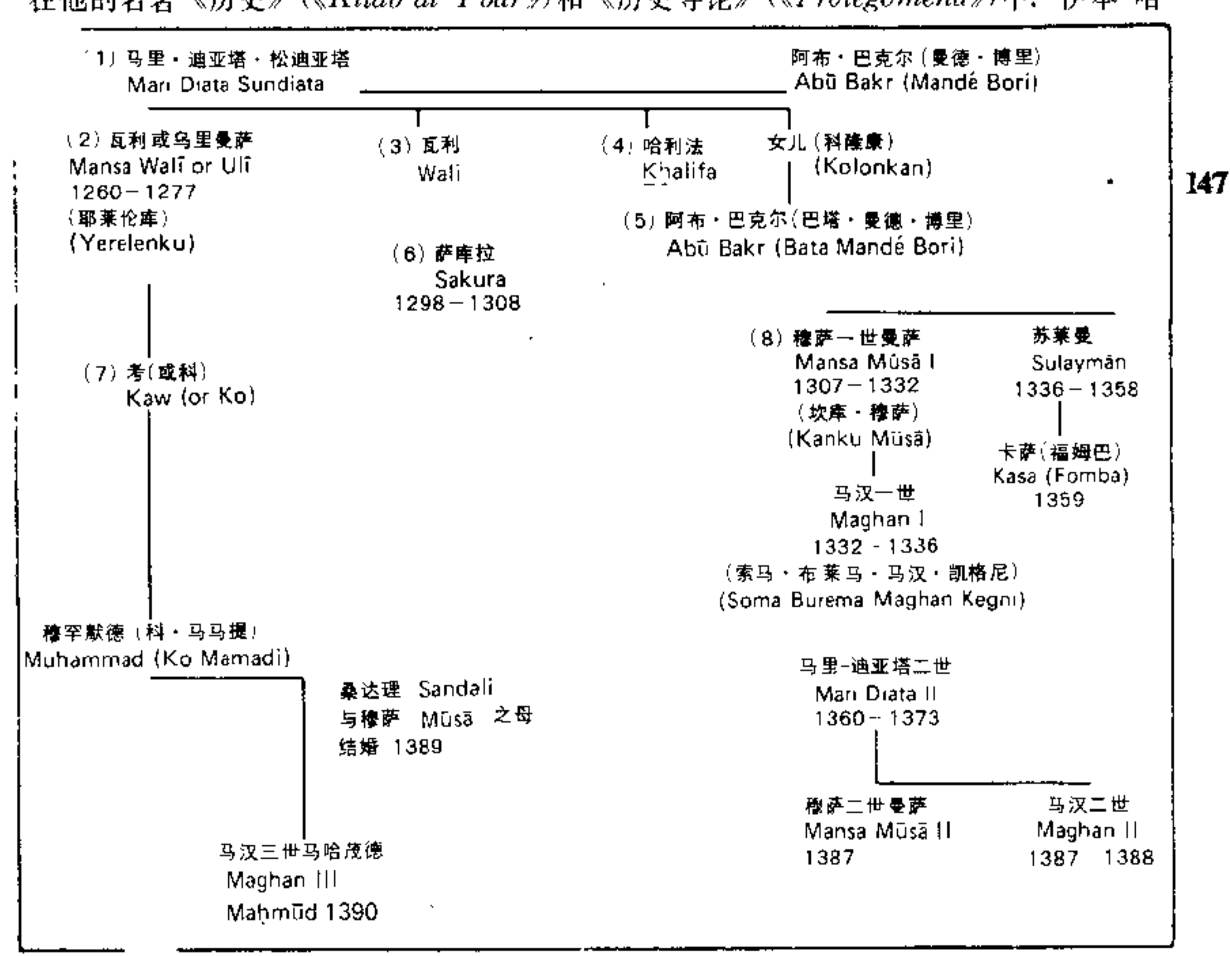


图6.9 伊本·哈勒敦记述的马里曼萨家族世系（历史传说的名称带有括号）

[65] 同上，第133页，歌颂蒂拉马汉·特拉奥雷。
[66] 关于曼萨世系表，见N.莱扶济昂，1963年。

勒敦都强调指出马里在14世纪的穆斯林世界中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占重要地位。他关于马里的报道，来源于可靠人士的记载，其中不仅有阿拉伯商人的，也还有马里派往开罗的大使和领事人员的记述。正由于他充分认识到马里在14世纪的穆斯林世界中的地位，所以他力求详细地撰写了曼萨的帝国的历史。

在松迪亚塔死后，兄位弟继的古老传统便不再有人遵守，他的长子耶莱伦库（奥林）曼萨掌权，1250年到1270年在位。他保持了军队的统一，将领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很可能就是在他统治期间，马林克人占领了塔克鲁尔，并巩固了蒂拉马汉在塞内冈比亚取得的征战成绩；从此，曼丁哥人在这些殖民地定居下来。奥林曼萨曾去麦加朝圣，这引起了阿拉伯国家对马里这个国家的注意。他死后，帝国由于宫廷阴谋，几乎崩溃；但松迪亚塔旧时一位名叫萨库拉的老将，使国家转危为安。[57]他恢复了征战行动，收服了图阿雷格人的部落，再度巩固了马里对尼日尔河流域的统治，并占领了加奥。恢复秩序以后，他也去麦加朝圣，不幸在归国途中被撒哈拉强盗所谋害。据说他的尸体运回马里，以王室礼仪厚葬。[58]他的后继者都软弱无能。约在1307年，松迪亚塔的侄子坎库·穆萨继位，以穆萨曼萨一世的称号统治马里直到1337年前后。

穆萨曼萨1325年去麦加朝圣一事，许多人都有详细阐述。在他统治之下，马里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他死后，他的儿子马汉一世（或索马·布莱马·马汉·凯格尼）继位；这位曼萨于1336年被穆萨曼萨一世的兄弟苏莱曼所推翻。苏莱曼曼萨在所有方面都保持了帝国的光荣，但他死后，宫廷内部的阴谋斗争更趋激烈。[59]在穆萨一世曼萨、苏莱曼曼萨和其他几位曼萨后代的周围形成了几个政治"氏族集团"，而强大的凯塔氏族此时公开提出王位要求。苏莱曼的儿子福姆巴在位仅一年，他在1359年被马里-迪亚塔二世（即松迪亚塔二世）赶下宝座。松迪亚塔二世是个暴君，他"毁了这个帝国……耗尽了王家的财宝……他卖掉了堪称稀世珍宝的那块黄金。那块黄金价值连城，这个挥霍无度的君主却以很低的价钱把他卖给了埃及商人"。[60]后来，马里·迪亚塔二世因患昏睡病卧床不起而退位，由他的儿子穆萨三世曼萨（1374-1387年在位）继承，但实权却掌握在他的一名大将手中，这位大将恢复了秩序，平息了发生在著名的产铜城市提吉达（塔凯达）的叛乱。由于公主们挑起的宫廷阴谋斗争，15世纪之末便成了动乱时期。地方统治者越来越藐视中央政权，然而帝国的荣誉还是持续了很长时期。

下面是M.德拉福斯对松迪亚塔以后到穆萨一世曼萨历代曼萨统治年代的估计。[61]

（1） 松迪亚塔 1230-1255年

（2） 奥林 1255-1270年

---

[57] 伊本·哈勒敦，第345页。

[58] M.德拉福斯，1912年，第2卷，第185-186页。

[59] 伊本·巴图塔，出处同上，第62-63页。这位著名的旅行家描述了苏莱曼曼萨的妻子如何设计推翻她的丈夫。这一内部冲突削弱了帝国。

[60] 伊本·哈勒敦；译自J.库奥克，法文译本，1975年，第348-349页。

[61] 伊本·哈勒敦说穆萨一世曼萨的统治总共持续了25年，因此有必要将最后一代统治时间定为1307-1332年，前引著作，第343-346页。

148

（3） 瓦利 1270－1274年
（4） 哈利法 1274－1275年
（5） 阿布·巴克尔 1273 1285年
（6） 萨库拉 1285－1300年
（7） 考 1300－1305年
（8） 穆罕默德 1305－1310年

穆萨曼萨时代伊斯兰的胜利（1307－1332年）

穆萨一世曼萨是马里帝国最为著名的皇帝，这主要是因为1325年他有过麦加朝圣之行及途中对开罗的访问，这次访问使他声名远扬。在开罗，由于他慷慨解囊，布施了大量黄金，致使开罗黄金市场很长时间不景气。[62]这次朝圣对西苏丹此后的历史起了相当重大的影响，该地区从此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埃及、马格里布、葡萄牙和意大利商业城市都对马里越来越感兴趣。对自己的权力感到十分自豪的穆萨一世曼萨，为使世界其他部分视自己的帝国为理想中的黄金之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登上皇帝的宝座，穆萨一世曼萨就着手巩固前辈们所取得的成绩和加强中央政权的权威。他得到杰出将领萨兰·曼迪安的有力支持和帮助。萨兰·曼迪安不仅在尼日尔 **149** 河流域远到加奥和加奥以远的地区，而且在整个萨赫勒地区，都尽一切力量加强这位皇帝的权威，他还设法使经常行劫和造反的撒哈拉游牧民臣服于这位马里皇帝；这样，他为穆萨的麦加之行扫清了障碍，因为，这位马里皇帝对撒哈拉游牧民谋杀萨库拉一事一直记在心头。

穆萨一世曼萨事先为这次朝圣行动作了充分的准备。据传说，他向各商业城市和所有省份都征收了特别贡税，在离开尼亚尼时有极为众多的随从（固然，阿拉伯作家所说的数量或许有所夸大，但这位马里皇帝的声势也由此可见一般）。据传他有6万名挑夫和5百名奴隶挑运黄金，他们每人手中都有一根金杖。马哈茂德·卡蒂早在16世纪初就已根据文字记载，讲到穆萨一世曼萨的商队前锋行至廷巴克图时，他本人还在王宫里尚未启程。在埃及（开罗），他受到了欢迎一位伟大素丹规格的隆重接待。他慷慨大方，给人印象深刻，俨然像"一千零一夜"传说中描写的国王。[63] 他身体健壮，据马克里齐描述，他是"一个棕色皮肤的年轻人，五官端正，体格健美，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受过马立克学派的薰陶；他的随从衣着整齐，都有马骑，臣属万人簇拥在他周围；他带来了华丽多彩的礼物，令人美不胜收"。[64] 据口头传说，穆萨一世曼萨还在开罗和麦加买下土地房屋，以安置来自苏丹地区的朝圣者。更重要的是他与朝圣途中访问的各国之间建立了友好的经济及文化联系。

[62] 有众多随从者在途中服侍曼萨穆萨；他带有80袋金粒，每袋重约3金塔尔（*kintār*）或3.8公斤……6万名挑夫和500名奴隶随他同行，每人手持一根重500米特卡尔（*mithkāl*）或3公斤的金棍，译自M.德拉福斯，1913年。早于1375年，画家们就描绘过手持金块的曼萨穆萨的画像。

[63] 马哈茂德·卡蒂，前引著作。

[64] 译自马克里齐（al-Makrizī），见J.库奥克，1975年，第91－92页。

穆萨曼萨——建设者和保护人

穆萨曼萨在开罗见到的宏伟宫殿，无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回国时他将著名建筑师伊萨克·图埃京也带了回来。伊萨克·图埃京建造了加奥的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现在只剩下了地基和部分壁龛。他又在廷巴克图建造另一座大清真寺和一座王宫，但他最高超的杰作还要数尼亚尼著名的接见大厅，他把自己的全部艺术精华都集于这座建筑。皇帝要的是一座抹上石膏的坚实建筑，于是图埃京就建造了一座圆顶方形房屋……

150 抹上石膏，并饰以五光十色的阿拉伯式彩绘，一座惊人之作终于建成。这个国家原本没有建筑学知识，所以皇帝对此十分欣喜，为了表示满意，他赐给图埃京 12,000 米特卡尔砂金。[65] 无疑，皇帝的这位建筑师也只能使用土坯，这是苏丹地区最常用的建筑材料。在尼亚尼所处的纬度，土坯建筑需要不断进行修理和重整。更往北，降雨量少些，建筑物比较耐久。杰内、廷巴克图和加奥的清真寺就是如此。由于没有石头，土坯只能用木头来加固，因此苏丹地区的清真寺上都布满木条。随着尼亚尼城屡遭破坏以及长年的风雨冲刷，这位诗人兼建筑师的伟大成就最后终于成了一堆泥土碎坯。

在开罗时，这位曼萨十分乐于回答聚集在他周围的大臣和学者所提出的问题，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的帝国，但不无夸张。他说，他本人享有“黄金专有权，黄金作为贡品都集中到他的宫中”。开罗和卡拉法的行政长官伊本·阿米尔·阿吉布，当时受马木路克素丹委派照管这次朝圣，曾对这位皇帝的言谈作了大量报道，说这位皇帝肤色红中带黄，“当他端坐在马背上时，追随他的那些朝圣者就挥动皇室标志，那都是些巨大的旗帜。”他强调自己的帝国“人口众多……大群大群的……但如果与周围及其南边的黑人人口作比较，那么，帝国人口就像一头黑牛身上的一个小白点。”穆萨清楚地意识到在他帝国南边还有大量的人口和不少强大的王国。他还说到，他有一个名叫做提吉达(塔凯达，现称阿泽利克)的城市，“那里有个红铜矿，所产的铜制成铜条送往尼亚尼。在我的帝国里，原铜数量之大绝无仅有，这是最大的征税来源，全都来自这一处铜矿。我们把铜送到异教的黑人地区，一米特卡尔铜块可以换回原重量三分之二的黄金”。[66] 穆萨在开罗时还谈到他的先王死于海难，“也曾有人劝告先王说，要抵达大海彼岸是不可能的，但先王执意不听，一意孤行……先是用 200 艘船载人，其余船则满载黄金以及可供数年用的淡水和给养，结果这些船全都沉没了”；事后，先王又亲自出征，装备 2000 艘船，但启程之后音讯全无，一去不复返了。[67] 关于这次远征的命运，穆萨所言究竟有多大可靠性，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L.威纳和 M. D. W. 杰弗里斯两位学者曾经提出过马林克人是否发现了

151 美洲的问题。[68] 果真如此，黑人就比哥伦布还早 200 年到达大洋彼岸了！[69]

---

[65] 译自伊本·哈勒敦，前引著作，第 348 页。

[66] 译自欧麦里，前引著作，第 80 - 81 页；关于马里与森林地带商业交往的细节，从林区运来棕榈油、柯拉果和黄金，参阅本书第 25 章。

[67] 同上。

[68] L.威纳(L.Wiener)，1920 - 1922 年；M. D. W. 杰弗里斯(M. D. W. Jeffreys)，1953 年(b)。

[69] 美籍黑人学者伊万·塞蒂玛(Ivan Sertima)有一种理论，认为最早到达美洲的是黑人，他细心分析墨西哥和中美洲文明，发现其中有曼丁哥文化成分。这说法很吸引人，但未经证实。

但是，上述轶事至少也表明，定居于海岸一带(主要是冈比亚)的曼丁哥征服者，对航海远征并不是毫不关心的。这次盛大的麦加朝圣，将大量文人学者吸引到他的宫廷中来，他本人的阿拉伯语也日渐熟练，虽然与阿拉伯人谈话还要通过翻译。他有自己的卡迪(执法官、*kādī*)、秘书和真正的“迪万”(政府、*dīwān*)，但这主要是为了装门面。在他这次闻名的朝圣之后，非斯的马林王朝和马格里布各商业城市都开始对马里感兴趣，统治者之间开始互赠礼品、互派大使。穆萨建立了一些古兰经学院，他本人从开罗和圣地购买了大批书籍。可能正是在他统治时期，瓦拉塔城日趋重要，杰内和廷巴克图发展成为百年后驰名世界的城市。

作为一个建设者，穆萨一世曼萨给苏丹地区所有城市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标记——那些独特的用木头加固的土坯建筑。杰内和廷巴克图大清真寺是今天人们公认的苏丹建筑风格的典型。作为文学的保护者和朋友，穆萨帮助奠立了黑人的阿拉伯文学基础，这种文学在14－16世纪的杰内和廷巴克图诸城市结出了丰硕的果实。[20]

苏莱曼曼萨

在穆萨曼萨之子、马汉一世短促统治之后，根据口头传说，穆萨的兄弟苏莱曼夺取了皇位(1336－1358年在位)。在苏莱曼统治时期，著名的旅行家伊本·巴图塔访问过马里，并在首都住了9个月。他的报道是欧麦里记述的补充，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帝国宫廷生活和行政管理体制的生动画卷。朝仪根据严格的礼节进行，关于这方面，伊本·巴图塔给我们作了非常详细的叙述。

与先前卡雅·马汉一样，这位曼萨的作用主要是充当公正的施与者和家长，人人都向他诉说苦情。各地区均由地方长官代他执政，但一旦这位曼萨得知某个地方长官处事 152 不公，一般就立刻将其撤职。臣民去见这位曼萨要恭而敬之，要用尘土涂面，尊称他为“姆-法-曼萨”(“国王、我父”)。据伊本·巴图塔记载，这位皇帝有两种接见仪式，一种是在宫中，即在专为穆萨一世修建的那个著名的接见大厅中举行，另一种是在露天树下，坐在一张嵌有黄金和象牙饰物的宝座上举行。军队统帅(坎科罗·西吉)、显贵长老、地方长官、祭司和法律专家就位以后，作为发言人和司仪的格里奥(“吉里”、*djeli*)站到接见大厅中与会者的前面。伊本·巴图塔这样描述曼萨：“这位皇帝的头巾上装饰着做工精巧的流苏。他的脖领下挂着一把金鞘马刀。他脚穿带有马刺的靴子；这一天只有他才有资格穿马靴。他双手执两把铁头尖尖的短矛，一支矛杆是金的，另一支是银的。”[21]

---

[20] 口头传说中很少谈到穆萨曼萨，有些甚至根本没有提及他。经过长期调查，发现穆萨曼萨似乎被人们认为是“对古来曼丁哥的传统不忠实”；一些掌握口头传说的人对他那次朝圣之行相当了解，但这是因为他浪费了帝国财富而受到谴责。见西非商业公司基金会材料，1980年(未介绍详细内容)。正是在他统治时期，班巴拉人(巴曼南人)建立了秘密组织科莫联合会，该组织的成员因忠于传统信仰而拒绝承认这位曼萨的权威。见《曼丁哥文献汇编》(*Recueil de littérature mandingue*)，1980年，第215－227页。

[21] 译自伊本·巴图塔，前引著作。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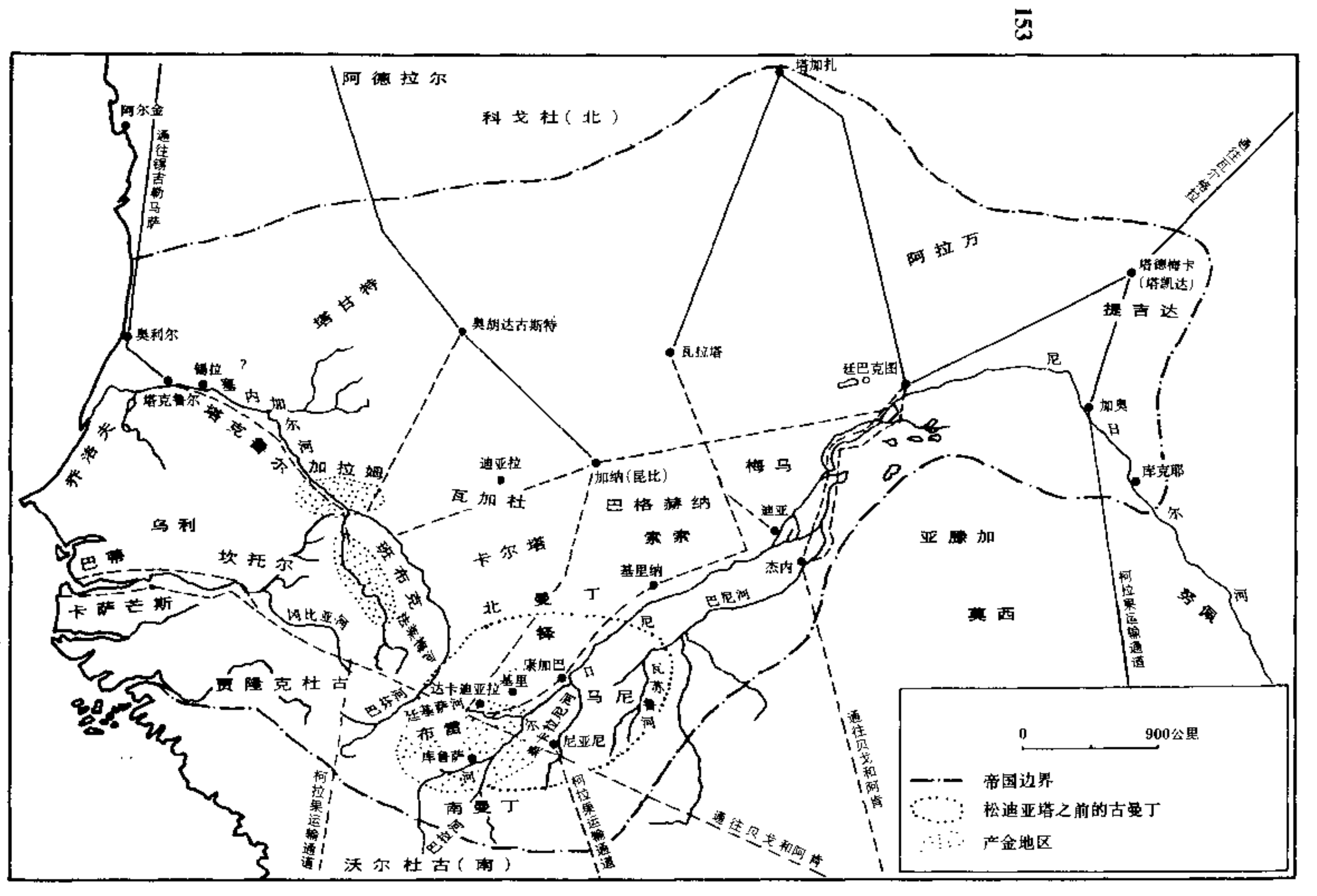


图6.10 马里帝国1325年（D·T·尼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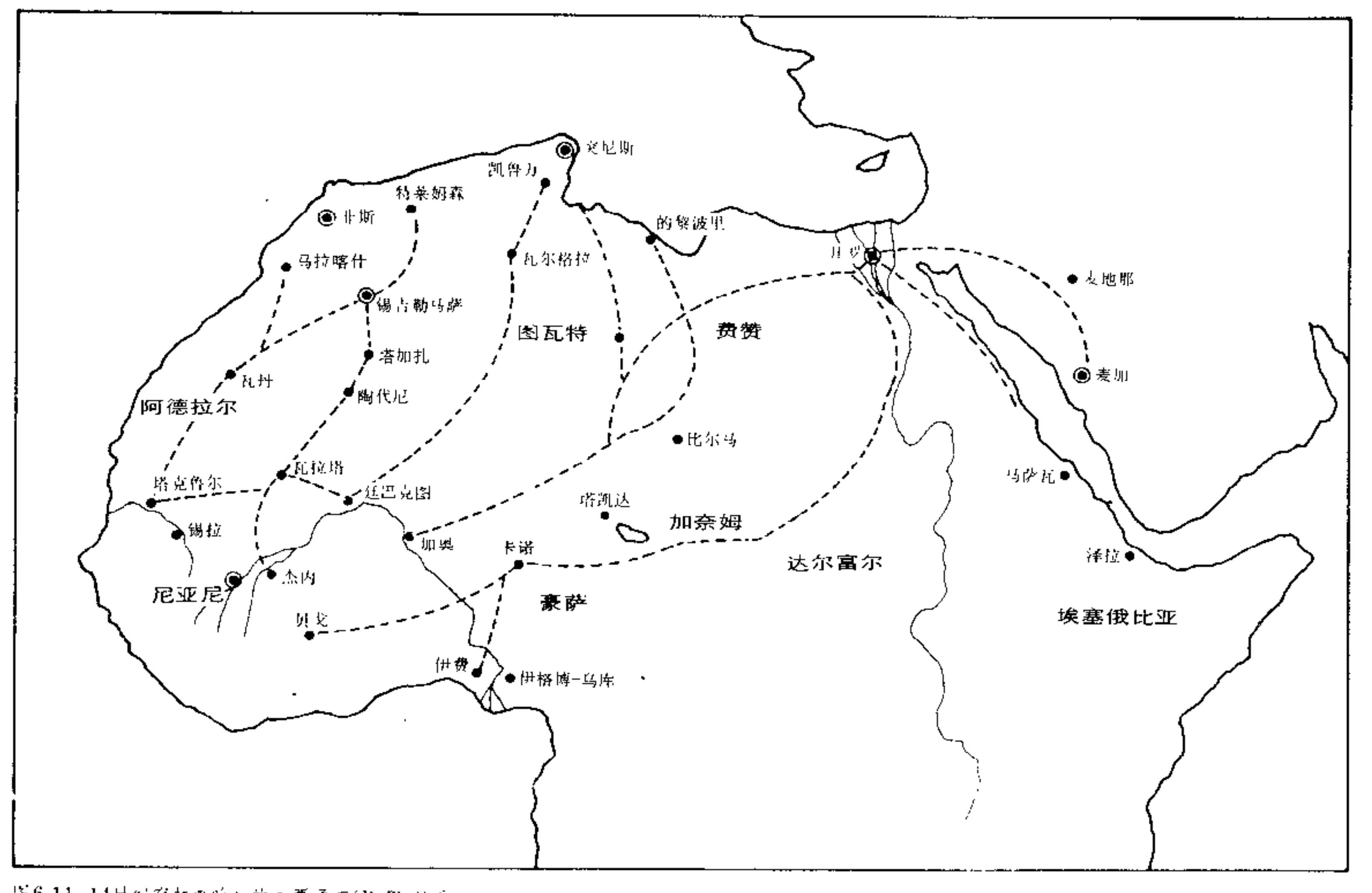


图6.11 14世纪穿越撒哈拉的主要通道（D.T.尼亚内）

伊本·巴图塔对露天会议的进行情况也有描述，说场面同样十分庄重。每星期五午间祈祷之后，当格里奥“宣讲”历史，回顾历代君王的业绩，仪式就开始了。那是口头传说内容最为丰富多采的时刻。讲述历史也就是一种不断教育的过程，无论在家还是在宫廷都一样。人们以国王的名义起誓，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

尼亚尼的仪式是原先卡雅·马汉时代礼节的重新恢复，只是形式更加动人，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皇帝是一位伊斯兰教徒，他隆重庆祝的是伊斯兰教的节日。但是，这位皇帝同时也还忠实于非伊斯兰教的某些习俗，伊本·巴图塔对他的许多异端做法深感震惊。除了有阿拉伯人在场和略加穆斯林装饰外，曼萨宫廷中出现的一切，与非穆斯林国王（诸如莫西人国王）宫廷中所见所闻并没有什么区别。[22]

据欧麦里介绍，宫廷显贵们不但衣着华丽、佩戴金饰，而且还拥有精良的武器。根据一个军人佩戴的箭袋，人们便可判断出他的身份，他们中的贵族都是征服者的后裔，法官和法律专家则可以根据头上戴的头巾来判别。黑人隐修士都出身于5个“伊斯兰信仰捍卫者”氏族（*Mori Kanda Lolu*），他们都是“带头巾的贵族”。

曼丁哥文明

帝国臣民

在穆萨一世曼萨和苏莱曼统治下，帝国达到其鼎盛时期。当时马里帝国的疆土包括西非洲的整个苏丹－萨赫勒地区。于是，许多民族和多种文化都集中到了一个单一政权的统治之下。

154

游牧民族与牧民

撒哈拉大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特别是麦苏法人的疆土，从塔加扎盐田一直延伸到瓦拉塔城。瓦拉塔城是马里两条穿越撒哈拉商道的重要交叉点。麦苏法人是食盐交易的主要经纪人，商队向导一般都从他们中招募，因为来往于马格里布和苏丹之间非得要有十分熟悉撒哈拉沙漠的人不可。往西直到大西洋，居住着伦蒂马－桑哈贾人和戈达拉人，他们属于柏柏尔人，他们的疆土相当于今天的毛里塔尼亚。与麦苏法人一样，他们也参与撒哈拉贸易和开采伊吉勒的盐矿。瓦拉塔城与尼日尔河湾之间是图阿雷格人的地域。所有这些大沙漠中的游牧民族都处于瓦拉塔、廷巴克图、加奥和昆比的警卫部队的监视之下。这片辽阔的撒哈拉土地归军事长官，即苏拉法林（*sura farin*）管辖。

萨赫勒地区的民族

在那时期，萨赫勒的气候比较温和，牧场牧草茂盛，苏丹的北部城镇，诸如塔克鲁尔、奥胡达古斯特、昆比、瓦拉塔和廷巴克图，都坐落在这一带。富拉尼人从大西洋沿岸的塞内加尔河港湾向尼日尔河湾游牧。他们放牧牛群，随季节迁移牧场。到14世纪，

[22] 见本书第9章和第10章。

一些部族已渗透到南方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特别是在杰内周围和桑卡拉尼河右岸一带，在尼亚尼周围和塔克鲁尔定居下来的人更多。[73]

萨赫勒务农的居民——图库洛尔人或塔克鲁尔人、索宁克人和桑海人[74]——皈依伊斯兰教的时间要早得多(在 11 和 12 世纪)，当时他们都还居住在大城镇里。平原地区交通便利，这对建立新的城镇和共同的文化起了促进作用，尽管该地区内的人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

热带大草原地区各民族

从西到东，那里的主要部族是乔洛夫人、曼丁哥人和索宁克人。蒂拉马汉征服这一地区之后，马林克人也大群大群地在卡萨芒斯和塞内冈比亚定居下来；这西部地区足够开拓者居住的。马林克人是否在松迪亚塔时代之前就已在塞内冈比亚地区定居下来，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很可能早在 13 世纪之前，一批批商人和索宁克、马林克的隐修士就已接踵而至，来到这个地区。[75]从冈比亚沿海到里奥格兰德河一带，在贝法达、巴兰特、费卢普和拜努克这些以种植稻谷为主的农业社会周围，当时居住的都已是马林克人。

156

15 世纪中叶，葡萄牙航海家到达冈比亚河的港湾后与曼萨进行了接触。从葡萄牙人那里我们了解到，这西部地区当时已深受曼丁哥人的影响。[76]我们还从廷巴克图的史书作者那里了解到，马里人口稠密。《苏丹史》的作者写道：

> 杰内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一周七天，每天都有众多集市。据说相距甚近的村庄就有 7077 个。
>
> 下面所述情况，可以说明它们相距有多近。举例而言，素丹若想召见代博湖附近某个村庄的某个村民，只要派出信使到防护土墙大门处大声说出他所传递的素丹旨意，就可以了。随后，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都有人重复原话，很快素丹的旨意即可传到目的地，应召者马上就可以速往召见地点。[77]

虽然人们对杰内 7077 个村庄这个数字有所怀疑，但人们必须承认口头传递信息这一叙述的真实性。

马哈茂德·卡蒂说，马里“有近 400 座城镇，那里土地肥沃。在全世界所有王国中，唯有叙利亚景色更秀丽。马里的居民很富有，生活也相当舒适”。[78]上述数字只不过是表

---

[73] 富拉尼人占领桑卡拉尼河右岸导致两个世纪之后瓦苏卢省的诞生。该地区的富拉尼人忘记了自己的语言转而使用马林克语。很可能富拉尼人向富塔贾隆和塔克鲁尔、本杜和马西纳的渗透始于 11 - 12 世纪，到 15 世纪之后加快了速度。

[74] “图库洛尔”一词是“塔克鲁尔”之误称。他们本身互称“哈尔 - 普拉尔 - 恩”(*Hal pular en*，即讲富拉尼语的人)；但与他们相邻的乔洛夫人和塞雷尔人则称他们为“图库洛尔人”。他们是农民和商人而不是牧民。语言学家把富拉尼语、乔洛夫语和塞雷尔语都纳入大西洋西岸的同一语系。

[75] 见 S.M. 西索科，1981 年(b)；M. 马内(M.Mané)，1981 年。

[76] 见本书第 7 章和第 12 章；A.多纳赫(A. Donelha)，1977 年，第 107 - 121 页；I. B. 凯克(I.B. Kakê)，198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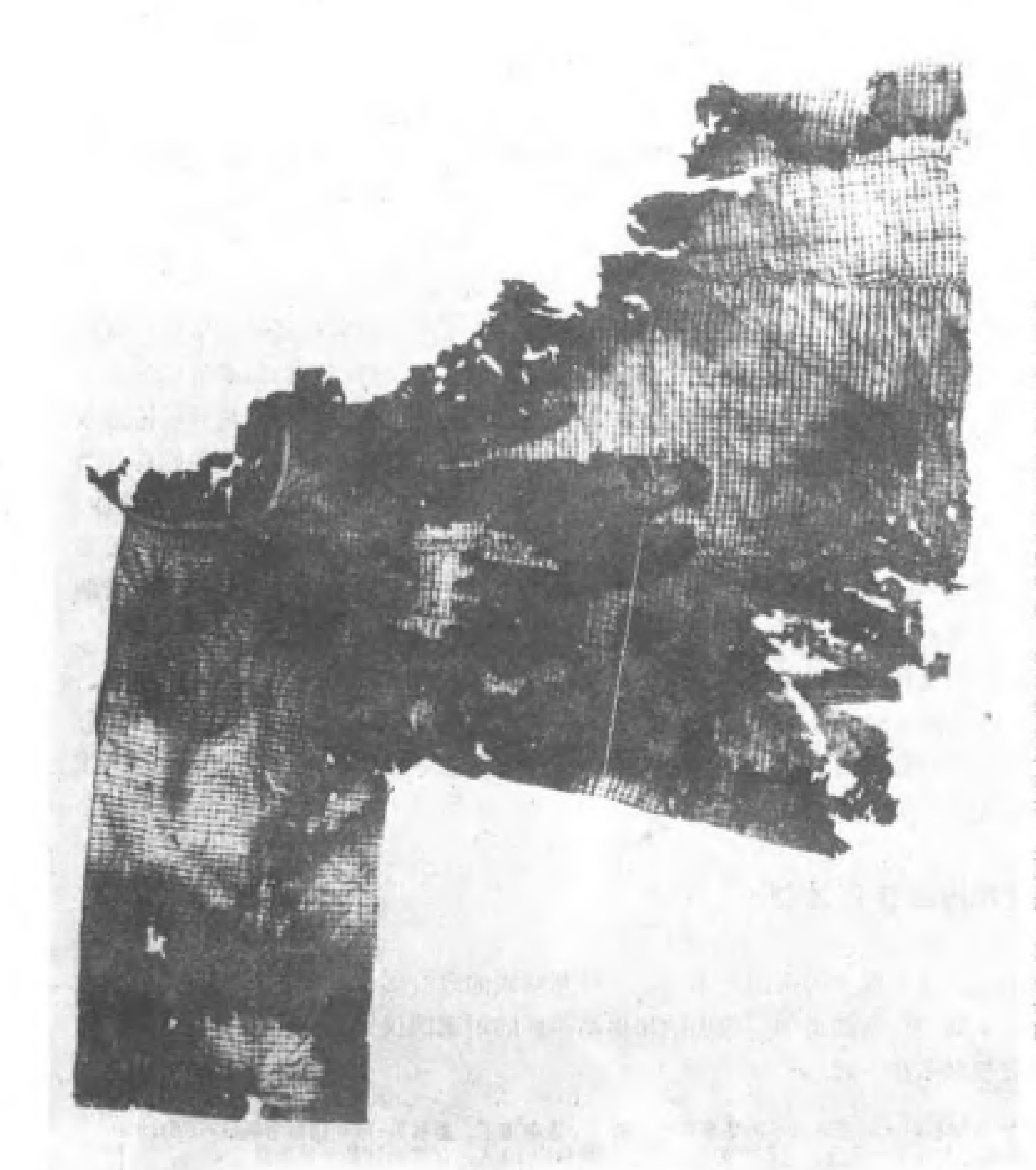
[77] 译自萨迪，前引著作，第 24 - 25 页。考古学研究证实了他这一叙述。

[78] 译自马哈茂德·卡蒂，前引著作，第 67 页。

图片6.8 佩古埃：特勒姆岩洞P景观，耐火砖筑成的粮仓(特勒姆第三阶段，12–14世纪)



图片6.9 佩古埃：特勒姆的有底基的四足杯，发现于岩洞D(特勒姆第二阶段，11–12世纪)



图片6.10 佩吉埃 特勒姆的棉织品，发现于岩洞C(特勒姆第二阶段，11 12世纪)

明该国人口十分稠密；我们可以同意马里有 4 5 千万人口的估计。尼日尔河与塞内加尔河流域实际上是人口非常稠密的地方。14 世纪时，首都尼亚尼的人口至少有 10 万。[59] 马里皇帝似乎对廷巴克图周围尼日尔河右岸地区并不太感兴趣，但加奥的统治者则不然，他们在洪博里派驻了一名地方长官，就在多贡附近的山脚下。[60]

157 黑非洲的多贡文化受到最广泛的研究，但只限于在人种学方面，所以我们无法将早期的多贡人在历史范畴里与其他苏丹人进行对照比较。R. M. A. 贝多的著作，试图根据血统确定多贡人与特勒姆人和尼日尔河湾其他民族间的联系，从社会和历史方面对他们进行研究。多贡艺术闻名于世，但是，最好的作品不在巴马科，而是收藏在欧洲的博物馆和欧洲与美洲的私人手里。[61]

多贡人[62]

班迪亚加拉峭壁是洪博里山脉的一部分，在尼日尔河湾一带久负盛名。多贡人就居住在这个山区，热带大草原的统治者要控制他们很困难，多次想使他们归顺都以失败告终。多贡人来自什么地方？根据他们自己的口头传说，他们是 14－15 世纪离开曼德进入大山的，最后在桑加地区定居下来。[63]据说，他们在那里发现其他山地民族，他们称其为特勒姆人（意为“我们在那里发现的人们”）；特勒姆人在多贡人到达后不久便离开桑加，迁到亚滕加定居。现在人们都同意说，多贡人来自南部地区（曼德），但仍有许多有关多贡人和特勒姆人的问题，尚有待解答。对多贡陶器和来自尼亚尼的马林克陶器——带柄的陶器——进行对比研究之后，趋向于认为这两个民族之间曾有过接触。

一种共同的文化把苏丹人和萨赫勒人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帝国的范围内，由于姓名体制相同，由于血亲的纽带，由于曼丁哥人与富拉尼人之间、富拉尼人与乔洛夫人之间，以及曼丁哥人与其他沿海各族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谐趣关系”，他们的相同之处越来越增多，而不同之处则日趋减少。

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

归根到底，这个庞大的帝国只不过是一种邦联式的政治实体，各省都拥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像加纳和梅马这样的附属国仅仅只是以某种象征性的忠诚与中央政权联系在一起。
160

[59] 到 16 世纪初时，尼亚尼已不再是苏丹地区的一个大都市了。据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估计，此时该城约有 6 千个家庭，也即 6 万人左右，平均每户 10 人，在非洲这是个最低数。

[60] 马哈茂德·卡蒂，前引著作，第 150 页和第 254－255 页。奇－阿里 1492 年参加通博(哈贝，或多贡)附近一次战役后回国途中死去。在尼亚尼收集到的一则传说，认为凯塔氏族占领了远至卡多库鲁，即多贡山区一带的土地。这些胜利要归功于塞雷·南迪乌古，他是 17 世纪的一位国王；这一说法似乎说得通，当时尼亚尼的领导人已无力控制马林克人居住的地区，帝国已是四分五裂。

[61] 见 M.格里奥尔(M.Griaule)，1938 年和 1966 年；S. M. 西索科，1968 年；J.鲁什(J.Rouch)，1953 年；R. M. A 贝多(R. M. A. Bedaux)，1972 年和 1974 年；L. 德斯普拉格尼(L.Desplagnes)，1907 年。

[62] 富拉尼人称多贡人为哈贝人(Habe)，马林克人称多贡人为卡多人(Cado)。曼丁哥人的口头传说，认为多贡人来自曼德，但还有待于证实。

[63] R. M. A. 贝多，1977 年，第 87 和 92 页。

中央政权

曼萨是政府首脑，而且也是所有权力之根基。他的周围则是一些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和显贵，他们都是从松迪亚塔追随者的后代中挑选出来的。在曼德，村庄(或“杜冈”dugu)是政权的基础；一般来说，村里的居民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由一位长官统治下的一批村庄构成一个省，称为“卡富”(kafu)或“贾玛纳”(jamana)。当初，曼德的国王仅仅只是众多长官中的一位。铎、基里、邦科诸省统一之后，这位凯塔氏族的首领才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国王。经过松迪亚塔及其后继者多次征战，曼德的国王才成为曼萨或皇帝，位居众国王之上。

松迪亚塔的将领的后代，在曼萨周围形成一个军人贵族集团，组成一个议事会，议事会的建议对君主的决策至关重要。“格里奥”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伊本·巴图塔介绍过这个重臣在苏莱曼曼萨的宫廷中所起的作用。据我们知道，“格里奥”一职是世袭的：曼萨的“格里奥”向来是从库亚特氏族中产生，该氏族就是松迪亚塔本人的“格里奥”巴拉·法塞克的后代。“格里奥”首先是皇帝的发言人，“由于皇帝讲话声音小，便由格里奥大声复述他讲的话”。每天都有信使骑马离开尼亚尼驰往各地，而各省也每天都有信使来到尼亚尼，这些信使都要向“格里奥”报告消息。“格里奥”又是王子们的教师，他还负责主持各种仪式和指挥宫廷乐师。[64] 在14世纪，穆萨曼萨统治之后，君王已有了秘书，但只有在曼萨要给素丹去信或收到素丹信件时才使用他们。其余时间，信息的传递和接收都是靠口头进行的。

皇帝十分喜欢以“臣民之父”自居，庄严的场合，均由他亲自执法；他亲自听取臣民对代表他在各省执政的地方长官(或法林)的指控。他依据国法判决个人之间的诉讼。[65] 因此，尽管具有穆斯林宫廷的一切外表，任何人都能来向他寻求公正。曼萨是家长、是父亲。在各省，审判都由他所选定的执法官(卡迪)根据古兰经教法进行。

官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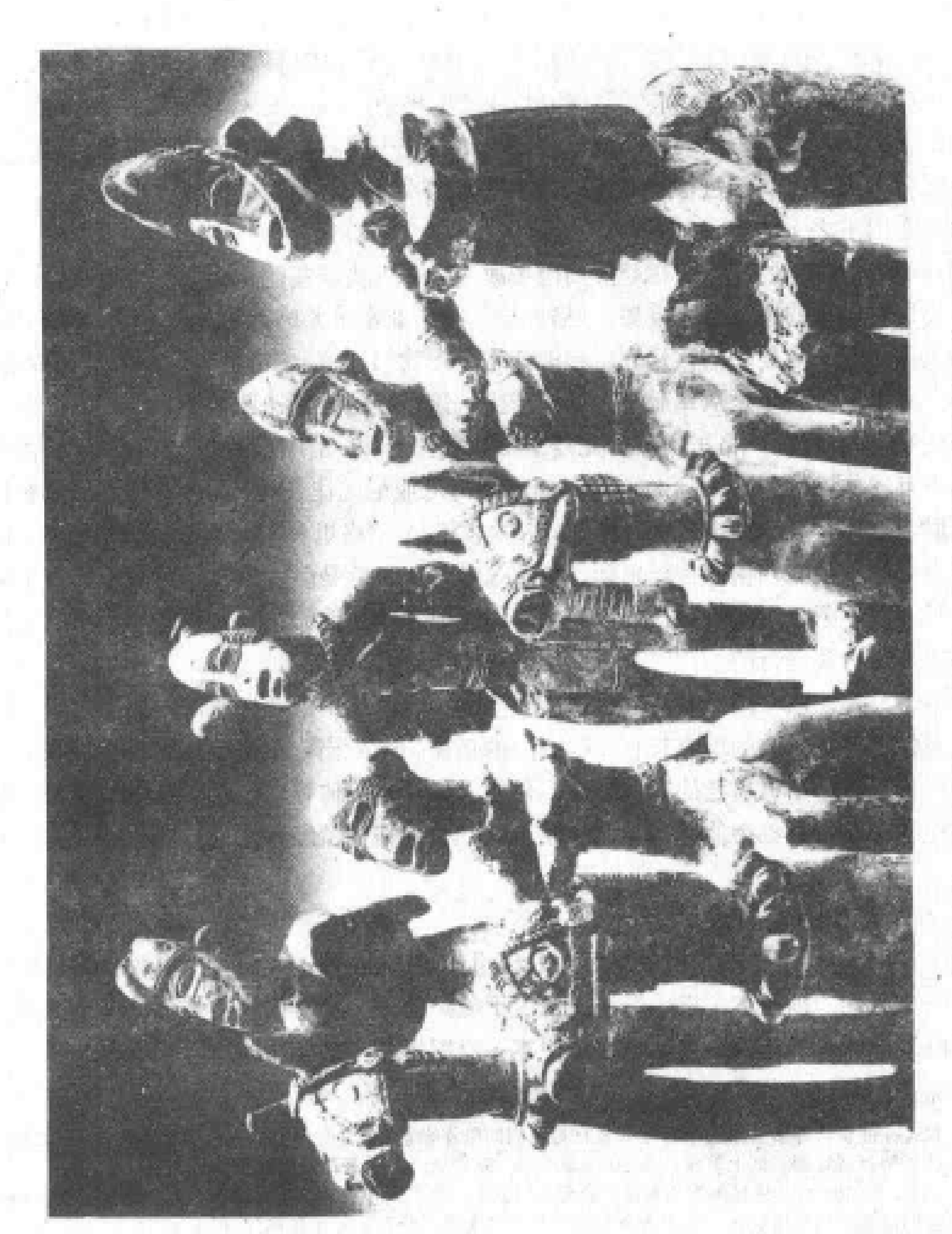
除了“格里奥”(伊本·巴图塔已对其作用作了描述)外，我们对中央政权的其他官职几乎一无所知。据伊本·巴图塔说，仅次于曼萨的第二号掌权人物是一位军事统帅，他似乎应该是军队的首领，但他的作用伊本·巴图塔并未具体阐述。[66]

---

[64] 伊本·巴图塔，前引著作，第303－305页。

[65] 农民往往步行许多公里去控诉地方长官对他们的敲诈勒索。由曼萨裁定地方长官是否有过失。如果有过失，他就要被召回处理。同上著作，第303－309页；欧麦里，前引著作，第57－58页。

[66] 同上，第304页；也见本书第8章。桑海人看来确实受到马里行政管理体制的启示。加奥设立好几个部，其起源均可追溯到马里时代。其中有负责财政事宜的大臣(“哈利塞－法尔玛”，*khalisse farma*)和负责白人(外侨)事宜的大臣(“科赖伊－法尔玛”，*korei farma*)。“坎法里”或“巴拉玛”(*kanfari* or *balama*)是帝国一级的总督或总监。桑海的“瓦奈－法尔玛”(*wanei farma*)相当于马林克人的“桑蒂圭”(*santigui*)，即负责掌管财宝和处理产权的长官。桑海的“萨奥－法尔玛”(*sao farma*)相当于曼丁哥的“图蒂圭”(*tu tigui*)，即林木长官。在马里，总冶铁师行使先前具有皇家血统的一位王子掌管的职权。桑海的“哈里－法尔玛”(*hari farma*)相当于马林克人的“吉蒂圭”(*dji tiguei*)，即负责河道和湖泊事宜的长官，又称“索莫诺”(*somono*)或“博佐”(*boz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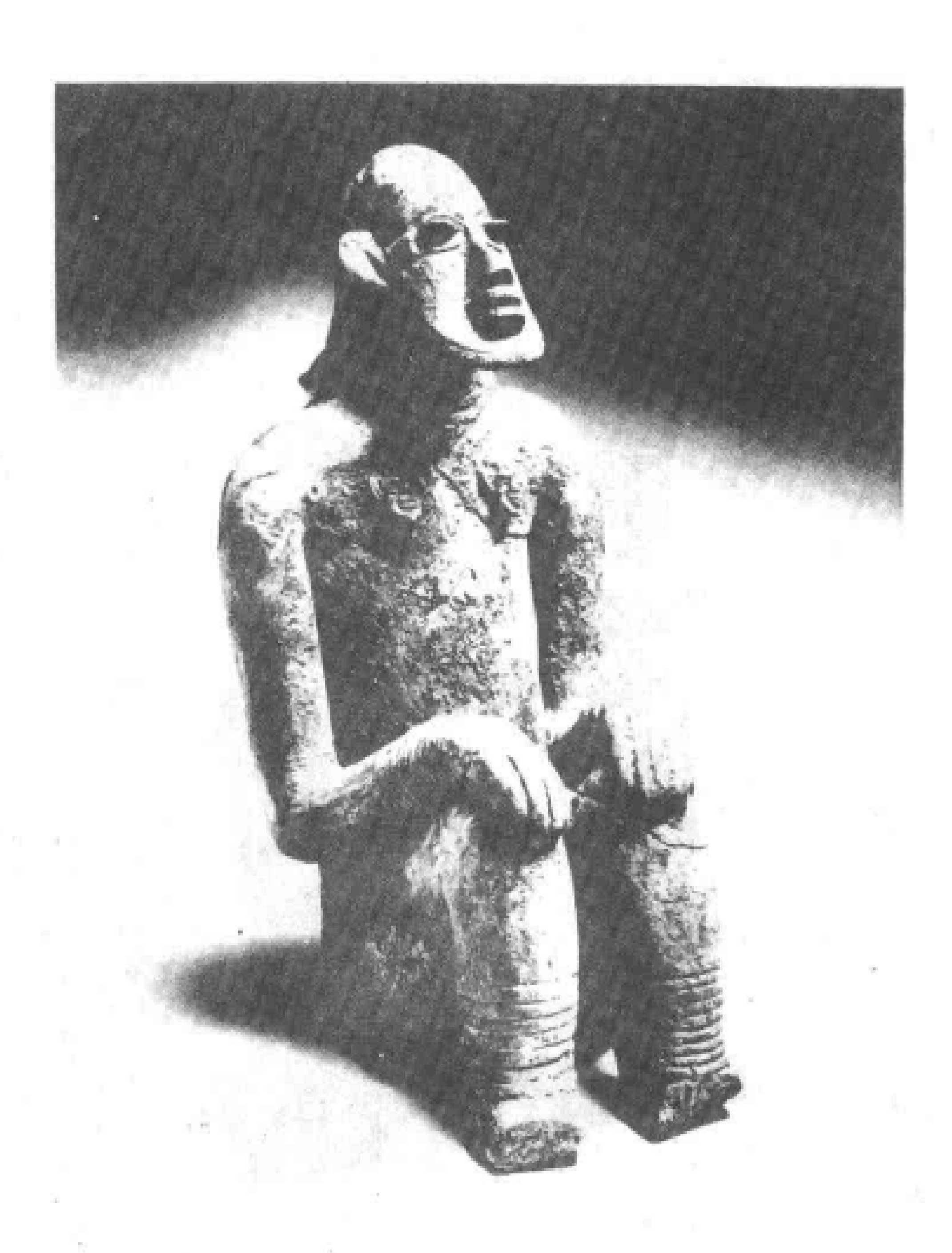


图片6.11 马里帝国，一群骑手，发现于巴马科地区(可能是11-15世纪)



图片6.12　马里帝国：骑手雕像，发现于巴马科地区（根据热释光测定，证明是在1979年前680±105年间，1194－1404年）

166



图片 6.13 马里帝国：蓄须人像，赤陶工艺（根据热释光测定，证明是在 1979 年前 860±180 年间：939—1299 年）



图片6.14 马里帝国：母子雕像，赤陶工艺（根据热释光测定，证明是在1979年之690±：1184—1394年）



168

图片6.15 马里帝国：蛇雕，赤陶工艺（根据热释光测定，证明是在1979年前420±65年间；1494－1624年）

161 “桑蒂圭”（*santigue*）是负责掌管财宝的大臣。最初他仅仅只是王家粮仓的守护官。随着税收来源不断增多，他又负责储存黄金和其他类似象牙、铜和宝石之类的贵重物品。在此之前，这些事宜由曼萨的一名奴隶负责。我们从口头传说中知道，各个行业氏族由其首领代表他们面见曼萨、接受曼萨的命令并转告其成员：这样，铁匠、船民和渔民的首领实际上就是某一手工业行会的代表。

省政府

帝国由各省和若干属国组成，每个省都有一地方长官（或法林）。14世纪，帝国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此时总共有12个省。[65] 主要省份如下：塔克鲁尔省，位于塞内加尔河的中下游。该省实际上是用武力征服的一个王国；它拥有许多个贸易中心，诸如锡拉以及与该省同名的塔克鲁尔城。班布古省，以金矿闻名，臣民几乎全部是马林克人。扎加或迪亚省是迪亚富努人的家园，它位于尼日尔河中游地区。加奥或桑海，这里曾是一个王国，这个王国被马里－迪亚塔的后继者征服，直到14世纪末才摆脱曼丁哥人的压制，它的首府也称加奥，该城在14世纪时是一个大都会。萨纳加纳省，这是欧麦里提到过的地方，是萨纳加纳人和戈达拉人游牧的地区（即现在的毛里塔尼亚）。最后是加纳和梅马这两个王国，它们曾是松迪亚塔的最早的同盟者。曼德是首府，由曼萨本人直辖领导。

每个省又分成若干个区，这些区往往以氏族为单位。省政府是中央政府的小型模式，

[65] 欧麦里，前引著作。他所提到的某些省份究竟是在哪个位置尚未得到认证，或许因为这些名称有误。

各省地方长官(法林)的周围是一些达官贵人，他必得尊重这些人的风俗习惯。区由若干村社组成，由村子结成的村社受当地传统首领("杜固蒂吉"，*dugu-tigi*)管辖。这种与当 **164** 地传统首领密切结合的灵活的地方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使马里帝国得到稳定。有效的政策和一支常胜的军队保证了货物和人身的安全。

军队

我们对究竟有多少军队了解不多，阿拉伯人的资料经常提到的是10万人这个数字，但这只是一个概数。这支军队的力量在于曼丁哥人的战斗精神和纪律观念，他们是这支军队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帝国的主要城市，诸如瓦拉塔、加奥、廷巴克图和尼亚尼都驻有警卫部队，曼萨的权力一直延伸到特塔加扎矿区。马格里布王公对马里的尊重从他们恳求穆萨曼萨援助他们恢复王位这件事可见一般。[88]

"佩戴箭袋的贵族"在自愿的情况下可以充当士兵。骑兵由"顿蒂圭"(*ton-tigui*、佩带箭袋者)组成。在松迪亚塔时代，骑兵就是一支由上层精英组成的精锐部队，马匹大多来自塔克鲁尔或乔洛夫，但在尼日尔河流域养马业当时已相当发达。一名曼丁哥骑兵除弓箭之外，还配备长矛和马刀。[89]骑兵作为一支精英部队，它直接归曼萨指挥。步兵由小贵族率领。他们配备长矛或弓箭，根据他们来自的地区不同而定。曼德士兵一般备有弓箭。来自撒哈拉的士兵则手持皮制盾牌和长矛作战。帝国在其鼎盛时期，似乎没有奴隶组成的部队；他们是以后才出现在马里军队之中的。各省都装备一小队自由民士兵；在城市中驻有警卫部队，在敏感的边境线，如萨赫勒-撒哈拉边沿驻有大批军队，他们长年镇压起义或抗击邻国的入侵，以保卫帝国。

经济生活

农业

曼萨的帝国在国外以盛产黄金闻名，但它的经济实际上还主要是依靠的农业和畜牧业，大多数人从事耕作和放牧。曼丁哥人有许多歌曲赞美农耕生活。贵族并不轻视田间劳动。战争告一段落时，自由民一般都务农。狩猎与农业紧密相连，这是两种贵族可以从事而又不失身份的活动。我们对当时乡村生活的详情不太了解，可是葡萄牙航海家对14世纪马里的报道证明马里并不缺乏食品。在尼日尔河和桑卡拉尼河流域，在塞内冈比 **165** 亚和卡布，人们种植水稻。[90]最适合在干旱地区生长的小米是萨赫勒的主要农作物，那里一年只有二、三个月雨天，但也种植豆类和蔬菜。伊本·巴图塔特别强调指出了马里食品丰富，生活费用很低，旅行者不必携带给养，因为他们在每个村庄都可获得大量食品。[9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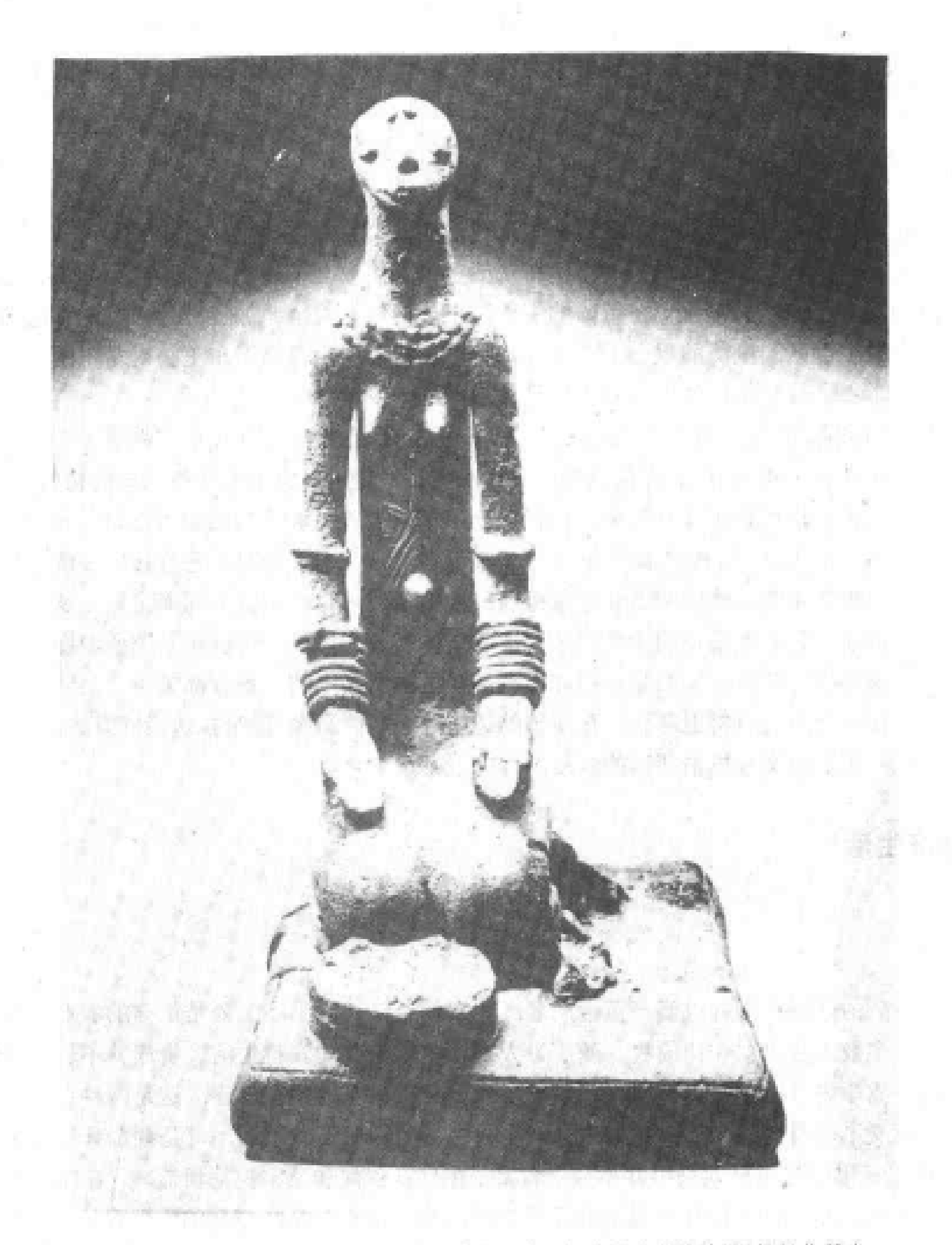
[88] 伊本·哈勒敦，前引著作，第347页；I. B. 凯克，1980年，第46-51页。

[89] I. B. 凯克，1980年；欧麦里，前引著作，第57-59页。

[90] V.费尔南德斯(V.Fernandes)，法文译本，1951年。

[91] 欧麦里，前引著作。薯类容易保存，可够整个冬天食用。

169



图片 6.16 马里帝国：跪形人像，赤陶工艺，发现于班科尼地区（根据热释光测定，证明系 1396－1586 年间）

由于农业这一财富，曼萨才得以保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并以“臣民之父”的面目出现，答应经常赐予恩惠。每次收获，人们一定要给曼萨或他的代表进贡，即使是象征性的也必须这样做；若不将最先收摘的成果进贡给曼萨就是表示对曼萨权力的不敬。在曼德，历来的传统是一季中最早收的甘薯必须献给首领以示尊敬，偷盗甘薯的窃贼要受到曼萨的严惩。到15世纪末，棉花在整个帝国广泛种植；葡萄牙水手将卡萨芒斯描述为盛产棉花的地方。人们用棉花交换铁器。

饲养业和渔业

诸如富拉尼人这样的萨赫勒民族专业从事动物饲养。但到14世纪，尼日尔河流域的大多数农民都已饲养牛、绵羊和山羊。在这一时期之前，已有不少富拉尼人部落为该流域富饶的草场所吸引，就在乔洛夫、塔克鲁尔和曼德定居下来。

只有几个专业的部族从事渔业，如尼日尔河上游的索莫诺人、尼日尔河中游的博佐人、以及廷巴克图和加奥之间的索尔科人。烟熏鱼或干鱼用大筐包装，在帝国各地（一直到南部森林地带边缘）出售。当今，加纳、科特迪瓦和上沃尔特的人食用来自莫普提（取代杰内的那个城市）的干鱼的时间并没有多长。[92]

工匠

有些氏族专业从事手工业。制造铁器专有铁匠，在曼丁哥山区和尼亚尼地区，铁资源相当丰富。铁匠制造农具和武器。[93]曼萨在尼亚尼有大炼铁工场。鞋匠氏族制作皮革制品，并大量输往北方各地。金匠极受尊敬，金饰是由一种叫“西亚基”（Siaki）的金匠在曼德制作的，这种人都住在大城市里。在塔克鲁尔和乔洛夫，贵重金属的锻炼传统可追溯到卡雅-马汉的时代。这些地区的工匠是西非洲最为著名的。 170

纺织业也很繁荣。在帝国各省都进行大宗的成捆的棉花贸易，销往南方各民族地区。用靛蓝染布很快成为塔克鲁尔人和索宁克人的专门行业。玛博是一个专业氏族，在塔克鲁尔从事纺织和染色两种行业。

工匠都在本氏族内部通婚，在曼萨掌权的时代，所有氏族都必须付税，但他们也享有严格规定的权利。无论是皇帝还是贵族，更不用说自由民，都不能向他们索取超过规定的钱款。

贸易

黄金、食盐、铜和柯拉果对马里的经济至关重要。马里有许多金矿，从而使得马里成为古代世界最大的贵金属生产国。黄金是在与曼德相邻的布雷省开采的，那里的人全都从事开采这种黄色金属。塞内加尔河上游的班布克、加拉姆和尼亚尼周围地区也出产黄金（参阅插图6.10）。和卡雅-马汉时代一样，曼萨对块金拥有专有权。[94]马里还从南方

---

[92] 见本书第8章。对渔民和农民课税的数目是固定的，由各个家庭支付。这意味着已进入农奴制而非奴隶制。

[93] W.菲利波维亚克，1970年。考古学家已查明，尼亚尼周围地区铁矿丰富，铁矿石质量颇佳。

[94] 欧麦里，前引著作。

森林地带获得黄金。[95]布龙地区(今天的加纳)的贝戈是进行柯拉果、黄金和铜交易的主要中心。在塔加扎和伊吉勒开采的矿盐由迪尤拉人运往帝国各地零售；塞内冈比亚沿海一带出产海盐，但这种盐没有输往内地。当时的塔凯达是铜生产与销售的大中心地，铜被制成铜条向南输出，那里的人把铜看得比黄金还贵重。现已掌握可靠资料，证明这种铜不仅在阿肯，而且还在贝宁-伊费和伊格博－乌库的文化区销售。[96]马里从南方各国输入柯拉果，索宁克人和马林克人专门从事这种贸易，从而与许多森林地带的人发生接触，其中有阿肯人和古鲁人(即今天居住在加纳和科特迪瓦的民族)，这些人称索宁克人和马林克人为迪尤拉或万加拉商人。[97]

曼丁哥人在寻找柯拉果和黄金时，他们沿尼日尔河两岸到孔城(在当今科特迪瓦境内)和贝戈(在当今加纳共和国境内)的路上设立了若干补给站。他们深入南方传播伊斯兰教和他们的曼丁哥文化。[98]根据豪萨人的传说，伊斯兰教是在14世纪由万加拉人传入中苏丹的。[99]迪尤拉人或万加拉人派出商队，用驴把食盐、棉花和铜驮运到森林地带，他们也雇用小贩。瓦伦廷·费尔南德斯这样报道说，有些来自杰内的万加拉商人拥有的奴隶达200名之多，他们将食盐运往南方以换取黄金。[100]这种传统以及他们强烈的经商意识至今仍是曼丁哥人的民族特点；他们在西非洲的贸易中保持了这种给人深刻印象的精神。

171

---

[95] M.波斯南斯基(M.Posnansky)，1974年。估计每年运往北方黄金的数量相当困难。但是，14世纪整个地中海地区，随着马赛和热那亚等商业城市采用金本位制，对黄金的需求量很大。

[96] 欲了解穿越撒哈拉贸易以及热带大草原与森林地带之间商业活动的情况，见本书第11章和第25章。

[97] 欲了解森林地带柯拉果贸易的情况，见 J.祖农·格诺博(J.Zunon Gnobo)，1976年。

[98] 曼丁哥人向南推进的速度在15世纪末加快了，此时，马里已失去了尼日尔河湾东部的几个省。

[99] 见本书第11章和第25章。

[100] V.费尔南德斯，法文译本，1938年，第85－86页；另见本书第25章。

7 马里帝国的衰落

M. 莱-托尔

引 言

14 世纪以后，也就是在伟大的曼萨（mansa）坎库·穆萨统治时期之后，马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衰落过程。15 世纪和 16 世纪以帝国利益中心西移为特征。迄至此时为止一直与阿拉伯世界进行的帝国贸易有一部分已转向沿海一带，但对其他像桑海和加奈姆等撒哈拉以南的国家来说，穆斯林对贸易的垄断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位于冈比亚河畔的撒图柯和贾格兰库拉市场取代了已属桑海统治的杰内和廷巴克图市场。因此，这一时期阿拉伯人的资料无法提供很多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伊本·哈勒敦的著作是供撰写马里历代曼萨编年史的主要资料，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直到 14 世纪末的历史情况[①]。在他之后过了一个多世纪，利奥·阿非利加努斯的《非洲纪行》（«*Africae Descriptio*»）才为人们提供了关于马里帝国的有权威性的重要阿拉伯根据[②]。 172

西部地区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可由葡萄牙人 1415 年占领休达后出现于非洲来解释；阿拉伯柏柏尔人不是唯一与西方进行贸易的人。欧洲人的资料，特别是葡萄牙人所写的游记，替代了阿拉伯人的资料。欧洲资料中有许多关于马里西部省份、特别是冈比亚和卡萨芒斯的珍贵报道。A. 达·卡·达-摩斯托和迪奥戈·戈麦斯分别于 1455 年和 1456 年溯冈比亚河而上，他们的游记可互为补充[③]。关于 16 世纪初期的情况，我们拥有两份日期几乎相同的记述，一份是杜阿特·帕切科·佩雷拉 1505-1506 年所写的《锡图·奥比斯的绿宝石》（《*Esmeraldo de Situ Orbis*》，前译《埃斯梅拉多》），另一份是瓦伦廷·费尔南德斯 1506-1507 年所写的颇有价值的游记[④]。

但是，最为重要的资料要属安德烈·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的著作《关于几内亚地 173

①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于 1393-1394 年完成了《历史》（*Kitāb al-Ibar*）一书的绝大部分，虽然直到 1406 年他去世之前，他一直不断地对此书进行修改。

② 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是欧洲人所知晓的名字，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哈桑·b. 穆罕默德·乌赞（1494 左右至 1552 年），似乎他并没有真正访问过他书中所提到的所有国家；有些线索需要谨慎对待。

③ A. 达·卡·达-摩斯托（A. da Ca da Mosto），法文译本，1895 年；D. 戈麦斯（D. Gomes），法文译本，1959 年。

④ D. 帕切科·佩雷拉（D. Pacheco Pereira），法文译本，1956 年；V. 费尔南德斯（V. Fernandes），法文译本，1951 年。

区河流的短文集》(《*Tratado Breve dos Rios de Guiné*》), 因为这本书所叙述的马里帝国权力的最后光辉及其声望甚至一直延续到16世纪最后的25年。安德烈·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是出生在非洲佛得角圣地亚哥岛上的葡萄牙人，他经常因经商前往几内亚沿海地区。

除了上述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文字资料外，我们还拥有大量口头传说，尽管时光流逝，但它们往往仍能给我们提供十分宝贵的材料。17世纪中叶的两部苏丹编年史《苏丹史》(《*Ta'rīkh al-Sūdān*》) 和《法塔史》(《*Ta'rīkh al-fattāsh*》), 虽然作者的论点有失公允，但对了解马里帝国崩溃之后的情况非常有用。就马里与桑海的关系而言，这两部编年史又得到当今居住在几内亚、马里和冈比亚共和国的所有曼丁哥人的口头传说的补充。锡吉里地区的口头传说中有许多是谈到尼亚尼的马穆鲁曼萨的，伊夫·佩尔松认为这位曼萨与穆罕默德四世曼萨是同一个人[⑤]。在西部，西曼丁哥人的口头传说尤为重要，因为15世纪和16世纪曼丁哥帝国冈比亚省起着特殊的经济作用。卡布或加布的曼丁哥王国的口头传说也同样重要。富塔托罗和富塔贾隆两地的富拉尼人的口头传说则清楚地说明了曼丁哥帝国和富塔托罗的富拉尼国之间的关系。只要我们很好利用至今尚未得到充分发掘的葡萄牙人的资料，并更进一步研究各种口头传说，我们肯定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了解15和16世纪曼丁哥帝国的历史。

从14世纪开始，由于坎库·穆萨曼萨受人赞颂的麦加朝圣之行，马里与北非的关系得到加强。在此之后，马里的经济和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使马里的影响扩大到它的国境之外。但这个国家的民风民俗却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大量传入的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起了变化。如果一直由像坎库·穆萨或苏莱曼这样强有力的曼萨统治这个帝国，一切都会始终顺利。可是他们的继承者却都是平庸之辈，这些人执政时，马里宫廷内部的阴谋斗争层出不穷。到了14世纪，马里帝国的权力达到顶峰，然而，就在这个世纪末，它的中央政权就开始削弱。此时，一个新的政权正在沿尼日尔河下游发展壮大，这就是以后在所有北部省份中取代马里权力的桑海国。

马里帝国失去了对穿越撒哈拉贸易的控制

在松尼·阿里大帝和桑海的军队到来之前，首先对曼丁哥帝国发动攻击的是图阿雷格人和柏柏尔人。

174 图阿雷格人与柏柏尔人

曼丁哥帝国的权力在14世纪达到了顶点。在其统治之下有各种各样柏柏尔系统的部族群体，例如克尔-安特萨尔人、扬塔拉人、梅杜萨人和伦图纳人，这些部族都已作为曼丁哥社会的一部分过着定居生活，而且都向曼萨纳贡。然而，生活在阿伊尔和伊福拉

⑤ Y. 佩尔松(Y. Person), 1970年。穆罕默德一世在位时间是1305至1310年；1599年攻打杰内的那位曼萨是穆罕默德四世。



图片7.1 坎加巴地方的"卡马-布隆"(专供礼拜用的茅屋)：全貌



图片7.2 坎加巴地方的"卡马-布隆"(专供礼拜用的茅棚)：外观

斯高原的柏柏尔系统游牧部族却富有造反精神。他们的服从只有在像坎库·穆萨和苏莱曼这样强有力的曼萨统治之下才是真心实意的。1387年左右穆萨二世曼萨去世之后，漫长的争夺继承权的危机开始了。松迪亚塔的后代是王室家族中的长房，他们试图重新取得政权，而当时的政权自坎库·穆萨死后就一直由非长房，即松迪亚塔弟弟芒代·博里的后代执掌。

这一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导致了三年之中有两个曼萨惨遭暗杀，这种情况极大地削弱了王室权力和中央政权，尤其是在萨赫勒地区更是如此。从15世纪起，图阿雷格人对廷巴克图城进行了多次侵袭，他们终于在1433年前后占领了这个城市，同时被占的还有大多数萨赫勒城市，其中包括瓦拉塔、内马，甚至还可能包括加奥在内。

占领了马里北部省份之后，图阿雷格人又大举向南进犯。这样，他们在穿越撒哈拉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加强。但他们的军事优势持续时间不长。在松尼·阿里大帝统治下桑海国家逐步兴起，这对图阿雷格人无疑是个致命威胁，同时也说明了后来以松尼·阿里大帝为一方，廷巴克图的学者、贵族和大部分来自柏柏尔城市瓦拉塔的"乌里玛"（*ulamā'*伊斯兰贤哲）为另一方之间发生意识形态斗争的原因。

图阿雷格人的军事行动和桑海的霸权地位所产生的主要后果是对马里构成了一种窒息经济的威胁。但是，葡萄牙人到来之后大西洋贸易的发展则又给马里提供了喘息的机会。西部各省此时已成为起主导作用的物资供应地，它们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日益明显。

马里西部各省

坎库·穆萨曼萨的前辈阿布·巴克尔曼萨曾试图航行于大西洋，虽然他毫无所获[⑥]。尽管如此，在葡萄牙人发现非洲之前，塞内冈比亚诸省和大洋本身在马里的地理政治学和商业发展方向上只起了有限的作用。然而，从15世纪起，葡萄牙和马里的君主建立了外交关系，两国商业上的联系于是也就日趋紧密。

贸易

马里的曼萨们仍然控制着布雷的金矿；并且，万加拉族商人寻找黄金远达阿散蒂。商176 队定期来到沿海地区用黄金交换铜、黑色和蓝色棉布、亚麻布、印度织物、红色棉纱乃至缀有金银饰物的外衣。万加拉人所持黄金常常多于葡萄牙小商船运来的货物，于是他们只好带回剩余的黄金。万加拉人实际上是相当精明的商人，他们有砝码和天平，因此，他们再也不满足于对黄金重量的约略估计。这样，他们成功地用自己的黄金获得最大的利润[⑦]。

欧洲人很早就开始利用在不同地区进行交易的可能。他们在富塔购进马匹，运到冈比亚卖出。马匹贸易加强了曼丁哥军队的力量，同时也导致了另外一种贸易的发展，那就是奴隶买卖。在乔洛夫人的国王和冈比亚地区的马里省督对马匹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的

⑥ 参阅本书第26章。

⑦ D.帕切科·佩雷拉，法文译本，1956年，第69和70页；A.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A. Alvares d' Almada），法文译本，1842年，第26、27、29、30和43页。

同时，葡萄牙人也力求使其国内的黑人数目能得到增长，他们经常用马匹去交换奴隶(最初，一匹马换8名奴隶，很快一匹马能够换到15名奴隶)。贸易往来对非洲人十分不利，所以情况迅速恶化。 177

马里帝国西部诸省贸易的兴旺一直持续到16世纪末。葡萄牙人安德烈·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甚至在1594年还写道："全几内亚最大的贸易额是在冈比亚"；而冈比亚当时仍是马里的一个省[8]。但贸易仅给马里人口中的一个专职化的部族——万加拉人提供了职业，而大多数人是农民和牧民。

农业和畜牧业

马里西部各省雨量充沛、河流纵横。每到雨季，棉田、稻田一片葱绿，特别是冈比亚河两岸，景象更是诱人[9]。这条大河所经之处雨量丰富，而且经常泛滥，所以两岸整个流域积有大量肥沃土壤。到时河流的洪水范围很广，有时向上游行驶的船被冲出河床，卡在树丛之中[10]。冈比亚河沿岸森林茂密，林中野生动物甚多；而深入腹地则树木稀疏，生活着成群的大象，象的长牙为象牙贸易提供了大量货源。与东部的曼丁哥人一样，西部的曼丁哥人也热衷于狩猎，而狩猎又与宗教密不可分。作为一个得到公认的好猎手必须同时熟悉森林，这就与巫术紧密相联。西部各省的气候十分湿润，那里的畜牧业和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农民既放牧又耕作。冈比亚的富拉尼族牧羊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在富饶的草场周围定居下来。以后，富拉尼人组成了村庄。正如我们将要在本书读到的那样，它们在15世纪末开始在政治上起作用。畜牧业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然而皮革贸易得到发展则是在很久以后。

社会与社会风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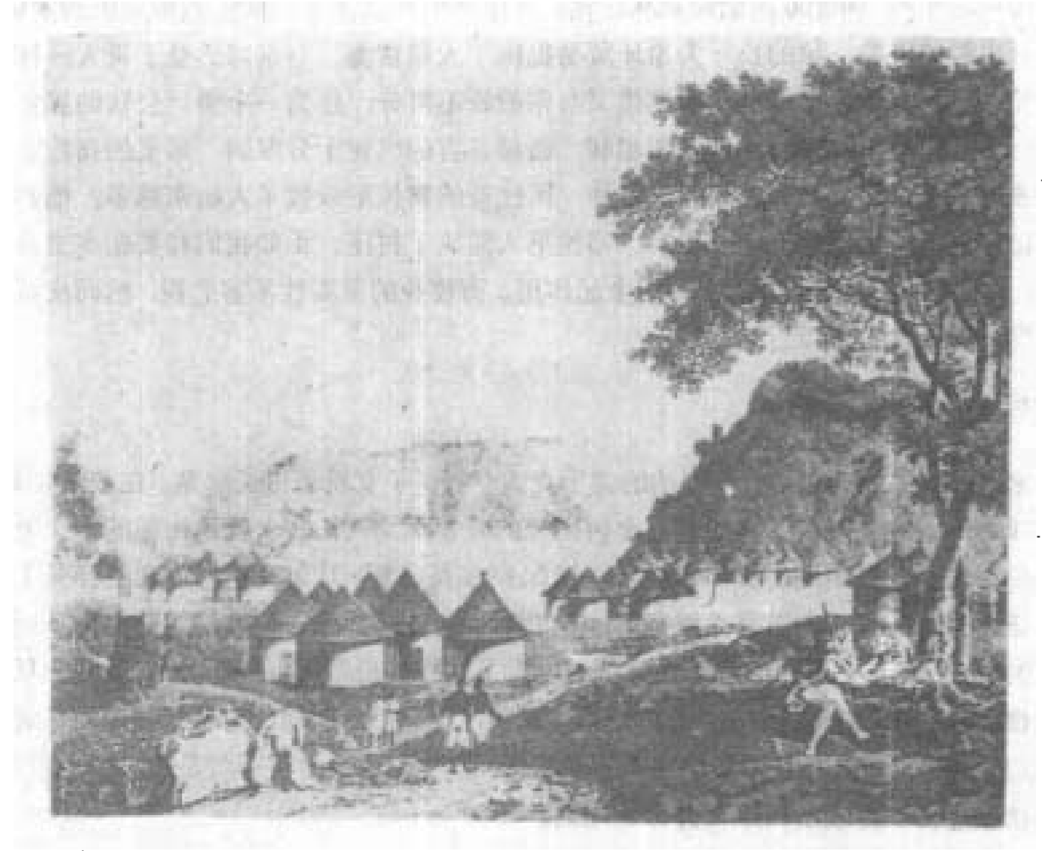
家庭以母系制为基础，与加纳的索宁克人一样，子女属于母亲家系。在政治领域中，这意味着母系继承制。举例而言，全冈比亚的首领桑戈利法林，就是由他的一个外甥代表他在冈比亚河口附近的尼乌米执政。据A.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说，在西部曼丁哥人中，曼萨的有些标志与王家血统有关，这说明了为什么选择一位外甥的原因，从而消除人们的误会。巴克里对加纳的母系继承制也做了同样的说明[11]。在卡萨芒斯等地一旦由长老会议推举出了新的法林(farin)，他必须退隐一年，在此期间，他所管辖的地区暂由他人摄政。这些人一般都是原先法林手下的将领，但其中至少要有一名是王室的成员[12]。这种办法显然为玩弄政治阴谋大开方便之门。 178

西部曼丁哥人的另外一个特点则表现在其宗教信仰中。他们都信泛灵论，即万物均

[8] A.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前引著作，第35页。
[9] G.E.德-祖拉拉(G.E. de Zurara)，法文译本，1960年，第346页；A.达·卡·达-摩斯托，法文译本，1895年，第70页。
[10] A.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前引著作，第33页。
[11] 巴克里(al-Bakrī)，法文译本，1965年。
[12] A.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前引著作，第42、80页。

有灵[13]。出现诉讼案时，控告往往与巫术有联系，几乎所有案例都经过实地试验。被告被带到法林面前，法林完全依靠所谓的“红水判断法”作判决。诉讼双方都要喝一定量浸泡过一种特定植物根而呈红色的水，先呕吐者胜诉，败诉者被认为是巫士，或被抛给野兽、或是与他全家人一起入狱[14]。对首领们来说，这显然是获取奴隶的一种十分经济的方法。

首领极大部分是伊斯兰教教徒。但在多数场合，宗教不过是一种虚饰，例如在卡萨芒斯，每次开战之前穆斯林曼萨按惯例总是要让伊玛目（imam）去请教占卜者[15]。也还是在卡萨芒斯，穆斯林首领把祭奠死者当作一种习惯：他在喝酒之前，必须先在地上给死者洒上几滴祭酒。在田地里，人们总是把米粉和玉米粉用山羊或小母牛的血掺合起来涂抹在木桩上，认为这样可保丰收。耕地的祭礼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在卡萨芒斯河和里奥格兰德河流域内地，15世纪曼丁哥人的卡布王国强烈崇拜传统宗教。国王虽仍依靠尼亚尼中央政权，但他已经降服了几乎所有曼丁哥人的省份，因此按卡布人的传统称这位



图片7.3 卡马利亚（位于马里，坎加巴的西南）远景，选自芒戈·帕克《非洲内地游记》（1799年）

[13] A.达·卡·达-摩斯托，前引著作，第40页。
[14] A.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前引著作，第40页。
[15] 同上，第39页。

国王为“卡布曼萨巴”(*Kaaba Mansaba*, 卡布的大王), 但在葡萄牙人的书中他只是“加布法林”(*Farin Gabo*)。[16]

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在这些地区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特别是在16世纪[17]。在沿海地区到处可见流动的隐修士，他们禁食猪肉，分发护身符。和在14世纪一样，隐修士们动员皈依的对象主要是首领。因为一旦首领皈依了伊斯兰教，他的臣民自然就会跟随，至少在名义上如此。但是，这样的皈依过于表面化，因为同是这些首领，只要一遇机会，也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他们的新宗教而改奉基督教[18]。 **180**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西部曼丁哥人社会面临了新的现实问题，即受到伊斯兰教以至基督教文化的渗透。这些外界影响必定会动摇传统的平衡。但到处都充满了最为严重的危险，这主要在于军事方面。正当爱好和平的曼丁哥人专心于进一步繁荣他们的商业和农业的时候，在他们的北部一股可怕的势力，即“伟大的富”正在崛起[19]。

富拉尼人的崛起：对马里西部各省的威胁

汤吉拉家族：1490－1512年

从13世纪开始，居住在特尔迈斯的富拉尼游牧民就一直在向南渗透，先是富塔托罗，继而是马西纳的大布尔哥地区以及富塔贾隆牧草丰富的高原。起初他们只是当地首领的附庸，最后却使自己凌驾于本地人之上，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见插图7.1）。富塔托罗的富拉尼国家就是这样在汤吉拉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汤吉拉的儿子考利则更是众所周知。

考利·汤吉拉是其事迹载入传奇书籍的非洲人物之一。富塔托罗的传奇故事把他说成是松迪亚塔的儿子，汤吉拉只是他的继父。父子关系的这种说法只能被看做是传奇故事想要把西非中世纪史上这两位伟大人物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意图。正如有人已经做的那样，我们至多可以认为考利有曼丁哥人的血统[20]。

在汤吉拉和考利的领导下，丹尼扬克（或丹尼扬科比）富拉尼人侵占了塞内冈比亚全境。他们所经的路线目前尚有待于探讨。有些人认为他们从富塔托罗出发向富塔贾隆进军[21]；另一些人则坚决认为他们走的是相反的方向[22]。不管怎么说，人们全都肯定他们与曼丁哥人作过战[23]。

---

[16] A.多纳赫（A. Donelha），英文译本，1977年。

[17] 这可能与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变化有关系；在富塔，海尔普拉人的信仰取代了丹尼扬克富拉尼人的信仰。

[18] 见D.戈麦斯就尼乌米曼萨令人吃惊地改信基督教的描述，法文译本，1959年，第42－44页；又见A.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前引著作，第25页。

[19] 为丹尼安克富拉尼首领起的名字。

[20] J.布莱格（J. Boulègue），1968年，第186页。

[21] 这是M.德拉福斯（M. Delafosse）的论点，A.特谢拉·达－莫塔（A. Teixeira da Mota）对日期进行了校订和修正。

[22] J.布莱格，前引著作，列举了这种观点的根据。

[23] 或许两个族群（富拉尼人和曼丁哥人）关系中凯塔氏族所起的作用是参照考利·汤吉拉的家谱确定的。

1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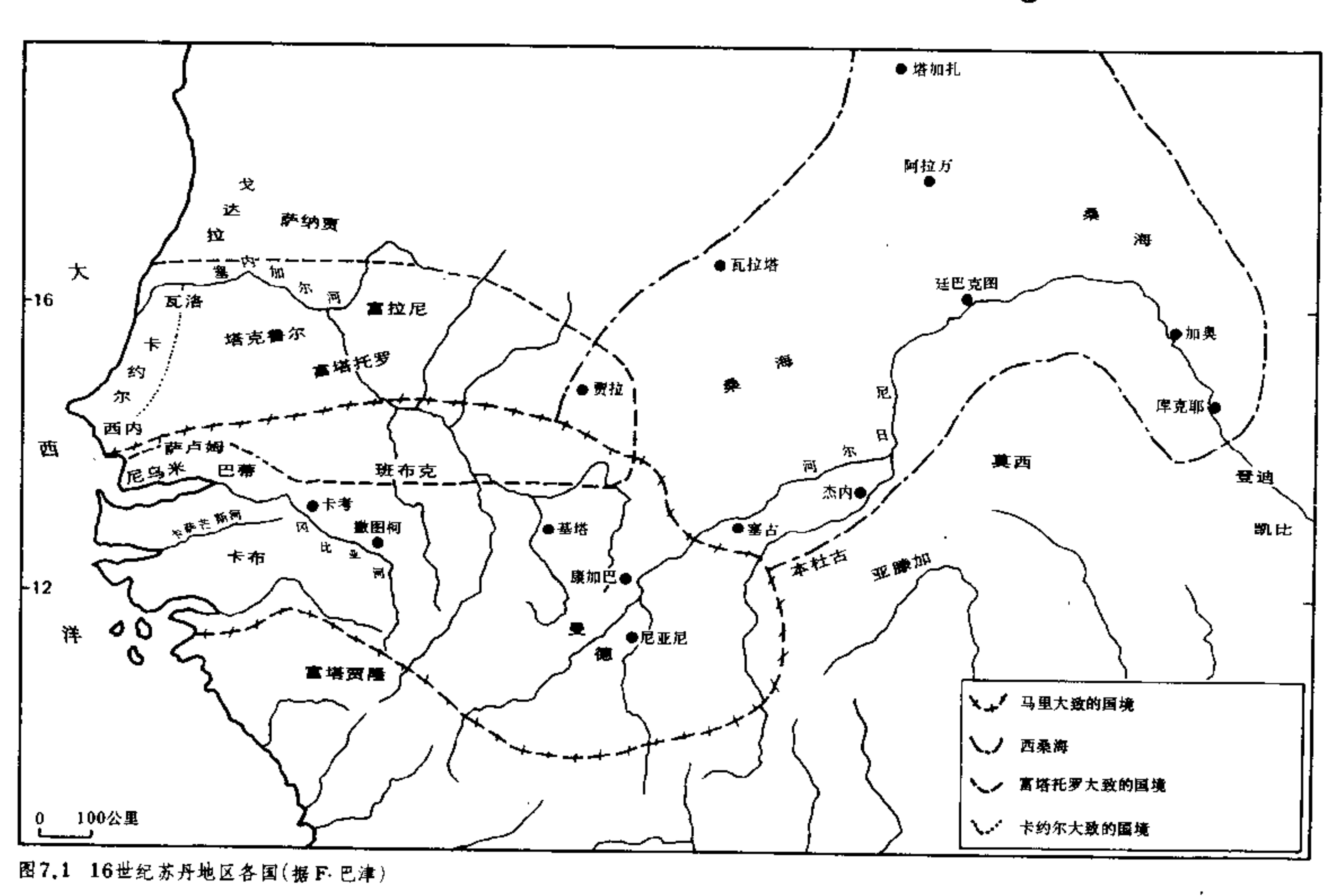


图7.1 16世纪苏丹地区各国(据F. 巴津)

丹尼扬克人与马里帝国的曼萨之间进行战争的确切日期尚待查考，但肯定是发生于1481年至1514年之间。当地的口头传说对富拉尼军队的情况有生动的描述。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后，安德烈·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还听人说他们的马队和骆驼队多得不计其数，更不用说他们所带的牛群了。考利不仅征服了富塔，而且在那里定居下来，因为他被那块肥沃的土地吸引住了。

181

一直在富塔贾隆丘陵地带行使权力的马里当局这时开始撤退。马里连接西部各省的交通线向北朝冈比亚和卡萨芒斯后移[24]。到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连接马里东部和西部的通道只剩下一条狭长的走廊。马里帝国的曼萨派往冈比亚撒图柯市场出售黄金的曼丁哥商人再也不能保证平安无事了。他们不得不绕道而行，以至旅程有时要用长达6个月的时间[25]。

考利和其父亲的军队由于得到来自富拉尼人定居地（特别是马西纳）兵源的补充而迅速壮大。这支军队向本杜，又从本杜向富塔托罗进发[26]。他们在"富拉尼滩"越过冈比亚河。"富拉尼滩"是以这次军事行动而得名的。为了使人能对这支军队人数之多有个概念，口头传说描述道，如要填平这条宽5公里（或1里格）的河，只要每个士兵搬一块石头就够了。父子俩在征服本杜之后便分手了；汤吉拉率领军队朝扎拉王国进发，而考利则开始征讨富塔托罗。

扎拉（迪亚拉）王国的陷落

我们已经知道，16世纪的最初两年，扎拉（迪亚拉或桑卡拉）王国已落入桑海人之手。阿斯基亚（askiya）穆罕默德鉴于其兄弟乌玛尔·康迪阿哥因攻打曼丁哥人的扎拉王国而陷入困境，迅即前往救援，并征服了曼萨派驻当地的代表。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在这个地区停留了相当长时间，"安抚"占领区的人民并在新的基础上将他们组织起来[27]。

但和平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富拉尼军队已经出动，并且很快就冲进了扎拉王国。阿斯基亚的兄弟不得不再行作战。这次战斗比与曼丁哥人那次作战要顺利得多。汤吉拉战败身亡，据《苏丹史》一书记载，时间大致是在1511-1512年间[28]；据《法塔史》一书记载，时间则在1512-1513年间[29]。桑海人通过这一行动再次表明他们多么需要扎拉王国，有了这块土地他们就可以插手班布库的矿山。考利并没有滞留于此，而是继续长驱直入富塔托罗[30]。

---

[24] Y.佩尔松，前引著作，第287页。
[25] A.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前引著作，第30-31页。
[26] J.布莱格，前引著作，第186-189页。
[27] 萨迪（Al-Sa'dī），法文译本，1964年，第124-125页。
[28] 同上，第127页。
[29] 马哈茂德·卡蒂（Mahmūd Ka'ti），法文译本，1964年，第127页。
[30] 萨迪，前引著作，第127页。

182 富塔托罗和乔洛夫的陷落

富塔仍留有曾受曼丁哥人统治的痕迹。当扎拉的国王从属于马里的曼萨时，各个法林都非得听命于他不可，但一旦扎拉被桑海征服，法林们就多少有些自由了。考利只须与地方上的小头领进行战斗即可，而这些小头领们彼此间还是分裂的，这样，他的使命便大大简化了。他建都于安亚姆－戈多，多次从那里领导攻打乔洛夫帝国的军事行动，占领了该帝国的好几块领土。据A.拉斐纳尔在1846年收集到的口头传说称，考利“很快就成了使附近各民族，特别是乔洛夫人，感到心惊胆战的人物，因为只经过几次战斗他便将乔洛夫打得落花流水。他占领的肥沃良田并入了他从摩尔人那里掠夺来的土地。从此以后，乔洛夫只拥有南面的一片土地，远离那条大河及其支流[31]。富塔对乔洛夫的宗主权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上半叶。

这时，那位被葡萄牙人称之为“伟大的富”（所谓“富塔的锡拉蒂奎”（国王））的人物，正在逐步蚕食马里西部诸省。尽管如此，正如安德烈·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所指出的那样，马里曼萨的权力从冈比亚到卡萨芒斯一直有效地行使到16世纪末。远至撒图柯之外1500多公里（300里格）的地方，人人都知道有个曼萨在位，个个都听从他的命令，民间传说把他看做是所有黑人的统治者。埃尔－米纳的居民称他为“大象”，但到了这个时候，这“大象”已是年老力衰、即将倒毙了。

马里帝国的衰亡

遭受东西两方夹击的古老帝国，同时还面临着一种虽然隐蔽但却相当可怕的威胁：葡萄牙人对西非政治生活的干涉。

马里与葡萄牙：马哈茂德二世曼萨和马哈茂德三世曼萨

葡萄牙人在与黑非洲进行了最初几次（也是特别激烈的几次）交火之后，由于沿海人民坚强的抵抗，不得不改变政策。这时，他们转而潜心于赢得土著统治者的信任[32]。葡萄牙历届国王派遣了许多外交使节前往西非各国。举例而言，1481至1495年间，约翰二世就向富塔国王、廷巴克图科伊（*koi*）和马里曼萨派出了使团。

183 派往马里的使团就有两个，这表明葡萄牙国王十分重视这个国家。第一个使团抵达冈比亚，第二个使团又从埃尔－米纳堡动身。接待他们的那位曼萨叫马哈茂德，他是乌里曼萨的儿子、穆萨曼萨的孙子。[33]尽管已与丹尼扬克富拉尼人开战，但马里当时还十分强

[31] A.拉斐纳尔（A.Raffenel），1846年，第317－318页。

[32] 实际上是把人掌握在手中。见M.莱－塔勒（M. Ly－Tall），1977年，第17页。

[33] 注意：马哈茂德（Mahmūd）、乌里（Ule）和穆萨（Mūsā）这几个名字频繁出现，异人同名在马里王室中是常见的。

大。在致葡萄牙国王的信中，马哈茂德二世曼萨自称他的实力只有四个素丹，即也门、巴格达、开罗和塔克鲁尔的素丹能与之相比。[34] 1534年，马哈茂德三世曼萨接待了一位使节，这是受葡萄牙国王派驻在埃尔－米纳堡的代表若奥·德－巴罗斯的派遣，前来与曼丁哥统治者就冈比亚河两岸的贸易问题进行谈判的。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葡萄牙人已开始插手沿海国家的内部纷争。举例而言，大约在1482年前后，有一位贝莫伊（bemoy），即以乔洛夫国君名义行使权力的摄政，接受了葡萄牙国王的援助，用以反对合法继承人。这一类的“友好”使团同时还负有了解这个古老帝国内部局势并提供情报的任务。葡萄牙人所采取的另一政策是给沿海地区一些小头领们提供贸易上的优惠，从而诱使他们摆脱芒代曼萨的束缚。这就是曾经在萨卢姆王国发生的事情。

马里与萨卢姆王国

萨卢姆王国很可能是西内人的国王姆贝加尼·恩杜尔在15世纪晚期创建的，16世纪其地域大为扩张。到1566年，它已占据了冈比亚河以北和西内的很大部分。它所拥有的强有力的行政和军事机构使它成为冈比亚省最强大的酋长国之一。葡萄牙商人安德烈·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对其军事组织的效率印象特别深刻。所有的村长（当地人称为“贾戈亭*jagodim*”）由两名军事长官（当地人称为“贾加拉夫*jagaraf*”或“贾拉夫*jaraf*”）进行监督，“当国王想招募一支军队时，他只需通知那两名军事长官，由他们把他的命令传达给村长，各个村长负责召集各自的人员。由此，只需很短时间，国王便可集结起一支庞大的军队，其中包括许多骑兵，马匹则从富拉尼人和摩尔人那里购买”[35]。

萨卢姆王国最后终于从冈比亚的监护下解放出来，而且还兼并了冈比亚河沿岸的几个小酋长国，成立王国。17世纪初期（1620－1624年）英国人理查德·乔布森报道说，在那些地方已经没有人再提冈比亚王国了[36]。这时，在马里帝国的这个重要的省份里已有三个王国：萨卢姆、伍利和坎托尔[37]。 **184**

古老的马里帝国所剩下的部分终于失去了它最后一个与外界相通的门户。接着，在1599年，马里的曼萨为了在尼日尔河三角洲中部重获立足之地孤注一掷，作出最后的努力，但这只是天鹅临终前的最后一曲。

---

[34] 马哈茂德二世曼萨大概有些夸张他的实力。

[35] A.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前引著作，第26和28页。

[36] R.乔布森（R. Jobson），1932年版本。

[37] J.布莱格，前引著作，第238页；A.多纳赫，前引著作，他认为有卡布或加布王国（法林加布）存在。在1600年之后，这个曼丁哥王国似乎占有塞内冈比亚的最大部分。

马里的孤注一掷：1599年马哈茂德四世曼萨在杰内的失败

马哈茂德四世曼萨试图利用摩洛哥占领军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制造的混乱局势，从中取利。大多数班巴拉族和富拉尼族的地方首领（博卡的卡拉·查阿、马西纳的卡拉或哈马迪·阿米纳以及法尔科和奥马的村镇首领）都支持他，这使他的实力大为加强。他率领军队向杰内进发。但是，卡拉·查阿中途背叛。当时，卡拉·查阿没有看到两员大将赞加·祖玛和法伦·苏拉的踪影，便决定站到摩洛哥人一方。如果没有这次背叛，马里的曼萨完全有可能夺回杰内。不管怎么说，当摩洛哥增援部队抵达这个城市的时候，马里帝国的军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部队人数众多，云集于河湾两岸，而这是船只通往城市的必经之路"。[38]

接着，卡拉·查阿又提出一个十分可取的建议。于是，摩洛哥人得以在一次强攻之后占了曼丁哥军队的上风。但即使在一败涂地的时候，这位曼萨还是受到了他应得的尊敬。卡拉·查阿和索亚·穆罕默德"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与他见面，向他行应向素丹行的礼，并且按惯例向他脱帽致敬"。马哈茂德四世曼萨试图夺回对这西非大商业城市统治权的努力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本来依附于曼萨的各个省份纷纷独立。据萨迪所述，这次土崩瓦解导致了五个小王国的兴起[39]。

马里帝国的崩溃，主要得益者是班巴拉人（巴曼南人）。在曼萨的统治下，到17世纪初期，他们已在扎拉王国以及尼日尔河三角洲的核心部分建立了一些相当重要的中心。整个17世纪，这些中心由于移民源源不绝的到来而力量大为增强，最重要的移民浪潮是由巴拉曼果罗和尼安果罗兄弟俩领导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为塞古和卡尔塔这两个班巴拉人的王国奠定基础。马里帝国这时已降为一个王国，即曼丁王国，如今它的版图只包括卡布、基塔、迪奥玛和克尤马万亚这几个地区[40]。

185

结　论

马里帝国的政治衰败经历了很长时期。15世纪前半叶，它失去了北部各省，得益的首先是图阿雷格人，然后是桑海人。多亏西部诸省所具有的经济力量，马里帝国才得以与这新国家长期共存，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6世纪末。由于万加拉人和迪尤拉人充满活力，15和16世纪马里的文化和商业仍具有相当影响。访问过马里西部的欧洲人给人们留下了一幅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十分坚实的画面。

行政上，有一名管辖不少村长的法林，他代表马里的曼萨。这类村长在当地叫做"尼乌米－曼萨"、"巴蒂－曼萨"、"卡萨曼萨"等等。到了15世纪中叶，这位法林称作桑戈利，住在巴蒂曼萨村东南方，到南方要走10天的路程。[41]有一些村长是依附王室的奴隶。

[38] 萨迪，前引著作，第279页。
[39] 同上，第279页和21页。
[40] Y.佩尔松，前引著作，第283页。
[41] A.达·卡·达·摩斯托，法文译本，1937年，第67页。

继承通常为母系制。据迪奥戈·戈麦斯说，冈比亚河附近的一个村庄的村长弗朗加齐克，就是桑戈利法林的外甥。[42] 但到16世纪，随着有些地方的曼萨皈依伊斯兰教，我们发现父子相传的继承制已逐渐采用。从16世纪开始，卡布成为一个更为强大的王国，这时它宣告独立，并控制塞内冈比亚大片土地[43]。

法林有包括奴隶在内的许多随员。向他致敬时，奴隶们必须要脱下衣服，自由民则要抛下武器跪地叩拜。称为法尔巴（*farba*）的政府官员来往于各村之间收缴税金，这是曼萨岁入的主要来源。

这地区有冈比亚和卡萨芒斯两条大河灌溉，农产品相当丰富。15和16世纪所有葡萄牙人写的资料都讲到冈比亚王国和卡萨芒斯王国那些长势良好的棉田、一望无际的稻田和茂密的森林。但最重要的经济活动还是经商。在冈比亚河口收取的食盐被送到内地换取黄金。贸易使冈比亚河沿岸出现了拥有重要市场的城镇，如撒图柯和贾姆南苏拉，这些城镇是出售马匹、酒类、布列塔尼棉布、玻璃饰物、珠串、钉子和手镯等物品的葡萄牙商人的落脚点。他们在这些地方所遇到的曼丁哥商人的经商经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4] 黄金贸易的高额利润培育了万加拉人富商阶层。迪尤拉人的这些先驱者对传播曼丁哥文化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南部森林地区（现在的科特迪瓦、加纳和几内亚）。 **186**

在15和16世纪，伊斯兰教的影响在马里西部还很薄弱。[45] 迪奥戈·戈麦斯确曾在尼乌米曼萨的宫廷中遇到过来自马里西部省份的一名伊斯兰教隐修士，但当时他的影响尚微不足道，以致葡萄牙旅行者几乎毫不费力就使这位曼萨信奉了基督教。[46] 只是从16世纪后半叶起伊斯兰教才开始在冈比亚王国深深扎下根来。虽然首领们往往都是伊斯兰教徒，但他们仍保持对泛灵论的信仰。卡布是塞内冈比亚传统宗教的堡垒。这个地区不准穆斯林进入，不论他们是富拉尼人还是萨拉科尔人全都一律对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47]

随着黄金贸易的衰落，许多曼丁哥人受柯拉果贸易的吸引而转向南方。[48] 16世纪后期，曼丁哥人开始向南部和东南部大量移民，他们在这里沿着这条柯拉果之路建立了许多定居点。[49] 19世纪，萨摩利正是向这些中心地寻求援助以建立他的帝国。

---

[42] D.戈麦斯，前引著作，第34页。

[43] A.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前引著作，第6页；A.多纳赫，前引著作，第119－120页。

[44] A.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前引著作，第29页；他说，人们用天平称量黄金，分量“丝毫不差”。

[45] 冈比亚人大多数信奉泛灵论：J．巴罗斯（J. Barros），英文译本，1937年，第70页。

[46] D.戈麦斯，前引著作，第42－44页。

[47] A.阿尔瓦雷斯·达尔马达，前引著作，第28页；S. M. 西索科（S. M. Cissoko）和M. 西迪贝（M. Sidibé），提交1972年在伦敦召开的曼丁哥大会，1972年。

[48] 随着沿海地区奴隶贸易的开展，黄金贸易曾出现下降趋势。

[49] Y.佩尔松，前引著作，第284页。

12到16世纪的桑海



S.M. 西索科

187 在经历了近800年的长期演变之后，定居在尼日尔河中游两岸的桑海人，于16世纪建立起了一个强大国家，统一了西苏丹的大部分地区，从而使数世纪以来形成的灿烂文明得以大放光彩。为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将这一演变过程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目的在于我们能尽力根据桑海本身的口头传说以及阿拉伯和欧洲的一些原始资料，特别是廷巴克图的两部史书（指《苏丹史》和《法塔史》）来认清这两个阶段，以识别它们的主要特征。[1]

加奥王国：从12世纪到1464年松尼·阿里·贝尔登位

目前，人们对松尼·阿里·贝尔统治时期（1464－1492年）以前的桑海历史所知甚少。现存有关这一时期的极少一些阿拉伯资料引起的疑问反而多于问题的答案。口头传说只能对于当时的生活勾划出一个大致而很不完整的轮廓，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现有研究情况只能批判接受。研究中涌现出来的问题会比解决的还要多，即使提出一些解答也不过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些假设而已。

12世纪的加奥王国

由于恰好地处尼日尔河畔，位于苏丹地区和萨赫勒地区边缘这样一个有利的地理位置，加奥于12世纪就成为新建的桑海国的国都，而旧城库克耶或阿拉伯作家笔下的库加则黯然失色而消失。与塔乌特克（该地确切位置现尚难以确定）的食盐贸易，经由塔德梅卡从利比亚、埃及和伊弗里基亚源源而来的货物，以及来自图瓦特和遥远的西马格里布的商队，使加奥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世界性市场。188

然而，阿拉伯原始资料中提到这个城镇时所用名称并不确切。称这座城镇为“考考”的巴克里写道，该城镇坐落于尼日尔河畔。[2]伊德里西证明该城与库加城并非一地，他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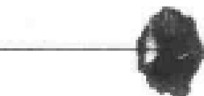
[1] 萨迪（Al-Sa'dī），法文译本，1964年；马哈茂德·卡蒂（Mahmūd Ka'ti），法文译本，1964年。这两部著作的作者都是苏丹地区的人，都写于17世纪中叶左右。它们是本文所述时期桑海和西苏丹历史的基本史料。

[2] V. 蒙泰伊（V. Monteil），1968年，第79页。

189



图片 8.1 在加奥－萨内挖出的第11号墓碑(SO 50－59 bis)，长方形石英板(高0.38米、宽0.28米)。碑上写的是："此处是穆罕默德·古姆阿之墓，上帝宽恕，他死于阿拉伯历安息年496年6月星期五（即公元1140年5月1日）"



190

图片8.2 在加奥－萨内挖出的第14号墓碑（SO 50－54），黄褐色页岩板（高0.49米、宽0.29米）。碑上写的是："世上的生命最终都将枯萎，归诸吾主。此处是穆罕默德之女好娃（?）之墓，真主宽恕，她死于阿拉伯历希吉拉534年9月12日星期四夜（即公元1140年5月1日）

库加“人口稠密并筑有城墙”，位于尼日尔河北岸，距北面的“考考”（加奥-加奥）步行约 20 天的路程。[3]应当注意到的是，加奥和库克耶两城在 12 世纪同时存在。

沿尼日尔河两岸从登迪延伸到加奥的这个王国是在迪亚人或称扎人的统治之下，迪亚人大概是与柏柏尔人相通婚的一个桑海少数民族。[4]不管是何说法，在 11 世纪，迪亚人具有桑海人称之为坎塔（*kanta*）或坎达（*kanda*）这样的称号。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是迪亚－科索伊人于 1019 年皈依伊斯兰教。桑海人似乎并未以此为榜样，他们依然一直信奉自己的传统宗教信仰和习俗。在加奥－萨内发现的墓碑上面所刻的伊斯兰姓名不同于两部史书中的那些姓名，因此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它们可能是从境外搬到这个地区来的（见图片 8.1 和 8.2）。

曼丁哥人的统治和松尼王朝：13 至 15 世纪

可能是在 1275 年左右，更可能是在 1285 年至 1300 年之间，[5]曼丁哥军队征服了加奥王国。大约在 1324 年到 1325 年，穆萨曼萨在朝圣归途中在加奥建起了一座清真寺。曼丁哥人在法林（farin）或地方官的指导下，把尼日尔河河湾地区组成行政区，并促进它的经济发展。加奥成为了一个大商业中心，成为苏丹地区最佳城镇之一。[6]

曼丁哥人的统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加奥的迪亚人实际上只是向曼丁哥人纳贡，他们利用了马里处于困境摆脱曼丁哥人的控制。总之，曼丁哥人对加奥的统治看来是结束于 14 世纪末。由阿里·科隆于 13 世纪建立的一个新王朝，即松尼王朝独立而起，并取代了曼丁哥人。

这一王朝起源于何处现尚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布布·阿马认为他们来自库克耶，并将曼丁哥人逐出了加奥。[7]松尼人也称“Sii”或“Shi”，世世代代是武士。这个世系中的最后三个君主从加奥开拔，向西部富庶的马西纳和马里帝国发动了战争。松尼·阿里的父亲松尼·马达乌，开始对曼丁哥帝国的国都尼亚尼进行大规模的远征袭击，将它洗劫一空，掳走了属于曼萨的 24 个奴隶部落。他的继位者松尼·苏莱曼·达马又侵略并摧毁了马里帝国索宁克省的中心城市内马，抢走了大量战利品。历次战争扩大了统治者的势力范围，加奥国王成了尼日尔河湾的真正的主人。该王朝在 1464 年松尼·阿里即位之后，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191

---

[3] 伊德里西（Al－Idrīsī），法文译本，1866 年，第 3 节，第 12－14 页。

[4] 萨迪，前引著作，第 1 章，提供了一段关于扎人或迪亚人起源的传说，说他们的祖先来自也门。M. 德拉福斯（M. Delafosse），1912 年，第 2 卷，认为迪亚人是伦塔柏柏尔人，曾皈依基督教使加奥王国免遭索尔科人的掳掠。B. 阿马（B. Hama），1968 年，认为迪亚人是桑海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是混血种人，皈依伊斯兰教。

[5] V.蒙泰伊，前引著作，他通过对M.德拉福斯的前引论文进行认真的评论阐明这个问题，M.德拉福斯的文章把曼丁哥人的征服定在 1324 到 1325 年间。

[6] 伊本·巴图塔（Ibn Battūta），法文译本，1966 年，第 72 页。

[7] B. 阿马，前引著作，第 3 至 5 章。

15到16世纪的桑海帝国

松尼·阿里·贝尔，或称
松尼·阿里大帝（1464－1492年）

松尼·阿里·贝尔改变了加奥王国的命运。他放弃先辈所采用的突袭政策，改而大片征服领土。[8]为此，他建立了一支严格训练和组织完善而又有优秀指挥官指挥的军队。在尼日尔河上有一支小舰队，归希－科伊（*hi koi*，统管河流和舰队的大臣）指挥；有相当数量的步兵，它的队伍靠收编战败而被征服的武士不断得到扩充；最重要的是一支骑兵，它的机动灵活在这位伟大松尼的历次征战中起了先锋作用。松尼·阿里·贝尔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经常率领他的骑兵，一马当先，巡察尼日尔河流域各处，出奇兵制服敌人，以快速使敌惊惶失措，靠武力和威慑推行他的权力。在他同时代人的心目中，他享有战无不胜的名声，是下凡的战神。他还被尊为了不起的巫术大师，是一个超凡入圣的人物；人民给他冠以“*daali*”的称号。[9]

和他的先辈一样，松尼·阿里对西部富庶地区以及尼日尔河流域的许多城镇和中央三角洲有浓厚的兴趣。他逐步征服了杰内（马西纳的一部分，他在那里屠杀了大批富拉尼人），更为重要的是，他在1468年征服了廷巴克图。他攻打图阿雷格人，把他们赶回萨赫勒北部。在南方，他领导了对多贡人、莫西人和巴里巴人的多次远征。1483年，他与莫西国王纳塞尔一世遭遇，后者正从瓦拉塔满载贵重战利品而归，他在杰内附近一举击败了纳塞尔，从而永远遏止了莫西人对尼日尔河流域的威胁。

193　松尼·阿里1492年猝死之时，他已是建立在尼日尔河流域从登迪一直延伸到马西纳的一个庞大帝国的君主。他按照曼丁哥人的模式组织这个国家。他建立了若干个新省份，并将这些省份交给曼丁哥人称之为法林（farin）或法尔玛（*farma*）和在桑海称之为科伊（*koi*）或莽佐（*mondzo*）的统治者来统治。[10]他在廷巴克图任命了一位卡迪（*kādī*），在其他伊斯兰城市大概也是如此。东部所有这些代理人都直接对松尼本人负责。这样，加奥这个族长统治和遵从传统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控制尼日尔河整个地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松尼·阿里促进了这个新帝国的经济的发展，虽然他未能实现他想开凿一条从尼日尔河通往瓦拉塔的运河的设想，但据说他在该河流域修筑了一些堤坝，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宗教政策

松尼·阿里在与穆斯林贵族的关系上遇到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在廷巴克图，那儿的乌里玛（*ulamā*，伊斯兰贤哲）在两百年以后对后代描述这位大帝时，把他说成个残酷的、

[8] 关于桑海帝国的情况，也可见A. W. 帕尔多（A.W.Pardo），1971年，第41－59页。

[9] 马哈茂德·卡蒂，前引著作，第84页，他将“*daali*”解释为“le Très Haut”（“至高无上者”），并认为此称号可适用于神

[10] 见本书，第196－202页，关于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的部分。

暴虐的和放荡的君主，现在松尼·阿里·贝尔已经恢复名誉。[11]他反对帝国的乌里玛，其原因纯属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他不是一个好穆斯林，也从未放弃桑海的传统宗教，他是在他的故土法鲁（索科托）受教育的。至于乌里玛，他们继续批判松尼，许多人站到了阿基尔·阿克·梅芬尔领导下的图阿雷格人一边，而松尼·阿里当时正在与图阿雷格人作战。最重要的是，松尼·阿里是桑海传统文化的象征，他所反对的是伊斯兰教和城镇的新兴力量。

阿斯基亚王朝（1492－1592 年）

阿斯基亚穆罕默德一世，西拉家族[13]

松尼·阿里死后爆发了内战，松尼·巴莱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由洪博里-科伊穆罕默德和他的兄弟乌玛尔·康迪阿哥领导的一个伊斯兰教派系掀起了反对新松尼的暴动，并在靠近加奥的安法奥地方推翻了他。穆罕默德“图雷”或“西拉”夺取了君权，自称为阿斯基亚（askiya），建立了一个伊斯兰王朝。

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出身于塔克鲁尔地区的图雷或西拉氏族中的索宁克人。[12]他虽没有受过教育，但却是个热诚的穆斯林，一个不偏不倚的稳健派，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的胜利可以说是伊斯兰教的胜利。他争取新兴势力的支持以扩大和巩固松尼·阿里·贝尔创建的这个帝国。他统治之初的突出事件与其说是他的武功，不如说是他的麦加朝圣。 194

出于宗教虔诚和政治策略两方面的原因，这位新国君曾于 1496－1497 年间前往麦加，随行的有 800 名骑兵和许许多多乌里玛所组成的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他还携带了 30 万第纳尔巨款以供开销。在开罗，他拜访了伊斯兰教的重要人物之一，即爱资哈尔的祖师苏龙蒂，后者在治国之道方面给他以指点。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给从苏丹地区来的朝圣者在麦加买了一块地界，又向麦加的谢里夫（*sharīf*）求得了苏丹哈里发（caliph）的称号和徽号以及给他的帝国派去一位大使谢里夫·萨克利。他以穆斯林心目中的合法君主又有着公认的权力返回苏丹地区。

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继续推行松尼·阿里·贝尔的事业。在他兄弟乌玛尔·康迪阿哥的协助下，他四面八方扩大帝国的版图。1512 年，他征服了马西纳和扎拉，汤吉拉在那里被杀，其子考利·汤吉拉继位。阿斯基亚穆罕默德控制了撒哈拉，其权力远及塔加扎矿区，他还占领了阿加德兹以及两个豪萨城镇卡齐纳和卡诺。他攻打南方各族（巴里巴人、莫西人和多贡人），但未获成功。通过南征北战，他巩固了桑海帝国，从登迪到西比里杜古再到塞古以南，从塔加扎直达亚滕加边陲，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帝国的疆土。

[11] 松尼·阿里的辩护者：J. 鲁什(J.Rouch)，1953 年；B.阿马，前引著作；C.A.迪奥普(C.A.Diop)，1960 年；R.莫尼（R.Mauny），1961 年；S.M.西索科（S.M.Cissoko），1966 年；及其他一些史学家，改正了对松尼大帝的不公正评价，并将他的所作所为写进了他们的历史著作。

[12] Syllanke是个索宁克词，意思是“属于西拉家族”。

[13] “图雷”和“西拉”这两个名称均见于两部史书。阿斯基亚的称号大概出自西拉族；图雷在当时像西塞（Cisse）一样是个宗教中的称号，曾为摩洛哥征服者所采用。

阿斯基亚穆罕默德遵循松尼·阿里的传统组织帝国，他任命他的兄弟乌玛尔·康迪阿哥为库尔米纳的法里（*fari*）。乌玛尔·康迪阿哥建造了一个全新的国都，取名为滕迪尔乌。阿斯基亚穆罕默德还重建行省以他自己的亲信取代松尼·阿里原有官员，他给所有穆斯林城市指派了卡迪。他改组朝廷和帝国会议，确立了官阶和礼仪制度，要求他宫内的奴仆各司其职。他还为朝中的乌里玛和卡迪立下朝规。

阿斯基亚穆罕默德是位开明君主，他关心国内发生的一切。他鼓励贸易，从而使国家富强起来。他尽力引进精确的量具用于计量，通过卡迪对案件从快作出判决和依靠大批市场监督员确保市场秩序。据说他从卡巴拉到廷巴克图开凿了一条运河。[14]他建立了许多农业村落安置从战争中俘虏的奴隶以开发农业，为此还特别减轻了租税。他向乌里玛馈赠礼物和发放年金，特别是他本人尊重乌里玛，以鼓励学术进步。总之，他建立了作为阿斯基亚权力基础的教会与国家的联盟。但不幸的是，他子女太多，统治时间太长。在他年老失明之时，他被他众多的儿子阴谋推翻，为首的是他的长子穆萨，原任农业大臣，于 1528 年宣布继阿斯基亚位。

195

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的继位者

直到 1583 年，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的几个儿子相继在位：穆萨（1528－1531 年）、穆罕默德二世班坎·基里埃（1531－1537 年）、伊斯迈尔（1537－1539 年）、伊萨克一世（1539－1549 年）和达乌德（1549－1583 年）。在这以后，达乌德的儿子：哈吉·穆罕默德三世（1583－1586 年）、穆罕默德四世（1586－1588 年）、伊萨克二世（1588－1591 年）和穆罕默德·加奥（1592 年）先后接位。他们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战功，只是袭击邻国以掠取财物。在国内，尼日尔河中游在王位争夺战中不止一次地成为喋血之所；在国外，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塔加扎的盐矿问题，这个问题导致了与摩洛哥素丹的关系严重恶化。我们将以三个主要君主的统治时期为内容探讨这两个问题。

伊萨克一世（1539－1549 年在位）据两部史书记载是个要求别人绝对服从的独裁君主，他的弟弟达乌德曾率领一支远征军攻打马里帝国国都，并洗劫了这座城市。塔加扎问题开始出现于伊萨克一世统治时期，摩洛哥素丹萨迪·穆罕默德·沙伊克声称对盐矿拥有主权，企图占领但未获成功；伊萨克一世进行反击，派出图阿雷格骑兵对摩洛哥的达拉进行了一次入侵。[15]

达乌德（1549－1583 年）是阿斯基亚穆罕默德一世的另一个儿子，他在位时间很长，他统治的时期是桑海帝国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两部史书把阿斯基亚达乌德说成是位睿智之君，他足智多谋，并宽宏待人又礼贤下士。他曾身居要职和插手他几位兄长治下的所有问题，这使他获得待人接物的经验。

在阿斯基亚达乌德统治下，帝国达到了极盛时期。它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尼日尔河流域农业兴旺，大商业城镇空前活跃。正如 V.M.戈丁霍所说，当时穿越撒哈拉的商队

---

[14] 根据廷巴克图的口头传说，据说运河的流向是从卡巴拉到廷巴克图。

[15] 萨迪，前引著作，第 157－164 页。参看R. 莫尼，1949 年，第 129－140 页。

胜过大西洋上的船队。[19]这位阿斯基亚从经济繁荣中获得大利，甚至还建立了一个钱库，钱库来源就是商业和帝国地产的税收。从全国征收上来的成千上万吨谷物流入他的粮仓。达乌德和他父亲一样，竭力保护艺术。他尊重文人，给他们以荣誉和赐赠。他出钱重建清真寺，并施舍穷人。 196

在军事方面，这位阿斯基亚在马西纳以及在东面指挥了几次平叛之战，对莫西人进行了猛烈的袭击。最严重的问题依然是塔加扎问题。摩洛哥素丹穆莱·艾哈迈德·曼苏尔一再声称对盐矿拥有主权。似乎当时曾达成过一项协议，该协议维护了桑海对盐矿的权利和所有权。然而，在阿斯基亚哈吉·穆罕默德三世统治时期（1583－1586 年），一支摩洛哥远征军占据了矿区。图阿雷格人继续开采塔加扎以南 150 公里的特瑙达拉（陶代尼）的矿藏。这里后来都成为废墟。

穆罕默德三世死后，其弟穆罕默德四世巴诺于 1586 年继阿斯基亚位，从而激起了一场内战。这位阿斯基亚的弟兄们起来造反，其中有廷巴克图地区的巴拉玛（*balama*）萨杜克。1588 年，萨杜克率领库尔米纳以及西部诸省的各支军队进军加奥。他在廷巴克图自立为阿斯基亚，但后来却败在加奥的新阿斯基亚伊萨克二世手下，后者残酷地平定了反抗，大肆屠杀西部的军队。结果，帝国实际上是分裂了。醒悟了的西部对加奥失去了兴趣，桑海诸王子经过 3 年内战之后，也就是在 1591 年竟然毫无疑虑地与摩洛哥侵略者携起手来。于是桑海帝国瓦解了，成为自身内乱的牺牲品。

桑海的文明

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

桑海帝国在其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方面是颇有独创性的。森严的权力等级、层层的集权以及绝对的君主专制制赋予加奥王朝以一种现代的色彩，摆脱了加纳和马里的那种诸多王国联盟形式的传统政治体制。

君主

加奥君主制承袭了历史悠久的治国传统，建立在尊重伊斯兰教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按照桑海和苏丹的古老传统，国王是其臣民之父，有仅次于神的权力、国家的兴旺发达全决定于他。他深受尊敬，朝见他时都要跪拜。另一方面，从 11 世纪以来就一直都是穆斯林的加奥国王，按照伊斯兰传统，他进行统治必须严格遵循古兰经教义。这两种传统相辅相成，但因君主的个性不同，而各有所侧重：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和阿斯基亚达乌德在位时，侧重于伊斯兰教传统，而松尼·阿里和其他大多数阿斯基亚则更注重桑海传统。

居住在加奥的皇帝有一个庞大的朝廷，名为“逊奈”（*sunna*），它包括皇室成员、高官显贵，以及盖萨雷格里奥（*Guesere griot*）和玛博格里奥（*Mabo griot*）。皇帝的宝 197

[19] V.M.戈丁霍（V.M. Godinho），1969 年。

座设在高台上，周围侍立着700名宦官。万都格里奥（*Wandu griot*）的职司是传令。大批仆从，通常都是奴隶，在一位宫廷长官（胡-霍科罗伊·科伊，*hu hokoroi koi*）的指挥下，负责各种宫廷内务。衣物总管掌管国君的服饰。[⑰]国君死后，由最年长的兄弟继位。实际上，王位的继承取决于竞争者的实力，这也就是周期性爆发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新的阿斯基亚登位由“逊奈”宣布，并在古都库克耶加冕。

王家政府由君主指定的大臣和咨议组成，按各自的职务定官级，阿斯基亚可以将他们免职。阿斯基亚亲自掌握的中央政府和各省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别可作如下划分。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官员组成帝国会议，讨论帝国的所有问题，文书大臣起草会议文件，处理君主的信件，并负责草拟和执行君主颁发的各种特许状。其他职别等级各不相同的官员，各自分管不同的行政部门。确切地说，各种职务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两部史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份中央政府高官的名称表，现将主要的官名抄录如下。[⑱]

希-科伊（*hi koi*）是“河流总管”兼舰队统帅，他的职务是最古老和最重要的职务之一，这是由于尼日尔河在古代桑海人们生活中所起作用决定的。希-科伊是朝廷中最高级的官员之一，类似于内政大臣，他监督各省的省督。不管怎样，我们发现在阿斯基亚伊萨克一世统治时期，希-科伊曾谴责极有权势的库尔米纳省督达乌德亲王，命令他速即返任，不得迟延

法里-莽佐（*fari moundzo*）或称莽迪奥（*mondio*），是农业大臣，看来是由他负责管理帝国的大量田产，这些田产分散于帝国各地，每年提供大量赋税。这项非常重要的职务通常交给具有血亲关系的亲王，甚至可能交给王储掌管，当然法里-莽佐必须解决土地争端，与之接近的职务有哈里-法尔玛（*hari farma*）河道和湖泊长官，萨奥-法尔玛（*sao farma*）林木长官，瓦奈-法尔玛（*wanei farma*）负责处理产权问题的长官。

198

卡里萨-法尔玛（*kalissa farma*），即财政大臣的职务在两部史书中没有明确说明，但它肯定与帝国国库有关，我们知道，所有的阿斯基亚都十分富有，他们的岁入或以实物或以货币集中到加奥，卡里萨-法尔玛负责看管国库和负责支付国君的开支，无疑，他掌管阿斯基亚达乌德建立的钱库。协助卡里萨-法尔玛工作的有瓦奈-法尔玛（*wanei farma*）负责产权处理、巴那-法尔玛（*bana farma*）负责薪饷和道伊-法尔玛（*doi farma*）负责采购。

巴拉玛（*balama*）是一种军事职务。尽管在过去巴拉玛是军队的指挥官，但两部史书并没有明确说明巴拉玛究竟是什么等级的官。到16世纪，这官职的重要性肯定是削弱了，再也没有提到作为帝国军队首脑的巴拉玛了。这个官职成为驻扎在卡巴拉-廷巴克图地区的一个军团的长官，这个军团肯定听命于库尔米纳的法林。该职位似乎一直都是由王室子弟执掌的。

⑰ 大约有210套绸的、毛的和棉的衣服。见马哈茂德·卡蒂，前引著作，第260-261页。

⑱ 帝国政府官员的完整名称表见G. N. 科吉奥（G.N. Kodjo），1971年，第270-272页以及J.鲁什，1953年，第192-193页。

在加奥肯定还有帝国政府中起作用的其他一些部门，但在两部史书中却没有提到。在这之中，我们应该提一下科赖伊－法尔玛（*korei farma*），那是负责白肤色外国人事宜的大臣，同时也是由皇帝定期派往各省去解决一些紧迫问题的帝国使节，该大臣还负责向大城市的商人征收特别税，或监督地方官员和省行政长官。

省政府

桑海随其不同领土的不同特点，采用了两套行政体制。第一套适用于那些被征服的省份，那里的行政长官由阿斯基亚任命，但也可随时被他解职。这些省督构成一个统治阶层，他们行使除司法权之外所有的最高权力，而司法权则归卡迪（*kādī*）执掌。行政长官一般称为法里（*fari*）、法尔玛（*farma*）或法尔巴（*farba*），这些名称都是由曼丁哥的法林（也就是总督）这一官职演变而来的。马里帝国曾在尼日尔河中游地区设置过这些官职，松尼·阿里和各阿斯基亚也都保留了这些官职和官名。科伊（*koi*）是个桑海词，意思是首领，因而重要性较小。莽佐（*mondzo*）的情况也是如此，它既可用以称呼地方官（如廷巴克图的莽佐），也可用以称内阁官员（如法里－莽佐）。至于查（*cha*）、马伦法（*marenfa*）以及其他官名，我们就不得其详了。

帝国划分为两大行政区，西部的库尔米纳和东南部的登迪（见插图 8.1）。几乎没有例外，库尔米纳的法里或称坎法里（*kanfari*），这一职位都由具有皇室血统的亲王执掌，而且也确乎常常由帝国的王储担任。[38] 库尔米纳的法里常驻于滕迪尔马，在国内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们不确切知道他的权限范围，他似乎是管辖廷巴克图以西的所有省份的负责人，但这并不能肯定，因为这一地区的省督均由加奥直接任命，并对阿斯基亚本人负责。但到 16 世纪末，库尔米纳法里的军事实力使他得以控制所有西部各省，因此他实际上是那里的真正的首脑。他拥有一支近 4000 人的强大军队，能够与加奥政权相抗衡，而且也确实曾几次出现过这种情况。 **199**

登迪的法里是登迪的总督，他管辖登迪属下所有各省，也就是帝国的东南地区，他在国内位居第三。这一职位通常归朝廷中的一位重臣掌握，他的军队数量必定要比库尔米纳法里少些。他负责防卫帝国的南部边疆。大行政区之下的各个省份的长官都由阿斯基亚任命，其职称是：巴拉－科伊（*Bara Koi*）、迪尔玛－科伊（*Dirma Koi*）、洪博里－科伊（*Hombori Koi*）、阿拉宾达－法尔玛（*Arabinda Farma*）、本加－法尔玛（*Benga Farma*）、卡拉－沙（*Kala Sha*）和巴格赫纳－法尔玛（*Baghena Farma*），均已丧失阿斯基亚称号。

诸如廷巴克图、杰内·塔加扎和瓦拉塔等商业城镇，在它们的科伊或莽佐统治下享有一定的自治权，那里的商业和手工业活动以及人口之多，都需要有众多的行政官员。在廷巴克图，除了负责司法的卡迪和廷巴克图的科伊或称头人之外，还有大批官员，其中包括阿萨拉－莽佐（*asara mondzo*，负责维持市场与城镇的治安和执行卡迪作出的裁决）、市场度量衡器检查官、税务官、卡巴拉的海关官员、各种行会行首、各部族区域（由相邻地区组成）的首领和管理近郊草棚区的官员。所有这些人构成了大城镇有效施政的

[38] 其中包括阿斯基亚穆罕默德二世班坎·基里埃和阿斯基亚达乌德。

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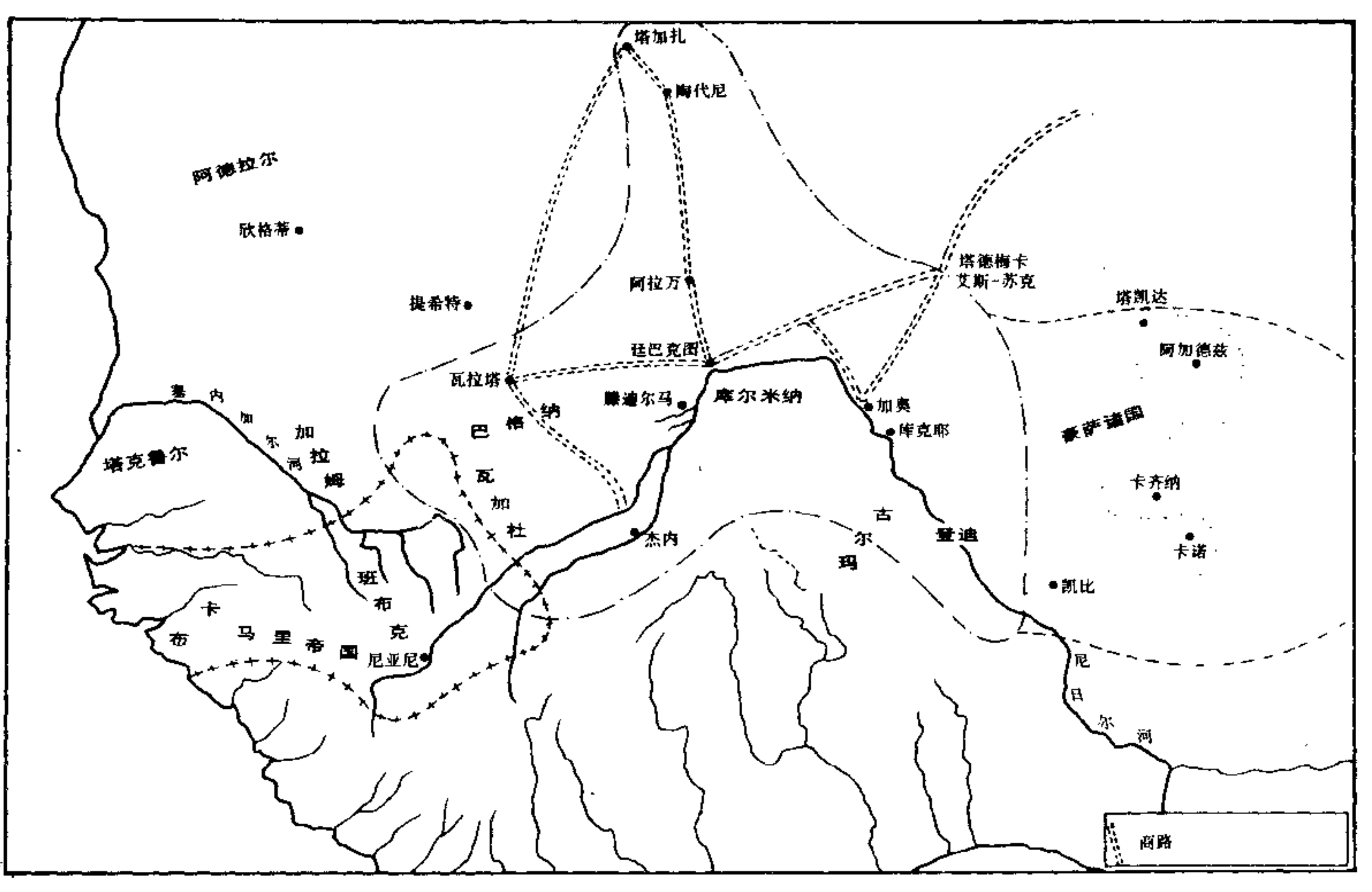


图8.1　16世纪临近结束时的桑海帝国(据D.T.尼昂)

核心。

非直接行政区

非直接行政区包括附庸国或进贡国，其首领根据地方习俗产生，然后经阿斯基亚认可。但时有发生争当首领的纷争或反抗帝国权力的叛乱。在此情况之下，阿斯基亚就要进行干预，和强令接受他所指定的候选人。马西纳的方多科（*fondoko*）布布·马里阿马就是这样被阿斯基亚哈吉·穆罕默德二世废黜的，他被流放到加奥。[20]实行非直接的统治的还有豪萨国家卡诺和卡齐纳、阿加德兹王国、图阿雷格－克尔－安塔萨联邦（萨迪称之为安达森联邦）和马格萨伦联邦。最后者是桑哈贾血统的图阿雷格人，他们来自廷巴克图－瓦拉塔地区，但并不是一个部族；他们代表图阿雷格社会的贵族上层。[21]马里帝国也是一个进贡国，但桑海对马里的控制并非是持续不断的。据利奥·阿非利加努斯的说法，马里的曼萨曾向阿斯基亚穆罕默德一世纳贡。尽管这控制是实际存在的，但并不持续；待到阿斯基亚伊萨克一世即位后，已不得不对马里再次进行远征。这时曼萨实际上已挣脱了加奥的宗主权。两个帝国交界处西比里杜古，肯定位于塞古以南，在曼德的边境，即今天库基科罗的位置上。[22]所有这些国家虽然都是进贡国，但在某种程度上则随加奥的政策的不同而处境有所不同。他们的国君按期纳贡，应在皇帝要求其参加征战时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士，并以访问、赠礼和联姻等方式维持良好的关系。 **200**

通过这几种行政体制（中央的、地方的和非直接的），加奥帝国将苏丹尼日尔河地区各族人民组织了起来，以确保本身安然无恙，并使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阿斯基亚的君主制是一种基于既遵从桑海价值观念又尊重伊斯兰价值观念的有组织的政权，不是特指某一个人的，它曾一次又一次地克服了很多次王朝危机。如果不是摩洛哥人的入侵削弱了它的根基，它很有可能演变为一个现代的非洲国家，尽管它在政治上高度集权，但它还是保证了基本的人身自由。

国家机器

国家掌握相当丰富的资源，这对国家的实力和独立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常备军有足够的能力保卫帝国、使臣民服从君主的意愿、并粉碎一切叛乱。不过，这一强大而又稳定的国家机器还不是十分专横暴虐。司法权交由实际上独立行使职权的卡迪或部落首领掌管，以维护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研究桑海国国家机器的一篇论文明确阐述了它所具有的现代性。帝国继承了一种悠久的尚武传统；桑海人不是务农者，也不是商人，而是武士。"桑海的所有重要人物"，马哈茂德·卡蒂写道，"都精通战争艺术。他们非常勇敢、非常大胆，又善于用兵。"[23]

贵族上层人士的天职就是搞政治和战争，他们是骑兵的骨干，是桑海军队的先锋。

[20] 萨迪，前引著作，第 189 页。
[21] H. 洛特（H.Lhote），1955－1956 年，第 334－370 页。
[22] 这与D.T.尼昂(D.T.Niane)的观点相一致，他所根据的是他在尼亚尼地区记录下来的曼丁哥人口头传说。
[23] 译自马哈茂德·卡蒂，前引著作，第 146 页。

桑海骑兵武士的武器是长矛、马刀和弓箭，在他们的束腰战袍之内还穿有铁甲胸铠。马很昂贵（在16世纪时约值10个俘虏），所以骑兵是一支享有特权的部队。步兵在军队中所占人数最多，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其中有奴隶、小贵族和自由民。步兵的武器是矛和弓箭，手持革盾或铜盾。尼日尔河上的渔夫大部分是索尔科人，他们组成了一支常备 **201** 的小舰队，约有2千条空心独木舟行驶于河上。军队都携带长喇叭（*kakaki*）和军旗，有他们独特的行军队列和扇形的战斗队形。

军队的真实数字不得其详。阿斯基亚穆罕默德一世和阿斯基亚穆罕默德二世班坎·基里埃的改革把加奥的常备军增加到大约4000人，另外还有由300名武士组成的国君卫队，称为“松纳”（*sunna*）。[28]大多数士兵都是阿斯基亚的奴隶，他们是他继承的财产，但允许他们的女儿出嫁。1591年通迪比战役时调集了全部军队，约3万名步兵和1万名骑兵。这是西苏丹最庞大的有组织的军队，它使阿斯基亚得以实现其意愿，而主要的是能使他掠夺财物。

财政来源

加奥的国君权力大而又很富有。这君主国有可靠和取之不尽的财源，它通过大批行政人员从帝国各个地方征集上来，并加以管理。这类人员的头目叫做卡里萨－法尔玛（*kalissa farma*）。帝国税收的来源很多。有来自国王私人财产的收入，有为穷人征收的扎卡税（*zakāt*）或什一税（tithe），有农、牧、渔业税，有商业税和关税，有向大城市商人征收的特别税，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连年战争所获战利品。因此国王的财源永不枯竭，他可以任意挥霍。国王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支付朝廷开支和常备军的军费。阿斯基亚也捐款建造或修缮清真寺、资助国内的穷人以及馈赠和救济著名隐修士。

司法

司法是皇家特权，阿斯基亚作为穆斯林的埃米尔（amir）和臣民之父，将司法事务委派给代表们负责，这些代表独立于中央政权或其他官吏之外。无论如何，必须分清两种司法之间，即伊斯兰司法和传统司法之间的区别。

前者适用于穆斯林社会，它以苏丹地区各大学所讲授的伊斯兰教马立克教法（Mālikite law）为基础。卡迪（kādī）是由皇帝任命的最高权威和终身法官，但没有什么人愿意担任这个职务，所以阿斯基亚对他的任命常常是强制性的。在廷巴克图，这职位在 **202** 整个16世纪都由显赫的马哈茂德·本·乌玛尔·阿基特（1498－1548年）家族所独占，该家族还为桑科尔清真寺输送了不少伊玛目。[29]在许多城镇，这个职位后来都成为世袭。卡迪聘请各种法律助理协助，诸如法庭的书记、秘书和公证人等等。惩处则由代表帝国

[28] 注意勿与帝国会议的朝廷“逊奈”（*sunna*）相混。国君卫队“松纳”（*sunna*）都是些绝对忠诚的士兵，他们肯定都要作特别宣誓。“松纳”不得逃避战斗，因此他们1591年在通迪比战役中全部被残杀。

[29] 关于这个家族，可参阅J.库奥克（J.Cuoq），1978年，第85－102页。

权力的官员阿萨拉－莽佐（*asara mondzo*）负责执行，卡迪审理所有各种案子，不论是刑事的还是商务的，对他的判决绝无上诉一说。此外，他还负责登记注册，将诸如解放奴隶、遗产划分和私人文件的生效等民事活动记录在案。卡迪是廷巴克图城的真正首脑，他的权力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司法领域，并还保护市民的自由。

传统司法几乎在整个帝国都起作用，甚至许多穆斯林大城市，人们在家庭内部或通过族长解决纠纷都照旧按传统习惯办事。在加奥，帝国会议作为一个政治法庭裁决国家大事，通常涉及的是一些政治阴谋策划者的活动，他们往往是王子和同谋者。为了制止伤风败俗，特别是通奸（这在尼日尔河中游地区的农耕社会中已成为一害），阿斯基亚伊萨克二世设立了特别法庭以严惩那些当场捉住的罪犯。特别令人吃惊的是允许人民通过有权力的审判团自己行使司法。这是对维持秩序和自由的最可靠的保证。桑海国因此而促进了灿烂文明的欣欣向荣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

经济发展

地处苏丹萨赫勒地区中部的桑海帝国，地理位置十分有利，从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中得益甚大。尼日尔河由西向东流经帝国，便利了交通，两岸的肥沃土地是经精耕细作的良田。总的说来，可以划分为两种经济：一是农业的即传统的，二是城市的即商业的。

农业经济

关于农业活动，两部史书记载极少。农业技术从那时起没有太大变化。锄头（桑海语叫 *kaunu*）、粪肥、河谷中的园艺作业以及热带大草原上的轮耕，几个世纪来都一直照旧未变，但尼日尔河流域人口却日益稠密，那里的居民从事农业、渔业和牲畜饲养业。大城市里的王公和乌里玛拥有大庄园而由奴隶耕作，这些奴隶都定居在周围村落中。阿斯基亚本人也是个大土地所有者，他的田地遍及整个尼日尔河流域，它们由一村村的奴隶在监工（*fanfa*）的监督下进行耕种。收获后要向加奥缴纳实物租税。[29] 私人奴隶也是如此。 203

索尔科人、铎人和博佐人都以捕鱼为业。打来的鱼或晾干或熏干，然后贩运到帝国各地去卖。同样，萨赫勒地区边缘国家马西纳和巴库努的牛羊饲养业以及马西纳河谷定居者的肉牛饲养业，对城镇居民来说，是奶品和肉食的重要来源。事实上，农业地区的产品（谷物、鱼和肉），很大部分都送到市场销售，这就使乡村居民可以获得食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

商业经济

苏丹和萨赫勒地区的城镇，如瓦拉塔、廷巴克图、杰内和加奥（规模宏大的穿越撒哈拉贸易的几个中心）与撒哈拉、北非以及远至欧洲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许多大市场联系

[29] 马哈茂德·卡蒂，前引著作，第 178－180 页。

在一起。穿越撒哈拉的商道从尼日尔河流域伸向北去。[27]主要的几条商道是：廷巴克图－塔加扎－图瓦特到塔菲拉勒特和西阿尔及利亚；廷巴克图－瓦拉塔－提什特－瓦丹到达拉和塔菲拉勒特；加奥－塔德梅卡－加特到利比亚和埃及；加奥－塔德梅卡－古达梅斯到利比亚海岸和突尼斯海岸；加奥－豪萨－加奈姆-博尔努到尼罗河流域。15世纪和16世纪穿越撒哈拉的贸易看来主要是针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在中心地带，塔加扎盐矿以及图瓦特和加特的绿洲是通往苏丹地区路上的大贸易驿站。

贸易掌握在柏柏尔阿拉伯商人（有许多商人来自图瓦特和廷巴克图的古达梅斯）和苏丹各族人民——万加拉人（曼丁哥人）、瓦科尔人（索宁克人）、莫西人、豪萨人和桑海人的手中。聚会的地点是城镇。那儿的居民充当掮客从中渔利。有些商人有完善的组织，在许多城中设有分理处，靠行市的起伏获利。他们在尼日尔河上有商船队，还用骆驼和牛驮运货物，利奥·阿非利加努斯在16世纪初到达那里的时候，卡巴拉港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货物。[28]

交易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或者更多的是采用货币，小买卖用玛瑙贝，大买卖随市场之不同有用黄金、食盐或铜币的。苏丹进口布匹，大多数布匹来自欧洲（威尼斯、佛**204** 罗伦萨、热那亚、马约尔卡岛、英格兰和法兰西）。从塔加扎和伊吉尔进口盐，还进口武器、马匹、铜、玻璃器皿、糖和北非的手工业品，如鞋类和羊毛制品。这一贸易的主要动因是盐。它装运时是长方形的块状，有25－30公斤重，运往内地各处。苏丹出口金子、奴隶、象牙、香料、柯拉果和棉制品。砂金和天然块金来自班布克、布雷、莫西人地区的金矿，特别是来自阿散蒂的比图。金子是穿越撒哈拉贸易的支柱，也供应给欧洲。[29]

苏丹国内贸易还包括各种地方土产。在各大人口集中地都有市场，农民聚拢在那里交换他们的产品，来自北方的小贩购买食盐、布匹和其他货物。从中央三角洲或从登迪运来的谷物再转运到廷巴克图、加奥和萨赫勒地区去，从南方来的柯拉果和金子则向北运到穿越撒哈拉的商道的几个起点。杰内作为整个西非产品的集散中心起了极大的作用。

总之，商业有助于尼日尔河沿岸城市扩大财富，有助于乡村居民过上舒适的生活；但不幸的是，它只包罗当地一小部分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大宗贸易都是矿产品和采集品。穿越撒哈拉贸易基本上经营的是用土产换取进口物品的买卖，而不是依靠地方产品的真正的市场经济，因此它并没有使社会结构或实用技术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但无论如何，它使尼日尔河流域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某种物质上的改善，同时也造就了举止文雅的贵族。长束腰外衣（*bobu*）和拖鞋（*babush*）、家里的安逸舒适、多样化的饮食，都是尼日尔社会进步的标志。

[27] R.莫尼，1961年，IIIC，5。

[28] 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法文译本，1956年，第2卷，第467页。

[29] F.布劳德尔（F.Braudel），1946年；J.希尔斯（J.Heers）1958年，第247－255页；E.F.戈蒂埃（E.F.Gautier），1935年，第113－123页。这些著作都足以证明苏丹地区的贸易对中世纪地中海和欧洲经济的重要意义。参阅本书第26章。

社会

桑海社会的根本结构与西苏丹其他各个社会基本相同。创新之处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城市社会活动的多样化，但是，这有一定的限度，作为一个整体，当时的社会毕竟还是以农业为主。

尼日尔社会的组成

在城市和在乡村都一样，桑海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亲属关系十分重要。赋予各种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以鲜艳色彩的基本要素是家庭。氏族由若干个家庭组成，最古老的氏族多属索宁克血统（图雷、西拉、通卡拉、西塞、贾克希特、德拉姆和贾瓦拉）；只有极少几个（迈加）是桑海人。这就引起了桑海民族的实际构成问题，它是由索宁克人、柏柏尔人以及诸如曼丁哥人、戈比尔人和豪萨人各族血统混合而成的。 **205**

两部史书只是列举了束缚于土地上或束缚于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行业之内的奴隶和农业人口的名称，却只字未提部族组成情况。[90] 桑海社会的最主要特征是它的等级制度，它分为贵族、自由民、行会成员和奴隶。这是整个西苏丹普遍都有的特征，但在这里，贵族的地位更加突出，他们几乎都专门从事政务和军务。大量的奴隶按规定只能干家务活或农活，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只充当配角。

乡村社会

除了有大商业城镇的尼日尔河流域以外，桑海人以及帝国各族人民都居住在乡村，从事各种农务。15 世纪和 16 世纪的农民居住在建有一座座圆形小屋的村落里，这与今天的农民没有多少区别。技术革命或其他任何革命都没有破坏社会的基本结构。当然，生活条件是有所改变的。两部史书提供的有限资料说明，在尼日尔河流域，特别是在杰内地区，农业人口密集，他们主要靠农业为生。当然也有手工业行会，如铁匠、木匠和制陶工，但他们的工作肯定是季节性的，所以更多的还是要靠种地度日。尼日尔河上的渔夫（索尔科人，博佐人和索莫诺人）肯定也是一样，他们在雨季耕种土地。生活状况可能并不象利奥·阿非利加努斯描述的那样悲惨。[91] 生活基本上是有保障的，饥荒次数并不太多。两部史书的记述使我们对乡村生活得以略知一二。两部著作实际上都没有提到农民起义，奴隶主要求奴隶交纳的租赋并非沉重不堪。相反，登迪的一位帝国财务官开列的财产表给人一种农村尚称富裕的印象。农民甚至在本地市场上出售他们的部分产品，以换取盐或布之类物品，从而他们也参与了贸易。

在精神生活领域里，伊斯兰教并未在农村扎下根来，农民们仍留恋于他们自己本乡本土的价值观念和宗教，在大多数农业地区，如登迪和南方，尽管在表面上人们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依然留恋于传统礼拜。因此，尽管乡村已向市场经济打开大门，但它对 **206**

---

[90] 马哈茂德·卡蒂，前引著作，第 20－21 页。

[91] 利奥·阿非利加努斯，前引著作，第 2 卷，第 472 页，他描述贫困无知的农民都被帝国税收压垮了。

来自城镇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念在一定的程度上仍然是关闭的，城镇是尼日尔社会的第二上要成份。

城镇和城市社会

商业大扩展使城市文明在整个苏丹－萨赫勒地区得到了发展。在15世纪和16世纪，我们知道有瓦拉塔、杰内、泰南库、滕迪尔马、廷巴克图、班巴、加奥和阿加德兹等城镇，以及豪萨城镇卡齐纳和卡诺（见插图8.1）。这些城镇一般是敞开的、没有城墙，市场在城里，城郊有许多帐篷和草屋，流动人口都住在那里。城镇中心地区的房屋，有平房也有三层楼房，都是苏丹式的砖石建筑；有门厅通内院，里面各房间的房门都不朝向院子。

三座最大的城市是廷巴克图、杰内和加奥，关于它们说来话长。廷巴克图于1468年被松尼·阿里·贝尔征服，于16世纪达到了它发展的最高峰，在阿斯基亚达乌德统治时期，估计有8万左右居民。[32]它在那时是帝国的经济首都，也是整个苏丹地区的圣城，因那里有许多神职人员和一所大学而闻名。杰内是中央三角洲的一个岛，在经济和宗教方面与廷巴克图有密切联系，约有3万到4万居民，它确实是苏丹内地最重要的黑人聚居地。[33]那里高耸着美丽的清真寺，可称为苏丹艺术的明珠，也是南方的大市场，主要与大草原和森林地带联系。加奥则是政治首都，比其他城市更古老，是一个有近1万居民的大城市。[34]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面向豪萨世界、登迪和利比亚以及埃及。

尼日尔河所有这几个城镇都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桑海人核心，到处都讲桑海语。但它们也都有一个由各族人民（柏柏尔阿拉伯人、莫西人、豪萨人、曼丁哥人（万加拉人）、索宁克人、富拉尼人和其他族人）构成的居民群体。城市社会根据苏丹模式按等级排列，207 不同的是这儿还有几条经济界线。城市社会包含三种基本成份：商人、手工业者和宗教阶层，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靠商业为生。商人大都是外来者，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这是居民中最活跃和最有生气的一部分，他们组成行会，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规矩和习俗。知识分子、隐修士和学生是有教养的人，在社会上受到相当大的尊敬。

尼日尔社会是个有秩序、有素养的社会，至少在贵族的层次上是这样。他们喜欢穿宽大的长袍和拖鞋，喜欢过家中的舒适生活，喜食美味食品，然而最喜欢广交良友。这导致行为有失检点，存在许多高等妓女和王公贵族放荡淫逸的生活就是明证。

总之，城市社会表现为与传统的农业社会割裂，绝不可能向乡村扩展。城市社会的统治阶层一般由外来人构成，它是以伊斯兰教和商业的价值为基础的，它似乎与社会的整体格格不入。商人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想象它扎根于商品经济一样扎根于农村。因此它

---

[32] 这是一个很不精确的数字，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这比R.莫尼（1961年，第497页）提出的数字（25,000人）更接近实际。16世纪时这个城市规模很大。所有口头传说都异口同声说，卡迪马哈茂德墓今日虽与城市相距甚远，但当时却是他的宅邸。城区整日受黄沙的侵蚀，这使我们对旧址空中摄影的价值产生怀疑。同时也应注意到廷巴克图是一个向上发展的城市，三层的房子比比皆是，因此，居住空间高度集中。

[33] 见S.基奇（S.Keech）和R.J.麦金托什（R.J.McIntosh），1980年，该书有助于理解杰内的问题。

[34] 此数字取自该城首次进行的人口调查，时间是16世纪末，调查提供了7626户的数字，其中不包括郊区草屋。

就不能对桑海社会产生意义深远和持续不断的影响。

宗教与文化的发展

伊斯兰教于 11 世纪进入西苏丹，虽然进展缓慢而又不平衡，它最终还是在尼日尔河湾和萨赫勒地区站住了脚。但是，在许多地方，它最多不过是遮在古老信仰上面的一层薄薄的面纱，从来没能深深扎根。在城市地区，伊斯兰教造就了一批文人精英，这批精英以他们富有创造性的努力，为伊斯兰教增光添色，并对它作了新的解释。这一发展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苏丹有了普遍的繁荣，苏丹的繁荣从 15 世纪起就开始吸引来了许多外国学者。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加奥的君主奉行一种恩赐政策，例如阿斯基亚王朝的创建者给与穆斯林学者许多荣誉和礼物，并赐予他们举国无双的社会特权。阿斯基亚穆罕默德一世推行了一系列穆斯林政策，并致力于向苏丹引入和推广伊斯兰教。

宗教生活

尽管如此，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伊斯兰教还不是占主要地位的宗教，绝大多数桑海人和居住在乡村的帝国各族人民依旧留恋于他们祖传的信仰。阿斯基亚穆罕默德一世在给马格希利的一封信中对此感到惋惜和抵触，虽然他没法改变这种情况。

桑海人崇拜"霍里"（*hole*）和自然界到处都有的精灵，对之供奉[39]。他们的众神中包括如下诸神：哈克·迪科（*Harke Dikko*）即尼日尔河神（伊萨·贝尔 *'Isā Ber*）和唐哥（*Dongo*）即雷神。在他们的社会里，巫医称作索尼安克（*sonianke*），据说是业已衰落的松尼王朝的后裔，受到普遍的尊敬，负责保护社会不受邪恶的鬼魂和术士（*tierkei*）之害。对死者的祭祀由各氏族的首领主持。在乡村扎根极深而普遍流行的传统宗教就是这样来确保社会的安稳、心理平衡和连续性的。 **208**

外加于这些信仰之上的伊斯兰教在那时对乡村的影响极小，甚至毫无影响。即使伊斯兰教是属于城市和贵族老爷的，但它最终还是变得更适于广泛接受。这是一种黑人的、宽容形式的伊斯兰教，它通过阿斯基亚穆罕默德一世和穆斯林学者们的活动，通过贸易的和平发展而日益普及，因为它在黑非洲从一开始就与贸易发生紧密的联系。阿斯基亚穆罕默德一世听从了图瓦特的马格希利和开罗的苏尤蒂两位大学士的忠告，[40] 率领帝国灿若群星的一批隐修士对拜物教大张挞伐，对逊尼派追随者，即所谓的"坏穆斯林"，穷追猛打，把卡迪的统治和马立克教法强加于某些村社，还对莫西的异教徒进行了一场圣战（*djihād*）。巡回走动的商人完成了余下的工作，把宗教直接带到了南方森林地区的中心地带。

这样，到 16 世纪末，在从马西纳到登迪的整个尼日尔河中游地区，伊斯兰教已占绝对优势地位，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取得明显进展。只要对城镇作一番观察便能对宗教生活

[39] J.鲁什，1954 年和 1960 年；J.布尔努瓦（J.Boulnois）和B.阿马，1954 年；这些材料修正了对桑海史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解释。

[40] E.H.R.姆贝耶（E.H R.Mbaye），1972 年；J.O.亨威克（J.O.Hunwick），1970 年。

有很好的了解。中央三角洲的杰内和迪亚以及加奥和廷巴克图都各有其清真寺、伊玛目、卡迪和墓地，以及由极虔诚的教徒和到如今在尼日尔河河湾仍受人们尊敬的圣者开办的学校，廷巴克图是座典型城市。那里有三座大清真寺——金格雷勃尔、西迪－叶海亚和桑科尔，后两者建于15世纪上半叶。该城还以献身于宗教的神职人员和著名学者闻名于世。诸如，死于1464年的谢里夫西迪－叶海亚、死于1548年的卡迪马哈茂德·本·乌玛尔·阿基特以及后者的许多家族成员，包括修复了几座大清真寺的卡迪·阿基勃，都出自该城。由于这一切它被称为整个苏丹地区的圣城。它的一所大学向整个西苏丹传播伊斯兰文化。

文化生活

苏丹尼日尔河流域和萨赫勒地区于15世纪和16世纪出现文化大觉醒。苏丹的人文主义成为世界范围的伊斯兰教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14世纪和15世纪从非斯的卡拉韦因经学院和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培养出来的苏丹精英的思想解放了，他们登上了伊斯兰学术的高峰。当时，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依然是城镇。商业的盈余使得献身于宗教礼拜和学术研究的知识阶级有了发展的可能。普遍繁荣把苏丹和萨赫勒各地的学者吸引到了尼日尔河地区的各个城镇中来。[50]

209

最有名的大学无疑是廷巴克图大学，它为我们留下了两部史书，虽然它们写于17世纪，但它们仍不失为苏丹最重要的历史巨著。这所大学作为获得和传播知识的中心，并不像北非那些大学一样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机构，它由许多独立的学校组成，特别是那座举世闻名的桑科尔清真寺，提供更高一层的教育。16世纪，廷巴克图约有180所讲授古兰经的学校，有成千上万学生从苏丹和萨赫勒各地来这里学习，他们都是寄宿生，与老师同住。教师没有报酬，但提供给他们各种生活必需品，他们全心全意地日夜潜心于他们的教学工作。

教学分为两个层次：初级古兰经学校，那里主要是阅读和背诵古兰经；高一层的学生则要开始学习伊斯兰教的各个科目。这所苏丹大学和当时穆斯林世界其他所有大学一样，讲授人文学科，它包括各门传统学科——神学（*tawhīd*）、经文释义（*tafsīr*）、伊斯兰圣训（*hadīth*）和马立克教派的法学体系（*fikh*），此外还有语法、修辞学、逻辑学、星占学、天文学、历史和地理。科学知识和数学知识肯定是非常初步的。马立克教法是廷巴克图学者的专长，两部史书自始至终把他们称作"法学家"。教学方法从16世纪以来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基本特点就是按着纯学术性的方法剖析和解说课本。

由苏丹和萨赫勒来的老师授课。15世纪，有谢赫西迪－叶海亚和穆迪布·穆罕默德·卡巴利，后者是卡巴拉本地人，他们培养了下一代教师。16世纪，尼日尔河河湾出现了一大批著名教师，绝大多数出身于两个柏柏尔大家族，即阿基特家族和安达·阿格·穆罕默德家族，他们相互通婚。其中最有名的教师是著名的法学家和语法学家卡迪马哈茂德·本·乌玛尔·阿基特（1463－1548年）、他的兄弟艾哈迈德（死于1536年）、他的堂弟穆赫塔尔和他的几个侄子，其中最有名的是：阿卜杜勒·阿巴斯·艾哈迈德·巴巴·

[50] A.谢博诺（A.Cherbonneau），1854－1855年。

伊本·艾哈迈德·本·艾哈迈德·阿基特（1566－1627 年）。[39]

15 世纪和 16 世纪伟大的文化活动并没有遗留下任何遗迹。我们知道书名的一些书籍一般都是些学术著作，它们应当充分受到重视。苏丹学者试图用他们自己掌握的资料 210 从理论上和实际中领会和解释伊斯兰法学。然而，伊斯兰文化需要放到苏丹总的范畴中加以观察，它基本上只是一种城市精英的文化，影响所及只是少数人。它基本上是书面语言，并没有吸收当地土著语言和民族文化。它与社会是脱节的，所以它随着造就它的城市的消亡而消亡。

[39] 同上；J.O.亨威克，1964 和 1966 年（a）。



12至16世纪尼日尔河湾和沃尔特河流域的各族人民和诸王国

M. 伊扎德

尼日尔河湾的莫西人：编年史

211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本章所要探讨的遥远时期尼日尔河湾的历史，只能集中在曼普鲁西人、达贡巴人和莫西人所建立的王国——它们的崛起和领土扩张上；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而且两者是相互关联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关于这几个王国的资料，与我们目前掌握的同一地区其他历史实体（诸如古尔马）的历史资料相比要丰富得多（至于那些没有形成中央权力体制的社会则更无需谈了）。第二个原因是任何撰写莫西正史的企图，都必然会碰到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它与古典编年史（《苏丹史》(«*Ta'rikh al Sūdān*») 和《法塔史》(«*Ta'rikh al-fattāsh*»）中提到的"莫西"是否同一回事。正如我们在下文即将看到的那样，若要对本章所涉及的整个地区确定一个满意的编年史纲，首先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只能从分析各种苏丹编年史中提到的莫西人开始。《法塔史》说，莫西人在13世纪中叶前后，也就是在本卷所包括的时期最初那四分之一时间中入侵过桑海的加奥王国。据说莫西人曾与之进行过战争的扎·巴雷，好像就是让·鲁什所编的王朝世系表中的扎·贝拉福洛科；[1]在尼日河流域，他的权力已从加奥扩大到蒂拉贝里。在他的继位者扎·阿西贝统治期间，加奥王国降格成为马里的瓦利曼萨统治下的属国，据内赫米亚·莱扶济昂考证，瓦利曼萨统治时期是1260–1277年。《法塔史》虽然未指明莫西的领土范围，但也告诉我们，莫西人曾经几次入侵尼日尔河湾的西部，就在这里，马里的势力与来自北方的图阿雷格人发生了冲突。《法塔史》中有两段记载，给我们指出了重要的线索，其中谈到一位"莫西的科伊"(*koi'*)，换句话说，就是莫西人的首领，或称国王。[2]留传下

212 来的资料，没有一点说明他们可能是一伙不易控制的劫掠者，相反，所有资料都表明，我们这里所要考证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和军事组织的统治民族，他们或许已初具国家规模，有固定的疆土，我们只能假设是在尼日尔河湾内某一处地方，究竟是哪里则目前尚难肯定。不管怎么说，到13世纪中叶，这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已能向尼日

① J. 鲁什 (J.Rouch)，1953年，第174页，注13。

② 马哈茂德·卡蒂 (Mahmūd Ka'ti)，法文译本，1913年，第333–334页。

尔河湾的几大霸主挑战了。最后，这两段记载中还谈到莫西人曾袭击廷巴克图。正如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的，古典编年史中所指出的莫西人代代相传的巨大事业的长远目标，是要取得对河湾西北方几个商业中心的直接控制。

按年代顺序继续向下考察，我们在穆萨曼萨时代（1312－1337年在位）又碰到尼日尔河湾的莫西人，《苏丹史》记载了这时代的有关事件。其中有广泛流传的关于莫西人攻克廷巴克图的一段记载，摘引如下：

> 有人告诉我们，正是坎库·穆萨素丹建造了廷巴克图大清真寺的宣礼塔，也正是在他的王朝某一君主统治时期，莫西的素丹率领大军对该城发动了远征。马勒(Melli)人民惊慌失措，纷纷逃离，把廷巴克图丢弃给了进攻者。莫西的素丹长驱直入，将城市洗劫一空，然后纵火使它变成一片废墟。被俘者全都遭到杀害，人民的财物丧失殆尽，他大胜回国。[3]

莫西人攻陷廷巴克图的日期一般认为是1337年；[4]也就是说，是在莫西人对加奥形成威胁之后几乎整整一个世纪。当时，这个好战的民族不仅依然为众所瞩目，而且他们似乎还在进一步加强实力。莫西的“素丹”从他那神秘莫测的国土向外发动广泛的远征，攻打可能已有良好防御的大城市，这表明他肯定在人力、马匹和武器等方面有极大的潜力。《苏丹史》也提到了对本卡（尼日尔河湾以西、廷巴克图上游）的一次袭击，这大概发生在1433－1434年之前不久，就在这一年，图阿雷格人攻陷了廷巴克图。[5]又过了整整一个世纪，莫西人仍如以往一样令人望而生畏。让·鲁什有力地论证说，袭击本卡只是对湖区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的一个事件而已。[6]

213

下面我们再谈一谈北部莫西人历史上最为人所知的一段时间，这正好与松尼·阿里大帝和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的统治时期相吻合，两部古典编年史中都提到上述两人，其情节可互为补充。关于松尼·阿里大帝统治时期（1464－1492年在位），我们特别提出以下各点供参考：

（1） 1464/5年：松尼·阿里大帝即位；由“国王”科姆道率军与莫西人作战；莫西人失败，桑海军队一直追逐到班巴拉（巴曼南）人居住的地区，同时科姆道收复了他的首府阿尔古马；

（2） 1470/1年到1471/2年：桑海军队入侵莫西人居住的地区，他们先是由松尼·阿里领导，后来由叶科伊·雅特指挥；莫西国王的住地巴尔卡纳被毁；莫西人的一名首领死去，《法塔史》说他的称号是滕加·尼亚马（*tenga niama*）；

（3） 1477/8年：莫西人渗入桑海领土，一直留到1483/4年；地处在尼日尔河与

[3] 引自萨迪(al-Sa'di)，法文译本，1900年，第16－17页。

[4] C.蒙泰伊(C.Monteil)，1929年，第414－415页。

[5] 萨迪，前引著作，第45－46页，谈到袭击本卡；马哈茂德·卡蒂，前引著作，第118、173、178页，谈到图阿雷格人攻陷廷巴克图。

[6] J.鲁什，前引著作，第177页。

瓦拉塔之间的萨马沦陷；

（4） 1480年：经过一月之久的围攻，莫西人占领瓦拉塔，后来他们撤退，不得不将俘虏丢给城中居民；

（5） 1483/4年：科比之战或称吉尼基－托伊之战，发生在桑海军队擒获莫西首领的家族成员和夺得他的战争财富之后；莫西人撤回本土，桑海军队随之追击，深入莫西境内。⑦

在以袭击本卡为标志的14世纪中叶以及以莫西扩张主义达到高峰、攻占瓦拉塔和其后开始陷入逆境为标志的15世纪中叶之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关于这一整个世纪的情况，没有任何书面材料可作参考。然而，至少可以从15世纪后半叶发生的许多事件中得出如下的推测，当不同凡常的君主松尼·阿里大帝上台时，莫西人已经对桑海帝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以至若要巩固桑海的权力，只有消灭对手才行。在松尼·阿里大帝统治期间，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莫西人对尼日尔河湾一些城镇的偶尔袭击，也不再是桑海方面要进行防御性的反击；这时人们面临的是两大军事强权之间持久难平的战争。到了松尼·阿里大帝统治末期，他已是胜利者，而他的继承者们都不肯就此罢手；他们准备 214 彻底消灭北方的莫西国家，待到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即位时，莫西人的国家虽已元气大伤，但还没到彻底灭亡的地步。

两部古典编年史中谈到16世纪北方莫西人历史之处只有寥寥几处，虽然很少事实依据，但也的确告诉了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情况：在阿斯基亚穆罕默德（1493－1529年在位）及其后继者统治时期，桑海对莫西的战争一直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进行的，莫西人就像古尔马的居民一样是"异教徒"。⑧1497－1498年，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对莫西地区发动过一次远征，那地区当时的统治者是纳阿西拉"素丹"；桑海军队获得胜利，而莫西人死伤惨重，他们的妇孺妻儿大都被俘，他们的首府也被摧毁。阿斯基亚达乌德（1549－1582年在位）即位伊始就对莫西发动了战争，1561－1562年又发动一次，1575年前后是最后一次。1561－1562年的战役使我们能够确定北方的莫西人政权几乎彻底灭亡的日期，我们现在能判断说，这个政权保持达3个世纪之久。《苏丹史》告诉我们，达乌德刚发动第二次战争，"（莫西）统帅就丢弃了他的军队和国土"。至于达乌德统治期间的第三次即最后一次战役（1775年），《苏丹史》简单地告诉我们，桑海人凯旋归来时，"未能掠得什么东西"，这无疑表明那里已经无物可劫掠，桑海军队进入了一个受尽战争摧残而已荒无人烟的地区。⑨

这样，尽管我们所能依靠的资料如此零散，我们还是能够给尼日尔河湾莫西人的历史勾划出一幅相当完整的图景。一个好战的军事化社会在内地建立了世袭统治之后，为控制尼日尔河而与桑海帝国拼杀了300余年，最终归于失败；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统治时期之后，宗教的对抗加剧了政治对抗。关于莫西人及其国土的确切位置，可惜我们现在只能作出极其模糊的假设，因为我们同样得不到口头传说的帮助，在没有进行必要的考

⑦ 关于尼日尔河湾的莫西人和松尼·阿里大帝，可参阅马哈茂德·卡蒂，前引著作，第85－86、88－89页；M. 伊扎德（M.Izard），1970年，第38－44页。

⑧ 参阅马哈茂德·卡蒂，前引著作，第114－115页；萨迪，前引著作，第121－122、124页。

⑨ 萨迪，前引著作，第168、173、179页。

古调查之前，要想有更多的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进行新的研究探索时，我们手头也有一些并非来自古典编年史的资料，它们可以补充我们的知识，或至少可以加强我们的假说。布布·阿马婉转提到一份用阿拉伯文写的神秘文稿，题为《非洲手稿》(«*Aguinass Afriquia*»)，据说是15世纪时的手稿，推测其作者是阿布卡勒·奥尔德·奥达尔。据我所知，这部编年史被称为《萨伊史》(*Ta'rikh of Say*)，它既未出版，也无译本；尽管布布·阿马概述了该书的内容，但他没有直接从中摘引任何一段。根据奥达尔的记述，布布·阿马提出莫西人来自东方，他们在 **215** 尼日尔河左岸建立了一个名叫迪亚马尔的国家，它的最后一个国都设在达洛尔博索的罗齐。据说罗齐国从8世纪传到12世纪，延续了500年。约在12世纪，莫西人没有离开豪萨一岸，他们在那里创建了第二个迪亚马尔国家，以明杰为其政治中心，原来的都城罗齐已因受到柏柏尔人的压力而被放弃了。第二个迪亚马尔国寿命不长；它建立后不久发生了一次饥荒，莫西人就渡河到古尔马一岸定居。在击败当地居民古尔曼克耶巴人和或许是库龙巴人之后，莫西人建立了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迪亚马尔国（插图9.1）。[10]

在未得到和验证《萨伊史》全文之前，我们既无法科学地利用布布·阿马提供的资料，更不能对他提到的某个历史年代是否可信作出明确的回答，比如1132年这个日期就有可能与第二迪亚马尔国向第三迪亚马尔国转化的时间吻合，而在L.托克西埃看来，这很可能是古典编年史所记载的最早与莫西人开战的桑海君主扎·巴雷统治时期的开端。[11] 还有一份著名的阿拉伯文献，是伊本·法德尔·阿拉·欧麦里1337年的作品（据信正是这一年廷巴克图为莫西人攻陷），书名为（«*Masālik al-Absār fī Mamālik al-Amsār*»），书中提到了穆萨曼萨与未来的埃米尔阿布尔-哈桑·阿里的一次谈话，后者是给编年史撰写人提供材料者之一。这位埃及名人请马里君主告诉他马里与谁在交战，穆萨曼萨回答说："我们面对着一伙残暴的敌人，他们在黑人当中与我们的关系，正如鞑靼人与你们的关系一样。"接着，这位国王又补充说，这些敌人"纷纷被箭射中"，他们有"阉割的马匹，马鼻是切开了的"。[12]我们可以联想，这些骑手是不是北方来的莫西人，尽管没听说过在尼日尔河湾一带有阉割马匹之事。

我们知道，热那亚商人安东尼奥·马尔凡特曾于1447年到图瓦特旅行；他用拉丁文给他的同胞乔瓦尼·马里奥诺写过一封信，此信已由C.德·拉·隆西埃尔予以发表；[13]伊夫·佩尔松正是从这封信件中见到有关北方莫西人的内容的。[14]在提到一个名叫伐洛的城市（佩尔松认为就是瓦拉塔）时，还涉及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拜物教国王"，此人正打算围攻这个城市。最后，如用书面资料作一结束，还应提一下若奥·德-巴罗斯在他的《亚细亚编年史》(«*Decadias da Asia*»)一书中所说的"莫塞斯人"；此书写于1552- **216**

[10] B.阿马(Boubou Hama)，1966年，第205-215页；参阅M.伊扎德，前引著作，第1卷，第47-48页。

[11] L.托克西埃(L. Tauxier)，1924年，第22页。

[12] 根据法文《马里帝国》(«*l' Empire du Mali*»)中的一段翻译，1959年，第61页。

[13] C.德·拉·隆西埃尔(C. de la Roncière)，1924-1927年，第1卷，第156页，载有这封信件的拉丁文本和法文译本。

[14] 伊夫·佩尔松(Y. Person)，1962年，第45-46页；应该指出Y.佩尔松所说的"瓦洛"(Wallo)，即C.德·拉·隆西埃尔所说的"伐洛"(Vallo)；参阅M.伊扎德，前引著作，第1卷，第50-53页。

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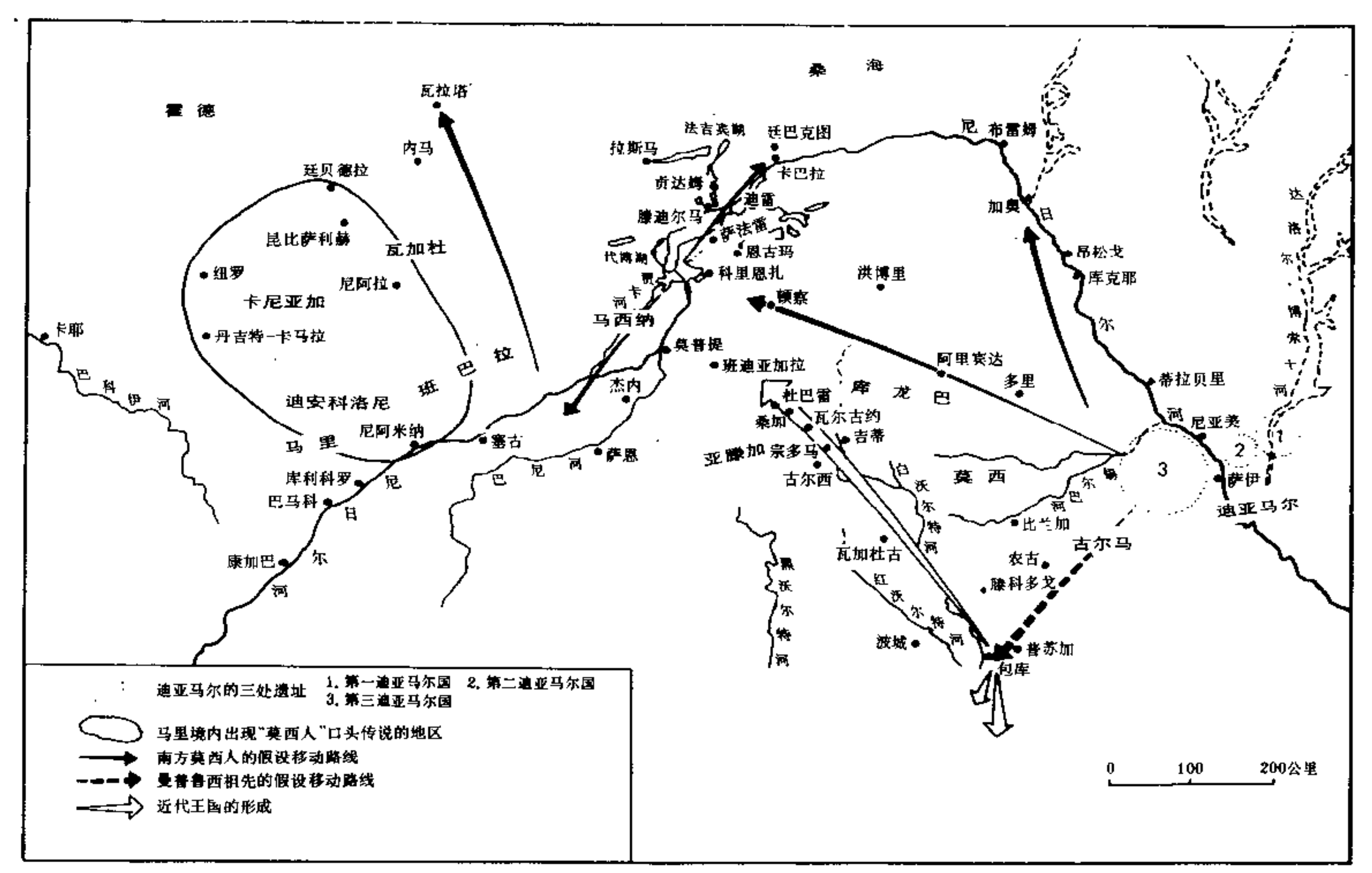


图9.1 尼日尔河湾和沃尔特河流域，1100－1600年(资料来源：M·伊扎德，《莫西王国史概论》，巴黎大学博士论文，1970年)

1553年，这位葡萄牙作家讲到1488年有一个名叫贝莫伊的沃洛夫亲王访问过若奥二世的宫廷。贝莫伊对这位君主说，“莫塞斯”的领土从廷巴克图向东伸展。就这一点而言，在有关北方莫西人的问题上，与我们按古典编年史记载所论述的并无矛盾之处。在若奥二世看来，“莫塞斯”国王的权力竟是如此之大，那肯定无疑就是著名的祭师王约翰了，传说中的祭师王约翰是示巴女王的附庸和埃塞俄比亚王国的创立者。贝莫伊还大谈“莫塞斯”国王与“曼丁国王曼迪曼萨”之间的战争，又详细描写了“莫塞斯”人的习俗，以致在场的听众都相信“莫塞斯人”是基督教徒；至少可以说，他们不是穆斯林，就这一点而言，若奥·德-巴罗斯的看法与古典编年史作者的记述也相符合。[35]

若奥·德-巴罗斯的解释只是在一个方面证实了廷巴克图的历史。至于其他书面史料所引用的材料，虽不十分明确，却也证实在整个15世纪有一个黑人“异教徒”政权与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相对抗，西非其他强权大国也与它处于长期敌对的状态。另外，我们还应感谢克劳德·梅拉苏，他收集了不少有趣的马里口头传说；[36]虽然一致认为这些传说很难解释，但确是很有意思，因为传说中涉及北方莫西人，他发现莫西人在离尼日尔河湾很远的地区——霍德、卡尼亚加、瓦加杜都留下了踪迹。这些口头传说是迄今为止唯一涉及古典编年史中所说的这个好战民族的资料。在尼亚米纳和尼阿拉之间的迪安科洛尼地方，有一排水井据说是莫西人挖成的，这与我们印象中的好战者的形象很不相符。在这地区，据说莫西人清除或同化了绝大多数苏玛尔氏族，然而，迪亚里索各氏族却成功地顶住了入侵者的压力。现在还有人知道，传说在今丹吉特-卡马拉地方（穆尔迪亚以南100公里）发生过一场莫西人和当地居民的战斗。据说，莫西人曾经在霍德占领了几处地方，并在加拉设立了领地据点，包括40个左右的村庄。他们还入侵到距昆比萨利赫不远的道勒-吉尔贝。[37]

尼日尔河湾的莫西人与沃尔特河流域的莫西人两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古典”的论点

217

第一批史学家开始撰写白沃尔特河流域莫西人的情况时，他们对历史的分析主要根据口头传说资料，这些口头传说把莫西人所有王朝的家系全都归到独一无二的始祖纳阿巴·韦德拉奥戈一人，这些史学家还强调莫西诸王国的起源与曼普鲁西、纳农巴、达贡巴各国的起源有着明显的联系。M. 德拉福斯、L. 弗罗贝尼乌斯和L. 托克西埃就是试图追述莫西历史的最早一批史学家；M. 德拉福斯采取的方法是对1909年以来有关殖民统治的专著进行研究，后两位则是依靠直接收集到的材料。[38]从目前掌握的莫西传说中，看不到他们早先与桑海发生冲突的任何迹象，也没有发现莫西人在尼日尔河湾长久

[35] 引自若奥·德-巴罗斯（João de Barros），法文译本，1909年，第6-18页；参阅L. 托克西埃，1917年，第84-85页；M. 伊扎德，前引著作，第1卷，53-55页。

[36] 私人信件，引自M. 伊扎德，前引著作，第1卷，55-56页。

[37] 昆比萨利赫，据推测是加纳帝国首都，距毛里塔尼亚的廷贝德拉以南60公里。

[38] M. 德拉福斯（M. Delafosse），1912年，第2卷，140-142页；莱奥·弗罗贝尼乌斯（L. Frobenius），1925年，第260-262页；L. 托克西埃，1917年，第67-84页。

居住的痕迹。这几位史学家都熟悉《苏丹史》；而《法塔史》的出版和翻译要比另一部重要的廷巴克图编年史晚，因此任何注释都没有提到它。尽管莫西口头传说对我们所谓的尼日尔河湾莫西人只字未提，但是毫无疑问，在这些莫西史学的真正奠基者心目中，北方莫西人和白沃尔特河莫西人是同一个民族。他们当然可能甚至很自然地会提出这种假设（这只不过是个假设，而且几乎仅仅是以人种对比的相似性为依据的），但是假设一经提出，就该采取步骤来加以证实，或者说如果得不到明确的证据，那就该将它抛弃。这种假设从未得到证实，因为根本没有理由（举例而言）把一部编年史中提到的一个莫西首领的名字（纳阿西拉）[19]与一位亚滕加君主的名称之间可能有的关系当作证实假设的依据[20]。但莫西王国的历史却正是建立在这种脆弱的基础之上，这就冒着模糊尼日尔河湾莫西国家的原始特征或建国前结构的风险，更糟的是把一个尚难成立的假设看成已经解决的问题，还会冒冲淡对这些问题进行历史研究的危险。

M. 德拉福斯和 L. 托克西埃把尼日尔河湾的莫西人与白沃尔特河畔的莫西人等同起来，专门为各莫西王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廉价的年代框架；与此同时，他们又给予那份年表一个比单纯考虑这些王国和邻近政治实体的口头传说所能推断出来的年代要 219 长得多的“尺度”。为了肯定当时的莫西各王国发源于南方的这种占优势的说法，为了证实廷巴克图的征服者是来自白沃尔特河的莫西人，还有必要明确提出下列两个相互补充的假说：莫西人只有到他们对沃尔特河畔的土著居民建立起牢固的统治权之后，他们才有可能进行全面的军事征战；古典编年史中提到的那些军事行动在诸王国历史的早期阶段是不可能进行的。M. 德拉福斯为了使一个未经证实的冒险假设变得确实可信，甚至提出当时的莫西各王国的历史始于 10 世纪末期前后的论点。[21] 这就把口头传说没有直接提供的莫西君主平均在位时间的长度大大地扩大了，同时也承认了这样的观点，即在莫西国土上见到的各王朝世系表中都有间断；如果我们着眼于现有口头传说提供的王朝世系及首领世系的大量材料，那么这两点都是无法证实和难以成立的。

应当赞扬法国一名军事行政官员朗贝尔上尉，他早在 1907 年就批评了把古典编年史中的莫西人等同于现述莫西人的趋向。[22]对于莫西人历史编纂工作来说，遗憾的是朗贝尔的可贵研究成果从未发表，因而 M. 德拉福斯和 L. 托克西埃的论题就成为无疑问的教条而流传下来，甚至他们两人的意见分歧也无人注意，不问分歧原因何在。[23] 直到 1964 年，这一可以称之为“古典”的论点（指 M. 德拉福斯和 L. 托克西埃的论点）才受到英国著名史学家约翰·费奇的强烈挑战。在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文中，J. 费奇重新考察了这一“古典”论题，他细加分析，最后予以否定，并主张对“莫西人”历史进行全面革新的研究；就在这篇论文中，他首先将尼日尔河湾莫西人和沃尔特河流域莫西人两者加以明确区分，但并没有排除这两个群体间可能有关系的假设，因为提出这种假设还

[19] M. 德拉福斯，前引著作，第 2 卷，141－142 页； L. 托克西埃，1917 年，第 81 页。

[20] 这里所谈的君主是亚滕加的纳阿巴·纳索达，他无疑很短的在位时间是在 17 世纪上半叶。

[21] M. 德拉福斯，前引著作。

[22] 朗贝尔（Captain Lambert）专题论文原件一直保存在达喀尔的塞内加尔档案馆。

[23] 在 M. 德拉福斯的论著于 1912 年发表后，他从未重新修订；与他不同，L. 托克西埃 1924 年对编年史论点的解释却比先前于 1917 年提出的论点有较大的修改。

是有许多根据的。[24]

在约翰·费奇看来，这种古典论点在年代问题上碰到的困难是难以克服的。按已故学者戴维·泰特对达贡巴口头传说的分析，J. 费奇得出结论说，传说中的莫西历史年表太长，由 E. F. 塔马克洛伊提供的得到公认的达贡巴历史编年也太长；他由此提出达贡巴国创建者纳·尼亚格斯开始统治的年代应是 1480 年左右。[25]这样，对 J. 费奇来说，我们推测中各王国所由产生的政治实体的出现不会早于 15 世纪。J. 费奇曾接受关于北方莫西人与沃尔特河莫西人具有同一起源的假说，但认为在同一历史进程中，前者处于国家形成前的阶段，而后者已处于国家形成阶段。顺着 J. 费奇的这条线索，另一位史学家内赫米亚·莱扶济昂于 1965 年提出了一份沃尔特河流域所有国家的年代对照表（缺古尔马，因无有关资料）。[26]由于莱扶济昂将纳·尼亚格斯的统治年代定在 1460 - 1500 年之间，将他之前的两代定在 1380 - 1420 年和 1420 - 1460 年（第一代：曼普鲁西王国建立；第二代：纳农巴王国建立），他对各王朝世系表作了一番研究后，接受每一代平均年限为 40 年的计算法，其成果自然与 J. 费奇的相一致。

220

我本人也试图加入这场讨论，愿为沃尔特河流域类似于国家的几个政治实体的历史提出一个编年框架，其基础在于对莫西人的家谱资料、特别是对现述两个主要莫西人国家（瓦加杜古和亚滕加）的资料进行分析。[27]在方法上，首先是参照殖民统治前各朝代的时间长度，断定每一代的平均年限，从而确定亚滕加建国的关键性日期，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可行的。于是，我就以 1540 年作为亚滕加建国的时间。然后我从亚滕加的创建者纳阿巴·亚德加往前追溯到他的祖先瓦加杜古王国的创建者纳阿巴·乌布里，同时利用瓦加杜古王朝家谱独有的特征来进行这一推断。这又使我得出 1495 年作为纳阿巴·乌布里统治的起点。再往前追述瓦加杜古王国建立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家谱资料，加上权力转移方式的多变，我只得提出一份大致年表，一代的平均时间在 15 至 30 年之间按比例递增。莫西的王室家谱，在纳阿巴·乌布里之前提到他的"父亲"纳阿巴·宗格拉纳，后者的"父亲"纳阿巴·韦德拉奥戈和"他的"母亲耶能加，也即曼普鲁西王国创建者的长女(?)，曼普鲁西人称这位创建者为纳·巴瓦或圭巴，莫西人和达贡巴人则称他为纳·涅德加。由此得出的结论展现在附表 9.1 中，表中日期是指各代统治的开端而不论其统治是否确实存在（至少就耶能加而言是确有其人）。

221

需要指出的是附表 9.1 中，每一纵行与各代的标准平均时间相吻合，由 15 年到 30 年按比例递增。可以认为（这也是最有可能的假设）一代一代时间的长短是各不相同的，所以一份完善的表格应考虑到各代时间长短的各种可能的组合。正如表格所示，这一大致年表与 N. 莱扶济昂提供的年代对照表并不矛盾，因为他是以平均 40 年为一代作基础，将纳·巴瓦的在位时间定在 1380 年到 1420 年，而我将它当作最长的统治时间看待，或定于 1400 - 1420 年（一代为 25 年），或定于 1375 - 1405 年（一代为 30 年）。

[24] J. D. 费奇（J. D. Fage），1964 年（a）。
[25] J. 费奇和 D. 泰特（David Tait）对达贡巴王国历史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版。
[26] 内赫米亚·莱扶济昂（Nehemia Levtzion），1968 年，第 194 - 203 页。
[27] M. 伊扎德，前引著作，第一卷，第 56 - 70 页。

附表 9.1 莫西五代"统治"的大致年表

	每一代的平均年数:	15	20	25	30
5	纳阿巴·乌布里	1495	1495	1495	1495
4	纳阿巴·宗格拉纳	1480	1475	1470	1465
3	纳阿巴·韦德拉奥戈	1465	1455	1445	1435
2	耶能加	1450	1435	1420	1405
1	纳·巴瓦	1435	1415	1395	1375

沃尔特河流域各国的起源：现在了解的状况

现在让我们扼要叙述一下我从有关尼日尔河湾莫西人的各种不同资料中了解到的情况。13世纪上半叶，原来第二迪亚马尔国（明杰）的莫西人渡河来到萨伊地区，建立了第三迪亚马尔国。第三迪亚马尔国的早期历史，似乎主要是反对加奥的桑海人的战争，其目的无疑是要巩固新的疆土。14世纪时，这目的一经实现，莫西人扩张的目标就不再是尼日尔河湾东边而是它的西面，1337年对廷巴克图的远征充分表明这一点。15世纪一开始，莫西人就向西面和西北面发动新攻势，他们袭击了本卡，15世纪下半叶，首先是以莫西人的重大胜利为标志，然后是桑海人在松尼·阿里大帝领导下进行的猛烈反攻，桑海很快获得胜利。此后100年间，在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和阿斯基亚达乌德统治时期，桑海的穆斯林君主发动"圣战"，莫西人就完全处于守势地位了。1575年前后，北方莫西人一切有组织的抵抗均归失败。

除非得到有关古尔马的充足资料，或考古发现足以证实各种著作及口头传说的结论，否则我们没有可能提出涉及北方莫西人和沃尔特河流域莫西人之间关系的确切论断，更不能提出涉及迪亚马尔国莫西人和曼普鲁西王国初期那些武士之间关系的论断；后者一方面发展成为纳农巴和达贡巴国家，另一方面又演变为现述的莫西人政治实体，最后可能还演化出农古王朝（法达·恩古尔玛）。这确实是个重要问题，而且关系到一种特定的政治组织格局在西非洲广大地区传播所经过的路线，其起点或许是在博尔努，可能又以当时豪萨人居住地区的赞法拉为中间集结站。大概可以肯定地说，曼普鲁西君主的祖先是来自东边。据北方的加纳人传说，曼普鲁西的第一位君主纳·巴瓦（14世纪晚期至15世纪初期）的直系祖先是一个"红发猎人"，名叫托哈杰耶。这个流传很久的传说是E. F. 塔马克洛伊从达贡巴人那里收集到的。㊽

托哈杰耶原来住在马勒王国的一处洞穴中，随处行猎，当地靠近豪萨人的领土。马勒国王在与邻国作战时曾经向托哈杰耶求助，恢复和平后便将一个瘸腿的女儿帕加沃尔加嫁给了他；传说他们生有一子，名叫克波戈努姆博，这男孩虽是独臂独腿，但所有的传说都说他身躯高大，成年之前随父同住。待到长大成人，马勒国王又一次碰到困难，这次是向他求助而不依靠他父亲了。克波戈努姆博为他的保护者赢得了胜利，随后便决定不再

㊽ E. F. 塔马克洛伊（E. F. Tamakloe），1931年。

回到父亲住穴而向西远行 经过几天路程，他来到古尔马境内的比尤恩、比尤恩的"当地主人"把一个女儿苏胡萨布加（或西萨布吉）许配给他，婚后生了5个儿子：先有一对双胞胎夭折了，接着是纳姆齐谢勒、尼亚尔格和恩格马尔根萨姆。克波戈努姆博急求统治比尤恩，于是杀害其岳父，自立为首领。这一篡权行为激起了古尔马国王达拉玛尼的义愤，他便对比尤恩首领宣战；但未能打败克波戈努姆博，最后达拉玛尼决定媾和，把自己的女儿索伊尼（或索尔伊尼）作为人质嫁给了先前的敌人 索伊尼生有一子，即未来的纳·巴瓦（或圭巴），达贡巴人和莫西人则称他为纳·涅德加 在克波戈努姆博的直系后代中，只有这个幼子离开古尔马去别处寻求前程。他率领一大批武士，侵入库萨西人的土地，在普苏加建立了行宫，从那里攻打库萨西人和比萨人，以图建立统治权。

纳·巴瓦有9个儿女：长女名叫卡乔戈，后面8个儿子是齐里利、库福戈、托哈戈、恩格曼塔姆博、西托博、西比埃、比埃芒涅、博戈耶尔戈。按说纳·巴瓦的继承人是长子齐里利，可是怕他心眼太坏，纳·巴瓦便与其余儿子合谋阻止他继位。纳·巴瓦选择次子库福戈为继承人，可是，母后把阴谋告诉了齐里利，他就把库福戈处死了。纳·巴瓦得知库福戈的死讯，当即死去 后来是长女卡乔戈继位，但齐里利又成功地夺去她的王室权力，将她排挤到贡多戈自处去了。看来，齐里利才是曼普鲁西王国的真正缔造者 然而，在他死时，他的3个兄弟——托哈戈(托苏戈)、恩格曼塔姆博与西托博都争夺继承权。托哈戈被赶出了纳·巴瓦的王国，他建立纳列里古城，创建了当今的曼普鲁西王朝。恩格曼塔姆博在纳农巴人中间定居下来，成了该地的国王 西托博先后在甘巴加和纳巴雷定居，他在世时，其长子恩雅格西住于巴加拉，后来建立了达贡巴王朝。

不言而喻，我对以上简述的一切本应详加阐明，因为严格说来，这一流传很广的传说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都应考虑在内。然而，更重要的是，应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些综合的历史线索。

如果我提出的年表，或 N. 莱扶济昂提供的类似年代对照表得到承认，那就可以肯定地说，曼普鲁西的原始历史首先发生在豪萨境内(或者说在尼日尔河的豪萨一岸)，然后14世纪在古尔马，而14世纪正是尼日尔河湾的莫西人向西边发起第一次大远征的时期 假如这些莫西人与曼普鲁西人的祖先之间有任何关系，那只能是他们在遥远时期有共同的血统关系，可追溯到第二迪亚马尔国（在尼日尔河的豪萨一岸）和第二迪亚马尔国(在古尔马一岸)的时代。或许也可能把这个时代定于13世纪，那时一些被雇佣的武士从原始莫西人的基地进到了古尔马，过后又穿过该地到达普苏加地区。值得注意的是 E. F. 塔马克洛伊所转述的达贡巴传说中，谈到马勒王国的一个国王，这是一个使人联想到马里的名称。同时还应注意到现今亚滕加的莫西人还能区别两个"曼德"，一个是相当于马里的西曼德，另一个是东曼德：据传说，卢鲁姆的库龙巴人以及古老而较小据点布尔苏马的莫西人，都来自东曼德。[29]

正如我所说，纳·巴瓦这个名称在莫西人中间是称纳·涅德加：据达贡巴的传说，

[29] 关于库龙巴人的全面研究成果，见 A. M. 施韦格-赫弗尔（A.-M. Schweeger Hefel）与 W. 斯托德（W. Staude）合著，1972年，第19 127页。布尔苏马是亚滕加中心地区的一处村落，那里的居民自称是来自东曼德的莫西人；别处的莫西人却认为他们是当地居民。

纳·巴瓦的长女是卡乔戈，这个名称可能与莫西人传说中的纳·涅德加的长女耶能加的
224 名称是混同了。这里要说明的重点，并不在于传说中的细节，那是十分复杂的；无论如何，我们有两点认识：（1）曼普鲁西、纳农巴、达贡巴诸国的形成是有直接联系的，这是一方面；至于它们与莫西人各国的关系，则是另一方面，（2）这种直接联系，并非父系血亲关系，而是同母异父的关系；前者，父系血亲关系，在北方的加纳王朝占优势；后者，同母异父关系，在父系社会中为血统关系的延续打下了无可否认的烙印，历史的延续性和间断性的辩证关系正是如此。

据我所知，有关莫西各王国起源的历史传说，绝不少于15种说法，但如细心收集口头传说，仍会进一步有助于研究的开展。让我们细细察看占优势的那个传说，这是在莫西人地区、特别是在瓦加杜古王国地区广泛流传的传说，它谈到达贡巴(而非曼普鲁西)的国王纳·涅德加，他的首都在甘巴加，有长女名叫耶能加，他不许女儿出嫁而要她守在身边，因为耶能加的身价不亚于一名武士。这个流行十分广泛的传说又有多种说法，对耶能加为什么骑上一匹未经阉割的马去比图附近的森林，却都讳莫如深，只说她在林中迷失了道路，她究竟是因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女性去满足父亲的军事要求而逃离他的住所呢？还是因马脱缰而使她与她所率领的骑兵分开了呢？任何一种说法都没有把原因说清楚，只说她（自愿或被迫地）骑马穿过森林时遇到一个曼德王子，他名叫里雅尔（或里雅雷），是个猎象者。他们相会之后生下一个男孩，取名纳阿巴·韦德拉奥戈，整个莫西人地区都是如此称呼他，这名字来源于莫雷语的韦德拉奥戈（*wedraogo*）一词，意指“未阉割的雄马”。这个纳阿巴·韦德拉奥戈命中注定要成为莫西人的始祖、成为一整个民族的共同祖先。

许多传说都没有提到里雅尔此人，而在上述传说中他也只不过是纳阿巴·韦德拉奥戈的男性先辈而已；从社会意义上说，纳阿巴·韦德拉奥戈并无“父亲”，他只是耶能加的亲生子。同一类传说中，对耶能加之死及其子早年的作为都很少交代，但是谈到纳阿巴·韦德拉奥戈长大能拿起武器时，他就由母亲引见给他的外祖父了。他由外祖父任命为一支武士军的头领。按传说回忆，这大概是15世纪中叶的历史。

许多传说都表明古尔马国家当时已经存在，虽然那时的君主并不一定属于后来的统治王朝。古尔马那时候不是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是（在一定意义上说以后一直是）一系列相对独立的领地据点的邦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两部古典编年史都提到古尔马。举例而言，松尼·阿里大帝15世纪末期的最后一次袭击，就是针对古尔马的。[30]到
225 16世纪，桑海所有的君主都对古尔马“异教徒”大张挞伐。《法塔史》的主要编纂人是马哈茂德·卡蒂，他的孙子伊本·莫克塔尔编写这部编年史的附录就指出，阿斯基亚伊萨克曾经入侵比兰加，即“古尔马君主的王室住地”。[31]除了这些零散的史实之外，关于古尔马国家的起源以及同一地区相互更替的一系列国家的情况，我们迄今一无所知。

但是，莫西人中间最流行的传说却谈到了农古王朝的起源：第一位农巴多（*Nunbado*，农古王朝的君主）是迪雅巴，他是纳阿巴·韦德拉奥戈的儿子，也是洛姆波人的祖

[30] 萨迪，前引著作，第105、115-116页。
[31] 马哈茂德·卡蒂，前引著作，1898年，第275-276页，注2。

先；但是这似乎是一种晚近的传说，而且是莫西帝国主义意识的产物。琼佐·卡瓦达在杜尔滕加地方收集到一个传说，其中也谈到迪雅巴，说他是甘巴加的国王纳·涅德加之子。[32]值得一提的是有许多传说古尔马人本身并没有听到过，例如说卢鲁姆的第一位库龙巴人国王、农古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是从天而降；最后这个传奇至少可以表明古尔马王朝史是独成一系的，不能与北方加纳人的和莫西人的王朝混为一谈。[33]

各莫西人王国历史的开端

16世纪时，纳阿巴·韦德拉奥戈的子孙后代一直在白沃尔特河流域各民族中扩大其势力；在西面，他们到达并跨过了红沃尔特河，进而抵达黑沃尔特河流域的博罗莫，莫西人向西扩张就到此为止。在此之后，莫西领土虽有某些调整和加固，但其边界在殖民地时代以前并无改变，到那个时候，莫西人的扩张主义又以农业殖民化的新形式发展起来。

长期以来人们对莫西各王国历史的起源未能探讨清楚，这主要是因为滕科多戈（滕科戈多）传说迟迟没有发挥出它的优势作用，未能及时压倒更为古老但今天已很少流传的南方领地传说。感谢琼佐·卡瓦达的辛勤劳动，现在才有可能对莫西南部领地据点起源的复杂性有了比较明确的概念。[34]由于这种复杂性，现在还不可能对这段历史取得全面的认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实际征服白沃尔特河流域和建立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几大王朝之前有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琼佐·卡瓦达认为，曼普鲁西王国的最初形态起源于普苏加；从严格意义上说，赞巴尔加和桑加是莫西人最早的据点。杜尔滕加和科敏-扬加两个地方王朝（其首领是古尔曼克耶巴人，或更确切地说是雅尔塞人）似乎是直接从普苏加来的，[35]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农古王朝可能起源于杜尔滕加。据说金泽姆据点源自赞巴尔加据点，而金泽姆据点后来又衍生出瓦尔盖、拉尔加伊和特诺阿根诸据点；最早的征服者是从金泽姆往西北去的，从戈代王朝中分出了滕科多戈王朝，而戈代王朝则来自特诺阿根。 226

经过一段时间野心勃勃的政治军事行动准备，莫西人的征服战进展神速，这发生在南部领地，赞巴加尔、金泽姆和一些较小地方的周围。在这段早期历史中，有两个主要人物，即纳阿巴·拉瓦和纳阿巴·宗格拉纳，他们的军事活动大致可以定在15世纪下半叶，口头传说把他们列在纳阿巴·韦德拉奥戈的"儿子"辈中。我们无需再次强调我在前面所说的莫西史中最初那些人物的"子女"（及以后的"兄弟"）关系是有很大疑问的，这一点在关于纳阿巴·韦德拉奥戈与纳阿巴·拉瓦和纳阿巴·宗格拉纳之间关系的方面特别真切。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纳阿巴·韦德拉奥戈这两个假设的"儿子"的传说是互相矛盾的：凡是提到纳阿巴·拉瓦的地方，都不提纳阿巴·宗格拉纳，反之亦然。此外，

---

[32] 琼佐·卡瓦达（Junzo Kawada），1979年。
[33] W. 斯托德，1961年。
[34] 琼佐·卡瓦达，前引著作。
[35] 莫雷语中"扬加"（*yanga*）这个词意指东方，雅尔塞人是与南部地区的莫西人有关系的东方人，被看作是介于莫西人和古尔曼克耶巴人之间的民族。

尽管历史上确有纳阿巴·拉瓦其人，因为存在大量关于他的众口一辞的材料和证据，但是否真有纳阿巴·宗格拉纳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鉴于纳阿巴·宗格拉纳的踪迹只能在莫西地区南部和中部几处地方找到，所以纳阿巴·拉瓦就给人以一位伟大征服者的形象。

亚滕加的乐师歌颂纳阿巴·拉瓦为波城（在卡塞纳人居住地区、莫雷语中称普戈）、宗多马、桑加和杜巴雷的首领，后三个地方是在北方大莫西王国境内。纳阿巴·拉瓦是莫西历史上唯一可称为"帝国"的政治实体拉瓦滕加的创建者。[36]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在一个单一的权威领导下联合而成的这个国家包括当时莫西人领土的相当大部分，国家的中心地区是由各据点组成的大网络，其中主要有尼尤、纳诺罗、萨奥、达佩尔戈、马琪和尤布。拉瓦滕加国土过大，建国时间又过早，那时莫西人据点的人口密度还很低，土著居民也只是部分降服，所以它无法长期保持统一。尽管纳阿巴·拉瓦的几个儿子和同僚长期在莫西中心地区保持对据点的统治，但即使是纳阿巴·拉瓦在世时，唯一具有凝聚力的政治实体是从拉瓦滕加崛起的宗多马王国，这名称来自当时亚滕加境内纳阿巴·拉瓦的三处住地之一。

纳阿巴·拉瓦在贡多平原结束他的征讨，那里是多贡人居住的地方，他把多贡人赶出亚滕加，迫使他们迁到班迪亚加拉峭壁（当时的桑加和杜巴雷就在莫西人领土与多贡人住地的交界处）。在北方，纳阿巴·拉瓦设立了一系列据点，把它们分给儿子、兄弟和军官们去管辖。在亚滕加，当时已有许多首领直接列入或被收进这一世系中了，包括宗多马村的头人（受人崇敬的纳阿巴·拉瓦的陵墓就在此村）；这些首领在那里保持"能征善战者"（*tasobanamba*）的身份，在王国历史的全过程他们中很多人成为朝廷大臣或"国王的管家"（*nayiridemba*）。16 世纪下半叶以后，亚滕加的领地扩大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以损害宗多马王国为代价而取得的。如前所述，莫西史料当时很少谈到纳阿巴·拉瓦的"弟弟"纳阿巴·宗格拉纳；但他的踪迹在国内多处、特别是曼加南部地区仍有发现。靠近亚滕加东南边境上的两个小王国拉滕加和齐滕加，据说就是这位鲜为人知的首领的"儿子们"建立的。

就在这段时间，逐步建立了最早的一批莫西人政治实体。当时总共有五股从南方涌入白沃尔特河流域中心地区的人流。第一股在这地区的西部，以纳阿巴·帕斯戈和纳阿巴·西尔加为首，他们越过白沃尔特河，就在孔比西里及曼加地方扩展其势力。第二股的目标是占据库古佩拉（科佩拉）。第三股则在巴姆湖沿岸，拉滕加王国的创建人纳阿巴·拉塔格巴在那里定居，与他的兄弟、齐滕加王国的创建人纳阿巴·齐伊多相距不远。第四股由纳阿巴·吉格马率领直奔布尔萨地区。第五股则在中部地区的腹地驻留下来，建立了乌布里滕加，这名称就表明它是纳阿巴·宗格拉纳的"儿子"纳阿巴·乌布里所建。在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的征服者或王朝创建者当中，有两位杰出人物，纳阿巴·吉格马和纳阿巴·乌布里。据东边的传说，纳阿巴·吉格马是纳阿巴·乌布里的兄长，他后来被他的弟弟夺走了权力。[37] 纳阿巴·吉格马因征服当时莫西领土的东部而崛起，其势力

[36] 莫雷语中"滕加"（*tenga*）一词总指土地或"领土"；这就派生出拉瓦滕加（拉瓦的领地）、亚滕加（亚德加的领地）、乌布里滕加（乌布里的领地）等地名。

向北一直扩展到当时利普塔科的边境。[38]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东部的一些政治实体，构成了一条沿古尔马边界由北而南的宽广的条形地带；这似乎表明古尔曼克耶巴人为了使自己的领土成为莫西人向东扩张计划的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们已经在充分牢固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了。

纳阿巴·乌布里是瓦加杜古王国当时统治王朝的创建者，该国君主的称号为莫戈·纳阿巴（*Moogo Naaba*,莫戈首领），那是指所有莫西地区而言。[39]我已将纳阿巴·乌布里登上政治舞台的时间定在15世纪末（1495年算是正式的假设年份），因此，他的统治时期实际上包括16世纪初在内。纳阿巴·乌布里占领了津雅尔地区，该地后来改称乌布里滕加，据说他的到来结束了当地土著居民间无休止的战争。接着，纳阿巴·乌布里又从乌布里滕加向东边和东北边扩张其势力，曾与莱伊人作战，他的征讨远至雅科和库杜古，进入了莫西人已经建立许多据点的地方（其中不少属于拉瓦滕加）。纳阿巴·乌布里在离雅科不远的拉村去世，也许他想以拉村为最后住地；他的遗体移葬在一个村庄里，该村以后便称为“乌布里陵墓所在地”（*wubriyaoge*），他的遗物被分置在吉隆古、达博祖格－尧格和隆比拉，在这些地方仍可以见到瓦加杜古国王用的祭坛。

在纳阿巴·乌布里逝世时，他所创立的王国的中心地区几乎所有地方都归到了一个单一据点的管辖之下，紧接他的几个继承人都能继续他的事业，特别是进一步向西扩张势力。纳阿巴·纳斯比尔（纳阿巴·乌布里的第三个儿子）继位称王，他统治时定都于拉村（即王朝创立者去世之地）。纳阿巴·乌布里的另外两个儿子前往亚滕加地区另行建立据点：纳阿巴·里姆索建其据点于甘博，他的弟弟纳阿巴·乌姆塔奈则成了吉蒂王国的建立者，他与多贡人作战，将铁匠都变为奴隶。就在同一时代，一个军事首领纳阿巴·斯维达驻扎在古尔西附近的米尼玛，另一个从南方来的首领纳阿巴·瓦尔玛在那里与他联合。

纳阿巴·乌布里之孙、即纳阿巴·尼英涅姆多之子纳阿巴·库姆杜姆耶继位之时，恰好与纳阿巴·纳斯比尔之子纳阿巴·亚都加启程去古尔西发生在同一时间。纳阿巴·亚德加是由米尼玛的首领纳阿巴·斯维达抚养大的，他在权力之争中无法取胜纳阿巴·库姆杜姆耶，因此外出找找运气；其姐帕布蕾与他同行，她以纳波科（*napoko*）的身份替纳阿巴·亚德加偷得王权的徽号，并自行保管起来。[40]这些事件，我假定发生在1540年；如前所说，这是我们所说的莫西历史上的第二个关键时刻。纳阿巴·库姆杜姆耶在当时各王国的建立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在他领导下，莫西人的向外扩张达到高潮，甚至一度深入到古伦西境内。纳阿巴·库姆杜姆耶的直系子孙是当时孔基西滕加、雅科、特梅、马内、布苏马诸王国的建立者。在上一代，纳阿巴·乌布里之子纳阿巴·纳曼梅已经建立布尔萨王朝，他因此得到纳阿巴·吉格马的部分政治遗产。纳阿巴·纳曼梅的儿子纳

229

[37] 弟弟废黜兄长在莫西有关领地据点的传说中是常见之事。

[38] 利普塔科原是一个以多里为首都的埃米尔国，它是本章所述时期以后很久才建立的；上沃尔特北边这片地区的居民肯定是桑海人、库龙巴人和古尔曼克耶巴人。

[39] 莫西人（Mossi），也称莫塞人（Moose），其单数为莫加（Mooga），他们控制的整个地区总称莫戈（Moogo）；实际上莫西人“领土”一词与“世界”含义相似。

[40] 莫西首领或国王死时，在正式宣布他亡故（并非实际死亡的确切时日）与指定继承人当间，由他的长女暂时登位；她有纳波科（女头领）的称号，作为父王的替身，她身穿王袍。

阿巴·库里塔则建立了库古佩拉王国。[41]卡亚奥王国的建立应归功于纳阿巴·乌布里的另一个孙子纳阿巴·耶莱库（即纳阿巴·纳斯比尔之子、纳阿巴·亚德加的同父兄弟）。纳阿巴·库达（纳阿巴·库姆杜姆耶之子）在16世纪下半叶登位统治时，莫西人领土的中心已经最后成形；这位君主，即本章所探讨时期最后一个“莫戈·纳阿巴”的主要措施，就是将他的儿子纳阿巴·塔桑戈（塔滕加王国的创建者）送到了里斯亚姆山区。

纳阿巴·亚德加到达古尔西地区实行统治时，亚滕加境内已有许多莫西人的据点。[42]该地区的主要政治力量是宗多马王国，即拉瓦滕加的北方化身，但它受到其他政治实体的挑战，其中首要的是吉蒂王国；在西南方，新建的莫西领地与萨莫人居住地交界处，米尼玛和古尔西的据点是莫西人一系列据点中的两大主要堡垒（在它们周围已经建立许多地方据点）。纳阿巴·亚德加从古尔西出发是要实现三项目标：使他的养父纳阿巴·斯维达保持中立；与古尔西首领纳阿巴·瓦尔玛结成同盟；将他的征服行动扩展到萨莫人地区。在古尔西住定之后，纳阿巴·亚德加又在拉戈建立了第二个住地。他的第二个儿子纳阿巴·格达在16世纪末掌握权力时，年轻的亚滕加王国终于断绝了它与瓦加杜古王国的一切联系。[43]从此以后，莫西人的两大王国——瓦加杜古和亚滕加命运就各不相同了；但它们还是莫西地域霸权的两极，在它们周围各有许多小臣属国，从而形成了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

总而言之，从15世纪上半叶或中叶开始的莫西各王国的历史，在我们所探讨的这时期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时代（15世纪下半叶）；其次是征伐阶段（16世纪上半叶）；最后是巩固阶段（16世纪下半叶）。

莫西人的政治体制

这里我只能给莫西人的政治制度勾划一个非常简略的轮廓；的确，关于莫西体制的发展过程我们所知甚少，只能就18世纪末期以来的亚滕加情况和19世纪初期以来的瓦加杜古情况作出概述。实际上，从1907年就开始收集的有关莫西各王国组织情况的有用资料相当充足，我们完全有可能阐述那些政府机构是如何发挥职能的，但这只限于殖民地之前时期结束时的情况。所有观察家都同意，莫西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在于拥有土地者（*tengsobondo*）社会与拥有权力者（*naam*）社会双方的差别；前者代表土著居民，被称作“土地种植者”或“土地之子”，后者则主要是莫西人。当然，土著居民与征服者之间的差别并非不可变动的，至少是人们一提到“有权势者”就必定会把莫西人本身（纳阿巴·韦德拉奥戈的后代）、王室仆从和俘虏（大部分属于外族血统）都包括在内。其实，

[41] 库里塔（*kurita*）意为死去的首领在人间的代表人，这个词的原意“故王仍在”，据推测是“统治者”（*narita*）一词延伸而成的。通常，库里塔是在死去首领的儿子中选定，他有称号而无实权，而且不得继位，但他可以在自己家族据点之外的一个地区充当首领；如果库里塔当上首领，他仍保有纳阿巴·库里塔的空名。

[42] 当时古尔西是亚滕加西南的一个重要地方；它好像一直是个重要的经济中心，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而且是很早时期的商路驿站。

[43] 亚滕加的创建者纳阿巴·亚德加保存有他长姐、“纳波科”帕布雷窃获的纳阿巴·乌布里王权徽号，但据说紧接他的两位继承人纳阿巴·库里塔和纳阿巴·格达是在拉城称王的，当时是瓦加杜古国王的住地。

"拥有土地者"和"拥有权力者"之间的区别，就是"种地人"（*tengsoba*）和首领（纳阿巴、*naaba*）的差别；其间还有宗教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应，因为"种地人"顾名思义与土地崇拜相联，而"有权势者"只承认天神温德（Wende）至高无上，它被奉为上天或太阳的始祖。这个社会的统一意志是以纳阿巴·温德和纳帕加·滕加（*napaga*:天神之妻是大地）的精神结合为标志的，在这个社会里，宗教与土著居民休戚相关，而权力属于征服者。 231

除亚滕加人之外，我们对莫西人来此之前的居民几乎是一无所知；亚滕加人定居的历史则是已经确认了的。[49]看来当地有三个主要的土著群，可区别为：第一，古伦西人，他们讲"沃尔特语"或古尔语；由于语言相近，他们可能与库龙巴人有渊源联系，莫西人称库龙巴人为富尔塞人，后者构成了莫西人来此之前的亚滕加族系。第二，多贡人（莫雷语称基布塞人），他们过去的住地在莫西领土上分布很广，只因为他们武装反抗外来征服者，所以就成了新政权统治下的主要受害者。最后还有曼德人，他们分为萨莫（尼尼塞）人和比萨（布萨塞）人两大族群，住地分散，但看来有共同渊源。种地人，即土著居民，每年都要做祈求丰收的礼拜；比如在亚滕加，新定国王作为享有纳阿巴称号的掌权者，在特定的祭坛上供奉祭品之后正式登位，从此之后，他也取得"里马"（*rima*）的称号，有了这称号他就可以在死后葬入王室墓地，而且可以使他的儿子或"里姆比奥"（*rimbio*）谋求王位。

再以亚滕加为例，除国王本人外，掌权者可分为三类："国王的管家"（*nayiridemba*）；"能征善战者"（*tasobanamba*）；王族成员（*nakombse*），国君从后者当中产生。国王的管家或王室仆从以及能征善战者，可能或是莫西人或是王室战俘；所谓莫西血统的人属于历史悠久的首领家族，这些家族的起源往往一直可以追溯到亚滕加以前的政治实体（例如宗多马王国）。因此，国王要选择他的政权的直接支持者，就只能选择与他关系相当间接的莫西人或被俘降服者，依靠这些人对与他关系近的人即王族成员行使权力。亚滕加的纳阿巴住在国内四处行宫中的一处，他周围有众多的妻妾、莫西人仆从或俘获的奴隶。由于有行宫四处，王室仆从也就分为4组，每组由叫做涅索姆德（*nesomde*,复数为*nesomba*）的高级显贵统领。四处行宫都有可能成为朝廷，因此每处都设有4位涅索姆德组成的机构，其中三名来自莫西人（托戈·纳阿巴 *togo naaba*, 巴卢姆·纳阿巴 *balum naaba*, 瓦兰加·纳阿巴 *waranga naaba*），一名来自被俘者（宾·纳阿巴 *bin naaba* 或拉萨姆·纳阿巴 *rasam naaba*）。

由国王任命涅索姆德高级显贵组成的特定机构是与国王住处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王国政府，一旦国王去世，它就成为推举继承人的摄政团。这个机构有责任从王位候选人中选定一位新国王，它遵守一种权力转移制度而不是自动继承的规则。实际上，兄终弟及的继承法使个个王子都有条件追逐王位，确切地说，是所有弟兄一辈（同一个国王的儿子们）中的最长者先继承。如大家所知，19世纪亚滕加的历史表明，这种权力转移的莫西人习俗并不是严格的，结果是不时发生的王朝危机，引起王族不同派别之间的内战。我们可以总结说，莫西人在经历了对外征服时期之后，他们在 232

[49] 参阅 M. 伊扎德，1965年。

内部始终忙于无休止的权力之争，尽管中央集权化在加强，国家机器的重要性也在增长，这对操纵王位候选人的贵族们是不利的。

从莫西领土的一端到另一端，体制的各种细节千变万化，但令人惊异的却是莫西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虽然这是历史上逐步形成的；这种一致性，表现在权力意识的一贯性，而这种权力意识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和意义深远的政治哲学。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伟大的西非洲文明。

没有形成中央权力体制的沃尔特河流域各民族

这里应再次强调，要详细讲述肯定属于历史领域但又知之甚少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确实，我们对沃尔特河流域尚未形成国家的社会，具有一种首尾一致的印象，但这种印象是现代的，至于它们的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待研究证实。由于缺少国家结构，以家族世系或以村社为基础的殖民前的社会历史，往往会变成为近代（19世纪）移民运动的一纸名单；或者，如果我们把有组织的社会看成国家，那又会看不到邻近王国的征服和同化政策对这类社会的影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缺乏系统的研究，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未形成国家的社会的情况，都没有超出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之前；总的说来，在近代历史与神话之间有一条鸿沟，史学家们至今仍有待于设法将它填平。换言之，我们还不可能就本章所探讨的时期里这类社会的历史有把握地进行讨论。

233 由于本章的中心内容是莫西各王国的历史，因此这一节从"沃尔特"或古尔（严格以语言分类学为基础）的社会讲起是合理的。古尔语已得到广泛的研究（与其说是从起源的观点还不如说是从分类的观点），我们要感谢加布里埃尔·曼内西对这一重要语族的知识作了总结。[48]古尔语包括了今天在上沃尔特以及科特迪瓦、加纳、多哥和贝宁以北大片地区所用的许多种语言。M. 德-拉韦尔涅·德-特雷桑把古尔语系分为三个亚语族：莫雷语，洛比-博博语和塞努福语，而莫雷亚语族又包括莫雷、古尔马、滕、古隆德诸语言。[49] D. 韦斯特曼和 M. A. 布赖恩，像前一位作者那样，单独分出一个塞努福亚语族，但将其他亚语族又进一步分门别类，划分出库兰戈、洛比-多贡（洛比、博博和多贡）、格鲁西、古尔马、滕、巴尔固和莫西语；莫西语又与莫西以外的一组语言（达贡巴、南坎塞、塔伦西、瓦勒、达加里、比里福尔和南南）结合。[50]

J. H. 格林伯格提出了与前一种相似的分类法，就是把莫西-格隆希语（或古尔语）分为七组：塞努福、莫西、格隆希、滕、巴尔固、古尔马和基林加语。[51] O. 克勒的分类法已经由 G. 曼内西整理重组，当初，O. 克勒认为古尔语系有一个核心，包括三个语族：莫西-达贡巴（曼普鲁西、达贡巴和莫西，即阿塔科拉语）；格鲁西（格鲁西的东支：卡布雷、滕、卡拉；格鲁西的西支；格鲁西的北支：库龙巴）；还有古尔马。[52] O. 克勒又将

[48] G. 曼内西（Gabriel Manessy），1963年。
[49] M. 德-拉韦尔涅·德-特雷桑（M. de Lavergne de Tressan），1953年。
[50] D. 韦斯特曼（D.Westermann）和 M. A. 布赖恩（M. A. Bryan），1970年。
[51] J. H. 格林伯格（J. H. Greenberg），1955年。

塞努福语和巴里巴语，连同残余的多哥语、多贡语，都包括在古尔语系之内；多贡语的词义，很多是与古尔语相同的，但据说在句法上又是曼德语型。

自然，专家学者的见解并不完全一致，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给他们的分类法提出过一套正规标准。可是，一般认为在古尔语中可能分辨出一个大莫西语族，其中又包括三个亚语族：莫西、达贡巴、比里福尔－达加里－维勒；而达贡巴亚语族中又包括达贡巴、曼普鲁西、纳农巴、南卡纳、塔伦西和库萨西语。分类法上的这些问题甚至于引起更为复杂的语言起源关系问题，只是在这种研究上，同源语言演变史学的贡献还很少见。以语言间的类同为基础简单地把它们归在一起，这至少表明相关语言在已有国家结构的社会和还没有国家结构的社会里都同时应用；因此，莫雷语（莫西人的语言）就和 **234** 达加里语十分接近了。还应当注意一点，即一国统一之后，一般说来方言都有所减少，而无中央权力机构的政治制度下则方言必然非常之多。

语言分类上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外来征服者（比如长期以来从莫西人的情况和某些迹象上看）是不是把他们的语言强加给被征服者，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语言；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是掌权民族接受了本地民族的文化？一旦我们能对这问题作出准确的回答，我们无疑就会找到一条通道可以理解在非洲建立中央权力机构所必备的某些历史机制。

在考虑庞大的古尔语系时，人们总想从语言分类走向文化的分类。这样做是以为某些方法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然而情况并不总是如此；这说明为什么M. 德拉福斯、H. 鲍曼和 G. P. 默多克的努力基本上是令人失望的。[30] 我们还应当知道，"沃尔特"语言的多样和文化的多样并不完全对等。仅举一例说明，布瓦人讲的是古尔语，但他们属于曼德文化；而相邻的博博人既属于曼德文化，又讲曼德语。

如前所述，奥斯瓦尔德·克勒展示了一幅描写沃尔特河流域包罗万象的社会全景图，但他对社会的分类和他所作的语言分类非常接近：他把库龙巴人称为"北格鲁西人"，虽然库龙巴人在文化上与人类学家称之为"古伦西"的族群相距很远，而且他们占据的是莫西领土西边的广大地区。居伊·勒·莫阿尔绘制的一览表在意图上虽然系统性不那么强，但确实以人类学对社会的研究为基础，其优点就在于摆脱了先验的分类学的假设。[31] 勒·莫阿尔把沃尔特河流域各民族区分为莫西、古伦西、博博、曼德、塞努福，这是以文化和地区分类为基础的，他并且用一个共同名称来概括了当时上沃尔特西南部的各族人民。

必需与莫西人结合一起研究的是那些在莫西人到来之前就存在的民族，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保留本身的特性。例如库龙巴人，他们无疑曾经在卢鲁姆王国内部建立过一种包括某些中央权力体制要素的政治实体，它最初是以"王权神授"作为思想基础的。库龙巴人，当时又称富尔塞人，属于莫西各王国内部的"种地人"范畴；亚滕加人与马

---

[29] O. 克勒（O.Köhler），1958年；另见G. 曼内西引用的O. 克勒未发表的著作，G. 曼内西，前引著作。

[30] M. 德拉福斯，前引著作；H. 鲍曼（H. Baumann），1948年；G. P. 默多克（G. P. Murdock），1959年。

[31] G. 勒·莫阿尔（G. Le Moal），1963年

235 兰塞人一样，原属桑海；雅尔塞人原来主要属于曼德或坎博西，是班巴雷、达芬或迪尤拉血统。至于古伦西人则根本不属于国家的范畴。历来人类学家都把勒拉、努纳、卡塞纳、西索拉、科、普古利6个分散的社会统称为“古伦西”。他们总是与定居在现今加纳和上沃尔特边境一带的塔伦西、库萨西及南坎塞社会相联系的；可以认为，他们与这些相邻的政治实体在文化上彼此都是独立的，但从国家的观点看，他们是依附性的或附属的社会。我们知道，根据迈耶·福尔特斯的研究，这些社会给人类学理论提供了“因世系而分裂”的政治制度的典型。[53]

被称为博博人的民族（使我们联想起曼德血统的博罗姆族），基本上包括布瓦人（先前称博博－伍勒人）和博博人自身（先前称博博－芬人）。在他们的社会里，共同举行礼拜仪式起重要作用，他们各自有一个以自治村社为基础的政治组织。这种情况，萨莫和比萨人是如此，达芬和马尔卡人也一样。达芬人居住的地区从苏鲁河谷（北边）直伸到博博－迪乌拉索地区（南边）。达芬人多是穆斯林商人和武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保持对传统宗教的信仰。他们建立了许多小的具有中央权力机构的国家；他们进入黑沃尔特河流域历史的方式，正与迪尤拉人进入博博－迪乌拉索和孔城之间地区的历史类似。与塞努福语族有关系的一些社会，如卡拉博罗、图西亚、图尔卡、格韦、瓦拉，都从塞努福文化中汲取了许多内容；这样，图西亚人才有一个秘密会社“洛”（*lo*）其特征和“波罗”（*poro*）相似。

勒·莫阿尔用地区性的名称“西南各族”，把维勒人、达加里人、比里福尔人、洛比人、迪亚人和其他一些民族归并在一起。所有这些民族都起源于现今的加纳，自16世纪起，他们相继越过黑沃尔特河而来。维勒人到达最早，他们逐退了普古利人；接踵而来的是达加里人，他们与维勒人在语言和文化上有密切关系，但达加里人是双系继承制，而维勒人则是父系继承制。比里福尔人大约与达加里人同时来到，也就是说晚于洛比人；他们的传位制度同达加里人相类似。维勒人、达加里人和比里福尔人同属于莫西语族，但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有一重要特征，即秘密加入“巴格雷”（*bagre*）组织；比里福尔人与洛比人是紧邻，所以吸收了洛比文化的许多特点。在洛比人中，母系成分大大超过父系成分；在社会控制权上，加入“迪奥罗”（*dyoro*）组织也起了重要作用。迪亚人和洛比

236 人关系密切，大概是同时越过黑沃尔特河的。这些西南地区的民族各有其政治组织，但又不同于古伦西人，即没有以“王权神授”为基础的中央权力体制。

除了上述这些农业社会以外，一定不要忘记在尼日尔河湾和上沃尔特河流域还有游牧民族的社会——富拉尼人和图阿雷格人。在黑沃尔特河流域、苏鲁河谷、贡多平原、杰尔戈吉、利普塔科及雅加，都可见到富拉尼人，他们在那些地方建立了许多据点（在黑沃尔特河流域是多克威，在苏鲁河谷是巴拉尼，在杰尔戈吉有吉博、巴拉布尔和通戈马耶尔），并建立了利普塔科国家。但这里应再次强调，富拉尼政治实体的真正历史还得在比本卷更晚近的时期（从17和18世纪开始）才能作出系统概述。

[53] M. 福尔特斯（M. Fortes），1940年。

经济方面的探讨

本章所涉大部分地区的粮食作物主要是粟类，北部人们种禾本科直长马唐（*fonio*）的栽培和野生品种，南部则是种薯类。至今仍然闻名于世的 *Gossypium punctatum* 棉花品种历史悠久，长期以来一直在干热、多灌木的草原地带栽培生产。看来，在最初几个莫西王国创立时期，纺织品已经普及，虽然只有酋长才有权穿长袍。在莫西境内、西曼德族系的雅尔塞人就从事纺织业；根据瓦加杜古王国雅尔塞人的口头传说，有个纺织匠曾为纳阿巴·乌布里制作出包括宽大衬衫、裤子和帽子的全套服装。染色术是桑海人的特长，这种工艺同纺织一样古老，而且是纺织的补充，当时有两种主要的染料植物：槐蓝和光果非洲使君子，后者把纺织品染成土黄色。

饲养瘤牛是萨赫勒地区的牧民——富拉尼人的专职。至于从事农耕的人，他们只喂养绵羊、山羊和家禽。驴和马匹的饲养特别值得一提，当时莫西领土的北部在这方面长期以来起着重要作用。例如，亚滕加向莫西地区中部和南部供应驴，这个王国的东部地区还以他们良种的栋戈拉威马出名，这种马是很早以前从上埃及传入的。马是最有用的作战牲畜（驴则主要是适用于草原的驮运牲畜），至少有五种具有代表性的马：亚滕加的、杰尔戈吉的、库龙巴地区的、贡多平原的和巴拉尼的。[63]

有两种地方工业总是结合在一起发展的，这就是金属与陶器制作业。又是亚滕加因富有高质铁矿而比莫西其他地区更加突出，虽然整个上沃尔特河西部到处都蕴藏有铁矿 237

至于长途贸易的早期历史，我们确乎一无所知。在莫西人到达沃尔特河流域时，似乎雅尔塞人已开始经营商业，但直到新国家逐个形成之后商业才有了大规模的发展。长途贸易的发展与纺织技术的掌握有着直接的联系。雅尔塞人既是纺织工匠，又是商人，他们把一块块白布或染色布作为当地外运的货物。在北方和南方的地区间双边贸易中，北方供应的主要是从撒哈拉运来的盐块，还有干鱼和席子，南方供应的主要是柯拉果通用货币是玛瑙贝（重的叫 *Cyprea annulus*，轻的叫*Cyprea moneta*），可能很早对黄金已有一定的比价，实际上，对于货物的价值有许多种不同的计算标准：一腕尺（约18－22 英寸）的棉织品可用作计量普通货物的价值单位；但比如说马匹，通常是用若干俘虏来交换的，金属品制作业中心的铁匠们彼此间则以制成品（工具和武器）和冶炼用的铁球进行交易。

人们定居的历史为一些商业中心存在的时期提供了证据。遗憾的是缺乏考古资料，一切能说明 12－16 世纪间沃尔特河流域经济状况的仍还只是些假设性的推断，而且根据也限于 19 世纪欧洲旅行家收集的资料。这是一个尚待进一步探索的研究领域。

[63] 参阅德－佛朗哥（de Franco），1905 年。

10 乍得境内诸王国和民族

D. 兰格

238 12世纪，乍得湖周围大部分地区由一个名叫加奈姆的强大王国统治。当时在该地区估计还有其他王国，各种不同的民族分成一个个单独的族群和氏族分散居住在那里。加奈姆很早就为阿拉伯旅行者和地理学家所知晓，而且是尼罗河流域的努巴人和往西尼日尔河湾两岸的考考人之间唯一享有国际声誉的一个政治实体。由于现有的资料以及我们掌握的情况，本章不可避免地会着重探讨加奈姆王国的情况，谈及该国内部各民族之处也必然会多于该国之外的民族，后者在过去没能引起撰史人多大注意，所以现在我们掌握的史料也很少涉及他们。

加奈姆不仅有自9世纪以来多种外国史料谈到它，而且还有一部本国史料——加奈姆－博尔努历代素丹世系表"迪万"（*Dīwān*），因此情况为人们所了解。[①] "迪万"的起源或许要一直追溯到13世纪上半叶。那时宫廷史官开始记载涉及王朝历史的某些事实，以前这些都靠口头流传。不过，史官们在动手写他们自己时代的事件之前，先将10世纪以来口头传说中的许多要点作了书面记录。自此之后，这项工作一直继续到19世纪塞富瓦王朝告终之日；在每个君王去世时，都要写上一段简短的统治事迹。采用这种编写方法，在经过整整6个世纪之后，本应创作出一部浩瀚巨著。但事实上，这本"迪万"，按其目前状态、总共不过5页半。"迪万"只不过告诉了我们加奈姆－博尔努王朝历史的概要，但由此可以推断出与中苏丹历史中其他许多方面有关的某些重要情况。[②]

除此之外，还有阿拉伯地理学家提供的一定数量的材料。对研究中苏丹史特别有价239 值的作品是伊德里西（写于1154年）、伊本·赛义德（死于1286年）和马克里齐（死于1442年）的记述。[③] 这两类记述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非洲的撰史人提供的是时间轮廓，而阿拉伯人地理学家提供的是空间范围（参阅伊德里西和伊本·赛义德绘制的地图，插图10.1－10.3）。

① "迪万"（*Dīwān*）的全文在D.兰格（D.Lange）文集（1977年(a)）中已译成英文并加了评述。

② 同上。

③ 伊德里西（al－Idrīsī），法文译本，1866年；伊本·赛义德·马格里比（Ibn Sa'īd, al－Maghribī），法文译本，1958年；马克里齐(al－Makrīzī)，法文译本，1979年；关于后者，也可参见J.库奥克(J.Cuoq)，1975年，第382－3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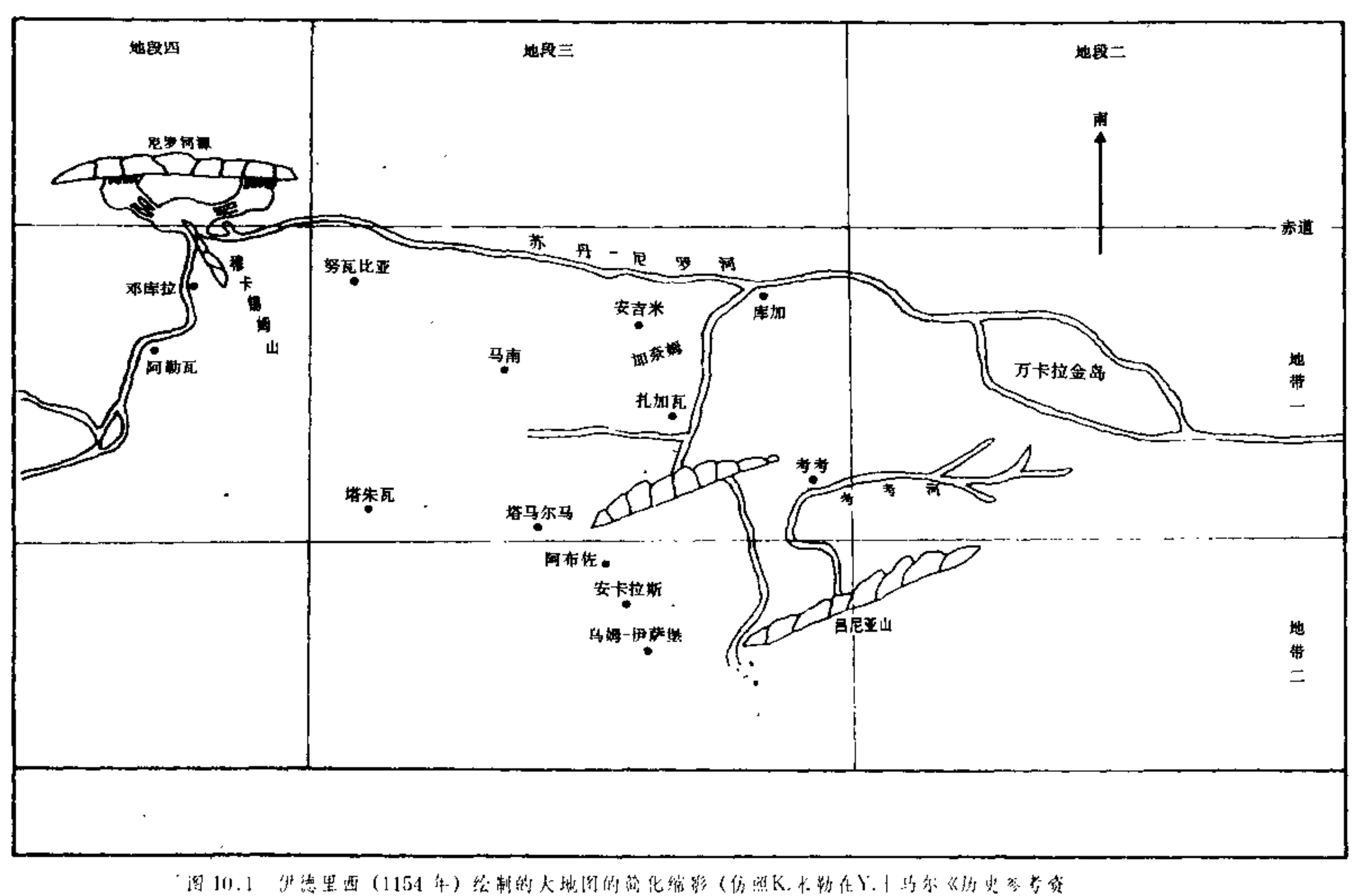


图10.1　伊德里西（1154年）绘制的大地图的简化缩影（仿照K.米勒在Y.卡马尔《历史参考资料》（《Monumenta》）一书3（4）、第867页的复制图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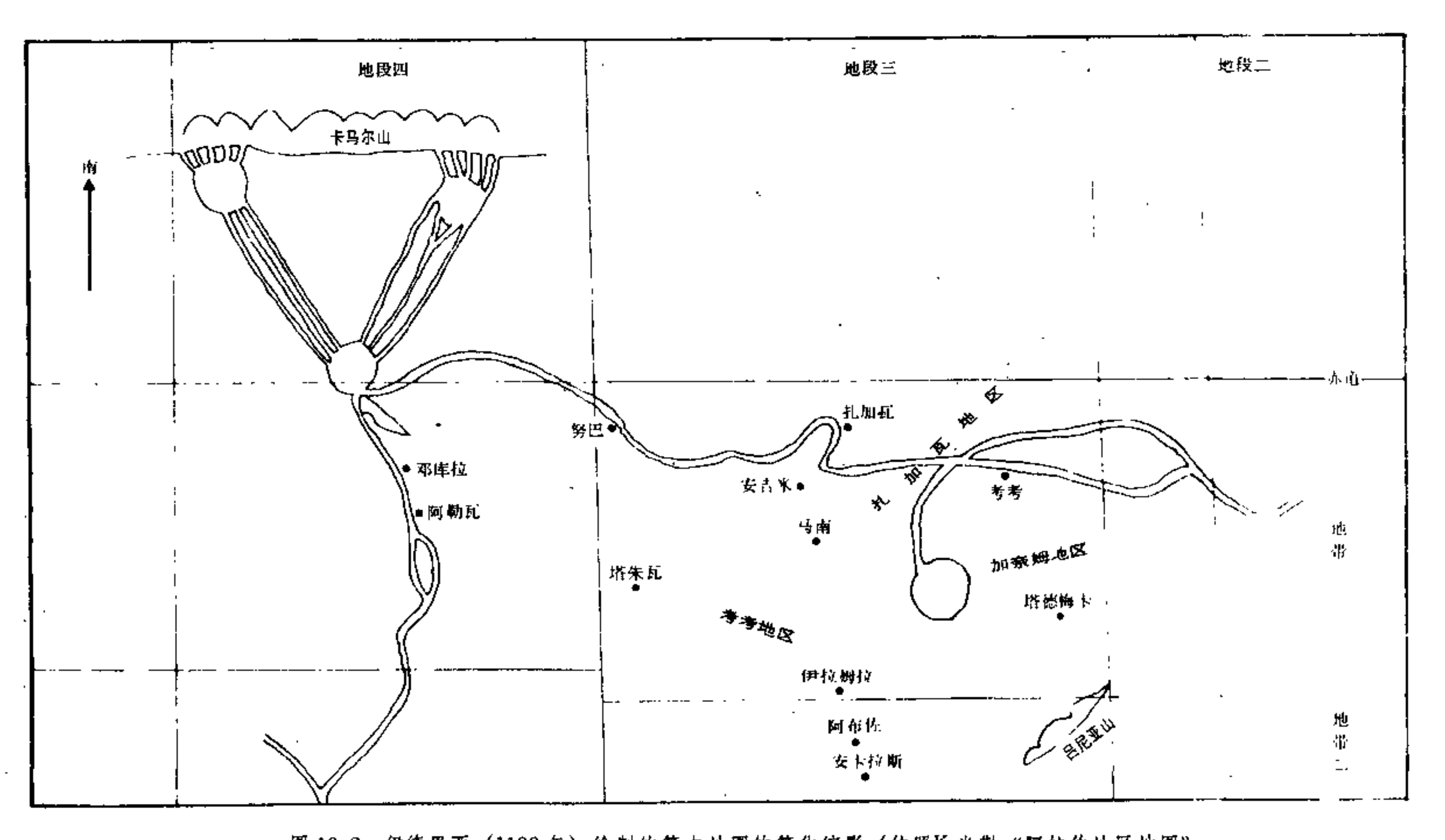


图 10.2 伊德里西（1192 年）绘制的简本地图的简化缩影（仿照K.米勒《阿拉伯地区地图》（《Mappae Arabicae》）1（3），第 99 页的复制图绘制）

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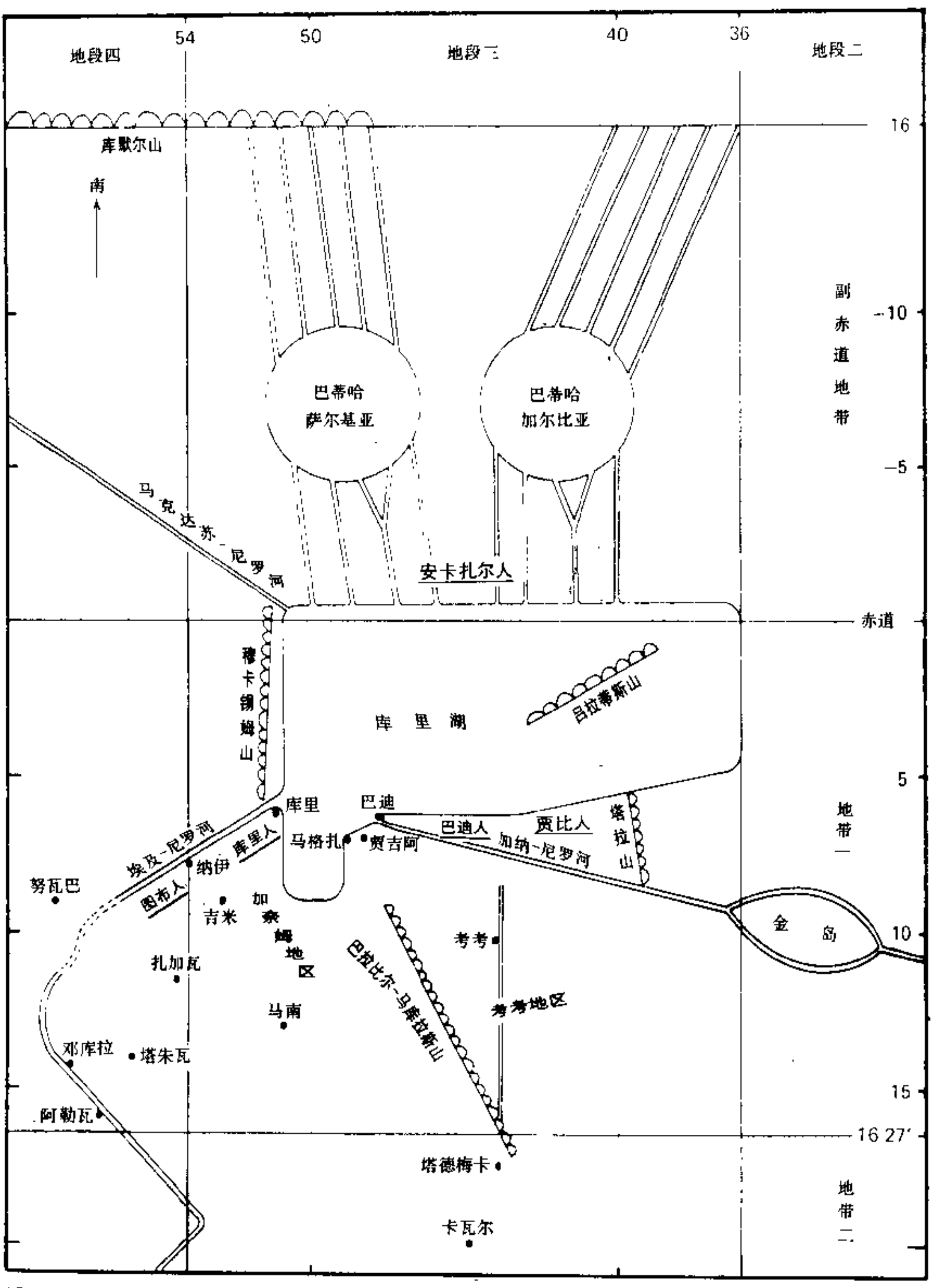


图10.3 乍得湖(库里湖)地区(本章作者仿照伊本·赛义德13世纪上半叶所绘地图的缩影复制图绘制)

塞富瓦王朝

本书第三卷已经提及，加奈姆受扎加瓦人统治达数世纪之久。[4]这种情况，直到11世纪后半叶，随着一个名为塞富瓦的新王朝的出现，才告结束。塞富瓦王朝，据其自称，是也门英雄赛义夫·迪·雅赞的后代(参阅插图10.6)。该王朝的创建者是胡马伊(约1075－1086年在位)，各种史料都说他是柏柏尔人；根据他的姓氏(由穆罕默德派生而来)和家谱，他出身于一个完全伊斯兰化的社会。我们从伊德里西的作品中得知，卡瓦尔的许多居民在那时穿裹头黑袍的都是穆拉萨蒙－柏柏尔人。[5]其他许多史料也指出，该地区的伊斯兰化可以一直追溯到9世纪中叶以前。[6]由此应能得出结论，胡马伊祖籍卡瓦尔，但也有可能他降生于扎加瓦人统治时已归属加奈姆的一个柏柏尔人部落。

然而，自称祖先是也门人这一点清楚表明，胡马伊和他的族人与北非洲柏柏尔人有联系。北非洲柏柏尔人宁愿承认自己是希姆亚里特人的后裔，以使自己与阿德南尼特阿拉伯人相区别。因此，在人们推测是赛义夫·迪·雅赞的祖先中，世系表只提及与北阿拉伯人血统有关的几个姓氏，这决非偶然。我们在其中见到库拉什(先知穆罕默德部落的始祖)、麦加(朝圣地)和巴格达(阿拔斯王朝都城)的名字，却没有希姆亚尔、卡赫坦，甚至也没有提到也门。13世纪初，胡马伊的家谱就已明显去掉了其中与柏柏尔人有关的世系，从而起了一种新的作用：所需证明的不是塞富瓦王朝国王的正式血统源自希姆亚里特人，而是首先要强调他们长期效忠于伊斯兰教。此时，赛义夫·迪·雅赞的名字已无意义，弃而不用。[7]

243 尚有其他资料证明，塞富瓦王朝的国王都希望他们的柏柏尔人血统被人忘却；举例而言，13世纪的史官就萨尔马马·阿卜德·阿拉(约1182－1210年在位)，即胡马伊玄孙的事迹所作记载说，他"非常之黑"。据这些史官所述，"自赛义夫素丹以来，直到这一位素丹，没有一个天生是黑肤色的，全部素丹的肤色都呈贝都因阿拉伯人的颜色"。[8]诚然，这份资料只与加奈姆的第二个王朝有关。可是，我们还能找到一份可资证明塞富瓦王族为柏柏尔人血统的材料，但史官仍千方百计加以掩饰，力图暗示，他们是阿拉伯人而不是柏柏尔人。上述例子清楚说明，在史官眼中，白肤色只是与伊斯兰教相关才受到尊重，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肤色而是他信仰的宗教。

伊本·赛义德的著作中有一段说明，塞富瓦王朝的外国血统已很快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伊本·赛义德根据亲自到过加奈姆的伊本·法提马所提供的材料写道：

---

④ 见第3卷第15章。

⑤ 伊德里西，前引著作。

⑥ 亚库比(al－Ya'kūbī)，法文译本，1937年，第205页。

⑦ 14世纪末寄自博尔努的一封信中，也将赛义夫·迪·雅赞与先知穆罕默德部落的始祖联系在一起。卡尔卡尚迪(al－Kalkashandī)评论说："就他们而言，这是个错误，因为赛义夫·迪·雅赞是也门的图巴人的后代，即希姆亚里特人。"

⑧ "迪万"，第17节。

> 加奈姆素丹……穆罕默迪·贾布勒，属赛义夫·迪·雅赞的世系。他的祖先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并无宗教信仰，都城在马南。后来，其中一人，也就是这位素丹的曾祖，在一法学顾问的影响下，成了穆斯林，从此伊斯兰教就在整个加奈姆传播开来。[9]

其实，穆罕默迪·贾布勒是国外所知国王杜纳马·迪巴拉米（约1210–1248年在位）的称号。伊本·法提马正是13世纪上半叶在他统治时住在加奈姆的。这意味着当时塞富瓦王族还被认为是杜古瓦王朝（扎加瓦人国君）的嫡系后代。只有伊斯兰教的传入、和平“皈依”和迁都之类重大事件，在传说中依然使人回想起11世纪后半叶的政治大变动。

人们可以从一系列王朝口传史中看出而同时也为“迪万”所证实，加奈姆当时已是一个具有固定疆界、结构完备的强国。伊斯兰教传入和朝代的变更显然没有损害国家的根本，其开端可以一直上溯到6世纪末。[10]甚至迁都这样既是当时也是后来与朝代变更密 **244** 切相关的大事，[11]对加奈姆的政治发展也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扎加瓦人和塞富瓦人的王朝都各有固定的中央首都：马南作为杜古瓦王朝国王的驻地至少有一世纪之久，而吉米作为塞富瓦王朝国王的国都则长达三个世纪。直到14世纪末，塞富瓦国王被迫离开加奈姆之后，吉米才失去其首都的地位而成为一个普通城市。[12]关于11世纪下半叶（或12世纪初）的迁都，值得注意的是吉米的地理位置比马南要偏南得多。因此这次迁都可以视作是加奈姆土著定居民力量增强，从而牺牲萨赫勒地区半游牧民的明证。

如果我们领会“迪万”中提到的塞富瓦王朝最初几位国王的联姻方针，我们就能发现，这新王朝的“非柏柏尔化”政策完全是有意识的，与土著定居民政治力量的逐渐增长密切相关。多亏史官认真记载了所有王太后的部族血统，我们今天才能列出如下的一览表：胡马伊（约1075–1086年在位）的母亲是凯族人的后代；杜纳马·胡马伊（约1086–1140年在位）的母亲是图布人；比尔·杜纳马（约1140–1166年在位）的母亲又是凯族（科扬）人；阿卜德·阿拉·比尔（约1166–1182年在位）的母亲又是图布人；萨尔马马·阿卜德·阿拉（1182–1210年在位）的母亲是达比尔人；杜纳马·萨尔马马

---

[9] 伊本·赛义德，前引著作，第95页；J.库奥克，前引著作，第209页。

[10] 前面已指出，伊本·赛义德转述的这段口传历史并不十分可靠。伊德里西于12世纪中叶写的那本著作既提到了马南，也提到了吉米。按他所说，马南早已是“（扎加瓦人的）国君及领主的驻地，而吉米规模较小，据说仅是属于加奈姆而已。很明显，伊德里西是试图把他那时代的资料与自扎加瓦王朝时期起就已中断的资料相衔接。在他那时代，吉米还不可能是加奈姆的国都。

[11] 见D.兰格，前引著作，第7章。

[12] 除吉米和马南外，国外资料所提到的加奈姆城市只有塔拉扎基（根据穆哈拉比的资料）和纳伊（根据伊本·赛义德的资料）。后来，伊本·富尔图瓦（Ibn Furtūwa）在叙述伊德里斯·阿拉沃马（1564–1596年在位）的军事远征时提到了乍得湖地区的许多地方，其中也包括吉米。此外，还须要指出的是，“迪万”中提到11世纪以来加奈姆–博尔努所有国王的葬地。其中有几处可能已经成为相当大的城市，特别是扎姆塔姆（第17和38节）、纳尼加姆（第25和36节）以及迪斯卡马（第20节），都位于乍得湖西边，但无其他资料可作佐证。还提到吉米是4位国王的葬地（第19、21、28和29节）。

（约 1210－1248 年在位）的母亲是马戈米人（王族血统）。以后，所有的王太后似乎都是马戈米人，只有易卜拉欣·比尔（约 1296－1315 年在位）的母亲例外，她是昆库纳人。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杜古瓦王朝统治时期有两位王太后出身于托马格拉族。后来，该族人却没有再与塞富瓦朝的国王发生任何联姻关系。这或许可以证明，该族于 11 世纪后半叶的王朝更替时期已失去优势地位。此后，托马格拉人无疑在中苏丹继续充当主角，245 因为直到今天在提贝斯提和卡瓦尔（比尔马绿洲）还可以看到他们的踪迹，而且在那里统治其他图布部落。在加奈姆和博尔努如今也能见到托马格拉人，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与当地的卡嫩布人和卡努里人同化。从在博尔努收集到的口传史料中可以知道，正是他们开创了穆尼奥和曼达拉王朝。[13]

凯族不同于托马格拉族，凯族与这两个王朝都有关系。因此，他们的政治地位看来并没有受到杜古瓦王朝衰亡的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王朝创立者的母亲是个凯族人。如今，凯族——人们通常称为科扬人——居住在博尔努的北方，在科马杜古约贝附近。他们现在是定居民，但他们一直在周围荒漠地区放养骆驼这一事实可以证明他们原是北边的游牧民。

图布人在“迪万”中仅仅是谈及塞富瓦王朝时提到过。这可能是当时流传的史料的特点，史官只告诉我们杜古瓦王朝的统治是在阿尤马王朝（约 987－1007 年）的统治之后。可是，杜纳马·胡马伊的母亲，也就是胡马伊的正妻，是个图布人这一事实看来是颇具深刻意义之事；很可能是图布人促成了杜古瓦王朝的垮台。然而必须承认，“迪万”中说的图布人和国外资料所提到的扎加瓦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并不清楚。只有伊本·法提马写于 13 世纪后半叶并由伊本·赛义德传播的材料，对这两个部族明确作出区分。连同塔朱瓦（贾吉阿）人一起提到的扎加瓦人的居住地，大致位于加奈姆和努比亚之间，而图布人则十分确切是住在加扎勒河一带。[14]迄今仍有很多图布人的部落群体生活在加奈姆以东地区，它们统称达扎人或戈尔罕人。“真正的”图布人则居住在提贝斯提及其周围地区。这座山脉通常被看作是整个图布民族的发源地（*tu-bu*这个名称是表示“山地居民”之意），但这并不是已成定论的说法。[15]

“迪万”中还提到其他两个族群，即达比尔人和昆库纳人，今天已不复存在。根据G.纳赫蒂加尔收集的材料，达比尔人（确切地应称迪比里人）是卡嫩布族定居民，在与达扎游牧民混合之后，据说形成了卡达瓦部族，而且如今仍居住在加奈姆。H.巴尔特和 246 G.纳赫蒂加尔都相信昆库纳人原先也是卡嫩布族定居民，但是这两位权威人士都未能给现代的各个族群列出一张清楚明确的世系表。[16]

最后，再谈一谈马戈米人，史官称之为马格尔姆人。这是塞富瓦王朝国王的父系血统。如果我们相信“迪万”所提供的情况，杜纳马·迪巴拉米（约 1210－1248 年在位）

---

[13] G.纳赫蒂加尔（G. Nachtigal），1967 年，第 2 卷，第 338 页。

[14] 在现有《Kitāb al－djughrāfiyya》文本中，“图布”这名称被曲解，参阅J.马夸特（J. Marquart），1913 年；另见D.兰格，前引著作，第 2 章，第 13 段，注 2。

[15] 关于一般所说的图布人，见J.夏佩尔（J. Chapelle），1957 年。应当指出，他叙述图布人历史的一章可靠性较差，因为作者主要依据的是Y.于尔瓦（Y. Urvoy）1949 年草草编写的材料。

[16] 关于达比尔人，见G.纳赫蒂加尔，前引著作，第 2 卷，第 319－320 页。

的母亲应该是阿卜德·阿拉·巴卡鲁（约 1166－1282 年在位）的侄女。这一情况可以用来证实后来成为卡努里族核心的世系集团是如何逐渐形成的。没有任何资料足以证明马戈米人在塞富瓦王朝统治之前即已存在，把他们视作是帮助胡马伊取得权力的政治力量肯定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很可能“马戈米”实际上指的是塞富瓦王朝国王所有父系后代，这由他们的家谱和他们支系的姓氏可以作证。[17]假如上述说法是正确的，那么马戈米人是通过塞富瓦王朝家系逐渐成为一个部族(卡努里族)的核心。总而言之，加奈姆－博尔努国家真正的渊源应该早于今天已成为其主要基础的马戈米人。

在卡努里族形成之前，加奈姆国王从其他族群获得力量，这些族群有的是游牧民，有的是定居民，有的讲尼罗特－撒哈拉语(如同今天的图布人、扎加瓦人和卡努里人)[18]，也有的讲乍得语。[19] 在某些时期，加奈姆国王的势力肯定也像在 13 世纪一样扩展到一些讲柏柏尔语的部落群体，但看来这些部落群体与尼罗特－撒哈拉地区诸部落群体发生关系时一直处于少数地位。[20] 如果“迪万”中那些并不十分有力的证据尚属可信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塞富瓦王朝国王的部族基础的发展和加强应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胡马伊的崛起到 12 世纪中叶，那段时间似乎是两个游牧部落——图布人和凯人——起重要作用。第二阶段，达比尔人和昆库纳人（或许还有其他几个非游牧部落）替代了图布人和凯人成为塞富瓦王族的主要联姻者。[21] 第三阶段，联姻关系发生了 **247** 如下的变化，那时马戈米王室家系政权已经进一步牢固树立；杜纳马·迪巴拉米（约 1210－1048 年在位）的母亲是马戈米人；他的一个妻子、卡戴（约 1248－1277 年在位）的母亲也是马戈米人；他的另一个妻子、比尔（约 1277－1296 年在位）的母亲大概也是马戈米人，只是史官们没有书明她属于哪个族。然而，比尔的继承人，其子易卜拉欣·尼卡尔(约 1296－1315 年在位)，却有一位昆库纳族的母亲。从此以后，“迪万”就不再书明王太后是什么族人，原因可能是到了 14 世纪初，马戈米人已使加奈姆其他一切定居部族完全黯然失色。

王室家系等级的形成，多少可以说明在杜纳马·迪巴拉米（约 1210－1248 年在位）和他以后几个王位继承者统治时期王国所具有的权力。同时，这也可能是在他统治时期爆发反图布人的长期战争的原因(至少是间接有关)。H.巴尔特认为，杜纳马的第二个妻子、比尔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名为拉克马马的族群；[22] 如果这是属实的话，那么之所以造

[17] G.纳赫蒂加尔，前引著作，第 2 卷，第 418－419 页提到如下几个支系：马戈米－乌麦瓦(胡马伊的后代)、马戈米－提西利姆瓦（萨尔马马的后代）、马戈米－比里瓦（比尔的后代）和马戈米－达拉瓦（阿卜德·阿拉的后代）。参见“迪万”第 17－18 节。

[18] 如今的扎加瓦人已不再是伊本·赛义德之前阿拉伯作者所说的扎加瓦人，正如同当今的卡努里人不像 13 世纪以前尼罗特－撒哈拉地区任何一个部落群体一样。现在恐怕只有图布人仍保持着当年的民族特点而没有多大变化。

[19] 其中有今天恩吉津人、科托科人和哈杰雷人的语言。

[20] 正像他把王太后（*ghumsa*）起重要作用看作是柏柏尔人的遗风一样，H.巴尔特（H. Barth）认为托马格拉人属于柏柏尔人血统。他还指出，在卡努里人的语汇中并没有借自柏柏尔语的词语。

[21] 可以认为正是这种联姻关系的变化导致加奈姆的迁都。因此应该承认，正确的是伊德里西，而不是伊本·赛义德（参见本章注 10)。

[22] H.巴尔特，1857－1859 年，英文译本，1965 年第 2 卷，第 584 页。该书已经指出比尔的正妻——易卜拉欣·尼卡尔的母亲不是马戈米人。

成杜纳马两个儿子卡戴（他的母亲是马戈米人）和比尔的对立家系，其原因可能是加奈姆定居部落和马戈米人王室父系之间的权力之争。以父位子继为标志的和平时期，在塞富瓦国王不再娶别族妇女为（正）妻而代之以与他们自己父系血统女子通婚之后便告终止，这无论如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23]

加奈姆的全盛时代

谈到加奈姆国家的发展，如果不讲一讲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是无法说明问题的。毫无疑问，中苏丹这个最大的国家之所以建立在穿越费赞和卡瓦尔绿洲的主要商道的南端决非偶然。这条道路可能从古罗马时期就已使用；这是连接乍得湖地区与地中海的最短路线。在东面，只有一条穿越库夫拉绿洲的十分难行的小道；在西面，只有一条经过塔凯达（现称阿加德兹）的小道堪称可能的竞争者。

248

政治结构

“迪万”实际上并未就加奈姆的政治体制给我们提供任何资料。然而，我们可以假定，在初期，直到杜纳马·迪巴拉米统治时期（1210－1248年在位），王室成员在该国的国家机构中占据主要地位。

据史官记载，到13世纪，素丹和他的儿子们发生了冲突，易卜拉欣·尼卡尔将他的一个儿子处死之后，情况才起了质的变化。[24] 我们根据这些迹象可以断定，自13世纪以后塞富瓦王朝把他们自己的家庭成员排除出政府的要害部门，而宁愿依靠一些并无血缘关系的官员，诸如当地的酋长。卡吉阿马（*kagiama*，南方总督）和叶里马（*yerima*，北方总督）很可能在博尔努时代就已设置。这两个官职看来都像是源自乍得湖以西地区。叶里是科马杜古约贝西北一个省的省名，卡加指的是当今迈杜古里城周围地区。

在稍后的时代，母后在博尔努起着非常突出的作用。“迪万”写出最初10位国王母后出身的部族，这决非偶然。值得指出的是，母后氏族的支持在继承王位时是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后来，古姆莎（*ghumsa*，国王的第一个妻子）成为最重要的王妻，国王只从她生的儿子中指定他的锡罗马（*shiroma*，王储）。

虽然缺乏专谈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可靠材料，但我们知道，在15世纪末塞富瓦王朝统治着12个臣属的王国。[25] 直接的行政管理只及于有限的地区，而且可能是由王家奴隶负责掌管。至于军事，许多书面材料都说国王保持着一支常备军，士兵分为朱努德（*djūnūd*，战时征召的士兵）和阿萨基尔（*'asākīr*，职业雇佣兵）。

---

[23] 史官在谈到杜纳马·迪巴拉米的统治时指出：“在他那时代，素丹的儿子分成不同的派系”（‘迪万’第17节）。杜纳马儿子之间的斗争，从王朝的角度说，可能是马戈米人与其他族群之间对抗的表现。这种对抗可能是加奈姆第二个王朝历史上初次庶子继位的渊源。庶子继位的原因，也可能是正妻的地位削弱，或许正是这一点才促使塞富瓦王朝的逐渐“非柏柏尔化”。

[24] “迪万”，第17节。

[25] 见马克里齐，前引著作。

司法审判，尽管各地的统治者都已皈依伊斯兰教，但仍由国王亲自执行，如同马里的曼萨法庭一样。然而，在某些国王的统治下，如在伊德里斯·阿拉沃马统治时期，曾试图将司法建立在沙里阿（*sharī'a*）的基础上。[26]这地区内的所有国家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加奈姆－博尔努的影响，它的政治体制是豪萨、科托索和巴吉尔米政权效法的样板。

通商贸易

249

位于乍得湖东北的加奈姆必然要想方设法控制乍得湖以西地区，以便进一步控制从卡瓦尔向南的商道，乍得湖以西地区正是后来博尔努形成的地方。然而，从阿伊尔（塔凯达，即现在的阿加德兹）也可以进入卡瓦尔，因此一心想控制这一主要的交通枢纽，不仅是加奈姆国王、也是博尔努国王追求的重要目标。控制卡瓦尔的重要意义，不仅是它在穿越撒哈拉贸易中所占的重要战略位置，还有比尔马和阿格拉姆（法希）储量极为丰富的盐矿可给萨赫勒地区各国输出大量食盐，从而为其主人提供巨额收入。中央撒哈拉地区其他任何盐矿都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经济价值。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些矿藏是从什么时代起开始开采的。"迪万"的撰稿人提到阿尔库（1023－1067 年）在迪尔库和西格迪姆建立奴隶殖民地时，似曾提到这些盐矿受加奈姆控制，但这并不等于已成定论。[27]

12 世纪上半叶，卡瓦尔的居民从南、北两大邻国那里争得了独立。伊德里西曾经提到过好几个商人和盐矿矿工居住的小集镇。这些地方的首领都是穿裹头黑袍的柏柏尔（塔瓦里克或图阿雷格）人。根据伊德里西的报道，卡瓦尔的居民主要从事开采和买卖明矾（用于染色和制革），他们贩运明矾远到埃及，西达瓦尔格拉[28]。上述这种情景无疑是一个外来观察者的错觉。如果那时与萨赫勒各国的食盐贸易确实存在，那么在数量上肯定要比向北非一些城市出售的明矾大得多。而且应当指出，伊德里西根本没有提到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十分广泛，这是卡瓦尔成为费赞与乍得湖地区间唯一交通枢纽的依据。他不提及这一点，或许正说明两类商业活动相对的重要性：繁荣兴旺的地区性贸易，如果不是在价值上，至少也是在数量上，看来是不亚于大规模的国际贸易。

费赞地区位于两大商道交叉口，那里的一块块绿洲对长途贸易的重要性远比卡瓦尔绿洲要大得多。费赞压倒一切的优越地位，给控制北－南（从伊弗里基亚/的黎波里到加奈姆－博尔努）和东－西（从埃及到加纳/马里/桑海）商道提供了可能。加奈姆如要与地中海诸国（除马格里布边远地区以外）进行长距离贸易别无他途可选，绝大多数进出口货物只能通过这条路线。只有与马格里布国家做买卖的商人，才有可能绕过费赞，走穿过贾多和高原的艰险道路。保证北－南商道的安全和对驿站的控制，便成为当时加奈姆－博尔努国王最关心的事。

250

加奈姆与北方交流哪些货物呢？关于这问题，史料提供的情况非常有限，但我们可

[26] 见伊本·富尔图瓦，英文译本，1932 年。

[27] 新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提供了有关阿伊尔的图阿雷格人获取巨额利润的具体资料，这些图阿雷格人今天仍然从比尔马和法希往萨赫勒地区各国运送食盐。P.富克斯（P. Fuchs），1974 年。

[28] 伊德里西，前引著作。

以断定，自伊斯兰教传入之初到 19 世纪的这段时间里，变化并不太大；奴隶大概始终是其中的大宗。我们所掌握的这方面最早的资料来自亚库比，他记述了柏柏尔商人在 9 世纪时从卡瓦尔，可能还从加奈姆贩运奴隶到费赞的首都宰维莱。[29] 到 16 世纪初，利奥·阿非利加努斯给我们提供了比较确切的材料，谈到北非洲商人亲自到博尔努来用马换取奴隶；他们往往不得不用整整一年时间等待国王捕捉到足够数量的奴隶。[30] 显然，国王以博尔努之南的异教徒为对象捕捉奴隶，无法充分满足需求。王国衰弱之后，加奈姆－博尔努的居民本身就有被外来敌人卖作奴隶的危险，尽管他们中大部分人从 13 世纪起就已皈依伊斯兰教。到 14 世纪末，在致埃及的哈里发拜巴尔斯的一封信里，比尔·伊德里斯（约 1389－1421 年在位）抱怨那些将他的穆斯林臣民变卖为奴隶的阿拉伯人。[31] 我们从 D.吉拉德那里得知，在 17 世纪时博尔努的某些居民，由于图阿雷格人捕捉，遭到了同样的命运。[32]

与贩卖奴隶同时，去往费赞和地中海各大城市的商队也贩运某些来自外国的商品，如象牙、鸵鸟羽毛和某些活的动物。[33] 如果要计算奴隶买卖的真正价值，则首先应当全盘考虑总的生产活动。从这个角度讲，毫无疑问，加奈姆－博尔努的繁荣昌盛应归功于它兴旺的农业、畜牧业和盐矿开采业，而不是靠奴隶买卖的收入。手艺人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产品出口至邻国。在 14 世纪，伊本·巴图塔报道说，博尔努除了奴隶以外，还出

251 口刺绣衣服。[34] 而且，按伊德里西于 12 世纪所说，卡瓦尔的明矾是北非洲所需求的。[35]

输入物主要是马匹；因为马匹有重要的军用价值。据史官记载，杜纳马·迪巴拉米（约 1210－1248 年在位）的骑兵有 41,000 匹马。[36] 马克里齐提供的有趣资料说，加奈姆的马很矮小，由此可知那里早先养马的一般情况。[37]

服装和织物的制成品以及铁制武器，也都是从北方输入的。伊本·赛义德曾提到，在杜纳马·迪巴拉米统治时期，服装是从突尼斯首都输入到加奈姆来的。[38] 早期，穆哈拉比也曾说过，扎加瓦的国王所穿的是从苏塞输入的羊毛和丝绸衣服。到 14 世纪时，本地的纺织业已相当发达，加奈姆的居民甚至用棉布的块数作为商业活动的价值衡量尺度。[39]

此外，铜也是输往中苏丹的一种货品。我们知道，在 14 世纪，这种金属是从塔凯达

[29] 亚库比，前引著作，第 205 页。

[30] 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法文译本，1956 年，第 2 卷，第 480 页。

[31] 卡尔卡尚迪，法文译本；J.库奥克，1975 年，第 40 页。

[32] 参阅C.德·拉·隆西埃尔（C. de la Roncière），1919 年，第 78－88 页。关于中苏丹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见A.费希尔（A. Fisher）和H.费希尔（H. Fisher），1970 年。

[33] 我们知道，1268 年"加奈姆的国王和博尔努的君主派人通给哈夫斯王朝的素丹穆斯坦西尔一头长颈鹿，这头长颈鹿在突尼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引自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法文译本，1852－1856 年，第 2 卷，第 346－347 页。

[34] 伊本·巴图塔（Ibn Battūta），法文译本，1853－1859 年，第 4 卷，第 441－442 页。

[35] 伊德里西，前引著作，第 95 页。

[36] "迪万"第 17 节。

[37] 马克里齐，H.A.哈梅克（H.A.Hamaker）引述，1820 年，第 206 页。

[38] 伊本·赛义德，前引著作，第 4 卷，第 441 页。

[39] 欧麦里（al－'Umarī），法文译本，1927 年，第 45 页。

附近的矿山中开采出来的，或许数量还不太大。[40]这时，尼日利亚高原的锡矿藏也可能已经开始采掘。佩蒂·德·拉·克鲁瓦告诉我们，17 世纪末，锡是博尔努输往的黎波里的货物之一。[41]铜与锡（还有锌）当然是制造青铜所必不可少的，人们都知道，贝宁和努佩卓越的青铜工艺在葡萄牙人到达非洲大西洋沿岸之前就已享有盛名。

北－南贸易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穿越撒哈拉的中央商道的安全。12 世纪上半叶，这条商道的安全是由三种不同的势力保证的：北边是费赞王国，自 10 世纪初以来一直由巴努哈塔布族的柏柏尔王朝统治；中间是卡瓦尔的一些柏柏尔酋长；南端则是加奈姆。等到马木路克的军事首领谢里夫·丁·卡拉库什于 1172－1173 年占领费赞，并使这国家遭受火与剑的洗劫之时，这一旧的均势就受到了严重威胁。[42]巴努哈塔布人的消失所造成 **252** 的政治真空或迟或早必然会引起加奈姆国王对费赞的干涉。

13 世纪时，伊本·赛义德（他有关加奈姆的报道写的是杜纳马·迪巴拉米统治时期，约 1210－1248 年在位），谈到这位加奈姆国王控制着卡瓦尔和费赞。[43]加奈姆的北向扩张也得到欧麦里的证实，他在 14 世纪中叶写道："（加奈姆）帝国起于靠近埃及的一个名叫泽拉的小市镇（在费赞的东北），迄于另一端一个名叫卡卡的小市镇，这两个小市镇之间的距离为三个月的路程。[44]加奈姆的强大实力已为旅行家提贾尼所证实，他谈到 1258－1259 年，加奈姆国王的间谍成功地谋杀了入侵费赞以北瓦丹地区的卡拉库什的一个儿子。[45]

然而，为了有效地控制中苏丹和北非之间的一切贸易，必须防止贸易转向其他次要路线。事实上，伊本·赛义德就曾报道，加奈姆国王占领了西边的塔凯达（书中写的是塔德梅卡），并在东面控制着塔朱瓦人（达乔人）和扎加瓦人，[46]加奈姆国王还统治位于乍得湖西北的贾吉阿王国和南边（图瓦里克）的柏柏尔人。[47]

但是若要认为加奈姆在 13 世纪时已经是一个具有稳固疆界的大帝国，则是过分轻率了。特别是我们没有掌握可使我们明确加奈姆在费赞行使的权力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资料。我们今天在特拉甘见到的"青年"阿里之墓实际上就是国王伊德里斯·阿里（约 1677－1696 年在位）的坟墓，他是在朝圣时死于费赞的，而并非我们原先以为的一个地方长官或加奈姆国王所封的总督之墓。[48]此外，我们不能肯定加奈姆的版图东边有没有延伸到达尔富尔一带。伊本·赛义德曾经说过，加扎勒河离吉米并不远，居住在那个地区的图布人是个独立的民族。[49]杜纳马·迪巴拉米尽管进行了持续达"7 年 7 个月零 7 天"的长期

[40] 伊本·巴图塔，前引著作，第 4 卷，第 441 页。

[41] 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资料（B.N.Paris, *n.acq.*）手抄本 7488。

[42] 提贾尼（al－Tidjānī），法文译本，1852 年，第 55－208 页，和 1853 年，第 101－168 页以及 354－424 页。

[43] 伊本·赛义德，1970 年版，第 114－115 页和 127 页。

[44] 欧麦里，前引著作，第 43 页。据卡尔卡尚迪说，卡卡是博尔努首都的名称；卡尔卡尚迪，法文译本，1913－1919 年，第 281 页。卡卡也可能就是伊本·赛义德书中所说的贾吉阿城（见本章注 69）。

[45] 提贾尼，1958 年版，第 111 页。

[46] 参阅R.比卡耶（R.Bucaille），1975 年，第 720－778 页。

[47] 伊本·赛义德，1970 年版，第 94－95 页。

[48] 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资料。

[49] 伊本·赛义德专门指出，图布人是黑肤色的异教民族。根据G.纳赫蒂加尔收集的资料，加扎勒河地区的图布人各部落群体是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前引著作，第 3 卷，第 213 页）。同时参阅本章注 14 和注 15。

战争，他显然没有能使图布人屈服。关于这场战争，伊本·富尔图瓦也曾有所叙述。[50]

253 居住在乍得湖周围地区和一些岛屿上的民族也都一次次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独立。伊本·赛义德根据伊本·法提马提供的材料得出结论说，“库里（乍得）湖四周处处都有未被征服的还在吃人肉的苏丹异教徒”。[51] 他把巴迪人（或贝德人）列为乍得湖以北地区的民族（马克里齐则认为他们已经形成王国）；[52] 安卡扎尔人（很可能是科托科人的同义词）列为乍得湖以南地区的民族；贾比人列为湖西北地区的民族；库里人列为湖东北居住在加扎勒河口的民族(现在的库里人则定居在湖中岛上)。此外，在湖岸有一处名叫达尔西纳阿(*dar al - Sinā ʻa*，意为“武库”，或按词源为“制造”)的地方，关于这地方，伊本·赛义德记述如下：“素丹经常从这里率领他的舰队出征到湖边异教民族地区去，目的在于攻击他们的船只，杀死或俘虏他们。”[53] 马克里齐根据一份13世纪的材料，也曾提到居住在加奈姆四周的一些异教民族的名称。其中能够辨认的有贝德人、阿夫努人（卡努里人如此称呼豪萨人）和科托科人（书中写为“坎库人”）。[54] 同一位作者还记述说，大约在1252-1253年间，加奈姆国王从吉米袭击了马布纳人（可能是瓦代地区的马巴人）的支系卡尔金部落，其目的无疑也是要捕捉俘虏。[55]

从上述情况似乎可以推测出，加奈姆的向外扩张仅仅限于北方地区。在南边，加奈姆与几个非穆斯林民族的关系明显未曾发生什么变化。对这点无须感到奇怪，因为王国的兴旺发达——或者至少是王室的兴旺发达——直接仰仗于穿越撒哈拉贸易所得的收入，这项收入远比农业或畜牧业的任何增产要大得多。此外，奴隶已成为换取北方输入物品的主要“货物”。他们都是通过对南方非穆斯林民族有组织的袭击捕捉来的。因此超越一定限度地推广伊斯兰教并不符合加奈姆国王的利益。

甚至在加奈姆国内，伊斯兰教在13世纪以前也还扎根不深。马克里齐在15世纪著书时把杜纳马·迪巴拉米算作是加奈姆第一位穆斯林国王，他肯定错了。“迪万”中有资料说明所有塞富瓦王族都是穆斯林。如果史官的记载是可以相信的话，塞富瓦的第二个国王杜纳马·胡马伊（约1086-1140年在位）甚至曾两次朝圣，而在第三次朝圣途中死254 去。塞富瓦王朝的奠基人胡马伊本人，据说死于埃及。假如这是确实的话，那么可以认为他也曾去朝圣过。[56] 更值得指出的是，自比尔·杜纳马（约1140-1166年在位）统治时期开始，以后各位国王的正妻，如“迪万”所记载，按其姓氏（或她们父亲的姓氏），全都是穆斯林。然而，伊斯兰教可能到了杜纳马·迪巴拉米统治时期才按照它的传统形式，给一般老百姓广泛刻上深深的印记。

根据内部和外部的资料，我们可以断定，杜纳马·迪巴拉米是一位杰出的穆斯林改革家。“迪万”的撰写者闭口未谈14世纪两位国王的朝圣，伊本·富尔图瓦却指责杜纳

---

[50] 伊本·富尔图瓦，前引著作，第123-124页。

[51] 伊本·赛义德，1970年版，第94页。

[52] 马克里齐，前引著作，第187-209页。

[53] 伊本·赛义德，前引著作，第94-95页。

[54] 科托科人市镇加固城防，据认为始于13世纪；那时许多市镇已筑有城墙，使居民能抗击来自加奈姆的侵袭。

[55] 马克里齐，前引著作，第187-209页。

[56] “迪万”，第12-13节。

马·迪巴拉米毁坏了一件称为“穆涅”（*mune*）的圣物。这可能是伊斯兰化之前留传下来的一种王室祭礼必备物品。伊本·富尔图瓦虽是一位伊玛目，他于16世纪从事写作时也将这种“亵渎圣物的行为”看作是导致多次动乱，特别是与图布人长期作战的原因。[57]此外，杜纳马·迪巴拉米好像还在开罗创建了一所专供加奈姆臣民用的古兰经学院。[58]伊本·赛义德写道，他是“由于进行圣战以及他那值得称赞的行动而闻名”的，而且他的随从人员全是穆斯林法学家。他强迫中苏丹某些民族，最明显的是强迫柏柏尔人，接受伊斯兰教。[59]无疑，伊斯兰教的传播，到13世纪下半叶，就已与领土扩张同步配合进行了。

杜纳马·迪巴拉米死于1248年前后，埋葬在乍得湖西北的城镇扎姆塔姆。除了伊本·赛义德的《*Kitāb al-djughrāfiyya*》一书以外，别无其他资料阐述此后加奈姆领土扩张和伊斯兰教发展的情况。“迪万”记载了两位费拉塔族（富拉尼人）谢赫，于比尔·杜纳马（约1277－1296年在位）统治时期从马里来加奈姆访问，但没有提到易卜拉欣·比尔（约1296－1315年在位）或伊德里斯·易卜拉欣（约1342－1366年在位）的朝圣。[60]欧麦里在14世纪中叶撰书时，所提供的确切资料也很少，按他本人的说法，加奈姆是一个非常弱的帝国，它的资源有限，军队也不多。另一方面，加奈姆居民的宗教热诚很引人注目，他说：“在他们国内最重要的是司法公正，他们遵守伊玛目马立克的礼拜仪式。他们的服饰没有任何不必要的东西，他们都有一颗炽热的虔心”。[61]

如果欧麦里所说是可信的话，那加奈姆在当时就仍统治着费赞。另一方面，塔凯达则肯定保持着一位独立的素丹。[62]毫无疑问，由于14世纪下半叶的王朝危机，加奈姆不得不放弃它对中央撒哈拉商道的独占地位。14世纪末，布拉拉人成功地击败了加奈姆，又打破了它对北非洲贸易的垄断；此后，塞富瓦王朝就进入了他们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255

从加奈姆到博尔努

至迟于12世纪，加奈姆各民族开始西迁，定居于博尔努（乍得湖以西）。托马格拉人、图拉人、凯人（科扬人）和恩加尔玛－杜科人，肯定是较先迁到博尔努的；马戈米人中最古老的肯定也源自加奈姆，只有14世纪末期以后形成的部落群体才起源于博尔努。16世纪下半叶，由于伊德里斯·阿拉沃马的胜利远征，大量的图布人和阿拉伯人离开加奈姆而来到乍得湖西岸比较富饶的地区，那里也更容易防御外敌入侵。这次大迁移，对于半游牧的部落说来，可能是与政治扩张密切结合的；迁移运动一直继续到西方殖民

[57] 伊本·富尔图瓦，前引著作，第123－127页。
[58] 欧麦里，前引著作，第46页。该经学院建于公元1242－1252年间。
[59] 伊本·赛义德，1970年版，第95－96页。
[60] 比尔·伊德里斯致埃及哈里发的信中，称呼他们为“哈吉吉”（*hadjdj*）。见卡尔卡尚迪，前引著作，第8卷，第117页。
[61] 欧麦里，前引著作，第43页。
[62] 伊本·巴图塔，前引著作，第4卷，第441－442页。

时代开始才告结束。[63]

在乍得湖以西，来自加奈姆的各部落群体与乍得语系的各族定居民相接触。按卡努里人的传说，他们统称为萨奥或萨乌族。伊本·赛义德和马克里齐都没有提到这个名称。但是，史官对此却有记载，就在14世纪中叶，有4位塞富瓦王朝的国王在与萨奥人的战争中死去，其中两位在加利瓦阵亡。[64]加利瓦城，可以假定就是现在的恩加拉（乍得湖之南），至今仍住着科托科人。据19世纪有书面记载的口头传说，科托科人的先辈就是萨奥人。[65]

至于说到书面资料，萨奥人一词曾在16世纪上半叶利奥·阿非利加努斯的著作中不止一次提到过。他说，萨奥人当时居住在乍得湖以西、博尔努之南。[66]半个世纪之后，伊本·富尔图瓦又把萨奥这一名称用于两个族群：加法塔人，居住在科马杜古约贝；塔塔256 拉人，居住在乍得湖西岸一带。伊德里斯·阿拉沃马（1564－1596年在位）对这两个民族多次发动残酷的进攻，迫使幸存者抛弃家园。[67]有些人避难于乍得湖的几个小岛上。1582年意大利地理学家G.L.阿纳尼亚就称乍得湖为萨奥（Sauo）。[68]今天，萨奥（索、萨乌）一名，在卡努里文化传统中是用以称呼早于他们之前的那些民族的，既指加奈姆的人，也指博尔努的人和卡瓦尔的人，但是，这些民族的历史情况，现在尚无从了解。

很难说清14世纪末期加奈姆和博尔努之间的关系。只有一点可以断定：从13世纪初至14世纪末，博尔努相对而言重要性日益增加。伊本·赛义德提到一个乍得湖以西的王国：他只讲了它的首都名为贾吉阿，其地理位置表明它就是博尔努。[69]他写道：“贾吉阿城是一个拥有若干城镇和土地的独立王国的所在地（库尔西，*kursi*）。当时，它属于加奈姆的素丹。”[70]

由此可知，博尔努很可能早在13世纪以前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王国。马克里齐知道伊本·赛义德的一本书已经失传，于是他也用了同一个含义不明确的词“库尔西”（*kursi*），既用于称呼加奈姆，也用于称呼博尔努。按他所说，易卜拉欣·比尔（约1296－1315年在位）同时占有加奈姆和博尔努两国的王位（“库尔西”）。[71]伊本·哈勒敦在1268年的记述中提到“加奈姆的国王和博尔努的君主”。[72]伊本·巴图塔1353年到过塔凯达（从阿伊尔南行），知道博尔努有一位塞富瓦王朝的君主，但是，他所指向的博尔努首都的距离却

[63] G.纳赫蒂加尔，前引著作，第4卷，第415－417页，提供了许多有关定居博尔努的资料。

[64] “迪万”，22－25、66节。最后一位史官将该城称为加拉。

[65] G.纳赫蒂加尔记述，在恩加拉有一处很大的陵园，共有45位科托科国王的陵墓。他认为这是科托科族取代萨奥人统治恩加拉之后的45位国王。G.纳赫蒂加尔，前引著作，第2卷，第426－427页。

[66] 利奥·阿非利加努斯，前引著作，第1卷，第5、53页；第2卷，第480页。

[67] 伊本·富尔图瓦，英文译本，1926年，第63－69页。

[68] D.兰格和S.伯绍德（S.Berthoud），1972年，第350－351页。

[69] 贾吉阿，可能就是欧麦里所说的卡卡城；欧麦里，前引著作，第43页。

[70] 伊本·赛义德，1970年版，第94页。关于卡瓦尔，伊本·赛义德在表达自己的见解时一般都用同样几个词，只是通过“库尔西”一词，伊德里西证实了早期酋长国的存在，前引著作，第114页。

[71] 马克里齐，1820年版，第207页。

[72] 《历史》（《*Kitāb al - Ibār*》）译本二，第346－347页；伊本·哈勒敦，1925年、1956年版，第346－3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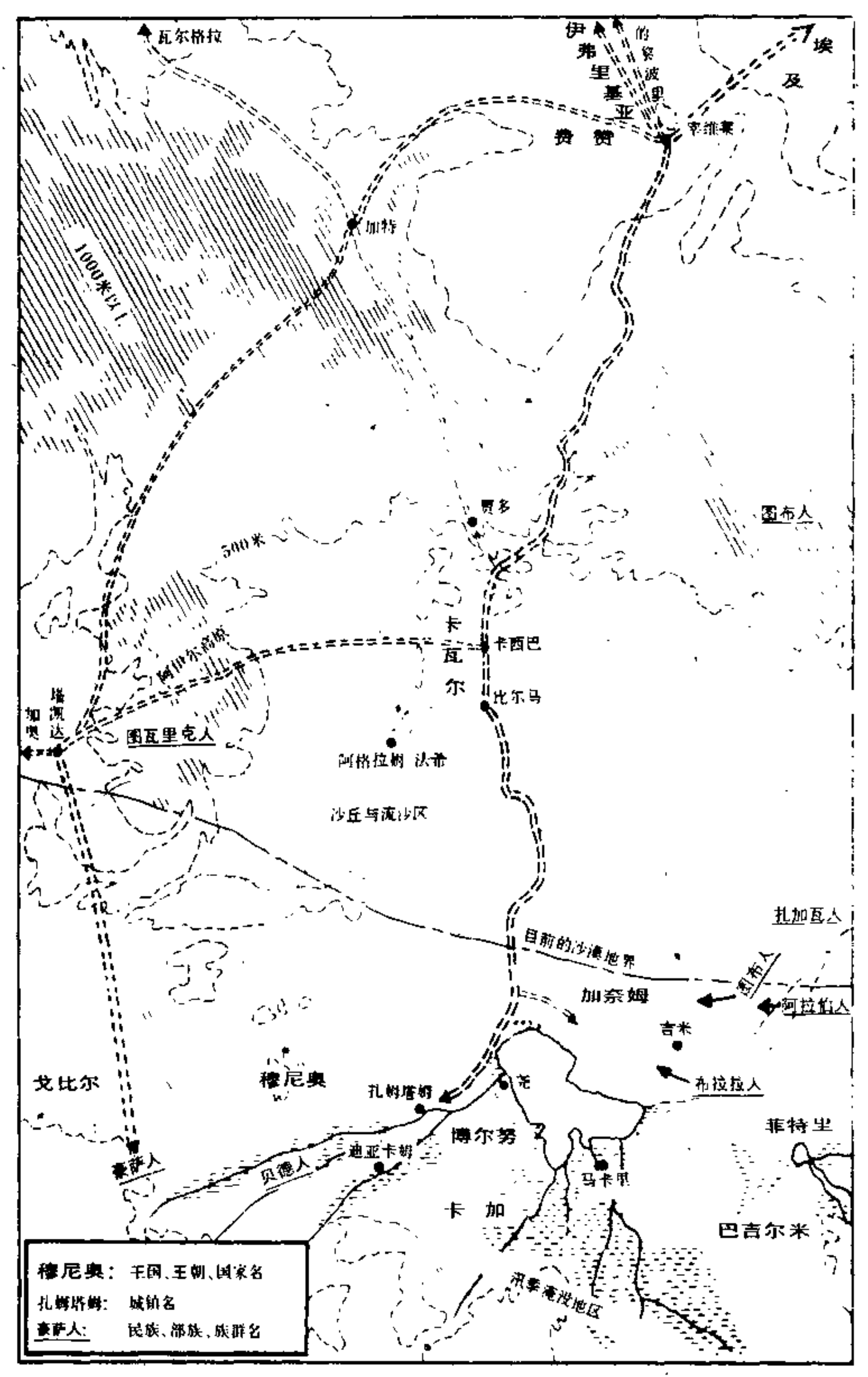


图10.4　14世纪乍得境内诸王国与民族(D·兰格)

把我们引到乍得湖东，引到了加奈姆。[73]其实，上述这些不同的说法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因为可以同意说加奈姆和博尔努原先是两个分别存在的王国，只是从13世纪起它们都归属于同一个塞富瓦王朝的统治之下了。

然而，欧麦里在14世纪中叶写书时肯定说，埃及的马木路克素丹曾经分别给加奈姆国王和博尔努君主交换过信件。[74]据此，可以有理由说，博尔努仍保有一定的自主权，尽管加奈姆国王拥有君主权，旧王朝或许还在博尔努起重要作用。每当塞富瓦王朝权力衰落，一些土著国王的权力便得到了增强；而一旦塞富瓦王朝趋于强大，后者就难有施展宏图的机会。可是，部族的基础必然是相同的，否则伊本·巴图塔怎么能够把博尔努这名称用来称呼塞富瓦帝国呢？

258

这种情况，到14世纪行将结束，布拉拉人发动进攻迫使塞富瓦王朝放弃加奈姆和最后定居在博尔努之时，必然已经变化(见插图10.4)。布拉拉人在入侵加奈姆之前可能是定居在菲特里湖地区从事畜牧业，直到现在也还有在那里住的。[75]他们曾在那里统治过库卡人，后者说的是与萨拉人一样的语言。布拉拉人长驱直入加奈姆，这有可能与14世纪初因基督教王国努比亚国内混乱而引起的某些阿拉伯部落西迁有关。据伊本·富尔图瓦考证，阿拉伯人在16世纪末可能已与布拉拉人结盟。14世纪末，曾有一位塞富瓦国王在与阿拉伯人的作战中阵亡。

布拉拉人干预加奈姆的直接原因看来是在于达乌德·易卜拉欣·尼卡尔（约1366－1376年在位）和他兄长伊德里斯（即前国王）的几个儿子之间内部矛盾引起的塞富瓦王国的削弱。达乌德本人后来被布拉拉国王阿卜德·贾利勒所杀。他的3个后继者也都在抗击布拉拉人的战斗中遭到杀害。第4位后继者乌玛尔·伊德里斯（约1382－1387年在位）最后不得不逃离吉米，并且完全放弃了加奈姆。[76]根据他的兄弟比尔·伊德里斯所写的一封信，他死于朱达姆阿拉伯人（或朱哈伊纳阿拉伯人）之手。[77]以后的两位塞富瓦国王也都是在与布拉拉人作战中死亡的。后来，比尔·伊德里斯（约1389－1421年在位）经过长期统治才最终挡住了塞富瓦帝国的这个可怕的敌人。

上述这些事件在其他伊斯兰国家中也为人们所熟知。马克里齐将这些事件概括如下：

> 公元1300年前后，国王哈吉吉·易卜拉欣（赛义夫·迪·雅赞的后代）拥有加奈姆和博尔努两个王位。他的儿子哈吉吉·伊德里斯继承统治，以后继位的是另一个儿子达乌德·易卜拉欣；然后是伊德里斯之子乌玛尔，最后是乌斯曼·伊德里斯于公元1397－1398年之前不久继位。加奈姆人民反对这些国王，拒不从命。当时，

[73] 伊本·巴图塔，前引著作，第4卷，第441－442页。

[74] 欧麦里，1894年版，第27和以后诸页。

[75] 伊本·富尔图瓦，前引著作，第4－5页。据R.巴尔特（R.Barth）说，布拉拉人是一个名叫吉尔－希科迈尼的人的后代，传说他是杜纳马·迪巴拉米的儿子；R.巴尔特，1857－1859年，英文译本1965年，第2卷，第545和586页。但更可能的是布拉拉人和塞富瓦王族之间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G.纳赫蒂加尔，前引著作，第3卷，第38－39页。

[76] "迪万"，第27－31节。

[77] 朱达姆这名称在14世纪时即已废弃不用（《伊斯兰百科辞典》第1版，第1卷，第1090－1091页）。相反，朱哈伊纳人在摧毁努比亚基督教王国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他们向南和向西迁移。H.A.麦克迈克尔（H.A.MacMichael），1922年，187和以后诸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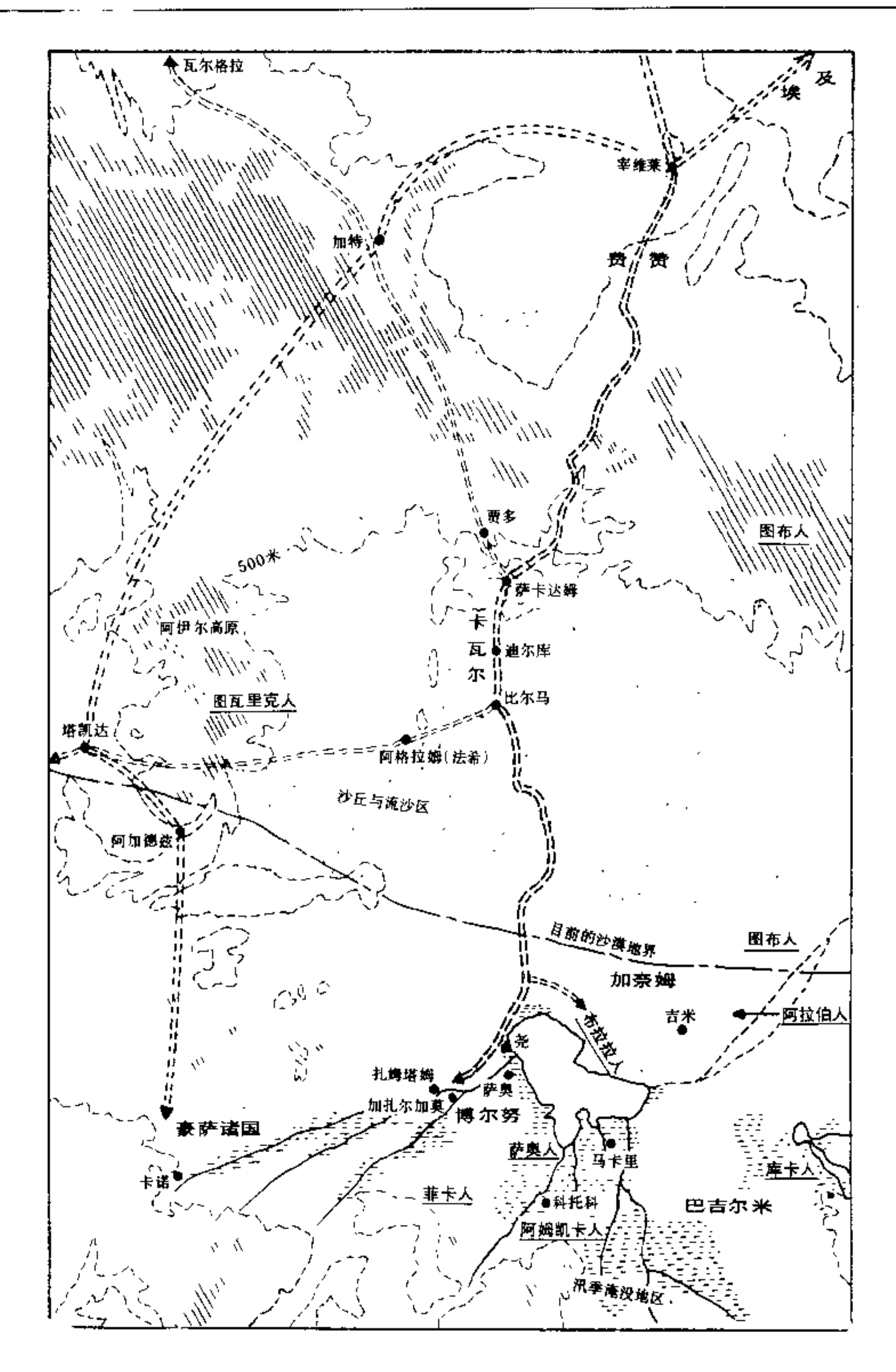


图 10.5 15世纪乍得境内诸王国与民族（D.兰格）

260 博尔努仍在帝国版图之内；那里的居民是穆斯林，他们对加奈姆人发动了圣战。他们一共拥有 12 个臣属的王国。[78]

马克里齐上述记述使我们设想布拉拉人很可能是异教徒，但无论是“迪万”的作者还是伊本·富尔图瓦都未曾提到这一点。比较可信的还是叙述以博尔努为中心的新塞富瓦帝国的资料，许多土著酋长似乎都效忠于它，卡卡成了它的新都。[79]看来，比尔（乌斯曼）·伊德里斯有足够的力量把战争推向敌方境内。

关于布拉拉人，据我们所知，他们曾经在加奈姆建立一个强大的王国，而且正如伊本·富尔图瓦所说，图布人和阿拉伯人部落都是他们的同盟者。利奥·阿非利加努斯所知道的他们的王国叫做“加奥加”，这名称无疑是来自库卡语。[80]按他的报道，加奈姆比博尔努更辽阔和强大，加奈姆国王与埃及的哈里发保持着良好关系。[81]这些记述虽不涉及 16 世纪初（当时利奥·阿非利加努斯正自称去萨赫勒地区各国访问），[82]但可能符合 15 世纪末的情况，因为那是来自北非洲的商人对他讲述的。众所周知，博尔努的军队大概在伊德里斯·卡塔卡尔马比（约 1497－1515 年在位）统治初期（也就是被逐出加奈姆之后 122 年），重新占领了吉米。[83]然而，布拉拉人在 16 世纪下半叶伊德里斯·阿拉沃马取得成功以前，始终未被彻底击败。

王朝危机和政治危机

“迪万”中大部分资料所记载的是王朝历史，因而这就成了加奈姆－博尔努历史中最为人熟知的一个方面（见插图 10.6）。作为一种惯例，“迪万”所提供的只是记载历代 262 王位继位传代的资料(王位传代年表仅用以说明各代国王统治时期的长短)；但这足使我们有可能确定前后连接的不同国王的血统(他们的家系)，说明王位继承习惯的演变。为去世国王选择继承人，都要按照这种习惯，或者更确切说，都要按照这种先例进行。固然王朝不同部落群体之间的力量平衡也要考虑在内，但最重要的是必须与赋予继位人以合法性的既定惯例相一致。这种不成文的习惯法已证明比现代宪法更加持久。它们都只有经历很长时间之后才会有所改变，而且往往是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的结果。由哪个部落群体建朝立代都需依据这些惯例确定，各部落群体都不能按自己愿望随意加以窜改。

---

[78] 译自马克里齐，见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资料，手抄本 3744（摘要）。先前这节译文引自一个不完善的文本（H.A.哈梅克，1820 年，第 207 页）。这里应该注意，乌斯曼·伊德里斯在“迪万”第 34 节中叫做比尔·伊德里斯。

[79] 卡尔卡尚迪，前引著作，第 5 卷，第 281 页。欧麦里也曾提到过卡卡，它或许就是伊本·赛义德所说的贾古阿，或许就是“迪万”（第 31 节）中所说的卡加。参阅本章注 43 和 49。

[80] 这是一个族群的名称，并非加奥或加奥－加奥城；加奥，通常误拼为考考。

[81] 利奥·阿非利加努斯，前引著作，第 1 卷，第 10 页；第 2 卷，第 479－483 页。

[82] 利奥·阿非利加努斯对中苏丹地区各王国的“叙述”错误颇多，因此完全可以排除他访问过这个地区的任何可能。他称博尔努国王为“哈布拉姆”（易卜拉欣），并提到“加奥加”的两位国王莫西（穆萨）和霍马拉（乌玛尔）。在 15－16 世纪以易卜拉欣的名号统治博尔努的唯一国君是易卜拉欣·乌斯曼（约 1431－1439 年在位）。另外两个名字，穆萨和乌玛尔，都得不到证实究竟是哪位布拉拉国王。

[83] 伊本·富尔图瓦，英文译本，1932 年，第 5 和以后诸页。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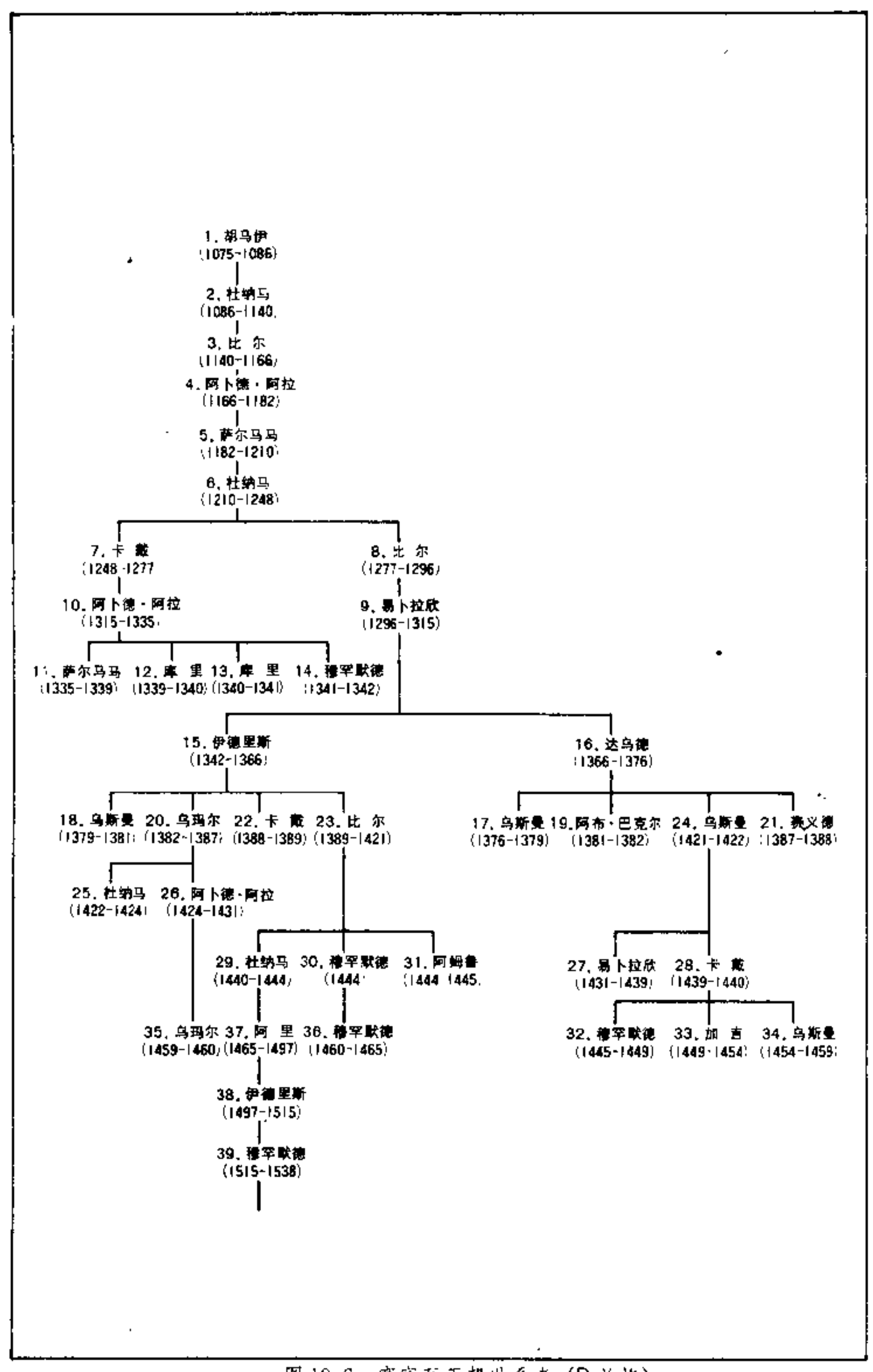


图 10.6 塞富瓦王朝世系表 (D.兰格)

重新将王位传代的惯例及其演变过程考察清楚，不仅有助于了解王朝历史，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历史进程中的许多方面。

根据“迪万”记载，塞富瓦王朝前6位国王都是嫡脉相传，即父位子继的。史官指出杜古瓦王朝的国王也是采用类似的传位方法，但国王统治时间有长有短，王位并非总是能够按代相传的。父位子继被认为是源自卡瓦尔酋长中推行的惯例，他们可能就是那位创建塞富瓦王朝的胡马伊的先辈。

到了杜纳马·迪巴拉米儿子一代，我们才看到兄位弟继的第一例；但必须注意到，卡戴·杜纳马（约1248－1277年在位）和比尔·杜纳马（约1277－1296年在位）并非同母所生。卡戴的母亲很可能是马戈米人，而比尔的母亲却可能出身于加奈姆一个古老的部落。从一直注视着杜纳马·迪巴拉米统治的史官们提供的一份重要资料中，可以看到有关的阐述：“他在世时，他的儿子们就已分成不同的派系；而在此之前派系之分根本不存在”[68]。也许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卡戴派和比尔派之间的对立正反映了早在13世纪初即已出现的王朝内部冲突。正如我们业已知道的，马戈米王室世系和加奈姆定居部落之间日益扩大的矛盾很可能就是这些派系冲突的根源。

还需记住的是，按史官记载，塞富瓦王朝史上最初出现的庶子继位，发生在加奈姆境内头一位国王惨遭横死之后（杜纳马·胡马伊于朝圣途中被杀害）。卡戴事实上是在与安达卡马·杜纳马（*'andakama dunama*，王国的大臣之一）交战中阵亡的。另一方面，他的兄弟比尔则是在吉米自然死亡。易卜拉欣·尼卡尔（约1296－1315年在位）按父位子继的惯例，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但他本人却被另一大臣叶里马（北方总督）穆罕默德·加迪击败，权位转到了他的堂兄弟阿卜德·阿拉·卡戴（约1315－1335年在位）手中。此后，传统的继位原则得到恢复，因为阿卜德·阿拉·卡戴于吉米自然亡故，当即由他的儿子萨尔马马（约1335－1339年在位）继位。由此可以断定，13世纪下半叶和14世纪初，父位子继仍然是主要方式，或者说是只有靠暴力才能加以破坏的一种方式。

从那以后，弟继兄位越来越占了上风。阿卜德·阿拉的4个儿子依次接掌权力，但他们都在执政后不久与萨奥人的作战中死去，在位时间全都不长。卡戴·杜纳马的后代似乎都无力击败萨奥人，于是权力转到了比尔的一个孙子伊德里斯·易卜拉欣·尼卡尔（约1342－1366年在位）手中。这位国王对待博尔努土著民族看来比较温和，因为他本人就是比尔·杜纳马血统的后代，这样也就与加奈姆境内的非马戈米人保持亲密关系。总之，他在与萨奥人各部落建立协调关系和在使博尔努建立秩序方面似乎颇有成绩。

伊德里斯·易卜拉欣·尼卡尔去世时，传位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复杂：应该传位于谁，是传给儿子还是兄弟？结果，选中了异母兄弟达乌德；[69]可是诸王子并不甘心。于是，在达乌德统治时期爆发了“素丹某一儿子（或几个儿子）与素丹本人之间的战争”。[70]可以认为，为继承权而爆发的这场战争是塞富瓦王朝随之而由强变弱的根源，

[68] “迪万”，第17节。

[69] 与杜纳马·迪巴拉比的儿子相反，易卜拉欣·尼卡尔的两个儿子并不是代表两个不同的集团；按“迪万”记载，伊德里斯的母亲和达乌德的母亲实际上是姐妹，大概都是马戈米人。

[70] “迪万”，第17节。或许可以认为，这里谈到的“儿子”是指达乌德之子；但若如此，史官就会这样写：“在素丹和他儿子（或儿子们）之间爆发了战争”，如同他们记述杜纳马·迪巴拉米统治时期一样。

从而招致了布拉拉人的干预：1376至1389年间7位国王相继死于抗击入侵者的战争。[40]这同时也导致达乌德家系和伊德里斯家系的对抗，他们不断用武力争夺权力，严重地削弱塞富瓦王朝。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这继位问题，由于两家系中有一个被彻底消灭，才最后得到解决。

外部入侵的直接后果是产生预防反应：先是乌斯曼（约1376－1379年在位）顺利地继承了他父亲达乌德的王位，后来达乌德和伊德里斯两家交替执政，直至加奈姆境内的战斗结束时为止。在这期间，弟继兄位日益成为惯例：乌斯曼·伊德里斯接了乌斯曼·达乌德的位，乌玛尔·伊德里斯又接了阿布·巴克尔·达乌德的位。显然，合理合法的继位原则已服从于当时的政治需要。

在当时情况下，甚至一个非塞富瓦王族能登上王位也不足为怪。有一位"国王"（实为"马立克"（*malik*）而不是素丹）赛义德（约1387－1388年在位）事实上继承了乌玛尔的王位，乌玛尔在布拉拉人的逼迫之下放弃了加奈姆。因此，赛义德是仅仅只统治博尔努的第一位国王。他可能是因较好地代表该古老王国这一部分地方居民利益才被推上王位的。把他看作是古老的博尔努王朝的一位代表，这种看法颇有一定道理。他和他的继承者卡戴·阿夫努·伊德里斯（约1388－1389年在位）都是在比尔（乌斯曼）·伊德里斯最后击败布拉拉人以前与入侵者的战斗中被杀死的。 264

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次胜利给予伊德里斯家系能一劳永逸地把达乌德后代逐出权位的有效王牌。在那以前，达乌德家系已经三次被排除在王位继承权之外。后来，比尔（乌斯曼）·伊德里斯（约1389－1421年在位）长期执政，使达乌德家系更难以重掌王权。然而，乌斯曼·卡尔纳玛·达乌德（约1421－1422年在位）是合乎条件继承比尔（乌斯曼）·伊德里斯的王位的；当时真正执掌实权的人物已明显不再是塞富瓦王族，而是王国一些高级的官员。

"迪万"告诉我们比尔（乌斯曼）·伊德里斯不得不与"凯格哈马"（*kayghamma*，军队首领）穆罕默德·达拉图作战。他的继承者乌斯曼·卡尔纳马·达乌德在登位后只9个月就被"凯格哈马"尼卡尔·易卜拉欣和叶里马（北方总督）卡戴·卡阿库推翻。王权在归还给达乌德的后代易卜拉欣·乌斯曼（约1431－1439年在位）和卡戴·乌斯曼（约1439－1440年在位）之前，又落到了乌玛尔·伊德里斯的两个儿子杜纳马（约1422－1424年在位）和阿卜德·阿拉（约1424－1431年在位）之手。两家系之间的这种权力动荡肯定应归咎于王国官员，尤其是"凯格哈马"对王位继承的操纵。史官们无疑要我们注意"凯格哈马"在那时所拥有的巨大权力。阿卜德·阿拉·乌玛尔是被"凯格哈马"阿卜德·阿拉·达格哈尔马废黜的，达格哈尔马把达乌德家系的易卜拉欣·乌斯曼扶上了王位；但在这位国王死后，"凯格哈马"又让阿卜德·阿拉·乌玛尔复位。因此，至少20年间，博尔努真正的主人是军队首领而不是王室子孙。

官员势力，特别是"凯格哈马"势力的增长，恐怕不是偶然的。这种情况在比尔（乌斯曼）·伊德里斯统治时期十分鲜明，每当布拉拉人造成的外来威胁得到抑制，这种情况

[40] 同上，第27－33节。

就会出现。战争刚结束，维护王国安全的主要出力者们就想与统治王朝分享权力。他们或者还相当软弱，或者是力量过于分散，一时不敢取代塞富瓦王朝的统治。[48]然而，他们充分利用王朝内各集团之间的分歧来争权夺利，使王朝一再陷入危机，而这种危机在比尔（乌斯曼）·伊德里斯长期执政后本来是可以有效地克服和稳定下来的。

此后，达乌德和伊德里斯两家系之间的直接对抗又继续了 20 年。杜纳马·比尔（约 1440－1444 年在位）攻打卡戴·乌斯曼，为伊德里斯的后代夺回了王国。此后，两兄弟——穆罕默德·马塔拉和阿姆鲁·艾沙·乌斯曼先后继位，[49]但他俩的统治在达乌德家系重掌权力之前加在一起也不到两年。现在还无从得知穆罕默德·卡戴（约 1445－1449 年在位）是在什么情况下继承阿姆鲁的王位的，很可能他是借武力自立为王。他的王位后来也是被他的两个兄弟加吉·伊马塔（约 1449－1454 年在位）和乌斯曼·卡戴（约1454－1459 年在位）所接替。后者被阿里·加吉德尼击败，从此达乌德家系作为一个政治力量不复存在。造成国家分裂达 40 年之久的王朝内部大冲突最后以伊德里斯家系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然而，阿里·加吉德尼，虽然是杜纳马·比尔的儿子，却并非一定有把握继承王位。显然，他家系中两个年长的成员对王位有更加有力的权利。阿里·加吉德尼实际上是在乌玛尔·阿卜德·阿拉（约 1459－1460 年在位）和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约 1460－1465 年在位）之后继位的。应该肯定，在达乌德家系和伊德里斯家系的长期斗争中，这两个王族集团都已形成强有力的组织结构，严格按年长次序、弟继兄位的方式延续到每一代最后活着的一人，这已成为一种天经地义、很有约束力的规矩，甚至连这位彻底征服达乌德家系的英雄都无法摆脱。

关于阿里·加吉德尼（约 1465－1497 年在位）的统治情况，我们只有很少一点资料。确为大家所知晓的只是他建立了加扎尔加莫城（位于卡诺和乍得湖之间），该城后来成为塞富瓦王朝的首都达 3 个世纪之久。然而，他执政的重要意义或许可由以下事实衡量，即在他统治之下，传位方式朝着有利于传给下一代直系子孙的方向转变。王位继承者是他的儿子伊德里斯·卡塔卡尔马比（约 1497－1515 年在位）和他的孙子穆罕默德·伊德里斯（约 1515－1538 年在位）。子继父位，经长期受阻而又得到恢复，这在博尔努居民眼里，必然是像黄金时代的重新到来。

[48] “凯格哈马”的姓名，各不相同，使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官职是世袭的。但是，阿卜杜拉希·施米特（Abdullahi Smith）提出假设说，“凯格哈马”都是卡加（博尔努南部）的酋长，他们不满意塞富瓦王族霸占他们的领土。H.F.C.（阿卜杜拉希）施米特，1971 年，第 180 页。直到 16 世纪下半叶（伊本·富尔图瓦）才证实了“凯格哈马”的军事职责，在此之前，这一假设长期被认为是有道理的。

[49] 史官没有指出是直系传位因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这里不能因而得出结论说穆罕默德和阿姆鲁是篡位者。

11 中苏丹的豪萨人和他们的近邻

M. 阿达穆*

266 北起阿伊尔山脉、南到乔斯高原北侧、东自博尔努古国边沿、西迄尼日尔河流域，这一大片土地是豪萨人历来居住的地方。豪萨语很早就是该地区内唯一通用的当地语言。这地区本来没有特定名称，仿佛为要强调豪萨语的重要性，于是就称之为 *kasar hausa* ——豪萨语国。然而，经过多次迁徙和长期同化，这片以豪萨语为主要交流媒介的地区往西、往南两个方向扩大了。至于北面，大批非豪萨语族人，特别是图阿雷格人、扎巴尔马/杰尔马人和富尔贝/富拉尼人进入境内并在那里定居。

豪萨语如今仍是中苏丹热带草原地区的主要语言。随着历史的进程而相互融合的各种不同的群体全都讲这种语言，这样就使他们最终具有了统一的独特文化共性，并且创造出一种光辉灿烂的文明。固然，我们能同意盖伊·尼古拉斯的说法，“豪萨人讲的是相同的语言，遵循的是相同的习惯，服从的是相同的政治制度，所以他们构成非洲最重要的部族之一。许多近邻，为他们的文化所吸引，放弃了自己本身的语言和习惯，成为豪萨人的一个组成部分。”[①]但豪萨人究竟来自何处？他们最初的祖先是谁？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在了解豪萨诸国的建立和发展到 16 世纪时的情况以前要在本章开头首先加以探讨的。本章后面部分则将着重阐明豪萨诸国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它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它们内部国与国之间以及它们与邻国、特别是与桑海和博尔努之间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也将在本章予以研究。

豪萨人的起源

267

有好几种学说，虽然常常是矛盾的，但都提出了对豪萨人起源的看法，这些观点大致可概括如下：

第一种学说是根据对巴亚吉达（或道拉）传说的错误解释而产生的。这种学说主张，豪萨人的祖先本是来自伊拉克巴格达的阿拉伯人[②]。最近安德烈·萨利福给我们提供这一传说的另一版本。而 W. K. R.哈勒姆将它解释得好像是对基督纪元当前这一千年之初在

* 《非洲通史》负责编辑工作的当局决定利用安德烈·萨利福(A.Salifou)的一篇作品，以对本章进行修订。于是，由国际科学委员会指定让·德维斯(J.Devisse)、I.赫尔贝克(I.Hrbek)和 Y. A. 塔利布(Y. A. Talib)三位教授组成小组，进行审定。

① 译自盖伊·尼古拉斯(Guy Nicolas)，1969 年，第 202 页。

② H. R. 帕尔默(H. R. Palmer)，1928 年，第 3 卷，第 133 及以后诸页。

豪萨地区出现几个新王朝情况的叙述。[3]按H.F.C.阿卜杜拉希·施米特的说法："如果巴亚吉德传说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博尔努对豪萨人政治制度的影响，这可从豪萨语词汇中有卡努里词语这一点来证实"。[4]历史学家现在对所谓豪萨人起源于阿拉伯人这种学说已不屑一顾。

第二种学说认为豪萨人原先居住在撒哈拉南部，当时那里尚未成为沙漠，后来他们才南迁的。[5]他们在进入了如今的北尼日利亚之后，或是将那里的土著居民驱赶到包奇高原上去，或是他们看到这片疆土人口如此之稀少，足够他们居住，并未驱逐原有居民。这可以说明为什么现在高原上还住着许多小部族群体，而这些部族群体的语言属于与豪萨语完全不同的语种。认为豪萨人祖籍是撒哈拉的这种学说表面上似乎言之成理，但无法作为定论，因为它没有事实根据，所以只能是一种假设。

第三种学说与此全然相反，认为豪萨人的祖先是原来大乍得湖西岸从事狩猎、捕鱼和耕作的居民。[6]在乍得湖缩小到现在的位置(偏向东侧)之后，豪萨人的祖先仍选择继续留在原来定居的地方。按J.E.G.萨顿新近提出的论点，构成道拉、卡诺、拉诺、加龙-戈巴斯诸王国的这片土地是"豪萨语族"(Hausa-ness)最早的发祥地；后来，才由此向西、向北伸展，将卡齐纳、扎扎乌、戈比尔、赞法拉、凯比等地包括进来。J.E.G.萨顿把自己的见解"概括为一句话，即豪萨人定居地区的历史，在基督纪元当今这一千年中是从哈代贾-道拉-卡诺地区向西扩展到索科托以至更远地方的过程。"[7]他从而彻底否定了H.F.C.阿卜杜拉希·施米特所主张的豪萨人起源于北方(撒哈拉)的说法。但是，J.E.G.萨顿的见解也是迄今尚未得到最后证实。

268

关于豪萨人起源的第四种学说，是由M.阿达穆最近提出来的。[8]这种学说的主要论据是，不管哪部分豪萨人都没有讲到他们是从豪萨以外地区迁徙到这里的口头传说，当地有记录的口头传说都说豪萨人的祖先是"从地洞里钻出来的"。这种说法在非洲其他地方也常听到，可理解为，他们的祖先本是那里的土著。所以，豪萨人的祖先，看来可以肯定原来就住在现在称作为豪萨的这块地方。当然，豪萨族群因来自东方和北方的民族大迁徙而大为扩充；在以后一个时期中，又有万加拉(迪尤拉)人和富拉尼人诸族纷纷从西而迁来豪萨地区定居。这种学说认定豪萨语和豪萨族群从一开始就是在豪萨地区发展起来的，虽然人种的形成过程，由于时间相隔过长，现在难以弄清楚，但至今还没有可

[3] A·萨利福，1971年，第321-345页；W.K.R.哈勒姆(W.K.R.Hallam)，1966年。

[4] H.F.C.阿卜杜拉希·施米特(H.F.C.Abdullahi Smith)，1970年(a)；关于卡努里语对豪萨语的影响，见J.H.格林伯格(J.H.Greenberg)，1960年。

[5] H.F.C.阿卜杜拉希·施米特，前引著作。

[6] 现在的乍得湖，在史前时期是占有40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一个古老的内海；其水面在公元前约8000年(距今10,000年以前)达到最高水位，这种水位一直维持到公元前约2000年左右(距今4000年以前)。参见《非洲通史》第1卷，第16章。

[7] J.E.G.萨顿(J.E.G.Sutton)，1979年，第184-185页。

[8] M.阿达穆(M.Adamu)，甚至H.F.C.阿卜杜拉希·施米特都认为，豪萨语族从很早时期起就居住在他们今天定居的地区。

以驳倒这一学说的任何根据。[9]

然而，豪萨各族人民居住的土地，在古代很可能还包括撒哈拉南部的某些部分，特别是阿兹宾（阿伊尔）在内。[10] 各种不同材料都证明，这地区至迟到 14 - 15 世纪曾被图阿雷格人征服，该地区大多数豪萨居民被迫向南迁到戈比尔。来自北方的压力，迫使豪萨人往南向其他族群的居住地大转移，这些族群在以后几个世纪逐渐接受豪萨语和豪萨人的风俗习惯。

豪萨一词，用来作为豪萨地区各族人民的总称，出现于书面材料是 16 - 17 世纪才开始的。在此之前，这些民族都是各自以他们城市和王国之名相称，如卡纳瓦人、卡齐纳瓦人、戈比拉瓦人等等。利奥·阿非利加努斯于 16 世纪初指出，在如今成为北尼日利亚的地区，戈比尔语曾是通用语言。[11] 然而，埃及历史学家苏尤提（1445 - 1505 年）在他《致苏丹、豪萨、塔克鲁尔国王书》（《*Epistles to the Kings of the Sudan, Hausa and al - Takrūr*》）中，将“豪萨”用为地名。[12] 廷巴克图的学者们在《法塔史》（《*Ta'rīkh al - fattāsh*》）和《苏丹史》（《*Ta'rīkh al - Sūdān*》）两部古典史书中也常常把豪萨一词用来表示豪萨人居住的尼日尔河左岸地带；与此相对称，他们用古尔马一词指右岸地区。[13] 269

起初，“豪萨”这词仅指豪萨地区居民的母语，那里的人民实际上都自称为“豪萨瓦”（即讲豪萨语的人）。[14] 然而，豪萨有时候单纯是指以前赞法拉、凯比和戈比尔诸王国所在地域，这间接肯定了古典苏丹史书的说法，因为这些王国是离桑海最近的几个豪萨人居住地。

在尼日利亚和尼日尔都有讲豪萨语并分享豪萨文化、却又不愿被人称为豪萨人的非穆斯林群体。在尼日利亚，这些人自称或被其他豪萨人称为马古扎瓦人（或巴马古吉人）；而在尼日尔，则把他们叫做阿兹纳人（或阿尔纳人）——在豪萨语中，意思是“异教徒”。阿兹纳人把以“豪萨”为名的整个地理范畴看作是赞法拉、凯比和戈比尔地区。由于“马古扎瓦”这名称很可能来源于阿拉伯语的“*madjūs*”一词，（最初作“拜火教”解，后来逐渐转义为“异教徒”），所以豪萨人与马古扎瓦/阿兹纳人的分化很可能是从 17 - 18 世纪在豪萨地区平民百姓中传播了伊斯兰教之后才开始的。

在本章中，“豪萨”一词指母语为豪萨语的一切人，不论他们居住在哪块地方或属于何种宗教信仰。

---

[9] C. K. 米克（C. K. Meek），1931 年（b），第 1 卷，第 61 - 87 页；C. R. 尼文（C. R. Niven），1957 年，第 265 - 266 页；和 H. R. 帕尔默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提出的关于豪萨人的祖先是科普特人、努比亚人或柏柏尔人的牵强附会的说法，我们搁置一边、不值一提。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来源于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含米特神话”。有关这一点，可参阅《非洲通史》第 1 卷，第 1 章，第 35 及以后诸页。

[10] 雷蒙德·莫尼（R.Mauny），1961 年；第 144 页指出，目前居住在撒哈拉沙漠绿洲中的哈拉廷人就是这种古代黑人的残存者，他们成为讲豪萨语居民的一部分。

[11] 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法文译本，1956 年，第 1 卷，第 9 页。

[12] H. R. 帕尔默，1914 年，第 407 和以后诸页。

[13] 马哈茂德·卡蒂（Mahmūd Ka'ti），法文译本，1913 - 1914 年，第 53、178 和 330 页；萨迪（al-Sa'dī），法文译本，1900 年，第 41、152 和 232 页；也可参阅 N.斯金纳（N. Skinner），1968 年，第 253 - 257 页。

[14] D. A. 奥尔德罗格（D. A. Olderogge），1960 年，第 68 页，将人种名称“豪萨”和“*hausa*”（语言）一词联系起来，用以表示语言或方言；*na gane hausarka*，意即“我懂你们的语言”。

豪萨国家的产生和演变

流传最广的有关豪萨祖先的传说，讲的是巴亚吉达王子从巴格达西行来到加奈姆-博尔努的情况。[15]据传“马伊”（*mai*，国王）将他的女儿“马吉拉”（*magira*，公主）许配给巴亚吉达为妻，但又夺去了他所有的随从。巴亚吉达王子惧怕这位马伊，于是再向西逃逸，不久以后来到一座城市，那里有一巨蟒阻碍该城居民用水，人们称它为“萨尔基”（*sarki*，“大王”）。他用剑杀死了巨蟒。[16]当地的女王道拉以身相报，与他结为夫妻，并给 270 了他一个瓜里族女人作妾。他与道拉所生的儿子名叫巴沃加里，而其妾为他生的第二个儿子名叫卡博加里或卡拉夫加里（占城者）。这座城市从此以道拉为名。巴沃加里继承其父登上王位，他有6个儿子，是3对双胞胎，分别成为卡诺和道拉、戈比尔和扎扎乌（泽格泽格或扎里亚）以及卡齐纳和拉诺的统治者；连同巴亚吉达与博尔努公主所生之子统治的比拉姆，这7个国家构成了 *hausa bakwai*（7个豪萨国家）。卡博加里的7个儿子则建立了另外7个国家，即凯比、赞法拉、瓜里、朱昆（夸拉拉法）、约鲁巴、努佩、雅武里，这7国合称为 *banza bakwai*（7个私生儿或卑贱者之国）。[17]

虽则这个传说中包含着某些古代的微妙隐秘，但它毕竟反映出16世纪北尼日利亚的形势。构成 *hausa bakwai* 的7国都与邻近的敌对群体进行了几个世纪长期艰苦的斗争，它们是取胜者。正如 H. F. C. 阿卜杜拉希·施米特强调指出的，豪萨地区各王朝和中央集权政府，并不是有更高文化的东方的某个文明英雄所一手造成的，因为巴亚吉达传说本身就承认在他逃到道拉时，那里已有一位女王。[18]此外，卡诺流行的同一传说，把巴亚吉达的儿子巴加乌达说成是卡诺国家的创始人，但在他到来之前，那里实际上已有一个掌权的王朝。所有这一切表明，道拉传说的真正意义仍是一个谜。

对豪萨各城市分工的有趣叙述，是该传说的补充。按所说，卡诺和拉诺被称为 *sarakunan babba*（靛青之王），因为它们主要从事纺织品的生产和染色，而卡齐纳和道拉则被说成是 *sarakunan kasuwa*（集市之王），因为商业集中于这两个城市。戈比尔是 *sarkin yaki*（战争之王），因为它的职责是保卫其他城市不受外敌侵犯。最后，扎扎乌（扎里亚）成为 *sarkin bayi*（奴隶之王），因为它给豪萨各城市提供奴隶劳动力。[19] 这反映出豪萨几大

---

[15] H. R. 帕尔默，1936年，第273-274页；W. K. R. 哈勒姆，前引著作，第47-60页；两人都认为这个巴亚吉达王子与历史上的阿布·亚齐德有某种联系，因为阿布·亚齐德在10世纪上半叶领导了哈列哲教派柏柏尔人反抗北非洲法蒂玛王朝的一次起义；他是塔德梅卡地方一个女奴的儿子，生于西苏丹，公元947年被法蒂玛王朝杀害。

[16] 关于这位斩蛇英雄的传说在曼丁哥人讲述瓦加杜王朝始祖的一些故事中也提到过。

[17] 参阅 H. R. 帕尔默，1928年，第3卷，第132-134页。有关“道拉”的各种传说，对这两个“7国”的组成情况说法不尽相同：在前一集团中，我们有时发现有赞法拉、凯比和包奇（比拉姆和拉诺则不在其内），而格万比、包奇、古尔马、扎贝尔马和博尔古又可能包括在后一集团内。参阅 D. A. 奥尔德罗格，前引著作，第72-73页，其中列举了所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18] H. F. C.阿卜杜拉希·施米特，前引著作，第329和以后诸页。

[19] A. J. N. 特雷莫尔涅（A. J. N. Tremearne），1913年，第141页。

城邦(city-states)建立后经济一度达到较高水平的一般情况。

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出现，看来与首府(称为比拉涅，*birane*，单数 *birni*)的建立和成为政治权力中心密切相关。豪萨各城市的地位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并且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本章只探讨 14 世纪后起重要作用的几个城市的发展情况，它们是卡诺、卡齐纳、扎扎乌(扎里亚)、戈比尔和凯比。 **271**

卡诺

卡诺的历史，因有编年记载和丰富的口头传说，因此人们了解的情况较多。[20]这个王国所属地区，原先是若干小酋长国领地，这些小酋长国的首领对人民行使权力所依靠的是宗教审判权。酋长国中最重要的是谢默、达拉、桑托洛。在巴加乌达来到之前，达拉有过 6 代统治者。

据 H. R. 帕尔默说，巴加乌达来到卡诺的时间是公元 999 年；虽然 H. R. 帕尔默所列年表纯系主观的推测和约略的估计，至今人们仍以这一日期为准。[21]巴加乌达在强制当地居民接受他的统治后，始终住在卡诺，直到他在那里死去。他的孙子基吉马苏(公元 1095 - 1134 年在位)，在达拉山麓建立自己的定居点时，创建了当今的卡诺城。他同时开始建筑城垣，这项工程直到他的儿子察拉基(公元 1136 - 1194 年在位)统治时期才告完成。到 1200 年，卡诺的统治者降服了该地区所有酋长国，只有桑托洛除外。在此之后，桑托洛继续保持 150 年的独立。

在亚吉(公元 1349 - 1385 年在位)的统治下，征服该城周围地区和附近居民的进程才算胜利告一段落，尽管城内城外许多部落群体仍时有反抗。向外扩张是以征服扎姆纳加巴的几个独立酋长国以及占领拉诺达两年之久为标志的。拉诺从那时起，虽然仍旧存在，但却从此丧失独立主权了。

在亚吉征服桑托洛的战争中，他得到万加拉/迪尤拉族大群穆斯林的支持；根据《卡诺编年史》(《*Kano Chronicle*》)记载，这些人正是在这个时期来到卡诺的。他们不仅加入他的军队协同作战，而且还为战役的胜利祈祷。桑托洛城终于被攻克，城中举行传统献祭的宗教中心遭到彻底摧毁。这次征服战确定了卡诺王国的疆界。

值得注意的是，《卡诺编年史》把统治阶级和黎民百姓之间的斗争——人民多次反抗 **272** 日益加剧的暴政，描写为穆斯林与传统宗教信奉者之间的冲突。[22]这显然是对权力集中过

---

[20] 阿拉伯文的《卡诺编年史》显然是 1890 年前后编写的，但它以较早的圣战前(*pre - djihād*)资料为根据，记述了豪萨 48 位“萨拉库纳”(*sarakuna*，国王)的情况，从巴加乌达到穆罕默德·贝洛(1807 年后富拉尼族)。英文译本《*Kano Chronicle*》：H. R. 帕尔默，1909 年，第 58 - 98 页；重印版，1928 年，第 3 卷，第 92 - 132 页(下面引文均引自该译本)。豪萨语译本：《*Tarihin Kano*》：R. M. 伊斯特(R. M. East)，1933 年。另有《巴加乌达颂歌》(《*Song of Bagauda*》)，编者不详，也列出卡诺国王的名单，见 *M.* 希斯基特(*M. Hiskett*)，1964 - 1965 年。

[21] *H. R.* 帕尔默，1928 年，第 3 卷，第 92 及以后诸页。

[22] 同上著作，第 102 和以后诸页。《卡诺编年史》还提到卡诺那时已有长喇叭和国歌，歌名为 *Zauna daidai Kano garinkine*，译为“坚毅不屈，卡诺是你们的城市”。同上著作，第 104 页。

程的新解释。卡诺的扩张目标指向南方；继桑托洛之后对南方又进行了多次战役，卡诺军队首先与夸拉拉法/朱昆族作战，但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局，夸拉拉法人拒绝归顺亚吉，只答应献出 100 名奴隶。

卡纳涅吉（公元 1390－1410 年在位）继续推行扩张政策，经过两次战役，他征服了扎扎乌，后者的国王在战斗中被杀。当时，与夸拉拉法人的关系看来是和睦的，卡诺以马匹换取奴隶。对外交往逐渐增加，“立飞迪”（*lifidi*，一种缝制的战马防护衣）、铁盔和铠甲在当时纷纷传入，即可作证。[28] 在达乌达（公元 1421－1438 年在位）统治时期，外来的影响，随着博尔努一位逃亡王子及其随从和大批“马兰”（*mallam*，伊斯兰教士兼学者）的到来而更加明显。除马匹、鼓、喇叭和旗帜等王室用物外，博尔努人同时还带来了较高水平的行政管理思想，从那时起，“加拉迪马”（*galadima*）“奇罗马”（*chiroma*）、“凯加马”（*kaigama*）等衔头开始在卡诺使用。

虽然战争和武装袭击在 15 世纪接连发生，但卡纳瓦人日益扩大的商业活动却显示出有更重大的发展。据说在 15 世纪 50 年代开辟了一条从博尔努通往格万贾（现在加纳的贡贾地区）的道路。从撒哈拉来的骆驼和食盐在豪萨地区已是常见之物；利润优厚的柯拉果贸易和阉人买卖也已开始出现。王国的日益繁荣昌盛以及统治阶级越发明显的伊斯兰化，吸引了大量穆斯林教士来到卡诺。15 世纪 50 年代，富拉尼人从马里来到豪萨地区，同时带来了一些“神学和语源学方面的书籍”（先前人们只知道一些法学书和口头传说的记载）；15 世纪末，又来了一批“里法”（*rif*，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和一位精力充沛的伊斯兰教士马格希利。[29] 另一方面，卡诺国王都不得不向博尔努进贡，并且卷入了对卡齐纳长达一世纪之久的战争。

《卡诺编年史》把许多重要的革新都说成是穆罕默德·鲁姆法（公元 1463－1499 年在位）的功绩。在他统治期间，城墙扩展了，修建了新的城门；选派宦官担任国家职务；创建卡诺的主要市场——库尔米市场；创立了一个由 9 位领导官员组成的类似于内阁的政务会议（*tara-ta-Kano*——“卡诺 9 人会议”）。有一些革新，表明穆罕默德·鲁姆法决心模仿博尔努的生活方式，甚至是马格里布的宫廷格调，如建造一座新王宫“鲁姆法宫”（*gidan rumfa*）、制作长喇叭和作为王室象征的鸵鸟毛扇、设立可住一千妻妾的与外界隔绝的后宫；当然，在拉马丹斋月（*'Īd al－fitr*）结束时还要举行盛大宴会。

273

在鲁姆法统治时期，与卡齐纳的战事爆发；这场战争延续了整整 11 年，双方都未能占上风。他的继承者阿卜杜拉希（公元 1499－1509 年在位）和穆罕默德·基索基（公元 1509－1565 年在位）继续推行他的政策，他们虽然没有对卡齐纳赢得多大胜利，但却战败了扎里亚。博尔努的日趋强大始终使豪萨地区笼罩着阴影，卡诺虽没有蒙受“萨尔基”（首领）在“马伊”（国王）面前屈膝的耻辱，但也不得不奋起保卫自己的领土。

---

[28] R. H. 帕尔默，1928 年，第 3 卷，第 107 页。

[29] 同上著作，第 111 页。关于马格希利此人及其作用，见本书第 290－291 页。

卡齐纳

总的说来，卡齐纳早期的历史资料要比卡诺少得多；[25]但它的历史几乎是和卡诺完全平行的，虽然有一段相当大的时间间隔。后来被人称为卡齐纳王国的那块地方，在13-14世纪时是若干个酋长国辖地，他们讲的都是豪萨语，其中以杜尔比-塔-库谢叶为最重要，正是杜尔比最后发展成为权力集中的卡齐纳城邦。穆罕默德·科拉乌这位萨尔基(1445-1495年在位)很可能是这个新王朝的创立者，从他开始，卡齐纳的历史才有了真正可靠的根据。科拉乌在杜尔比时，已发现了几条商道的一个汇合点，当时那里只有一座铁矿和一个名叫巴瓦达的神庙。他作为一个“萨尔基”，在该地建造了一座新的筑有城墙的城(“比拉涅” *birni*)，这座城就叫做卡齐纳。[26]

这个新的居民点很快就吸引了大量定居者和过往商人，从而使其统治者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和财富。附近一些酋长纷纷以铁条的形式向他纳贡，卡齐纳的“哈拉吉”(*haraji*)或人头税即由此开始。既然具有这样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基础，穆罕默德·科拉乌便四处向外出击，直到他为自己开拓一片疆土，建立卡齐纳王国。按传统说法，他是卡齐纳王国的第一位穆斯林统治者。[27]在他统治时，马格希利访问过这里；著名的戈巴拉乌大清真寺即建于这个时期，它以加奥和杰内的清真寺为模式，至今仍有部分遗迹留存。卡齐纳对豪萨地区以外的军事行动，和卡诺一样，都集中在王国以南。根据《卡齐纳编年史》 **274** (《*Katsina Chronicle*》)的记载，穆罕默德·科拉乌曾对努佩发动过战争，当时努佩与卡齐纳边界相连；[28]这场战争的起因很可能与努佩人和约鲁巴人之间的冲突相同，是新兴的努佩的扩张主义所引起。

在科拉乌的后继者中，易卜拉欣·苏拉(1493-1499年在位)被认为是个强迫臣民祈祷和囚禁抗命者的严厉统治者；他与埃及著名历史学家苏尤提(死于1505年)有过书信往来。承袭易卜拉欣王位的是阿里，他那漫长的统治时期包括16世纪最初的整整25年，他被称为“穆拉比特”(*murābit*)，这个称呼是为了纪念他把这座城市建成堡垒。[29]

扎扎乌

我们所掌握的扎扎乌早期历史的情况甚至比卡齐纳的更加模糊不清。史料实在有限，以致无法对该地的政治历史作出如实的重现，对仅有少量资料的解释又都是相互矛盾的。按照阿卜杜拉希·施米特的看法，豪萨人“在扎扎乌居住的时间要比该地区出现一个中

---

[25] H.R.帕尔默，1927年，发表了卡齐纳历代国王一览表；另见H.R.帕尔默，1928年，第3卷，78-82页。介绍卡齐纳历史的最新著作是Y.B.乌斯曼(Y.B.Usman)在扎里亚大学发表的博士论文。

[26] Y.B.乌斯曼这一考证否定了早年某些作者以为卡齐纳城是移居该地的万加拉人所建的说法；同上著作。

[27] H.F.C.阿卜杜拉希·施米特，1971年，第196-198页。

[28] H.R.帕尔默，1928年，第3卷，第79-80页；也见Y.B.乌斯曼，1972年，175-197页。

[29] 早期的卡齐纳年表相当混乱。参阅H.F.C.阿卜杜拉希·施米特，1961年；他利用一份阿利尤·卡亚吉瓦统治时期(H.R.帕尔默认定为1419-1431年)一次日蚀的资料，证明H.R.帕尔默把日期说早了100多年。

央政府早一千年，这政府最初建立在图伦库”。[30] 一些酋长从那里向外扩张，兼并毗邻的弱小部落，然后在现今扎里亚城的地方建立他们新指挥中心，时间约在15世纪末。

最近，M. 拉斯特对豪萨人在扎扎乌的统治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论点。他认为，早在1200年，那里就有一个王国，名叫坎库马(或称坎戈马，现在人们称之为宽戈马)，王国的统治者不是豪萨人而是卡穆库人。坎戈马这一联合酋长国，“继承的是诺克文化，经济则依靠金属制品贸易”。这一联合组织破裂后，“建立于图伦库的坎戈马王国(分裂过程中产生的)，16世纪时改名为泽格泽格”。到1641年，豪萨人才开始统治泽格泽格(扎扎乌)，并以扎里亚为国都。[31] M.拉斯特这种论点颇为大胆，但有其不足之处(主要是从语言角度讲)，在没有更具说服力的论据以前，只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

阿卜杜拉希·施米特对扎扎乌这一时期历史的说法比较令人满意，其情节大致如下：在15世纪之前不久，豪萨地区最靠南的扎扎乌平原上出现了几个中心城镇，又渐渐发展成为城邦式的行政管理体制。在政治演变过程中，其中两个城镇——图伦库和库菲纳，开始对其他城镇行使权力。起初，这两个城市都是独立的，直到15世纪末图伦库的统治者巴克瓦接管了库菲纳的权力。从此，扎扎乌国王同时统治着库菲纳和图伦库，并定居于库菲纳城东新建的首都，它以巴克瓦女儿扎里亚的名字命名(扎里亚公主和著名的阿米纳是同胞姐妹)。

275

随着图伦库和库菲纳这两个城邦的出现，扎扎乌王国实际上已经成形。从16世纪初开始，扎扎乌在西边和南边扩张领土。据历史传说，扎扎乌军队的几次出征，都由公主(*gimbiya*)阿米纳(巴克瓦的女儿)率领，她还修筑了宽阔的城墙以加强扎里亚和库菲纳的防御工事。在文学作品或非宫廷口头传说中，都从来没有提到阿米纳是扎扎乌的最高统治者。扎扎乌国王一览表中也未见到其名；她在世与死时都是一位公主，一位公认的有影响的公主，而从来不是女王。传说中把她描写成为出征远达扎扎乌西南边境以外努佩人居住地区以及东南远到夸拉拉法的一位勇士。《卡诺编年史》记载说，“努佩国王送给她〔这位公主〕40个阉人和10,000枚柯拉果。她是豪萨地区第一个拥有阉人和柯拉果的人。正是她那时代，各种西方产品纷纷传入了豪萨地区。”[32]

戈比尔

如果说扎扎乌是最南边的豪萨城邦，那么戈比尔则最靠北。戈比拉瓦人原来的老家还要更偏北一些，从阿加德兹一直延伸到包括阿伊尔山岳在内的地方。豪萨语称这块地方为阿兹宾(正确的读法应该是 Abzin)。至于戈比尔，则是指戈比拉瓦人组成的政治实

[30] H. F. C. 阿卜杜拉希·施米特，1970年(b)。

[31] M. 拉斯特(M. Last)；见M. 阿达穆编(即将出版，b)。

[32] H. R. 帕尔默，1928年，第3卷，第109页。按《卡诺编年史》记载，阿米纳与卡诺统治者达乌达(1421-1438年在位)是同时代人。现代不少学者都倾向于同意这个时间，例如 R. A. 阿代莱耶(R. A. Adeleye)，1971年；H. J. 费希尔(H. J. Fisher)，1977年。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她生活在16世纪，如 S. J. 霍格本(S. J. Hogben)和 A. H. 柯克-格林(A. H. Kirk-Greene)，1966年，第216-218页；他们断定她出生于1576年之后。H. F. C. 阿卜杜拉希·施米特，1970年(b)，则认为是16世纪初。这也是本章编者的观点。

体。[33] 戈比拉瓦人的一些部落群体，从 12 世纪起受图阿雷格人的压力而被迫南迁。其中一部分定居在平原上现在称为阿达尔的地区，并成为大家所知道的阿达拉瓦人。另外几个说豪萨语的部落群体，后来成为戈比拉瓦人，同样也向南迁移，在另一个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建立了戈比尔王国。大概在 1405 年之前的那段时间，该王国位于当今尼日尔共和国所在一带，中心在马兰达(?)；后来它进一步南移，曾一度定都于比尔宁－拉莱。《卡 276 诺编年史》提到阿布齐纳瓦人来到戈比尔的时间是在 15 世纪中叶，并且说食盐在豪萨地区成为常用物品也是从那时开始。[34]

由于缺乏成文的和口传的资料，我们无法如实重现比较完整的戈比尔历史，也无法判定最初在那里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全过程。既然我们手头上现有的国王名单上任何一种说法都没有什么价值，那么年代的划定也同样是不可能的。但是，马兰达在 9 世纪左右就已是穿越撒哈拉与加奥进行贸易的重要商业和工业中心，因此，戈比尔很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不断出现来自图阿雷格人的压力，但戈比拉瓦人在本章论述的这段时期和以后保卫豪萨地区北部边境的斗争中始终是胜利者。

拉诺

在论述豪萨诸国早期历史的大多数著作中，拉诺总被说成是早在这一千年之初就已出现的几个王国之一，只是后来被卡诺夺走了主权。然而，最近默里·拉斯特提醒大家注意如下事实：如果对《卡诺编年史》进行认真核查，人们就会发现，根本无从证明 15 世纪前存在一个拉诺王国。[35] 可是确有一个独立于卡诺的名为扎姆纳加巴(或扎姆纳科吉)的豪萨酋长国。根据《卡诺编年史》记载，正是卡诺的亚吉国王(1349－1385 年在位)将其酋长逐出了他的都城，后来继续向前推进，来到拉诺和巴布，他在那里住了两年。[36] M. 拉斯特认为，扎姆纳加巴在被征服之前是桑托洛政治体系的一个部分，这个政治体系在那时尚未附属于卡诺，只是到了亚吉统治的后期才被他征服。因此，似有必要重新考虑拉诺是否应该包括在早期的豪萨国家之中，并进一步分别研究卡诺与桑托洛和拉诺的关系。早期豪萨七国(*hausa bakwai*)名单中的拉诺或许应改换为扎姆纳加巴。[37]

赞法拉

只是到了 16 世纪初，赞法拉才能说是明确地作为一个国家出现。此前，它领土内几个主要的酋长领地是杜齐、托加伊、基亚瓦(或基阿瓦)和贾塔。很遗憾，现有资料没有一个能够说明中央集权政体最初在这里发展的情况，但看来较早就有人经管的地方正是 277

[33] 根据一些口头传说，所有豪萨人都来自阿伊尔山岳；见 D. 哈马尼(D. Hamani)，1975 年。
[34] 《卡诺编年史》，见 H. R. 帕尔默，1928 年，第 3 卷，第iii页。
[35] M.拉斯特，《卡诺情况研究》(《*Kano Studies*》)，1979 年，第 13－15 页。
[36] H. R. 帕尔默，1928 年，第 3 卷，第 104 页。
[37] 扎姆纳科吉这名称的意义也值得进一步研究，它在《道乌拉史编年史》(《*Daura Chronicle*》)中是以卡诺缔造者的名字提出来的；同上著作，第 134 页。

冶炼铁矿的那些地区以及一些具有宗教意义的山丘所在地。[38] 权力集中过程是从杜齐的统治者开始的，他们把其他一些酋长领地置于他们的控制下。把比尔宁-赞法拉建成为永久都城估计是在 16 世纪初，因在该世纪中叶，赞法拉已开始南征；一次又一次的出征，使他们进到了尼日尔河流域的雅武里，虽然他们并没有长期占领这个地方。在 1600 年以前，赞法拉统治者所最关心的是巩固他们在自己国内的权力。[39]

凯比

虽然豪萨地区最西端的凯比很早就居住着讲豪萨语的居民，但当地的口头传说却并未把这里的人们归在豪萨七国(*hausa bakwai*)之中，而是把他们列入“七个卑贱者之国”(*banza bakwai*)的范畴。按照 M. 穆罕默德·贝洛的说法，“凯比人是卡齐纳人母系和桑海人父系的后代。”[40]

凯比之见诸于历史是在这块地方开始受桑海人统治的时期，那时桑海的统治者是松尼·阿里大帝(1464-1492 年在位)。当时，里马河下游受号称“马加吉”(*magaji*，胜利者)的氏族领袖们所控制。但此后不久，就有人开始从其他豪萨地区迁移到这里来。移民中有一位从卡齐纳南部库亚姆巴纳迁来的人物，名叫穆罕默杜·坎塔。此人以高超的军事才能很快就使当地的“马加吉”们黯然失色，从而自己成为桑海所属凯比省的实际统治者。[41] 他一度加入桑海军队，担任队长(*barde*)职务，而且参加了抗击阿加德兹素丹的胜利战役，缴获了大量战利品。但由于坎塔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那份胜利果实，他和他的追随者脱离了桑海帝国，并被宣布为反叛者。这是 1516 年的事；后来他和桑海进行了一连串的战争，前后延续达数年之久，在此期间，坎塔一直保持自己的独立。[42]

以后坎塔建都苏拉姆，鼓励小村子合并成为市镇，并在这些市镇周围筑起城墙，以利防御。他亲自将 9 个独立的居民点合成比尔宁-莱卡，后来又建立了另一个城镇，这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比尔宁-凯比，建造此城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可用以对抗桑海的基地。[43]

278

在坎塔用上述办法加强他的防御体系之后，他就把注意力转向国外。他占领了阿伊尔/阿加德兹，从桑海人手中夺取了对该地区的控制权。M. 穆罕默德·贝洛还说他征服了整个豪萨地区和博尔努部分地区；[44] 另外一些资料则谈到他曾入侵南方的雅武里和努

---

[38] N. 加尔巴(N. Garba)，1977 年。

[39] K. 克里格(K. Krieger)，1959 年。

[40] M. 穆罕默德·贝洛(M. Muhammad Bello)，英文译本，1922 年，第 13 页。把凯比排除在“豪萨七国”之外，可能是根据以下事实：在 16 世纪，凯比王国是桑海的一个同盟者，并曾派兵讨伐其他豪萨人国家，因此，这些豪萨国家都把凯比看作一个敌国。

[41] M.B. 阿尔卡利(M. B. Alkali)于 1969 年写的一篇未曾出版的论文叙述了凯比早年的历史，其中包括坎塔此人的兴衰史。

[42] 萨迪，前引著作，第 129-130 页。

[43] M. B. 阿尔卡利，前引著作，第 55 和以后诸页。

[44] M. 穆罕默德·贝洛，前引著作，第 13-14 页。

佩。[45]看来，坎塔并没有建立任何行政机构以使他所征服的地区与宗主省合成一体。他满足于附庸国向他纳贡并承认凯比的霸主地位。[46]

凯比在16世纪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强国，在豪萨地区和尼日尔河流域之间起到了一种缓冲作用。一个新兴强国的出现使博尔努王国感到惊恐，因此千方百计想要压制它，并企图入侵坎塔统治下的豪萨诸国；但博尔努的军队却被击溃了。坎塔1556年从一次出征博尔努西部胜利归来后便去世了。他死后，豪萨诸国就不再给凯比纳贡，并重新宣告独立，坎塔的长子和继位者艾哈迈杜也没有用武力强迫他们重新归附。到16世纪末，由于卡诺和卡齐纳插手支持与凯比为敌的一个权力要求者，对阿加德兹的宗主权也就不再牢固掌握在凯比统治者的手里。凯比，于是从一个"帝国"下降为一个地区性王国，它在豪萨地区至高无上的地位便完全丧失了。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1200－1600年肯定是豪萨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他们凭借筑有城墙的城镇在6个国家中建立了集权政府，这些城邦同时也就成了重要的商业中心。其中有几个国家甚至开始在豪萨地区内外实行扩张和攻击其他民族。

豪萨与邻族间的关系

当然，豪萨人并不是居住在中苏丹的唯一民族。中苏丹是一片辽阔的疆土，东起乍得湖，西迄尼日尔河流域，北靠萨赫勒，南到贝努埃河流域。豪萨人在这片幅员广阔的疆土内开展了与其他族群的多方接触交往。道拉传说——关于豪萨人起源的故事——列举了豪萨人在公元1500年即已与之有联系的近邻非豪萨各族。虽然 *banza bakwai*（"七个卑贱者之国"）有几种不同的名单，其中也包括讲豪萨语的社会（诸如凯比和赞法拉），**279** 但主要的代表者是朱昆、夸拉拉法、瓜里、约鲁巴、努佩和雅武里。值得指出的是，所有名单都没有提到两个更大更重要的邻国——加奈姆－博尔努和桑海，虽然它们在豪萨地区的影响早就应该受到重视。

豪萨人通常习惯于用巴雷巴里人（或贝里贝里人）称呼加奈姆－博尔努帝国的各族人民。以至早于近代之前，加嫩布人、卡努里人、舒瓦阿拉伯人、博勒瓦人、恩吉津人这类名称在豪萨地区很少有人知晓。在巴雷巴里人中，能够左右博尔努与豪萨关系的社会阶层——统治者、商人和穆斯林教士——大多都是卡努里血统，卡努里文化的某些特点因而被认为是巴雷巴里人文化的典型。[47]

在豪萨的历史中，它与加奈姆－博尔努的关系意义重大，因为许多重要的文化内容和一些新的思想都来自该国，而这些外来的东西后来都成了豪萨文化和文明的组成部分。豪萨人和卡努里人的接触交往开始于后者尚居住在加奈姆的时候；但自从他们定居到乍得湖西南的博尔努之后，这种交往就具有了新的深度和广度。[48]

---

[45] R. M. 伊斯特，1933年，第1卷。
[46] R. A. 阿代莱耶，前引著作，第564页。
[47] Y. B. 乌斯曼，前引著作，第185－197页。
[48] 参阅 M. 阿达穆，1979年；加奈姆－博尔努的历史在本书第10章中已有所探讨。

到15世纪下半叶，在经历了长期延续不断的冲突之后，博尔努王国重新得到了稳定。这次稳定是与在乍得以西恩加扎古穆建成筑有城墙的永久性都城密切相关的，它又是博尔努政权后来往西向豪萨地区扩张的基地。[49] 大约在1425年，博尔努的一个被废黜的统治者乌斯曼·卡尔纳马携同他的一群随从来到卡诺寻求避难；此人在达乌达(1421－1438年在位)和阿卜杜拉希·布尔贾(1438－1452年在位)的统治时期起了重要的作用。博尔努的马伊(*mai*，国王)不能忽视来自豪萨地区的威胁，他强迫卡诺和豪萨地区其他地方归顺于他，许多城镇不得不向博尔努称臣纳贡。大约与此同时，卡齐纳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博尔努的附属国，必须每年向恩加扎古穆进贡100名奴隶。[50] 至于整个豪萨地区从属于博尔努的程度以及为时多久，则尚不清楚。M. G. 史密斯的看法是，起初只有比拉姆和卡诺是博尔努的臣属，因为卡诺是紧靠博尔努的首要豪萨国家，自然首先受到卡努里人的注意。[51] 另一方面，根据《索科托地方报》(Sokoto Provincial Gazetteer)的说法，"雅 **280** 武里年年都给它的直接统治者扎里亚进贡，这就等于在给博尔努进贡。其他豪萨国家则向道拉进贡，作为向博尔努进贡"。[52]

博尔努在本章所述的这段时期对豪萨地区的宗主权的性质及其各个方面均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讨。然而，肯定无疑的是，博尔努的影响从那段时候开始越来越大，它主要是通过卡诺这条渠道来实现，这种影响加快了豪萨地区文化的发展。

16世纪时，凯比作为中苏丹最好战的国家崛起，结果导致它与博尔努统治者之间长期的争斗。穆罕默杜·坎塔在这一斗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他的主要目的是想控制几条穿越撒哈拉商道通向豪萨的重要枢纽阿伊尔(阿加德兹)。现在很难清楚判断豪萨诸国卷入这一权力之争的深度，但坎塔看来最低限度是要把他的宗主权强加于其中几个城邦，并以此消除博尔努的政治监护权。

与豪萨地区接壤的另一个强国是桑海帝国。中苏丹桑海之前的霸主马里在豪萨人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起过任何政治作用，虽然它在文化方面的影响——主要通过万加拉商人和教士的活动——在很早时期就可以强烈感觉到。[53]

直到最近，大多数历史学家一直认为，桑海帝国强有力的统治者阿斯基亚穆罕默德(1492－1528年在位)在16世纪初年征服过豪萨地区的所有地方，并把他的统治强加于卡诺、卡齐纳、戈比尔、赞法拉和扎扎乌。按照这一论断，豪萨地区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成了桑海和博尔努两大帝国长期争斗的场所，虽然一个独立王国凯比的出现，削弱了桑海自公元1515年以来对豪萨地区的直接控制。但正如H. J. 费希尔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叙述桑海入侵和占领的唯一资料是摩洛哥的阿拉伯旅行家利奥·阿非利加努斯写的报道，他声称自己在1510至1513年期间访问过西苏丹某些地区。[54]

[49] H. F. C. 阿卜杜拉希·施米特，1971年，第182页。
[50] 《卡诺编年史》，见H. R. 帕尔默，1928年，第3卷，第109－110页和第83页。
[51] M. G. 史密斯(M. G. Smith)，1964年(a)。
[52] 引自同上著作。
[53] 桑海在豪萨诸国的编年史中常常写成"Melle"，意思是"西边的帝国"。
[54] H. J. 费希尔，1978年。

无可否认，利奥·阿非利加努斯对桑海的入侵描写得非常生动，对豪萨诸国统治者的命运、他们沉重的贡金和他们的联姻关系都提供了详尽的报道。[58]另一方面，豪萨诸国的编年史中，对这些情况却都只字未提。然而，这些情况对豪萨地区的政治历史至关重要，决不是撰史人有意隐瞒一场可耻灾难所能一略而过的，因为《卡诺编年史》一再提到卡诺的国王(*sarkin kano*)曾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被诸如卡齐纳、扎里亚或夸拉拉法等较为弱小的国家所战败。如下事实甚至更为重要，即廷巴克图的编年史中虽从桑海的观点出发叙述了此事，但却没有提到传说中他们喜爱的那位英雄阿斯基亚穆罕默德的胜利战役。它们只简单扼要地提到1514年，也就是在利奥·阿非利加努斯访问之后不久的一次进击卡齐纳的小规模远征。[59] 现在看来，也许更有可能的是桑海从来没有征服过豪萨地区，那里的国家也从来没有受到过桑海的统治。 **281**

朱昆人目前仍居住在豪萨地区东南的贝努埃河中游一带；他们现在人数不多，但过去在尼日利亚中部和北部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对邻族有过长期的影响。

按照一般大家接受的观点，朱昆人是从东北边迁到他们现在定居的地方来的。一些口头传说中都提到他们的来处，但所说各异，有的说是尼罗河流域和科尔多凡地区，有的则认为远在阿拉伯半岛或也门。有一个传说称，朱昆人是与卡努里人同时来到的。[60]虽然这些古代传说不足为凭，但朱昆人确有可能是从东北边穿过曼达拉高地和乍得湖之间地区而来的。但是，语言学上的证据却显示，朱昆语与蒂夫语、伊比比奥语、埃菲克语以及大部分克罗斯河语言，同属于贝努埃-刚果支系；这显示朱昆人原居南方，但也还不能排除他们是从北方和东北向南大迁移最后一批潮涌而来者。

现已有两种论点，认为尼日利亚地区是朱昆人最早建立政权的地方。第一种论点认为，流传下来的豪萨语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朱昆人所建立的夸拉拉法帝国是在贝努埃河中游南岸。[61]夸拉拉法这座城市的遗迹至今仍清晰可见。在豪萨语中，夸拉拉法这名称，本来就是指朱昆人、他们的首都和王国。[62]18世纪末该城被废弃，[63]武卡里城才在它原址的不远处兴起。所以，朱昆人是从贝努埃河流域南部向北扩张到贡戈拉河谷，然后进入卡萨尔-奇基地区的。[64]这次自南向北扩张的日期尚未考证确定，但肯定是在夸拉拉法城遭到废弃以前。早期豪萨人和朱昆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贝努埃河流域南部地区开始建立的。朱昆语起源于贝努埃河以南，尔后才向北扩散。[65]卡萨尔-奇基地区各城镇的口头传 **282**

---

[58] 利奥·阿非利加努斯，第2卷，第473和以后诸页。

[59] 马哈茂德·卡蒂，前引著作，第77、147页；萨迪，前引著作，第78、129页。

[60] C. K. 米克，1931年(a)，第xv页。

[61] 同上。

[62] "夸拉拉法"是由"科罗罗-阿法"(*kororo - afa*)一词演变而来，意思是"盐民"，因为朱昆人居住的地区以产盐著名。参阅W. B. 贝基(W. B. Baikie)，1856年，第455页。"科罗罗法"一词，或称"科罗罗法瓦"，在文献中是泛指贝努埃河流域各族居民，并非专指朱昆人。见T. L. 霍奇金(T. L. Hodgkin)，1975年，第31页。

[63] 关于夸拉拉法城邦的衰落和遭到废弃，见C. K. 米克，1931年(a)，第32和以后诸页；M. 阿达穆，1978年，第38-43页。

[64] 卡萨尔-奇基地区是如今尼日利亚高原州地势较低的部分，包括瓦塞(朗唐)、申达姆、阿韦这几个地方政区。在豪萨语中，卡萨尔-奇基的意思是"中间地区"；词源尚未经过考证。

[65] K. 希穆祖(K. Shimuzu)，1971年，有关朱昆语的论文(未发表)。

说也证实，朱昆人的政权始建于南部地区，他们是南方(夸拉拉法、武卡里)来的朱昆移民的后代。

第二种论点认为：朱昆人最初组织自己的政权、开始建立军队、与豪萨人进行贸易，都是在贝努埃河以北的贡戈拉河谷和贝努埃河上游地区。在此之后，朱昆人才逐步在贝努埃河以南地区建立统治，只是现在还没有文件资料可以证明其统治年代和统治方式。[63]

这两种意见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朱昆人看来确是有过贝努埃河南岸和贡戈拉河谷两个政治中心。现在还不清楚，什么原因使贝努埃河南岸这一中心在政治上压倒了朱昆人居住的其他地区。从贡戈拉河谷对豪萨各国发动的进攻，可能是奉阿库(aku)之命行事——"阿库"是以南方(现已废弃的夸拉拉法城)为基地的朱昆人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64]由于豪萨人和卡努里人用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共同的敌人(卡努里人称之为"夸纳"，豪萨人则称之为"夸拉拉法")，M. 里亚德据此认为有两个朱昆人国家，一个(夸纳)在北边，与博尔努接壤，另一个更靠南，与豪萨关系较为密切。这两个国家形成的时间不同，靠南的一个，按《卡诺编年史》的说法，在 14 世纪时即已存在。[65]

遗憾的是，朱昆人既没有用书面文字写历史，也没有在"击鼓唱书"中留下他们的历史事迹。[66]如今朱昆人的绝大多数(除平迪加族是例外)，都不再记得过去祖先经历过的 **283** 许多争战尚武的事迹。然而，各种不同资料都明确提到，朱昆人在公元 1200－1600 年间即已定居于贝努埃河中游一带和贡戈拉河谷。很可能，他们在 16 世纪就开始向卡萨尔－奇基地区扩张。到本章所探讨的这段时期，他们已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国家在公元 1600 年达到了它军事力量的顶峰。朱昆人在早先历史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也可由如下事实来证明，现在有一些族群或是声称自己是朱昆人的后代，或是直接或通过伊加拉人继承了朱昆文化的许多方面。所谓伊加拉人，除了他们自身，还包括伊多马人、安奎人、蒙托尔人、伊格比拉人以及其他一些族人。[67]

至于努佩人，则是在中苏丹的最南端。无论从语言角度或是根据口头传说，两者都表明，最早的意义重大的联系都是与南方而不是与北方。然而，努佩人的住地，由于其地理位置，必然会成为北方热带草原和南方森林地带之间的纽带以及南北两方势力的聚合点。一切迹象都表明，努佩人是在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汇合处附近他们目前居住的地方上生土长的。

[63] H. F. C. 阿卜杜拉希·施米特支持第二种论点，见 H. F. C. 施米特，1971 年；新近又见 S. 阿布巴卡尔(S. Abubakar)，1980 年，第 168 和以后诸页。

[64] 阿库(*aku*)拥有宗教权威。人们认为，他受命于天，神人相通。参阅 M. W. 扬(M. W. Young)，1966 年。

[65] M. 里亚德(M. Riad)，1960 年，第 483 和以后诸页。

[66] 鼓手和歌手是西非洲许多村社口头传说的传播者。历史记述资料通常都以诗歌和传闻的形式留存下来，由传统史诗吟唱者("格里奥"，*griot*)家庭父子代代相传。这些资料大都与政治历史相关，因为只有国王和酋长才有可能护养这种史诗吟唱者。他们的史诗通常是在庆典仪式上传颂的。在豪萨各国就有击鼓唱书者，不过这些史诗迄今尚未经过系统的收集整理。大多数史学家是从宫廷侍臣和穆斯林教士兼学者("马兰" *mallam*)那里得到这类传说的，同时也利用书面资料。

[67] 关于这些论点的细节，见 O. S. M. 坦普尔(O. S. M. Temple)，1922 年；C. K. 米克，1931 年(a)。

即使是佐埃德——“那位开拓文化的英雄人物和努佩王国神话般创建者”[68]的事迹，也仅仅只谈到一个努佩中央政府的出现而没有涉及努佩民族的起源。[69]在佐埃德（他的另一个名字叫埃德吉，特别是豪萨人都这样称呼他）掌权之前，努佩人分5个部落群体或5个氏族：埃贝族、贝尼（或比尼）族、埃巴吉族、巴塔西（或巴塔契）族和迪博族（或齐塔科族，在豪萨人中也称加纳－加纳族）。这五个氏族结成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即所谓的贝尼联盟。有资料证明，在佐埃德之前已经有过若干个国王，其中几个还有姓名可查。但M.D.梅森对此却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佐埃德只不过是导致建立一个超氏族国家的一连串事件的人格化而已。”[70]这是一个革命时期，“佐埃德”不仅促成了以贝尼联盟为代表的努佩定居民的统一，而且也促成了居住在河流两岸的“河流上人”克德族以及其他许多部落群体（其中有已经被同化的约鲁巴、瓜里、卡努里或伊加拉移民）的大统一。

许多人认为佐埃德在16世纪初达到了他权力的顶盛时期，但这时间并非十分准确。虽则现在还无法将这样的国家结构纳入任何确切的年代框框，但豪萨语资料中对努佩人 **284** 的许多说法，其年代应当退回到15世纪，有些事件还可能和贝尼联盟有关。所以，应当说努佩人从那世纪起，已经是一个迅速扩大的族群，其人数猛增，原因在于鼓励开拓新的定居点，接着又把来自约鲁巴、伊加拉（后者据说是随佐埃德而来）和博尔努的移民以及瓜里人和某些坎巴里人同化了。在文化上，15－16世纪代表了一个以牺牲许多小族群对本地文化的忠贞，创造出一个整体努佩人文化的时期。“佐埃德传说”则是这一发展的核心。这期间，努佩国王相继与邻国，特别是与豪萨各城邦建立了外交和经济关系。

这时期与豪萨人有来往的另外一个群体是包奇的居民；“包奇这地名是豪萨语中用来指豪萨正南地区——卡萨申－包奇的。这地区包括如今的包奇州、高原州、卡杜纳州南部、尼日尔州北部和索科托州南部（祖鲁和雅武里）。[71]有不少民族现在都把这块地方看作是他们的故乡，除了坎巴里人以外，全都是小族群。[72]他们的传说——坎巴里人又是例外——都自认为是从豪萨地区或是从博尔努来的。

要想如实地说出豪萨人在16世纪以前与包奇各族人民之间逐步发展起来的关系是困难的，因为历史资料实在太少。主要的趋向似乎是豪萨人源源不断地迁移到包奇地区来，许多人冒险南迁是出于贸易和军事目的；也有一些人是为避难而去。[73]除了士兵，绝大多数迁来卡萨申－包奇地区的人都就地定居，不再返回。有些移民仍保持自己原来的语言；另一些人的后代则与此相反，他们在语言上被当地人（坎巴里人、贡加瓦人、达卡拉瓦人、瓜里人、卡穆库人，或瓦尔贾瓦人）所同化。另一方面，包奇又是卡诺和扎扎乌捕捉奴隶的地方，所以又有大批当地人进入豪萨地区。

居住在包奇的各族人中似乎只有坎巴里人和卡穆库人在16世纪以前曾建立过某种集权政府。雅武里的政治历史表明，自豪萨人开始来该地定居之后，直到14世纪末，他

---

[68] S. F. 纳德尔（S. F. Nadel），1942年，第72页。
[69] M. D. 梅森（M. D. Mason），1970－1971年，第32－33页。
[70] 同上。
[71] 关于包奇一词的传统用法，简要的探讨可参阅M. 阿达穆，1978年，第23页。
[72] 参阅C. K. 米克，1925年；O. S. M. 坦普尔，前引著作。
[73] M. 阿达穆，1978年，第39－40页。

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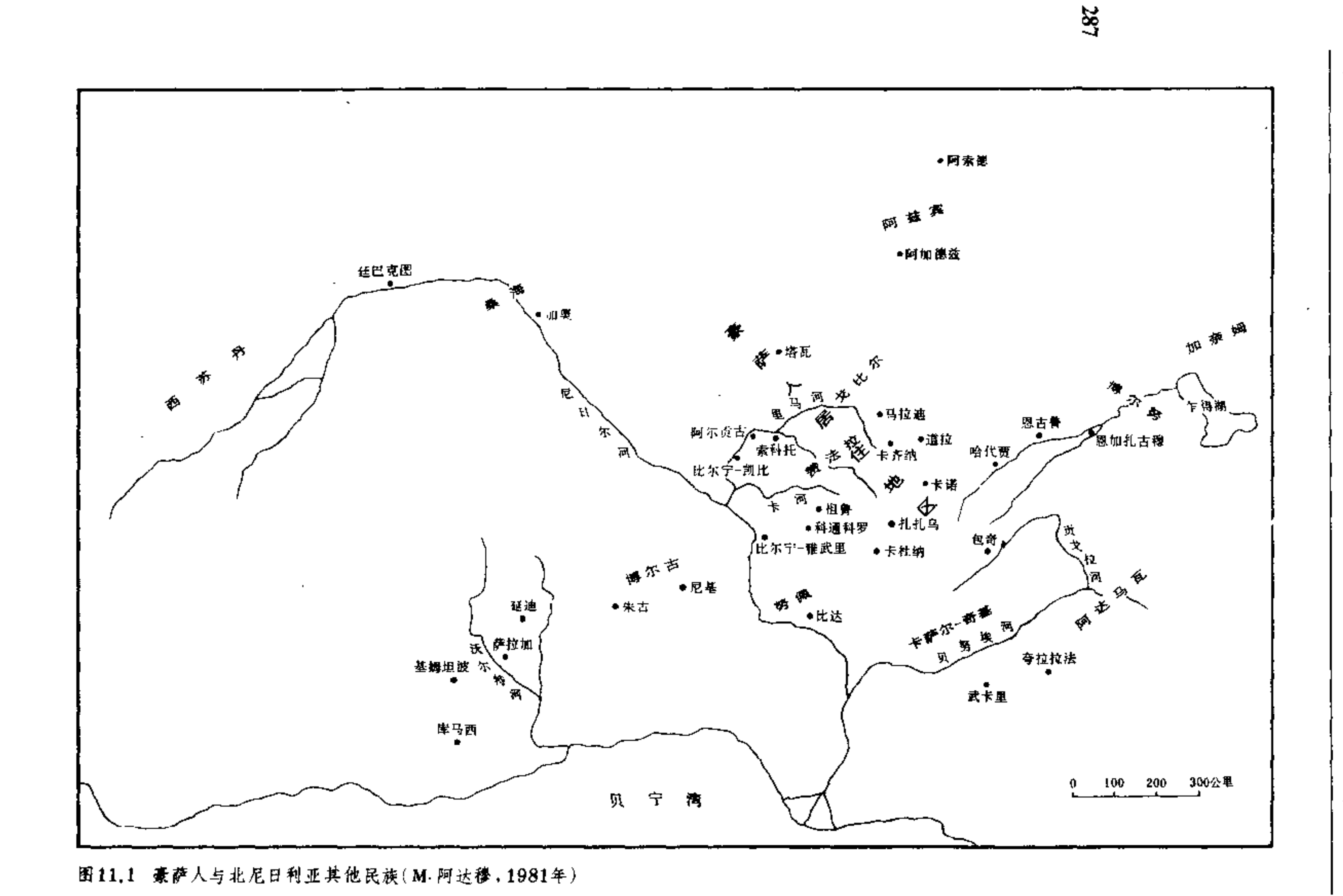


图11.1 豪萨人与北尼日利亚其他民族（M. 阿达穆，1981年）

285

们发现了坎巴里人的马金加酋长国，接管了它的权力，以后就一直对它实行统治。因此很可能在1200年时，马金加已经作为坎巴里人的一个王国存在。由于缺乏材料，很难判断它在如此早的时候与豪萨诸国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14世纪时在雅武里实行统治的最早的豪萨人是从卡齐纳来定居的商人。[74]

至于卡穆库人，他们或许就是马克里齐(死于公元1442年)在《苏丹的人种》(*al-Khbar an adjnas al-Sūdān*)一书中提到的名叫卡鲁库的那个民族，他们建立的国家也就是坎库马(宽戈马或坎戈马)王国。[75] 现在还难以肯定，这王国(据说卡穆库人是那里的统治民族)是否在公元1200年即已存在，是否就是M.拉斯特所说的扎里亚王国的前身。[76]但是，马克里齐确有根据地指出，卡穆库人早在14世纪或15世纪就有了某种形式的政治组织。

豪萨地区的几大进展

外来移民

这个时期的几大进展，其一是许多民族和部落群体在不同的时间出于不同的目的，大规模移民到豪萨地区来。这些移民的原居住地，北边是萨赫勒，东边是博尔努，西边是马里和桑海帝国。移民的种类包括牧民、渔民、务农者、零售商和贸易商，也有穆斯林教士和学者(豪萨语称之为“马兰”，*mallam*)也还有一些贵族。

最初迁来的牧人是富拉尼/富尔贝人，接着是图阿雷格人。对于中苏丹富拉尼人的早年历史虽已有过许多叙述，但有关他们的迁居情况却没有一致公认的史料，只是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他们是从西边迁来的。然而，具体年代以及他们经由的路线仍不清楚。按照优素福·乌斯曼的看法，富拉尼人最初是在卡齐纳之王贾布达亚基(大约1405-1455年在位)统治时期来到卡齐纳的。[77]就在这个时期之后不久，《卡诺编年史》有如下一段话谈及他们的迁入：

> 在雅库布统治时期(1452-1463年在位)，富拉尼人纷纷来到豪萨地区，他们带来了不少神学和词源学的书籍。从前，我们的博士除了《古兰经》外，只掌握一些法学书和有关历史传说的书籍。富拉尼人到博尔努去路过这里，把少数人留在豪萨地区，同时留下的还有若干奴隶和一些忍受不住路途劳累的人。[78]

286

从这段引文中，虽可看出这些富拉尼人有一部分是穆斯林教士，但绝大多数迁入者却都是游牧民，他们保持着自己的传统宗教信仰，他们来豪萨是为他们的牛、绵羊和山羊寻找新的和更好的牧场。现在还难以确有把握地说，究竟有多少富拉尼人在这段时间

---

[74] 参阅M.阿达穆(即将出版，a)第2章。
[75] 参阅H.R.帕尔默，1928年，第2卷，第6页上的英文译文。
[76] M.拉斯特，见M.阿达穆编(即将出版，b)。
[77] Y.B.乌斯曼，1979年(b)。
[78] H.R.帕尔默，1928年，第3卷，第111页。

里来到今天的北部尼日利亚，但看来他们的人数并不很多。这段时间里在豪萨地区可以见到有富拉尼人的地方是卡诺中部、卡齐纳北部和里马河流域（部分属赞法拉，部分属凯比）。至于穆斯林教士则大多数住在豪萨城市中心，他们在那里主要是传播伊斯兰教，尤其是在卡诺和卡齐纳。

图阿雷格人于14世纪后期，当他们开始与戈比尔的豪萨人交战之际，经由阿兹宾进入豪萨地区。前文已经提及，他们后来把戈比尔的豪萨人统治者逐出了阿兹宾地区，并于1495年在阿加德兹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素丹国。[79]由于图阿雷格人是游牧民族，所以对占领土地和进行殖民并不感到很大兴趣；他们最关切的是用他们的畜产品换取农产品，同时还对阿兹宾以南的村社定居点进行袭击。进入豪萨地区的图阿雷格人的有些部落群体继续向南渗透，寻求牧场，但只是到后来，迁徙的规模才变得越来越大。

人们从博尔努向豪萨地区的迁移很可能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但只是从15世纪起才有文字材料可供考证。[80]除《卡诺编年史》中提到的一些博尔努逃亡贵族，还有许多人，特别是商人和学者持续不断地向豪萨迁移。[81]他们定居在豪萨地区的各个角落，但主要是在卡诺、卡齐纳和扎里亚。[82]然而，公元1600年以前进入的移民在数量上远不如后来多。早期来自博尔努的移民中，无从证明有手艺人在内，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另一批向豪萨地区潮涌而来的移民是万加拉人－迪尤拉人。因为他们的到来与伊斯兰教的传入该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时间上又尚有争论，所以暂且留待后文再行探讨。在最初的潮涌而来者之后——姑且不论这是发生在14世纪还是在15世纪，接踵而来的是一群群万加拉人，特别是些商人。他们中一部分人定居在卡齐纳－莱卡的扬多托和库亚姆巴纳，另一部分则居住在扎扎乌的几个中心城市，当然，也还有许多人迁到卡诺。[83]来到中苏丹的万加拉人很快就溶入豪萨人的社会体制，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丧失对自己的经济活动的控制，所以在一段时间内，他们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84]

288

从西边来的另一批移民是桑海的渔民，他们来到里马河下游，在那里定居下来继续从事他们的老行当。在抵达那里之后，他们掌握了有关渔具和捕鱼方法的一种较高水平的技术。[85]他们也种植一些农作物。他们像其他外来部落一样，后来也都完全抛弃了原有的桑海文化而成了豪萨人，因此逐渐开辟了可以称之为豪萨地区西疆的领土。

被认为迁移到这里的最后一类移民是从北非洲和廷巴克图地区来的阿拉伯和柏柏尔商人和学者。他们于15世纪后半叶大致与富拉尼人同时开始来到豪萨地区；容纳他们的

---

[79] J. O. 亨威克（J.O. Hunwick），1971年(b)，第218－222页。

[80] M. 阿达穆，1979年。

[81] H. R. 帕尔默，1928年，第3卷，第109页。

[82] Y. B. 乌斯曼，1972年；M. 拉斯特；均见M. 阿达穆编（即将出版，b）。

[83] Y. B. 乌斯曼，1979年(b)；M. 拉斯特；均见M. 阿达穆，同上。

[84] 这种社会适应性的最显著方面是到了豪萨之后放弃使用 *nisbas*（或氏族）名称，这就是为什么像卡马拉、西塞、特拉奥雷或瓦塔拉这样一些名称在豪萨地区不再流行的缘故。豪萨语成了万加拉人唯一的交际语言，至少在公共场合是如此。

[85] 参阅M. B. 阿尔卡利，前引著作，第49页，但A. 奥吉埃（A. Augie）在他专门阐述1804年索科托"圣战"以前里马河流域历史的博士论文中对此提出了异议（未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主要地区还是卡诺和卡齐纳，特别是卡诺成了吸引远方来的穆斯林学者的一块磁石。人们这样地大量涌入既与豪萨诸国日益繁荣兴旺，又与有更多的部落和城市居民阶层接受伊斯兰教有密切关系。

向外迁徙

一方面豪萨地区从不同方向大量接纳外来移民，另一方面它的土地上也以相等数量流失掉原有居民。外流的大多数人是流向西和南去的。[86] 人们由豪萨地区向其南面接壤地区迁徙看来是一个延续时间很长的过程，但没有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保留下来。豪萨人大批向南迁徙的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事例都与卡诺、卡齐纳和扎里亚的统治者所率领的军事远征有关。在 14 世纪，居住在今日包奇和贡戈拉一带的非豪萨语族人，诸如库达瓦人、瓦尔贾瓦人、夸拉拉法人和朱昆人，都遭到豪萨诸国军队的袭击。15－16 世纪时，豪萨人的远征不仅更加频繁，而且形式也更加多样。[87] 遭受袭击的地区包括若干高原地带，即如今的扎里亚南部和雅武里地区。有几次远征带来长期围困以及为扫荡而长期驻守之类耗费年月的军事行动。据《卡诺编年史》的记载，豪萨人中大量非军事人员背井离乡随军出征；他们买卖货物给士兵，为士兵发放薪饷。[88] 由于这些人有许多再也没有回到豪萨，因此那些军事远征起着向外移民和扩大豪萨领土的作用。

289

另外两类外迁者是商人和穆斯林教士。14 世纪下半叶从卡齐纳南部来的库亚姆巴纳人就是这样在雅武里建立豪萨人统治的。[89] 按《卡诺编年史》所说，15 世纪初，博尔努也接收了从卡诺来的一些移居者。[90] 豪萨人的外移虽然开始于这个时期，但他们成群地散居在西非洲各地则是 16 世纪之后的事了。

伊斯兰教的传播

伊斯兰教起初是如何传入豪萨地区的，这仍是学术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不少学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卡诺编年史》中的说法，认为伊斯兰教首先是由万加拉人于 14 世纪中期传入豪萨地区的，他们在卡诺国王亚吉（1349－1385 年在位）统治时期从马里移居这里。虽然第一个用豪萨语写的涉及伊斯兰教的文字资料这样说，但伊斯兰教传入豪萨的时间可能比这要早得多。首先，伊斯兰教自 11 世纪起就已存在于加奈姆－博尔努；[91] 而豪萨人在 14 世纪以前长时期内一直延续不断地与该国保持接触，这也是公认的事实。[92]

---

[86] 关于这类外流的详细叙述，见 M. 阿达穆，1978 年，第 3 和第 5－7 章。
[87] 同上，第 24－25 页。
[88] H. R. 帕尔默，1928 年，第 3 卷，第 110 页。
[89] 参阅 M. 阿达穆，1979 年。
[90] H. R. 帕尔默，1928 年，第 3 卷，第 108 页。
[91] H. F. C. 阿卜杜拉希·施米特，1976 年，第 165－166 页（未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92] M. 阿达穆，1979 年。

因此，如果说伊斯兰教在 14 世纪之前那段时间竟然没有传入豪萨地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据语言情况判断，从很早时起，在卡诺就已有了来自加奈姆－博尔努的伊斯兰影响。与宗教有关的许多阿拉伯语词汇都是以卡努里语为中介纳入豪萨语的，由此足以证明，伊斯兰教从东面传入豪萨的时间要比西面早。[93]

其次，新近在卡诺收集到的一些口头传说表明，伊斯兰教在万加拉人到来之前早已存在于卡诺。[94]第三，从费赞到加奥的商道（9 世纪即已开通）经过戈比尔王国的领土，那里的马兰达城当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商业中心，因此北非洲穆斯林商人在 14 世纪以前很有可能已经把伊斯兰教传入了戈比尔。第四，虽然这不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但人们现在都同意如下事实：甚至在亚吉国王统治时期前，卡诺已有许多人使用了诸如达乌德（巴加乌达的别名）、迈达瓦基、阿卜杜拉希、扎卡尔、萨尔马塔或乌斯曼之类伊斯兰名字。[95]

最近发现和出版的一件阿拉伯文献、注明时间为 1650－1651 年的《万加拉编年史》（*Asl al－Wangariyīn*），并没有就伊斯兰教最初传入豪萨地区的问题作出任何明确说明，尽管人们一度对它抱有很大希望。该文献详细叙述了万加拉穆斯林在卡诺国王鲁姆法（大约 1463－1499 年在位）统治时期来到卡诺的情形，并且确定这与著名学者马格希利的到来是同一时间。A. 哈吉·姆贝耶由此得出结论说，万加拉伊斯兰传教士们来到卡诺的时间是 15 世纪末，《卡诺编年史》中所说的时间（14 世纪）应予否定。[96]但十分清楚的是，《万加拉编年史》将实际上相距一个多世纪的两件事强联在一起，都确定在鲁姆法国王统治时期了。[97]由于《万加拉编年史》经过多次修订，并存有着许多内在矛盾，所以它记述的某些内容只能批判接受。[98]因此，我们还不如承认《卡诺编年史》所认定的万加拉人于 14 世纪迁来此地的说法。然而，不论真正正确的是哪一个时日，伊斯兰教传入豪萨地区的时间总归要早得多，或者是经由阿伊尔和戈比尔，更可能是借道加奈姆－博尔努。同时也不能排除西面（从马里和桑海）来的穆斯林商人，他们在万加拉人到来之前已在豪萨商人和豪萨上层统治阶层中积极传播伊斯兰教；其中有许多伊斯兰教学者和传教士，后来帮助建立了一个比较强大而更具普遍性的伊斯兰传统。

另一方面，伊斯兰教虽于 14 世纪以前已在豪萨传播，但它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侨居商人、少数本地商人和上层统治阶层的宗教；民众仍多半信奉他们原有的宗教。但是，到 15 世纪，似乎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教传统，特别是在卡诺和卡齐纳。这一趋向不仅为万加拉的学者，同时也为富拉尼的穆斯林教士所加强，他们带来了许多新的神学书籍和法学书籍。

正是从这时候起我们才有了在豪萨地区积极活动的许多外来穆斯林学者所写的材料，其中最著名和最重要的无疑就是马格希利。他来自撒哈拉的图瓦特。[99]他以一位学者、

[93] J. H. 格林伯格，1960 年。
[94] J. 帕登（J. Paden），1973 年，第 48 和以后诸页。
[95] 《卡诺编年史》，见 H. R. 帕尔默，1928 年，第 3 卷，第 99－100 页和 103－104 页。
[96] A. 哈吉·姆贝耶（A. al－Haji Mbaye），1968 年，第 7－16 页。
[97] 参阅 H. J. 费希尔，1977 年，第 296 页。
[98] 参阅E. 萨阿德（E. Sa 'ad），1979 年，第 52－56 页。
[99]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德·卡里姆·马格希利（Muhammad ibn 'Abd al-Karim al-Maghili），有关他的情况，见A.A.巴特兰（A.A.Batran），1973 年，第 381-394 页。

辩论家和犹太人的迫害者早年在马格里布的经历而闻名，在15世纪90年代周游了阿加德兹、塔凯达、卡诺、卡齐纳和加奥。他在豪萨地区所起作用相当重要，即使他在卡齐纳所做的工作人们知道得并不十分清楚，而有关资料又有些矛盾。根据某些报道，马格希利曾亲自使那里的"萨尔基"(*sarki*，国王)改变宗教信仰；[100]另外一些资料则强调，普通百姓比统治阶级更乐于接受马格希利所传播的伊斯兰教教义。马格希利有一个学生名叫穆罕默德·塔扎赫蒂(死于1529/1530年)，他是廷巴克图的一位学者，曾去麦加朝圣，之后在卡齐纳当上了卡迪(*kādī*，伊斯兰执法官)。

马格希利在卡诺时写了一篇论述"君主职责"的文章，目的显然是引导卡诺国王穆罕默德·鲁姆法作为一个穆斯林君主执掌朝政。[101]他1491－1492年去卡诺访问前不久，与这位国王通过一次信，信中提出他本人对理想政府的设想。[102]很难断定，穆罕默德·鲁姆法对马格希利的进言和忠告接受到什么程度，因为现有的证据是矛盾的。《卡诺编年史》中所提到的某些"革新"似乎与马格希利宣传的伊斯兰教原则相一致，而另一些则与之相违。[103]《豪萨编年史》(《*Hausa Chronicle*》)指责鲁姆法的"欺诈行为"，也指责他背离伊斯兰教原则和推行伊斯兰教法所禁止的习俗。[104]

在卡诺推广伊斯兰教传统和生活方式的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他们中应当特别提到的有廷巴克图的艾哈迈德·伊本·乌玛尔·阿基特。他是著名的艾哈迈德·巴巴的前辈，访问过卡诺，并且在1487年左右到那里讲过学。1504年和1518－1519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历史学家伊本·加齐的学生、摩洛哥的阿卜德·拉赫曼·苏卡因从埃及来卡诺讲学；他的同事马赫鲁弗·巴尔巴利(1534年之后去世)，也曾在卡诺和卡齐纳积极从事教育事业。正如J. O. 亨威克所指出，"这些学者的教学活动看来可以表明卡诺已经成为一个伊斯兰城市了；它的'信仰转化'以砍倒圣树为标志，《卡诺编年史》和万加拉史料都认为这是穆罕默德·鲁姆法统治时期(1466－1499年在位)发生的事件"。[105]

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也传入其他豪萨国家。在扎里亚，15世纪后期在位的国王穆罕 292 默德·拉博在传说中一贯被认为是那里的第一位穆斯林统治者；[106]在凯比，第一位统治者穆罕默杜·坎塔(大约1516－1554年在位)和他属下的某些酋长，据说都皈依伊斯兰教。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坎塔原是穆罕默德一世阿斯基亚麾下的一位军事首领，这位阿斯基亚是十分虔诚的教徒，因此坎塔必然也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他的好几个后继者用的

---

[100] 穆罕默德·科拉乌大概与卡诺国王鲁姆法同时代，据说他是卡齐纳第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统治者。由于卡齐纳历史中的年代排列不很精确，所以仍不清楚在马格希利访问该国时究竟那里的统治者是谁。见H. F. C. 阿卜杜拉希·施米特，1961年，第7页。

[101] 见T. H. 鲍德温(T. H. Baldwin)的英文译本，1932年。

[102] 见H. R. 帕尔默的英文译本，1913－1914年。

[103] 参阅前文第272－273页。

[104] 《豪萨编年史》(*Hausa Chronicle*)，英文译本；R. S. 拉特雷(R. S. Rattray)，1913年，第1卷，第10-16页。

[105] J. O. 亨威克，1971年(b)，第216和以后诸页。

[106] H. F. C. 阿卜杜拉希·施米特，1971年，第196－198页。

都是穆斯林名字，这样，至少保持了一层伊斯兰面纱，虽然大多数凯巴瓦人此后很长时间仍一直信奉他们的传统宗教。至于豪萨地区其他一些地方，有关这一时期转信伊斯兰教的史料我们几乎没有掌握。在雅武里，我们只能猜测公元1600年以前已经存在一些小规模的穆斯林群体，这是由于经营柯拉果的商人往返博尔努和贡贾途中都在此停留，而穆斯林商人在他们经商的路上肯定会传播伊斯兰教，并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也肯定会建立小侨居地。[107]

总之，这时期该地区的伊斯兰化主要是局限于上层统治阶级和商人之中，仅限于伊斯兰教已有很大影响的一些城市和大中心。即便如此，大部分所谓的穆斯林也仅仅是半心半意地忠于伊斯兰教，他们仍旧相信还有其他神灵，在圣岩上和圣树下，他们仍向诸神祷告。

可以说伊斯兰教已混同在非洲原来的宗教格局中，它没有被看成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或是与豪萨人宗教观相抵触的信仰。更重要的是，穆斯林社会在这时期还没有要使它的宗教意识具有排外性，而是准备兼收并容各种传统宗教信仰或宗教习俗。这大体上就是多数土著皈依者和他们后代的一般态度。一方面，侨居学者和他们的学生形成一个精英集团，力图严格推行伊斯兰法；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却长期坚信传统宗教、巫术和魔法。只要伊斯兰教士不要求改变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旧模式，那么，至少是新的宗教不至于遭到抵制。

在政治领域里，伊斯兰教通过不断削弱以控制礼拜场地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结构，借此促进豪萨诸国中央集权化的过程。在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之前，小型酋长部落中的政治控制权总是与酋长执行宗教仪式之权紧密相联的。《卡诺编年史》是按伊斯兰观点写成的，其中有许多关于土著酋长反对卡诺统治者权力集中意图的记述，这些酋长都被说成是"异教徒"，而卡诺的统治者则被看作是真正的穆斯林。征服了这些酋长部落之后，随即卡诺统治者就有意地大规模破坏许多重要的传统礼拜场所，目的是要使酋长们丧失他们权力的主要依据。在卡诺，桑托洛是国王亚吉（1349－1385年在位）统治时期摧毁的最后一个古老礼拜场所。

传播伊斯兰教的另一个结果是，伊斯兰学者和教士从非洲各个角落大量涌入豪萨地区。这促进了新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观念在豪萨的推广和读写能力的提高，这里指的是阿拉伯语的读写能力以及后来用阿雅密字体（the ajami system）读写豪萨语的能力。[108]这又反过来推动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以及各种商业和商务的改进。最后，并非不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的传入和传播把豪萨地区和一个巨大的和不断发展的文化地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组织

尽管地域有所不同，豪萨人的政治组织，无论是最初形成阶段还是后来发展时期，全都遵循类似的模式，以相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为基础，所用语言也一样。同时，从14世

[107] S. A. 巴洛贡(S. A. Balogun)，1980年，第216页。

[108] 然而，应当指出，迄今尚未发现公元1600年以前阿雅密字体(*ajami*)的豪萨手稿。

纪以来产生于豪萨诸国的行政管理体制都明显受到加奈姆-博尔努的影响,许多制度和职务都是从那里套用来的,有时甚至冠以卡努里或加嫩布名称。事实上,博尔努长期以来一直是高文明和高文化的典型,它的影响通过来自乍得湖地区的移民逐步扩大开来。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博尔努的统治者多次远征和入侵豪萨诸国,而后者也须对之纳贡,但豪萨人从未把博尔努视为敌国(对桑海、凯比或夸拉拉法则情况完全相反),人们似乎默认博尔努的优越地位是顺乎自然的。另一方面,政治结构和行政管理机构,除最高层以外,其他各层次都按原来样式,从当地实际情况产生出来。

在整个国家,由家族集团("吉达杰",*gidaje*,单数为*gida*)组成小村社("考尤卡",*kauyuka*,单数为*kauye*),分属于村社头人("迈加里",*maigari*)管辖。这些村社,实际上是由一些经常迁移的小农舍构成的村落。上一层次是村庄("加鲁鲁瓦",*garuruwa*,单数为 *gari*),规模要大一些,而且是固定的。各个村庄都有一位村长(*sarkin gari* 或 *magajin gari*),在他之下有时还有几个小区首领(*masu - unguwa*,单数为 *mai - unguwa*)协助其工作。这种结构的顶点是地区首府(*birane*,单数为 *birni*),它并非由地区首领(*sarkin birni*,豪萨语中没有这种职称),而是由国家首领(*sarkin kasa*)统治. **294** 国家首领的权力自然延伸到所有各个层次的首领的头上。

在作为新型政治权力中心的首府(*birane*)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似乎有几个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中首先是豪萨地区农作物和手艺技术的多样化;其次是长途贸易的日益扩展,特别是在15世纪以后;最后是城市都筑有城墙,给各个城邦的人民和土地提供了保护,在战争时期也给邻近的农村人口提供避难所。虽然这些首府的居民由于从事贸易而具有四海为家的性格,但它们的建立似乎步子十分缓慢。[109]

萨尔基(或国王)居于国家之上,其权力是绝对的。至少从理论上说,他本人的身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王国的命运与他共存。一般情况下,他是从统治世系中挑选出来的,虽然父位子继已是惯例,但我们必须重视《卡诺编年史》注明了历代国王母亲的名字,这可能是母系制的残迹。萨尔基与几个高官分享权力,这几个高官有的是本世系中的人,也有的是原先统治世系中的人而现在已成为世袭的显要贵族。在这类显贵之中,有几人由君王指定为政务会议成员。在戈比尔,这种会议称为"戈比尔九人会议"(*tara ta Gobir*),一旦国王去世,由该会议决定继位人。[110]卡诺政务会议的组成与权限完全一样,称为 *tara ta Kano*,即"卡诺九人会议"。这一类的政务会议可以使人联想到加奈姆-博尔努古老的塞富瓦帝国的十二人会议。[111]

我们已经知道,卡诺国王鲁姆法创先例委派奴隶(甚至阉人)担任国家要职,由他们掌管国库、领导城市卫队和宫廷卫队,并负责与自由民的官员联络;他们还执掌诸如管理后宫之类宫廷内务。[112]国家官员中职位最高、最举足轻重的是"加拉迪马"

---

[109] 参阅 H. F. C. 阿卜杜拉希·施米特,1971年,187-191页;根据传说,卡诺城邦真正建成至少用了整整200年时间。

[110] 盖伊·尼古拉斯,前引著作,第207页。

[111] 参阅O. S. M. 坦普尔,前引著作,第467页;Y. 于尔瓦(Y. Urvoy),1949年,第37-42页。

[112] 《卡诺编年史》,见 H. R. 帕尔默,1928年,第3卷,第112页。

(*galadima*)，也即有权处理所有国家大事的首相或首席大臣。[113]这官职有时被预定的继承人所占据，有许多实例说明，国王往往成为权势很大的加拉迪马手中的傀儡。在加拉迪马之下，有一大群官员和权贵，他们各人负责管辖一个特定地区或一处地方，大到一个省、小到几个村子。

295 由于缺乏资料，现在还无法如实描绘出豪萨行政管理体制发展的实际过程。大约自1350年起，正如M. G. 史密斯所指出，有许多因素，诸如伊斯兰教，特别是奴隶问题(对他们的捕捉、把他们当进贡物和输出物、他们的居住地、让他们当官员，以及阉人和侍妾)，在中央集权的(有时是独裁的)政府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14]任命奴隶担任高级官职，可解释为要削弱豪门的地位和使统治者本人进一步获得更大权力而采取的一种新步骤。鲁姆法国王的几项"革新"——掠取妇女和财富，有权要臣民从事强迫劳动——表明王室特权的加强，同时也表明社会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

经济发展

对豪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在力量可以作这样的归纳说明。首先，这个地区拥有丰富而分布均匀的铁矿石矿藏。这不仅已经由《卡诺编年史》在谈及卡诺本地时指出，而且也为其他地方的考古研究证实。[115]所有矿藏似乎都靠近林木茂密的地区，那里有大量的木材和木炭可供冶炼矿石之用，而矿藏又都是在我们所涉及的这段时期开采和冶炼的。达拉山地的铁，无疑是吸引人们来卡诺定居的重要因素。

第二，几乎整个豪萨地区的土壤都十分富饶肥沃。伊本·巴图塔、利奥·阿非利加努斯等人(他们访问过豪萨地区许多地方)早期提供的资料，以及后来人们各种研究所得都强调指出，农业是所有豪萨各国最重要的经济活动。

第三，虽然我们无法得到豪萨地区人口密度的具体统计资料，但根据豪萨诸国村庄和城镇数量之多，可以有理由得出结论，当时该地区的人口并不稀少。人口的分布也相当均匀，因为城邦并非集中在豪萨地区某一部分。

第四，豪萨地区的地理位置，北面介于萨赫勒和撒哈拉之间，南面介于热带大草原和热带大森林之间，因此自然成为这些地区交流产品的枢纽。由于有这些有利条件，豪296萨地区就有可能在相当早的历史时期发展各种手工业和长途贸易。然而要如实描绘出豪萨地区从这一千年之初起的经济史，我们还需作更多的研究。

尽管总的印象是豪萨人全民都热衷于从事商业，但实际上每个豪萨人首先是农民，农业是这个地区经济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门。土地属于村社——农民聚居点、村庄或城镇，其头人监督土地的使用。土地从来不出售，耕种者享有土地收获权。经村社头人许可，外来者可以获得和耕种土地。后来，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形成，萨尔基才有可能和有权力将土地分给任何人，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农夫("塔拉卡" *talakawa*，单数为

[113] 这职位是从博尔努引进的，但在博尔努，这是称呼西部(最靠近豪萨地区的几个省)的省长的。

[114] M. G. 史密斯，1964年(a)和1964年(b)。

[115] 关于扎扎乌的制铁业，见J. E. G. 萨顿，1976和1979年。关于戈比尔的情况，见D. 格雷贝纳特(D. Grebenart)即将发表的著作。

talaka)的农事活动都听从一个领班——*sarkin poma*(农耕长)的指挥，他负责严密注视雨季洪水和向地方诸神献祭乞求丰收。

这期间，有三种农庄在豪萨地区得到发展：第一种是 *gandum sarkin*，即王家田庄，其特点是规模非常宏大；第二种是 *gandum gide*，即家族农田，通常称作戈纳(*gona*，也即一般田地的统称)；最后一种叫 *gayauna*或 *gayamma*，即个人田地。[116]奴隶劳动在王家田庄和一些高官显贵的大片田地上起着重要作用。在卡诺国王阿卜杜拉希·布尔贾(1438－1452 年在位)的统治下，卡诺及其周围地区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奴隶，这些奴隶绝大多数都从事农业。据说布尔贾国王的“加拉迪马”(首相)建造了 21 座城镇，每座城镇中安置有 1000 个奴隶。虽然《卡诺编年史》没有提到他们从事何种职业，但我们可以断定，他们都是被驱使去耕种新占领的土地。

豪萨地区谷物种类很多，其中包括各个品种的小米、高粱、直长马唐、稻米(特别是在凯比和西部地区)以及其他多种粮食作物。尤为重要的是经济作物的种植，主要是棉花和槐蓝，特别是在卡诺国。[117]

手工业在 14 世纪前的豪萨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仅次于农业。由于劳动分工和生产的专业化，产品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纺织品居首要地位，很早就已开始纺织棉布。纺织的各道工序(轧花、梳棉、纺纱、染色和织布)都是在当地完成的。豪萨的制革匠和鞋匠制作了许多产品，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皮包、鞋类、马鞍和垫子，他们将这些产品销往苏丹各地和北非洲的市场。[118] 297

冶炼业是久已存在的行业，铁匠在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人物。铸铁是经过在豪萨语中叫做 *marmara* 的鼓风炉中熔化大量的含铁砾石生产出来的。锻工(卡诺的锻工声望很高)锻造出村社所需的各种器具，如炊具、农具、刀子、斧子、箭头、长矛等。制陶业也是一种多面技术的行业，制作供储存各种流体和谷物所用的大部分容器。

大多数手工行业都由行会统一管理，每个行会有一个由国王指派的领导人，也偶尔根据行会的提名，其主要任务是向手艺人收缴应征税收。他们也负责监督人员入会、生产方法、质量标准和产品价格等事项。

豪萨人做买卖的场所是集贸市场(*kasuwa*)，在经商已成为城市居民最重要的活动之后，集贸市场还起着另外一些作用，如作为“社交生活的好地方、会议的会场、寻找亲朋好友和接待外方人士的约定碰头地点。”[119]主管市场的人叫做 *sarkin kasuwa*，他与他的助手一起负责维持市场秩序、调解买卖双方的纠纷，同时也代表国王收税，税金可用金钱支付，也可用实物缴纳。

商人阶级很早就分成若干类。豪萨人将集市或就地贸易与批发贸易区别开来，前者

[116] 有时，*gayamma*这词专用来指分给妇女的田地，她们耕种和自由处置自己的劳动果实。

[117] “在该省(卡诺)种有多种谷物和水稻，还有棉花”。译自利奥·阿非利加努斯著作的法文本，前引著作，第 476 页。

[118] 利奥·阿非利加努斯在谈到戈比尔的情况时说：“他们中有人制造像以前罗马人穿的那种鞋子，这些鞋子出口到廷巴克图和加奥去”。译自法文本，同上著作，第 477 和以后诸页。

[119] M. 阿达穆，1979 年，第 1 页。

在豪萨语中叫做“西尼基”(*ciniki*)，出售农产品和小规模的手工业产品，而且主要是生产者自己经营的。批发贸易，在豪萨语中叫“法陶西”(*fatauci*)，大都掌握在叫做“法塔克”(*fatake*，单数为 *farke* 或 *falke*)的职业商人手中，他们从事长途贩运。介于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种叫做“扬科利”(*yan koli*，单数为 *dan koli*)的市场倒卖商，这种商人在某一市场买进便宜货，然后再到另一市场上去出售，或者零售从“法陶西”贩运来的货物。“西尼基”是由那些基本上不远离家乡的所谓“扬·卡苏瓦”(*yan kasuwa*，单数为 *dan kasuwa*)经营的。在这三大类中，还可分出像肉商和粮商之类的专业商人。

在所有豪萨人的市场上都有一种特殊行当，那就是掮客(“迪拉利”，*dillali*，复数为 *dillalai*)。掮客熟悉各个市场的商情，能够预知市场供求和价格的起伏，并根据所掌握的情况进行各种投机活动。由于他从中出力，须在售价中付给他一定数目的佣金。

298 虽然贸易市场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交易往往在场外进行：举例而言，手艺人的作坊总是在自己家里，顾客们往往直接去那里买货。另外，有些货品(多数是进口品)总是送到上层人士的府邸或宫廷中去，因为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不宜出入市场购货。豪萨人经营商业的另一个特点是妇女的作用，不论已婚或未婚，她们在市场附近经销食品或者出售棉布。

很少资料提及商业经营中所使用的通货，由此可以判断，在那个时代，地区贸易以物物交换为主。所以，主要的通货是布匹(豪萨语叫做 *sawaye*)、食盐和奴隶。至于玛瑙贝(豪萨语叫 *farin kudi*，或白色钱币)，它们何时传入豪萨地区则不得而知；西边，在马里和桑海，玛瑙贝作为货币流通为时已久，但它们传入加奈姆－博尔努却要晚得多，大概迟至19世纪。直到最近，人们都认为玛瑙贝在豪萨地区流通始于18世纪，[130]但新近出版的一份16世纪时的材料提到，在卡齐纳“人们使用海里很白很白的贝壳作为钱币购买小物品，就像在所有黑人中一样，黄金则由于贵重而用以换取由商人贩运来的大宗货物”。[131]

由于豪萨地区中央集权政府体制发展缓慢，长途贸易网扩大到这地区要比其西方邻国(马里和桑海)和东方邻国(加奈姆－博尔努)晚些。但是，一旦豪萨人有了必备前提条件，他们就充分利用他们国家有利的地理位置所提供的良好机会。万加拉人无疑是豪萨地区长途贸易的先驱，但他们的作用似乎被某些学者多少给夸大了。[132]实际上，北非洲人、图阿雷格人、卡努里人以及其他族人也都参与这种贸易。15世纪看来是豪萨经济转折的开端，从那时起，豪萨人开始经商，他们接管了几条商道，特别是通往南方的那几条。[133]同样重要却又是相互竞争的两个城市卡诺和卡齐纳的出现与长途贸易的兴起和豪萨商人踊跃参加长途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豪萨人的贸易靠着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和各国所需的多种产品，很快就向四面八方扩大开来。一般说来，主要的贸易是沿着早期的北－南轴线

[130] M. 约翰逊(M. Johnson)，1970年，第33页。
[131] D. 兰格(D. Lange)和S. 伯绍德(S. Berthoud)，1972年，第335页。
[132] 举例而言，见P. E. 洛夫乔伊(P. E. Lovejoy)，1978年。
[133] 并不排除进一步研究还会发现还可能存在豪萨人通往东方去的商道。

进行的。向东西两侧扩展则是以后几个世纪的事。

豪萨贸易中的主要商品，按其产地可分类如下：299

（1） 豪萨本地产品：包括棉布、兽皮和皮革、供应撒哈拉沙漠绿洲的农产品（主要是小米）、麝猫香、鸵鸟羽毛，可能还有树胶。

（2） 北非洲的产品和部分欧洲产品：包括金属器皿、武器、马匹、珠串、玻璃器皿和某些华贵织物。

（3） 撒哈拉的矿产品：包括塔凯达（阿泽利克）矿山的锡条，但主要是比尔马和撒哈拉其他地方的几个盐矿的盐和泡碱。盐业的主要中心是阿加德兹和戈比尔。[18]

（4） （a） 奴隶主要是从豪萨以南地区输入，他们或是袭击的受害者，或是毗邻诸国的贡物。他们起着多种多样的作用，可充当货币和货物，可充当家仆、士兵和卫兵，又可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动。他们中有的被留在豪萨地区；有的则被贩卖到非洲其他各地，主要是卖到马格里布去。[19]

（b） 来自南边的第二种主要商品是柯拉果。出产柯拉果的主要中心地是贡贾和格万贾，在今加纳北部。从豪萨地区通往贡贾的主要路线要经过扎里亚和博尔古。

有关当时长途贸易究竟是怎样具体组织的问题，迄今仍缺乏资料。就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所能说的仅仅只是：北非洲商人在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中占有压倒优势，而南方以及部分东－西贸易则掌握在豪萨商人手中。需要考虑到的一个更为关键的事实是，某些豪萨城市，特别是卡诺和卡齐纳，在穿流不息的南北贸易往来中起着集散地的作用，因为它们是撒哈拉商道的两个终点站。豪萨诸国的统治阶级显然趁机利用这繁荣的贸易以自肥，他们的兴旺发达反映在15世纪以后宫廷财政的富裕充足上。穆罕默德·鲁姆法国王正是利用了这种商业繁荣，才能着手制订全面计划和实施前面所说的一系列行政、政治和宗教的改革。

到16世纪末，在桑海帝国衰亡后，通往西方的商道变得不可靠，桑海和阿伊尔之间的关系因此而中断。另一方面，豪萨地区与北方之间的贸易却日益欣欣向荣，尤其是因为穿越撒哈拉的商队终点站卡齐纳，与过去相比，更进一步成为豪萨地区和整个中苏丹的经济支柱。300

[18] 豪萨语词汇中有50多个表示不同品种食盐的名词，这表明食盐在贸易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19] 豪萨人把奴隶区分为两类：一类叫“巴夷”（*bayi*），他们是被捕捉或是买来的，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另一类叫库塞纳瓦（*cucenawa*），即第二代，其地位略优于第一类奴隶，类似于农奴。关于奴隶制度，见A. G. B. 费希尔（A. G. B. Fisher）和H. J. 费希尔，1970年。

12 沿海地区各族居民：从卡萨芒斯河到科特迪瓦礁湖区

Y. 佩尔松*

地 区 概 貌

301 “几内亚”一词指从冈比亚河河口到尼日尔河三角洲的非洲西海岸地区。当时，这与“埃塞俄比亚”、“黑人国家”是同义词，广泛用于最早的葡萄牙航海者对该地区的记述之中。上几内亚包括自冈比亚河河口至邦达马河口这块地方。这一段海岸及其内地不是阿拉伯旅游者和作家们感兴趣的地区；不过，从加纳帝国时期起，在热带大草原和这些森林覆盖地区之间，可能已经有贸易往来。这里虽不是密林或赤道森林地带，但其自然环境与热带大草原截然不同。该地区的特点之一是居民分成许多族群，起源各不相同。

随着曼丁哥人势力的增长，自苏丹地区迁来的移民前队，向南深入到了柯拉果、黄金、奴隶和食盐之乡。到15世纪，原来除沿海捕鱼和本地贸易外别无所有的大西洋海滨，突然间变得不再是死水一潭。相反，它成了与欧洲交往的“第二战线”，对美洲的奴隶贸易很快便成为这里压倒一切的贸易活动。从此以后，上几内亚的历史形成了一个新格局。这时，两股历史潮流互相交缠，虽然他们还没有真正合为一体。在形成这种格局的历史过程中，各土著民族都力图继续按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竭力保持他们本身的特点和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以曼丁哥文化为其主要源泉之一的苏丹、萨赫勒文明，是从8－9世纪以后由各个土著农民社会逐渐形成的。这些土著农民社会面临着许多难题，他们必需对付因北非洲皈依伊斯兰教而重新组织的穿越撒哈拉贸易的新局面。长途贸易网已遍及整个苏丹地区，

304 经营这种贸易最为众所周知的是马林克商人。早在12世纪，这一贸易网就已组织得相当完善，以至能把容易腐烂的柯拉果输到北非洲去。

就其后期情况判断，我们可以根据已有材料，认为这一贸易网当时已经扩大到了森林地带边缘，那里的交易是通过中间商人进行的。但在森林深处，生产者是以血亲关系组织行会进行转运，他们把货物从一个部落群体传到另一个部落群体，没有专职的商人。这无疑是柯拉果贸易进行的方式。它同样也是马拉古埃塔胡椒14－15世纪上市销售的方式；虽然这种胡椒只产于利比里亚南部，但它通过苏丹地区和马格里布，远销到欧洲（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后来，葡萄牙人将这项贸易转移到了沿海地区。

* Y. 佩尔松（Y. Person）教授已于1982年去世，本章是他的遗著。

从1450到1500年的短时期内，沿该海岸线航行的航海者们详细记载了当地居民的情况，这对我们的研究大有帮助。一般说，沿海一带地势低洼，沼泽地较多，有很多适宜种植水稻的泥泞地区。许多条河流发源于富塔高原，流经数百公里后注入海洋，灌溉着这片土地。大海在这些沿海居民的生活中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农民。不过，他们中有些人从事短途的海上贸易，参与采盐业，把提炼出来的食盐卖给内陆居民。

但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货物主要属于地区性的贸易，却又都是长途贩运的。一当穆斯林势力开辟了撒哈拉商路，就必须加以调整，以适应与外部世界进行大宗贸易的需要。就我们所知，后一种贸易是以在苏丹地区寻找黄金为基础的。因为自古以来，地中海世界就一直苦于缺乏这种贵重金属。奴隶和象牙则是仅次于黄金的最重要商品

黄金与上几内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是因为主要的采金地位于这地区之外，或者在塞内加尔河和尼日尔河流域的班布古和布雷等地，或者在东部沃尔特河流域的洛比和阿肯，只有如今几内亚共和国境内佩雷地区不太重要的格尔泽金矿在上几内亚境内，而且我们无从证明这些金矿在早先已被开采。

一当"发现"上几内亚和开辟了"第二战线"之后，葡萄牙人马上就为国际间强烈需求的这些产品吸引住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黄金；这里虽不产黄金，但人们要运金块，如果不走北路而要从海边出口，还非得经过这里不可。可是，我们将在下文看到，黄金的这种重要地位很快就被奴隶贸易淹没了。

上几内亚各国的发展情况

该地区的概貌已经简述如上，我们还得先对整整5个世纪中该地区各族人民和文化的情况有所了解。虽说是作个简单的介绍，却也有困难，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要追溯到比大多数口头传说更远的年代，文献记载的只是其中最后一个世纪的情况，考古研究或许有一天能回答我们现在探索的问题，但它目前尚在起始阶段。因此，我们不得不运用考证方法，根据人类学和语言学的资料来进行研究。 306

从卡萨芒斯河到卡库利马山

在上几内亚北部靠近塞内冈比亚的卡萨芒斯河与卡谢乌河交错汇合的地区，居住着巴兰特人、迪尤拉人和费卢普人。这些人专种水稻，都组成自治的村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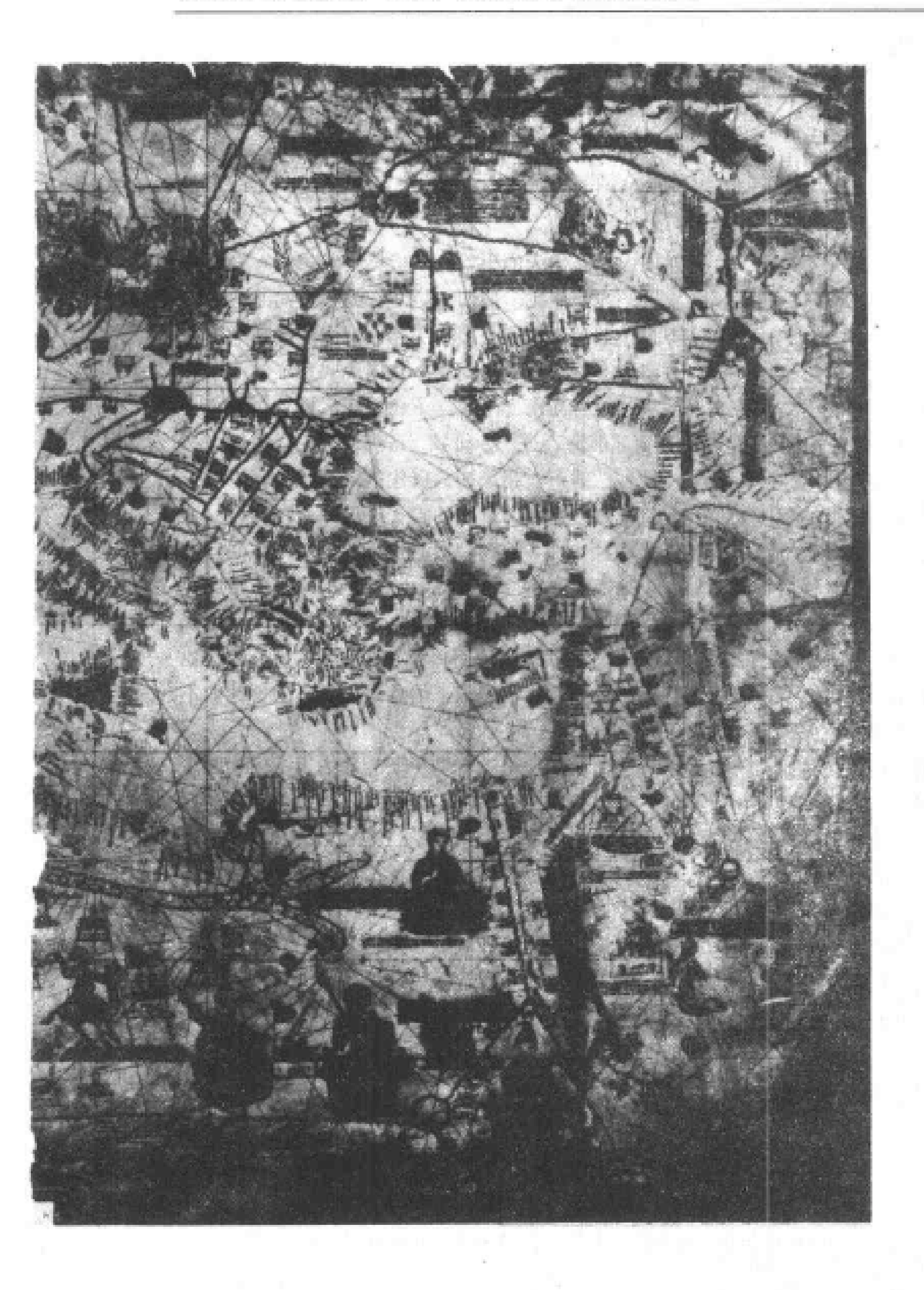
在这地区，拜努克人（葡萄牙学者称之为班洪人）也可能是自治的。直到16世纪中叶，曼德的曼萨(马里的皇帝)才把权力扩大到这沿海一带[1]。再往南则是比亚法达人(自称为迪尤拉人）和科科里人（或称兰杜马人），都组成独立的酋长领地。他们在15世纪中叶迅速扩展到了海边。在那一带、他们与比贾戈人发生了冲突；后者居住在筑垒的岛屿上，在殖民时期之前，一直利用海上优势袭击并企图控制大陆。比贾戈人已能建造可

[1] V.费尔南德斯（V.Fernandes)，法文译本，1951年，第83-89页。

302



图片12.1 梅西亚·德·维拉德斯特的地图，1413年（羊皮纸上的手绘彩图）



载90至120人的大船。

进一步深入内地，从上冈比亚到富塔贾隆山麓，滕达人的祖先——巴萨里人、科尼亚吉人和巴迪亚兰克人，控制了大片地方，而且组成自治的农业村社。15世纪末，他们有些人参加了丹尼扬克帝国创建人汤吉拉的军事冒险；他们对富拉尼人和曼丁哥人要统治他们的企图一直进行顽强的抵抗。[2]滕达人以易地耕作方式经营农业；他们的村庄由农耕帐篷构成。

巴加人、兰杜马人、纳卢人、蒂亚皮人和滕内人的土地，从里奥格兰德河一直延伸到里奥蓬戈河。他们或是种植水稻的农民，或是渔民。他们的村庄有的建在河滩上，有的建在堤坝上，他们讲的是梅尔语。15世纪以后，前三个部族实际已经居住在现今的地理位置上了。巴加人是住在里奥努涅兹河到卡库利马山之间现今几内亚共和国的滨海地区。可能是受到他们的压力，滕内人迁移到通博岛南部，建立了新的定居地。[3]

15世纪中叶在这一段海岸登陆的葡萄牙航海者进一步证实，这些地方的人口相当稠密。但是在费卢普人、巴兰特人、兰杜马人、纳卢人和巴加人居住的地区还没有大的王国。航海者称之为国王的那些人，其实只不过是些权力有限的族长或氏族头领而已。

307

瓦伦廷·费尔南德斯在他对非洲西海岸的描述中写道："所有村落的国王，从他们的臣民那里不可能得到赋税或贡金，但如果国王要栽植、播种或收割，臣民会义务帮助他们。当国王建造房屋、围拦土地或进行战争时，人人都会响应他们的号召。"可是，国王的权力受到议事会的约束，"如果国王想宣战，他就把长者召集起来组成议事会，要是他们认为战争是无理的，或者敌人过于强大，他们就会不顾国王的意愿，告诉国王他们不能帮助他，并且坚决主张和平。"[4]

这一带的人信奉传统宗教；里奥格兰德河以南地区没有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葡萄牙人正确记述了他们在沿海地区所见到的各种宗教的共同基础。人们崇拜用木头刻成的偶像；主神称作"克鲁"（Kru）；他们还祷拜死者，死者下葬前都要涂上防腐剂。"一般要为死者制作一纪念物；如果他是名人，人们就制作一个像他的偶像；如果他只是普通人或奴隶，用木头刻一人像，放进茅屋里。每年，都要用鸡或羊进行祭祀"。[5]这是我们目前掌握的对沿海各民族宗教和丧葬习俗的最早记载。这里谈到的小雕像，是用软皂石雕刻而成的，土著人叫做诺莫利（*nomoli*）或者庞塔（*pomta*，单数 *pomdo*），现在人们还能在几内亚共和国和塞拉利昂的古代墓地里看到这类雕像（见图片12.2－12.5）。

从卡库利马山到克鲁地区

滕内人是萨佩人的后裔，当时统治着卡库利马山以南的地区。在现今的几内亚共和

[2] 参见本书第7章。

[3] V.费尔南德斯，前引著作，第69－105页；V.蒙泰伊(V. Monteil)，1966年；D.帕切科·佩雷拉(D. Pacheco Pereira)，法文译本，1956年。

[4] V.费尔南德斯，前引著作，第83页。

[5] V.蒙泰伊，前引著作；参阅D.帕切科·佩雷拉，前引著作，第47页；V.费尔南德斯，前引著作，第69、10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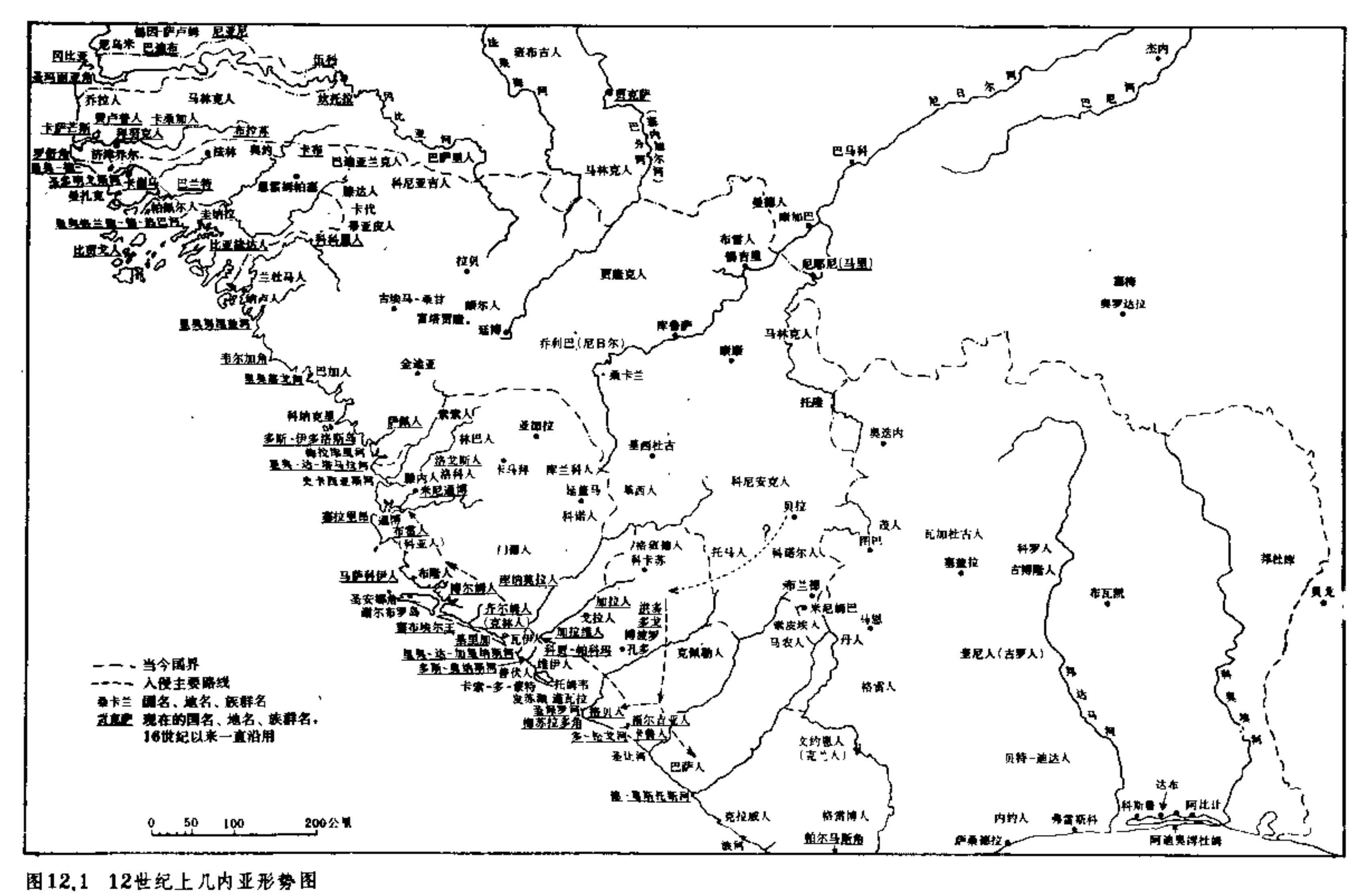


图12.1　12世纪上几内亚形势图



图片 12.3 塞拉利昂的诺莫利雕像（皂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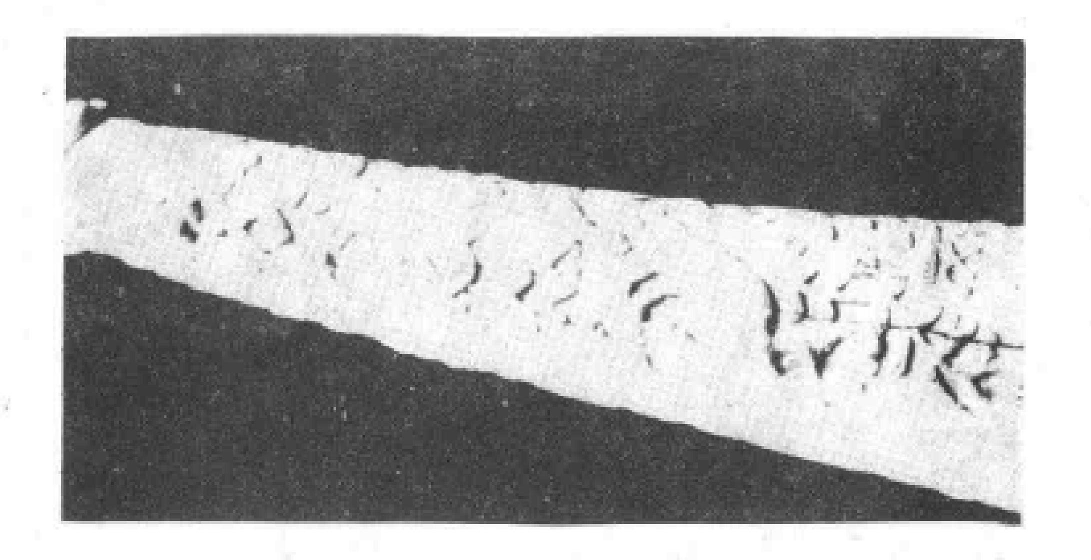
图片 12.2 塞拉利昂的诺莫利雕像（皂石）



图片 12.5 塞拉利昂的诺莫利雕像（皂石）



图片 12.4 塞拉利昂的诺莫利雕像（皂石）



图片 12.6　牙雕——狩猎情景



图片 12.7　非洲牙雕——葡萄牙海船和武士，全貌

311



图片 12.8 非洲牙雕——葡萄牙海船和武士，近观

国境内，人们对他们只有相当模糊的记忆，因为这族人现已集中到塞拉利昂。除了这族人外，还有林巴人、布隆人、以及生活在内地的基西人，后两个部族讲谢尔布罗语。

这些民族和当时别的民族一样，都以血亲关系组成自治的村社。他们的政治机构为神秘的“假面”会社所掌握。这些“假面”会社像北方巴加人和兰杜马人中的西莫会社一样，负责传授秘诀。葡萄牙人并没有感到这些沿海居民相互之间有什么重大区别。布隆人和滕内人的村庄非常稠密；每个村庄都有 150-300 左右的居民，有些资料甚至说布隆人每个村庄的人口多达 1000-3000。各村都有一名族长(*bai*)。沿海地区水稻种植相当发达；早在 15 世纪末，葡萄牙人就把塞拉利昂的剩余稻谷运往北方。同比贾戈人一样，布隆人也建造大船，渔业很发达；他们还发展木雕工艺，也精于牙雕。(见图片 12.6)。葡萄牙人常向他们订购工艺品，诸如盐碟和盐匙。 310

某个时期(确切时间尚难确定)，可能是 13-14 世纪，滕内人的语言和文化从富塔贾隆西北到塞拉利昂的罗克尔一带沿海传到了内地。葡萄牙人来到的时候，他们仍然控制着科纳克里纬度以南地区，但曼德人的先驱索索人（也即富塔贾隆高原的苏苏人）已蓄意要把他们进一步往南赶。虽然葡萄牙人提到过所谓的“萨佩帝国”，可那儿实际上从未有过成形的国家，而只有若干个由共同文化联系起来的酋长领地。有朝一日，考古发现肯定能使我们了解他们早期南迁的原因。我们不能把这看作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这是陈旧的看法），而应看成是一次缓慢的文化传播，它持续达几个世纪之久。

沿海一带，除滕内人和布隆人的领地外，还有克鲁人，他们的势力一直扩展到邦达马河湾；他们主要是生活在原始森林中，这片原始森林直到 16 世纪还无法通行。对这一时期这一族人的情况，我们现在了解得还很不够；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他们是相当原始的。正如纳卢人、兰杜马人、巴加人和布隆人那样，他们从事沿海捕鱼，他们的农业落后于他们北方的邻族。水稻可能是从与他们相邻的内地曼丁哥人那里传来的，但种植范围不广。他们当时的领土要比现在的大得多，尤其是因为他们侵占了靠近塞盖拉热带大草原的大片土地，从 16 世纪起，他们才把这片土地让给了马林克人。无论如何，葡萄牙人当时确是亲眼目睹巴萨人与克鲁人 15 世纪时已在沿海地区扎下了根。

热带大草原的影响

从与苏丹地区接触的角度讲，主要卷入的是曼丁哥人，富拉尼人只是在这一时期之末才出现。南方的曼丁哥人从远古时代起就与苏丹地区的居民有接触，并且在文化上受到他们很大影响。13－14 世纪时，曼丁哥人继续向里奥格兰德河与利比里亚海岸之间的沿海地区推进。

曼丁哥人——讲马林克语、班巴拉语、朱乌拉语和别种语言的各族人——形成了曼德世界的核心。在 13 世纪时，他们共同建立了辉煌的马里帝国，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们很早就对上几内亚有兴趣。马林克人与班巴拉人组成大型父系村庄群体，这些村庄群体随后又聚合成类似小国家的地域性单位，称为“卡富”(*kafu*)或“贾马纳”(*jamana*)。虽然这些地域性单位成立的时间并不一定早于马里帝国，但它们持续时间之 312

长，却出人意外，在村一级，政治生活是由几个大的传授秘诀的会社或称“乔”（*jow*）的组织主持。伊斯兰教是无处不在的，它虽是少数人信奉的宗教，但由于与长途贸易有关系而成为必不可少的了。社会层次，相对说已有了高度发展，以向“卡富”强征贡物的上层建筑为形式的国家组织，或多或少是相当普遍的。

马里帝国一直存在到17世纪上半叶，它以尼日尔河为中心，面向辽阔的热带大草原，控制着穿越撒哈拉的贸易。长途贸易，尤其是贩运柯拉果和买卖奴隶的贸易，必然会激起人们对通往森林边缘的南方商路的兴趣，但帝国除了从库鲁萨经康康去奥迭内的这一路线之外，似乎并没有树立起牢固的政治势力。统治者好像总是维护和设法改善与森林中头领的关系。

由于富塔贾隆以东的沙岩高原很难逾越，大海又因无法航行而始终是个障碍，所以这块地方好像总能摆脱马里的统治，而马林克人在富塔贾隆以东的扩张又不像是发生在帝国的势力范围内，在邻近帝国的地区，农民在军队纪律的管辖下逐渐向前推进，以至当地土著居民被吸收溶化。豪门显贵的世系后裔相互勾结瓜分权力，因此，根本不存在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唯一例外只是几次军事称霸的期间，诸如14世纪在尼日尔河上游桑卡兰的孔德人中，以及不晚于15世纪在从康康来到奥迭内的马林克人氏族中，即托隆的库鲁马氏族和科纳特氏族中。

再进一步往南，最先来到这个地区的是朱乌拉商人，他们是到森林边缘地带来拐卖奴隶、收寻柯拉果和黄金，并向西去寻找马拉古埃塔胡椒的。他们还走出这个地区向东去，先于葡萄牙人到了几内亚湾，也即“黄金海岸”、当今的加纳。他们带来了伊斯兰教的种子；他们与当地土著人民发生冲突，于是便求助于马林克人的武士，后者从政治上把这块地方组织起来，并引入农民以同化当时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库兰科人，他们居住的地方在当今几内亚共和国和塞拉利昂境内，时间不晚于15世纪；科尼安克人和茂人，时间大致是15世纪末；瓦加杜古人，时间是16－17世纪间）。他们中的一部分（科诺人和瓦伊人）早在15世纪时即已远远地渗透到了海边。几乎可以肯定，是科尼安克人的卡马拉氏族在1540－1550年对松巴人大举入侵负责，他们一直到达利比里亚海岸和塞拉利昂。

313

在邦达马河两岸，马林克人的大规模扩张必然要和朱乌拉人的前锋相遇，朱乌拉人早在14世纪就踏勘了从杰内到贝戈的阿肯金矿的道路，而且还远远达到古代博隆人、瓦加杜古人和科罗人居住的几内亚湾一带。从16世纪末叶起，在靠近邦达马河下游的那一边已有了一个出海口。

但是，从尼日河的源头到邦达马河的这个南马林克人的新世界并不是向海边，而是向苏丹、萨赫勒以及北方发展；直到很久以后，由于奴隶贸易的冲击，他们的扩展才受到阻碍，到17世纪末叶，海洋的作用才变得重要，穆斯林和商人成分的重要性也随之增大。就这一点来说，尼日尔河上游居民在他们到达大西洋沿岸之时，既瓦解了当地索索人和滕内人的文化，同时也破坏了他们自己故土的平衡状况。[6]

[6] 见W.罗德尼（W.Rodney），1970年；K.C.怀利（K.C.Wylie），1977年。

沿海的曼丁哥国家或行省

从13世纪上半叶开始，西北地区就出现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结果是在从冈比亚河延伸到里奥格兰德河的卡布（加布）形成了马林克文化的中心。马里帝国由于控制着塞内加尔河上游和尼日尔河上游产金地区，看来已将其霸权强加于整个塞内冈比亚，但却没能逃脱一个世纪后它所经历的危机，未能维持下来。

当时，在南方，从冈比亚河到富塔贾隆山麓的地区，马里的势力维持得较为长久，因为有大量人口新涌入这个地区以及当地社会意义深远的转化为基础。据传说，这种变化是松迪亚塔手下大将蒂拉马汉·特拉奥雷不懈努力的结果，他征服并组织了卡布国家。这个大国一直存在到19世纪(确切地说是1867年)，它原是马里的西部行政区。这省区一直延伸到西面的班布古金矿，并有一个出海口；这出海口虽只能提供食盐和水产，却成了诱惑苏丹地区马林克人的根源。

卡布周围有许多属国，其中有些由被同化的非曼丁哥人部族组成，如蒂亚皮人、比亚法达人和卡桑加人（东拜努克人)，或布拉斯王国（卡谢乌河畔的奥约王国)。葡萄牙人在15世纪时与一系列冈比亚河畔的王国打过交道，从河口往上游数，有尼乌米、巴迪布、尼亚尼和伍利。反对任何形式中央集权的巴兰特人不与外人来往，最后只是部分被征服。虽然曼丁哥语和曼丁哥文化在那里占主要地位，而且一直发展至今，但他们建立的政治制度却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尼日尔河上游的中心。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卡布的统治阶层在当地居民的影响下，采用母系继位制。这对盖洛瓦世系的起源作了解释，正是他们建立了塞雷尔人诸王国，日期目前尚难断定，但肯定是在1446年葡萄牙人到达之前。 314

在卡萨芒斯河下游，从属的拜努克－卡桑加王国始终保持原状，直到1830年被巴兰特人灭亡。葡萄牙人根据当地国王“卡萨－曼萨”这一称号，给这条河取名为卡萨芒斯。

对西部马林克人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最大事件，显然是1446－1456年葡萄牙人的到来：1446年是葡萄牙人发现冈比亚的年份，1456年则是他们到达里奥格兰德河的年份。从此，沿海地区成了文化渗透的主要前线，它对马里帝国的作用也根本改变了。冈比亚河是一条便于航行的水路，直到19世纪，它仍然是进入大陆腹地的通道之一。

从班布古以及从布雷出口黄金，这条路是必经的通道；不久之后，大批量的奴隶也从这里向外输出。15世纪后期，在1484－1485年、1487年和1534年连续会见马里皇帝的几个葡萄牙使团，也是走的这条通路。15世纪末，形成了一个反对汤吉拉领导下丹尼扬克富拉尼人的联盟，因为后者自富塔贾隆侵占上塞内加尔，从而给这条通道造成威胁，但这种威胁后来也消除了，丹尼扬克人在富塔托罗定居下来。可是，由于萨卢姆的塞雷尔王国在16世纪初期逐步强盛起来，从尼乌米到尼亚尼的冈比亚北部马林克人诸国，纷纷归属于它的统治之下。从那时起，直到18世纪，他们只能跟着奴隶贸易的节奏生活了。

卡布国只是在冈比亚河以南保持权力，它口头表示愿意与更靠南在卡谢乌河和里奥格兰德河一带的葡萄牙人直接联系；但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表明，它实际上并没有吸取16世纪的教训，仍然忠实于马里帝国。马里帝国，尽管版图缩小，丧失了萨赫勒地区

的一些属国，可它依然存在——这与长期以来人们所认为的并不一致。历史上这一联系被切断的具体时间肯定是能够明确判断的。经过仔细查证，班布古与当地金矿在 1599 年时仍归马里控制，正是这一年，马穆杜曼萨在杰内前线遭到惨败。此后，班布古就被一
315 伙葡萄牙叛教者以富塔托罗丹尼扬克人的名义所建的“伟大的富的帝国”征服了；这伙叛教者由加纳戈加所招募，此人原是来自克拉图地方的一名犹太人，改信伊斯兰教后，成了丹尼扬克的锡拉蒂奎（国王）的女婿。[7]从那时（大致是 1600 年）起，卡布与尼日尔河上游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而在此后 25 年间，马里也遭到肢解。[8]

再进一步往南，萨佩人居住地区的内地是富塔贾隆的一大片沙岩山岳，富塔贾隆山麓是西非洲的分水岭，一条条深谷分割开这一大片广阔无际的高原，土地贫瘠，气候适合于从事畜牧业。很久以前，确切日期无从考查，这地区曾是两个关系密切的民族——贾隆克人和索索人（苏苏人）的家园，他们同属于曼丁哥语系，但有两种不同方言，虽与马林克语相近，仍有较大区别。

富拉尼人和富塔贾隆各族

贾隆克人生活在富塔贾隆山岳的北侧和东侧，向东一直延伸到产金地布雷。他们有曼丁哥式的文明，按传统组成父系氏族群体、村庄和类似“卡富”（*kafu*）的小酋长领地。他们在马里帝国全盛时期至少部分是帝国的附庸，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15 世纪末受到外族骚扰（或接近 16 世纪末尼日尔河上游发生骚乱）时为止。

与此相对照的是索索人，他们生活在这山岳的西部和南部，分成一个个小的群体，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在讲梅尔语人的影响下逐步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因此，他们的政治组织相当松散，致使起源于滕内和巴加的西莫会社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语言在沿海各族人民中逐渐占了主要地位。那时，富塔贾隆谷地中巴加人和纳卢人日益增多；直到 18 世纪富拉尼“圣战”时期，他们才离开这一地区。

索索人是生活在苏丹地区边缘的农民和猎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不知有伊斯兰教，无可奈何地过着一种相当闭塞的生活，直到有两个新的因素打乱了他们与外界隔绝的生活规律，并且穿过他们领土开辟了重要的商路。这两个因素就是富拉尼人的入侵和葡萄牙人来到沿海这段地区。

富拉尼人是半游牧民族，他们使用一种与塞雷尔人有密切关系的西大西洋语言，他们最初出现在这一地区是 15 世纪中叶。当马里对萨赫勒放松控制的时候，成群的富拉尼
316 人离开了位于当今毛里塔尼亚东部的富塔，渡过塞内加尔河上游，然后在尼亚尼浅滩又越过冈比亚河，这段历史至今还流传在各种口头传说之中。大约在 1450 年，杜洛·德姆巴在富塔贾隆西边袭击了比亚法达人，后者当时仍从属于马里。一段时间以后，特马拉（汤吉拉率领的）族群在古埃马－桑甘地区贾隆克人居住的地方定居了下来。就在这个

---

[7] A. 特谢拉·达－莫塔（A. Teixeira da Mota），1969 年，也可参阅A. 多纳赫（A. Donelha），英文译本，1977 年，第 268－269 页。

[8] 见本书第 7 章。

世纪末，他们又从那儿出发，与卡布和冈比亚的马林克人作战。到16世纪初，他们征服了上塞内加尔和富塔托罗，考利·汤吉拉就是在这块地方建立了丹尼扬克人的王朝。

16世纪末，富塔贾隆只是象征性地与“伟大的富帝国”联系在一起，丹尼扬克人在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带走所有的富拉尼人。这些牧民仍信奉传统宗教，他们在高原上居住于索索人与贾隆克人之间。大致在1560年时，他们与塞拉利昂边境上本纳地方的索索人联合起来，以阻挡马内人的入侵，后者当时已侵占了南边的一些地区。但是，17世纪末，当大批穆斯林涌入后，他们便满足于自己在社会上扮演的缓冲角色（他们随后征服了贾隆克，1727年卡拉莫克索·阿尔法“圣战”后，当地仍沿用此名）。

正是葡萄牙人的到来对海岸贸易起了骤然的促进作用，彻底改变了索索人的命运。从15世纪末开始，贾卡纳人的商队在该地区川流不息，把塞内加尔河上游的班布古采金场和尼日尔河上游的布雷金矿与河边沿海一带联系了起来。索索人随着这动向，把巴加人和滕内人赶回了里奥蓬戈河和本纳地方（他们在16世纪中叶到达那里）。最早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些小部落分散在他们中间，但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苏丹的影响引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如同以前在他们南方邻族中所发生的变革一样。

曼丁哥人对沿海地区的压力——马林克人的推进

从尼日尔河上游到萨桑德拉河畔的森林边缘地带，住着各种各样真正的曼丁哥人部族，如库兰科人和南马林克人（科尼安克人和茂人）。朱乌拉人可能很早以前就在这个地区组成一个柯拉果贸易网；这贸易网包括一个与生产者打交道的经纪商区域。生产者一概都被看作森林“野人”，不论他们讲的是与古罗人、丹人、克佩勒人和托马人（洛马人）一样的曼德语，还是讲的与基西人一样的梅尔语。

这一地区远离马里帝国的各个政治中心，中央政权的统治究竟有效程度如何，以至是否真有一段时间中央政权真正进行过统治，这都无法下断语。但是，虽然我们没有掌握具体确切的时间，我们还是可以断定，武士、农民和商人确曾在这地区建立了定居点，大量的人口确曾逐渐集中到这里，在这段时间里，前面所提到的土著居民或被同化、或被逐出；有迹象表明，主要的几次迁移发生在14－15世纪，[⑨]这正是马里退缩到北方而使人们的活力转向南方的那段时间。这场大推进似乎发生在葡萄牙人发现那里之前，至少是与此无关。但是，马内人提到马里帝国的方式，说明直到16世纪中叶，科尼安克人（从理论上说）仍然承认它的权威。 317

在尼日尔河上游以东，桑卡兰人和托隆人定居地的历史（与基西人和托马人早有接触）可以一直追溯到14世纪。科尼安克人的定居地和茂人在科特迪瓦的图巴的定居地，虽然历史没有那么悠久，但也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如果以马内人的入侵作为解释）。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片高原的重要性，这里各种自然条件都相当好，适宜于从事畜牧业，

⑨ 从表面看，这些世系关系比较可信的时间是在16世纪中叶；但若与尼日尔河上游的凯塔氏族相对比，却说明马林克人的历史要退后整整4个世纪从结构上是根本不可能的。按世代计算，至多只能算出这时期的最低限。

又为俯视南侧赤道森林的群山所环绕，离蒙罗维亚和弗里敦也不远。这样的位置如果有了商业上的重要性，必然能迅速吸引人们大量涌向海岸。这个地区居住着以卡马拉氏族和迪亚曼德氏族占统治地位的一些马林克人氏族，卡马拉-迪亚曼德人口头传说中的祖先费伦-卡曼赶走或同化了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克佩勒人土著。这片高地以后又吸引来了许多富拉尼人氏族，尤其是在17世纪，但新来的移民很快就接受了马林克语。曼丁哥人一旦在森林地带边缘定居下来，便马上想穿越林区向海边长驱直入，这种企图至少出现过两次，虽然两次的情况迥然相异。[30]

科诺人和瓦伊人

这两族都是曼丁哥人，在葡萄牙人发现他们以前，也就是在15世纪60年代，他们已经住在现今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森林地带。他们来到这里定居的时间，甚至可能是再早一个世纪，但科诺人和瓦伊人所讲的语言始终与曼丁哥语相接近，这说明年代还不是太久远。

318 不管怎么说，确有一些马林克氏族向海边推进是从尼日尔河上游（从桑卡兰）出发的。他们推进到现今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接壤地带。根据传说，他们是由卡马拉带头，因此与后来在科尼安克定居的人们有亲属关系。那些中途离队的人则成了科诺人：他们居住在与科尼安克相似的高原上。[31]另一些人，据传说由年轻的卡马拉、凡戈洛马和基亚坦巴带头，来到皮苏湖地区的海边（离今罗伯茨港不远）他们在那儿成了瓦伊人。葡萄牙人对他们所拥有的家禽数量之大感到惊讶，称他们为“加里纳斯”。

这些苏丹地区往昔的居民将自己的文明适应于在森林地带生活，但他们似乎保持一种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很快适应由于葡萄牙人来到而形成的新的商业社会，他们移居的原因也许首先与寻找食盐和鱼有关。不久，他们就向苏丹地区另一族即马内人屈服，虽然后者可能同出一宗族而没有打破社会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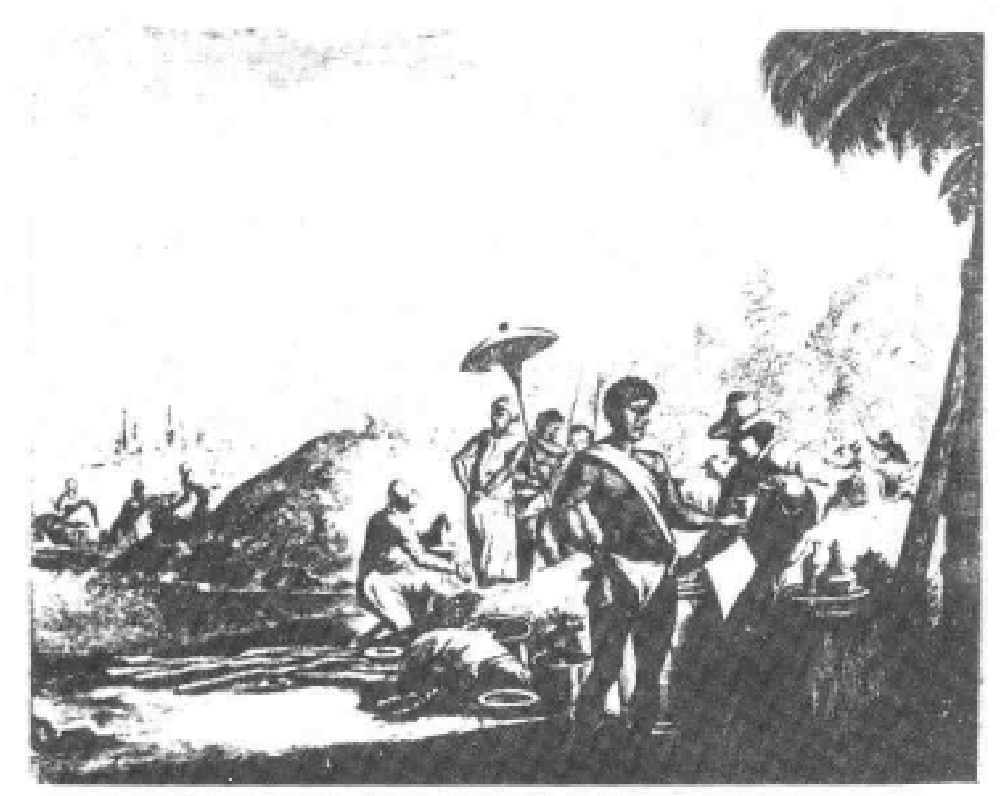
马内人或曼德人的入侵

曼丁哥人第二次向海岸推进，相当于著名的马内人-松巴人和科贾人-卡鲁人的入侵行动。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相当多，但也相当复杂，而且质量上参差不齐，大部分都比较肤浅。现在还没人把这些文献与各有关民族的人种史和历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许多研究是在一些具体事例的基础上进行的，历史的全貌并不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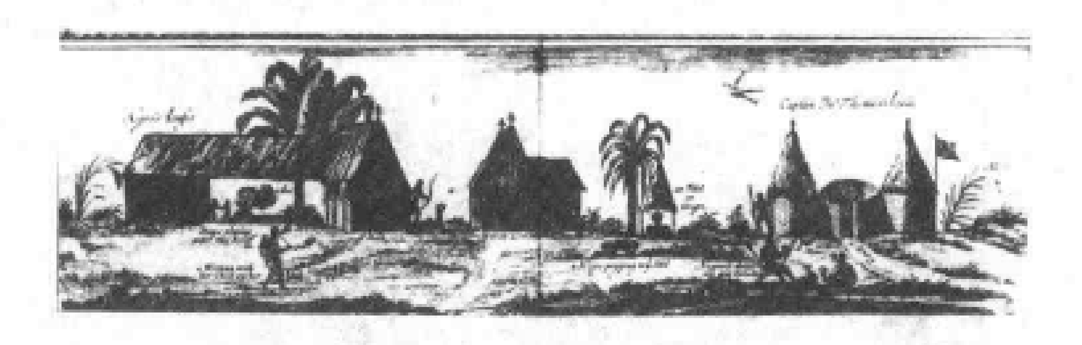
马内人的入侵，如同50年后安哥拉的贾加人或19世纪祖鲁人的大迁移一样，是相当一段时间内震动非洲相当一些地区的大运动。上述几次大迁移，对民族结构和相互关系所起的瓦解作用，远比人种-语言图上所显示的更为严重。马内人的入侵其作用虽不

[30] 这一双重长驱直入使我在早期的研究中（Y.佩尔松，1961年）错误地把马内人的入侵截然分作两次：第一次长驱直入是马萨科伊氏族的由来，第二次长驱直入则是法恩布尔氏族的起源，这两次行动迄今仍在瓦伊人（利比里亚的曼丁哥人）中有很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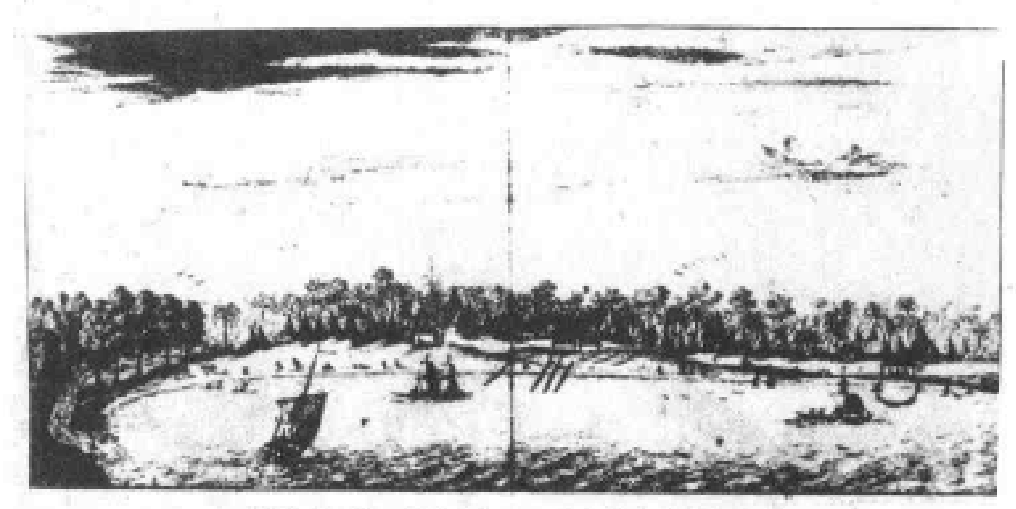
[31] “科诺”在曼丁哥语中意为“等待”。按法达马（曼丁哥口头传说传授中心）的说法，这些移民因等待而得此名：他们没有得到先头部队的消息，所以就留在塞拉利昂的高原上了。



图片 12.9 欧洲商人在佛得角与卡约尔居民交易（速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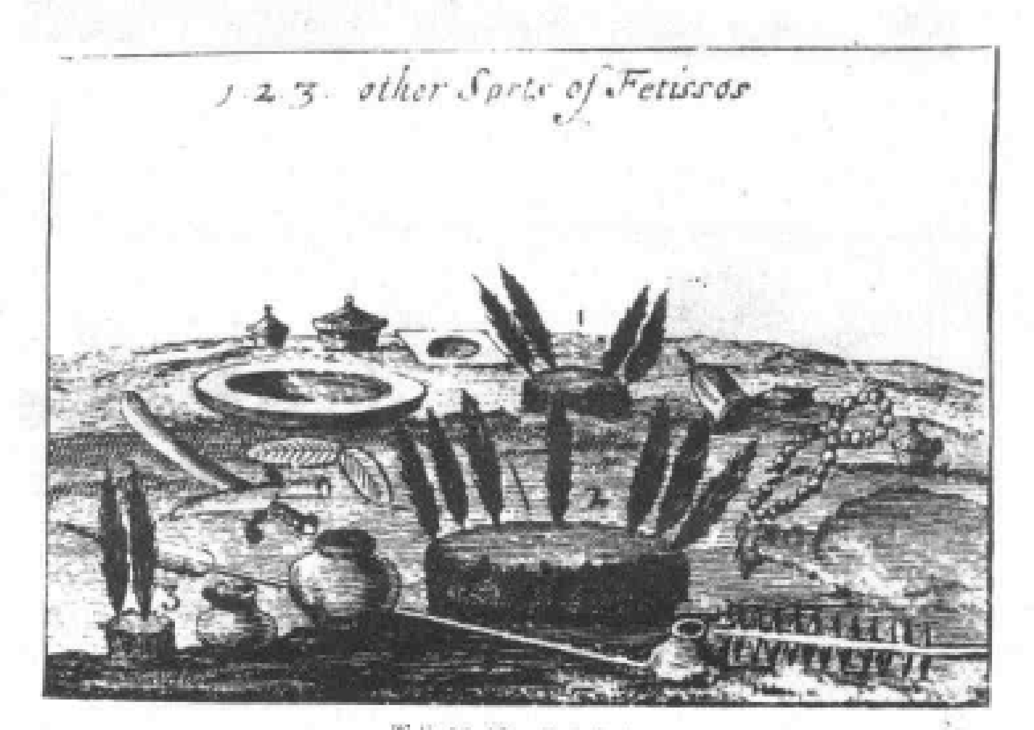


图片 12.10 非洲人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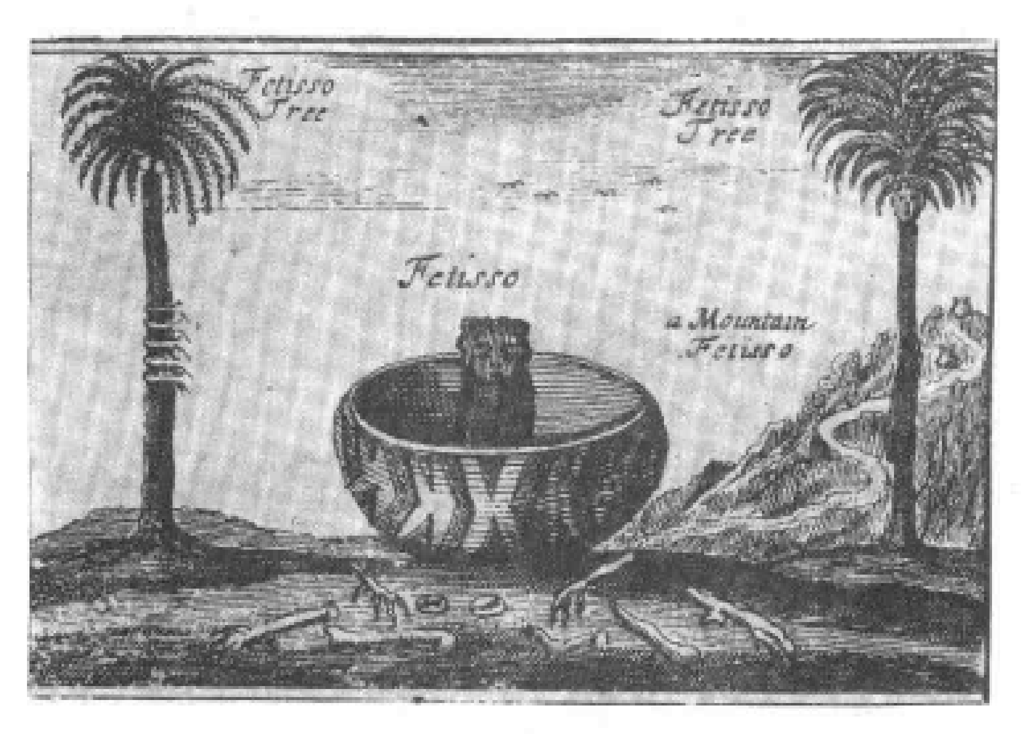


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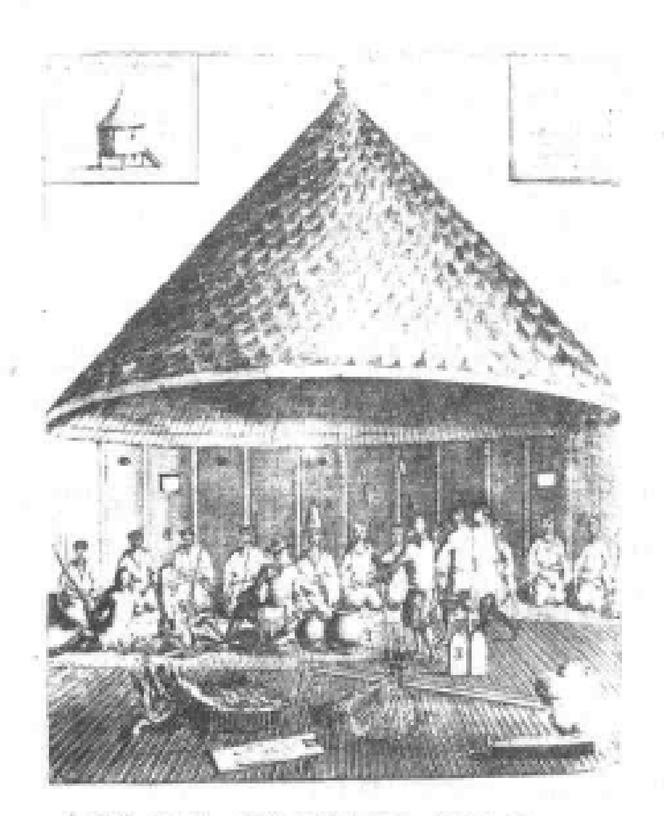
图片 12.11 塞内加尔——吕菲斯克的黑人市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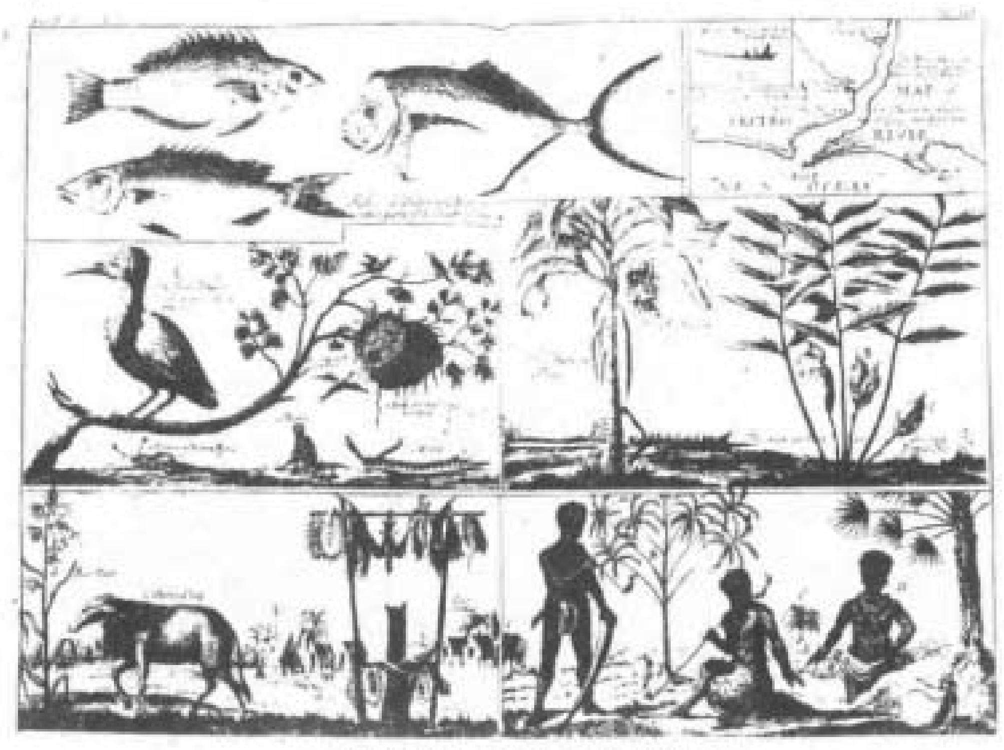
图片 12.12 物神崇拜



图片 12.13 物神崇拜



图片 12.14 塞斯特罗的国王（17世纪）



图片 12.15 上几内亚的动植物

323

如瓦伊人的入侵重大，却也是曼丁哥语在南方得以传播的缘由和洛科族起源的根本。重要的是，它对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推广，对苏丹地区长途贸易网的扩大，都有贡献。

有些学者，如P.E.H.海尔教授，对此似仍持怀疑态度；[12] 但现在已相当清楚，马内人的入侵行动最初是由熟悉长途贸易和东部黄金之路的曼丁哥部落挑起的（发动对埃尔－米纳的战争）。他们的活动是在葡萄牙人发现该地区八十多年之后，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开辟海岸商路的设想与此无关。虽然入侵者的政治及军事组织超过别人，但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又不适应林区气候环境。他们的成功，只归因于能够逐渐动员被他们征服的人民，由此产生"滚雪球"一样的效果；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虽然是少数，但随着运动的势头，他们也能不断向前推进。这可以说明为什么一开始就有引起葡萄牙观察家重视的双重性。

319

佛得角群岛

在佛得角贫瘠而干枯的沙地上，1462 年已有人定居，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马德拉群岛的居民相似；佛得角群岛在 1484 年归属于葡萄牙王室。最初，是在圣地亚哥岛上建都，该岛离大陆最近，有总督长驻治理，而 1535 年后又设有主教，主教辖区从塞内加尔沿岸地带一直延伸到利比里亚的梅苏拉多角。

[12] P.E.H.海尔（P.E.H.Hair），1967 年。

由于气候适宜，群岛居民日渐增多，大部分是从塞内冈比亚和上几内亚买来的奴隶。到1582年，福古岛和圣地亚哥岛这两个主岛上住有1600名白人、400多自由黑人、13,700名奴隶；16世纪时，这些岛屿的经济以畜牧业、棉花种植业和使用非洲技术的纺织业为基础。很快，群岛居民不再满足于仅仅进口奴隶供自己役使，他们开始向美洲运送奴隶。当时，圣多美和刚果主要是向巴西提供奴隶，而佛得角群岛在1530－1540年期间主要是向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进行奴隶贸易。16世纪下半叶，奴隶出口数量估计每年为3000人，其中一部分用以交换棉布。

只要考察一下这些岛屿同大陆和美洲的交易，我们就会看到葡萄牙人统治殖民地的特点。他们是以王室垄断贸易的想法为基础的，让享有特许权的商人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交易。例如1466年的规章，允许佛得角群岛居民有权与“佛得角几内亚”进行贸易，也就是说，可以同远至梅苏拉多角的沿岸地带进行贸易。1514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的敕令规定，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去几内亚，严格禁止移民定居。

在16世纪初，葡萄牙当局最关注的是反对他们的移民入境。当时，已有不少移民经非洲君主的同意定居在大陆，他们内部通婚，大都是商业经纪人。这种移民被人称为“兰卡多”（*lancados*，源出“兰卡尔”*lancar*，意为从事冒险），或称“坦戈马奥”（*tangomãos*，意为已经入境随俗的人）。[13] 1508年的一项法令是专门针对塞拉利昂居民的，他们被视作刑事犯罪份子。当然，他们确有不少人来自社会下层，特别是其中的“新基督教徒”，还有一些被迫改教的犹太人。 **320**

结　论 **323**

沿海地区现在仍然是学术研究领域的处女地。葡萄牙航海者从15世纪起，给我们提供了文字记载，而且里斯本的档案馆最近也向研究者开放了。考古学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对一些口头传说所做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一地区当时并不闭关自守：柯拉果和森林物产的贸易，很早就吸引曼丁哥人来到这里，建立了强有力的经商社会或王国，诸如卡布国和森林边缘的科尼安克国。许多沿海民族，如纳卢人、巴加人和布隆人，以他们的雕刻文化受到人们的注意。他们种植水稻的知识使这一地区变成了热带大草原上供应男女老少的真正粮仓，他们的国王通常与当地头领维持良好的关系。[14]

[13] J.布莱格（J. Boulègue），1968年。

[14] 有一句马林克人的格言：“如果你想要棕榈油和柯拉果，就千万不要与基西的国王开战”。热带大草原的武士们很少渗透到这一带来：森林和沼泽地也有碍于大规模使用骑兵。

13 从科特迪瓦礁湖区到沃尔特河

P. 基普里

地 域

324 海岸从帕尔马斯角起，以弧形由西向东弯曲，形成几内亚湾。在接近赤道处，植被越来越密，到处是森林。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沿岸有许多礁湖。实际上，这区域可划为三个地区：

（1） 帕尔马斯角港湾以东至塔诺河一带，12 个连串的礁湖与海岸相平行；[1]
（2） 从塔诺河至阿克拉平原——几座小山构成了高低不平的地形（三尖角）；
（3） 通向沃尔特河出口处——这里较为干燥，没有森林，空旷的土地上只见稀疏的树木。

这地区属赤道气候，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为 2000 毫米。3 月至 7 月为雨季，8 月至 9 月为旱季，10 月和 11 月期间有一短雨季，从 12 月到 3 月又为旱季。空气湿度很大，即使在旱季也是如此。森林对环境的影响相当大。

资料来源问题

这地区只是最近才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兴趣。长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热带草原和萨赫勒进一步往北的地区，也即历史上曾举行过许多隆重典礼的几个帝国的所在地。10 世纪到 16 世纪期间访问过苏丹的穆斯林旅行者和历史学家对这森林地区毫不了解；因此这方面的文字资料十分缺乏。325 考古学对这一地区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口头传说相当丰富，但是也引起许多尚待探讨的问题。

---
[1] 12 个礁湖——诺尼、塔迪奥、梅克、埃布里耶、阿格欣、科迪欧－波乌埃、奥诺、波图、埃希、赫博、塔巴和阿比，占水域面积 2400 平方公里。

书面资料

文字资料大多数是15－17世纪葡萄牙航海家的航行记录，而他们的兴趣之所在又限于我们现在所阐述的这时期之末。从1471年到1480年，葡萄牙人探查了帕尔马斯角与沃尔特河河口之间的这片土地，他们与当地人有了接触；1481年，他们开始建立埃尔-米纳城堡，为他们有效的控制沿海贸易提供了保证。此外，有两份重要资料：一份是葡萄牙航海家杜阿特·帕切科·佩雷拉的作品，他曾参加沿海地带的探查，之后于1905至1906年写出了他的《锡图·奥比斯的绿宝石》（«*Esmeraldo de Situ Orbis*»，前译《埃斯梅拉多》），该书描述了由摩洛哥至加蓬的西非洲海岸的情景；另一份是荷兰人O. 达珀关于非洲的论述，他参考一系列的报道，写出了一部关于17世纪非洲的著作。我们可以从这些资料中了解到什么呢？

这些作品描述了沿海各族人民的情况，对他们的活动作了详细的介绍。杜阿特·帕切科·佩雷拉在帕尔马斯角遇到了他称之为埃戈雷博人的民族，即如今的格雷博人。所有流入大洋的河流，他也都认真标明特点：圣安德烈河，即萨桑德拉河，那里有“海拉里或稻田”。往东，他说的佩德罗河可以确定是塔布河；拉戈阿河，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大拉胡的河流。杜阿特·帕切科·佩雷拉曾提到拉戈阿河彼岸有7个住着许多怀有敌意者的村庄。这位航海家把他们称作克鲁人——“坏蛋”。外国人在去马约河（即科莫埃河）的途中，到处都受到冷遇：“我们对这一地区的贸易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但我们知道这里人口稠密。”[2] 葡萄牙人在阿克西姆建立起一座小城堡，这座城堡后来以圣安东尼的名字命名，接着他们很快在埃尔-米纳又建立了一座城堡。在这地区发现黄金是他们入侵的动力。为了建造城堡，葡萄牙国王曾派出9艘装满石料和石灰的船只；土著人对葡萄牙人的图谋自然不满，尽管他们不断进行威胁，城堡还是建成了。葡萄牙国王发现了金矿，他就想独占开采。

埃尔-米纳很快成为一个贸易中心，吸引了众多的商人。“这些商人属于许多各不相同的民族，如布雷穆斯人、阿蒂斯人、哈坎尼斯人、博罗埃斯人、曼丁古阿斯人、卡克莱斯人、安德塞斯人、苏佐斯人等等（为免累赘，这里不一一列举其名了）[3]。在这个名单中，我们可以肯定有阿铁人、阿肯人、布龙或阿布龙人和曼丁哥人。大批商人涌入埃尔-米纳说明贸易的重要性；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曼丁哥人是“丛林人”的最好主顾。值 **326** 得指出的是，阿肯人、阿铁人和布龙人之所以对黄金贸易感兴趣，那是因为在他们的土地上有金矿。16世纪时，这些民族大多数都已能确认出来。从邦达马河至三尖角的这片土地被称为象牙海岸或夸夸海岸。黄金海岸（现在的加纳）从三尖角伸展至沃尔特河，这里的许多村庄都由葡萄牙人按他们自己的解释命名。有500居民的萨马村被说成为一个大村，而“小芳蒂”港和“大芳蒂”港则明显是在芳蒂人居住地区。15世纪末，这一地区因有埃尔-米纳而成为一个重要的黄金市场。

---

[2] 摘自杜阿特·帕切科·佩雷拉（Duarte Pacheco Pereira），法文译本，1956年。
[3] 同上，第123页。

葡萄牙人对各处地方的习俗都作了有价值的描述，但是，在我们重现这些民族各自的生活之前，还有许多空白须待补充。

考古资料

考古学的研究近期才刚刚开始：加纳和科特迪瓦有些遗址已经进行了发掘，初步成绩表明，它们可以提供许多有用的资料，甚至对那些似乎难以进入的森林地带也都是如此。森林北部边缘（与热带草原相接），在贝戈的布龙人居住地区进行的发掘表明，许多文物来自杰内，同时也证明这里与尼日尔河流域中部地区有过频繁的贸易往来；M.波斯南斯基认为这种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4]贝戈是森林地带与热带草原之间的一个贸易中心，也是马林克人（或迪尤拉人）在布龙人居住地区附近建立的一个重要移民区。1970年以来，特别是在贝戈的尼亚科地区所进行的发掘，似可表明这一遗址当时居住过约1100人。[5]可以肯定的是，在14世纪，贝戈是最为重要的柯拉果市场之一。M.波斯南斯基认为，在同一时期形成的阿肯人社会，很可能是曼丁哥人居住区和南部柯拉果产区之间的一个中介站。有证据表明，14世纪时贝戈与马里进行过黄金贸易，而黄金很可能来自更远的南部。在14世纪（全盛时期），人们对黄金的需求十分强烈，因此，贝戈与森林地带的关系也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在西部古罗人居住地区，曼丁哥人的渗透要早得多。柯拉果贸易看来也比以往想象的要早得多。北纬8度是热带草原和森林地带的相接处，大多数贸易中心都位于这条线上。在加纳的奥达一带和科特迪瓦的塞圭发掘出土的文物，年代还未确定。在塞圭发现了许多很像防御工事的椭圆形沟渠，深达4米或6米不等。尽管大量陶器已经出土，[6]但其年代仍不能确定（见图片13.1和13.2），需要把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邻近地区出土的陶器作一番比较研究。现在这里的居民阿贝人说，他们的祖先一到这里就发现了这些沟渠，但不知是谁挖的。口头传说告诉我们，阿贝人是在18世纪阿肯人大迁移前不久来到这里的。[7]不管怎么说，深藏在森林中的这些遗物可以说明，那里肯定还会有许多有趣的发现。可以这样讲，我们的知识还很不足，有待补充。我们从葡萄牙人的史料中了解到，在沿海地区居住着渔民和农民群；我们应该将研究直接集中在沿海地区和指向森林地带，也就是说，要研究航海家们记述过的地区。

330 阿比让大学考古和艺术研究所已经来礁湖区探查过，但在长有红树林的沼泽地带，研究工作十分困难，因为那里的落叶层堆积得非常之厚。尽管如此，他们对阿比礁湖区还是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在贝利贝勒、阿索科和尼扬姆瓦三个岛屿进行了探测（见插图13.1）。这里有沿海早期居民遗留下的成堆的新石器时代的贝壳；[8]此外还发现了许

4　M.波斯南斯基（M.Posnansky），1974年，第48页。
5　同上，1975年（b）。
6　J.波莱（J.Polet），1974年，第28—44页。
7　M.波斯南斯基，1974年，第46页。
8　阅《非洲通史》第3卷，第16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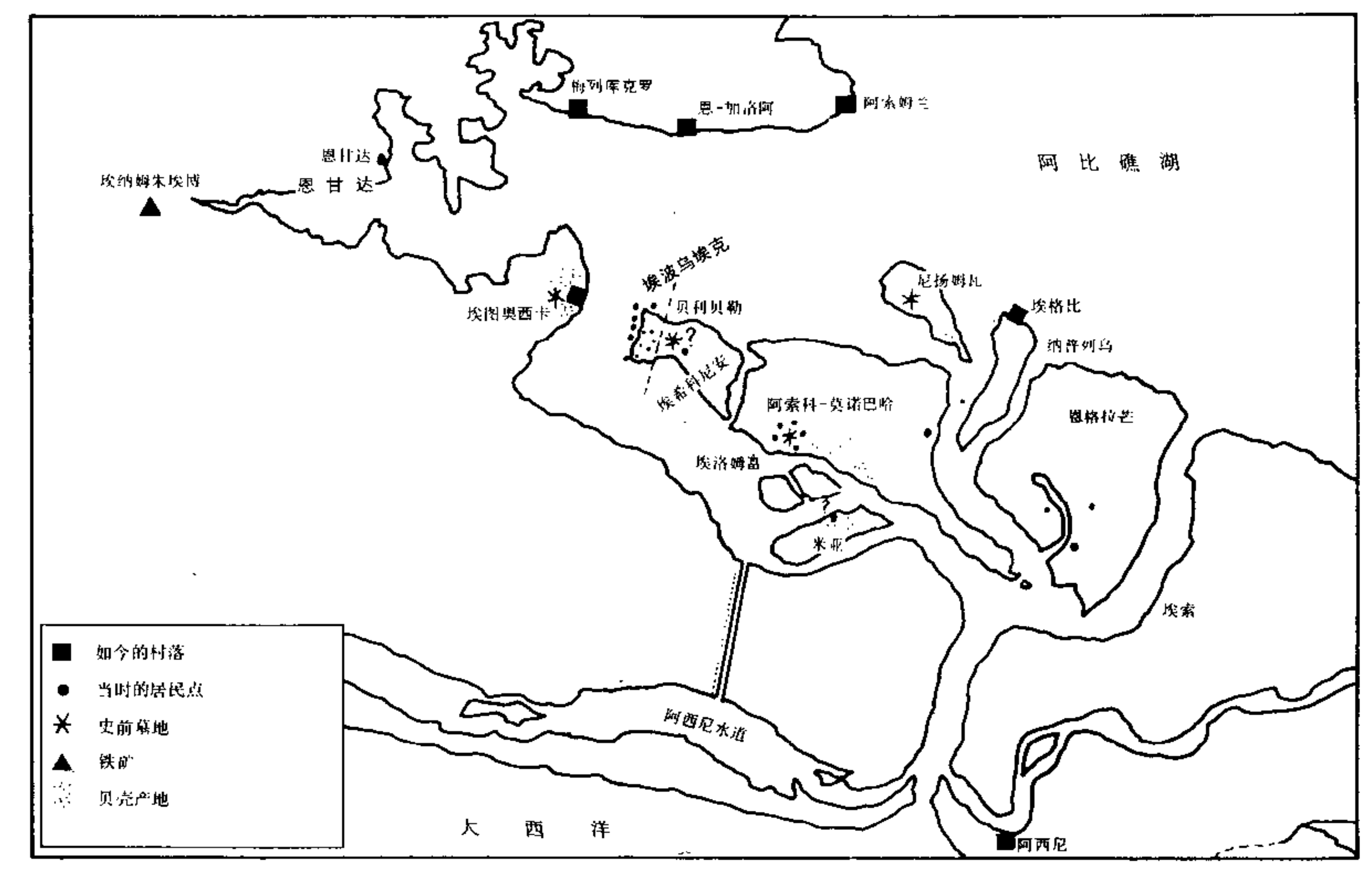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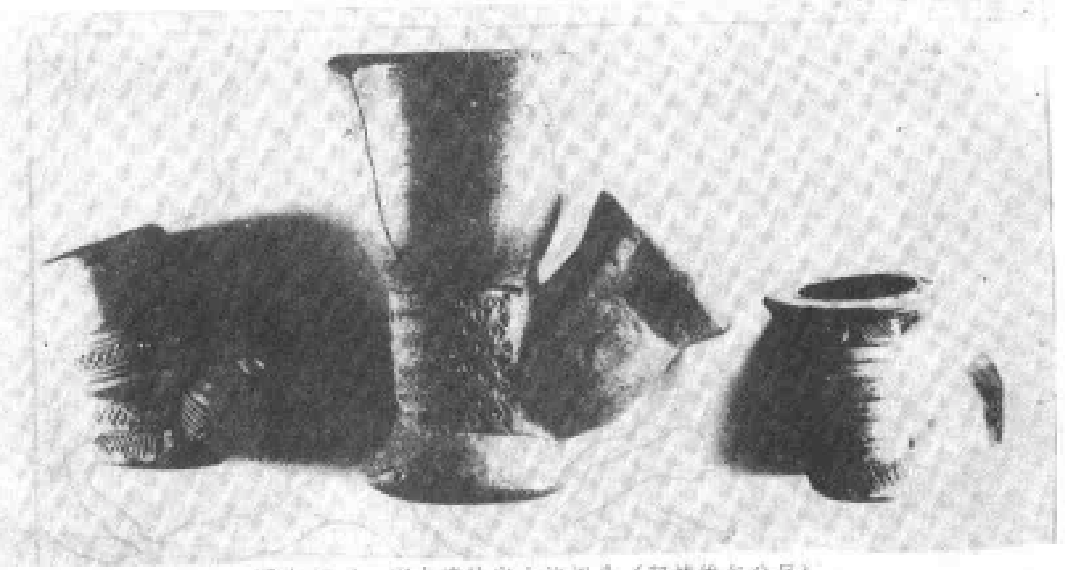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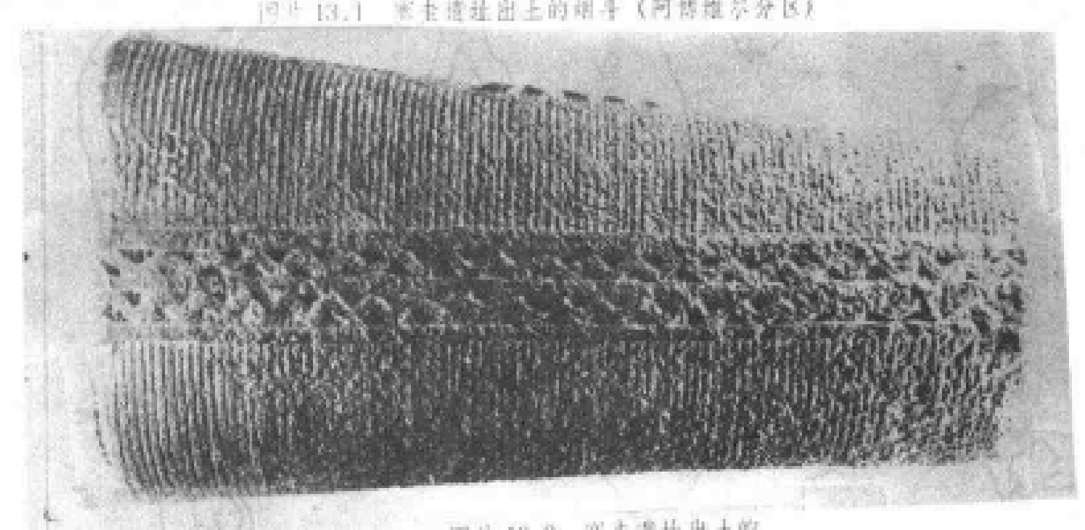


图 13.1 阿比让潟湖区考古遗址（资料来源：《戈多 戈多评论》，2，阿比让，1976 年，第 123 页）



图片 13.1　室圭遗址出土的烟斗（阿博维尔分区）



图片 13.2　室圭遗址出土的前臂护腕



图片 13.3　在尼扬姆瓦史前墓地出土的陶盆



图片 13.4　在尼扬姆瓦史前墓地出土的陶瓮



图片 13.5　在尼扬姆瓦史前墓地出土的烟斗

多大贝丘。发掘了三处史前墓地，收集了大量尸骨、手镯、珠子和陶器，虽然这些物品的年代还未确定。不管以后结论如何，这些礁湖岸边已经证实有不少令人感兴趣的遗址。[8]

口头资料

因为每个族群都有自己历史起源的神话和颂扬迁徙的叙事诗或唱述，所以口传资料十分丰富。部族四分五裂的现象很严重，常常可以发现人口不足2万的部落群体散居在森林中的村落里。因此，对研究者说来，口传资料本身就构成严重的问题，有不少特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不少部落群体对往事的追述不超过18世纪以前。其次，口头传说在内容上族群之间常有相互转述的情形，这样就造成了记述的混乱。许多部落群体都说他们的祖先从天上（一个靠着金链，另一个靠着铁链）来到人间，如此等等。另外一些部落群体则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地洞或蚁穴。有些地方的氏族将其他氏族视为“兄弟”，这样就出现了文化交叉难辨的情况；例如，阿维坎人视阿拉迪亚人为兄弟。但是，大多数居民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外乡，对他们迁徙史也能详尽描述；例如，阿迪乌克鲁人认为他们是在8次大迁徙浪潮中从西部迁来的。但是，他们的发源地在哪里？最早的一次迁徙始于何时？迁徙活动何时终止？这些问题并不是通过一次简单调查就能得到解答的。

331

另外，阿肯人的许多支族认为他们的发源地在今加纳共和国。阿夸穆人传说他们的发源地位于热带草原北部，那地方名叫孔。与此相似，海边的芳蒂人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加纳西北部的特克伊玛。问题并不这样简单，首先，我们需要系统地收集传奇故事，这样或许能查明各个族群和他们的发源地。其次，不同学科要相互配合，把那些共同文化特征加以清理和分类，因为，这些民族没有一个是孤立的实体，每一个都与某一较大的族群有联系，收集和分类之后，历史学家就可以应用其学科的正规方法重现历史。

我们意识到，最为重要的是语言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通力合作。阿比让大学和位于莱贡的加纳大学在这方面作出了鼓舞人心的榜样。1974年1月在邦杜库举行的主题为“科特迪瓦和加纳共有的民族”讨论会上，这种合作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来自两国的研究人员仔细研究了各自掌握的口头传说、考古学和人类学提供的资料，得出结论说，不但有可能编写出有关各民族的历史，而且有可能清楚地了解他们在同一地区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的形成过程。

在结束口头传说问题这一段落之前，应该指出，上面所说族群四分五裂的情况发生在17世纪和19世纪之间。这些传说资料初看似乎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极少追溯到17世纪以前，可是，阿肯、克鲁和布龙人是15世纪在此定居的，当时阿克拉村已经存在。恩德涅人的情况是最典型的例证。据他们的口头传说，他们是在一位名叫阿诺·阿塞纳的祖先领导下在今天这块土地上定居的。传说他们来自安扬亚地方，在加纳东部。“阿诺·阿塞纳给人们带来法律，在他之前……甚至没有树木，什么都没有。在他面前，一只系上链条的铜盆从天而降。”口头传说还有阿诺·阿塞纳给人们分发香蕉和甘薯，教他们耕种等情节。经过调查和对照几种不同的口头传说，克劳德·佩罗特发现阿诺·阿塞纳是

[8] J.波莱，1976年，第121－139页。

17 世纪的人物。他还查阅了欧洲的许多文件，都说恩德涅人的这位祖先出世的时间，比较确切地说是 1690 年左右。[10]

追溯久远的历史以确定这个教会人们耕种的人的年代，无疑是十分有趣的。但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17 世纪末，在加纳的奥温王国爆发了一场战争。民族领袖阿诺·阿塞纳带领他的人逃离这个国家，在阿西尼附近，也就是恩德涅人聚居的地方定居下来。恩德涅人属于大阿肯族。在那里，人们按阿诺·阿塞纳的形象编造出一个民族起源的古代神话，把这位领袖描写成是神人般祖先。口头传说的重新整理，将迁徙前的一些事件追溯到遥远的往昔，这样就产生了一部为人们所接受的新的历史。 **332**

提出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要提醒人们在采用口头传说时应小心谨慎。看到研究人员为了再现历史而仔细核对了有关阿诺·阿塞纳的不同的口传及文字甚至考古资料，确实令人欣喜。

只有这样核对不同的资料才能勾划出 12 至 16 世纪这地区的历史梗概。尽管目前我们所知的还远远不够，但我们已能为今后的研究工作制定方针。

沿海和内地各民族

按传统观点，这地区的民族一般可划为两大类：礁湖和森林地带的民族，内地（灌木林区和热带草原）的民族。前者称为原始黑人，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定居住于森林地带和沿海一带的史前黑人。可是，这种观点，经不起人类学和语言学提供的新事实的验证。现在看来，礁湖区居民和内地人居民确实同属于克瓦语系。我们应能记起，葡萄牙航海者曾把一部分海岸称为“夸夸海岸”（参阅插图 13.2）。[11]

在一篇题为“谁为阿肯人？”的著名论文中，A.阿杜·博亨教授列举了阿肯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同时还用最新的语言学研究成果来证实被称为阿肯人的各族语言的统一性，并查明了导致他们在现今地方定居下来的几次迁徙的时期。[12]值得提及的是，现在阿肯人占加纳人口总数的 45%，占科特迪瓦人口的 33%。在加纳的阿肯人中，A.阿杜·博亨列举了如下族群：博诺人、阿散蒂人、夸胡人、阿克姆人、阿夸皮姆人、瓦萨人、特维福人、阿西尼人、阿夸穆人、贝姆人、塞夫维人、奥温人、恩齐马人、阿汶塔人、芳蒂人、贡瓦人、阿佐纳人；在科特迪瓦，则有如下族群：阿布龙人（布龙人）、阿尼人、桑威人、鲍勒人、阿铁人（阿克人）、阿贝人、阿比吉人、阿迪乌克鲁人、埃布里耶人、埃加人（德拉人）、埃奥蒂尔人、阿布雷人、阿格瓦人、阿维坎人、阿拉迪亚人。[13]可见，阿肯人是一个巨大的语族群，在本章探讨的这一时期，族群的分化或许还没有发生，但是，他们已有了不同的方言。 **334**

---

[10] C.佩罗特（C.Perrot），1974 年。

[11] O.达珀（O. Dapper），1668 年。

[12] A.阿杜·博亨（A. Adu Boahen），1974 年。这位加纳历史学家驳斥了有关阿肯人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利比亚或古加纳的旧论点。他运用 J. H. 格林伯格（J. H. Greenberg）的语言学理论，将最早的阿肯人住地的位置确定在乍得－贝努埃地区。

[13] 同上，第 66 页。

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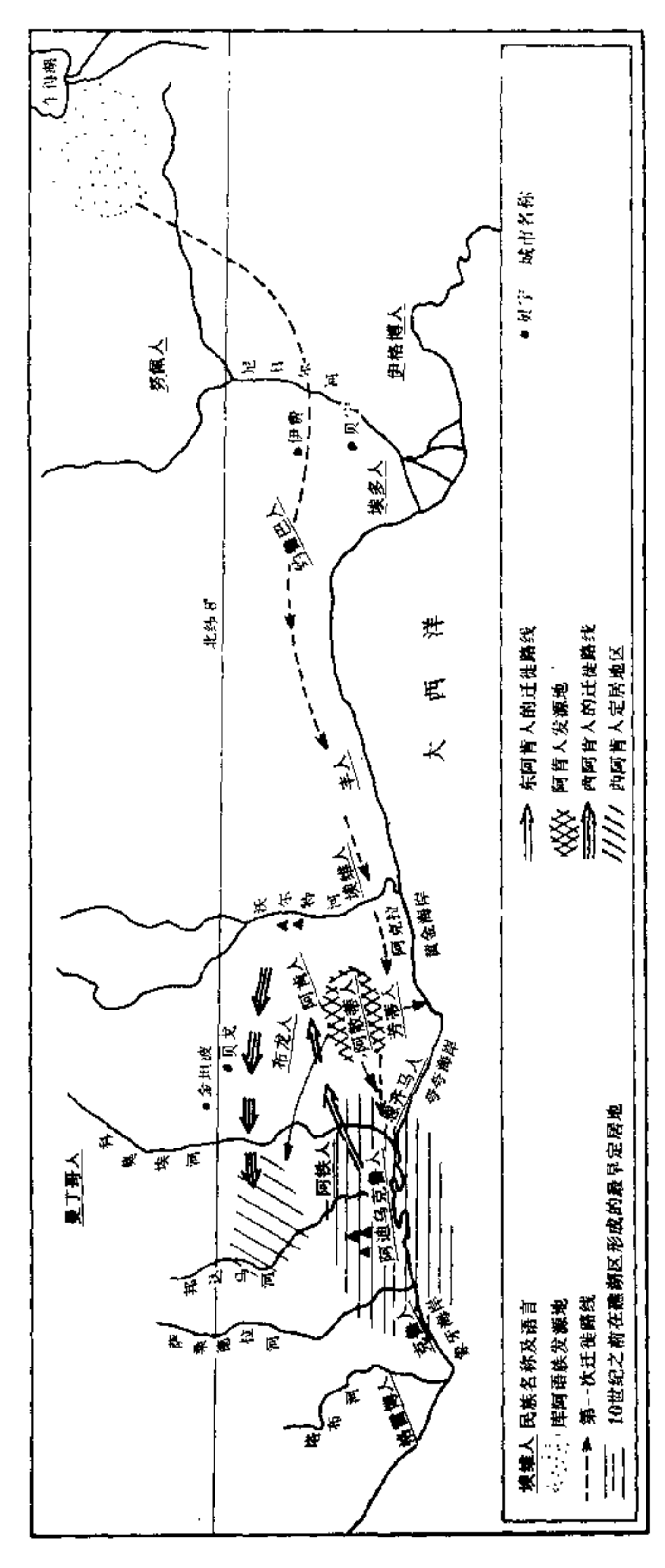


图13.2 阿肯人迁徙图(D. T. 尼昂)

礁湖区的人和阿肯人都属于克瓦语族。他们的语言是沃尔特－科莫埃语的支系。克瓦语族的祖先可能是分几个阶段从乍得－贝努埃地区，取道尼日尔河下流，穿越如今的贝宁和多哥来到礁湖区的。[14]他们建立了一系列至今仍有制约性的制度。许多移民离开了阿丹西而向西迁，与礁湖区人混合而产生了鲍勒、恩齐玛、塞夫维和阿尼诸族群。[15]

因此，应当注意三个居民中心(或集散区)：乍得－贝努埃起源地；礁湖区，即加纳阿肯人的出发地；阿丹西，即最后一次向西（科特迪瓦）迁移的起始地。考古学对这几次迁徙的研究迄今还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我们已了解到，贝戈附近的阿肯人(布龙族)早在1300年就已结成了若干个与曼丁哥人进行黄金和柯拉果贸易的组织完善的群体。[16]

礁湖区人民

这些人何时在此定居？估计是在12世纪之前。[17]我们已经知道葡萄牙人与克鲁人、芳蒂人以及其他几个沿海民族有过联系。到15世纪，克鲁人形成了几个以血缘世系为基础、各自独立的社会。"沿海地区的黑人是卓越的渔民，他们拥有前甲板带小舱的独木船，而且已会使用风帆。"[18]克鲁人，如人们所知，自古至今一直是优秀水手。据葡萄牙人记载，当时沿海一带人口稠密，有很多大村庄。我们知道，"小芳蒂港"、"萨布"和"大芳蒂港"的人们与埃尔－米纳人使用同一种语言。但各个社会都是各自独立的。航海家的记录告诉我们，这些社会的首领首先就是宗教领袖。[19]由于有礁湖和森林提供有效的保护，控制西部地区的克鲁人得以保持其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

通过葡萄牙人，我们得知礁湖区人民与内地人民进行过贸易；拉霍河一带的人出售食盐给内地人，还与他们进行"大宗服装贸易"。有证据表明，礁湖区人民并没有与邻近的森林地带和热带草原隔绝；交换的货物包括盐、鱼、织物、黄金和铜。 **335**

15世纪末，礁湖区的人生活在族长统治下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族长的权力主要是在宗教领域而不是在俗界。M.F. 哈里斯教授认为，克鲁人是阿希齐族(阿布拉人、尼古伊人和蒂阿加人)、阿迪乌克鲁族（布布里人和迪布里蒙人）以及埃布列－阿比亚族的始祖。[20]然而，就现有知识来说，看来很难断定这些支系是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16世纪初，西阿肯人，主要是礁湖区的人，组成了一个个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对这些社会的组织结构，我们知之甚少，然而首领们尽力维护自己政权这一趋势却是十分清楚的。

---

[14] J. M. 斯图尔特（J. M. Stewart），1966年。

[15] A. 阿杜·博亨，前引著作，第76－81页。

[16] 与M.波斯南斯基一样，A.阿杜·博亨也认为公元1000至1500年是阿肯人为他们的社会奠定基础的时期。

[17] 参阅《非洲通史》第3卷，第9章。

[18] 译自O.达珀，前引著作，第302－304页。

[19] O.达珀提到一位因有魔力而使沿海居民畏惧的国王；同上著作。

[20] M.F. 哈里斯（M.F.Harris），1974年，第135页。

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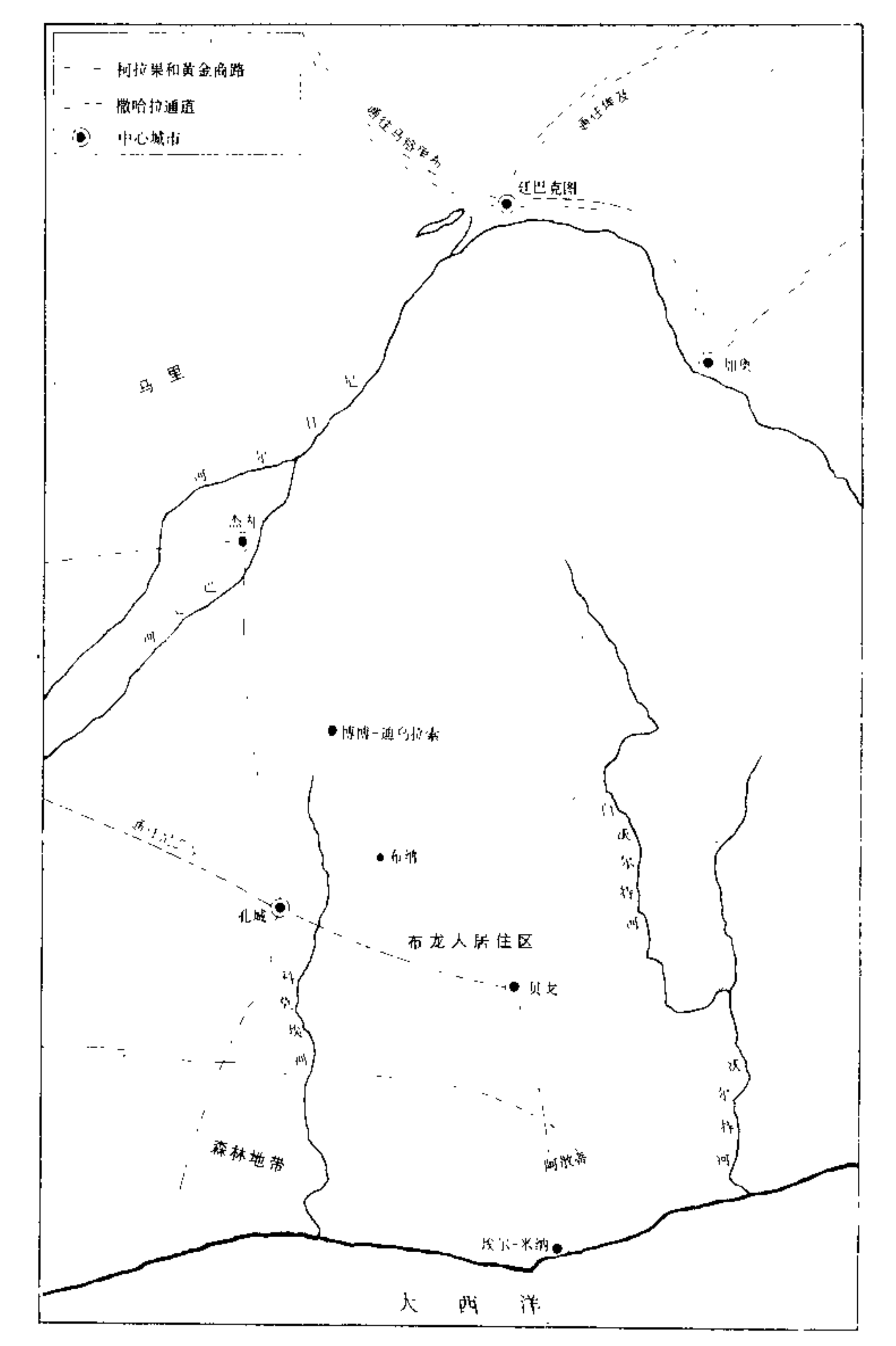


图 13.3 尼日尔河流域与几内亚湾之间地区形势图（M.波斯南斯基，邦杜库讨论会文集，1971 年）

阿肯人社会的起源

我们已经知道，因为礁湖区人是最古老的家系，所以实际上这一地区的人口主要由阿肯人组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证明，森林地带的人民相对说都属于同一族群，M.F.哈里斯教授认为，原因在于这个混杂的居民群最初是由三个家系繁衍出来的。主要中心在加纳而又人口众多的阿肯家系——除阿尼人外，派生出了鲍勒人、阿克耶人、阿布雷人、马卜托人、阿贝人、阿拉迪亚人、恩齐马人、埃布列人、阿迪乌克鲁人、阿克拉迪奥人和阿肯人。M.F.哈里斯教授还谈到我们提到过的克鲁家系，以及更早定居在那里的一些民族，诸如埃沃蒂尔人、阿格瓦人、基姆帕人等等。[21]

这些不同的支系什么时候从母系分离出来，至今仍是个没有弄清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东阿肯（加纳）文化的各项体制以及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否产生于15世纪之前。M.波斯南斯基研究阿肯人社会的论文提出17世纪是个转折点。他认为，在沿海一带和森林地带新出土的许多陶器证实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阶段。一些烧制陶器已经有了描绘得很好看的人物或动物形象。[22] 虽然考古学家至今并未从布龙人诸国（建立于15世纪初） 337 发现任何14和15世纪的铜和黄金制品，但铜和黄金在那里很早就已经开采了。我们必须把出土文物依照口头传说中的根据和按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来进行分析研究。为了填补15世纪（那是葡萄牙人来到非洲的时间）和17世纪（那是阿肯人诸国向外扩张的时间）之间的时代空白，我们必须从口头传说的保存者那里收集更多的资料；我们相信，以后的发掘工作会找到有关那里人民物质文化状况的其他证据。

无论如何，人们有理由认为建于15世纪初的阿肯人诸国在沿海地区和内地一带都曾得到发展：在沿海地区，阿寒布、费图、阿瓜福和芳蒂诸王国尽管在15世纪末规模还不大，但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开采和买卖黄金；在内地，贝戈曾是一个极愿与曼丁哥人进行贸易的布龙人王国的国都（插图13.3）。

阿肯人社会的基础

一般认为，是东阿肯各族发展了我们这里所谈的文化的许多方面。17世纪和18世纪的多次战争导致了向西迁徙，许多部落群体西迁时带去了文化中的最主要部分。

（1） 一种具有多种方言的共同语言。（在邦杜库研讨会结束时，C.旺济教授强调指出，今后，研究人员应将“阿肯”这个词作为一个政治词汇来使用，“特维”（Twi）这个词应指属于克瓦语族的一个语种）。[23]

（2） 母系权力继承制（从母方舅舅传给外甥）。

---

[21] M. F. 哈里斯，1974年，第135页。

[22] M.波斯南斯基，1974年，第46—48页。

[23] C.旺济（C. Wondji），1974年，第680页。

（3） 一个孩子两个名字的惯例，一个名字表示出生时为星期几，另一个名字由父族选定。

（4） 阿肯人历法：每月为42天。这看来是兼顾早先阿肯人的6日一周和穆斯林7日一周而产生的；但有关这一历法的起源尚有争论。[24] 据尼安戈兰－博赫说，它涉及到"有确切天数的宗教礼拜月。这种月份是为各省人民安排宗教活动服务的"。[25]

阿肯人的音乐和舞蹈完全相同；他们在甘薯收获季节都要举行宴庆和其他庆祝活动。每个阿肯人都同时属于两类氏族，即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母系氏族共有8个，父系氏族共有12个。按A.阿杜·博亨教授的看法，在阿肯人的宇宙起源论中，两类氏族互为补充：母系氏族给予一个人血液，而父系氏族决定一个人的性格、精神和灵魂[26]。阿肯人社会据以形成为民族的一些文化特征是很容易识别的。

338

阿肯国家的权力是高度集中的。各个国家均由若干个城镇和村庄组成，它们受一位国王和一位王后的管辖。每个阿肯国家都有自己的神殿，国王很重视祭司的话。值得注意的是，在宫廷觐见时王后坐在国王身旁。据H.迪阿巴特说，原先是由女王摄政，似乎是王国诞生之后才改而由男人掌权。然而，王后仍然继续参与权力的行使。[27] 看来，这些氏族在14世纪和15世纪"尚以互相分离的实体独立存在，无需一个共同的首领时"，可以奉女王为头人；[28] 但在为生存或扩张而需频频发生战斗时，他们就愿意有一个能随时领导战斗的首领。[29]

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16世纪末，这些王国的组织结构已臻完善。由于防卫的需要，女王的作用必须要靠一个与她分享权力的战争领导人来加强；因此，男性国王的出现是血亲社会向王国过渡的标志。从此以后，国王的作用就偏重于政治，而不是礼仪性的了。

结 论

从13到14世纪，在礁湖地区得到发展的是互不依赖、独立自治的血亲社会。当时，社会劳动分工已经开始。举例而言，克鲁人捕到很多的鱼，便将剩余部分卖给他们的一些邻族。于是，商业活动沿海岸向北发展。沿海人民出售食盐，其他地区的人则提供织物。黄金对长期从事柯拉果贸易的曼丁哥人的吸引力相当大；公元1500年之后，他们离开贝戈，穿过布龙地区，远到埃尔－米纳，再次与他们曾在塞内冈比亚见过面的葡萄牙人接触。阿肯人居人口的多数，早在葡萄牙人来到之前，在15世纪末，就已建立起王国和城邦。

[24] J.古迪（J.Goody），1966年。

[25] 尼安戈兰－博赫（Niangoran-Boah），1967年，第9－26页（未进一步提供细节），根据A.阿杜·博亨所引用，前引著作，第69页。

[26] 同上，第70－71页。

[27] H.迪阿巴特（H.Diabaté），1974年，第178－180页。

[28] R.S.拉特雷（R.S.Rattray），1929年，第81页。

[29] H.迪阿巴特，前引著作，第185页。

14 从沃尔特到喀麦隆

A.F.C.赖德

生态与语言

339

从沃尔特河到喀麦隆之间的滨海地区，8个世纪前的概貌与今天人们所见的区别不大。至于内地那一片几乎占尼日尔河三角洲大部分的淡水沼泽，以及那热带雨林区，受大规模移民开拓的影响则更要小得多。从那时以来，伐木和旱季野火几乎将一半的原始森林地带变成了衍生草原。多哥和贝宁的原始森林比尼日利亚要少，每年发生的森林火灾实际上已将原始森林植被焚毁殆尽。尼日尔东部，由于农业开垦，结果使数百平方公里的原生雨林完全消失，代替它的是大片油棕丛林（插图14.1）

原始森林的砍伐，自几千年前各黑人民族最初定居此地时即已开始。铁器制作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大加速了森林砍伐的进程，同时也促进了狩猎和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公元5世纪，铁器的应用已渗入到森林地带的所有地方，定居人数大增。有关这方面的传说在约鲁巴人中流传甚广；从历史上说，约鲁巴人看来是这整个地区最重要的居民，对他们语言的不同方言所作的分析研究表明，他们的扩张是从森林趋向草原。显然，语言学分析与历史传说也有矛盾之处，但这可以参照从森林到草原，又从草原到森林的移民运动来解释。

现已查明，约鲁巴方言可分为三大群。[1]其中，中央方言群（包括伊费、伊莱沙和埃基蒂地区）和东南方言群（包括翁多、奥沃、伊卡雷、伊拉杰和伊杰布地区），据认为是具有古代特征、因而是较早的移民使用的方言。在12世纪的时候，这些地方全都是森林地带。第三个方言群，包括奥约、奥森、伊巴丹以及埃格巴地区的北部；这一西北方言群在历史上与奥约帝国密切相联，不如前两个语群古老。这一分析与伊费神话相一致。伊费人的传说认为人类的发源地在伊莱－伊费；塞缪尔·约翰逊在19世纪末记述的源自奥约的神话则认为，约鲁巴人的祖先是东方来的移民。[2] 341

对埃多人的语言进行类似的分析表明，他们的方言也可分为南、北两大方言群。作

[1] A.阿德图格博（A.Adetugbo），1973年。
[2]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92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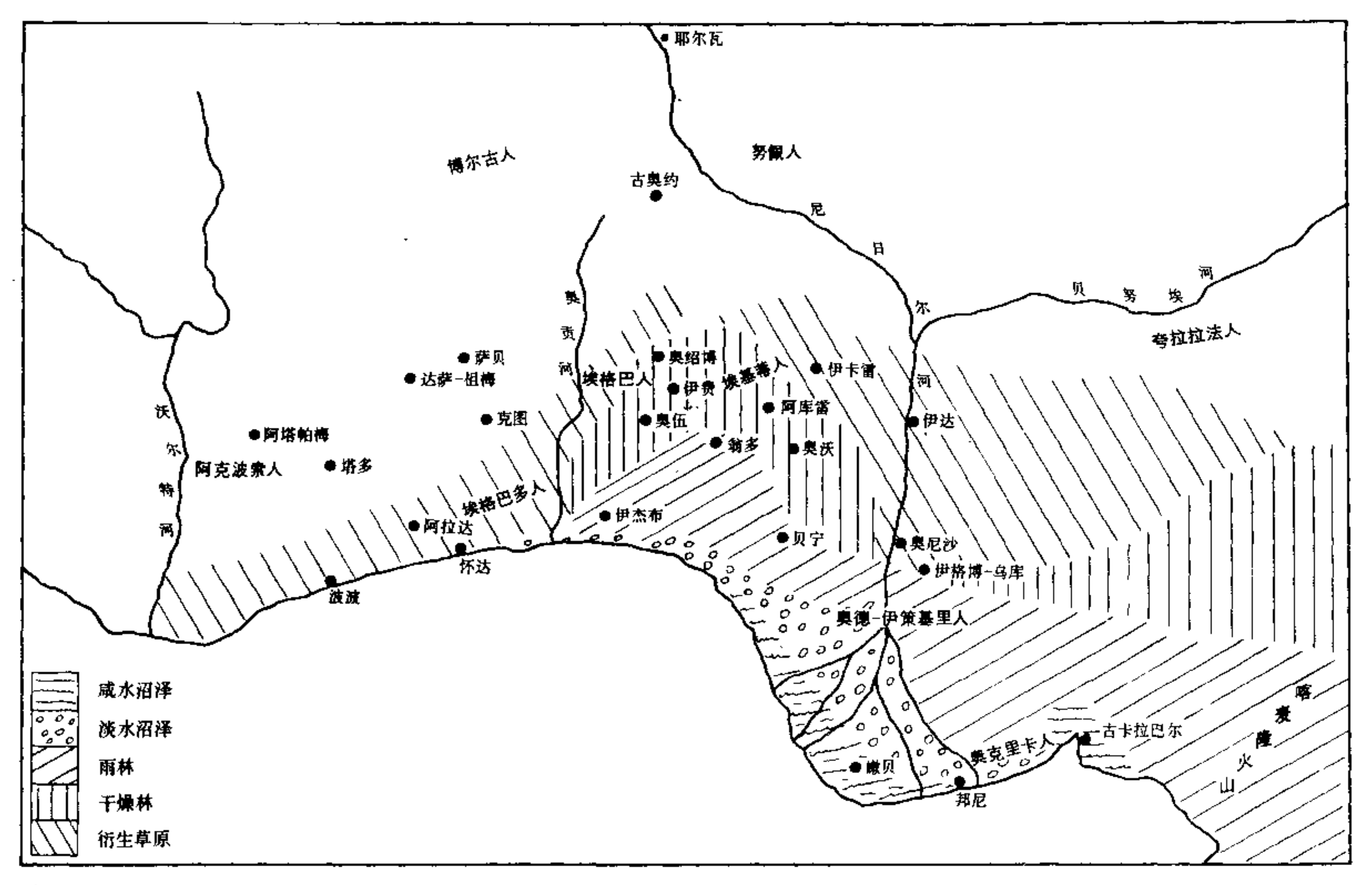


图14.1 1100—1500年沃尔特河与喀麦隆之间地区形势图(A. F. C. 赖德)

为历史上政治和文化发展中心的贝宁王国的方言属于前者。但这样分类，是否与历史上的定居与分散相符合，现在难于肯定。[3]对伊格博人方言的系统分析研究，尚有待进行。有一种假设认为，伊博人是从奥韦里-乌穆阿希亚附近的故乡向北、向东北、向西和向南方扩张的。[4]据考证，伊乔人迁徙的出发地是尼日尔河三角洲中部及其毗邻地区。总之，目前所有的证据充分说明，千百年来在历史发展上起过重大作用的许多民族的发源地都在森林地带。

在本章所涉及时期之初，这地区的语言当然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分布情况也不一样。那时它们相互间在形式上比现在更为接近；那种认为克瓦语族的主要语言分离已有数千年之久的同源语言演变史学的研究方法，现在已完全不为人相信了。那时这个地区语言的类别也可能比现在更多，有些语言肯定已被强大的胜利者所同化。这在如今一系列语言中，可以找到根据，有些语言只在一两个村庄里使用，由于地点偏僻和交通不便，它们得以在约鲁巴人和埃多人推进的夹缝中幸存下来。[5]1100－1500年间，一些民族为了在原先弱小民族居住的或尚未有人居住的广大地区占有语言优势，有时甚至是为了建立政治统治，而大力向外扩张，因此，语言的同化过程有了重大的发展。这种扩张最为惊人的后果是由此而建立了奥约、贝宁和伊费这样一些幅员辽阔的大国。当然，并非任何情况下总能导致这样的结果；例如，伊博人的扩张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强大的伊博国家，反而形成了一个个以小世系氏族为基础的独立居民点（插图14.2）。 **343**

血亲社会

血亲社会是指那些尚未形成中央政权的社会，若干氏族或若干世系相伴而住，但相互间完全独立。族长或氏族首领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每一族人都开垦一片或大或小的疆土，农业技术相当原始，为寻求优质土壤就要向外迁徙。对甘薯和油棕的深耕细作，促成伊博人开拓和垦种尼日尔河以东大部分森林地带。在伊博人的开拓区，大量砍伐树木使森林面积大大缩小。[6]这种向外扩张的另一结果是推行对土地的精耕细作，同时出现许多较大村庄。最后，个人具有政治权威的国家和组织完善的城市才发展起来

在伊博人中，有许多血亲社会始终保持独立；与此相对照，别处已经出现在世系群体之上有中央政权（一个国王、一群大臣和朝廷）的社会。因此，一方面是世系血亲社会，另一方面则是政权比较完备的城邦或王国，两者并存，区别相当明显。但当时更普遍的形式还是那种分散的、有明确疆界的村社组织。

能给一个向外发展的民族提供一定量土地的这情况的后果并不都是等同的，为了获得可以定居的土地，某些群体不得不离开他们的近亲去向他们并不熟悉或毫无亲属关系的其他一些群体乞求土地。

③ B.O.埃卢格比（B.O.Elugbe），1974年。

④ S.奥顿伯格（S.Ottenberg），1961年。

⑤ 摘自伊巴丹大学语言学与尼日利亚语文系教授卡尔·霍夫曼（Carl Hoffman）的个人信件。该语言群的性质和内在联系尚有待研究。

⑥ E.J.阿拉戈亚（E.J.Alagoa），1972年，第189－19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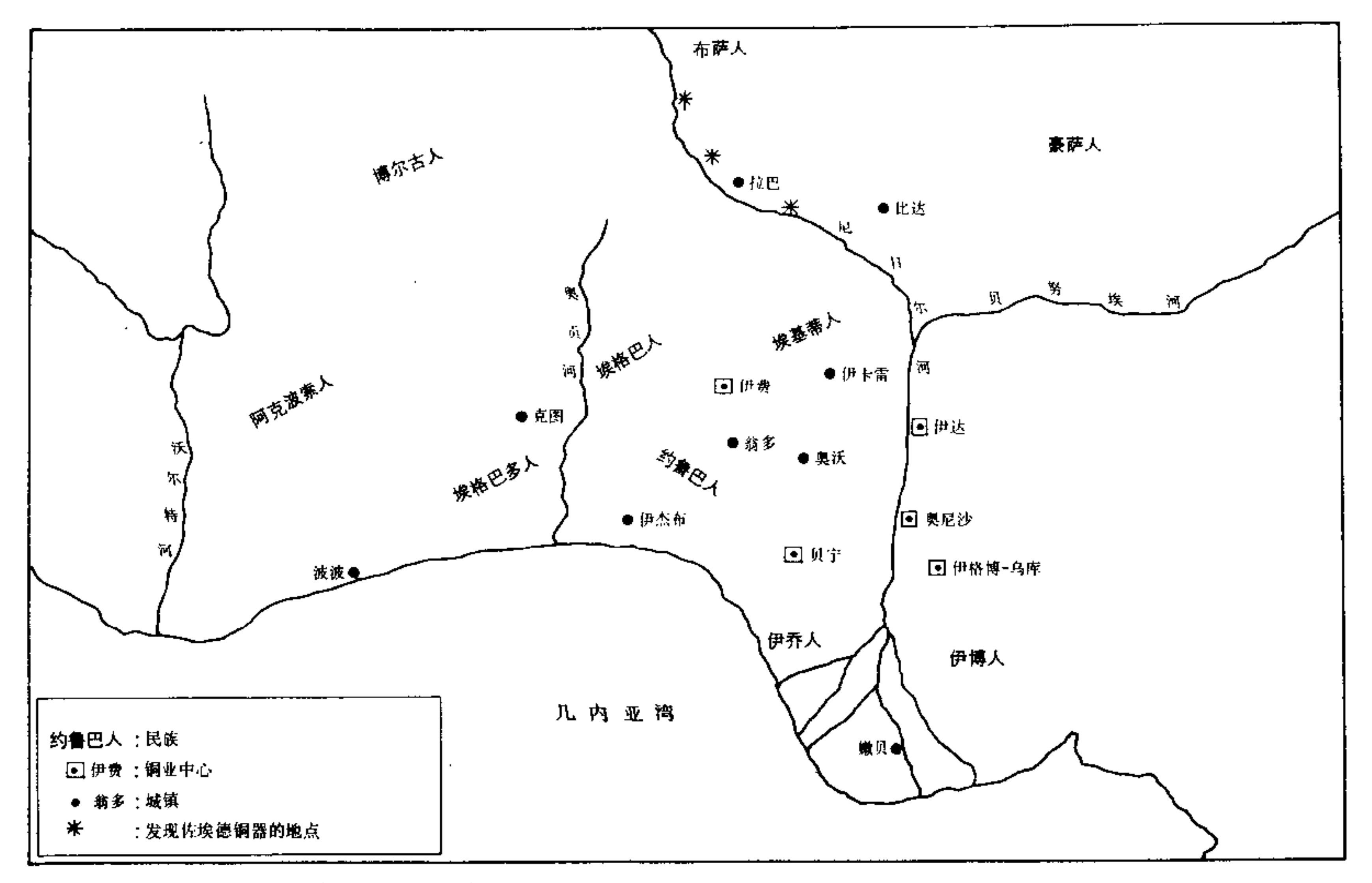


图14.2 尼日尔河三角洲居民分布图(D·T·尼昂)

在森林地带，仍然有许多世系群体与王国和城市相并存。他们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在族长的神权甚于政权的统治下生活。山地提供的防护有助于多哥的阿克波索人保持他们"不存在国家"的社会。但大多数民族则感到，他们不得放弃那种组织形式而与邻近的世系亲属联合在一起，组成大型的以村庄为单位的村社，以便有效地抵御来犯之敌。有些地方，敌人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他们抗击外来者以保卫自己的疆土。伊费人早期关于与土著伊格博人进行长期战斗的传说很可能指的就是这种情况。[7]奥沃人也有类似的传奇故事，讲的是与一个称为埃菲内的民族进行战争的事迹。但是，防御的目的，并非总是要组织一个与分散居住形式不同的村庄。

举例而言，从淡水三角洲迁移到咸水沼泽地带的伊乔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渔业兼农业经济而转向渔业兼煮盐经济。早先，他们生活在自治居住地中，由最年长的长老主持召开全体成人男性参加的大会进行统治。但是，新渔村由若干个根本没有血统关系的世系群体组成，为了争夺少如凤毛麟角的居住地不得不与其他村庄激烈争斗。在这种情况下，担任领导者的标准就不再是年龄，而是能力和是否占支配地位的世系群体的成员——通常是创业祖先的子孙。 **344**

除了逐渐形成新的权力形式之外，村庄还促使各种超越世系血缘关系界线的组织脱颖而出。最有代表性的是同龄会和秘密会社。同龄会把村里的男子（在绝少的情况下也可以是女子）分年龄组织起来为整个村社服务。他们一般将男子按年轻和年长分成两组；有时还分别青年人和成年人，形成三个组。成年男子组成村庄的战斗力量，年长者则组成议事会。每个同龄会员的入会仪式都有助于加强与世系关系相对立的村庄的力量；这种入会仪式在秘密会社中割断家族对其成员的束缚，使他们忠于村社，在加强村社的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8]

人们全都相信家族的幸福由祖先的神灵保佑，族长代表全族侍奉祖宗神灵，而村长则与能给整个村社带来幸与不幸的神灵力量保持一种特殊关系。

与村社紧密相连的宗教观念的出现，已为伊乔人对阿马－特梅－苏奥和阿马基里的崇拜所说明。他们对阿马－特梅－苏奥尤其崇拜，因为它代表了"村社本身的特点和有生命力的精神，村社的命运（和历史）完全取决于它"。[9]

在12世纪时，村庄这种组织形式究竟分布范围有多广？我们已知的几个最古老的疆域明确的邦国大致始于这个年代，这一事实表明，当时至少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干燥林地带，肯定已经有了村庄。由于缺乏可断定某一遗址是村庄还是分散居民点的必要手段，目前由考古得到的证据对回答这一问题还没有多大帮助。所以，我们还不能断定究竟是哪种居住形式的居民生产了在伊莱－伊费出土的木炭，经放射性炭素测定其年代是在公元560至980年间。在尼日尔河岸边的耶尔瓦遗址周围也有类似的疑点，许多考古发掘出来的地下埋藏物证明那里在公元100至700年间曾有人长期居住。今后只有对一些大型遗址进行广泛的考查研究，才能证实那个地区是否确实有过村庄，并断定它们出现的年 **345**

[7] 不能把伊费传说中提及的伊格博人与现今居住在尼日利亚东部的伊博人混淆起来。

[8] 同龄会和秘密会社，在从塞内加尔到赞比亚，包括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在内的大多数非洲社会中，都可看到。同龄会对于狩猎和耕作等集体劳动是理想的组织机构。

[9] E.J.阿拉戈亚，前引著作，第200页。

代。[18]

解决问题的另一途径是对有关民族起源和迁徙以及有关宗教、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传说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在伊乔人中进行这类调查研究，已使我们能测定出这个民族经由尼日尔河三角洲向外分散建立定居点的位置，时间肯定开始于12世纪结束以前。我们还可以推断出伊乔人的村庄形式定居点也出现于那个时期，正如上文所述，正是这类分散进入新环境的居住形式产生了新的政治机构。

如果按考古学的证据目前还很难对一个分散的农业定居点和一个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的村庄加以区别，那么，要证实在那时期是否存在一些大于村庄的政治实体就更难了，但无论如何，还是有充分理由来假定这样的政治实体确实存在，也没有必要从别处、甚至从苏丹去寻找外界因素以解释西非森林地带“不存在国家”的村庄演化成为城邦的过程。R.霍顿用以解释从分散的世系群体定居点转变为集中的村庄的模式表明，在转变过程中，“国家”的一些最基本的机构似乎是经过内部的适应变化而开始出现的。[40] 领导地位不再是过渡性的；新兴的世系获得较大的权力，随同非世系倾向的村社的出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建立在共居一地和遵守共同法律基础上的政治一体化原则是君权原则的基础。

王国与城市

一旦村庄这种居住形式稳定下来，只要土地肥沃，它就会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的村社；这种发展又导致建立有效军事组织的必要。很有可能是商路和货物交换在城市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森林地带也是如此，城市一旦形成，就必然成为吸引商人的经济中心。所有迹象都可以证明，城市是在一种竞争（即使不是敌对）的气氛中形成的。富有侵略性的城市，靠吞并其他城市和土地来扩大自己的领土。森林对这种扩张是一大障碍，它限制了城市的疆域范围。行使权力的范围能超出60公里以外的城市绝无仅有。在60公里以外，城市就要依靠“臣属”或血亲关系的首领来治理了。

346 我们在前文中强调森林国家起源于本土，这意见不应解释为否认一切外来影响。一个初生的国家很可能借重一位外面的可依靠的统治者，发生在森林国家之间的这类事情，已经得到证实——贝宁国剑和首领称号的外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没有理由认为类似的交流在森林与草原各国间就没有发生过。加纳统治西苏丹的时期，在草原和森林地带几个权力中心之间，就有过这种惯常的、带有体制性质的交流，它象铜和盐之类昂贵商品的流通一样。

12和13世纪期间，由于柯拉果、黄金和铜的贸易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草原民族便开始向森林地带扩张。曼丁哥人、万加拉人以及豪萨人很早就与森林地带的民族发生接触，这些接触有军事性的，也有商业性的。[41]

[39] 建房最早使用的材料是木头和芦苇；大约在公元900年左右，人们开始用土坯建房。在森林中的易地耕种地区和在草原地带，村庄迅速发展起来，它们由小道和大道构成的交通网络相接。

[40] R.霍顿（R. Horton），1971年。

[41] 可以肯定，早在9或10世纪，塔凯达出产的铜已传到伊费、贝宁和伊格博－乌库。

伊乔人自治的、"不存在国家"的村庄转变为具有国家性质的村社，这是明显的未受重大外界影响的国家发展的一个例证。在尼日尔河三角洲东部的一些渔村里，头人们都有"阿马尼亚纳博"（*amanyanabo*，"城市主人"）的光荣称号；因需用鱼和盐换取自己不能种植的粮食，这就促进了这些村庄与内地伊乔人和伊博人的贸易，而这种贸易反过来又加强了国家机构的权力。于是，村庄变成为城市，其首领变成为国王或"城市主人"。

约鲁巴人

当时，最重要的国家合成体是各约鲁巴语族的联合，它从西面的阿塔帕梅一直延伸到东面的奥沃，从南面的伊杰布和奥德-伊策基里一直延伸到北面的奥约。其起源不像伊乔人各国那样容易辨明，因为两个约鲁巴国家——伊费和奥约的威望在其他地方的传说中受到强有力的渲染。举例而言，有人认为，波波人祖籍伊费的说法开始于18世纪他们被奥约征服之时，当时征服者为了证明自己有理由统治整个"约鲁巴"民族而非常重视与伊费的联系。[13] 显然，起源于伊费的一切说法，不论是由民族还是王朝造成的，都不能以其表面涵义为依据。

再如从伊乔诸国看，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因为那里有许多起源于贝宁的说法。对这些传说有人分析说：

> 起源于贝宁或其他遥远地方的说法，实际上反映了伊乔人对起源问题所持的一种特殊态度，也就是对那些并不清楚自己祖先的个人和群体抱有很深的成见。因此，当一个群体已不再记得原先发源地的情况下，他们就很可能选择一个认为是强大、古老和遥远的地方作为发源地，这不至于对他们的自治地位造成威胁。[14]

347

就伊乔人来说，对祖先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一点也不独特；这种类似的感情无疑也影响了约鲁巴人和其他许多被迫自称是起源于伊费的民族。有些地方，只要有一位源自伊费或确实来自另一个约鲁巴国家的统治者，似乎就会使全体居民都声称自己的祖籍是伊费。[15]

如果我们接受约鲁巴人的故乡是中央方言群和东南方言群地区的这一说法，那么我们就必须在那个地区寻找约鲁巴国家体制的起源。认为伊费是第一个约鲁巴人国家，这种说法给人印象是非常深的。现存的大量关于伊费建国者奥杜杜瓦的各种传奇故事，甚至包括那些来自奥约的传说，都承认伊费的这种领先地位。目前还没有发现把这种荣誉让给其他任何国家的传说。对该城伊塔-耶莫遗址出土的木炭进行的放射性炭素测定证实了这一观点，因为测定的年代为公元960至公元1160年，比任何另外的约鲁巴城市废墟出土的木炭年代要早。[16] 此外，该城靠近森林的北沿更能证实此种看法，因为这可以说

---

[13] R.C.C.劳（R.C.C.Law），1973年。
[14] E.J.阿拉戈亚，前引著作，第187页。
[15] 对地名的研究也有助于查清国家的起源。目前，在这一探索领域中，民间词源学仍占绝对优势。
[16] 必须承认，目前还只有少数几个约鲁巴人的遗址经过考古发掘。

明该城居民经受来自草原民族的压力比其他地方的人要早。

起源

根据伊费的传说，约鲁巴人的第一代国家是在来自伊费的奥杜杜瓦的子孙领导下产生的：这些国家是奥佤、克图、贝宁、伊拉、萨贝、波波和奥约。但这些国家绝不可能像传说中讲的那样同时产生。对波波的情况我们已有所论述。萨贝国王的名册中只列有21位的名字，克图国的则不同，共列有49位国王的名字，伊费国王也列有47位。另一方面，传说中最早的约鲁巴国家不包括伊杰布，而伊杰布很可能正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它有52位统治者列名。显而易见，关于这些国家产生时代的先后和形成的方式，尚有待作深入的探索

典型的约鲁巴国家都很小，一般只是由一个城镇及其周围几个村庄构成。在最近几世纪，仅埃基蒂一地就不少于16或17个王国，没有理由认为这些政治实体有实质性的大小之分。埃格巴多人的城镇似乎从未形成过较大的国家或联邦，相反，埃格巴人与伊杰布人一样，他们所组成的与其说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王国，还不如说是一些小国家合成的联邦。埃雷多（*eredo*）地震时128公里的震波正可以确切测定杰布人的疆土有多大。即使伊费本身，它看来也没有把它的统治扩张到很大一片土地。[⑰]在约鲁巴势力影响东北边缘的阿科科人也没有大于村庄的政治组织。

348

在这些小邦国中，奥约王国是个明显的例外型态，但它显出"帝国"的特征相当迟，甚至已经到了17世纪初期。这种独特的发展过程，可以从奥约帝国赖以生存繁荣的那种草原环境来解释；在草原上活动要比森林中容易得多，从而能有效地使用骑兵，并把大量步兵调动到较远地方。实际上，奥约帝国在发展过程中还受到近邻的草原国家博尔古和努佩的影响，其程度要比受约鲁巴森林各邦的影响更大。奥约要得到巩固，它首先必须胜过北方的敌手，然后才能放手地去征服约鲁巴人中的敌手。按照奥约国王世系表，可以断定这个王国是在15世纪初期建立的；全然可以断定，奥约人在努佩的压力下，16世纪上半叶曾一度弃守都城。目前已经发现的最早考古证据，看来都与奥约人在16世纪末重占都城的时代有联系。简单说来，在15世纪末期，奥约王国不像是有多大的发展。

伊费

就伊费在整个约鲁巴历史中所占的中心地位而言，我们对伊费的历史实在了解得太少了。尽管对传奇式的建国者奥杜杜瓦和他以后的几个继承者的情况我们有比较具体的了解，但关于以后年代的口头传说，为我们提供的只是为数不多的一些支离破碎的叙述。考古资料提供的证据对填补这一空白有一定的帮助，但这种研究才只刚刚起步。伊费国家的最初历史阶段大约始于11世纪，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居住分散、广泛采用四周铺有陶瓷片的地面，已有了玻璃珠工业和十分完美的赤陶工艺，这一工艺专门用于生产自然主

⑰ A.阿德图格博，前引著作，第193页。



图片14.1 赤陶头像（奥沃，尼日利亚）

义的雕像，特别是人头雕像。由于具备这后一种特征，人们往往设想伊费的文化和诺克文明有某种联系，虽然两者之间相隔千年。更有意思的是，伊费的赤陶工艺与在约鲁巴人的其他文化中心发现的十分相似。在奥绍博附近的伊金隆和伊雷，在伊卡雷附近的伊丹雷都发现了许多与伊费风格十分相似的头像；最近，颇为有趣的是在奥沃出土了一大批15世纪的赤陶雕塑（图片14.1）。这种艺术风格分布之广，可以说明当时伊费的影响范围确实很大，但也表明这一文化特点在约鲁巴人中间广泛传播，主要是与宗教习俗而不是与伊费的王权相联系的。换句话说，伊费只不过是生产这类工艺品的几个中心之一，将这一艺术风格一概归为伊费所独有的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在伊费，经常与赤陶塑像在同一场合发现的陶瓷碎片铺饰的地面，同样也不是该城所独有。人们在奥沃、伊法基、伊克林、埃德、伊塔吉、埃基蒂、伊卡雷，甚至远在今日贝宁共和国的克图和达萨—祖梅以及多哥的卡布拉伊斯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地面。在耶尔瓦一座公元700年以前的遗址中、在乍得湖附近达伊马的8世纪文物和贝宁14世纪前后的遗址中，也都发现这样的地面。到目前为止，在伊费发现的最早的陶瓷碎片地面的年代，是公元1100年左右，后期的地面有玉米棒的痕迹，这说明这种地面的年代不可能早于16世纪。[18]在此以后，陶瓷碎片地面连同赤陶工艺逐渐消失，这或许表明16世纪时发生了某种使伊费惨遭毁灭的灾难。有25个伊费“青铜”头像（实际上是黄铜或铜制品）与赤陶制品在风格上竟是如此之相似，很可能就是那场灾难前夕制成的，那时葡萄牙人已运来黄铜和铜，从而有了较多的金属铸件。目前我们只能推测，毁灭这种文化的事件是何性质，最好的解释似乎是伊费当时被一个外来王朝所征服。

如果对伊费历史的上述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当地的统治王朝就是16世纪所建的那个王朝。他们在当地修筑了宫殿，围绕城中心地区筑了城墙。也许新王朝保存了旧王朝的某些政治和社会制度，但我们并不认为新旧政权相似的特点在政治上会比艺术上更大，因此，要准确描述16世纪之前伊费政权的形式是不可能的。这样也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许多约鲁巴国家所说的与伊费的关系，究竟是属于伊费历史的早期还是晚期：因为近代的登基仪式和王室徽记在大多数约鲁巴地区，包括伊费在内，是如此之相似，又因为这些徽记与伊费早期王室官员所佩戴的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近代约鲁巴人的王权产生于伊费晚期，虽然各个约鲁巴国家最初也可能是仿照早期伊费的模式建立的。

在15－16世纪，西苏丹各国的兴衰存亡可能都直接影响到几内亚森林地带国家的形成过程。15－16世纪期间，就在本章所论述的这些国家的北面，新建（更可能是重建）了几个重要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博尔古、伊达和夸拉拉法王国。[19]它们的出现和扩张，可能有助于说明毗邻的南方各国当时发生的动乱。我们知道，在16世纪早期，努佩人就把约鲁巴人赶出了古奥约，而且在约鲁巴人四分之三世纪后重返他们的国都之前，奥约已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他们重视骑兵，因为骑兵是草原国家军队的重要进攻力量。奥约人

[18] 玉米原产于新大陆，葡萄牙人于16世纪将玉米传入非洲。

[19] 对热带草原和森林的关系我们所知甚少，鉴于贸易的重要性日益明显，那时的关系可能比今天还要密切。参阅瑟斯顿·肖（Thurstan Shaw），1970年，第251页。

还模仿努佩人对祖先的崇拜，他们重新复国的某些特征也可能来自努佩。

贝宁王国

贝宁是葡萄牙人抵达西非海岸后来到的第一个国家，两者很快便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贝宁位于伊费的东南，建立王国的时间可能要更早一些，大概是在12世纪。贝宁看来在15世纪经历了一次与16世纪降临到伊费头上的有些类似的变化。尽管13世纪前在埃多人中可能已经存在某种国家形式，但真正的王国的建立要归功于贝宁和约鲁巴传说中的奥兰延，此人是伊费颇有声望的统治家族的后裔，据说在公元1300年左右，他受几位贝宁头领的邀请，被他的父王派往贝宁。

根据口头传说，伊费最初几个统治者的权力受到土著头领世袭等级势力的严格限制，这种头领人们称为"奥扎马"（*ozama*）。然而，这一世袭等级的各种称号和组织很有可能来自王朝本身，因为这些称号与约鲁巴人一些最为普通的称号十分相似，这个特点只能以一方对另一方的模仿来解释。[20]这6个奥扎马头领看来起着某种政治作用，这与以后奥约的7个具有奥约梅西（*oyomesi*）称号的头领所起的作用十分相似。根据R.霍顿关于国 **352** 家形成的说法，我们可以认为，以国王为一方和以代表部落群体的头领为另一方之间的权力均衡，在各处都以同样的基本格局变来变去，而万变不离其宗。据传说，贝宁王朝的第四代统治者曾试图通过与奥扎马头领的一次武装较量来改变这种平衡，使之有利于自己。他随即迁移到一座更加宏伟的宫殿，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朝廷，并为其官员规定了许多非世袭的称号；然而在实力强大的奥扎马头领面前，他和他的继承者的地位也不过是略为高出一点而已。

到了15世纪，一场严重的动乱将这个君权有限的政体转化成为独裁政体，而这个小国也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王国。口头传说把所有这些变化归功于一个名叫埃瓦雷的统治者，他靠驱逐和杀害他的一个弟弟才登上王位；据说在这场斗争中，首都大部被毁。对这类合法的兄长与图谋篡权的兄弟之间关系的事件，历史总是把它解释成为保持王族必要的合法继承顺序所做的努力，好像为此目的，其他一切均可不顾。但是，人们更多看到的却是埃瓦雷登位时如何使用暴力，以及贝宁被外界力量占领后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城市

埃瓦雷按一项新计划重建了他的国都，并将它命名为埃多，这个名称一直流传至今。[21]在该城中心区开挖了巨大的深沟河，并修筑了高大的城墙。像伊费城墙一样，埃多的城墙横穿那些旧建筑。在城墙以内，一条宽大的街道将宫廷与"市镇"分隔开来，所

[20] 除非约鲁巴和贝宁的称号都来自外界同一来源，埃多人的称号为*oliha, edonen, ezomo, ero, eholo nire* 和 *oltoton*；与之对等的约鲁巴人称号为 *olisa, odofin, ojomo, aro, osolo* 和 *oloton*。

[21] 所有非埃多人都知道"贝宁"是这个城市和王国的名称，但这个名称有时颇令人费解，民间词源学对它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可能最初到达海岸的葡萄牙人使用了贝尼（*beni*）这个名称（伊乔语中意思为"水上居民"），以后又将它错用到了埃多人身上。

谓"市镇"，也就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行会工匠和祭司居住的街区。宫廷本身由三个部门组成——保管库，统治者私人侍从居住区和妻妾居住的后宫。每个部门都有专职人员，与埃多村庄的同龄会一样，按年龄分为三级。市镇的各个行会也有类似的按年龄分级的结构，并都隶属于一定的宫廷部门，宫廷中年长者级别的成员享有个人终生头衔。有理由认为，埃瓦雷曾以强制性的短期服役制度，使所有的自由臣民与宫廷组织挂勾，服役期满后大多数人回到自己的村庄。埃瓦雷授与自由民"奥巴之奴"（slaves of the *oba*）的称号，借面部刺纹来进一步加强自由民对统治者的人身依附关系。

353

埃瓦雷的政府

经埃瓦雷改建的贝宁政府依靠国王和三类有头衔的头领进行统治：世袭的奥扎马头领、宫廷头领和埃瓦雷本人创设的市镇头领等级。这个统治集团中的年长者组成议事会，就国王提交给它的问题与国王进行商讨，他们每一个人都受命监管王国之下的几个从属国。较年轻的两个级别则提供信使、士兵和宫廷所需要的其他人员。当时另外一个重要的法制上的发展是实行王位长子继承制；埃瓦雷授与他的法定继承人以埃达肯（*edaiken*）的称号，并将它列入与奥扎马同级。在宗教领域里，埃瓦雷（贝宁人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魔法师）提倡隆重庆祝一年一度的伊古节，使统治者所特有的神力得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伊古节期间，他可以重振生命活力。

建立一个强大的王国是埃瓦雷取得的一大成就。在这过程中，他不断地与邻邦交战。他亲率军队，先后征服了埃多其他民族，许多是居住在尼日尔河西岸的伊博人，同时还征服了约鲁巴东部一些地方，据说包括阿库雷和奥沃两个城镇。较远的被征服者都向贝宁纳贡，以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其余的也臣服于按贝宁模式建立的政府，这些政府的首脑都是埃瓦雷王朝的王子；只有首都周围64公里以内的被征服者直接受贝宁统治。在这中心地区，即王国本土，仅只国王一人有权判处死刑。

口头传说中并没有提及可以解释埃瓦雷为其扩张行动成功而实行的主要军事改革。他取胜的秘诀可能在于他召集臣民服役的方式。他不仅能调集到优胜于敌方的军队，而且能够征集许多体格强壮的臣民参战。他必须不断地发动侵袭，依靠战利品和贡物来维持对外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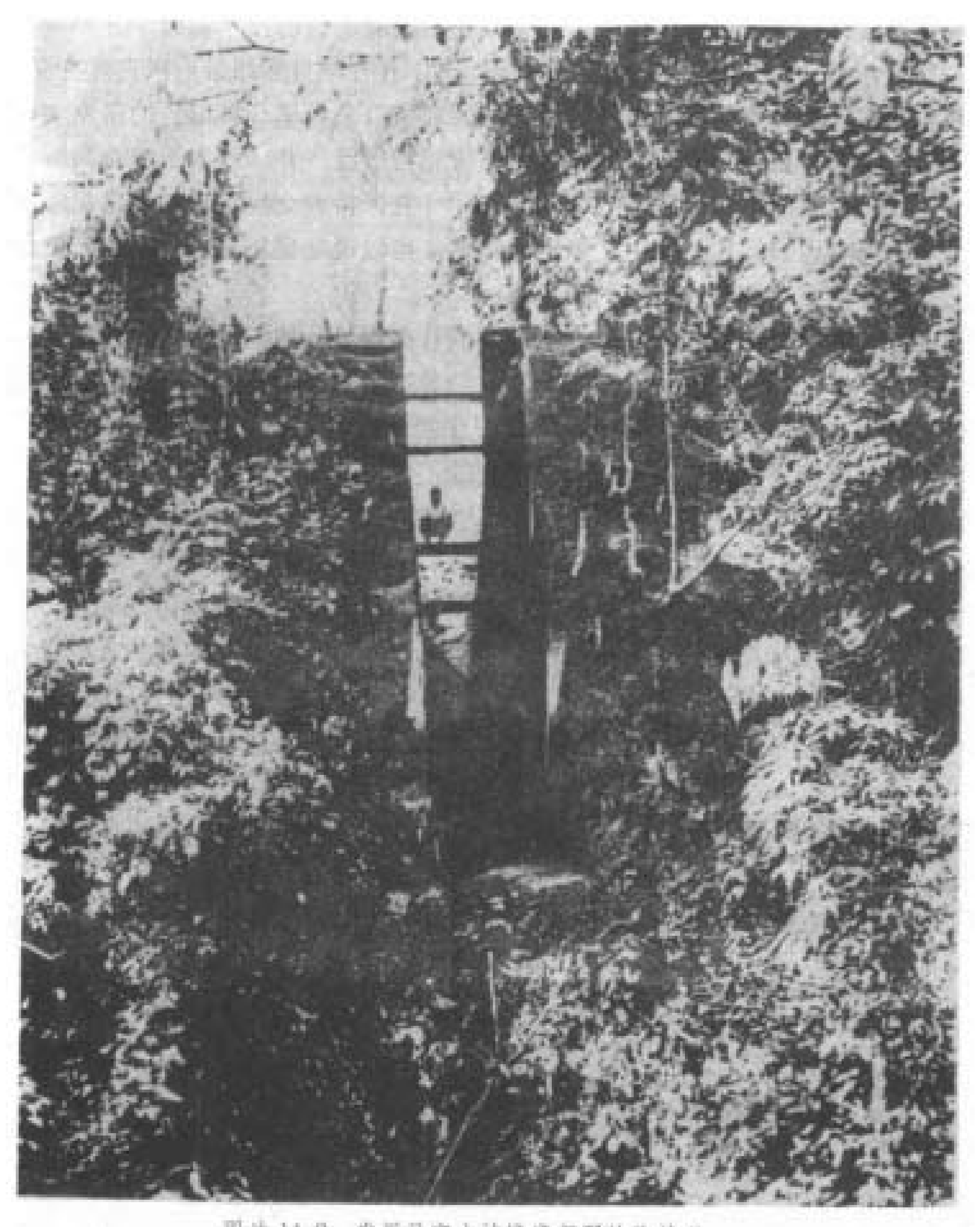
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继承埃瓦雷事业的一系列尚武的统治者经常对边境省份和边境外地区进行军事征讨活动，埃多北部大多数民族均已处于贝宁统治之下。在埃多人对约鲁巴地区强行入侵之前，约鲁巴人势力的向东扩张已经停住。贝宁军队占领奥沃和阿库雷，迫使埃基蒂广大地区称臣纳贡。根据贝宁的传说，甚至伊杰布，约鲁巴人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也曾承认过埃多的宗主权。这种说法，虽然在伊杰布没有确证，但是，伊杰布政府的某些特征，诸如伊福雷（*ifore*）宫廷的组成情况，却与贝宁十分相似。同样的情况，在毗邻的约鲁巴国家翁多也能见到。贝宁的征服，可以解释所有这些共同现象，但也可能是埃瓦雷为他的王朝树立威望之后，约鲁巴各国便自愿接受或主动要求贝宁派来一位统治者。这种情况，约鲁巴人东支伊策基里人就曾经历过，伊策基里人接受

354

埃瓦雷的孙子伊吉努亚当了他们的统治者。伊吉努亚带领一批埃多随从在伊策基里人中间定居下来，随即按贝宁模式建立了一个王国，以后几个世纪，这个王国一直承认其母国的宗主权。

对于埃瓦雷重建的贝宁王国的特征，我们在此作了详细的描述，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埃多人的历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它对邻国的影响也很大，更何况它是我们具备足够资料以研究 16 世纪之前这地区社会制度的唯一典型国家。我们对贝宁的早期历史确实比对其他国家的了解更多更详细，这是由于宫廷保存下来丰富的口头传说，16－17 世纪欧洲访游者也收集了大量资料，还有过去三十年在这座城市进行了考古调查研究。

考古资料证实了 15 世纪时埃瓦雷大兴土木修筑城墙和重建宏伟宫殿的传说（图片 14.2），也证实了著名的贝宁铜器制造工艺（黄铜和青铜的失蜡浇铸工艺）十分发达的情



图片 14.2　发掘贝宁古城墙底部深处的情况

况。所有发掘出来的 16 世纪前的铜器，经检验证明是锻造而非铸造而成的。尽管失腊浇铸技术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已经出现，但从考古文物资料和对贝宁现有许多铜器的风格的研究看，这种工艺是在 16 世纪随着欧洲黄铜的大量输入而变得重要的。[22]

伊费艺术和海湾铜器

到目前为止，人们几乎一直是用审美观点来看待非洲艺术，很少注意作品社会学意义。现在面对伊费－贝宁文明，我们完全有条件，结合其历史和社会学意义来研究非洲艺术。总的来说，木刻在黑非洲艺术中占统治地位，因此，能够激发审美家热情的作品大都是较为近期的作品；伊费－贝宁文明则是明显的例外，人们能够从中看到足以说明在黑非洲艺术总的发展过程中这一地区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赤陶和青铜艺术品。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那些铜器或是锻造或是用失腊浇铸的技术制成，这种技术可能 13 世纪以前费厄地方就已掌握。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有一条自然纽带把以自然主义人像，特别是人头像为代表的赤陶艺术与可追溯到铁器时代（公元前 5 世纪）的诺克文明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很重要，它说明诺克文明传播得相当广泛，并非局限于包奇高原一带；358 我们有证据证明草原国家与南边的森林国家之间一直保持着交换贸易和经常接触。这样，伊费和贝宁的著名青铜器和自然主义风格的铜器，可以说是最早自铁器时代起就在这一广大的文化区开始出现的艺术发展的大集成。

我们不必浪费时间去谈殖民主义者所鼓吹的什么理论，他们试图为这些自然主义的杰作寻找一种并非发源于非洲的根据；有一位约鲁巴艺术的研究者、欧洲的专家写道：“如果仔细考察一下这个复制人头像〔13 世纪伊费一位奥尼（Oni）的头像〕，人们第一眼就会情不自禁地称赞“这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杰作”。[23]

德国学者利奥·弗罗贝尼乌斯在 1910 年访游非洲时发现了伊费的木雕作品。但是，还在 18 世纪末发生的一件事至今一直被隐瞒着：当时伊费曾遭到一支英国军队的洗劫，占领者对这个城市大肆掠夺，他们从伊费王宫中抢走了许多木雕制品运往英国。

利奥·弗罗贝尼乌斯希望文化界重视伊费的艺术精品，因而艺术家和人种史学家们就提出惊人的理论来解释所谓的伊费奇迹。[24] 1939 年，一批重要的青铜器在离伊费的奥尼王宫不远处出土；从那时起，在伊费和贝宁又获几次新的发现。

贝宁艺术的风格与演变过程

1949 年，伯纳德·E. B. 法格在离伊费不远的阿比里进行了发掘。[25]他在阿比里一处

[22] 贝宁早期黄铜铸造最有名的一件制品是一尊伊约巴（*iyoba*，“母后”）头像。如果鉴定正确无误，这尊头像铸成日期不可能早于 16 世纪初期，因为统治者埃西吉那个时候刚为他的母亲创立伊约巴的称号。

[23] 威廉·B. 法格（W. B. Fagg），1963 年，第 105 页。

[24] 威廉·B. 法格写道：“常有传闻，说这些青铜器是出自埃及人或罗马、希腊流浪艺人之手，甚至说它们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或葡萄牙耶稣会教士的作品”。同上著作，第 105 页。

[25] 可参阅伯纳德·E. B. 法格（B. E. B. Fagg）的著述，1956 年、1959 年、1960 年和 1977 年。



356

图片14.3　贝宁雕版，奥巴的随从庆典宰牛图

357



图片 14.4 贝宁：铜制长笛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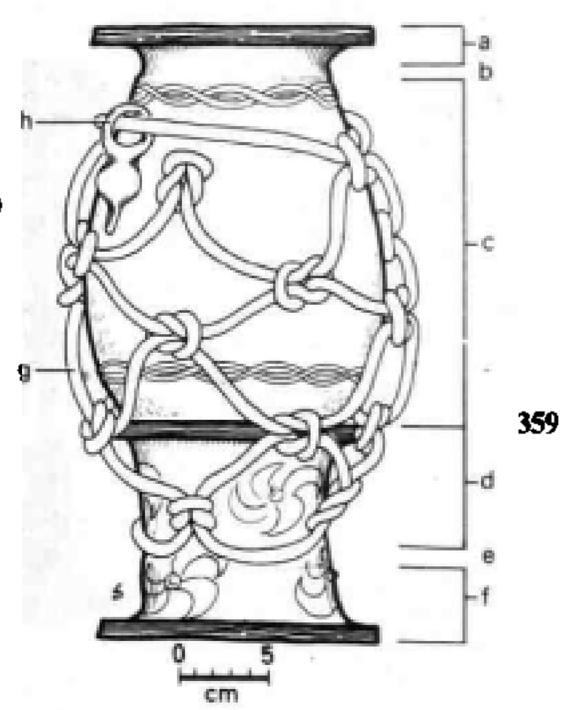


图 14.3 铜制系绳罐设计图（根据瑟斯顿·肖图复制）

(a) 罐口

(b) 罐口和罐身间颈部

(c) 罐身

(d) 罐底上部

(e) 罐底上下部间颈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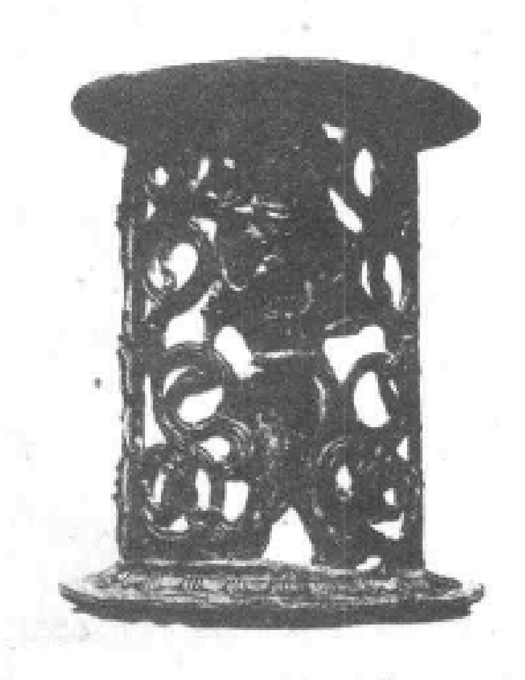
(f) 罐底下部

(g) 绳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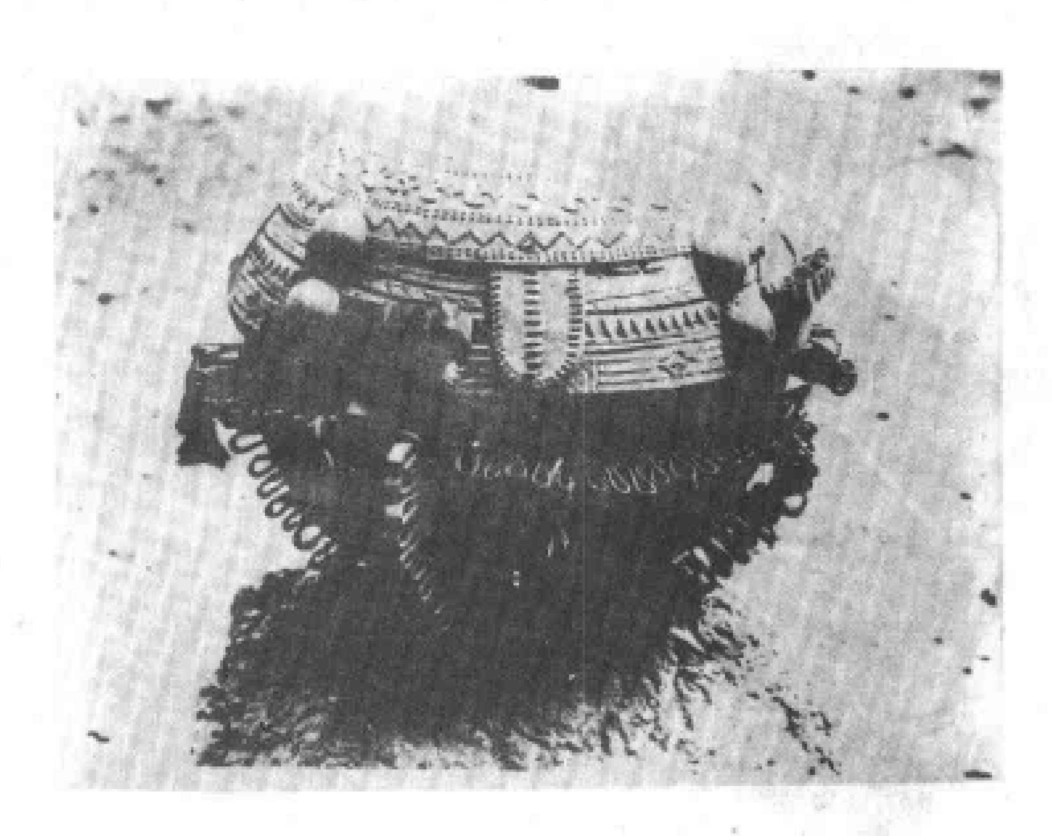
(h) 手柄



图片 14.5 铜制系绳罐



图片 11.6 铜制祭坛立像



图片 11.7 典礼上用的葫芦

墓穴中发现了三尊赤陶人头像：一尊完全是自然主义风格，其他两尊的风格则绝然不同。正如威廉·B.法格所说的那样，"在伊费文化中有一种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化史中极为罕见。纯自然派艺术与几乎是纯抽象派的艺术在同一种文化中共存；这种现象在欧洲古典文艺复兴时期也是不可思议的"。他认为有一尊头像是现实主义的或伊费自然主义风格的最佳代表作。各种尺寸都十分精确，"人们甚至可以看到枕骨的隆起"。面部表情非常沉着，显出内心的平静，给人以惊人的和谐感。在同一墓穴中，这尊头像旁边还有其他那两尊，它们的风格完全相异：

> 两个小孔代表眼睛，一条平平的细缝代表嘴。突出了风格……连同这三尊，在同一墓穴中共有四尊头像，它们是同一来源……材料、烧制技术以及保存条件都完全相同。非常明显，应该确认，对人物的精神状态的完全不同的表现手法在非洲并不陌生，这是古代约鲁巴宗教的一种神秘信仰的产物。[39]

361

可以肯定，伊费和贝宁的艺术基本上一开始就有宗教的特点。

这些头像所表示的是什么呢？它们多半表示伊费的宗教领袖奥尼（Oni）。这些作品是在奥尼死后制成，然后放入他的墓穴。在奥尼王宫的博物馆里有：

> 与青铜器风格相似的数以百计的赤陶头像碎片，从艺术上说，有些与精美的青铜塑像相等，或甚至超过它们。几乎所有这些头像和碎片都不是有组织地发掘的，而纯粹是靠运气在伊费的数百寺庙的两三个中发现，其中许多显然是供各种宗教仪式用的，因为这种艺术与当时的村社生活紧密相联。[40]

根据口头传说，贝宁的奥巴恳求并接受了奥尼派来的一位技术熟练的雕塑匠，他教会贝宁的工匠制作青铜器的技术；因此，伊费的确是人们纪念祖先的宗教和艺术的故土。对祖先的尊敬是传统宗教的基础，伊费人创建了一种艺术以永远纪念那些"守护在世者的祖先们"。在庙宇中发现的大批人像还表明，有些是放在庙宇中供人们礼拜用的，而不是陪葬品。但这种艺术不只限于伊费－贝宁地区，人们不但在三角洲一带，而且在北部的努佩边界地区也有所发现。

伊格博－乌库

伊格博－乌库遗址于1939年在尼日利亚东部被发现，1959年瑟斯顿·肖教授对该遗址作了考察。大约800件青铜器出土，可它们与伊费－贝宁出土者全然不同。伊格博－乌库是一座城市综合体，其中心为宫廷和庙宇。各种不同的建筑都已打开：一巨室中有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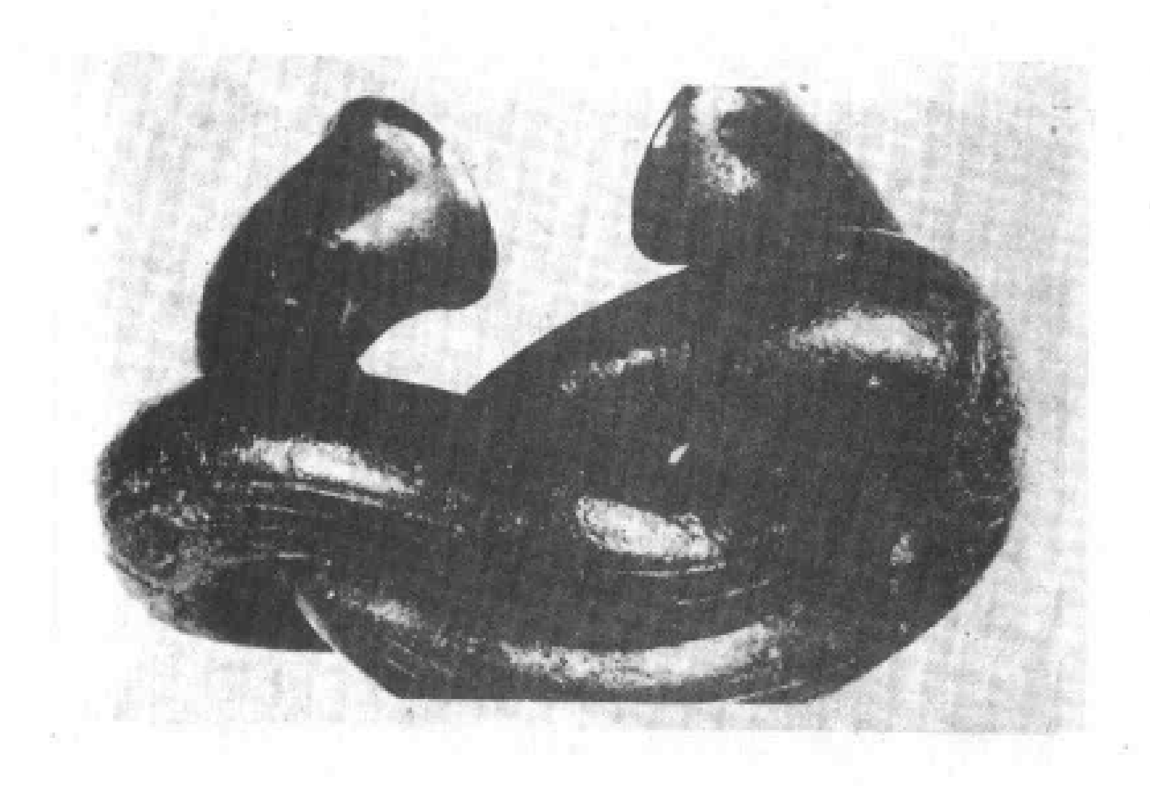
[39] 威廉·B.法格，前引著作，第106页。
[40] 同上，第104页。

363

图片 14.8 大铜钵，从顶上看



图片 14.9 大铜钵，翻面，从侧边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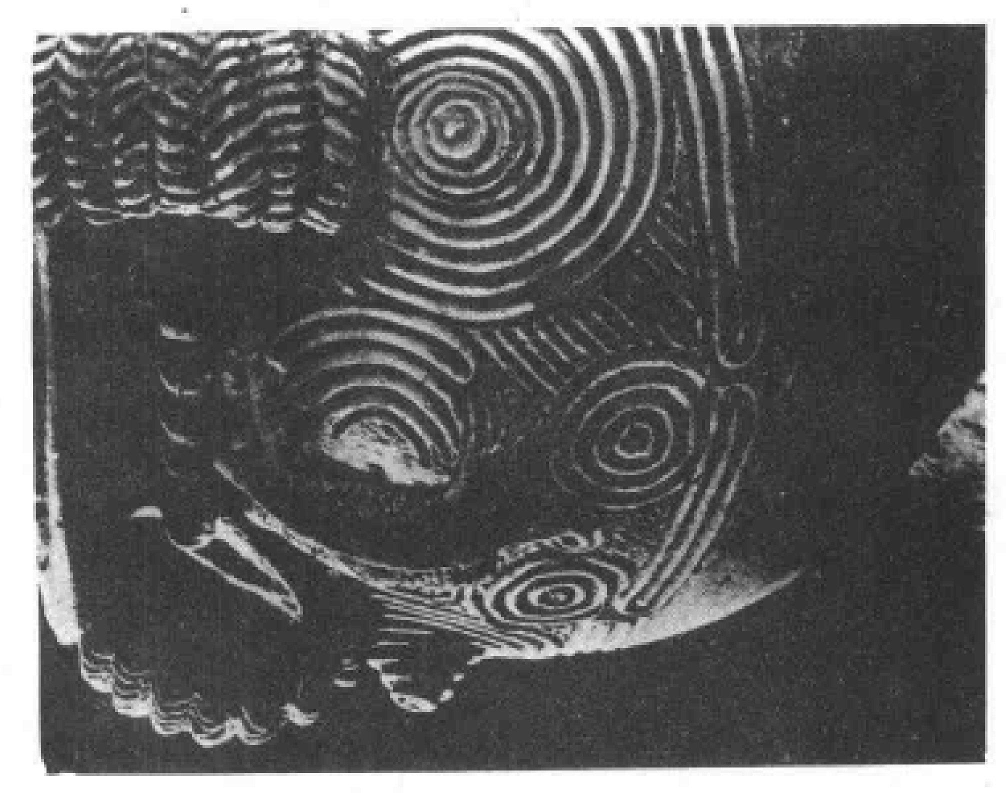
364

图片14.10 重型双扣铜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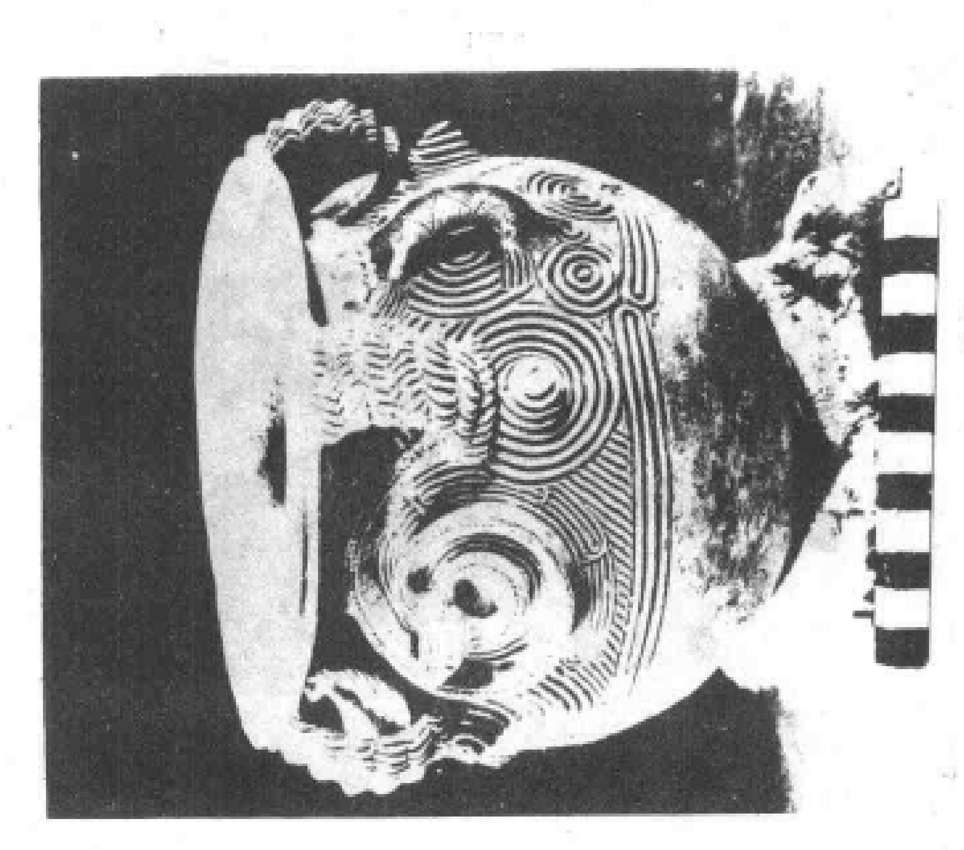


图片14.11 陶器：外观

365



图片 14.13 陶器：近观



图片 14.12 陶器：外观



图片 14.14 考古学家复制的伊格博－乌库统治者葬礼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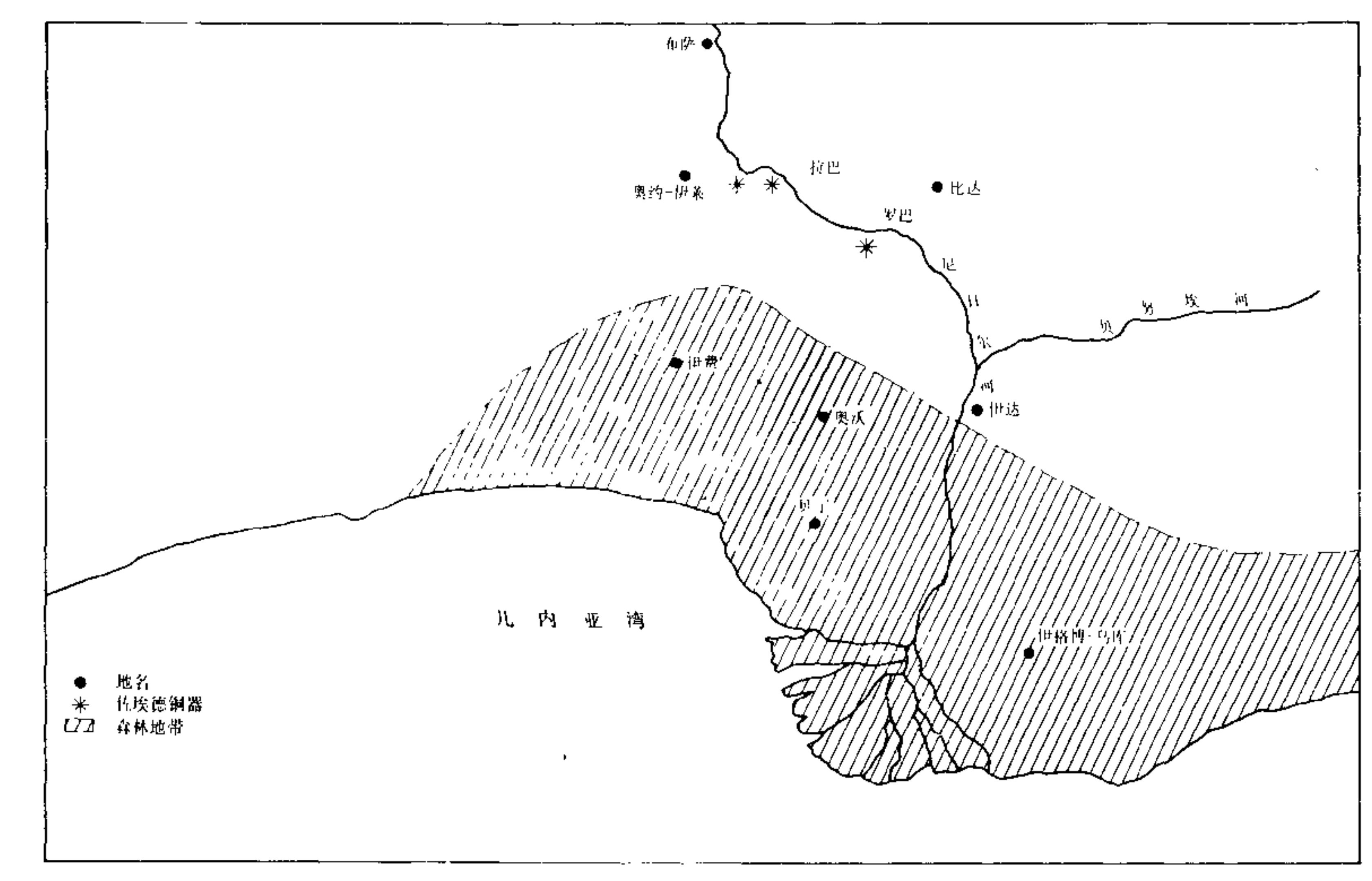


图14.4 佐埃德铜器出土地点示意图（资料来源：[illegible]论文"佐埃德铜器[illegible]"，载《西非考古学杂志》，1973年第3期，第231页）



图片14.15 铜制佐埃德坐像

多盘子、祭品和财宝，一个大祭司的墓室装饰得富丽堂皇；一个大洞中藏有陶器、骨头和其他物品。

362 当然，在伊格博－乌库发现的青铜器与伊费的艺术作品有所不同。然而，一些共同的特性表明，这两个中心是同一文化的两个不同部分。的确，正如在伊费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奉行宗教仪式的君主政体。[28] 伊格博－乌库的艺术家们在赤陶和青铜器制作方面的精湛技艺令人赞叹不已。他们以一种能获得理想造型的技术和以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精雕细刻对原材料进行加工。葫芦形青铜碗和饰有弯曲花纹的陶瓷瓶的制作技术十分高超。（见图片 14.5、14.8－14.9、14.11－14.13）。

可以认为，伊格博－乌库是巨大王国的宗教都城，那里的财宝由一身兼国王和祭司的埃齐·恩齐守护。[29] 有关伊格博－乌库文化的资料相当缺乏；对口头传说保存者的调查工作一直在进行，考古学家察看了制作青铜器的大片地区。然而，伊格博－乌库连同其奉行宗教仪式的王权制度、大量的失腊浇铸模件，似乎都与前面关于铜器铸造业发达的假说相矛盾，而且确实又与关于国家形成的多种推测相抵触。用放射性炭素测定年代，证明了这个古老而发达的文化早于 9 世纪时已在伊博人内部发展起来，当时，伊博人仍保持着“不存在国家政权”的社会形态。换句话说，伊格博－乌库文化与伊费－贝宁文化和在森林地带发现的其他文化相比，至少是早两个世纪。

假如没有放射性炭素来测定年代，人们将会依据在伊格博－乌库发现的资料，误以为伊格博－乌库的兴旺年代是 16 世纪或 17 世纪。邻近的奥尼沙，在贝宁的影响下，大约是在那个年代建立王权的；据说对乌穆埃利人（伊格博－乌库所归属的群体）酋长制度的发展有过很大影响的伊加拉国家，在 15 世纪之前尚未出现。用放射性炭素测定年代，究竟有多大的可靠程度？以木炭来测定年代，必须审慎；因为在木炭埋入墓坑或洞穴之前，其表层有可能已是年深日久。另外，在赤道附近所作的放射性炭素测定，也有很大疑点。[30] 这里应当指出，测出伊格博－乌库的 5 个年代，其中之一是 1445 ± 70 年；这个数据，与伊格博－乌库东边 24 公里处一次发掘所得出的测定年代 1495 ± 95 年颇为符合，而那次发掘出土的青铜钟铸造风格又与伊格博－乌库的十分相似。这样说来，伊格博－乌库文化就成了一个意义重大但还有大量问题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解开这个谜底

366 的方法或是提高放射性炭素测算年代的技术，或是对现有关于这地区各国进化过程的假说进行全面的修正。[31]

---

[28] 瑟斯顿·肖，前引著作。

[29] F.威利特（F.Willett），1967 年，第 172 173 页。

[30] P.奥赞（P.Ozanne），1969 年。

[31] 炭素测定的几个年代：1075 ± 130 年（10 至 13 世纪）、1100 ± 110 年（10 至 13 世纪）、1110 ± 145 年（10 至 13 世纪）。有关这个地区的年表必须重新验证。从各个研究项目看，显然尼日尔河三角洲与北方的努佩和更远的中苏丹草原地带有着密切的联系，塔凯达的铜通过此地传入伊费－贝宁和伊格博－乌库，草原与森林地带之间的大宗贸易很可能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

努佩的青铜器

沿尼日尔河更往北，在布萨河与贝努埃河交叉处有几个遗址发现了青铜器(插图14.4和图片14.15)。这些青铜器以16世纪努佩王国创建者的名字命名为“佐埃德青铜器”。传说这些青铜器是佐埃德从伊加拉的国都伊达带来的；还传说，有数名铁匠随佐埃德一起回来，他们教会努佩人失腊浇铸的技术。[32]

人们在塔达、杰巴和古拉普都发现了青铜器。那里的青铜器都各具一格，但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可以证明伊费或贝宁的影响。F.威利特这样写道：“在全尼日尔河流域的青铜器锻造史中，不只有一两个线索需要解开。这简直是一块织物，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经线和纬线分开。[33]

瑟斯顿·肖提出了几个研究方向，力求找出整个尼日尔河下游各地所用的铜的来源。[34] 据他说，应该注意研究这个地区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南北关系：10世纪之前，它们之间的贸易可能已经开始，显然，正是出于控制由南到北商路的意图，权力中心才从伊费转移到古奥约。于是，在杰巴/塔达发现的青铜器也就在尼日尔河畔接触地带出土了。

总之，为了确立一个年表和更好地了解青铜器的不同流派，仍需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地区并不出产铜，离此最近的铜产地是塔凯达铜矿。现在还谈不上把尼日尔河、贝努埃河和苏丹之间关系的档案材料作出定论。

结　论

370

15世纪末，当葡萄牙人到达沿海地区时，奥约和贝宁是当地最重要的国家；当时还有一些组织得很好的独立城市，这些城市将血亲关系掺合到机构不复杂的政府中去。贝宁和奥约当时正在向强大的、有扩张野心的王国演变。国家的形成促进了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对各种制度、宗教仪式的习俗和用品、宗教礼拜以及技术的传播，都起了推动作用。例如，铜器的失腊浇铸技术原来和神圣的王权统治连系在一起，严守秘密，严防泄露，然而它却广泛传播开来。

经济关系也得到加强和变得复杂了。国家与“不存在国家”的村社相比，更需要而且能够有较大程度的经济专业化；国王的宫廷、它对各种供应品和特殊服务的需要，都对刺激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国家有了较好的装备，能组织出口贸易，提供市场，收集和运输产品，保证商人长途旅行的安全。伊乔有几个国家，曾派出大型船队深入内地，

[32] 佐埃德国王是一位传奇人物。根据传说，他乘一艘青铜小舟到达努佩。对他的描述相当复杂：据说他生于1463年；1493年，他作为一名奴隶被送往伊达；1523年他从那个城市逃了出来，之后在1531年成为努佩国王。他死于1591年，这意味着他活了128岁

[33] 依F.威利特之见，这一时期带有神秘色彩，“佐埃德可能是这时期末的人，但也可能是这时期初的人。”为了填补他与其他各代国王之间的“时间空白”，有意将他的年岁“延长了”，第212页。

[34] 瑟斯顿·肖，1973年。

用他们生产的盐交换他们不能生产的食品。贝宁国王有能力组织奴隶买卖以及象牙和胡椒的大宗贸易。伊杰布的布匹在广大地区拥有市场。奥约由于它的边境在森林和草原之间，它控制了两个地带之间的大部分贸易。

因此，当15世纪末葡萄牙人刚出现在沿海地带时，他们就发现伊杰布、贝宁和伊乔人建立得相当完善的国家都已具备能够适应国际贸易需要的经济。如何对付与欧洲各国进行商业、文化和政治接触所遇到的挑战，成了该地区各民族此后4个世纪历史中的一大主题。

15 埃及与穆斯林世界

J. C. 加辛

从表面看，12世纪末到16世纪初这一时期埃及在历史上似乎很像是不属于"非洲"范畴之内的。公元1171年在开罗建立的政权取代了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统治，法蒂玛王朝始建于马格里布，而后成为尼罗河流域决定性的权力轴心。到12世纪后期，埃及已经成为一个强大帝国的主要力量核心，这个帝国先是由阿尤布王朝而后又由马木路克王朝统治，其版图远达幼发拉底河和安纳托利亚的托罗斯山脉各关隘，它所施展的宏图则基本上是在非洲以外的地方。在历史上其他阶段，即使是在阿马亚德、阿拔斯以及奥斯曼综合体中形成一个省份的年代，埃及也没有像这个时期那样置身于非洲大陆之外。这种看法可能是确切的，但是埃及对中东地区显示其权力的这一时期，也正是撒哈拉商路兴旺发达之时，加奈姆、马里、桑海等国的王公贵族纷纷通过撒哈拉，来到开罗，取道去汉志（希贾兹）的穆斯林圣地，而埃及的商人也通过同样的路线进入非洲中心地带。 371

埃及历史上这几个特殊的世纪，无疑也是非洲很大一片地区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岁月，因为这些地区都已经处于伊斯兰教的控制之下。在阿尤布王朝及马木路克王朝统治时期的埃及，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已经形成，非洲大多数地方的穆斯林在不同程度上都仿效埃及逊尼派的言行和思想规范。同样，埃及这一历史时期对伊斯兰教马格里布中心也具有极大的影响。换句话说，什叶派哈里发小邦在尼罗河流域的消亡使得马格里布与文化和宗教的传统发祥地穆斯林东方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促进了非洲伊斯兰教的统一。开罗是伊斯兰教主要学派的中心。后来在尼罗河两岸兴起的政治和文化进程影响到非洲许多地方，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和中、西苏丹。

法蒂玛王朝灭亡后埃及的复苏（萨拉丁和新的政治版图的形成） 372

构成阿尤布王朝素丹国领土基础的那些地区（后来马木路克王朝统治时期稍有增减），都在萨拉赫·丁·优素福·伊本·阿尤布（西方世界称他为萨拉丁）领导的抗击十字军的斗争过程中趋于统一，并归顺于他的权威统治之下。早有记载表明，无论是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后来受伊拉克的土耳其-塞尔柱人埃米尔的统治，他们来自亚洲草原，原为哈里发服务，不久分散各处），还是开罗的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他们同样处于他手下军事首领的控制下，又受到叙利亚的塞尔柱人发动的阿拔斯王朝讨伐战的

威胁)，都不可能在11世纪末年阻止西方人侵入巴勒斯坦和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更不能在12世纪（两代哈里发王朝交替时期）阻止西方移民来到这些地方。这里的穆斯林反应迟缓：他们起初并不了解西方入侵的性质，几乎丧失伊斯兰教的“圣战”精神，只是由于统治摩苏尔的埃米尔们起而反击，重新被征服的地区（幼发拉底河上游和叙利亚内地从阿勒颇到大马士革一带）才统一在一位埃米尔——努尔丁的权力之下。当时，埃及的哈里发们无能为力，一次又一次都忍让于他们的对手。

在埃及本身，法蒂玛王朝的军队领导人互相争夺实权，也即争夺大臣的职位(vizierate)，他们或是从大马士革或是从耶路撒冷寻求武装支援：要是没有这一场权力之争，也许反对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的战争还会长年累月地拖延下去。哈里发为了防止耶路撒冷的军队进入埃及，把施尔科提升为法蒂玛王朝的大臣，此人是一个库尔德血统的埃米尔，率领从大马士革来的军队。1169年，他突然死亡之后，他的权位由侄子萨拉丁接替。两年后，埃及法蒂玛王朝的这位末代大臣宣布废除什叶派哈里发政权；从此，努尔丁所领导的效忠于阿拔斯王朝的统一体在穆斯林东方重新建立，以对抗参与十字军诸国。这个新的穆斯林帝国的政治版图开始形成。

然而，埃及的埃米尔政权对大马士革统治者形式上的屈从，并不能防止阿拔斯王朝势力范围内两大政权的敌对冲突。萨拉丁预见到冲突不可避免，甚至找了一条向南方撤退的可靠路线：第一站是努比亚，但他很快放弃了征服这地区的计划；此计不成，他于1174年急速占领也门，企图将也门变为埃及将来在印度洋沿岸繁荣事业的前哨阵地。同年（1174年），努尔丁去世，他的后继者都是无能之辈。萨拉丁在大马士革住了几个月；373 到1182年，他的权力扩展至阿勒颇；1186年，幼发拉底河流域最后剩下的几个地方也归属于萨拉丁的王国。翌年，哈廷战役获胜，萨拉丁占领耶路撒冷，从此消灭了十字军王国。真正的统一是实现了，当时的埃及成了这个新帝国的中心；先前的埃及很少卷入抗击十字军的战争，现在的埃及则成了反抗西方的主要核心，而且是即将到来的侵袭者的目标。

新政权的意识形态

上述这些事件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萨拉丁本人的性格（对他说来，伊斯兰的复苏全面体现了一种政治观念），都在埃及的“重建”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法蒂玛王朝倾复后必须重建的是一个穆斯林埃及。什叶派的主张在埃及的穆斯林中间并没有多少影响(或许上埃及地区是例外，当地什叶派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会消失)，它不仅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分裂派，而且被视作是对真正的伊斯兰教义的一种叛逆，人们认为它应该对穆斯林世界备受西方攻击的被动软弱局面负有很大责任。因此，必须在政治结构、社会组织及人们心目中牢固树立起来的应该是传统的、公众的伊斯兰教，即逊尼派伊斯兰教。当时，远方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由于塞尔柱族统治者权力的削弱，在伊拉克狭小的范围内争取到了真正的独立，并受到一定的尊重。过去因为有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王国，麦加朝圣受阻；现在则比较容易通行了，因为朝圣者得到较好的保护，在埃及和汉志（希贾兹）

都不再受地方政权的欺压，特别是后者已经日益处于埃及的影响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萨拉丁的威名一直传到了穆斯林非洲的最西边。

在埃及本身，新政权竭力扶持一个通晓宗教教义、法律和文学，又能给这个逊尼派国家以坚决支持的社会阶层。从塞尔柱东方引进的古兰经学院（*madrasa*）教育体制，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在埃及稳固建立；上述政策主要目的是培训所需要的那种既可靠而又能献身于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人材。[1] 为了使这一事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经常需要求教于来自叙利亚或更远的东方富有战斗精神的穆斯林律师和教师，然而，纯埃及人的领导作用已逐渐占了主要地位，一个能够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起纽带作用的社会阶层已经兴起。

神秘主义也在此时出现，神秘主义教派不仅从东方传入，也有来自马格里布的，上埃及更是马立克学派占多数的地方。这些人或是在修道院（*khānkā*）成群集居，或是在隐修所（*ribāt*）分散索居。在他们的努力下，穆斯林群众重新恢复了正统的宗教生活，或者换句话说，他们径直向穆斯林群众提供（特别是农村缺乏的）基本宗教教诲。在1244年之前不久，马格里布伊斯兰教苏非派的阿布尔·哈桑·沙迪里定居亚历山大，他就尽力帮助那些有志于建立逊尼派埃及的人们。这种神秘主义理想是对阿尤布王朝政治努力的一种鼓舞，给它提供了基本的动力，并且逐步形成一种抗拒伊斯兰教内外敌人的形式。在创建稳固的社会－文化结构的过程中，这种理想日益积聚力量，而它所创建的社会－文化结构则远比政权维持得更为长久。 374

阿尤布王朝统治时期的和平

逊尼派埃及，始建于反抗十字军之时，此后这一事业则在一种缓和的政治气氛中发扬光大。从广义的角度说，敌对状态结束后，这一事业是在和平与经济繁荣时代向前发展的。耶路撒冷王国的灭亡（1187年）、沿海几个要塞十字军的损失，曾经像强烈闪电一样惊动了欧洲各国君主，他们作出粗暴的反应，即组织了第三次十字军；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萨拉丁颇难接受的。虽然十字军没法重新占领耶路撒冷，但他们又一次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海岸稳扎下来。萨拉丁在1193年去世之前不得不承认这种既成事实。实际上，西方人所侵占的沿海地带相当狭窄，战略上易受攻击，因而此后他们的存在并不构成一种威胁。当时除了驻扎在这里的军队，还有不少商人，这些西方商人甚至对阿尤布王朝的经济繁荣是有利的。

萨拉丁的后继者也尽力确保和平，虽然在穆斯林中间还有些怨言；至于西方人，特别是定居东方的那些西方人，他们已经意识到维持现状对于照顾到各方的许多权益十分有利，更何况十字军精神当时已大受削弱。当然，侵略行为仍持续不断，如1218－1221年的第五次十字军就以达米埃塔为进攻基地，这次是直接针对那妨碍西方人事业的政权中心。然而穆斯林方面准备让步，宁愿把耶路撒冷于1225年还归西方，其条件是保全它成为一个开放城市。这一政策的结果是阿尤布帝国的叙利亚省区在沿海一带和基督教徒 375

[1] 事实上，在萨拉丁掌权之前，亚历山大和开罗旧城已经有少量古兰经学院存在。

3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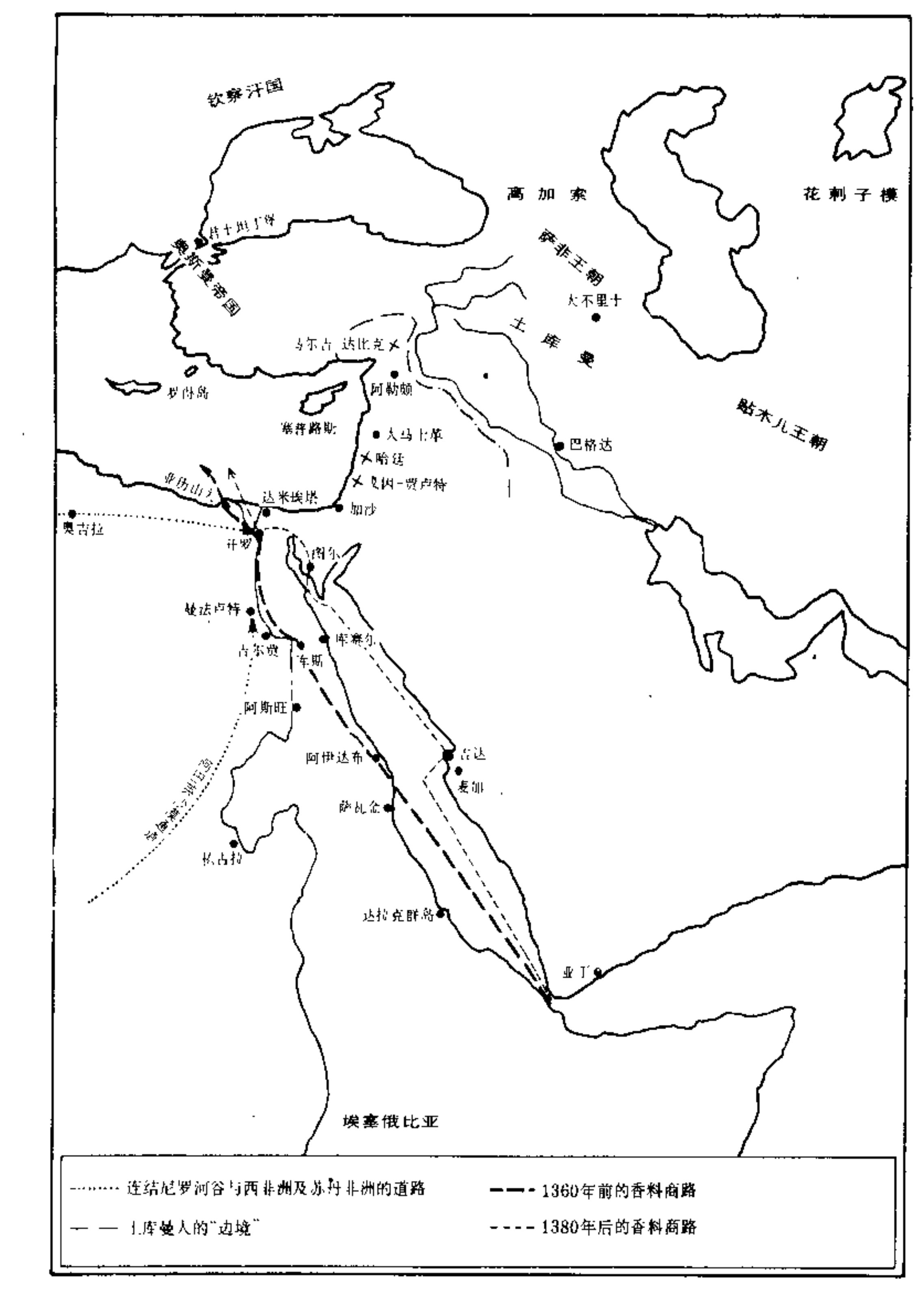


图15.1　马木路克王朝统治时期近东地区概貌(J. C. 加辛)
〔注〕：图中亚洲国家的位置是15世纪后半期的情况

商人建立了联系，从而使叙利亚日趋繁荣。[2]

埃及本身也享受到了和平的好处，它能够通过不大受干扰的与西方人的贸易关系获利，同时还由于传统的农业生产和新兴的甘蔗种植业的发展而增加了财富。同先前的法蒂玛王朝一样，阿尤布王朝迫切需要商业贸易，因为埃及缺少铁、建筑用木材和沥青，这些都是建设一支舰队所需的重要原料，当时只能从威尼斯、比萨或热那亚的商人手上买到；意大利人提供这类原料，尽管教会方面是禁止出售可能用于反对十字军的战略物资的。[3]作为交换，埃及则向西方提供纺织业所需的明矾，还有来自远东的珍贵物产。

在商业贸易方面，先前的法蒂玛王朝尽力把历史上曾经创造过希腊－罗马时代埃及繁荣的印度洋贸易重新纳入红海与尼罗河流域的商路上来，阿尤布王朝现在受惠了。11世纪后半期，埃及成了香料贸易的必经之地，有几条商路维持了三百年之久（见插图15.1）。东方的贵重货物通过红海运到阿伊达布港，由商队转运至尼罗河，直达当时上埃及首府库斯（在现在的卢克苏尔以北），再顺流而下到亚历山大，西方商人就在那里接货。萨拉丁拒绝西方商人来开罗，他们不能通过开罗去红海。埃及完全控制着过境贸易，在红海上也不必担心，因为阿尤布王朝有一位亲王统治也门，直到1231年。专门经营东方大宗贸易的是卡里姆（卡里米）商人（可惜至今还没有查明这些人属于何族和他们的来源），他们与也门当局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法蒂玛王朝末期，埃及的犹太商人就已经提到卡里姆商人；阿尤布王朝初期，在穆斯林的文献中也谈到卡里姆商人。总之，尼罗河上下游货物与商人的交流，不仅给经营者带来利益（包括关税收入在内），而且对整个尼罗河流域的统一和繁荣起了巨大作用。

国家和国家组织：执政的军人阶级（萨拉丁的后继者）

虽然阿尤布王朝统治时期的埃及政治史尚待撰写，但我们可以断言，它的政府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与法蒂玛王朝的传统并无截然不同之处。尽管政治结构有着明显的穆斯林色彩，埃及仍然有人数众多的基督教徒或科普特人，他们仍旧像什叶派哈里发统治时期一样承担着大部分行政管理的职责，承袭了统治王朝更迭期间保留下来的行政管理技能。阿尤布王朝行使内阁大臣职权的政府（"迪万"、*dīwān*）实际上是法蒂玛制度的继续；新王朝的创始人原来是开罗的哈里发所任用的最后一位大臣；阿尤布王朝和以后的马木路克素丹，通常都拥有古代大臣的传统称号"马立克"（*malik*），这是权力的象征。[4] **376**

萨拉丁原来是库尔德族的一位埃米尔，出身于一个为塞尔柱统治者效劳的家庭。他的政治使命、他的政权的稳固（他的后继者也一样）所依靠的力量，全在军队。原有的法蒂玛王朝军队的等级制度，在哈里发国家第二世纪时已经形成，其财力来源完全依赖

---

[2] 十字军在13世纪初已失去原有的好战势头，虽然两大宗教的信徒们仍处在交战状态，但他们双方的领导集团越来越倾向于考虑商业上的交往。

[3] 参阅本书第26章有关西方控制地中海的内容。

[4] 见G.维厄（G.Wiet），1937年。

于"伊克塔"（*iktā'*）征税权制度；也就是说，根据哈里发的调配，各地方的埃米尔分别包办一个或几个地区的捐税，其数额之多或少，又依埃米尔的身份和所掌握的军队人数来定。这种制度，当时的东方各国普遍实行，只有少量具体方法上的差别。但是，萨拉丁的军队，很自然地要取代法蒂玛王朝军人特权阶层的地位。他的军队是由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组成，因此，埃及人通常把他们看成是外国军队。实际上，这支军队主要是一种政权机构，其作用远远超出埃及的境界，所奉行的观念在尼罗河流域也是前所未闻的。萨拉丁从来对政治结构抱有家族观念，这一点跟他以前的伊朗和土耳其埃米尔非常相似，这些人全都声称自己的武装为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效劳，但结果全都自己夺取权力。萨拉丁给自己亲族的各个成员分封一省或一个城市的统治权，由他统一管辖。这样，这个帝国就变成了许多有自治权的君主国的联邦，各君主国的统治权归属于一个有功于伊斯兰的家族；当然，为服从更高的利益，有时也将某个君主从一地调迁到另一地。埃及由于它的重要性享有特权，它理所当然是所有君主中地位最高（或要求成为地位最高）者所管辖的领土。

这种由挑选出来的家族集团负责保卫和统治穆斯林的政治制度，也带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君主国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而且已经表现为部族矛盾（阿勒颇是例外，那里的君主权是父子相承的）。君主间相互对抗和武装冲突的原因，主要是职权分工不明确，结果第三者——来自叙利亚或巴勒斯坦沿岸的基督教徒往往乘虚而入，进行干涉，从此卷入中东地区的政治角逐。1193年，萨拉丁把埃及的统治权传给他的儿子马立克·阿齐兹；长期以来，萨拉丁的兄弟马立克·阿迪勒统治着幼发拉底河各省区，阿齐兹继位时，阿迪勒通过调解亲族间争端掌握实权，同时也显示出具有野心。1198年马立克·阿齐兹逝世，马立克·阿迪勒趁机进驻开罗（1200年），并以铁腕手段统治阿尤布王朝诸君主，直到1218年他死于大马士革，当时第五次十字军的士兵正在达米埃塔登陆。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他的儿子马立克·卡米勒轻易就获得了治理埃及的继承权。此人力图继续执行他父亲对待亲族的策略，但未能成功，尤其是因为他对西方人采取妥协态度。1237年他逝世时，想要恢复那标志着萨拉丁和马立克·阿迪勒光辉时代的家族统一的努力已经完全失败，甚至有一段时间阿尤布王朝所有君主全都联合起来反对他，只有他一个儿子马立克·萨利除外。萨利因过早暴露其雄心而被放逐于幼发拉底河省区。但正是这个儿子，在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之后，终于在1240年掌握了开罗的领导权。

马立克·萨利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要想在残酷的政治角逐中占上风，手里必须掌握一支忠实于自己的军队；这是阿尤布王室显贵人物都想获得的一种力量，为此，这样一支军队最好是由各方面都得依靠其将领的人组成，即由自己收买和亲自训练的人组成，他们的生死存亡与他本人的成败密切相关。这是说，成为马木路克兵团的一员，或是白人奴隶；在当时情况下，这是指土耳其人雇佣兵。马木路克兵团或称巴赫里兵团（*Bahr*——巴赫尔，指尼罗河，是埃及的阿拉伯语词），驻扎在开罗的罗达岛，他们很快就成了这个库尔德族王朝最后一位伟大君主的重要支柱；[⑤]这个王朝的权力转移原则，在

⑤　这名称的真正来源"巴赫里"（*Bahri*）在阿拉伯语中是"巴赫里亚"（*Bahriyya*）。据说，按古代阿拉伯语，巴赫尔（*bahr*）指大海，也就是他们来自海外之意，此说不确。

埃及造成了一个有实力的统治集团，而在此之前，只有穆斯林东方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土耳其人的马木路克兵团

马木路克政权的出现，代表一个强有力的军队特权等级制度已经在埃及穆斯林社会建立起来，并且雄踞于整个社会之上。从此之后，马木路克便可以在自己的特权圈子里选择素丹了。习惯上我们总是说某一"王朝"，可这个马木路克政权却与王朝的世袭继承无关，除非他们有时要争取某种非要不可的政治权益。原先由阿尤布王朝的君主亲自掌握的这个武装集团，现在已能自行其是；它有自己的天然首长，虽然还有竞争激烈的敌对集团，它已形成为唯一能够在权力斗争中拥立废黜一位素丹的政治阶层。最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破裂，被统治者发现他们的首要统治者原来是"土耳其人的马木路克兵团"——西方史学家所知的巴赫里。虽然严格上说来，这是指马立克·萨利创建的那个兵团，但自1382年以后，它成为"塞卡西亚人的马木路克兵团"（the Circassian Mamluks）。 379

马木路克权势的起源：反抗蒙古人和西方十字军的斗争

蒙古西征引起的新的危险局势，使军人特权等级有了夺取权力的理由。最初只是在一些预料不到的情况下感到有危险。13世纪40年代，蒙古人侵袭的第一次大浪潮冲到匈牙利，沿途在伏尔加河下游平原建成了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之时，只有花剌子密素丹国等伊朗边疆省份受到侵扰。散兵游勇纷纷逃出那些省区。马立克·萨利曾打算把这些散兵游勇收编过来，以加强他对阿尤布王朝其他君主的统治；但是，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些无法控制的花剌子密人，转而收买、雇佣土耳其出生的白人奴隶，他们人数众多，都是从蒙古人钦察汗国投到奴隶贩卖场上来的。正是这些雇佣兵组成了巴赫里兵团。[6] 从花剌子密来的散兵游勇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各省区大肆劫掠，1244年在耶路撒冷大批屠杀基督教徒，这些事件引起西方的强烈反应。1249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领导的第六次十字军在达米埃塔登陆，又一次要埃及对东方发生的事件负责。

马立克·萨利死时，他的继承人图兰·沙赫还在幼发拉底河一带作战，局势变得十分严重。在这个危急时刻，巴赫里兵团拯救了埃及；他们打败了路易九世，将他俘获，埃及从而免遭十字军的入侵。当新的素丹赶到时，战争已经赢得胜利。经过这场危机，巴赫里兵团一举而成了这个国家举足轻重的主要力量。1250年5月，图兰·沙赫遭到暗杀。他是埃及阿尤布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从此政权归属马木路克；只是为了防止阿尤布王朝各君主的反对，他们才抢先推举马立克·萨利的遗孀作为临时素丹，指定她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共同掌权。然而这一行动并未能使他们避免与阿尤布君主们兵戎相见，同时也没有防住阿尤布君主在他们当中挑拨离间的阴谋活动；如果没有蒙古人的第二次侵袭浪潮迫使马木路克兵团证明自己足能保卫伊斯兰世界，或许他们也就无法支撑下去。

[6] 军人阶层在埃及夺取政权，并非偶然现象；参阅伊拉克的塞尔普克史。13－15世纪，直到帖木儿时代，亚洲一直对中东地区施加压力

1258年，巴格达落入蒙古人手中，按照成吉思汗孙子旭烈兀的命令，阿拔斯王朝的哈里380发被处死；阿尤布王朝各君主国很快也遭到蹂躏，侵略军一直深入到加沙地区。只因蒙古人内部的政治原因，[①]他们才没有向埃及进军。马木路克素丹库图兹，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于1290年9月，在纳布卢斯附近的艾因-贾卢特，将留驻那里的蒙古军队击败。蒙古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后撤，马木路克政权的前途才有了保证。

这样，"土耳其人的马木路克"势力就在效劳于伊斯兰教的事业中兴起，而他们原来的主子——阿尤布王朝的君主们却未能抵制基督教徒和蒙古人造成的危险。蒙古人的威胁、穆斯林世界在哈里发政权惨败时受到的震动，都给马木路克素丹国的结构和它的政策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其实，马木路克国家只不过是在反抗外部侵略的斗争中产生的一种实际存在的社会－军事组织。同时，这个政权又由于巴赫里兵团的埃米尔之一拜巴尔斯所具有的军事及政治卓越才能而坚持下来，他于1260年夺取了军队指挥权。

蒙古人的出现，使东方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西方的君主们则希望从这些新入侵者带来的各种宗教中找到好处，眼看蒙古人推翻了哈里发政权，西方的君主们很想与这些事先未曾料到的盟友建立联盟关系，共同反对伊斯兰世界。结果，叙利亚－巴勒斯坦沿海地带的基督教领地又重新构成威胁；虽然它们在蒙古人入侵时大多保持中立，但仍有可能成为日后发动攻势的基地，形势所迫，必须摧毁它们。蒙古人虽然已经尝到马木路克军事力量的滋味，但仍是可怕的威胁。马木路克确实是非常幸运，蒙古人居然在关键时刻发生内讧，旭烈兀及其后代（波斯的伊儿汗国，以大不里士为首都）正与钦察汗国的可汗们发生冲突。钦察汗国允许马木路克国家在他们那里招募土耳其奴隶（伊斯兰教徒）充当雇佣兵。

引起冲突的原因是安纳托利亚问题。与东方各地的情况一样，11世纪时土库曼各部落已渗入这个地区，由于拜占廷政府的暧昧态度，土库曼人在不顺从塞尔柱统治的王公贵族领导下定居于安纳托利亚（他们定居在拜占廷境内，被人称作"鲁姆－塞尔柱人"，有别于伊拉克境内的"大塞尔柱人"）。这个开端并未引起问题，但是，该素丹国在1243年就被蒙古人西征的第一次浪潮淹没，遭到钦察汗国的侵吞，而这个亚洲大帝国内部进行权力再分配时，伊朗（波斯伊儿汗国）的蒙古人却得到了统治土库曼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居住地的权力。于是，引起一系列冲突，而马木路克也从而多次逃过危运。

381我们只有考虑到当时蒙古人起主导作用的全盘局势，才能理解马木路克国家的新素丹——马立克·扎希尔·拜巴尔斯（1260－1277年在位）的政策。拜巴尔斯利用互相敌对的各汗国之间的矛盾和蒙古王公争夺继承权的大好时机，在1265－1268年间以及在1270年（乘西方最后转向突尼斯进行侵略之机），先后攻占了基督教徒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到1277年，由他率领的一支远征军进入安纳托利亚，无法忍受蒙古人统治的土库曼人部落纷纷归降于他，这就加强了马木路克政权在保护全体穆斯林的事业中的地位。拜巴尔斯之后，还有两位强有力的素丹：马立克·曼苏尔·卡拉乌恩（1279－1290年在位），马立克·纳西尔·穆罕默德·伊本·卡拉乌恩（1310－1341年

① 主要原因是蒙古人占领阿勒颇、大马士革之后，可汗蒙哥去世，其弟旭烈兀乘机返回波斯（伊儿汗国），他只留一支军队驻于叙利亚。

在位)，他们继承了他的事业

但是，蒙古人非要达到他们的目的不可：1282年，他们进犯叙利亚西部城市胡姆斯；1300年占领大马士革；1310年他们再次越过幼发拉底河，这条河此时已成国界了。在河的马木路克一面，1291年人们攻下阿克的圣约翰要塞（基督教徒在巴勒斯坦海岸的最后一处要塞），这是对蒙古人和西方君主联盟的回答。于是，险情有所缓解，再加上波斯的伊儿汗1295年又重新皈依伊斯兰教，似乎对穆斯林的威胁已经解除。但是到1310年，伊儿汗却对什叶派表示好感，虽然没有进一步勾结，这也加剧了以逊尼派为主的中东地区与倾向什叶派的伊朗－蒙古集团之间的对抗；这就看清楚了，从全局看，威胁虽然还不是燃眉之急，但它确实存在。

直到1323年，伊儿汗国趋于衰落，和平才成为现实。当时，马木路克帝国已经克服长期存在的危险局势，它所控制的领土一直延伸到安纳托利亚边区，马木路克是靠自己力量防止蒙古人统治的；同时，土库曼人的骚乱已经平息，众多的君主国均已降服，其中包括北方方兴未艾的奥斯曼，它恢复了古来的好战态度，又和当时还存在的拜占廷保持暧昧关系。实际上，马木路克国家此时已经成为当时穆斯林世界的一大强国

马木路克政权与非洲

马木路克政权既然历尽艰辛战胜了来自欧洲和亚洲两方面的威胁，那么，它在非洲占有重要地位就不足为奇了。马木路克国家繁荣之路，主要在非洲。它与远东进行的大宗贸易，又一次取道红海和尼罗河流域；也门不能不承认埃及的霸主地位，同时埃及还试图与红海南部达拉克群岛的埃米尔结盟，并要求归还萨瓦金和穆萨瓦尔的主权，以控制一些次要的商业点。[8] 与之对峙的蒙古人则试图取消这一有利可图的交通线，转而发展波斯湾商业航线，香料贸易商就曾一度利用过蒙古人这条商路。但是，威尼斯、热那亚和巴塞罗那的商人是了解情况的，自1340年以来，红海航路作为连结埃及各港口和再度兴起的黎万特（地中海东岸）各海港的商路是无与伦比的，香料全都靠非洲大河来运输。卡里米商人靠它发财致富，他们的商业活动一直发展到西非洲。根据历史记载，这种国际贸易的巨头之一就死于廷巴克图（1334年）。[9]

382

非洲的这些对外关系和内部关系是整个政治和文化联系格局的构成部分。早在1261年，即拜巴尔斯当政时，非洲各国的王公和臣民均已取道埃及去汉志（希贾兹）朝拜圣地 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士在追述他们朝圣经历时都曾提到非洲穆斯林各王国的存在。举例而言，14世纪时，伊本·法德尔·阿拉·欧麦里撰写的地理全书，这一著作中有关非洲的章节，至今仍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10] 至于普通的开罗人，他们注意的是财富的象征；例如，加奈姆统治者在开罗旧城建立的马立克教派古兰经学院，穆萨曼萨1324年朝圣路过时赠送的黄金，等等。马里一直为埃及的制币厂提供黄金。总之，历代素丹都热

---

[8] 关于达拉克群岛，见G. 维厄，1951－1952年，第89－95页。

[9] 学者们对“卡里米”（*Karīmī*）有不同的解释。或许读音有误，或许这是指加奈姆（卡尼米）。假如后一种解释无误，那么，加奈姆就在东方贸易中起过一定的作用。可参阅本书第26章，第653页，注55。

[10] 见欧麦里（al－'Umarī），1894年；法文译本，1927年。

情欢迎非洲各国王公君主，这种欢迎态度与他们想要扩大埃及政治影响的愿望密切相关，他们认为埃及的政治影响将随着宝贵的纺织品的输出、宫廷的正式礼仪、来访者在开罗这座大城市所能见到的书籍的广泛传播而扩大到非洲各地。

埃及的影响就这样随着马木路克帝国的强盛和繁荣，自然而然地在非洲扩展开来。但是，埃及故意地和特别粗暴地对其毗邻地区行使自己的特权，1275 年，努比亚基督教王国北部地区被吞并，栋古拉被分封给埃及的臣属，以后又逐渐在那里设置了附属国。此外，埃及在它向前推进时还找到了得力的援军，这就是各贝都因部落：巴努尔坎兹人（今日克努兹人的祖先）很快进入阿斯旺和苏丹边界之间地区，他们积极设法摧毁了栋古拉基督教王国，1317 年正式皈依伊斯兰教之后成了这个地区的统治者。[1]在此之前，朱巴伊纳各部落和其他南方阿拉伯族群（诸如巴莱、朱达姆、塔伊）也大量从艾斯尤特和曼法鲁特诸省区移居到更往南的达尔富尔及中非地区。努比亚这一障碍被排除了，看来，埃及政权在马立克·纳西尔·穆罕默德当政之前是力阻游牧民族大规模迁移，在此之后则转而认为这种迁移对己有利；好作乱的部落迁走，使埃及能够得到暂时的安宁，何况这些远在南方的部落仍是臣属之辈，继续与开罗保持联系。自 1320 年开始，曼法鲁特省就向素丹的私库交纳贡税（“伊克塔”，*ikta‘*），同时那里也就变成了奴隶市场。这只是开端，马木路克统治下的埃及还以它体现的文明模式对非洲穆斯林产生更强有力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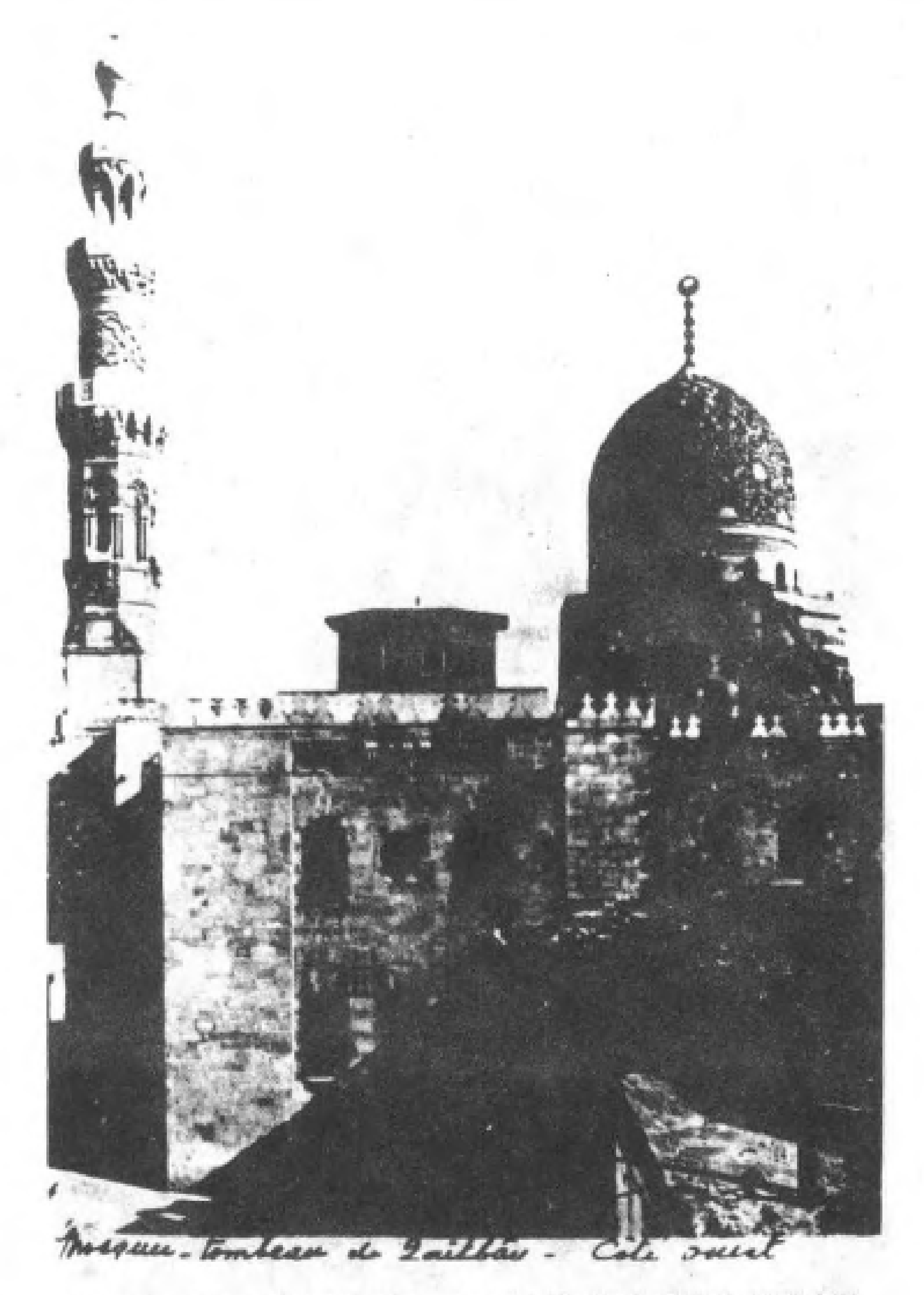
383

埃及的伊斯兰教

马木路克国家潜在的动力只能追溯到阿尤布王朝时代。虽然国内敌人已不复存在，但着重点仍然是保卫伊斯兰教，保证其不会受到攻击。逊尼派的教导在埃及广泛得到传播。开罗、亚历山大、库斯，甚至埃及农村小居民点都设有古兰经学院，有的为纪念学校创建人（埃米尔或富商）建造得富丽堂皇，也有的仅仅只是数间简陋的房屋（其财力不足以维持教师薪金和学生补助），但都致力于培养出既有学识又有献身精神的人才，这是萨拉丁的未竟事业。带有埃及特色的逊尼派气氛就这样形成了，外省可通过他们的精英人才参与首都的活动。精神生活通常受到忠诚于安萨里（又译加扎利）教导的传统秘诀的鼓舞，并纷纷建立了兄弟会（*shadilis*）。通过埃及作家如乌德富韦、努韦里、伊本·阿卜德·扎希尔、伊本·富拉特等人所编的传记集和百科知识提纲，在讲授穆斯林传统时，历史又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来。国家的高级职务仍需依靠叙利亚人（如巴努·法德尔·阿拉·欧麦里）来充任，但是，到了 14 世纪末年，卡尔卡尚迪等人的作品表明，埃及社会准备恢复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内阁大臣制度——逊尼派伊斯兰教就这样建成了它的埃及堡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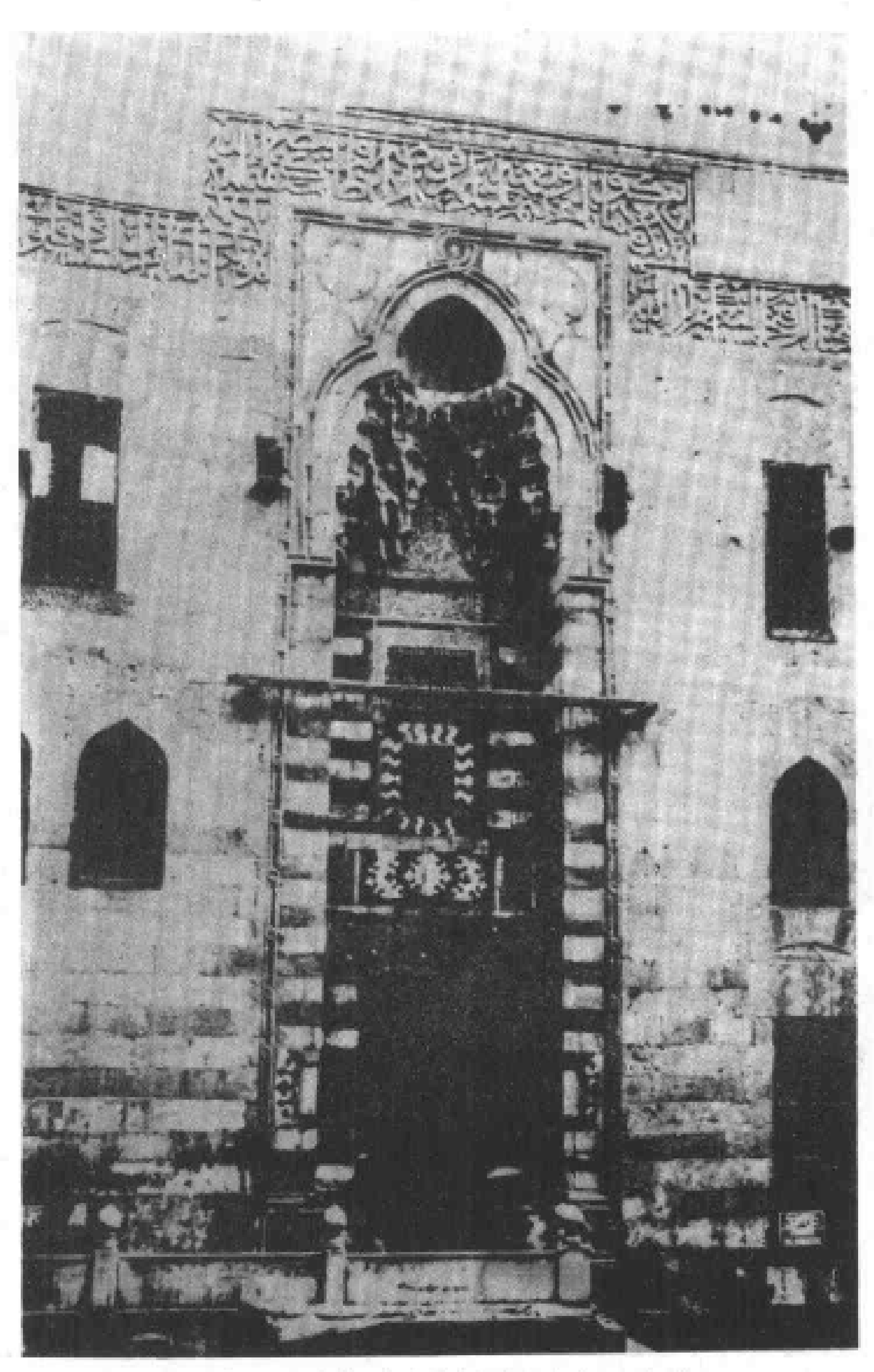
作为阿尤布王朝后继者的马木路克军人特权等级制度，确实很少发现在埃及的律师、教师和神职人员中有抱怨他们不称职的意见，因为他们确是保卫了伊斯兰文化免于毁灭，功勋卓著。但从另一方面说，埃及人的情况还是与叙利亚人不同，埃及人从未受到蒙古人的直接打击，因而以保卫穆斯林为理由是很难为埃米尔的奢侈生活作辩解的，他们都

[1] 栋古拉基督教堂（*Dunkula al-'adjūz*）后来改为一所清真寺，那里有一碑文写明确切日期：1317 年 5 月 29 日。详情可参阅本书第 16 章，第 403－40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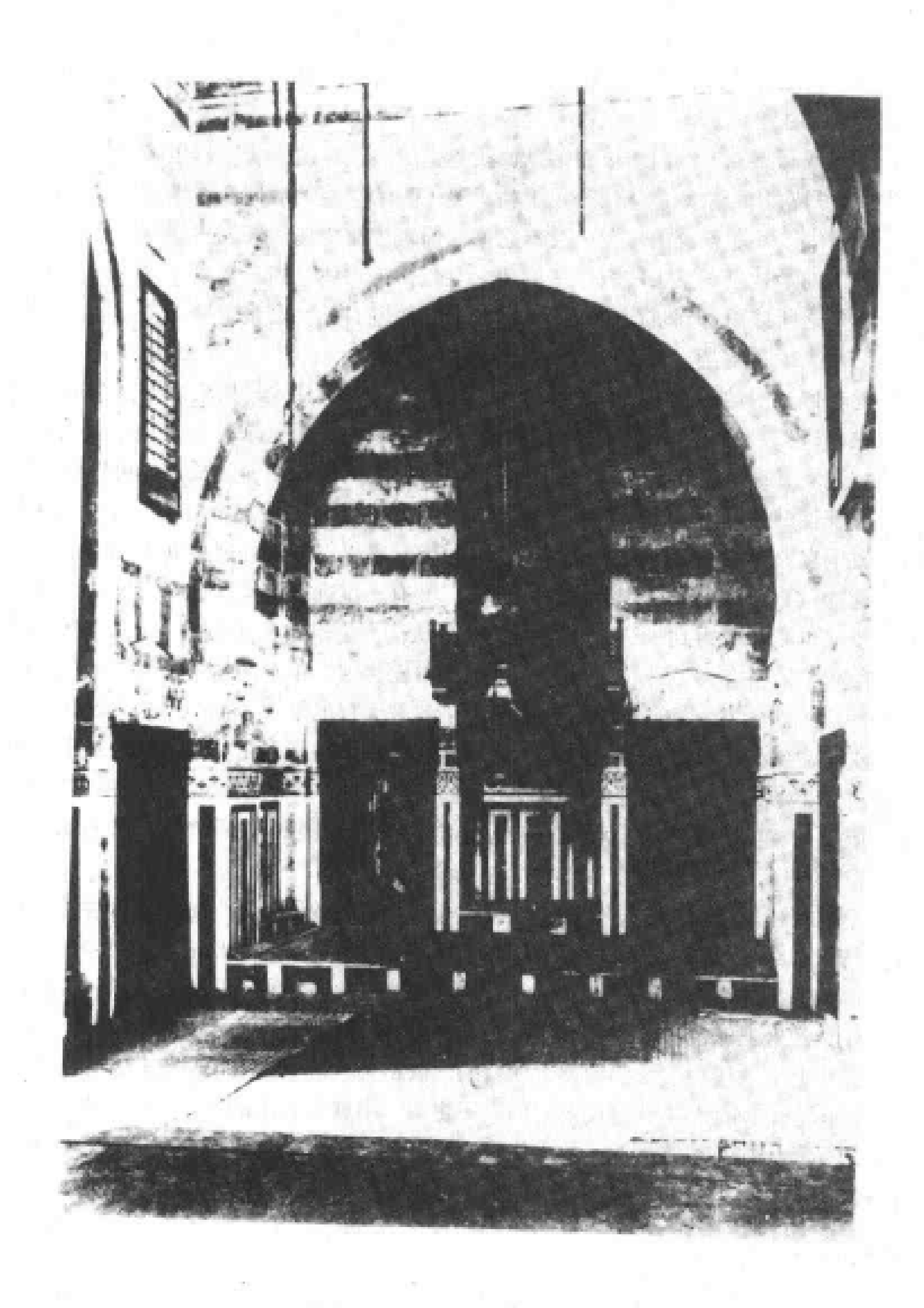
图片15.1　开罗：凯特贝陵墓（1472－1474年）（马木路克王朝统治时期的建筑）

385



图片15.2 坎苏-古里清真寺大门房（1504年建）

386



图片15.3　开罗：贾瓦尔－拉拉清真寺内景（埃塞俄比亚传统）（1430年）

是靠军人特权等级制度在全国强征赋税才能享受到这种生活。所以，律师们都自认为在
387 某种程度上（与马木路克相比而言）是埃及普通人民的代表，而财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由基督教徒掌握。这些埃米尔都是从军队中提升上来的，他们性情粗野，目空一切，只有基本的宗教训练而缺乏知识教育；他们的土耳其语讲得比阿拉伯语流利得多；他们的职业就是战争。然而，对普通人民说来，伊斯兰教的胜利还是令人欣喜：拜巴尔斯、卡拉乌恩或马立克·纳西尔·穆罕默德所建造的高大建筑的壮丽形象确实给人深刻印象；先前素丹宫廷的豪华是从法蒂玛王朝承袭下来的，受人敬仰；埃米尔保护从东方来的许多新奇的（并非正统的）兄弟会，它们的涌现也使单纯的人们感到宽慰。这时，普通人民的伊斯兰教已同军人特权等级的伊斯兰教混为一体，同多异少，这是马木路克政治统一大业之所以能得到巩固的原因。但是，保持既有的社会聚合力，并且歌颂伊斯兰教的光荣伟大，是不是当时高于一切的任务呢？

开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明显地体现了伊斯兰教的光荣伟大，因为它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国家赖以复兴的城市。先前哈里发家族有一个成员逃脱屠杀投奔开罗，拜巴尔斯欢迎他的来到，并理解他的意图是要寻求援助以待收复阿拔斯王朝的故都；可惜他所得到的只是象征性的援助，随后战死沙场。这和11世纪巴格达的情况十分雷同，在一位素丹借哈里发的名义对军人特权阶级发号司令的时代，拜巴尔斯得到阿拔斯王朝的正式承认，从而使他的素丹国地位得到合法化。不久，又有一位逃亡者来到开罗，他的阿拔斯世系和哈里发继承权也得到承认；1262年，他否认前一位逃亡者的业绩，自己继任为伊斯兰教的哈里发，并在开罗登位，人们祈祷时都对他称颂。不幸的是素丹与哈里发之间很快爆发冲突，法学家们偏向哈里发，认定他是政教大权的唯一领袖；但是，他缺少其他方面的支持，结果被软禁起来。他以后的一些继任者，往往也是如此下场。然而，任何一位素丹都不敢把这些象征性的哈里发从身边彻底除掉，尽管所谓素丹政权只是伊斯兰"事实上"的权威的说法很不动听。因为在埃及境外，特别是在非洲穆斯林看来，哈里发在开罗的存在，能给素丹的荣耀增添光彩。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几乎在开罗完成，开罗就是新的巴格达。显然，开罗不仅仅是埃及或马木路克帝国的首都，叙利亚和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也相继传入开罗的古兰经学院，埃及知识界正在创造一种文化。比之于古典文化，这种文化的内容并不丰富，而且带有强烈的逊尼派色彩，但是，它力求保留过去的文化遗产，将文化遗产整理成册，吸收其中为伊斯兰教愿意接受的精神，如新的尚武精神。因此，有大量文集出版问世，其中伊本·哈勒敦（1382年到过埃及）的《历史》一书就是突出的例证。这位保守派的
388 贵族，多次受聘为埃及马立克教派的大执法官（称卡迪，*kādī*），他那充满灵感的教义宣讲是开罗经学院流传下来的一大范例。

马木路克的政治制度

穆斯林社会是在土耳其军人特权集团——马木路克保护下发达起来的，这个集团的成员不断更新，其属下有成千上万人献身于帝国的保卫事业，所以，真正的政治角逐是发生在马木路克内部。土耳其人的马木路克，大多来自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是热那

亚商船把他们从黑海岸边带来亚历山大的，穆斯林东方的巨商又将他们引入内地。自然，其中也有许多不同籍贯的叛逃者，包括蒙古人。这个集团的聚合力在于其成员所受的本质上经久不变的教育：不仅是体育和军事上的锻炼，而且还受一种基本教育，使他们从年轻的奴隶转化为穆斯林，自认为有朝一日得到自由就能获取高官厚禄。他们的军饷，始终是依靠"伊克塔"（*iqtā'*）制度——在他们统辖的各个地区榨取兵役税，自然收入也不平衡；素丹从中提取一部分，马立克·纳西尔·穆罕默德就曾提高这部分贡税的比重来加强他的权力基础。素丹属下的埃米尔，则按其军阶级别享用他们所得的一部分。

这种征税权制度有助于各城镇的发展，因为马木路克都分封在各省区的中心城市或居住在首都。在开罗，埃米尔们都在他们的府邸聚敛财物、屯积粮食，收集工匠制造品，还拥有一些可供控制全城的萨拉丁堡素丹随时调用的护兵。政权统治人物的选择是非常严格的[32]。以拜巴尔斯和卡拉乌恩为例，他们两人都是从巴赫里兵团选拔上来的；他们以阿尤布王朝为榜样，都拥有自己的马木路克兵团；自此之后，每一个夺得素丹权位的埃米尔，也都以创建自己的军队为首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行使素丹的权力。他们并不是人人都能成功的，因为在获得足够的追随者之前，任何人都可能被打倒。但是，一朝权在手，政治上就可以稳定下来，就可以组成一个新的马木路克集团，以他们所服从的素丹名义行使权力，并且紧紧跟随这位素丹行事，直到他去世；这时，凭借个人的功绩和伙伴关系，在他们当中又出现一位素丹继承权力。因此之故，每一位新上台的素丹都在为产生新的一批马木路克提供机会，这些新生的马木路克都牢固地控制着国家的各种主要职能。在一代素丹统治时期，他们对下一代的马木路克是一种威慑力量。

如此说来，王朝继承传统仅仅只是表面文章，尽管土耳其人马木路克集团和历代素丹都希望别人称他们为"卡拉乌恩家族的王朝"。实际上，卡拉乌恩（1279－1290年在位）比拜巴尔斯（1260－1277年在位）要幸运，因为卡拉乌恩在夺取拜巴尔斯的权位之后，成功地将素丹国的权力传给了儿子马立克·阿什拉弗·哈利勒（1290－1293年在位），也即在阿克攻克圣约翰要塞的胜利者，尽管此人在位时间不长。卡拉乌恩的兄弟穆罕默德曾两度成为素丹，那是因为争权夺利的埃米尔们两次都没能压倒他们的对手；后来，穆罕默德靠自己的力量，终于第三次执政，成为在位时间最长的素丹（1310－1341年在位）。穆罕默德死后，在1341－1382年期间，他的12个儿子和孙子相继登位，但都因即位时年幼，没有一位能充分行使其权力超过几个月的；实际上，在此期间，政府由大埃米尔库松、塔兹、谢胡掌权，这些人的威望迄今在象征他们当时权力的一些开罗城市建筑风格上仍清晰可辨。相反，素丹所建唯一最漂亮的建筑是马立克·纳西尔·哈桑（1356－1362年在位）的清真寺；此人在位时期的历史真实情况尚待查明。人们可以提出疑问，这三位大埃米尔难道仅仅是因为崇敬素丹王朝才未曾追求素丹权位？确切地说，这难道不是剥夺他们继承素丹权位的那种制度的弱点？1382年，埃米尔巴尔库克被拥立为素丹，开创一代新的统治，其权力有过一次短暂的中断，但却一直坚持到世纪末（1399年），并且恢复了马木路克的传统。巴尔库克是塞卡西亚人，因此，又是一种新的部族聚合力

389

[32] A. 达拉吉（A. Darraj），1961年。

支持着他的权位。

15世纪结束前的埃及、塞卡西亚人马木路克集团、与非洲的交往

马木路克素丹政权的第二个演变阶段大致是在15世纪，我们对这个阶段的情况所知很少，只能靠推想来谈一些主要情节。一般认为划分两个阶段的年份是1382年，那是塞卡西亚人马木路克集团开始掌权的时候，当时的目击者都感到政治生活从那时起开始遵循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变化的深远根源还在前一阶段；只是不久以后，即在15世纪初，埃及和素丹政权受到一些严重危机的影响，马木路克政权才有了新面貌，或者说出现了一个新的埃及国家，它不再是中世纪的埃及了。

深远的变化

首先是对马木路克的招募发生了变化，钦察汗国自14世纪后半期开始日趋衰落，兵源枯竭，从那时起，高加索就是主要的招募军队的地方，而塞卡西亚人在马木路克军队

390

中逐步占据主要地位，他们的种族意识和家族团结比其他任何集团都更强固。[13]对其他种族，塞卡西亚人采取排外态度，这就削弱了可能推选出一位素丹的政治核心集团的威望。在这种情况下，种族问题在提供职权晋升的机会方面同严格的军事训练一样重要。即使仍然迫切需要不断从各地区招募马木路克军队，新兵也不会参加塞卡西亚人相互间的政治角逐；他们仅仅是佩带武器，视所得的军饷决定效忠的程度。

当军人特权等级的组成和结构发生变化时，依靠伊克塔制度提供的传统财源也在变化和收缩。埃及这时与欧洲一样，瘟疫流行。1349年和1375年发生过黑死病，以后到15世纪又严重蔓延。马木路克兵团死亡惨重，急需补充人员，但埃及的城市居民和农民也都蒙受瘟疫之苦，土地荒芜，能征得的伊克塔税数额当然随之下降。

马木路克政权只能想尽一切办法来适应这一形势所造成的持久性变化，但除了这一系列变化之外，上埃及的土耳其人素丹们所采取的政策也产生了不少严重后果。允许贝都因部落在那里定居，然后又允许他们往南和向中非洲进行劫掠，例如朱达姆人就曾袭击博尔努王国[14]。此时，贝都因部落已经成了上埃及举足轻重的强大力量，在马立克·纳西尔·穆罕默德逝世，随之引起十年动乱和不成功的暴力报复之后，贝都因部落的存在已经成为人们非认真考虑不可的因素。他们做得十分过分，竟然强迫定居在努比亚的巴

[13] 塞卡西亚人马木路克集团在素丹曼苏尔·卡拉乌恩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得到"布尔吉亚"或"布尔吉斯"（*burdjiyya*、*burdjis*）之名，因当时这位素丹将自己的马木路克兵团分扎在一些城堡（*abrādj*，其单数是*burdj*，语音相同）。

[14] 1391年博尔努国王写信给素丹巴尔库克，抱怨朱达姆人和其他阿拉伯部落的恶行，他们袭击他的臣民，并将博尔努人卖给埃及、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商人。见卡尔卡尚迪（*al-Kalkashandī*），1913－1919年版，第1卷，第306页；第8卷，第116－118页。

努尔坎兹人撤回到阿斯旺。结果，从阿伊达布到库斯的商路无法通行，终于在 14 世纪 60 年代前后被彻底废弃。库赛尔一度取代阿伊达布成为香料商路的进口港，但为时并不太久，这一带的埃米尔们看到自己的税收锐减，便经常敲诈勒索，使得商人们尽量推迟珍贵货物上岸，也就是说往北运到西奈半岛海边的图尔上岸，这地方在 1380 年之后已经用于通商。这样，香料贸易再不是通过尼罗河，而埃及领土用于香料贸易也就受到影响。

在巴尔库克继位时，这许多变化还暴露得不十分明显，只是国家管理上有些混乱，国家权力有所削弱，有少数穷困的埃米尔发动骚乱。马立克·扎希尔·巴尔库克担任素丹的政权（1382—1399 年在位）大力加强对各省的控制、把豪瓦拉族柏柏尔人从西部三角洲迁至上埃及以平衡阿拉伯部落势力、逐步加强中央权力，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届政府是遵循土耳其人大素丹传统的；他们的公共建筑风格也在开罗得到复兴。 391

15 世纪初的危机

真正的危机发生在巴尔库克去世的时候。危机有内外两个方面，险些导致马木路克素丹政权的崩溃。就外部而言，这个统治制度的权力在安纳托利亚受到了威胁。奥斯曼所属的一个土库曼君主国引发了一场反对基督教徒的战争，其影响远至巴尔干（从 1366 年起，欧洲一直考虑派一支远征军去援救君士坦丁堡）。奥斯曼要求获得鲁姆－塞尔柱素丹国的继承权，并逐步兼并其他君主国；当他们的军队开始涉足马木路克保护下地区的时候，一场更加令人恐惧的危机在中亚爆发。蒙古王公的一员战将帖木儿着手恢复他们大帝国的事业，而这一次的旗号是血洗伊斯兰教。蒙古人恢复了令人战栗的西征。1400 年，帖木儿向马木路克发起进攻，很快就进驻大马士革，如果不是首先热衷于重建蒙古人对安纳托利亚的统治，他入侵埃及是轻而易举之事。1402 年他击溃了奥斯曼的军队；但由于内部出现问题，他被召回亚洲。

埃及又一次躲过了外敌入侵的危险，马木路克素丹政权又一次在东方发现对自己的事业有利的环境：奥斯曼的扩张已经受到挫折，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君主国又重新发生内讧（当时在伊拉克新建的君主国也是如此）。但这时马木路克素丹国能够获得什么样的统治地位呢？蒙古人已自动从他们践踏过的地区撤走，这次土库曼君主们得以恢复自治权完全要归功于侵略者。马木路克帝国虽然奇迹般受到保佑，但因内部纷争根本无力承担任何作用，而且这种软弱无力的状态一直持续不止。

素丹巴尔库克死后，他的马木路克便公开争夺他即将继位的儿子法拉吉的权力。或是因为以前他们在兵营里长期一同受训时所形成的那种政治上相互依靠关系如今已不再牢固，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埃米尔占据首位；或是因为与巴尔库克之前的日子一样，不再有任何一个埃米尔能有独占鳌首的足够力量。总之，军人特权等级内部发生了长期、血腥、而且毫无结果的斗争。他们思想极度混乱，以至在 1411 年法拉吉斗争失败和丧命后，素丹权位竟在一段时间内落到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手中。看起来，这一政权当时已摇摇欲坠。更糟的是正待克服政治危机之时，埃及又遭到自然灾害的打击。1403 年，尼罗河 392

水位下降，发生了严重的饥荒。1405 年，鼠疫造成大批人口死亡、城镇毁灭、行政瘫痪。在上埃及，贝都因——柏柏尔人或阿拉伯人——坚持扩大权力，他们在整整 10 年间为所欲为，开罗对他们完全无能为力、彻底失控。埃及面临其历史上极少出现的重大危机。马木路克国家必将被推翻，或必须根本改造。

埃及面临基督教的威胁：对葡萄牙的斗争

在此危险时刻，巴尔库克的一名马木路克成为素丹，号称马立克·穆艾叶德（1412－1421 年在位），他开始在各个方面大力进行整顿。接着，巴尔库克的另一名马木路克又继位为素丹，号称马立克·阿什拉弗·巴尔斯贝（1422－1438 年在位），他恢复了秩序，从而行政管理开始走上正轨。由于豪瓦拉族柏柏尔人的协助（他们趁开罗控制权削弱之际已在吉尔贾建立统治），上埃及（受劫掠的阿斯旺省可能不包括在内）又回到马木路克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必须尽快找到某种途径来弥补这场危机给素丹国造成的财源损失，因为瘟疫直到巴尔斯贝政权结束前仍在继续蔓延，而且在 15 世纪晚期又发生一次。

有一个领域埃及是不必担心有什么竞争对手的，特别是在与蒙古人的战争继续进行期间：那就是香料贸易。这种货物来自亚丁，取捷径穿越埃及，从图尔运到亚历山大、罗塞塔或达米埃塔；或者运到叙利亚各港口。1425 年，巴尔斯贝认为素丹政府有必要垄断这种贸易；为了避免利润损失，这种货物必须全部运经吉达港，这个汉志（希贾兹）港口当时已经成为帝国的一部分（甚至那个时候就有人说是直属埃及），在这里上税，并且只能通过官方渠道转卖给西方商人。显然，这种措施不但有损于控制亚丁的也门君主的利益，而且也不利于大私商（包括这时已经没落的卡里米商人）和西方商人，特别是不利于威尼斯人（15 世纪时他们声称已控制埃及进口额的三分之二）。所有这些商人都觉得他们是被迫按素丹规定的价格收买香料，因此反应十分强烈，但素丹坚持己见。另外，在地中海，特别是在卡塔兰和热那亚海盗骚扰严重的沿岸一带，素丹声称对这种贸易负有保护责任；埃及怀疑塞浦路斯这个基督教王国与海盗有勾结，因而 1425 年对它进行袭击，俘其国王；1440 年，对罗得岛也进行过类似的远征，但不太成功。这种垄断性的控制为巴尔斯贝和他的后继者们提供了他们所需的资金，同时给埃及造成了一种与前不同的经济基础，有许多指数可以说明这一点。

393

有朝一日，如果埃米尔们只能靠从“伊克塔”税收中提取的一小部分来维持生计，那么，素丹就获得一种新的统治优势。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除少数偶发事件外，再没有什么可怕的对立面足以威胁他的权位。当时，由军人特权等级造成的唯一麻烦是新兵问题，他们受到塞卡西亚人集团的排挤，正日益沦为纯粹的雇佣兵，受到的训练不多，却贪得无厌。同时素丹政权也发生了变化：青年和壮年的埃米尔均被免职，因为这些人在自己人的积极帮助下可能夺取权力和使出他们的本领和野心；代替他们的多是一些成年的和上年纪的人，这些统治者承担的责任往往超出他们的能力，不能胜任，因此他们的举止不像军人反而更像政客。他们声称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因为军人特权等级与知

识界和宗教界之间的对立正在消除。总之，素丹的合法权位已经不再怕被人夺去，而且那越来越少出面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影响也不再具有多少意义。

这时，埃及穆斯林与基督徒的比例看来也有很大增长；在这世纪头25年的艰难岁月里，一般老百姓都倾向于把他们的不幸遭遇归咎于少数人，因而纷纷改变宗教信仰。面对西方的压力，埃及正日益变成一个更为划一的穆斯林国家。西方的压力不仅是海盗在沿海一带的侵扰（甚至还传说西方基督教国家与埃塞俄比亚君主尼格斯结成秘密同盟，打算从背后再次袭击伊斯兰世界），而且还包括已经出现的那些商人，他们带着金币和昂贵的织品自由出入开罗。素丹政权通过并充分利用大宗国际贸易，似乎给了埃及的马木路克社会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力量、一种稳定性和一种和平感，然而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尚未充分暴露的脆弱性和对西方的依赖，因为西方处于把埃及和世界联接起来的贸易关系的中心。

不少西方游客曾经深入沿海城市以外的地方进行探险，他们所写的游记对今日的历史学家说来还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在开罗的外来者中，他们不占多数。来自西非的旅游者则已在开罗近郊形成一个流动性的侨民社会，他们是在去汉志（希贾兹）途中因染病而留在开罗的，时间或长或短，有的也就定居下来。到了15世纪中叶，非洲朝圣者的人数大量增多，像其他国家去朝拜圣地的官方代表团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朝圣埃米尔"在《法塔史》（*Ta'rīkh al-fattāsh*）和《苏丹史》（*Ta'rīkh al- Sūdān*）两书中，都曾谈 394 到开罗宣教师和汉志（希贾兹）宣教师的逊尼派虔诚，⑲现在这种宗教虔诚已经开花结果、像从前在埃及出现过的情况一样，在非洲社会广泛得到支持。这对非洲各王国的政治生活有很大影响，例如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就曾授权给王公贵族去朝圣，1496年阿斯基亚·穆罕默德就曾前往圣地。马木路克素丹出于私利，这时对朝圣者一律都课以重税，主要把它看作一种大好财源。

与非洲内地的接触也通过上埃及。这里贝都因部落的埃米尔已转化成为土地所有者和批发商，而且都是优秀的穆斯林了。他们在国家事务中越来越起重要作用，通过贸易，他们也变得十分富有。他们饲养的马匹和经过开罗出卖的奴隶是当时商业中的主要项目。⑳另一方面，香料贸易这时已不是取道上埃及，因为上埃及与尼罗河三角洲此时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当地，基督徒人口仍然相当多，他们的生活节奏缓慢，而三角洲地区的基本情况则是塞卡西亚人集团统治下埃及的特征十分明显：贫富悬殊，商业城镇的喧嚣繁华与农村的贫困落后恰成对照，有许多新式建筑拔地而起。在这方面，马立克·阿什拉弗·凯特贝素丹（1468－1496年在位）的长期统治把开罗推上顶峰，开罗之成为今天的模样是他的功劳。这是塞卡西亚人统治所取得成就的光辉总结。

毫无疑问，15世纪80年代是素丹政权和埃及历史的转折点。外来的问题开始给长期恢复工作带来风险。尽管有许多不利条件，15世纪的埃及还处在没有失去风格和创造性的阶段。埃及的影响，通过它本国的巨大调整和文化发展，一直得到保持。15世纪早期

⑲ 马哈茂德·卡蒂（Mahmūd Ka'ti, 1593年前），法文译本，1913－1914年；萨迪（al - Sa'dī），1656年，法文译本，1964年。

⑳ 穆罕默德·卡蒂，前引著作；欧麦里（al-'Umarī），前引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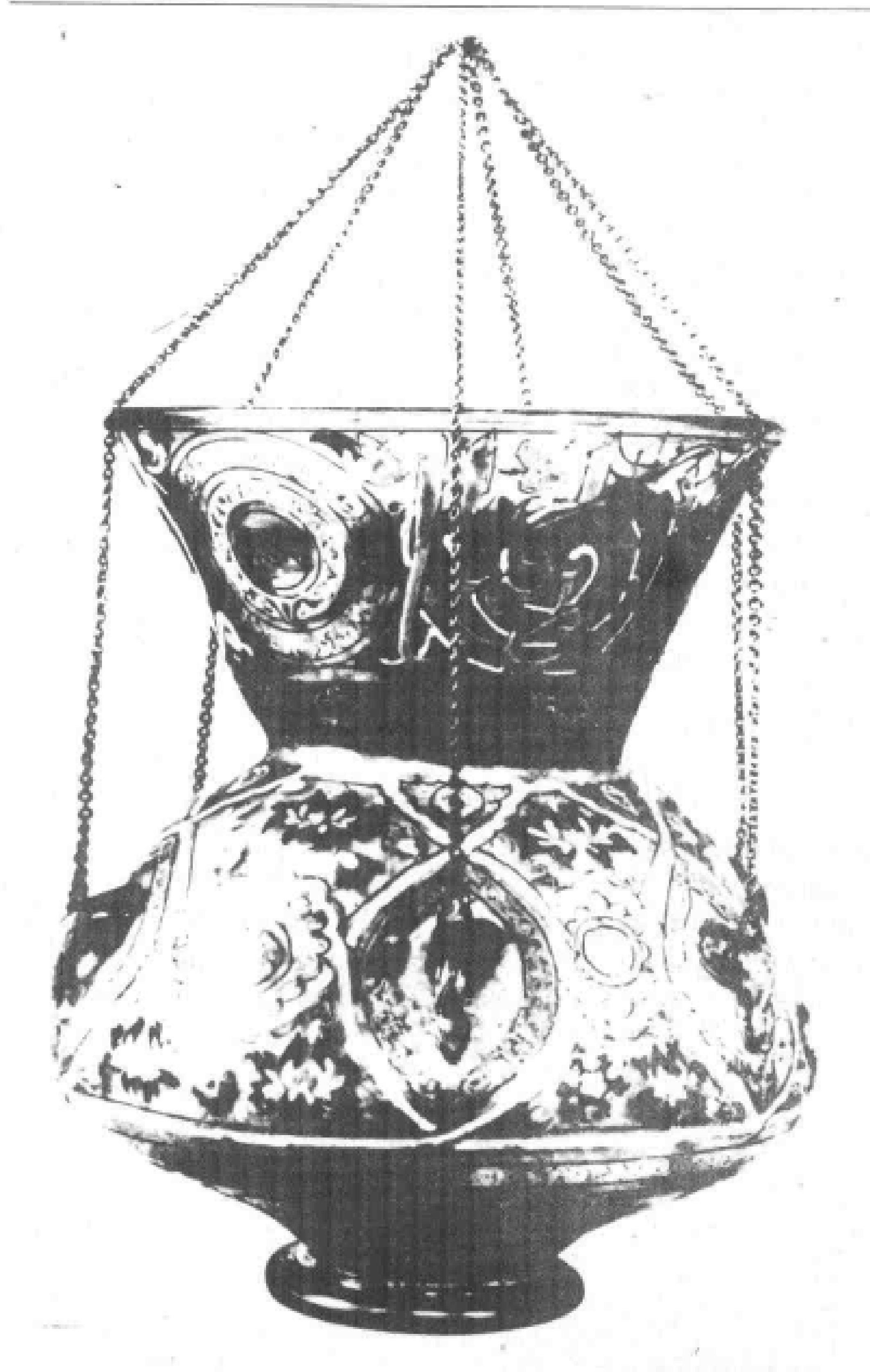
黑暗岁月的见证人有马克里齐，他之后又有艾尼、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伊本·台格里托罗伊和萨哈维（这些人都是埃及人和马木路克混血儿），直到艰难时期出现编年史家伊本·伊雅斯和多产的苏尤蒂——所有这些埃及学派历史学家，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中苏尤蒂自豪地夸到他的声誉远远传到塔克鲁尔。

新的国际关系

东方的势力均衡长期对塞卡西亚人集团有利。帖木儿的后继者（帖木儿王朝）放弃好战态度，成了爱好和平的君主和统治伊朗与中亚的"艺术之友"。土库曼部落重新陷入政治分裂状态，这就让重新组织起来的马木路克政权不冒什么风险而再次推行干涉安纳托利亚的传统政策。素丹政权又有了受它保护的臣民。同时，难以约束的土库曼人也需要有监督者，帖木儿王朝的领土边界由于受到伊拉克的土库曼人的侵袭不得不逐渐收缩。素丹政权对那里频繁发生的战斗保持高度警惕，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力量有限，这种情况在一系列小事件中都得到证实。在试图控制伊斯兰世界的这些新来者（马木路克必定感到与他们有某种密切关系）的政治发展时，开罗的素丹政权起了左右事态发展的作用；但在寻求无法预料的结果时以及在调动土库曼人力求统一的力量时，素丹政权却让一个族群统治埃及，从而也统治整个北非，而这个族群当初根本没有想要得到如此广阔的居住地区。奥斯曼人被击败和瓜分，现在正小心翼翼地重建其力量。奥斯曼国家的活力是在迈赫默德二世执政后（1451－1481年在位）恢复的；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当时，开罗为此举行庆祝，它赋予这个最近正在扩大的国家以一种使伊斯兰世界的战士们都感到困惑不解的魔力。另一方面，在安纳托利亚受马木路克保护的土库曼人，这时还在进行那无法防御的事业，他们为避免奥斯曼帝国的吞并，竟然与西方人相妥协。马木路克与奥斯曼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468年，在凯特贝素丹领导下，战争终于爆发。第一次对抗持续到1472年，幸运的是伊拉克的土库曼人的介入使这一次间接的对抗暂告结束，因为奥斯曼国家当时只有将其全部兵力集结起来才能与他们抗衡。此后，从1483年到1491年，两个素丹政权之间再次爆发了公开的战争。这一次马木路克获得胜利，但是胜利来之不易，它是以国内稳定为代价换来的。马木路克又一次阻止了奥斯曼国家的前进。后者这时将其全部力量放在地中海，与西方人进行圣战，他们正是从西方人那里学会使用火器的。然而，土库曼人仍不安定，他们卷入了由萨菲王朝（1501年将伊朗人和土库曼人联合在一起）开展的什叶派运动。这时头一次正式信奉什叶派的伊朗，对它的敌手奥斯曼（后者信奉逊尼派）构成了威胁。要想利用这种既有危险又可能有好处的局势，马木路克素丹需要证明自己目光敏锐，但更需要的是能够行使权力；然而，由于近期的一系列战争，他们的权力已经大大削弱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地区的扩张，使威尼斯人的贸易和马木路克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源都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塞卡西亚人集团政治结构所依靠的物质基础也开始动摇。随着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的航行，葡萄牙人的出现更是使人们普遍感到震憾。他们收购香料，封锁红海；他们包围非洲和伊斯兰世界，损害埃及马木路克

396



图片15.1 彩色玻璃制成的埃及吊灯（马木路克王朝统治时期）

政权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埃及与非洲休戚相关、祸福与共，出现了共同的利害关系。397 塞卡西亚人集团最后一位伟大的素丹马立克·阿什拉弗·坎苏·古里（1501－1516年在位）试图反击；他的奥斯曼敌手也急于要充当伊斯兰世界的保卫者，十分关注对汉志（希贾兹）的威胁，这甚至促使他建立了一支舰队。但在1509年埃及一支海军分队在印度西海岸的第乌战败后，马木路克帝国的力量就只限于保卫红海了。由于力量不够，自然也就取消了对东方进行干涉的想法，而当时东方的局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受到西方鼓励的萨非王朝的什叶派运动实际上使奥斯曼国家陷入了窘境。当奥斯曼新素丹谢里姆试图反击时，他发现马木路克并没有站在他一边，即使他有意在红海上帮助他们。由于旧时土库曼政策的影响，开罗政权似乎失去了敏锐的目光，谢里姆只得单独作战（这时奥斯曼人已能使用火器），于1514年成功地防止了什叶派的扩张活动，将它限制在伊朗境内。后来，谢里姆又决定将他的对手马木路克在土库曼人住地不肯放弃的有害势力清除掉，即使马木路克这时已无力充当伊斯兰教和逊尼派信仰的保护者。1516年8月24日在阿勒颇以北马尔吉－达比克进行的一次战役，决定了马木路克帝国的命运。这是一次用火器战胜轻视火器的塞卡西亚人骑兵的战役；年迈的马木路克素丹的阵亡、军人特权等级内部的阴谋、新出现的伊斯兰教逊尼派保护者的威望、埃及人的冷漠态度，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原本只不过是一次有限的清算行动到后来变成了对整个埃及的占领，而且是轻而易举的成功。

结　论

1517年，当奥斯曼统治扩大到埃及时，开罗政权已全面崩溃；此后，它沦落为一个再也无力复兴的小政治集团，完全失去了生存能力和原先有效捍卫伊斯兰世界的合法地位。奥斯曼政权在开罗设置了一个总督；同时，贝都因部落的埃米尔在吉尔贾的权力也得到了承认；这样，埃及沿海地区与上埃及之间政治上的区别被长期固定了下来。但是，埃及的社会结构并未受到影响，也会长期存在下去。马木路克集团，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及文化事业的遗迹也幸存下来，而且在伊斯兰和非洲的历史上占有相当高的位置。

16 12世纪后期到15世纪初期被芬吉人征服前的努比亚

L. 克罗帕赛克

努比亚基督教诸国的衰亡

398

纵观世界历史，很少有像"巴克特条约"（*bakt*）那样持久的双边国际协议。该条约作为穆斯林埃及和基督教努比亚之间和平相处的法律基础，时间长达6个世纪之久。[①]虽然，小规模的袭击或反袭击时有发生，但双方始终遵守停火协议，双方都履行了包括互通有无在内的各自应尽的义务。因此在原则上从未使人怀疑条约的是否继续生效。"巴克特条约"虽经多次修改和暂时中止，但它仍不失为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一个适用的准则。

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埃及－努比亚关系似乎是人们所渴求的睦邻友好与一定程度下相互合作的最佳范例。这样，既满足了法蒂玛王朝的需要——补充兵员奴隶、保持和平的南部边界——同时也满足了努比亚的需要；当时，努比亚的政治权势和文化成就均已经达到鼎盛时期。本章所探讨的埃及的阿尤布王朝（1171－1250年）和马木路克政权（1250－1571年）统治时期，与早先的朝代相比，其特点是与努比亚关系的不断恶化。总的说来，北方因素对努比亚衰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可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一方面，埃及统治者对正在衰落中的努比亚施加直接压力，另一方面，阿拉伯游牧部落不断渗入，他们对努比亚的社会结构起破坏性作用。

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基督教努比亚的政治历史知识，几乎全部来自埃及的阿拉伯文资料。[②]关于这些基督教力量后期的情况很少有当地的书面史料，即使有也不合我们之用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因建造阿斯旺大坝而制定的抢救计划强调了考古证据的重要性。在下努比亚进行的发掘工作使人们对简陋的普通房屋的许多断垣残壁这样一些本不引人注目的废墟都给予了十分的重视，结果使大家都把解释努比亚历史的重点放在它的内部因素的发展方面。[③]

399

根据阿拉伯文资料，在12和13世纪，努比亚的政治地理与早期史料的记载相同。尼罗河畔的两个王国特别引入注目：穆库拉王国（格雷科－科普特语称之为马库里亚），

① 有关巴克特条约的法律条款，见《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1卷，第966页。
② 有用的阿拉伯文资料，实际上在Y.F.哈桑（Y.F.Hasan）1967年写成的书中，已作了可靠的研究和分析。
③ 见P.L.欣尼（P.L.Shinnie），1965年，第263－273页；W.Y.亚当斯（W.Y.Adams），1966和1967年。

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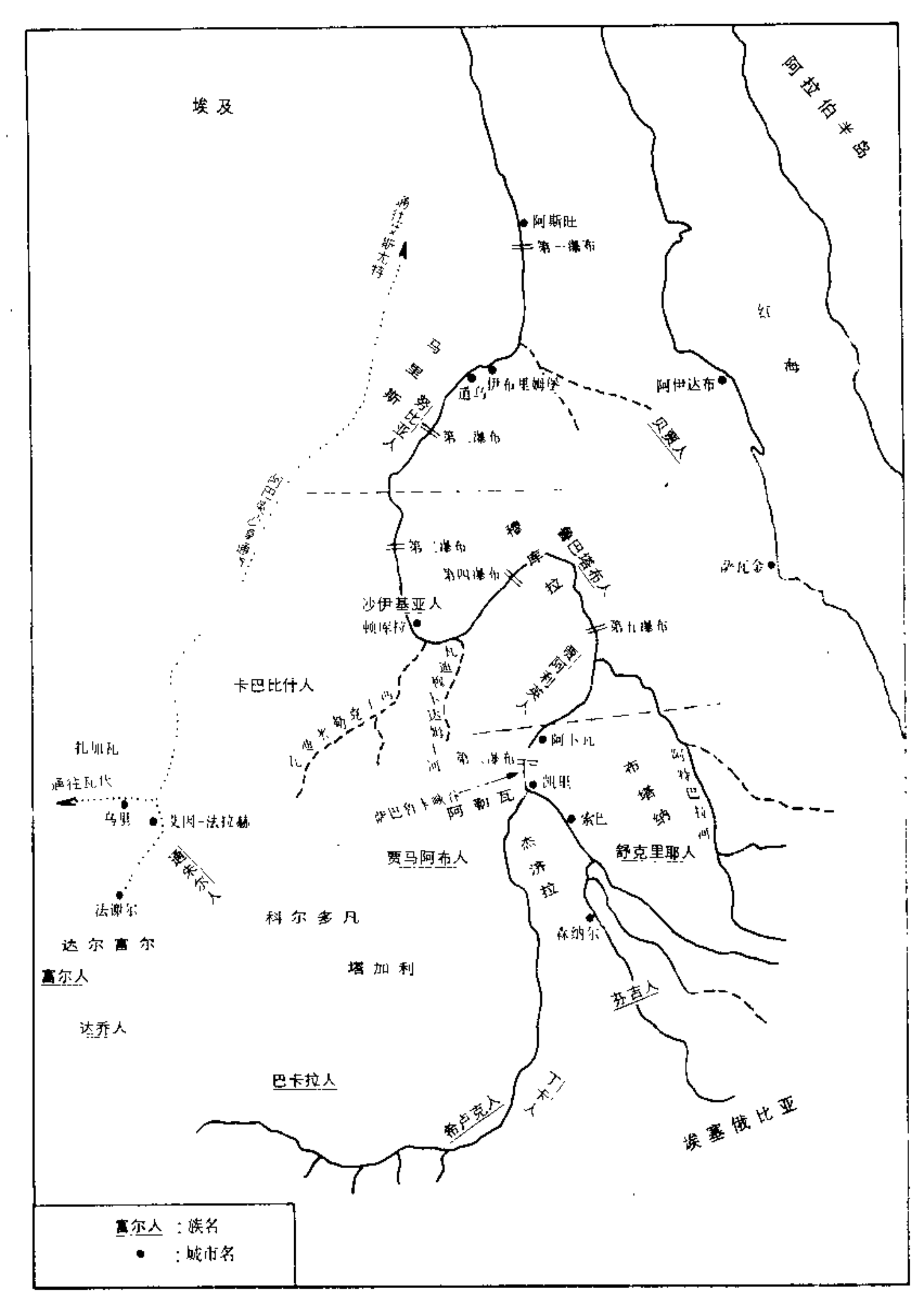


图16.1 12世纪后期到16世纪初期被芬吉人征服时的努比亚

它的都城是顿库拉（旧栋古拉）；和阿勒瓦王国（阿洛迪亚）。这两个王国的分界线位于第五和第六瀑布之间（见插图 16.1）。阿勒瓦最北的边境村落通常被称为阿卜瓦（“大门”，或现代的名称凯布希耶）。这两个王国的王位继承主要根据母系继承制，这一制度赋予前统治者姐妹之子获有王位继承权。努比亚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都具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对于这一点，许多资料和报道似乎都有很大误解。

穆库拉王国

如前所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埃及法蒂玛统治者和努比亚的关系相当友好。有足够的文件和材料证明，在那个时期，埃及和努比亚之间的贸易很兴盛。仅举一例为证，经对出土陶器的研究，发现双方人民的交往频繁，法蒂玛设计的各种图案对努比亚制陶业有很大影响。这时期双方根据巴克特条约通商所采取的形式看来很合情合理，体现了安全和贸易两方面的相互利益。宗教信仰的不同并没有被看成是个大障碍。很多阿拉伯文资料都提到：亚历山大教区教长和他的保护人努比亚国王之间的交往一直未受干扰，对造谣诬蔑努比亚人有反穆斯林之嫌以及 1079 年退位的努比亚所罗门王在开罗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的人给予了应有的惩罚。

法蒂玛王朝对南方邻国态度友好，可能是由于他们感到什叶派政权在伊斯兰世界处境孤立。从努比亚人方面来说，对这一友好态度有时以直接帮助给予报答。因此，埃及 10 世纪时，受到法蒂玛武力征服的同时，也遭到努比亚人的入侵，后来这些袭击只是在阿尤布王朝推翻了这友好政权之后才又重新恢复。努比亚人在遣返从埃及外逃的奴隶和政治流亡者方面也给予合作。另一方面，巴克特条约的许多条款反映了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的一些惯例。

法蒂玛王朝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成份是苏丹籍的黑人士兵，他们大都是从穆库拉和阿勒瓦这两个王国买来的。由于哈里发穆斯坦西尔的黑人母亲对他们的特殊偏爱，这些士兵曾威风一时，之后，于 11 世纪下半叶，与他们敌对的土耳其人和柏柏尔人将他们中的许多人驱赶到上埃及，他们后来在那里经常与自己的政敌发生冲突。尽管如此，这些黑人士兵依然是法蒂玛政权的坚决支持者。他们在法蒂玛政权的末期曾顽强抗击日益强大的阿尤布王朝。 401

倔强的阿拉伯士兵曾多次反叛，后来成为一大祸根。他们中有一些人可能逃脱了随之而来的镇压来到南方，但人数有限，行为也尚能控制。在解决巴努希拉尔族的阿拉伯人问题时，法蒂玛王朝采取把他们向西遣送到北非去的明智决策而得到好评。在南部边界，法蒂玛王朝不得不于 1102 - 1103 年进行一次讨伐来平息巴努尔坎兹族要求独立的愿望；在穆库拉寻求避难的反叛者坎兹·达乌拉（巴努尔坎兹人的酋长），被努比亚国王交还给了埃及人。后来，部队驻扎在阿斯旺以守卫边疆，直到法蒂玛王朝被推翻，边疆一直保持平静，没有发生过大的骚乱。阿拉伯编年史作者们确实没有发现在法蒂玛王朝统治的最后 70 年里埃及 - 努比亚关系中有什么值得记录在案的事件，这证实，两者之间始终保持着和平共处和友好往来。

贸易进行得很顺利。巴克特条约的条款规定，依照惯例允许穆斯林商人自由旅行并向他们提供保护，但一般只准他们在北部边疆地区定居。从长远观点看，和在西苏丹一样，贸易为伊斯兰化铺平了道路。商人们来往不断，他们本身增加了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同时又将此传播给了对此感兴趣的人。商人的个人热情对传播伊斯兰教的贡献大于受法蒂玛王朝之命传播什叶派教义的官方宣传者(杜阿特，*du'āt*)。在尼罗河地区，官方的活动从来没有越出阿伊达布，大部分传教工作是由商人们自然而然和不知不觉地进行的。

阿尤布王朝统治时期的埃及－努比亚关系是从1172年努比亚人的一次进攻为起点的；萨拉赫·丁的兄弟图兰·沙赫统率下的阿尤布军队发起反击，攻克了伊布里姆堡，并占领了一段时间。有人说，努比亚人发起进攻可能是法蒂玛王朝和努比亚人之间订立某种联盟的结果。[④]不久，阿尤布军队打败了反叛的巴努尔坎兹阿拉伯人，迫使他们从阿斯旺撤退到穆库拉北部的马里斯地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该地区在9世纪和12世纪间逐渐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巴努尔坎兹人（他们本来就是阿拉伯－努比亚混血族）居住在努比亚，又是族内婚，这是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主要原因。

402

埃及的各个氏族集团(*kabila*)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南流动。阿尤布王朝统治下，阿拉伯游牧和半游牧氏族集团受到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在马木路克王朝统治时期还要更大，引起了多次严重的冲突。据史料记载，1302年、1351年、1353年、1378年、1395年马木路克军队曾对倔强的乌尔班人，即习惯所谓的贝都因人，进行过多次大讨伐。乌尔班人在不断的追击之下，最后只有一条出路：逃往苏丹。饥荒和瘟疫所造成的威胁，也将他们往同一方向推进。随着掳掠而人数日益增多的这些游牧民，越过沙漠，向尼罗河畔的努比亚挺进。这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途经人们定居区时攻打单个村落和地方政权，并又自相残杀。埃及和努比亚人都惧怕这一严重威胁。

在分析努比亚与马木路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的关系时不能脱离开这个背景。穆库拉，由于面临劫掠和逐渐丧失内部凝聚力，越来越难生存下去，也越来越难保持它希望有一个合作的邻国来起到确保南部边界安全的作用。而马木路克政权则加紧推行旨在将穆库拉变为一个附庸国的政策。统治家族内部的不和为马木路克的干预提供了便利。后来，当统治家族中某些人皈依伊斯兰教时，这种不和又具有了新的意义。

似乎有理由作这样的推测：拜巴尔斯素丹（1260－1277年在位）采取积极干预努比亚事务的政策，其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埃及的安全出发的。也有人认为，从历次努比亚战役中得到的和从上埃及乌尔班人那里获取的大批劫掠物，也许可以说明，在持续不断的武装干预的背后还是有着经济目的。[⑤]当时一些编年史记载了由于素丹要求恢复巴克特条约，曾经有过一项外交协议书，但是，从一个无法查考的日期起这一协议就被中止执行。相反，努比亚国王达乌德却曾多次侵入埃及领土，1272年达到高潮，他其至占领了对埃及商业至关重要的红海港口阿伊达布。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一行动是为了支持十字军，但这种说法缺少证据。引起入侵的原因，更有可能的是达乌德在数年前控制了

④　见P.L.欣尼，1971年(b)，第46页。
⑤　Y.F.哈桑，前引著作，第114页。

萨瓦金，以后就想获取战利品，对马木路克复仇。尽管如此，在叙利亚和努比亚，同时都发生了对马木路克政权的征战，这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1276 年，拜巴尔斯素丹派出一支庞大的讨伐军。这支军队击败了达乌德，将穆库拉的王位给了与达乌德争夺王权的他那堂兄弟，即史料中所说的萨坎达，或者叫做马什卡德。为报答马木路克王朝的支持，萨坎达以基督教的名义起誓，保证归附素丹，接受一系列条件，以附庸关系代替传统的巴克特条约关系。[6]萨坎达自称是素丹的代理人（"奈依布" *nā'ib*）他保证将本国岁入的一半及苏丹地区的一定数量的牲畜，作为贡俸。马里斯地区（可能是该地区全部岁入）交给素丹直接控制。不愿信伊斯兰教的努比亚人每年须交纳人头税（*djizya*）。在努比亚避难的阿拉伯游牧民将被遣返。更甚于此，萨坎达的一切政策均需经这位素丹批准。 **40.**

除了协议中那些可耻的政治与经济条件外，努比亚还损失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虽然史料中关于输送到埃及充当奴隶的战俘达 1 万人之说肯定有些夸张。但战俘中包括王族中的人质和前国王达乌德，这是有政治含义的。达乌达曾到阿卜瓦寻求避难，但被那里的统治者出卖了。拜巴尔斯和埃塞俄比亚的叶库诺·阿姆拉克往来的信件中表现出对达乌德命运的某些关注。

穆库拉降为强大宗主国统治下的一个仆从国后，内部仍经历了相当大的动乱，所以又多次遭到讨伐。作为起着阻止掠夺性游牧民的缓冲国作用的努比亚，采取对外干涉的野蛮政策，结果证明是目光短浅。马木路克王朝的军队对这个国家大肆掳掠，使它的人口大减。对付游牧民的尼罗河地区国家的抵抗力量因此而减弱到毫不起作用的地步。形形色色的阿拉伯人为在埃及以外掠夺到财物和过较好的生活，纷纷趁机投身马木路克军队。据伊本·富拉特估计，参加者在 1289 年达到 4 万部落民，这一数字无疑包括士兵和随营人员在内。[7]巴努尔坎兹人从一开始就参与支持马木路克的战争。

国王夏马蒙是马木路克王朝的顽强的对手。在两次遭到失败后，他攻打驻在顿库拉的马木路克卫戍部队，杀死了叛徒和他们的保护人。1290 年，他写信给卡拉乌恩素丹请求宽恕，并答应给予超过巴克特条约规定的补偿。这位素丹似乎因已经承诺要和十字军残部作战而默认了这种局面。

努比亚免于战祸之后又过了 10 余年。1305 年，国王阿米为寻求帮助以解决其国内问题而要求开罗再次派出一支讨伐军。后来，阿米的继位者卡伦巴斯由于拒绝纳贡，而且也实在无力纳贡，又引起一次讨伐，随讨伐军而来的是一个新的王位觊觎者，要由他来取代这位不顺从的国王。候选者是个穆斯林教徒，这是空前未有的。他是达乌德王的侄儿，据史料记载，他名叫赛弗·丁·阿卜杜拉·巴尔萨布（或叫萨布）。卡伦巴斯作出的反应是提名另一位穆斯林候选人舒贾·丁。他是当时的坎兹·达乌拉（也即巴努尔坎兹族的酋长），又是卡伦巴斯亲姐姐的儿子，此人更有权继承王位。 **404**

[6] Y.F.哈桑，前引著作，第 109 页，有这项协议书的全文；在马克里齐（al - Makrīzī）的《苏鲁克书》（《*Kitāb al - sulūk*》）中有努韦理（al - Nuwayrī）整理的文本；另见J.S.特里明厄姆（J.S.Trimingham），1949 年，第 69 页。

[7] 伊本·富拉特（Ibn al - Furāt），1936 - 1942 年版，第 8 卷，第 83 页；Y.F.哈桑前引著作，第 114 页

萨布在顿库拉即位，标志着穆库拉王国正式皈依伊斯兰教。在为纪念这一事件而立的石碑上，用阿拉伯文记录了将顿库拉王家大教堂改建为清真寺的情况，时在回历 717 年 3 月 16 日（即公元 1317 年 5 月 29 日），赛弗·丁·阿卜杜拉·纳西尔主持了开寺典礼。但是，新王的统治并不长久。坎兹·达乌拉得到努比亚人和阿拉伯各氏族集团的广泛支持，因而战胜并杀死了他的敌手——从开罗来的他的远亲。

苏丹担心在一个努比亚和阿拉伯混血儿的统治下周围会出现一个更为广泛的联盟，因此，他设法挑选出一个新的候选人。在后者过早去世之后，于 1323－1324 年间又有一次讨伐，这次讨伐将卡伦巴斯重新扶上了王位。卡伦巴斯国王在暂时囚禁于开罗期间已皈依伊斯兰教。[8] 然而，坎兹·达乌拉赶走了他的舅舅，将政权夺回到自己手中。人们不清楚马木路克统治者为什么没有再次干预。

以后的一段王朝史难以查考得非常清楚。从我们所掌握的涉及 1365 至 1366 年种种事件的资料看，内部权力之争一直不停似乎与阿拉伯人的坚决卷入有关。巴努尔坎兹族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巴努尔伊克里马族以及巴努贾德族起了很大作用，后者控制了顿库拉。国王在马里斯地区的道乌城堡寻求避难，这时顿库拉已成为一堆废墟。由努比亚驻开罗使节请来的马木路克军队采取屠杀阿拉伯人、在北部地区捕捉俘虏以及迫使巴努尔坎兹族和巴努尔伊克里马族人屈膝投降的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努比亚国王保留了他们在道乌的住所。穆库拉王国大部分地区一片混乱，已经没有了中央政权。自 1397 年起，涉及努比亚国王的最后的文字史料是再次请求帮助以解决其内部的纠纷。

因此，努比亚王国最后时刻的情况我们是模糊不清，而埃及的资料对此则只字不提。苏丹有以口头传说和各部族家系为根据的另一种有用材料，谈到的是沿尼罗河一带及其邻近地区的新的部族分布的形成，丝毫没有涉及前统治者的消失一事。有据可查的史实表明，努比亚从未被并吞，不能把埃及人的入侵看成是有计划的消灭努比亚或是将其殖民地化。然而，由于埃及人的入侵，穆库拉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大伤了元气。一位现代苏丹历史学家在谈及上室的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时写道："努比亚王国没有被彻底推翻。"[9] 另外则有"基督教努比亚遭淹没"的说法；[10] 或认为外来移民吞没了努比亚原有的力量。

405

阿拉伯化的一个重要媒介就是通婚。由于努比亚实行母系制度，阿拉伯父亲和努比亚母亲所生的儿子有继位权以及分得土地和其他财产权。我们已经看到，巴努尔坎兹族的政治统治所贯彻的正是这种制度。人们逐渐皈依伊斯兰教是中央政权消失之后出现的混乱状态下同一复杂过程的另一个方面。

近代考古工作所获得的大量证据使我们有可能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来看一看这一结合过程中的各个对立面。[11] 自 12 世纪中叶以来，人们的不安全感增加了，在这同时防御建

---

[8] Y.F.哈桑，前引著作，第 120 页。根据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和艾尼（al-'Aynī）的权威著述。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阿斯旺圣赛米奥修道院中用古老的努比亚文写的、年代为 1322 年的一块敬奉希腊正教的石雕表彰了卡伦巴斯国王，说他是伟大的基督教君主，是"凯撒之首席"。参看F.L.格里菲思(F.L.Griffith)，1928 年。

[9] Y.F.哈桑，前引著作，第 90 页。

[10] P.M.霍尔特（P.M.Holt），1970 年，第 328 页。

[11] W.Y.亚当斯，1966 年。



图片16.1 法拉斯（努比亚）的教堂和修道院被阿拉伯人城堡所包围（从东门看）



图片16.2 法拉斯阿拉伯人要塞的城墙，用古的碑石

筑发展起来了，基督教徒聚居的许多居民点都修建了各种防御设施。在调查了许多聚居地遗址后发现它们有共同的特征，最好的解释是它们都是为防止劫掠者掠夺财产和食物而设计的，而居民很可能还是更倾向于逃跑。通常只有在上努比亚和第二瀑布上游的基督教徒晚期遗址内才有防御围墙和瞭望塔(见图片16.1)。在不少岛屿上发现了许多基督教徒后期社会的遗迹 这些岛屿居民点的防御设施都面向大陆，而瀑布地区瞭望塔都朝向南方，这似乎表明，当时预计敌人来自沙漠，而且主要来自南方，此时很可能他们还不熟悉水上设防。[12]

因此，合乎情理的结论似乎是，主要危险是来自沙漠的那些掠夺成性的部落，主要是阿拉伯人，但也可能有柏柏尔人、扎格巴卡人和其他族人。这样，一方面，当时根据埃及人的观点所写的许多资料使我们了解到被毁的村庄、被砸碎的水车以及被北方入侵军队掳去充当奴隶的人民的情况；同时也提到了撤退中的努比亚人自己所采取的焦土政策。另一方面，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危险，它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感受也更为强烈。正是这一因素，即阿拉伯人的渗透，最大程度地破坏了旧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并推动了影响深远的文化变革。

406

阿勒瓦

阿勒瓦的历史比穆库拉有组织的基督教社会最后时期的历史更加模糊不清。主要根据伊本·苏莱姆（自公元975年起）和13世纪初的阿布·萨利赫的报道，再加上穆斯林商人那里获得的资料作为补充，想象出一个繁荣王国的一般形象，其原因在于阿勒瓦是购买奴隶的好市场。阿布·萨利赫的描述表明这王国正处于鼎盛时期，拥有400多处教堂，其中包括在索巴的一所宽敞的大教堂。

在马木路克统治时期极少提到阿勒瓦王国。经常讲到的只有阿杜尔一人，他是阿卜瓦的统治者，为要取得马木路克素丹的好感，曾数次引渡逃亡的努比亚国王。1287年，应阿杜尔的邀请，素丹曾派遣使者调查对顿库拉国王不满的怨言。根据同一位中世纪作者提供的资料，1290年阿杜尔又曾要求提供帮助以对付一伙很可能是来自南方的外敌。[13]

阿勒瓦的衰亡与穆库拉的衰亡极为相似。阿拉伯移民渗入边缘地区，进而深入内地，和当地居民通婚，并获取了对牧场的控制权，他们就是这样侵蚀当地的社会结构和挖中央政权的墙脚。来自南方黑人的攻击构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威胁，并影响到国家潜力和人力资源，但这很可能早已被奴隶贸易所削弱。此外，教会处境孤立，毫无作为。15世纪后半叶，情况全面恶化，使得阿拉伯人得以在索巴附近的国家中心地区定居。阿拉伯人在杰济拉地区的扩张到达的最南点是建于1475年前后的阿尔巴吉城。

直到最近，一般都认为阿勒瓦王国是于1504年最终消亡的，因为在这一年建立了以

[12] W.Y.亚当斯，1966年，第150页："越往南走，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碉堡，其在基督教时期中出现的时间也一个比一个早。"但亚当斯承认这一说法是以他本人对巴滕·哈杰尔和上努比亚地区的基督教徒遗址不太系统的观察为依据的。

[13] 伊本·阿卜德·扎希尔（Ibn ‘Abd al-Zāhir），12世纪，见Y.F.哈桑，前引著作，第13页。

森纳尔为中心地的芬吉素丹国。然而，这两件事并不一定是同时发生的，而且也没有足够理由来排除索巴可能是在更早一些的时候由阿拉伯人独自攻占的旧说法。[④] 口头传说中说，这一军事行动是由阿卜杜拉酋长组织和领导的，他绰号为贾玛，是鲁法族阿拉伯人卡瓦斯马支系的“召集人”。进攻的理由是反对名叫阿纳吉的阿勒瓦国王的所谓专制暴虐，结果，索巴被攻占，而且很可能被摧毁，居民逃散了。阿卜杜勒酋长的后裔——“阿卜杜勒比”在两条尼罗河汇合处及其北边的广大地区取得了对各游牧氏族集团和阿拉伯化的努比亚人的统治权。新统治者的都城建在凯里（靠近萨巴鲁卡峡），这样就确保了对尼罗河主河道的控制地位。 **407**

阿拉伯人的统治地位不久就受到了挑战。16 世纪初，又有大批移民顺青尼罗河而下，突然出现在杰济拉地区。他们是芬吉人，以游牧牛群为业，那时他们信奉自己的传统宗教。对他们的渊源曾作过不少的推测，从他们和希卢克人相似这一点说起，一直探索到他们的家园是否在博尔努或者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某处。[⑮] 涉及 1504 年事件的两个相互矛盾的口头传说都提到阿拉伯人与芬吉人的关系。《芬吉编年史》19 世纪修订本中所持的是第一种说法：芬吉酋长阿玛拉·顿卡斯与阿卜杜勒·贾玛缔结了反对索巴的盟约。我们从詹姆斯·布鲁斯处了解到的是第二种说法：双方曾在阿尔巴吉附近交战。显然，双方都在争夺杰济拉南部的放牧权和统治权。

芬吉人取得了胜利和权力，而阿卜杜勒后裔酋长们则居第二位。芬吉人与“阿卜杜勒比”阿拉伯人合作进行统治，扩展到了尼罗特苏丹的广大地区，开创了苏丹史上的新纪元。政治上的稳定有利于阿拉伯威望的增长和有效地推行伊斯兰化。

伊斯兰教的胜利

基督教的衰落

努比亚从基督教转而皈依伊斯兰教并不是一个从南到北直线向下速滑的过程。伊斯兰教的传播早在本章论述的那个时期之前即已开始，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速度发展，到了芬吉人统治时期才大体完成。伊斯兰化的途径非常之多：有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容许穆斯林商人进入这个国家活动；有阿拉伯人的逐步渗透、直接施加压力和后期机会主义分子纷纷追求私利、如萨坎达所订立的条约和顿库拉王室改变宗教信仰。

同样，基督教信仰也不是立刻随同努比亚的政治制度一起消失的，而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20 世纪 60 年代在伊布里姆堡发现了一座主教墓，其中随葬品有主教的科普特和阿拉伯纸卷。这表明，1372 年时教会的高级圣职人员仍在履行职责。基督教社会可能又延续存在了好几代。16 世纪 20 年代，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斯的葡萄牙教士 **408**

[⑭] 见P.M.霍尔特，1960 年；H.N.奇蒂克（H.N.Chittick），1963 年（b）。奇蒂克认为，在阿勒瓦王国消亡后，一位基督教将军逃往凯里，这座城市像是阿卜杜勒比编年史中提到的要塞。

[⑮] 源自希卢克族之说的最早的权威是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1790 年，他在 1772 年访问了森纳尔。源自博尔努的说法主要是由A.J.阿克尔（A. J. Arkell）提出的。至于该问题的详尽分析，见P.M.霍尔特，1963 年。

在埃塞俄比亚旅行时听到他的同行者叙利亚人约翰对努比亚人国家的一段描述：

> 他曾到过这个国家。那里有150座教堂，座座仍都保留着钉有耶稣的十字架和圣母像，墙上还画有许多其他肖像，一切如旧；这个国家的人民既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摩尔人或犹太人，但他们渴望能成为基督教徒。这些教堂都建在遍布全国的古老的城堡内，有多少城堡，就有多少教堂。[16]

阿尔瓦雷斯还写到一位基督教使节，他是上述努比亚国家派往埃塞俄比亚宫廷请求派教士和修道士去教化他们的；然而，埃塞俄比亚的“约翰神父”因考虑到他自己与亚历山大教区主教的从属关系而未能如此做。通常认为所提到的这个国家就是阿勒瓦，这一观点最近受到怀疑，有人认为这是顿库拉地区，此问题至今尚无定论。考古工作看来很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以证明努比亚的当地基督教社会保持了很长时间。

至于伊斯兰化发展的进程，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部分证据都来自北部地区。占人口少数的穆斯林居民很可能长期以来一直与他们的基督教邻居和平共处，分享着共同的物质文化。但11世纪中叶以后未曾发现有阿拉伯文的墓碑，因此就引起了穆斯林可能受到基督教徒排挤的猜测，有一个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碑文似乎可以证明这种说法，但要肯定这种说法仅凭这一块碑文是远远不够的。[17]

后来，随入侵而产生的种种反基督教暴力的迹象说明，这类行动属于偶然，既非预谋，也不是受普遍的宗教仇恨所驱使；例如历史书曾谈到，在阿尤布王朝征服伊布里姆堡后把教堂改建为清真寺、捕捉和折磨主教、屠宰猪群等情形。但总的说来，在努比亚的基督教纪念物上都没留下什么破坏性暴力的痕迹，虽然有些纪念物可能被乌尔班人掳走了。文字资料也未记载基督教义本身曾是攻击的目标。W.Y.亚当斯写道：“努比亚的基督教徒夹在埃及穆斯林和游牧民穆斯林两股势力的中间，这两者之间相互仇恨，同样又仇恨努比亚。如果说努比亚的基督教毁于这过程之中，那么与其说是出于预谋，还不如说是事出偶然。”[18]

然而，努比亚基督教的削弱有其重要的内部原因。根据广为流行的看法，它基本上是上层人士的宗教，没有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在很大程度上，礼拜都和科普特人牧师及外国文化有关，没有土生土长的圣徒和殉教者。几乎所有的墓碑都用希腊文或科普特文书写，J.S.特里明厄姆认为，努比亚基督教堂“从来没有像伊斯兰教那样本土化。”[19]虽然如此，在发掘出来的教堂壁画上，还是可以看到土著努比亚主教的黑色面孔。尽管教士们的虔诚很难说明农民的感情，但是我们也不能无视用努比亚文刻成的虔诚的碑文。长期存在一种更古老的在基督教之前就存在的宗教信仰，它在伊本·苏莱姆的著作（写于10世纪）和今天苏丹流行的伊斯兰教中仍有所反映。

努比亚的基督教会是一种与国家政权密切相关、经过精心培育的城市文化，但它基

[16] 见F.阿尔瓦雷斯（F.Alvares），英译本，1881年，第351－352页。
[17] W.Y.亚当斯，1965年，第172页，提到该碑文发现于迈纳尔提。
[18] 同上，1966年，第151页。
[19] J.S.特里明厄姆，第76页。

本上远离外国的基督教，孤立于四周的穆斯林邻国之中。然而，对这一点我们不可过于武断。努比亚的艺术似乎表明曾与拜占廷，甚至也许与十字军都有过关系。[29] 占主导地位的是基督一性论，除了与科普特主教教区的联系之外，也还有晚些时候的梅尔基特人习俗的证据。[30] 但是，努比亚教会的孤立状态日趋严重。13世纪中叶，中断了与亚历山大主教教区的联系，或许从此再也没有科普特教士被派往该地。尽管如此，直到14和15世纪，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的小礼拜堂中，以及后来在加利利的宗教仪式上，仍都可见到努比亚的朝圣者。

因此，在一种难下结论的环境中，外部因素，特别是不利于维护基督教国家独立的大量移民，肯定会引起内部的变化。随着基督教教会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已黯然失色，皈依伊斯兰遂成为那些影响很大的移民上升到一种新的显赫地位的象征，所以对作为社会重新组合一份子的各阶层人民来说，伊斯兰化成了一种逐步的但却是普遍的发展过程。

苏丹人的阿拉伯化

在本文探讨的这个时期，有大量的阿拉伯氏族集团移居苏丹，或在苏丹境内易地而居，苏丹各族人民迅速重新组合成许多新的部族。从努比亚诸国消失之后的黑暗时期起出现的情况，证明曾有过一次规模巨大的种族混合，阿拉伯语言和文化基本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然而，在土著人口阿拉伯化的同时，移民也以同样势头非洲化，这一点在他们今天的种族特征方面显得非常清楚，苏丹阿拉伯人新具有的文化特点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新家园的环境。

有许多资料对我们站在历史角度上研究一次次的迁徙如何导致北部苏丹出现现代民族的问题具有宝贵的价值，但我们使用这些资料时必须持谨慎态度。这些资料大部分都是些传奇故事和家系传说，它们整理成今天这种样式还是最近的事。这些被称为安萨布（*ansāb*）或尼斯巴（*nisba*）的家谱，都是口头留传下来的，或在某些情况下写成书面文字作为珍贵的私人财产保存至今。[31] 有些家系的起源可追溯到很久以前。许多尼斯巴系谱的创作者是萨马康迪，他是16世纪的一位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据说，他编写了一本芬吉人各个宗族的家谱，目的是要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相信苏丹人确实具有阿拉伯和穆斯林背景，以此劝说他放弃敌对计划。这一目的——为要表示是高贵的阿拉伯人的后裔——使得许多家谱，特别是其中较古老的部分令人生疑，不足取信。

尼斯巴系谱一般不注重实际的血亲继承关系，各宗族都以自己与古老的氏族集团或联盟有关系而感到自豪。例如，历史悠久的朱海纳族，称其祖先是南阿拉伯（卡赫塔尼）人；贾阿利英族则声称与北阿拉伯（阿德纳尼）人有关，说自己的祖先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叔叔阿拔斯，这样，就与阿拔斯王朝有了血缘关系；而芬吉族黑人有意把自己的祖先

---

[29] 特别是波兰学者在法拉斯的考古挖掘工作使人们看到了拜占廷的影响，也还有波斯影响的痕迹，关于具体细节，见K.米查洛夫斯基（K. Michalowski），1965和1967年。

[30] 这一点已由在法拉斯进行的挖掘工作所证实。努比亚基督教的性质在D.W.基尔赫夫纳（D.W.Kilhefner）1967年一书中有所评述。

[31] 内容最丰富的尼斯巴系谱（*nisba*）是H.A.麦克迈克尔（H.A.MacMichael）编写并出版的，1922年

说成是伍麦叶人，为的是要掩盖自己模糊不清的起源。在一些苏丹氏族和布道士家庭中还出现了另一种自诩高贵的说法。布道士们自称为阿什拉夫（*'Ashrāf*），也就是说，他们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和近亲。不幸的是，从中世纪阿拉伯作家那里得到的一些补充资料和经过更正的材料都是支离破碎的，还不如精心编造的尼斯巴系谱那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研究为数众多的族群的活动，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的渗透活动大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自12世纪以后，则变成了大规模的涌入。在中世纪的史料 412 中经常提到的一些族群名称，后来完全消失了，随之出现了新的族群。我们不应忘记，许多族群的组合在较长时间内都具有流动性。阿拉伯人，或赶着大群牛羊，或空无所有地长途跋涉，他们经过的许多路线，至今有一部分仍依稀可辨。

至今在尼罗河以东的部族名称中常用的后缀"*-āb*"，源自图-贝达维（贝贾维）语，意为家族或部落，这表明氏族集团的迁徙曾经过贝贾地区。该地区很可能最早有横渡红海和从埃及来的阿拉伯移民来到。许多游牧民对在此定居不感兴趣，贝贾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包括通婚在内的接触也没有最后导致完全融为一体。各氏族集团继续行进，来到布塔纳和尼罗河中游绵延起伏的平原地带，他们在这里与经过努比亚涌来的另外一些人相遇。许多人终于在杰济拉定居下来。

有许多族群经尼罗河流域向南迁徙。上面已经提到，他们中的一些人自愿参加了马木路克的远征活动。他们从几个方向进一步深入顿库拉以南的干旷草原地区。有一些族群向西方迁移。瓦迪米尔克干河和瓦迪穆卡达姆干河，是方便的路线。通往达尔富尔的另一途径是阿巴英通道（即"40天路程"通道），这条路线起于埃及西部沙漠中的绿洲。

根据他们各自的"尼斯巴"系谱，大多数讲阿拉伯语的苏丹人把自己划属于包罗很广的两大族群——或是贾阿利英族群，或是朱哈伊纳族群。贾阿利英族群，主要包括尼罗河中游和科尔多凡地区的一些定居部族，除了居住在阿特巴拉和萨巴鲁卡峡谷之间的贾阿利英本族外，还有贾瓦布拉、贝达伊里亚、沙伊基亚、巴塔欣、贾马阿布、贾马伊亚、贾瓦米亚诸族。据传，他们共同的祖先是一个阿拔斯人，名叫易卜拉欣·贾阿尔，各部族都引用他的名字，而他的生活年代大致是在12世纪或13世纪。贾阿尔是他的外号，人们称呼他这个外号是因为他乐善好施，经常对饥民说"我们把你看作一家人"（*Dja'alnākum minnā*）。[23]现有的"尼斯巴"系谱，只有16世纪以后的才比较可信。

总的说来，贾阿利英人就是阿拉伯化的努比亚人，虽然他们只有很少的阿拉伯血缘。他们的家园，在尼罗河中游第四瀑布以南，那里的两个基督教邦国之间的某个地方，可能就是他们重新聚居的家园。上面提到的贾马阿布、贾马伊亚、贾瓦米亚之类族名，都带有阿拉伯语的词根"贾马阿"（*djama'a*），其意为"聚合在一起"。[24]这表明了阿拉伯移民的混合成份，而他们又与土著居民进一步混杂；但是，在"尼斯巴"系谱的记录中，这一点完全被忽略了。

413 16世纪初某一时期，贾阿利族群的部分人向西迁移，进入科尔多凡，被土著黑人居

[23] H.A.麦克迈克尔，前引著作，第28、128页。
[24] 参考斯瓦希里语"*ujamaa*"一词。

民所同化，虽然他们仍保有自己的姓名和习俗。有关科尔多凡成立政府的传说，通常都以贾阿利族酋长与当地名门闺秀结婚为主题。努巴山区、达尔富尔、瓦代和博尔努的塔克利族统治者、还有科尔多凡的努萨巴特人，都认贾阿利族群是祖先。

朱哈伊纳族群更有权利自称是阿拉伯人。与贾阿利英人不同，他们习惯于游牧生活，因而住在日趋荒芜的阿勒瓦草原上。系谱学家急于使历史系统化，往往错误地把所有游牧部落和一切不属于贾阿利族群的氏族集团全都和朱哈伊纳族群混为一谈。结果到了今天，从广义上讲，朱哈伊纳族群可以包括萨塔纳的阿拉伯人（舒克里耶人和鲁法人）、杰济拉的阿拉伯人（基纳纳人和梅萨拉米耶人），甚至还包括拥有骆驼的科尔多凡牧民（卡巴比什人、达尔哈米德人和哈马尔人），以及拥有牛群的巴卡拉人。他们都自称来自同一祖先，即阿卜杜勒·朱哈尼。

至于阿拉伯人向科尔多凡的渗透，所用时间大概更长。有证据表明，14 世纪时阿拉伯人已越过达尔富尔，向西渗透到乍得草原。这次推进的先驱是朱达姆阿拉伯人，他们的名称后来失传了。卡巴比什人好像是起源于几个不同的氏族，只是为了表示统一性，他们后来虚构了一个与部族同名的祖先卡巴什·伊本·哈马德·阿弗扎尔。“卡巴什”意为“公羊”，这是游牧民中的象征。据传卡巴什的兄弟是法扎拉人的祖先，古老资料中常见这个名字，但在马赫迪时代之后也失传了。

“巴卡拉”原意为“牛”，变为广义的族名，指一些放牧牛群的部落，他们的住地今天已延伸到苏丹人自东至西的主要通道以南。这个地区的气候既不适于饲养骆驼，也不适于放牧羊群，因而巴卡拉人就只能改而牧牛了。但是，他们一般仍以放牧骆驼的习惯方式来放牧牛群。由于是后来者，他们可能发现北方牧场已经有外族占领，所以不得不另谋生路。与卡巴比什人一样，他们逐渐和某些先前的朱达姆氏族同化了。黝黑的肤色，证明他们与土著尼格罗黑人居民是密切混合了的。

巴卡拉人入境的路线还没有考察清楚。他们当中一些人说，其祖先来自突尼斯和费赞。在当地传说中，确实也提到通过这一条路线进行迁移、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远至达尔富尔。由此看来，巴卡拉人可能起源于一个混血族，其中一支是来自尼罗河的朱达姆人，另一支则是来自费赞和乍得的部族。还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认为巴卡拉人的祖先在 10 代以前，就已向西移动，后来又转而向东，抵达今天的住地。据说他们与巴努希拉尔人也有联系，这既反映了他们与北非有长期的文化接触，同时又反映了有一小支 **414** 希拉利人在从埃及向南迁移到努比亚的各族人民中活动。[29]

在涌入尼罗河流域苏丹地区的新人群中，除了阿拉伯人之外，还有柏柏尔人和阿拉伯化的柏柏尔人，虽然他们在这个地区的人数比西部的要少些。有资料说明，在 14 世纪、15 世纪，一部分阿拉伯化的柏柏尔人——霍瓦拉人——曾经迁移到埃及去。所以，在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也都发现一些霍瓦拉人的小块定居点。可以想见，在来自马格里布的移民中，除了希拉利人或其他的阿拉伯人之外，必定还有阿拉伯化的柏柏尔人。

---

[29] 参阅Y.F.哈桑，前引著作，第 169 - 171 页。

社会和文化的变革

努比亚从来是处在地中海与热带非洲两个先进文明区域之间的一个重要地带。中央政权的消失、宗教信仰的变化、许多种族以及许多部族群体的大规模融合或重新组合，使得这块地方（现代苏丹的北部地区）再一次成为各种势力的汇合点，所有的居民都必然受到影响，而且改组为一个新的综合的独特的整体。在这个萌芽初生的社会里，已经产生出与现今苏丹显然相似的部族及文化特点；换句话说，正是这些部族同化和文化发展的特点，使苏丹地区成为阿拉伯－非洲一个独特的结合体，因而也是北部非洲的一幅缩影。[26]

由于国家权力的消失，首先造成的恶果是贫困和失去安全保障。生活水平的下降，除有前面讨论过的历史原因以外，可能还有气候的变化，现代的调查研究已经证实，当时尼罗河的水位一度降低。[27]

有关努比亚物质生活条件的早期记载，反映了当时目击者的看法很不一样，这是因为他们各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偏见。举例而言，12 世纪时，阿尤布王朝的一位使者报告说，努比亚是个穷国，那里只有黍米和椰枣，其主人十分可笑；而同一时代一位亚美尼亚人阿布·萨利赫，却以赞赏的心情，谈到努比亚城镇文化的精致。现代考古工作肯定了阿布·萨利赫的看法，而且提高了我们对努比亚艺术、特别是教堂壁画和陶器的鉴赏水平。虽然画面上有拜占廷的艺术痕迹，那些陶器却继承了本地尼罗特人的传统。只是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后，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考古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来说，努比亚本土（穆库拉和马里斯地区）在黑暗时期，指顿库拉遭到毁灭和 16 世纪初奥斯曼军队进驻之间这段时间，仍然是个大问号。近来，W.Y.亚当斯提出一种说法，他认为努比亚中部地区（马哈拉卡与尼罗河第三瀑布之间地区）原是贫穷之地，当地基督教居民大概是在 13 世纪末弃地离去；他们在南方多雨的地带度过 300 年的游牧生活，后来又回归故土，而这时他们已成了穆斯林。这一观点，可以解释努比亚中部马哈族的方言为什么与北部克努兹族和南部达纳克拉族的方言大不一样。克努兹族和达纳克拉族的方言非常接近，但却与马哈西语差别很大，虽然马哈族就住在这两族人之间。W.Y.亚当斯认为，早在努比亚诸王国衰亡时，伊斯兰化的肯齐语族已经渗入尼罗河第二瀑布以南人口稀少的地区，因而扩散了肯齐语；与此同时，马哈族在游牧生活中仍沿用一种更接近于古努比亚人的方言。当然，这种看法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接受的。[28]

总的看来，在黑暗时期耕地是减少了，致使原先的定居人口有相当一部分转变为游牧民或半游牧民。伊本·哈勒敦是基督教努比亚衰败的同时代人，在他的社会学观念中，

[26] 关于这问题，参阅阿卜德·拉希姆（'Abd al - Rahim），1970 年。

[27] 参阅J.德－海因策林（J.de Heizelin），1957 年。

[28] W.Y.亚当斯，1966 年，第 153－155 页；至于P.L.欣尼的意见，参见他投给Y.F.哈桑的文稿，1971 年，第 44 页

这个地区的定居生活既是文明的最后阶段，又是衰败的起点，恰好与贝都因游牧部落生气勃勃的活动相对照，同时，这种发展也证实了他认为一个被打败的民族会很快灭亡的看法。伊本·哈勒敦叙述了阿拉伯氏族集团特别是朱哈伊纳族群的氏族集团如何使努比亚诸王国解体而陷入无政府状态，然后写道："在他们这一片国土上，中央政权（穆尔克，*mulk*）早已荡然无存，因为他们经历过一场变乱，通过内部婚姻和联盟，受到了阿拉伯贝都因化势力的影响"。[89] 尽管这种说法有其现实意义，但如果由此断定努比亚经历了普遍的游牧化过程，又未免把复杂的情况看得过于简单了。

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势力带来了许多相互关联的变革。前面已经提到过一些，特别是从母系制到父系制的变化，以及一般氏族都自认为是阿拉伯人。除努比亚本土外，从阿斯旺往南，远至顿库拉，全都受到语言阿拉伯化的影响，甚至顿库拉地区也普遍是两种语言混用。另一方面，从博尔努到尼罗河流域，整个地区所用的阿拉伯方言则明显受到非洲语言的影响。只是在芬吉人统治时及其后，伊斯兰教规、教法（*sharī'a*）才逐步得到实行。妇女的地位变了，因为她们被排斥于公共生活之外。在婚姻关系、家庭或社会生活礼仪以及宗教仪式中出现了新的风俗。

基督教时代的观赏艺术和建筑风格已告结束。恰如伊本·哈勒敦所见，贝都因移民根本不关心美术，他们并没有把同他们信仰相同的定居部族的高雅审美观念和精湛技艺从伊斯兰中心地区带到努比亚来；在这个方面，苏丹一直是被忽视的边远地带。另一方面，非洲本土的美学传统并未衰退，它继续体现在一些小型艺术和手工艺创作中。 **416**

伊本·哈勒敦当时还曾提到努比亚人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就免除了缴纳人头税（*djizya*）的义务。然而萨坎达所订条约中有关人头税条款的执行情况，我们并不清楚。因此，可以相信的只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们受到保护而不再被奴役。过去，外族入侵、按巴克特条约必须交付财物、而且随时还要向穆斯林商人送上礼品和出卖奴隶，这些压力经常干扰着努比亚人的生活，尤其是信奉传统宗教的俘虏供不应求时干扰更大。随着达尔·伊斯兰（*dār al-'Islām*、伊斯兰教地区）面积不断扩张，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得不向南和向西去寻找猎获或购买奴隶的场所。另一方面，家庭奴隶劳动的使用情况可能没有多少变化，因为这种劳动在经济生活中只起辅助作用。在简单的手工艺和农业操作方面，也同样没有变化的迹象。

中央政府的消失、居民的贫困化、游牧经济占了优势，这些就是当时社会倒退的征兆。部族结构加强了，这妨碍封建制国家机构潜在的生长力。总之，经过黑暗时代之后，苏丹各族人民所得到的是一个新的社会格局和一种新的文化模式，这就限定他们只能在阿拉伯与非洲文化之间的桥梁地带争取进一步的历史发展。

努比亚在非洲历史上的地位

在当代研究尼罗特苏丹的历史学家中，出现了一种强烈而合情合理的看法，认为过去是不恰当地夸大了北方或阿拉伯人的因素，而忽略了土著居民的发展以及与黑非洲文

[89] 伊本·哈勒敦，引自Y.F.哈桑，1967 年，第 128 页。

化的联系。[30]一段时间以来，这种交叉文化与苏丹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一个特殊例子，已成为全面探讨而富有成果的园地。

现有资料的下述特点是造成注意力分布不均的一个明显原因。目前掌握的史料中，阿拉伯文的书面资料占很大的比重，而考古工作才只刚刚起步。当然，随着把口头传说的发417 掘与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考古学上也还是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特别是沿着苏丹自东往西的轴线，但在另一方面，由于错误地将貌似相同的部族名称与地方名称混为一谈，或由于对现存证据作出各种不正确的解释，我们仍难避免出现曲解事实的危险。

从与埃及的关系这一角度讲，这里只能合情合理地强调指出，努比亚人富有创造性的文化独立与科普特人社会有许多可比之处，而又高出很多。长期以来，这两种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科普特僧侣在遭受迫害时就到努比亚来避难。[31]也有足够证据表明，努比亚与上埃及之间也互有影响。最引人注目的努比亚文献残片是在科普特修道院里发现的，在埃及还发现了相当数量富有特色的努比亚陶器，也就是著名的栋古拉陶片。至于邻国之间的商业交往，无论是文字资料还是考古发掘都已找到大量的证据，足以说明有此情况。在东边，努比亚人从事的活动也导致他们同埃及和阿拉伯人建立多种联系。现在还不清楚的是努比亚对贝贾人的政策究竟如何，贝贾人可能偶尔袭击过沿河地区的一些居民点。据伊本·哈勒敦说，贝贾人有一部分是信奉基督教的。至于努比亚人在东部沙漠活动的整个情况，迄今仍有待进一步调查阐明。

由于阿拉伯学者们的努力，我们对通过红海进行贸易的情况已有较多的了解。在本文所涉及的时期，红海地区的贸易是相当发达的。法蒂玛王朝早就把红海开辟为通往印度的主要商路，直到16世纪初葡萄牙人闯入之前，这条商路一直畅通无阻。苏丹沿海的主要港口阿伊达布和萨瓦金原都是由穆斯林商人发展起来的。这些港口和尼罗河流域之间的贸易完全由阿拉伯人控制在手，虽然贸易往来都要经过贝贾人的领土，但就连他们也几乎完全处于被动的境地。然而，商业交往的友好态度和商路的安全是由一些条约作了保证的，在有些情况下，地方酋长可以分享税收。以阿伊达布地区为例，从法蒂玛时代到14世纪伊本·巴图塔游历这个繁荣商埠时，税收份额有增无已。[32]

阿伊达布港，主要是提供与埃及通商贸易的联系通道。当十字军侵占巴勒斯坦而又威胁西奈商路时，朝圣者都曾利用此港，去往麦加。14世纪后半期，通过阿伊达布的东方贸易明显下降，因为彼岸（亚洲的）吉达港正在兴起，而内地无休止的骚乱也起了不利于商业的作用。最后，到了15世纪20年代，巴尔斯贝素丹为了报复当地的阿拉伯人418 和阿拉伯化的贝贾人，对该港狠狠地作了一次致命的打击。[33]

从地理位置上看，萨瓦金作为一个商业出海口，无疑比它的北邻港口更加重要。然

---

[30] 参阅P.E.H.海尔（P.E.H.Hair），1969年。鉴于对苏丹的研究工作需要重作研究，苏丹研究所召开了首次国际讨论会（1968年2月于喀土穆）。另见Y.F.哈桑编，1971年。

[31] 举例而言，在加扎利发现的墓碑，证明科普特僧侣确曾到过那里。参阅P.L.欣尼和H.N.奇蒂克的著作，1961年，第69及以后各页。

[32] Y.F.哈桑，1967年，第73页。

[33] 关于阿伊达布遭到致命打击的情况，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录下了口头传说（1526年左右）；见法文译本，1956年，第484－485页。阿伊达布之名，误传为济比德，或扎比德。

而，根据现有书面资料的内容看，我们所作的探讨仅仅只不过涉及了萨瓦金和埃及的关系。1264－1265年，拜巴尔斯素丹采取军事行动，惩罚了萨瓦金的阿拉伯统治者，但后来却又同意任命他为马木路克的代表。有一段时间，萨瓦金统治者为表示归顺，每年要向素丹进贡80名奴隶、300头骆驼和30金塔尔的象牙（计量单位为金塔尔，*kintār*），这些都是供不应求的高价的苏丹产物。[54]15世纪中叶，一支马木路克的军队再次占领萨瓦金，将它置于马木路克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至于说到努比亚与基督教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关系，令人费解的是我们竟然也所知甚少。人们所提到的只是一些个别的事例，例如F.阿尔瓦雷斯曾谈到努比亚派往埃塞俄比亚的使节徒劳无功。然而，尽管缺乏足够的证据，我们仍然可以设想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双方基督教徒之间的政治关系肯定要比目前所能证实的更为密切。这也许可以从埃塞俄比亚方面找到更多的证据。

南边的情况也同样模糊不清。我们甚至说不准阿勒瓦王国的边界究竟延伸到多远。现已判明，与之相同的文化的遗址，最南端是在瓦德赫达尼一带，但也很可能还要延伸得更远一些，可以设想，当时人们经常是从这一地区的某些地方获得奴隶的。阿拉伯学者在描写阿勒瓦时，总把努巴人和其他黑人区别开来。一个常见的族名是库尔西、克尔萨或卡尔萨。[55] 学者们在其著作中写道，这些黑人赤身裸体——也有些资料说他们身披兽皮——全靠当地人信仰的神灵来替他们收获。在阿勒瓦境外，还有塔昆纳或巴昆纳族，他们可能也是赤身裸体的黑人。[56]伊本·阿卜德·扎希尔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约在1290年，阿纳吉（也即阿勒瓦）的国土曾遭到外敌袭击；Y.F.哈桑认为，这次袭击必定来自南方，或许就是芬吉人的祖先所为；A.J.阿克尔则认为，入侵者来自加奈姆，或来自达尔富尔。[57] 看来，来自南方的进攻是常有之事，甚至芬吉人据说也是从南方沿青尼罗河进入杰济拉地区的。一般说来，人们倾向于认为，基督教努比亚的瓦解肯定与近邻各方人口流动的连锁反应有某种关系；这种人口流动甚至包括尼罗河上游的居民——尼罗特人向南行进，渗入赤道附近的湖泊区。[58]

419

在西边，努比亚与外界的交往以及相互的影响比较容易追溯。正如人们习惯于无鉴别地赞扬古代的麦罗埃传播了熔铁技术一样，中世纪的努比亚竟也成了众人心目中传播基督教远及于西部非洲的中心。对此，我们虽不是持彻底怀疑态度，也应有所保留。虽然U.莫内勒·德－维拉尔曾经从西边收集到许多基督教传说，[59]当代也仍有不少学者支持基督教是从努比亚向外大规模传播的观点。[60]但是，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也同样不在少数，

---

[54] Y.F.哈桑，1967年，第85页，转引努韦理（al－Nuwayrī）的著述。

[55] 伊本·苏莱姆（Ibn Sulaym）、伊本·豪卡勒（Ibn Hawkal）和伊本·阿卜德·扎希尔（Ibn 'Abd al－Zāhir）都曾提到此族名。A.J.阿克尔，1961年，第195页，认为这可能是达尔富尔人，和瓦代地区的马巴人是同一个族。

[56] 伊本·法基（Ibn al－Fakih）和马苏迪（al－Mas'ūdī）都如此说。见Y.F.哈桑，1967年，第7页；A.J.阿克尔，1961年，第189－190页认为塔昆纳族名，在科尔多凡的考恩山区、尼日利亚的琼昆地区，甚至在加纳，都可能保存下来了。

[57] Y.F.哈桑，1967年，第130页；A.J.阿克尔，1961年，第199页。

[58] 见M.波斯南斯基（M. Posnansky）那篇激动人心的论文，1971年，第51－61页。

[59] U.莫内勒·德－维拉尔（U.Monheret de Villard），1938年。

[60] 详见I.霍夫曼（I.Hofmann），1968年。关于拜占廷、波斯的基斯拉和努比亚在使非洲基督教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论题，已由T.帕帕多波洛斯（T.Papadopoulos）于1966年步弗罗贝尼乌斯（Frobenius）的后尘重又提出。另见D.F.麦考尔（D.F.McCall），1968年。

他们或是指出基督教还有通过撒哈拉向外传播的另一途径(例如通过戈拉恩)，或是指出人们对伊斯兰教的影响有所误解。[41]

事实上，有关基督教努比亚向西传播影响的证据，总比麦罗埃传播冶铁技术的证据要清楚些，A.J.阿克尔曾就此问题作过十分有力的阐述。努比亚确实曾使一种较高的文明臻于完善，这种文明与西苏丹各帝国的文明水平相当，可以说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典型。西非各族人民留下许多口头传说，自称他们起源于东边，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关于这类传说，P. L. 欣尼写道："鉴于这样多的资料都提到与东边的联系，这就不像是编造或虚构的神话，它们可能包含着真实可信的因素，至少表明某些文化影响是来自东边"。口头传说资料很少能追述到500年以前，因此，P.L.欣尼认为，这些文化影响应来自中世纪的努比亚，而不会是麦罗埃。[42]

阿拉伯学者在这方面并没有留下多少信息。伊本·豪卡勒在10世纪时提到两个民族：附属于顿库拉的杰巴利扬，归顺于阿勒瓦的阿哈迪扬：他们的住地叫阿姆卡勒，他们与西部的马格里布人（*maghāriba*）相似，乘骆驼，佩武器，足系草鞋。[43]这种记述是含混不清的，令人费解。

但是，可以证明努比亚对西边各地有影响的物证随处可见。例如古努比亚文的石雕，还有沿着自东往西贯穿北科尔多凡的大道上，赞科尔和阿布苏夫扬引人注目的红砖建筑。赞科尔陶器与索巴的很相似。对这两处遗址，除了单纯的考察和收集文物外，还有大量工作急待进行。[44]同一样式的红砖建筑，在达尔富尔、乍得（艾因-加拉卡），直到博尔努都相继发现，最西边的遗址是北尼日利亚的恩古鲁。在达尔富尔，距顿库拉900公里的乌里有一处王宫，A.J.阿克尔认为它可能就是素丹卡拉乌恩的使者应阿卜瓦统治者阿杜尔的邀请于1287年访问之地，（因阿拉伯文的记载中仍有这些地名的辅音）。[45]在达尔富尔北部的艾因－法拉赫，也发现类似的红砖建筑的废墟，经过反复研究，确认这里原有一座寺院和若干礼拜堂，留下8世纪至10世纪的一些努比亚陶器碎片，绘有象征基督教的标志。初步断定，这些建筑属于陶器所表明的年代与13世纪之间。[46]这一连串遗址中，只有博尔努的比尔宁－加扎尔加佐一处可以较准确地判断是建于15世纪或16世纪。

420

在离尼罗河1450余公里处的科罗托罗和博齐安加两地，发现了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陶器，可以看出受到中世纪努比亚的影响。[47]现在还无从判断这些陶器是与努比亚商业交往运来的，还是乍得本地的产品。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处遗址都证明当时人们已懂得炼铁术，因而冶铁技术是否真来自尼罗河流域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争论。

努比亚与加奈姆－博尔努的关系，以至与西苏丹的关系究竟有多深，这个问题尚待

---

[41] C.H.贝克尔（C. H. Becker），1913年。

[42] P.L.欣尼，1971年，第48页。

[43] 伊本·豪卡勒，1938－1939年版，第58页。

[44] 详见A.E.D.佩恩（A.E.D.Penn），1931年；W.B.K.肖（W.B.K.Shaw），1936年。

[45] A.J.阿克尔，1961年，第198页。

[46] 关于艾因－法拉赫，详情见A.J.阿克尔，1960年；另见R.德－纳夫维尔（R.de Neufville）和A.A.霍顿（A.A.Houghton），1965年，他们着重指出这些建筑在古老的风格上增添了穆斯林的特点。

[47] R.莫尼（R.Mauny），1963年。

考古学进一步的系统研究来论证。考古研究的关键地区是达尔富尔，它的早期历史可一直追溯到富尔·凯拉政权建立之前，大约从 1640 年开始的这段历史，充满了互相矛盾的传说，非常值得探讨。只有政权是以和平的方式，从南方达乔人政权过渡到北方通朱尔人政权，最后传给富尔人这一点，学者们的意见大体一致[48]，前两个政权的起源以及各自的统治时间问题，曾经引起种种推测。[49]其实，它们地理位置不同，在一段时间里完全可能并存而且同样强盛。它们现有的家谱和种种传说，显然都是按照高贵而知名的阿拉伯祖先世系这样一种设想来编造的。

A.J.阿克尔承担了重修“中世纪”达尔富尔史的大部分工作。他早先曾经提出假设，认为通朱尔族统治的年代是在 1350 - 1535 年之间。在证明基督教对于艾因 - 法拉赫确曾有过影响之后，他提出新的观点，认为通朱尔族的统治受到努比亚的保护，其全盛时期是在 8 - 10 世纪之间。[50]是否可以认为伊本·豪卡勒写的材料是支持这种观点的呢？A.J.阿克尔还把通朱尔族的起源追述到“穆库拉”，而且认为这与达尔富尔传说中“聪明的异乡人”艾哈迈德·马库尔的名字可能有联系。他相信，达尔富尔在 1240 年前后曾经被加奈姆的著名国王杜那马征服过，这位国王的权力甚至达到尼罗河畔的马里斯地区，离阿巴英沙漠通道十分之近。这种说法断定达尔富尔在以后 400 年间受到博尔努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在迈伊·伊德里斯统治时代。[51] 427

有清楚的内部证据表明，尼罗河和乍得大草原之间正在形成的所有穆斯林国家，其体制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这是因为它们同样受到博尔努文化的影响，但不一定受其政治统治。这种影响特别在行政管理部门分成四级、在建筑的某些式样以及母后在政府中有权有势这几个方面最为明显。最后一个特点在努比亚也能见到。

在A.J.阿克尔看来，达尔富尔北部的乌里是通朱尔族的统治中心，后来又是加奈姆国家的中心。这里很可能是阿巴英沙漠通道和草原东西通道两者交叉路口的长途贸易重要汇集点，后者阿拉伯语称之为“塔里克 - 苏丹”（*tarik al - Sūdān*）。可以推想，在本文所述及的这个时期，沿着这条道路有过程度不一的商业活动，但在 16 世纪前，它似乎还没有用作去麦加朝圣的交通线。书面文字资料从未提到过这一点。这个时期大家所知道的所有从西苏丹和中苏丹去朝圣的路线，包括马里、桑海和博尔努一些统治者有名的出巡，都是先到达北非海岸，然后穿过埃及取道阿伊达布。看来，这条蜿蜒于苏丹腹地居民区用于通商和移民的内陆通道，只是在 16 世纪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之后，才被用作朝

[48] 为了对已掌握的可靠知识有一个简明的概念，可阅H.G.鲍尔弗 - 保罗（H.G.Balfour - Paul），1955 年。G.D.兰彭（G.D.Lampen）有长篇论述，1950 年；A.J.阿克尔写过许多篇著名论文（见注 50）。

[49] 关于通朱尔族，有证据表明他们当中有信仰基督教的迹象，见H.A.麦克迈克尔，1920 年，24 - 32 页以及 1922 年，第 66 和以后各页。关于他们是希拉利人后裔的说法，见G.纳赫蒂加尔（G.Nachtigal），1879 - 1881 年和H.卡尔博（H.Carbou），1912 年。相反，H.巴尔特（H.Barth）记载了通朱尔族来自尼罗河的说法；而C.H.贝克尔，前引著作，则企图调和这两种说法。还有大量的推论，见于H.R.帕尔默（H.R.Palmer）的许多文章。

[50] 见A.J.阿克尔，1936 年、1937 年及 1946 年（早期的观点）；1959 年（更正后的论点）。阿克尔晚期著作（1963 年），认为达尔富尔首府设在乌里，并且，传说中的通朱尔族瓦代“异教王国”连同其在瓦拉的都城，可能实际上是穆库拉管辖下的另一个省区。

[51] 见本书第 10 章。

圣路线的。虽然从一方面看，摩洛哥人入侵桑海和安全条件恶化对西撒哈拉通道起了消极影响，但另一方面，尼罗河流域基督教王国的消失、伊斯兰政权在森纳尔、达尔富尔和瓦代的形成和巩固，都给东苏丹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经由这条苏丹路线去朝圣的活动进展非常缓慢，经过很长时间之后它才占居主要地位。[52]至于达尔富尔，一般的推测是伊斯兰教有可能在通朱尔族统治时期已经作为一种宫廷宗教出现，但可以肯定说，它在凯拉·富尔统治时已经传播很广。

422

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渗透活动，对尼罗河与乍得之间的整个地区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看不到阿拉伯人在苏丹各族人民中影响越来越大这一点，也就不可能对那里的文化、商业及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有正确的理解。1391 年，开罗的素丹巴尔库克曾收到博尔努国王写的一封信，信中抱怨朱达姆人和其他阿拉伯人行为不当，袭击他的人民，随意将他的人民卖给来自埃及、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奴隶贩子。由卡尔卡尚迪保存下来的这份文件，在同类文件中是一个独特的证据，它反映出世界上这一部分地区已经有了扩及面很广的政治与商业交往。[53]

和在尼罗河流域的情况一样，阿拉伯人的到来改变了从尼罗河到乍得整个地区的种族分布图，虽然规模要小一些。向东扩张的一连串活动，使条件变得更加有利于伊斯兰化的发展和苏丹各国的兴起。在根本没有年代久远的文字资料的情况下，这些新的开端还是反映在该地区许多令人迷惑的丰富多采的传奇材料之中。为了理出头绪，迫切需要进一步大力开展考古研究工作。

[52] 参阅U.A.纳夸尔（U.A. al - Naqar），1971 年。
[53] 卡尔卡尚迪（al - Kalkashandī），1913 - 1919 年，第 1 卷，306 页；第 8 卷，第 116 - 118 页。

17 非洲之角：埃塞俄比亚的所罗门王朝与非洲之角诸国

T.塔姆拉特

非洲之角的政治地理

423

在13世纪的最后25年期间，非洲之角的政治地理形势变得非常复杂。当时，这一地区最有名的国家是位于埃塞俄比亚北方高原的基督教王国，即1270年由扎格维王朝转到所罗门王朝手中的那个国家；它的边界，当时向南扩展到绍阿人居住地区的北境，向西扩展到塔纳湖东边及青尼罗河上游，向东则接近埃塞俄比亚高原边缘。除了这个基督教国家，非洲之角也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政治实体。在塔克泽河彼岸，与先前扎格维王国西北部接壤的法拉沙人（人们称之为"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似已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国家，它一直处于被基督教势力征服的威胁之下苦苦挣扎。传说中提到的戈贾姆王国，似乎应当位于塔纳湖之南山区。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个地区的历史传说曾经特别强调地提到一个强国——"达莫特王国"，它控制着青尼罗河河谷以南广大地区。对这个古老的非洲王国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是传说在这地区各个基督教和穆斯林君主国出现以前，达莫特王国的国王早就在整个绍阿高原地区享有实际控制权。

从红海的达拉克岛，直到印度洋边上的索马里城镇布拉瓦，沿海地区还有不少穆斯林君主国。它们的地理位置有着重要战略意义，因为埃塞俄比亚中部和南部的富庶之地、东非洲海岸一带以及亚丁湾和红海沿岸相互间的贸易相当发达。13世纪末，由于贸易的发展，已经出现一些强大的穆斯林村社；以后，这些村社便逐步发展成为组织严密的君主国：内陆较重要的国家有绍阿、伊法特、费特加尔、达瓦罗、哈迪亚、巴莱和阿达尔。[1] 沿海主要的定居点——达拉克岛、泽拉、伯培拉、摩加迪沙、马尔卡和布拉瓦——虽然 425 比它们的内陆对手更富于伊斯兰文化，但是，坚持而又成功地在非洲之角建立起真正穆斯林帝国的还是内地的村社。

① 欧麦里（al-'Umārī）的著作（1927年法译本第2页）忽略了阿达尔，但是列举了七个"阿比西尼亚的穆斯林王国"：伊法特、达瓦罗、阿拉巴卜尼（或阿拉贝尼）、哈迪亚、萨尔卡、巴莱、达拉。马克里齐（al-Makrīzī）按此顺序重复提到这些国名，他称之为"泽拉地区的王国"；1895年编，第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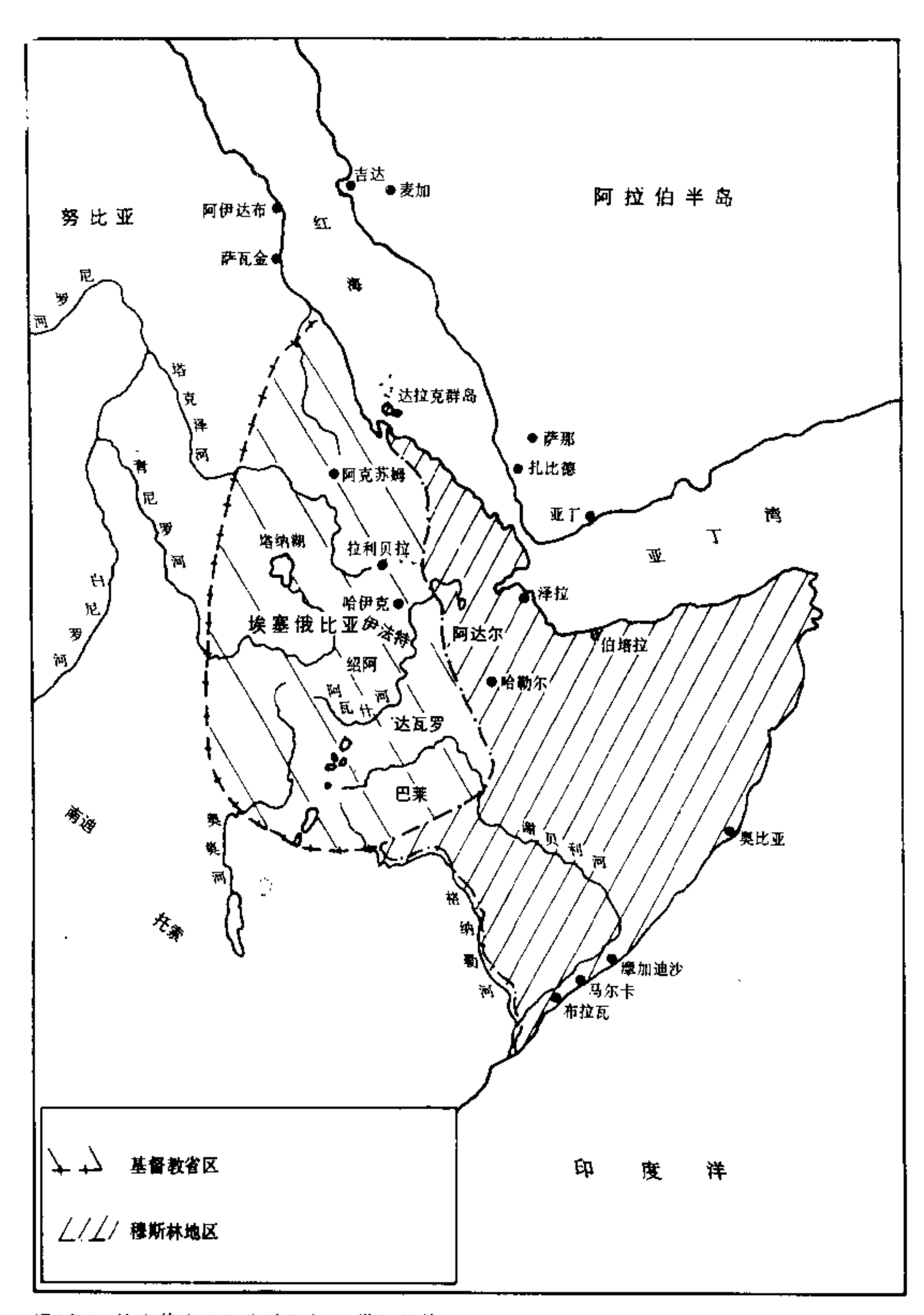


图17.1 埃塞俄比亚与非洲之角(T·塔姆拉特)

民族和语言

意大利著名史学家 C. 扎蒂·罗西尼恰如其分地将埃塞俄比亚描写为“多民族博物馆”。这个比喻，如实反映出埃塞俄比亚和整个非洲之角的语言和部族的古老和复杂情况。在这个地区，除了刚果－科尔多凡语系（Congo-Kordofan）和科伊桑语系（Khoisan）之外，还有另外两大语系：非洲－亚洲语系（Afro－Asiatic）、尼罗－撒哈拉语系（Nilo-Saharan）；这两个语系有着广泛的代表性，或称为“特大语族”。就语言分布及有关情况来说，非洲－亚洲混合语系更为重要，至少是它的六个分支中有三支——闪米特语、库希特语和奥莫特语在本地区普遍应用，而这些分支语系又分化为许多大有区别的方言。[②]

在本章所论述的时期，非洲之角大部分居民显然属于库希特语族；一般地说，库希特语族已分化为北库希特（贝扎）、中库希特（阿格沃）和东库希特三部分。[③]讲贝扎语的人分布在今厄立特里亚北部，也就是这一地区最北方的居民。在这些人的南边居住着讲阿格沃语的群落，他们分布在厄立特里亚高原的中部及南部（比伦/博戈斯）、提格雷的部分地区、威格及拉斯塔地区的扎格维人居住区、塔克泽河以西的法拉沙人居住区，以及塔纳湖南部和东南部的戈贾姆山区。13－14世纪间，在阿姆哈拉很可能还有一些飞地住着讲阿格沃语的群落。至于非洲之角内陆，那里大部分地区居住着讲东库希特语的人，虽然语言或方言有多种多样，但可分为两大类，即布尔吉－锡达莫语和低地库希特语。布尔吉－锡达莫语大致分布在今天的绍阿南部、阿鲁西、巴莱，以及哈勒尔高原的部分地区；低地库希特语则分布于埃塞俄比亚高原边缘与北边红海之间干旱、炎热的低地，而且遍及非洲之角内陆主要是索马里人的住地、现今埃塞俄比亚境内查莫湖以南及东南。到16世纪，讲加拉语的部族才开始从查莫湖区向外扩张。

426

奥莫特语——不久前人们还认为它是西库希特语[④]——大概是埃塞俄比亚西南地区（青尼罗河河谷南部和奥莫河流域之间）居民的通用语言。虽然非常繁复多变的奥莫特语言和方言现在集中于奥莫河流域一隅之地，但在戈贾姆西南部和沃莱加一带仍存在与奥莫特语相近的希纳沙语和马奥语，这可以说明在16世纪加拉人扩张之前，奥莫特语确实在埃塞俄比亚西南地区广为使用。

在非洲语言中，非洲－亚洲语族还有第三个分支，即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的闪米特语；13－16世纪，这一地区政治和文化上占优势的人，大多数讲闪米特语。埃塞俄比亚的闪米特语，统称为埃塞－闪米特语，其实种类繁多。人们过去以为埃塞－闪米特语是公元前700年之后由南阿拉伯移民传入埃塞俄比亚北部的，这种看法早已无人相信。近来研究的成果证明埃塞－闪米特语的历史比通常所说的更为久远；它的两个分支，北

---

② 在非洲语言分类问题上，专家们还没有一致意见。

③ M.L. 本德（M.L. Bender），1976年。

④ 哈罗德·弗莱明（Harold Fleming）作了重要贡献，证明先前被划归西库希特语系的奥莫特语本是非洲－亚洲语族的一个分支；H.C.弗莱明，1964年。

支和南支，现在可以认为早在阿克苏姆帝国兴起之前300多年已经分离开来。至13世纪末期，埃塞-闪米特语族开始形成今天的分布状况。埃塞-闪米特语的北支又可分为三支，其中之一是格埃兹语，它从公元4世纪以后成为埃塞俄比亚教会的书面语言，其形体保持至今，仍可辨认。另外两支，提格雷语和蒂格里格纳语在一度属于阿克苏姆帝国的两个最重要省区——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仍在使用。到了13世纪，除厄立特里亚沿海地区和北部讲提格雷语的一些群落之外，原来阿克苏姆帝国讲提格雷语和蒂格里格纳语的地方几乎全部由基督教王国继承了下来。

与此显然不同的是，埃塞-闪米特语族南支所包括的许多语言及方言却经历了更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其详情人们至今尚不甚了解。最近有人尝试，把埃塞-闪米特语族南支再分为两大支——"外侧的"和"横向的"南埃塞-闪米特语。[⑤]讲"外侧"南埃塞-闪米特语的部族（加法特人和北部、西部及中部古拉格人）看来是闪米特人在埃塞俄比亚中部扩张的最早先驱，他们在本章所论述的时期占据了阿瓦什河上游盆地与青尼罗河河谷之间的一大片地区，即今天绍阿省的西部。他们的早期历史已经失传，但人们清楚的是他们早在阿克苏姆基督教会建立之前，也就是在这个新宗教向南方扩张之前，已经进入这片地区。据说，迟至14、15、16世纪，这些居民中的某些部落仍与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国家处于战争状态。

427

有关"横向"南埃塞-闪米特语族（阿姆哈拉语、阿尔戈巴语、东古拉格语和哈拉里语）的早期记载，曾指出阿姆哈拉直到公元9世纪初还没有完全皈依基督教。然而，就从那时起，阿姆哈拉开始变为基督教王国的一部分；并且随着所罗门王朝的兴起，到13世纪末已在该王国占据了统治地位。"横向"南埃塞-闪米特语族的其他分支（阿尔戈巴语、东古拉格语和哈拉里语）早期的历史，更难于探明；但他们早已分布在阿姆哈拉南方及东南方，很可能就构成了绍阿、伊法特、[⑥]以至于费特加尔和达瓦罗这几个穆斯林群落早期扩张发展的基础。在这方面还有必要指出：有古城墙防护的哈勒尔及其周围地区迄今仍讲哈拉里语和阿尔戈巴语，而当初这里正是从伊法特逃亡出来的穆斯林瓦拉斯玛王公贵族所建立的新政治中心；14世纪末，瓦拉斯玛家族统治的伊法特地区最后被基督教徒所兼并，本章稍后再言其详。

以上就是埃塞-闪米特语族各支系在埃塞俄比亚内地（从厄立特里亚高原直到阿瓦什河上游盆地一带）的分布状况。除此之外还流行阿拉伯语；在红海、亚丁湾以及印度洋沿岸各定居点，在主要商路沿线和内地市场中心，阿拉伯语都是宗教和商业用语，因而在某些地方能见到刻有阿拉伯文的墓碑。

沿海地区的穆斯林君主国

除了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王国和一些比较强大的穆斯林君主国之外，我们对直到13世纪末肯定还存在于这个地区的许多小邦国几乎一无所知。非洲古国（法拉沙、戈贾姆和

⑤ M.L.本德，前引著作。
⑥ E.塞鲁利（E. Cerulli），1941年，第32-34页。

达莫特）。与非洲之角沿海和内地许多伊斯兰化的部族一样，只有臣服于更强大的基督教或穆斯林邻国的军事统治，在这地区的历史中才有其一席之地。既然本章的目的在于尽可能讲清这些不同的政治实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在这里就必须把可用于研究非洲之 **428** 角各族人民政治及文化史的资料理出个头绪，尽管只限于与埃塞俄比亚和最强大的穆斯林国家（例如伊法特、达瓦罗、阿达尔、达拉克等素丹国）。一般说来，这些古国的地方史已经失传。因此，只有在语言学和考古学方面作出必要的巨大努力，对这些人的政治及文化动态才能有个比较清楚的推断。

虽因目前掌握的资料不够，我们很难给这时期非洲之角各族人民的发展过程勾划出一个轮廓或图景，但是，利用一些阿拉伯史料就可使我们得到一份沿海地区穆斯林君主国的名单，因为它们都是商业发展的产物，所以或多或少为阿拉伯商人所熟悉和经常提到。

达拉克群岛离非洲之角北端不远，控制着马萨瓦航道；它和阿拉伯半岛海岸外的法拉桑群岛隔海相望，自然就成了也门与厄立特里亚沿岸地区之间的桥梁，它还是红海上南北航路的重要港口。远在古代这些岛屿就起这种作用；很早以前，7世纪时穆斯林占领了大达拉克岛，在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统治时期它被用作囚犯放逐之地，直到9世纪落入也门的扎比德王朝手中。[7]

13世纪时由于穆斯林世界发生内部纠纷，达拉克群岛便乘机恢复独立并建立埃米尔国。它从事贸易和海盗活动，通过积极的外交和与埃及马木路克王朝结盟的有效的投机性政策，成功地保持了中立，从而既避开了来自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的威胁，又抵制了也门和埃塞俄比亚统治者争霸的企图。就达拉克王国而言，这个政策是有成就的，直到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到来之前，达拉克群岛仍保持独立。[8]

伊本·巴图塔曾从埃及的红海沿岸一直到基尔瓦走遍了整个非洲东海岸，我们从他的记述中了解到14世纪时泽拉与摩加迪沙（马克迪苏）之间那块地方的一些情况。[9]泽拉，原是黑人群落伯培拉所在地的一个城镇；伯培拉人，按雅库特所做考证，[10]无疑是贝拉比尔人（索马里人）。泽拉城积极从事商业贸易、饲养骆驼和羊群，并兼营渔业。那里 **429** 的气氛俨然是一个大都市，面临着城市规划和环境卫生之类的问题。

马克迪苏是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饲羊业发达，因而居民能够生产出“以该城名字命名而别人难以匹敌的出色衣料。这些衣料远销到埃及和其他地方”。[11]它还出产香蕉、芒果和蔬菜以及作为主食的稻米。城外港湾是一个可以招来许多商船的海港，船一靠岸即为一群“森布克”（*sunbuk*）——捕鱼和运货两用的小艇包围，忙着将货物运到四郊。该城是一个文明的社会，据伊本·巴图塔的描绘，那里的商界爱好宴请和待客殷勤。统

⑦ 关于达拉克群岛，见《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2卷，第90－91页。

⑧ G.维厄（G. Wiet），1951－1952年。

⑨ 伊本·巴图塔（Ibn Battūta），14世纪；见法文译本，1922年，第2卷，第179－191页；法文节译本，1966年，第22－26页。

⑩ 雅库特（Yākūt），德文版，1866－1873年，第1卷，第100页；第2卷，第966页；第4卷，第602页。

⑪ 引自伊本·巴图塔，法文节译本，1966年，第23页。

治这个素丹国的是一个大特权集团，包括有势力的商家、律师和素丹手下的官僚。据伊本·巴图塔所言，那素丹不过是一位谢赫，却也凌驾于一套能够保证商业繁荣的组织机构之上。我们并不了解这个王朝和当时政界的发展情况，但有证据说明素丹的宫廷拥有一些大臣，他们权限分明而又办事效率高。

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阿拉伯语与土著语言一起流传下来，虽然伊本·巴图塔未言其详，但是，阿拉伯语在非洲文化结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随着社会日益伊斯兰化以及古兰经的传授而发达起来；伊本·巴图塔特别提到这里有许多勤奋的塔巴拉（*tabala*，宣教师），沙斐仪学派（Shāfi'ī rite）在当地居民中占有优势。

阿拉伯地理学家还谈到非洲之角索马里沿岸的三个商业城市：伯培拉、马尔卡和布拉瓦。伯培拉在古代就是著名的重要港口。关于这个港口及其内地情形，在托勒密和科马斯·因迪科普卢斯特斯的著作以及《红海巡航记》中已有描述。这个港口在本章所论述的时期并未失其重要性，因为长期以来提到它的名称就是指亚丁湾；阿拉伯地理学家通常都把红海称作巴巴拉海或巴巴拉湾。据这些地理学家所说，当地居民贝拉比尔人（正如大多数地理学家所指出，他们并非柏柏尔人）与斯瓦希里人和阿比西尼亚人大有区别。我们有各种理由说他们正是索马里人。[39] 从政治上说，在9世纪或10世纪至14世纪期间，伯培拉似乎是同这地区的其他穆斯林社会，特别是近邻的泽拉和阿达尔素丹国一起得到发展的。

430 位于非洲之角另一端的马尔卡和布拉瓦，看来是处于摩加迪沙商业帝国及其海军的势力范围之中，这可以部分地由商品的转运和一个相当大的地方贸易来说明。可以想见，在摩加迪沙和两个大港（布拉瓦和马尔卡）之间曾经形成一个相当紧密的商业交流网，其重要性决不亚于各个地区之间的贸易。

这些形形色色的穆斯林社会都是安德烈·米凯尔所描绘的“商业棋盘”上的关键棋子。它们的重要性是和有一个宽阔的、活跃的和富足的内地紧密相关的。

基督教与穆斯林诸国
与信奉传统宗教的群落的关系

公元10世纪之后，亚丁湾几条商路越来越向非洲之角内地深入，这是该地区各族人民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些商路即使因该地区主要国家争夺其统治权而成为它们之间争斗的原由时，毫无疑问，对于各地具有不同文化、宗教和语言的人民相互间的交往仍然还是起了促进作用。在本章所探讨的时期里，特别是在几个主要的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长期进行征服和扩张之际，这地区所有各个角落的部落都在这些商路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13世纪中叶，甚至埃塞俄比亚北方的基督教扎格维王国也已经不再把达拉克素丹国看作是它在红海的唯一出口，它开始通过南方各省去利用泽拉商路。这对泽拉所起的经济作用来说无疑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变化；它不仅是促使

[39] 索马里一词最早出现于15世纪初，见于雅萨克国王统治时代埃塞俄比亚的一首赞美诗；《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一卷，第1172－1173页。

伊法特成为亚丁湾和绍阿高原之间主要穆斯林国家的关键因素，而且也促使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的政治中心逐渐南移，结果是所罗门王朝的兴起。

这个新的所罗门王朝，奠基者叶库诺－阿姆拉克原是阿姆哈拉一个地方领袖，关于他的出身和早期事迹，很少有人知悉。但口头传说都认为他在1270年推翻了扎格维王朝；扎格维王朝与所罗门王朝统治者之间的争吵已有悠久的历史，传说中的叶库诺－阿姆拉克以重建古代阿克苏姆帝国的所罗门王朝为理由来建立自己的合法统治。这种说法掩盖了实际原因，并不能说明叶库诺－阿姆拉克及其支持者何以能获得成功。长期以来，扎格维王国最南端诸省的基督教徒居民点已经成为亚丁湾和绍阿高原之间穆斯林君主国巨大商业网的组成部分；阿瓦什河上游及中游盆地就是基督教徒、穆斯林以及信奉传统宗教各群落相互交往的边境区域，这种关系至少延续了三个世纪。 **431**

这个边境区域大概是著名的“达莫特国王”的领地的一部分，据伊本·哈勒敦说，[13]这位达莫特国王在基督教传说中被看作是13世纪的一位强有力的君主，他（在基督教传说中名叫莫特拉密）是信奉传统宗教的；只是出于善意，才容许阿瓦什河上游以北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绍阿高原的居民点同时并存。于是，出现一种格局，在一方面是信奉传统宗教的社会，在另一方面是近邻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这种关系在10世纪和11世纪时已开始形成。以后，来自埃塞俄比亚北方的基督教徒和来自亚丁湾的穆斯林商人，都在这个地区建立起他们各自的社会。12世纪时由于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在扎格维王朝统治下一度复兴，基督教徒越来越自信，甚至于要求扎格维王朝出面干预以保护他们的利益。扎格维传说中提到对达莫特的军事征讨，很可能与此有关。[14]这次远征最后失败了；达莫特并未屈服于扎格维国王的统治，由扎格维国王发动起来反对达莫特的许多基督教徒反而死于战场。但是，扎格维王朝在基督教社会中的优势地位由此得到加强，这地区的基督教徒在此之后就把自己当作是扎格维国王的臣民。他们和阿姆哈拉的基督教省区以及北方的安戈特和提格雷省区都加强了联系。

居住在绍阿的许多基督教徒，这时已同北方的提格雷建立了长途贸易关系。据一份早期反映13世纪情况的材料说，这些商人去提格雷买盐，卖出绍阿的马匹和骡子。[15]这就表明，当时住在绍阿（今绍阿省北部）的为数不多的基督教徒，已经在阿瓦什河上游以北的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内陆贸易中占了优势。他们还从事农业的多种经营，最早的传说把他们当中一些人描绘成富裕的农业大家族，且有一定数量的奴隶。他们住地广而分散，所以组成小酋长国，看来他们原先都是向达莫特国王纳贡的。这些分散的居民点都有强烈的团结一致、互相依靠的意识，当扎格维政权在拉斯塔达到极盛时代时，他们似乎已与他们在阿姆哈拉的邻邦组成了一个较大的基督教省份（在今沃洛地区）。

在绍阿高原东侧，与这些基督教徒为邻的是一些穆斯林家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宗教社会，但原来都附属于当地信奉传统宗教的统治者，因而两者的住地很可能在区域划分上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与基督教徒一样，穆斯林也有强烈的团结意识，并且历来认 **432**

[13]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法文节译本，1852－1856年，第2卷，108页。

[14] C. 孔蒂·罗西尼（C.Conti Rossini）编著，1904年，第22－26页。

[15] T. 塔姆拉特（T.Tamrat），1972年（a），第82页。

为，他们社会的创始者都是来自麦加的阿拉伯人。[16] 到13世纪时，这些穆斯林已结合成为一些独立的有竞争力的政治实体，而且趋向于逐渐摆脱达莫特统治者的权力。他们当中有一个“绍阿素丹国”，实际上包括许多由小家族集团统治的君主国，祖先同样都是阿拉伯人。后来被人称作费特加尔的地区可能也就是这些紧密联合的居住地的一部分。另一个重要的穆斯林社会是伊法特，它在13世纪才崭露头角。自从这些居住地建立以来，他们各自都因有众多的土著皈依伊斯兰教而加强了实力。据语言学家对当地统治者姓氏的研究和后来的欧麦里报告的分析，无论是穆斯林居民还是附近的基督教社会，其主要地区，至少是在绍阿境内，都讲埃塞－闪米特语言。[17]

这些穆斯林，跟他们的邻人基督教徒一样，生活相当舒适，既有多种农业经营，又从事比基督教徒规模还大的长途贸易。穆斯林在贸易上居于有利地位，因为从亚丁湾到绍阿的商队，都必须通过13世纪以来穆斯林占优势的地区。这样，他们就牢牢控制着国际贸易。不过，要向内陆扎格维王国的中心扩展贸易，他们还必须同绍阿和阿姆哈拉的基督教徒合作，因为这两处的基督教徒已成为这高原地区两边的中介人。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越来越使高原地区基督教社会和穆斯林社会双方的利益结合在一起。随着泽拉作为埃塞俄比亚中部大宗贸易的出口港而在海湾地区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这种联系也就更加紧密和有利可图。虽然这两个集团都意识到各自不同的身分，但在他们中间又有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因而很久以来，在这个边境地区并未发生严重的宗教冲突。

因此，在叶库诺－阿姆拉克掌权的前夕，所有证据都证明，阿姆哈拉和绍阿的基督教社会在穆斯林地区和扎格维王国北方的其他一些地区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人作用。由于他们在经济上与商人合作，从而在扎格维宫廷以及在其他基督教国家都增强了他们的影响。似乎可以肯定，叶库诺－阿姆拉克在他真正成为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的新国君之前就已经和绍阿的穆斯林社会和基督教社会建立了联盟。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他的一些比较可信的传说都强调他的那些来自绍阿北部某几个地区的“武士”的作用。[18] 叶库诺－阿姆拉克本人给埃及素丹拜巴尔斯（1260－1277年在位）的信中也曾说过，在他的军队中有许多穆斯林骑兵。[19] 有有限几幅描绘这位新国君的油画，其中一幅画着他高坐在宝座上，按画上的文字说明，周围站着许多“穆斯林和奴隶”。[20] 所有这一切似乎可以说明，叶库诺－阿姆拉克之所以能推翻扎格维王朝，并不在于他要求重建古代阿克苏姆帝国所罗门王朝的合法性，而是在于他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强大。[21] 他的最主要的成就是把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的中心远远推向南方，即阿姆哈拉和绍阿；从此以后，这一王国在亚丁湾和埃塞俄比亚内地间的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能够起到更加直接的作用。

433

---

[16] E. 塞鲁利，1931年，第43页；1941年，第15－16页。

[17] 欧麦里，前引著作，第1－2页。

[18] J. 佩若琼（J. Perruchon），1893年，第368页；C. 孔蒂·罗西尼，1922年，第296－297页。

[19] 穆法达尔（Mufaddal），法文译本，1973－1974年。

[20] W. 赖特（W. Wright）编，1877年，第75（b）－76以下各页。

[21] 当时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许多地理学家和制图专家肯定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强大力量。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记述叶库诺－阿姆拉克与诸穆斯林君主国之间的战争时指出，阿比西尼亚人“据说是全省区中最优秀的战士”；引自法文译本，1955年，第292－293页。类似的说法可能不仅被当时地中海整个制图学界屡屡重复，而且还有所夸大；Y.K. 福尔（Y.K.Fall），1978年，第300－310页。

所罗门王朝统治之下的埃塞俄比亚王国

所罗门王朝统治之初是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当时新王朝既要在基督教王国的内部，又要在和各邻国的关系方面加强其威力。它所面临的两个最棘手的问题是：一、为使王位世代相传需要建立牢固的统治；二，为在埃塞俄比亚内地和非洲之角其他地区建立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良好关系而制定有效的政策。王位的世代相传问题通过制定一项有关盖申山的新制度而得到解决，盖申山从此被称为“国王之山”。叶库诺－阿姆拉克的所有男性后代，除了在位的国君和他的嫡子以外，一律都住在该山难以攀登的山顶上，山脚下和各个隘口派有数百名绝对可靠的武士把守。这些王子都享受王族成员应有的荣誉，他们在盖申山的范围以内享受各种欢乐。大多数王子，由于与外界隔绝和实际上丧失了与王国中其他人的社会或政治上的联系，他们就开始研究宗教，卓有成效，而且以写格埃兹语诗歌的诗人和宗教歌曲的作曲者闻名于世。如果在位国君去世之时，在他的直系亲属中没有活着的继承人，那就从盖申山的王子中选定一人登上王位。因此，“国王之山”是一种巧妙的立法手段，在本章所论述的整个时期都得到采用，它有助于保障这一基督教王国的稳定和延续。

434

最为艰巨的任务是与正在逐渐强盛的穆斯林居民点以及亚丁湾与阿瓦什河流域之间地区的穆斯林部落建立良好关系。在所罗门王朝称霸的前 50 年期间，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勉强趋于平衡；只是到了叶库诺－阿姆拉克精力充沛的孙子安达－泽扬（1314－1344 年在位）统治的关键性时刻，基督教王国才在该地区取得军事优势，这种优势一直延续到本文所探讨的时期。安达－泽扬刚登上王位时，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内部已严重分裂：它的疆界并没有超过旧扎格维王朝的领土范围，只是在前不久向绍阿地区稍有扩展，而在四面八方——无论是东面和东南面的各穆斯林素丹国，还是从西北伸展到西南和南边的“犹太人”（法拉沙人）社会以及那些信奉传统宗教的社会，都没有安全感。

安达－泽扬是一个杰出的武士而且同时又是一位卓越的国王，他很快就亲自并且是有条不紊地逐一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他最初几次战役的确切年代现虽无从得知，但他本人在一份授予土地的契约上就曾声称他于 1316－1317 年率领军队讨伐达莫特和哈迪亚的统治者，并且随即又远征戈贾姆。著名的法拉沙人所居住的塔纳湖以北地区大概也是在那时首次被兼并的。这些战役每次都赢得了胜利。于是，一些有争议的地区全并入了这个基督教王国。攻占这些内陆省份使安达－泽扬为他的军队获得了大量人力后备，同时也巩固了对以亚丁湾为起点的这条商路的终点地的控制。这位国王于是就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从而能把自己的统治强加给从海湾到阿瓦什河流域的一系列穆斯林社会。除了伊法特之外（它自乌玛尔·瓦拉斯玛统治之时起就已成为最重要的穆斯林君主国），达瓦罗、萨尔卡和巴莱这些穆斯林城镇主要都得靠与安达－泽扬刚刚占领的地区进行长途贸易为生。

在经济上屈从于这位基督教国王的这一新情况，已经开始使人感受到后果严重，周

围的穆斯林世界对这位征服者似乎产生了一种不安和敌意。伊法特于乌玛尔·瓦拉斯玛（叶库诺－阿姆拉克的同时代人）统治时期就已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公元1332年之前不久，安达－泽扬曾抱怨乌玛尔的孙子哈凯丁限制他信奉基督教的臣民行动自由，据说有一个臣民被穆斯林抓走并卖去充当奴隶。这事件给了基督教军队入侵伊法特及其属地一个借口。该城受到洗劫，其素丹于战斗中阵亡；虽然他的儿子德拉蒂尔在穆斯林牧人的帮助之下在伊法特以东的平原上英勇作战，但所有的抵抗很快就被粉碎。安达－泽扬征服了伊法特，使它在历史第一次沦为一个附庸国，派驻在那里的军队占领了伊法特境内的关键要地。其他一些大的穆斯林君主国见此情况就急忙与安达－泽扬和好，据说至少其中的两个，即达瓦罗和萨尔卡，与他订立了友好条约。对哈凯丁的军事胜利因而具有重大意义；国王安达－泽扬由于很早就征服了哈迪亚、达莫特和戈贾姆三个君主国，所以在他执政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就统治了一个地域辽阔的基督教王国。

下面我们将简要地阐述一下这位国王牢牢控制这一如此之大的帝国并对它进行有效统治的行政组织。但这里必须指出，反对安达－泽扬的叛乱始终连连不断，不仅在新兼并的省份是如此，而且在与这王国的依附关系相对而言比较紧密的其他地区情况也不例外。如于1320年左右，安达－泽扬不得不去镇压由基督教徒在提格雷北部掀起的一次地方性叛乱，而且在不久之后他似乎又赶到遥远的厄立特里亚沿海一带去进行讨伐。[22]他必须认真对待的则是1332年爆发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叛，由于当时很多地方都纷纷竖起反旗，于是就出现了他那年有名的征讨战。关于1332年的一系列东征西讨现在都有文献记载。[23]这些征战的主要成就可概括为：一，使伊法特、达瓦罗、萨尔卡和巴莱这些大君主国彻底沦为附属国；二，大大加强了基督教在各条战线上的军事地位。从那时起，安达－泽扬的赫赫战功名扬四方，一直传到中东。作为安达－泽扬同时代人的阿拉伯历史学家欧麦里写道："据说在他属下有99个国王，而他谎称为100个。"虽然这些数字肯定纯属虚构，但欧麦里明确无误地把伊法特、达瓦罗、萨尔卡和巴莱包括在安达－泽扬的他所谓的"埃塞俄比亚7个穆斯林王国"中。[24]

穆斯林诸国和埃塞俄比亚

安达－泽扬所创建和统治的这个大帝国，连同他的子孙后代直到16世纪所取得的少数属地，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它至多是由许多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部族和不同语言的君主国组合而成的一个松散的邦联；它的结合主要取决于中央权力的绝对优势。

每当朝廷的权力有所放松时，各个臣属国，不管它有多小，都准备走争取独立的道路。在本文论述时期的很长时间里，大多数君主国在基督教皇帝的最高权威之下仍继续由它们的世袭君主管理。对于当时的基督教统治者和新归顺的附庸国之间的关系欧麦里

[22] B.杜雷耶夫（B.Turaiev），1906年，第53页；T.塔姆拉特，前引著作，第95－96页。
[23] J.佩若琼，1889年。
[24] 译自欧麦里，前引著作，第25－26页。

作了如下的叙述：

> 虽然这些王国的所有国君都是按世袭制移交其君权的，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具有不经这位阿姆哈拉国王授权而实际掌权的。当一位国君去世时，如果他有男性后嗣，那么他们全都会去求见这位国王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以博得他的恩宠；正是他……具有在他们之上的最高权力，在他面前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下属。[25]

欧麦里写这段话时，他头脑里所考虑的只是那些穆斯林附庸国，但他的描述还是反映了这一基督教帝国当时的基本结构。信奉基督教的皇帝们一直保持作为他们权力象征的庞大军队是确保这些附庸国始终效忠所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刚被征服的一些地方，皇帝常常派出队伍长期驻扎在那里：这些驻屯军由一位授有封号的军官指挥，他并不听命于当地的世袭君主，而是直接与皇帝的朝廷保持密切联系。驻守新占领土的驻屯军通常都是在别的部族和讲其他语言的地区征募来的，因此效忠的区别和矛盾大为缩小。这些驻屯军保证：当地任何叛乱萌芽都可以立刻镇压下去；每年向皇帝的进贡一定及时交纳；主要商路始终畅通和平安无事；最后是皇帝的愿望在各方面都能得到贯彻实现。如果地方上的骚乱多得难以应付，驻屯军司令便将情况向皇帝报告，皇帝就从邻近地区的驻军中抽调兵力派去增援。假如情况确实像1332年那样严重，他就要亲自率兵讨伐叛乱。

这一制度基本上体现了所罗门王朝统治时期的特点，直到16世纪初；帝国这时已变得如此之不纯和难以控制，以致国王为防止它的解体，只能使朝廷始终立足于战争，准备一旦出现新的紧急情况就立刻向任何一个方向出动军队。这就是朝廷为什么在这时期经常处于流动状态和基本不在大城市的原因。 437

埃塞俄比亚帝国的政治结构

所罗门王朝的国王都是从这些流动的军营中对他们辽阔的领土进行行政管理的。尽管帝国朝廷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但它却始终是皇帝管理全体臣民政治与经济生活的焦点，并且起着融合他们各种不同文化和语言的熔炉的作用。它的内部结构和组织在其他著作中已有更充分的叙述，[26] 这里只要提一下这流动朝廷的职能与固定国都完全一样就够了。经常有许许多多来自帝国各地的人民随同朝廷一起漂流。从各附庸国征招来的军队和王家卫队更是始终依附于朝廷，他们的指挥官不论国君走到哪里都紧随不离。除此之外，国君还有数以千计的随从和家属，他的许多高级官员同样也是如此。还有一支特殊的教士队伍长期跟随着朝廷，他们用来配备众多的王家小教堂的神职人员或为国王及其追随者的宗教需要服务。国王的大本营不管驻扎在哪里，这个地方也就随之成为交换货物和供应物品的主要中心；于是商人、手艺人和工匠（有基督教徒也有穆斯林）全都带着他们的商品汇集到这里来进行交易或提供服务。每逢干旱季节，最易于行走的时候，另有

[25] 欧麦里，前引著作（译自法文本），第19页。
[26] T. 塔姆拉特，前引著作，第103－106和第269－275页。

许多人从各省区跑来拜见朝廷；臣国的首领和地方总督带着贡品前来进贡，而其他许多人则是来请求国王和他的官员解决他们的棘手案件。因此国王营地的实际人数总是接近于一个普通城镇的数目。

国王的营地既然像一个正常的城市中心，那么它就有着把不同语言、不同部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结成一体的重要综合作用。从某种意义说，它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大大超过一个固定的居民点。就一个固定居民点而言，只有各地大量流入居民，而没有反向交流；然而，就一个流动营地而言，它不仅从乡村吸收来居民，而且它又是不停地在帝国各地流动，所以它与它所经过的地方保持了一种息息相关的关系。这样，它就在一个非常辽阔的地区内实现它的综合功能。

朝廷和全国人民之间的这种经常性交往无疑促进了与朝廷有接触的成千上万的多部族埃塞俄比亚人在文化上相互沟通和在政治上结为一体。这对那些从新占领地区抓来的 438 大批俘虏来说尤其是如此。他们中许多人被编入基督教军队；其余的则为国王本身的庞大家族或他众多官员的家族服劳役。也很明显的是，各附庸国世袭统治家族都有成员留在皇帝身旁，或是当作人质，或是作为这位霸主的长期宾客。后来，其中许多人完全成了皇帝及其家族的忠实追随者，甚至适于担任朝廷或外省的重要职务。然而，朝廷停留在一个地区往往只是一个相对短促的时间，因此它与当地人民的接触是短暂的、表面的、甚至是使人感到压抑的。似乎总是对停留地区提出各色各样的要求，要他们提供形形色色的食物或劳役，当地大多数居民对于皇帝及其庞大随从队伍的来临的感受往往不是很愉快的，所以流动朝廷所起的综合作用也就非常有限。

其实，皇帝对他们附属领地的控制基本上往往只是一种间接统治。虽然他们在自己的朝廷内以及在许多地方任命了一大批有封号的官员，但是从未出现过中央集权的帝国行政制度，各个君主国和各酋长领地上的人民的日常生活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可能部分缓和这种地方化的办法是皇帝在他们庞大的朝廷官员陪同之下不定期地去访问他们国土的主要地区。

安达－泽扬的多次征伐战不仅扩大了他朝廷和他军队的规模，而且也使他和他的后继者成为十分富有的君王。他们的大量财富是定期向所有各个属地强征的进贡中得到的。不履行进贡义务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背叛行为，经常引起大批臣属的被革职、逮捕、甚至杀害。有关这时期的历史记载对解释该帝国的经济基础并无多大帮助，但大量封赠土地都出自所罗门王朝当时的国王这一事实似乎可以说明，国王权力的主要来源在于他们为论功行赏而给自己众多的追随者分封土地。但是，在他们征服了东部战线的许多穆斯林地区之后，有证据证明，他们对贸易的控制给他们增添了另一个有利可图的财源。他们已经对历来给穆斯林近东提供高价哈巴沙奴隶（*habasha* slaves）的内陆地区取得了绝对的军事控制，还从新占领的地区获得象牙和黄金，这些物品经常被看作是该地区两项重要的贸易货品。此外，埃塞俄比亚高原富庶的农业地区也为红海两岸沿海城镇提供最需要的谷物和新鲜水果。

439 皇帝从整个地区的这些商业活动中通过两个途径增加年收入。首先，他们征收每宗贸易的进出口税，其次，他们很快就参与和直接投资于长途贸易，派出了由他们商业代

理人率领的货物充足的商队。然而，基督教徒在内地省份所取得的成就久而久之只能引起泽拉与伊法特、达瓦罗和巴莱等边远国家之间地区穆斯林权力的东山再起。领导这次穆斯林复兴的是乌玛尔·瓦拉斯玛家族中的一个支系，他们将指挥部迁到哈勒尔高原，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卓有成效的联络网，把红海的达拉克群岛与印度洋索马里沿海地区之间的广大腹地以及周围阿拉伯国家的穆斯林结成联盟。这一发展情况在别的作品中已有较详尽的描述；这里只需指出一点：该地区穆斯林反抗基督教徒统治的火焰一直不灭，直到最后于16世纪爆发了伊玛目伊本·易卜拉欣领导的圣战（*djihād*），这场战争又称为"格拉根之战"，大约发生在公元1527－1543年。

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复兴

除了我们已经在前面几个段落中简单回顾过的一些征战和领土扩张之外，这一基督教国家在所罗门王朝历代皇帝的统治之下力量增强的另一个后果是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复兴和它再次试图促使埃塞俄比亚内地信奉基督教。在1270年所罗门王朝执掌政权之时，教会仅只是在中、南厄立特里亚、提格雷、瓦格、拉斯塔、安戈特、阿姆哈拉等古老省份以及阿拜河与阿瓦什河之间的绍阿高地部分地区牢固建立。作为一项总的规律，那时的教会越往南地位就越弱和越不稳定。当时基督教各大教育中心依然是在提格雷和扎格维王朝的故乡拉斯塔，在那些地方埃及的主教掌握着他们的主教法庭。因此，宗教训练和教士职位的授予在扎格维王国的这些地区也需花费许多年的时间。非常明显，当时在该国南部僻远地区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格履行这一职务，绍阿北部的教会之所以能存在，主要不是由于当地教士组成了强大的宗教领导，而是由于不均匀地分散在这整个地区的有限几个基督教家庭的坚持效忠。甚至在更往北的阿姆哈拉地区，也只是在所罗门王朝崛起的前夕，据传说，才由一位来自拉斯塔的杰出僧侣艾伊苏斯－莫阿在哈伊克湖的一个小岛上创办了一座有影响的修道院学校，这位僧侣本人是在提格雷地区古老的德卜勒－达莫修道院接受宗教教育的。

然而，随着新王朝的出现以及王国中心的南移，在阿姆哈拉和绍阿北部开始涌现出许多宗教机构和教育机构，它们很快就成为向各地宣传基督教信仰的中心。这一扩张主义运动背后有两个重要推动力，其一是教会自身的内部复苏（这似乎在扎格维王朝统治时期即已开始），其二是所罗门王朝皇帝要在他们的整个国土上建立教会的专门许诺。虽然扎格维王朝的国王们也曾同样致力于教会，但继他们之后的所罗门王朝肯定具有更强大的权力和更巨大的资源来支持埃塞俄比亚教会的教士们的种种努力。 440

几乎所有从13世纪最后25年起开始在阿姆哈拉和绍阿发展起来的新修道院都与艾伊苏斯－莫阿在哈伊克湖小岛上创办的学校有联系。它们的创建人或者是他本人的学生，或者早年曾受到与他有关系的人的教育。在所罗门王朝统治的最初50年中，也就是安达－泽扬发动大讨伐之前，只有阿姆哈拉和绍阿北部的修道院得到了顺利的发展。

埃塞俄比亚教会，从一开始起就深受埃及沙漠和尼罗河流域修道院传统的影响，艾伊苏斯－莫阿的学生都严格遵循圣安东尼和帕科米乌在建立他们的集体时所树立的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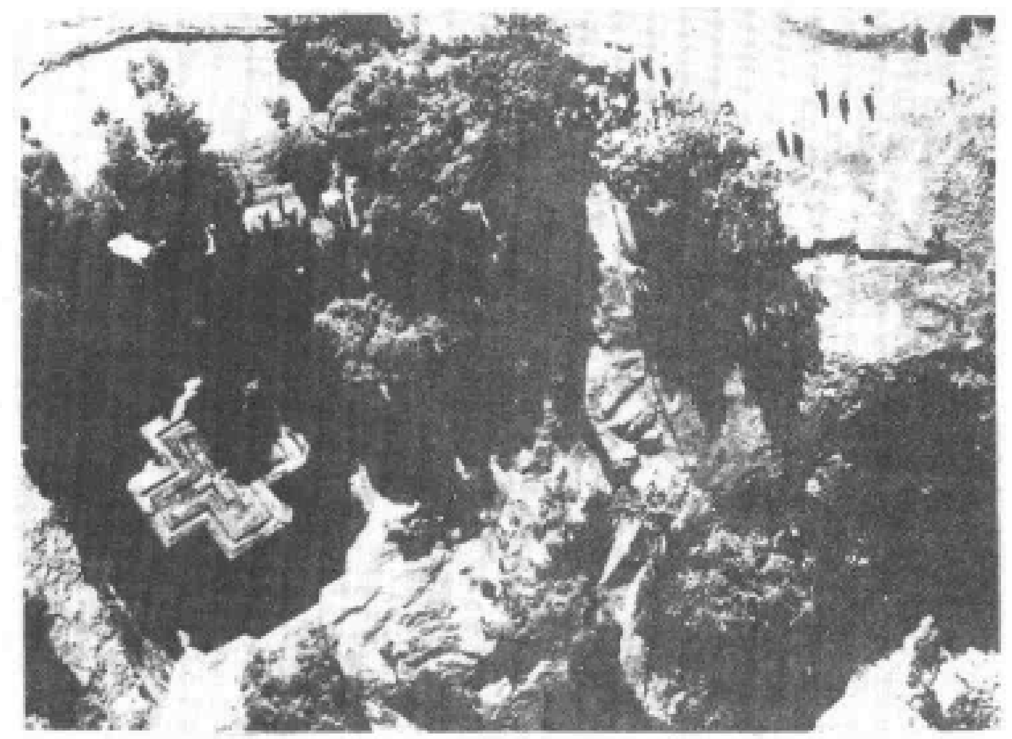
修道院僧侣典型。经过对这些集体的历史传统的研究之后，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它们的创建者最初的主要动机与其说是要宣传基督教义，还不如说为他们自己寻求解脱。这类集体的创建者几乎都是单纯地以离开自己的村子，在远离人们的地方设立一个隐居修道场所来达到"脱离尘世"的目的。这种隐居式的修道场所往往只是在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山山腰上的一个天然山洞；埃塞俄比亚大多数古老修道院通常都建造在这样一些人迹不到的地方，看来就是这种历史因素造成的。起初，修道所的建立者或者就只有他一人单独生活，或者只有极少几个较年轻的追随陪伴着他。最初几年，这些隐居修士过的完全是苦行生活，只专心一意地做祈祷和自我反省，采取受饥饿、挨口渴甚至鞭打肉体之类的巨大痛苦来惩罚自己。他们靠吃野果为生，但后来逐步发展到在自己隐居处所的周围开垦土地和种植某些蔬菜和粮食作物。他们又渐渐地与当地居民有了来往，那些居民很快就赞赏这类集体的宗教热情，并且向他们的邻近地区宣扬这类集体的创建者和他的同伴的圣洁。这时就有一些好奇者和一些真正信仰宗教的人来参观访问修道所。有的当即参加了修道；有的与创建人建立了宗教联系，请求他给予祝福、祈祷，并且提供捐赠。最后，这些僧侣的宗教影响大大提高，如果地理位置合适，其影响甚至还扩及到各个省督的亲属和所罗门王朝皇帝的朝廷。

441 这种集体从个别家庭、地方官员，也可能从皇帝那里得到土地、牲畜和其他各类物品的捐献。集体既然日益繁荣，就需要建造体面像样的教堂以及一批房屋供亲友居住、办学和各种自身需要之用。除了单纯出于信仰而参加这类集体的人数不断增加以外，还有穷人、老人和孤儿也来向修道院寻求食宿。圣徒传记中关于住所及其居住者的神奇传闻传播甚广，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使许多人前来请这些献身于宗教的人作能出奇迹的医治。修道院成了定期朝圣的中心。此外，在大多数大修道院之下，还附设女修道院，女修道院在宗教上受大修道院的指导，两者相距往往只有几英里。修道院集体必须顺应形势，所以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数百长期居民的大村庄。与最初相比，现在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以指导集体的生活，并通过民主的方式选举出一个等级森严的僧侣领导班子来执行这些规章制度和管理修道院日益增多的财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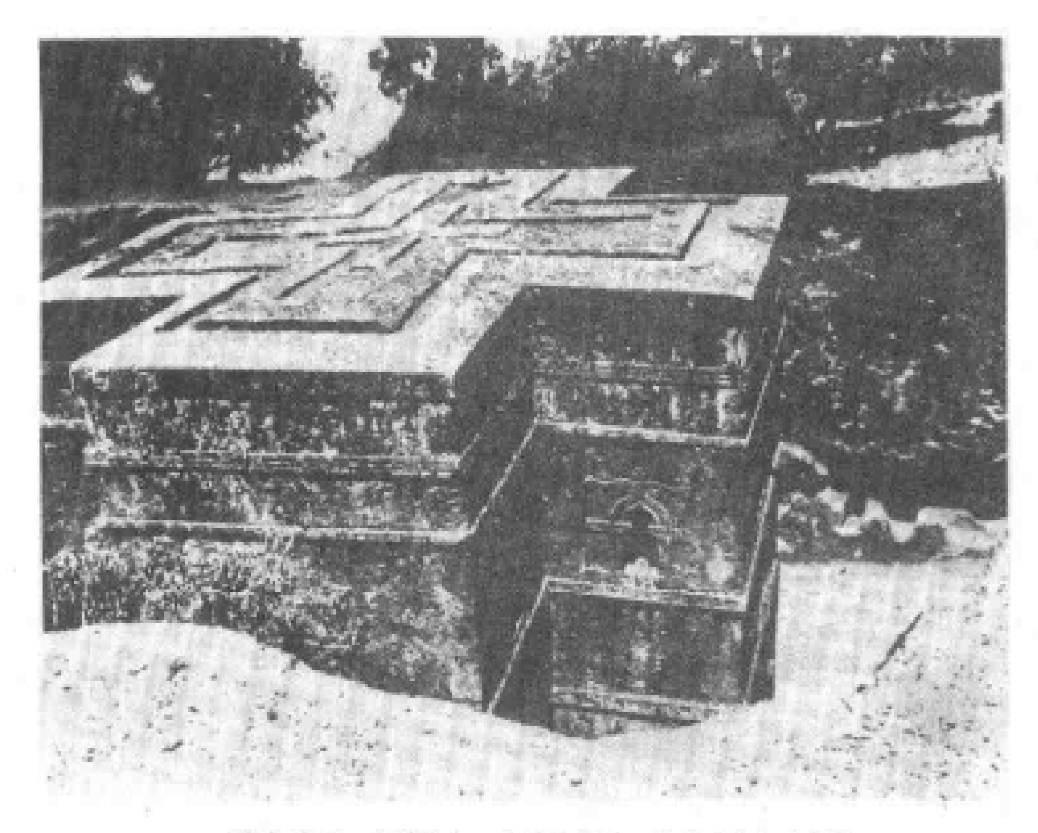
这些修道院崇高声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们所起的教育中心的作用。每一个修道院都供养了一批常住学者，他们教授当时的传统课程，如读、写、埃塞俄比亚教会高度发展的宗教音乐、格埃兹语诗歌及语法、教会历史和圣经注释。[⑧] 书法和宗教画大师很受优待。大修道院竞相争取各类专家，为能留住他们而给予他们以极大的荣誉和优厚的报酬。为了给请来的学者创造更有效和可以有所竞争的文化环境，还给穷苦而又有培养前途的学生提供帮助，他们最后能以修道院修士、已婚教士或教会其他工作人员身份参加教会的领导。

不仅这些未来的教士要在这类学校中经受各种严格的训练，修道院学校因为是国家进入近代之前唯一的教育机构，所以也是为国家培养领导人才的基地。除了出身于有钱和有权有势家庭者以外，获得宗教学者光荣头衔是进入教会上层的最可靠途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软禁于盖申山上的所罗门王朝家族成员所受的也是类似的教育，各个省

⑧ 评述埃塞俄比亚教会教育的最佳新作是塞高·海布尔·塞拉西（Sergew Hable Selassie）的著作，1972年，第162—17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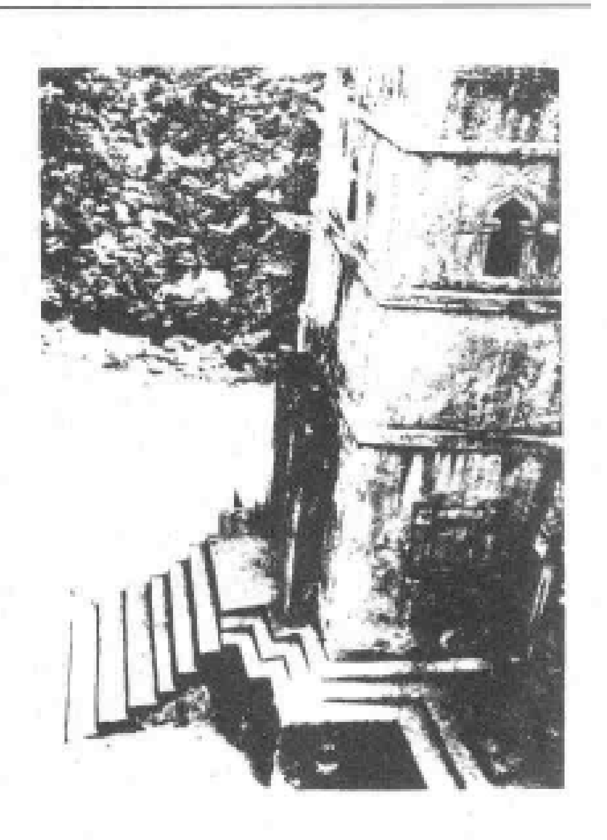


图片 17.2 拉利贝拉：圣乔治教堂，
发掘中的教堂上半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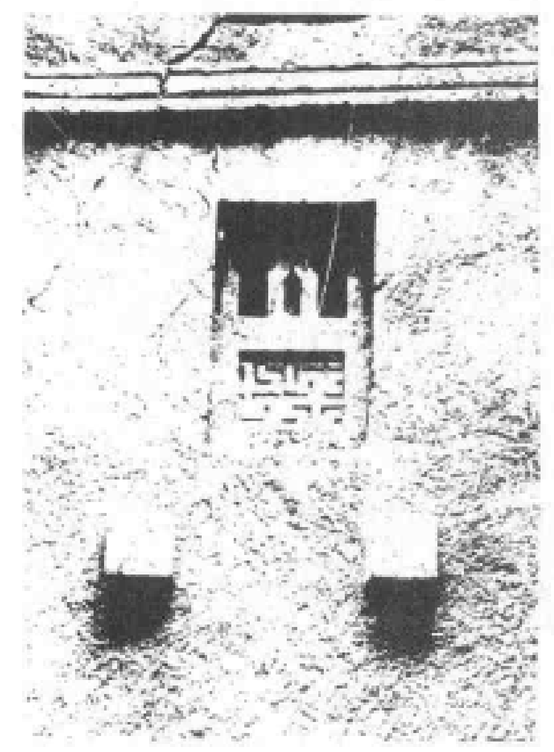


图片 17.1 拉利贝拉：圣乔治教堂，发掘后的空中摄影

443



图片 17.3　拉利贝拉：圣乔治教堂，立视景观



图片 17.4　拉利贝拉："救世主教堂"的窗户

份以及朝廷中大多数官员也都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正是教会在教育体制中所占的这一重要地位才使它能够将自己的影响渗透到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全国所有的权力机构中去 **444**

埃塞俄比亚北部的古老修道院从基督教阿克苏姆帝国时开始就提供这类宗教、文化和教育训练，但仅仅到了13世纪后25年和14世纪上半叶它们的影响才传到阿姆哈拉和北绍阿的许多地方。由艾伊苏斯－莫阿的学生所建立的这类集体在早期就取得稳固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几个是：阿巴·特克尔－海玛诺特于绍阿建立的德卜勒·阿斯博（后来改名为德卜勒·利巴诺斯）修道院；阿巴·阿诺尔伍斯和巴塞洛特－米卡埃尔于阿姆哈拉创建的德卜勒·科尔修道院；塔纳湖中达加岛屿修道院，这座修道院人们一向都认为是艾伊苏斯－莫阿的另一个学生希鲁特－阿姆拉克所创建。圣徒传记中关于这些修道院学校的传说说明了它们毕业生的足迹远到内地，他们在那里创建他们自己的集体。修道院在整个地区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绍阿，已经出现一批批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士。在埃塞俄比亚的最北边也有同样的修道复兴浪潮，那是由才智过人的阿巴·艾沃斯塔特伍斯所倡导，他传播福音的活动对博戈斯、马尔耶、哈马森、塞赖和今天称作厄立特里亚的库纳马的某些地方都有明显的影响。[29]

在安达－泽扬正在兼并一系列非基督教地区的时候，基督教会内的这一发展确实是件幸事。当时掌管埃塞俄比亚主教教区的埃及主教阿木恩·雅伊科布经皇帝批准已着手建立各级教区，并划定各自的管区，使它们能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负责宣传福音和一般的宗教福利事业。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安达－泽扬在新征服的地区都设置了驻屯军，这位皇帝和他的埃及主教还从各修道院调集教士到新地区去与基督教部队共同配合来加强这一扩张运动。因此，教会与修道院在法拉沙兰、戈贾姆、达莫特以及甚至在伊法特、达瓦罗和巴莱这些穆斯林地区逐步发展起来。皇帝拨给教会和修道院大量土地，当地的居民必须向这位基督教皇帝保证负责保护教会并给它们的宗教活动提供方便。违反这一保证便成为皇帝的军队进行惩罚性讨伐的主要理由。

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加以保护虽然在初期促进了基督教社会在整个所罗门帝国境内的形成，但是教会与权力机构过分密切的联系从长期和多种角度看却是一种严重负担。教会既然在各个属地都被看作是扩张和暴虐帝国的一部分，它就永远得不到被征服人民真心实意的爱戴。教会纵然有国家给予它的极大支持，它始终面临民间传统宗教领袖的坚决抵制；[30]它的命运总是与帝国的命运紧紧相连。它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于埃塞俄比亚的封建制度，所以永远不能维护自己在道德和宗教领域中的独立性；除了北部几个古老省份以及被占领土上基督教势力的几大中心以外，它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实在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情况的真实性在16世纪最初20年间帝国受到圣战的压力而崩溃时最为明显。 **445**

教会在这时期的重大发展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组织结构。它在宗教上继续依赖亚历山大大主教管区，各地教会均由埃及主教掌管。一个很重要发展是出现了两个居领导地位的修道会，即所谓的特克尔－海玛诺特"馆"和艾沃斯塔特伍斯"馆"。特克尔－海

---

[29] 有关教会发展运动的更详细的阐述可见T. 塔姆拉特，前引著作，第156－205页。

[30] T. 塔姆拉特，1972年（b）。

玛诺特"馆"与国王的朝廷保持紧密的联系，又以绍阿的德卜勒·利巴诺斯修道院作为它的基地，因而得到帝国大多数教会的效忠。艾沃斯塔特伍斯"馆"在14世纪之初只是一个好战的少数派集团，虽然它后来于15世纪也在提格雷、法拉沙兰、戈贾姆和绍阿建立起了自己的集体，但它主要的权力基础仍然还是艾沃斯塔特伍斯本人的学生在厄立特里亚建立的那些修道院，其中的德卜勒·比泽修道院后来成了领导中心。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埃塞俄比亚的教会和该基督教帝国完全一样，权力极度分散。虽然教会保持了一个在宗教上和历史上都有很重要意义的僧侣逐级统治制度，但各大修道院基本上都自给自足，它们彼此间几乎是完全独立的。即使是同一个会的修道院相互间的关系也都如此。埃及主教和皇帝一直想要缩小这种分散性，并试图通过在经济上给予好处和利用主教授与圣职的特权来加强对修道院的直接控制。这一意图对许多修道院外的世俗教会来说，确实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因为这些教会是由已婚教士主持，并可归地方上管理。但是，大修道院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独立自主，并成功地阻止了强大的国家僧侣统治集团的发展。当然，在朝廷和主教法庭上都有一批宗教官员，他们以皇帝和埃及主教的宗教顾问的身份行使着很大的权力。本文探讨的时期中有很长时间许多位皇帝都从哈伊克湖的岛上修道院招募他们掌权的宗教官员（*akabe - seat*），德卜勒·利巴诺斯修道院的院长（后来拥有 *echege* 这一称号）从16世纪之初开始担任这一职位。但这些教士之所以能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施加他们的影响主要是靠他们在帝国朝廷中拥有官职这一优势而不是靠作为国家僧侣统治集团成员这一优势，即使这个集团有着得到广泛承认的权力。

446

这时期是埃塞俄比亚教会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虽然它并没有能够在帝国新兼并的所有地方获得永久性的立足点，但它已经很明显地在13世纪末力量还非常薄弱或者是尚未插足的许多地区深深地扎下了根。尽管特克尔·海玛诺特修道会和艾沃斯塔特伍斯修道会经常发生冲突，竞争激烈，它们都对这一扩展作出许多贡献。但是，这个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发展还是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宗教和文化复兴。I. 吉迪和 E. 塞鲁利已经就这时期的埃塞俄比亚文学写过一些卓越的文章。[30] 这几个世纪艺术成就之大从数量比较有限的一些加了彩饰的绘画稿、双连画和教堂壁画以及许多经过精心设计的十字架和主教在宗教仪式上用的权杖即可看出，这些珍品在细心保护之下经过许多世纪至今仍完好[31]（见图片17.5 - 17.7）。

这一次文化复兴受到皇帝的关心和鼓励，有几位皇帝本身就是学识造诣很深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泽拉 - 雅科布（1434 - 1468年在位），他亲自投身于文学方面的发展，并被认为是许多神学论文的作者。大量圣徒传记关于这时期的传说进一步证明了在这些修道士集体中宗教活动十分活跃，其中有一些集体似乎对教会流传下来的教规、圣餐礼拜和教义都进行过一番反思。教义方面的论战以及对礼拜仪式上的争论在整个时期都是常有之事，亚历山大的领导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严重挑战。埃塞俄比亚人的自立精神是如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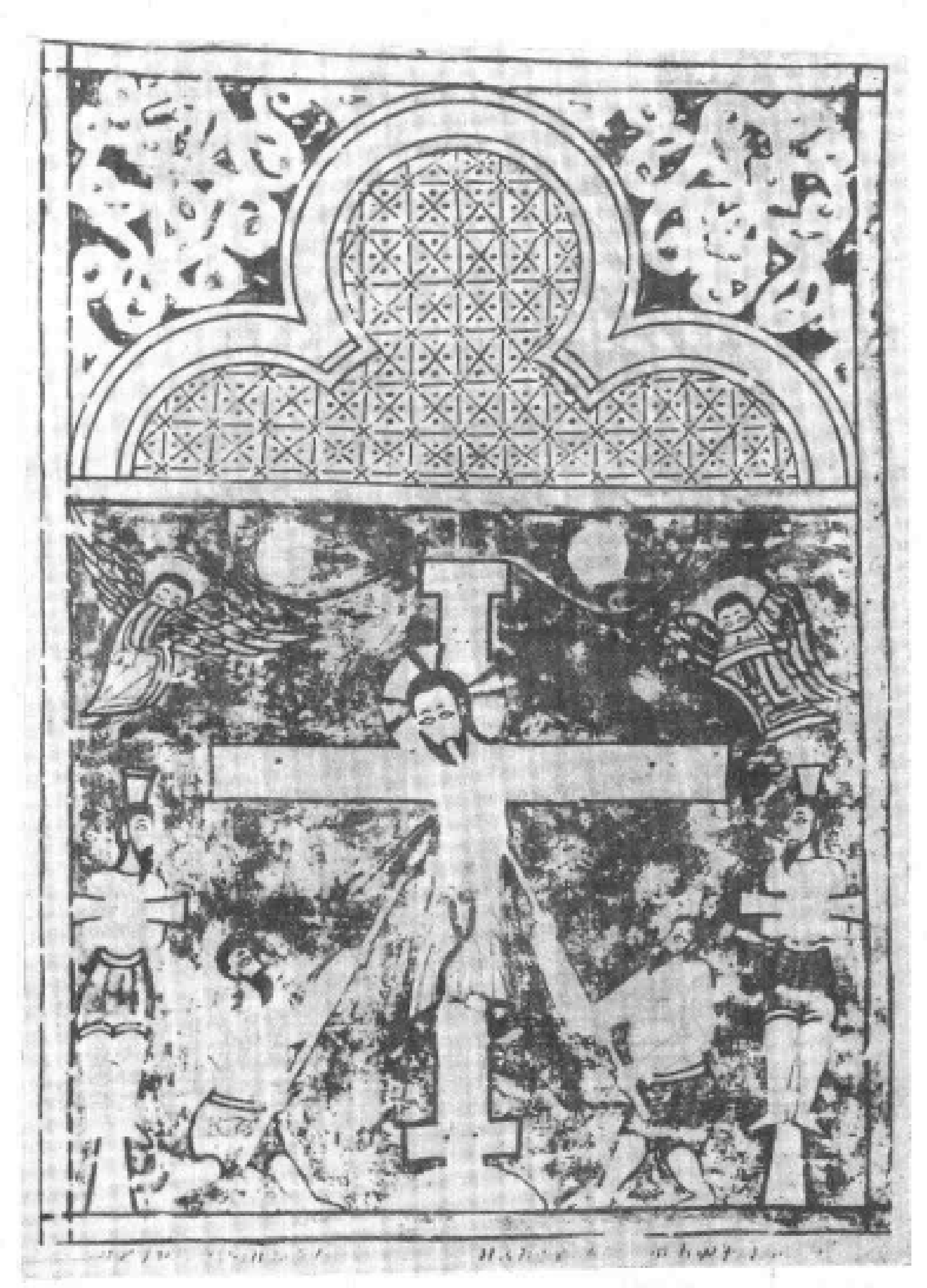
[30] I. 吉迪（I. Guidi），1932年；E. 塞鲁利，1956年。

[31] 该时期埃塞俄比亚艺术的详细评述可见：J. 勒洛埃（J. Leroy），1964年；S. 乔吉纳基（S. Chojnacki），1971年。



图片17.5　15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绘画稿，生命之树（克布拉恩修道院）

448



图片 17.7 15 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绘画稿，圣母领报（叶海亚·吉约吉斯修道院）



图片 17.6　15 世纪埃塞俄比亚的绘画稿，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克布拉恩修道院）

之根深蒂固，他们对埃及主教的信任跌落得如此之惨重，以致在 15 世纪后 25 年中曾出现了一个要与亚历山大大主教管区彻底分裂的强大运动，只是没有成功。[34]

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斗争

与亚历山大大主教管区的传统关系对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帝国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虽然这种效忠使埃塞俄比亚教会一直都接受埃及科普特人僧侣统治集团的监督，但是这种联系是与圣地的古老基督教中心和基督教世界其他地方保持相互沟通的唯一途径，对于这一事实皇帝和他们的主要顾问一直十分重视。因此，埃及主教和埃塞俄比亚教士之间虽然常有磨擦，但整整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始终都不允许导致永久性的分裂。他们的国家与红海或亚丁湾邻国之间在宗教上的不同一直使埃塞俄比亚皇帝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他们自然想利用自己的基督教徒身份与基督教欧洲建立联系和订立军事联盟，甚至后来还想直接参加后期十字军；另一方面，他们也力图制定出与穆斯林邻国和平共处的比较现实的政策。

马木路克统治下的埃及作为东非最有威望和最强大的国家，牢固控制着通往地中海的国际航道，所以也就掌握了解开这些政治矛盾的钥匙。因此，所罗门王朝的皇帝就是以寻求对开罗朝廷以及诸阿拉伯邻国，特别是对他们推行谨慎外交政策开始他们的统治的，他们力求与他们保持正常的商业往来。每当他们需要请求派一位新埃及主教时，他们就向马木路克素丹送去“男女奴隶、黄金和其他各种礼物”，[35] 并且还写信给素丹，恳求他们为埃塞俄比亚教徒去圣地朝圣和他们的平安归来提供方便。

然而这种谨慎政策并不总是与基督教埃塞俄比亚在安达－泽扬并吞了广大穆斯林地区之后开始萌生的权力意识相吻合。确实，在安达－泽扬执政之后的整个时期，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埃塞俄比亚皇帝在他们和马木路克政权的关系方面所采取的一个比一个强烈的进攻性姿态。由于埃及素丹一直主张在埃塞俄比亚保护伊斯兰的利益，所以安达－泽扬和他的后继者作为交换条件提出要求，要马木路克政权尊重科普特人基督教徒礼拜自由和其他一些民权，并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在埃及迫害科普特人。埃塞俄比亚和科普特传说都谈到，这一矛盾在安达－泽扬的儿子和王位的继承人西菲－阿尔埃德（1344－1370年在位）统治时期开始加剧。一位 15 世纪到埃塞俄比亚旅行的意大利人说，西菲－阿尔埃德曾率领一支军队远达尼罗河流域以增援塞浦路斯国王皮埃尔·德－吕锡格南 1365 年对亚历山大的围攻。[36] 马克里齐报道说，西菲－阿尔埃德的儿子达维特（1380－1412 年在位）“曾入侵阿斯旺地区，打败了阿拉伯人，并蹂躏了伊斯兰教徒的国土”。[37] 接着，被马克里齐说成是与伊斯兰教不共戴天的皇帝叶萨克（1413－1430 年在位）为了结束穆斯林在近东的称霸，力求与基督教欧洲建立强有力的联盟。[38]

[34] T. 塔姆拉特，1972 年（a），第 243 页注 4、第 230 页注 4 和第 245－247 页。

[35] 译自 E.M. 卡特勒梅尔（E.M. Quatremère），1811 年，第 2 卷，第 268－271 页

[36] C. 谢弗（C. Schefer），1892 年，第 148 页。关于西菲－阿尔埃德与埃及的其他矛盾，见 J. 佩若琼，1893 年，第 177－182 页和 E. A. W. 巴奇（E. A. W. Budge），1928 年，第 1 卷，第 177－179 页

[37] 马克里齐译自 E.M. 卡特勒梅尔法文本，前引著作，第 276－277 页。

[38] 马克里齐，法文译本，1790 年，第 8 页

另一位15世纪的阿拉伯作者伊本·台格利巴尔迪（1409－1470年）更详细地写述了叶萨克皇帝秘密派往欧洲的代表的故事，他们在返回埃塞俄比亚的途中被亚历山大城的埃及当局所逮捕。这使团的领导者是居住在埃塞俄比亚的波斯人，他在开罗被当众绞死，货物被埃及人没收，其中包括"大批制服，上面绣有（象征性的）十字架和金字。这些制服是供士兵穿着的。"[37] 在这之后一段时间两国一度恢复正常关系。但当泽拉－雅科布（1434－1468年在位）得知对科普特人的新的迫害导致著名的米特玛克教堂（即马格塔斯教堂）遭到捣毁之后，他便向贾克马克素丹（1438－1453年在位）送去一封表示强烈抗议的信件。贾克马克随即派去一位使节，带着一封讥笑挖苦的复信，泽拉－雅科布阅信后十分震怒，扣留这位使节达4年之久。[38] 15世纪埃塞俄比亚皇帝的这些傲慢表现与所罗门王朝创建者叶库诺－阿姆拉克不无谄媚的态度绝然相反，后者写信给拜巴尔斯素丹时自称是"素丹的最顺从的仆人"。[39] 但这是13世纪末以来一系列巨大变化的真实反映。

这些变化对于基督教埃塞俄比亚来说具有许多国际含义。尽管面对很大的个人困难，但人数日益增多的埃塞俄比亚僧侣仍一批又一批地前往圣地朝圣。有一个很独特的证据证明从14到16世纪初这段时间，在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修道院中、在西奈山上、在圣地的各个地方、在亚美尼亚、在塞浦路斯和罗得岛上以及在像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等意大利城市里——到处都存在埃塞俄比亚人的小型社会。这些埃塞俄比亚人不论走到哪里，都向与他们信奉同一宗教的基督徒们夸耀安达－泽扬和他继承者们的武功以及他们不断扩大的帝国。他们很可能同时也吹嘘他们皇帝所拥有的无穷财富、富饶资源和强大权威。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之初，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被认为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位基督教皇帝

此外，有些战略研究家似曾认真思考过基督教埃塞俄比亚是否有可能参加后期十字军的问题。这看来是完全可能的，原因不仅在于传闻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正在对埃及采取一项侵略政策，而且还在于马木路克政权急于要切断埃塞俄比亚与欧洲的一切联系。据一位14世纪来这里旅行的人说，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徒"非常愿意和我们拉丁民族交往，但巴比伦王国（也就是埃及）的素丹严禁任何拉丁人进入他们的国家，以防他们订立一项反对素丹的战争条约"。[40] 然而，埃塞俄比亚人越感到本身国力强大和繁荣昌盛，他们想与基督教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建立紧密联系的决心就越大；叶萨克的兄弟和王位继承者泽拉－雅科布不顾他兄长于1427－1429年派出的命运不济的使团的失败，他于1450年又往欧洲派出了一个使团。这一次比前一次较为成功；使团至少访问了罗马和那不勒斯，而且还平安返回埃塞俄比亚，带回来了一大批欧洲工匠和手艺人。[41]

452

[37] E. M. 卡特勒梅尔，第277－278页；伊本·台格利巴尔迪（Ibn Taghrībirdī），法译本引自E. M. 卡特勒梅尔，前引著作，第277－278页；英译本，1957－1960年，第4部分，第59－61页。

[38] 萨卡韦（al－Sakhāwī），1897年编，第71－72页和第124－125页。

[39] 引自穆法达尔，前引著作，第384－387页。

[40] 引自E. 塞鲁利，意译本，1943、1947年，第1卷，第133页。

[41] F. 塞朗（F. Cerone），1902－1903年；C. M. 德－维特（C. M. de Witte），1956年。

但是，埃塞俄比亚人最终还是打了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因为他们无法摆脱他们的孤立地位。马木路克埃及除了对通往地中海的国际航道能够绝对控制之外，还能向亚历山大主教管区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对该管区主教采取强硬措施就能很容易地全盘动摇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的宗教和政治基础。这一意图在整个埃塞俄比亚－埃及关系史上曾多次出现；每次到了紧要关头，埃塞俄比亚人总是不得不从他们的强硬立场上退回来。在15世纪，埃塞俄比亚统治者对马木路克政权的傲慢政策使在开罗的主教们深深陷入窘境和蒙受耻辱。例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泽拉－雅科布逮捕和囚禁了贾克马克派去的一位埃及使节。素丹对此作出反应，召来了在开罗的主教，将他痛打一顿，或许还强迫他要求泽拉－雅科布释放被囚禁者。而且，素丹在使节回归之后于1448年明文规定主教未经特许不得与埃塞俄比亚发生关系。[43]

埃塞俄比亚深深感受到这种宗教制裁的影响达30多年之久；在泽拉－雅科布统治时期最后一位埃及主教于1458年以前去世之后没有派去过替代他的人。一直到1480－1481年他的孙子伊斯金迪尔在位期间（1478－1494年在位）才重新立了一位新的主教，而且只是从那以后埃塞俄比亚人又照旧向埃及素丹赠送礼物。埃塞俄比亚在这方面的基本弱点以及僵局最终打开之后的群情激动的情况都反应在国王的记事录之中，记事录对主教到达后的效果作了如下的描述："教士的人数开始多了起来，各地的教会也都得到了恢复，全国一遍欢腾。"[44]埃塞俄比亚离基督教欧洲过于遥远，与近东又是那么密不可分，所以也就无法期望能成功地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建立具有深远意义和持久不变的关系。

453

埃塞俄比亚的衰落

基督教帝国在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的力量对比中占传统优势，这一点到15世纪后30年逐渐显出衰败的迹象。泽拉－雅科布统治时期标志着基督教在他祖先于前一个半世纪中所征服的整个地区之内的至高地位已经达到顶点。[45]他在基督教帝国国内与好斗的艾沃斯塔特伍斯修道会取得和解，而该会与埃塞俄比亚教会其他各派关系疏远已有一个世纪之久，这一情况对政治和地区起着重大影响。泽拉－雅科布曾千方百计试图在他整个国土上彻底改组基督教会，他宣布在他的国家里排斥和严禁所有传统宗教信仰和礼拜。他以一个真正的神学家的身份，下令禁止在教会内部进行重大的教义争论，他对抗命的僧侣严加惩处，决不姑息。他甚至曾想在绍阿的德卜勒－比尔汉建立一个新国都以结束国王朝廷不断流动的状态，他在那里设置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机构。

为保卫帝国，泽拉－雅科布击退了阿达尔王国在他东线诸省的连连进攻，粉碎了穆斯林附庸国哈迪亚素丹发动的叛乱，同时还改组了边境的驻军，并给他们补充最忠实的部队，从而加强对边远地区的军事控制。他在今天的厄立特里亚高原上为他从绍阿招募来的著名好斗民族马亚人士兵建立了一个侨居地；他在红海边上离今天马萨瓦遗址不远

[43] 萨卡托，前引著作，第210页。
[44] 译自J．佩吕琼，1894年，第340页。
[45] T．塔姆拉特在他的著作中对泽拉－雅科布的一生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1972年(a)，第220－247页。

处的吉拉尔有一个海港，那是靠人工挖出来的。[65] 泽拉－雅科布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重大难题。他的统治真正标志了中世纪后期埃塞俄比亚文化、政治和军事发展的高潮。

泽拉－雅科布许多计划的完成经历了千辛万苦，这位皇帝不得不花费大量心计对付来自各方的有组织的反抗。有关他本人事迹的一些书本，即与该时期有关的一些记事录和圣徒传记中的传说，都提到他不知疲倦的活动激发了许多政治动乱，甚至曾多次出现过想要废黜他的图谋。它们还谈到了他采取强烈的镇压手段击溃了所有这些反叛，又有许多故事谈到不少高级教会官员和朝廷大臣被放逐到流动的拘禁地去。他的儿子和继位者比埃德－马尔耶姆（1468－1478 年在位）登位后采取的第一个公开行动实际上是赦免了一大批这样的政治囚犯，并放松了泽拉－雅科布在新都城德卜勒－比尔汉推行的中央集权制。但是，在缓和了泽拉－雅科布的铁腕统治之后反又引起了许多地方新出现的叛乱，虽然这位年轻国王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一浪潮，但他的形象不如他父亲那样有威严。

继比埃德－马尔耶姆的短暂统治之后而来的是严重的内部分裂；他死后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他们都还不能担负起统治帝国的重任。两个王子的支持者之间为王位的继承问题所发生的冲突延续了好几年，因而严重损害了基督教帝国的力量。[66] 基督教军队在阿达利前线的初次惨败发生在比埃德－马尔耶姆的统治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的基督教政权从此就日趋衰落，一直到伊玛目艾哈迈德所领导的圣战促成其最终崩溃为止。

[65] C. 孔蒂·罗西尼（编），1903 年，第 181－183 页；J. 科尔莫迪（J. Kolmodin），1912－1914 年。
[66] T. 塔姆拉特，1974 年，第 526－533 页。

18 斯瓦希里文明的发展

V.V. 马特维耶夫

455 12 至 15 世纪这一时期，在东非洲诸岛屿及沿海一带的历史中，最为突出的是或许可以称之为斯瓦希里语族社会的出现。毫无疑问，当时在该地区已经有了国家，关于这些国家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 10 世纪。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东非洲 12 至 15 世纪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外界破坏势力的影响。一直到 16 世纪初，葡萄牙征服者的到来，才扰乱了这一进程，改变了东非洲以后发展的趋向和性质。这些情况，再加上文化发展的不断增长，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本章所探讨的时期，是斯瓦希里文明的全盛时代；特别是与后来的倒退和衰落相对比，这一特征尤为明显。

12 世纪时，斯瓦希里人无论在民族或社会组织方面都还没有组成统一的社会实体。按民族分布情况说，当时该地区是以讲班图语的居民为主的社会。在这基础上，后来又加上从内地四周来的人群，还有从阿拉伯海北岸和印度洋国家来的移民，后者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既然在社会中普通人、即自由的成员主体之外又来了一群与众不同而自成一体的上层人士，也就出现了社会差异。以民族和族群为基础的各种体制虽适合于社会这种形式的结构，但社会中却已有了阶级的种种因素。因此，这些上层人士即使被看作与社会中其他成员完全平等，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是富有的，享有传统的权势。

除了这些上层人士，社会中还有另一种富有者：他们没有传统的权力和权势，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经营贸易。一般的普通人构成斯瓦希里人的大多数和主体。此外，斯瓦希里社会在 12 世纪初，看来已有奴隶。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阿拉伯作家关于输出奴隶的各种描写中推断出来。奴隶在斯瓦希里社会中的作用并不清楚。他们或许仅仅是起奴隶贸456 易中商品的作用。但到 15 世纪末，根据一位未具名的葡萄牙人所作的关于在基尔瓦有奴隶耕种各种作物的报道，可以肯定他们已参与了某些经济活动。[1]

由斯瓦希里居民建立的文明，与斯瓦希里社会本身一样，存在着差异。我们可以看出普通百姓传统的和大众的文化与上层人士的文化有明显区别；但是，我们对这一文明的知识，由于缺乏原始资料，还不够全面。

[1] G.S.P. 弗里曼·格伦维尔（G.S.P. Freeman-Grenville），1962 年（b），第 217 页。

经济与商业

斯瓦希里文明的支柱是三大行业：农业，渔业和海产采集业，以及贸易经商

农业和渔业

农业耕作是普通百姓所干的行业。农耕与捕鱼和采集海产，是斯瓦希里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10世纪的一位作家马苏迪列举了当地出产的如下一些作物：香蕉、都拉高粱、薯蓣（卡拉里）、锦紫苏和椰子。[2] 另一些作家提到了甘蔗和酸豆。15世纪时，那位未具姓名的葡萄牙作家在引用上述说法时指出，基尔瓦－基西瓦尼有椰子、甜橙、柠檬、各种蔬菜、小葱头与香草、槟榔子、各种豆类和玉米（或许还有都拉高粱和高粱）。他又说，还有饲养业，包括牛、绵羊和山羊在内的家畜，以及种植棉花。以后的资料，连同陶制纺锤的发现，证明当时已经有纺织业。种植椰子树也是东非洲诸海岛和沿海居民从事农业的一个重要项目。

阿拉伯作家还指出有渔业和海产采集业存在以及它们所占的重要地位，作家们常常谈到当地的人们对鱼、海洋动物和海洋软体动物的大量消费。海洋资源不仅提供食物，我们从阿拉伯人的记载中了解到，那里的人收集珍珠、贝壳、玳瑁壳和琥珀，并予以出售。捕捞的鱼不仅自己食用，而且也出卖一部分，这足以说明捕获量是相当大的。众所周知，贝壳当时用于制作容器、汤匙和珠子。作为一种习惯，在阿拉伯文的原始资料中提到渔业时，它们总是泛指整个沿海一带而不作任何地理上的详细说明。但是，伊德里西撰文中谈到若干城镇居民的主要几个行业，并叙述了马林迪一个地区的渔业情况。[3]

航海术的发展是与渔业和海产采集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发展有两个方面：造船业的进步和远洋航行技术、特别是航海天文学的改进。后者只能通过印度洋上的航行取得进展，因此有足够的理由认为，非洲的远洋航海者在这方面作出了他们的贡献。[4] 457

至于造船业，我们估计，当时除了独木船和布篷船以外，还有其他种类的船。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没有具名的葡萄牙人所提供的资料说，在基尔瓦港停泊了许多大船，其排水量约为50吨；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说它们归谁所有。可以间接证明当时确有多种类型船只存在的是如下事实：在斯瓦希里语中有若干种船只的名称，很可能是表明它们各有自己的用途，而且到12世纪初仍然有着许多种类的船只。如果这推测是正确的话，那么就会对那种认为东非人从未在印度洋上航行经商的论点产生疑问。

---

[2] 马苏迪（al-Mas'ūdī），法文译本，1861—1877年，第1卷，第334页，和第3卷，第7、11和29页。也可参阅V.V.马特维耶夫（V.V.Matveiev），1971年，第26－27页。

[3] V.V.马特维耶夫和L.E.库贝尔（L.E.Kubbel），1965年，第304页。这是一部有关10到12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情况的阿拉伯语原始资料汇编，有俄文译本。

[4] V. M. 米苏京（V.M.Misiugin），1972年，第165－17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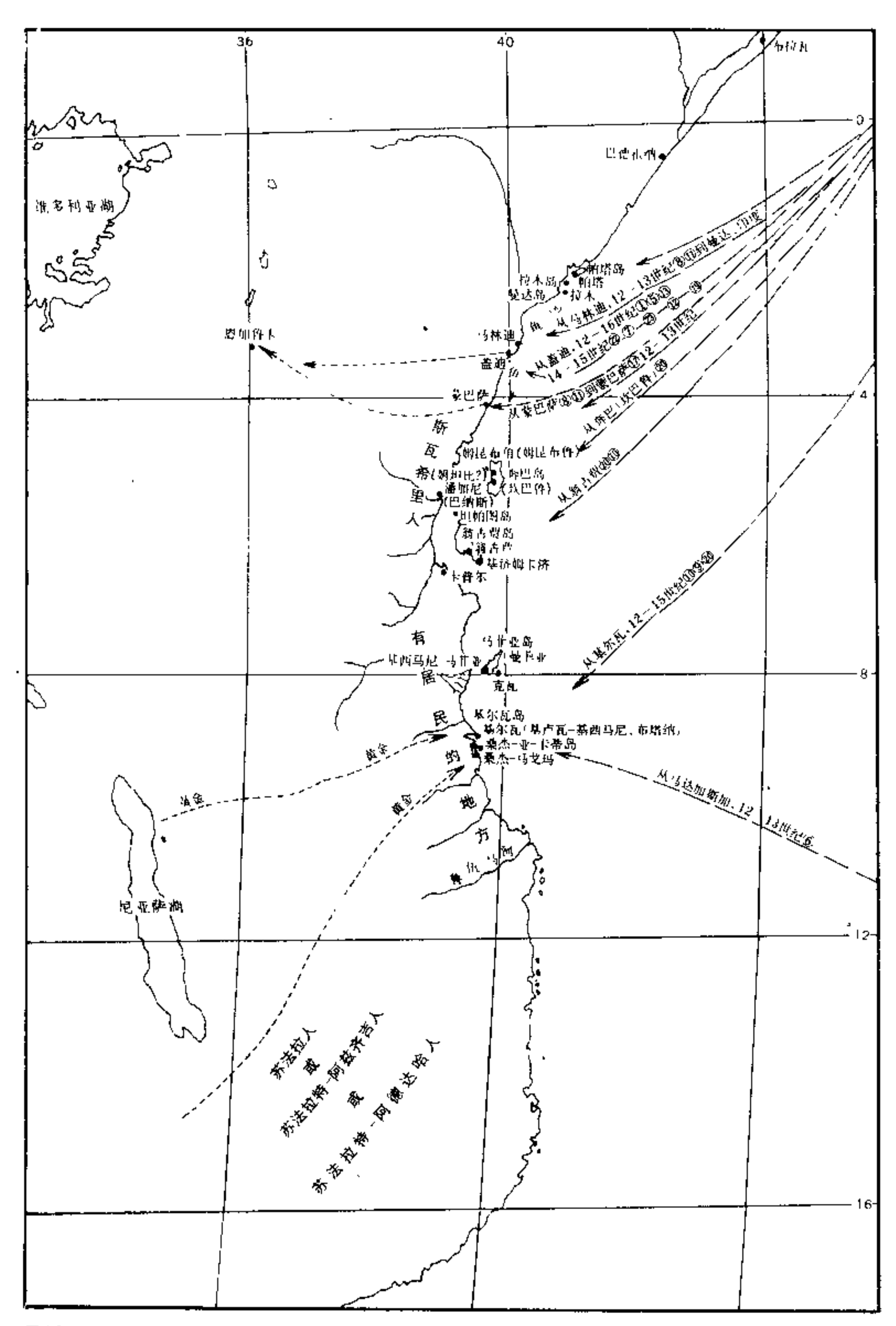


图18.1 12—15世纪东非沿海城市的内陆和海外贸易(V.V.马特维耶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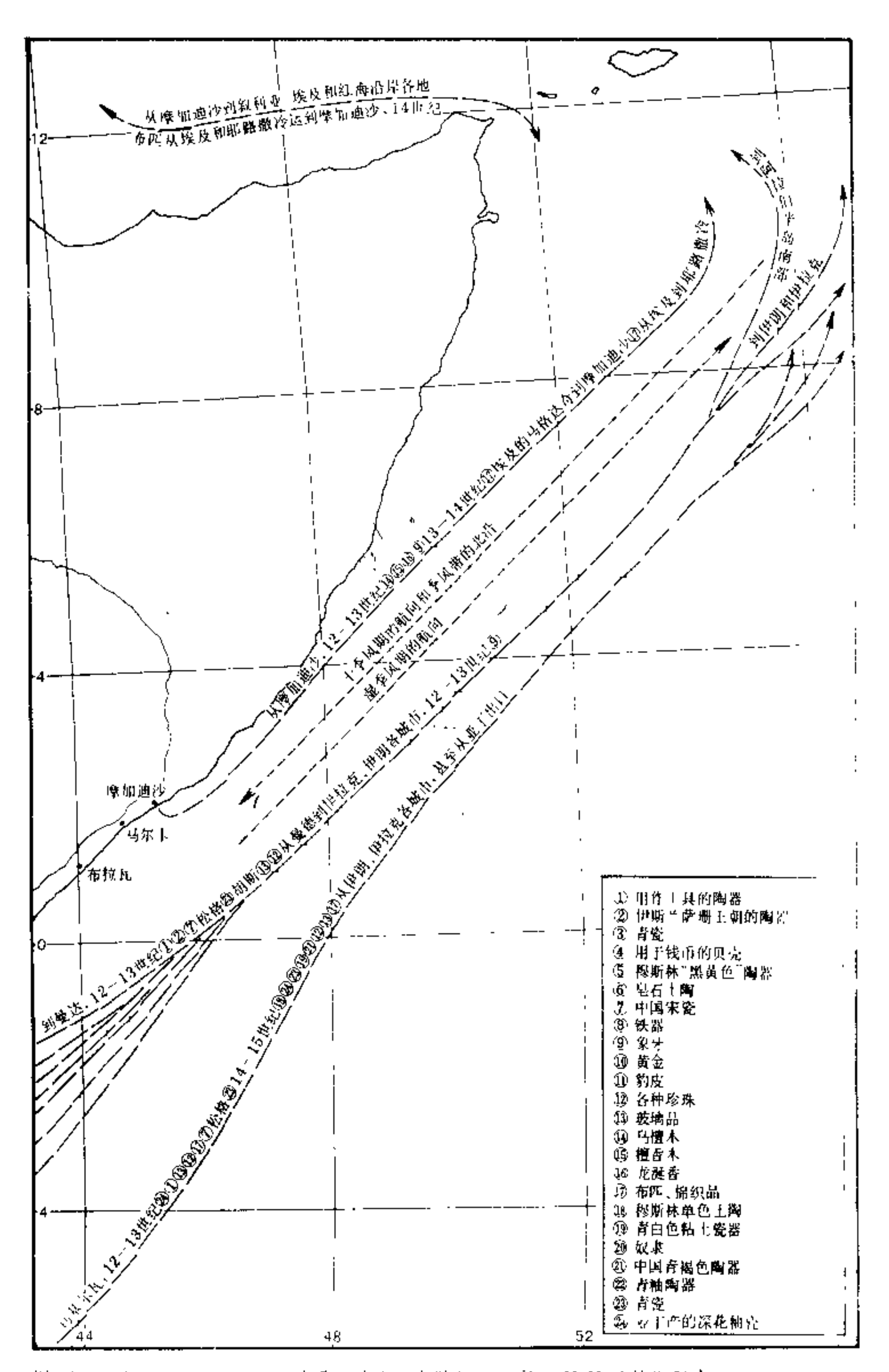


图18.1（续）：12—15世纪东非沿海城市的内陆和对外贸易（V. V. 马特维耶夫）

贸易和城市的发展

一般的斯瓦希里人都居住在他们用木棍和泥土建造、以棕榈叶或茅草作顶的棚屋里，正是这些棚屋后来结成为村落和城镇。完全有可能，阿拉伯文原始资料中所提到的猎取豹子和狼的人，指的就是那些斯瓦希里人。这些资料中还说他们加工铁矿石以出售铁块，他们可以不伤害猛兽而用咒语把它们迷住和降服狮豹，同时还提到他们为猎取狼和狮子所用的红毛狗，以及他们可以指挥自如的巨大琵琶桶和能发出可怕声响的大击鼓。[5]

然而，以上所述并不是东非洲沿海文化的全部。阿拉伯文原始资料中还有另一方面的叙述。这就是东非洲诸岛屿和沿海一带的比较进步的城镇文化，这种文化与海上贸易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一些阿拉伯作家对文化水平的差异也有过论述。据阿布尔·卡西姆·安达卢斯说，在东非洲的这些人民中，只有城镇居民才"把研究哲学当作精神生活乐趣"。[6] 这些城镇很可能绝大部分是棚屋，但它们也已有了一些石头建筑，斯瓦希里社会中富裕和高贵的成员住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城镇都是贸易中心，本地的货物都集中在那里，从海外来此的船舶就在这里进货。这些城镇在当时也是伊斯兰教在沿海一带的中心。在沿海经营贸易获利甚丰，原因主要在于对货物的估价变化很大。输入的货物都不是本地产的，大多都是奢侈品，其价值在购买者眼中要大于它们实际所有。另一方面，诸如黄金和象牙这样一些昂贵货品数量甚多，人们并又推测库存总会不断得到补充，于是使它们的价格下跌。有利的地理位置（东非整个沿海地带实际上正是受季风影响的地区）为航行于印度洋提供了可能，同时也说明为什么在世界这块地方有条件开展贸易的原因。

460

在12世纪，与非洲来往的主要贸易都取道拉穆群岛和桑给巴尔；考古发掘和调查的结果表明，这地区最大的中心是曼达岛上的曼达城，该城镇在9和10世纪相当繁荣，在12和13世纪时尚有贸易活动在继续进行。[7] 此后，大部分贸易就已明显经由基尔瓦了。曼达城的富有和繁华可由进口货物数量之大来证明，其中有萨珊王朝时代的穆斯林陶器、中国元朝的青瓷以及五彩拉毛陶瓷。许多上釉的和无釉的物品，很像在锡拉夫发掘出土的那些物件。

铁渣的发现，表明当时已经有了炼铁业。然而，单凭考古资料似乎很难对冶炼规模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可能伊德里西在他著作中针对马林迪城所说的一段话——"铁是他们岁入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贸易的主要项目"[8]——与这地区有关，铁是从马林迪运到曼达的。可以说明曼达富足原因的主要出口物品是象牙。

伊德里西还向我们谈到了沿海地区以及诸海岛上的其他城镇，它们的名称是马尔卡、

[5] V.V.马特维耶夫和 L.E.库贝尔，前引著作，第305页。
[6] 同上书，译自俄文本，第194页。
[7] H.N.奇蒂克（H.N.Chittick），1967年（b）。
[8] 译自 V.V. 马特维耶夫和 L.E. 库贝尔，前引著作，第304页。

布拉瓦、马林迪、蒙巴萨、潘加尼（巴纳斯）和翁古贾（桑给巴尔的古代名称）。根据一个新得到的而看来又是正确的证据，伊德里西所说的布塔纳与基尔瓦是同一个地方，在潘加尼的更南边。[9]这一说法可能意味着，基尔瓦已经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但以前它还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一些有关早期的阿拉伯文资料还提到苏法拉，那是出口黄金的地方。若将这些地方加以核对，就能确定它们都是在基尔瓦地区之内。

在基尔瓦－基西瓦尼进行的考古工作提供了一幅贸易兴旺的图画。[10]考古发现中包括大量用作钱币的玛瑙贝、进口的陶器(都是黄色拉毛陶瓷型的，上面有奶油色的描影．也有上了深绿色釉影的）以及一些玻璃制品。也还发现了少量的玻璃、玉米髓、石英珠子和马达加斯加产的块滑石花瓶。这儿的主要出口项目是黄金。12世纪中叶基尔瓦开始进口中国的宋瓷，和少量的青瓷。

盖迪在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进口物品是穆斯林黑黄色陶器、黄色和绿色拉毛陶瓷器 **461** 皿和各种中国青瓷。阿拉伯文的原始资料并未提到盖迪。当时可能也已经有了摩加迪沙城，尽管伊德里西并没有谈起过它。两个重要性较次的贸易中心是马林迪和蒙巴萨，从这两处地方输出铁和豹皮。鱼也是马林迪的出口物资。

13世纪初，雅库特称摩加迪沙是东非洲名声最大的城市之一，他写道，摩加迪沙的居民是过着有组织社会生活的伊斯兰阿拉伯人。那时期摩加迪沙输出檀香木和乌檀木、龙涎香和象牙。雅库特特别指出摩加迪沙居民血统混杂的特征。他也提到奔巴岛上的姆坦比和姆昆布鲁两城镇。“它们有各自独立的素丹。这岛上有许多村落和村庄。它们的素丹都强调自己是阿拉伯人，是从库法移居该岛者的后代”。[11]雅库特也是第一个提到基尔瓦（以此名称）和马菲亚两城镇以及坦帕图岛的人，但他说马菲亚不是在岛上而是在大陆沿海地区；而坦帕图岛，他指的是桑给巴尔岛(兰朱耶－翁古贾)。按照他的说法，桑给巴尔岛上有一个独立的国家，翁古贾城是有船只进港的贸易中心。他说，坦帕图岛上的居民都是穆斯林。

那时，设拉子王朝统治着基尔瓦，似乎马菲亚岛也受它的统治。13世纪中叶，基尔瓦与尚加人作战，尚加人很可能是桑杰－亚－卡蒂岛上的居民，引起争战的原因可能是争夺对本地贸易的控制。按《基尔瓦编年史》所说，基尔瓦最后取得了胜利。[12]这次胜利可能为后来斯瓦希里贸易和斯瓦希里文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发展可以被认为是于14世纪初开始的，在时间上它和基尔瓦一个与阿布尔·马瓦希卜的名字相联的新王朝的兴起几乎完全一致。

盖迪那时仍在继续经营原来的几项重要贸易项目。和前个阶段一样，曼达和盖迪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波斯城市，特别是锡拉夫。基尔瓦的进口规模有了急剧的增长，其中数量最大的是彩色拉毛陶器，一般为深绿色，上面有各种形态的装饰。中国宋瓷的数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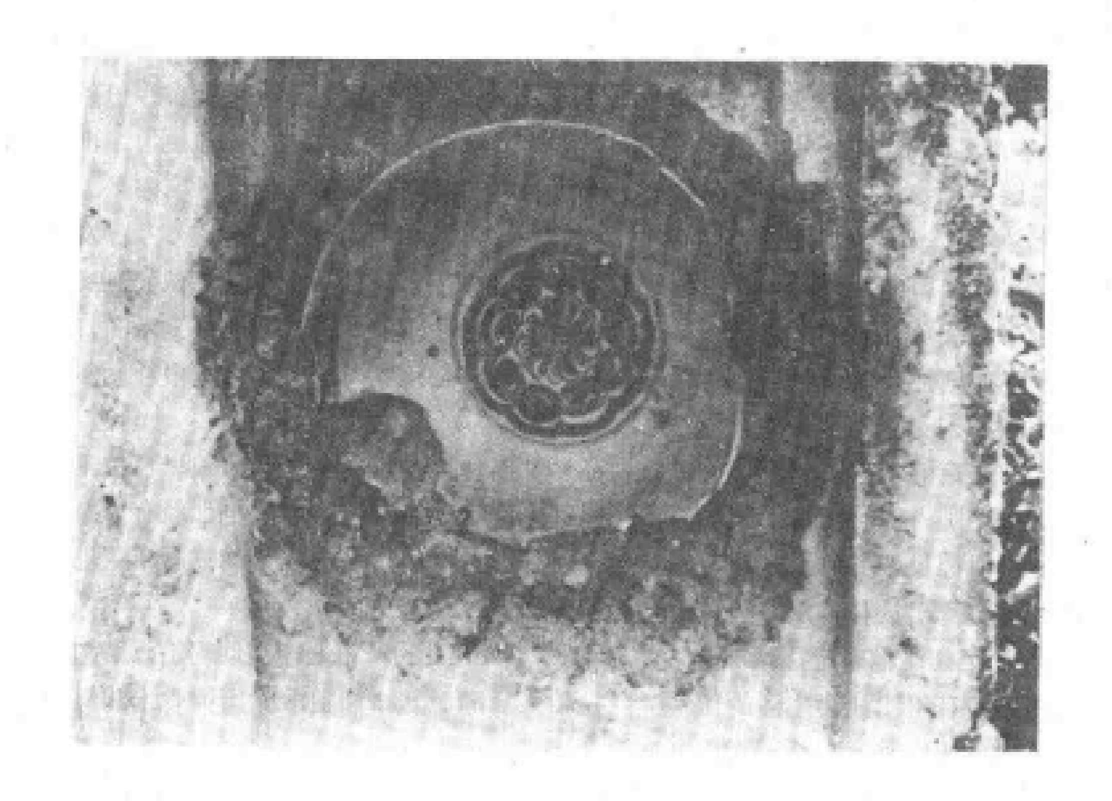
---

[9] M.A.托尔马切娃（M.A. Tolmacheva），1969年，第27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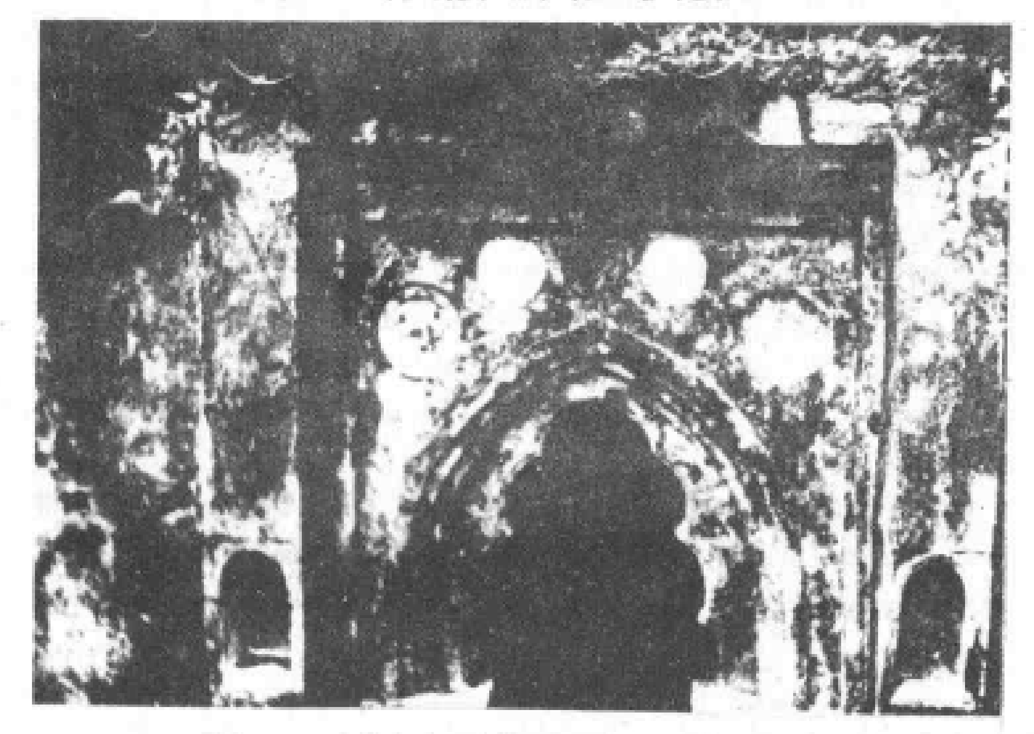
[10] 关于东非洲考古发现的简述和以后的东非洲斯瓦希里建筑的概述，提出主要著作如下：J.S.柯克曼(J.S.Kirkman)，1954年（a）；H.N. 奇蒂克，1961、1966和1967年（b）。

[11] 雅库特(Yākūt)，13世纪，德文译本，1866－1873年，第4卷，第75－76页；第5卷，第302和699页。

[12] 《基尔瓦编年史》，英文译本，见G.S.P. 弗里曼-格伦维尔，1962年(a)，第34-49页；1962年(b)，



图片 18.1 中国瓷盘，帕塔岛上西鲁的墓葬品



图片 18.2 中国瓷盘，马菲亚岛上富马清真寺门嵌上的饰品

有增加，现已发现其中有少量青瓷。此外，还进口了大量的玻璃器皿，主要是玻璃瓶，它们有时饰有浮雕，大多是用来装香水和化妆品的。在基尔瓦考古挖掘中发现的玻璃器皿，其形状和装饰与同时期从盖迪来的相似，也是各种瓶子。与大多数来自盖迪的器皿一样，它们很可能原产于伊拉克和伊朗。另外一些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块滑石花瓶都是进口的。玻璃珠子进口数量也有相当的增加。

贸易量到14世纪似乎达到了高峰。我们目前掌握的那时期主要阿拉伯文资料是伊本·巴图塔写的书，他曾到过东非洲。[13]他把摩加迪沙说成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他写道，来这里的每个商人都习惯于从市民中选择一个可靠的代理人代他处理业务。雅库特也提到过这种做法，但他并没有作具体详述。除了雅库特所握到的货物外，摩加迪沙还输出棉织品（*makdāshī*）。摩加迪沙的贸易联系与南边其他一些城镇不同。它自产的棉织品输往埃及，而又从埃及和耶路撒冷进口别样的纺织品。东非洲其他城镇与埃及和叙利亚却无贸易关系。

曼达于这时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无论是马林迪、蒙巴萨还是其他城镇，都不再具有重要意义。H.N. 奇蒂克所进行的考古发掘证明帕塔城只是在那时才在帕塔岛上出现。[14]

交换：中心地、产品、数量

盖迪于14世纪开始进口新货品。蓝色的和绿色的、表面光泽的上釉器皿取代了彩色拉毛陶器和黄色与黑色的陶器，虽然后者一直到14世纪中叶依然在进口。这些新货品很可能来自伊朗。其他进口项目有各种类型的青瓷和白色瓷器器皿，还有各样珠子，有用红泥制的（圆的或圆柱形的）、有玻璃制的、有上彩釉陶瓷制的，还有其他各种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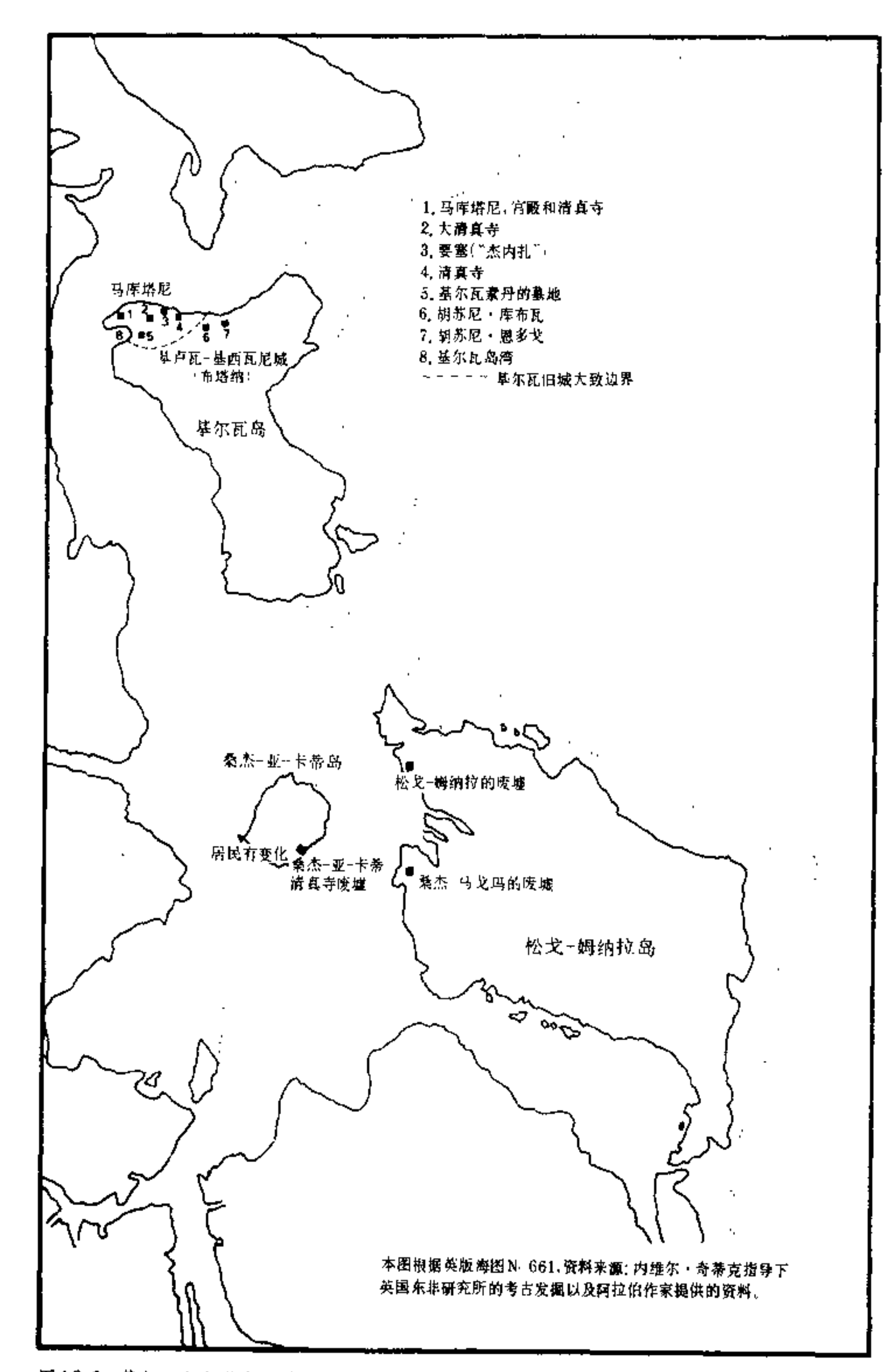
基尔瓦是主要的贸易中心。进口陶器的总量不断增加。也进口了少量穆斯林陶器，其中最典型的是上了黄釉但无光泽和带黑色图案的劣质器皿。可以认为这种陶器产于亚丁，是从那里进口来的。14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第一批穆斯林单色陶器；这些陶器几乎都是球形的、厚厚的容器，有一个粗壮的身子，边是圆的，容器的身子上了淡青色的釉。

中国瓷器进口的数量很大，它们主要是青瓷，往往又显得带点蓝色。“莲形”的青瓷容器使用很广，中国的土陶器在一些地方也广为传播，后者有桔黄色的釉面，底子的颜色接近黑色，上面是任意绘画的图案。也进口大量的玻璃珠子，颜色也有改变，已是钴蓝的了。块滑石器皿的进口已经停止，虽然同样的玻璃器皿仍照旧在使用。

到15世纪，盖迪依然在进口上有发亮釉彩的白色和青色穆斯林陶器。一个新的进口项目是白色和蓝色瓷器，这在该地区是初次出现，瓷器上的装饰明显带有15世纪中国明朝的风格。珠子进口情况一如前一世纪，玻璃器皿那时的进口总量缩小了。15世纪通常被看作是基尔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衰落的时代，原因在于上层社会内部各派力量的权力之争。但是，进口仍在增加。穆斯林单色陶器质量已有所提高，从而成为最常见的种类，

[13] 伊本·巴图塔（Ibn Battūta），法文译本，1853－1859年，第2卷，第176及以后诸页。
[14] H.N. 奇蒂克，1967年（b），第19－27页。

464



本图根据英版海图N. 661，资料来源：内维尔·奇蒂克指导下英国东非研究所的考古发掘以及阿拉伯作家提供的资料。

图18.2　基尔瓦岛和基尔瓦城（V. V. 马特维耶夫）

其颜色已由蓝青改为青色。中国瓷器两倍于穆斯林陶器。青瓷和蓝色与白色的瓷器分布最广，这两者的数量几乎相等。玻璃器皿，主要是瓶子，也相当普遍。玻璃珠子差不多全都是红色的。

主要的出口项目一如既往是象牙和黄金，此外还有奴隶（伊本·巴图塔提到过捕捉奴隶的情况）、犀牛角、龙涎香、珍珠、贝壳和沿海北部的豹皮。还有一种重要物品，部分从海外进口、部分由当地生产，这就是棉布，它的贸易额可能很大。我们了解到，在15世纪有大量的布匹运到蒙巴萨和基尔瓦，然后转运到苏法拉去。[15] 棉布在早期所起的作用非常突出，《基尔瓦编年史》中就提到基尔瓦岛居民购买棉布的长度相等于绕该岛一周的总长。

东非洲沿海和诸岛屿与印度洋北岸各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有关民族的相互联系和接触，并使他们富裕起来。这是全球规模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那里的海上贸易本身就是联系东西方的几条重要商路之一。东非洲各港口不是这条海路的终点，它还通往马达加斯加。毫无疑问，沿海地区与内地尼亚萨湖一带的产金区也有着联系，那里的黄金源源不绝地运往基尔瓦。14世纪时，苏法拉的几个产金地都受基尔瓦素丹的控制，素丹往那里派出自己的官员进行统治。这些联系以及这些联系的特点，现在都已为东非洲沿海或者甚至非洲以外国家的出土文物所证实。格特鲁特·卡顿－汤普森指出，在津巴布韦出土的柠檬色珠子与印度许多地方发现的珠子完全一样，她推测这类珠子的年代大概是8世纪。[16] 在津巴布韦发现的蓝色和绿色玻璃也可能来自印度，因为它们与印度人的产品和马来人的产品非常相象。 **466**

J. S. 柯克曼根据他对在盖迪发现的本地陶器的研究和看到它们与津巴布韦的一种陶器有相似之处而得出结论说，沿海地区与非洲内陆的金矿所有者之间也有交往。[17] 大陆中心和当今赞比亚国领土上靠近赞比西河的一些产金区可能是最早与外界建立贸易联系的地方。这现在已由发现的货币玛瑙贝所证实，这些玛瑙贝是用来在戈科梅雷和科洛莫换取黄金和象牙的。在当今坦桑尼亚的恩加鲁卡地区对一个古代的贸易点进行的考古挖掘证明15与16世纪那里的玛瑙贝和珠子与基尔瓦和其他沿海城镇所出土的完全一样。

伊德里西有关12世纪的著作明确指出与内地一些地区曾有过商队贸易，他说："因为他们没有可供驮运的牲畜，他们就自己负运货物。他们将货物顶在头上或背在肩上运到两个城镇——蒙巴萨和马林迪去。他们在那里卖出买进。"[18]

在当时的贸易中，作为交换媒介，玛瑙贝比其他任何东西用得更为广泛。它们在所有的考古挖掘中都有发现，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不仅在沿海，而且在大陆内地均无例外。珠子和后来瓷器似乎都曾作同样用途。在商业活动最活跃的地方采用了新的交换媒介——硬币。基尔瓦和摩加迪沙好像是铸币中心。硬币最开始是在基尔瓦使用，据H.N.奇蒂克考证，时间是设拉子王朝初建之际，他推定为12世纪末。[19] 硬币有铜铸和银铸的两

---

[15] J.斯特兰德（J.Strandes），1899年，第97－100页。（也可参阅英文译本，1961年。）
[16] G.卡顿·汤普森（Gertrude Caton-Thompson），1931年，第81页。
[17] J.S.柯克曼，1954年(a)，第72－73和第78－79页。
[18] 伊德里西（al-Idrīsī），译自V.V.马特维耶夫和L.E.库贝尔的俄文本，前引著作，第305页。
[19] H.N.奇蒂克，1965年。

种。摩加迪沙的硬币不同于基尔瓦的硬币，上面铸明日期为1322年造。[20] 沿海一带硬币的发现分布并不平衡。G.S.P. 弗里曼-格伦维尔指出，在姆纳拉尼和基尔瓦-马索科之间的整个沿海地带还没有发现过一个硬币。他认为，这也许是该地区考古研究工作做得不够的缘故。[21] 当然，也可能那些地方没有铸过和没有流通过硬币。

467

事实上，硬币的发现地都是大贸易中心，如基尔瓦-基西瓦尼、基西马尼-马菲亚、胡安尼岛上的克瓦，以及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在肯尼亚只发现过极有限的几个硬币。硬币的存在和流通说明，当时东非洲沿海一带和诸岛屿已经有了活跃和发达的本地贸易，所以才有使用硬币的需要。或许也可以假定，硬币比玛瑙贝有更大的交换价值，它们的使用足以证明当时那里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商业活动。这可用具有很高的内在价值的黄金成为基尔瓦主要贸易项目这一事实来证实。那时黄金产量之丰富以及它在商业上作为一种贸易项目的作用，显然使人不愿把它用作交换媒介。那些发现硬币的地区，显示出当时本地贸易的地理范围。基尔瓦硬币之所以没有标明铸造地点和铸造日期或价值，原因可能在于当一桩买卖用玛瑙贝进行时，所需做的仅仅是计算贝壳的数量。

东非洲各城镇的贸易获利相当可观，从而成为它们财富的主要来源。它奠定了斯瓦希里社会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基础。贸易往来使斯瓦希里社会熟悉和了解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在内的其他各民族的文化成就。尽管在考古挖掘过程中发现有大量的中国货物，但中国人在15世纪初以前并没有直接参与非洲贸易。一位权威人士V.A. 维尔格斯最近对中文资料所作的研究证明，中国的贸易船只不仅在5到11世纪这段时间里从未驶到过波斯湾，甚至也没有冒险驶出苏门答腊和爪哇以南或以西去，更不用说是到东非洲了。[22] 现在所知道的中国船队最早驶向东非洲沿海的两次航行是在郑和率领下于1417-1419年和1421-1422年进行的。

13至15世纪的斯瓦希里文明

这种财富和这些贸易往来大大影响到了东非洲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贸易发展的结果，使许多原来的小居民点发展成为若干个大城镇。贸易发展的另一结果是，在斯瓦希里社会里出现了一个能与旧贵族争夺权力的有势力集团，而旧贵族的势力和影响是建立在执行各种公众事务的职能之上的。这一个新的、有影响的集团的兴起以及它竭力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其源泉就是伊斯兰教思想，这种思想，

468

经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交往开始有了传播。已经在别处取得成就的东西，在需要时，往往可以被人们所接受和改造以满足自己的要求。根据这一原则，由历史环境所提供的伊斯兰教很自然地在这块地方获得了生根发芽的土壤。我们对伊斯兰教在东非洲传播的具体情况虽然一无所知，但可以有信心地说，伊斯兰教在东非洲总的说来，并不是像其

[20] H.N. 奇蒂克，1971年，第131页。
[21] G.S.P.弗里曼-格伦维尔，1957和1960年(a)。
[22] V.A. 维尔格斯（V.A. Velgus），1969年。

他地方那样由阿拉伯征服者武力强迫推行的。似乎也没有进行过什么特别的宣传以争取人们皈依伊斯兰教。这说明伊斯兰教是被人们自愿接受的，它符合于社会内部要有一种新思想的需求。

伊斯兰教的渗透大致是始于7世纪末或8世纪。马苏迪于10世纪报道说，在坎巴鲁岛上住有讲某种非洲语的穆斯林。这是一般认为伊斯兰教在东非洲沿海岛屿传播的时期。13世纪时伊斯兰教传到了大陆沿海一带。东非洲的伊斯兰教明显不能与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相提并论。伊斯兰教在东非的格局，正如J.S.特里明厄姆在谈论以后很久时期的情况时所说的，基本特点是人民皈依穆斯林者的数量有限，传统宗教依然存在。[27] 这一事实本身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许多传统的社会联系趋于分裂和破坏，新的社会联系则应运而生。人们之所以信奉伊斯兰教也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意图，也就是要使自己与那些非穆斯林非洲人区别开来。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个新出现的事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逐渐扩大和深化，信徒的人数也随之增加。这一变化的外观表现是清真寺数量的上升。

伊斯兰教的发展和分布

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大传播的时间可能不会迟于12世纪后几十年，而它的充分发展肯定是在14和15世纪。因此伊本·巴图塔在1331年把摩加迪沙说成是一个伊斯兰化程度很深的城镇。他在谈到基尔瓦的居民时说，"信仰和正直是他们最主要的品质"，他们的素丹赞扬虔诚信教和道德高尚的人。[28] 我们知道当时在摩加迪沙、盖迪、卡奥莱、基尔瓦、桑杰－马戈玛和其他一些地方都有清真寺。那些接受伊斯兰教的人都把他们的皈依看作是转向一种新的身份和新的生活方式，他们需要在行为格局上有所创新。在实际生活中，最突出的表达方式是：穿穆斯林的服装、用穆斯林的姓名和称呼。这在表明新的社会联系方面意义特别重大。这过程如何逐渐发展，可以从如下事实看出：穆斯林和非洲人新的和旧的称号，如素丹和姆法尔姆（*mfalme*，国王）的称号先是同时并存；后来非洲人的称号消失了。也可以作这样的假设，伊斯兰教的教规和禁令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尊重，因为传统宗教礼拜形式所特有的习俗和仪式依然继续保持。 469

最早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的可能是那些富裕商人。他们这一行为先是被旧贵族，后来才被普通居民中的某一部分人所效仿，那些平民之所以这么做，乃是想和信同一宗教的人平起平坐。

接受伊斯兰教是和吸收那些适合于本地情况的文化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伊本·巴图塔在他的著作中针对摩加迪沙和基尔瓦的卡迪（*kādi*，执法官）所作评论判断，斯瓦希里社会吸收了穆斯林法规中的某些成分，但并没有把整个法律制度全盘接受过来。[29] 在商业活动十分活跃的情况下，伊斯兰教的传播经常借用阿拉伯文中的许多词汇，

---

[27] J.S.特里明厄姆（J.S.Trimingham），1964年，第24－28页和第46－47页。

[28] 伊本·巴图塔，译自法文本，前引著作，第2卷，第194页。

[29] 同上书，第183－184页。

特别是关于贸易、宗教和法律方面的词汇。贸易和宗教方面的需要，诸如记帐、举行各种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以及确定斯瓦希里社会各个阶层的权利和特权，导致了用阿拉伯文字母书写斯瓦希里语的情况的出现。正如V.M.米苏京的研究成果所指出，要看懂这种书写形式的意思，必须懂得斯瓦希里语，因此只能是斯瓦希里人自己才看得明白。根据他的看法，这是10到12世纪之间的事。[26]

斯瓦希里建筑学

伊斯兰教在斯瓦希里人中发展和传播的结果，不仅是建造了不少清真寺，而且也发展了石头建筑。J.S.柯克曼和H.N.奇蒂克所从事的考古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东非洲诸海岛和沿海地区建筑和建筑学发展的全景。其起始日期，在盖迪、桑给巴尔和基尔瓦可以追溯到12世纪。初期阶段，人们有其自己的建筑方法，也就是把珊瑚块层层垒在红土上。从那时幸存到今天的唯一的大建筑是基尔瓦大清真寺，但它经过多次重建，已经面目全非，完全不是原来的模样了。这座清真寺是文字资料中曾经提到的唯一的一座建筑物。12世纪的另一个遗迹是桑给巴尔岛上基济姆卡济清真寺中的1107年的碑文，它现在已经成了一座18世纪清真寺的装饰品。

470 至于13世纪的建筑，我们知道基西马尼－马菲亚的三座清真寺，基尔瓦大清真寺的北部分庙，桑杰－亚－卡蒂岛上的一座小清真寺，摩加迪沙附近的两个宣礼塔（其中之一的建筑日期为1238年）和法克尔·丁清真寺（那里修道院的壁龛中有一块碑文，日期是1238年），那时的建筑方法已多少有点改变：所用的珊瑚块是造型粗糙的立方体，块儿很大，宽约20－30公分，垒砌时已使用灰浆，灰浆的灰是珊瑚烧制的。[27]

14世纪时，基尔瓦这个重要贸易中心在建筑学和商业上都经历了一个繁荣发达的时期，建筑方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单纯采用石块加灰浆，石块虽未经深加工，但大小或多或少已有一定规格。这方法明显简化了建筑的过程，而且也方便得多，虽然当时的石头建筑与13世纪相比质量是低一些。细加工的石块只是用于装饰壁龛和作门窗外框。新的建筑组成部分包括球形的和尖形的屋顶、半圆筒形的拱顶、石柱和各种装饰。但这些组成部分似乎只在基尔瓦有所发现，其他地方则一直是平顶房。

471 当时一个十分了不起的遗迹是胡苏尼·库布瓦的宫殿要塞（也是作为贸易中心的宫殿）。H.N.奇蒂克根据遗迹提及素丹哈桑·伊本·苏莱曼二世（1310－1333年在位）之名，认定这些宫殿建筑的年代是在14世纪，并认为这一类胡苏尼·库布瓦的建筑是给该世纪建造的富人住房起示范作用的。作为惯例，这类房屋都朝北或朝东，房前都有相连的院子。房屋由几个狭长的房间组成。第一个房间（可能是个前室）长长的墙壁紧靠院子，墙上开有一个门，其余几个房间都与第一个房间平行。房间的数量不一，但除前室外，都还有一个主室和一个卧室。厕所在房屋右侧不远处，那里有洗涤的设备。除了朝

[26] V.M.米苏京，1971年，第100－115页。

[27] 这些细节的根据，见H.N.奇蒂克，1963年(a)，第179－190页。至于建筑学、建筑技术以及关于基尔瓦考古发掘成果的资料也可见H.N.奇蒂克，特别是他1974年的杰作，下面的几节就是依据该书写的

向院子的墙上有窗外，其他各处都没有窗子，所以里边的房间都是黑洞洞的。类似这样的房屋在盖迪、基西马尼、马菲亚和卡奥莱，以及在基尔瓦岛上已都有发现。在胡苏尼·库布瓦，这类房屋更是到处都有。这综合体的另一部分显然是一个池塘。当时，没有别的建筑可与胡苏尼·库布瓦的相媲美，它是东非洲建筑学上的一个真正的杰作，虽然建造它的目的意图是什么并不完全清楚。

基尔瓦在14世纪发展成为一个大城镇；那里建起了许多石头房屋，这无疑反映了这个城镇的财富在不断增加。15世纪上半叶基尔瓦大兴土木的活动继续不停，与此同时，建筑的方法也进一步改善。往门窗外框中灌灰浆，并且还加进碎石。甚至屋顶的建造也采用这方法。石头加灰浆的圆柱替代了独块石头的圆柱。尽管房屋的基本样式仍然如旧，但已开始出现两或三层的房屋。当时建筑的一个特点是习惯于用上釉的中国和波斯瓷器嵌入建筑以装饰拱形屋顶和圆形屋顶。这个时期基尔瓦一座十分重要的建筑物是位于旧城马库塔尼地区那座带有清真寺的房屋。在素丹苏莱曼·伊本·穆罕默德·马立克·阿迪勒（1412－1442年在位）统治时期，基尔瓦大清真寺改建成了现在的样式，这是东非洲斯瓦希里建筑的一个最佳实例（见图片18.3）。

对那时这种建筑风格的观点不一。G.S.P.弗里曼－格伦维尔指出，基尔瓦的某些建筑物（特别是18世纪的宫殿）的场地平面图与普通泥墙房屋的图样非常相似，这说明这些石头建筑是非洲当地原来的建筑样式。[48] J.S.柯克曼和H.N.奇蒂克则认为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推动了建筑式样的发展，但后两人同时也指出，建筑物的许多具体细微之处与

470



图片18.3 基尔瓦大清真寺的两座近邻建筑

[48] G.S.P.弗里曼－格伦维尔，1962年(b)，第9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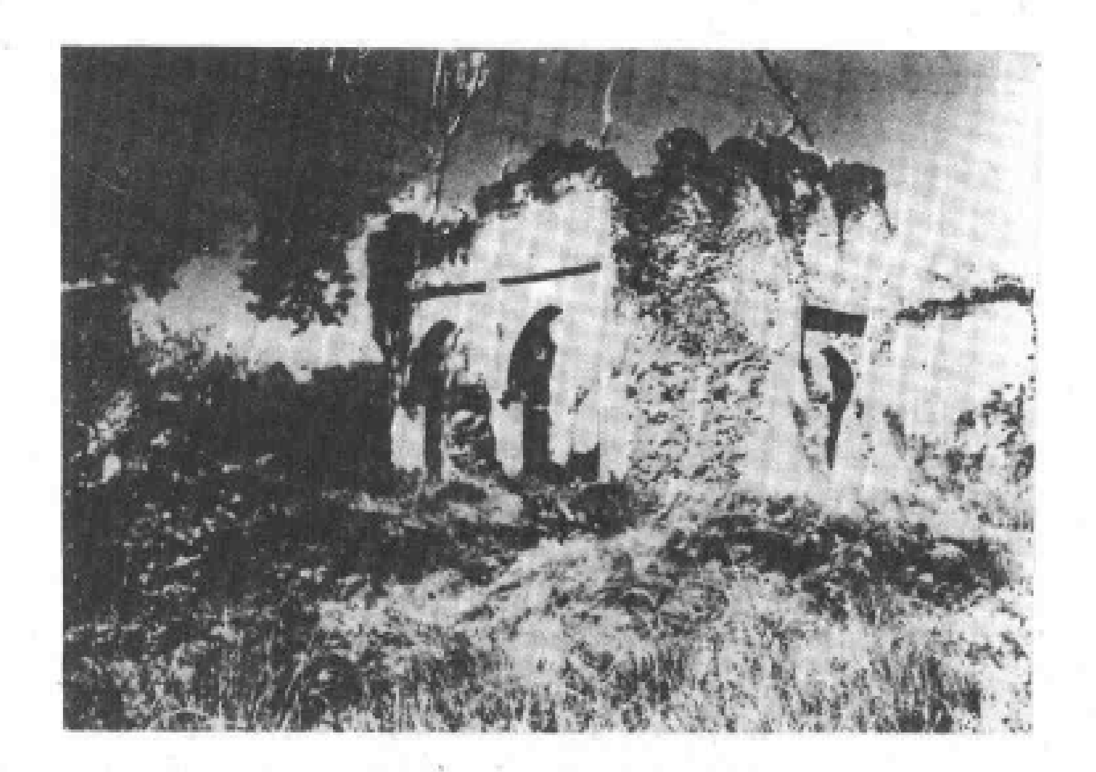


图片 18.4 基尔瓦－基西瓦尼要塞正门（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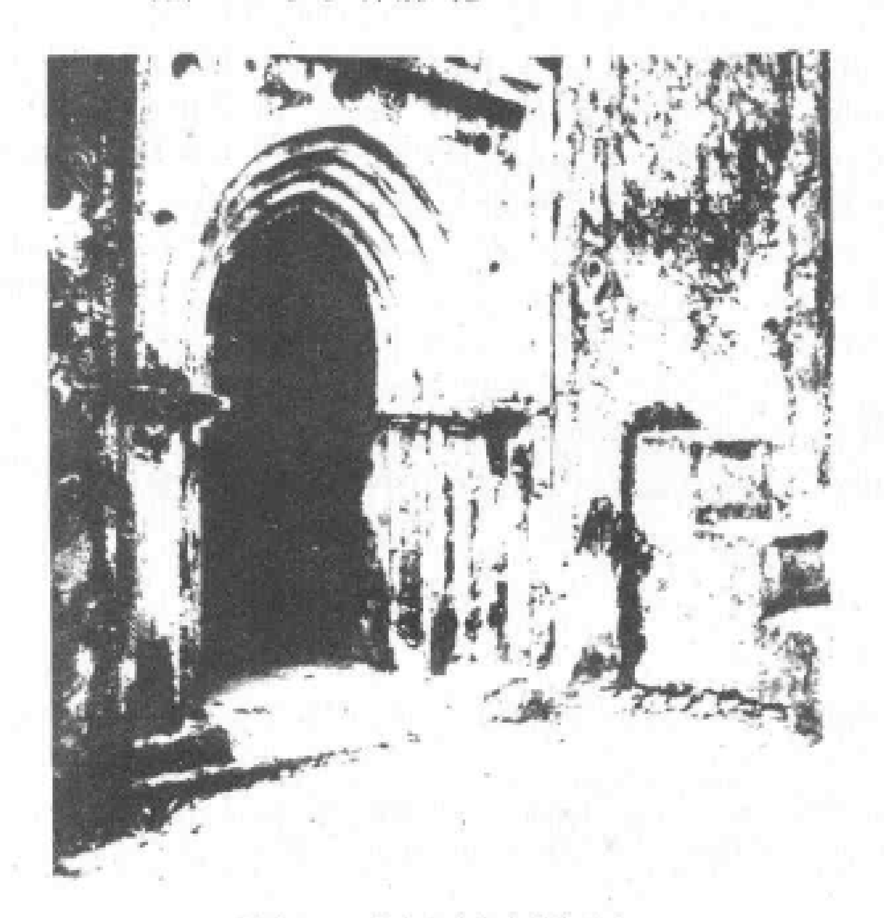


图片 18.5 基尔瓦－基西瓦尼要塞正门（近景）

474



图片 18.6 松戈－姆纳拉岛上纳布卡尼清真寺的废墟



图片 18.7 盖迪大清真寺的修道院

阿拉伯国家中伊斯兰教对建筑物的一些规定不尽相同。J.S.柯克曼说，盖迪大清真寺中矛头形状的装饰在阿拉伯半岛或伊朗是不会出现。H.N.奇蒂克则写道：“东非洲沿海人民在物质方面，而且特别是在建筑风格上，发展了一种在许多方面有他们自己特点的文明，若将这种文明称之为早期斯瓦希里文明最为合适。”[29]

J.E.G. 萨顿和P.S. 加莱克表示了类似的观点，萨顿写道：“沿海地区斯瓦希里人的建筑风格在其宗教和家庭建筑的平面图和样式方面，在其石头建筑的技术方面……在其经过加工的石头的造型和装饰的图案花纹方面，几个世纪以来都始终保持自己与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不同的传统。”他们两人看来是想强调斯瓦希里建筑风格并非源于非洲和想说明它的“非创造”性，同时又认为，这与其说是真正建筑师的成就还不如说是石匠高手的硕果。[30] 我虽然没有直接读到 P.S. 加莱克的书，但我愿指出，他称之为非创造性的特征很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应归因于有意识地努力模仿某种典型：例如，建筑方法的发展表明了对本地材料的合理应用和真能较好地使用它们。

根据葡萄牙人的资料，基尔瓦城泥墙房屋之间的狭窄街道都被高耸的棕榈树叶所遮盖，它们成了房屋的屋顶。石头房屋之间的街道也很狭窄；沿屋墙排列着石制的长凳。宫殿是重要的大建筑物，它往往有两层，一部分甚至是三层。各建筑物都装有木门，或许还有其他木制物，上面有许多雕刻作为装饰。这种工艺已经开始在东非洲沿海各地，特别是在巴加莫约和桑给巴尔发出光辉。杜阿特·巴尔博萨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工艺水平相当高，这说明它已经采用了好几个世纪。[31]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葡萄牙人对那里的城镇（其外貌和建筑风格他们原先在家时根本无法想象）和居民的富有（居民出来迎接他们时穿着非常讲究，衣服都是丝织和棉织的，而且华丽，上面还有金饰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妇女们在手臂上和腿上都戴有金、银的链子和镯子，耳环还镶了宝石。

斯瓦希里文明的高度发展似乎也可由考古挖掘中发现的陶制灯来证明，它们肯定用于房间的照明，这也说明居民们也许已经从事于阅读、书写和记帐等等。当时也已使用蜡烛。家具中有地毯和席子，有时有凳子和床，床很奢华，镶嵌了象牙、螺钿、银子和金子。富人要求日用陶器都从伊朗、伊拉克和中国，以及从埃及和叙利亚进口。烧煮东西使用本地土陶，而社会上的穷苦人则不管干什么都用这种器皿。从 12 到 15 世纪整个时期，这种土陶在形状和装饰上有相当多的变化。容器分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圆底或尖底，适合于放在火上烧煮；另一种是敞口的容器，它们类似于碗或碟子，可能是吃饭用的。

权力结构

东非洲的斯瓦希里城镇不仅是贸易和传播伊斯兰教的中心，而且往往也是行政中心，

[29] H.N.奇蒂克，1971 年，第 137 页。
[30] J.E.G.'萨顿（J.E.G.Sutton），1967 年（对P.S. 加莱克 1966 年一书的评述）。
[31] D.巴尔博萨（D.Barbosa），英文译本，1918 和 1921 年，第 1 卷，第 17－31 页。

这些小国的国都都由当地的穆斯林王朝统治。基尔瓦是这样的中心最为典型的例子，从《基尔瓦编年史》的两个版本可以充分了解这一点。[32]按该编年史所述，那里的王朝——其成员不是非洲人而是波斯人——原先来自设拉子。我们知道，几乎东非洲所有的城镇都有类似的传说。问题在于究竟谁是斯瓦希里城镇富有的伊斯兰化统治阶层？得到这问题的答案肯定有助于解决斯瓦希里文明究竟渊源于非洲还是由外来者带进非洲的问题。

从神话到历史事实

现在对这个主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其中一个说法认为，在东非沿海创建的文明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劳动的结果，他们或者在那里建立了城镇、传入了伊斯兰教和传播了他们高出于非洲人的文化，或者为此铺平了道路并促进了这方面的发展。根据这一观点，土著人所起的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作用；移居者周围有着大群的非洲妻室和仆人等等，因此他们很快就在当地的环境中被同化了。他们的文化非但没有发展，反而倒退，若不是因为又有了新的外来者，整个非洲的历史运动就会渐渐缩小到一个封闭的圈子之中。

这一说法是 J.斯特兰德于 19 世纪末提出的。[33]它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根据，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世界各族人民分成有历史影响和消极被动两类，后者缺乏创造能力，命定要受积极活动者的领导。这说法后来虽有许多变异，但其中心思想一直流传至今，而且还有一定的市场。几乎所有这样或那样关心非洲历史的专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受这一错误观点的影响，所以在 J.M. 格雷、杰维斯·马修、罗兰·奥利弗以至于 G.S.P. 弗里曼-格伦维尔等历史学家的著作中都包含有这种观点的成分；[34] 甚至连考古学家 J.S. 柯克曼的著作也是如此。[35] 476

西方考古学家 H.N. 奇蒂克和苏联 V.M.米苏京提出的另一种观点，现在仍受到重视，并在继续完善之中。[36] 非洲的史学家 J. 基-泽博和谢赫·安塔·迪奥普的意见与此相接近。[37]这一理论是以非洲人积极参与活动的假设为基准的。它的出发点是断定城镇的统治王朝都是非洲土著王朝。

权力转移的制度

V.M. 米苏京研究的题目是《帕塔城的编年史》。米苏京认为，在纳布哈尼王朝以前

[32] 见 G.S.P. 弗里曼·格伦维尔，1962 年(a)和 1962 年(b)。
[33] J. 斯特兰德，前引著作，英文译本，1961 年。
[34] J.M. 格雷(J.M.Gray)，1962 年，第 622 页；G. 马修(G.Mathew)，1953 年，第 212-218 页，1956 年，第 50-55 页；R. 奥利弗（R.Oliver）和G. 马修（编），1963 年；R.奥利弗，1962 年，第 305-321 页；G.S.P.弗里曼-格伦维尔，1958 和 1962 年(a)。
[35] J.S. 柯克曼，1954 年(b)。
[36] H.N.奇蒂克，1974 年；V.M.米苏京，1966 年。
[37] J. 基-泽博(J.Ki-Zerbo)，1972 年，第 10-12 页和第 190-192 页；C.A. 迪奥普(C.A.Diop)，1955 年，第 19 页。

帕塔有一个由古老的非洲贵族氏族统治的国家，这氏族名叫“瓦帕塔”，具有掌握王室权力的特权和享有姆法尔姆（*mfalme*）的称号。

> 为了维护与“姆法尔姆”称号和官职有关的古老而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法定准则，帕塔的统治氏族继续将男性亲属按血亲关系计算体制分成若干群体。在瓦帕塔氏族的各群体中，拥有“姆法尔姆”称号和有权依次取得“姆法尔姆”称号的男子都认为最重要的亲属关系莫过于在一个和睦群体（即恩杜古 *ndugu*）中联系着一个年龄层（一代人）的一些代表人物的那种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瓦帕塔高贵氏族中的“姆法尔姆”称号并非授予某一个人而是授予整个一代人的，也就是说，是授予以恩杜古这特定意义的词结成的整个群体的。凡是在有封闭的贵族氏族的地方，这个恩杜古群体不可能很大。然而，它可能包括相当数量的男人。“姆法尔姆”这称号的授予不是终身的，而是在同一代人中，把称号由恩杜古成员一个转给另一个（在后者达到成年之时）。
>
> 按规矩一个人一到成年就应成婚。由于贵族氏族的封闭性，男子都与同一氏族的女子结婚，这些女子反过来也就代表了同一代人的恩杜古群体。所以，婚礼同时 **477** 也就是当作“姆法尔姆”称号转移仪式举行的。根据古老习俗，这“姆法尔姆”称号，由于给人以获得最高权力的权利，所以是整个瓦帕塔氏族的财产。氏族中所有的男子都在一定的时间里履行获取这称号的职责，而氏族中的女子都是这一权利的保管人。因此，纳布卡尼王朝的创建者苏莱曼在他和一个巴塔维尤纳（瓦帕塔）氏族女子结婚时，按传统习俗，便获得了帕塔国王的称号。他之所以取得这称号，并不是因为他娶了国王的女儿（这仅仅是巧合），而是因为她是恩杜古群体下一代的妇女之一。[38]

从坚持恩杜古惯例的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斯瓦希里社会是一个氏族社会。

> 恩杜古惯例的社会本质，原来意味着瓦帕塔氏族过去凭借着它在财产方面对其他氏族的优势，将自己局限或封闭在氏族社会关系的一个有限框框之内，从而剥夺了其他氏族取得最高官位的权利。[39]

因此纳布卡尼王朝的第一位代表苏莱曼的继位以及他通过婚姻获得他的权力这一事实，说明了东非沿海地带阶级关系久已有了发展。但是，苏莱曼并不属于帕塔的王室氏族。这样，这称号通过他的妻子传到他手，他仅仅是靠了一个妇女才和这传统氏族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就王室氏族来说，包含着危险：它有可能丧失对这称号的权利，因为按照恩杜古的惯例，这称号要传给丈夫的弟兄，而他们完全有可能不与王室氏族的代表结婚。在这样的情况下，国王的妻子，作为王室氏族的代表，就成了对国王称号这抽

[38] V.M.米苏京，前引著作，第8页。这段引文是从俄语翻译来的。
[39] 同上，第63页。

象权利的保管人，因为行使称号的职责已被她的丈夫拿走了。这与究竟谁会是她的丈夫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成了现存制度的基本要素，而这制度产生于非洲沿海，并起源于非洲人。

我们试图将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于研究《基尔瓦编年史》，看来恩杜古惯例也同样左右着这个城镇的王位继承。这特别可从该《编年史》的第一章中清楚看出。我们对此有一参考资料，其中谈到，最先统治的是穆罕默德·伊本·阿里，尔后是他的第三个弟弟巴斯卡特·伊本·阿里，下一个继承人却是他的儿子阿里·伊本·巴斯卡特。这里，他明显篡了他伯伯、叔叔苏莱曼、哈桑和达乌德应有的权利，因为按照惯例，合法的统治者应是他的伯伯、叔叔，而不是他。

在该《编年史》的第三章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它谈到两兄弟哈桑·伊本·苏莱曼·马图恩和达乌德·伊本·苏莱曼·马图恩彼此都有权执掌素丹职位。达乌德在执行素丹职责时，把自己看作是他外出哥哥的代理人，如果他哥哥回来，他认为他有义务听命于他。这一点在我们看来特别有意思，因为哈桑和达乌德同属阿布尔－马瓦希卜王朝，而该王朝据说起源于也门。人们都认为该王朝在基尔瓦得到巩固和加强给该城镇各种各样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还值得指出的是，斯瓦希里文版的《基尔瓦编年史》和《帕塔编年史》都提到这位新的波斯素丹娶了一位土著酋长的女儿。 478

权力继承要服从恩杜古惯例，这一事实证明非洲城镇的政府机制源于当地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统治是按非洲当地的社会制度进行。还有一些城镇也像帕塔和基尔瓦那样通过与统治者的女儿结婚取得权力，弗里曼－格伦维尔举了一些例子。所有这一切证实了这样的说法，即在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习俗和准则支配下的沿海一带与帕塔相似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

伊斯兰教和权力观念

伊斯兰教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与斯瓦希里社会中靠了贸易已经富裕起来的阶层所起作用不断增长紧密相联的。他们的地位已大大改善，以致古老的贵族设法与富裕的穆斯林通婚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而穆斯林则为了要与古老的贵族取得平等地位，一个个都声称他们是阿拉伯人的后代，有时甚至还说他们出自在穆斯林国家历史上显赫一时的阿拉伯和波斯名门。

> 于是，一批批穆斯林于7、8、9和10世纪相继向东非洲城镇移民的古老斯瓦希里传说就转化成了从阿拉伯半岛和波斯迁来大批移居者的故事。许多斯瓦希里城镇王朝的统治者都纷纷自称其祖先是如此迁来，因此这些王朝当然是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建立的。[40]

这类传说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在《扎努吉书》（《*Kitāb al-Zanūdj*》）这本传说集里

[40] 译自俄文本，同上著作，第67页。

这种说法比比皆是。[41]同一类的传说在其他时期和在非洲和非洲以外的地方都曾传闻。例如有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认为埃塞俄比亚的统治王朝的起源是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479 东苏丹的非洲人部落声称自己是深入到非洲来的阿拉伯部落的后代。加奈姆国家的出现是与第一位国王塞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按照口头传说，他就是也门国王赛弗·迪·雅赞。马里的凯塔统治氏族的家系可一直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的随行者。甚至在尼日利亚也有一个传说提到约鲁巴人的祖先是来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迦南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传说将所有民族的起源、国家的建立和统治王朝的创建都归诸于很久以前来到非洲的白肤色异乡人，完全不谈非洲人的因素和事件。这里我们明显涉及的是由前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在某些情况下的一个特殊历史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某些研究人员，尤其是 A.H.J.普林斯，他举出了许多有关一些族群不顾他们无可否认的非洲血统而声称祖先是阿拉伯人和设拉子人的例子，从而进一步间接证实了当时存在的那种风气。[42]

然而，非常清楚，东非洲斯瓦希里文明是商业发展结出的丰硕成果。正是贸易使文明不断进步发展，但也造成了它的弱点，因为它并没有和该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根据居民的分布状况可以看出，整个斯瓦希里民族在出现大规模贸易之前，并没有尽力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使之超出传说中的斯瓦希里社会当时可能达到的水平。这也可由以下事实看出，即多次的考古挖掘只出土了极少几件铁制工具或其他金属器具。几乎所有斯瓦希里人生产的货物都不是供本地消费，而是为了向外销售和出口。追逐和开采黄金和铁也是同样情况。同时，单纯的贸易对一种文明来说，只是一个不充分的基础，至多只能起到刺激作用。一旦原先的贸易商路丧失和许多商业关系中断，必将严重威胁到贸易，从而出现停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财富和文明活力急剧耗尽的严重后果。现在我们知道，这就是东非各城镇停滞不前的原因。

还有许多情况也可看作是促使斯瓦希里文明衰落的因素。津巴人的入侵，以及雨量的减少和随之而来的水位的下降，似乎也都影响到沿海各城镇的进一步发展。很可能所有这些因素确是伤了斯瓦希里文明的元气。但是，据笔者看来，主要的原因还是葡萄牙人中断了海上贸易。葡萄牙船只装备精良，船上配有大炮，建造的目的就是要用于海战，所以是难以战胜的。它们由鲁伊·洛伦佐·拉瓦斯科率领经常出没于该地区，一次抓走了20条满载货物的商船，一次又击败了桑给巴尔强大的轻型船队，劫掠和摧毁了沿海诸城镇，特别是基尔瓦，这些都是使东非洲海上贸易从此一蹶不振和中世纪斯瓦希里文明日趋消亡的严重打击。480

[41] 意大利文译本，见 E.塞鲁利(E. Cerulli)，1957-1959年。
[42] A.H.J. 普林斯(A.H.J.Prins)，1961年，第11-21页。

19 海岸与大湖之间

C. 埃雷特

公元 12 世纪初，东非洲内地历史发展进程中明显的标志是生态和族群分类密切相关。尽管基督纪元开始以来整整一千年中，大量讲班图语的人一批又一批地来到东非定居，但是讲班图语的社会群体相对说来仍占少数，而且他们几乎全都聚居于雨水充足的地区，那里年降雨量最低不少于 900 - 1000 毫米。① 必须指出，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中，东非大部分讲班图语的人都已学会种植谷物和饲养牲畜，但班图社会仍以传统农业为主，即种植班图移民当初带来的块根、埃茎植物。② 相反，在肯尼亚内地和坦桑尼亚的平原和高原地带，种植多种谷物与放牧牛群相结合的东非洲农牧混合型农业已占主要地位。至于这一地带的北部则比较干旱，居民主要是讲尼罗特语；而南库希特语族主要是在南部。③ 481

近 海 内 地

分布在东非洲近海内地的班图人主要分为三大语族：萨巴基、塞乌塔和鲁伏。萨巴基语又可分为三种方言，仅仅通用于肯尼亚海岸后面的狭长地带。塔纳河以南，大概起自蒙巴萨向南延伸到坦桑尼亚的东北端，这一地区主要是讲祖传的米吉 - 肯达方言。讲萨巴基语族原始的波科莫方言的人大致分布在塔纳河河口一带，也许还有拉穆内陆。④ 第三种方言，原始的斯瓦希里方言，则较早通用于沿海各商业中心。⑤ 482

进入内地，沿海地区被干旱的肯尼亚东部内陆取代，萨巴基人的社会也让位于生活习性迥然不同的其他各族。塔纳河以北是讲古索马里语的游牧民。经济上也以游牧为主的南尼罗特人大致分布在塔纳河沿岸及以南。⑥ 萨巴基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讲米吉 - 肯达方言和波科莫方言的人按年龄分组的制度，这可能是班图入与内地其他各相互影响

① 下面各页除非加注，关于讲班图语部族族群所在位置和文化传统的论述，均以D.努尔斯 1974 年的论据和结论为基础；D.努尔斯(D.Nurse)和D.W.菲利普森(D.W. Phillipson)，1974 年；T.欣内布施(T.Hinnebusch)，1973 年；C.埃雷特 (C.Ehret)，未注明日期。

② C.埃雷特，1974 年 (a)。

③ 同上，1974 年 (b)。

④ 同上，表 2 - 1；尼卡（米吉 - 肯达）方言的外来语词是从早期波科莫方言借用的。

⑤ 见本书第 18 章。

⑥ C.埃雷特，1974 年 (b)，第 2 章第 2 部分和第 4 章第 2 部分。

的产物。人们或以为这种按年龄分组的制度是在17世纪加拉人的影响下产生的；然而，在讲波科莫方言的人中，南尼罗特人的观念肯定是促成这种制度的首要因素，其影响一定是出现在公元1600年以前。

内地的游牧民和沿海的班图人都与狩猎－采集者和平共处，这种格局不同程度地一直维持到今天。在塔纳河以北，讲自己独特的索马里方言的博尼人，可以看作是狩猎－采集者，他们的索马里方言来源于一千多年前占人口多数的游牧民，但他们始终没改变以采集食物维持生计的生活格局。[7]在拉穆内陆，讲南库希特语的达哈洛狩猎－采集者的词汇中有外来语，这证明他们虽然独处一隅，却也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间有好几百年一直与人口众多的讲波科莫方言和斯瓦希里方言的人相互交往。

班图人的第二个分支塞乌塔语族居住在早期萨巴基人社会以南，也就是现在坦桑尼亚东北海岸一带内地，大致是潘加尼河与瓦米河下游地区。公元1100年时，原始塞乌塔语族在他们的古非洲传统作物之外，增种了原产印度尼西亚的一些作物，包括亚洲薯、芋头和香蕉。当时萨巴基语族的农业生产，也可能有类似的发展，但是现在还不清楚，那时是否已经如塞乌塔语族的高原后代桑巴拉人那样大面积种植香蕉。此后500年中，原来的塞乌塔语族逐渐分成三个不同的社会群。桑巴拉方言形成于讲塞乌塔语的地区的西北部，通过移民传入了乌桑巴拉高原地带。原始齐古拉－恩古拉方言形成于公元500年左右，在瓦米河上游至恩古鲁山区的塞乌塔语族社会中广泛流行。该语族定居区核心地带使用的则是现在称作邦代语的一种早期方言。

483

如同肯尼亚的情况一样，坦桑尼亚东北雨量充足的沿海地区进入内地后也让位于日益干旱的内陆地区。自原始塞乌塔语族时代起，大约在1100－1600年期间，该语族与讲姆布古安语的南库希特人就是近邻。据信，姆布古安人主要饲养牲畜，其次生产粮食，似乎他们住在当今讲塞乌塔语地区的东部，即马萨伊草原与沿海狭长地带之间。

在讲塞乌塔语地区以南的瓦米河流域居住着讲鲁伏语的班图人；到12世纪，他们由采用两种不同农业耕作方式的两个社会群组成。东鲁伏语族（由他们衍生出现代的库图人、奎勒人、多斯人、扎拉莫人、卡米人和卢古鲁人）可能最初生活在沿海比较湿润的低地地区。因此，如果说是他们的北方近邻班图人先混合种植了非洲与印度尼西亚农作物的话，那么他们在这方面又进而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西鲁伏语族（他们的方言后来发展成为现代的卡古鲁语和戈戈语）随着他们的扩张向西迁移到瓦米河上游，他们加强了粮食生产和畜牧业的分工。他们的文化可能与先前就在这里的南库希特人相互交流，但这一假设尚未得到证实。与早期西鲁伏语族相互交流的库希特人可能是向南迁移的穆古安人，他们原先与原始塞乌塔语族为邻。

从尼亚萨湖到维多利亚湖

12世纪初，有相当数量班图人住的第二个地区是东非的南侧，即靠近尼亚萨湖北岸的地方。尼亚萨湖东北的高原可能住着原始恩乔姆贝人。恩乔姆贝语后来演变成为现代

[7] H.C. 弗莱明（H.C. Fleming）1964年。

的金加语、克赫语、贝纳语和桑古语。讲古尼亚库萨语的另一个班图社会住在恩乔姆贝人的西边，很可能就是现代尼亚库萨人居住的地方。他们的西北面，即坦噶尼喀湖与尼亚萨湖之间的高地走廊，还有另两支班图人，他们讲的是当地同一语言的两种不同方言：靠近恩乔姆贝人和早期尼亚库萨人的是原始尼哈人，原始尼哈人的西面是原始拉普瓦人。在班图人居住的这一地带的另一边，也就是东南面，居住着原始松盖阿人和早期波戈罗人，这些人在南面和东面与恩乔姆贝人为邻；讲演变为尧语、马孔德语和穆韦拉语的各 484 种方言的各族则分布在鲁伍马河东岸，可能一直延伸到印度洋岸边。[8]

公元 1100 至 1600 年间，围绕尼亚萨湖北岸的地区既有大批班图人向外扩张，又有许多内部移民流动。到了这一时期中期，走廊西半部的拉普瓦人社会开始进入扩张阶段，从而使拉普瓦语推广到了它现在疆域中的大部分地区，并导致了这种语言分化成为三种现代方言：尼扬万加、曼布韦和菲帕。大量事实证明，讲拉普瓦语的人向外流散时部分地吸收了湖区内的中苏丹人。[9]但是东松盖阿班图族群迁徙的规模最大；他们聚居在鲁菲吉河与较为潮湿的鲁伍马河地带之间的一大片干燥低地上，那里年降雨量不足 1000 毫米。他们的后代有马通比人、恩登格雷科人、恩金多人和本加人。他们能够在至多只适于种植早期班图作物而不适于饲养牲口的边远地区生存下来，这足以说明早在 11－12 世纪，东部原始的松盖阿人已将他们的原始农业逐渐转向种植谷类和其他种子作物。他们的迅速发展和迄今依然很低的人口密度，表明鲁菲吉河以南绝大部分或所有低地，在他们之前恐怕只有狩猎－采集者。

相反，内部人口流动主要来自恩乔姆贝地区。早期金加人南侵进入原来松盖阿班图族群的居住地，大部分恩乔姆贝人被吸收到尼哈人的社会中去。此后在 16 世纪，由金加移民分别产生了尼亚库萨人的两大君主家系和讲尼亚库萨语的恩贡德人统治家族。[10]

也是后来，其他地区的班图人开始移居到走廊地带，他们主要来自西部和西南部。这一地区的班图人长时期保留着某种头人领导的原则，但是地方上的政治实体既小且不稳定。S.R.查尔斯利认为，尼亚库萨的君主可能是走廊地带头领的较早类型。[11]西部和西南部的移民似乎经常破坏原来各个社会之间的协调关系，从而加速了新的较大酋长国的出现，由移民的头人掌握领导权。16 世纪的基扬万加酋长国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但是，485 西部和西南部的因素真正起到重要作用则还是在 17 世纪和以后。[12]

11 世纪初，班图人定居的第三个地区是维多利亚湖东岸一带。12 世纪，维多利亚湖东南的班图人社会大致分布在从南边的马拉到北边的卡维龙多湾这一地区。沿卡维龙多湾北缘以及沿布索加东侧西北的地区，则是维多利亚湖东北讲班图语的社会群。埃尔贡山东南的班图人则是维多利亚东南族群中分离出来的一支，他们居住在埃尔贡山南麓或

[8] 松盖阿语系中同源核心词汇的百分比，作者根据D.努尔斯和 D.W. 菲利普森（1974 年）采用的标准表核算不低于 70%。与他们两人注明的日期作对照说明，松盖阿语的分化，开始时间至今不超过 1000 年。尧语、马孔德语和波戈罗语彼此比较，或与松盖阿语相比，同源词的百分比要低得多，可见它们那时已经独立出来。

[9] C.埃雷特，1973 年。

[10] M.威尔逊（M. Wilson）1959 年（a），第 1 章。

[11] S.R. 查尔斯利（S.R. Charsley），1969 年。

[12] B.布罗克，（B.Brock），1968 年。

东南麓。沿维多利亚湖北岸，维多利亚湖东北班图人的疆土纳入了湖区讲班图语的地区。

尽管维多利亚湖以东各个社会在北面与湖区班图人毗邻，但与湖区社会截然不同。这种差别说明，维多利亚湖东岸的班图人与非班图人在前几个世纪有着长期的相互交往和文化交流。大约12世纪初，维多利亚湖以东的班图人对男性施行割礼，有相当可靠的人种学材料证明，维多利亚湖东南的班图人还对女性施行割礼。湖区班图人对这两种割礼却是完全不理会的，但是，这种仪式在南库希特人和南尼罗特人中，却普遍流行，因为后两者原是维多利亚湖以东班图人的东邻。维多利亚湖以东各个社会，看来都按氏族或世系组成若干地方小单位。他们同非班图语族的邻人一样，还没有酋长制；当时，湖区社会是由头领或土王统治，这种统治方式可以说是班图人更古老的组织原则。[13]

对于维多利亚湖东南（一边是湖）的社会群来说，尼罗特人和库希特人12－17世纪始终在剩下的一翼对这社会群的文化历史起着重要的作用。讲维多利亚湖东南语言所属马拉方言的各族有一个突出趋向，就是通过吸收南尼罗特人来求得发展；这一过程（在现代库里亚人、扎纳基人、伊科马人等族的祖辈中）使得南尼罗特人的定期按年龄分组的制度转用到早期维多利亚湖东南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及政治组织中来。由于班图人和南尼罗特人逐渐溶化为一个社会，双方不同背景的社会结构观念也合成一体，尽管马拉方言仍在这个合成群体中占主要地位。[14]维多利亚湖东南社会群中的穆索马亚语族，也与南尼罗特人有交往，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15]但是，现在还不清楚，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在文化的发展变化上是否也起过同样的促进作用。与此相对照，对马拉亚语族分支古西人影响最大的是高原南库希特人，而不是南尼罗特人。很早期，讲古西语的社会，显然是由于吸收高原居民而得到发展的，他们并没有像其他讲马拉方言的社会那样接受南尼罗特人的同龄会组织。[16] 甚至于公元1600年以后，在古西人与基普西吉人（南尼罗特人一分支）关系密切时代，接受古西人的特性，意味着保持1600年以前已定局的地方社会组织类型。

就在同一时期（12－17世纪）维多利亚湖东北的各个社会卷入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交往。在他们西边，湖区班图人移民似乎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当地的社会习惯和民族分布。例如，在西巴卢希亚人中，割礼和不定期按年龄分组的制度削弱了，这是由于一些没有这种习俗的各族不断地从讲湖区语言的地方迁来。埃尔贡山西麓原来是伊通加人居住之地，公元1100－1600年期间有一部分地方为维多利亚湖东北讲吉苏方言的人占去，另一部分地方则为班图人的另一支锡安人所夺取，后者与来自现在是布索加或布干达地区的移民结合在一起。同时，语言学方面的证据表明，维多利亚湖东北的移民在那时也大量涌入了布索加。可以令人信服地断言，布索加和布干达口传历史中的金图时期，代表了14世纪时维多利亚湖东北地区各氏族的一次重大迁徙定居运动，这又充实了语言学所提供的证据。[17]看来没有理由怀疑口头传说中提到的一件事，即金图时期的迁徙运动把香蕉

[13] 参阅J·范西纳（J.Vansina），1971年。

[14] C.埃雷特，1971年，第5章。

[15] 同上，附录D4。

[16] C.埃雷特，1974年（b），第2章，第6节。

[17] D.W.科恩（D.W. Cohen），1972年。

传入了布干达和布索加；据我们所知，这与其说是第一次传入香蕉，还不如说是引入了早已在埃尔贡山区得到发展的香蕉培育技术。

然而，在维多利亚湖东北的北部和东部社会群中，还是尼罗特人的影响最大。埃尔贡山西麓的伊通加人和基托基的南尼罗特人（这段时间一直住在埃尔贡山以南）的观念意识汇集在一起，促使原始的吉苏人懂得了养牛业的重要。16 世纪以及在此之后，卢伊亚人与居住在南迪山下讲卡伦津语的南尼罗特人两者遭遇，导致讲班图语的社会群的形成；这些社会群在社会及政治结构上仍保持原来的氏族基础，但也承袭了卡伦津人的定期按年龄分组的制度。此外，在 16 世纪晚期还有卢奥族移民侵入卡维龙多湾附近地区的最南部。卢奥人原先并不起重要作用，但他们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却迅速发展，重要性日益增加。 487

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内陆地区

虽然肯尼亚与坦桑尼亚内地的大部分班图人社会都建立在年雨量 1000 毫米以上的地区，但也有少数几个在 11 世纪时已适应于干燥气候；前面提及的西鲁伏人就是一个例证。可能还有其他社会群，他们讲的是坦桑尼亚西部原始的塔卡马语。语言地理学对近代塔卡马语是有研究的。尼亚图鲁语、尼拉姆巴语、尼扬韦齐－苏库马语、金布语——这些语群的故乡可以假定是在文贝雷河西岸某处，这是年雨量 600－1000 毫米的地区。即便是那里有些地方种植某些非洲原有作物，其数量也不会多，不足以成为生活所需的食品，因而原始的塔卡马人肯定更多地是依靠谷物种植。

12 世纪时，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内地的其余地区，主要是尼罗特人和南库希特人的社会，只有少数几个分散的班图人居住地。无论是尼罗特人还是库希特人，都有饲养牲畜的癖好，但不能把他们看作不从事农耕的牧民。实际上，观察一下这类人较近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以谷物种植作为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然而，在雨量极少和降雨不均的少数地区，如马萨伊草原和肯尼亚东北部大部分地方，畜牧业实际上已完全或差不多完全取代了农耕作业。

与现今的情况大不一样，当初，南库希特人是分布很广而且占有重要地位的，其中以居住在大裂谷东支者人数最多。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中，大裂谷东支的库希特人在北至乞力马扎罗山和帕雷山南到多多马地区（今坦桑尼亚）的广大地带占有绝对的优势。他们饲养牛群，放牧绵羊、山羊，同时种植小米、高粱充主食之用，在雨水充足的地方还种植龙爪稷。约在 1100 年，由于尼罗特人的两支——达多格人（或称达迪奥人、达戈人）和翁加莫人的扩张，大裂谷东支原有的领域分裂。

在马萨伊兰中部有一个东裂谷人组成的小社会，我称他们为阿萨克斯人。尽管达多格人在当地占优势，他们还是坚持生存了下来；之所以能如此，就因为他们都是狩猎－采集者。[13] 狩猎－采集者能以他们独特的经济活动与曾一度占优势的东裂谷人相共存，甚至接受了东裂谷语。在达多格人把东裂谷牧民同化或逐走时，阿萨克斯人仍作为一个单独的社会实体而存在，甚至保留了他们自己的库希特语。 488

[13] 在以前的著作中，曾经提到过阿萨克斯人，当时称之为“阿拉马尼克人”。

由马萨伊兰中部往南，有两个东裂谷社会仍保持他们的祖先在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中所过的放牧和种植谷物相结合的生活方式。其中第一个是夸德扎人，即早先在马萨伊兰占优势的东裂谷人的直系后代，他们所讲的方言与阿萨克斯人接近，⑲他们的疆土可能包括南马萨伊、姆普瓦普瓦和多多马地区的一些部分。⑳第二个东裂谷社会，可暂称伊林加地方的南库希特人，其疆土范围尚不清楚。显然，他们是夸德扎人的南邻，其人口之众和分布之广，在公元1100年左右对原始的恩乔姆贝人影响极大，并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对赫赫、贝纳、桑古诸族的形成起了作用。

公元1100年后的几个世纪，由于夸德扎人和伊林加人住地的气候十分干燥，班图人的扩张受到限制。但在这一时期，班图人社会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把先前已在此地的南库希特人同化了，还通过商业以及文化交往施加影响；于是，早期农耕作业逐步由伊林加人和夸德扎人的农牧混合型农业所取代。这些班图人一部分组成了坦桑尼亚南方高地的恩乔姆贝社会，另一部分组成了基洛萨地区的西鲁伏社会，还有一部分组成了夸德扎人住地以西的各个塔卡马社会。到了16世纪，这三个地区的班图人居民开始大规模向外扩张。在南方高地，残存的东裂谷社会不仅屈服于讲古贝纳－赫赫方言的恩乔姆贝移民的最初冲击，后来又屈服于西鲁伏移民的压力——这后一次移民运动可能不早于1600年。在多多马地区，夸德扎人一开始就受到三个方面的压力。最后，西鲁伏移民引进的戈戈语终于占了优势，但戈戈语词汇和戈戈人的历史传说证明，从赫赫人的地区向南以及从塔卡马向西，人口迅速增长，其总数甚至超过原有的夸德扎人。㉑1600年，这一过程刚才开始，夸德扎人仍是中坦桑尼亚历史上起作用的一个因素。

塔卡马移民之深入多多马地区，仅仅是塔卡马人自公元1000年开始广泛进入西坦桑尼亚的一个表现形式。11世纪以后，在这一扩张运动的最初阶段，原始的塔卡马人就已分成三个社会群。住在文贝雷河以东干燥高原上的塔卡马人，这时形成了文贝雷社会，他们讲的是塔卡马方言，这种方言后来演化成为近代的伊兰巴语和尼亚图鲁语。沿用古金布语的社会大致是在紧靠文贝雷河上游南岸一带形成的。而原始的尼扬韦齐－苏库马人则住在文贝雷地区的西北。㉒近代苏库马人居住地区比尼扬韦齐人居住地区方言更多，这说明，原始的尼扬韦齐－苏库马人的居住地是在苏库马地区。㉓尼扬韦齐－苏库马语中有不少词是从南库希特语借用来的，这说明原始的尼扬韦齐－苏库马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塔卡马语族与先前住在维多利亚湖南岸而今日尚未查明去向的南库希特人㉔混合的结果。至于南库希特人对原始的讲文贝雷语和金布语的居民有何影响，则目前掌握的证据很少，因而很可能文贝雷人和金布人曾经迁居到先前只有少数狩猎－采集者的地区。埃亚西湖畔的哈察人，看来像是这些早期社会中未被同化的最后幸存者。邻近的桑达维人好像也属于这一类，只不过他们是由于转入农业生活而未被同化。

---

⑲ 夸德扎（Kw'adza）是先前拼音 Qwadza 的更正。
⑳ C.埃雷特，1974年（b），第2章，第4部分。
㉑ P.里格比（P.Rigby），1969年，第2－3章。
㉒ D.努尔斯和D.W.菲利普森，前引著作，谈及塔卡马人三部分的分化（他们的“南湖”）。
㉓ D.努尔斯的私人信件，1974年7月。
㉔ 可能是尼安萨南库希特人；见C.埃雷特，1974年（b），第2章，第6部分。

1100－1600 年这段时间的局面，大体上是塔卡马人不断扩张又不断分化。起初，文贝雷人开始南北分化，这在后来促进了伊兰巴人和尼亚图鲁人社会的形成。但最重要的还是尼扬韦齐－苏库马人社会的扩张，到 1600 年，讲他们方言的人已经遍布于从维多利亚湖岸远至现在金布人居住的地区。或许早在 1600 年，金布移民也已开始向南方和西南方扩张到了他们现在所住的地区。在塔卡马人扩张晚期，还有一些塔卡马居民向东迁移，后与多多马区的班图居民结合。

山区：乞力马扎罗和肯尼亚

到 12 世纪，至少有一个或几个东裂谷南库希特人社会仍生活在马萨伊兰中部以北的乞力马扎罗山麓，可能还有一、两个东裂谷族群迁入泰塔山地。[29] 这些东裂谷社会的共同特征，看来就是依靠灌溉和施肥来从事谷物生产。这两种措施，在东非洲农业史上引起了重大的变革，即在高原上为发展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业和种植香蕉充作主食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些讲班图语的社会在同化南库希特人的过程中，成功地将班图人的农耕传统，加上种植印度尼西亚香蕉的方法，和库希特人的种植业结合起来。这种新的高原农业传统始于何时何地，现在还不清楚，但自 11 世纪以来，乞力马扎罗山区、肯尼亚山和帕雷山区的一些班图人社会已经掌握了它。高原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桑巴阿人 1500 年前后在乌桑巴拉山地开始定居。至于高原上的东裂谷人社会，可能早已掌握高原传统的一些谷物，但只是被不断扩展的高原班图人社会同化之后，才全面接受了那种农业方式。 490

12 世纪时，东裂谷族群被限制在高原地区，因为翁加莫人在乞力马扎罗山以北的卡普蒂埃平原大肆扩展，又向南绕过山区，甚至进到帕雷山地的边缘。[30] 翁加莫人的语言与肯尼亚山区的原始马萨伊人相似，而且在那时期相互通用。翁加莫语与马萨伊语同出一源，不仅说明他们饲养牲畜，还说明他们种植的作物中有高粱和龙爪稷。翁加莫人控制平原，把东裂谷人限制在山区，当时一些班图人小社会也直接对东裂谷人施加压力，于是他们就被困在山区了。

1100 年前后，原始查加人很可能已住在乞力马扎罗山东南麓，虽然他们原先的定居地也可能在帕雷山地北部一带。他们已经掌握一种充分发展的高原农业技术，特别注意于香蕉的种植。正是这里所表明的高原作业的强大生产能力，在以后 5 个世纪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促使查加人迅速扩展，并在扩展过程中同化了东裂谷人和翁加莫人社会。在查加人扩展初期，已经出现 4 个查加人社会群。

其中有 3 个社会群分布在乞力马扎罗山区：山南一带的西查加人，今莫希附近地方的中查加人，还有山区东边一带的罗姆博人。同时，早期的圭诺人出现在帕雷山地北部，有些证据表明那里原是东裂谷人的故土。到 1500 年前后，查加人的继续扩张，促使罗姆博－查加人分化为若干个独立的社会，分布在山区东边一带，同时，又有些西查加移民 491

[29] C.埃雷特（1974 年（b），第 2 章，第 4 部分，图表 4.6 和 4.7）把这些居民简称为“裂谷人”；但是，C.埃雷特指出他们的起源是在东裂谷（著作未注明年月）。

[30] C.埃雷特，1974 年（b），图表 8.2。

从乞力马扎罗山进入了梅鲁山附近的高原森林。16世纪时，仅只在乞力马扎罗山最西南方，东裂谷人社会还有其优势，因为可以看到那里西查加人的锡哈方言中有南库希特语的借用词汇。[27]在乞力马扎罗山东麓较低处，仍有许多翁加莫人，但他们显然不再对外界起任何作用了。

在1100－1600年期间，泰塔山区甚至比乞力马扎罗山区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历史上的关键问题——东裂谷人和班图人之间相互适应的问题——在那里尤为突出。在该山区，东裂谷人社会早于原始泰塔人而存在，并且一直是那里的重要居民成份，甚至基督纪元第二个一千年的最初几个世纪，原始的泰塔人分化为达维达人和萨加拉人两个社会时，情况还是如此。但是可以断定，在近几个世纪，东裂谷人最终还是被泰塔山区日益发展的班图人社会所同化。特别是在萨加拉人中，还有一个分化因素，即沿海一带和帕雷山区来自讲萨巴基语地区的班图移民的渗入。沿海一带移民势力在萨加拉人中影响很大，以致萨拉加语包含有许多萨巴基语词，更引人注目的是萨拉加语音的变化也深受萨巴基语音的影响，虽然这两种语言原来差别很大；相反，萨拉加语本与达维达语比较接近，却未受到后者的影响。然而，沿海移民因素只是在东裂谷人势力衰落时才开始影响到泰塔山区的，这大概不会早于16世纪。我们把该地区后来的社会及政治变迁，留待以后再谈，本卷暂不论述。

在萨巴基语族进入泰塔山区的迁移运动中，可能有一批移民定居于泰塔山北的乌坎巴尼地区，16世纪时形成为阿坎巴族，而在乌坎巴尼，南方来的移民就与原先住在肯尼亚山讲塔吉库语的班图人融合了。[28]1100年左右，塔吉库人的祖先已经在肯尼亚山南麓建立了一些小型的班图社会群；与当时的原始查加人社会一样，塔吉库人社会被夹在南库希特人（讲林亚加语）[29]和游牧特性较强的山外平原南尼罗特人之间。原始马萨伊人很可能是生活在肯尼亚山林区以西以北。1600年之前，马萨伊语族对塔吉库社会似乎还没有多少影响。

492 公元1100－1500年间，塔吉库人社会由于采伐森林和沿山南一带延伸而扩大了领土。同时，原始的塔吉库语言分化成为几种方言；在塔吉库人从肯尼亚山向南迁入乌坎巴尼中北部的过程中，这些方言逐步发展起来。

大约到了16世纪，塔吉库人中近代民族分化现象越加明显。以后几个世纪的扩张，主要是早已形成的两族进行的：一是基库尤人，他们原在肯尼亚山与尼安达鲁瓦山脉之间居住；纳鲁人，他们原在肯尼亚山以东，居住于塔吉库社会的另一端。这期间的萨巴基移民与乌坎巴尼的塔吉库社会经常有交往，从而形成一个都用塔吉库语的社会，但在文化的许多方面却不同于肯尼亚山的班图人，而是与泰塔山区或沿海的班图人相类似。例如阿坎巴人以弓箭代替长矛做常规武器，他们在社会、政治组织上并未采用按年龄分组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在肯尼亚山一带却是至关重要的。南库希特人社会仍分布在山脉东侧，其中几个可能与早期基库尤人相邻；一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群控制着尼安达

[27] D.努尔斯和D.W.菲利普森，前引著作。
[28] K.A.杰克逊（K.A.Jackson），1972年。
[29] C.埃雷特，1974年（a），第2章，第7部分。

鲁瓦山脉基库尤人住地以南一带林坡。关于乌坎巴尼地方班图之前的人，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资料，但其中至少有一小部分南尼罗特人，他们可能与肯尼亚东北干旱平原上的南尼罗特人有血缘关系，正因为如此，在东乌坎巴尼，基坎巴人的近代图伊方言中出现了少量南尼罗特语的语词。

从肯尼亚山到乞力马扎罗山一线以西，是辽阔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内陆地区，公元1100－1600年期间，这片地区一般说并未发生班图化的趋势。直到1500年之后，当地大部分地方仍然是南尼罗特人的社会占统治地位，特别是卡伦津人和达多格人居住的地区。1000年前后，原始的卡伦津人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基托基地方的南尼罗特人，已经控制了从埃尔贡山南麓向东穿过乌阿欣吉苏平原的一大片疆土。其后二、三百年中，卡伦津人越过乌阿欣吉苏高原，向东又向东南扩展，进入肯尼亚中部和南部的大裂谷地区。以后几世纪，卡伦津人继续扩张，这加速了方言的分化，在卡伦津人居住地区的各个部分开始出现了民族差别。

埃尔贡山东南一带，早期埃尔贡山区的卡伦津社会由于与埃尔贡山东南的班图人融合，渐渐脱离了一般卡伦津人的生活习俗。例如，在维多利亚湖东北的班图人中，地方氏族制度就取代了定期按年龄分组的制度，而对于埃尔贡山区的卡伦津社会来说，按年龄分组的制度原是基本的组织原则。同样，埃尔贡山区的卡伦津人也开始转向以种植香蕉为基础的农业，有此条件，他们便开始在埃尔贡山森林坡地扩展。 **493**

公元1500年前后，埃尔贡山以东的正宗波科特人逐渐受北邻伊通加人的文化统治；同时，原始南迪安人社会已经在乌阿欣吉苏高原西边（即波科特人以南）形成。就在南迪安人发展初期，他们就已经同高原南库希特人融合，南库希特人对他们的卡伦津后代继承者所作贡献之一，可能是在讲南迪安语的克尤人和马拉奎特人中间推行农业灌溉，这两族人今天住在埃尔盖约悬崖一带。公元1500年之后，南迪安人的扩张转而向南，他们进入了尼扬多河附近的森林和平原。很可能就是在这些南迪安居民的发展中，出现了晚些时候的南迪人和基普西吉人社会的一部分。

但是，这时期最迅猛而又广泛的民族扩张还是南卡伦津人发动的。最早的南卡伦津社会，出现于卡伦津人早期扩张的最南端。从肯尼亚中南部出发，他们迅速地向南扩张，先是沿着平原直指裂谷陡坡，后来又穿过马萨伊草原抵达孔多阿高地的东部。不晚于1500年，南卡伦津移民已经在西鲁伏班图人南方边境一带定居了。在马萨伊兰的中部和北部，一度居统治地位的达多格人也不能不屈服于卡伦津人的扩张势力。在南马萨伊，夸德扎人或是被南卡伦津人同化，或是被逐出境。坦桑尼亚北部的裂谷悬崖仍然是防止南卡伦津人扩张的一道屏障，达多格人仍然控制着洛伊塔山和恩戈罗恩戈罗高地；现在还不清楚，他们曾否进入西边的塞伦盖蒂平原和马拉平原。17世纪之前，达多格人在这些地区的势力就已开始衰败；后来，达多格人并不是被卡伦津人压倒，而是遭到马萨伊人的入侵。

在孔多阿和姆布鲁两处高地，西裂谷的南库希特人，连同原始伊兰吉人组成的班图社会，并未受到南卡伦津人在他们东边扩张的影响。公元1100－1600年期间，这个地区各族人民的历史，我们所知甚少，仅仅只了解一点西裂谷库希特人——伊拉库族的历史。

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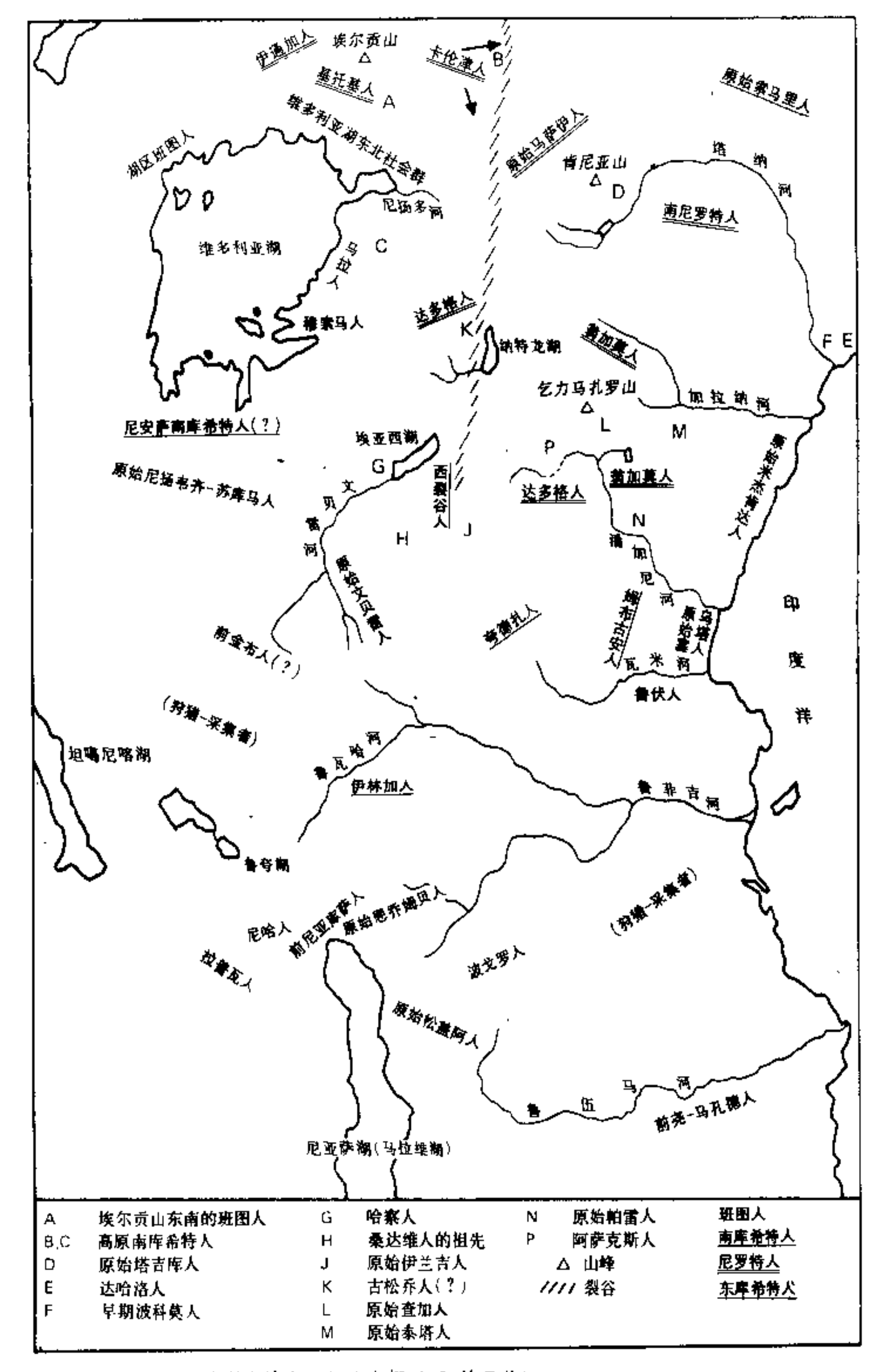


图19.1　12世纪东非洲内地各民族分布概况(C.埃雷特)

3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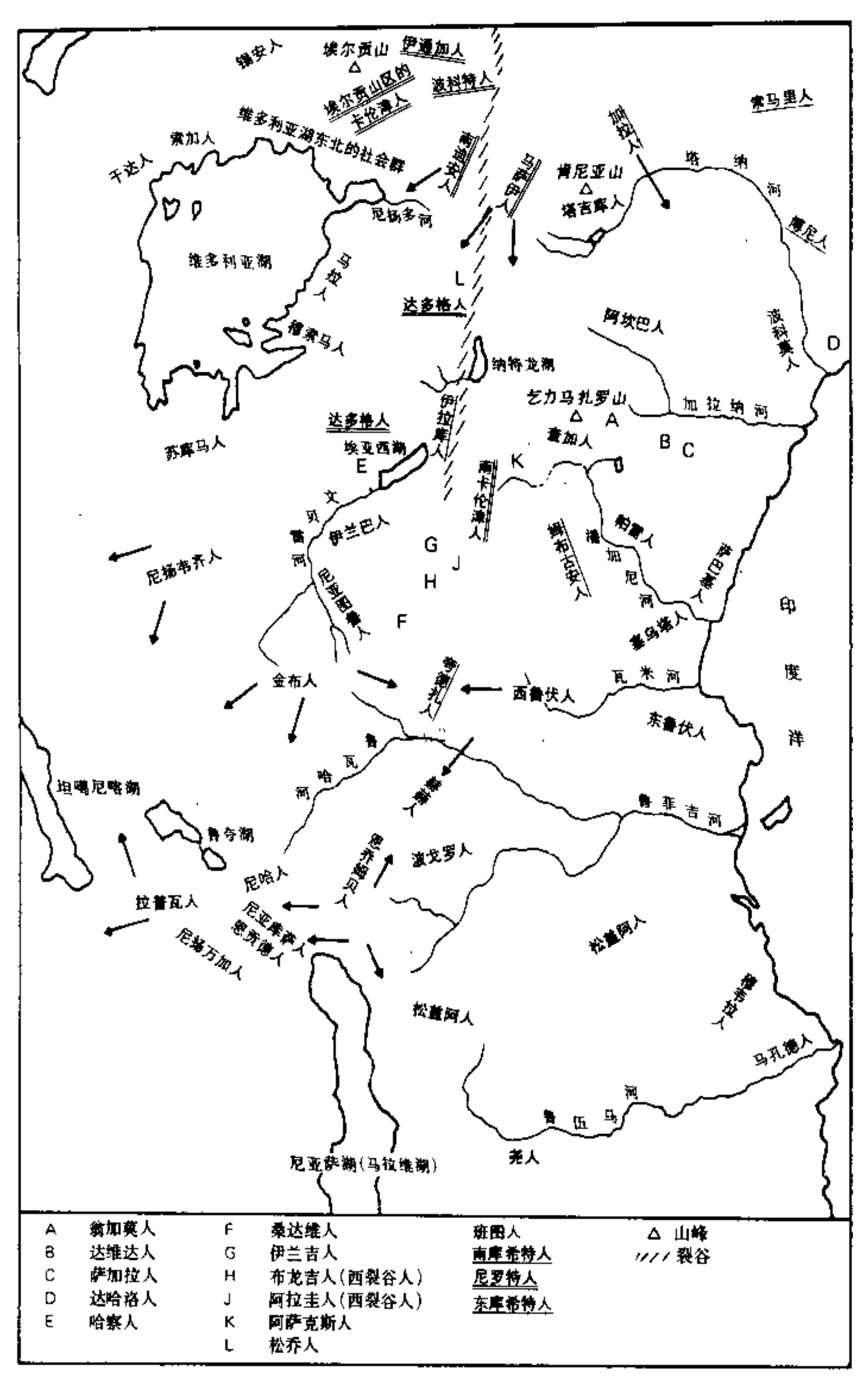


图19.2 16世纪东非洲内地各民族分布概况(C·埃雷特)

松乔人的语言中有伊拉库人的语词，这表明伊拉库人曾经沿着裂谷悬崖，向北渗入了达多格人与南卡伦津人之间的震裂地带。[30]至于讲班图语的松乔人，他们主要是农耕者，占有一小片便于灌溉的土地，周围全是游牧为生的达多格人和南卡伦津人，自成一体而处于优越的地位。可以设想，伊拉库人如何沿裂谷边缘前进，力求取得同样的成功，求得

494 同样的生活环境。根据松乔人的传说，在公元1600年之前，他们大概是定居在洛伊塔高原下的裂谷边缘一带。[31]至于独成一体的伊拉库人社会，很可能是松乔人的南邻，住在近代松乔人定居的纳特龙湖区或是举世闻名的恩加鲁卡考古遗址附近。

在卡伦津人疆土的另一端，即巴体戈和莱基皮亚高原，原始的马萨伊人在这时期已分成为三个自成一体的社会：桑布鲁人，蒂亚穆斯人和马萨伊人。最后一个，即马萨伊人，位于最南边，他们早在16世纪即已开始沿肯尼亚中部的裂谷进入先前卡伦津人的疆土。公元1600年，他们很可能是沿裂谷一线向南扩展到坦桑尼亚北部边境，从而开始对更南方的各族——达多格人和南卡伦津人的统治构成威胁。

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

把事物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看，人口的迁移流动始终是整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内地历史变迁的推动力。诚然，公元1100－1600年期间的移民可能并没有进入荒芜人烟的不毛之地，因此他们所参与的乃是各个社会不断矛盾、冲突的历史，也是导致各族人民在形成新的社会政治群体过程中不断交流思想观念的历史。讲班图语的地域之所以能迅速扩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些早期班图居民对农业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强。在坦桑尼亚中部和西部的许多地方，班图移民自动改变了生活习惯，原来以块根植物为主食，这时则改为邻族库希特人和尼罗特人惯食的小米和高粱，正因为如此，他们能扎下根来，并逐渐同化当地原有的居民。在东非洲北部的几个高原地区，班图人适应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农业——高原农业，这是促使他们实行扩张的根本原因。

在开拓过去由只靠采集食物为生的社会所占有的新地区过程中，班图人的农业适应能力起了很大的作用。西坦桑尼亚的某些地方，譬如文贝雷河东岸，农业生活方式之所以能固定下来，全靠公元1100－1600年期间塔卡马人在那里定居和从事谷物种植。至于北方，高原农耕传统使先前为狩猎－采集者占有的森林地带得到了利用；在乞力马扎罗山区，早期查加人的扩张，与其说是直接夺取农业先辈的土地，还不如说是大量砍伐森林，逼近或压服邻族，然后逐渐把他们同化。

497 在此文化大变动和部族大变迁的时期，东非洲内陆各族人民之间必然出现某种有限度的商品交换经济；然而，只有一个地区能够同时提供多种剩余产品来促进正规市场的形成，这就是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一带。这一地区，既有密集的高原农耕者，又有众多的牧牛民，而这些农耕者和牧民们还与狩猎－采集者的群体同时并存。[32]牧民提供了

---

[30] 同上，第2章，第4部分。

[31] A.雅各布斯（A. Jacobs），私人信件，1976年9月。

[32] 市场贸易的恢复，是有当地市场的传统观念做基础的；原始的塔吉库族和早期（即或不是原始的）查加族都有这方面的名词，至今仍然存在。

剩余的皮革，加工后成了皮服，这都是高原农民所迫切需要的；另一方面，高原居民拥有木材，可以制成大木具(蜂箱、水盆等)，还有植物做成的瓢、葫芦，这些产品又是平原地区社会十分看重的。每年青黄不接或粮食短缺时，高原居民能够提供剩余的粮食，换取近处平原居民的牲畜。那些狩猎-采集者，有时也可以提供生活所需的产品，如皮革、蜂蜜等。

金属矿藏的分布不均是另一个原因。直到16世纪，帕雷山区北部的圭诺人一直作为铁和铁器的提供者全面投入高原和平原之间的贸易体制。[13] 塔吉库人在肯尼亚山周围一带也居于同样的地位。至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内地其他大部分地区，直到1600年以后，市场贸易才成为经济生活中的惯常现象；但是，这并不是由于当地的因素，而是受到了外界的影响。

[13] I.N. 基曼博 (I.N. Kimambo)，1969年。

20 大湖地区

B. A. 奥戈特

498 历史学家如果试图再现公元1200－1500年东非洲湖泊地区的历史，就会遇到几大难题。首先，有关这300年历史，我们既缺乏足够的口头传说和语言方面的资料，也没有掌握充足的考古资料。举例而言，口头传说大都讲述富有传奇色彩的祖先形象，他们被奉为大神、全民之父、氏族的始祖，或是粮食作物（如香蕉或谷子）和牲畜的传入者。人们把他们的功绩编成故事在人民口中流传，但很难断定它们的历史真实性。因此，C. 里格利等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像奇伟齐（Chwezi）这类神话故事对早期湖区的历史并没有提供什么可靠资料就不足为怪了。假如同意神话故事中提到的和受顶礼膜拜的奇伟齐神灵是15世纪湖区某王国实有其人的国王，那就如同相信欧丁（Odin）和弗莱雅（Freya）是古瑞典王一样，尽管英格林加传说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①]

其次，历史学家对该地区的研究还面临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对那里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关系存有看法上的偏见。许多史书和史学文章都把牧民说成是走向文明化的征服者、他们在原来是一片混乱的地方建立起了法律和秩序。而另一方面，农民则被描写成为安分守己和沉默不语的多数，他们既没有推动社会发展，也没有建立国家。这一偏见在卢旺达表现得最为典型，例如，A. 卡加梅就认为很难相信卢旺达这国家在制度上曾从农民那里得到过什么借鉴。他也不愿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胡图人”曾经统治过高贵的、“讲含米特语的”牧民。[②]我们在本章中要着重阐明的是，该地区农民形成国家要早于大多数牧民。499 我们还想指出，在15世纪大国形成之前，那里的农民和牧民曾长期和睦相处，而该国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阶级和等级制度的出现。在这方面，有必要着重强调，“农民”和“牧民”这两个词的概念，不属于民族范畴，而是属于职业范畴。湖区的各种传说都表明，牧民一旦丧失了牲口而又无力挽回损失，他们就会转化为农耕者；而农民一旦获得了牲口，他们也会变为牧畜者。[③]职业上的这种变化在该地区是常有之事，有的是个人，有的甚至是整个部族群体。

历史学家研究当时该地区的历史时所遇到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年代。近20年来，有几位学者将各种传说中所提到的世代更替原则、相互关系材料和日月食情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班图人和尼罗特人的年代作了大量考证。但是仔细阅读了这些浩瀚书

① C. 里格利（C. Wrigley），1958和1973年。
② A. 卡加梅（A. Kagame），1955年，第112页。
③ 见S. R. 卡鲁吉（S. R. Karugire），1971年。

卷之后就会发现，这些书无论是对个别国家还是对整个湖区总体年代的确定，看法都远非一致。例如，D. P. 赫尼奇最近就对布尼奥罗的比托家谱的可靠性表示怀疑。[④]在卢旺达也是如此，那里的年代问题至关重要。A. 卡加梅认定该国是在公元 10 世纪建立的，并列出了一份从 959 年起的王室家谱。[⑤]而 J. 范西纳则坚决认为 A. 卡加梅提供的名表中的前 7 人，除吉汉加可能是例外，其余都不是真正的历史人物。按照 J.范西纳的意见，卢旺达这国家建立于 15 世纪后期。[⑥]

但即使我们能够解决个别几个国家的年代顺序，我们仍还需要将卢旺达、吉萨卡、布尼奥罗、基齐巴、姆波罗罗、布干达、布索加、恩科勒、卡拉圭、伊汉吉罗、基亚穆特瓦拉、布津扎和苏库马这些国家的年代顺序纳入本时期的基本年代框架之中才行，而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历史学家研究该地区的工作所遇到的最后一个难题是，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大部分史料都是以宫廷为中心的。它们都是以宫廷传说为基础来探讨湖区具有中央权力机构的国家的起源与发展。举例而言，对卢旺达，A. 帕热斯、德－拉克热和 A. 卡加梅的著作都是主要以宫廷传说为基础。类似这样的一些史料自然有局限性，特别是有关王室以外的社会情况几乎完全是空白。

在列举了这几个难题之后，我们现在再转而来阐述这一地区的历史。为便于叙述历史，本文将分四个题目加以探讨，即：基塔拉氏族群、金图氏族群、鲁欣达氏族群和卢旺达氏族群。使用“氏族群”这词是为了强调该地区的多民族性和构成该地区历史的多种文化传统的融合。但这四个氏族群又同时互相联系从而结成了该地区总的历史。 **500**

基塔拉氏族群

卡罗尔·布坎南博士最近已经对地处当今布尼奥罗和托罗大部分地区以及邻近的恩科勒、穆本德和布干达部分地区的基塔拉氏族群的历史进行研究。[⑦]这可能是湖区最古老的国家制度，其历史通常以三个部族群体——巴滕布齐人、巴奇韦齐人和比比托人的入侵划分。我们要指出的是，对历史作这样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基塔拉氏族群的历史分成三大时期，但对讲班图语的人则只字未提，而班图语却是该地区主要的语言。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断定多数班图人很少注意历史，也从未参与其事？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主要应记住大多数讲班图语的人的到来要早于那三个部族群体。布坎南博士曾假设公元 722－1200 年这一段时间是有案可查的最早移民移居到基塔拉氏族群来的时间。最初在这地区定居的几个氏族可能原来是中苏丹人，因此是来自北方或西北方。[⑧]学术界对中苏丹人的早期历史并无统一看法，但语言上的根据可以说明中苏丹

---

④ D. P. 赫尼奇(D. P. Henige)，1974 年。

⑤ A. 卡加梅，1959 年。家谱的顺序是：吉汉加一世(959－992 年在位)、加希玛一世(992－1025 年在位)、穆辛迪(1025－1058 年在位)、鲁梅萨(1058－1091 年在位)、尼扬努梅(1091－1124 年在位)、鲁克伊(1124－1157 年在位)、鲁班达(1157－1180 年在位)。

⑥ J. 范西纳(J. Vansina)，1960 年。

⑦ C. A. 布坎南(C. A. Buchanan)，1974 年。

⑧ C. 埃雷特(C. Ehret)，1974 年(c)，第 8 页。

人来这里的时间很可能早于最初的讲班图语的人。如果事实确是如此，这无异是说，根据考古资料，他们早在公元4世纪之前就已来到这个地区。[9]最初的讲班图语的氏族可能来自蒙博托湖(艾伯特湖)以西地区，并分散居住在尼罗河以南各地。根据他们本身的传说，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种植龙爪稷和高粱，虽然有一部分人也饲养牲畜。卡罗尔·布坎南认为，这些早期班图移民来到湖区的时间是在公元10和11世纪，其根据是，在基比罗出土的最古老的文物(大约为10世纪)中没有发现足以证实讲班图语的人确已存在的那种底部微凹的陶器。[10]

501 这些讲班图语的氏族后来有一部分形成了若干个小农业国，卡罗尔·布坎南博士将这归入基塔拉历史中的巴滕布齐时期，并暂定为从公元900年到1300年。[11]如果她是正确的，那么前面所提到的关于讲班图语的人在该地区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就有了答案。这个答案是，至少在巴滕布齐时期，我们所涉及的不是入侵者，即所谓的外来牧民，而是该地区最早的讲班图语的部族群体。

卡罗尔·布坎南的研究工作是第一次对巴奇韦齐之前时期作认真的考察。迄今为止，许多历史学家和其他一些学者一直把巴滕布齐时期称为"神的时期"，因此认为与其将巴滕布齐时期看成历史，还不如归作神话。根据基尼奥罗人的传说，该时期共有19位阿巴卡马－阿巴滕布齐(*Abakama Abatembuzi*)或称"开国国王"；[12]但恩科勒人的传说中只记载了4位，也没有统一的称号。其中有几位国王(如汉吉、卡佐巴和尼亚穆罕加)都是巴奇韦齐人所顶礼膜拜的神灵祖先。

卡罗尔·布坎南之所以能透过笼罩着巴滕布齐时期的迷雾看清问题实质，只是因为她不过于相信宫廷传说，而注重于氏族的历史。她查明的最早的一个政治实体是布干盖齐酋长国，那是由巴加布氏族建立的。在传说中，他们被说成是巴滕布齐氏族，创始者是汉吉。巴亚加(原称巴塞赫)是另一个前巴奇韦齐氏族，他们大概是在同一时期从塞姆利基河流域来到这里。据他们本身的传说说，是他们把牛(可能不是长角牛)带到这地区来的，还说到他们曾在蒙博托湖畔的基博罗开辟盐场制盐。另外还有一个巴西塔氏族，他们的优势似乎是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一个氏族是湖区氏族中最大的一个。这族人被认为与西塔(布吉苏一个氏族的创建者)有关，而且也和布干达和布索加的阿本代加(绵羊)氏族、巴孔乔的巴斯瓦加氏族以及基巴莱的比亚巴西塔氏族有血缘关系；他们在恩科勒、基齐巴和布哈亚诸国的传说中占有重要位置，说他们先于巴欣达人建立了一种早期的头人制。根据他们本身的传说，他们之所以能强大，并且分布很广，应归功于他们会制造铁器。在姆文加、布吉苏(位于乌干达)以及在坦桑尼亚西北部和肯尼亚西部出现的"姆巴莱"或"卡巴莱"这些地名在许多传说中都与巴西塔氏族的居住地有联系。

---

[9] C. 埃雷特，1967年，第3页；J. E. G. 萨顿(J. E. G. Sutton)，1972年，第11页和第23页。

[10] S. 皮尔斯(S. Pearce)和M. 波斯南斯基(M. Posnansky)，1963年；S. 查普曼(S. Chapman)，1967年；J. 希尔诺(J. Hiernaux)和E. 马克特(E. Maquet)，1968年，第43页。

[11] 也可参阅J. 尼亚卡图拉(J. Nyakatura)，1947年。他所列的家谱将869－896年作为巴滕布齐王朝第一位"开国国王"在位时期，将1301－1328年作为伊萨扎，即最后一代的在位时期。

[12] 同上，第6－65页。

大约到 1250 年，在鲁文佐里山脉以东已经出现了若干个讲班图语的小酋长国，它们要不是布干盖齐酋长国的巴滕布齐分支，那就是它的翻版。例如，按 F. X.鲁穆基拉的看法，基齐巴国的第一位国王 1236 至 1263 年期间在世。[13]但与此同时，另外还有几个讲 502 班图语的社会也形成了诸如世系和氏族之类较小的政治实体。

巴兰齐氏族的历史把巴滕布齐王朝与基塔拉氏族群的下一个王朝——巴奇韦齐王朝连接了起来。根据基尼奥罗人的传说，该氏族的创建者布库鲁是个平民，曾在巴滕布齐王朝最后一位"开国国王"伊萨扎(大约 1301 - 1328 年在位)的朝廷中担任官职。他被说成是伊萨扎的继位者，但他同时又被说成是巴奇韦齐时期的杰出统治者恩达胡拉(大约 1344 - 1371 年在位)的祖父。该氏族以蚱蜢和香猫为图腾，他们可能是从布松戈拉地区来到西部的。正如后文即将提到的，这两种图腾在布干达和布索加的历史上十分重要，既是作为金图氏族群之前各部族群体的名字，也是作为巴奇韦齐时期之前各部族群体的名字，这些部族群体都是由西向东越过草地来到维多利亚湖畔。

如上所说，布库鲁原是一个农民，他在开国国王和巴奇韦齐王朝之间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根据布尼奥罗人和恩科勒人的传说，恩达胡拉的养父是一个陶工，出身于巴科皮氏族。[14]因此恩达胡拉又名卡鲁本比(来源于"穆本比"，*mubumbi* 一词，也就是陶工)。或许这些传说的目的都是要使布库鲁由一介平民一跃而为一位杰出人物的这种地位合法化。但是，这类传说在该地区广为流传，因此对它们应作这样的理解，即湖区各具有中央权力机构的国家的产生与发展不能归功于外来的牧民贵族。内在因素，包括土著人的主动性，很可以成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基础。

有几个酋长，由于他们不愿受平民的统治，便起来反抗布库鲁接替伊萨扎的王位。布库鲁平息了叛乱，但是不满情绪到处都有，所以使恩达胡拉得以乘机夺取王位，并建立了巴奇韦齐王朝。根据布尼奥罗人和恩科勒人的传说，这王朝有两位统治者(恩达胡拉与瓦马拉)和一位摄政，名叫穆林德瓦，后者在他的兄长恩达胡拉出征时替代他执政。尽管史学界对该王朝统治者的名字没有异议，尽管有关该王朝的书籍已经出了不少，但史学家对这类书籍的准确性则意见不一。G. W. B. 亨廷福德认为，巴奇韦齐人可能属于"含米特"语系，与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希达莫人有血缘关系。[15]罗兰·奥利弗断言，巴奇韦齐人在历史上确有其事，"总的说来，奇瓦的干达王国有可能就是奇伟齐的那个干达王国，比托人所征服的已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它受奇伟齐氏族国王统治下的希马牧民控制"。[16]更早些时候 J. P.克拉佐拉拉就曾大声疾呼说，巴奇韦齐人和巴希马人是同一个民族，他们都是卢奥人。[17] M. 波斯南斯基根据考古学的证据，同意历史上确有以 503

---

[13] F. X. 鲁穆基拉(F. X. Lwamgira)，1949 年，第 65 页。

[14] J. 尼亚卡图拉，出处同上；A. G. 卡塔特(A. G. Katate)和L. 卡穆昆古努(L. Kamugungunu)，1967 年版。

[15] G. W. B. 亨廷福德(G. W. B. Huntingford)，1963 年，第 86 页。

[16] R. 奥利弗(R. Oliver)，见 R. 奥利弗和 G. 马修(G. Mathew)(编)，1963 - 1976 年，第一卷，第181 - 182 页。

[17] J. P. 克拉佐拉拉(J. P. Crazzolara)，1950 - 1954 年，第 2 卷，第 94 - 97 页和 102 - 103 页。我在本章使用正确的拼法 Luo，而不是旧的欧洲写法 Lwoo。

饲养牲畜为生的巴奇韦齐人，并认为他们与比戈堡文化有联系，至于比戈堡文化的时间他定为公元 1350 - 1500 年。他确实走超前了，以致将戈比堡看作是曾于 1350 - 1500 年统治过西布干达的一个牧民王国的国都。[19]

虽然上述学者都同意巴奇韦齐王朝在历史上的真实性，但 C. 里格利却独自一人坚持认为，他们是根本不存在的，至多不过是“人所众知的一座万神殿，那里一个个都是有名有姓而又各具特点的天神，但又将他们想象成为一个形象鲜明的人间大家族，其中大多数还与自然界的各种重要特征和力量联系在一起”。[20] 在本章中，我们接受了巴奇韦齐人具有历史真实性的观点。因此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 1350 - 1500 年期间基塔拉氏族群中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我们把这些事件视作东非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东非神话的另一个内容。

关于基塔拉氏族群的这些重大发展，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有那么一些历史学家，他们和罗兰·奥利弗一样认为，巴奇韦齐帝国是在巴希马牧民入侵后建立的。然而，他们对巴希马人究竟来自何处的问题则意见不一。过去的观点认为他们来自东北方，也许是来自南埃塞俄比亚。最近持这种观点的某些学者转而认为巴希马人可能来自南方。克里斯·埃雷特在讨论湖区南库希特人的文化影响时就曾发表过如下意见：

> 南库希特人是起重要作用的牧民，他们后来在湖区南半部的继续存在产生了令人感兴趣的这种可能性：后来图西人和希马人的牧业(在湖区南半部意义十分重大)根源于南库希特文化，因此它由来于东方而不是北方。[21]

按持此观点的学者设想，巴希马人进入该地区的时间大概是在 13 世纪至 14 世纪初。经过了一段不稳定的时期，他们和他们在最早到此定居者之中的盟友一起逐渐取得了高于农民之上的贵族身份，并于 14 世纪建立了他们的结构松散的国家。

另一派的观点正在迅速得到广泛支持，他们认为巴奇韦齐人之所以成为当地的统治者是因为湖区发生了经济和人口的变化。无庸置疑，基塔拉帝国是由恩达胡拉(大约 1344 - 1371 年在位)缔造的，他是一位杰出的武士国王，他扩大了小小的布干盖齐酋长国的版图，将布尼奥罗、西布干达、托罗、北基盖齐、塞塞群岛、恩科勒、基齐巴、卡拉圭、卢旺达东北部和西肯尼亚的一部分都包括了进去。他军事力量不足，也缺乏行政官员和快速联络的手段，所以无法在这片辽阔的领土上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因此，他只能尽量地依赖由他派往各地的钦差。这一组织松散的帝国似乎以盐、牲畜和铁器作为它的经济支柱。

恩达胡拉国王经常率兵出征，在入侵布科巴的伊汉吉罗时，他被敌方俘获，原因在于他的部队见到日食而惊恐万状。获释后，他不愿以一个蒙受耻辱的国王返回他的国都姆文盖，便移居西部。传说再没有提到过他以后的命运。

---

[19] M. 波斯南斯基，1966 年，第 4 - 5 页。
[20] C. 里格利，1973 年，第 226 页。
[21] C. 埃雷特，1974 年(c)，第 11 页。

他的儿子瓦马拉(大约 1371 - 1398 年在位)继承了王位，为了安全起见，将国都从姆文盖迁到了布韦拉。在瓦马拉的统治之下，局势甚至比他父亲统治时期还要动荡，原因主要是有若干部族群体由外边迁居到这里来。其中有乔 - 奥马人(或巴希马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阿戈罗山区；有一些讲班图语的氏族来自于东边，他们与金图氏族群有关系(见本章原文第 518 - 524 页)；从南方来的入侵者很可能是巴尚博氏族的先驱；卢奥人则是从尼罗河以北开始进入基塔拉的。乔 - 奥马人究竟是卢奥人还是巴希马人，至今尚无定论，虽然 J. B. 韦伯斯特和他的小组最近在马凯雷雷的调查研究所得结论有利于后一种看法。[21]尽管可能是如此，但有一点需加以强调，按照本章所勾画出的历史轮廓，巴奇韦齐人既不是巴希马人也不是卢奥人，他们是 14 至 15 世纪出现于西乌干达的班图人贵族。由于巴希马牧民(不论他们只是来自北方还是来自北方和南方)和卢奥人于巴奇韦齐王朝最后这位国王的统治时期来到这里，这个结构松散的帝国就成了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国家了。政治统一的问题所引起的内部紧张不断加剧，问题得不到解决，最后导致了该帝国的彻底崩溃。

国王瓦马拉对外来移民采取委以重任的做法以期得到他们的支持。例如，巴尚博氏族的米拉米拉和巴利萨氏族的鲁戈和基尼奥伊被任命为马西奥罗湖周围一些地区的钦差，这些地区也就是后来的基塔文达、布津巴和布赫韦佐。穆希马族人鲁欣达掌管王家畜群；巴西塔氏族的诺诺担任卡拉圭地方的副长官；卢奥族人卡戈罗为军事指挥官；瓦马拉国王与坎图结拜兄弟，因为他是来自东边的各个讲班图语氏族的首领。但是，所有这些建议都被说成是外来移民社会对国王的妥协，因为他们很快就成为势力超过国王的臣民。

随后发生了大饥荒，接着又是蔓延全国的牲口瘟疫。不满情绪日益扩大。国王瓦马拉的军事指挥官卡戈罗乘机发动反巴奇韦齐王朝的政变。巴奇韦齐人惨遭屠杀，尸体被投入水中。巴奇韦齐贵族统治(无论怎么说都不能算是规模宏大的)就这样被消灭了，或者，像传说中所说，“消失了”。这次政变标志了巴奇韦齐帝国的告终。取而代之的是两组国家：包括布尼奥罗 - 基塔拉、基塔文达和基齐巴在内的卢奥 - 巴比托人诸国；以及更往南包括卡拉圭、恩科勒、基亚穆特瓦拉、伊汉吉罗，也可能还有吉萨卡在内的巴欣达(巴希马)人诸国(见插图 20.2)。 **505**

巴奇韦齐帝国的崩溃导致了卢奥人和巴希马人(巴比托人和巴欣达人)在这地区争夺政治控制权的剧烈斗争；这些后继国家此后 3 个世纪的历史必须与这一争夺政治霸权的斗争结合起来进行观察。

在开始叙述后继的卢奥人诸国时，有必要强调一下本章所持的观点，即西乌干达历史的发展决不能单纯以征服论的说法来解释。根据这种说法，一批批涌来此地的牧民征服者都是文明的传播者。[22]如上所述，卢奥人是在瓦马拉统治时期开始来到基塔拉的。但在这之前，讲卢奥语的一些人就已经离开他们的出生地(或许是南苏丹)了。北部的卢奥

[21] 见 J. B. 韦伯斯特(J. B. Webster)，1978 年。

[22] 见 R. 奥利弗和 G.马修，前引著作，第 180 页；B. A. 奥戈特(B. A. Ogot)，1967 年，第 1 卷，第 46 - 47 页；M. 波斯南斯基，前引著作，第 5 页。

5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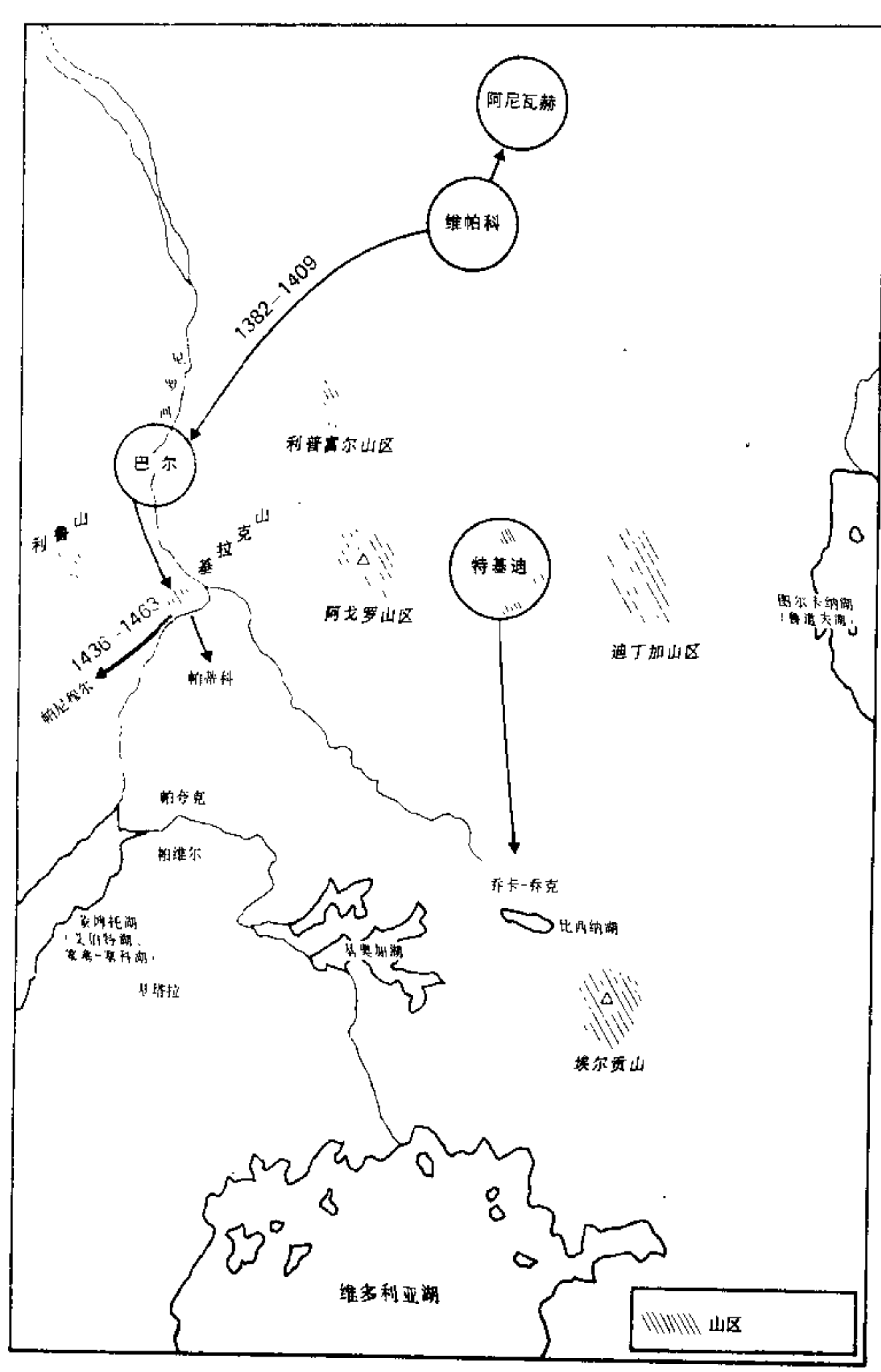


图20.1 卢奥人的早期移民(B. A. 奥戈特)

5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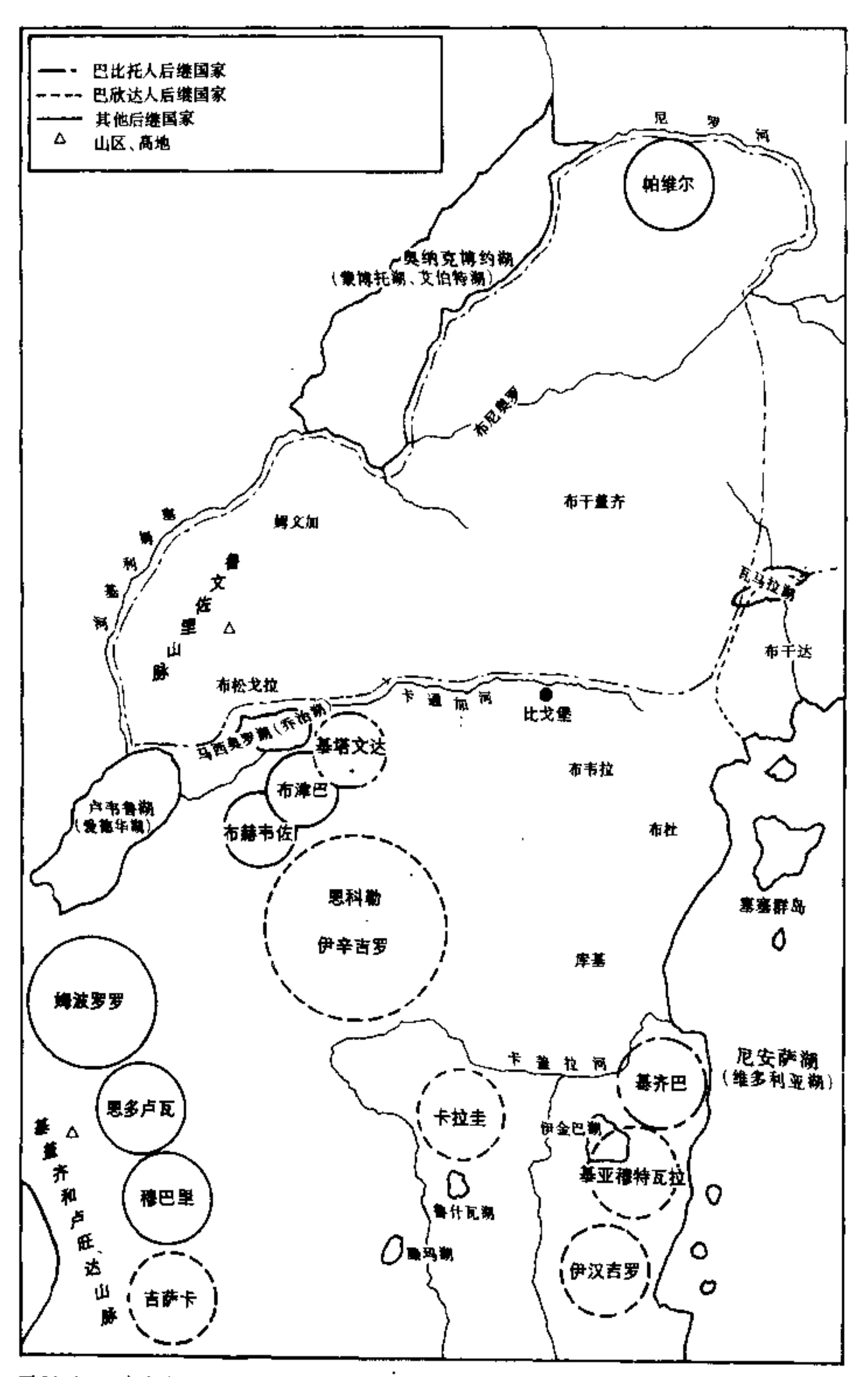


图20.2 巴奇韦齐帝国与移民（B·A·奥戈特）

人显然仍留在基塔拉地区，而中部和南部的卢奥人则向南迁移进入了阿戈罗山区。对卢奥语各种方言的同源语言演变史的研究表明，它们的分化是在 870 年(±200)，也就是在 670 至 1070 年间。[23]

口头传说谈到，讲卢奥语的人在 13 和 14 世纪仍继续不断向外扩散(见插图 20.1)。这几个时间从语言学的根据得到证实，语言学表明，中部的原始卢奥人和南部的原始卢奥人是大约 1170 - 1470 年分开的。[24]到 14 世纪末，已经有 4 个卢奥人社会：一个在阿戈罗山区附近；另一个在靠近蒙博托湖北端的尼罗河，即帕夸克三角地带；第三个占有尼穆勒和尚贝之间的地区(巴尔)；第四个是乔卡 - 乔克人的祖先，他们居住在阿戈罗山以南的某个地方。[25]

根据卢奥人的传说，他们在阿戈罗山区遇到了若干个非卢奥人的部族群体。落脚之 **507** 后，他们遇到了穆鲁人，随之就在穆鲁人中间定居下来，并与他们大量通婚。乔卡 - 乔克人和帕维尔 - 帕夸克人就是从这些混血居民中产生出来，后来又离开那里，分散到各处。留在阿戈罗山区的讲卢奥语的人后来约于 1320 - 1360 年与乔 - 奥马(巴希马)人汇合。这时讲卢奥语的人从事狩猎兼搞农业，他们看来已从巴希马牧民那里学会了畜牧。之后该地区牲口发生了瘟疫，大批巴希马牧民被迫迁移。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他们于瓦马拉国王在位时越过尼罗河进入了巴奇韦齐帝国。留下来的一部分牧民被讲卢奥语的人同化，后者在他们自己的国王奥韦尼一世(1409 - 1436 年在位)的领导下建立了最早的卢奥人国家之一，即特基迪国。[26]根据卢奥人的传说，奥韦尼一世娶了一个穆希马姑娘尼亚特沃罗为妻，生有一子，名叫鲁基迪。后来，鲁基迪王子突然脱离他的父亲，与他的随从一起迁居到帕夸克去。卡戈罗政变之后，他应先期来到基塔拉的卢奥移民的请求担任了那里的政权领导者。他和他的部下随之就成了所谓的巴比托人，他所创建的基塔拉巴比托新王朝(约自 1436 至 1463 年)将在后文叙述。仅就现在所掌握的有关特基迪国生活的这些资料，我们实难推断出哪个是卢奥人和哪个是穆希马人，主要是因为这两者的后代几乎全都是混血的。这或许就是 J. P. 克拉佐拉拉和其他一些学者都把讲卢奥语的巴希马人说成是卢奥人的原因。

再往北，在巴尔，子卢奥人与马迪人之间也有类似的民族融合。诸如帕蒂科、尼穆尔、帕迪贝、阿蒂亚克(克旺)、科克和帕加亚这几个高贵氏族在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后相继崛起，并在该地区北部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举例而言，我们知道帕蒂科人在拉邦戈的率领下自帕里 - 巴尔迁移到尼罗河的帕夸克三角地带。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与另一个叫做阿尼瓦吉(阿尼瓦赫)的氏族一起，跟随着鲁基迪进入基塔拉。我们还知道巴克旺加人(大多数原都是中苏丹人)、巴克瓦人和巴加亚人(这两氏族原是北卢奥人)向南迁徙进入了基塔拉帝国。C. A. 布坎南强调说，这一些人的迁徙至少要比鲁基迪早出一代人的时间。[27]因此，关于卢奥军队进军基塔拉帝国的设想由于缺乏事实根据面应予否定。有

[23] B. 布朗特(B. Blount)和 R. T. 柯利(R. T. Curley)，1970 年。当然我知道许多语言学家不再相信同源语言演变史学。

[24] 同上。

[25] B. A. 奥戈特，前引著作。15 世纪末肯尼亚西部就已经有乔卡 - 乔克人。

[26] C. A. 布坎南，前引著作，第 181 页。

[27] 同上。

一些小的部族群体继续向四处扩散，向北的进入苏丹，向西的进入扎伊尔，向东的进入埃塞俄比亚，向南的进入基塔拉、布索加、布克迪和西肯尼亚。

根据布尼奥罗、基齐巴、恩科勒和卡拉圭的传说，显然，巴比托人和巴欣达人认为推翻瓦马拉政权要比控制这帝国容易得多。于是，新统治者编造神话，大肆宣传巴奇韦齐已经消失。他们还声称自己与巴奇韦齐人有血缘关系，企图以此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遗憾的是，这些宣传因为没能打动他们臣民的心而未奏效。由巴奇韦齐王朝任命的地方长官则热衷于控制自己的地盘。如巴里萨人高贵氏族在布津巴和布赫韦佐建立起了自己独立的酋长国。[28]在帕维尔也是这样，卢奥人高贵氏族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独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布尼奥罗-基塔拉的庇护。在其他各地，为建立卢奥人和巴希马人的统治，不得不交替使用武力和阴谋手段。 508

以基齐巴为例，斗争在基比(1417-1444年在位)上台之前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基比是个卢奥猎人，他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卢奥霸权。他通过政治阴谋和慷慨赠送猎物，赢得了几个重要氏族的支持，其中有巴加巴氏族(巴腾布齐王朝古老的高贵氏族)、巴西塔氏族和巴兰齐氏族。[29]

布尼奥罗-基塔拉内部斗争持续的时间甚至更长。卡戈罗组织的政变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他却无法将卢奥人统一起来，更不用说统一整个国家了。然而，他坚持要将作为王室标志的击鼓传给巴比托人。最后，卢奥人派出代表去请鲁基迪，在他答应之下由他的巴比托随从陪同来到那里。他发现国内有些地方的人民对他怀有敌意。例如在布韦拉，对新政权所怀的敌意强烈到足以使鲁基迪不得不将国都从那里迁到布干盖齐，后者原是古巴腾布齐国的心脏。他还面临地位合法化和将一个多民族的社会结合成一个统一国家的问题。这种局势直到公元1500年以后才稳定下来，那时布尼奥罗已开始向巴欣达人诸国和卢旺达扩张。[30]

正如我们已在前文读到的，巴奇韦齐王朝曾任命巴尚博氏族的米拉米拉和巴利萨氏族的几个成员担任马西奥罗湖周围地区的地方长官。瓦马拉去世后，当即爆发了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巴比托族的两兄弟瓦科莱和尼亚尔瓦勾结巴舍卡特瓦人杀掉了米拉米拉，建立起了基塔文达国。[31]

鲁欣达氏族群

这个氏族群的地理中心就在当今坦桑尼亚境内的基盖济地区、安科莱、布科巴地区和布隆迪与卢旺达的部分地区。在本章论述的这一时期，所要谈到的主要国家有恩科勒、卡拉圭的布哈亚诸国、伊汉吉罗、基扬贾、布津扎和基亚穆特瓦拉，以及后来的卢旺达王国的某些地区，如恩多卢瓦(见插图20.2)。尽管有国界和语言障碍存在，但这地区远 509

[28] K.K.恩甘瓦(K. K.Nganwa)，1948年，第6-7页；P. K. 坎尼亚蒙尤(P. K. Kanyamunyu)，1951年。

[29] F. X. 鲁穆基拉，前引著作。

[30] 关于布尼奥罗-基塔拉的扩张政策，见B. A. 奥戈特，第5卷，第26章。

[31] 见A. 惠勒(A. Wheeler)，1971年。

在本章论述时期之前就已具有一种历史凝聚力。例如，巴希马/巴图西牧民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看来最大。若干个古老氏族，如巴西塔、巴加赫、巴西吉、巴齐加巴、巴金比里、巴尚博、巴伊蒂拉、巴茨亚巴、巴杰塞拉、巴伊舍卡特瓦、本固拉和巴班达广泛分布于这地区。这一点在本地区尤为重要，因为各氏族，特别是较大的氏族都宁愿结成混血的酋长国，也不愿见具有外来血统的部族群体。[32]许多巴希马人已被各讲班图语的氏族所同化，而许多讲班图语的家族又与各巴特瓦人的氏族相互同化。这种彼此同化的现象已由今天这地区大部分居民都讲鲁基加、鲁霍罗罗、隆扬科勒或隆扬姆博方言(相互间有密切联系)，或讲隆雅万达语这一事实所证实。促成这历史凝聚力的另一个因素是这地区大部分部族群体都受到卢旺达国扩张的压力。但这方面的情况不在本节讨论范围之内。

公元1200年前后的口头传说告诉我们，当时的森林地带比今天的面积要大得多，那里居住着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巴特瓦人，他们猎取大猎物，如大象和野水牛。[33]后来班图农民开始逐渐进入这一地区，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方和西方。他们在森林中开出空地并建立永久性居住点，在那里种植粟类作物和高粱。他们也从事狩猎和制造铁器。举例而言，巴龙戈人在巴希马人来到布津扎之前就久已擅长狩猎和炼铁。[34] 我们还从巴辛加氏族的传说中了解到，他们的祖先卡辛加就是卡拉圭的一个铁匠兼巫师，被他的兄长穆哈亚赶走后一直在恩多卢瓦避难，最后来到了巴图西。[35]

起初，讲班图语的人以大家庭为基础组织起来，由各家的家长组成最高权力机构。他们坐在一起研究如何改善全氏族的生活，并行使审判权。但随着外来移民的日益增多，氏族组织也发展壮大了。可是我们应该强调指出，在我们谈到这个地区的氏族时，我们并不一定是指那些同一祖先的后代。例如，结拜兄弟的习俗就使新来的移民得以加入到旧有家庭中去，移居来此的部族群体则通过加入当地的氏族和采用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来求得强大氏族的保护。的确，一个氏族转变为另一个氏族在这地区似乎是习以为常的。

510

因此，氏族变成为有一定疆界的政治组织。氏族首领同时也是地方长官，这地方也就以势力最大的家族的名字命名。如，布西吉住的主要是巴西吉氏族，布加赫住的主要是巴加赫氏族，其余以此类推。像巴齐加巴、巴杰塞拉、巴西吉和巴班达这样一些大氏族都有一个国王或头领(姆瓦米 *mwami*)，姆瓦米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宗教领袖。他负责畜牧、农耕和全族人生活的改善。他们大多数都能祈求降雨。[36]例如，我们从传说中了解到居住在布尼奥尼湖附近恩多卢瓦的巴加赫氏族、居住在布西吉(如今卢旺达的一个地区)的巴西吉氏族以及居住在金基齐的巴班达氏族都是求雨者。

到15世纪初，看来这些班图氏族中已有一部分建立了王朝。例如，据我们所知，在巴欣达人掌权之前，恩科勒、卡拉圭以及其他几个布哈亚国家都由巴西塔氏族成员统治。

[32] F. 格劳德(F. Géraud)，1977年，第24页。

[33] 见Z. 卢旺杜西亚(Z. Rwandusya)，1972年。

[34] I. K. 卡托克(I. K. Katoke)，1975年，第14页。

[35] F. 格劳德，前引著作，第28页。

[36] “卢旺达的求雨者大都是班图氏族土著国王的后代”，F. 格劳德引自 A. 帕热斯(A. Pagès)，同上，第30页。

卢旺达的历史传说中提到了一个名叫巴伦吉埃、从事农耕的部族群体。他们被看作是卢旺达地区最早的居民，主要聚居在现在属西卢旺达地区的恩杜加附近一带，使用笨重粗制的铁锄。[37] 据说巴伦吉埃人早在巴图西人到来之前就已被巴班达人赶走。[38] 幸运的是据我们所知，今天在坦桑尼亚西北部和乌干达西部，即从布丰比拉到托罗这一带发现了巴伦吉埃人。因此可以认为，这个古老的、能制造铁器的讲班图语的社会在牧民们到来之前就已散布在卢旺达和乌干达西部。这些地方的大部分统治家族都出自他们。

可能是卢旺达和乌干达西南部最早居民的另一个从事农耕的古老氏族是本固拉人，据 M. 德 - 赫特费尔特说，这个族于 1960 年在鲁亨盖里(卢旺达西北部)人数相当之多。[39] 遗憾的是本固拉人的所有有文字记载的传说没有一个谈到他们的迁徙情况或国家形成的过程——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这氏族之古老。

巴齐加巴人似乎也是该地区最早的农业人口中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他们在巴尼金亚人在历史上最初出现时就在卢旺达的最东边建立起了穆巴里国，这国家有一个国王(称作卡贝贾 *Kabeija*)和一个作为王室标志的击鼓(叫作塞拉 *sera*)。[40] 但在恩科勒和在基盖齐的鲁琼布拉地区也发现了他们，而且人数很多。他们在这三个地区各有不同的图腾：在卢旺达是豹，在鲁琼布拉是羚羊，在恩科勒是身上有条纹的牛。正如 D. 德农教授所指出：

> 这样的分布状况和多样性的特点无疑证明那时有一个多氏族国家(可能叫穆巴里)，后来在长时期里逐步向四处分散迁移，起初巴齐加巴这名称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最后则当作社会含义予以保留，并且还保留了巴齐加巴国家原始氏族结构的图腾标志。[41]

511

当时还有其他几个讲班图语的部族群体，如巴尼扬圭、巴西塔、巴努马和巴伊蒂拉，他们在 15 世纪末巴欣达人开始统治恩科勒以前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说明 15 世纪初已经在湖区西部一带形成的那种政治形势，我们最后还将提到的另一个氏族是巴伊舍卡特瓦。他们存在于卢旺达(这里曾一度统治过布杰塞拉的巴洪多戈人被认为是他们的支系)、基盖齐(他们在这里是最早的鲁琼布拉居民)、托罗和恩科勒。我们还从布干达人的传说中了解到，布干达人中的达一氏族，正如下文所述，是随同基梅拉由西边来到布干达的。因此，似乎可以肯定巴伊舍卡特瓦人是西乌干达最古老的一个氏族，他们的居住地由布松戈拉一直延伸到卢旺达西部。

至今我们的讨论只局限于讲班图语的农耕氏族。现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向牧民。首先有必要再重申一下已经阐明过的观点，即这地区牧民的起源现尚无法肯定。有一种

[37] J. K. 伦尼(J. K. Rennie)，1972 年，第 18 - 19 页。
[38] F. 格劳德，前引著作，第 27 页。
[39] M. 德 - 赫特费尔特(M. d'Hertefelt)，1971 年，图表 8。
[40] M. 保韦尔斯(M. Pauwels)，1967 年，第 208 页。
[41] D. 德农(D. Denoon)，1972 年，第 6 页。

假设认为他们起源于北方，但是，正如 J. K. 伦尼所指出的，“任何人都不能否定，放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许就是在卡拉圭或卡拉圭附近就地发展起来的”。[42] 其次，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即认为牧民是作为征服者来到这地区的，他们一开始就建立起了牧民高居于农民之上的贵族统治，但这种看法在基塔拉这样的地方是说不通的。我们可以举出好多个有关牧民与农民和睦相处的例子。[43] 诚然，直到 15 世纪出现了几个牧民国家之前（参阅后文所述），这里（如前面所指出的）大都是农民氏族建立起了一个个由他们统治的王朝。

例如，巴里萨氏族，现在被看成是该地区最古老的牧民氏族。按他们的传说，他们是从北方，或许就是从布尼奥罗迁到南边的卡拉圭来的。后来他们又从卡拉圭经现在的基盖齐和西恩科勒返回了北方。在他们到达姆波罗罗之后，氏族成员就东分西散。其中某一个家庭有三弟兄——卡蒂齐、基尼奥伊和鲁戈，以及一个妹妹伊蕾梅拉，他们由一只鹰带路去往巴奇韦齐王朝最后一位国王瓦马拉的宫廷。三兄弟之一卡蒂齐在途中退了出来，定居于布赫韦佐，他在那里娶了几个当地妇女为妻，以农为业，并另立了巴蒂齐氏族。另外两兄弟和他们的妹妹终于来到巴奇韦齐王朝的宫廷。伊蕾梅拉嫁给了国王，由国王下令鲁戈负责统治布津巴，而基尼奥伊则成为瓦马拉国王在布赫韦佐的钦差。国王赐给他们俩每人一个王室击鼓和一百头牛。[44] 根据这一传说，可以清楚知道，并非所有的牧民一开始就是统治者。而且他们也不都是以统治者告终，卡蒂齐的命运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513

在后来的牧民移民中有三个氏族——巴尚博人、巴西塔人和巴欣达人，他们在恩科勒、卡拉圭、伊汉吉罗和基齐巴建立新氏族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传说谈到巴尚博人来自北方并定居于卢旺达西北部的恩多卢瓦周围一带，后来又从那里分散开来，往北和往东进入恩科勒和基盖齐东部，[45] 他们可能就是在巴奇韦齐人统治之前或统治期间进入巴奇韦齐国的巴希马人。巴西塔人显然是与巴尚博人相反的方向迁移。他们似乎是从卡拉圭或卡拉圭附近的一个中心地往北扩散。巴奇韦齐王朝统治时期，他们成了卡拉圭和恩科勒的统治者，而诺诺和卡拉拉则是巴奇韦齐国王的钦差。

就最后一个氏族，即巴欣达氏族的起源问题争论颇多。恩科勒人的传说声称，巴欣达人是巴奇韦齐人的后代，鲁欣达在卡拉圭、基亚穆特瓦拉、恩科勒和伊汉吉罗建立了一系列王朝，他是巴奇韦齐王朝最后一位国王瓦马拉的儿子。[46] 但是，L. 德 - 霍伊施却认为，巴欣达人是尼罗特人。他争辩说，他们在卢奥人入侵布尼奥罗时击败了巴奇韦齐人，巴奇韦齐人因此向南退却到布韦拉和恩科勒，因为那里有比戈堡要塞可以防御卢奥人的侵犯。巴欣达人作为卢奥人的一个分支从侧翼包围了退却中的巴奇韦齐人，并取道卡拉圭从背后发动进攻。他们终于在恩科勒击败了瓦马拉国王，从而在恩科勒、卡拉圭、伊

[42] J. K. 伦尼，前引著作，第 23 页。
[43] S. R. 卡鲁吉，前引著作，第 122 - 123 页。
[44] P. K. 坎尼亚蒙尤，前引著作。
[45] 据说，巴尚博妇女都嫁给了巴奇韦齐人。见 F. 格劳德，前引著作；L. 德 - 霍伊施(L. de Heusch)，1966 年。
[46] S. R. 卡鲁吉，前引著作，第 126 - 127 页。

汉吉罗和基亚穆特瓦拉建立起了一系列新王朝。而这一说法现已为 S. R. 卡鲁吉所否定。[47]

D. 德农却提出了这么一种说法："鲁欣达是从吉萨卡来的一个穆杰塞拉国人，或是为扩大该国的势力，或是突然逃离该国。"[48] 他在证实这观点时指出，巴杰塞拉氏族和巴欣达氏族的图腾同样都是猴子；巴丰比拉人和巴托罗人都把恩科勒叫做"布杰塞拉"——巴杰塞拉人的王国；恩科勒根本没有巴杰塞拉氏族，而它周围却处处都有巴杰塞拉人，这只能从当地人都把巴欣达人称作巴杰塞拉人来解释；最后，众所周知的巴杰塞拉人势力之大与这种说法完全相符。一直到 17 世纪末，巴杰塞拉人一直是恩科勒西部和基盖齐东部势力最大的一个氏族，他们的侵略远到布松戈罗和姆文盖。然而，D. 德农这种论点只能说明，该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强大的牧民部族群体，他们很可能就是巴杰塞拉人。至于是否能进一步证实巴杰塞拉人与巴欣达人完全等同，我们从他的论述中不能得出明确答案，主要是因为他并未阐明鲁欣达此人和巴杰塞拉人之间的关系。 514

看来，正如 J.尼亚卡图拉所记载的那样，布尼奥罗人的传说对鲁欣达此人的由来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说法。根据他的说法，鲁欣达是生活在瓦马拉国王统治时期的一个富裕牧民(穆希马人)。[49]他在巴奇韦齐朝廷中地位显赫，被任命为牧民统领。在卡戈罗发动的政变取得成功之后，鲁欣达便把一部分王室牛群驱赶到了卡拉圭。按卡拉圭人的传说称，正是鲁欣达和他手下的牧民将长角牛传入了卡拉圭。这时候，该地区的南部由巴西塔氏族和巴尼扬圭氏族统治，他们从巴奇韦齐王朝那里得到了象征权力的王室击鼓。巴西塔氏族的一个成员诺诺统治着卡拉圭；巴尼扬圭氏族的两个人，即恩康布亚和卡拉拉分别统治着伊汉吉罗和恩科勒。

在早期很少有像鲁欣达一样统治年代记载确切的国王。布津扎、基亚穆特瓦拉、卡拉圭和恩科勒四个国家的王朝都声称是鲁欣达儿子的后代。根据这四个世系的家谱可以推算出鲁欣达统治的年代大约为公元 1405 - 1447 年。基齐巴人的传说说鲁欣达统治的年代大致是 1417 至 1444 年间。在鲁欣达来到卡拉圭之后，他利用他牛群这一巨大财富将诺诺赶下了台。接着他就开始在卡拉圭建立了一牢固的作战基地，后来他又将这基地从那里向北迁到了恩科勒。他在恩科勒与那里人多势大的巴尼扬圭氏族达成了一项政治交易来达到他确保政治控制的目的。为了回报巴尼扬圭人愿意接受他的领导，他保证不迫害他们，不没收他们的财物。鲁欣达和鲁基迪一样，通过小心谨慎的宣传，试图使他的臣民相信他是巴奇韦齐王朝的后代。

他让他的儿子恩库巴在恩科勒执掌权力，而他自己则将注意力转向基亚穆特瓦拉和伊汉吉罗。他先是在基亚穆特瓦拉杀死了瓦马拉国王的钦差马沙雷，立他另一个儿子尼亚鲁班巴为王。在伊汉吉罗，他可能与人合谋，通过他们把瓦马拉国王的另一个钦差，即阿巴扬戈氏族的伊汉吉罗毒死，然后派他的小儿子(也叫鲁欣达)去统治伊汉吉罗。最

---

[47] S. R. 卡鲁吉，前引著作，第 126 - 127 页。

[48] D.德农，前引著作，第 10 页。

[49] J.尼亚卡图拉，前引著作，第 65 - 66 页和 290 页；也可参阅F.X.鲁穆基拉，《卡拉圭、伊汉吉罗、尼亚米特瓦拉等国的历史》，未发表的手稿，第 1 - 3 页。

后，他来到布津扎，废黜了恩沙沙梅，并立他又一个儿子为王。[50] 总之，鲁欣达在卡拉圭站稳脚根之后，很快就征服周围地区，罢免了巴奇韦齐王朝的各个钦差，由他的儿子们515 取而代之进行统治。正当他准备建立一个类似于南方巴比托或是北方卢旺达(布甘扎的巴尼金亚氏族所建)的国家时于布津扎去世。他死后，他控制之下的这大片地区便立刻四分五裂。他的儿子们，原只是在各地代他执政，如今却都成了独立的统治者，他们分别建立了卡拉圭、伊汉吉罗、基亚穆特瓦拉和布津扎四个王朝。继巴欣达之后建立的这几个基塔拉国家都是小国，在以后很长时间也都没有起变化。

根据这一概述就可明白，随着巴奇韦齐王朝的"消失"，湖区出现了如下一些国家：吉萨卡、巴欣达诸国、卢旺达、巴尚博人统治下的恩多卢瓦、巴比托诸国和布干达(本章迄至目前为止还没有谈布干达)。可能除布干达以外，大部分新兴国家都具有明显的牧民色彩。鲁欣达是个牧民，巴杰塞拉氏族、巴尼金亚氏族和巴尚博氏族也都是牧民社会。尽管巴比托人起初靠狩猎和农耕为生，但他们很快就染上牧民统治者的特色。

卢旺达氏族群

在讨论卢旺达的早期历史时，我们拟采纳 J. 范西纳的但经 J. K. 伦尼作了许多注释的概述。[51] 这么做，我们充分理解 A. 卡加梅和一般白人史学界先辈的一些著作所具有的巨大影响。[52] 这些著作都有两个重大缺陷：第一，它们都着眼于宫廷，以宫廷为中心，因此我们很难从中了解到当时组成卢旺达国家的各个社会的反应；第二，由于其作者过于相信陈旧的含米特理论，这些著作严重缺乏客观真实性。

简而言之，A. 卡加梅和白人史学界的先辈们坚决认为如今的卢旺达当时居住着的是在政治上还没有很好组织起来的一个个讲班图语的家族和氏族。后来，从北方来了一群有组织的"讲含米特语的图西人"牧民，他们带来了畜牧业、炼铁业、王权概念、等级社会和一些新的粮食种类。在他们的首领吉汉加领导下，他们从公元 10 世纪以后建立过一系列图西人王朝，这些王朝最后结合成为卢旺达国家。他们的这个国家通过外交、军事征服和以图西人掌握牛群为基础的经济实力，逐步扩大，以致包括了现代的整个卢旺达。当时还立下一种表示从属关系的制度，根据这种制度，班图("胡图")人只要服劳役和效忠国家就可获得使用牛群的权利，这样，这些被征服者也都融合到了这国家中来。这也标志了卢旺达阶级制度或如社会主义者 J. J. P. 马克特所说的卢旺达不平等的前提的开始。[53]

为了避免对卢旺达早期历史作出有失偏颇的描写，我们有必要认真观察一下尼叶金516 亚诸国及其社会之前的历史。根据传说，最初的居民几乎全是以巴特瓦人为代表的森林狩猎-采集人，除了狩猎以外还制作陶器和编制筐篓。后来，逐渐有农民来到这里，他们

---

[50] S.R.卡鲁吉，前引著作，第 130－131 页和第 137－142 页。
[51] J. 范西纳，前引著作；J.K.伦尼，前引著作。
[52] A. 卡加梅，1954 年、1959 年、1961 年和 1963 年。
[53] J.J.P.马克特 (J.J.P.Maquet)，1961 年。

在森林中开出空地定居下来，狩猎人拿兽皮和肉换取他们的食盐和铁制品。讲班图语的农耕者种植高粱、喂养牲畜和蜜蜂、打猎和发展乡村工业。他们穿的是用山羊皮和树皮织成的布做的衣服。他们在同一血缘的头人或首领的领导下组成世系和氏族。[54]

到了 15 世纪，许多讲班图语的人建立了若干个小国家。每个国家都由若干世系组成，其中必有一个世系居于首要地位，国家的统治者叫做姆瓦米（*mwami*，意思是头领或国王），姆瓦米不仅管辖土地，同时也是主持求雨仪式的人。[55] 这一职位与我们前文描述的鲁欣达氏族群的情况基本相同。有证据证明，一些世系，诸如辛加氏族中的鲁本加世系和齐加巴氏族中的赫卡世系，在卢旺达的尼叶金亚氏族出现之前就已拥有牛群，而且那时已经有了几个颇大的国家。每一个国家都由一个主要氏族控制，虽然我们有必要重申那时的氏族与其说是以互相通婚的部族群体的一些祖先的名字命名，还不如说他们的名称是表示其政治归属。

一般都同意在尼叶金亚时期之前已经有 7 个主要氏族建立了国家。它们是辛加、齐加巴、格赛拉、班达、西亚巴、昂格拉和埃嫩韦。[56] 这 7 个氏族中有 3 个，即辛加、齐加巴和格赛拉，被认为是“原来者”（*abasangwabutaka*），意思是先于别人来到那里或本来就是卢旺达土地的主人。[57] 这些国家的性质如何以及它们是如何并入卢旺达国中去的？第一个问题将在后面讨论，而第二个问题则不属于本章讨论的范围之内。

根据图西人的传说，卢旺达最古老的国家很可能是由辛加氏族中的伦吉世系所建。这国家尽管组织松散，却覆盖了除东部地区以外的现代卢旺达大部分领土。可是，历史并没有保留下这地区的名称。从传说中可以清楚了解到的是，伦吉世系的人已经产生了一种王权与宗教仪式相结合的复杂概念。我们知道，在 16 世纪末有一群专门从事宗教仪式、被人们称作“特吉”的人进入卢旺达的国家机构，这些人自称是尼亚布特吉的后代。据说，尼亚布特吉是鲁本加的子孙，而鲁本加则是伦吉人的宗教仪式主持者，卢旺达图西人诸氏族的创立者吉汉加就是从他的手中接受象征王室的击鼓和伦吉王家教规的。[58] 517
到 17 世纪中叶，伦吉世系诸国被扩张中的卢旺达国所并吞。

在卢旺达的最东边是齐加巴氏族所建的穆巴里国，它显然拥有大片领土。尼叶金亚氏族在卢旺达历史上最早被提及是他们从齐加巴统治者那里得到了加萨博山。[59] 尼叶金亚人获准可以有他们自己的酋长，但他必须受齐加巴统治者的管辖。这时，这两个氏族可以自由通婚。但是，齐加巴人的穆巴里国在 16 世纪末丧失了独立，卢旺达统治者尤基二世加希玛夺走了他们的塞拉击鼓。该王朝尽管丧失了政治独立，但仍设法维持到 18 世纪后半叶，直到基吉里三世恩达巴拉萨（1765－1792 年在位）杀死了国王，该王朝才从此结束。于是，齐加巴人分成小股迁往乌干达西南部的各个地区，他们在那里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已在前文提到过了。

---

[54] M.德－赫特费尔特，1962 年，41－44 页；J.范西纳，前引著作，第 78 页。
[55] J. 范西纳，前引著作，第 77－78 页。
[56] A. 卡加梅，1955 年。
[57] 同上，1954 年，第 56 页。
[58] 同上，1955 年，第 13 页。
[59] 同上，1954 年，第 53－54 页。

与齐加巴人密切相关的是格赛拉人，他们统治着卢旺达西南部的强大的吉萨卡国，也可能还统治着布杰塞拉。格赛拉人竭力保持独立到19世纪，最后它终于瓦解，并被姆瓦米(国王)卢沃格拉(约1830－1860年在位)所并吞。但格赛拉人对两个从吉萨卡分裂出来的小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到20世纪，它们是：卢旺达西南部的布索佐(该国建于17世纪初)和卢旺达西北部的布希鲁。[10] 位于卢旺达中北部的是另一个国家，名叫布西吉，它由一个能求雨的头领管辖。布西吉作为一个国家直到20世纪初才最后并入卢旺达。[11]

还能提到其他几个较小的国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新的卢旺达国家并不是由没有组成国家的各族人民建立起来的。以吉萨卡为例，它长时期以来就一直与年轻的卢旺达国一样有着良好的组织。这些国家，即使大小强弱不一，但都已具有显示王权的各种制度，并掌握为土地和雨水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力。有一些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在今后300年新卢旺达国逐步扩张的过程中被它所采用。卢旺达的宫廷宗教仪式收到明显的政治效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中吸收了农民和牧民的宗教仪式，有一些农民因精通宗教仪式而受到社会尊重，他们是这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518

大约从15世纪起，牧民在这些国家中人数大增。起初他们并非占统治地位的等级，有些地区他们甚至很可能依附于农民。J. 范西纳已找出充分证据证明，在卢旺达的东北、西北和西部牧民和农民彼此和睦相处。表明这两类人之间关系特点的从属制，在15世纪他们都已归入新卢旺达国之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以今论古总是不无冒险的，但一般都同意，卢旺达至少有9大氏族都是图西人，他们原来很可能都是牧民。这9个氏族是辛迪、尼亚卡拉马、埃加、尚博、西塔、哈、欣戈、科诺和洪多戈；他们都具有一种民族主义特色，由此可以一直往上追溯到所有图西氏族的共同祖先，一位神话般的人物吉汉加。

这些牧民迁移时并不是结成大帮凝聚性群体。他们直到15世纪末在人数上壮大到足以结成强大的世系组织之前仍是以小股向南流动，他们在那里与农民发生了冲突。这些世系只有两个是例外，其余的都不够强大，还不能组成独立国家。例外的两个是洪多戈和尼叶金亚。前者定居于南部穆盖塞拉湖周围一带，并已建立一个政治组织，从而能把格赛拉人往东赶入吉萨卡。后者，即尼叶金亚人，建立了卢旺达统治王朝。他们来自东部的穆巴里，并如我们所知道的，定居在穆哈齐湖周围卢旺达中部的加萨博山。到15世纪末，他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具有中央权力机构的国家，而且还订立了将牧民和农民全都结合在其中的一些制度。至于一个独立而有一定疆界的卢旺达国家的创建、巩固和扩大则已不属于本章探讨时期的范围之内。[12]

---

[10] A. 达里亚诺夫(A. d'Arianoff)，1952年。

[11] M. 保韦尔斯，前引著作，第223页。

[12] 根据J. K. 伦尼的年表(这是对J. 范西纳年表的更正)，只有三个国王属于我们探讨时期，他们是：恩达希罗·鲁扬吉(1424－1451年在位)、恩多巴s/o恩达希罗(1451－1478年在位)和萨门比s/o恩多巴(1478－1505年在位)。

布干达、布索加和埃尔贡山地区

根据 D. W. 科恩的看法，公元1100至1400年这段时间是大批讲班图语的氏族从埃尔贡山/维多利亚湖地区向外大迁徙的时期。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这次大迁徙，我们还不清楚。M. S. M. S. 基瓦努卡认为"卢奥人向东南推进对这一系列迁移有一定影响"。但是，卢奥人的传说却证明，这次大迁徙比卢奥人在这地区最早的迁移至少还要早一个世纪。这些讲班图语的部族群体于公元1100年之后在他们新家园的政治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次移民中有一个部分包括金图氏族群的各个氏族，据 D. W. 科恩认为，这些人迁居到基奥加湖南岸，建立了许多小国，其中包括维多利亚湖北岸的布干达。[69] 519

历史上是否真有金图其人无从得知。但似乎清楚的是，这位金图的形象与图腾是花豹与狮子的一个讲班图语的氏族群有联系。根据布干达人的传说，金图所到之处，诸如恩诺诺、布武维、布卡萨、曼吉拉、马贡加和布特瓦拉，全都是布干达以花豹为图腾的氏族的居住地。同样，今日布干达以狮子为图腾的氏族的重要地区中有坎扬亚和勒瓦达两地据说也是金图到过的地方。

维多利亚湖北岸，在出现狮豹氏族群之前就已有若干讲班图语的氏族居住在那里。他们的图腾有的是"对祖先的崇拜"，有的是香猫、长发猴、食米鸟、肺鱼和羚羊。在布干达，人们把氏族称作"班纳萨格瓦"（*banansagwa*），也就是"在这地方发现的"人。政治上，这些部族群体都各有其独立行事的氏族头人。只有羚羊氏族已经在今日布索加建立了多氏族的酋长国布古鲁，它由"伊古鲁"（*igulu*）领导。该酋长国的核心是一个大的制陶业和一个重要的宗教神殿，而这两者都由阿拜西·伊古鲁所属居统治地位的世系控制。这个氏族沿维多利亚湖北岸由东向西迁移，他们在布古鲁碰到了狮豹氏族群。

在布古鲁地区碰到金图氏族群的另一个"班纳萨格瓦"是肺鱼氏族。根据 D. W. 科恩在布索加、布干达以及维多利亚湖诸岛所收集的传说，该氏族迁离基苏木和埃尔贡山之间一块叫做布莫格拉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曾是起重要作用的渔民和铁匠（这里提到的氏族和地方，均可参阅插图20.3）。现在不清楚的是他们什么时候离开原来的家园和为什么要离开。他们从布莫格拉出发，越过维多利亚湖：一部分人去南布索加；另一部分人去布武马群岛；再一部分去克亚格维海岸边的布萨加齐，肺鱼氏族的一个首领穆比鲁又从那里经内陆去曼吉拉，他在曼吉拉碰到了金图。

去南布加索的这部分人是由瓦隆比率领的；他们在布古鲁碰到了金图氏族群。看来金图这个形象或者这个象征性的人物在当时已是狮豹氏族群的领袖。他娶了瓦隆比的女儿南布比为妻，从而建立了狮豹氏族群和肺鱼氏族之间的密切关系。伊古鲁显然对这些外来部族群体深感不安。根据传说，他大概是利用神谕劝说金图或各狮豹家族离开那里。

金图和他的追随者决定西行，直抵布斯威基拉。在布加索人的传说中，布斯威基拉一直被说成是金图和南布比夫妻从"格古鲁"、也就是从"天堂"降临人世的"降落地

[69] D. W.科恩(D. W. Cohen)，1972年，特别是第70和以后诸页；M. S. M. S. 基瓦努卡(M. S. M. S. Kiwanuka)，1971年，第3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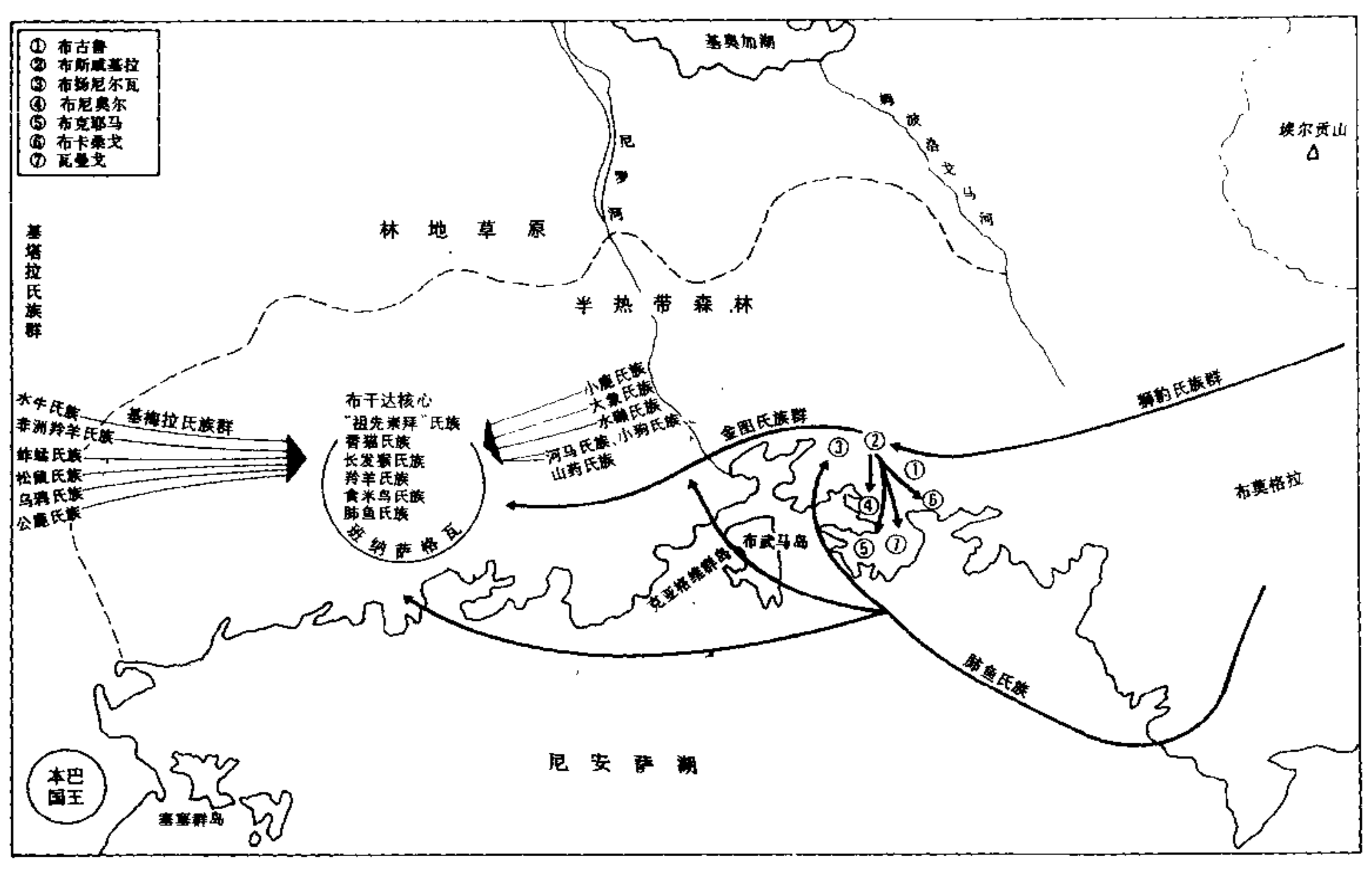


图20.3 从金杜到基梅拉(B.A.奥戈特)

点"。看来，布干达创始故事中所说的金图所来自的"格古鲁"或"天堂"是对布古鲁和那里的神庙的象征性描写。金图的姻亲，也就是肺鱼氏族，很快由瓦隆比率领追寻金图夫妻来到布斯威基拉。但在这里立刻就因土地分配问题而激起了狮豹氏族群和肺鱼氏族之间的一场争斗，这场争斗最终将瓦隆比的部分人马向西赶到了几英里以外的布扬尼尔瓦，后来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永久性定居点。布索加人有关阿拜西·马甘达部族群体的传说记载，瓦隆比是他们所崇拜的最主要的神，他的神庙迄今肺鱼氏族仍严加守护着。根据布索加人的传说，布斯威基拉是金图在布索加活动的中心。传说还进一步告诉我们，在湖边建立了布尼奥尔、布卡桑戈和布克耶马这三个酋长国的阿拜西·伊苏姆布瓦和阿拜西·克耶马这两大部族群体是金图儿子们的后代。 521

金图从布索加向西迁移来到后来成为布干达核心的地方。除了狮豹氏族群之外，伴随或跟随金图西行的其他氏族，根据传说记载还有：大象氏族、水獭氏族、小鹿氏族、河马氏族、小狗氏族和山药氏族。他们也还碰到了先期到达的穆比鲁率领下一部分肺鱼氏族人，后者对金图和他的追随者都怀有对立情绪。但金图所面临的更为严重的威胁来自布杜的本巴国王。除了已经提及的布古鲁酋长国之外，位于布杜的本巴酋长国是金图之前布索加和布干达另一个讲班图语的多氏族政治实体。金图与一土著氏族(长发猴氏族)结成了联盟，他很快就和本巴国王发生冲突。结果，本巴被杀，金图或他的后继者着手建立核心地区，这核心地区后来发展成为布干达国。

再现这时期布干达、布索加、东乌干达和西肯尼亚的历史也有助于说明本章中反复指出的论点：湖区的几个小国是在牧民成为重要政治力量之前由讲班图语的农民建立的。公元1200至1500年期间，牧民在这地区的活动看来并不起主要作用。特别是布干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布索加的几个较小国家都是森林国家，它们的经济更多地依赖于农业，而不是产生等级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半牧半农。甚至在人口数量上，就我们所知，布干达的"班纳萨格瓦"(氏族)或者是最初的居民全都从事农耕；金图氏族群也是以农业为生，从西边迁来的基梅拉以及他的追随者(有关他们的情况将在后文叙述)基本上也都成了农民。

D. W. 科恩和 C. A. 布坎南都曾指出，金图氏族群中的某些氏族是从西面迁到基塔拉氏族群中来的。[64] 既然金图氏族群的各个部族群体进入今天布干达核心地区的时间，据 D. W. 科恩估计，是在西乌干达巴奇韦齐王朝出现之前不久，那么西迁的这部分人，如前所述，很可能是在瓦马拉国王当政时来到基塔拉的。[65] 在此之前已有一位名叫坎图的人作为东部移民领袖出现。正如前文所指出，瓦马拉国王与他结拜兄弟，那是国王把这些移民吸收进他的政治制度中来的一个策略。但东部移民看来是构成了对瓦马拉的特殊威胁。他们的领袖坎图被杀，按布尼奥罗人的传说所说，这是一个严重影响帝国稳定的大事件。[66] 各氏族群体由于失去了安全感，便纷纷沿维多利亚湖北岸往赤道森林中迁移。由 522

[64] C. A. 布坎南，前引著作。
[65] D. W. 科恩，收于 J. B. 韦伯斯特著作之中，前引著作。
[66] J. 尼亚卡图拉，前引著作，第36-41页。

西向东往布干达去的这次大迁徙把我们引入湖区尚未解决的一个历史问题——基梅拉氏族群的问题。

人们往往把基梅拉此人(大约 1344 ~ 1374 年在位)与基塔拉地区联系在一起。尤为重要的是，有人把他看作是布干达小酋长国一个新王朝的创建者。[67] 围绕基梅拉的许多争论都离不开他的氏族归属。有一种传说把他和卢奥血统的非洲羚羊氏族相连。另一种传说把他与巴希马人的蚱蜢氏族联系在一起。举例而言，M.S.M.S. 基瓦努卡根据A.卡格瓦所写蚱蜢氏族史，认为基梅拉可能是建立于基索齐地方的巴松加王朝的一个成员。他接着又以赞同的口吻引用 J. L. 戈尔朱的话说，“不管怎么样，基梅拉看来是先于布尼奥罗最早的巴比托统治者来到布干达。”[68] 总之，重要的不是基梅拉个人的身份。我们应尽力理解有关基梅拉的传说的真正意义之所在，或者我们所说的基梅拉氏族群究竟意味着什么。

基梅拉传说谈的是几个逃亡部族群体的迁徙，他们从恩达胡拉统治时期起到巴奇韦齐帝国崩溃时为止连续不断地逃出该帝国，进入赤道森林中去。起初，他们显然是由于恩达胡拉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不安全感而逃离，基梅拉本人好像就是在这时离开基塔拉的。坎图的死亡，继之是巴奇韦齐王朝的崩溃，这就促使更多的人纷纷离开基塔拉去布干达寻求避难，如同到恩科勒和其他一些政局稳定的地方寻求避难一样。

至于这些逃亡者走哪几条路线，传说中并没有提到。很可能最初的几批，诸如包括 523 基梅拉在内的那一批，与狮豹氏族群在布索加所做的一样，于途中建立了一些定居点或者甚至是一些国家。这些逃亡部族群体是多氏族和讲多种语言的。他们中有的是基塔拉土生土长讲班图语的部族群体；有的是放牧的巴希马人；有的是卢奥族猎人和农民；还有的是原属金图氏族群讲班图语的氏族。根据布干达人的传说，基梅拉氏族群包括如下氏族：水牛氏族、非洲羚羊氏族、蚱蜢氏族、松鼠氏族、乌鸦氏族和公鹿氏族。因此如若有人，像 J. P. 克拉佐拉拉那样，收集了布干达非洲羚羊氏族的传说加以研究，他就会得出结论说，基梅拉和他的追随者是卢奥人。如果此人像 A. 卡格瓦和他的翻译 M. S. M. S. 基瓦努瓦那样，仅限于研究蚱蜢氏族，那么他就会得出他们是巴希马人的结论。[69] 如有人要利用比托在布尼奥罗 - 基塔拉建立统治的日期作为论据来反驳基梅拉是卢奥人的观点，那么他必须记住，许多卢奥人部族群体早于巴比托人来到布尼奥罗。

作为逃避各种政治控制的人，他们的思想意识自然是反巴奇韦齐、反巴比托和反巴希马的。把布干达与这三者中任何一个连在一起的传说都遭到禁止，这是不足为奇的，甚至在有充分证据的地方也是如此。例如，我们把布尼奥罗和恩科勒的巴奇韦齐传说与布干达传说(后者很少提到巴奇韦齐王朝)进行对照，就会发现一些历史学家无法忽视的惊人相似之处。在布尼奥罗和恩科勒，基塔拉的伊萨扎国王的门卫是巴兰齐氏族的布库鲁。塞塞群岛上水獭氏族(也就是巴兰齐氏族)的传说也提到了布库鲁的名字。在布尼奥罗和恩科勒，布鲁库的女儿，后来是恩达胡拉国王的母亲，名叫尼叶纳姆维鲁。基干达的相应人物则是纳姆德杜，她在塞塞群岛的传奇故事中广为流传。我们从西部的传说了

[67] M. S. M. S. 基瓦努卡，前引著作，第 36 41 页。

[68] 同上，第 40 - 41 页；A. 卡格瓦(A. Kaggwa)，1905 年；J. L. 戈尔朱(J. L. Gorju)，1920 年。

[69] J. P. 克拉佐拉拉，前引著作；A. 卡格瓦，1971 年。

解到布库鲁的孙子叫穆加萨，而布干达人的传说将布库鲁孙子的名字说成是穆卡萨。我们从恩科勒人的传说中知道穆加萨死于维多利亚湖中；而根据布尼奥罗人的传说，国王瓦马拉投湖而死，而他又是瓦马腊湖的建造者。在布干达人的传说中，瓦马腊是布库鲁的后代，他也与这同名湖的建造有关。此外，布干达人像基塔拉氏族群地区神化巴奇韦齐神灵一样神化了布库鲁后代神灵，如南德和穆卡萨。因此，是不是可以设想，在布干达，布库鲁的后代就是巴奇韦齐人呢？

现在再回到构成基梅拉氏族群的逃亡氏族上来，他们既是在不同的时期离开布尼奥罗的，也是在不同的时期到达布干达的。遗憾的是，所有这些逃亡氏族，不管他们是何时来到布干达，现在都自认为是基梅拉大迁移的一部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往往愿意把 **524** 自己与胜利联系在一起。领导各部族群体逃亡的基梅拉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和一个国家，从而将来自四面八方、定居于这一地区的 35 个氏族连成一体。每一个氏族都想分享这君主政权，因此在布干达出现了各氏族给卡巴卡赠送妻子的风俗，以此求得继承王位的机会。[70] 到公元 1500 年，布干达历史上迁徙与定居时期终于结束了。新王国的巩固和发展不属于本章叙述的范围。

---

[70] M. S. M. S. 基瓦努卡，前引著作，第 91 - 110 页。

21 赞比西河流域和林波波河流域

B. M. 费根

公元1000年前后铁器时代的文化与社会

525

10世纪末期，铁器时代的人已经定居在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之间热带草原森林地带的大部分地区，东至印度洋，北至现在的赞比亚和马拉维。[①]石器时代后期残留下来的一些人，也还生活在热带草原森林偏僻的地方，靠狩猎为生，与邻近的农民偶而有点接触。有的住在岩洞里，有的住在不御风寒的小帐篷里，现在这些地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工具以及铁器时代的陶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现代桑族人的祖先，则分布在热带草原森林以南和以西的卡拉哈里地区的大部分地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由游动，直至如今。生活在中南非洲辽阔地区里的铁器时代的人大部分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们的食物来源是靠驯养大小家畜和种植高粱、小米之类谷物。狩猎和采集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采用的是简单的易地耕作方式，或许还包括仔细选择优良土壤。

显然中南非洲早在公元200年就出现了铁器时代的第一个定居点，而且初期的开垦仅用了相对而言比较短的时间，但是早期的农业人口广泛地散居在各个没有采采蝇的地区，人口密度普遍非常之低。采采蝇的分布受易地耕作方式的影响，这种农业方式反过来很快又影响人口的分布。在基督纪元后的头10个世纪里，农业人口增长缓慢，随着森林的砍伐和耕作方法的慢慢改进，可耕地有所增多。易地耕作十分浪费土地，这是造成不断另辟新定居点的原因之一，这种耕作方式对开垦出来的林地利用率也很低，按现代统计方式计算，每英亩林地利用率都远在百分之五十以下。

527

在技术上，铁器时代的农民已掌握了铁的简单的冶炼术，能把铜融化后制成各种装饰品，后来又能制作铜丝。各地使用的陶器虽造形简单但制作精细。中南非洲的文化，与所有以自给自足的农业为主的文化一样，完全适应于几乎遍地都是热带草原森林的环境，其基础是对当地土壤、气候、植被充分了解，就地取材建筑房屋，以及推行家庭经济。各个群体基本上自给自足，有特殊需要才去邻村和当地的交易场所购买。

许多考古学家细致地研究了中南非洲铁器时代的早期文化，他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陶器的式样和放射性炭素测定的研究上。[②]最早的农民所使用的刻有花纹的原始陶器说

① B.M. 费根（B.M.Fagan），1967－1969年。

② 主要参阅 D.W. 菲利普森（D.W. Phillipson），1968和1974年。

明中南非洲两端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有人提出应对一些地区差异、“各种传统”和“各种文化”进行分类研究。不同社会的许多具体细节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这里只须指出：铁器时代早期的各种文化传统，直到基督纪元第二个一千年一直定居在中南非洲许多地区的居民，他们所掌握的简单的炼铁术、锄耕以及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全都以泥墙草顶房屋的小村为基础，这就足够了。早期铁器时代的人是后几个世纪较复杂文化的直系祖先。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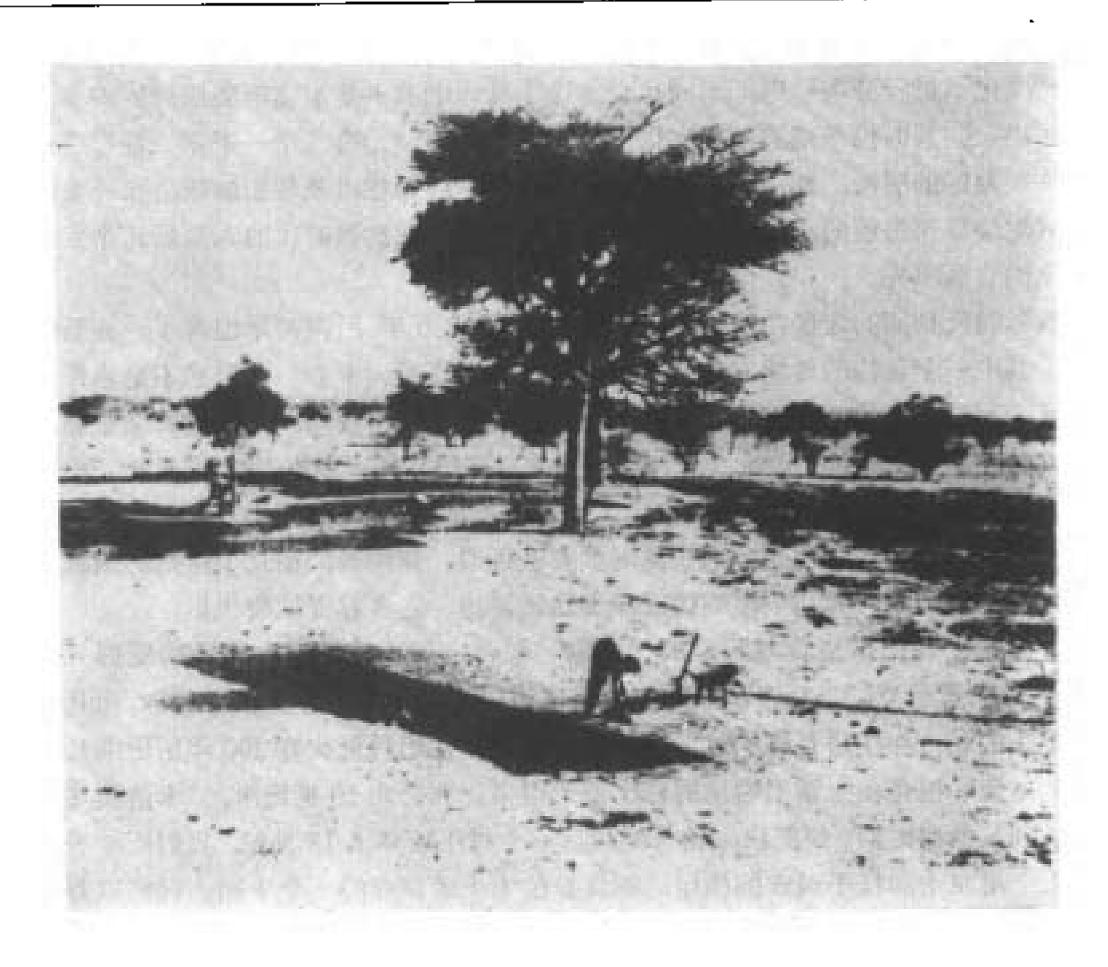
铁器时代初期的农民在赞比西河畔定居后的1000年，沿河两岸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传统。其中一个独特的传统以赞比亚南部的巴托卡高原为中心。那里已不是热带草原森林地区，而是开阔的草原地带，为牲畜提供了良好的天然牧场。高原没有采采蝇，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雨量充沛。公元4世纪时，早期铁器时代的人就在此定居下来。到公元10世纪末，他们的居住地被“卡洛莫文化”农民所占据；“卡洛莫文化”农民虽然侧重于放牧，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早期铁器时代有些近似。新陶器同前几个世纪的刻纹陶器相比，较为简单，只饰有几条横刻纹或印上几道镶边。许多容器成袋状形。

曾对位于现代卡洛莫城附近的伊萨穆－帕蒂定居点进行过大规模的发掘（见图片21.1）。这个定居点同巴托卡高原的多数铁器时代遗址一样，是一个大土墩，由几个世纪堆积下来的底土和住房瓦砾构成。这土墩虽然是7世纪后至少有200年历史的几个小定居点的遗址，但是在土墩上后期的村庄要大得多。到公元10世纪末，“卡洛莫文化”在此地达到其鼎盛时期。伊萨穆－帕蒂的最后一个村庄废弃于13世纪，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若干个用泥土和杆子筑成的棚屋，围绕着位于土墩顶点的一个牛圈。村民以养牛和种植谷物为主。他们的作业靠的是制作犁具、箭镞和其他用具所必备的简单炼铁术。在每一个卡洛莫文化村(在赞比西河的中上游和巴托卡高原均可见到)，当地的或远距离的物物交换活动的一些痕迹，现在仍清晰可辨。在一些村子里发现了铜条和铜珠，这些东西显然是从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换来的，因为在那些地方的地表层发现有熔炼过的铜。更重要的是，从“卡洛莫文化”定居点和墓地发掘出一小撮由东海岸输来此地的玻璃珠和非常稀有的玛瑙贝；这些东西证明了在中非洲的这一偏僻角落曾经有过远距离的物物交换和远距离的贸易活动。这些东西也许由于数量太少，对早期铁器时代的社会结构产生不了什么影响。

“卡洛莫文化”很可能是起源于上赞比西河流域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卡洛莫人的工艺和经济策略与早期铁器时代的农民相近，这表明巴托卡高原上铁器时代的文化源远流长。由于村庄一个个破裂，农田和牧场承受巨大的压力，铁器时代的人口迅速向四周广大地区扩散。[3]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卡洛莫文化”在乔马附近的某些地区和在赞比西河流域一带一直延续到1450年。但是，在巴托卡高原的北部和西北部根本没有出现卡洛莫文化，其原因至今不明。 529

在马扎布卡和洛钦瓦尔地区另有一系列定居点，但他们都不如卡洛莫土墩那样有价值。以马扎布卡附近一个定居点命名的“坎吉拉传统”是卡富埃洼地边缘一带的塞班齐遗址中最有代表性的，它过了一段时期就归入了在整个巴托卡高原兴盛了好几个世纪的

③ 参阅 D.W. 菲利普森，1968年，第191、212页。



图片21.1 正在发掘中的伊萨穆－帕蒂土墩（赞比亚）

现代伊拉－通加文化之中。卡洛莫陶器和坎吉拉陶器的风格有某些相似之处，因此有些权威人士认为这两种陶器都起源于讲伊拉－通加语的民族，这种语言已被公认为是赞比西河以北历史最悠久的语种之一。这可能意味着伊拉－通加人至少在1000年以前就来到了他们现在居住的家园了。在卡富埃洼地最西北角上的纳姆瓦拉地区还有一群大土墩。那里的土墩中有一种至今尚难以确定其归属的铁器时代后期的陶器，因为它们与卡洛莫和坎吉拉陶器都有联系。所有这三种陶器都可说明在赞比亚南部很早就住着伊拉－通加人，这一假说至少在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前是可以站得住脚的。

赞比亚在此之后的历史是整整5个世纪人口的剧烈流动和政治角逐高度激化的历史，从而使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黯然失色，最终被源自扎伊尔的新文化传统所吞没。但是，在赞比亚北部、西部和东部，一直到10世纪结束之后很久，还有早期铁器时代的人生存下来。戴维·W.菲利普森断定两大陶器传统都是在公元1000年以后不久产生于赞比亚。卢安瓜传统遍及赞比亚的中部、北部和东部，甚至延伸到马拉维，而在赞比亚西部有伦圭本古传统。这两种传统一直保存到现在；虽不太了解它们的起源，但它们现代的形式与早期铁器时代的传统已有明显的区别。

11 和 12 世纪经济和社会的变化

到了 11 和 12 世纪期间，在赞比西河以南，基督纪元最初 10 个世纪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在若干地区已被新的社会所取代。最为人所熟知的是所谓“豹地传统”，这种传统从林波波河流域向北延伸到布拉瓦约地区和林波波－赞比西两河流域的中部地区（见插图 21.1）。[4] 豹地传统的村庄要小于早期的农民定居点，这可能出自人为的生态变化的缘故 530 这些村庄与早期铁器时代的村庄不同，有许多是曾经多次有人住过的。放牧的牛群似乎要更大些。从一些人的墓地中发现了牛俑和牛骨，似乎可以说明，与前几个世纪相比，牛已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豹地传统与铁器时代早期的传统毫不相干，几乎可以肯定它的创造者是外来移民，与先前在此居住的人没有什么直接的文化关系。

在赞比西河以北尚未发现豹地人的痕迹，这说明他们是从博茨瓦纳和安哥拉这两个未经考古研究的地区的草原来到他们家园的，但这纯属猜测。早期豹地人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主要以农耕为业(种谷子和高粱)，同时也从事狩猎与采集。他们同邻近的卡洛莫人都掌握了简单的炼铁技术，在他们分散的村庄里出现了少量进口的玻璃珠和海贝壳。12 世纪末到 13 世纪初，豹地人的人口增加了，他们开始耕耘于马塔贝莱兰黄金地带比较肥沃但却较难耕作的土地。这一带发现了居住时间已经很久的村庄，那里的开发大致与最早开采金矿的时间相同（据认为赞比西河以南最早开采黄金的时间大约在 12 世纪前后）。豹地的某些定居点，同林波波河流域的巴姆班迪亚纳洛的一样，占地很大，其中心总是一个牛圈。另有一个定居点在 111 公里以外的马佩拉山丘上。这山丘高仅 92 米，是用石头胡乱堆砌而成的梯地，石方工程之大，如果没有集体的巨大努力是难以完成的。在梯地的最高层有一群小屋，它们比村庄里其他房屋更为坚固，也建造得更为精致，可能是当地社会中享有特权的重要人物的住处，这与没有任何社会等级或地位差别的早期文化形成对照。玻璃珠和其他一些输入物品已较为普遍，似乎远程贸易有了很大增长。

后期豹地文化体现了以采矿、冶炼、贸易、农耕为基础的经济，既多样化，又严加控制；政权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都居住在人口集中的重要定居点。这在闻名于世的马蓬古布韦遗址中就显得十分典型。那里，在 15 世纪，为数不多的一小撮富有统治者占据了一座长形低矮山丘的最高处，可以俯瞰林波波河流域。山丘的背阴处有许多如今业已埋在地下的村庄，表明那里曾经居住过大量人口。[5] 山丘上的墓地中发现了金 531 珠和金片，还有许多玻璃珠和其他一些输入物品。林波波河流域丰富的铜矿很明显是马蓬古布韦统治者财富的重要来源，他们那居高临下的住所至今仍被人们奉为圣地。马蓬古布韦是否由在政治上和宗教上对当地农民起支配作用的少数人统治的问题，如同林波波遗址和在它东北面的大津巴布韦两者之间关系的性质问题一样，人们尚在争论之中。为什么当时的人要在难以耕作的土地上耕种，为什么定居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定居点越来越大？对这种总趋势，迄今人们仍不太理解；确实，甚至连企图解释这种现象的权宜

④ T.N. 赫夫曼（T.N. Huffman），1974 年（b）。

⑤ B.M. 费根，1964 年。

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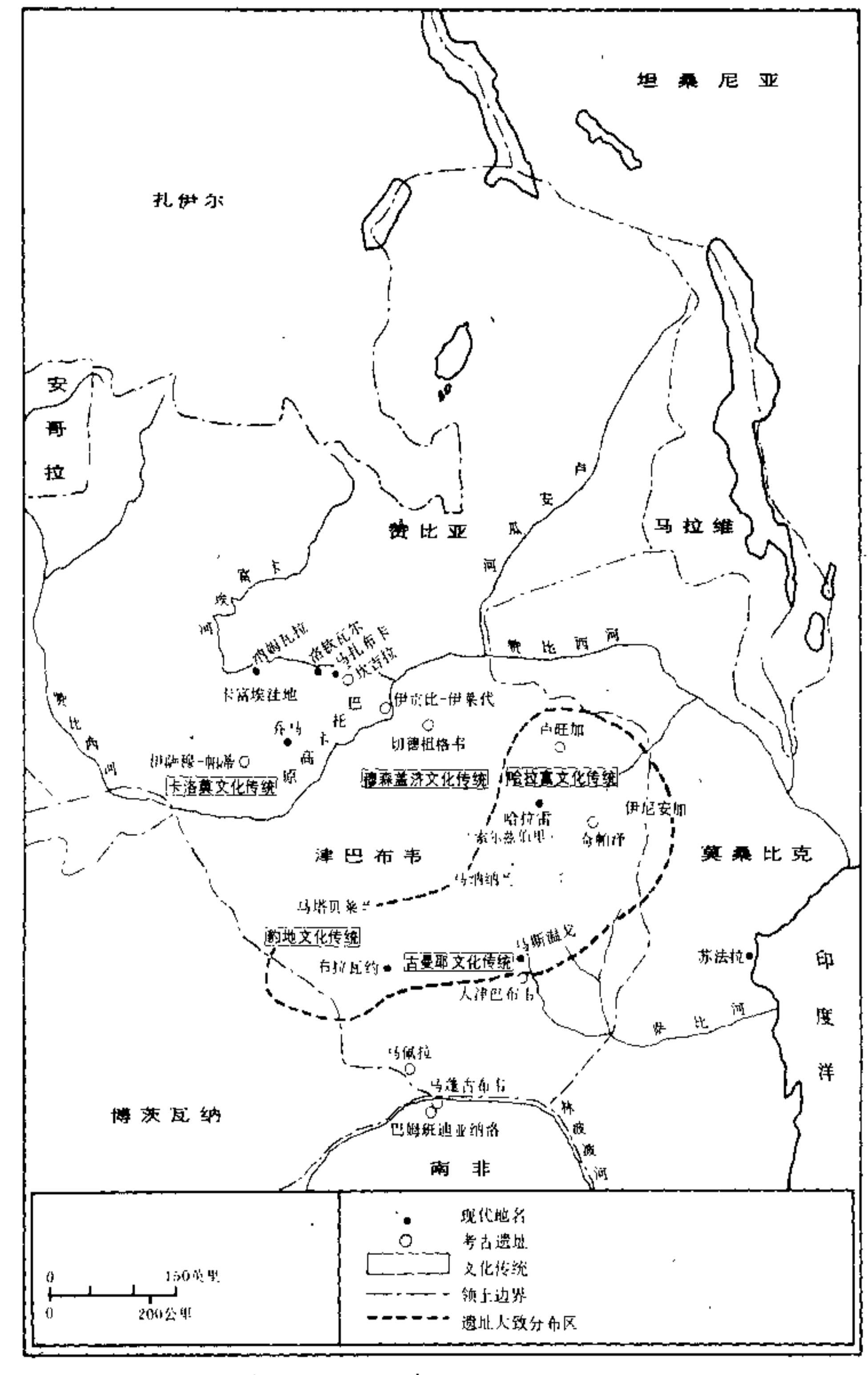


图21.1 本章提到的考古遗址和文化传统(B. M. 费根)

的假说也还没有。

在赞比西河以南其他地区也有新的农业文化的迹象。东北边的穆森盖济传统在靠近赞比西河流域南部边缘和北部高原上繁荣兴盛，在哈拉雷（即过去的索尔兹伯里）地区发现了哈拉雷传统。这两个传统都是农业文化，更具有12世纪以后豹地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特点。那里的陶器更接近于后期铁器时代而不是早期铁器时代的风格，东边伊尼安加地区自给自足的农民也许同属于这种文化的后期传统，他们将简单的山坡农业文化一直保持到现代。

以上各种文化传统，都显然是基督纪元第一个一千年结束时的新进展，可以想见这是外来的迁徙者或技术革新促成的。这些文化传统在不断变化之中，一直延续至近代。豹地传统，分南北两支，前者一直延续到19世纪。曾有人试图把这些考古学上的文化传统同现今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之间地区仍在使用的各个语种联系起来，这虽然纯属试验性的，但也可能有其成效。绍纳语是那里具有代表性的最大语族，其中至少包括6种地方方言群（卡朗加语、卡兰加语、恩道语、马尼卡语、泽祖鲁语和科雷科雷语）。至今仍在流行的其他语言，有恩德贝勒语（19世纪时传入）、通加语、赫伦圭语和文达语，它们都是外来语。绍纳语来身与东南的班图语没有直接关系。上面所说的几种文化传统，被认为与绍纳语族中的某一方言群有密切的联系。豹地人与卡朗加语相联系，哈拉雷文化同泽祖鲁语有关。虽然卡兰加语、科雷科雷语、恩道语和马尼卡语与考古遗址或各种陶器传统之间的联系现在仍缺乏证据，但是根据口头传说，认为上述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之间大多数后期铁器时代的文化可能与讲绍纳语的人有关的看法，是不无道理的。正是在讲绍纳语的人中间，12世纪之后在政治和经济上有了重大的发展。

津巴布韦文化的起源

532

现代城镇马斯温戈（以前曾称维多利亚堡）附近举世闻名的大津巴布韦遗迹，是当年津巴布韦文化蓬勃发展的象征，以建筑风格的优美和关于其起源的许许多多说法而著称。[6]现在，所有治学严谨的学者都把大津巴布韦看成是非洲发展的产物，它是用当地出产的原材料、按照数世纪一直沿用的建筑原理建造的。但是，以这一个遗址和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其他同类遗址为支柱的经济、政治和宗教组织产生的根本原因迄今仍然是一个谜。[7]

考古发现和最初的定居点

大津巴布韦早期铁器时代居住点的遗迹仅限于可以俯瞰大围场（大津巴布韦所有建筑物中最为壮观的建筑）的所谓阿克罗波利斯山上一系列文化传统中层次最低的一些，以及下面山谷中分散在各处的少量陶器。阿克罗波利斯山上早期铁器时代的层次已确定

⑥ 参阅R. 萨默斯（R.Summers），1963年，对这些说法的考察和评论。

⑦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P.加莱克（P.Garlake），1973年。

属于公元4世纪以前的时期，但是没有任何人能真正言之有物地说出早期铁器时代的人们在大津巴布韦定居的真实情况。用彼得·加莱克的话说，很可能雨量充沛的山谷提供了“良好的猎场和具有松软易耕土壤的开阔土地。”一直到10或11世纪（年代尚未确定），后期铁器时代的人才在大津巴布韦定居。对于这些人的情况，我们更是一无所知，因为除了大津巴布韦古曼耶定居点以外，所发现的他们的遗址实在太少。他们的陶器与早期铁器时代的极不相同，但可与豹地的陶器相比，尽管两者之间差别也十分明显。

现在，人们对古曼耶传统的情况仍不太清楚，只有在发现并挖掘出更多同类定居点之后方可搞清真相。这一传统的主人在尚未建起花岗石围墙之前就在大津巴布韦居住了，有人认为他们代表了沿着豹地的系统发展起来的另一种后期铁器时代的文化传统，因为古曼耶传统与豹地文化有着某些共同的特征。但是，不管给古曼耶传统本身下多么确切的定义，古曼耶人的文化到了12世纪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陶器制作更加精美，制出了泥人俑，出现了更多的玻璃珠和其他输入物品，建起了更为牢固的泥土与杆子结构的建筑，铜、青铜和金饰品开始增多，用花岗石垒墙在大津巴布韦已是十分普遍。这些发展至少部分地同已经提到过的豹地遗址中诸如马佩拉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到了13世纪结束时，一个强大而有影响的国家、一个以大津巴布韦为中心的国家已经奠定了基础，其疆土延伸到马绍纳兰中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这个国家早期与豹地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传统，这似乎已成定论，最根本的一致点大概在于有共同的语言，即绍纳语。再次引用彼得·加莱克的话说：“大约从12世纪后期起，两种文化都日益扩大、丰富多采、并出现多样化，于是增强了社会、经济和职能的专门化，以致最后所有的居民点像遗址中的各个区域一样，都是由一族族人或一群群人共同建立，并发挥出各自有限的作用。”[8] 大津巴布韦看来就是这样的居民点。

在阐述大津巴布韦遗址本身之前，让我们先认真了解一下阐述大津巴布韦国家如何形成的一些假说。为阐述这个新国家的形成，曾有人提出过两种主要的学说，一种学说是历史学家唐纳德·亚伯拉罕提出的，他认为绍纳人是公元10世纪末外来的移民，他们不仅把采矿术和其他一些新技术介绍了进来，而且还带来了他们对祖先的崇拜。为此他们建立神庙，主要的一个神庙建立在姆汉瓦山上，名为德津巴-德泽玛布韦（即石屋）。亚伯拉罕认为，绍纳领导人使用机智的政治手腕，取得了对臣服酋长的松散邦联的统治，这些酋长向他们进贡象牙和砂金。从东非海岸来的阿拉伯商人与这个强大联盟建立了联系，把它当作扩大黄金和象牙贸易的媒介。国家权力中心掌握在控制着姆瓦里崇拜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复杂的祭祖仪式的酋长和祭司手中，他们充当姆瓦里崇拜和普通百姓之间中间人的角色。这种所谓“宗教学说”是以对绍纳人口头传说的研究为基础的，传说的细节尚未形成文字。[9]

另一种学说认为卡兰加人的国家主要起源于活跃的贸易。到了14世纪，玻璃珠和其他输入物品，还有叙利亚玻璃器皿、波斯彩釉陶器和中国青瓷，在大津巴布韦的需求有很大增长，这表明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大津巴布韦的金器和铜器也在激增，因为赞比西

---

[8] P.加莱克，前引著作。

[9] 见 D.P. 亚伯拉罕（D.P.Abraham），1961年。

河以南到处都在开采黄金和铜。大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阿拉伯沿海城镇基尔瓦大大地繁荣昌盛起来，这一飞跃看来是和莫桑比克沿海苏法拉地区黄金和象牙贸易的增长有关，因为这一沿海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同中南非洲进行黄金贸易的中心。一位阿拉伯旅 534 行家伊本·巴图塔于1331年访问基尔瓦时就提到过苏法拉的黄金贸易。据他说，那里的黄金贸易在“利米斯所属土地尤菲”进行，从苏法拉往内地走大致一个月的路程。[30]

后者称为“贸易学说”，是以进出口贸易剧增为依据的。这种学说认为在社会划分成阶层的世袭社会里，酋长是最富有的。但他的一部分财富通过各种庆典活动和婚丧嫁娶等等而在社会中再循环。随着贸易往来的不断增加，不经过社会再循环的财富总量日益增加，因此使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政治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种情况从长远看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到后来，很可能富有的统治者为了进行公共工程建设付给百姓报酬，或者是通过政令让百姓以服劳役的形式从事国家工程建设，后一种制度，举例而言，曾在赞比亚的洛齐人中实行。这样，在大津巴布韦，统治者的财富越来越多，从而导致财富更大的再分配、人口集中在主要的商业中心、以及组织劳动力来建造大围场和阿克罗波利斯山高大、独立的围墙。这种“贸易学说”基于两个论据，一是东部沿海贸易的发展是国家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是认为经济实力也就是政治权力，这种提法也许只有部分道理。“贸易学说”认为建石头城需要大量劳动力，然而根据对其他地区的分析判断，情况并非如此。

形成大津巴布韦国家过程中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宗教学说”和“贸易学说”都没有把自给农业的特点和决策机构复杂化两个现实情况考虑进去，这两者至少在很大范畴内制约着社会发展的总方向。大津巴布韦国家的雏形早在有口头传说之前即已出现；所有证据都出自考古遗址或最一般的语言资料。考古学家已经证实，讲绍纳语的人大概是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之间后期铁器时代文化传统的形成者。到了13世纪，豹地传统和古曼耶传统随着贸易往来的更加扩大和政治权力的更加集中而越来越趋向于精巧细致。一些地区人口密度增长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从而使易地耕作的方法有所改进，采用了更加先进的清除森林树木办法以及可延长菜地休闲 535 期的烧荒技术。但是，虽然大津巴布韦和其他一些中心人口较为集中，大多数人仍散居在一个个较小的村庄里，人们随农业和牧业的需要定居和搬迁。像大津巴布韦那样的一个重要中心，一旦吸引了大批农业人口，必然导致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保持在较高水平，时间一长也必然造成地力下降、放牧过度和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

非洲铁器时代农业社会的基础是自给自足，虽然它也可能从四周较远的地区获取诸如铁矿石或棚屋杆子之类的原材料。除了宗教或经济的目的之外，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可激发远距离贸易的动力，而且经济目的在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社会中也很难表现出来。在某种限度下具有这类目的与把分散的农业人口都团结在单一的宗教、政治或商业名下是

[30] 伊本·巴图塔（Ibn Battūta），英译本，1958－1962年出版。毫无疑问这个遗址尚未探明。在关于基尔瓦和津巴布韦关系的档案中，有一枚在大津巴布韦发现的钱币，年代为哈桑·苏莱曼时期，约1320－1333年。

完全不同的情况。虽然东非沿海贸易引起的对原料的需求明显地促成了新的经济主动性，但是这种贸易本身并不能把人们统一在单一的政治和宗教的权威之下。这过程不仅要有少数几个家族在宗教或政治上的聪明才智，而且要有整个社会（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愿意接受一种更具等级制度特色的社会政治结构，即使这么做在当时看来是很不自觉的。若以单纯的宗教或商业的动力来解释大津巴布韦国家或其他任何一个非洲王国的起源，那是完全错误的。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这两种因素，以及在考古记载中很难找到的许多其他因素，在铁器时代的社会中，由于人们的政治和经济眼光已从一个村子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管大津巴布韦崛起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它是一处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名胜古迹。[⑪]这遗址有阿克罗波利斯山居高临下，在这座长长的、花岗岩山上到处是巨砾石（见插图 21.2 和 21.3）。一代代的居民在一块块巨砾之间垒上石墙使之形成一个个小围场和一条条狭窄通道。最西边的围场面积最大，四周由厚厚的、独立的石墙围住。后期铁器时代的人长期居住在这里，于是大津巴布韦的历史至少可分成三个阶段。定居人口最为集中的时候开始于 11 世纪左右；但直到 13 世纪才建有石头墙，那时比较牢固的泥土房屋取代了早期用杆子与泥土筑成的棚屋。西围场的护墙也是在那时建的，如今在地下的沉积物中可以见到有较多的外来物品。也正是在 13 世纪或 14 世纪，阿克罗波利斯山下的山谷中建起了第一批房屋。

540

四周筑有独立高墙的大围场（见插图 21.3），是 14 世纪期间逐步建立起来的。围墙的平均高度为 7.3 米，底部宽 5.5 米，顶部宽 1.3－3.6 米。墙心用碎石，内外壁则是平砌的石块。52 米长的围墙的墙顶垒有锯齿形的装饰（见图片 21.3），里面还有一道未建成的围墙。它显然已为现在那道围墙所代替，从而使两墙之间形成一条窄道，由此通向耸立在大围场里筑造精巧的圆锥形石塔(见图片 21.5)，当初建造这座石塔的用意现在还不太清楚。大围场本身又分成若干小围场，在这些小围场里，用杆子和泥土筑成的房屋的房基如今仍清晰可辨。这大概是大津巴布韦统治者们的住处，这种建筑结构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并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

在大围场的沉积物和阿克罗波利斯山较上层次中发现许多金、铜饰物，也还有许多相当精巧、用皂石制成的碗和雕刻品，这些东西曾被以前的探宝人挪动过地方。除此之外，还发现大量 14 世纪输入的玻璃珠以及中国、波斯和叙利亚的陶器、玻璃器皿和瓷器。很显然，那时东非沿海贸易已深深地渗入到了内地，大津巴布韦当时已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中心。可以想象，那里的统治者对商业享有相当大的垄断权。国外商人或他的代理人为了自身的安全和获取高额利润通过内地统治者办事毕竟还是大有好处的。的确，在矿工和他们的产品受大津巴布韦政治控制（以宗教和纳贡的纽带依附于它的统治者）的情况下，他们别无选择。但是要评价阿拉伯大商人在津巴布韦的事务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政治作用，或他们对这个非洲国家的建筑或工艺有多大影响是很困难的。[⑫]

---

⑪ 参阅 T.N. 赫夫曼，1972 年。

⑫ 关于东非与东地中海国家的贸易关系，见 H.N. 奇蒂克(H.N.Chittick) 的著作，1968、1970 和 1974 年；也可参阅 H.N. 奇蒂克和 R.I. 罗特伯格（R.I.Rotberg），1975 年。

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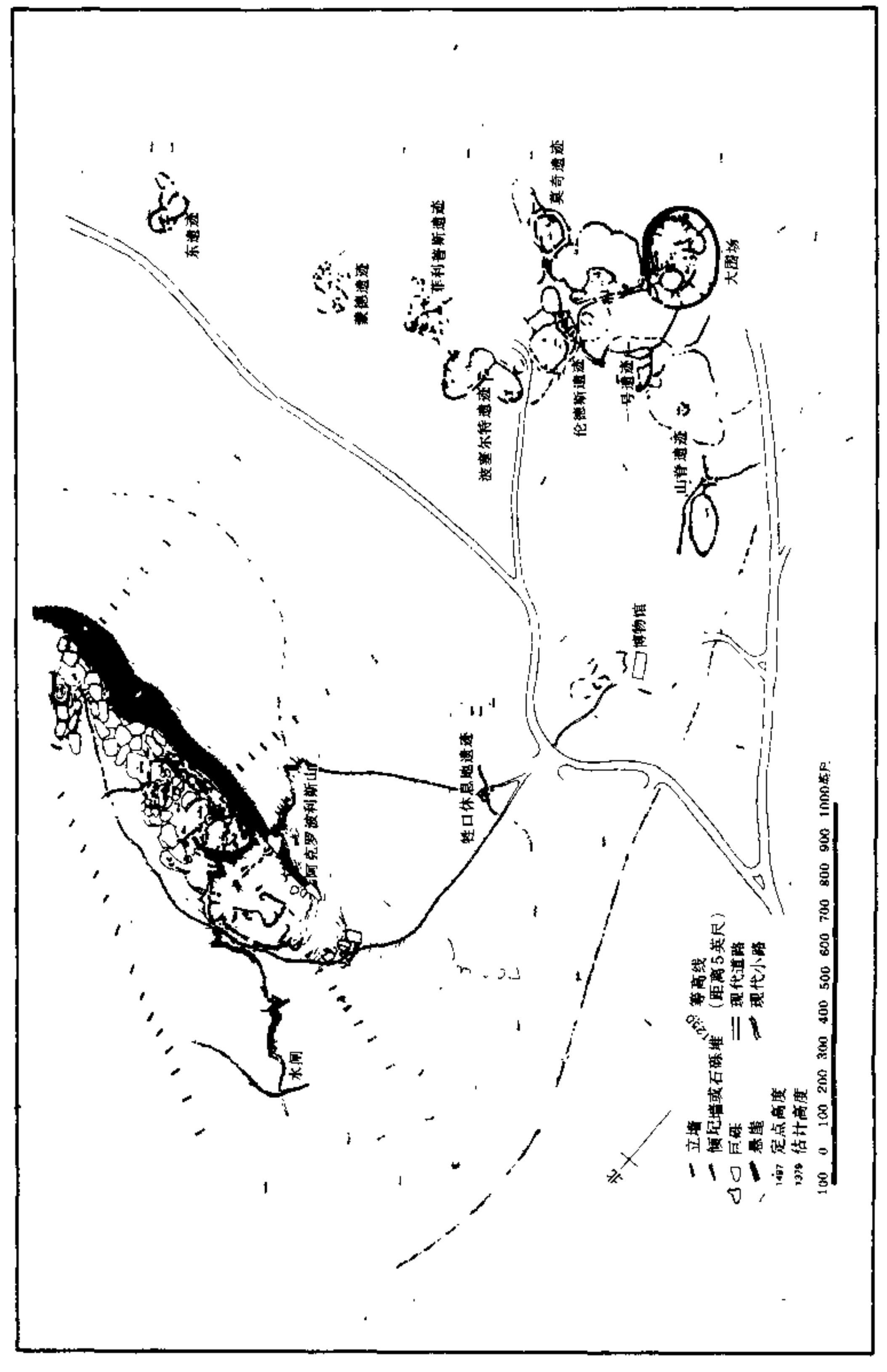


图21.2 大津巴布韦遗址 资料来源：R.萨默斯，《津巴布韦，罗得西亚之谜》（纳尔逊出版社，1963年）

5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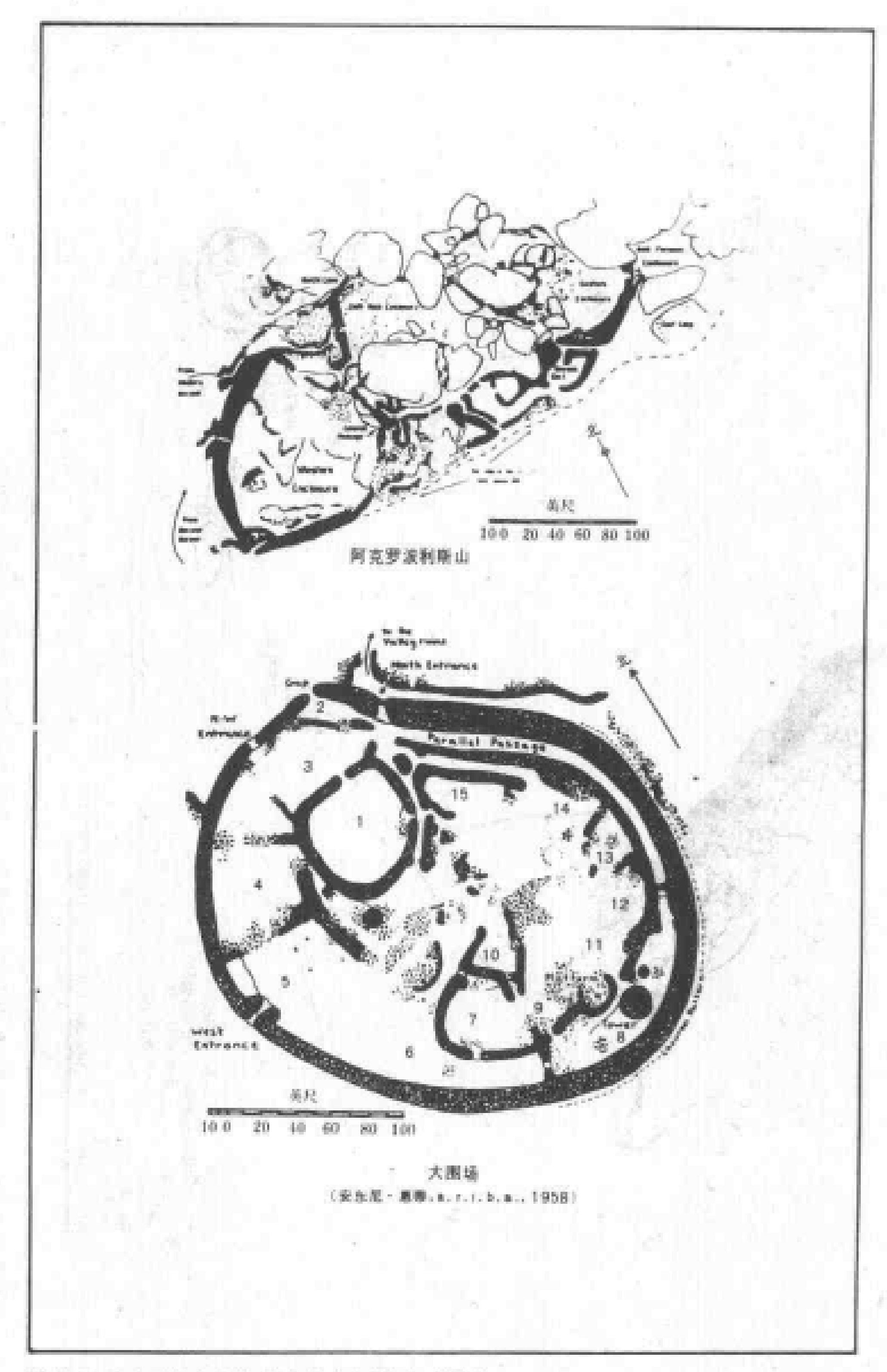


图21.3 大津巴布韦遗址：阿克罗波利斯山和大围场
资料来源：R·萨默斯，《津巴布韦，罗得西亚之谜》(纳尔逊出版社，1963年)

Volume IV – chap 21

5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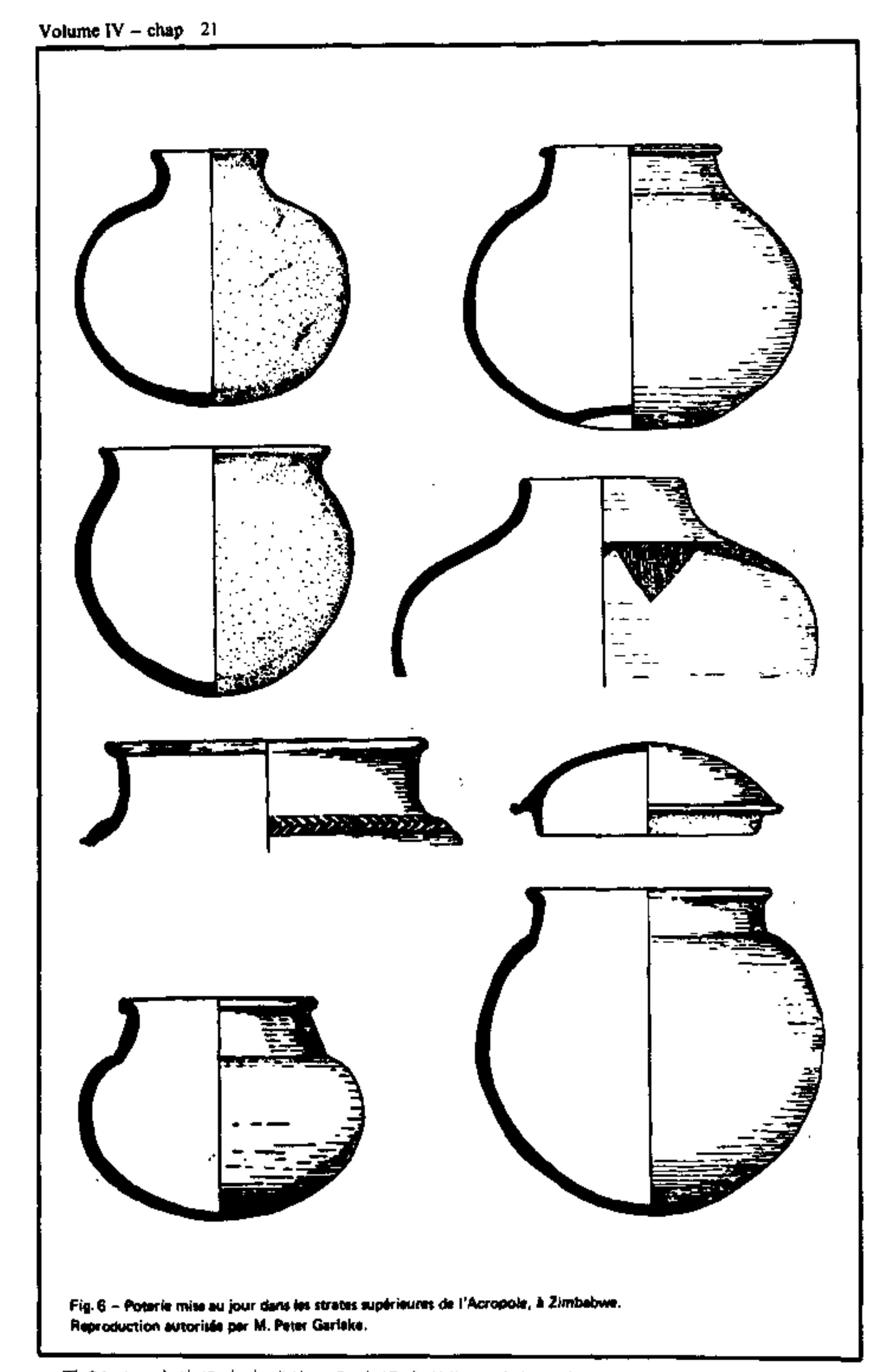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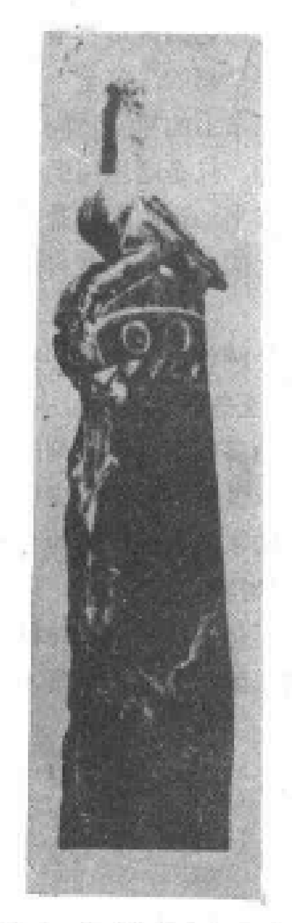


Fig. 6 – Poterie mise au jour dans les strates supérieures de l'Acropole, à Zimbabwe.
Reproduction autorisée par M. Peter Garla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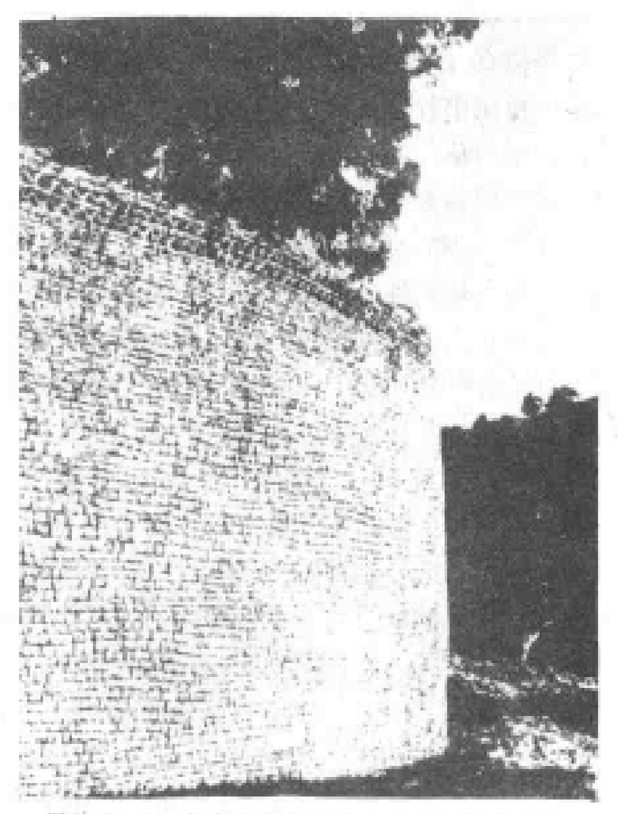
图 21.4　大津巴布韦遗址，阿克罗波利斯山后期层次出土的陶器
资料来源：彼得·加莱克



图片21.2 大津巴布韦遗址外墙顶部遗下的椭圆形壁垒内观



图片21.4 在大津巴布韦谷地菲利普斯遗迹内发现的石柱，顶上为一只用皂石雕成的鸟



图片21.3 大津巴布韦遗址大围场四周的围墙



图片21.5 大津巴布韦遗址内的锥形塔

有一学派认为，阿拉伯人在大围场的设计方面起了指导作用。他们把圆锥形石塔和东非许多清真寺对比，然后论证说，大津巴布韦所用的石头是一层层垒起的，完全不同于绍纳人村庄中普通而简单的杆子和泥土筑成的建筑物。但是大津巴布韦的建筑物同其他非洲国家用草、泥和杆子建的大围场和酋长的住处却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这里用的是石头罢了。用石头建造是因为石头坚实耐久，而且还因为在大津巴布韦一带到处都是自然剥落成 50 - 100 厘米厚的花岗岩石块。建造者们能够得到无数合用的石块，这些自然542 剥落或经过火烧水冲形成的石块只要稍稍加工即可使用。

大津巴布韦的建筑并没有与非洲的习惯背道而驰，圆锥形石塔是例外，它的式样独特，目前尚不明白其意义之所在。的确，在许多与大津巴布韦同期或晚些时候的遗址中，也有独立的围墙、梯地和各种形状的石造物。正是这些遗迹的规模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之产生许多关于他们祖先的神话。要把大津巴布韦的建筑或者是它的整个文化完全归诸受阿拉伯的影响是不可思议的。也不能把大津巴布韦国家的领导人说成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俯首听命于阿拉伯人和甘受外国人操纵的傀儡。即使有人持不同的意见，认为实际居住在大津巴布韦势力范围内的阿拉伯人或他们的代理人远不是少数几个，这种说法也难以成立。远距离贸易充其量只是偶而的，或者是季节性的，而不是一种经常不断的商业活动。

大津巴布韦影响的扩大及其在该地区独占鳌首

大津巴布韦就规模而言确实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遗址，它是形成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分水岭的花岗岩地区约 150 处遗迹中最大的一个。在津巴布韦一带和在马绍纳兰还有其他一些遗迹，它们各有 1 - 5 个围场不等，至少有一部分在围场周围筑有独立的围墙，围墙内则是用杆子和泥土搭起的棚屋。砌得很整齐的石头建筑是大津巴布韦的建筑风格。已挖掘出的石头建筑中偶而发现金器、铜丝手镯、玻璃珠和火锅，以及代表大津巴布韦文化特色的纺锤锭盘。在卢旺加和奇帕泽的遗迹中，牛是至关重要的。已挖掘出的 5 处遗迹说明它们建成和有人居住的年代是 14 世纪初到 15 世纪末。有些遗迹的年代则确定为 16 世纪。所有这些遗迹规模都很小，当初居住的人口都极少。它们一般都是傍山而建，山上有取之不尽的石头。因为规模都太小，所以不能成为单独的经济单位，它们或许是由周围村庄中那些外来劳力建造的，这些人都是靠易地耕作为生的农民。彼得·加莱克指出，未筑围墙的遗址都没有发现遗迹中那种人工制品。他写道，“提供这类劳动的定居点肯定有一种与遗迹中的文化不相关联的物质文化，虽然在遗迹中找不出足以证明确有其他文化的部族存在的根据。”他还认为，所提供的帮助是采取断断续续纳贡的方式，但这种假说尚未得到证实。

在纳亨古扎的遗迹中独有一个非常大的棚屋，分成三个房间。其中一间很大，可以543 容纳许多人，第二个房间里有一张椅子，第三个则是一间“与外界隔绝的隐秘的房间，它一定是摆放特别重要的物品用的，房间里有一块石碑，竖立在一个刻纹石台上。”这所

不同寻常的房屋很可能是一位起支配作用的重要宗教权威发号施令之处，这位权威不仅是需要建造孤立围场的原因，而且也是使大津巴布韦国家得以保持团结的活的聚合剂。人们在这个地方会产生一种感受，即有一种非常强大和不容置疑的政治和宗教权威，他对分散的农业人口的控制依靠的是对姆瓦里神的权力的某种坚定信仰或者是渗入每个家庭的其他宗教媒介。远距离的贸易虽定期进行，但并不是如此强有力的手段，毕竟只对一小部分人有影响。

大津巴布韦国的边境现在仍很难确定，尽管可以肯定它的腹地是在马绍纳兰中部。还有一些具有大津巴布韦风格的遗址，是在如今的马塔贝莱兰境内，那里的大津巴布韦人渗透到豹地人的领域中去。但是一直到15世纪大津巴布韦衰败以后，马绍纳兰才成为政治和商业的开创和发展的主要中心，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就不属本章叙述的范围了。

与东非沿海地区的商业联系

大津巴布韦以及依附于它的一些定居点的影响，远远超出该国直接的和比较有限的边界。位于东非沿海地区的基尔瓦城的繁荣与苏法拉的黄金贸易的兴衰紧密相连。早在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迪就曾写过基尔瓦黄金贸易的情况。4个世纪以后，伊本·巴图塔曾把基尔瓦描绘成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全靠南部黄金贸易繁荣起来。[33] 无庸置疑，大津巴布韦统治者财富的多寡取决于沿海贸易的好坏。基尔瓦本身在商业上历经沧桑，于15世纪达到鼎盛时期，重建了有精美圆形拱顶的著名大清真寺。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基尔瓦、东非沿海一带和大津巴布韦全部衰落了。当葡萄牙人抵达苏法拉时，沿海贸易只不过徒有虚名而已。尽管大津巴布韦与外界隔离，但它的贸易联系和境内的黄金不仅促进了东非沿海地区而且也促进了偏远地区的繁荣和经济发展。

当时对沿海贸易的结构，我们目前还不太了解。因为内地的贸易遗址几乎都尚未挖掘，或者都未能逃过早先探宝者锐利的目光。可是在14和15世纪，北马绍纳兰和赞比西河流域的贸易活动相当频繁，这在一些重大考古发现中已有反映。这一地区在早期铁器时代就有人定居，一直延续到10世纪末。从12世纪到14世纪，在北马绍纳兰居住的是穆森盖济陶器的制作者，他们是很少从事贸易的农民，据认为他们讲的是绍纳语。他们的文化与他们在大津巴布韦的富有南方邻人相差甚远，尽管穆森盖济后期的一些定居点有了较多的贸易货物。但是在马绍纳兰最西北角和赞比西河流域中游的低洼地区情况却远非如此，在那些地方，定居点的规模以及铜器的制作和交易显得非常重要。位于富饶的乌伦圭地区的切德祖格韦遗址在肥沃的草场上占地24公顷；遗址中大量的牛和猎物的骨头证明了畜牧和狩猎所占的重要地位。但是制铜和制铁业意义重大，附近的铜、铁矿蕴藏量极为丰富。铜被铸成两种固定重量的标准铜锭；细丝手镯也是用铜做的，铜和锡制成合金是很平常的东西。纺织品也已使用，人们会制作精美的陶器，还有饰有精

544

[33] 马苏迪（al-Mas'ūdi），法文译本，1962年；伊本·巴图塔，前引著作，第2卷，第379及以后诸页。也可参阅《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5卷，第106－107页。

5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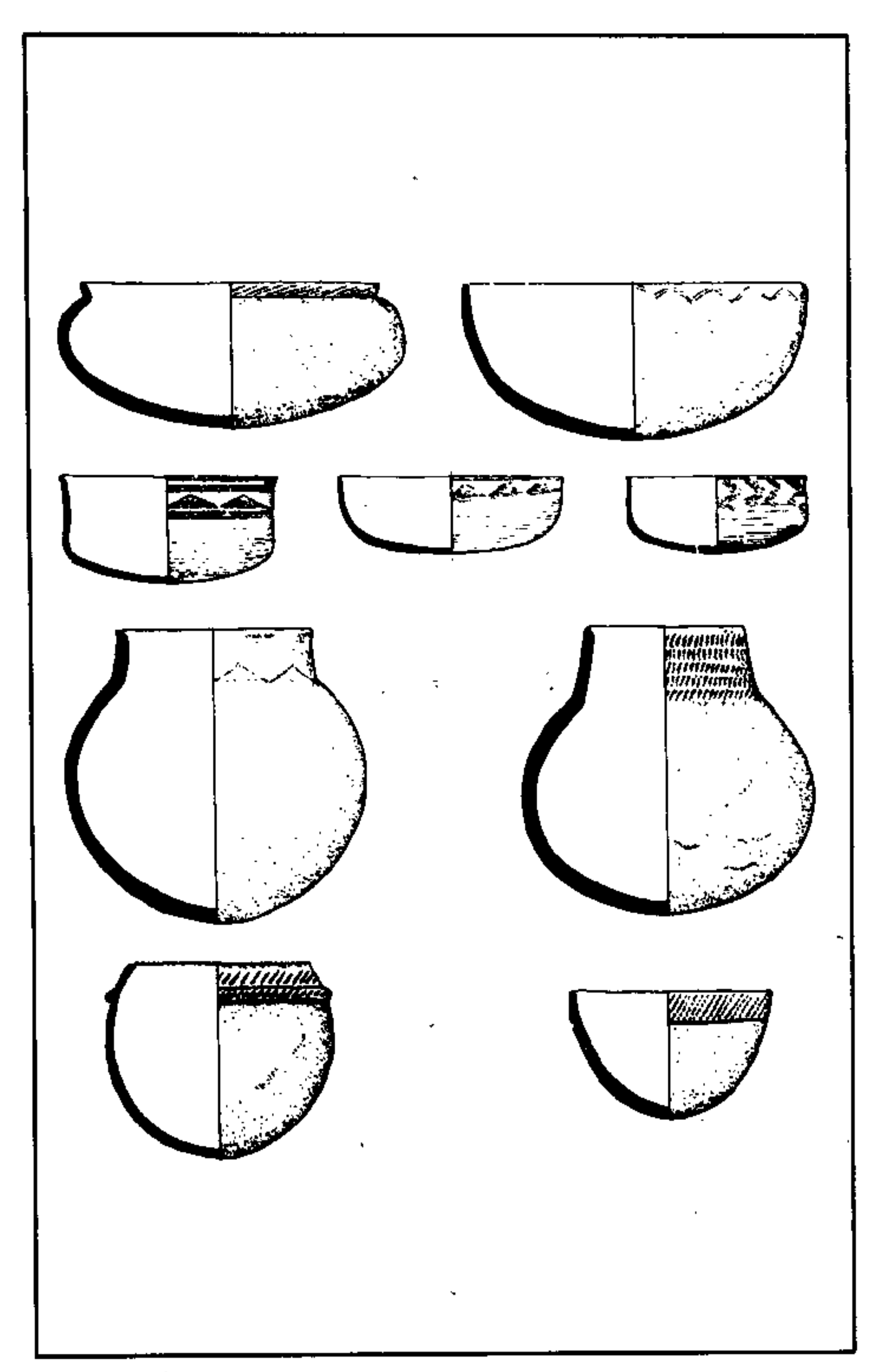


图21.5 津巴布韦，切德祖格韦出土的陶器
资料来源：彼得·加莱克

细雅致花纹的碗和酒樽，这在其他地方几乎是见不到的（见插图 21.5）。[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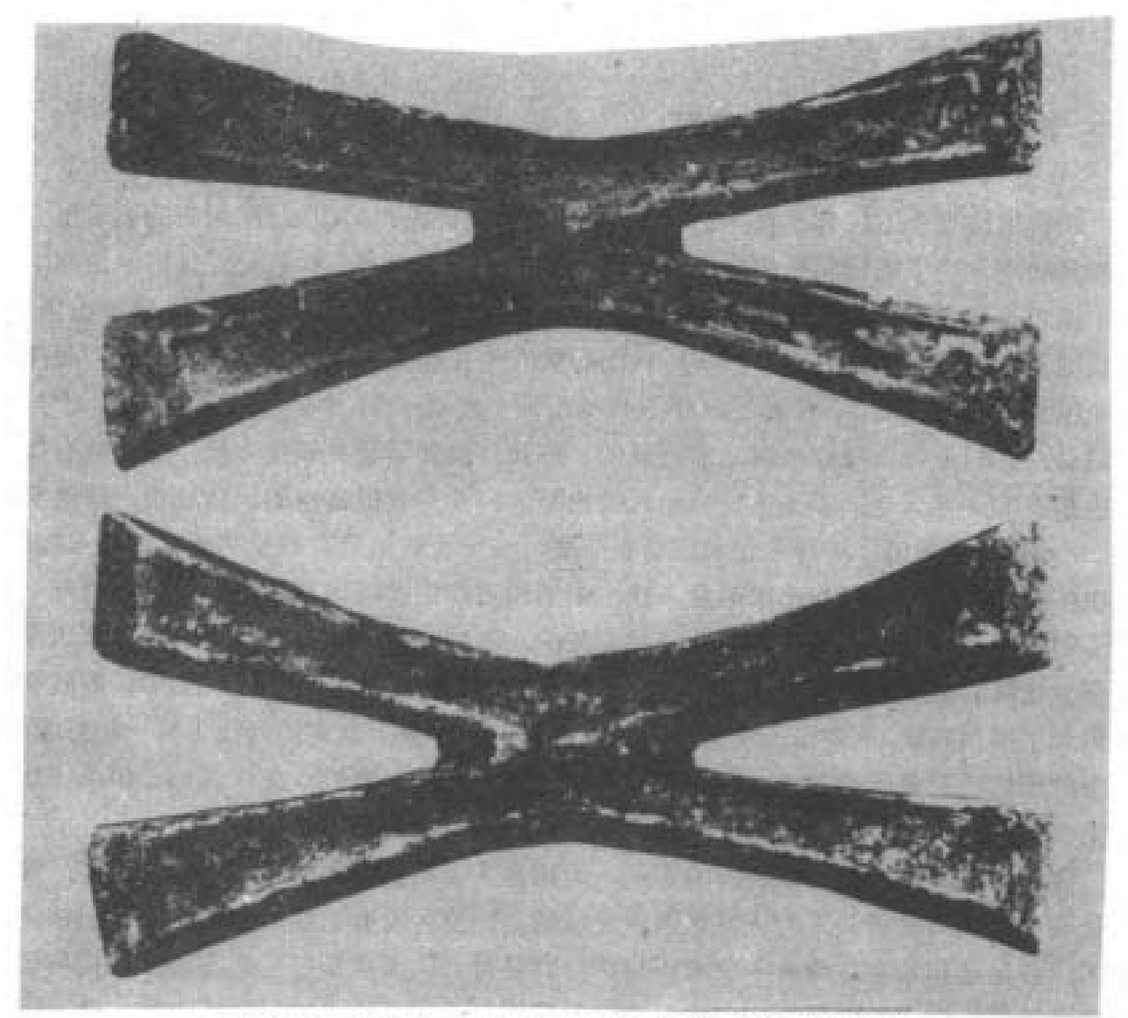
考古学与津巴布韦影响的范围

切德祖格韦人不仅到过大津巴布韦，而且也到过赞比西河流域。在闭塞的因贡贝－伊莱代定居点发现了他们制作的纯铜锭和精美陶器。1960 年的一些重大发现揭示出那里的远距离贸易和当地贸易的复杂情况。伊贡比－伊莱代位于赞比西河平原的一座小山顶上，距该河北岸有一段距离。这个铁器时代的居民点是在建造大型储水罐时发现的，现在是一个抽水站的所在地。在伊贡比－伊莱代的山顶上发现了 11 个装饰精美的墓葬，十分幸运的是，它们是在兴建储水罐之前发现的。好几具骷髅紧紧并躺在一起，旁边放有排列得很整齐的许多当地产和通过贸易输入的物品。一具穿着很富丽的尸体戴着一串康努斯（*conus*）贝壳项链（这种贝壳来自东非沿海，按传统规矩只有酋长才能佩戴），这具尸体在脖颈和腰间还戴着一串串的金、铁、铜圈和进口的玻璃串珠，腰部还放着另外一个康努斯贝壳和两个据认为是和伊斯兰教有关的木制护身符。在几个骷髅的头和脚边摆着铁锣、礼仪用锄头和一套套划线工具，还有不少十字形的铜锭（见图片 21.6）。四肢则套有铜丝手镯和脚镯，这些镯子据推测大概是和这些尸体身上发现的划线工具一起打制的。镯子的铜锈使死者所着几件衣服的数层棉布和树皮布没有腐烂。在伊贡比－伊莱代地层 **546** 的上部发现了许多纺锭的锭盘，由此可见，至少有一些布是当地织造的。

值得一提的是，墓穴里所有的葬品，无论是人工制品或原材料，除陶器以外，几乎全是通过远距离贸易买来的。赞比西河流域的这一地区没有重要的铜矿、金矿和铁矿石矿床，虽然盐和象牙这两种主要的贸易货物容易得到，而盐是日用必需品。铜锭与切德祖格韦的颇为相似，与墓葬同时发现的精美陶器几乎同乌伦圭地区遗址中的一模一样，而在伊贡比－伊莱代，玻璃珠的数量较多。从表面看，像伊贡比－伊莱代这样一个地方 **547** 似乎不太可能参与远距离贸易，因为当地没有金属矿藏。它参与这种贸易也许是由于卢西图河有蕴藏量丰富的盐矿，而岩盐在铁器时代是昂贵的商品，是当地以货易货中大量采用的商品。可能是由于掌握了盐矿才使伊贡比－伊莱代人得以与赞比西河以北和以南高原上的人们进行贸易往来。高原人用他们的贵金属换盐，而伊贡比－伊莱代人则用盐换取东海岸贸易中进口的奢侈品。伊贡比－伊莱代所起的这种中间作用纯系假设，因为以卢西图盐为交换媒介从乌伦圭和大津巴布韦换回进口奢侈品和铜、金、铁当然也是完全可能的。

伊贡比－伊莱代墓葬的年代不详，因为用放射性炭素测定骷髅的年代是很困难的。据了解，在该村的最高处有一座很大的用杆子和泥土筑造的房屋，它的地基在考古挖掘开始之前就被水罐建设冲掉了大部分。就在这座棚屋的底下有几座珍贵的墓葬，而棚屋本身也许是作为葬礼的一部分被毁掉了。骷髅的年代属于伊贡比－伊莱代的最后年代，伊贡比－伊莱代早在公元 7 世纪起就有人，也许是断断续续地在此居住过。到了 10 世纪末，这地方被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农民所放弃，他们与北面巴托卡高原上的务农者有过一

[13] P.S. 加莱克，1970 年。



图片 21.6　赞比亚，伊贡比－伊莱代出土的两枚十字形铜锭

些联系。伊贡比－伊莱代在开始阶段肯定不是一个从事贸易的村子，但大约在 1400 年，这个居民点又重新住上了人，只不过时间不长，在这些人快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在山顶的灰烬中建了上述墓葬。正是在这居民点的最后阶段，居民们可能才得到现在发现的那些进口物品——金、铜和精制的陶器。这正是大津巴布韦的鼎盛时期，那时阿拉伯人对东海岸贸易已经建立了牢固的控制。但是即使伊贡比－伊莱代是个贸易村子，从以货易货中得到的财富和利润也肯定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即死后葬于山顶的这部分人手中。在遗址的南部边界出土了 31 座墓葬，它们与葬在山顶的腰中缠金的人属于同一时期。草草下葬的尸体上只有极少数几具拥有装饰品，也仅仅只是寥寥几件玻璃珠串、淡水贝壳珠串或铜手镯而已。伊贡比－伊莱代居民点的社会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分成不同的阶层似乎是无可置疑的。

伊贡比－伊莱代也许是林波波河流域和赞比西河流域进行贸易活动的最北端，这一界线是随沿海贸易和大津巴布韦国及其邻邦复杂的政治网络的变化而变化的。除了 16 世纪葡萄牙人档案中某些不足凭信的记载之外，至今还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伊贡比－伊

莱代的珍贵墓葬与历史上哪个已知部族有关。1514年，瓦伦廷·费尔南德斯第一个深入到远离苏法拉的内地，他拜访了那里的酋长，并描述了当地进行的黄金贸易的情况。他报道了他耳闻的关于莫诺莫塔帕王国北面一条大河的故事，那里的“莫巴拉”人划独木小舟渡河与阿拉伯人进行贸易，用铜换回他们所需的布。伊贡比－伊莱代人和16世纪的莫巴拉人之间有关系已经得到普遍公认。

15世纪初期：变化与变革

当大津巴布韦国处于鼎盛的时期，中南非洲的历史记载和口头传说才只刚刚开始。到15世纪末，大津巴布韦被废弃，大部分地区陷于荒芜。那里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在强大的罗兹威氏族领导下向南、向西转移。口头传说提到世袭统治者的产生，第一位姆韦尼·马塔帕（*Mwene Mutapa*，意为掠夺者之王）是穆托塔。[19] 他的儿子穆托佩使姆韦尼·马塔帕的领土向北拓展，将他的指挥中心从大津巴布韦迁移到北边。结果到1490年左右，该王国的南部分裂了出去，成为一个由昌加米腊统治的强大独立国家。姆韦尼·马塔帕本身的领土只剩下赞比西河畔一条延伸到印度洋的狭长地带。这块领地在16、17世纪实际是处于葡萄牙人的势力之下。

但是，这些政治事件本身并不能清楚地解释像大津巴布韦这样如此重要的地方为什么会突然被废弃。这些人到了别的地方信奉的还是同样的宗教，从事的还是同样的经济活动。居民仍是靠易地耕作的自给自足农业为生。也许，这正是大津巴布韦被废弃的关键所在，它周围的农田也许再也供养不起哪怕是很分散的小村庄网，更不用说要供养居住在大津巴布韦的非农业人口中复杂的上层建筑了。农业产量的提高只有通过灌溉或人工施肥才有可能。这两种办法一种都没用过，而且在大津巴布韦附近热带草原的森林地带是根本做不到的。一旦可耕地的地力耗尽，出路只有一条——迁移到别的森林地带去，在那里再清理出新种粮地块来养活现有的人口。一旦土地的休闲期缩短了，就把牛和小牲口赶到新生出的植被上去放牧。至关重要的农业周期被打断了，这就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过度的放牧和人口大规模地向新的地区迁移。在大津巴布韦的周围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不管姆韦尼·马塔帕统治者的住处有多么神圣或那里的石头围墙有多么庄严，他都得搬迁。15世纪后期不稳定的政治变化似乎非常可能与环境的局限有密切的关系，而环境的局限始终困扰着以自给自足农业和分散的农业人口为基础的政治或宗教结构。 550

到1500年，中南非洲经历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在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统一和社会分成阶层，这种现象部分是在远距离贸易日益频繁和要求增加远地市场的情况下形成的，而且也是在非洲社会内部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财富更多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村一级以上的政治权力日趋集中，以及出现了复杂形式的国家，而国家的世俗和宗教权力集中于酋长一身，他被认为是从天而降的神。这些发展是非洲特有的，在中非和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许多新兴国家中都可见到。但是它

[19] 某些学者认为，姆韦尼·马塔帕的意思是“掠夺者之王”，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个词的意义为“金属之主”。

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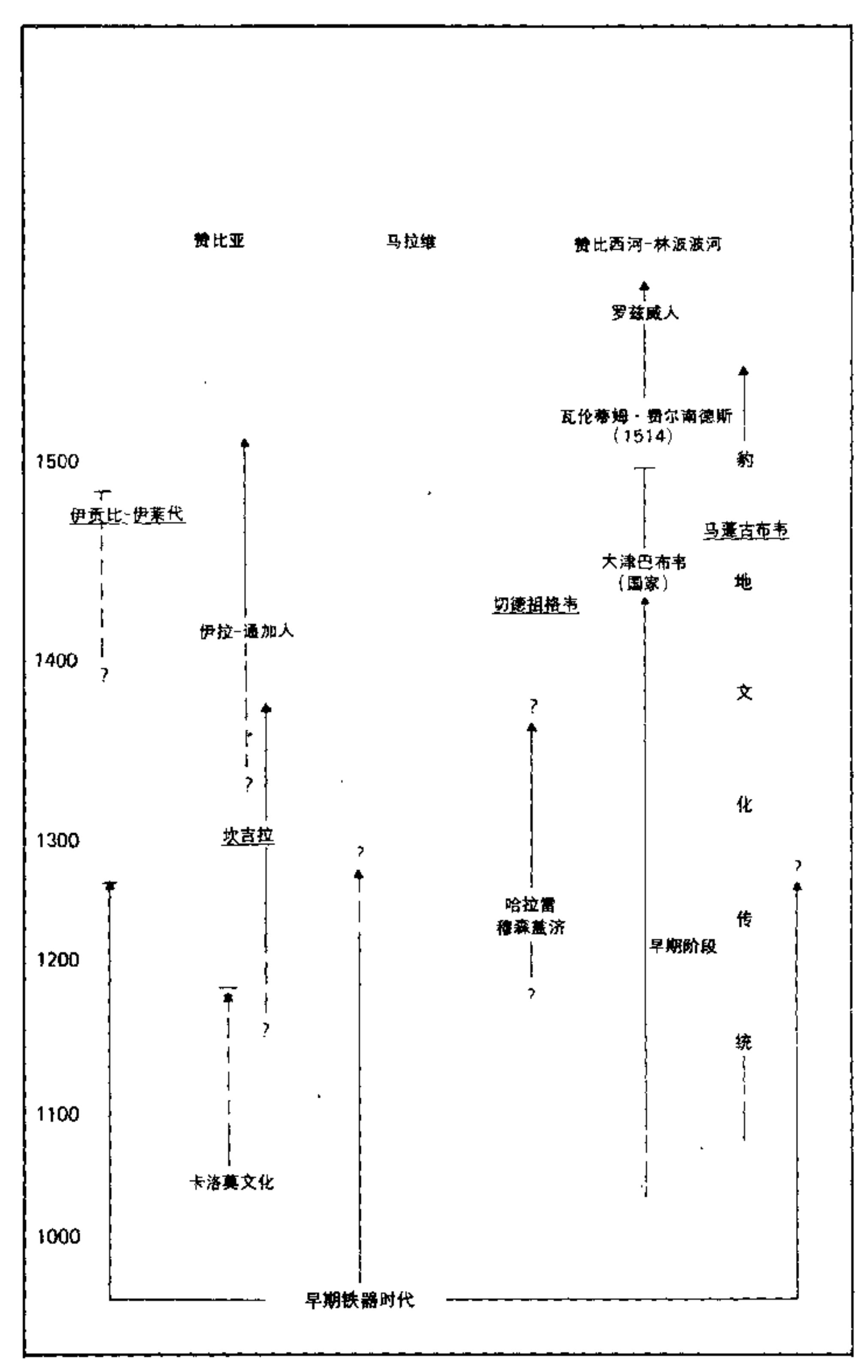


图21.6 考古学上的文化传统和阶段(B·M·费根)

们的活力取决于活跃的贸易网和足以养活全部人口的自给自足农业的合适制度的保持与否。据初步分析，这就是影响大津巴布韦及其后来的罗兹威国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因素。尽管大小酋长国历尽兴衰，铁器时代生活得以延续的主线应当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他们既种地又放养牛和小牲畜，这条主线经考古分析，已有充分记载。

22 赤道非洲和安哥拉：大迁移和最早出现的国家

J. 范西纳

551

目前掌握的情况

现在要重新写出非洲大陆上如此广大地区在公元 1100 - 1500 年间的历史，历史学家们都感到是极为艰巨的挑战，因为现有的可靠史料极少，最早的手稿资料只能追溯到 1492 年，而在沙巴、下扎伊尔各省区及其他地方，考古发掘工作才只刚刚开始，尚难凑出编年史的完整概貌。晚近的一些文字资料也只涉及刚果王国；这类资料在 1550 年以后逐渐增多，有 1587 年、1624 年和以后一些年份的。凡是与 1500 年以前，特别是与 1483 年以前有关系的资料，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都加以使用。

与刚果王国有关的非当代资料中有的是口头传说，最早可追溯到 1624 年，而其他资料则是有关沿海地区各王国的传说，都是达珀和卡瓦齐两人在 1641 - 1667 年间记述下来的，距离史实发生也有 2 - 3 个世纪。来自其他地区的口头传说，直到 19 世纪末才有原始记述，而且，这些记述到独立（1960 年）后才系统整理出来。现在事实证明，这些资料已成为探讨当时历史和文化的主要资料了。

对本章所要探讨的时代及其前面那个时代说来，语言学资料的应用至关重要。在我看来，这发生在班图人大迁移时期之后。我的这个意见并非人人都赞同。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同意说，这一时代是在原始的班图社会末期之后才开始的，其主要特征可以依据语言词汇，重现出来。诚然，语言学区别的研究，以及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都在初创阶段，但照此方向研究下去，必能获得丰硕成果。只是热带草原北部所用的语言——J. H.格林伯格称之为阿达马瓦语东支（Adamawa - Eastern branch）——以及中苏丹的语言，直到现在还没有用历史语言学方法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历史还留下了人种学的证据。但是，这一类资料很难确认。首先必须严格清理一下 552 所涉的范畴，至少要把移民迁徙时代前夕的状况辨别清楚；其次，还得用上 19 世纪末期以来历史人类学家努力证实的一系列极其审慎的方法学。有了人种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又辅之以从语言学转借和传播的研究，就会使历史的许多方面得到明确的解释。至于语言，也应如人种学一样，不仅要对至今尚未进行过研究的语言作出详叙的论述，而且要尽可能获取客观真实的材料。

年代和年代学上的考证，要是依靠这样一些晚近的未经放射性炭素测定而又无文献

可考的材料，就会成为一大难题。语言学或人种学现在还不能为拟定一个大致可靠的编年体系提供证据，年代的考证只得依靠考古学所获得的成果，进行参照研究，才能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口头传说也可能为获得大致可靠的年代顺序提供线索，但只有有关创世的神话故事之后的传说才有其可用价值。因此，关于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编年顺序，除沿海地区尚有可稽考之处外，其余地区的实难测定；这种状况，也只能靠发掘工作加紧进行和放射性炭素测定法的广泛应用来逐步改进。

如上所述，在目前情况下，要想重新写出这一时期的历史，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依据现已掌握的有关这一时期及前一时期的考古学和语言学资料来进行深入研究，并参考1500年以后的证据。这样，我们就会勾划出一幅古今脉络密切结合的历史图画，虽然它最后的结构仍不过是假想中的。

整个地区的居民情况

假如班图语的广泛传播反映出班图语族大迁移的情况，那么可以说，这种大迁移结束于1100年之前。继语言学家M.格思里教授之后，罗兰·奥利弗教授也断定班图语系的大量人口起源于沙巴地区及与赞比亚东北部相邻地区。在西边，他们的来源地甚至可能延伸到大西洋沿岸。罗兰·奥利弗教授认为，“班图”生活方式就是在这一带发展起来的，其基础在于以生产谷物为主的农业和广泛应用的铁器制作业。按此说法，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大量增长，他们沿河岸和海岸进入森林，而散居在森林区的狩猎者和渔民直到1000年还停留在农业前的生活水平上。[①]来自南方的这一渗入过程，大约结束于1500年，直到今天仍有广大地区是由非班图语系的种植者和从事狩猎的俾格米人一起居住着。[②]在安哥拉，也曾发现狩猎部落，也许他们是一些未被驱逐回南方的桑族人。

追随J.H.格林伯格教授的许多语言学家拒不接受上述论点，他们坚持认为，班图语系起源于贝努埃河和克罗斯河之间地区。他们的论点是，班图语系的人群逐渐南移，早在公元1000年之前，或许还在公元前，就已经移居到萨纳加河和奥果韦河之间一带了。据他们说，在同一时期，还有一次沿乌班吉河和姆博穆河进行的迁移运动。此后就发生了语言爆炸，形成从刚果语系地区（沙巴或大湖区）的第二个中心向四面扩散；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最早的一支班图语系的移民已经向东沿大森林边境进到了乌班吉河和姆博穆河一带。然而，即便是由此第二中心向外扩散的迁移运动，肯定也是在公元1000年以前很久发生的，因为斯瓦希里语就是派生语系之一，据贾希斯考证，在公元868年以前斯瓦希里语言中已发现有最早的班图语词。依我之见，新近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解释，而我也赞同这一看法，即在本章所探讨的这个地区，迁移运动在公元1000年以前已告结束。[③] 554

① R.奥利弗（R.Oliver），1966年；M.格思里（M.Guthrie），1962年。

② 关于班图人的扩张，见B.M.费根（B.M.Fagan），第3卷，第6章。

③ J.H.格林伯格（J.H.Greenberg），1963年，第30－38页；B.海涅（B.Heine）、H.霍夫（H.Hoff）和R.沃森（R.Vossen），1977年；A.库珀兹（A.Coupez）、J.B.埃夫拉尔德（J.B.Evrard）和J.范西纳（J.Vansina），1975年，第152页；D.W.菲利普森（D.W.Phillipson），1977年。

5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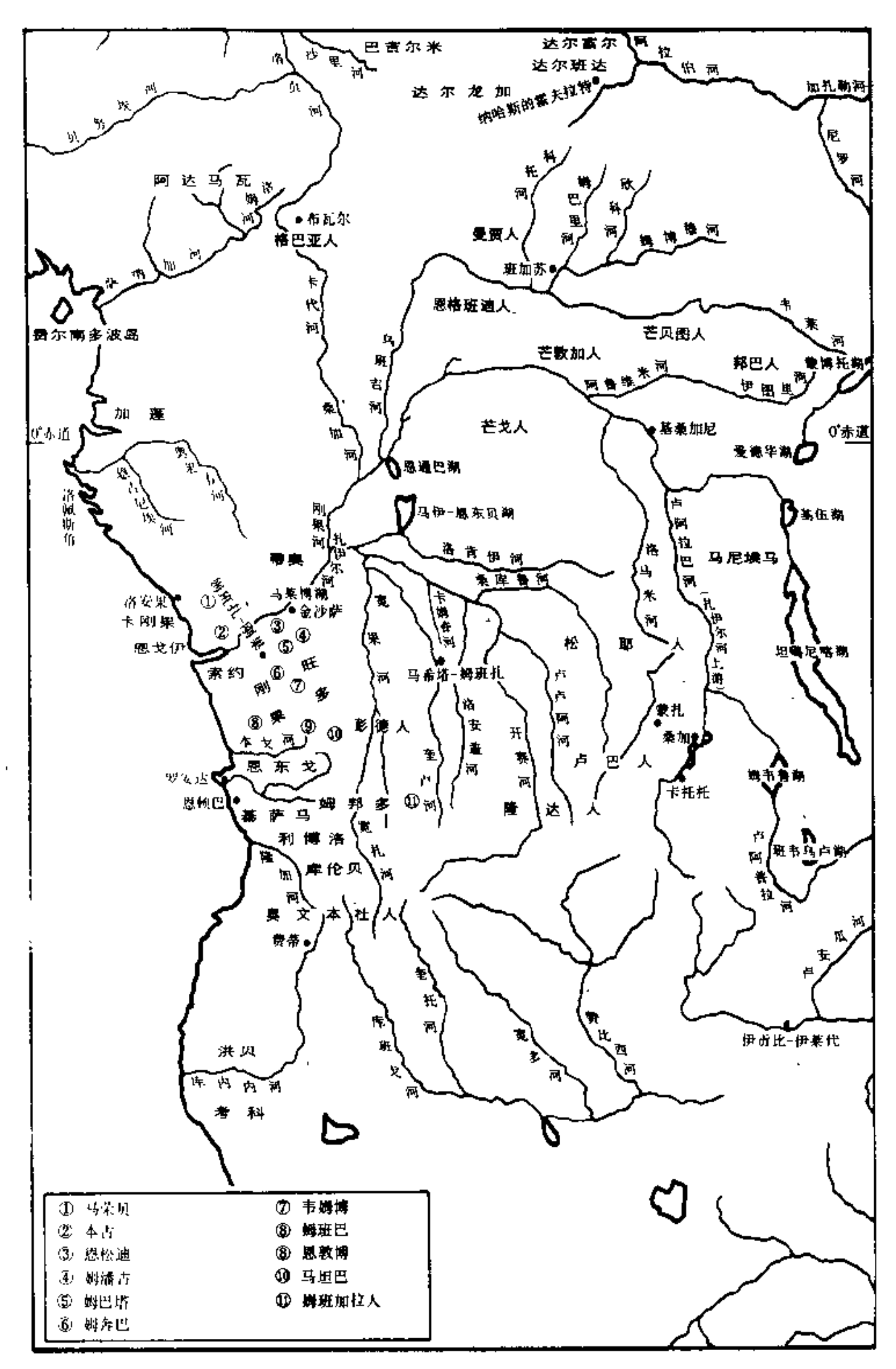


图22.1 1500年时的中非洲(J.范西纳)

也可能在公元1100年以前很久，由于受到东阿达马瓦族群东部语族的影响，中苏丹语言群体便分解了。但是，森林地区的东北角，也就是尼日尔河湾以北和乌班吉河流域，包括班图语在内的各种语言之间仍不断发生冲突，有时是一种语言排挤了另一种，但看来并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迁移。中苏丹各种语言没能使讲班图语的群体同化，反之亦然，只是这地区属于东阿达马瓦族群东部语族的最古老语言受到了其他各种语言的侵蚀。俾格米人主要采用了中苏丹的语言。这一切表明，有关各方在文化战线上大致势均力敌，如果我们能了解全过程，那肯定是延续几个世纪、双方互有得失而波动很小的漫长时期。在其他地方，班图语成功地取代了土语，或正在取代过程之中，很可能就在这过程中班图语移民把当地原有居民各种文化的结晶吸收到了自己的文明之中。这些都可能是在根本没有大迁移的情况下发生的；迁移运动在这地区的历史上似乎是例外而不是必然的现象。

很可能在公元1500年以前很久，第一批土著族群就已形成。大家熟知的例子是因班加拉人，这个族群由隆达人、卢巴人、奥文本杜人和安本杜人组成。[4]相互交流的影响在中央盆地特别明显，这里的劳动分工把农民、猎人（主要是俾格米人）和渔民三方面结合在一起。后者与“陆上人”交往颇多，他们卖出鱼和陶器，换取蔬菜和肉类；同时他们也通过水路网同邻近河段的渔民频繁往来。水路网的形状，足以说明在整个流域芒戈语为什么如此一致。在马尼埃马林区，地形崎岖，植被浓密，交通非常困难，但我们仍发现两大族群——莱加人和科莫人至今仍保持着文化的一致性。[5]

555

自然，土著人的影响，主要是在森林地区的东北部以及扎伊尔河、乌班吉河、姆博穆河之间地区，保留其明显的痕迹。也曾有人设想，各个不同的族群都有意识地培植自己的语言，为的是把自己与其他族群区别开来。C.埃雷特走得更远，甚至坚持认为中苏丹人不仅占有东北部，同时还占有卢阿拉巴河以东整个地区。按照他的说法，早在班图语系的移民来到之前，中苏丹人已经分解为各自独立的群体，他们不仅给该地区的语言留下了烙印，而且把各自的特性传给了他们已采用其语言的那些群体。这种说法或许有其根据、有其价值，但是要判断其真实与否，现在还为时过早。[6]显然，在热带草原北部的地图上留下了中苏丹人和其他群体影响的痕迹，这也能说明为什么会有一个个“部族”孤岛留存下来，但切不可忘记这样一个事实，现今地图所反映的，大体上是大迁移发生之后它所席卷的地区在17世纪至19世纪间的状况。

由此可知，班达人的迁移源自达尔班达（流经苏丹地区的阿拉伯河以南），他们把萨班加人和克莱什人这两个族群赶出了帝国的整个东部和中部地区。直到1900年前后，在班达人的汪洋大海中还留下萨班加人的一隅之地，当然是大大地同化了。此外，只有恩扎卡拉王国尚能够维持生存。后来班达人之所以向外迁移，实在是因为他们不断受到贩奴商人的侵袭：贩奴商人最初来自达尔富尔，以后竟从尼罗河方面直接入侵。与此同时，来自阿达马瓦的贩卖豪萨奴隶的商人，也迫使格巴亚人大批向外迁移；这一迁移运动席卷之地，包括现今中非共和国的西部。

④ J.C. 米勒（J.C. Miller），1972年（a）。
⑤ M.格思里，1953年，附图表明语言分布状况；J.范西纳，1966年（a），第93－103页，105－114页。
⑥ C.埃雷特（C.Ehret），1974年（a）。

地区作为整体的历史和文明

农业

依据现在掌握的生态学和考古学资料，可以断定甚至在1100年以前，这一片地区的人们就已广泛从事农业耕作，例外的仅仅只是与卡拉哈里沙漠紧联的安哥拉南部内地和一些森林地带。这个地区种植的谷物，主要是红高粱及其他黍类(*saa - sanga*)。所种的块根植物多半是各种非洲薯，似乎很少种植亚洲的可可薯．但在大部分森林地带（还有热带草原），则出产亚洲品种的香蕉和甘蔗；蔬果类有豆子和花生（*voandzia*）。通过狩猎、捕鱼、采集幼虫和蛴螬，必要的蛋白质食品也有了供应。家畜和家禽（山羊、犬和鸡）随处可见；林区南部还有绵羊，在河流下游一带甚至饲养猪和长角牛。林区和热带草原地区的耕作方法自然有其差别，前者的主食是香蕉和薯类食品，后者的主食则是谷物杂粮。另外还有一些地方生产酒椰、种植波拉苏斯棕榈。

这里必须记住，在加蓬境内诸河流和扎伊尔河北部各支流及其河湾地区，沿河森林之间还插入一些自然分布的热带草原；各类谷物也可能在这些草原上生产出来。但是，这些地方却很少种植谷物，唯一可能的原因是靠近赤道，当地湿度很高。这是一个问题，考古学家和植物学家必须求其答案。如同林区边缘一样，在这些分散的热带草原周围，人们至少有两个互为补充的有利环境；首先，这里收获是有保障的，而随着农业的引进及铁器的使用，人口必然会逐渐增多。在公元1000年以前，正是人口的增殖引起了移民向人口稀少地区迁移的运动。

不仅在密林地带人们可以利用这双重有利条件，就是热带草原树木丛生的部分、森林延伸地带和分散的丛林中，情况也与分布在林区之间的热带草原一样，这种情况在乌班吉河、开赛河和卢阿拉巴河流域尤为明显。而且，在这三条河流以及沙里河的沿岸，丰富的水产有利于人口的繁衍和集中。蛋白质较高的食物还可能提高人口的出生率，促使人口进一步增长。

手工业和贸易

到1100年，各地手工技术都已具备一些大约到19世纪末也还保持着的特色：冶铁业相当发达，其他行业有制陶、柳条制品、酒椰纤维编织、制桶、生产岩盐和海盐，以及从植物和盐碱滩提取食盐，等等。在当今中非共和国境内的布阿尔以及在桑加进行的发掘，证实当时已经有了金属制造业。蒙扎（沙巴地区）的铁矿可能最早得到开采，这是和古代卢巴王国的扩张相联系的。⑦

⑦ P.维达尔（P.Vidal），1969年；P.维达尔和N.戴维（N.David），1977年：都认为在中非共和国境内纳纳河和莫德河汇合处有另一个铁器时代的遗址。P.德-马雷（P.de Maret）、F.范-诺顿（F.van Noten）和D.卡亨（D. Cahen），1977年；T.Q.里菲（T.Q.Reefe），1975年。

随着这些手艺的出现产生了地区性贸易。已经有初步的证据，表明在公元1000年前后，铜带地区已用十字形铜块作为货币，这种办法在15世纪中叶以前从赞比西河逐步推广到了卢阿拉巴河流域。1483年，葡萄牙人在刚果发现了一种通货计量单位，名为恩齐姆布（*nzimbu*）；约于1500年，在面向大西洋的整个南部热带草原的各条商道上，已经用方形酒椰块作为计价单位流通。到下一世纪，基萨马的岩盐被当作货币使用。[8]最早携带货币的人很可能是渔民，他们不仅打鱼，而且生产陶器，他们所制造的陶器在该地区许多河流的航道沿岸都有发现。在沙巴地区和赞比亚北部，看来还有许多专门开采铜矿和做贩铜生意的人。毫无疑问，那里也曾有过有限的铁器交易，最后，森林中的土著猎人无疑常用猎物换取箭镞、香蕉和盐。

社会和政权组织

随着手工艺技术和贸易的发展、扩大，人口数量逐渐增长，社会也就按照父系血统关系组织起来。起初，讲班图语的人聚集在人口相当拥挤的村庄里。在本章探讨的时期之前，班图语族群趋向于盛行母系制度，而且在热带大草原南部颇有发展。实际上，不仅在中非洲整个地带（从纳米比亚到赞比西河，从奥果韦河到坦噶尼喀湖）我们重新发现了母系制度；而且，G.P.默多克和其他一些学者还力图证明卢阿拉巴河以西林区的居民（诸如沙巴地区的卢巴人）全都实行母系制度。看来到公元1000年前后情况还是如此。但是，不管怎样说，林区居民到15世纪时已经实行父系制度，只有开赛河一带的卢巴人（可能还有沙巴地区的卢巴人）仍保持母系制度。继承方式则是在公元1500年以后才发生变化的。[9]

班图人的母系制度，实际上是与男人对妇女的统治原则同时存在的，并且往往造成以男性为主的居住方式，其结果是氏族派生出来。血缘世系的关系仍然薄弱，但这加强了村庄结构，因为村庄秩序和村社生活都必须维持下去。这种村庄权威是以领土原则为基础，因而也就是以政治原则为基础，所以班图语族很早就有了村庄一级的政治首领。 558

与此相反，分散在今天中非共和国各地的非班图语人所实行的父系制则都居住在小村落中，受同一世系的男性管辖，尽管他们中间还没有真正的酋长。这里没有村庄，只有分散的小村落，社会实际上是平等的。但是在其他地区，在乌班吉河和沙里河沿岸森林里的父系制居民，却已有了大聚居群。这里血缘世系的关系比较强，所以已经出现了一些酋长。[10]

整个南部热带大草原以及森林南北两方边界地区都承认领主。这些统治者都是神灵的祭司，代表神灵而对土地享有特权。这样，他们实际上就取得了一种真正的政治统治权。他们所供奉的神灵，是自然神灵还是祖先，这无关紧要。这些领主似乎每人都管辖

[8] R.格雷（R.Gray）和D.伯明翰（D.Birmingham），1970年；M.S.比桑（M.S.Bisson），1975年。

[9] G.P.默多克（G.P.Murdock），1959年，第287页；J.范西纳，1978年，第105－110页。这些资料表明，卢巴人（其中一部分为克特人）是母系氏族。

[10] P.卡尔克（P.Kalck），1959年，第45－54页；J.范西纳，1966年（a）。

着好些村子，每个领主的辖地形成一个行政区或是一个领土单位，即一个王国的雏形。

这些以土地为基础的领主得以被公认为政治首领的过程，是与血缘世系群体的发展相联系的。与此同时，血缘世系群体岁入的增长使酋长的权力得到加强。这样族长就成了领主，后来他又吸收其他世系或用武力强迫其他世系接受自己的统治，从而创建一个国家。一旦一个村庄产品有剩余，一村之长就免除了体力劳动。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更多劳动力的产生，使一家之长也摆脱了劳动，由家长组成了以族长为首的议事会；从这时起国家就已在孕育之中。

因此，国家是在某个世系的首领统治了其他一些血缘世系以加强其自身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的领土包括承认某个首领政治权力的若干个村庄。首领手下的几个代表和显贵组成议事会。最初，作为政治首领的国王仍然保留着酋长的宗教象征，以此说明他的“神圣性”。这个阶段过去之后，首领在转变成国王的过程中有了越来越多的议事会成员、法官、显贵和侍卫。于是，就需要建立一种制度，对剩余产品另作分配的制度，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这些国王、首领和议事会成员以他们的慷慨恩赐，特别是以赏赐果酒或水酒来争取追随者。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国家中“国王赐饮”仪式后来成为国王崇高地位的象征。既然对剩余产品的需求超出了常规，既然技术并没有改进，而土地又很充足，所以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劳动力是唯一可变的因素。因此很可能就出现了家庭奴隶。当时，奴隶包括根据主人的命令从事生产的奴仆，也包括以妇女为主的农业劳动力中新增加的成份。最早的一批奴隶无疑是战俘。随着封建领地发展成国家，战争肯定日益频繁，因为这些领地要想得到扩大，就必须吞并他人的领地或其他的父系血缘世系。奴隶的另一来源可能是被赦免的罪犯。[31]

559

有些地方，虽具有优越的社会条件和生态环境，却不见国家的形成。于是，我们看到了发展中的各种政治形式。有些部落崇尚平等原则，坚决不愿与别人合并。另一些部落则采取不设酋长而只靠宗教仪式结盟的血缘世系联盟，以此维护一定程度的平等精神。至于说，究竟是建立了国家的部落还是未曾建立国家的部落更富有创造性，这很难下定论。作出这种“选择”的突出例子，可能要算恩格班迪人的做法。他们为许多地方提供涌现统治者的世系，但本身却并没有转化成为国家。比较普遍的例证是格巴亚人的做法，他们虽与已组成国家的族群（如姆布姆人）保持联系，但并没有仿照后者的做法。与此相似的还有萨拉人，他们帮助巴吉尔米人建立王国，本身却仍在血缘世系范畴内求发展。

在这整个地区，所有农耕者可能都有某些共同的宗教特征。他们迷信巫术；由土地占有者举行祈求丰收的仪式；崇拜本地神灵和祖先；信奉占卜者或巫医——所有这些都是原始班图人社会的共同特征。

从男性家长制到君主制或结盟制，所有这些权力形式都有其一定的神圣性。王权都有神圣性，这是不足为奇的，而神圣的观念也都一样，因为它们的宗教基础十分相似。对这种一致性原则，有人匆忙起名叫“神授王权”（或神圣权利），而人们就试图为它找到一个共同根源。然而，各个王国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上述看法忽略了它们各自的特

[31] E.德－戎格（E.De Jonghe）和J.范霍夫（J.Vanhove），1949年；S.迈尔斯（S.Miers）和I.科佩托夫（I.Kopytoff）合编，1977年；另见C.梅拉苏（C.Meillassoux）编，1975年。

征。举例而言，卢巴族各王国和大西洋沿岸各国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这种例证不胜枚举。

以上我们论述了一些较大政治集团的形成过程，它们都是在1000－1500年间最终建成国家的，特别是在南部大草原。

北部大草原：居民情况

当时住在乌班吉河湾的恩格班迪人已经按父系血缘组织起来——实际上是领主制或封建领主制，他们的口头传说可追溯到1500年以前。在关于国家起源的神话中，据传他们来自达尔班达附近（今苏丹共和国境内），19世纪时与班达人毗邻而居。这个地区北面 **560** 是加扎勒河的支流阿拉伯河，离纳哈斯的霍夫拉特铜矿产地不远。这些铜矿究竟已开采多久时间，无人知道，也无人过问。

大约在1300年前后，巴卡拉－阿拉伯人各族群已抵达这条河流的北方，也许就是这些人把恩格班迪人赶走。神话中提到，有弓箭、长矛、短刀、梭标甚至火枪等武器的白人（被称为阿宗迪亚人和阿巴拉人）；他们和恩格班迪人发生冲突，估计是在15世纪，接着是历经两个世纪的迁移，恩格班迪人终于来到邻近班加苏的地区。在迁移即将结束时，他们在欣科河和姆巴里河之间的姆博穆河北岸与班图语族人相遇了。[12]

赞德人似乎是1500年前后定居于科托河和达尔龙加之间的。今日中非共和国的西部，当时由曼贾－恩格巴卡人居住，东部则由班图人居住。中苏丹人至少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萨拉人和以后来的巴吉尔米人，另一部分住在尼罗河上游和东北林区。中苏丹的有些族群如克莱什人和尤卢人，当时可能已经定居在达尔班达地区，这里与恩格班迪人的故乡相距不远。

16世纪时，恩格班迪人中有一个世系建立了恩扎卡拉王国，该国的民众讲的是赞德语；其他恩格班迪人则组成由封建领主统治下的大血缘部落[13]。根据对韦莱河林区语言的分析，可以证明恩格班迪人是西部各部族往东、而北部各部族往南缓慢迁移的一个最为人所知的例子。J.A.拉洛什特就各族人民在这地区定居的复杂情况作了精辟的论证；[14]但是，他低估了这个地区所发生的文化活动和历史活动。

把语言范围的扩大或缩小全都归因于大规模的迁移是错误的。J.科斯特曼斯已经证实，邦巴人的迁徙史是以若干家庭为单位进行的非常缓慢的流浪式迁移，这一类迁移过程可能比大规模迁移更为常见，因为有关后者的直接根据实际上没有找到。[15]语言的影响当然也起了作用。例如，俾格米人就采用了中苏丹人的语言。进行语言、文化和纯历史的研究，至少可以部分澄清一下混乱的看法，考古研究或许可以确定各个文化时期的先

[12] B.坦盖（B.Tanghe），1929年，第2－37页。H.布尔森斯（H.Burssens），1958年，第43－44页。实际上，恩格班迪族群的口头传说只涉及欣科河和姆巴利河地区。

[13] E.德－当皮埃尔（E.de Dampierre），1967年，第156－181页。

[14] J.A.拉洛什特（J.A.Larochette），1958年。

[15] J.科斯特曼斯（J.Costermans），1953年。

561 后顺序。在这类调查研究进行期间，我们只能满足于本文所提到的有限的资料。

A. 德－卡洛纳－博费于1914年前曾在这一地区进行过工作，他坚持认为，公元1500年前这一地区尚未进入铁器时代；就是在他本人生活的那时代，仍能看到插在古老树干上的磨光的赤铁石石斧。这些磨光的石块、磨石和半月形石头构成了韦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它们也许与中非共和国和甚至南到喀麦隆中部类似的制作技术有关。考古学家F.冯－诺顿已经证实，这些石器，是石器铁器并用时代的遗物。这种工具是用含铁量很高的赤铁石制成的。看来在当时的许多情况下，矿石熔化和冶炼成生铁的工艺未必能生产出更为优质的工具，至少与冶炼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量相比来说是如此。含铁量很高的石制工具使用了很长时期。[16]无论如何，不能绝对地说铁器制作技术一出现，石器的使用就立即中止。

赤道大森林

赤道大森林并不像许多学者所想象的那样是隔离南、北大草原的天然屏障，而是一个可往来穿行的地区。至少有两条主要路线穿过森林：一条沿着海岸；另一条顺着河流，由卡代河－桑加河起，经乌班吉河和刚果河（扎伊尔河）到马莱博湖（斯坦利湖）。早在公元1000年之前，就有人从事海上航行，费尔南多波岛上居住着布比人就是明证。可以断定，从约鲁巴人居住地区到洛安果这一段几内亚湾沿岸各族人制作的彩饰木雕，说明这些影响是经海路逐步传播的。[17]当葡萄牙人抵达这里时，沿海一带住的都是渔民。在河网中，在乌班吉河、桑加河和扎伊尔河汇合处是水淹的森林中的大片沼泽地带，只有渔民可以居住在这种地方。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文化影响越过赤道森林的痕迹，也许这些物品都是通过渔民运来的。

越过大森林的各种活动

仅举几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不带铃舌的简单铃铛是在公元1000年以前可能由北向南越过森林的。此后，在1450年以前，又出现了同一类型的双铃。（见图片22.1）。制作这种产品必须掌握金属片加工与焊接知识。双铃是用来模仿人们口语声调的，它的出现说562 明了林区以及从林区更往南已经有了声调各不相同的（班图）语言。而且，这类物品的用途在尼日利亚到赞比亚整片地区都基本相似；双铃总被看作是政治首领的一种标志。用来投掷的刀子也是从北方传到南方去的，1587年时就有人报道，他们在南方目睹过这种掷刀。其他许多物品如线轴架、某些样式的刀子和一种用作传递消息的长条形鼓，已在贝宁和至少在远达马莱博湖的地方发现，虽然现在还不能断定究竟哪些物品来自北方，

[16] A.德－卡洛纳－博费（A.de Calonne－Beaufaict），1921年，第135页；F.范－诺顿，1968年；P.德－马雷、F.范－诺顿和D.卡亨，前引著作，第486和498页。

[17] F.M.奥尔布里希（F. M. Olbrechts），1941年；他指出了一些事实，但又误将这些事实归到葡萄牙人抵达之后的时期。



图片 22.1　芒贝图人（扎伊尔）的铁制双铃

又有哪些来自南方。物品的这种分布状况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赤道森林和南部大草原并不是与非洲大陆其他地区完全隔绝。思想观念也随同这些物品向四处传播，而且它是通过森林往南北两个方向传播的。[19] 563

这时期赤道森林最重大的发展，正是有别于“亲族首领”的政治首领的观念的渗透与扩散。芒戈语中用以表示血缘关系权利的词是“姆皮佛”(*mpifo*)，而表示首要占有者，即土地领主权利的词是“奥科佛”(*okofo*)。封建领主，或确切地说是拥有一定权力的血缘世系首领，很早就在芒戈人中产生了。“姆皮佛”或称血缘世系首领，如能增加自己的岁入，就能吸引越来越多靠他供养的追随者，从而控制其他血缘世系首领而成为国王。

[19] J.范西纳，1969 年；D.科德尔（D.Cordell），1973 年。

赤道森林和林中开垦地的社会结构

公元 1500 年以前，讲芒戈语的各个族群在桑库鲁河和开赛河以南地区都有缓慢但规模较大的扩展。有些族群甚至远远深入到了洛安盖河两岸、洛安盖河和开赛河之间以及卡姆查河两岸地区。关于从北到南的证据，即从洛肯伊河到桑库鲁河，然后再向南到卢卢阿河的证据，早已以口头传说的形式存在，这些口头传说现又由语言学分析予以核实。现在已有可能再现这些小酋长领地或者叫做“恩库穆”(*nkumu*)中人们的生活方式。那里的村庄往往由若干长老组成的议事会管理，他们同时也是酋长的助手。村庄一级可能有两位发言人，各负责主要街道的一侧。同俾格米人的关系是矛盾的，有些族群好像是与俾格米人共同生活，但另外一些族群的农民则与俾格米人互相争斗。至于社会结构、年龄观和威望观在现实生活中是一致的，两代人之间却有明显的区别。这些南方族群与一般芒戈人不同，他们已开始发展相互联姻的制度，这意味着他们不那么强调部族须以血统关系为基础，因此也就巩固了领土的统一。在经济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林区中的小片草原已开始种植高粱、粟类，而林区居民使用铁器的能力是人所共知的。松耶人承认，他们掌握的炼铁技术源自森林中的卢巴人所传授。不管这是否属实，人种学的根据已证明铁器制作在森林地区已是普遍使用的技术。他们已能燃烧硬木以提高冶炼温度，他们甚至已发现炼钢技术。[19]

564 关于加蓬-喀麦隆到今刚果共和国森林地区的历史，我们了解得很少。公元 1500 年之前，人们已开始从萨纳加河以北逐渐向喀麦隆南部迁移，所谓的帕温迁徙其实是很缓慢的。[20]大约从那时起，这里也逐渐出现了类似“恩库穆”的政治组织。最后，现在已经了解到加蓬东北部的森林地区当时可能大部分无人居住，至少是没有耕种者居住，因为这里直到不久前还是原始森林。

在扎伊尔河上游以东，即马尼埃马地区，曾有几次缓慢的人口迁移，但是现在无法确定其时间。这里的人口迁移，是由于一些熟悉农业但主要从事捕鱼的小部落群体的流动性所造成。他们在流动中吸引了整群的俾格米猎人。

公元 1500 年以前，马尼埃马地区南部可能已经是莱加人祖先的故乡。这些部落群体很可能已经建立起被称作“布瓦米”(*bwami*)的社会-政治联盟。这种联盟实行复杂的等级制度，按照这种等级制度，由最高层成员组成一个集体的政治和道德权力机构，来统辖参加他们“布瓦米”的整个地区。居住在基伍湖和坦噶尼喀湖之间、格拉本以西湖区的各个部族已经具有酋长和国王的概念，据认为就是以这些“布瓦米”为依据的。因此，这里建立政治组织的原动力也来自森林地区。再往南，松耶人中出现的以选举产生的封建领主制，可能也是起源于类似的森林部落群体联盟。如果这种联系确实是由北向南发展，那么这过程也一定是发生在公元 1500 年以前。[21]

---

[19] J.范西纳，1978 年，第 90-103 页，并散见各处。
[20] P.拉比尔特-托尔拉 (P.Laburthe-Tolra)，1977 年，第 79-414 页。
[21] D.比埃博克(D.Biebuyck)，1973 年，关于“布瓦米”(*bwami*)的论述，见 11-12 页，并散见各处。

565



图片22.2 拟人酒壶（基萨乡时期，约7世纪）

沙巴草原

在大盆地以南的热带草原，可以清楚地按大西洋沿岸区分为东部传说和西部传说。前者又可分为卢巴传说以及上开赛和上沙巴传说，这些传说描述了卢巴王国和隆达王国形成时期的情况。但是，这些传说究竟有多少可信的成份呢？有人认为，它们纯属虚构，只不过反映或证实了19世纪社会结构的情况而已。但德－乌斯奇教授则认为，这些传说虽是神话，却是它们所传的王国形成时的产物。[42]实际上，上述这些意见并非根据于对传说本身的分析，这种分析尚有待于学者们深入进行。

金属制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地点，在早期显然是桑加。我们还须等待现在正进行的考566 察研究的结果，才能提出一个可靠的年代资料。然而，可以断定，自15世纪起就有比较明显的社会分化，这一过程间接证实了酋长制度的成长。从卢阿拉巴湖区直到赞比西河中游，早就形成了一个贸易网，当时使用的通货就是十字形铜锭。这些十字形货币最早出现于9－12世纪，在今赞比亚与扎伊尔之间边境的铜带地区。这就是说，它们是在该568 地区铁器时代晚期开始之后不久出现的。考虑到伊贡比－伊莱代遗址与东海岸的贸易联系，无疑还可以断定，在1500年以前，这地区的贸易网已经和印度洋贸易网联结在一起了。[43]

不同时期的口头传说都提到，在马拉维，在赞比亚的北部、中部和东部有“卢巴”酋长存在，马拉维的最早。正是通过这些相同的传说，我们才知道卢巴国家和隆达国家的建立确有其事，而根据J.C.米勒的研究结果，又了解到一个隆达国早于1450年之前已经建成。[44]很可能是当时一群又一群的手工艺人迁居到这些地区来，地区贸易有助于人口的扩散。

卢巴王国和隆达王国

口头传说资料和对该地区的了解

在南方热带草原地区，很早就形成了卢巴人和隆达人的王国。这两个王国都是在卢阿拉巴湖区附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农业资源十分充足的沙巴矿区，很早就出现了酋长制度，或即酋长国，随着组织的日益完善，它们便发展成为王国。商业在草原地区容易发展，这也可能是促使国家形成的原因之一。

卢巴人和隆达人组织他们的国家最早。我们这里掌握的大部分资料来自口头传说，有关这两族人的传说特别丰富。然而，我们还未获得一套完整的传说，目前仍在不断收集。

---

[42] L.德－霍伊施（L.de Heusch），1972年。

[43] D.W.菲利普森，前引著作，概述1977年前业已掌握的各种资料。也可参阅P.德－马雷，1967年；P.德－马雷、F.范－诺顿和D.卡亨，前引著作，第487－489页；B.M.费根，本书第21章。

[44] J.C.米勒，1976年。

按照传说，卢巴王国是由一位名叫刚果洛的人所建，他在卡隆戈附近建立他的国都；关于起源的神话，根据其他传说来看，给我们提供了某些有关卢巴文化（尽管不是卢巴历史）的有用资料。大致的估计，卢巴国出现于公元1500年之前，由几个氏族合并而成，受一位酋长管辖。对卢巴王国的政治结构所知很少，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已按父系制组合起来。每个血缘世系都有自己的村庄，首领都占有奴隶。“基洛托”（*kiloto*）即各血缘世系的首领，承认了国王的权力。国王周围有一批官员，其中至少有两人是我们所知的：一个是王徽的守护者，称作“因纳班扎”（*inabanza*），另一个是军事首领，或称“特维特”（*twite*）。卢巴王权建立在“布洛普韦”（*bulopwe*）或“神圣”的基础之上，这是王室血统所固有的，卢巴人称王室血统为“姆皮佛”（*mpifo*）。[25]

沙巴地区的盐和金属资源有助于商业的发展、人口的混合以及各大城镇的形成。基督纪元最初10个世纪的发展，在这个地区有其延续性。由于父系制亲属关系的深化，人们更重视血统的纯正性，从而促使统辖父系血缘世系的封建领主制建立起来，同时促进了领土的统一。卢巴人的神圣原则“布洛普韦”，仍依王族血统而定。 569

政治制度

卢巴帝国的思想意识原则显然有别于松格人的政治原则，松格人保持着一种王位选举制，它建立在血缘世系财富的基础上，统治期往往有限制，一切由“布基施”（*bukishi*，一种秘密联盟）的议事会来决定。在实行母系制的东卢巴，这种秘密联盟组成统治机构。从地理上讲，所有这一切都与莱加人居住的森林地区极为相似，因此有人企图假设“布瓦米”与这些统治形式有联系，这种联系大不同于松耶人和中卢巴之间的文化联系。“布洛普韦”似乎是松耶人和中卢巴所独创，也许只是卢阿拉巴湖区才有的。此外，卢巴人王国有好几个，除了湖区的基孔加王国之外，就我们所知，还有卡隆德韦封建领地。[26]

至于隆达人，除非得到相反的证实，我们可以认为，在宽果河上游到夸塞奥河上游的整个地区，在沙巴南部，在与赞比亚接壤的一些地区，当时都已经实行王位永恒制；这是一种复杂的制度，王位继承人沿用前国王的姓氏，继承其亲属关系、责任和君权，从而实际上“变成为”原先的国王。[27]这一制度否认时间的推移，为的是保持整个社会秩序的内聚性和连续性。它容许由母系氏族联盟、征服、合并和酋长互相达成的“兄弟”协议中产生的各种权力关系，全都可以永远存在下去。公元1500年以后，这种制度成为创造一个真正的帝国——受隆达统治者领导的几个王国的联合体——的强有力工具。

[25] J.范西纳，1966年（b），第71-81页；A.罗伯茨（A.Roberts），1976年，第36-41页；T.Q.里菲，1977年，不承认卢巴人对隆达人有影响，但J.胡佛（J.Hoover）在私人通信中和恩杜瓦·索洛尔（Ndua Solol）不同意他的观点。H.W.兰沃西（H.W. Langworthy），1972年，第28-30、21-27页。

[26] A.威尔逊（A.Wilson），1972年，他不信1800年以前有一个地域辽阔的卢巴国家；这与J.约德（J. Yoder）的看法有些矛盾，见J.约德，1977年，第67-97、120-153页。关于库阿巴，见J.约德，前引著作，第56-57页；参阅J.韦德特（J. Weydert），1938年；G.沃特斯（G. Wauters），1949年；另见N.J.费尔利（N. J. Fairley）的博士论文《本·埃基》（Ben 'Eki），1978年。T.Q.里菲，1981年，是这方面的最新著作。

[27] J.C.米勒，1972年（b），第45-68页、81-82页和166-168页。

5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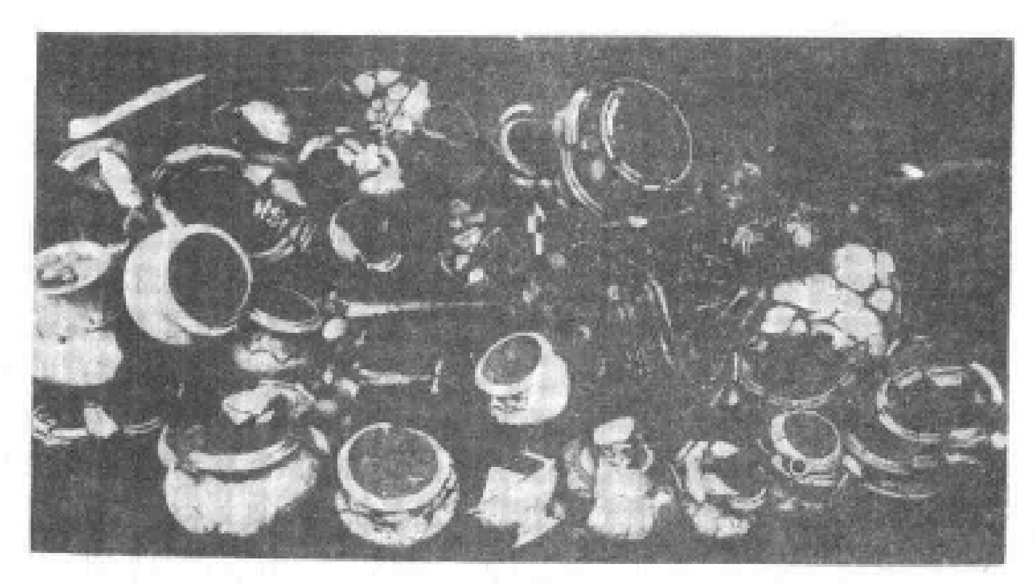


图片22.3　基库卢墓(KUL-T2)尸体胸前有一枚清晰可辨的十字架
(14至16世纪卡巴姆比安A墓)

有人可能会指出：位于开赛河和宽果河之间的地区自然资源贫乏，可能人烟也稀少，

570 而东边的卢阿拉巴河和卢阿普拉河之间的盐矿和铜矿那时正在发展。在南边，赞比西河上游地区的资源也比隆达王国丰富。但是从各方面看，它的资源仍少于沙巴地区南部。然而，洛齐人国家却在这里崛起。我们可以认为，洛齐人国家的创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隆达人促成的，但我们对它后来的发展时期却一无所知。[28]

[28] M.梅因加（M.Mainga），1973年，第16－21页；G.普林斯（G.Prins），1980年。



图片 22.4　从坎加遗址出土的基萨尔时期墓葬里的各种物件（公元 12 世纪）



图片 22.5　“恩塔迪－荆果”石雕像，自扎伊尔南部的姆博马出土

安 哥 拉

很久以前(公元1500年之前)，在宽果河上游的支流卢伊河流域已经出现了酋长国，居民受彭德人统治。J.C.米勒认为，这里酋长国的地域也在扩大。[39]卢伊河流域周围地区大部分是盐田。

最后，至迟在公元1500年后不久，利博洛以南的高原上出现了一个库伦贝国家，它可能是最早出现的奥文本杜族国家中的一个。库伦贝国的组织方式与众不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建立“基隆波”(*kilombo*)，即一种自由加入的军事联盟。无论是在利博洛还是在库伦贝，都发现了最早的石墓，其遗址现仍存在，考古发掘工作尚待进行。其他的奥文本杜国家对“基隆波”可能也不陌生，因为关于洪贝（安哥拉南部一国，其形成年代失传)的可靠传说曾经提到这种军事组织。另一方面，“基隆波”也可能是由因班加拉人传给洪贝的，因班加拉人直到16世纪才形成一个独立的族群。奥文本杜族讲西南方班图语，像环博人这样的奥文本杜族都把高原南端，特别是一个叫费蒂的地方看作是自己的发源地，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用放射性炭素测出的年代——公元710±100年和公元1250±65年。第二个年代无疑是指奥文本杜族的，但这只是一种试测的结果；考古工作尚须继续进行。奥文本杜族有14个国家，其中几个很可能在16世纪之前很久就已开始形成；语言、牧牛业、血亲制度，把奥文本杜族和安哥拉南部以及纳米比亚境内班图语族的文明联系在一起。

他们可以分为三大支系：尼扬伊卡-洪贝、安博和赫雷罗。第一支系，即尼扬伊卡-洪贝人，在文化上与奥文本杜族关系密切，除洪贝之外，并没有形成大国；但是，小酋长国却随处可见。第二、三支系，在纳米比亚境内也有。安博人从事一些农业，但他们的生活主要是靠饲养长角牛。19世纪时，安博人的政治结构包括12个小邦，其中3个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酋长们都在设防的首府实行统治。所有官职都按母系实行继承。权力的象征，是掌握圣火，同时掌握以牛群为基础的经济结构。赫雷罗人同附近纳米比亚境内的科伊人一样是游牧民，他们靠饲养牛羊、狩猎和种植一些谷物为生。同科伊人一样，他们直到19世纪才使用铁器。然而，他们讲班图语，又因有双重血统而不同于科伊人。在安哥拉南部、纳米比亚的中部和北部，还有一些以狩猎为生的桑人群体和黑肤色猎人——包括“伯格达盖”(*bergdagai*，山区黑人)在内的特瓦人，后者是纳米比亚的铁工匠，他们讲的是科伊-桑语。[40]

这就是1850年前后的状况。这些人的历史又应该如何写述呢？尼扬伊卡-洪贝人说，他们是土著居民；安博人和赫雷罗人说，他们来自东部。看来，可以接受的说法是

[39] J.C.米勒，1972年(b)，第55-88页；B.海因茨(B. Heintze)，1970和1977年。海因茨的文章批判了J.C.米勒的某些观点。

[40] 参阅C.埃斯特曼(C.Estermann)，1960年；H.维德(H.Vedder)，1938年；C.H.L.哈恩(C.H.L. Hahn)、H.维德和L.富里埃(L.Fourié)，1966年。

他们来自赞比西河流域，他们从那里得到牲畜，赶着牛群取道库班戈河向西迁移。除非把赫雷罗人迁移的时间定在公元后最初的500年内——似乎没可能那么早——他们就只能是从科伊人手中获得羊群的。无论如何，绘有羊群的岩画上所画的肯定是科伊人。安博人把许多特瓦族的猎人同化了，他们并不羞于承认这点。同时，尼扬伊卡－洪贝人也把特瓦人和一些不知属于何族的猎人同化了，可是他们却不愿承认。赫雷罗人似乎也同化了不少特瓦人，因为南部的赫雷罗人占据考科维拉约200年之久，当地原称之为奥特瓦，即“特瓦人的土地”。

至于说到具有桑人文化的黑肤色猎人，他们原住于沿海远到南纬13°的地区，某一时期北行，绕过中部高原而与东部的桑族群体汇合。在南方，他们占有纳米比亚北部整个沿海地区。在内地，他们与桑族和科伊人为邻。这些群体有的已掌握了炼铁技术。可以推断，大约在此期间西南方的班图语族占有安哥拉中部高原，有几处则更往南和更往西，而在东面他们就住在东安哥拉的一些山谷里，将河间土地让给了桑人。往北直到奎牦河与宽多河的源头是水源比较丰富的土地，那里已经有了铁器时代的农业居民，在语言上他们属于隆达－关吉拉－科克韦语族。安博人和赫雷罗人则仍居住在山谷中。

西南草原

葡萄牙人在沿海地区发现两个大王国，即刚果王国和洛安果王国，在内陆发现另一个王国——“大马科科”的蒂奥王国。根据传说，前两个王国是由一些较小的国家缓慢合并而成；刚果王朝发源于刚果河之北，距洛安果王朝不远。这两个王朝可能都是建于13－14世纪间。据O.达珀说，所有这些王国都起源于马莱博湖以北地区，即蒂奥地区，这不是没有可能的；特别是因为在蒂奥人、洛安果人和刚果人中间都曾经有一个不是指人就是指地方的同样关于“恩古努”的传说，而这个传说可能纯粹是有关国家起因的。根据这一传说，前一位君主的所有后代（从理论上讲）都有要求继承王位的同等权利。这一传说也还提到刚果王朝的诞生地正是在曼尼安戈以西，当地曾受巴泰凯（蒂奥）王朝统治。 572

如果这同一起源说是真实的，那么最早在马莱博湖以北和西北建立的国家，肯定是在14世纪之前，甚至早在公元1000年前后，就已存在了。只有对已知的刚果、维利和蒂奥王朝以及姆班扎－刚果（圣－萨尔瓦多）几个最早的墓地进行考古发掘，才有可能提供确切的日期和详尽的背景情况。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这一地区的文明最初是在其北方森林边缘地带或马荣贝森林地区获得其固有的特点的。这些文明适应于热带大草原，甚至巴泰凯高原的文明也适应于干旷草原。它们的向外扩散，包括语言的传播，说明了环绕两个发源中心（刚果人的中心和蒂奥或巴泰凯人的中心）出现又一次“高潮”。刚果人扩展到刚果河以南地区，洛安果的维利人则沿海岸朝北和东北方向直到奥果韦河的支流恩古尼埃河，同时来自赤道附近森林边缘地带的蒂奥人就向南占据了所有高原、加蓬的丛林地带以及河流瀑布地区。

关于刚果的传说于1624年开始有了书面记载；据传说称，刚果河以南原属安本杜人

（或恩敦博人）酋长领有的地区，后来才被刚果人在一段时期内逐步占领。刚果人征服了这些酋长领地，一直推进到马坦巴和恩东戈，这两个地方一度成为非正式的纳贡臣属国，但刚果王国本身可能最远只伸展到洛热一带，其疆域包括罗安达周围沿海地区，也就是包括岛屿和宽扎河与本戈河之间面对着岛屿的那片陆地。至于其他地区征服或建立国家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一份独立的封建领地的名单（正是这些领地联合组成洛安果中部几个省份）。虽然我们已经掌握当时一般的政治演变过程，但在恩戈伊、卡刚果、洛安果中心区、本吉、恩松迪和姆巴塔这些较大的封建领地出现之前，关于这过程的各个具体阶段我们丝毫没有掌握任何书面记载。当然，我们可以假设这个过程的格局同赤道森林地区相差无几：首先是出现了有酋长和若干参议者（每个血缘世系出一名）的大母系血缘村庄；然后通过各村通婚，也可能通过武力征服或宗教优势（利用咒语、神灵等等）形成酋长国；再到后来，随着情况的变化，有一些酋长国在如上所述的那些小王国建立过程中继续发展壮大，另一些则消失不见。对神灵的崇拜随处可见，大地的神灵和祖先的神灵被人们奉为至高无上的神。贸易在这个地区似乎很早就有了发展，因为在1483年葡萄牙人抵达时，这里已经有货币流通。这里存在贵族阶层，农活由奴隶承担。最近在金沙萨以及姆巴穆岛进行的发掘工作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断定确切年代。

573

公元1500年前的刚果王国
——各种制度[※]

刚果王国之所以值得详尽论述，并不是因为它最大和最强盛，而是因为有关它的传说最多，人们对它比较了解。卢克尼·尼米在渡河离开马农贝的本吉时建立了这个国家，然后又进一步征服了姆班扎刚果的安本杜人酋长领地。他在那儿先是“分享”权力，最后征服者和土著人相互融合，这是“贵族与贵族、平民与平民”的相互融合。下面我们引述一段16世纪末两位葡萄牙作家对“刚果王国及其周围地区”的有趣描述：

> 刚果王国分成6个省份：班巴、索格诺、松迪、潘戈、巴塔、彭巴。最大最富的班巴省，由国王堂·阿尔瓦罗的堂弟堂·塞巴斯蒂奥·玛尼曼巴管辖（最近他死了）。班巴省位于安布里兹河到科安扎河之间的沿海一带；那里有许多附属领主，其中最重要的是堂·塞巴斯蒂奥的兄弟、副督堂·安东尼奥·玛尼曼巴，还有玛尼伦巴、玛尼丹迪、玛尼班戈、玛尼罗安达（管辖罗安达岛）、玛尼科林巴、玛尼科安扎、玛尼卡扎尼。所有这些领主都在沿海一带享有统治权。在内陆安哥拉一侧，我们听说有安本杜族，他们听命于玛尼班布雷；包括安加西（恩加西）、钦亨戈（昆金戈）、莫托洛、卡遂达以及许多门第较低的皇室血统人物。这里所称的“玛尼”（*mani*），就是“领主”的意思；姓氏第二部分指其领地。例如，玛尼班巴也就是“班巴地区的领主”，玛尼科林巴也就是“科林巴领主”（科林巴是班巴的一部分），如此等等……

※ 最全的书目以及最精确的描述，见W.G.L.兰德尔斯（W.G.L.Randles）的著作，1968年。

如前所说，班巴是刚果的主要省区，是王国的关键所在，也是王国抗拒外敌的盾牌、利剑、阵地和壁垒……那里的居民英勇无畏，随时都准备拿起武器，赶走来自安哥拉的敌人……

如若需要，班巴一省即可调集40万武士的大军。[32]

这段文字详尽描述了刚果的行政区划；国王在班巴所能招募的军队人数肯定有些夸大，但也表明班巴省人口稠密，又有一个强大的行政机构。总督尊称“玛尼”，住在“班扎”（酋长住地名）。[33] 574

省政府和组织

刚果国王享有极大的权威，但并没有绝对的权力。所有总督，姆巴塔总督除外，均由国王提名。姆巴塔总督由臣民和恩萨库家族的显贵选举产生，再由国王确认。在索约省，总督是世袭的。看起来刚果国王在公元1500年前拥有一个疆域更为辽阔的王国；他继续宣称对基萨马、恩戈伊、卡刚果、洛安果以及对特克人和苏库人的各个酋长国和王国拥有主权。

各省的总督负责征税和收纳贡物，然后上缴国王。贡物包括“恩齐姆布”（*nzimbu*，用作货币的贝壳）、酒椰块（也用作货币）、高粱、棕榈酒、水果、牛群、象牙以及兽皮（豹和狮的皮）。因此，税收和贡物一部分是货币，一部分是食物，一部分是可以交换的货物，还有一部分是象征性贡品（豹皮和狮皮）。

1530年前后，刚果国王仍宣称对基萨马、恩戈伊、卡刚果、洛安果、特克人的各个酋长国和王国、刚果－利阿－穆拉扎（在宽果河附近）和苏库人拥有主权。但也许这是夸大其辞。在1483年前后，王国的核心地带由6个省组成：即是刚果河与大海之间的索约省；索约以南的姆班巴省；东北方的恩松迪省；恩松迪以南的姆潘戈省；东面的姆巴塔省；以及地处中间并包括首府在内的姆彭巴省。此外，有几个延伸到韦姆博和可能延伸到旺多的酋长国也直接依附于国王（见插图22.1，参阅以数字标号的说明）。

国王拥有一批中央行政官员协助他执政，同时他也有权撤换他们。在首都的中央行政官员包括一位宫廷总管、一位大法官、一位税务官兼理国库、一位警察总监、一位传令官，还有一位称作“庞佐”（*punzo*）但职权不明的官员。这提醒我们，手稿中录写的官职名称只不过是选择欧洲人容易了解的部分。此外，还有一位称作“卡邦加”（*kabunga*）的大臣执行高级祭司的职权，据说他的祖先在尼米·卢克尼之前就已经是首都土地的领主。

各省总督，通常都是国王近亲。国王总是把他宠爱的儿子派到恩松迪和姆潘古去任

[32] 转译自F.皮加费塔（F.Pigafetta）和D.洛佩斯（D.Lopes）编（1591年）的法文译本，1965年，1881年有英译本。

[33] O.达珀(O.Dapper)，1668年，第219页；J.范西纳，1973年，第339页和345页；W.G.L.兰德尔斯，前引著作，第17－25页；P.马丁（P.Martin），1972年，第3－11页。

575 总督，这样，一旦国王死去，他们都占有征求王位继承的实力基础。总督们可以任命职位较低的领主，后者又统治着一些世袭的村长“恩库隆图”（*nkuluntu*）。

祖先陵墓都在首都附近，从来是顶礼膜拜的对象。王权是神圣的，但并非国王本人，虽然他号称为“恩赞比－姆庞古”（*nzambi mpungu*，至高无上的神灵）。国王不同于凡人，他可以同自己的姐妹乱伦，使自己超脱于本家族之外，从而成为理所当然的统治所有家族的唯一领袖。凭这种行为和他的传授，他还享有施巫术、念咒语的巨大权力，甚至可与巫师相比。最能够显示他的身份的，首先是一具带鼓的头饰、还有一副铜制的或象牙制的手镯、一个收税钱袋，一个方凳形宝座：这些东西象征着他是一国之君，握有不同凡人的最高权力。国王无比高贵和独一无二的地位，由一套复杂的礼仪表现出来。

由于葡萄牙作者的描述，我们对刚果首都与15世纪的宫廷生活已有相当的了解。但是，首都遗址迄今仍未彻底发掘出土。

> 尽管刚果王国的首都在彭巴省境内，但是城市和方圆约20英里的周围地区仍由国王亲自掌管，因此可以看作一个特区……用当地语言来说，该城叫班扎，意即“宫廷所在地、国王或总督的住地”。[34]

这座城市位于彭巴省的中心，所以也是一座“可以向所有地区迅速提供救援的城堡”。班扎城以石筑墙，精心建造，后来葡萄牙人给它起名为圣－萨尔瓦多。它同时也是一个主要商业都市，是内地和沿海商旅交汇之处。

按理说，国王的继承人应该由一个9人或12人组成的选举团来选择和商定。“卡邦加”（高级祭司）有否决权；姆巴塔总督不能继承王位，但他是选举团的当然成员，后来索约的领导人也处于同样地位。选举团其他成员很可能不是王室成员。他们通常只限于在国王去世时表示自己同意已故国王的哪个儿子最有权势。在国王执政期间，议事会（可能包括行政官员在内）有权监督国王，特别是在战争问题、提名或撤换总督以及贸易（他们可以宣布开放或关闭商路）问题上。

官员们享有“薪俸”，这证明生产已开始商品化，国家对商品生产也有了控制：政府

576 还对“恩津布”（*nzimbu*）贝壳的产量实行监督。肯定有过一段很长的商业相当发达的时期，用于交换的物品看来包括铁制工具、陶器、海盐、编席、篮筐等日用品，还有一些声誉较高的物品，例如铜饰、象牙、酒椰片，来自沿海一带的纤维织物等。如果说当时有奴隶，那么，奴隶贸易在1483年前一定是受限制的。当时还没有专门的手工行业；熔造铁器、编织酒椰纤维，这两项最有名气的经济活动是专为贵族服务的。

主要的贸易路线都通往首都：一条商路运罗安达的“恩津布”；另一条则运海盐和扎伊尔南部的产品（鱼、陶器、柳条制品）；又一条运来马莱博地区的产品（酒椰、陶器等等）；再有一条，运来姆班巴的铜以及产自河流瀑布以北地区的铜和铅；最后一条则运马坦巴的货物。要想更好地了解1483年前这个王国的经济生活，就需要在圣－萨尔瓦多、

[34] 译自F·皮加费塔和D·洛佩斯，前引著作，第78－79页。

金沙萨、各省首府、罗安达岛及其他可能有过市场的地方进行考古发掘。

社会结构

我们对当时的社会结构知道得实在太少。甚至连实行母系制这一原则也还没有得到完全证实，尽管当时可能确是如此。我们只是对王位的继承方式比较肯定，因为第一个国王的名字，一部分与他的父亲有关，另一部分与他的外祖父有关。但是，这是人们至今所熟知的氏族名称，就像姆巴塔的族名一样。这会使人认为当时存在单线血统的部落，而且很有可能是母系部落。我们真正清楚知道的是，由“恩库隆图”统治的村子很小，它们不同于封建领主统治的中心村庄。省的中心可能已具有城镇的特点，事实上，一些记载中使用这个词，指的是姆班扎刚果、是索约总督的住地，后来又指金沙萨。社会划分为阶层已非常清楚：分为贵族、自由民和奴隶三个等级。贵族是一个不同平民通婚的特殊等级。在两个自由等级中，婚姻成了家族联盟的手段，似乎已经出现婚姻必须门当户对。贵族中有称“基托米”（*kitomi*）的，指的是以前的土地领主，他们在省区的作用如同“卡邦加”（*kabunga*）在首都的作用一样，而且他们可能已形成为一个同其他领土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贵族阶层，其手段就是类似将王朝同姆巴塔和卡邦加联合起来的那种门当户对联姻制。

结 论

只有通过进一步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并在语言学和人种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之后，才有可能较好地了解公元1100年至1500年间的时代。现在，从所知一切给人的总印象中，可以看到两大特点：一是无处不有的森林具有重大意义，也就是一种强大的生态力量；另一是国家体制很早就有了发展。对第二个特点早有推测；大迁移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动乱一经结束，在开始使用铁器之后，各王国的兴起似乎已是意料中事。 577

历来对森林重要性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一直没有认识到：不管是间有热带草原的森林，还是森林边缘地带，都构成了极为优越的环境，足以同北方和南方的条状林带环境媲美。尤其是所有早期国家的建立，可能都应归结于这种环境，只是最早的卢巴人中心是个例外。当然，卢巴的地理位置也很优越，它有湖泊，部分地区有覆盖着森林的低洼地，还有热带大草原。

最后我们还应强调，并非所有可能掌握的材料都已得到利用；系统地研究口头传说和有关起源的神话，以及语言学方面的探索，如同考古工作一样，都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正在对这个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地区进行历史研究，为此开辟广阔的前景。

23 南部非洲：民族和社会结构

L. D. 恩康科著
J. 范西纳合作

578

撰写历史和收集资料所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撰写南部非洲的历史，存在着许多问题。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非洲通史》的发起者，于1977年在哈博罗内召集一批专家，就"南部非洲历史的编写工作"进行了讨论。[①]这地区当前的政治形势，很不利于历史研究。由于种族隔离制度，对林波波河以南黑人各族历史的研究，与非洲其他地区史的研究相比，确实少得多了。种族隔离问题，《非洲通史》第8卷将按当代非洲的历史情况予以研究；但在这里，观察一下这个制度所产生的不幸后果，对于撰写南部非洲的历史也还是必要的。

哈博罗内会议指出，"南非各大学和出版社一般都拒绝承认非文字资料对于再现历史的有效性，他们的死硬立场，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当前的研究工作趋向于集中注意少数白人统治者的历史"。此外，南非白人史学家还拒绝借助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的研究。尤为严重的是，那个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的官方史学家们从档案中仅仅摘取与白人有关的材料，而有意将涉及非洲各族人民的文献置之不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在总结编写种族隔离地区历史的方法时指出："非常有助于了解东非社会历史，尤其是沿海地区社会历史的葡萄牙档案中的丰富材料，以及对研究殖民前的津巴布韦、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各社会的历史颇具启迪意义的许多文件资料，南部非洲的学者都视而不见"[②]。

579 这些史学家不仅将口头传说当作不可靠的史料来否定，而且说文字记载中也还有"棘手的选择问题"。他们这种说法是违反科学的。

南非四代历史学家积累起来的历史材料，都是反对非洲各族人民的。为撰写《非洲通史》这一章来收集材料，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我们当前所碰到的更有无视或毁掉现有文件的既定方针！极力否定非洲文化和历史，是种族隔离制度推行者手中的一件危险武器。

---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1980年（b）。

② 同上。L. D. 恩康科教授（L. D. Ngcongco）的发言，第18－19页；D. 查奈瓦（D. Chanaiwa）教授的发言。

尽管如此，现在南部非洲的环境也正在变化之中：津巴布韦于1980年取得独立，为进行研究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地域，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独立以后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前景，马拉维、赞比亚、斯威士兰和莱索托等邻国研究工作目前已经开始。举行了多次会议和讨论会，正切实努力将各种口头传说集中起来。

现有的认识

在南部非洲的历史中有两个特别举足轻重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第一，各族在那里定居的日期，或者说各族迁移或迁徙的日期；第二，政权的性质，这是确定其结构所必须说明的。因此，有必要追溯各王国或国家的起源。

首先必须说明，最近的研究证明科伊科伊人在这一地区定居已有悠久的历史；[3]有人甚至认为定居在开普地区的是至关重要的牧羊人。在德兰士瓦东部的莱登堡，出土发现过精美的陶瓷头像（公元5世纪），并且当地早有农耕的证据不容否认。正是这一时期，开始有了早期铁器时代的迹象，这铁器时代到1100年左右结束。据英斯基普用放射性炭素测定年代，铁器在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地区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公元前20±80年。这早期铁器时代的文化传播到整个南部非洲；许多地方都已发现当时的陶器。

到1100年，第二个铁器时代开始，或称为中铁器时代。这个时代同讲班图语的各族人民的迁移是紧密相关的。参加哈博罗内会议的专家研究了这一问题，否定了有关班图语系人民迁移的旧看法。C.埃雷特教授参加的研究小组（利用一本从莫里斯·斯瓦德希 **580** 编译的100个通用词汇选出的90个词语订正表）对南非洲中部两个语族的关系问题进行过探讨，其中一个语族由讲绍纳方言的人组成，这种语言在林波波河和赞比西河之间地区通用，与其他人所讲语言很不相同；另一个语族包括索托人、恩古尼人、聪加人、乔皮人和文达人所讲方言，合称为东南班图语。据C.埃雷特教授说，"绍纳人最早定居于今天的津巴布韦，而最初的东南班图语族则居住在靠南一些的地区，可能在德兰士瓦北部"。[4]

公元1000年到1500年是南部非洲历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新的生活方式在1100年以后逐渐传开，科伊科伊人变成了游牧民，足迹伸及广袤地区。在其他一些可能也是讲班图语的各族人民中间牛的重要性也迅速提高。正是在这个时期或更早时期，我们可以找到生活在这地区讲班图语的典型部族——索托人、茨瓦纳人和恩古尼人——的文化传统的起源，因为他们有鲜明的特点。[5]到公元1500年前后，这些传统中有的已经定形，由19世纪众所周知的一些主要族群继承下来。这些变化对沿海地区的一些渔民社会、开普

---

[3] 被人称作"霍屯督人"的人经常自称为"科伊科伊人"。"霍屯督"一词含有贬意。

[4] 教科文组织，前引文件，第20页。

[5] 索托、茨瓦纳和恩古尼都是19世纪任意拟定的族名，普遍用来指称南非两个讲班图语和生活在文达人和聪加人以南和以西的文化群。参阅M.威尔逊（M. Wilson），1969年（a），第75-76页和1969年（b），第131-133页；M.勒加希克（M. Legassick），1969年，第94-97页；S.马科斯（S. Marks），1969年，第126-127页。

地区的牧羊人和狩猎者的生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6]

但是，对这个关键时期，我们仍缺少足够的资料。文字材料尤为稀少，而且只涉及这个时期的最后年份。岩画大多没有确定年代，并且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翻译问题。口头传说涉及这一时期者，也都缺乏年代的痕迹。语言学方面的材料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我们特别需要再现早期恩古尼语和早期索托语的词汇，若能仔细研究班图语借用的科伊桑语词和科伊桑语借用的班图语词，那将会有很大的收获。[7]对一定时间内的一些地方性问题也有必要从人类学方面进行对比研究，这一工作才只刚刚开始。[8]

581

核对来自不同方面的证据，包括考古发现在内，可以发现存在着许多实际问题。现在人们往往习惯于把一般的陶器文化与有关的语言学或人种学材料来作比较，但证据甚少。本章将主要依靠考古发掘的成果，只有在手上掌握的材料证明可以这样做的时候，才把考古发现同文化群体或语言群体联系起来考虑。这是一种严肃的研究态度，尽量避开对以前许多著作提出批评；其实，以前论述各族人民的一些论文或专著，往往把推测提高到学术性假设的高度，甚至把推测当作证据。而我们则不同，我们在本章将对南部非洲班图各语族的演变作一番研究，对他们在德雷肯斯山脉南北两侧的发展以及科伊科伊人的扩张进行探讨。

南班图语族的演变

南非洲的班图语族，包括文达人、索托人、聪加人、恩古尼人和伊尼扬巴内人。[9]尽管先前有一些学者把他们这些语种连同绍纳语一起归为班图语的一个分支，但后来的研究清楚地表明这样的归类是不准确的，词汇学的计算方法表明：绍纳语、文达语、聪加语、伊尼扬巴内语、索托－恩古尼语都是东非班图语系中几个并列的分支。这就是说，南部非洲讲班图语的人绝大多数属于一个单一的语族，这个语族不仅与绍纳语有区别，而且与北德兰士瓦的文达语、莫桑比克南部和德兰士瓦平原的聪加语和伊尼扬巴内语也不相同。

C.埃雷特和他的合作者发现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互关联达到最高度，首先是在文达语和绍纳语之间（55%），其次是在聪加语和绍纳语之间（41%），然后是乔皮语（38%）、索托语（37%）和恩古尼语（35%）。按照他们的看法，既然绍纳语和东南班图语从语言学角度上讲构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亚语族，那么，非常明显，班图语扩散到东南非广大地区是从两个中心开始的。C.埃雷特参加的研究组把绍纳语和其他东南班图语言之间的相

[6] 这里所说的狩猎者是指南部非洲以前被称为“布须曼”或“桑”的那些族人。“桑”是一个科伊科伊词，意思是“依附者”、“抢劫者”、“漂泊者”，那些狩猎为生的群体从不以此自称。参阅R.埃尔菲克（R.Elphick），1977年，第19－20页，第23－28页。

[7] 科伊桑语，是指南部非洲非班图语族的语言。参阅O.科勒（O.Köhler），1975年，第309－313页。人们也可以将此词用于生物学的意义，因为有不少生物学家不恰当地将它用来指居住在南部非洲的一个族群。参阅J.希尔诺（J.Hiernaux），1974年，第98－112页。

[8] A.库珀（A.Kuper），1975年。

[9] C.M.多克（C.M.Doke），1954年。

互关联看成一种证据，证明原始恩古尼语和原始索托－茨瓦纳语从原来讲索托－乔皮－聪加语的地区扩散开来，速度相当之快，但仍限于林波波河下游一带。与之相反，恩古尼语和索托－茨瓦纳语则沿德雷肯斯山脉两侧广泛扩散。[10] 索托语和恩古尼语之间的分化，要比其他语种晚得多，分化地区很广（讲这两种语言的部族现在都仍然生活在那个地区，即南非），而时间则是在讲班图语的人在那里定居以后很久。正如我们将要谈到的，茨瓦纳人和其他索托和恩古尼族人定居点的格局在 1500 年已经定型，因此说这时语言已 **582** 经分化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定在 1600 年左右。这样，就可以与一些珍贵的口头传说一致起来，这些传说主要涉及 17 世纪或者更早的家系。

要在考古资料与班图语族出现之间直接挂勾是不可能的。直到最近，考古学家仍无例外地把班图语族和农耕与金属冶炼社会划等号，他们把班图语族的到来定在公元 1 世纪。不久之前，R. R. 英斯基普和D. W. 菲利普森提出，从公元 1000 年左右开始的晚铁器时代文化的扩展是与南部非洲班图语族的扩散同时并进的。他们集中强调，这些语言的扩散和晚铁器时代陶器的扩散是一次大的文化高潮、也是有记载可考的“最后”一次高潮。因此，班图语族的到来，不能同以后任何考古时期相联系。[11]

不能肯定班图人是否每到一地都带来了优良的农耕技术或者更先进的工具。但是，我们应该强调一点，这些新技术大概是有利于生产的增长和有助于新的定居形式。但班图人的到来并不见得是学者们早先强调的那种划时代的重大“事件”。

应该承认，在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之间地区，绍纳语、文达语和聪加语，长期相互影响。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恩古尼语和索托语中有大量的相关词，为什么社会习惯中也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父系继承、行割礼和一夫多妻制）。[12] 相同的习惯和相同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是长期共同生活的结果。应该指出的是，所有各个族群都有与血缘世系或氏族相对应的图腾，唯独恩古尼人没有。

关于班图人在南部非洲的多次迁移，历史学家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还得寄望于找到证据，证明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入侵，所出现的只不过是小股人的渗入。现在，学者们对口头传说还没有进行过充分的研究或者审慎的判断，这类传说很可能提供远及 16 世纪甚至更早的情况。考古学家决不应该忽视这类资料。

乌克哈兰姆巴以北地区

第二个铁器时代或称“中铁器时代”，出现于公元 1100－1600 年之间。这一时期是以在奥莱芬茨普特地区发掘出来的梅尔维尔－科皮斯和普拉特堡两处村庄遗址为代表的。每个村庄由 10 座或 20 座排成圆形的房屋组成；它们周围有栅栏；屋内是夯实的地 **583**

---

[10] C. 埃雷特（C. Ehret），1973 年。

[11] R. R. 英斯基普(R. R. Inskeep)，1977 年，第 124－128、153 页；D. W. 菲利普森(D. W. Phillipson)，1977 年，第 197－209 页，要点在 206 页。这两部著作是当前南部非洲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只是在这点假说上有所失误。

[12] R. R. 英斯基普，前引著作；C. 埃雷特，前引著作；D. W. 菲利普森，前引著作。

5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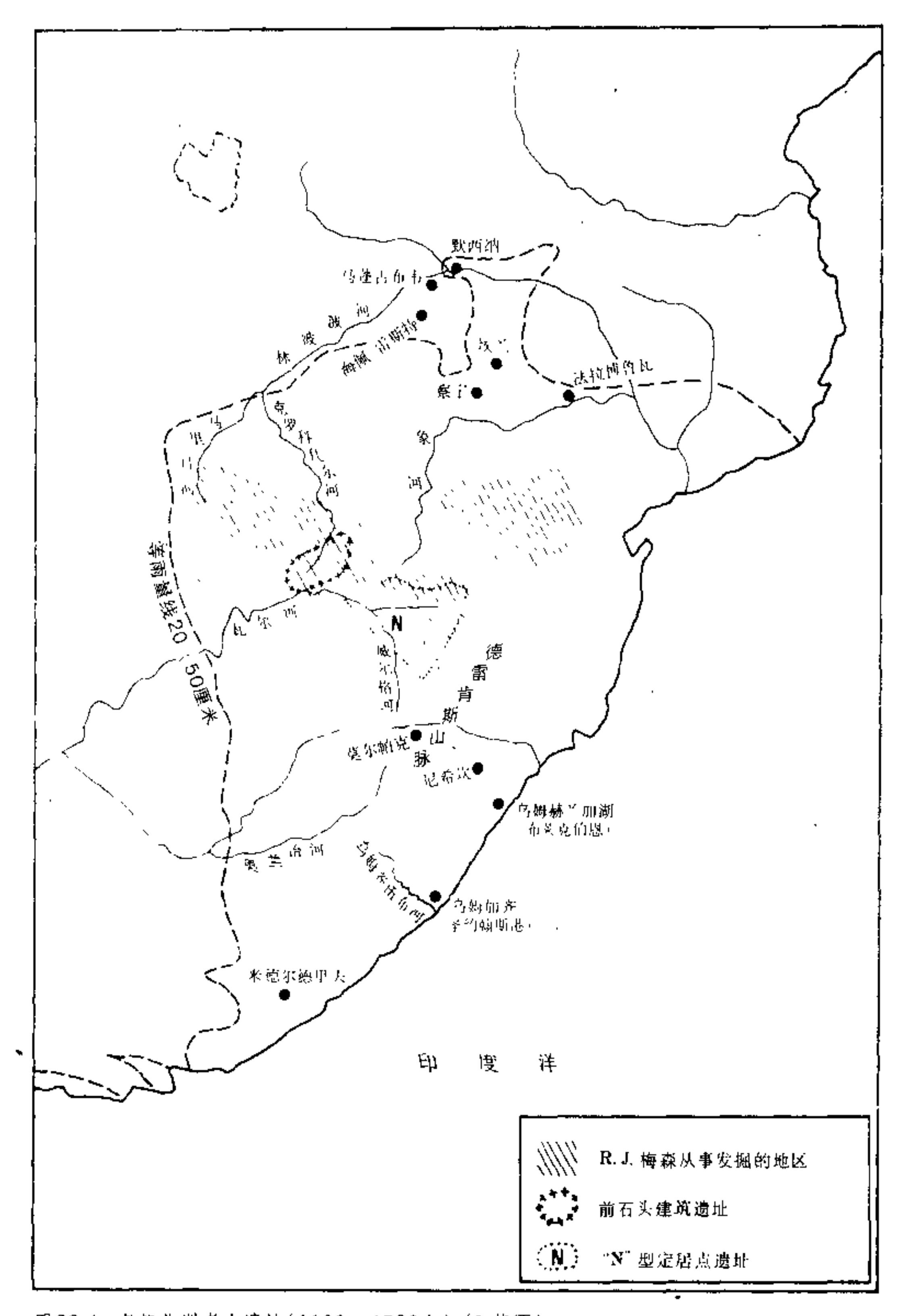


图23.1 南部非洲考古遗址（1100－1500年）（J.范西纳）

面。在遗址中发现了牛、绵羊和山羊的牙齿，还有铁制工具和保存完好的烧过的谷种。[13]

根据R.J.梅森的看法，这些可追溯到中铁器时代的文化肯定是班图语族的村庄（1100－1600年），并且几乎可以肯定是索托－茨瓦纳人的村庄。在这些村庄中，发现有些茅屋周围筑有石墙。除了豹地型的村庄以外，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可以明显看出由早铁器时代初期向后期过渡的遗址。

也许，考古学家不得不撇开这一重要差别，至少是在目前。目前，唯一可以证实这种过渡的遗址是德兰士瓦中部的埃兰。那里，盐的开采在整个时期内一直都在进行。早铁器时代的陶器于11或12世纪由马蓬古布韦陶器（豹地传统）取代。尔后又被法拉博鲁瓦陶器取代。[14]附近的“银叶”（察宁）遗址也显示了相同的发展（插图23.1）。

在法拉博鲁瓦，出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陶器和生活方式。此地是当时德兰士瓦两大铜矿中心之一。这遗址靠近林波波河的支流象河（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称它为“铜河”），在德雷肯斯山脉以东约80公里处。早于8世纪此地已有矿业，但目前发掘出来的遗址是960－1130年间的。此地陶器的样式完全不同于早铁器时代，但同法拉博鲁瓦人民今天制作的却颇为相似。这说明在我们探讨的这一时期之前好几个世纪，此地的陶器已具有它现在的特点；而在往北90公里的洛比杜遗址中也有同样的发现，[15]可见陶器并不是文化变迁的晴雨表。经过几个世纪，洛比杜社会变得大不同于法拉博鲁瓦，特别在政治生活方面(它是以崇拜自己的“雨水王后”闻名的)。法拉博鲁瓦现在处于北索托文化圈内，但它与洛比杜一样在1700年还是文达王国的一部分。因此有理由令人相信，至少在17世纪（不谈以后），这里人民的语言比较接近于文达语而不是索托语。后来发生过重大变化，却未见在陶器文化传统上有所反映。[16]

这地区由采矿者和商人继续发展，他们当然也从事陶器制作。至于当地的土著人，在口头传说中被称为“肖坎的萨朗”（Salang of Shokane），据说（大概是因为他们归属于聪加文化传统）完全不同于而且大大低下于他们的征服者（与文达政治传统有关系的人）。此外，还有一些传说与不久前渗入这个地区的非班图语族猎人有联系，而这些人 **585** 很可能有一种可靠的文化传统为依据。这样说来，在1100－1500年间，德兰士瓦低地草原似乎已经有从事农业的居民点了；当地人民互通有无，彼此交换手工制品。法拉博鲁瓦矿场（在半径32公里的范围内）产铁，更远处又产铜。这些矿产很可能传到林波波河下游，或经陆路到达沿海地区。察宁为这一地区提供盐，更往北，默西纳的铜矿肯定在一个辽阔的地区里以他们的产品从事贸易。R.T.K.斯库利提出一种假设说，由于法拉博鲁瓦冶炼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进行的贸易，那里的社会逐步形成了国家。在德兰士瓦整个平原地区发展起来的酋长国，开始都很小，它们既要防范到处流窜的狩猎者，又要同周围的其他酋长国相抗争。但是，在这一时期结束之后，可能就在17世纪，文达人的政治实体终于战胜了所有这些酋长国，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王国。[17]

---

[13] R.J.梅森（R.J.Mason），1973年。

[14] R.R.英斯基普，前引著作，第132页；D.W.菲利普森，前引著作，第204页；M.克拉普韦日克(M.Klapwijk)，1974年。

[15] N.J.范－德－默尔韦(N.J.Van Der Merwe)和R.T.K.斯库利(R.T.K.Scully)，1971－1972年。

[16] R.T.K.斯库利，1978年（a），详述自1700年左右开始的发展情况。

[17] R.T.K.斯库利，1978年（b），第25页。同时参阅R.R.英斯基普，前引著作，第135页。

在瓦尔河以北，吕斯腾堡、克莱克斯多普和约翰内斯堡三角地带，发现了一群具有同样传统的村庄的遗迹，年代是公元 1060－1610 年；R.J.梅森在那里进行了一些发掘工作。[18]在一处处圆形房屋中抹泥的地面上有平台，而平台上也同样抹了灰泥，墙壁上用的是一些较易腐烂的材料，可能是木栅栏，或是因为高地草原上难以找到木材而用芦杆抹泥搭成。居民种植粟米，饲养山羊和绵羊等家畜。村中房屋建造成中间为一椭圆形或圆形的空地，面积约 1 公顷，可能是牛栏。村子很小，一般只有 10 到 20 座棚屋。至少有 3 个已经挖掘的遗址是这种样子。定居点的这种式样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出现在石头建筑之前；石头建筑，从现有证据来看，在 17 世纪的德兰士瓦高地草原上已很普遍。[19]由于德兰士瓦中部和南部已经确定的成百个定居点中只有 4 个进行了发掘，因此今后进一步研究很可能还会发现年代在 1500 年以前的一些石墙遗址。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奥兰治自由邦有一种石头建造的定居点，现在定名为“N”型定居点，其年代至少在公元 1400 至 1450 年之间。

“N”型定居点的遗址出现在瓦尔河上游南北两岸，西面一直到威尔格河，南面和东面到德雷肯斯山脉。这一地区雨量充沛，牧草丰富。谷仓、牛栏和房屋按面定格局排列，有一道墙围着整个定居点，这一格局是农牧混合经济的有力证据。1600 年后，“N”型发展成为多种别的类型，它们遍及今天莱索托以北奥兰治自由邦的部分地区。后来这些类型的定居点有一个变异式样显然是茨瓦纳式的，它的出现时间最晚不迟于 1600 年前后。[20]

586

只有进一步进行研究才能确定吕斯腾堡－克莱克斯多普－约翰内斯堡三角地区带的前石头建筑遗址，可能还有更东面莱登堡地区年代不详的村庄遗址，是否真是出现在“N”型石头建筑定居点或德兰士瓦那些定居点之前。前石头建筑遗址以及瓦尔河以北“N”型和有关的石建筑定居点遗址，一直延伸到马里科河与克罗科代尔河之间地区，这个地区恰好与某些索托部落的散布相符合，至少从 16 世纪起是如此。[21]我们目前只掌握初步的材料，但R.R.英斯基普的观点，即认为那些前石头建筑定居点和石头建筑定居点都与索托人的生活方式和间接与索托语族有关，可能仍然还不成熟。R.J.梅森曾试图将公元 1100 年至 1500 年间这些乡村中独特的陶器风格同某些特定的茨瓦纳部落联系起来，但他的尝试还没有经受时间的考验。[22]只有进一步的研究才能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尽管如此，现有的证据看来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N”型石头建筑定居点在时间上是早于以后的遗址，以后的遗址中都有一种非常典型的带有两个耳房的房屋，其式样明显是茨瓦纳人的。人们可以在新建筑样式的推广以及叙述统治家族迁移史的口头传说之间，找出吻合的发展规律，至少 16 世纪之后是如此。在如今的津巴布韦地区，统治者在本文探讨的这个时期正是用石头建造房屋的，那里的以及莫桑比克的石头建筑遗址与

---

[18] R.J.梅森，1962 年和 1973 年。

[19] D.W.菲利普森，前引著作，第 198－200 页。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陶器称为厄伊特科姆斯特陶器，看来与吕斯腾堡地区出土的布伊斯普特陶器有密切联系。

[20] T.M.O'C.马格思（T.M.O'C.Maggs），1976 年（a）和 1976 年（b）。

[21] R.R.英斯基普，前引著作，第 138 页，书中做了一些非常笼统的推断，参阅M.勒加希克，前引著作，第 100 页和 103 页。

[22] 见B.M.费根（B.M.Fagan）的评论，1969 年，第 60 至 62 页；R.J.梅森，1962 年。

统治集团的扩张有密切联系。用石头建墙的想法可能就是从那里来的。当然，这也可能是约翰内斯堡本地的土发明，因为那里是放牧的好地方，然而木料奇缺。尽管如此，由于政治领导人喜爱这种建筑，这榜样无疑为当时的声望和时尚确立了标准，从而保证这一新的定居点样式得以推广。

公元1100年后，德雷肯斯山脉以北的定居点遗址显示出明显的重大变化；同前期已知遗址相比，牛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急速增大。地方组织的规模也扩大了，因为这时期定居点的面积显著增大。根据口头传说，在16世纪，国家开始形成，这总的说法与目前掌握的材料是一致的。我们把这里同低地草原地带（法拉博鲁瓦）或博茨瓦纳作一对比，就会看到瓦尔河附近的变化甚至更大。那里的定居格局和陶器风格的变化非常鲜明，对 **587** 此又如何解释呢？

解开这个谜的关键可能在博茨瓦纳，J. R. 丹鲍经过研究发现，那里有公元800年到1300年的遗址150余处。有两处发掘证明，从戈科梅雷陶器（早期铁器时代）的日索阶段发展到陶兹韦陶器是有地方持续性的。博茨瓦纳中部（马哈拉皮耶以北）大多数遗址具有集中放牧牛群的有力证据。那里牛粪积层有的地方厚达1米。[29] 当地的人都是半牧民，地理环境非常有利于这种作业，因为牧草带有甜味，还有一种“莫佩涅”叶（*mopane*）富有营养。正是这里而不是像T. N. 赫夫曼想象的那样在纳塔尔，牲畜迅速繁殖。博茨瓦纳的遗址，很少有同东非沿海一带来往贸易的证据，这并不奇怪，因为津巴布韦以及后来东面的马蓬古布韦都已开始集中控制贸易。公元1300年以后，遗址的数量明显减少，这或是因为气候变得干燥（卡拉哈里沙漠离此不远），或是由于采采蝇区转移迫使牛群随同其主人远走他乡。

人们很容易把这种人口下降的现象同德兰士瓦西部人口明显的增长和大规模饲养牛群的事实联系起来。有一些半牧民可能把他们的畜群转移到瓦尔河附近环境较好的地方，并利用他们的牛群把那些早期铁器时代的部落群体吸引到自己的社会中来。采取“洛博拉”（*lobola*，用牛作聘礼）和代为养牛的办法，便能达到这个目的而又有利于拥有大量牛群的人。“洛博拉”、代养牛群、用牛进贡等作法是后期索托和茨瓦纳文化的特征。一旦跨过瓦尔河，也就接受了畜牧兼农耕的经济，并引进挤奶业。土著居民可能也养一些牛，但大概只是为了吃肉，而没有用于产奶。

由此可以反驳认为截止那时陶兹韦陶器与晚期铁器时代瓦尔河两岸的陶器没有任何联系的假说。然而，现在也还没有人对这两种陶器进行过比较研究；瓦尔河一带的新样式，不一定就同移居者的一样；在本地样式同外来样式相遇时，是能产生出一种全新样式的。[30]

我们相信，这就是实际情况。后来在博茨瓦纳中部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社会环境也发生变化（津巴布韦政治机构的兴起），这就引起了在瓦尔河一带移民定居，同时出现了典型的索托－茨瓦纳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语言。下文，我们将论述另外一些牧民 **588**

---

[29] J. R. 丹鲍（J. R. Denbow），1979年。

[30] 关于陶器制作的改进，见R. R. 英斯基普，前引著作，第132－133页和图表9；提法很有意思，但有点教条主义。

或半牧民好像也向南方和东方迁移，以至影响到非洲大陆东南部和西南部的所有居民。

乌克哈兰姆巴以南地区

目前只有三处遗址能证实，在德雷肯斯山脉之南存在着晚期铁器时代的文化。这地区如今是恩古尼语族居住的地方，他们的生活方式比索托－茨瓦纳族更集中于养牛业。他们定居点的面积要小得多，也不那么集中；他们的文化也不同于索托－茨瓦纳人。

至于布莱克伯恩（德班以北约 15 公里处的乌姆赫兰加湖附近），也已经进行了发掘工作。那是由 12 间房屋组成的一处村落，发掘了其中的两间。[25] 房屋是建在一个直径约 5.5 米的圆形平地上，其构造呈蜂房状，有一柱或几柱支撑着；房架材料可能是细枝条，顶上铺了茅草。这与恩古尼式的建筑和科伊科伊人的房屋都很相似，村落的规模也同我们所知的恩古尼和科伊科伊人村落大小相仿。遗址内有碎铁片，残余食物——猎物骨头、贝壳和鱼骨。这遗址可能不是恩古尼人的，而是科伊科伊人祖先，或是沿海一带渔民的；因为我们知道恩古尼人和索托－茨瓦纳人一样禁忌食鱼，而发掘出来的证据说明，这种禁忌要不是在 11 世纪之后才出现，就是沿海一带科伊桑语族的狩猎者曾在此居住。这里的陶器（被称为NC－2 陶器），似乎也与滕布（恩古尼族的）陶器相同。更重要的发现是，同样的陶器还散布在瓦尔河附近大片废墟中；可见这两地居民之间很可能是有某种联系的。这一切都发人深思，但目前还无法轻易作出解释，尤其是因为目前尚未发掘更多的遗址。R. R. 英斯基普不愿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推测是明智的。[26]

在今埃斯特科特附近的莫尔帕克遗址，推算年代是 13 或 14 世纪。这遗址位于一个海角，周围有墙，围墙内不仅有房屋，而且有空地和台地。这定居点显然处于有利的防守位置上。房屋的残留物表明地基好像是长方形的。如果真是这样，这在整个南部非洲是独一无二的。那里的居民使用铁器，种植高粱，猎取飞禽走兽，放牧牛群。他们的陶器同其他地方的陶器有何关系，这还没有确定。如果房屋地面不是长方形的，这遗址比乌姆赫兰加湖遗址更像是人们所设想的恩古尼人祖先的经济活动。[27]

589

最后一组遗址是 1978 年在德兰士凯的乌姆加齐河口附近发现的。这些遗址可以代表铁器时代的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居住地。这里也发现人们能够冶铁，还有与高地草原地面相似的那种焙干粘土的明证。目前还没有用放射性炭素测定这些遗址的确切年代，一般是根据出土的碎陶片来推断年代。如果认定棚屋的那种地面和冶铁技术属于较早的年代，那就有可能使我们对德雷肯斯山脉南北两侧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及恩古尼人的祖先在这样靠南的地方定居的时间的认识，产生根本性的变更。[28]

现在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恩古尼人的最早资料出自 16 世纪纳塔尔和开普地区沿海一带海难事故的幸存者。[29] 从口头传说中收集来的材料说明，德兰士凯至少在 16 世纪居住

---

[25] O. 戴维斯（O. Davies），1971 年。
[26] R. R. 英斯基普，前引著作，第 145 页。
[27] O. 戴维斯，1974 年。
[28] 马蒂耶拉（Matiyela），1979 年。
[29] M. 威尔逊，1969 年（b），概要阐述，第 78－95 页。

的是科萨人，他们已组成若干个小而不稳定的酋长国，在此之前，一些占统治地位的家族已有好几代生活在乌姆齐伍布河上游，特别是现在人们不知在何处的德德西河一带。M.威尔逊经过对比验证，认为他们至少在1300年左右就在那里生活了。[30] 但那不是一个肯定的年代，而只是种大致的估计。可以肯定的是，早在1500年恩古尼人就已经占据了他们在1800年居住的几乎全部土地，尽管在西部他们是与科伊科伊人混居，并逐渐将后者同化。

东、西恩古尼语都留有科伊科伊语的深刻烙印。L.W.拉纳姆认为，这一影响只是在科萨语群和祖鲁语群开始分离之后才有的。[31] 这可能是后来发生的事，因为就在1600年之前不久，失事海船上的一名水手说，当时的语言，只是几种紧密相联的方言，此人确乎到过整个沿海地区。[32] 科伊科伊语对祖鲁语和科萨语的影响是很强的，它的词汇分别占这两种语言的14%和20%，科伊科伊语甚至改变了科萨语的音素系统。这意味着，科伊科伊语的影响在科萨语开始从东恩古尼语分离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科伊科伊人肯定占据过深入到纳塔尔内地的某些地区，正因为如此，甚至连东恩古尼语言都受其影响。[33] **590**

恩古尼人成为半牧民，饲养牛群的兴趣甚于从事农业，这肯定是受了科伊科伊人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牛群不是直接从科伊科伊人那儿得来的，因为科伊科伊人乐于饲养阿弗里坎德尔牛，而恩古尼人则喜养桑加种牛，这种牛在德雷肯斯山脉以北也很普遍。科伊科伊人的习惯对饲养业影响很大，词汇中充满外来语即是证明，例如挤奶法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科萨人的首领还从他们那里学会骑牛和用牛驮运东西。[34] 科伊科伊人在宗教信仰上也对科萨人有影响，L.W.拉纳姆以此证明他们曾长时间居住在恩古尼人的土地上，西部边境至今仍沿用科伊科伊语地名，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科伊科伊人的影响还有不少可以从居住格局中看出，而砍掉一截小拇指的作法也是确凿无疑的。

从生理上说，今天的恩古尼人是“尼格罗人”同“科伊桑人”的混血。[35] 在科萨人中间，这种混血现象十分明显，他们似乎有60%的遗传基因来自科伊桑人血统。茨瓦纳人也是如此。在东恩古尼人中，比例要低一些，但两者关系依然密切。就西恩古尼人而言，这并不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就连茨瓦纳人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同狩猎民和科伊科伊人的相互影响文件中记载甚多；但我们也发现与东恩古尼人中混血现象相当突出，证据的强烈程度令人吃惊。

若将语言上（表明同科伊科伊人有联系）的证据和生理上（既可能是狩猎民，也可能是科伊科伊人）的证据联系起来，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么是有很多科伊科伊人

[30] M.威尔逊认为，这年代“是在家谱所包括的时间内，也即1300年以后，但也可能在此之前好几世纪”（1959年(b)，第178页）。1969年他又重申这一论点，但未提及年代。他的推算，主要是以科萨酋长多古在1686年统治为依据（见M.威尔逊，1969年(b)，第95页）。但这个年代也还是一种未经肯定的估计。参阅J.B.佩里斯（J.B.'Peires），1973年；G.哈林克（G.Harinck），1969年，第154页及155页注30。

[31] L.W.拉纳姆（L.W.Lanham），1964年。

[32] M.威尔逊，1969年（a），关于桑托－阿尔伯托号海船1593年3月失事的情况。

[33] L.W.拉纳姆，前引著作；G.哈林克，前引著作，第150－153页。

[34] M.威尔逊，1969年（b），第96页、103－105页、107－109页。

[35] J.希尔诺，前引著作，第107－110页。

5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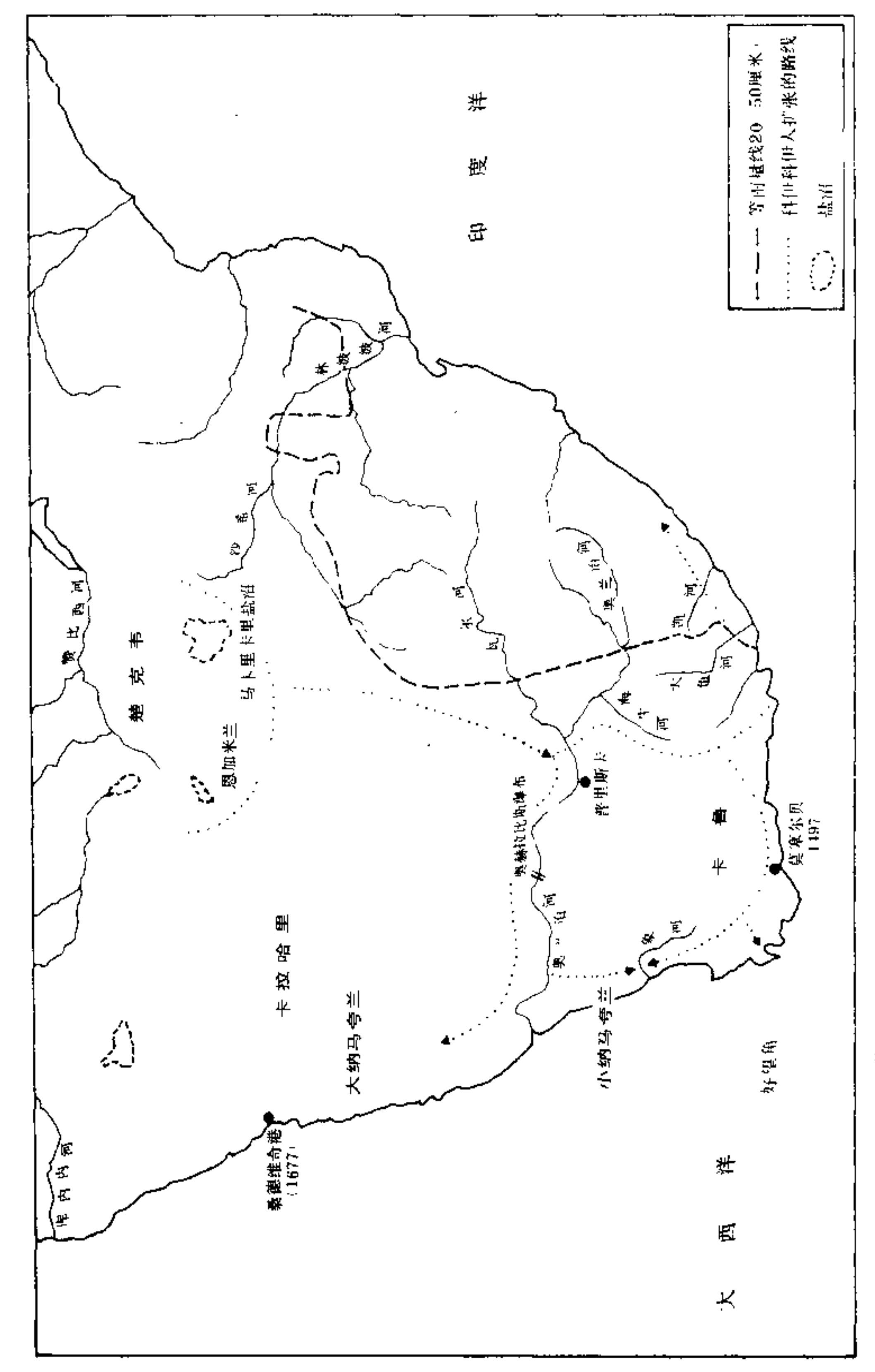


图23.2 科伊科伊人的扩张(J.范西纳)

在纳塔尔居住过，要么是恩古尼人在纳塔尔定居前同科伊科伊人有过非常强烈的相互影响；后一种可能性要小一些，因为如果是那样，东、西恩古尼语中共有的科伊科伊词在比例上会更高。这意思是说科伊科伊人的作用比历史学家迄今所认识的要大得多。下文我们将看到，他们的影响不只是对恩古尼人，而且涉及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大部分地区。

科伊科伊人

1488 年，巴托洛梅乌·迪亚士发现好望角；他在那里会见和寻访了一些非洲人，同他们有过接触。1497 年底，瓦斯科·达·伽马在一次远航中，与圣赫勒拿贝角以北地区和莫塞尔贝的非洲人有过接触。1510 年，印度总督堂·弗兰西斯·德－阿尔梅达与 60 名葡萄牙士兵一起在桌湾被杀，从而激起了科伊科伊人与葡萄牙人的对抗。[56]此事证明科伊科伊人组织良好，足以打败手持火枪的葡萄牙军队。一个半世纪之后，科伊科伊人又在开普地区碰上了准备移民该地的荷兰人，这更是导致了一场漫长的灭绝性战争。 592

从语言角度说，科伊科伊人属于科伊桑语系的楚克韦语族，这在最近已经得到证实。这一语族还包括安哥拉南部沿海地区使用的几种语言。[57]实际上，后来从纳米比亚北部到开普地区，再往东到大鱼河，这整片地区使用的都是单一的科伊科伊语，只不过是分成两种或三种方言。除此之外，他们的语言对恩古尼人的影响表明，科伊科伊语在纳塔尔地区一定也曾广泛使用。R. 埃尔菲克指出，科伊科伊语已是非洲扩散最为广泛的语言之一；整个族群的语言共性表明，它从楚克韦家园向外扩展比较晚但也比较快。科伊科伊牧民饲养牛和肥尾羊，他们以牛为坐骑，用牛驮运东西和盖房用料。这使他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也是与他们的语言广泛扩散相一致的特点。尽管他们同狩猎者有明显区别，但生理特征却与“科伊桑”人相同。[58] 相互间的差别主要在于饮食（牛奶），至于其他不同之处（诸如血清的特征）是不易解释的。尽管这些细小方面有区别，但生理人类学家都认为科伊科伊人与狩猎者是同一体类。这再次印证了语言学研究得出的结论。科伊科伊人属于南非的狩猎民，他们不是从非洲大陆其他地方衍生出来的。

科伊科伊人约在 1488 年来到开普地区南部，但是他们住在那里的时间并不很长，很快他们就离开了开普省中部良好的牧场，17 世纪时开普地区的科伊科伊人口密度不大即可证明这一点。鉴于这种情况，再考虑到如此广大地区使用共同语言这一特征，所以R. 埃尔菲克得出结论，科伊科伊人到达开普地区的时间不会是在 1488 年之前太久，虽然他们从博茨瓦纳进入开普一带至少用了一个世纪。[59]

科伊科伊人的祖先在博茨瓦纳北部拥有大批牛群，可能是阿弗里坎德尔种牛；同时 593

---

[56] 见E. 阿克塞尔森（E. Axelson），1973 年（a）和 1973 年（b）。

[57] E. O. 威斯特法尔（E. O. Westphal），1963 年；O. 科勒，前引著作，特别是第 305－307 页（对含米特人的论述），320－330 页（对楚克韦人的论述，他称之为科伊人）。

[58] R. 埃尔菲克，前引著作，第 8－9 页；J. 希尔诺，前引著作，第 100 页，第 103－107 页，特别是第106－107 页。

[59] R. 埃尔菲克，前引著作，第 12－13 页。在开普地区西部和纳米比亚的岩画中并没发现有牛，只有 5 处岩画描绘了羊，都是基督纪元之初遗留下来的；只有进行更广泛的考古研究，才能断定科伊科伊人到达这个地

他们已经掌握锻造金属的技术，虽然他们还不懂得如何冶炼金属，其中部分人已经放弃狩猎采集生活，或许可以设想J.R.丹鲍在博茨瓦纳发现的遗址是早期科伊科伊人的定居点，而不是班图语族人留下的营地；在林波波河畔的班巴迪安纳洛发现的遗骸曾引起争论，但似乎能说明当地居民是半牧民，并且生理上与11世纪的科伊科伊人很相近。[40] 1300年之后，博茨瓦纳人口减少，我们不仅可由此断定班图语族中一部分人前往瓦尔河流域的年代，而且可以由此断定科伊科伊人开始向外扩张的年代（见插图23.2）。

科伊科伊人从高地草原向南方和东南方向扩展，他们只要有可能便沿着河流前进。[41] 他们抵达瓦尔河和奥兰治河汇合处之后，一部分人沿奥兰治河向下游进发，进入纳马夸兰和纳米比亚，在1677年前到达桑德维奇港。另一支从两河汇合处沿河向南越过斯湼乌伯格，然后一分为二：一路从海滨向东进入内地到达纳塔尔，另一路则向西到达开普地区水草肥美的牧场。这最后一路又分出一支，沿海岸向北到象河，与来自纳马夸兰的同胞会合。[42]

在接受上面描述的情景之前，还得指出一个与上述说法不一致的情况，即米德尔德里夫的证据。克伊斯卡马河畔这处露天的遗址是11世纪的，[43] 那里有家养的牛，但工具并不属于铁器时代，只发现一些陶器碎片和石制工具。如果认为米德尔德里夫是科伊科伊人的遗址，那么上面提到的假说就不能成立，因为年代过早，也许还涉及技术水平。但没有理由认为它一定是科伊科伊人的遗址，因为它与我们现在对班图语族文化的看法不相符合。我们可以暂且认为米德尔德里夫是一处驯养牛群的狩猎民的遗址，就像他们的同胞一千年前在开普地区沿海一带改进牧羊方法一样，米德尔德里夫人后来被科伊科伊人同化或消灭。

科伊科伊人的扩张，深刻地影响了非洲最南端所有居民的生活。我们已经谈过，他们对开普东部和纳塔尔的班图语族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恩古尼人在纳塔尔并没有发现科伊科伊人，而他们逐渐赶跑或者同化了开普东部的科伊科伊人。但是，把所有证据综合起来所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如此。科伊科伊人在凯河以东遇到的是一些分散的农业定居者，他们很快就占据了这些定居点，从而成为德兰士凯甚至纳塔尔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力量。但是，在德雷肯斯山脉和海洋之间的低地上，那里的农业社会却要经过一个、甚至两个世纪，科伊科伊人的人口密度才达到足以改变居民力量对比关系、引起同化和统治问题。这说明为什么科萨人接受了那么多的科伊科伊人的特性，而这一点与科萨人在16世纪居于统治地位并不矛盾。

594

在西边，科伊科伊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然而却同样重要的方式影响了赫雷罗人。赫雷罗人并没有接受科伊科伊语言，但却接受了科伊科伊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可能还接受了

[40] J.R.丹鲍，前引著作；R.埃尔菲克，前引著作，第11页。关于班巴迪安纳洛遗骸，参阅B.M.费根，前引著作，第145-146页。

[41] R.埃尔菲克，前引著作，第18-19页；他主要是以科拉纳人在里特河一带的习俗和当地考古资料为依据，尽管年代晚于1500年。参阅R.R.英斯基普，前引著作，第145-146页。

[42] R.埃尔菲克，前引著作，第14-21页。

[43] R.M.德里考特（R.M.Derricourt），1973年。

他们的氏族组织形式。总的说来，这些讲西班图语的赫雷罗人好像是在博茨瓦纳西部遇到科伊科伊人的，因而随之迁移到纳米比亚，但他们住在科伊科伊人的北面。我们无法说出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但不排除公元 1500 年之前的某个时候。[44]

在政治结构上，科伊科伊人分成一个个氏族，随着饲养牛群的增大，他们又组成由世袭酋长领导的更大的政治单位。这样，在一个大范围内出现了酋长领地之间的依从关系，至少在 17 世纪时是如此，因为从开普地区到凯河所有科伊科伊人都处于一个单一的依从体制之中。但是，政治组织是建立在个人财富基础上的，继承制度和婚姻习俗只是将一部分家庭财富留给后人。尽管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但仍可能发生地位逆转的情况，以致富人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变穷，反之亦然。最穷的人可能退出这种生活方式而恢复狩猎和采集生活，就像开普地区斯特兰德洛普人的情况那样。一个政治单位的一伙穷人也可能进攻邻近的一个单位，抢夺牛群以图改善自己的境况。

每当畜群增加，政治体制也就相应加强，但畜群一旦减少，不管是因为缺少雨水，还是发生瘟疫或穷人偷牛贼事件，紧张关系就压倒通常的平衡关系，冲突增加，较富有的酋长也就成了盗贼的首要目标，一旦他的财富减少，他领导氏族的能力就随之削弱。因此，虽然不难理解为什么科伊科伊人当初可以压服流动性较小和组织不严的农民，但气候多变和牲畜得病，加上科伊科伊人内部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却对农民有利，至少在 **595** 凯河以东是这样。[45]

科伊科伊人对土著狩猎民和牧羊民以及沿海狩猎民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们全部争夺同一种资源的程度大于农民和牧民之间的竞争。在公元 1100 - 1500 年期间，土著人——所有的游牧民，大体上所有的狩猎民——都从事好几种劳动。在沿海地区，他们已几乎不再流动，完全靠海产过活。[46]沿开普地区西海岸和奥兰治河下游，即在奥赫拉比斯瀑布和普里斯卡之间，他们成群放牧肥尾羊；在内地，其他土著人以狩猎和采集“维德科斯（*veldkos*）为生。在那几个世纪中，最干旱的南非卡鲁台地、卡拉哈里沙漠以及最寒冷的高山地区，或许完全无人居住。但是在东面若干地方，或许和米德尔德里夫一样，有些猎人甚至已经饲养牛群。

随着科伊科伊人的到来，牧羊人，可能还有牧牛人，失去了他们的牧畜而重新靠狩猎为生，或者完全依附于科伊科伊人。沿海地区靠湿冷的草原和海滩为生的群体，作为幸存者在那里居住了很长时间，甚而把穷困的科伊科伊人也教会过斯特兰德洛普人的生活，但他们最终还是受科伊科伊人的统治。在内地，游牧民同狩猎民在竞争中互有胜负和相互胶着。对科伊桑人来说，狩猎民不过是些“盗贼”（*san*）；而狩猎民无疑把牧民看成非法“偷猎者”，逐渐把人挤出最好的水源和猎场。总的说来，科伊科伊人由于社会组织的规模较大，在同他们的小股对手竞争时往往占有优势。但是一旦环境条件稍有逆转，狩猎民就趁势争回一点平等地位，那时许多牧民不得不更多地从事狩猎，有的甚至加入

[44] D. 伯明翰（D. Birmingham）和S. 马科斯，1977 年，第 607 页。已知的赫雷罗人传说由H. 维德（H. Vedder）收编，英译本，1938 年，第 131 - 153 页。他认为，这些传说表明，赫雷罗人是从博茨瓦纳北部迁来的，初步确定是在 1550 年左右（第 151 - 153 页）。

[45] 关于社会 - 政治结构，见R. 埃尔菲克，前引著作，第 23 - 68 页；G. 哈林克，前引著作，第 147 - 148 页。

[46] R. R. 英斯基普，前引著作，第 114 - 117 页。

到狩猎民队伍中去。尽管如此，科伊科伊人的生活方式归根结底还是渐渐占了上风。到17世纪，科伊科伊语成了整个西开普社会交往的混合语，这是一种形式文化统治的明证。不管详细情况如何，无疑科伊科伊人的扩张改变了所有土著狩猎群体的生活。从19世纪到今天，无论卡拉哈里沙漠之南还是之北都没有一个群体可以被看成是“纯真的”狩猎民。

结 论

在本章所探讨的时期中，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科伊科伊人扩展到了非洲的最南端。596 这可能是博茨瓦纳境内卡拉哈里沙漠边缘气候条件恶化或者采采蝇活动区大转移所造成，也可能两个原因兼而有之。不管原因何在，作为游牧经济发源地的博茨瓦纳中部和北部于公元1300年被放弃了。那里有些部族并不是科伊科伊人，而是班图语族。他们也同样带着他们的牛群离乡背井。

在津巴布韦地区和林波波河以南的高地草原，牛被吸收到农业经济中来。外来移居者，至少是后来的索托-茨瓦纳移民取得了权力，他们开始在德雷肯斯山脉以北建立酋长国。至于这些移居者中是否有人到过更南的地区，我们没有把握。恩古尼人的祖先可能得到了比过去更多的牛，但移居者的人数仍然有限。出自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恩古尼人毕竟发展了一种比索托-茨瓦纳人更倚重于饲养牛群的经济。这是一种适应性的创新，这是遵循顺利侵入他们土地的科伊科伊人生活方式的结果。

历史记载如今仍很残缺。即使今后的研究证实了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所有假说，我们还是没有能解释清楚畜牧经济是怎样在博茨瓦纳北部发展起来的（其时间也许是在公元800-1300年之间），我们也不知道这一发展应归功于谁。恐怕不应该是班图语族，因为南部非洲许多有关养牛的词语都不是源于东班图语。它们可能来源于科伊桑语，有一位学者究其根源甚至一直追溯到中苏丹语。[67]然而到目前为止，能够证明这一结论的证据实在微乎其微。因为这方面的证据必须证明讲中苏丹语的人，从扎伊尔东北角的某个地区出发，越过广袤的地域，一直扩张到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而且又是在班图语族扩张之前。我们更倾向于认为，那些词汇来源于楚克韦语，正是科伊科伊人的祖先在5个多世纪中完善了畜牧业生活方式。他们愿意畜养牛群，但却不愿抛弃游牧和狩猎的传统。

---

[67] C.埃雷特，1972年和1973年。

24 12至16世纪的马达加斯加和邻近岛屿

F. 伊索阿维洛曼德罗索

12世纪末期，马达加斯加人口中的主要成分已经形成，虽然人口的迁移浪潮一直持续到16世纪。这种定居马达加斯加的浪潮是东南亚与非洲横跨印度洋的巨大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鉴于这个主题具有重要意义，负责编写《非洲通史》的国际科学委员会1974年7月在毛里求斯的路易港召开了专家会议，[1]专门讨论"历史上横跨印度洋的联系"这一专题。关于人们来马达加斯加定居这一问题，虽由《非洲通史》第3卷定为其中一章的主题，但仍有不少问题尚未得到解答；例如，非洲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对马达加斯加人口和文化的发展各有多少贡献这一问题，许多研究工作者仍在积极讨论之中。[2] 597

本章并不准备对12－16世纪马达加斯加的文明和历史提出一个明确的综合结论，而是试图阐明民族和文化这两方面缓慢而又复杂的相互影响及其发展结果，即16世纪初期在马达加斯加主岛上出现的最初统一局面。12世纪以后，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马达加斯加迎来了更多的阿拉伯人、印度尼西亚人和非洲人。关于这一点，梅里纳和贝齐莱乌两个地区的口头传说中就曾谈到外来者在他们的国王领导下发动战争，将"瓦津巴人"（Vazimba）赶入内地。[3]这类传说还提到几个家族世系，均可追溯到14世纪或13世纪。 598

然而有些专家认为，13－14世纪印度尼西亚人的新移民浪潮仅只影响梅里纳一地，这些专家对瓦津巴人的存在表示怀疑（在口头传说中瓦津巴人是印度尼西亚移民的对手）。事实上，据考证"瓦津巴"一词意即祖先，并非指某个民族；这个词是对于早已住在中央高原地带的无疑是黑人的居民的模糊称呼，他们比印度尼西亚人更早住在该地。[4]

关于岛上的居民，安泰莫罗人（东南地区的一个民族）精心保存下来的《索拉贝》

---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0年（a）。

② 见《非洲通史》第3卷第25章；另见R. K. 肯特（R. K. Kent），1970年，这是他依据语言分析学在政治及文化方面评价非洲人贡献的创新著作。

③ 关于伊梅里纳地区，参阅R. P. 卡莱（R. P. Callet）编，1908年。1868－1883年期间，卡莱神父收集了梅里纳地方的大量传说，这本重要的集子《梅里纳人编年史》中载有梅里纳人民的可贵资料。A. 德利弗（A. Délivré）在1974年对此书作了评论。关于贝齐莱乌地区，参阅J. 赖尼希菲纳（J. Rainihifina），1975年；P. 腊津巴扎菲马赫法（P. Ratsimbazafimahefa），1971年。

④ 关于"瓦津巴"一词的各种观点都以脱离语言学的论据为出发点，见G. 费朗（G. Ferrand），1891－1902年。被称作"瓦津巴"的古代居民看来还没有掌握某些技术（诸如冶炼金属和养牛），见P. 布瓦托（P. Boiteau），1958年。关于马达加斯加居民的最新研究，见C. 腊沃雅纳哈里（C. Ravoajanahary），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0年（a）。

5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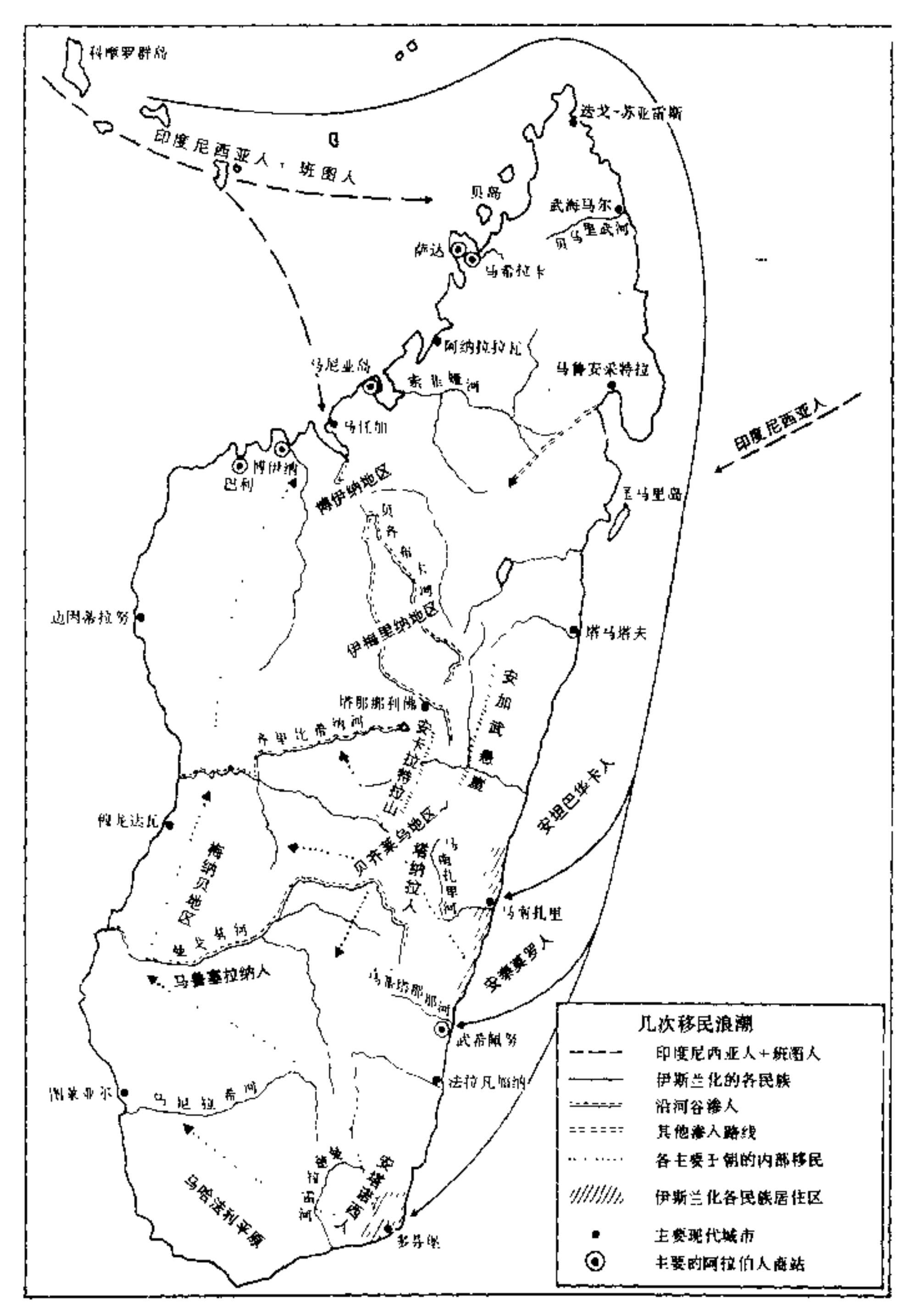


图24.1　马达加斯加：迁徙浪潮和居民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F.伊索阿维洛曼德罗索（F.Esoavelomandroso），在T.拉贾奥纳(T.Rajaona)合作之下，利用S.阿雅谢(S.Ayache)所编《马达加斯加地图集》和F.腊米安德拉索亚(F.Ramiandrasoa)所编《马达加斯加居民分布图》的资料绘制此图。

附注：印度尼西亚人的最后一次迁徙浪潮是在12—13世纪间。伊斯兰化各民族(斯瓦希里族和阿拉伯人)先在科摩罗群岛占有基地，然后从那里自北向南对马达加斯加岛作环岛航运。

(*sorabe*) 中就谈到阿拉伯人是怎样从麦加来到这里定居的。[⑤] 这些后来者对建立完善的政治体制看来是直接、间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岛上的人在他们来到之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王国。他们究竟是何时来到岛上的？要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必需先对各种文字记载和各种口头传说进行批判性的研究，特别是对来自被认为有久远历史的王朝的各种传说。

从 15 世纪和 16 世纪初开始，葡萄牙的资料就对岛上的居民和王国有所描述。葡萄牙人到达时，那里的王国已经初具规模，但它们创建于何时迄今仍是个未解之谜。是 12 世纪之前？它们是怎样形成的？对此众说纷纭。但我们必须承认，由于目前掌握的资料有限，对该地区还缺乏系统研究，所以现在还无法作出明确的回答。

究竟是黑人，即可能是最早占据该岛的人，为这些王国的创建奠定了基础，还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迁入者建立了这些王国？穆斯林肯定是很早就起过重要作用；有一些学者考虑到阿拉伯人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感到不排除这些王国起源于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说法，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就会涉及。

马达加斯加诸王国的起源

并不存在所谓的“瓦津巴人”。有些口头传说提到“瓦津巴人”，说明岛上很可能早已存在某种居民，但目前尚难肯定他们是什么人。关于“瓦津巴人”的种种传说仅仅是 **600** 一个基点，足以说明在最后一次迁徙浪潮之前并没有王权体制存在。贝齐莱乌地区的口头传说也倾向于一种看法，即土著人没有国王，只有战时才推举首领。

种种传说和说法

P. 奥蒂诺认为，从印度尼西亚来的人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特征加以识别，而不必根据他们到达马达加斯加的先后顺序和年代远近来判明。按这位学者的看法，一部分移民具有“脱胎于马来 - 玻利尼西亚传统”的大众文化，而另一部分则来自“认为王权和国家各有独立作用的典型的印度尼西亚印度教”的贵族文化。梅里纳人的王朝节日实际上很像印度尼西亚群岛印度教地区的喜庆节日。许多传说都强调这次移民浪潮年代并不久远的特点，因此它有别于较早的各次移民浪潮。奥蒂诺将这种贵族文化来到马达加斯加的时间定为 12 世纪。[⑥]

根据 P. 奥蒂诺这篇论文，伊梅里纳贵族以其印度教文化为显著特征。然而，J. 隆巴德却坚持认为“南部和西部大型政治实体的建立是阿拉伯化的部族迁居来此的结

⑤ 《索拉贝》(*sorabe*) 是用阿拉伯字母写的手稿，但用的却是安泰莫罗语，其内容是卡蒂博 (*katibo*, 书吏、传说保存者) 的传说汇编。这些手稿保存在英国、法国和挪威的图书馆中。参阅 L. 蒙塞 (L.Munthe), 1977 年。

⑥ P. 奥蒂诺 (P. Ottino)，1975 年。

果。[7]这种王朝或君主制起源于"阿拉伯人"的说法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他们认为是穆斯林给马达加斯加岛东南地区的各个社会带来这种革新，那里原来只有氏族。

需要指出的是，可能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外来影响。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既是生物学上的，也是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共生现象。例如，梅里纳人的政治制度中确有穆斯林的影响，即使很难确定"安德里阿纳"(Andriana，贵族)什么时候开始与定居到马达加斯加东南部来的移民相接触。恰如 J.P. 多梅尼契尼所指出的，我们决不能忘记非洲人的贡献；他还指出，把岛上诸王国的起源同穆斯林的到来联系在一起是十分错误的；每个地区的制度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4 个王家萨姆佩（*sampy*，神殿）中只有 3 个来自东南地区。这位学者在研究关于其他各个萨姆佩的口头传说和这种有巫术魔力的神殿的本质时得出结论说，"萨姆佩起源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在马达加斯加广为传播之前，虽然它后来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8]

601 在西部，P. 奥蒂诺说，"最早的几个王国疆域狭小，显然在政治上都没有任何明确的继承观念"，它们是在马鲁塞拉纳人到来之前建立的。他把这些"萨卡拉瓦之前"的王国和第一批母系班图移民联系在一起，这些班图移民以农业为生，而萨卡拉瓦诸王国则是由游牧部落（父系班图人）建立的。[9]我们对这些结论应该重视；这些结论特别强调要对一种文化的各个方面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较好地了解它们所作的各种贡献以及它们相互结合的方式方法。种种迹象表明，这些王国出现于 12 世纪之后；在此之前，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有了组织严密且已具有王权核心的氏族。当时的王国，只不过是这些氏族重新组合而成的更大和等级制度更加分明的政治实体。

马达加斯加东南部伊斯兰王国的缔造者拉米尼亚及其后裔具有很大的影响，这是肯定无疑的。根据 P. 奥蒂诺的看法，该王国的缔造者很有可能来自印度的西南部。E. 法热龙在研究有着相互联系的两个西部王朝（马鲁塞拉纳和安德莱沃拉）时，认为这两个王朝同属印度－阿拉伯血统；他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格朗迪迪埃的假设，而这假设却受到 R. K. 肯特的批判[10]有关这两个王朝的口头传说则把它们与以后某个时期来到该岛南部、后来又向西迁徙的外国人联系在一起。

岛内部迁徙的情况更加复杂，所以很难理出头绪来。这些新来的移民，似乎刚一来到就立刻向四周各地搬迁。尽管他们都保持了各自的民族特性，但熔炉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该岛文化的同一性就是最好的证明。

梅里纳人的到来与占领伊梅里纳；梅里纳王国的诞生

马达加斯加的高原地带如今住的是梅里纳人、西哈纳卡人、贝齐莱乌人和贝扎诺扎

[7] J. 隆巴德（J. Lombard），1973 年。
[8] J. P. 多梅尼契尼（J. P. Domenichini），1971 年（b）。
[9] P. 奥蒂诺，前引著作。
[10] 见 E. 法热龙（E. Fagereng），1971 年；P. 奥蒂诺，前引著作；R. K. 肯特，前引著作。

诺人；有些传说谈到，他们具有同一血统，虽然梅里纳人在他们中间已形成为贵族，其祖先安德里阿托玛扎率领远征队在安通吉尔湾登陆。以这里为基地，这些新来者逐渐征服了中央高原地带。[11]不论他们是直接来自东南亚，还是取道非洲大陆和科摩罗群岛分阶段航行来到马达加斯加，他们看来肯定是在安通吉尔湾上岸的。

亚洲最后一批移民来到马达加斯加的时间大致是在 13 至 15 世纪之间。大概是在这个时期末，新来的移民，很可能是分成小股陆续来的，到达后就沿着一条如今发现许多遗址的路线分散到岛上许多地方，这些遗址现在都已经过鉴定并正进行研究。移民们从马鲁安采特拉深入内地，在安加武悬崖西边的瓦拉希纳河源头停了下来。塔马塔夫北部的武希德拉扎纳和诺拉曼加的安巴图马西纳 - 武希德拉扎纳，都是这次进军途中的补给点。[12]

602

13 世纪阿拉伯旅行者的报道，甚至 16 世纪欧洲人的记述，都证实了印度尼西亚移民到达东海岸时间较晚的假设。[13] 贝齐莱乌地区的口头传说也提到伊亚里沃率领的移民采取相同路线从海岸来到马哈塔西亚特拉河的发源地，这些移民就是那里地方王朝的创建者。对传说的分析研究清楚说明，这是个相当缓慢的渗透过程，没有任何野蛮行为或大规模入侵的迹象。

新来的移民刚定居下来的时候并没有在该地区和当地居民发生争斗。《梅里纳人编年史》一书从一开始就叙述两者在伊梅里纳长期和平共处。根据传说，只是在两代统治——从安德里阿纳庞加到安德里阿马奈罗之后，新来者才开始向当地原有居民发动了战争。在这大部分覆盖着森林而又人烟稀少的辽阔地区，只要没有特定的领土和政治要求，分散的族群完全有可能彼此间长期不相往来，更不会发生任何抗争。然而，不同的族群相互间还是渐渐有了接触，并且开始通婚。虽然许多口头传说都十分明确地将梅里纳人、贝齐莱乌人和西哈纳卡人与瓦津巴人相区别，但是其他一些资料却一直没有把所谓的瓦津巴王朝与梅里纳王朝的世系区分开来。后者究竟有没有以前王朝的后代和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出现？最后来到马达加斯加的移民在那里接触到的是一个他们能够与之合作、随后又加以接管和改造的国家，这种可能性并不绝对排除。后来在“托姆庞 - 塔尼”（原来的土地主人）与新来移民之间爆发的几次冲突是相当激烈的。据 R. P. 卡莱神父所引用的一个传说称，梅里纳人的政治野心受到挫折，因为他们发现很难与原来的土地占有者共享肥沃田地。[14]据说，胜利者安德里阿马奈罗国王之所以能取胜，全仗他的士兵使用的铁制兵器的优势，而土地的原主人对这类金属品的使用却一无所知。这样又出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铁器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引进马达加斯加的？[15] 按人们公认的说法，它是公元 10 世纪末引进的。问题在于后来的几批移民都将这项重要发明的功劳据为己有。

[11] E. 拉米利松（E. Ramilison），1951 - 1952 年。
[12] A. 米利（A. Mille），1970 年。
[13] G. 腊莱米霍阿特拉（G. Ralaimihoatra），1969 年和 1971 年。
[14] R. P. 卡莱，前引著作。
[15] 见《非洲通史》第 3 卷，第 25 章。

603 至于我个人，对所谓“瓦津巴人”的看法，我宁愿接受 J. C. 埃贝尔提出的见解。[16] 据他解释，瓦津巴人只是那些后来者（梅里纳人）以及萨卡拉瓦人与之建立了谐趣关系的内地人，“这是以承认某些特权为先决条件的，这些特权最难使人理解的是可以无故侮辱对方（即使今日，马纳津巴（*manazimba*）一词仍表示侮辱的意思）”。[17] 所以，“瓦津巴人”可能是指黑人和在梅里纳人之前占领高原地带的印度尼西亚人的混合群体。

关于梅里纳人和贝齐莱乌人的多数传说，都谈到被击败者向西逃亡最远达到梅纳贝地区。他们被高原地带各国的国王驱逐之后，定居于萨卡拉瓦地区。他们的后裔对这次迁移也记忆犹新。当问及其祖先时，住在图莱亚尔地区南贝凡德里亚纳森林中的米凯亚人都说，他们是被梅里纳国王驱逐出来的瓦津巴人的后代。[18] 当然，我们也难以接受另一种假设，即认为当时土著人全都逃之夭夭，只留下一些令人畏惧的坟墓。[19] 实际上，至今还有一个自称是瓦津巴人后裔的安泰希罗卡氏族住在塔那那利佛西北偏西的梅里纳腹地，这一事实否定了原有居民全被驱逐的说法。他们中虽有不少人离开了伊梅里纳、贝齐莱乌和梅纳贝（举例而言，原住西部的扎菲索罗人就是在萨卡拉瓦人入侵之后东迁的），但大多数人还是留在原地。最后到来的移民，确实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更早来到这里、被看作是托姆庞－塔尼（*tompon-tany*，土地原来的主人）的族群取得谅解。胜者和被击败者之间的联姻关系增加了，相互间取得了暂时的妥协。胜者自信能得到原先居民的支持和地上诸神的恩赐，被击败者也希望因自己的屈服而可以少受折磨。就在西部，“移民

604 们同安德拉姆贝人中的所谓托姆庞－托尼之间的联盟，使安德里阿姆博拉梅纳王朝产生了第一个历史性人物”。安德拉姆贝人因此建立了梅纳贝王国，开始出现宗教仪式，在一位称作姆庇托卡（*mpitoka*）的官员主持下向国王的祖先作祈祷。[20]

因此，从外面迁来的人——梅里纳人、贝齐莱乌人以及其他族人逐渐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并在这里建立了若干个王国。这些人对加强穆斯林的经济和文化也作出了贡献，穆斯林早在 9 世纪就因经常出没于科摩罗群岛和马达加斯加而为人所熟悉。特别是到了 12、13、14 世纪，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在马达加斯加及其周围岛屿的影响已经非常之大，而且这种影响是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无所不包的。

---

[16] J. C. 埃贝尔（J. C. Hébert），1958 年。他把瓦津巴（*Vazimba*）一词同一个表示谐趣关系的词 *ziva* 联系起来，提出在“土地的主人”和新来移民间存在一种 *fizivana* 式联盟的假说。

[17] 这一说法是很吸引人的。在西非，这种谐趣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在许多情况下使社会紧张关系得到缓解。在塞内加尔、马里、几内亚和科特迪瓦，在曼丁哥人和富拉尼人中，都有特殊的欢庆节日活动，那时在相互取笑者之间彼此交换礼物，又互相侮辱对方，整个气氛中不再有贫富贵贱的隔阂。（本卷编者注。）

[18] 图莱亚尔大学研究中心于 1974 年 9 月进行了考察调查。有关这些民族起源问题的更深一层资料都是由前前后后多次调查提供的。米凯亚人自认为是逃亡者，他们逃离马鲁塞拉纳王朝即殖民者王朝的统治。参阅 J. 迪纳（J. Dina）和 J. M. 霍厄纳（J. M. Hoerner），1975 年。

[19] 据 H. M. 杜波伊斯转述的一个贝齐莱乌传说称，在王族和他们的臣民中，都没有瓦津巴人的痕迹，人们认为瓦津巴人退回到西部去了。H. M. 杜波伊斯（H. M. Dubois），1938 年。

[20] J. 隆巴德，前引著作，第 10－11 页。

伊斯兰教对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群岛的渗透

由于东非洲沿海商业据点的兴起以及斯瓦希里航海术的广泛传播，穆斯林经常成群自东海岸来到科摩罗群岛和马达加斯加。[21] 穆斯林“殖民点”纷纷在科摩罗群岛和马达加斯加的一些地区设立，这实际上加强了莫桑比克海峡两边的贸易往来。科摩罗群岛，在非洲东海岸斯瓦希里人定居点与马达加斯加之间占有中介据点的地位，那里的科摩罗人也比较完好地保持了当地文化的起源传统。至于谈到马达加斯加情况却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离斯瓦希里文化中心最远的主岛东南地区，在保持自己原有文化特征的同时，逐渐与马尔加什文化传统相融合。与此相对照，居住在主岛西北地区的许多伊斯兰化的群体，一直与那些同科摩罗群岛和非洲人村落进行贸易的穆斯林保持着密切联系，却直到今天，仍保留着他们原来的特征，这种特征是由他们的实力、祖先传统和航海能力造成的。

此外，科摩罗人和马尔加什人的传说还提到阿拉伯血统的祖先，他们由于宗教罪名被迫背井离乡。安泰莫罗人的传说《索拉贝》详细叙述了 15 世纪前后安泰莫罗 - 阿纳卡拉人的祖先拉里塔瓦拉特拉来到这里的经过。[22] 据说他是摩西遗赠给他家族的圣骨的保管者，由于圣骨受到麦加素丹阿里·塔瓦拉思的垂涎，他不得不带着 30 名忠实的家臣到别处寻求避难。历尽千难万险，他们终于在马蒂塔那那河两岸找到了“希望之乡”。保存在马达加斯加东南安坦巴华卡人和安塔诺西人中的其他一些传说，也都提到来自麦加的共同祖先拉米尼亚。[23] 科摩罗人的传说则详细叙述了一伙逊尼派穆斯林，约 14 世纪时由于不堪忍受泽迪特的统治，被迫离开波斯来到昂儒昂岛的经过。[24] 这些叙述清楚地反映了有关人士决心依附最有名望的伊斯兰正宗教派，目的是想抬高自己的地位，并借助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身份来更好地巩固其权势。[25]

605

尽管众多的传说认为向南迁徙主要出于宗教原因，但不可否认科摩罗群岛和马达加斯加确实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移民对与斯瓦希里人进行交易感兴趣。许多因素：对阿拉伯人在西印度洋航行的研究，对东非洲商业据点的了解，科摩罗群岛和马达加斯加西北地区有与斯瓦希里世界非常接近的文化传统，在主岛的东北和西北处不少遗址中发现的很多物品都足以清楚表明该地区与非洲各口岸存在着贸易联系——这一切使我们必须用多种方式，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伊斯兰化的民族究竟为什么要进行迁徙的问题。

[21] H. N. 奇蒂克认为，从摩加迪沙到苏法拉的沿海狭长地带，一直到穆斯林 10 世纪左右在奔巴岛和桑给巴尔岛定居时，才开始处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之下；直到 12 世纪时，许多城镇居民仍信奉传统宗教。H. N. 奇蒂克（H. N. Chittick），1967 年（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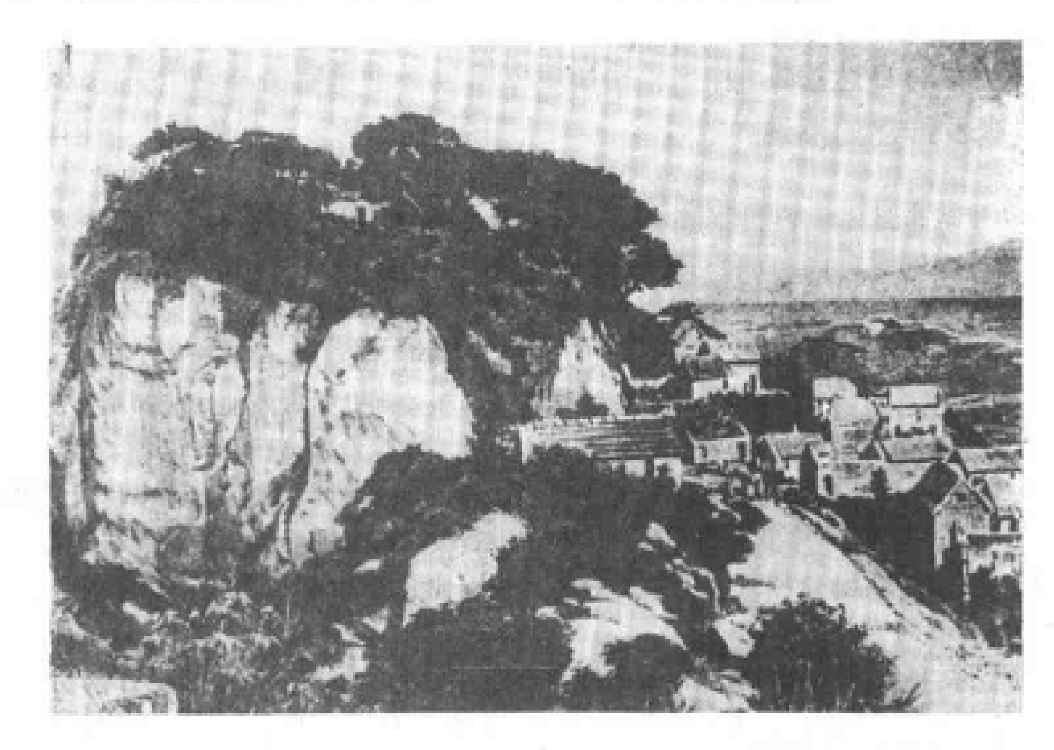
[22] 安泰莫罗 - 阿纳卡拉人是安泰莫罗的贵族阶级，拥有宗教特权。

[23] E. 德 - 弗拉库（E. de Flacourt），1661 年。

[24] C. 罗比诺（C. Robineau），1962 年。

[25] 这种自称是阿拉伯血统的趋向，几乎可以在东非洲和苏丹所有伊斯兰化的王朝中看到。





图片24.1 安通戈纳马豚(15－18世纪)，见19世纪后期一件雕刻版。山顶别墅是王公的住所，周围是马类饲养场和阿芒塔纳树丛；入口是在石头城堡上开凿出来的



图片24.2 位于博伊纳湾的安楚海里布里，这是一座安塔洛策人坟墓的入口，由珊瑚装饰，其建筑式样表明与非洲东海岸的文化相近

斯瓦希里人的中途补给站

从摩加迪沙延伸到苏法拉的东非洲沿海地区，有许多城市甚至在穆斯林定居点建立之前，就已经是商业开展得十分兴旺的地方。[26] 从 12、13 世纪起就日益繁荣的这些港口，面向大海而不是内地，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沿海地区。有许多商业据点，面向阿拉伯半岛，甚至于印度，同时也面对着马达加斯加和科摩罗群岛，对两方面都起中途补给站的作用。进而言之，来到这地区的许多伊斯兰化的移民也受到斯瓦希里文化的熏染，因此伊斯兰教得以在马达加斯加传播，非洲城市也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

尽管文字记载没有提供多少资料，但人们还是有理由相信非洲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考古研究已经表明，沿海城市确实是非洲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建立的。谈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各种参考材料，同样都没有把阿拉伯人包括在内。没有理由否认，生活在主岛的黑人和非洲大陆的黑人有着长久的联系。 607

贸易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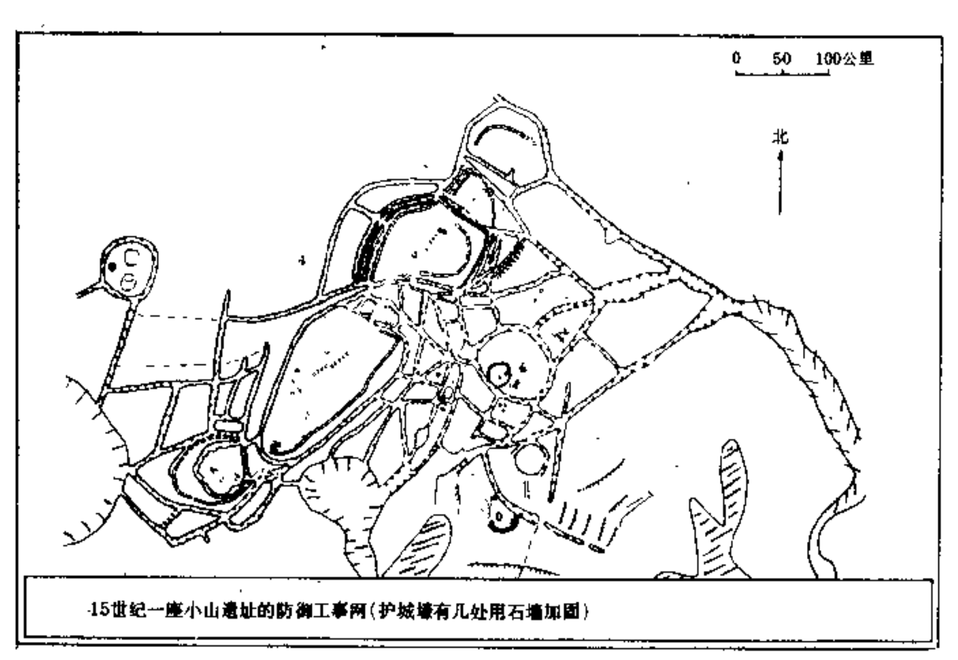
马达加斯加西北部和科摩罗群岛的贸易站，就其外形结构和居民生活方式而言，与东非洲沿海城市有许多相同之处。昂儒昂岛现在还保存着不少旧城堡遗址、清真寺废墟、有门庭雕饰的古房屋，这一切都证明，穆察穆杜、瓦尼、多莫尼和昔马这些居民点伊斯兰和阿拉伯文明的影响非常之深。[27] 尽管葡萄牙人带有偏见，他们还是津津有味地叙述 16 世纪初马达加斯加西北各港口的生活情景。

对最重要的定居点之一兰加尼岛有如下的描述："居民都是穆斯林，他们比沿海其他地方的人更文明、更富裕，他们的清真寺和大多数房屋都是用石灰石筑成的，阳台采用基尔瓦和蒙巴萨式样"。[28] 在马希拉卡遗址发现的古城堡，能与非洲东海岸的相媲美[29]（插图 24.2 显示位于伊梅里纳的一座设防山岗的平面图）。诸如，安帕辛达瓦、马哈贾姆巴、博伊纳，这些在马达加斯加西北海岸线呈犬牙状的深水海湾，曾是历史上许多商业据点——马希拉卡、萨达、兰加尼岛、博伊纳岛……的所在地，它们与科摩罗群岛和非洲大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构成斯瓦希里航海文化的一个部分。

独桅三角帆船在马达加斯加海岸装载稻米和各种皂石制品（如高脚酒杯、三脚炊锅等各种殉葬器皿），这些制品主要是该岛西北海边的伊哈拉纳制造的。[30] 马尔加什人的各个贸易站进口许多印度珍珠、印度织物和中国陶瓷——考古发掘的殉葬品中经常发现有各种碗碟。西北海岸的贸易站，主要是转手进口货物，在雷祖基和阿桑巴拉希发掘出许多具有斯瓦希里遗址特征的手工制品。[31] 虽然从 16 世纪起欧洲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但

---

[26] H. N. 奇蒂克，1974 年。
[27] P. 韦兰（P. Vérin），1967 年（a）和 1967 年（b）。
[28] C. 普瓦里埃（C. Poirier）引述，1954 年。
[29] L. 米约（L. Millot），1912 年；P. 韦兰，1972 年。
[30] E. 韦尼埃（E. Vernier）和J. 米约（J. Millot），1971 年。
[31] P. 韦兰，1980 年。



15世纪一座小山遗址的防御工事网（护城壕有几处用石墙加固）

图24.2 安布希特里坎贾卡，伊梅里纳（F. P. 多梅尼契尼和D. 拉萨缪尔）

这些伊斯兰化的定居点仍继续经营利润很高的买卖。

608 科摩罗群岛的居民组成情况和安塔洛策集团

尽管科摩罗群岛，特别是昂儒昂岛，可能接纳了印度尼西亚和班图移民，但主要还是从非洲东海岸潮水般涌来的伊斯兰化居民充斥了这些岛屿。新来者遵循古典方式，依靠武力实行统治，并声称，他们是“教徒们由于远离伊斯兰教发源地而对宗教仪式有所懈怠的地方的正统宗教的捍卫者。”[32] 移民们致力于对土著居民进行政治统治的同时，也给宗教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33]

马达加斯加西北部的伊斯兰化的居民结成了安塔洛策集团。他们在经济上起支配作用，代表了在真正城市国家中形成的强大的商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由具有政治和宗教双重职能的头人们领导。[34]

---

[32] C. 罗比诺，前引著作。

[33] 例如，建造清真寺。“设拉子人”哈桑尼·本·穆罕默德就是如此，他于15世纪建造了普马清真寺。

[34] 这类城市国家是按照东非洲沿海城邦模式组成的，而后者正是斯瓦希里航海文化的典型。参阅M. 莫拉（M. Mollat），1980年。

12－16 世纪的马尔加什文明

首先必须说明一点：关于瓦津巴时代，除了口头传说中谈到瓦津巴人逐走最早的原始居民和创立王国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考古学家才只刚刚开始进行研究工作，人们多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塔那那利佛大学艺术、考古博物馆和研究中心，大力支持这项系统的发掘工作计划。在安德罗伊，考古工作已有重要进展。[55] 还望读者参阅《非洲通史》第 3 卷，其中论述到马达加斯加最早的移民情况，还论述到 12 世纪来这里的移民所发现的文化。 609

12－15 世纪期间，外来移民一到马达加斯加主岛，或是并入一些已有的群体，或是按当地模式自行组织起来。非洲人族群和亚洲人族群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过程我们尚不了解，但另一方面，也有些书面材料证明，定居科摩罗群岛和马达加斯加的斯瓦希里穆斯林们仍与东非的斯瓦希里海岸保持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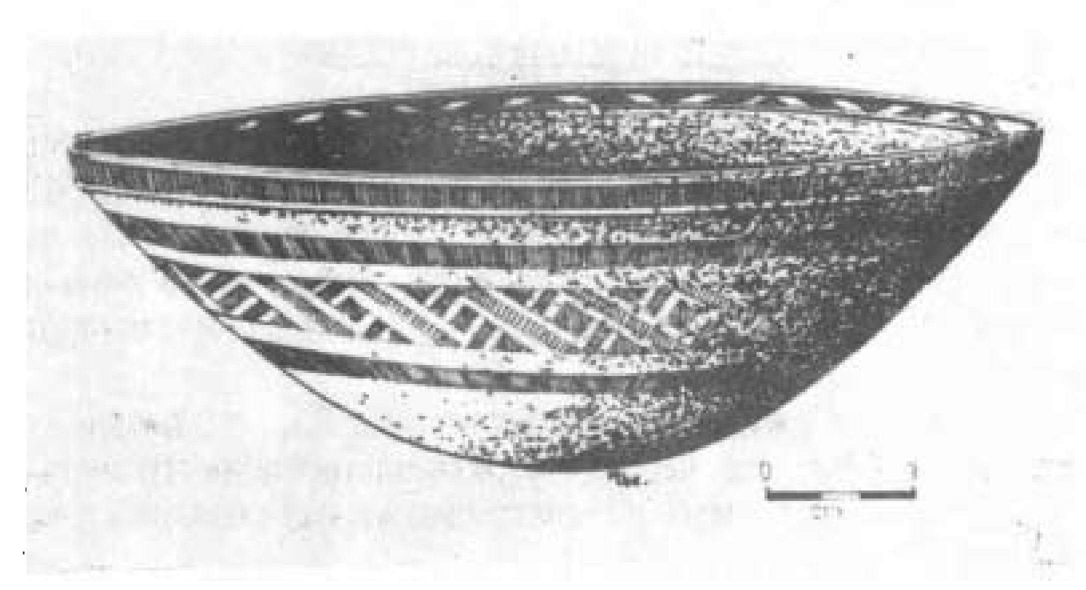
物质文明

考古学家现场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本文探讨的时期以前，就已经有了农业。12 世纪以后，稻米、马铃薯、香蕉、可可已在全岛推广种植。家畜——牛和禽类，都是非洲种的。要想划分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差别，可是一件冒险的事。[56] 随着马达加斯加人口的增长，村庄数目成倍增加，氏族也初具规模。渔业居十分重要的地位，筏子是岛上居民主要的海上运输工具。稻米种植也很重要，是岛上的主要食物。

南部和西部地区，以及北部一些地区的物质文明，看来主要还是来自非洲。据 C. 腊沃雅纳哈里的看法，稻米种植技术是印尼人传授的，而瘤牛的饲养和薯类的种植则是非洲式的。[57] 这位作者还指出，是 14 世纪最后一批移民引进了一种政治制度和宗教仪式，这种模式从 15 世纪起对初期马尔加什各王国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先是东南部，然后在南部、西部和高原地带平行发展。我们可以设想，到 15 世纪，基本社会结构已经成形：家庭结合成为氏族，氏族又结合成为在某种程度上独立的村庄。

考古研究工作发现了许多陶器（参见图片 24. 3），但还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至多不过是通过这些陶器区分其类别，何者与印度尼西亚的陶器相似，何者具有非洲的风格。为了填补了解情况的空白，今后务必还要做大量放射性炭素测定工作，才能确定这些陶器的年代。[58] 610

[55] G. 厄尔特比泽（G. Heurtebize）和 P. 韦兰，1974 年。另阅 J. P. 多梅尼契尼，1979 年（a）；T. 赖特（T. Wright），1977 年。
[56] P. 布瓦托，1974 年。
[57] C. 腊沃雅纳哈里，1980 年，第 91－92 页。
[58] P. 韦兰，1980 年，第 116 页。



图片 21.3 在瓦基尼西萨乌尼地方米兰加纳发现的陶盆(复制品)。这是15世纪伊梅里纳彩陶制作的典型

王权和政治制度

从氏族发展成为王国

以头人或族长为核心而组成的氏族，看来很早就已成形。"福科"(*foko*)、"特罗基"(*troki*)或"菲拉扎纳"(*firazana*)之类的名称，表明了氏族的基本特征：公有制社会("福科"=社会)，氏族成员有共同的祖宗("菲拉扎纳"=祖先，"特罗基"=母亲胸怀)。氏族正是王国的基本单位，就如氏族基于村庄或农田一样。大多数传说都强调指出，在王国的形成过程中，各氏族之间发生过争斗。在氏族内部，权力归长老掌握，他们的代言人是族长，而族长是氏族中的最年长者。文化和宗教仪式是团结氏族的重要因素，此外还靠共同的语言。

最初的王国及其演变

最早取代伊斯兰化之前的"贝贾"(*beja*)的是第一批伊斯兰的部落酋长，即"法尼"(*fani*)，虽然阿拉伯血统的王公们在科摩罗群岛取代了"法尼"；这一事实迄今无人怀疑，但是征服马尔加什人的那些王朝仍留下不少令人难解的疑点。许多传说都提到西部和南部诸王朝(马鲁塞拉纳、萨卡拉瓦、马哈法利、以及安德鲁伊地区的扎菲马纳拉王朝)和东南部诸王朝(阿努西地区的扎菲拉米尼亚王朝)之间的血统联系。阿拉伯化族群居住的地区看来是马尔加什人各王朝的摇篮。传说使人们想起东部-西部的迁徙运动，一方是从安泰莫罗地区迁移(塔纳拉-扎菲兰巴人)，另一方是从阿努西地区迁移(马鲁塞拉纳人)。梅纳贝人的未来君主们所取的路线是沿伊图曼皮河行进，先经过乌尼拉希河以北地区，越过菲海雷纳纳河和曼戈基河，最后到达班吉。[39]

611

[39] J. 隆巴德，前引著作。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君主政体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因素构成了这种典型的非洲或印度尼西亚的世袭制（至少从各种王权体制的角度说，部分原因是最早期各个社会的能动特点）？又如何使我们更明确地判断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马尔加什各王国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马尔加什文明所具有的非洲特征的研究，促使历史学家从非洲大陆寻求某些基本制度的渊源，诸如对已故国王遗体的顶礼膜拜（萨卡拉瓦国对“达迪” *dady* 的崇拜）。虽然 R. K. 肯特还没有作出马鲁塞拉纳 - 武拉梅纳王国起源于非洲的最后结论，但是他发现这个王国与著名的莫诺莫塔帕帝国之间有相似之处。R. K. 肯特严厉批判了格朗迪迪埃所说的来自亚洲的“白人国王的神话”，同时提出了一种假设，认为梅里纳的贵族安德里阿纳的血统本来就非常复杂。依他之见，他们可能是托姆庞 - 塔尼（*tompon-tany*，原来土地主人）的后代，也可能是原籍不明的外来移民的后代，甚至还可能是阿拉伯化的扎菲拉米尼亚王朝的后裔。[40] 因此，政治制度是从非洲、亚洲和穆斯林三方面的影响中产生出来的，以后又由来处不明的新移民的伊斯兰影响所补充。

政治制度反映出多方面的影响。如今大多数学者已经认清阿拉伯人在马达加斯加的政治和社会历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许多书本指明，在 14 世纪传入了有关政治权力的新概念，尤其是把王国划分为“若干相似的领土单位”。我们现在也发现，传说很重视扎菲拉米尼亚诸王朝，它们具有阿拉伯 - 印度血统；还提到各特莫罗部族的重要作用，其中包括直接来自麦加的那些人——安坦庞塞马克人（“麦加沙漠人”）。[41] 有关这个主题，为了更进一步了解马达加斯加岛上政权建立的情况，尚须做大量的工作；但有一点业已肯定，这些王朝是 15 世纪时逐渐强大起来的，并明显看得出伊斯兰的影响。

宗教

这个问题充分反映了非洲因素和印度尼西亚因素的高度结合，再加上伊斯兰的种种影响，这种影响长期起着支配作用，尤其是在科摩罗群岛。要区分移民各种不同的群体是非常困难的，重要的是了解使马达加斯加独具一格的这种共生现象。 **612**

众神

马尔加什宗教崇拜的众神中，居首位的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主神：沿海地区是扎纳哈里神或安德里阿纳纳哈里神，内地则是安德里阿纳尼特拉神(香神)。这种主神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创造世界、组成社会和规定风俗习惯。他是人们祈祷时首先要求他给予保佑的神，但这种主神离得太远。要想接近他，人们不得不寻求那第二位神（或称 *djinn*），即水神或森林之神代为说情。同时也祈求祖先神灵的保佑；祈祷的对象是瓦津巴人，也就是土地原来的主人。森林、岩石、大树都可作为礼拜的场所。

---

[40] R. K. 肯特，前引著作。

[41] E. 德 - 弗拉库，前引著作。

祭品

祭品献给诸神；水牛作为祭品很普遍，但还不如用牝牛的多，牝牛是任何地方和生活中发生任何事情都用的祭品。[49]

男巫

谈到宗教信仰，必然要提到男巫；他是社会中最使人惧怕的人物。很难确定男巫原来是从亚洲还是非洲传入，从他的名称英帕莫萨里（*inpamosary*）看，他应该是亚洲人，但在非洲大陆也能看到与马达加斯加岛上有相同特点的男巫。

丧葬

马达加斯加和印度尼西亚一样存在着隆重葬礼。在贝齐莱乌人的葬礼上，抬棺材的好像着魔一样地跳着舞，沿通向墓地的道路按“之”字形前进。

上述这些情况均可追溯到12至16世纪之间。

结　束　语

为了更好地了解马达加斯加主岛这个时期的历史，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这段时间对形成一个马尔加什民族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语言这时已趋于统一，但他们的情况仍存在许多疑点。我们衷心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毛里求斯召集会议，这次会议使与613 会者对历史上横跨印度洋的种种联系的全面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马达加斯加的情况如此错综复杂，我们只有加深理解这些关系，才能阐明它的文化及其历史。考古研究以及对各种口头传说按地区作系统的收集，肯定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构成马尔加什文化的各个方面。

目前的研究工作当然会有许多空白。至今仍存在许多模糊不清之处，必须打破禁忌（*fady*），特别是与瓦津巴人著名墓葬有关的那些禁忌。马达加斯加提供了各民族共生现象的典型实例，对它的研究比对非洲大陆历史的研究更令人感到兴趣。阿拉伯人、印度人、非洲人和印度尼西亚人都来此定居，这向世界提供了一个生物学上和文化上相互融合的极好的例子，而他们的后代又是如此漂亮清秀。

[49] 何时开始用牝牛作祭品？据认为是在黑人把牛引入该岛之后。这习俗可以一直追溯到很远的过去。

25 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D. T. 尼昂

614

公元1100至1500之间，非洲在同旧世界各大洲的联系中是一个地位优越的伙伴。欧洲、亚洲间穿过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活跃贸易都靠非洲连接，当时经营海上贸易的往往都是穆斯林。必须强调指出，在非洲大陆内部，从史前时期起就开始进行各种不同类型有组织的贸易，这已是人所共知之事。我们在本章可以看到，研究工作逐渐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精确细节，特别是有关地区间贸易的规模情况。然而，人们现有认识水平仍难以详细阐明从12到16世纪非洲各个地区间的各种联系。

看来，非洲经济与商业的发展在14和15世纪达到了高峰；但是，以奴隶贸易开始的同西方的接触，意味着过去朝气蓬勃的开端从此结束，要是贸易靠奴隶之外的其他商品开端，非洲的历史可能完全是另一条发展道路。汹涌的文化交流浪潮从各个角度席卷了整个非洲大陆，有时同迎面而来的贸易浪潮相汇合。于是，再没有孤立存在的地区，因为不论是荒漠还是密林都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今天，考古发掘以及对非洲语言和口头传说的研究，正在为历史研究打开新的前景，有关移民迁徙、技术推广和遥远地区间的贸易等一系列问题正逐步明朗化。

伊本·巴图塔在他所著中国和东、西非洲的游记中指出，这一时期，伊斯兰教无论是在思想传播方面还是在开展贸易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本章探讨的时期内，阿拉伯地理学家、旅行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对我们了解非洲各族人民的情况能提供很大的帮助。

撒哈拉和萨赫勒——对外关系中的优越地区

直到本世纪中叶，欧洲历史学家都力图以撒哈拉沙漠来解释今天非洲技术落后的原因，他们强调撒哈拉把黑非洲同地中海世界隔裂开了。但实际上，撒哈拉即使在成为沙漠之后，也从未成为障碍。首先，撒哈拉并非荒无人烟。它是游牧民的家园，而游牧民同北方和南方的土著定居民都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1100和1500年之间，撒哈拉毫无疑问曾是一条地理条件优越的通道，并且可以说，这段时间是穿越撒哈拉贸易的黄金时代。从10世纪起，西非洲与北非洲之间的黄金贸易迅速发展。人们通常都把撒哈拉正确地比作一片海洋，而苏丹的萨赫勒地区和北非洲的南侧则是它的海岸。在南方，提希特、瓦拉塔、廷巴克图、提雷卡和加奥是从坦杜尔特、锡吉勒马萨、特莱姆森、瓦尔

615

格拉和古达梅斯来的商队的主要终点站。唯有使用骆驼才能穿越沙漠，旅程至少要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这说明了撒哈拉南北大牧场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可供饲养骆驼之用；同时也说明了游牧民之间有时为控制这些草地而发生武斗的原因。

穿越撒哈拉的贸易向沙漠南北扩展的范围远远超过上述"港口"。图瓦特、古拉、突尼斯的杰里德和利比亚的绿洲，在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中同那些"港口"一样重要。从萨赫勒地区到森林热带草原，许多小径和水道构成了穿越撒哈拉的交通网，这与当今塞内加尔的情况十分相象。凡亲眼目睹尼日尔河上游的交通网者，都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况[①]。最近在上沃尔特、加纳和尼日利亚进行的研究得出结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同马格里布之间的贸易当时业已开展。至于本章所要探讨的热带草原地区，现在已有许多考古证据表明当时那里就常有商人光顾。[②]在今天的尼日利亚北部，这些路线肯定与从乍得来的商路相交接，关于这问题我们留待后文讨论。

游牧民是沙漠的主人，他们从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中得到很多好处，商队给他们带来粮食和布匹，以换取肉类、盐和水。游牧民和定居民就是这样互通有无的。在浩瀚无边的撒哈拉漠地，商队需要向导，而熟悉沙漠路线的牧民正好充当向导，他们因此得到优厚的报酬。穿越撒哈拉必须做好细致的准备工作，至少要用好几周的时间才能养肥骆驼。616 为了到苏丹去，伊本·巴图塔就曾先去锡吉勒马萨，那是所有准备离开摩洛哥的人的集散地。他在作品中写道："我在该城买了骆驼，饲养它们足足四个月之久"。[③]商队由一位首领统率，他像一名船长一样指挥全队人。一旦商队启程，没有一人敢掉队或冒险前进，更不用说离开集体了，否则他会在茫茫荒漠中迷失方向。

像麦苏法人那样的游牧民，就专为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服务，他们给商队充当向导或信使。现在，让我们看看伊本·巴图塔的商队是怎样行进并带他去曼萨所统治的帝国首都尼亚尼(马里)的。这支商队经过25天行程，到了塔加扎，那是撒哈拉的一处盐产地。人和牲口休息下来，恢复体力。10天之后，商队再行出发，前往瓦拉塔。在距瓦拉塔还有10天路程时，商队先派一名信使去该城，信使带给该城的信件中要求说："请租借房屋，并在他们达到之前4天带饮用的水去路上接待。"[④]信使的报酬很高，据伊本·巴图塔说是100个米特卡尔（*mithkāl*，货币单位）。假如信使不能把信带到瓦拉塔，商队就会遭到危运，但这种情况还很少见，因为麦苏法人对沙漠路线十分熟悉。1964年，西奥多·莫诺在毛里塔尼亚发现了埋于沙漠中的大批用作货币的玛瑙贝、铜条和碎布；这很可能是某一支商队葬身沙漠的遗物。[⑤]

---

① 波兰和荷兰考古工作者认为，他们发现了尼日尔河上游（尼亚尼就在这一地区）远到多贡地区的迁徙运动和贸易活动的重要迹象，出土陶器如此之相似，表明彼此间有联系是肯定无疑的。现在的问题是，陶器究竟输往何方？

② 见M.波斯南斯基（M. Posnansky），1974年；A. A.博亨（A. A. Boahen），1974年。阿肯人来自贝努埃河和乍得湖之间地区，由此证明北方与南方森林带之间的迁徙运动并非虚传。通过对语言和地名的分析，可以解开当时迁徙方式和贸易路线之谜。参见瑟斯顿·肖(Thurston Shaw)，1970年，第2卷，280－287页。

③ 伊本·巴图塔（Ibn Battūta），引自法文译本，见J.库奥克（J. Cuoq），1975年，第292－293页。

④ 同上。

⑤ 放射性炭素测定的年代为1165±110年（约在公元1055年到1275年间）。

伊本·巴图塔经过两个月的旅行，抵达马里的第一座城市瓦拉塔。有一位代表马里皇帝的总督驻在该城，商队就在这里办理纳税手续。瓦拉塔也是个贸易中心，黑非洲人和柏柏尔阿拉伯人聚集于该城经商。这可能是伊本·巴图塔在这里停留51天之久的原因。离开瓦拉塔，24天之后这位旅行家抵达曼萨的都城“马里”（尼亚尼）。这段路程很安全，因为是在帝国境内，所以能独自旅行而不必担心窃贼和强盗。

这位在古代世界商路上旅行的旅行家很赏识这种安全。只要苏丹地区有一个强大的政权，游牧民就尽力为商队服务。一旦政权衰落，导致城市毁坏，游牧民也就离开沙漠，到各个城市周围伺机行动。

黄金贸易

10世纪时的加纳国王，在伊本·豪卡勒眼中，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他掌握着巨大的财富和很久以来历代国王和他本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榨取来的大量黄金”。在苏丹，贮藏黄金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而在加纳，国王垄断了各个金矿中发现的块金：“一旦该国金矿中发现了块金，国王就据为己有，而把剩下的粉末留给他的臣民。假如他不这样做，黄金贮藏过多，价格便会下降……据说国王有一块大如巨石的金块。”[6] 617

苏丹地区的人总是将金矿的位置和开采方法对阿拉伯人严格保密。当开罗居民向穆萨曼萨问及这个寓言般的帝国的情况时，他不作任何明确的答复；他没有扯谎，只是在多种解释中尽可能把真相隐藏起来。穆萨曼萨就是这样始终保持他极为富有的名声。在他朝圣之后过了整整一代时光，这位曼萨手捧金块的形象还出现在为法兰西国王查理五世制作的著名的马约尔卡地图册中。马约尔卡人只可能从穆斯林方面知道这一点。现在实际上已经肯定，不仅加拉姆、博维和班布克几处人所熟知的地点，来自过去是和现在是森林的地区——科特迪瓦、加纳和尼日利亚的黄金，在当时也都支持了北方的贸易。人们全都知道，马里的黄金贸易在中世纪十分重要，但想对黄金出口量作出估计，那却是十分困难的事。曼萨们的慷慨行事，使人有充分理由认为他们积蓄了数量可观的黄金。在整个苏丹地区，黄金被认为是“神圣的”，或至少是具有神秘的力量。按照传统的观念，只有国王能够操纵黄金“神灵”。这种观念同样也盛传于南方森林地区，那里的酋长国都有丰足的黄金。

盐和其他商品

盐，在穿越撒哈拉的贸易中，与在非洲其他地区的贸易中一样，具有支配地位。西非洲历代统治者都力图压低盐价。[7]税务官员们严格控制盐的进出口。塔加扎盐矿为西苏

[6] 伊本·豪卡勒（Ibn Hawkal），引自法文译本，见J.库奥克，前引著作，第74页。至于这块大金石，它是曼萨所继承的。据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说，它被尼亚尼的一个统治者廉价卖给了埃及的商人。伊本·哈勒敦，法文译本，见J.库奥克，前引著作，第340-347页。

[7] J.德维斯（J. Devisse），1972年，第50和61及以后诸页。

丹广大地区提供食盐；塞内加尔河流域从奥利获得岩盐，但岩盐的分布区很少超出内地的尼日尔河湾一带。

盐税占王室岁入的相当大部分。直到14世纪，情况仍无多大变化。到过塔加扎的伊本·巴图塔用非常明确的语言告诉我们："苏丹地区的人长途跋涉来此（塔加扎）装运他们生活所需的盐。从伊瓦拉坦（瓦拉塔）运来的盐，一担价格为8-10个米特卡尔（*mithkāl*），卖到马里城则提价到20-30，有时甚至达到40个米特卡尔"。对苏丹地区的人来说，盐还像黄金和白银一样是贸易通货。盐块是切成小份出售的。在塔加扎，虽然市场规模不大，但成交的金粉量却相当可观。[8]

618

在整个苏丹地区，盐价十分昂贵：瓦拉塔的盐价相当于尼亚尼的4倍，而森林地带居民给价还可能更高。切成小块的岩盐成了行商的辅币。同样，森林地带出售的柯拉果也在农村集市上当作通货使用。森林居民似乎也开始采用其他方法取得食盐，例如蒸煮含盐植物。人们也从沿海地区运来食盐，但数量不多。[9]"在苏丹内地，盐是稀罕之物。有人秘密运来，居民用同样大小的一堆沙金与之交换"。[10]这位阿拉伯人的报道即使有些夸张，也有一定真实性；不难想象，那些到森林地带来购买柯拉果、黄金和奴隶的万加拉人和豪萨人是如何同卖主进行交易的。

铜在西非洲和非洲大陆其他地区也是交易的重要项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西非洲早期铜买卖的方式方法。[11]到14世纪时，拥有一座铜矿仍有其重要的经济价值。马里的曼萨在"会见"开罗人的场合谈到：

> 提吉达城有一处红铜矿场，当地所产的铜以铜条形式运销到尼亚尼，这可是一宗特殊的、无可比拟的财源。事实上，我们把这些铜运到异教徒的苏丹地区，在那里以一个米特卡尔黄金的基价出售，这就等于100个米特卡尔的铜价中有三分之二的金价。[12]

这里已说得一清二楚。苏丹地区的米特卡尔约为4.25克。如果真是这样按同等的金价出售铜，那么，马里人在与森林居民（这位曼萨称之为"异教徒"）的交易中肯定是获取厚利了。

伊本·巴图塔在尼亚尼住过几个月时间，他的记述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撒哈拉以及萨赫勒各城镇，在组织结构上看，既是中途转运站又是贸易中心。塔加扎和塔凯达（提吉达），同样都是如此，后者是铜的主要交易中心。[13]这位杰出旅行家告诉我们，铜

[8] 伊本·巴图塔，前引著作，第288-290页。

[9] O.达珀（O. Dapper），法文译本，1686年，第280页。

[10] 欧麦里（al-'Umarī），法文译本，见J.库奥克，前引著作，第282页。

[11] 见《非洲通史》第三卷第14章。古代铜的生产和贸易，特别是萨赫勒地区的铜，现在已得到公认。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在阿伊尔高原有关古代铜的冶炼和交易的重要发现。参阅S.伯尔努斯（S. Bernus），P.古莱奎尔（P. Gouletquer）和D.克兰曼（D. Kleinman），1976年。

[12] 欧麦里，前引著作，第282页。

[13] 伊本·巴图塔，前引著作，第295页。

都铸成粗细不同的铜条。粗的 400 条合一个金米特卡尔，细的 600 条或 700 条合一个金米特卡尔。在该地区铜条可用作购买木料、肉、高粱、奶油和小麦的通货。伊本·巴图塔还说，塔凯达的老百姓“除了经商外没有从事其他职业”。每年，他们都要到埃及去，从那里买进各类精美的织物和其他东西。塔凯达居民非常富有，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都拥有大批男女奴隶。受过教育的女奴很少卖出，但如卖出，要价非常之高。伊本·巴图塔发现，要得到这样一名女奴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她们的占有者往往拒绝转卖。[14]他记述说，有人答应卖给他一个奴隶，可后来悔之莫及，差点“伤心而死”。遗憾的是，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需求量很大的女奴受过何种教育。人们之所以要购买女奴，可能是因为她们善于烹调，或是长得很美。 619

伊本·巴图塔随同一个携带约 600 名女奴的大商队离开塔凯达，前往图瓦特。这件事本身就很有启发性，因为仅仅一个商队就能把这样多奴隶从苏丹地区转运到马格里布，同时又说明，奴隶贸易旨在为柏柏尔阿拉伯贵族提供家庭仆人，她们有时从事某些专业性很强的活动。同样，苏丹的君主也从开罗买进奴隶，主要是充当他们的私人卫队。每当曼萨坐在公共广场中的王位上，“他身后总是站着从开罗买来的大约 30 名土耳其（马木路克）人或其他雇佣兵。其中一人手举一把绸伞，伞顶上有一只画成雀鹰的金鸟。”[15]对君主和贵族来说，拥有一批能干的忠实奴仆是至关重要的。

向阿拉伯国家出售奴隶这一事实，可能被一些作者不恰当地夸大了重要性。在这时期，很难说奴隶贸易是一种大出血现象，因为阿拉伯人对苏丹地区感兴趣的首先是黄金，他们急需为地中海周围地区铸造通用货币。根据雷蒙德·莫尼的粗略估计，向北方出卖的黑奴每年约两万人，也就是说，每个世纪约 200 万人。[16]柏柏尔阿拉伯人对人力补充并没有强烈需求，况且需要量也不大。这里有必要提及埃及统治者同努比亚国王签订的著名的巴克特条约。此约规定：努比亚国王每年应向开罗提供 442 名奴隶，其成份如下：给埃及国库的 365 名，给开罗总督的 40 名，给总督在阿斯旺的副手 20 名，给阿斯旺法官 5 名，给开罗城的公证人 12 名。由此可以证明，开罗的素丹所索取的贡俸并不很大。 620

柏柏尔阿拉伯人不仅追求黄金，同时他们还追求象牙。非洲象牙比印度象牙质软而容易雕刻，因此在阿拉伯半岛和印度都很受欢迎。[17]苏丹地区还向撒哈拉各处绿洲出售兽皮、缟玛瑙、皮革和粮食。14 世纪，马里处于全盛时期，伊本·巴图塔在马里所走的是一条最繁忙的商路，另有一条商路是从廷巴克图，经过瓦尔格拉，通向凯鲁万，这可是马里朝圣者经常来往之路。

马格里布的各个城镇，也像古达梅斯和埃及的城镇一样，都由富商所支持的人物统治，这是一群真正的“劫掠者”，经常使穿越撒哈拉的商队感到不胜负担。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即特莱姆森的马卡里兄弟，他们采取考虑周到的严密分工办法，两人在特莱姆森坐镇，一人到锡吉勒马萨，还有两人到苏丹；在马里的曼萨保护之下，他们成功地建立

[14] 出处同上，第 318 页。关于塔凯达的铜，见 S. 伯尔努斯和 P. 古莱奎尔，1976 年。

[15] 欧麦里，前引著作，第 269 页。

[16] R. 莫尼（R. Mauny），1961 年。

[17] 瑟斯顿·肖，前引著作，第 2 卷，第 272－285 页。

了一个大商业网。

> 坐镇特莱姆森的那两位给他们在撒哈拉的兄弟送去所需货物，后者便从撒哈拉运回皮毛、象牙、柯拉果和金矿粉末。至于在锡吉勒马萨的那一位，他好比是天平上的指针，打听行情和价格的涨落，通风报信，把各行各业商人和当地的情况及时告诉兄弟们。这样，他们兄弟的财富大增，地位日益显要。[18]

马卡里兄弟就是这样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特莱姆森公司，它在锡吉勒马萨、瓦拉塔都有分号，有自己的情报网和联络员。曼丁哥和豪萨的商人也可能组织了类似的商行和商号，加强了与热带草原和森林区各贸易中心的联系。[19]

犹太人团体在这类贸易中很可能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T. 莱维基的研究表明，犹太人早在 8 - 9 世纪就已在图瓦特发挥作用。[20]《法塔史》中谈到尼日尔河流域滕迪尔马地区犹太农民的情况，这可信吗？不论怎么说，提到犹太人的参考资料还是确凿可信的：16 世纪初葡萄牙的航海家瓦伦廷·费尔南德斯就曾提到瓦拉塔的“犹太人”十分富有但受压迫。[21]

621 15 世纪时，随着西班牙“复地运动”（*reconquista*）的扩大，基督教徒纷纷来到马格里布定居。传闻苏丹地区盛产黄金，好些意大利商人就被吸引到那里。有个名叫贝内代托·戴伊的佛罗伦萨旅行者兼作家声称他在 1469 - 1470 年到过廷巴克图。[22] 热那亚人安东尼奥·马尔凡特以他从图瓦特寄给他热那亚商行的一封信而闻名。马尔凡特在访问图瓦特时收集了有关尼日尔河流域苏丹地区和贸易集散地图瓦特的珍贵资料。[23]但是，欧洲和苏丹地区之间的直接联系则是在 15 世纪通过大西洋建立的，这是葡萄牙人航海活动的结果。

伊本·哈勒敦告诉我们，曾经有拥有 12,000 匹骆驼的商队从苏丹地区去往埃及。[24]要直接穿越撒哈拉是困难的，因为沙暴总是沿尼日尔河 - 尼罗河的对角线横扫而过，所以这样穿行的商队很少见。在从尼日尔到马格里布的通常旅途上，商队一般拥有 1000 匹骆驼。

思想和技术的传播

由于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欣欣向荣，许多柏柏尔阿拉伯人在苏丹地区各城市定居，在

---

[18] 伊本·哈蒂布（Ibn al - Khaṭīb），引自法文译本，见 J. 库奥克，前引著作，第 324 - 326 页。

[19] 当今的社会学家们还可以看到在豪萨人和索宁克人中也有家族集团的合伙经营。以达喀尔、巴马科、阿比让、阿克拉、库马西、卡诺和拉各斯为基地的兄弟和堂兄弟分享对柯拉果、布匹和其他许多货物的贸易控制权。

[20] C. 德·拉·隆西埃尔（C. de La Roncière），1924 - 1927 年，第 1 卷，第 143 - 159 页。

[21] 瓦伦廷·费尔南德斯（V. Fernandes），法文译本，1951 年，第 85 页；T. 莱维基（T. Lewicki），1967 年；C. 蒙泰伊（C. Monteil），1951 年，第 265 - 298 页。

[22] C. 德·拉·隆西埃尔，前引著作，第 1 卷，第 143 - 159 页。

[23] R. 莫尼，前引著作，第 50 - 52 页；谢赫·安塔·迪奥普（C. A. Diop），1960 年。

[24] 伊本·哈勒敦，前引著作，第 349 页。

瓦拉塔、尼亚尼、廷巴克图、加奥等地安家立业;[25]这些城镇都有一处阿拉伯人居住区。因通婚而出现了亲戚关系——苏丹家系学者常以解释这种关系为乐事。历史学家迄今仍在争论:这种现象是不是与把父系继承制引入苏丹地区的伊斯兰教有关。当时的加纳帝国,王位继承并非按直系,而是由旁系,即舅父传给外甥(传给姐妹之子)。在14世纪,马里要接受父子相传的直系继承制还有困难。[26]在这方面,阿拉伯人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观察一下南方的森林地区,就会发现两种继承制度都存在,而当时的刚果还谈不上伊斯兰教的影响。

黑非洲的伊斯兰化没有通过暴力,而是通过柏柏尔阿拉伯商人、万加拉人和豪萨人的影响和平地实现的。除了好战的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因传播伊斯兰教而引起战争之事绝无仅有。伊斯兰教重视各地区传统社会的旧俗,而伊本·巴图塔则对黑人穆斯林的虔诚深表赞赏,他们忠实地按时举行祈祷,对集体的礼拜更是一片诚心,连儿童也照成年人的榜样行事。万加拉人从一个村庄向另一个村庄迁移,在柯拉果商路上的各个中心,像立路标似的建起了大量的清真寺。非洲人本性宽容,即使是在保持传统宗教的村子里人们也作祷告。阿拉伯语成了有文化者和宫廷官员的语言;根据欧麦里的说法,穆萨曼萨讲一口纯正的阿拉伯语,可以说是他把穆斯林文化引入马里的。[27]

622

出现了用阿拉伯语写的非洲文学,16世纪时,这种文学在尼日尔河湾地区阿斯基亚统治之下结出了丰硕成果。14－16世纪,苏丹和马格里布的学校之间经常有学术交流。但14世纪时,开罗一直对苏丹人有很大吸引力,这座位于朝圣路上的城市里有很多黑人居民。[28]

苏丹地区的统治者周围有许多阿拉伯法学家和顾问,他们大多是马立克教派的拥护者。然而,伊本·巴图塔于14世纪提到在马里的迪阿富诺人中也有哈列哲教派的信徒。[29]

在撒哈拉以南,穆斯林在文化和经济方面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穆萨一世曼萨朝圣归来时,他的扈从队伍中有许多文士和一名建筑师,这名建筑师被雇用来修建著名的接见大厅;1353年,伊本·巴图塔就是在那座大厅里受到穆萨曼萨的兄弟和继承人苏莱曼曼萨接见的。[30]

乍得和地中海地区的关系

历史学家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地中海地区的关系时大都把注意力集中于西苏丹。这是因为有关非洲大陆这一部分的资料相当丰富。许多阿拉伯旅行家,包括伊本·豪卡勒和伊本·巴图塔在内,都是沿西行路线到达苏丹地区的。然而中苏丹和乍得湖地区,

---

[25] 伊本·巴图塔,前引著作,第312－323页。

[26] 见本书第6章。

[27] 显然在曼萨穆萨统治时期马林克人和班巴拉人之间开始分裂,后者拒绝接受伊斯兰教,并组织了秘密团体“科马”以反对王室的政策。班巴拉(Bambara)意指“不承认曼萨的人”。

[28] 伊本·哈勒敦,前引著作。这位著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所知情况大多得自住在开罗的马里学者。

[29] 伊本·巴图塔,前引著作,第311页。

[30] 伊本·哈勒敦,前引著作,第347－348页。

同马格里布、利比亚和埃及也有十分活跃的联系。在本章探讨的时期内，中苏丹和乍得湖地区也已经出现相当强大的政治实体，例如加奈姆-博尔努王国，同时还有豪萨人的富裕城市在乍得湖与尼日尔河之间地区经营相当发达的贸易。[31]

14世纪，加奈姆王国的版图是北起费赞、东至瓦代一带。加奈姆统治者的政策是同北方修好，向北方的国王派去使节，赠送丰厚礼品。[32]有好几条道路从乍得通往北方。一条从加奈姆去埃及：起点在乍得湖，经过卡瓦尔盐田区，通往费赞；到达费赞的宰维莱之后，经过利比亚的绿洲（*sokna*），沿海岸直抵开罗。另一条路，从乍得湖出发，经比尔马向东越过提贝斯提高原（15世纪时人们已在那里开采宝石），去阿斯旺而后到开罗。第三条路是从加奈姆到加特和古达梅斯；那里有分支道路，一路去突尼斯，一路去的黎波里。这些商路与西行商路同样繁忙。15-16世纪，随着豪萨城市和博尔努的兴起，这些商路更为兴旺发达；但是，在阿拉伯人定居达尔富尔和从事奴隶贩卖之后，商业关系日趋恶化。

在尼日尔河与乍得湖之间及其周围地区，主要的出口货物是皮革、奴隶和象牙。豪萨人是中苏丹贸易的积极倡导者，就像曼丁哥人在西边所起的作用一样，他们积极从事热带草原和森林地区之间的贸易，充当中介人。豪萨人可能很早就与尼日尔河三角洲各王国、各城市有贸易关系，如奥约、伊费、贝宁和伊格博-乌库；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者认为，伊费和伊格博-乌库所用的铜，大部分是来自萨赫勒地区（塔凯达）。瑟斯顿·肖是最早在伊格博-乌库进行考古发掘的学者，他支持在尼日尔河三角洲与热带草原之间有过广泛贸易的说法。[33]总之，豪萨人参与了这些地区的长途贸易。扎里亚是最远的南方城市，它成了通往森林地带的桥头堡。

草原和森林地区

不久之前，森林地区还被人们认为是不适合于任何人居住的环境，特别是赤道茂密森林更被说成是像撒哈拉沙漠一样的大障碍，有人甚至说它是根本无法逾越的。现在人们都已了解到森林不是移民的障碍，它并没有阻碍思想和技术的传播。

西部非洲

阿拉伯地理学家（包括伊本·赛义德和伊本·哈勒敦）都曾以为沙漠是从热带草原之南开始的。[34]草原地区各族居民，虽然有条件给阿拉伯人提供启示，但他们却有意对地

---

[31] 见本书第10章和第11章。

[32] 1391年，博尔努的素丹近伊·阿布·阿默尔·乌斯曼·伊德里斯与马木路克素丹巴尔库克的通信。见本书第10章。

[33] 瑟斯顿·肖，前引著作，第279-283页；1973年，第233-238页。伊格博-乌库有大量铜制品之说是一个难以证实的问题，因当地并不产铜；最近的铜矿在塔凯达。

[34] 伊本·哈勒敦："赤道附近和更往南的地区无人居住"，见《历史导论》（*al-Mukaddima*），法文译本，1967-1968年，第100页。

区情况保持沉默，实际上苏丹各城镇销售的黄金大部分来自这个地区。穆萨曼萨在开罗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他从他所掌握的铜矿中获得了巨大利益。马里所产的铜，贩运到森林地带去换取黄金、象牙、柯拉果，还有奴隶。这样，苏丹地区各帝国与南方森林地带之间的贸易关系就成了值得认真研究的一大问题。商路从所有各个方向穿越森林，经过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人们现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历史上热带草原和森林地带相互间联系十分密切。森林居民把曼丁哥人称作迪尤拉人（科特迪瓦）或万加拉人（加纳），这两个词的原来词意都是“生意人”，柯拉果贸易商路沿途有许多村庄，其居民有一部分或全部都是迪尤拉人或豪萨人。很可能在 14 世纪以前，曼丁哥人已经同森林居民建立了联系。位于长有林木的热带草原上的孔王国和贝戈王国，是森林地带柯拉果和黄金市场的前哨。[35] 几内亚湾附近的林带有一缺口，在加纳和尼日利亚，从北部一直到大西洋沿岸，有很宽的一片无林空地。因此，这些地方与苏丹地区的联系更方便也更持久。万加拉和豪萨商人这时已经来到阿散蒂地区，并经过博诺－曼索来到约鲁巴人居住地。

我们无法说明究竟有多少货物来自热带草原，也不知道有多少货物从林区运往苏丹。直到最近，曼丁哥人和豪萨人还经常在农村集市出售珠串、盐、琥珀、铜盘和来自杰内和莫普提的熏鱼或干鱼。西部非洲森林并不茂盛，容易穿过；万加拉人的商队用驴驮着货物穿越森林。但万加拉人和豪萨人往往定居在森林边缘的大村庄里；那里还有其他民族居住，在他们和南方远处森林居民之间起中间人的作用，南方远处森林居民垄断着柯拉果贸易。

当时，柯拉果在西非洲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即使今天也还是如此。正如 F. 皮加费塔所看到的，远至刚果都有柯拉果的踪影。[36] 这种贸易涉及不同部族群体许多人的活动。虽然我们对这一贸易的详细情况不甚清楚，但是，祖农·格诺博的描述很有启发性；据他所说，种植柯拉果的土地是按果实的质量不同而划分地段的。

625

> 在北方长有林木的热带草原上，柯拉果产量不高，而南方的巴洛、博古贝、约科洛、尼凯迪、恩德里，则以出产高质量的柯拉果而闻名。这里是南北商路和贝泰人内地道路的集合点。古罗人好比一道屏障，切断了迪尤拉人和泽博奥人之间的直接贸易关系。这些马林克族商人只能来到古罗人的市场，在那里采办南方出产的柯拉果。古罗人出售商到南方去接货，送货人则是泽博奥妇女，她们在南方贝泰人和古罗人居住地区采集柯拉果。[37]

总之，我们能从中了解到热带草原和森林地带之间自古以来的贸易关系；曼丁哥人追求的是黄金，而不是柯拉果，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长有林木的草原地区建立了中转商站，

---

[35] 根据口头传说，孔城的历史始于松迪亚塔时期。然而，截至目前为止，遗址发掘工作还没有证实这一点。但是，阿比让大学和阿克拉大学对两地都有的民族进行了联合考察研究，证明草原同森林的联系由来已久；瑟斯顿·肖的作品对此也作了证实。这位专门研究伊格博－乌库铜器的专家认为，草原和林区之间的铜贸易大致开始于 9 世纪或 10 世纪。见瑟斯顿·肖，1970 年，第 268－270 页。

[36] F. 皮加费塔（F. Pigafetta）和 D. 洛佩斯（D. Lopes），英文译本，1881 年。

[37] 译自 J. 祖农·格诺博（J. Zunon Gnobo），1976 年，第 79 页。

6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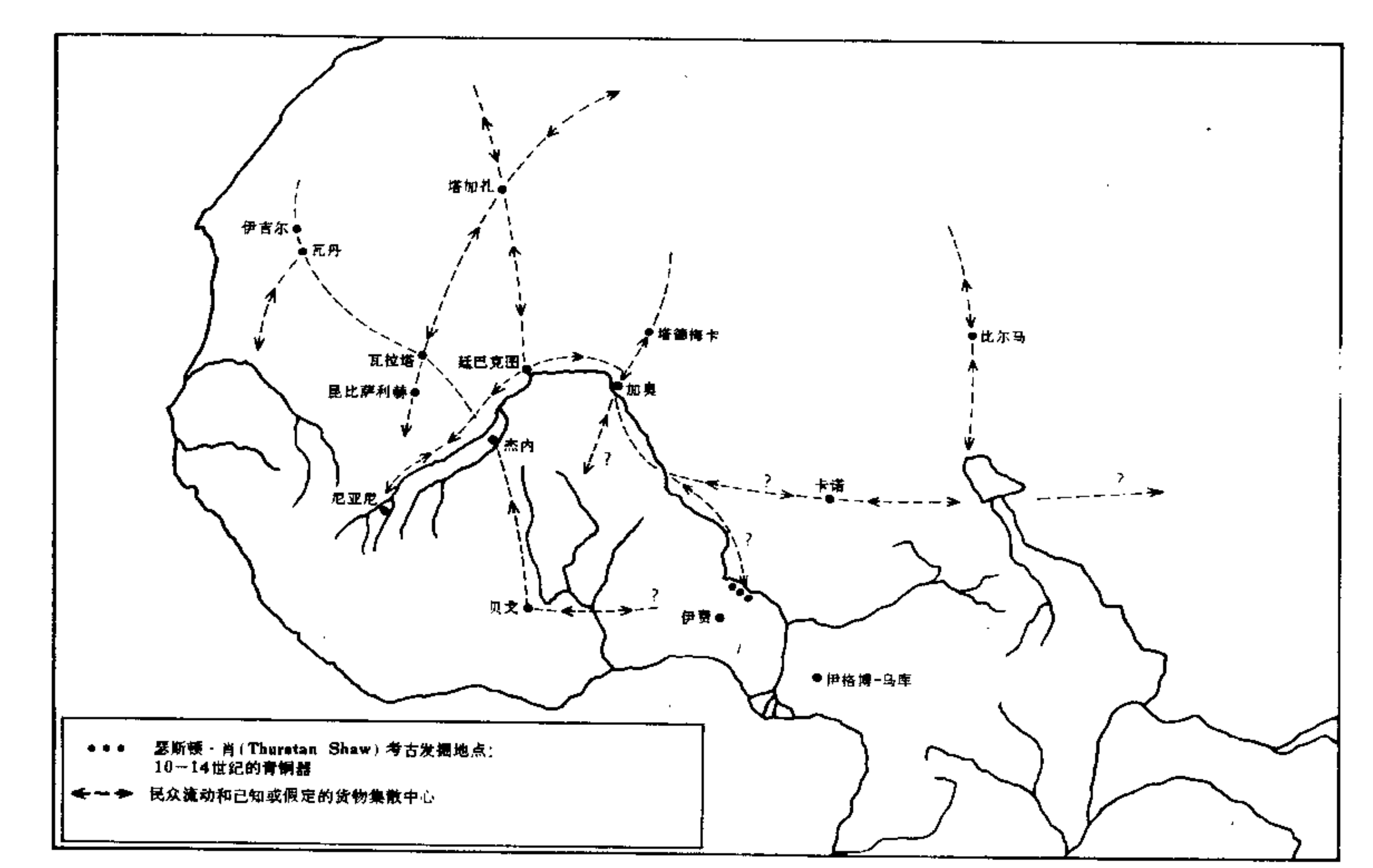


图25.1 西非洲民众和技术流动示意图(J·德维斯)

后来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38]南方各地盛产黄金；经过研究，我们了解到当地黄金流动的路线。根据较近时代的资料，阿肯王国和鲍勒王国的年代都不会早于17世纪之前。

从上述情况看来，森林并非一道障碍，它起到了过滤经济流通、交流思想和技术的作用(见插图25.1)。对口头传说的研究也可以证明，森林地带各族人民在最初都是从热带草原迁来的；贸易来往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值得一提的是草原各族人民都认为森林居民在草药、鼓语等方面掌握着深奥的独到的丰富知识。

热带森林的北部日益受到农业的蚕食，因而几内亚、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和加纳的前缘一带森林萎缩了。在尼日利亚，主要的交通路线都是从努佩到尼日尔河三角洲，当地居民清理了土地，约鲁巴各城市繁荣起来。

东部非洲和中部非洲

这里有不少问题还须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结论。例如，人们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从沿海地区出口到穆斯林世界和亚洲的产品是怎样收集的？几世纪以来 627 的象牙贸易或兽皮贸易是怎样组织的（我们对几个世纪以来这类贸易的重要意义已有认识，但本章所研究的时期，我们却很少了解）？这类产品是否有过正常的运输网？它们是通过哪些人转手的？经过交换又有哪些商品从东海岸进入非洲大陆内地？同西非洲（有进口这类商品的证据）相比，沿海贸易中心所进口的货物再分销至内地的比重有多大？[39]

如能知道沿海地区每年收入多少玛瑙贝以及它们的去向，这更是大有益处。[40]直到现在，除了津巴布韦之外，还不清楚哪些奢侈品运到了印度洋各港口；这是否意味着没有货物卖给或运到内地居民手中，或者仅仅是研究工作至今还没有给我们提供证据？

现在已能清楚看出，至少有些商货是通过内地，从埃塞俄比亚转运到赞比西河流域的。盐的贸易就是一个例证。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各种盐货的交易在穿越撒哈拉贸易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从伊吉尔到比尔马，从陶代尼到阿伊尔，各种生产活动都竞相为非洲提供食盐。[41]可是，除了已经探明的实例外，还有多少的食盐来源——从露天盐矿开采的或是内陆湖泊提供的？它们所起的作用还不清楚，但肯定是持久的。早在公元3-4世纪，班卡利出产的盐就是阿克苏姆王朝的出口物品；[42]这种情况在以后几个世纪似乎并没有中断。但是，这类食盐的生产也不可能达到很大规模；[43]只是，在本章所关注的时期，它很可能就分销到别处，至少是邻近地区。

---

[38] 贝戈位于今加纳共和国西北部，它是森林边缘的一个贸易中心，早在12世纪已与杰内及尼日尔河上游地区建立了联系，那里既有一处重要的马林克人聚居点，也有豪萨商人的住地。

[39] 见P.韦兰（P. Vérin），1975年，第77页。

[40] 有考古资料足以证明玛瑙贝已渗入赞比亚和扎伊尔南部。

[41] 关于阿伊尔的盐，见S.伯尔努斯和P.古莱奎尔，前引著作，第53-65页；S.伯尔努斯、P.古莱奎尔和D.克兰曼，前引著作；H.J.于戈（H.J. Hugot）和M.布鲁格曼（M. Bruggman），1976年，第129和以后诸页。

[42] G.格斯特（G. Gerster）编，1974年，第197-210页。

[43] 1964-1966年的产量估计为每年10吨。

如果对索马里南方海岸、肯尼亚北部以及帕塔岛的古代采盐方式作一番研究，这将是很有意思的。据 V. L. 格罗塔内利所说，那一带发现了许多处海盐产地，盐是由妇女和儿童采集的。[44]此外还有岩盐的大集散地，看来是用来出卖的。

有些事实十分重要，但文字记载很少提及，即使偶尔提到，也没有细谈。举例而言，628 瓦斯科·达·伽马在讲述他的第一次航行时说，他的水手在非洲大陆南部遇到的当地人用葫芦盛海水来煮盐。许多迹象表明，类似的制盐方法在大西洋沿岸，很早以前就有了，至少在几内亚湾一带是如此，但迄今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来证实瓦斯科·达·伽马所提供的这一具有确切时间的证据。他在谈及他的第一次航行时还说，当地人携带铁矛和象牙柄匕首；这一报道对铁器和象牙运输史具有重要意义，却从未有人利用过。这至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说明求助于叙述商业交易的口头传说是何等必要。事实上，口头传说可使我们一下就跳回好几个世纪。

对坦桑尼亚南部开采食盐的情况，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了解。[45]该国东南部的乌温扎至今仍在使用这种办法，盐田绵延 15 公里以上。初步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公元 1500 年以前乌温扎就有制取和销售食盐的大规模活动。现已发现煮制食盐的容器。放射性炭素测定的结果表明，那里的食盐开采早自公元 5 ~ 6 世纪即已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在同一地区的伊武纳，也可断定食盐生产从 13 世纪一直延续到 15 世纪（见插图 25.2）。

研究人员一致认为，盐货是出口到遥远的地方去，可能是定期贸易和以货易货的商品。因而对北方较小的盐田（在伊武纳以北 230 公里的萨哈以及乌干达境内的卡比罗）应作对比研究；还有赞比亚，那里的巴赞盐池似乎很早就已利用。最近在布隆迪的库莫佐地区作了一次很有意义的实验，[46]人们根据口头传说保存者熟知的方法，从含有盐份的作物中提取了植物盐。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理由假定，在东非的许多地区，尽管欧洲殖民者废止了植物盐生产，这种盐的生产在很长一段时期仍然是钠盐的重要源泉。在刚果王国，食盐是王室所垄断的。对于扎伊尔河出海口附近的姆平达盐场，对于安哥拉北部的安布里什盐场，都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见插图 25.2）。

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我们完全有可能发现在赠送和本地交易之外，宝贵的牛群是怎样在中程和长途贸易中受保护而通过东非洲迁移的。研究一下这些地区的宝石交易也 630 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宝石是当时盛行的交易物。[47]同时也应该研究一下促进交换活动的各种货币，假如当时交换活动是十分盛行而又广泛的话。例如刚果的贝壳，在葡萄牙人到达刚果河口之前，贝壳的采集加工由王室垄断，但也不是独一无二的。

长期以来人们总以为茂密的赤道森林是无法穿过的天然屏障，然而事实上它们却无碍于南北热带草原之间的联系，特别是那些由于气候变化形成或人工开拓而成了大缺口之处。J. 范西纳在他研究铜铃的著作中指出，铜铃是热带草原地区国王们的专用品，那

[44] V. L. 格罗塔内利（V. L. Grottanelli），1965 年，第 92 页。

[45] B. M. 费根（B. M. Fagan）和 J. E. 叶伦（J. E. Yellen），1968 年；J. E. G. 萨顿（J. E. G. Sutton）和 A. D. 罗伯茨（A. D.Roberts），1968 年。

[46] L. 恩多里辛帕（L. Ndoricimpa）等人，1981 年。

[47] T. 莱维基，前引著作，他提供了西非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例证。P. 韦兰，前引著作，第 7 页，他指出了珠宝促进贸易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例证。

6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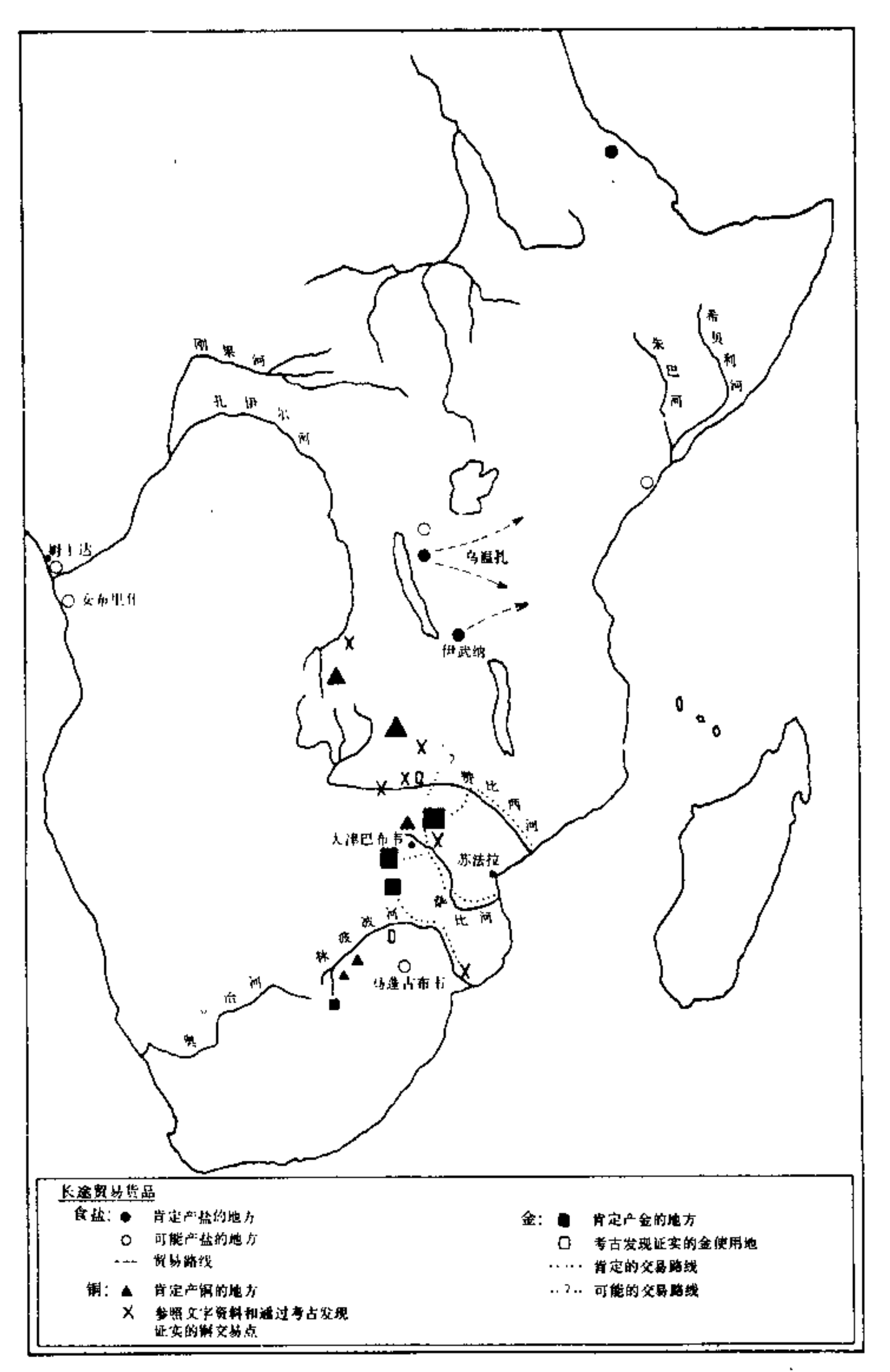


图25.2　11—15世纪的中非洲、东非洲和南非洲(J.德维斯)

是从北而南经过赤道森林传来的。所以，在伊费就发现了铜铃，在津巴布韦，较晚也发现公元1400年以后的铜铃。[48] 专门从事传送消息的使者都曾用铜铃来递送话声。进一步的研究，又证明那些投掷用的刀也是通过浩瀚的赤道森林，从北而南，传到南方各族人民手中的。同样，技术知识、各种物品和生活观念都可以穿越森林，由北向南或由南向北交流传播。各族人民向四面八方迁移的活动也没有受阻于森林。

在密林地区，永久性的交通线是河流；尽管有占统治地位的团结一致的族群分别控制着各段水道，但是，河流水道仍有利于技术和观念的传播，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渔民。

在大西洋沿岸，从刚果河口（在扎伊尔）到安哥拉，土著居民都参与了沿海贸易；专家们认为，某些技术就是通过海路传播开来的。按J.范西纳的看法，从尼日利亚到安哥拉的广大地区所发现的彩色塑像，正是这种经由海路传来技艺的实证。实际上，这种海上贸易在历史上很可能比今天人们想象的更为活跃。

遗憾的是，虽然在理论上对古代非洲的经济和社会作了深入的探讨，但在实际研究方面所作的努力却微不足道，即便说我们已有些证据表明对早期的生产和贸易的形式、技术和价值观念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把同欧洲人接触的几个世纪（非洲被奴隶贸易的社会-经济后果淹浸的时期）当作衡量事物的标准，而是认真研究一下本章关注的这个时期，增进我们对非洲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知识（目前所知甚少），那么，再有多少认为非洲社会在发展和革新方面“停滞不前”的偏见都将不攻自破。在这631 方面有待研究的领域是广阔的，但除了少数考古学家的工作之外，几乎还无人涉足。诚然，为了建立起一个深深扎根于自身文明价值观念的新社会，我们所要研究的正应该是这个时期的非洲。通过对它社会-政治结构的研究，这个非洲必将为大家所了解。

铜和金——南部非洲开展交易的基础

今天我们已确切了解到，南部非洲的几个地区在基督纪元最初的几个世纪已开始开采铜矿。[49] 矿石的开采，主要是在沙巴地区、今赞比亚西北地区、津巴布韦中部高原，还有林波波河上游地区（后者规模小些）。最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和放射性炭素测定工作也消除了对当时是否确有铜条、铜十字和铜合金长途贸易的怀疑。

葡萄牙人在开始他们的勘探时给林波波河取的第一个名字是“铜河”，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急需找到铜矿，为的是摆脱对欧洲产铜国的依附；同时，他们也向非洲出口铜，这很重要，因为非洲自15世纪末以后也需要大量的铜；这就说明在南部非洲发现铜矿的前景在当时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很久以来，铜一直受到非洲人的高度重视；这一点是有足够证据的。[50] 起初，铜就像宝石一样用作装饰品：《奇事简编》（*«Compendium of Marvels»*）一书中提到，黑人的

[48] J.范西纳（Jan Vansina），1969年。见本书第22章，第561-563页。

[49] 见《非洲通史》第2卷，第25章，632页；第27章，678、688页；第3卷，第23章；本卷第22章。

[50] 从9世纪起，经过加工的铜就是穆斯林同黑非洲进行交易的一种重要物品。

妻子们“都在手腕和耳朵上带着铜环”，还“用铜圈和贝壳圈装饰她们的头发”。伊本·巴图塔曾描述那些偶尔来到曼萨宫廷的人“带着半拃宽的大耳环”，或许我们可以设想，他是把铜环误认为珠宝了。在非洲大陆各个不同的地区，铜和铜合金的广泛应用标志着一种政治上的威望；这很可能是有悠久传统的。单是这类事实就足以使我们相信，这种“半贵重金属”也曾是长途贸易的货品。当然我们不应忽视把十字形铜块当做南部非洲通用货币的现象，因为伊本·巴图塔曾经谈到，塔凯达出产的铜条是当作货币用的。[51]

在赤道森林以南长有林木的热带草原上，沙巴地区的富矿非常引人注目。毫无疑问，那里黑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加工技术已相当发达，因而那里的长途贸易迅速扩展。公元1500年以前，就在沙巴地区出现了卢巴诸王国和隆达帝国。经过对语言的研究，对人口迁徙、民族起源神话和亲属制度的分析，现在已有可能就这一地区的社会－文化问题提出一种看法。[52]日益清楚的是，无论草原还是林区，到处都有人口流动。这方面的研究表明，沙巴当时是一个有着广泛吸引力的文化中心；远至赞比西河流域的各个地方都曾受到卢巴人的影响。[53]

632

早在10世纪，马苏迪就曾谈到黄金在南部非洲重要产地的一些情况：“在赞盖巴尔大海的尽头有苏法拉和瓦克瓦克地方，那里盛产黄金”；[54]这段记述表明，10世纪时，穆斯林已经知道南部非洲有金矿，而且已在开采，可能还有出口。

考古学的发现再一次证实和解释了文字材料的许多内容。虽然人们对R. 萨默斯作出的结论尚有争议，但他就绍纳高原开采黄金的基本年代和数量所提供的资料却是难以驳倒的。[55]经过对金矿遗址的系统调查、钻探和年代测定，这位学者绘制出了精确的地图。开采工场看来是7世纪左右在赞比西南部的马佐埃河谷开始的，9－11世纪时扩展到整个高原，然后再发展到林波波河流域，那已是15世纪的事了。据R. 萨默斯的看法，大多数对沿海地区的出口货是经过萨比河流域运送到苏法拉的，另有两条贸易路线则沿赞比西河和林波波河行进（见插图25.2）。W. G. L. 兰德尔斯基本上同意R. 萨默斯的结论，他同其他几位历史学家都认为，14、15世纪津巴布韦的繁荣应以贸易集中在萨比河少数富有者手里这一点来解释，面15世纪以后，萨比河航行条件的重大变化则可以说明津巴布韦贸易之所以衰落和苏法拉一蹶不振的原由。[56]

因此，不应当像以往有些人那样把黄金开采和黄金贸易单纯同津巴布韦一地的命运联系起来。正如西非洲对黄金生产和黄金贸易控制权的争夺能够说明10至15世纪那里的许多历史现象一样，来自南部的黄金很可能是通过多种途径落到穆斯林买者手中，尽管津巴布韦的统治者力图树立垄断地位，特别是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时候。

633

---

[51] 伊本·巴图塔，前引著作，第313、718页。在墓葬地发现的铜饰品，例证见于J. O. 沃格尔（J. O. Vogel），1971年，第99页。

[52] 见本书第22章。

[53] A. 威尔逊（A. Wilson），1972年。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地区（卢巴－隆达）的口头传说是文学上的发展，或者说是使14世纪状况合法化的传奇故事大全。但要做到更加科学化，就应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54] 马苏迪（al-Mas'ūdī），法文译本，1962年，第2卷，第322－323页。

[55] R. 萨默斯（R. Summers），1969年。

[56] W. G. L. 兰德尔斯（W. G. L. Randles），1975年，第14和以后诸页。

即或是 R. 萨默斯对 11 世纪黄金产量的估计（大约每年 9 至 10 吨）要慎重对待，仍然可以肯定地说，南方黄金到达北方的时间要比大多数历史学家（他们主要是关心基尔瓦的命运和用贵金属造币问题）迄今所说的还早。南方黄金可能早在 11 世纪时已在非洲的商业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那个时候，穆斯林航海者就在进行通往苏法拉的沿海贸易，其间从未中断过，一直继续到葡萄牙人到来，即使沿海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可能给穆斯林造成困难，也没有影响贸易的开展。这一远达亚丁的沿海贸易，既是推动向穆斯林世界、印度和中国出口非洲内地产品的强大动力机，也是我们今天几乎毫无所知的老造船厂的促成者。

即使人们对 11 世纪黄金贸易的规模尚有争议，但从来没有任何人对它在 13 至 14 世纪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根据葡萄牙人抵达苏法拉时对其贸易量的估计，可以相信在这两个世纪中，每年都有几千吨黄金从南方运往北方。在大津巴布韦筑有防御的一角（这部分正是遗址所在的阿克罗波里斯山）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熔炼这种贵金属的地方。按目前了解的情况，很可能黄金在出口之前还经过精加工。

因此，黄金在 14 和 15 世纪从绍纳高原出口的商品中和在卖给统治津巴布韦的贵族的产品中均占主要地位。尽管如此，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黄金并不是津巴布韦财富的主要来源：人们可以推断，在没有萃萃蝇的草地高原，养牛业当时必定已有相当大的发展。13 世纪时，一次严重的旱灾迫使牧民们转移到了自然条件较好的高地。津巴布韦的统治者、牧牛者进贡的国王，他们可能在力图控制和发展黄金贸易之前一、二个世纪就已经靠臣民的牛群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并且大大充实了财富。这就是说，那种古老的把人们区分为“开采矿藏者”、“牧牛民”和“建筑者”的研究方法还是可取的：那第一类人，应即是在公元 1100 年以前开采金、铜矿和其他金属的；最后一类人，可能就是著名的大津巴布韦石头城的建筑者。即便说他们的部族起源和他们的语言还不能清楚断定，但应该说毫无疑问，这些“开矿者”和“建筑者”就是津巴布韦高原居民的直系祖先，即索托人和绍纳人。[67]

634 遗憾的是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无论哪个问题）都还了解得不大清楚，罗得西亚和南非两个种族主义国家阻碍了研究工作的开展。[68] 诚然，由于盎格鲁-撒克逊学者们的努力，这地区的史前情况已为大家所了解，可是，一旦深入各个历史时代的研究，一切就都模糊不清了。种族主义者为了否定黑人在 1500 年以前开创的发达兴盛的文化，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然而，从各地收集到的实物资料却能证明，这些文明是相互联系的，呈现出一个不可否认的整体。看一看东面，赞比西河流域是北方影响（包括班图人影响）渗入的一条途径。在横跨南部热带草原的几个王国里，金属加工及其产品贸易都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至于赞比西河以南，可以看到两个积极的文化活动区：津巴布韦高原以及遥远南方的卢格韦尔德高原。[69]

---

[67] R. 萨默斯，1960 年、1963 年。

[68] 津巴布韦共和国独立后开辟了新的前景。

[69] 见本书第 21 章。

非洲内部贸易的另一个方面，近年来有重要的研究价值。P. 韦兰是首先认定马达加斯加、科摩罗群岛与非洲东海岸之间有频繁交往的学者，他坚持认为，如果沿海影响能够达到这些岛屿，某些产品（诸如用马达加斯加的绿泥石片刻制的器具）也可能从岛上扩展到沿海一带，最远甚至可以扩展到基尔瓦。[59] 如果进一步的研究能证实 P. 韦兰的看法和假说，那就有必要重新认真讨论一下常说的非洲人与阿拉伯人在印度洋的航行范围的最南端问题。据初步发表的研究成果看，1977 年以来在马达加斯加展开的考古研究，无疑将给我们增加有关这些地区知识的重要内容。

[59] P. 韦兰，前引著作，第 72 - 73 页；参阅 J. P. 多梅尼契尼（J. P.Domenichini），1979 年（b）。

26 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J. 德维斯著
S. 拉比布合作

外部世界看非洲

635

现在我们还无法说清，公元1100－1500年这四百年中，生活在非洲内陆的非洲人究竟是怎样根据他们不断演变的文化和历史悠久的传统来认识自己的。然而，我们仍将尽力尝试如此做，因为这项研究虽然十分艰难，但却非常重要。我们已经开始了解到，由于接连不断的文化适应，从非洲空间观念的角度看，发生了何种变化。举例而言，知道15世纪时一个非洲商人如何看待他本人所处的环境，那是十分有趣的。我们现在可以肯定说，马里的塔克鲁尔商人——实际上是万加拉人[①]——对于穆斯林世界或者甚至整个世界的地理状况，当时已有相当的了解。15世纪时，万加拉商人是有学识的；至少可以说，他们中相当多的人是颇有学识的，对他们周围环境了解得一清二楚。万加拉语用“萨赫利”（Saheli）或“科哥杜古”（Kogodugu）——产盐之地——一词来称呼北方，因为阿拉伯商人或柏柏尔商人就是用骆驼从北方把盐巴驮运来的。“沃罗杜古”（Worodugu，柯拉果产地）或“图科罗”（Tu-Koro，森林）两词用来表示南方，因为难以进入的南方森林盛产珍贵的柯拉果。林木稀疏的“格贝坎”（Gbe Kan）——“畅通无阻的地方”——由东向西伸展，这是万加拉商人徒步、骑马或骑驴经商通过的地方。

636

由于盛大的朝圣活动，苏丹地区许多人从13世纪起对马格里布、埃及，甚至对阿拉伯半岛都有十分确切的知识。虽然没有具体数字可作这项估计的依据，但从现已掌握的一些文件来看，15世纪后期在开罗驻有黑人使节的事实足以说明，那时肯定有相当数量苏丹地区的人居住在该城。印度洋沿岸的赞吉人和斯瓦希里人对阿拉伯世界东部、对印度，甚至还可能对遥远的中国都非常熟悉。来自苏丹地区和东非洲的黑肤色商人很可能

① “万加拉”（Wangara）：此字在阿拉伯作家笔下有不同的写法——Wankāra、Wanghāra、Wangàra Wangārāta，甚至还曾写成“阿姆贾拉”（Amdjara），10世纪时马苏迪的作品中就是如此写的。“万加拉”一字，有时还与“甘加拉”（Gangara）相混淆，误把古代萨赫勒遗址看成是属于甘加拉人的。“万加拉”一字在11世纪或12世纪之前的阿拉伯文献中从未出现过。据说，万加拉人曾经在尼日尔河上游一带开采黄金和从事此项贸易。14世纪时，万加拉人的名称常常与杰内城联系在一起。按照伊本·哈勒敦的说法，他们的势力范围一直扩展到东非洲。后来，“迪尤拉”（Dioula）一字又取代了先前的名称，迄今迪尤拉人还用以称呼一直延伸到加纳热带大草原地区经营商业的曼丁哥语族。

去到不少的阿拉伯城镇和省份进行贸易。廷巴克图的学校设有地理课程，基础教材无疑与开罗所用的完全相同。正如欧麦里所说，像坎库·穆萨曼萨这样的统治者对黑人居住地面积的大小以及马里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

如今，我们对周围文明世界认识、尤其是“观察”非洲大陆的方式已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里所说的周围文明世界，是把非洲和非洲以外的世界——穆斯林世界以及亚洲、拜占廷和西方世界，全都归在同一名称之下。这样做的重要含义我们将在下文逐步明白。

穆斯林是熟悉非洲的。但在14世纪，他们的文化传统，虽则世代相传、历史悠久，却反映出不少过时的观念和不全面的知识。这种学术状况，正如我们在下文即将看到的，与发现非洲大陆的过程形成鲜明对比，后一种过程早在11世纪已积极展开，到14世纪取得了巨大发展。甚至连伟大的伊本·哈勒敦都承认他对整个非洲地区的知识依然是来自于托勒密和伊德里西。伊本·哈勒敦告诉我们，学者们普遍断言，“赤道地区以及赤道以南全部荒无人烟”，原因在于世界这前两部分的气候都炎热干燥。[②]但是，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承认他感到困惑，因为“观察的结果和历来的传说都支持相反的意见。如何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呢？”他在对双方的论点做了充分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说：“在赤道地区以及赤道以南，如人们所传说的那样，还可能有一个文明世界，但对它不能估计过高”。[③]

若要理解以一神论宗教为基础的文明世界对非洲及其周围海域所持的看法，我们需要知道，在我们所探讨的这四百年间，所有学者，无论是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他们的看法全都可以归为两大系统。第一类看法产生于如下信念：陆地四周是一片汪洋。“海水，”哈勒敦一再说，“从一些地方退走了，因为上帝要在那里创造生物，让它们与人类一起生存”。非洲是已知大陆中最南边的一个，它受到浩瀚而又未经探测的海洋的冲刷。[④]希腊文化的继承者，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西方人，都把炎热难忍的赤道地区，包括陆地和海洋，看成是人能生存的世界范围的极限。并且，地中海文明的所有这些后裔，正如伊本·哈勒敦所一再指出的那样，都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在世界的第三和第六部分之间”——既不是在北方也不是在南方。[⑤]再也没有比从经院学者（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的传统学说中找出的有关大西洋及其岛屿更好的资料了。大西洋上的布莱斯特群岛（极乐世界），即加那利群岛，是已知的这世界的西部边界。许多14世纪以前的阿拉伯学者都认为这些岛屿是无人居住的。杜勒·卡尔纳恩（亚历山大大帝）曾到过这里，但没有再向西航行，这“可能是由于大雾或害怕迷失航向而遭毁灭的缘故”。[⑥]

537

② 伊本·哈勒敦（Ibn Khaldūn），引自法文译本，1967—1968年，第100页。按照著名的托勒密学派和穆斯林的说法，世界是从南部（赤道）地区到北部（北方）地区分成七个部分或七个“气候区”。这里提到的前两部分，大致指非洲赤道和赤道以北的炎热地区（见插图26.1，说明这些地区的划分）。

③ 伊本·哈勒敦，引自法文译本，前引著作，第103-104页。

④ 同上书，第90以下各页以及第111-112页。“世界的第一部分紧挨赤道北侧。赤道以南，只有托勒密提到的那种文明。再往南是荒漠和沙漠，一直延伸到周围都是被称作海洋的水域。”

⑤ 同上书，第101和117页。伊本·哈勒敦谈到摩洛哥商人经常出入的西非洲这部分地区。他说，南边一些地方是“拉姆拉姆”奴隶的一个储备地，这些奴隶都“面带疤痕，更往南，那里的人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更接近于动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看作是人”（第166页）。他们的生活方式起因于“他们离温带太远……因此他们的天性变得更接近于野兽，而远不像人了”。

⑥ 加那利群岛，举例而言，见伊德里西（al-Idrīsī），法文译本；J.库奥克（J.Cuoq），1975年，第127页；伊本·赛义德（Ibn Sa'īd），同上书，第202和2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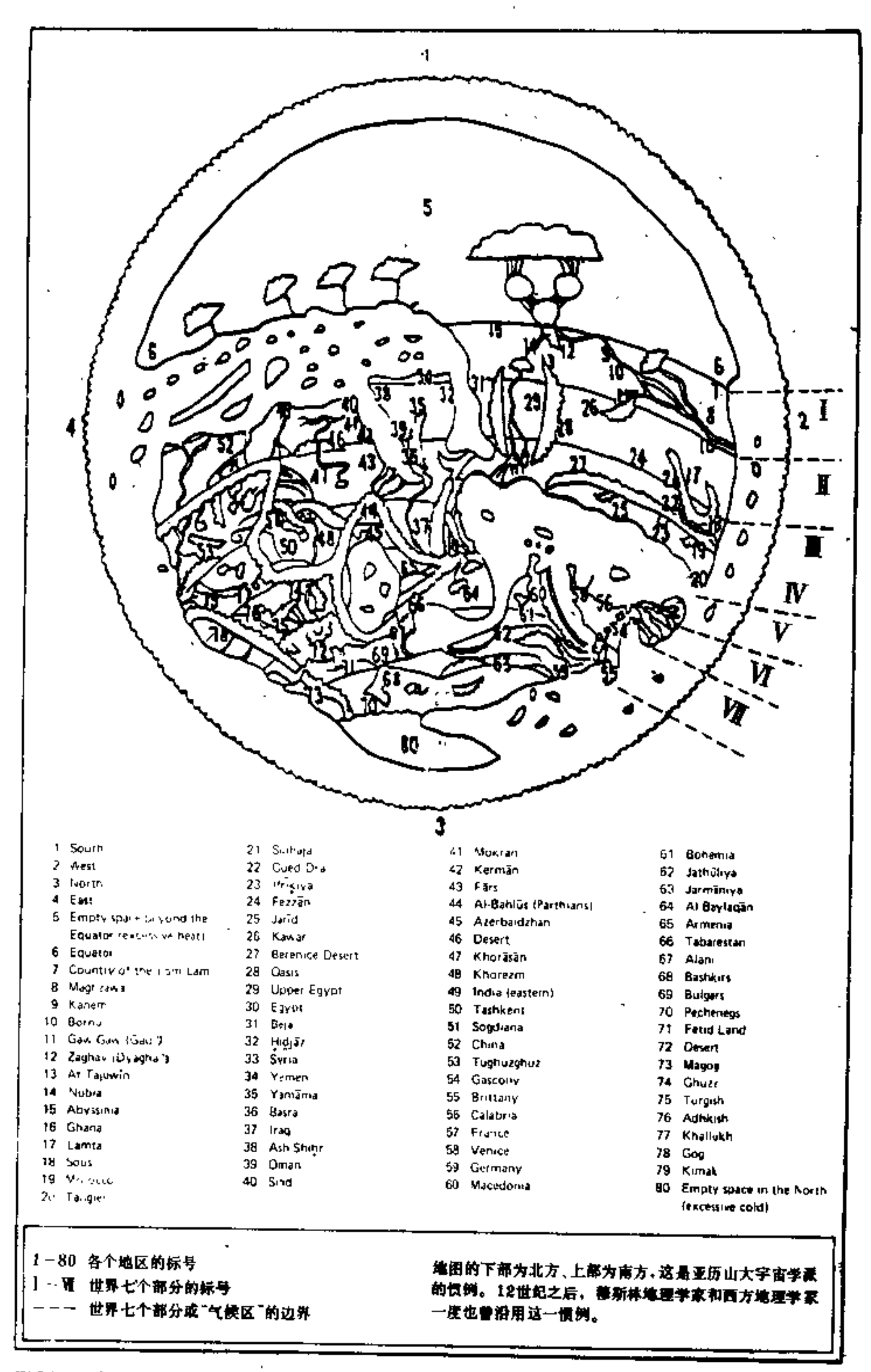


图26.1 伊德里西和伊本·哈勒敦心目中的世界

穆斯林旅行者，至少是10世纪以后，采取完全不同的途径，他们走海路沿东海岸，或走陆路取道西非，逐渐深入到北回归线以南地区。[7]经过实地考察后写出的许多报道拆穿了教科书中所说纯系谎言；14世纪以来的这种第一手资料主要来自伊本·巴图塔和欧麦里。[8]此外，穆斯林世界还通过印度洋学到了亚洲的航海与天文方面的所有科学知识

对于主要关注西非洲的学者来说，我们希望解决的许多问题仍都没有得到解决；这是由两种因素造成的：其一是非洲的一些文明地区唯恐失去他们的独立自主地位，为防被人看清而给自己蒙上的一层神秘色彩，其二是统治当局为了不准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士随意进入萨赫勒地区和热带大草原而作出的种种限制。

至少是有些阿拉伯学者从地中海沿岸来到尼日尔河湾、塞内加尔河与尼日尔河的源头、乍得以及今日的尼日利亚北部，对这一大片连绵不断的土地进行了观察并作了描述 639 这个地区——主要是森林地带，对他们说来还是个谜，用“地中海标准”对照，具有比沙漠或干旷草原更异乎寻常的特征。有其独特气候结构的森林地带正是欧洲人想要了解的地区，因为他们对非洲的内陆几乎一无所知。非洲一直深受地区差异性所造成的后果之苦，而这种差异性几乎是由各方人士偶然发现的。

基督教西方对非洲本身并不表示多大兴趣。[9]一些想要探明“穆斯林帷幕”后面诸种奥秘的商人则向它投射出功利主义的目光。有些人仔细研究了地图绘制工作者的成果，这些地图绘制者把从阿拉伯人那里得来的资料绘制成一幅幅互相连接的地图，再经过西班牙传播出去，在那些地图中，北回归线以北非洲的形状绘制得相当精确。马约尔卡岛上的居民从西班牙的犹太移民那里继承了阿拉伯人的科学知识，然后再把他们从早期最有名的一些航海图中获得的知识加以具体化。[10]1339年安杰利诺·杜塞尔特绘制的著名地图向基督教徒展示了世界上确有盛产黄金的“Rex Melli”存在。在同一世纪末期，克雷斯奎父子绘制的精确地图清楚说明，绘制者认为，打开南方大门的钥匙将在特莱姆森找到，这些地图的出现还说明，通向“黑人之乡”的道路已开始为人知晓。[11]

在努力概括现有知识的同时，还有人试图经由撒哈拉商路开辟通往黑人之乡的道路；这种尝试无疑是非常之多、而又往往永远湮没而无人知道。热那亚的安东尼奥·马尔凡

[7] 西非的一次例外，如伊本·赛义德（同上书）和其他作家所述，是假设伊本·法提马的那次航行是沿非洲海岸进行的，这问题留待下文再作讨论。

[8] 我们也不能忽视马苏迪（al-Mas'ūdī）于10世纪、巴克里（al-Bakrī）于11世纪和伊德里西于12世纪所作的重要调查。T. 莱维基评述伊德里西的卓越论文清楚地说明了这位总指挥是如何把大队人马收集的资料精心汇集在一起加以综合的：T. 莱维基（T. Lewicki），1966年。

[9] 见F.德-麦德伊罗斯（F.de Mêdeiros），1973年。在那些景色如画、拉丁文中叫做*mirabilia*的奇景中必须包括但丁（Dante）所提到的南克罗斯和彼特拉克（Petrarch）所描写的加那利群岛，R.亨尼格（R. Hennig），1953-1956年，第1卷，自第369页起. 同样，在13世纪末的一部著名小说中R.吕尔（Ramon Llull）提到了“加纳”（Gana）和该城周围的黑人，说他们人数众多、盲目崇拜偶像、性格开朗和酷爱正义，他的介绍应该和其他一些作者的描述一样，被看作是文学上的一种奇想。

[10] 见J.维尔内特（J. Vernet），1958年。

[11] 这里自然只能对这问题作一粗略的概述，它已是许多出版物的主题，也值得研究工作者们给予进一步注意，因为从这些文献中仍能取得很多有用的观察成果。

特于1447年到图瓦特的探险就是这一系列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的“探查”中的一次。[12] 至

640 于埃及人，他们很有效地阻止了自12世纪以来基督教徒向开罗以南和红海地区的任何渗透。但是基督教徒许多年来对居住在非洲的穆斯林的兴趣远远超过对非洲大陆本身。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葡萄牙人的海外扩张使欧洲人与许多非穆斯林黑人开始有了接触为止。1276年在巴利阿里群岛建立米拉玛尔经学院和13世纪末在伊弗里基亚建立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研究中心，这都是和多明我会修士与方济各会修士想使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愿望和要求相吻合的。其副产品则是给现有的有关非洲的知识增加某些新特色。

罗马教皇介入非洲大陆事务是异乎寻常的。11世纪末教皇在某些情况下的介入是为了保留基督教的最后一点残存力量，因为这些残存力量正从伊弗里基亚消失。教皇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的介入则是为了让派往穆斯林君主国的外交代表争取教会活动能继续进行，或者甚至——在摩洛哥——是为了使想在马格里布设立欧洲商社和驻扎雇佣军而建立的教区能继续存在。这些外交代表有时行动轻率，直接干预马格里布的生活。[13] 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徒给欧洲人对非洲的知识打上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印记。作为贵金属的寻求者和穆斯林的敌人，他们自认为从“祭司王约翰”身上可以找到反伊斯兰教的非洲“同盟者”，他是十字军熟知的人物，然而一般欧洲人已开始把他遗忘。

虽然亚洲人在15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扩张以前很久就知道非洲东海岸，但从现在掌握的文献资料看，他们对非洲大陆并没给予足够的重视。[14]

一个不断扩大的领域：从地中海外交到欧非之间的交易

直到前不久，历史学家还仅只注意了非洲人与穆斯林世界西部之间的外交关系和两者之间的战争。我们没有必要重复那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在这里只是简单提一下，尽管穆斯林在抵抗基督教势力的猛烈进攻时没有能很好相互协调，但基督教势力自身的表现也并不比穆斯林更团结，更和谐。从西到东，各个王朝统治着大小不一的领地，在阿尔莫哈德王朝消亡以后，西班牙、摩洛哥、特莱姆森、伊弗里基亚和埃及这几个穆斯林国

641 家之间经常交战。伊斯兰在精神和文化方面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但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他们的团结还不足以抵销各个国君的利害冲突。同样，经济利益也导致从卡斯蒂尔到意大利的各基督教国家的公开对抗，尽管它们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

从其表面看，在这几个世纪里，地中海地区的外交、军事和政治历史似乎并不十分合乎逻辑。热那亚坚决支持格拉纳达王国反对卡斯蒂尔；而格拉纳达，尽管它向摩洛哥和埃及发出呼吁，但并没有得到它们多大的援助。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居民为控制通往

[12] C.德·拉·隆西埃尔（C.de la Roncière）1924－1927年，第1卷，第144和以后诸页。由德·拉·隆西埃尔出版的文本根据原稿仔细作了订正。关于作者对这次旅程所加的说明，见J.希尔斯(J.Heers)，1971年，自第66页起。

[13] 这是1251年的情况，当时教皇英诺森四世呼吁在摩洛哥沿海一带建造基督教堂；1290年，教皇尼古拉四世向北非所有基督教徒发布告谕；1419年，教皇马丁五世给摩洛哥基督教僧侣统治集团致辞。

[14] J. J. L. 杜文达克（J.J.L. Duyvendak），1949年；T. 费列西（T.Filesi），1962年（a）和1962年（b）；周一良（Chou Yi Liang），1972年。

大西洋的这一重要通道而发生的激烈争斗说明了马林王朝和格拉纳达之间进行外交战的根源。[15]埃及作为卡斯蒂尔和阿拉贡的附属国，它自身的利益可以充分说明它对格拉纳达的支持为什么竟是如此三心二意。马林王朝曾与邻国特莱姆森发生冲突；而哈夫斯王朝则试图将特莱姆森人推回到西面去，并竭力阻止马林王朝的任何扩张。如果我们不是透过外交关系的表面现象看清问题的实质，那就无法理解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为一方，与马木路克统治集团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的困难而又矛盾的关系。各国情况不一样，势力大小也不同。

穆斯林仅凭他们所掌握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就已主宰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同时也促使萨赫勒地区的经济纳入了世界局势千变万化的紧密关系之中。北非洲直接地或间接地从遥远的南方，以至从远到南方森林边缘地区获得大量资源，尤其是黄金。这情况起初是在 7 世纪至 10 世纪渐渐出现的，后来到 11 和 12 世纪就大大加速。此时，通往南方的、"弯弯曲曲"的小道已与穆斯林贸易的主要大道连接了起来。[16] 西非洲在马里帝国和加纳帝国的统治下卷入了这一活动；而阿伊尔、乍得、达尔富尔以及尼罗河中游地区也不例外。[17]这对萨赫勒地区，后果影响深远。[18]在北方，从 11 世纪起，在通往南方商路的各个会合点上建起了一个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和它的四邻互相竞争。国君与国君之间展开了经济竞争，这种竞争通常对居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只有少数地方是例外，如 **642** 在特莱姆森就由此而出现了一个商业资产阶级。

从 12 世纪起，基督教国家充分利用了上述这种竞争和由此引起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衰落。这时穆斯林国家以及它们的南方附庸发现自己已同一个广袤的、经济充分发展的地域联系起来了：首先是地中海西部诸国，尔后是整个欧洲。这一"根本变革"的重大影响直到 13 和 15 世纪才被人觉察。[19]马里和桑海为了控制出口和征收进口税，建立了一个严密制度。此外，马里的曼萨和加奥的君主千方百计寻求出口路线和客户的多样化，这对发展萨赫勒地区和它在非洲大陆北部的对手或伙伴之间的各种关系方面肯定也起了不小的作用。频频派遣使节、出访和信件往来使人们开始看到黑人君主开展外交活动的主动性和能力，他们竭力避免由于对购买他们的产品形成垄断而导致的灾难性严重后果。[20] 这一新形势对北非洲和热带非洲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北非洲穆斯林各国的内部情况都产生了意义深远和日益增长的影响。举例而言，摩洛哥马林王朝、瓦塔斯王朝和萨阿德王朝的成和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南方的关系的改善或中断。

基督教势力在军事和商业上的压力不断增强。签订条约的数量和延长条约的次数说

[15] 由卡斯蒂尔与马林王朝于 1285 年签订的条约标志着均势的深刻变化。马林王朝放弃了对西班牙的领土要求和驻有海军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非斯从科尔多瓦得到 13 船的书籍——此事迄今对我们仍有相当大的文化上的意义；C.-E. 迪富克（C.-E. Dufourcq），1966 年，第 206 页。

[16] 法蒂玛王朝，随后是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以及阿尔莫拉维德王朝以及后来的阿尔莫哈德王朝，相继从它们控制着南方商路最重要终点的优越地位中得好处。见 D. 罗伯特（D.Robert）、S. 罗伯特（S.Robert）和 J.德维斯（J. Devisse），1970 年；以及 J. 德维斯，1972 年。

[17] 尚有大量资料有待研究以便查明本文所探讨的地区的居民和货物流动的历史。

[18] 我曾在其他地方发挥了这论点：见 J.德维斯，前引著作。

[19] R.S. 洛佩斯（R.S. Lopez），1974 年，第 252 页。

[20] 见 J.德维斯，前引著作；M. 阿比特博尔（M.Abitbol）更近的著作，1979 年，第 370 页。

6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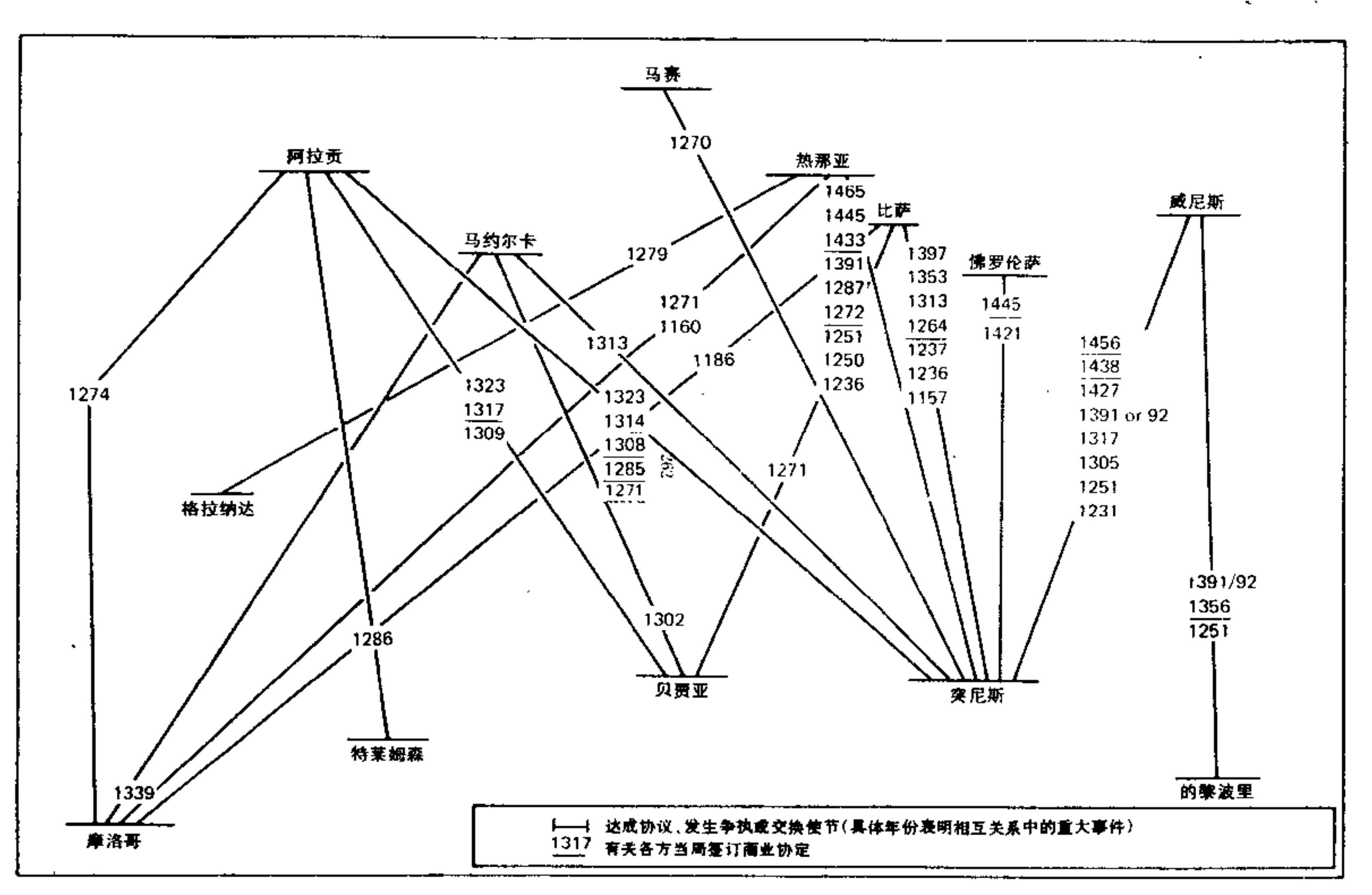


图26.2　地中海西部各地间的经济关系

6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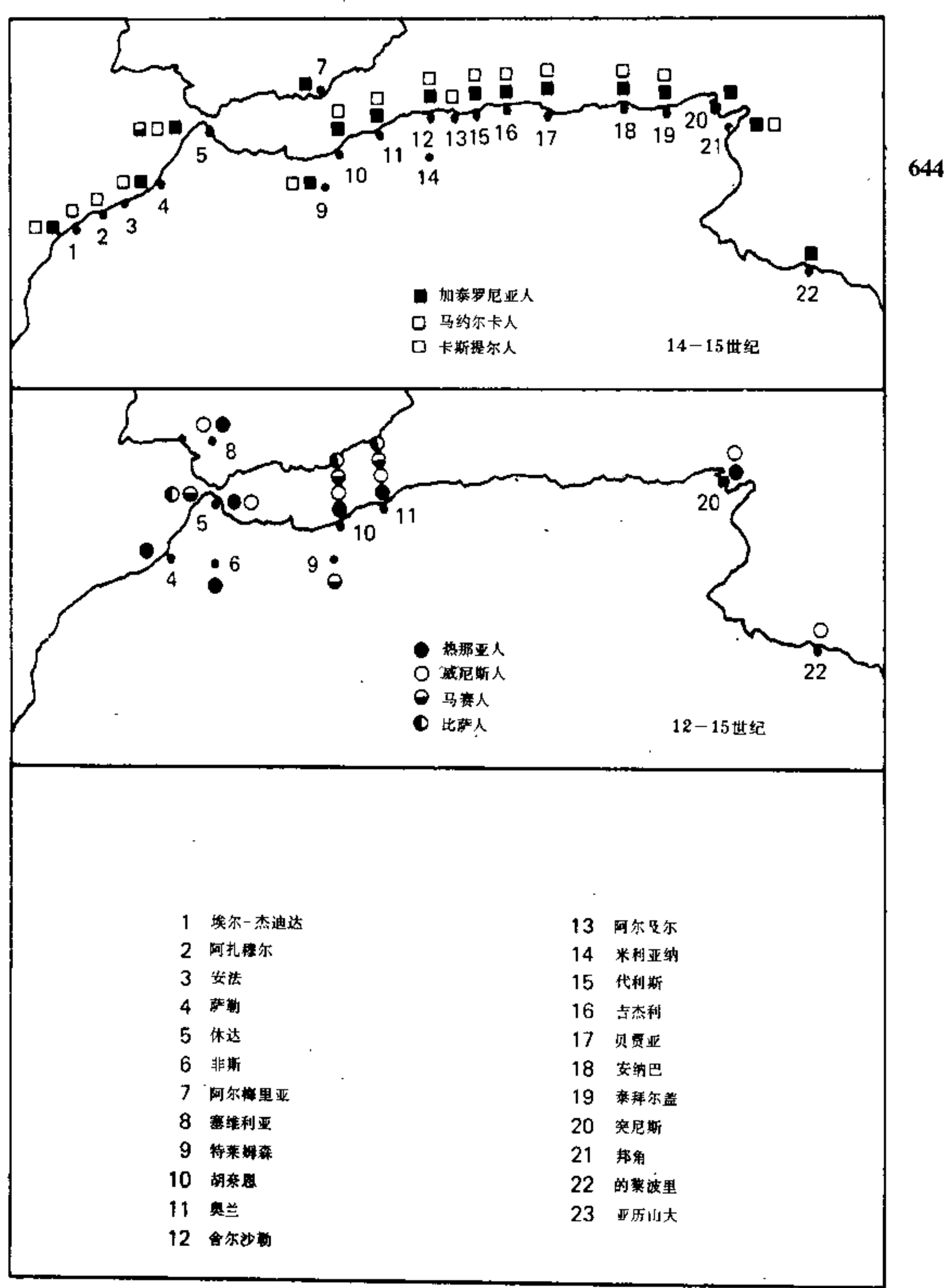


图26.3 12－15世纪欧洲商人寻求非洲黄金(J.德维斯)

明了北方商人和国王们顽固坚持的进迫以及马格里布软弱无力的抵抗（见插图26.2）。固定贸易点的数目不断增加，它们虽都或多或少地孤立于马格里布范围之外，而且相互间又不断竞争，但仍表明欧洲对与非洲贸易的重视（见插图26.3）。从这时候起，北方就把非洲看成是南方一直到森林地带的一个经济上可开发的地区。[21]只有埃及在它的各个港口有效地控制了欧洲贸易，从而使它连续几个王朝都能保持利益均等。[22]

欧洲人在同非洲进行贸易时，尽管相互间竞争激烈，却并未采用划一的手段。他们力图取得最有利的贸易平衡，但他们各自在经济上和战略上能力也有很大不同。威尼斯直到15世纪末仍坚持一种样式的贸易，而这种样式的贸易却已开始逐渐让位于比较现代 645 化的形式。威尼斯商人在埃及和叙利亚购买亚洲的香料，然后高价转卖。他们因为确实知道他们自己控制着一个不会被渗透的销售市场，所以他们不愿大量进口，从而可以保持高价。从这一点说，埃及和地中海东部各国对威尼斯是至关重要的。[23]然而，在15世纪出现困难的时候，威尼斯人并不反对向的黎波里和突尼斯提供玻璃制品、纺织品、铜和珊瑚以换取黄金。威尼斯人由于垄断了从东方和从塞浦路斯及克里特岛来的糖，他们也就有了增加自己财富的好机会。许多年来，他们对埃及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即对亚洲和中东商道几个终点的兴趣远远大于对非洲本身。[24]

14世纪时，热那亚人一直都在向东方同一地区出售小麦和奴隶。[25]他们从英国购进低质的羊毛，然后廉价售出。[26]每次交易虽然获利不大，但他们薄利多销，明显扩大销售量，从而形成一种价值可观的贸易。[27]和加泰罗尼亚人一样，热那亚人把船包租给穆斯林，在西班牙和埃及之间运送人员和货物，所不同的是时间更长，规模也更大。对于他们来说，西－北非洲和东地中海早就有很大的重要性。奥斯曼的征服导致热那亚人被逐出东地中海，从那时起，他们就完全依赖于同北非洲的贸易。热那亚人为了同威尼斯人争夺糖的销售市场，售价要低很多，他们在历史上首先开创了糖的大宗贸易。但从那时起，他们也就需要直接或间接控制糖的产地。西班牙人，其中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教徒，正是他们最早提供了大量的糖。[28]这自然使他们同热那亚人建立起友好关系，而热那亚人后

---

[21] J.德维斯，前引著作，第369页。

[22] 见C.卡亨（C.Cahen），1965年。

[23] 至于这种选择对威尼斯人的后果，见R.罗马诺（R.Romano）、A.特南蒂（A.Tenenti）和V.图西（V.Tucci），1970年，109及以后诸页。

[24] 我们刚开始发现，自15世纪起，当威尼斯人也处于奥斯曼扩张压力之下时，他们就把与的黎波里的贸易——特别是黄金的进口——置于很重要的地位。

[25] 就像拜占廷过去所做的那样，热那亚人控制了黑海地区的小麦出口，以此作为对埃及法蒂玛王朝施加压力的手段。现在这成了他们对付马木路克的一张王牌。以马格里布为例，在那里寻找是否还有其他形式的"小麦外交"存在，这将会是很有趣的，因为这种交易对那些不能年年获丰收的国家也构成一种压力。非洲内陆这时期整个谷物贸易问题尚有待研究。14世纪的文献很少提到这方面的情况。1477年，一艘装载640吨谷物的货船从奥兰驶往热那亚；15世纪时，也有把小麦从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运往葡萄牙的。

[26] 欧洲的纺织品交易渗透到了遥远的南方。我们知道伊本·巴图塔在描述马里曼萨的服装时曾提到过欧洲的纺织品：伊本·巴图塔（Ibn Battūta），1357年，第305页。

[27] 据载，1445年格拉纳达从热那亚人那里没收的货物中有90公斤玛瑙贝。有关这类情况，见J.希尔斯，1957年，第120页。

[28] 从这一点来看，格拉纳达王国1492年的灭亡无疑对热那亚的糖的销售政策给予了虽属暂时但却相当严重的打击，这也可能对大西洋诸岛的产糖业起了促进作用。见J.希尔斯，1971年，第89和以后诸页以及第170页。

来直接参与了葡萄牙人的“发现”活动，参与了在葡萄牙人占领的大西洋诸岛屿上引种 646
甘蔗和销售来自马德拉群岛与加那利群岛的糖的活动。很自然，热那亚人的这种政策会把意大利人带进直布罗陀海峡和大西洋，使他们对于深入研究当时正在发展的，特别是葡萄牙的造船业产生兴趣，同时也使他们或多或少地直接参加了探险活动。[29]

这些事实值得加以强调，因为它们能够解释后来葡萄牙人在大西洋进行扩张的全过程，预示这一扩张必将给非洲造成的不良后果。最后崛起的加泰罗尼亚人并没有达到和他们强大的意大利对手同样的实力水平；他们只是从事一些小规模的和低收益的买卖。[30]西边其他港口城市和国家由于不甘落后而耗尽人力物力。

但这并不是最引人注目的方面。非洲在地中海使人刮目相看的并不仅仅是少量的柯拉果、马拉古埃塔胡椒和包括象牙在内的其他或多或少的装饰用品，[31]而是黄金和从非洲内地掳掠来的奴隶。对这两方面的情况都还没有作过彻底的探讨，现在所能做的充其量只不过是概述一下已经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

从10世纪到12世纪，非洲黄金主要用来铸造法蒂玛、伍麦叶、阿尔莫拉维德、阿尔莫哈德、哈夫斯诸王朝的优良货币。[32] 直到15世纪末，黄金还不断地流向北非洲，这期间虽有过一些鲜为人知的波动（见插图26.4）。统治者们控制黄金流通的程度大小虽不相同，但黄金不仅给他们提供了铸币原料，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政治声望和阿拉伯作家所描绘的那种宫廷奢华。但是一些新进展使情况逐渐朝着有利于欧洲人的方向变化。

现在了解到，西班牙的基督教徒在10世纪末就已开始用当时还很原始的方法从南方得到黄金。但从13世纪起，情况有所改变，利润积累起来了。那时同突尼斯人的贸易一 648
年大概能给基督教徒带来2万至6万第纳尔，同贝贾亚的贸易带来12,000到24,000第纳尔的收益。在1302年和以后一段时间里，马约尔卡岛在它与贝贾亚的贸易中得到约2千第纳尔的黄金。1377年，热那亚进口了价值68,000镑的黄金，其中绝大部分是经格拉纳达或基督教西班牙运来的。75年以后，热那亚通过同一渠道，每年获得约45,000杜卡特。[33]在15世纪，加泰罗尼亚向马格里布出口总值——不是单指利润——每年约为40万到50万第纳尔；巴塞罗那每年收入约为12万第纳尔。[34]遗憾的是，现在还未能得到威尼斯和热那亚东方贸易的估计数字，但肯定也相当可观。当时地中海沿岸一些基督教势力

---

[29] C.维尔林登（C.Verlinden），1966年（b）。

[30] 关于加泰罗尼亚的贸易，见C.-E.迪富克，前引著作。

[31] V.L.格罗塔内利（V.L. Grottanelli），1975年，该著作已经阐明欧洲人从非洲进口象牙是在葡萄牙人进行扩张之前。这一事实很少为研究工作者注意和提到；它表明了非洲工艺在15世纪以前对欧洲的影响。

[32]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大量发表。特别见于《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英国皇家钱币学会和纽约美国钱币学会出版物。

[33] B.博纳西埃（P.Bonnassié），1975－1976年，第1卷，自第372页起；P.维拉尔（P.Vilar），1974年，第42页；C.-E.迪富克，前引著作，第429页；J.希尔斯，1957年，第101页，和1971年，第177页；R.阿里埃（R. Arié），1973年，第363页。

[34] C.-E.迪富克，前引著作，第555－556页。他估计伊弗里基亚的贸易额约为125,000第纳尔，中马格里布约为5万到7万第纳尔，摩洛哥约为20万第纳尔。

6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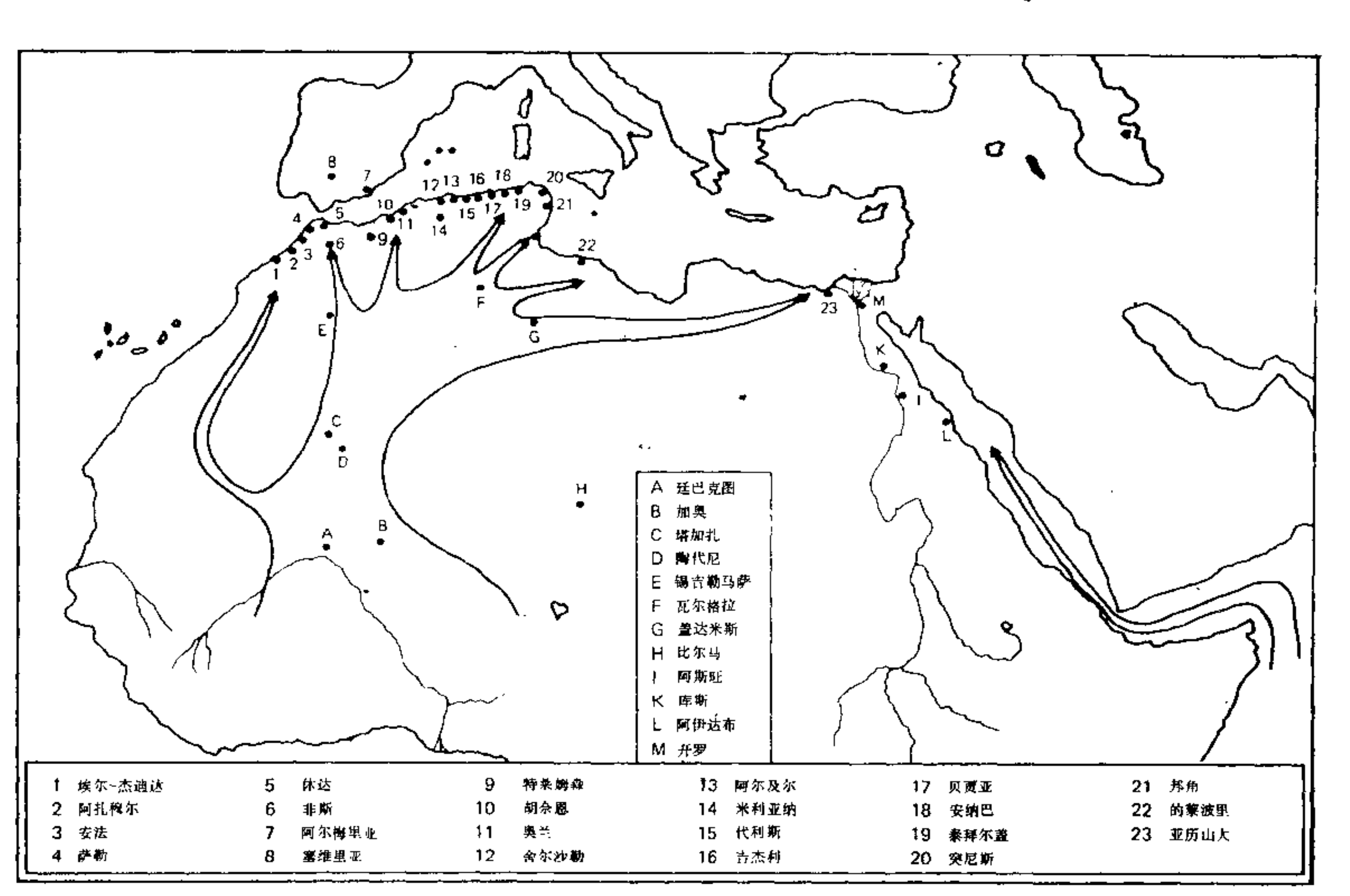


图26.4 非洲黄金流入北非穆斯林经济(J.德维斯)

控制下的重要港口和某些大城市，如米兰、佛罗伦萨，出现一个活跃的商人阶级，是不足为奇的。既然利能生利，这些“资本家”的势力——随着各种商号的建立日益增强——使他们能够大规模造船和武装那些吨位不断增多的船队。[35]

当然，与此同时，在西方已中断几个世纪的金币铸造业，从13世纪中叶以后又重新兴起。[36]这无疑应部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有待作出正确估计）归因于从穆斯林港口得来的非洲黄金。从科学和经济方面对这些货币的研究现在正在进行，它肯定将提高我们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但即使情况如上述，甚至把从北非通过埃及流入欧洲的东方黄金都计算在内，其总量仍还不能满足正处于经济全面发展时期的西方的需要。[37]

“对黄金的渴望”可能是推动欧洲人去进行征服并取得世界经济霸权的一个有力的促进因素。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徒对非洲黄金表现出强烈兴趣是很容易理解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派出安东尼奥·马尔凡特和其他许多人到非洲内陆去寻找黄金之路。从黄金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对这些国王来说，并非微不足道，但这还不是西方人获取非洲黄金所用的唯一手段。基督教征服者以提供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保护为交换条件而强征的贡赋，也给统治者带来颇为可观的收益。[38]

649

12世纪时，突尼斯国王每年要向西西里交付33,000拜占廷金币。1282年后，阿拉贡企图强行恢复这项贡款，但未成功。14世纪时，伊弗里基亚曾重新纳贡，但数额不大——约2万第纳尔——而且是不定期的。与加泰罗尼亚的海军联盟（1274年马林王朝短期间所要求的联盟）耗去摩洛哥约4万第纳尔。1309年，因争取阿拉贡的支持，摩洛哥又花费7千第纳尔。要理解这些“赠礼”的价值，就得想到14世纪时，从开罗回国的一个格拉纳达使团给奈斯尔王朝的君主带回一份2千埃及第纳尔的礼物。最近还了解到，格拉纳达曾得到一些非洲黄金，它每年转送给卡斯蒂尔1万到4万第纳尔——其中包括卡斯蒂尔人赢得军事胜利后强征的贡赋。15世纪时，这数额有所下降，可能是因为格拉纳达的黄金已经减少。贝贾亚答应——但并未兑现——在1314和1323年，每年向阿拉贡交付1千第纳尔，而在1329年交纳8千第纳尔。特莱姆森每年向同一位阿拉贡国王交纳2千到6千第纳尔。[39]

当然，这些纳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穆斯林与基督教势力之间实际力量对比的消长。

---

[35] 在穆斯林不再掌握地中海岛屿和西班牙的丰富的木材资源后，他们的造船业，由于缺乏木材，便变得很困难了。

[36] 热那亚从1330年起到该世纪末有一个稳定的货币制度，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危机，它改革了货币制度，其他意大利城市，特别是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马约尔卡岛从1310年起开始铸造含3.85克纯金的货币。阿方索十世统治时，卡斯蒂尔金币达布龙折合为一个阿尔莫哈德的第纳尔（4.60克）。

[37] C.-E. 迪富克，他在前引著作中估计每年大约有70公斤非洲黄金流入阿拉贡；J. 希尔斯认为每年有200公斤黄金被带到热那亚。有关经济上对黄金流通的实际需要量，见P. 维拉尔，前引著作，第32－33页。

[38] 基督教国王在同穆斯林君主签订协定时，他们有时能获得他们在非洲的商人所支付的关税的部分偿还：1229－1230年，阿拉贡国王就是这样从特莱姆森得到约500第纳尔；1302年，贝贾亚保证偿还四分之一的关税，一年约1500第纳尔；14世纪初，伊弗里基亚向阿拉贡退还50%的关税。有关这些协议对货币的影响，见P.维拉尔，前引著作，第42－43页。

[39] G. 伊维尔（G.Yver），1903年，第135页；C.-E. 迪富克，前引著作，第179页；R. 阿里埃（R.Arié），前引著作，第119页和第214页。

其他方法，如出租舰队或军队更有利可图。出租舰队的例子很多：1304 年摩洛哥曾用 3 千第纳尔向阿拉贡租用一支舰队。1302 年和 1309 年，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以每条船每月 500 第纳尔之价将装备齐全的舰只租给马林王朝。他在 1309 年又以同样条件将舰只租给哈夫斯王朝，每月实际收益可达 250 第纳尔。据 C.-E. 迪富克推算，以这样的价格出租，只需四、五个月时间就可收回一艘船只的造价。1313 年，特莱姆森租用 6 艘军舰，租金 650 一年共 35,000 第纳尔。1377 年，阿拉贡的佩德罗四世向格拉纳达提供带弓箭手的舰只，租金每月 900 第纳尔。现再来谈陆军士兵的问题。从 13 世纪中叶起，加泰罗尼亚人向哈夫斯王朝提供基督教徒部队。为这些雇佣军支付的款项一部分转给阿拉贡国王，这样，阿拉贡国王每年能得到约 4 千第纳尔的收入；在特莱姆森和摩洛哥也有类似做法，1304 年支付的费用高达 1 万金第纳尔。[40] C.-E. 迪富克曾作过如下的估计，从 13 世纪末起，阿拉贡国王以各种不同办法获得的收入达 15,000 第纳尔，或超过王室岁入的百分之十。[41]

以这一材料为基础，再进行更加详细的算计，我们就有足够的根据推测出进入欧洲商业领域的非洲的黄金决不是少数。虽然其数量只占每年从非洲南部和西部输出到北部的黄金总数（约 4 到 8 吨）中的很小一部分，而且这数量与欧洲经济的实际需要相比小得可怜，但是这些黄金终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此外，欧洲人在贸易地点所施加的压力充分证明，每个与此有关的人都清楚他们在那里能获得什么样的利润。伴随着经济压力，又还努力建立宗教社会，特别是在摩洛哥，因为当时非洲教会的原有结构在伊弗里基亚正处于彻底瓦解之境地；[42] 但在 15 世纪罗马想同埃塞俄比亚建立关系的努力，由于缺乏诚意，实际上没有取得结果。

只要我们设想一下北非洲的各个穆斯林王国自己从中也得益匪浅，那么对它们接受这种局面也就不会感到什么奇怪了。除了条约规定的特权以外，对欧洲进口的货物征收的关税通常为百分之十。仅是同加泰罗尼亚人的贸易，每年就能给马林王朝的国库增加 6 千第纳尔，给特莱姆森带来的好处也相当可观。15 世纪时，哈夫斯王朝在突尼斯的海关每年有 15 万第纳尔的收入。[43] 对于这些王朝来说，即使欧洲靠他们的国库支出而大大致富，但为确保道路安全，特别是特莱姆森以南地区的安全而支付军队的费用和征收税款，他们从中仍有利可图。马格里布有眼光的统治者谴责欧洲商业殖民政策使他们的经济越来越失去平衡；但他们大多数都随波逐流。

早从 7 世纪起，入侵敌国领土并捕捉奴隶——其中一部分被卖掉，另一部分则强迫 651 从事各种劳动——就是穆斯林与基督教势力之间作战的一个常见特征。在 10 和 11 世纪，这一个“市场”对西班牙的穆斯林特别有利。12 世纪以后，由于基督教势力对穆斯林的军事和海上压力不断增强，这种倾向才有所逆转。日益扩大的力量不平衡使基督教徒有

---

[40] C.-E.迪富克，前引著作，第 103 页、第 149 和以后诸页、第 541 页；R.阿里埃，前引著作，第 269 页。

[41] C.-E. 迪富克，前引著作，第 560 和以后诸页。

[42] L. 雅丹（L.Jadin），1966 年，第 33 - 69 页。在摩洛哥出现了托钵僧修士会，并给非斯和马拉喀什信奉基督教的雇佣军派去了主教。也可见 A. 马哈朱比，（A.Mahjoubi），1966 年，第 1 卷，第 85 -103 页。

[43] C.-E. 迪富克，前引著作，第 563 和以后诸页。

越来越多的奴隶供出售或役使；这些奴隶中不仅有马格里布人，而且还有从北非洲或从遥远的南方来的黑人。[44]

可以肯定，有“苏丹”或努比亚奴隶被输送到北非洲所有国家。这在埃及是尽人皆知的，但现在对西非洲来说却并非完全如此。[45]毫无疑问，基督教势力同黑人的最初接触是通过穆斯林世界为中介实现的。例如，当时的肖像画，使我们看到“黑摩尔人”在与基督教势力作战的西班牙穆斯林军队中的地位；[46]伊本·阿布敦在他所写的手册《*Hisba*》中说，12 世纪在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统治的塞维利亚就有这一类的黑人，并认为他们是十分危险的。[47]

14 和 15 世纪，这种可耻的贸易主要掌握在基督徒商人手里。加泰罗尼亚人当时是这方面的能手；西班牙北部的商人从 14 世纪起就向法国的鲁西永输送黑奴。1213 年，有一名基督教女黑奴被一个热那亚商人卖给了他的同行。根据资料记载，15 世纪地中海西部各地增加了黑奴劳动力的进口(威尼斯也如此，只不过程度上稍逊一筹)，肯兰尼加在这种贸易中起了重要作用，至少在 1440 至 1470 年间是如此。15 世纪下半叶，那不勒斯的奴隶有 80%是黑人。在西西里也有很多黑奴。[48]

另一个重要事实是来自“几内亚”的黑人在地中海市场上出现。[49]欧洲人之间的竞争这时已很激烈。葡萄牙议会早于 1472 年就要求对奴隶再出口进行严格监督(这是在将近 15 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买卖，起初是通过对毛里塔尼亚沿海一带的袭击获取黑奴)，并且要求这种劳动力主要应用于在葡萄牙和它所管辖下的一些岛屿上发展农业。但这是忽略了意大利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企图。1486 至 1488 年，住在葡萄牙的一位佛罗伦萨人巴尔托洛梅奥·马尔基翁尼，他注意到了奴隶海岸奴隶贸易的不断增长[50]和奴隶进口的增多。热那亚人对金融和海运的控制使他们在葡萄牙的商业中占有很大份量，他们和加泰罗尼亚人，都再出口和再出卖这种劳力。巴伦西亚的奴隶市场从 1494 年起货源一直很充足。1495 到 1496 年，大约有 800 名奴隶在那里被卖掉，其中包括从葡萄牙转来的数目相

652

[44] 有资料表明，12 到 13 世纪期间在西西里有黑人：如 1145 年在卡塔尼亚有 23 名黑奴，1243 年在巴勒莫有一个基督教徒黑奴。12 世纪时由诺曼底国王送给蒙雷阿尔大教堂的穆斯林，从其姓名看大致有 30 名是黑人。(巴黎第八大学青年研究工作者提供的资料，部分尚未发表。)

[45] 例如，见雅库比 (al-Ya‘kūbī) (891 年)，法文译本，收于 J.库奥克，前引著作，第 49 页；伊斯塔赫里 (al-Iṣtakhrī) (951 年)，同上著作，第 65 页；穆卡达西 (al-Mukaddāsī) (946 - 988 年)，同上著作，第 68 页；比鲁尼(al-Birūnī) (973 - 1050 年)，同上著作，第 80 页；巴克里(al-Bakrī) (1068 年)，同上著作，第 82 页；祖赫里(al-Zuhrī) (1154 - 1161 年)，同上著作，115 和以后诸页；伊德里西(al-Idrīsī) (1154 年)，同上著作，127 和以后诸页；伊本·伊达里·马拉库什 (Ibn ‘Idharī al-Marrākūshī) (14 世纪)，同上著作，第 220 页；欧麦里 (al-‘Umarī) (1301 - 1349 年)，同上著作，255 和以后诸页；伊本·巴图塔 (Ibn Battūta) (1356 年)，同上著作，380 和以后诸页；马格希利(al-Maghīlī) (1493 - 1496 年)，同上著作，399 和以后诸页，也可见 R.莫尼 (R.Mauny)，1961 年，第 336 - 343 页、377 - 379 页和 422 - 424 页。

[46] 主要见 A. 施泰格尔 (A. Steiger)，1941 年。

[47] 伊本·阿布敦 (Ibn ‘Abdūn)，法文译本，1947 年，第 204 节。

[48] C.维尔林登，1966 年(a)，第 335 - 343 页，举出了上述以及其他许多的例子。也可见 C.维尔林登，1977 年，第 200 和以后诸页。

[49] 最初是于 1489 年在巴塞罗那提到的；C. 维尔林登，1966 年(a)，第 338 页。

[50] 从 1486 年 6 月 15 日至 1493 年 12 月 31 日，有 3589 名奴隶运到里斯本，其中至少有 1648 名是要卖给佛罗伦萨商人的。也可见 V.劳 (V.Rau)，1795 年。

当可观的黑人。[51]他们中有些来自塞内加尔。[52]

黑奴大量流入的后果十分严重。首先，奴隶价格暴跌。黑奴以最低价被卖出，他们的命运据描述是极为悲惨的。通常人们都认为，黑人奴隶能吃苦耐劳又忠实可靠，特别适合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后果就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地中海国家的某些社会阶层对这些不幸的黑奴采取了傲慢和冷漠的态度，但当时北欧人对此持不同看法。[53]

15世纪，非洲在先前数百年间出现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周围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的破坏。争夺控制印度洋的斗争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是打破平衡的两大因素。欧洲对大西洋的扩张是另一因素，对非洲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它要对非洲从14世纪开始的经济发展在以后几个世纪中不幸中断负主要责任。

653

非洲、亚洲和印度洋

《非洲通史》的前几卷已经指出，非洲由于与亚洲一些富庶的生产中心进行交往，开辟了好几条重要的商道，有的经由陆路，有的经由海上，条条道路全都通向西亚。虽然从7世纪起，这些商道就已由穆斯林控制，但一边是以阿拉伯/波斯湾顶端为尽头、哺育着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贸易的商道，另一边则是通过尼罗河引向欣欣向荣的三角洲海港而以红海为终端的商道，两条商道之间那块土地上竞争仍然非常剧烈。在本卷《非洲通史》所阐述的那时代，由于亚洲发生多种多样的骚乱以及穆斯林在美索不达米亚统治的垮台，这整片地盘就向埃及敞开了，那时埃及在法蒂玛王朝和马木路克王朝统治之下正控制着对东方的贸易，而这种贸易也正经历着它的极盛时期。[54]

地中海在公元1100年以后实际上已让给了基督教势力。但是基督教势力在军事上和商业上试图经由埃及抵达主要国际商道所作的种种努力却始终未能如愿。而埃及人以及他们世世代代的统治者也极少有机会直接参与印度洋的巨大贸易，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通过贸易中心地亚丁几个彼此接替的王朝的中介。

不管怎么说，从12世纪起，这地区大宗贸易的行家里手是“卡里米”(Karīmī)人，他们一面在亚洲和非洲之间，另一面在亚丁和埃及之间，经营香料、宝石、黄金和铜的买卖。[55]他们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持续保持昌盛。直到奥斯曼帝国进行征服之时，他们和

[51] 见V. 科尔特斯-阿隆索（V. Cortés-Alonso），1964年。1489年有62名加那利群岛的奴隶在巴伦西亚和90名在巴利阿里群岛的伊维萨岛被卖掉；1493年有21名、1494年130名、1496年99名、最后1497年26名在巴伦西亚被卖掉。至于买卖关切人的贸易，见C.维尔林登，1955年(a)，第357、550、561、562-567和1028页。被卖掉的非洲黑人数目：1484年200人以上；1490年约50人；1491年将近350人；1492年约180人；1493年约180人；1494年约150人；1495年约650人；1496年约150人；1497年约110人。直到1502年，奴隶供应才中止。

[52] V.科尔特斯-阿隆索，前引著作，第56和以后诸页。他们往往都岁数很小，一般只有9岁、12岁或15岁。

[53] 我们希望在对西方的黑人肖像画作长期研究而发表了研究成果之后，在这基础上能掌握更多资料。

[54] S. Y. 拉比布（S. Y. Labib），1965年。

[55] “卡里米”（Karīmī），这名称有时与乍得的卡尼姆（Kanim）（加奈姆 Kanem）联系在一起。新近的研究成果支持这一论点。有关这问题可参阅《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4卷，第640-643页上的“卡里米”条目。在泰穆尔语中，“卡尔雅”（*karya*）一词的意义是“生意”；要在这两者之间看出有某种有趣的联系是不无可能的。可参阅S.D.F. 戈伊坦（S.D.F. Goitein），1966年，特别是其中的17和18章；也可参阅J.C. 加尔辛（J.C.Garcin）第15章，382页注9。

那些仿效他们的穆斯林商人的事业都很兴旺发达，埃及的地中海港口都从中受到实惠，许多西方人来这里购买这些稀有和珍贵的物品。

在阿尤布王朝(1171－1250年)统治之下，阿伊达布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56]伊本·朱拜尔于1183年朝圣途中经过这里。他根本没法统计当时在场的商队，因它们多得不可胜数。然而，红海的政治力量与海上力量的统一从来不可能是持久不变的，无论阿尤布王朝，还是他们的后继者，在实现这一目标上都很少有所成就。真正的统一因素是商人，尤其是“卡里米”人，他们以亚丁为基地，从那里运送、购买和出售来自亚洲、非洲和地中 654 海的产品。“卡里米”人常常在埃及的主人和亚丁的君主之间发生冲突时进行外交斡旋。他们还在亚洲与埃及的一些王公诸侯之间商订协议。埃及当局对这些必不可少的外来辅助力量总是授予他们和他们的货物以及西方产品自由输入埃及的安全通行证。香料和奴隶大量地进入尼罗河流域贸易中心由此得到保证。埃及在经济上的霸权地位在马木路克统治时期扩展到了红海西海岸的萨瓦金、马萨瓦和阿萨布等几个港口。

亚丁也是另一种贸易的必经要地——也即和非洲东海岸进行的贸易，它不太引人注目，它与亚洲贸易相比一般不太为人所知，获利也似乎比较小。[57]但是，有很多证据足以证明，法蒂玛王朝家族成员和埃及商人之所以对这种贸易感兴趣，与埃及在12世纪迫切需要黄金不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当时瓦迪－阿拉克金矿已日趋枯竭，可又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从西非获得黄金。[58]

根据伊德里西的意见，密集的商业活动于12世纪在东非洲沿海就已存在。铁的输出，特别是运往印度，获利很大，因为印度冶炼优质钢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大约于1240年，伊本·瓦尔迪在描述苏法拉周围地区时就写道：“这是一片广阔的地区，山峦重叠，山中富有铁矿，当地居民已在从事开采。印度人来到这里以高价向他们购买这一金属。”在内地收集并为穆斯林地区、中国和印度市场大量寻求的象牙，以及兽皮、生铁和黄金是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与地中海问题研究成果可相比拟的许多论文都肯定非洲在木材国 655 际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仅次于亚洲，因此，木材也应该列入这一货品名单中。[59]

来自南方，经由苏法拉向外输出但在基尔瓦销售的黄金在这一贸易中占有最主要的地位。据R.萨默斯估计，南部非洲在这些世纪中，一年的黄金产量高达10吨，到15世纪才开始有所下降。[60]即使采纳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也必须承认南部非洲的黄金在世界

[56] 关于该港口的发展，见J.C.加尔辛，1972年，第189－209页；A.保罗(A.Paul)，1955年。

[57] 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和第3卷。这一问题在有待于发表更多学术著作的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根据S.D.F.戈伊坦的看法，有些贸易往来，当时并没有经过亚丁：前引著作，第355页；和1967年。阿拉伯和中国的资料也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材料：见P.惠特利(P.Wheatley)，1959年。

[58] 从南方输入黄金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未获解决，原因在于各位专家之间缺乏协作，但从已经发表的许多重要材料中可以知道，开采和输出黄金肯定开始于公元1000年之前。特别可参阅R.萨默斯(R.Summers)，1969年，他确信此项生产在古代就已开始。也可参阅T.N.赫夫曼(T. N. Huffman)，1974年(a)，其中有重要书目提要。这位作者强调指出，大规模的黄金开采开始于11世纪。在这条线索的另一头，A.S.埃伦克鲁兹(A.S.Ehrenkreutz)，在他1959和1963年所写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中告诉我们，法蒂玛王朝铸币的确切大小和质量，他推测这需要大量的黄金供应，而法蒂玛王朝当时不可能从埃及、努比亚或从西非得到 也应当指出，仍有极少数专家学者认为与埃及的黄金贸易古代就已有之。

[59] M.伦巴德(M.Lombard)，1972年，第153－176页

[60] R.萨默斯，前引著作，第195页。

经济中的作用可与西非洲的黄金相比，虽然现在对这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

船把各种各样的产品运到这一海岸：下列一些物品由于它们的出处而特别使人感兴趣：玛瑙贝、很快就适应非洲气候条件的植物新品种、布匹和高价出售给非洲人的玻璃珠。[61] 这主要是一种沿海岸进行的贸易，运送货物的船有不同的样式和不同的吨位，这种船把基尔瓦当作它们的基点港口。[62] 15 世纪以前，穆斯林水手还没有对远到莫桑比克海峡的非洲更往南地区进行系统的探察和开发，那里的气象条件与人们熟悉的北印度洋的气象条件很不一样。"南方地区"仍是神秘莫测，这主要是因为，按托勒密派学者的说法，它与真正南方相比更加东方化，同时也因为正是在那里有一个人们向往而又充满危险的神秘地方——瓦克瓦克（Wakwak），期待着英勇无畏的旅行者去探索发现。另外，那里还有"陆地的尽头"，有关它的情况人们了解得极为有限（参看插图 26.1）。

穆斯林的船利用夏季的季节风每年从蒙巴萨或马林迪驶往亚洲。这些船在发展航海技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航海技术从 13 世纪到 14 世纪有很大提高。观星航行（这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人的发明和观察）；利用罗盘（这可能是由阿拉伯水手和地中海水手约于同时间从中国人那里引进来的）；依据风向、水流以及海水中动物群和植物群变化的知识；绘制航海图（穆斯林舵手将他们观察到的标在图上）——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科学与技术宝库，葡萄牙人到达蒙巴萨之后，他们从中受益很多。[63]

656

总的说来，这一贸易，虽则十分明显有违内地非洲人的利益，但却使所有立足于这些沿海飞地的非洲土著和外来经纪人富裕了起来（基尔瓦从 13 世纪起就已开始铸币）。非洲水手受雇在沿海航船和往返于亚洲非洲之间的船上工作，假如有一些绘画手稿可使人相信的话（见图片 26.1）。还有一些人，他们或多或少是自愿离开非洲，在阿拉伯半岛南端甚至远达印度西海岸建立了殖民点，关于后者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新近才开始有所研究。[64]

从加达富伊角到苏法拉，城镇多达 50 余个，这显示出斯瓦希里地区在阿拉伯人来到之前就已经有活跃的城市景象。考古学和对一些原始资料所作的分析研究明确指出，自 12 世纪起，当时虽还没有统一性的或有组织的殖民活动，但已经有一群群人数不多的移民群体从穆斯林世界来到这些沿海城镇和岛屿。这些城镇由于和经由亚丁在印度洋上或借助季节风直接在亚、非两大洲间进行的大规模贸易有紧密联系，从而出现了一个富裕

---

[61] 伊本·巴图塔对来自海岸以东马尔代夫群岛的玛瑙贝作了长期的研究。他也撰文谈到新的植物品种。关于新的说法，可见 H.N. 奇蒂克（H.N.Chittick）和 R.I.罗特伯格（R.I.Rotberg）编，1975 年；以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80 年（a）。

[62] 斯瓦希里商人用他们的黄金在基尔瓦和苏法拉换取各种棉、丝和羊毛织物。13 世纪时，在基尔瓦征收的关税中 67% 来自进口的棉花。非洲的这一地区看来与西部地区一样，铜制装饰品的价值之昂贵，至少和黄金饰物一样。然而，新发表的学术著作——W.G.L. 兰德尔斯（W.G.L. Randles）、R.萨默斯等——则着重指出穆斯林收集南部地区的黄金时态度谨慎。这些作者着重描写穆斯林们的缓慢步调（即使从长远说，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相当数量的黄金）和葡萄牙人定居非洲大陆南部地区之后寻找黄金的狂热态度之间形成鲜明对照。

[63] 有关这方面的学术论著现在已逐渐增多。例如，可参阅 L.A. 巴拉达斯（L.A. Barradas），1967 年；G.R.蒂贝茨（G.R.Tibbetts），1969 年。

[64] 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前引著作。



图片 26.1　13 世纪的一份阿拉伯文原稿，在一艘航行于印度洋的船上，可以明显见到有非洲人的踪迹

的商人贵族阶层，其中大多是穆斯林，他们有时敢于向原有当局的权力挑战。这些城镇，和西非洲的城镇一样，是部族与文化的大熔炉，其特性逐渐伊斯兰化，这里阿拉伯语和斯瓦希里语相互混同。更往南一些地方迅速发展起来的沿海城镇本身就有助于形成各种血统居民混居的复杂情况，这种混杂情况现在几乎已无法解开。[66]

这些地方的统治阶级过着相当豪华的生活，现在已经为考古证实。美观的石建清真寺和宫殿、从波斯湾输入的漂亮的玻璃制品、从中国越海运来的陶瓷，全都说明了他们的富裕程度。各个君主以及富豪阶层在他们的宫殿里积聚了大量从苏丹阿巴德和内沙布尔运来的彩釉陶器、中国宋代的青瓷和带有彩绘的明代盘碟、从印度来的珍珠和宝石，以及黄金和象牙雕像、玉器和镶珠宝的铜饰、来自中东的地毯。

658 当然，人们不会从这些非典型的例子中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城镇的全体居民都是富裕的。但是，这些城镇本身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它们能够引进新技术和创造出一种与马苏迪于 10 世纪所描述的内地非洲人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对清除任意跻身到城镇中来的那些人和使之陷于穷困也肯定起了作用。H.N. 奇蒂克和 R.I. 罗特伯格所作的研究对其中最繁荣的一个城镇基尔瓦作了明确的描述，伊本·巴图塔曾将它说成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镇之一”，它的四、五层楼房甚至在 15 世纪的中国资料中也有所阐述。[67]

中国人确实曾于 15 世纪来到非洲东海岸的这一沿海地区。也有证据证明非洲人可能早在 6 或 7 世纪就曾到过中国；[68] 唐代的绘画上出现佛教洞穴中的黑非洲人；13 世纪一本汇编著作中谈到了斯瓦希里地区。但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说明 8 世纪之后中国人与东非洲有过关系的迹象的考古发现。[69] 现在也还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些迹象产生于古代中国人与非洲人的直接联系。15 世纪时，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早在 1402 年，有一张朝鲜地图对南部非洲勾划出了一个大体准确的非托勒密学派的轮廓；1470 年明代编年史对斑马作了确切的描绘；1444 年的一幅中国图画画了一头长颈鹿——无疑这头长颈鹿是早几年出现于中国皇宫的(见后文)。除了奴隶贸易，中国的资料还提到东非洲输出的四大商品：黄金、琥珀、黄檀香木和象牙。

中国的一支船队，按当时水平它是很庞大的，由一位来自云南的回教徒郑和率领，在 1405 年至 1433 年间作了七次跨越印度洋的伟大远航；这些船两度抵达非洲海岸，一次在 1417 至 1419 年间，另一次在 1431 至 1433 年间。[70] 第一次航行，这支船队远航到马林迪，还带回一个代表团，该代表团受命于 1415 年向北京的帝国宫廷赠送了一头长颈

[66] 只是很久以后，始于 15 世纪，与这些城镇的建立相关的许多口头传说才走了样，把它们与亚洲血统联系在一起，“设拉子神话”现在虽然仍广为流传，但它的内容完全定型却是更近期的事。见本书第 18 章。与此有关的其他许多著作，有一些尚待发表，见 W.赫希伯格 (W.Hirschberg)，1931 年，以及 V.L. 格罗塔内利，1955 年。

[67] H.N.奇蒂克和 R.I. 罗特伯格（编），前引著作。关于另一座城市顺瓜亚，见 V.L. 格罗塔内利，1955 年。

[68] 周一良，前引著作；也可见 F. 希尔思(F.Hirth)，1910 年；W.W.罗克希尔(W.W. Rockhill)，1915 年；C.E. 弗里普（C.E. Frip)，1940、1941 年；罗荣彭（音译，Lo Jung Pang)，1955 年；T. 费列西，1962 年（a)、1962 年（b)。

[69] 周一良，前引著作。

[70] 这些船的吨位为 1500 吨，而首次驶向印度洋的葡萄牙船却只有 300 吨。

鹿。[60]第二次航行的报告中还提到布拉瓦和摩加迪沙这两个城镇。郑和的这几次航行被视为中国当时海上事业的顶峰，由于中国国内事变，它们很快就中止了。[659] 可是因中国与东南亚和西非洲之间出现了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古吉拉特人的海上贸易，所以诸如瓷器和丝绸等中国产品在那几次远征之后仍与以往一样继续不断地在东非洲市场上出售。[61] 杰维斯·马修在基尔瓦附近的松戈-姆纳拉珊瑚岛上发现了泰国的上釉陶器和大量宋末明初之间（大概是 1127 - 1450 年）的中国瓷器。[62]1440 至 1449 年间中国的汪大渊写了一本书，其中提到科摩罗群岛和马达加斯加。

1450 年前后，非洲东海岸、马达加斯加西北面（这一带当时有定期航班与基尔瓦相联系）、埃及、阿拉伯半岛和亚洲之间有固定的商业交往体制，这对许多贸易点以至整个印度洋地区的繁荣发展都作出了贡献。1487 年，佩罗·达 - 科维良接受了葡萄牙国王的一项秘密使命来到东地中海，在那里他了解到远达苏法拉的东海岸贸易的规模。1488 年 7 月 24 日，巴托洛梅乌·迪亚士绕过非洲的最南端，从而确信，这顶点背后非洲大陆的形状并不像托勒密时代人们所说的那样。1497 - 1498 年，瓦斯科 · 达 · 伽马的船队在东南沿海停留检修 32 天。船上人员看到：箭和长矛都是铁制的，制盐采用蒸发海水的方法，匕首装的是象牙把手，妇女的嘴唇上都戴有装饰物，那里妇女的人数超过男人。1498 年 3 月 2 日，瓦斯科 · 达 · 伽马在莫桑比克首次遇到讲阿拉伯语的非洲人，他们的美好服装使他惊讶不已。同年 4 月 7 日，蒙巴萨的素丹向这些葡萄牙人表示了热烈的欢迎。17 天以后，后者在航海图编制者伊本·马斯吉德的导航下，离开那里驶往印度。[63]1499 年 9 月，这首次远征的幸存者回到了葡萄牙。印度洋和非洲东海岸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开始，这时代是以大西洋沿岸所发生的许多重大骚乱为先导的。

控制大西洋和对非洲的影响

“大西地中海”

16 世纪时，人们把东大西洋与伊比利亚半岛、非洲、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加那利群岛相接的那部分海域称之为“大西地中海”。[64] 阿拉伯文资料告诉我们，许多学者 [660] 对非洲大陆的情况仅仅局限于传达已有的一些知识，他们对世界这一地区往往是一无所

---

[60] 见 J. J. L. 杜文达克，前引著作。

[61] 见 G.S.P.弗里曼 · 格伦维尔（G.S.P. Freeman-Grenville），1955 年；J.S.柯克曼（J.S. Kirkman），1967 年；H.N.奇蒂克和 R.I.罗特伯格（编），前引著作。

[62] G.马修（G.Mathew），1956 年。

[63] 阿拉伯文本已经发表：G. 费朗（G.Ferrand），1921 - 1928 年。参看注 63。

[64] 关于大西洋，参阅《伊斯兰百科辞典》新版，第 1 卷，第 934 页。伊德里西写的文章（法文译本，见 J. 库奥克，前引著作，第 143 页）和伊本 · 哈勒敦写的文章（法文译本，见 C. 蒙泰伊，C.Monteil，1967 - 1968 年，第 115 页）足以证明传到他们手里的资料质量不高。应当强调指出，阿拉伯人对非洲西部海域的知识之贫乏与他们对印度洋和它沿岸许多地方的控制，恰成对比。

知：虽然常有商人和航海者在那里进进出出，却甚至对加那利群岛也了解得很少。[75]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实际上最早与沿海各地和各岛屿相接触的是穆斯林船只，虽然现在还没有掌握关于他们那次航行的书面记载。[76]海洋对沿海居民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因此伊本·赛义德说，"金枪鱼是摩洛哥和安达卢西亚人民的主要食物：把它劈成两半，然后挂起凉干。"11 世纪时，巴克里就讲到黑非洲沿海地区的琥珀生产；12 世纪时，伊德里西就谈到奥利尔和塞内加尔之间的食盐贸易。[77]当时考察过的地区可能并不很大，因为这些旅行考察者不敢离开海岸太远。[78]但没有疑问，人们常常把海看作通行大道和食物来源：最初一批葡萄牙水手指出，他们发现西非沿海有食鱼的居民，这些人根本看不起内地的以猎为生者。

欧洲人对"大西地中海"的征服，并不是由于他们技术上占优势。其真实原因必需从别的方面寻找。12 世纪时，阿尔莫哈德王朝的舰队负有声誉，萨拉赫·丁（萨拉丁）就曾要求它给予支援以抗击基督教势力在东地中海的海军。13 世纪末，马林王朝的海军实力在一系列直布罗陀海峡争夺战之后已经完全耗尽。一个更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基督教势力几乎完全控制了生产西地中海造船用木材的所有重要地区。[79]

661 此外，基督教各国的港口需要用于造船业的大量资金往往掌握在商人和他们的合伙人而不是当权者的手中。这些地方的造船政策，与从 1200 年到 1600 年加速发展的经济扩张有直接关系。这种影响在 1277 年以后扩及到了北大西洋。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船队，经由巴利阿里群岛、塞维利亚、里斯本、马德拉群岛和巴荣纳这些停靠港，将商业的意大利和工业的佛兰德和英格兰联系在一起。经济实力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80]穆斯林对欧洲人不断增加的挑战并无明显反应，原因既在于马格里布诸王国的软弱（短暂的哈夫斯王朝和萨阿德王朝除外），也在于穆斯林经济事业的成功与否一般说来并不是非要靠海洋不可。走陆路的商队运回的黄金要比小帆船运来的多得多；马格里布各国的商人和统治当局，在 14 和 15 世纪，没有明显的经济理由以巨额投资为代价在海上来和基督教势力一决雌雄。以上情况说明为征服"大西地中海"所作出的努力并不是等同的；要在 14 世纪末完成这样的一种征服，需要有整整一个世纪时间的投资和不断的努力，也需要

[75] 早在 12 世纪，"里斯本的探险家们"就有可能已经到过加那利群岛。R.莫尼，1960 年，第 91 页；1965 年，第 61 页。关于 13 世纪时伊本·法提马的一次航行，伊本·赛义德作了详细叙述（法文译本，见 J.库奥克，前引著作，第 212 页）。这次航行表明穆斯林曾试图考察非洲沿海。伊本·法提马的自述说明，他们的扩张决不是不考虑物质利益的，他们并没有专心致志于科学性的调查研究。这位航海家在摩洛哥以南发现一个人们难以耕种的地区，那里是一片沙漠，但"很适于种植甘蔗"。下一世纪，欧麦里谈到，阿尔梅里亚的一位大臣曾试图探查非洲沿海；见 J. 库奥克，前引著作，第 281 页。

[76] 我们觉得一位中国学者引用中国资料时说话不无夸大之处。他对这些地区所提出的论证还需要有更可信的科学根据来加以证实。李惠林（音译，Hui Lin Li），1960－1961 年。

[77] J.库奥克，前引著作，第 83、128 和 212 页。

[78] J.希尔斯谈到北大西洋时认识到，渔民们在跨越大西洋未来商路上所有各地的发现都非常重要，引述了 16 世纪到达赫德逊湾的里斯本渔民的例子：J.希尔斯，1966 年，第 230 页。

[79] M.隆巴德，前引著作，第 153－176 页。

[80] 15 世纪时，通过这条海路的贸易量为以前意大利与佛兰德间经过香巴尼地区的陆路贸易的 40 倍。

经受得起多次的挫折，尽管技术上的困难比博贾多尔角以南地区的探索者所遇到的要少。以上情况也说明意大利人在这阶段的扩张中所起作用很突出。在这早期阶段，葡萄牙还没有能投入所需资金的商人和银行家。[81]

关于欧洲人在这地区进行探索的大多数航行，我们至今还不甚了解；历史学家有时偶然才得知其中之一二。历史学家们在提到已有文件证明、后来导致欧洲人占领这块领土的最初一次远征时，出于慎重，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重新发现”一词。[82]基督教势力如此急于控制“大西地中海”海域，其原因现在已十分清楚。寻求黄金在这方面可能起了相当的作用；[83]但一个显然更为重要的动机是希望在大西洋的一些岛屿上大规模生产有用的农作物——小麦、葡萄和甘蔗。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和一段时间里还有亚速 662 尔群岛，在向博贾多尔角以南扩张之前，都成了种植甘蔗的地区。[84]作为扩张动力的蔗糖贸易的作用现在还没得到充分研究。早在13世纪，摩洛哥就已经向佛兰德和威尼斯输出蔗糖。在萨阿德王朝时期数量已经猛增的摩洛哥种植园，从9世纪起就不断在发展；但直到萨阿德王朝之前，其产量、投资额和销售组织都不足以使摩洛哥在蔗糖贸易的竞争中占有很大份量。摩洛哥尽其努力是相当晚的，那时在热那亚人的压力下，投入了巨额资金才使这些海岛的蔗糖生产有了明显的增长。这次发展比美洲在16世纪的扩大糖业要早几十年。

非洲的劳力输出与这次努力有直接联系。14世纪初，加那利群岛上的关切人已先于黑非洲人沦为奴隶，他们被束缚在糖业和有利可图的农业上。[85]

博贾多尔角以南的地区

海域探险

正如R. 莫尼所明确指出的，信风和反气旋连续不断的大西洋引起了许多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技术问题。[86]从1291到1434年，至少就基督教势力来说，海上探索博贾多尔角以南地区所作的各种努力都是以失败告终。R.莫尼就曾提出论据认为，船若驶过博贾多

---

[81] 见V.德－马加哈伊斯·戈丁霍（V.de Magalhães Godinho），1962和1969年；J.希尔斯，1966年，第273－293页；V.劳，前引著作，第447－456页；C.维尔林登，1955年(b)，第467－497页，和1961年。

[82] A.科尔特萨奥（A.Cortesão），1971、1972和1973年；Y.K.福尔（Y.K. Fall），1978年。后者引用了许多有力的论据以证实其他许多航海者（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很可能在葡萄牙人以前就已扬帆于博贾多尔角以南的海洋上。

[83] 与此相反的观点，见V.M.戈丁霍，1962和1969年；以及J.希尔斯，1957年和1971年，其中涉及维瓦尔迪兄弟的远征。可以肯定葡萄牙人需要黄金；1387至1416年间，他们将金价提高12%。在1436年以前葡萄牙没有铸造金币，穆斯林铸币一直使用到1456年。

[84] 到1455年，据A.达·卡·达·摩斯托（A.da Ca da Mosto）报道说，马德拉群岛甘蔗种植园的产量极大。于1508年，该岛生产出70,000厄罗伯（arroba，西班牙旧重量单位）的蔗糖。

[85] 见V.M.戈丁霍，1962和1969年。于15世纪末沦作奴隶的关切人被贩运到塞维利亚去出售：F.佩雷斯－恩比（F.Perez-Embid），1969年，第89页。1496年以后，这种奴隶数量大增。关于塞拉的基督徒出卖他们的情形，见伊本·哈勒敦提出的证据，前引著作，第115页。

[86] R.莫尼，1960年。

尔角以南太远，要再回来是不可能的：他这论点再次受到挑战。[57]但事实是，15 世纪进行这样的航行势必作出巨大努力，并投入大量资金，同时还会有人力和物力的重大牺牲。在“大西地中海”取得的经验有助于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单有这些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经常在阿拉伯人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在西地中海进行科学和技术的调查研究以掌握新的情况。[58] 那时财政上的需求甚至将大大超过已往任何时候。[59] 此外，还必须掌握观星测定航向或者至少应该学会利用罗盘和航海图的技术；[60] 同时也还需要建造小型灵活的船。[61]小帆船的吨位只有威尼斯货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小帆船能很好适应大西洋的风，并又能顺河流而上，但它们只使用了很短一个时期，后来很快就产生了运载吨位有限的问题。到 16 世纪，与亚洲的贸易就以重型的大帆船替代了小帆船。

664

一旦有了取得成功的各种条件，有组织的探险就迅速开展起来。这种探险主要与欧洲有关，但它在某些方面对 15 世纪非洲的生活有很重大的影响。虽然当时已初步探明非洲的全部轮廓，但非洲的发现者对这大陆本身却极少给予重视。由于北部和东部大部分黄金掌握在穆斯林手中，因此葡萄牙人只能获取很少的一点，他们对此大失所望，很快就把非洲的作用降低到只是单纯提供劳力的场所。这样，西部非洲沿海地区连续几个世纪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一经被打破，就立刻有相当一部分非洲人被输出到美洲去。新大陆的经济繁荣似乎是永无止境的，而最后终于受到绕道而来的伊斯兰影响的亚洲当时所能供应的是香料、宝石、织物和瓷器。这两个地方使“黑色大陆”在白人的心目中黯然失色。

在接触这一点之前，先应特别注意欧麦里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和其他许多文章一样，在一段时间里引起许多不符合科学的争论。欧麦里提到坎库·穆萨（曼萨）对他之前那位马里君主所作的一段评论：

> 他并不认为大洋是不可逾越的。他希望能到达大洋彼岸，并热情地关注着为此所做的一切。他曾装备 200 条船，并为这些船配足了人员以及黄金、水和足够几年食用的食品。然后他对船上的负责人说，“在没有驶达大洋彼岸或耗尽水和食物之前不得返航”。船队扬帆出海了。时间一天天过去。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一艘船返回。最后终于有一条船，而且也仅仅只有一条船返回原地。我们问船上的船长他的所见所闻。他说：“我们一直前进，驶到一条河流，看见海中有一股急流。我是在最后一条船上。其他船仍继续向前驶去，当它们驶到那个地方时，它们已无法掉头，此后便消失不见了。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至于我，并没有驶入那条河流

665

[57] 例如，R. 洛尼斯（R.Lonis）的论文，1978 年。

[58] 见 G.博儒昂（G.Beaujouan），1969 年；A. A. 特谢拉·达-莫塔（A. Teixeira da Mota），1958 年；以及 E.普尔（E.Poulle），1969 年。

[59] J.希尔斯，1966 年。

[60] 从 1317 年起在地中海已使用航海图，但在大西洋使用航海图则始于 15 世纪。绘制出第一张符合要求的西非洲以及西非海洋的航海图的时间大约是 1470 年；标明佛得角群岛和圣多美的第一张航海图绘制于 1483 年。见 C. 德·拉·隆西埃尔，1967 年；M. 德·拉·隆西埃尔，1967 年。

[61] P. 吉尔（P. Gille），1970 年。

就掉头返航了。”

这位君主驳回了这个船长的解释，随之又下令装备2000条船，1000条由他本人和他手下的人员乘坐，另1000条供装载食物和水。那时他指定我为他的王位代理人，接着他和他的同行者上了船，启航出发。这是我们和他们，即他和他的同行者的最后一次见面。

曾有人试图想从这令人很感兴趣的文献中找出马里水手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根据。有时甚至把它当作一个证据，用以证明黑人已经掌握了能从大西洋驶往印度洋的航海术。在这“争胜的”心情中存在着可以作出正确、可靠结论的某些可能。R.莫尼在反驳这些说法时一再强调指出，按当时西非的技术条件作这样的航行是没有可能的。无论怎么说，人们看来并没有取得大家公认而又能持久的结论。

且让我们暂时把这些问题搁置一旁而先提出某些补充思路。首先，不应该在“技术角度的讨论”上纠缠不清。可以肯定，非洲各海岸在很长时间里早已有了海上航行，因此没有理由认为非洲人对克服实际存在的重大困难所必需的技术问题所给予的考虑不如其他地方的人多。捕鱼、沿海贸易以及欧洲早期航海者谈到过的沿海一带的种种活动都是不容怀疑的；东西两边有相当部分海域全由非洲人控制。然而，海洋实际上在非洲各国的经济和政治组织中始终没有占居重要地位。非洲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所有起决定作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全都远离海岸。

更有意思的是，居然有一位曼萨对大西洋如此关注。首先应当指出，伊斯兰的文化移入当时似乎还没有影响到马里的统治阶级。托勒密体系及其种种限制恐怕也还没有影响到这样一位曼萨的视野：海洋就像沙漠和森林一样，本来就是一个有待探索的地方。　666

欧麦里，法文译本，载于J.库奥克，前引著作，第274-275页。关于此文，有一古老书目列于R.亨尼格前引著作中，第3卷，第161-165页。

L.威纳（L.Wiener），1920-1922年；也见M.哈密杜拉（M. Hamidullah），1958年，后者借用了M.D.W.杰弗里斯（M. D.W. Jeffreys），1953年（a）的一个论据，但以现在掌握的资料看，这不能说是具有结论性的；也就是说，所提到的那条河流乃是亚马孙河。这里忽视了两个事实：第一是，这些船在驶近这条“海中之河”之前，应当先进入几条水流，其中最汹涌的一条奔向加勒比海而不是流向巴西；第二是，亚马孙河向外流出的水必定会冲击这些船，使它们倒退回去，而不会把它们推向现在属于巴西的海岸。然而，事实上，这些水流如果能够利用的话，能将船朝西穿越大西洋送往达喀尔的纬度方向去，但不可能使它原路返回。不知这是否是欧麦里文章所要说明的意思。也见C.L.赖利（C.L. Riley），1971年。

J.H.赫顿（J.H. Hutton），1946年。

R.莫尼，1971年。

然而，马里对它的卡萨芒斯、冈比亚以及甚至更可能是塞拉利昂等“沿海诸省”的关注应当着重强调。这种关注现在已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美国年轻历史学家们的一批研究成果。

为了进一步推动这问题的讨论，系统地收集在曼丁哥人中发现的有关海洋的各种口头传说是十分必要的。据我们所知，现在还没有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在这里引述一下接受亨利亲王命令、要去探索博贾多尔角以南海域的那些人所说的话是相当有意思的：“我们怎能越过我们的父辈所确立的界限呢！我们此去无异于自杀。亲王牺牲了我们的灵魂和肉体，他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不难看清，在这个海角以南的海域，既没有人，也没有有人居住的地方……那里的水流是如此之凶猛，因此没有一条绕过这海角而去的船能够驶返回来。”见G.E.德-祖拉拉（G.E. de Zurara），1960年版，第60-70页。

此外，我们必须重视马里沿海诸省所起的作用，重视马里为使萨赫勒地区经济关系多样化而作的努力，最后还应重视穆斯林或欧洲人于 13 世纪和 14 世纪初期所进行的“探索”的次数。一位曼萨试图探索和控制大西洋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因为别人已经在进行揭开其奥秘的工作。穆萨曼萨上述叙述的语气说明，就是他本人也都认为去做这样一件事是不现实的——或许仅仅因为这事已经失败。他去朝圣带出了大量黄金，他这次朝圣造成的经济后果表明，他的失败之大几乎与他的前一位君主不相上下。这次冒险，若从事情的前前后后看，理应受到认真的对待，即需要研究其起因和它对人类可能产生的后果——譬如说，出现一次在南美洲的小规模登陆。[98]实际上，它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有一切证据证明，只是零。[99]

扩张，失望，开拓

一当葡萄牙人牢牢控制了摩洛哥沿海的贸易飞地，并从那里输入棉布、马匹和黄金之后，他们就在 1434 年绕过了博贾多尔角。他们用 9 年的时间来掌握经由亚速尔群岛返回本国的技术；到了 1443 年，沿着非洲海岸进行扩张已成为可能的事（见插图 26.5）。54 年之后，他们到达非洲大陆以南，60 年内，他们已经定期航行在印度洋上。15 世纪下半叶，非洲经历了扩张、失望、开拓三个过程。

667 残暴和掠夺是扩张的早期阶段的特点。到 1450 年以后，扩张行动已经比较有组织了；贸易代替了袭击。阿尔金和埃尔米纳程度不同地是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进行贸易的停靠港口。少量俏货，如皮革、琥珀和枪支都从这两个港口运往欧洲。但一些最需要的商品在数量上与最初的尝试相比，却令人失望。扩张最早是以王室的名义，并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其利益进行的。当它成为过重的负担时，才允许个人插手。[100]但是葡萄牙王室从来没有完全放弃它的直接控制的政策，即使它根本没有办法实现这一政策，而首先是没有办法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抗衡以捍卫它理论上的垄断地位。[101]

很快又产生了各种各样令人失望的事情，一开始就与贸易的实际本质有关：每年的远征只靠少量小船很难带来高额利润。各次想深入到非洲大陆内地去的打算全都以失败告终。1481 年，葡萄牙的约翰二世为了想找到一条通往黄金产地的水路，下令用火药来清除塞内加尔河上的费卢急流浅滩，当然这是完全徒劳的。另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发生于 1483 年，那时发现扎伊尔河由于受耶拉达湍滩之阻而无法通行，虽然它非常宽阔以致使人觉得沿着它顺流而上很容易通向内地。1487 年，人们试图在瓦丹建立一个贸易点，以便从那里获得一定量的黄金，据了解那是从廷巴克图去摩洛哥的必经之地；但这遭到普

[98] 至于这方面某些不幸的、没有根据的尝试，见 M.D.W. 杰弗里斯，前引著作。

[99] 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5 卷，以供研究美洲在哥伦布以前就已有非洲玉米以及那里的玉米是由穆斯林或黑人水手引进的这一有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正是这些黑人水手比哥伦布更早发现美洲。

[100] 阿尔金始终在王室的牢牢控制之下。冈比亚河以南，曾几次与私人船主签订合同。为了换取支付费用和每年对某段海岸进行考察，将当地的收益让给他们。

[101] 15 世纪时最出名的事例，是厄斯塔什·德·拉·福斯及其伙伴到黄金海岸的航行（1479－1480 年），这次航行以悲剧告终；他们因未曾得到王室准许、违禁来到埃尔米纳而被逮捕，并受威胁说要处以绞刑。见 E 德·拉·福斯（Eustache de la Fosse）；R. 富歇－德尔博斯（R. Fouché-Delbosc）编，1897 年（未见进一步的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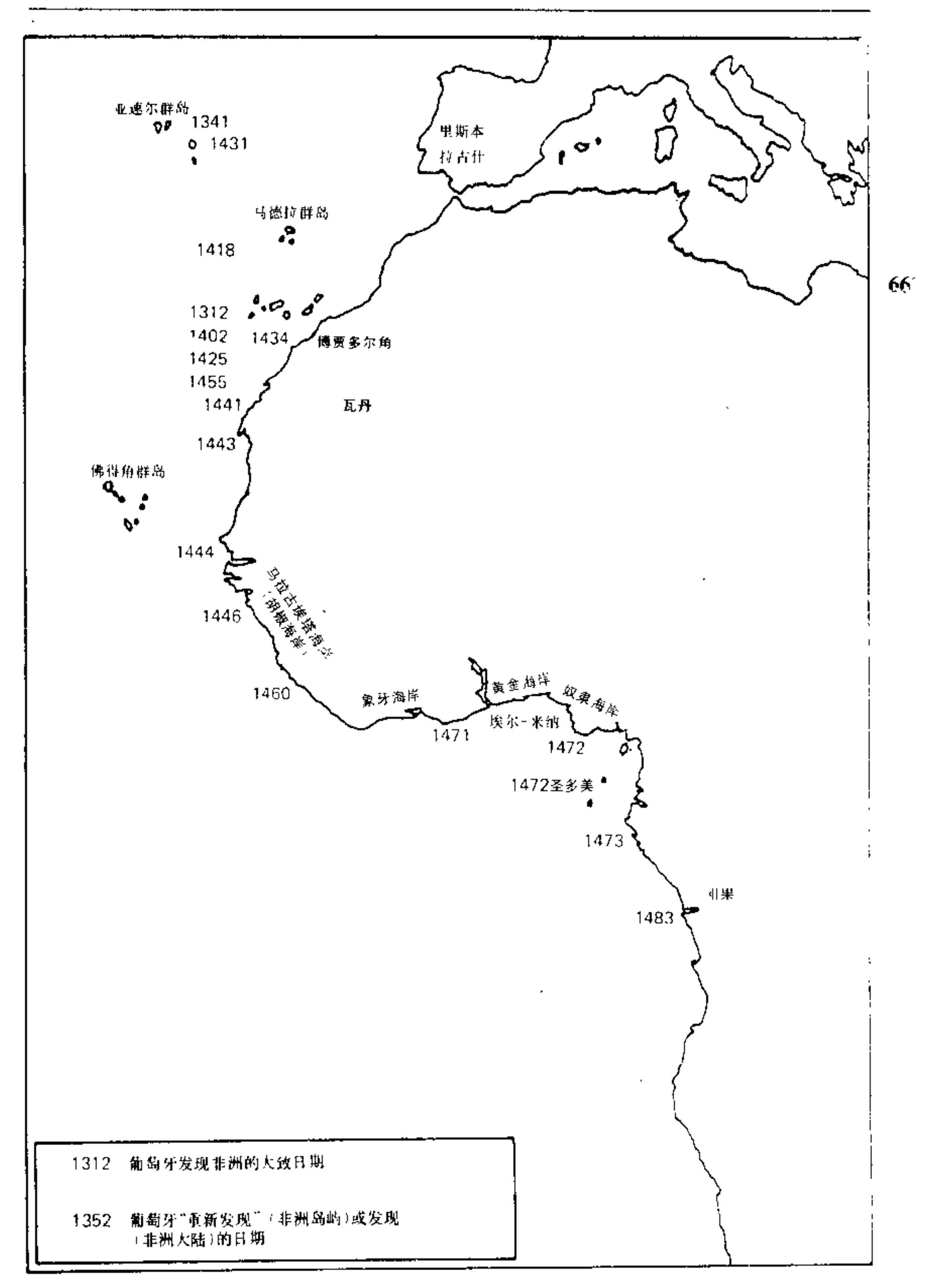


图26.5 15世纪葡萄牙对非洲形成包围圈（J.德维斯）

遍的敌视。在冈比亚河畔的坎托尔，马里为取得高额利润牢牢控制了那里的贸易；再往南，远到谷物海岸，外国人完全不受欢迎，停泊处也不是令人满意的。

欧洲人有相当一段时间的注意力只集中于寻求非洲的黄金。[103]我们知道，葡萄牙人开辟海路把大量黄金运往海岸的目的没有成功。他们从大西洋沿岸获得的总量从来没有超过，或许还从来没有达到过一年一吨之数。[104]经过了起初的数年之后，在满足欧洲急剧发展的经济的需要方面，人们所感受到的失望是很严重的。地中海各港口，正如我们现在 668 渐渐知道的，继续获得非洲黄金，那是通过陆路由商队运来的。来自贝宁的马拉古埃塔胡椒和黑胡椒一度代替了黄金；[105]但尽管马拉古埃塔胡椒依然走俏，而国际商人却认为非洲胡椒无法与市场上出现的亚洲胡椒相竞争。

总的说来，前几个世纪的种种报道使人们产生了想要得到非洲奇妙物品的愿望，但从经济角度看，贸易仅仅只是停留在一般水平。较少量的白银（它在撒哈拉以南产量有限）、摩洛哥贸易地区生产的纺织品、马匹和铜使贸易得以保持平衡。[106]

失望情绪在经济领域以外也同样严重。那赫赫有名的祭师王约翰的王国看来在西非洲和北非洲是无从找到的，而自 14 世纪以来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却一直把这个“王国”想象成抗击穆斯林的一个同盟者。到 15 世纪中叶，一位不知名的方济各会修士确有把握地宣称这救世王国就在非洲。迭戈·康认为他在 1483 年发现了通向这王国的道路是经由刚果河河口。但黑非洲没有一个地方是属于基督教国家或准备为抗击伊斯兰而战的。

由于异常气候而引起的失望情绪对于未来会产生更加直接的后果，因为它增强了水手和商人亲眼目睹的感受。[107] A. 达·卡·达·摩斯托第一个看到贝宁地区夏季连绵阴雨的天气与更往北一带的干旱环境形成鲜明对照。[108]这种时刻在欧洲是正当收获的季节，而这里却似乎会使农耕活动全部处于停顿状态。A.达·卡·达·摩斯托还亲眼目睹，这里的人们在雨季前播种和雨季后收割。对来自地中海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生疏的农耕习惯。669 航海必须懂得观察风象，于是揭示了长期困扰着人的一种自然现象——东北季风和东南季风的出现和消失。[109]气温很少有变化的情况同样也困扰着人们。居民的习俗，传统宗教

[103] 1447 年安东尼奥·马尔凡特到图瓦特的远征可能得到桑图里奥尼家族的热那亚银行的资助，该银行当时渴望开辟一条经俄罗斯和亚洲通向亚洲香料产地的陆上交通。

[104] 见 V.M. 戈丁霍，1969 年；J. 德维斯，前引著作。这里应当回忆一下 R.莫尼于 1960 年对西非与北非之间黄金贸易所作的估计是一年不到 4 吨。

[105] 见 R. 莫尼，1961 年，第 240 - 250 页。

[106] 白银在非洲比黄金还值钱，它由基督教国家输入。由于国际上的经济原因，甚至马格里布在当时也是很好的白银市场。V. 费尔南德斯（V.Fernandes），法文译本，1938 年，第 97 页。尽管最早去非洲的旅行者就已经怀着可以理解的兴趣注意到了非洲居民都赤身裸体或者穿着十分简单，但事实上还是有人在生产纺织品。

[107] 见 S. 达沃（S. Daveau），1969 年。

[108] 在阿尔金，“一年只有三个月，即 8、9、10 月下雨”；A.达·卡·达－摩斯托，根据法文译本，1895 年。

[109] 参照这两种风向的规律就可计算出启航的时间。16 世纪初，杜阿特·帕切科·佩雷拉就曾指出：“一年中有三个月，即 1、2、3 月，凡是要驶往东印度群岛去的船务必于这时启程；这三个月中 2 月是最佳时间”。杜阿特·帕切科·佩雷拉（Duarte Pacheco Pereira），根据法文译本，1956 年。这里应该指出，冬季在地中海是很少出航的。

仪式的多姿多态，引起了最早期的人种学家的评论，[109]例如瓦伦廷·费尔南德斯。"拜物"（fetish）一词，当时并未出现，后来才被误解而通用。[110]

上述这些观察所得的现象与航海密切相关，导致许多有益的发现，可是在这方面海洋比陆地影响更大。[111]原先，葡萄牙人企望欧洲的作物（小麦、葡萄）和欧洲人本身能适应非洲的土地，但实际结果是，地理环境并不利于农业作物的移地种植，气候条件也使人沮丧。[112]于是，否定托勒密文化传统的革命终于开始；[113]但是非洲人发现，那种观点所固有的成见并没有消失。

很快就证明，把欧洲农作物移植到非洲去是不可能的，但有可能在诸如1472年就已被占领的圣多美处女地上建立新的甘蔗种植园；蔗糖市场依然在发展。"要搞到必要的劳力"，这思想是计划中理所当然要出现的。所以，还要把捕捉到的黑人送往"大西地中海"其他一些种植甘蔗的岛上去。[114]

事实上，奴隶买卖在向海岛放逐黑人之前30年左右就已开始。[115]从1440年起，在当今毛里塔尼亚沿海一带不同地点捕捉来的奴隶是当时的买卖对象，G.E.德-祖拉拉曾对这种现象作过辩护，但如果不是事先发现欧洲人中意见有极大矛盾的话，那么他谈这个问题时所用的语气就会显得巧妙而冷嘲热讽了： 670

> 应当指出，这些黑人，虽然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摩尔人，但出于一种古老的习俗，他们依然是摩尔人的奴隶，我相信，这习俗是根据诺亚（Noah）在大洪水之后对他的儿子哈姆（Ham）所作的咒诅流传下来的……（然而）虽然他们的肤色是黑的，但他们都有和别人一样的心灵，何况，这些黑人非但不是摩尔人的血统而却都是异教徒血统，因此很容易将他们领到走向得救的路上去。[116]

---

[109] V.费尔南德斯，法文译本，1951年，第2卷，71、73、77、83、101页；他还在其他一些不大引人注意的短论中，阐述了非洲人的偶像崇拜现象。

[110] 关于"拜物"，见R.阿维勒尔（R. Arveiller），1963年，第229-230页。葡萄牙语中 *feitico* 一词是形容词，意为"人造的"，13世纪时与法文中的 *factice*（fake、虚假）并非同义词。葡萄牙语中的 *feitico*，在其他一些语言中派生出一系列的单词。fetishist 一词，原出于1602年荷兰人P.德-马雷（P. de Marees）一本旅行指南的法文译本（1605年）；fetish 一词则首先出现于1669年，研究此词需参照葡萄牙语和卡斯蒂尔语。

[111] 西方人原先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而以种族优越的面目出现。后来，又发现地理上的巨大差异，这又促使他们去研究对他们有利的地理原因；但是，科学探讨只是在先有充分观察之后才能逐步进行。

[112] 据杜阿特·帕切科·佩雷拉观察所得，贝宁沿海的气候全年都是不利于健康的，尤其在8、9两月，实在难以忍受，那时雨水下个不停；"所有河流都泛滥并发出恶臭，这对我们白人是十分有害的"。杜阿特·帕切科·佩雷拉，法文译本，前引著作。

[113] "从贝宁到刚果的整个非洲海岸树木茂盛，人口稠密。这一地区靠近我们祖先所说的无法居住的赤道圈，但我们根据经验发现这与事实相反"；出处同上。

[114] C.维尔林登，1955年（a），第630-631页。

[115] 出处同上，第617页；C.维尔林登，1967年，第365-377页。

[116] G.E.德-祖拉拉，前引著作，第90页。

获取利润的动机支配着人们的良智；[117]所以似乎很少有人会对用一个白色摩尔人去换取几个黑人，或者直接奴役黑人的行为感到不安。[118] 1444年，在葡萄牙的拉古什地方设立了一家专门从事开发奴隶贸易的公司。同年，就在拉古什，航海家亨利、拉古什教会、圣文森特角的方济各会修士和一些商人一起瓜分了240名奴隶。

1448年，于阿尔金建立了包括以货换人在内的"定期贸易"，可能每年提供数百名奴隶，直到15世纪。自此往南，这种贸易组织同样"有利可图"：1460年以后，从佛得角和辛－萨卢姆之间那片土地上一共运走1000名左右奴隶。更往南，15世纪时期的数字就难以估计了。[119]

据C.维尔林登估计，运入葡萄牙，来到拉古什和里斯本皇家埃斯克拉沃斯堡的奴隶人数，每年约880名。[120]卡斯蒂尔从1474年起承认葡萄牙对这宗贸易的垄断，但是在里斯本购买奴隶。可以肯定在该世纪末经常不断有奴隶运进葡萄牙，虽然现在尚无法提供可靠的数字。[121] 从事奴隶买卖的组织到了15世纪末已经固定。奴隶的价格在头几年波动很大；但后来在各地实际上已稳定在同一水平上，大致是6个奴隶换1匹马。[122]在非洲大陆内地，马匹是一种高价商品；但有些地方，特别是在赤道地区，铜渐渐代替了马匹。[123]遗憾的是，非洲的奴隶交易在几个世纪中一直是欧洲人在非洲沿海最有利可图的买卖。

在15世纪的整整一百年中，欧洲人给予非洲大西洋沿海各群岛以极大的冲击，但还没有深入到内地。他们既没有彻底改变原有的贸易制度，也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基本的政治平衡。葡萄牙人曾打算于1481至1495年间派出一个使团去马里以便与那里的曼萨保持联系，不过这一意图看来没有取得成功。很难认为这些行动对富尔贝人于1480－1490年左右开始向南流动有任何影响。他们与刚果国王恩库武的关系虽然比较密切，但依然捉摸不定，因而在当时尚未产生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1483年，国王对设立葡萄牙使馆之事作出了反应，他邀请一个代表团来访。1491年，确实派来了一个代表团，其中有几位方济各会修士，他们在当年5月3日为国王施洗礼；此外还有木匠、牲畜饲养人和

---

[117] 教皇尼古拉五世于1454年1月8日给葡萄牙的阿方索五世签署了一个训令，准许他剥夺"所有摩尔人和基督的其他敌人"的自由，连"几内亚人"也不例外，见C.维尔林登，1955年（a），第618页。

[118] 一项附加的优越条件是，已经皈依的黑人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传播基督教。他们在这之前，先要提供他们知道的关于人们极不了解的非洲大陆的一切详情，说明哪里可以找到大量黄金。

[119] 佛罗伦萨人巴尔托洛梅奥·马尔齐翁尼为了在奴隶海岸经营奴隶买卖，在那里租了一块地盘，期限是从1486年至1488年，共三年，每年租金为45,000杜卡特。

[120] C.维尔林登，1955年（a），第617和以后诸页；也可见同一著作，第358－362页。

[121] 有关这问题的最详尽的材料，见P.D.柯廷（P.D.Curtin），1969年，第17－21页。该作品所作的估计是，15世纪从非洲弄走的奴隶共计有175,000人。还要再参考C.维尔林登1977年所提供的数字。葡萄牙和西班牙学者所发表的大量论文也还应当参照，如V.科尔特斯－阿隆索，1963、1964和1972年，第123－151页；A.佛朗哥·席尔瓦（A. Franco Silva），1979年。也可见A.特谢拉·达－莫塔，1981年。

[122] A.达·卡·达·摩斯托指出，在北方起初14名奴隶才换得1匹马。在塞内冈比亚奴隶数在10和12名上下不等。15世纪末，在辛－萨卢姆，一匹马与奴隶的比数则在6名与15名之间波动。

[123] 这问题是如此之重要，它更多地是关系到非洲沿海各地。D. 麦考尔（D. McCall）教授目前正就这个问题写一篇专题论文。

石匠前来教人们掌握手艺。但是，到 1493 或 1494 年，出现了严重困难，国王宁肯叛教也不愿放弃一夫多妻制。于是，在贝宁沿海和塞内冈比亚，基督教的传播暂时遭受挫折。[134]只是在一些岛上建立了正规的基督教机构，例如，加那利群岛有一位主教；仅有的例外是摩洛哥，那里的情况特殊。[135]

与此相反，欧洲人的到来对非洲沿海地区的直接影响却很快就能使人感觉出来，即使是相当小的地区也如此。在塞内冈比亚，葡萄牙人发现，早在他们到达之前很久就已明显存在一种双重平衡。一方面，马里的曼萨，正如葡萄牙旅行者所看到的，采用对铁严加管制的办法，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维护了他们对远到冈比亚以北的卡萨芒斯地区的霸权；另一方面，他们把塞内加尔和冈比亚之间的地区让给了强大的乔洛夫国家。欧洲铁的输入，哪怕数量不多，也就打破了这一平衡。葡萄牙人的贸易在瓦解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甚至更大，先是在塞内冈比亚，随之，于公元 1500 年以后，在贝宁沿海，特别是在刚果境内，情况也是如此。乔洛夫的布尔巴用了可能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设法使卡约尔人和鲍尔人承认其权力。自 1455 年起，布尔巴向新来者索要马匹，到 1484 年，这已成为惯例。[136]但后来乔洛夫的统治者将注意力由国内贸易转向参与沿海贸易。正如今后情况所显示的那样，地理位置在这方面的有利条件明显是在卡约尔和鲍尔人一边。

672

然而，这一新情况所促成的社会后果很快就被看成至少是与政治影响同样重要。在塞内冈比亚学者笔下，当时的塞内冈比亚社会包括许多非常典型的行业，如乐师、织布工、铁匠和皮匠，但唯独没有商人。正因为没有商人，便由国王亲自组织贸易事业，与新来者进行交易，这种贸易使国王一度获得了加强他的权力的手段，而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权力已开始受到挑战。虽则官方一再强调不准向非基督教地区输出生铁这一虚假禁令，但人们仍广泛使用马匹和铁作为交换物，以换得奴隶。

有资料证明，15 世纪下半叶各地不同的社会里都存在着“奴役制度”，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历史学家现在正在逐步查明，大致主要是由于战争、欠债和饥荒，但是当时社会结构并不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因此塞内冈比亚这些附属者的身份可能仍然是私人性质的。然而，一旦出现“用奴隶经营”以偿付进口物的买卖，情况就迅速改变了。王家和贵族统治集团从中得到的不仅是个人利益，而且也得到社会和道德的坏名声。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与邻国的关系多半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起了深刻的变化。

抵抗伊斯兰的堡垒在塞内冈比亚依然存在；除了在古老的国家塔克鲁尔，皈依基督教的酋长国不多。在乔洛夫人中，伊斯兰教在普通老百姓中传播可能成为向传统权力的一种潜在挑战，国王，像摩洛哥的瓦塔斯王朝的统治者一样，已经逐渐向要他让欧洲人卷入王国与王国之间以及一个社会阶层与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内部纠纷的劝诱屈服。

---

[134] 从 1469 年起在几内亚－比绍开始有方济各会修士致力于传教。1489 年，曾试图使一位塞雷尔族的酋长皈依基督教，但他在从欧洲回国途中遭到他自己的葡萄牙卫士的暗杀。1484 年，多明我会修士也来到贝宁。

[135] 根据 1225 年摩洛哥和它的欧洲各方对手签订的一项协议，允许基督教徒在摩洛哥任何地方定居。托钵僧修士会竭力劝人信奉基督教，但奏效不大，在非斯和马拉喀什甚至任命了主教，在沿海的各贸易飞地开办了教堂，专为信奉基督教的雇佣兵服务。关于这些问题，见 L.雅丹，前引著作，第 36－68 页。

[136] 见 J. 布莱格（J. Boulègue），1968 年。

27 结 束 语

D. T. 尼昂

67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定的《非洲通史》第4卷，一直写到欧洲人开始占优势和扩张的时代。至于15世纪和16世纪，这不只是黑非洲历史的转折点，而且还是我们全世界历史的转折时代。确实，当时人类已面临一个新世纪的曙光；火药、罗盘、装有灵活的风帆而又容易驾驶的快船，使欧洲人船够控制海洋和世界贸易。

整个15世纪，意大利商人，特别是热那亚人，力图通过马格里布生意人谋取苏丹黄金，尽管作出巨大努力，地中海——古代世界的大湖——沿岸港口还是接连不断地趋于衰落。1447年，著名商人安东尼奥·马尔凡特曾抵达图瓦特暂居，他把关于远方苏丹地区和黄金交易的情报带回热那亚；但是，当时通向苏丹地区和印度洋诸岛的海路是西班牙、葡萄牙人发现的，而西、葡两国的国王通过为他们服务的意大利航海家，已船实现他们的愿望。由于环球航行的实现，穆斯林起过重要作用，这时却让位于西、葡两国的基督教势力。航海探险是由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来完成，这决非偶然。正如M.塔尔比教授所说，这是因为他们与阿拉伯人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和和平交往，从而继承了阿拉伯的科学。①

从12世纪到16世纪，非洲在世界经济中起过主要作用。直到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才为欧洲人开辟了新的金银资源；后来，秘鲁和墨西哥的矿业在供应贵金属方面很快超过了布雷、班布克、恩加拉姆、姆韦尼·马塔帕等地。

回顾非洲这一时期的历史，须注意三个主要方面的实际情况：首先是宗教和政治，其次是经济和文化，第三是历史的动力。

宗教与政治

674 首先是各个王国、帝国和城市日益发展。伊斯兰教通过北部非洲的逐步阿拉伯化巩固其权力。在撒哈拉以南，它也已成为一些王国和帝国的国教，但是阿拉伯人并未取得对黑非洲的控制权，伊斯兰教在黑非洲并非一种宗教因素，而仅仅是政治因素。然而伊斯兰教刺激了各个地区的贸易关系。如在苏丹地区，大宗贸易就促成了社会的迅速发展，同时促使新的社会阶级出现——黑人商旅及学者阶级。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已能适应当地的环境，但严格说来，它只不过是与柏柏尔阿拉伯人有交往的宫廷和商家的一层薄

① 参阅第3章。

薄的外表虚饰。至于人民中间，以崇拜祖先为基础的传统宗教仍然盛行不衰。这种情况，在统治者皈依于伊斯兰教的地区，以及在国王还不是穆斯林的地方，大致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昆比和尼亚尼的宫廷仪式就同亚滕加的雷同。这些地方的臣民，在晋见他们的君主之前，都要全身撒土，匍伏地上。

无论何处，统治者都宣称对帝国的幸福和富强负有责任。这就是臣民们顶礼膜拜的根据所在，统治者几乎被称为“神王”或“圣君”，而有些专家就常用这种称呼。最后必须重视一点，早期的黑人国王都有宽容精神，他们甚至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已赞同柏柏尔阿拉伯人定居于各地城镇。然而，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却并不意味着抛弃祖传的宗教习俗。因此，一些地区存在着原始的共生现象：例如在苏丹地区的传统背景中，就有许多伊斯兰教影响的痕迹，苏丹人的神话、英雄人物和历史故事，都是用大不同于古代典型的形式来表现的。同样，在埃塞俄比亚的非洲传统和基督教文明之间也有上述情况。可是，这两个崇拜天神的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经过几世纪的争斗历程而流传后世的，在非洲之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尽管如此，商人却从未丧失其权利。[②]

> 自10世纪以来，从亚丁湾到非洲之角内地的商路，一直是这地区所有民族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这些商路，既成了该地区主要大国都想争夺的鲸骨，因此，也毫无疑问地促进了各具不同文化、宗教及语言的当地民族之间多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到了13世纪中叶，就连埃塞俄比亚北部笃信基督教的扎格韦王国，也都不再把达赫拉克素丹国当作它通向红海的唯一出口，当时，它已经通过南方各省开辟了泽伊拉商路。[③]

675

由此可见，宗教冲突以及间歇性的战争并未阻断各族人民混合的趋势，相互间文化和经济的交往从未停滞。

在政治方面，氏族和部族群体大体上已充分组织起来，可以抵御外族的诱惑而不致同化。即使某个群体兴起并强制推行其法律，其结果也没有达到以获胜氏族为中心、各群体完全熔合的程度，而是建立起氏族联盟，各个氏族，则按其组织程度，保持各自的特性。明显的事实是：举例而言，在马格里布，马林王朝、哈夫斯王朝和萨阿迪特诸王国，实际上都是由一些氏族群体（卡比拉）聚合在统治者的氏族周围而形成的。在马里，情况也一样，即是曼丁哥人同其他氏族联合起来；在莫西和卢旺达，以及姆韦尼·马塔帕，也复如此。

在非洲大陆的北部和东北部，马格里布和埃及变成了穆斯林世界中显然不同的独特部分：马格里布经历过阿尔莫哈德王朝一段短暂的统一时期，以后便分为三个邦国：最西边的摩洛哥以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它们各有个性，但全都是在那短暂的政治统一破坏之后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区阿拉伯化的过程相当缓慢：卡比拉（父系氏族群体）仍是政治实体和社会实体，统治者不能不考虑谢赫和氏族首领的地位。在加贝斯

② 参阅第17章。
③ 参阅第17章，原文第430页。

湾——伊弗里基亚或突尼斯边界的起点——和尼罗河流域之间有利比亚地区，它夹在突尼斯统治者与开罗统治者中间，归属不定。开罗的统治者，特别是马木路克王朝，曾经使埃及称霸于穆斯林世界。开罗成了政治首都，它的声音能传遍西方及东方。

伊斯兰教好比是马格里布、埃及和穆斯林东方之间的一种结合剂。然而，没有一个地区能自称强权，或重建以往世纪那样的穆斯林整体。在本书研究的这一时期之末，伊斯兰教已从政治水平面上落到全面退却的地步。当时，基督教已在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发起攻势；格拉纳达——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王国已经陷落。基督教徒纷纷渡过地中海，来到马格里布，圣路易十字军即是典型例子。15世纪末，充当基督教进攻先锋的葡萄牙人占领了休达，其意图也就是借摩洛哥为桥头堡入侵非洲。15世纪末，无论陆上海上，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者已经从穆斯林手中夺走主动权，从而找到了通向黄金产地苏丹地区的路线。

576 努比亚的情况值得注意：在努比亚，基督教经过长期斗争，终于灭绝。[4] L.克罗帕塞克教授写道：

> 按广泛流传的见解来说，基督教主要是社会上层精英的宗教，在人民群众中间并没有深厚的根基。它的崇拜仪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古埃及遗留下科普特僧侣以及外来文化相关，绝少推出土生土长的圣徒和殉道者……考古发掘出来的教堂壁画上只偶尔见到努比亚土著主教的黑脸……伊本·苏莱姆的著述（写于10世纪）证明古老的、基督教传入之前的信仰持续存在，直到今日还继续在一般苏丹地区的伊斯兰教中流传。[5]

但是这里的阿拉伯化过程，同别处一样，并非全然是和平的；入侵者不得不镇压许多次起义，而实际上是黑人为阿拉伯移民浪潮所淹没。

> 在研究尼罗特苏丹的当代史学家中间出现了一种强烈的、但颇有道理的见解，认为以前过分强调北方或阿拉伯的因素，而忽视当地土著的发展及其与黑非洲文化的联系。这种实例，——对渗入苏丹地区腹地和来自苏丹地区腹地的交叉文化的影响，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已成为充分探讨而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6]

新近的研究证明，尼罗特苏丹从来是非洲许多氏族（或黑人部族群体）经常流动和相互联系的地带。年复一年，考古学揭示出苏丹地区文明史上黑人文化中的黑种原素。

还有生存于沙漠中的氏族：在撒哈拉，各个氏族有自己活动的范围；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人口流动性很大，使得具有中央权力机构的国家很难建立。赤道丛林地带也是同样情形：俾格米人在非常困难的境地生存，他们随处栖身，从来以狩猎为生。处于同样情况的还有科伊科伊人、桑人和所有被苏丹地区居民或班图人逼回到沙漠和丛林的各族；苏丹地区居民和班图人有较好的武器，因为他们已学会用铁、并使用长矛。

---

④ 参见第16章；在这一章里，对这一时期努比亚文化和社会的变化也作了新的论述。
⑤ 第16章，原文第410页。
⑥ 同上，第416页。

总结这几段有关政治发展的综合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1600年前，非洲各地区已经达到或经历了氏族阶段；凡有条件的地方，都建立了城镇、王国和有生存力的帝国。原始的政治结构已经形成，而且从外部得到充实，出现了许多种政府形式。非洲历史上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可惜很少加以研究。政治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表明了由氏族到氏族联合以至建立王国的演变过程，最后几个王国结合起来形成帝国。以这一演变过程，今后可以对非洲许多地区的政治结构进行研究。 677

在非洲大陆的南端，即从纳米比亚到林波波河口一线以南地区，12世纪以前肯定已有王国和帝国存在。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但当今的南非共和国给历史研究设下了障碍。虽然考古研究对这个地区的物质文化已有一些了解，可是有关森林地带和南部草原的资料十分罕见。研究班图传统的专家J.范西纳教授所作分析，证明这个地区在本书所论述的时期内，确有国家（指成形的政治实体）存在，而且是存在已有很长时间：

> 这里的国家肯定很古老。桑加和卡托托两处大墓地，恰好位于卢巴帝国中心之南的卢阿拉巴湖区，绝非偶然，这帝国也许就是这些居民点后来的表现形式。两处大墓地的年代大约是在基督纪元1000年前。可以肯定，正如桑加墓地遗留至今的陈迹所显示的，人口如此稠密的城镇，决不可能仅仅靠氏族之间的联系来管理。再者，卢巴型国家之所以能如此古老是由于开赛东部、沙巴大部分、赞比亚东北部、赞比亚铜矿地带和赞比亚西北一部分地区的相关语言分布极广。

另外应当指出，在本世纪初，英国人成立了一家“罗得西亚古迹公司”（简称“古迹公司”）。几十年间，这个声名狼藉的公司盗掘了津巴布韦－马蓬古布韦文明时代的皇陵，有组织地运走了好几处陵墓所藏的珍宝。南部非洲的这种文明和津巴布韦文明看来有许多共同点。南部非洲也是一种有石砌建筑的采掘文明，与莫桑比克的马努基尼文明相似。在德兰士瓦、索托和绍纳，都有巨石建筑的古迹；据新近研究所知，马蓬古布韦文明几乎就是班图文化和更远古的科伊科伊文化之间的共生现象。10世纪之前，铁器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根据各方面的理由，我们相信马蓬古布韦山的陵墓及其附近遗迹，原是11-15世纪间（即或不在更早时代）一度繁荣昌盛的文明，必定是在奴隶贸易带来政治及社会动乱、使非洲陷入了长期缓慢的痛苦的衰落之前。

有些研究者的推论失误了。他们以为南部非洲只可能在9－10世纪才知道铁，但是，史实表明：（1）尼罗河流域（麦罗埃－纳帕塔）、大湖区与林波波平原之间的交往关系仍在继续维持；（2）人口流动并未遇到重大障碍；（3）即便从文化上或单纯的商业角度看，地区相互间的交往关系也未受到阻碍。新近的研究表明，南部非洲早在基督纪元前已能冶铁，这就推翻了旧时的各种论断。 678

对本卷所论述的时期，有关南部非洲各地区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也还有几点模糊不清之处。但是，在津巴布韦文明的问题上，当地巨石古迹的创造者，究竟是黑人土著还是白人已经一清二楚。这些石砌建筑，完全是绍纳人的创造，这一点已是肯定无疑的了。然而，绍纳王国是何种政治的结构？又有何种社会结构？津巴布韦与沿海地区之间的贸易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这样一些难题，尚缺答案。

经济和文化

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最明显的特征是非洲各地区之间的关系、非洲大陆与外界的关系，都同时加强起来；这种关系经常不断地受到阿拉伯、波斯、柏柏尔、中国、曼丁哥和豪萨商人的刺激。在南方，绍纳人和近赤道草原区的各族居民进行着十分繁荣的商业交易，既向大西洋方向发展，也通过刚果河、大湖区和姆韦尼·马塔帕指向印度洋。

黑人统治者都很懂得金属（金、铜和铁等）的经济和政治作用，因而牢牢控制矿藏的开发。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有关非洲的研究资料和论文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非洲是柏柏尔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取之不尽的金库，而非洲的国王只是在当地为外国人服务；这简直就是否认有组织的国家的存在。事实上非洲君主们曾经禁止阿拉伯旅行者进入金矿区，这决非偶然。

合伙做生意的每个人，都在对等交易基础上获得利益。正因为如此，人们称苏丹的最高统治者为“卡雅·马汉”，即“黄金之王”；在南方，与他对等的统治者，也因本地盛产金、铜、铁而被称为“姆韦尼·马塔帕”，即“金属之王”。这些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都懂得贵金属是他们王国争取富强和传播名声的基础所在，他们也知道矿产在他们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卡雅·马汉对金块拥有独占权，对贵金属的输出严加控制，在津巴布韦，姆韦尼·马塔帕肯定也是如此。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因为一些非洲问题研究专家想要我们相信非洲人和他们的统治者早就把他们的财宝让给了第一批入境的商人，似乎没有任何维护公众利益的观念。

统治者们都知道怎样利用金子来招徕外国人的服务，例如穆萨曼萨就把建筑师召到他的首都，还有作家和教士，都以金子给他们津贴。津巴布韦的国王不得不用金子交换宫廷大量需要的中国瓷器和其他奢侈品。只要拿出金、铜、象牙，非洲国王们就能给他们的国家换来食品和生活必需品，食盐在必要时得按斤量付给金子，其他还有诸如中国瓷器、花缎、丝绸、精良武器等一切能显示宫廷辉煌的东西。

北非地区和非洲大陆的东海岸起了特别重要的中介作用。来自欧洲的物产和商品以及给地中海贸易关系带来生命活力的贵金属，都是通过北非交换的。当然，地位如此重要，也可以说明为什么马格里布各商业城市之间如此严酷地对立，每个城市都要争夺苏丹地区财富流通路线的控制权！这种状况，在伊本·哈勒敦所著《历史》一书的有关部分，已有很好的载述，书中他专门描述了柏柏尔人的情况。这也许就是他对黑人国家的历史要作长期详细研究的原因，实际上，马格里布和埃及各城市的商业及活动，很大部分要依赖黑人国家。

在非洲大陆的东边，从非洲之角到苏法拉都面向印度洋，这就使非洲和东方甚至于远东，有了直接联系。海上贸易促使沿海地带建立了商业城镇。内地的国王们，特别是姆韦尼·马塔帕也建设城市，其遗址即是现在的巨石建筑，迄今仍可看出它们当年的宏大规模和建筑艺术，却没有外来影响的痕迹。

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期，贸易有赖于来自草原腹地和森林地区的布匹、武器以及

各种产品的交换，这些产品被转卖到各个国家，远至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这显示了冲刷着马达加斯加海岸的印度洋的重要性，这个巨岛和非洲大陆东海岸城镇一样成了东方和非洲各种文化、语言和经济的共生地。通过贸易，新作物——特别是亚洲的作物——传到了非洲；例如棉花，它就是10世纪前由阿拉伯人带进苏丹地区的。

文化活动及地区相互间的交往从来没有像这段时间那样重要；加奥和廷巴克图都出现了繁荣的书市贸易。在苏丹地区全境，从大西洋岸到红海各地，都出现了黑人－穆斯林文学。阿比西尼亚、博尔努、桑海、塔克鲁尔和马里等王国发展了独创的文学，其中以神学和历史学占重要地位。南撒哈拉的城镇则通过朝圣和贸易，与北方各城镇维持文化联系。

从12世纪到16世纪这一时期，班图语族已遍布中部非洲，他们使用铁工具，因而改进了农业技术。班图文化对南方的影响不断增强。1498年，当瓦斯科·达·伽马航行 680 绕过好望角时，非洲大陆的南端已是具有杰出文明之地，农业和畜牧业都已相当发达。但是，为了替欧洲人早年向非洲大陆南端移民进行辩解，许多学者们竟毫不迟疑地宣称非洲这一部分接近于荒无人迹。在历史研究提供的证据面前，这种无稽之谈不值一驳。事实说明，荷兰人及其后的英国人自17世纪以来就逐步把非洲人赶向贫瘠地区，19世纪时更是大量涌入津巴布韦及德兰士瓦矿区，而在5个世纪之前，这些地区原来是在姆韦尼·马塔帕、马蓬古布韦和莫桑比克强大的马努基尼君主统治之下的。

在整个这一时期中，除了矿业占重要地位之外，农业也是撒哈拉以南各个王国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基础，生产靠氏族耕作来维持。到处都有受奴役的居民群众为统治者做工。在黑非洲盛行一种奴役制度，按成规征收固定的贡赋和捐税；在南马格里布，奴隶和农民同样为领主或统治者耕种土地。非洲东海岸外的岛屿上也有相当发达的种植场。但是，在这一时期，任何地方都还未见到成群的奴隶受制度化的剥削。

畜牧业是某些社会集团的专长，在潮湿多草地区，畜牧业和农业密切相关。牧民们在苏丹地区和萨赫勒地区游荡。有些牧民群体远行到南方定居下来，例如在马西纳和富塔贾隆的富拉尼人。黑非洲还有某些等级的人从事各种各样的手工艺生产，至少苏丹地区是这样；其他地方，如马格里布或埃及，那里已组织了行会和正式的公会。由于缺少文字资料，现在还无从了解南部非洲的手工艺行业情况，虽然当地的金属手工业曾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如能仔细地研究南部非洲的文明传统，将会发现有关当地劳动组织的有价值的材料。

一般说来，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盛行家长制生产方式。氏族酋长、卡比拉首领、国王和皇帝，并非专制暴君，而是当地习俗的产物，保护个人不受统治者勒索和专横行为之害。在马格里布，14－15世纪间，经常发生卡比拉反抗素丹横征暴敛的起义。

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是商人阶级的存在，这是萌芽中的资产阶级。这些商人，无论是否皈依伊斯兰教，他们都促进了各地区和各族人民之间关系的发展。这一事实，在本书许多篇章里得到强调。正是这一时期，民间对贸易的兴趣大有发展，比如曼丁哥人、 681 豪萨人，就具有浓厚的商业倾向。

假如允许比较，我们可以说，在古代世界各个地方，包括从非洲到中国、经过阿拉

伯、欧洲、大西洋、博斯普鲁斯海峡，各王国或帝国都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欧洲人的探险活动，始于15世纪，而当时的非洲或中国，都有可能承担这种事业，特别是中国，因为那里早已发明了罗盘和火药。马里一位皇帝，不是也曾企图发现"环海"（大西洋）的尽头吗？[7] 可是，历史车轮向前转动，指向欧洲。大约经过5个世纪，西欧就超过亚洲大陆而占居优势地位。

非洲的历史动力

根据以上考察，我们都能看到这一时期非洲大陆的主要特征也就是它本身历史动力之所在。当时非洲文明的欣欣向荣，绝不是伊斯兰教的影响所致，尽管这种观念一直沿袭至今。贝宁、刚果(扎伊尔)、马蓬古布韦和大津巴布韦等地的卓越的文明，已经证明这个理论与实际情况不符。即或是改信伊斯兰教的国家，它们的精神力量也主要来自基本的非洲传统，而不是得自伊斯兰教。这个时期非洲的传统文明比以前任何时期更有活力。北部非洲的土著人民虽然信奉伊斯兰教，受到阿拉伯影响，但他们仍然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正因为如此，柏柏尔人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后也还能保留他们的语言和大部分文化。

随处可见的政治动乱是起于内部原因，而克服困难的方法也反映了人民的基本意向。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伊斯兰教传入西部非洲。阿尔莫拉维德运动在本质上是黑人－柏柏尔人的运动；在苏丹地区，这个运动的扩展使古老的加纳帝国发生混乱。随后是各省区之间的一系列战争，导致曼丁哥人统治的帝国复辟，而曼丁哥国王们在11世纪时已改变宗教信仰。新的马里帝国获得新的省份，其势力一直扩展到加纳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这一演变过程外表上挂着伊斯兰教的招牌，实际上则是建立新的城镇和新社会的先声；这个新社会很快就由一个代表黑人商家和学者的贵族政府统治。还有很多例证都能表明非洲历代社会的内在动力。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与外部基督教世界脱离关系，埃塞俄比亚接其古老的传统价值观念自行塑造了一个教会。

682 关于非洲在沦为殖民地之前占优势的生产方式，理论界至今在定义问题上还有许多争议。然而，对非洲历史的真正轮廓都不了解，谁又能说明某种生产形态的特点呢？历史必须重写，首先就要揭示出各种制度的相互作用，同时展现出社会的组织成份——这需要做更多的研究。[8]

如上所述，虽然金、铜、象牙是非洲热带地区与外部世界贸易的主要物资，但是，对于卡雅·马汉、曼萨和姆韦尼·马塔帕之类统治者说来，经济的基础还是农业，因为农民和手工艺工匠占其臣民的大多数。

宫廷和各个城镇的商人及贵族，形成为一个贵族统治集团，与农民和畜牧者相比，他们人数不多。在黑非洲，应注意到基本的事实是土地私有制尚未形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这和欧洲的情况显然不同。由于货币经济不够发达，黑非洲的土地仍被认为

[7] 参阅第26章，原文第664－665页。
[8] 切忌匆忙下结论，因为某些地区的历史真相，我们只知其一般概要。

是属于村社而不可分割的。国王和皇帝们拥有“人们的土地”，其实是他们所统治的村社的共耕地；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是农奴制而不是奴隶制。例如马里帝国和晚些时候的加奥帝国，它们属下的人民或部族群体，都须按家庭单位缴纳一种固定的地租。莫迪·西索科教授清楚地写到这一点：

> 从那时以来农业技术没有多大发展。锄（桑海称之为“考努”）、畜肥、河谷地区的园艺和热带草原的庄稼轮作，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原样，只是尼日尔河流域人口越来越多，当地人民从事农业、渔业和畜牧业。大地产属于大城市的王公和“乌里玛”（伊斯兰贤哲）所有，土地却是由住在农村的奴隶们耕种。阿斯基亚本人就是个大地主。他的领地分布于全河谷区，由叫做“凡发”（*fanfa*）的监工们驱使奴隶村社去耕种。按收获季节征收一种实物税，送到加奥。对私有奴隶也采用同样办法。[9]

但是有些地区，奴隶对于经济和权力的贯彻执行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处于尼日尔与乍得之间的中苏丹的情况。豪萨人的城镇里就有很多由南方召来的奴隶。安德烈·萨利福曾经谈到王室奴隶和家庭奴隶的区别。王室奴隶是从仆役中挑选的，他们是国王的忠实随从。年青奴隶，往往是由于父母在战争中被俘、被卖或处死，他们在宫廷中随王公子弟一起长大，一直处在素丹的控制之下，他们只认他为“父亲”。这些人不会被卖掉，也不受虐待，常在政府军队和行政机关中担任要职。 683

这类事实并不鲜见。为了抗衡贵族势力，国王经常指派他的奴隶去担任要职，他们理所当然既忠于他个人和王室而又少政治野心。例证颇多，在马格里布、埃及和马里，都能见到有权有势的奴隶。一般说来，奴隶在人口成份中所占比例，并未超过农民。自由民是独立种地的，但须与附属国人民一样为统治者和地方领主服务。

目前的研究，有三点值得分别加以讨论。

（1）经济的基础在于农业和畜牧业，然而财产私有制在任何地方都未变成普遍现象，基本所有权仍属于村社。

（2）有商人阶级，也就开始有一定的资本积累，然而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

（3）非洲并不是一个人口不足的大陆。

最后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一位著名史学家写道：“文明产生于数量。”没有一定的人口“数量”，加纳皇帝绝不可能建成昆比的大宫殿，马格里布的统治者也不可能建造非斯和凯鲁万那样漂亮的清真寺，还有锡吉勒马萨的大石屋。没有这些“数量”，南方的皇帝和国王也不可能建立大津巴布韦。由此可知，非洲人口那个时候就相当稠密，尤其是撒哈拉以南、塞内加尔河流域、尼日尔河三角洲内地，以及乍得湖周围地区，这些地方有几百处从事农业生产的村庄、贸易中心和城镇。

对这个问题，在上述地区的第一批考古发掘已有明确答复。巨大石方建筑遗址并非“群体奴隶”所造，它表现的是臣民对统治者的虔敬忠诚——表示自己甘愿做国王的子

---

[9] 参阅第8章，原文第202－203页。

孙——正因为如此，他们可以贡献全力。“群体奴隶”受到高压统治的说法，日益显得肤浅；这正如假设哥特式大教堂和罗马王宫是奴隶们在皮鞭驱赶下所造的一般。在当时人们的心灵和精神中，信仰忠诚是有强烈共鸣的。

对一些地区的人口情况也有材料说明。据马哈茂德·卡蒂的记述，马里曾拥有 400 个城镇或较大的人口集中地，农业地区的村庄沿着水路两边延伸成行。农产品十分充足。我们已引用过西索科教授的著作，他的书中就提到过稻米生产的情况，例如 15 - 16 世纪的桑海，一个管理纳贡村社劳动的监工头（“凡发”）可向国王上交 1000 索努以上的粮食（索努，即大皮袋，1 个索努约为 70 公斤）。王室存粮很多；仅下述事实也可见一般：加奥国王拥有正规军 10 万人，加上主要商业城镇和巨大宫廷附近的守备兵，所有这些部队都靠国王征收农业租税来供养维持。人口数量很难估计，但从人口稠密的商业城镇之多和大津巴布韦遗址的规模来看，可以肯定人口是相当稠密的。在商业日益兴盛的这个时期，整个大陆的城市人口，可能占总人口量的 10%。

非洲确实不缺人口，但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人口分布不均，这是因为有沙漠和大森林存在。这时期非洲必定发生过传染病，经常发生旱灾和洪水，但是现在掌握的文献资料却几乎没有提到过饥荒。阿拉伯旅行家，诸如 14 世纪的世界旅行家伊本·巴图塔，曾经提到过东海岸和苏丹地区的粮食充足。整个非洲大陆，在伊本·巴图塔生活的时代，估计人口至少也有 2 亿。[20]

> 早在 1600 年以前，在非洲就已经有奴隶贸易，然而卷入奴隶贸易的人口是有限的。
>
> 至于 1500 年以后欧洲人强加给黑人世界的奴隶贸易，则是无可比拟的。原来，欧洲人与苏丹地区的统治者以及几内亚和刚果的统治者都有相当好的商业关系。1550 年前后，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把葡萄牙人挤掉了，他们分别在非洲海岸设立堡垒、开办工场，力图把奴隶贸易转到更有利可图的方向上来。

如果要对 12 - 16 世纪这一时期的历史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必须以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及口头传说为基础，从中汲取资料。提到口头传说，它一方面可以用来与文字记载作对比，另一方面还能引导考古学家去进行实地考察，例如对昆比和尼亚尼的发掘工作就是如此。民间的手稿，应继续搜寻，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字资料肯定要比通常设想的更多一些。当然，关于黑非洲口头传说的系统收集的必要性也不能过分强调。

索马里的例子值得一提。它的童谣、民歌、巫师咒语，以及其他传说，经过系统的收集，真是无所不包。举例而言，一部未曾发表过的著作——《非洲通史》已故的科学委员会委员穆萨·H.I. 加拉勒编写的《群星、季节和天气》一书就应该提上一笔。[21] 在索马里，对群星或星座（索马里语“希迪哥”，Xiddigo）的研究，是以一系列的短诗作为

[20] 提供奴隶最多的国家，均在人口最多的国家之列——几内亚湾沿岸一带（从科特迪瓦到尼日利亚）；刚果（扎伊尔）河口一带；还有安哥拉，等等。

[21] 穆萨·H.I.加拉勒（Musa H.I.Galaal）的书尚未出版。

依据；对天象以及某一季节里可以见到的群星作正规的研究，也是如此，从中可以引出一种历法。见到天文学的研究这样密切联系于民间生活，真是引人入胜。我怀着极大的喜悦读过穆萨·加拉勒送给我的文本，阅后进一步深信口头传说的研究必将继续引起人们的兴趣。这本书中，谈到索马里的天文学，表明农民和牧民都具有先进的宇宙知识。那些简短的诗歌，描绘了所有的星座和行星。根据许多世纪积累的经验，人们有了正确的知识，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指导农事活动和牧民流动的历法。毫无疑问，一旦穆萨·加拉勒的著作出版，非洲许多人会受到启发而去研究"传统"科学。

根据以往对口头传说的长期研究经验，我们可以肯定说这个领域还留下许多工作要做；这一研究领域是最近才开辟的，而人们通常又仅仅从历史或文学的角度去看待它。但是，马里的多贡人，还有其他许多民族，早就对天空和星座进行过细心的研究，有些民族则对土壤和植物作过研究；他们留下的口头传说，是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探讨的。不仅是历史学家或文学作家，就连自然科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学者，凡是对古代黑非洲社会制度有研究兴趣的学者，都应该研究这些口头传说资料。诚然，要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并非轻而易举的；因为口头传说创始者生活的世界，即或不是不可能接近，也是难以理解的。非洲各国应当创造尽可能良好的条件，以便在我们这个变化发展的社会中有更多的掌握祖先遗产的人来参与研究工作。

在那些最偏僻的乡村里还有不少"智者"隐身其间。虽说失传的口头传说很少，但一切仍须多方面进行发掘。归根到底，这与其说是与个别研究工作者相关的问题，还不如说是非洲各国政府的责任；它们理应制定一项研究政策，给非洲学者提供物力财力，并动员广大人民都投身于一系列有研究意义的项目。对愿意帮助农村居民的人来说，有关土地开发和地区文化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在总结口头传说问题之前，这里还须指出非洲的艺术传统也是在这个时期生根萌芽的；正是这一时期，非洲各族人民和各个国家相继发展起来，逐渐成长为近代的非洲。这时期的穆斯林艺术，在马格里布和埃及有了杰出的成果，诸如 14－15 世纪在非斯、特莱姆森和埃及建立的大清真寺。如果说这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艺术作品稀少，那么可以解释一下，部分原因在于艺术家（如雕刻家）所用的是木料，他们的作品无法耐久保存。同时，这也由于人们了解情况太少，事实上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柏林、里斯本和梵蒂冈的博物馆里藏有不少杰作，非洲人甚至还不知道。 **686**

另一方面，伊费－贝宁文明给我们留下了举世闻名的青铜和黄铜头像。伊费－贝宁的艺术是那样纯粹的自然主义，甚至"非洲学的专家"们也曾否认它们是非洲人所创造。然而，今天人们已经知道，伊费人的艺术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伊格博－乌库人和努佩人的青铜制品证明铸铜技术当时已经传播很广，最近在几内亚－比绍发现的青铜头像也说明这一点。这就在更大的范围上引出一个问题，这种技术和工艺究竟是怎样传播开来的？

还有，在津巴布韦和南部非洲进行发掘，从艺术角度说，又将发现什么呢？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存在大可乐观的希望。

编写《非洲通史》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名单

所述日期指的是参加该委员会的日期

J. F. A. 阿贾伊(J. F. A. Ajayi)教授
(尼日利亚),自1971年起
第六卷主编

F. A. 阿尔布凯克·莫朗(F. A. Albuquer-queMourao)教授
(巴西),自1975年起

A. A. 博亨(A. A. Boahen)教授
(加纳),自1971年起
第七卷主编

布布·阿马(Boubou Hama)阁下
(尼日尔),1971-1978年(已辞职)

M. 布尔(M. Bull)阁下
(赞比亚),自1971年起

D. 查奈瓦(D. Chanaiwa)教授
(津巴布韦),自1975年起

P. D. 柯廷(P. D. Curtin)教授
(美国),自1975年起

J. 德维斯(J. Devisse)教授
(法国),自1971年起

M. 迪富伊拉(M. Difuila)教授
(安哥拉),自1978年起

H. 贾伊特(H.Djait)教授
(突尼斯),自1975年起

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教授
(塞内加尔),自1971年起

J. D. 费奇(J. D. Fage)教授
(联合王国),1971-1981年(已辞职)

M. 法西(M. El Fasi)阁下
(摩洛哥),自1971年起
第三卷主编

J. L. 佛朗哥(J. L. Franco)教授
(古巴),自1971年起

已故 M. H. I. 加拉勒(The late M. H. I. Galaal)先生
(索马里),1971-1981年;1981年逝世

V. L. 格罗塔内利(V. L. Grottanelli)博士,教授
(意大利),自1971年起

E. 哈贝兰德(E. Haberland)教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1971年起

A. 哈普特(Aklilu Habte)博士
(埃塞俄比亚),自1971年起

阿马杜·哈姆帕特·巴(Amadou Hampate Ba)阁下
(马里),1971-1978年(已辞职)

I. S. 哈雷尔(I. S. El-Hareir)博士
(利比亚),自1978年起

I. 赫尔贝克(I. Hrbek)博士
(捷克斯洛伐克),自1971年起
第三卷助理主编

A. 琼斯(A. Jones)博士
(利比里亚),自1971年起

已故阿贝·亚历克西·卡加梅(The late Abbé Alexis Kagame)先生
(卢旺达),1971-1981年;1981年逝世

I. M. 基曼博(I. M. Kimambo)教授
(坦桑尼亚),自1971年起

J. 基-泽博(J. Ki-Zerbo)教授
(上沃尔特),自1971年起
第一卷主编

M. D. 拉亚(M. D. Laya)先生
(尼日尔),自1979年起

A. 列特涅夫(A. Letnev)博士
(苏联),自1971年起

G. 莫赫塔尔(G. Mokhtar)博士
(埃及),自1971年起
第二卷主编

P. 马蒂布瓦(P. Mutihwa)教授
(乌干达),自1975年起

D. T. 尼昂(D. T. Niane)教授
(塞内加尔),自1971年起
第四卷主编

L. D. 恩康科(L. D. Ngcongco)教授
(博茨瓦纳),自1971年起

T. 奥邦加(T. Obenga)教授
(刚果人民共和国),自1975年起

B. A. 奥戈特(B. A. Ogot)教授
(肯尼亚),自1971年起
第五卷主编

C. 拉沃雅纳哈里(C. Ravoajanahary)教授
(马达加斯加),自1971年起

已故 W. 罗德尼(The late W. Rodney)教授
(圭亚那),1979-1980年;1980年逝世

已故 M. 希贝卡(The late M. Shibeika)教授
(苏丹),1971-1980年;1980年逝世

Y. A. 塔利布(Y. A. Talib)教授
(新加坡),自1975年起

已故 A. 特谢拉·达莫塔(The late A. Teixeira da Mota)教授
(葡萄牙),1978-1982年;1982年逝世

T. 齐邦古(T. Tshibangu)主任
(扎伊尔),自1971年起

J. 范西纳(J. Vansina)教授
(比利时),自1971年起

已故 E. 威廉斯(The late E. Williams)博士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76-1978年;1978年辞职;1980年逝世

A. A. 马兹鲁伊(A. A. MaZrui)教授
(肯尼亚)
第八卷主编
非本委员会成员

国际科学委员会秘书处

M. 格莱莱(M. Glélé)
教科文组织文化研究处,法国巴黎米奥利斯街
地址:M. Glélé,
Director, Division of Studies and Dissemination of Cultures,
I, rue Miollis, 75015 Paris, France

作 者 简 历

导　　言　D.T. 尼昂(D. T. Niane, 塞内加尔)；曼丁哥问题专家；发表过一系列关于11至16世纪大帝国统治时期西非的著作；达喀尔L. S. 桑戈尔基金会前主委；研究员。

第 二 章　O. 塞迪(O. Saidi, 突尼斯)；阿尔莫哈德史专家；发表过多种有关马格里布，特别是突尼斯古典历史的著作；现在在突尼斯大学文学院和高等师范学院任教。

第 三 章　M. 塔尔比(M. Talbi, 突尼斯)；伊斯兰问题的专家；曾就伊斯兰宗教与文化的各个方面发表过许多著作和文章；现在在突尼斯大学文学院任教。

第 四 章　I. 赫尔贝克(I. Hrbek, 捷克和斯洛伐克)；非洲历史(特别是西非洲历史)源于阿拉伯人之说的专家，同时也是伊斯兰问题的专家；曾就这两个领域的问题发表过许多著作和文章；现在是布拉格东方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

第 五 章　R. 伊德里斯(R. Idris, 法国)；阿拉伯语言与文学专家；曾讲授过穆斯林世界西部的历史；已去世。

第 六 章　D. T. 尼昂(D. T. Niane)

第 七 章　M. 莱-托尔(M. Ly-Tall, 马里)；马里史专家；发表过许多有关马里帝国的著作；现在在巴马科高等师范学院任教；研究员。

第 八 章　S. M. 西索科(S. M. Cissoko, 塞内加尔)；中世纪廷巴克图史专家；发表过多种有关西非历史的著作；达喀尔文学院助理讲师。

第 九 章　M. 伊扎德(M. Izard, 法国)；沃尔特河流域历史和特别是诸莫西王国历史的专家；发表过许多关于该地区殖民时期之前、殖民时期和近代历史的著作；现任巴黎全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第 十 章　D. 兰格(D. Lange,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苏丹殖民时期之前历史的专家；发表过多种有关该时期的著作；现在在尼亚美大学任教。

第十一章　M. 阿达穆(M. Adamu, 尼日利亚)；豪萨史专家；曾就这个主题发表过一些著作；现在扎里亚的艾哈迈杜·贝洛大学任尼日利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A. 萨利福(A. Salifou, 尼日尔)；豪萨史专家；发表过多种关于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的著作；现在在尼日尔从事教学工作。

第十二章　Y. 佩尔松(Y.Person, 法国)；非洲史，特别是曼丁哥问题的专家；发表过许多关于非洲历史的著作；巴黎第一大学，万神殿神学院教授；已去世。

第十三章　P.基普里(P. Kipre, 科特迪瓦)；科特迪瓦近代史和现代史专家；曾根据口头传说发表过许多文章；现在在阿比让高等师范学院任教。

第十四章　A. F. C. 赖德(A. F. C. Ryder, 联合王国)；西非史专家；发表过许多有关该地区殖民时期之前和殖民时期历史的著作；现任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

第十五章　J. C. 加辛 (J. C. Garcin, 法国)；穆斯林埃及史专家；发表过多种关于马木路克统治下的埃及和穆斯林上埃及历史的论文；现在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的普罗旺斯大学任教。

第十六章	L. 克罗帕赛克(L. Kropáček，捷克和斯洛伐克)；苏丹地区社会、政治和宗教历史专家；发表过多种关于达尔富尔的著作；现在在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东方和非洲学系任教。
第十七章	T. 塔姆拉特(T. Tamrat，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中世纪史专家；发表过多种有关该时期的论文；现在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任教。
第十八章	V. V. 马特维耶夫(V. V. Matveiev，苏联)；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发表过许多关于非洲历史源于阿拉伯人之说的著作；现任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人种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第十九章	C. 埃雷特(C. Ehret，美国)；东非语言学和历史学家；发表过许多关于东非殖民时期之前和殖民时期历史的著作；现在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任教。
第二十章	B. A. 奥戈特 (B. A. Ogot，肯尼亚)；非洲史，特别是东非史的专家；发表过许多关于东非历史和考古的著作和文章；教师、研究员、国际纪念路易斯·利基非洲史前史研究所的前任所长。
第二十一章	B. M. 费根(B. M. Fagan，联合王国)；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发表过许多关于东非和南部非洲铁器时代和石器时代文化的著作；现任圣巴巴拉加州大学的人类学教授。
第二十二章	J. 范西纳(J. Vansina，比利时)；口头传说专家；发表过许多关于赤道非洲和中非洲历史的著作；现在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任教。
第二十三章	L. 恩康科(L. Ngcongco，博茨瓦纳)；南部非洲殖民时期之前历史的专家；发表过多种关于殖民时期之前博茨瓦纳历史的论文；曾在博茨瓦纳大学任教；现任哈博罗内国家研究所所长。
	J. 范西纳(J. Vansina)。
第二十四章	F. 伊索阿维格曼德罗索(F. Esoavelomandroso，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史的专家；发表过多种关于16至18世纪马达加斯加历史的论文；现在在塔那那利佛的文学院任教。
第二十五章	D. T. 尼昂(D.T. Niane)。
第二十六章	J. 德维斯 (J. Devisse，法国)；4至16世纪西北非历史的专家；考古学家；发表过许多关于非洲史的文章和著作；巴黎第一大学，万神殿神学院教授。
	S. 拉比布(S. Labib，埃及)；非洲中世纪史专家；发表过多种关于该时期社会和政治历史的著作；现在在美国犹他大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尔大学任教。
第二十七章	D. T. 尼昂(D. T. Niane)。

参考文献目录

前　言

迳编纂下列参考文献目录，供各国学者作参考用。

本参考文献目录仅包括第4卷引用的著作。列入的条目，凡作者有名有姓者，均按作者名姓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只有在没有作者名姓的情况下才按书名英文字母顺序排列，为了与种类繁多的文献目录编排体系协调一致，所有条目一律以作者姓名为主线，系列书名只作为一项具体内容列在作者姓名之后。与某些参考文献目录的做法不同，每一著作首次列出的日期，只要有可能，都是该书初版日期(阿拉伯语手抄本则是其完成日期)，如此做的目的是要将早期著作和现代版本或译本予以明确区别。只有阿拉伯作者，才在其姓之外同时列出名字，并按第一个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因为他们最为人熟知，或者按文中引用的阿拉伯名字排列；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另条列出同一作者的另一个更为人熟悉的阿拉伯名字，以供参照。

阿拉伯文原本中的人名和书名现均以英文字母音译拼写，一律按照《伊斯兰百科辞典》英文版本中所用体制，此书是迄今所知最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我们也从下列图书馆的书目和文献目录资料中取材：美国国会图书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英国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西北大学梅尔维尔·J.赫斯科维茨图书馆、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图书馆、犹他州立大学中东目录室以及牛津的罗得斯社图书馆。同时，我们也查阅了以下书目和文献目录：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种学文献目录、当代非洲事务文献目录、国际非洲文献目录、国际非洲学会和有关非洲研究的总书目。

期刊名单和缩写

AA　*African Affairs*, London: OUP

AB　*Africana Bulletin*, Warsaw Warsaw University

AEA　*Anuario de Estudios Atlanticos*, Madrid

AEDA　*Archivo Espanol de Arqueolologia*, Madrid

AEO　*Archives d'etudes orientales.*

AESC　*Annales-Economie,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 Paris

AFRCD　*Afrique française: renseignements coloniaux et documents*, Paris: Comitede l'Afrique françaiseet Comite du Maroc

Africa-(L)　*Africa*, London

Africa-(R)　*Africa*, Rome

Africana Linguistica　*Africana Linguistica*, Tervuren: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Africanist　*The Africanist*, Washington DC: Howard University, Association of African Studies

Afrika Museum　Groesbeck, Netherlands

AHES　*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 Paris

AHS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la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AI　*Annales islamologiques*, Cairo

AIEOA　*Annales de l'Institut d'etudesorientales d'Alger*, Algiers

Annales islamologiques

Annales du Midi *Annales du Midi: revue de la France méridionale*, Toulouse

Anthropos *Anthropos: Revue internationale d'éthnologie et de linguistique*, Fribourg

Antiquity *Antiquity*, Gloucester

Arabica *Arabica: Revue d'études arabes*, Leiden: Brill

Archiv Orientalni *Archiv Orientalni, Oriental Archives: Journal of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Prague

Arnoldia *Arnoldia*, Salisbury: National Museums of Rhodesia

ARSP *Archiv für Rechts-und-Sozialphilosophie*, Berlin, Leipzig

AS *African Studies*,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ASAM *Annals of the South African Museum*, Cape Town

ASp *Afrika Spektrum,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moderne Afrikforschung*, Pfaffenhofen: Afrika Verlag

ASPN *Archivio Storico per la Province Napoletane*, Naples

A–T *Africa – Tervuren*, Tervuren

AU *Afrika und Übersee*, Hamburg: Universität

AUA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Abidjan*, Abidjan

AUM *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 Madagascar*, (*Série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Tananarive

Awrāķ *Awrāķ* (Arabic & Spanish texts), Madrid: 1978– Instituto Hispano–Arabe de Cultura

Azania *Azania*,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East Africa

BA *Baessler Archiv*, Berlin: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BAM *Bulletin de l'Académie Malgache*, Madagascar

BARSOM *Bulletin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Bruxelles

Ba-Shiru *Ba-Shiru*,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BCEHSAOF *Bulletin du Comité d'études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Dakar

BCGP *Bolletino Culturale da Guiné Portuguesa*, Bissau

BEO *Bulletin d'études orientales*, Damas: Institut français

BHSN *Bulletin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Ibadan

BIBLB *Boletim Internacional de Bibliografia Luso-Brasileira*, Lisbon: Fondaçâo Calouste Gulbenkian

BIE *Bulletin de l'Institut d'Egypte*, Cairo

(B)IFAN *(Bulletin de l')Institut fondamental d'Afrique noire* (previously: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frique noire), Dakar

BLPHGAM *Bulletin de liaison des professeurs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 d'Afrique et de Madagascar*, Mejec-Yaoundé

BM *Bulletin de Madagascar*, Tananarive

BNR *Botswana Notes and Records*, Gaborone

Boston University Papers in African History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BPH *Bulletin Philosophique et Historique*, Paris: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section d'histoire et de philologie

BRAH *Boletin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Madrid

BSACH *Bulletin of the Society for African Church History*, University of Aberdeen,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CA *Current Anthropology*, Chicago

CEA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The Hague: Mouton

China Review *China Review*, Hong Kong

CHM *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 Paris: Librairie des Méridiens

CJAS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Revue canadienne des études africaines*), Ottawa: Carlet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African Studies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COM *Cahiers d'outre-mer*, Bordeaux: Institut de la France d'outre-mer

CRTSASOM *Compte-rendus trimestriel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Paris

CSIC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s: Madrid

CSSH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Cambridge: CUP

CU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to 1978, Cambridge thereafter

Der Islam *Der Islam: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 Islamischen Orients*, Berlin

EAPH 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

EAZ *Ethnographisch-Archäologische Zeitung*, Berlin

EcHR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ondon, New York: CUP

EHR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ondon: Longman

EM *Etudes maliennes*, Bamako

EP *Etnografia Polska*, Wroclaw: Polska Akademia Nauk, Instytut Historii Kultury Materialny
Ethiopiques *Ethiopiques, Revue socialiste de culture négro-africaine*, Dakar: Fondation Léopold Senghor
Ethnos *Ethnos*, Stockholm: Ethnographical Museum of Sweden
EV *Etudes Voltaïques, Mémoires*, Ouagadougou
FEQ *Far Eastern Quarterly* (late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nn Arbor, Michigan
FHP *Fort Hare Papers*, Fort Hare University
Garcia da Orta *Garcia da Orta*, Lisbon: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GJ *Geographical Journal*, London
GNQ *Ghana Notes and Queries*, Legon
Godo-Godo *Godo-Godo: Bulletin de l'Institut d'histoire d'art et d'archéologie africaines*, Université d'Abidjan
HAJM *History in Africa: a Journal of Method*, Waltham, Mass.
Hespéris *Hespéris*, Rabat: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marocaines
HJA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Harvard
H-T *Hespéris–Tamuda*, Rabat, Université Mohammed V,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humaines
IAI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IFAN see *BIFAN*
IJAH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previously: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Center
IIALC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RCB Institut royal colonial belge
JA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JAH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London, New York: OUP
JAI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London
JAL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London
JAO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New Haven
JAS *Journal of the African Society*, London
JATBA *Journal d'agriculture traditionnelle et de botanique appliquée*, Paris: Muse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JEA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London
JES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Addis Ababa
JESHO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London
JHSN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Ibadan
JMAS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London: CUP
JMBRAS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ingapore
JNH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Afro-American Life and History
JRAI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JRASB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Calcutta
JSA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fricanistes*, Paris
JSAIMM *Journal of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Mining aud Metallurgy*, Johannesburg
JSS *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KO *Kongo Overzee*, Antwerp
KS *Kano Studies*, Kano, Nigeria
Kush *Kush, a Journal of the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s*, Khartoum
L'Homme *L'Homme: Cahier d'éthnologie, de géographie et de linguistique*, Paris
MA *Moyen âge*, Paris
Man *Man*, London
MIO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Orientforschung*, Berli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
MNMMR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Museums and Monuments of Rhodesia*, Salisbury
MSOS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ie Friedrich Wilhelm Universität zu Berlin*
Muslim Digest *Muslim Digest*, Durban
MZ *Materialy Zachodnio-Pomorskie*, Warsaw
NA *Notes africaines*, Dakar: IFAN
NAk *Nyame Akuma*,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Nature *Nature*, London, New York
NC *Numismatic Chronicle*, London: Numismatic Society
NED *Notes et études documentaires*, Paris: Direction de la Documentation

OA *Oriental Art*, London
OCP *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 Rome
Odu *Odu: Journal of West African Studies* (previously: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Ife; preceded by *Journal of Yoruba and Related Studies*, Ibadan), Ife: University of Ife
OL *Oceanic Linguistics*,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OSA *Omaly sy anio*, Tananarive: University of Madagascar
OU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 *Présence africaine*, Dakar
Paideuma *Paideuma, Mitteilungen zur Kulturkunde*, Frankfurt-am-Main
PAP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York
RASGBI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RBCAD *Research Bulletin of the Centre of Arabic Documentation*, Ibadan
RDM *Revue des deux mondes*, Paris
REAA *Revista Espanola de Anthropologia Americana*, Madrid: Universidad
RES *Revue d'ethnographie et de sociologie*, Paris
RGM *Revue de géographie du Maroc*, Rabat: University Faculty of Geography
RH *Revue historique*, Paris: PUF
RHC *Revista de Historia Canarias*, Las Palmas
RHCF *Revue de l'histoire des colonies françaises* (later: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Paris
RHCM *Revue d'histoire et de civilisation du Maghreb*, Algiers: Société Historique Algérienne
RHES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Paris
RHSP *Revista de Historia*, São Paulo
RIBLA *Revue de l'Institut des belles lettres arabes*, Tunis
RNADA *Rhodesian Native Affairs, Departmental Annual*, Salisbury
ROMM *Revue de l'occident musulman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Aix-en-Provence
RRAL *Rendiconti della Reale dell'Accademia dei Lincei*, Classe de Scienze Morale, Storiche e Filologiche
RS *Revue sémitique*, Paris
RSACNM *Recueil de la Société archéologique de Constantine, notes et mémoires*, Constantine
RSE *Rassegna di Studi Etiopici*, Rome
RSO *Re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Rome: Scuola Orientale dell'Universita
SAAB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Cape Town
Saeculum *Saeculum*, Freiburg
SAJ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Johannesburg
Sankofa *Sankofa*, Legon (Ghana)
Savanna *Savanna: a Journal of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ciences*, Zaria: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Scientia *Scientia, Rivista di Scienza*, Milan
SHG *Studia Historica Gandensia*, Ghent
SI *Studia Islamica*, Paris
SM *Studi Magrebini*, Naples
SNED Société nationale d'édition et de diffusion, Algiers
SNR *Sudan Notes and Records*, Khartoum
SOAS London Universit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 Pretoria
SS *Sudan Society*, Khartoum: Khartoum University
Swahili *Swahili*, Nairobi: East African Swahili Committee
SWJA *South 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later: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Taloha *Taloha, Revue du Musée d'art et d'archéologie*, Tananarive
Tamuda *Tamuda*, Rabat
Tantara *Tantara*, Tananarive: Société d'histoire de Madagascar
THSG *Transaction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Ghana* (previously *Transactions of the Gold Coast and Togoland Historical Society*), Legon
Times *The Times*, London
TJH *Transafrican Journal of History*, Nairobi: East African Literature Bureau
TNR *Tanzania Notes and Records* (formerly *Tanganyika Notes & Records*), Dar es Salaam
TNYAS *Transac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New York
T'oung Pao *T'oung Pao,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sinologie*, Leiden: Brill
UC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fahamu *Ufahamu, Journal of the African Activist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UJ *Uganda Journal*, Kampala

Universitas *Universitas*, Legon: University of Ghana
WA *World Archaeology*, Henley-on-Thames
WAAN *West African Archaeological Newsletter*, Ibadan
WAJA *West Af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Ibadan
Zaïre *Zaïre*, Kinshasa
ZDMG *Zeitung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Leipzig

Bibliography

'Abd al-'Azīz b. Muḥammad b. Ibrahīm al-Ṣinhādjī al-Fishtālī (16th cent.) *Manāhil al-Safā' fī akhbār al-Mulūk al-Shurafā*; 1964 ed. 'Abd Allāh Gannun (Tetuan).

'Abd al-Bāsiṭ b. Khalīl, al-Malati (15th cent.) *al-Raud, al-Bāsim*; 1936 ed. and French transl. R. Brunschvig, *Deux récits de voyage inédits en Afrique du nord au 15e siècle* (Paris: Larose).

'Abd al-Raḥīm, M. (1970) 'Arabism, Africanism and self-identification in the Sudan', *JMAS*, 8, 2, pp. 233–49.

'Abd al-Rahmān b. 'Abd Allāh, al-Sa'dī: see al-Sa'dī

'Abd al-Wāḥid al-Marrākushī (1224) *al-Mu'djib fī talkhīs Akhbār al-Maghrib*, 1963 ed. M. S. al-Iryan (Cairo); 1847, 1881, Eng. transl. R. Dozy, *The history of the Almohads* (Leiden: Brill); 1893 French transl. E. Fagnan (Algiers); 1955 Spanish transl. A. Huici Miranda (Tetuan: Editora Marroqui).

Abitbol, M. (1979) *Tombouctou et les Arma: de la conquête marocaine du Soudan nigérien en 1591 à l'hégémonie de l'empire peul du Macina en 1833*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Abraham D. P. (1961) 'Maramuca: an exercise in the combined use of Portuguese records and oral tradition', *JAH*, 2, 2, pp. 211–25.

Abū 'Abd Allāh Muḥammad al-Wazīr al-Andalusī (16th cent.) *al-Ḥulal al-sundusīya fī 'l akhbār al-tunisīya*; 1870 edn and transl., *A history of Africa, especially of Tunis*, 4 vols (Tunis).

Abubakar, S. (1980) 'Peoples of the upper Benue basin and the Bauchi plateau before 1800', in O. Ikime (ed.) *Groundwork of Nigerian History* (Ibadan/London: Heinemann), pp. 165–86.

Abu-'l-Fidā (14th cent.) *al-Mukhtaṣar ta'rīkh al-bashar*; 1869–70 edn, 2 vols (Istanbul); 1907 edn (Cairo).

Abu'l-Maḥāsin b. Tagrībīrdī (15th cent.) *al-Nudjūm al-Zāhira fī Mulūk Miṣr wa 'l Ḳāhira*; Eng. transl. W. Popper, *History of Egypt (1382–1469 A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ublications in Semitic Philology, 13–14, 17–19, 22–3).

Abun-Nasr, J. M. (1971, 1975) *A history of the Maghrib* (London: CUP).

Abū 'Ubayd al-Bakrī: see al-Bakrī

Adams, J. (1904) *Légendes historiques du pays de Nioro* (Paris: Challamel) (no further details available).

Adams, W. Y. (1965)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 excavations at Meinarti, 1963–1964', *Kush*, 3, pp. 148–76.

Adams, W. Y. (1966) 'Post-Pharaonic Nubia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y, 3', *JEA*, 52, pp. 147–62.

Adams, W. Y. (1967)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Nubian cultural history', *SNR*, 48, pp. 1–32.

Adamu, M. (1976) 'The spread of Hausa culture in West Africa', *Savanna*, 5, 1, pp. 3–13.

Adamu, M. (1978) *The Hausa factor in West African history* (Zaria: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Press and OUP).

Adamu, M. (1979) 'Distribution of trading centres in the central Sudan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Y. B. Usman (e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koto caliphate: the Sokoto Seminar Papers* (Zaria: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for the Sokoto Caliphate Bureau), pp. 59–104.

Adamu, M. (forthcoming a) *The Hausa kingdom of Yawuri* (Zaria: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Press).

Adamu, M. (forthcoming b) *History: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Abdullahi Smith* (Zaria: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Press).

Adeleye, R. A. (1971) 'Hausaland and Bornu, 1600–1800',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Vol. 1, pp. 485–530.

Adetugbo, A. (1973) 'The Yoruba language in Yoruba history', in S. O. Biobaku (ed.), *Sources of Yoruba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175–204.

Aḥmad b. Mādjid al-Nadjdī: see Ibn Mādjid al-Dīn Aḥmad

Ahmad, A. A. R. (1973) *La femme au temps des mamlouks en Egypte*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Textes arabes et études islamiques, 5).

Ahmed Ibn Fartua: see Ibn Furṭūwa, Aḥmad

Ajayi, J. F. A. and Crowder, M. (eds) (1971, 1974) *History of West Africa*, 2 vols (London: Longman).
Alagoa, E. J. (1972) *A history of the Niger delta: 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Ijo oral tradition* (Ibadan: University Press).
Albatenius: see al-Battānī
Alberuni: see al-Bīrūnī
Alfonso X, el Sabio, King of Castile and Leon (n.d.) *Libros de acedrex dados e tablas*; 1941 ed. Arnald Steiger, *Das Schachzabelbuch König Alfons des Weisen* (Geneva: Droz).
Alkali, M. B. (1969) 'A Hausa community in crisis: Kebbi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published M.A. dissertation,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Zaria).
Allan, W. (1965) *The African husbandman* (Edinburgh: Oliver and Boyd;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Alvares d'Almada, A. (1594) *Tratado Breve dos Rios de Guiné*; 1946 Portuguese ed. L. Silveira (Lisbon); 1842 French transl. V. de Santaren (no further details available).
Alvares d'Almada, A. (16th cent.) *Asia*; 1934 edn (London: Hakluyt Society).
Alvares, F. (16th cent.) 1881 ed. and Eng. transl. Lord Stanley of Alderley, *Narrative of the Portuguese embassy to Abyssinia during the years 1520–1527* (London. Hakluyt Society).
Arianoff, A. d' (1952) *Histoire des Bagesera, souverains du Gisaka* (Brussels: Institut royal colonial belge;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class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24, 3).
Arié, R. (1973) *L'Espagne musulmane au temps des Nasrides (1232–1492)* (Paris: de Boccard).
Arkell, A. J. (1936–46) 'Darfur antiquities', *SNR*, 19, 1, pp. 301–11; 20, 1, pp. 91–105; 27, 3, pp. 185–202.
Arkell, A. J. (1950) 'Gold Coast copies of fifth to seventh century bronze lamps', *Antiquity*, 24, 93, pp. 38–40.
Arkell, A. J. (1951–2) 'The history of Darfur: 1200–1700 A.D.', *SNR*, 32, pp. 37–70 and 207–38; 33, pp. 129–55, 244–75.
Arkell, A. J. (1959)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Darfur in its relation to other cultures and to the Nilotic Sudan', *SNR*, 40, pp. 44–7.
Arkell, A. J. (1960) 'A Christian church and monastery at Ain Farah Darfur', *Kush*, 7, pp. 115–19.
Arkell, A. J. (1961) *A history of the Sud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21* (London: Athlone Press).
Arkell, A. J. (1963)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 Nubia in the Chad area between AD 800–1200', *Kush*, 11, pp. 315–19.
Arnett, E. J. (1910) 'A Hausa chronicle: (*Daura Makas Sariki*)', *JAS*, 9, 34, pp. 161–7.
Arveiller, R. (1963)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termes de voyage en français 1505–1722* (Paris: d'Artrey).
Ashtor, E. (1971) *Les métaux précieux et la balance des paiements du Proche-Orient à la basse époque* (Paris: SEVPEN).
'Ashūr, Sa'īd 'Abd al-Fattāh (1965) *al-'Asr al mamālīkī fī misr war al-shām: The Mameluke period in Egypt and Syria* (Cairo).
Asín Palacios, M. (1941) *Huellas del Islam: Sto Tomás de Aquino* (Madrid: Espasa-Calpe).
al-Athīr: see Ibn al-Athīr, 'Izz al-Dīn
Avempace: see Ibn Badjdja
Averroës: see Ibn Rushd
Axelson, E. (1973a) *Congo to Cape: early Portuguese explorers* (London: Faher).
Axelson, E. (1973b) *Portuguese in south-east Africa, 1488–1600* (Johannesburg: Struik).
Ayalon, D. (1953–4) 'Studies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Mamluk army', *BSOAS*, 15, 2, pp. 203–28, 3, pp. 448–76; 16, 1, pp. 57–90.

Badawi, A. R. (1972)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en Islam*, 2 vols (Paris: Vrin).
Baikie, W. B. (1856) *Narrative of an exploring voyage up the rivers Kwora and Binue* (London: Murray).
al-Bakrī (Abū 'Ubayd al-Bakrī, 'Abd Allāh b. 'Abd al-'Azīz b. Muḥ h. Ayyub) (11th cent.) *Kitāb al-Masālik wa 'l Mamālik*; 1911, 1913 ed. and French transl. MacG. de Slane,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Algiers: Jourdan; Paris: Geuthner); 1965 reprint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1968 ed. 'Abd al-Raḥmān (Beirut).
Balfour-Paul, H. G. (1955)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Darfur* (Khartoum: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 Museum pamphlet 3).
Balogun, S. A. (1980) 'History of Islam up to 1800', in O. Ikime (ed.) (1980), q.v.
Barbosa, D. (1812); 1918, 1921, edn and Eng. transl. *The book of Duarte Barbosa: an account of the countries bordering o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ir inhabitants*, 2 vol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Barbour, N. (1974) 'The Emperor Frederick II, king of Jerusalem and Sicily, and his relations with the Muslims', in J. M. Barral (ed.), *Orientalia hispanica* (Leiden: Brill), Vol. 1, pp. 77–95.
Barges, J. J. L. (1859) *Tlemcen, ancienne capitale du royaume de ce nom* (Paris: Duprat).

Barges, J. J. L. (1877) *Complément à l'histoire des Beni-Zeiyan, rois de Tlemcen* (Paris: Leroux).
Barradas, L. A. (1967) *O sul de Moçambique no roteiro de Sofala do piloto Ahmad ibn-Madjid* (Coimbra: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Agrupamento de estudos de cartografia antiga, 20).
Barros, J. de (1552) *Decadas da Asia*, Vol. 1; 1937 partial Eng. transl. in G. R. Crone, q.v.
Barth, H. (1857, 1858) German edn, *Sammlung und Bearbeitung*, (including Centralafrikanischer Vokabularien), 3 parts in 2 (Gotha: Perthes); Eng. edn,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 and Central Africa; being a journal of an exploration undertaken under the auspices of HBM's government in the years 1849–1855*, 5 vols (London: Longman); 1965 Eng. reprint, 3 vols (London: Cass).
Barth, H. (1965a) 'Authenticity and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discovery of Bornu', in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1965 edn (see above), Vol. 2, pp. 15–35.
Barth, H. (1965b) 'Chronological table, containing a list of the Sefuwa, or kings of Bornu', in *Travels and discoveries*, 1965 edn (see above), Vol. 2, pp. 581–605.
Bathily, I. D. (1961) 'Notices socio-historiques sur l'ancien royaume Soninké de Gadiage', *BIFAN*, B, 31, 1, pp. 31–105.
Batran, A. A. (1973)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ography of Shaikh ... Al-Maghili, Al-Tilimsani', *JAH*, 14, 3, pp. 381–94.
al-Battānī, Abū 'Abd Allāh Muhammad b. Djābir, also known as Albatenius (c. 900) *Kitāb al-Zidj*; 1896 edn of astronomical tables, *Le tabelle geografiche d'al-Battānī* (Turin: Bona); 1899, 1903, 1907, ed. and Latin transl. C. A. Nallino, *al-Battānī sive Albatenii opus astronomicum*, 3 vols (Milan: U. Hoepliurn).
Baumann, H. (?1948) 1957, 1967 French transl. L. Hamburger, *Les Peuples et les civilisations de l'Afrique*, with French transl. of D. Westermann, 'Les langues et l'éducation' (Paris: Payot).
Baumann, H. (1956) 'Die Frage der Steinbauten und Steingräber in Angola', *Paideuma*, 6, 3, pp. 118–51.
Bautier, H. R. (1955) 'L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ntre l'Europe et l'Afrique du nord et l'équilibre économique méditerranéen du 12e au 14e siècle', *BPH*, pp. 399–416.
Bayle des Hermens, R. de (1972) 'Aspects de la recherche préhistorique en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A-T*, 18, 3–4, pp. 90–103.
Beattie, J. (1960) *Bunyoro: an African kingdom* (New York: Holt).
Beaujouan, G. (1969) *L'astronomie dans la péninsule ibérique à la fin du Moyen Age* (Coimbra: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Agrupamento de estudos de cartografia antiga, 24).
Beaumont, P. and Schoonraad, M. (1971) 'The Welgelegen shelter, eastern Transvaal', in *Rock paintings of Southern Africa*, *SAJS*, special issue no. 2, pp. 62–9.
Becker, C. H. (1910) 'Zur Geschichte des östlichen Sudan', *Der Islam*, 1, pp. 153–77.
Becker, C. H. (1913) 'Leo Frobenius und die Brille des Islam', *Der Islam*, 4, pp. 303–12.
Bedaux, R. M. A. (1972) 'Tellem: reconnaissance archéologique d'une culture de l'Ouest africain au Moyen Age: recherches architectoniques', *JSA*, 42, 2, pp. 103–85.
Bedaux, R. M. A. (1974) 'Tellem: reconnaissance archéologique d'une culture, de l'Ouest africain au Moyen Age: les appuie-nuques, *JSA*, 44, 1, pp. 7–42.
Bedaux, R. M. A. (1977) 'Tellem', *Afrika Museum* (Groesbeck, Netherlands).
Bel, A. (1903) *Les Bénou Ghânya; derniers représentants de l'empire almoravide et leur lutte contre l'empire almohade* (Paris: Leroux; 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africaine de l'école des lettres d'Alger, 27).
Bel, A. (1937) 'Les premiers émirs mérinides et l'Islam', in *Mélanges de géographie et d'orientalisme offerts à E. F. Gautier* (Tours: Arrault) pp. 34–44.
Bel, A. (1938) *La religion musulmane en Berbérie: esquisse d'histoire et de sociologie religieuses* (Paris: P. Geuthner).
Bello, M.: see Muhammad Bello, M.
Bender, M. L. (ed.) (1976) *Language in Ethiopia* (London, OUP).
Béraud-Villars, J. M. E. (1942) *L'empire de Gâo: un état soudanais aux 15e et 16e siècles* (Paris: Plon).
Bernus, S. and Gouletquer, P. (1976) 'Du cuivre au sel: recherches ethno-archéologiques sur la région d'Azelik (campagne 1973–1975)', *JSA*, 46, 1–2, pp. 7–68.
Bernus, S., Gouletquer, P. and Kleinman, D. (1976) 'Die Salinen von Tegidda-n-tesemt (Niger)', *EAZ*, 17, 2, pp. 209–36.
Bertrandon de la Broquière (1892) tr. C. Schefer, *Le voyage d'outre-mer de Bertrandon de la Broquière*, (Paris: Leroux).
Betbedder, P. (1971) 'The kingdom of Buzinza', *CHM*, 13, 4, pp. 736–62.
Bezzola, R. (1944–63) *Les origines et la formation de la littérature courtoise en Occident: 500–1200*, 5 vols (Paris: Champion).
'Bibliographie de l'histoire des grandes routes maritimes', (1968–73) in: *Boletim internacional de bibliografia luso-brasileira* (Lisbon: Fo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
Allemagne: 9, 2, pp. 189–252

Danemark: 9, 2, pp. 254–72
France: 9, 2, pp. 274–352; 9, 3, pp. 433–57
Pologne: 9, 3, pp. 457–71
Etats-Unis: 10, 4, pp. 509–62; 11, 1, pp. 5–153
Espagne: 13, 1, pp. 7–149; 13, 3, pp. 373–446
Grèce: 13, 3, pp. 447–98
Royaume-Uni: 14, 1, pp. 5–162, 14, 3, pp. 359–544, 14, 4, pp. 673–711

Biebuyck, D. P. (1973) *Lega culture; art, initiation, and moral philosophy among a Central African peop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ikunya, P. (1927) *Ky'Abakama ba Bunyoro: History of Bunyoro* (London: Sheldon Press).

Birkeli, E. (1936) *Les Vazimba de la côte ouest de Madagascar: notes d'ethnographie* (Tananarive: Imprimerie Moderne de l'Emyrne;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malgache, fasc. 22).

Birmingham, D. (1965) 'The dat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Imbangala invasion of Angola', *JAH*, 6, 2, pp. 143–52

Birmingham, D. (1966) *Trade and conflict in Angola: the Mbundu and their neighbou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ortuguese, 1483–179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irmingham, D. and Marks, S. (1977) 'Southern Africa', in R. Oliver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London: CUP), Vol. 3, pp. 521–620.

al-Bīrūnī, Abu 'l-Rayhān Muḥammad b. Aḥmad (1030) *Kitāb Ta'rīkh al-Hind*; 1887 ed. E. Sachau; 1888 Eng. transl. E. Sachau, *Alberuni's India; an account of the religion, philosophy, literature, geography . . . of India about AD 1030* (London); 1964 reprint (Delhi: S. Chand).

Bisson, M. S. (1975) 'Copper currency in Central Africa: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WA*, 6, 3, pp. 276–92.

Blount, B. and Curley, R. T. (1970) 'The southern Luo languages: a glotto-chr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JAL*, 9, 1, pp. 1–18.

Boahen, A. A. (1974) 'Who are the Akan?' in Bonduku Seminar Papers, q.v.

Boelaert, E. (1957–8) *Lianja-verhalen*, 2 vols (Tervuren: Annales du musée royal du Congo belge: Sciences de l'homme: Linguistique, 17–19).

Boiteau, P. (1958)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nation malgache* (Paris: Ed. sociales).

Boiteau, P. (1974) 'Les droits sur la terre dans la société malgache pré-coloniale', in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aris: Ed. sociales), pp. 135–69.

Bonduku Seminar Papers (1974) 'Colloque inter-universitaire Ghana – Côte-d'Ivoire: Les Populations communes de la Côte-d'Ivoire et du Ghana' (Bonduku: University of Abidjan).

Bonnassié, P. (1975–6) *La Catalogne du milieu de 10e à la fin du 11e siècle: croissance et mutations d'une société*, 2 vols (Toulouse: University of Toulouse-le-Mirail, Série A, 23, 29).

Boulègue, J. (1968) 'La Sénégambie du milieu du 15e siècle au début du 17e siècl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Dakar).

Boulègue, J. (1972) *Les luso-africains de Sénégambie, 16e–19e siècle* (Dakar: University of Dakar, Department of History, Travaux et documents, 1).

Boulnois, J. and Hama, B. (1954) *Empire de Gâo: histoire, coutumes et magie des Sonrai* (Paris: Maisonneuve).

Bourouiba, R. (1972) *L'Art musulman en Algérie* (Algiers: Sned).

Bourouiba, R. (1973) 'La Doctrine almohade', *ROMM*, 13–14, pp. 141–58.

Bourouiba, R. (1976) 'Le problème de la succession de 'Abd al-Mumin', *RHCM*, 13, pp. 23–9.

Bousquet, G. H. (1954) *L'Islam maghrébin;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générale de l'Islam* (Algiers: Maison des livres).

Bovill, E. W. (1927) 'The Moorish invasion of the Sudan', *JAS*, 26, pp. 245–62, 380–7; 27, pp. 47–56.

Bovill, E. W. (1933) *Caravans of the old Sahar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Sudan* (London: OUP for IIALC); revised edn 1968, *The golden trade of the Moors* (London: OUP).

Boxer, C. R. (1963) *Race relations in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empire, 1415–182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Brasio, A. D. (1952–71) *Monumenta missionaria africana: Africa ocidental*, 12 vols (Lisbon: 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

Brasseur, G. (1968) *Les Etablissements humains au Mali* (Dakar: IFAN; Mémoires, 83).

Braudel, F. (1946) 'Monnaies et civilisations: de l'or du Soudan à l'argent d'Amérique: un drame méditerranéen', *AESC*, I, pp. 9–22.

Bréhier, E. (1971) *La Philosophie du Moyen Age* (Paris: Albin Michel).

Brett, M. (1972) 'Problem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Maghrib in the light of some recent publications', *JAH*, 13, 3, pp. 489–506.

Brignon, J., Amine, A., Boutaleb, B., Martinet, G. and Rosenberger, B. (1967) *Histoire du Maroc* (Paris: Hatier).

British Museum (1877) *Catalogue of the Ethiopic manuscripts*: see Wright, W. (ed.)

Brock, B. (1968) 'The Nyiha', in A. Roberts (ed.), *Tanzania before 1900* (Nairobi: EAPH), pp. 59–82.

Broecke, P. van den (1605–14); 1842 French transl., 'Voyages au Cap Vert', in C. A. Walcknaer (ed.), *Collection des relations de voyages par mer et par terre ... depuis 1400 jusqu'à nos jours*, 21 vols (Paris: Walcknaer), Vol. 2, pp. 300–5; 1880 Eng. transl. Charles, *Stirring adventures in African travel* (no further details available).

Bruce, James (1790), *Travels to discover the source of the Nile in the years 1768, 1769, 1770, 1771, 1772, 1773*; 1964 reprin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Brunschvig, R. (1940, 1947) *La Berbérie orientale sous les Hafsides: des origines à la fin du 15e siècle*, 2 vols (Paris: Maisonneuve).

Brunschvig, R. (1948) *La Tunisie dans le haut Moyen Age: sa place dans l'histoire*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Bucaille, R. (1975) 'Takadda, pays du cuivre', *BIFAN*, B, 37, 4, pp. 720–78.

Buchanan, C. A. (1974) *The Kitara complex: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western Uganda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Bloomington).

Budge, E. A. W. (ed.) (1928) *The books of the saints of the Ethiopian Church, Mashafa Sĕnkĕsâr*, 4 vols (London: CUP).

Burssens, H. (1958) *Les Peuplades de l'entre Congo–Ubangi: Ngbandi, Ngbaka, Mbandja, Ngombe et Gens d'Eau* (Tervuren: Annales du Musée royal du Congo belge, sciences de l'homme. Monographies ethnographiques, 4).

Buzurg b. Shariyār (10th cent.) *Kitāb 'Adjā'ib al Hind*; 1883 ed. P. A. van der Lith (Vol. 1) and 1886 French transl. M. Devic (Vol. 2), *Livre des merveilles d'Inde* (Leiden: Brill).

Ca da Mosto, A. da (15th cent.) 1895 French transl., *Relations des voyages à la côte occidentale de l'Afrique d'Alvise da Ca' da Mosto, 1455–1457* (Paris, Leroux); 1937 ed. and Eng. transl. G. R. Crone (q.v.); 1948 Italian text with Portuguese transl., *Viagens de Luís de Cadamosto e de Pedro de Sintra* (Lisbon: Academia portuguesa da história).

Cahen, C. (1960) 'Ayyūbids', in *Encyclopaedia of Islam* (q.v.), new edn, Vol. 1, pp. 796–807.

Cahen, C. (1965) 'Douanes et commerces dans les ports méditerranéens de l'Egypte médiévale d'aprés le Minhadj d'al-Makhzumi', *JESHO*, 7, 3, pp. 217–314.

Callet, R. P. (ed.) (1908) *Tantara my andriana eto Madagascar: documents historiques d'après les manuscrits malgaches*, 2 vols (Tananarive: Imp. officielle).

Calonne-Beaufaict, A. de (1921) *Azande; introduction à une ethnographie générale des bassins de l'Ubangi–Uele et de l'Aruwimi* (Brussels: Lamertin).

Campbell, D. E. H. (1926) *Arabian medicin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iddle Ages*, 2 vol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Canard, M. (1939–41) 'Relations entre les Mérinides et las Mamelouks au 14e siècle', *AIEOA*, 5, pp. 41–81.

Carbou, H. (1912) *La région du Tchad et du Oudai*, 2 vols (Paris: Leroux; University of Algiers,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humaines, 47–8).

Cardinall, A. W. and Tamakloe, E. F. (1931, 1970) *Tales told in Togoland, by A. W. Cardinall. To which is added: The mythical and traditional history of Dagomba, by E. F. Tamakloe* (London: OUP).

Carreira, A. (1972) *Cabo Verde: formação e extinção de uma sociedade excravocrata (1460–1878)* (Lisbon: Memorias do centro de estudos da Guine portuguesa, 24).

Carreira, A. (1978) *Notas sobre o tráfico português de excravos: circunscritos a costa ocidental africana.* (Lisbon: Universidade Nova, ciencias humanas e sociais).

Carrère, C. (1967) *Barcelone, centre économique à l'époque des difficultés, 1380–1462*, 2 vols (Paris: Mouton).

Casciaro, J. M. (1969) *El diálogo teológico de Santo Tomás con musulmanes y judíos* (Madrid: CSIC).

Castries, H. de (1923) 'La conquête du Soudan par El-Mansour', *Hespéris*, 3, pp. 433–88.

Caton-Thompson, G. (1931) *The Zimbabwe culture: ruins and reac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edn (London: Cass).

Cavazzi, G. A. (1965) *Descrição histórica dos três reinos do Congo, Matamba e Angola, de João António Cavazzi de Montecúccolo, G. M. de Leguzzano* (Lisbon: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Agrupamento de estudos de cartografia antiga, Secção de Lisboa, Publicações, 2).

Cerone, F. (1902–3) 'La politica orientale di Alphonso di Aragona', *ASPN*, 27, pp. 31–93; 28, pp. 154–212.

Cerulli, E. (1931) *Documenti arabi per la storia dell'Etiopia* (Rome: Memorie dell'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classe di scienze morali, storiche e filologiche, serie 6, 4, 2).
Cerulli, E. (1941) 'Il sultanato della Scioa, nel secolo XIII secondo un nuovo documento storico', *RSE*, 1, pp. 5–42.
Cerulli, E. (1943, 1947) *Etiopi in Palestina: storia della communita etiopica di Gerusalemme*, 2 vols (Rome: Lib. dello stato).
Cerulli, E. (1949) *Il 'Libro della scala' e la question delle fonti arabo-spagnole della Divina Commedia* (Vatican City: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Cerulli, E. (1956)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etiopica* (Rome, Nuova academia editrice).
Cerulli, E. (1957, 1959, 1964) *Somalia: scritti vari editi ed inediti*, 3 vols (Rome: Amministrazione Fiduciaria Italiana della Somalia).
Césard, E. (1927) 'Comment les Bahaya interprètent leurs origines', *Anthropos*, 22, pp 440–65.
Césard, E. (1937) 'Le Muhaya (l'Afrique orientale)', *Anthropos*, 32, pp. 15–60.
Chanaiwa, D. (1980) 'Historical traditions of southern Africa', in Unesco (1980b), (q.v.), pp. 25–44.
Chapelle, J. (1957) *Nomades noirs du Sahara* (Paris: Plon).
Chapman, S. (1967) 'Kantsyore Island', *Azania*, 2, pp. 165–91.
Charsley, S. R. (1969) *The princes of Nyakyusa* (Nairobi: EAPH for Makerer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Chaunu, P. (1969) *L'expansion européene du 13e au 15e siècle* (Paris: PUF).
Cherbonneau, A. (1854–5) 'Essai sur la littérature arabe au Soudan d'après le *Tekmilet ed dibadji* d'Ahmed Baba le Tombouctien', *RSACNM*, pp. 1–42.
Chéron, G. (1924) 'Contributions à l'histoire du Mossi: traditions relatives au cercle de Kaya', *BCEHSAOF*, 7, 4, pp. 634–91.
Childs, G. (1964) 'The kingdom of Wambu (Huambo): a tentative chronology', *JAH*, 5, 3, pp. 365–379.
Chittick, H. N. (1959) 'Notes on Kilwa', *TNR*, 53, pp. 179–203.
Chittick, H. N. (1961) *Kisimani Mafia: excavations at an Islamic settlement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Dar es Salaam: Government Printer).
Chittick, H. N. (1963a) 'Kilwa and the Arab settlement of the East African coast', *JAH*, 4, 2, pp. 179–90.
Chittick, H. N. (1963b) 'The last Christian stronghold in the Sudan', *Kush*, 11, pp. 264–72.
Chittick, H. N. (1965) 'The Shirazi colonisation of East Africa', *JAH*, 6, 3, pp. 275–94.
Chittick, H. N. (1966) 'Kilwa: a preliminary report', *Azania*, 1, pp. 1–36.
Chittick, H. N. (1967a) 'L'archéologie de la côte occidentale africaine', in P. Vérin (ed.), *Arabes et islamisés à Madagascar et dans l'Océan indien* (Tananarive: Revue de Madagascar), pp. 21–38.
Chittick, H. N. (1967b) 'Discoveries in the Lamu archipelago', *Azania*, 2, pp. 37–68.
Chittick, H. N. (1968) 'The coast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Portuguese', in B. A. Ogot, (ed.), *Zamani: a survey of East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EAPH), pp. 98–114.
Chittick, H. N. (1969) 'A new look at the history of Pate', *JAH*, 10, 3, pp. 375–91.
Chittick, H. N. (1970) 'East African trade with the Orient', in D. S. Richard (ed.), *Islam and the trade of Asia* (Oxford: Cassir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p. 97–104.
Chittick, H. N. (1971) 'The coast of East Africa', in P. L. Shinnie (ed.), *The African Iron 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108–41.
Chittick, H. N. (1974) *Kilwa: an Islamic trading city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2 vols (Nairobi: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 Memoirs, 5; London: distrib. by Thames and Hudson).
Chittick, H. N. and Rotberg, R. I. (eds) (1975) *East Africa and the Orient: cultural syntheses in precolonial times*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Africana Publishing Co.).
Chittick, H. N. with Shinnie, P. L.: see Shinnie, P. L. and Chittick, H. N. (1961)
Chojnacki, S. (1971) 'Notes on art in Ethiopi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 inquiry into the unknown', *JES*, 9, 2, pp. 21–77.
Chou Yi Liang (1972) 'Early contact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GNQ*, 12, 6, pp. 1–3.
Chrétien, J. P. and Coifard, J. L. (1967) 'Le Burundi', *NED*, 3364.
Cissé, Y. (1964) 'Notes sur les sociétés de chasseurs malinkés', *JSA*, 34, 2, pp. 175–226.
Cissoko, S. M. (1966) *Histoir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Moyen Age et temps modernes, 7e siècle–1850*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Cissoko, S. M. (1968) 'Famines et épidémies à Tombouctou, et dans la boucle du Niger du 16e au 18e siècle', *BIFAN*, B, 30, 3, pp. 806–21.
Cissoko, S. M. (1969) 'La royauté (mansaya) chez les Mandingues occidentaux d'après leurs traditions orales', *BIFAN*, B, 31, 2, pp. 325–38.
Cissoko S. M. (1972) paper presented at Mandingo conference, London.

Cissoko, S. M. (1975) *Tombouctou et l'empire Songhay: épanouissement du Soudan nigérien aux 15e–16e siècles*. (Dakar: Nouvelles éditions africaines)
Cissoko, S. M. (1981a) 'De l'organisation politique du Kabu'; and (1981b)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s Mandingues de l'ouest'; both in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ur les traditions orales du Gabu* (Dakar: Ethiopiques, Numéro special, October 1981), pp. 195–206, 73–92.
Clark, J. D. (1970) *The prehistory of Africa* (London/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Cohen, D. W. (1970) 'A survey of interlacustrine chronology', *JAH*, 11, 2, pp. 179–202.
Cohen, D. W. (1972)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of Busoga, Mukama and Kintu* (Oxford: Clarendon Press).
Cohen, R. (1967) *The Kanuri of Bornu* (New York: Holt).
'Colloque inter-universitaire Ghana-Côte-d'Ivoire' (1974): see Bonduku Seminar Papers
Connah, G. (1969) 'Archaeological work in Bornu, 1964–1966,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excavations at Daima Mound', in *Actes du premier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archéologie africaine, 11–16 Dec., 1966* (Fort Lamy: Institut national pour les sciences humaines; Etudes et documents tchadiens, mémoires, 1), pp. 112–24.
Connah, G. (1971)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Bornu chronology', *WAJA*, 1, pp. 55–60.
Conti Rossini, C. (ed.) (1903) 'Gli atti di Abba Yonās', *RRAL*, serie 5, 12, pp. 177–201, 239–255.
Conti Rossini, C. (ed.) (1904) *Vitae Sanctorum Antiquiorium: I: Acta Yared et Pantaleon* (Paris: Corpus scriptorum christianorum orientalum, 36–7; Scriptores aethiopici, 9–10).
Conti Rossini, C. (ed.) (1922) 'La caduta della dinastia Zagué et la versione amarica del Be'ela nagast', *RRAL*, serie 5, 31, pp. 279–314.
Cordell, D. (1973) 'Throwing knives in equatorial Africa: a distribution study', *Ba-Shiru*, 5, 1, pp. 94–104.
Cornevin, R. (1967) *Histoire de l'Afriqu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3 vols; Vol. 1, *Des origines au 16è siècle* (Paris: Payot).
Cortés-Alonso, V. (1963) 'La trata de esclavos durante los primeros descubrimientos (1489–1516)', *AEA*, 9, pp. 23–50.
Cortés-Alonso, V. (1964) *La esclavitud en Valencia durante el reinado de los reyes católicos, 1479–1516* (Valencia: Ayuntamiento).
Cortés-Alonso, V. (1972) 'Procedencia de los esclavos negros en Valencia (1482–1516)', *REAA*, 7, 1, pp. 123–51.
Cortesão, A. (1971) *Descobrimento e cartografia das ilhas de Sao Tomé e Principe* (Coimbra: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Agrupamento de estudos de cartografia antiga, Secção de Coimbra, publicações, 62).
Cortesão, A. (1972) *Descobrimento e descobrimentos* (Coimbra: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Agrupamento de estudos de cartografía antiga, publicações 72).
Cortesão, A. (1973) *A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s das ilhas da Madeira por Roberto Machim em fins do século 14* (Coimbra: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Agrupamento de estudos de cartografía antiga: secção de Coimbra, serie separata, 85).
Cortesão, J. (1958, 1961) *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êses*, 2 vols (Lisbon: Arcadia).
Costermans, J. (1953) *Mosaique bangba: notes pour servir à l'étude des peuplades de l'Uele* (Brussels: IRCB;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28, 3).
Coupez, A., Evrard, J. B. and Vansina, J. (1975) 'Classification d'un échantillon de langues bantoues d'après la lexicostatistique', *Africana Linguistica*, 6, pp. 131–58.
Cour, A. (1920) *La dynastie marocaine des Beni-Wattâs, 1420–1544* (Constantine: Braham).
Crazzolara, J. P. (1950–4) *The Lwoo*, 3 vols (Verona: Ed. Missionaria Italiana).
Crone, G. R. (ed. and Eng. transl.) (1937) *The voyages of Cadamosto, and other documents on Western Afric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Hakluyt Society).
Cruz Hernández, M. (1970) 'La estructura social del periodo de occupacion islámica de al-Andalus (711–755), y la fundación de la monarquia omeya', *Awrak*, 2, pp. 25–43.
Cuoq, J. M. (ed.) and French transl. (1975) *Recueil des sources arabes concernant l'Afrique occidentale du 8e au 16e siècle (Bilād al-Sūdān)* (Paris: CNRS, Sources d'histoire médiévale, 3).
Cuoq, J. M. (1978) 'La famille Aquit de Tombouctou', *RIBLA*, 41, 1, pp. 85–102.
Curtin, P. D. (1969)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Dampierre, E. de (1967) *Un ancien royaume bandia du Haut-Oubangui* (Paris: Plon).
Dandouau, A. and Chapus, G. S. (1952)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de Madagascar* (Paris: Larose).
Daniel, F. de F. (1940) *History of Katsina* (London: Colonial Office Library).
Daniel, N. (1962) *Islam and the West: the making of an imag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Dapper, O. (1668) *Naukeurige Beschrijvinge der Africaensche gewesten van Egypten, Barbaryen, Libyen, Biledulgerid* ... (Amsterdam: Van Meurs); 1970 Eng. transl. and adaptation, J. Ogilby, *Africa: being*

an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the regions of Aegypt, Barbary, Lybia, etc. (London); 1670 German transl., *Beschreibung von Afrika* . (Amsterdam: Van Meurs); 1686 French transl.,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 . . (Amsterdam: Wolfgang, Waesberge *et al.*)
Darraj, A. (1961) *L'Egypte sous le règne de Barsbay, 825–841/1422–1438* (Damascus: Institut français de Damas).
Datoo, B. A. (1970) 'Rhapta: the location and importance of East Africa's first port', *Azania*, 5, pp. 65–76.
Daux, P. (1952) *Histoire du pays gourmanché* (Paris: Challamel).
Daveau, S. (1963) 'Géographie de l'expansion portugaise', *COM*, 16, pp. 313–18.
Daveau, S. (1969) 'La découverte du climat d'Afrique tropicale au cours des navigations portugaises (15e siècle et début du 16e siècle)', *BIFAN*, B, 31, 4, pp. 953–87.
Davidson, B. (1959) *Old Africa rediscovered* (London: Gollancz).
Davidson, B. (1964) *The African past: chronicles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 times* (London: Longman; Boston: Little, Brown).
Davidson, B. and Bush, F. K. (1965, 1967), *The growth of African civilisation: 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1000–1800* (London: Gollancz).
Davies, O. (1961) 'Native culture in the Gold Coast at the time of the Portuguese discoveries', in *Actas do congresso internacional de historia dos descobrimentos* (Lisbon), Vol. 3, pp. 97–9.
Davies, O. (1971) 'Excavations at Blackburn', *SAAB*, 26, 103–4, pp. 165–78.
Davies, O. (1974) 'Excavations at the walled Early Iron Age site in Moor Park near Estcourt, Natal,' *ANM*, 22, 1, pp. 289–324.
Davis, R. W. (1970) 'The problem of possible pre-Colombian contacts between Africa and the Americas: a summary of the evidence', *GNQ*, 6, 2, pp. 1–7.
De Craemer, W., Vansina, J. and Fox, R. C. (1976) 'Religious movements in Central Africa: a theory', *CSSH*, 18, pp. 458–74.
De Jonghe, E. and Vanhove, J. (1949) 'Les formes d'asservissement dans les sociétés indigènes du Congo belge', *BARSOM*, Section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19, pp. 483–95.
De la Fosse, E., ed. R. Fouché-Delbosc (1897) 'Voyage à la côte occidentale d'Afrique, au Portugal et en Espagne, 1479–1480', *RH*, 4, pp. 174–201.
Delafosse, M. (1912) *Le Haut Sénégal-Niger*, 3 vols; 1972 ed. M. F. J. Clozel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Delafosse, M. (1913) 'Traditions historiques et légendaires du Soudan occidental, traduites d'un manuscrit arabe inédit', *AFRCD*, August, pp. 293–306; September, pp. 325–9, 355–69.
Delafosse, M. (1922, 1941) *Les noirs de l'Afrique* (Paris: Payot); Eng. trans. F. Fligelman, *The negroes of Africa* (Port Washington: Kennikat Press).
Delafosse, M. (1924) 'Les relations du Maroc avec le Soudan à travers les âges', Hespéris, 4, pp. 153–74.
Delgado, J. A. (1950) 'La navegacion entre los Canarios prehispanicos', *AEDA*, 79, pp. 164–74
Délivré, A. (1974) *L'histoire des rois d'Imérina: interprétation d'une tradition orale* (Paris: Klincksieck).
Denbow, J. R. (1979) 'Iron Age research in eastern Botswana', *NAk*, 14, pp. 7–9.
Denoon, D. (1972) 'Migrations and settlement in south-west Uganda', Makerere Seminar Papers.
Derricourt, R. M. (1973)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Transkei and the Ciskei: interim report for 1972', *FHP*, 5, 4, pp. 449–55.
Deschamps, H. J. (ed.) (1970–1)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frique noire*, 2 vols (Paris: PUF).
Deschamps, H. J. (1972) *Histoire de Madagascar*; 1972 4th edn (Paris: Berger-Levrault).
Deschamps, H. J. and Vianes, S. (1959) *Les Malgaches du sud-est: Antemoro, Antesaka, Antambahoaka, peuples de Farafangana* (Paris: PUF).
Desplagnes, A. M. L. (1907) *Une mission archéologique et ethnographique au Soudan français: le plateau central nigérien* (Paris: Larose).
Deverdun, G. (1959, 1966) *Marrakech des origines à 1912*, 2 vols (Rabat: Editions techniques nord-africaines).
Devic, L. M. (1883) *Les pays des Zendjs, ou la côte orientale d'Afrique au Moyen Age.* (Paris: Hachette).
Devisse, J. (1972) 'Routes de commerce et échanges en Afrique occidentale en relation avec la Méditerranée: un essai sur le commerce africain médiéval du 11e au 16e siècle', *RHES*, 50, pp. 42–73, 357–97.
Dez, J. (1967) 'De l'influence arabe à Madagascar à l'aide de faits linguistiques', in P. Vérin (ed.), *Arabes et islamisés à Madagascar et dans l'Océan indien* (Tananarive: Revue de Madagascar), pp. 1–20.
Dez, J. (1971) 'Essai sur le concept de Vazimba', *BAM*, 49, 2, pp. 11–20.
Diabaté, H. (1974) 'A propos de la reine-mère dans les sociétés akan', in Bonduku Seminar Papers, q.v.
Diabaté, M. (1970) *Kala Jata* (Bamako: Editions populaires).
Diaby, K. (1972) 'Inventaire partiel des manuscrits de la bibliothèque de Kadi Muhammed Mahmud

à Tombouctou', in 'Tombouctou, la ville la plus riche en documents historiques et sociologiques sur l'Afrique de l'ouest', *EM*, 3, pp 1–20.

Diagné, P. (1965) 'Royaumes sérères: les institutions traditionnelles du Sine Saloum', *PA*, 54, pp. 142–72.

Dias de Carvalho, H. A. (1890ff) *Expedição portuguêsa ao Muatiânvua*, 6 vols (Lisbon: Imp. nacional).

Dieterlen, G. (1955) 'Mythe et organisation sociale au Soudan français', *JSA*, 25, 1, pp. 39–76.

Dina, J. and Hoerner, J. M. (1975) 'Etude sur les populations miké du sud-ouest de Madagascar', *OSA*, 3–8, pp 269–86.

Diop, C. A. (1955, 1965) *Nations nègres et cultures*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Diop, C. A. (1960) *L'Afrique noire précoloniale: étude comparée des systè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 ..*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al-Djilali, 'Abd al-Rahman b. Muhammad (n.d.) *Ta'rīkh al-Djazā'ir al-amm*; 1934 60 edn (Algiers).

al-Djinhānī, al-Habīb (n.d) *al-Kayrawān 'abra 'usūr izdihār al-hadārah al Islāmiyāh*; 1968 edn (Tunis).

Documents on the Portuguese in Mozambique and Central Africa, 1497–1840; also *Documentos sobre os Portugueses em Moçambique e na Africa central, 1497–1840*; 1962, Vol. 1, *1497–1506* (Salisbury: National Archives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 Lisbon: Centro de estudos historicos ultramarinos).

Doke, C. M. (1954) *The southern Bantu languages*, (London: OUP for IAI).

Domenichini, J. P. (1971a) 'Artichiroka et Vazimba: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du 16e au 19e siècle', communication, séance plénière de l'Académie malgache.

Domenichini, J. P. (1971b) *Histoire des palladium d'Imérina d'après des manuscrits anciens* (Tananarive Travaux et documents du musée d'art et d'archéologie de l'Université, 8).

Domenichini, J. P. (1979a) 'L'écuelle de Milangana, 15e siècle' *Ambario*, 1, pp. 127–31.

Domenichini, J. P. (1979b) 'La plus belle énigme du monde', seminar paper, Colloque de Tuléar, 9–15 Avril 1979.

Donelha, A. (1625) *Descrição da Serra Leõa e dos rios de Guiné do Cabo Verda, 1625*; 1977 eds and Eng. transl. A Teixeira da Mota and P. E. H. Hair, *An account of Sierra Leone and the rivers of Guinea of Cape Verde, 1625* (Lisbon: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Centro de estudos de cartografia antiga, secção de Lisboa, 19).

Dramani-Issifou, Z. (1975) 'Les relations entre le Maroc et l'empire songhai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16e siècl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aris).

Dubois, H. M. (1938) *Monographie des Betsileo (Madagascar)* (Paris: Institut ethnologique).

Dufourcq, C.-E. (1966) *L'Espagne catalane et le Maghrib aux 13e et 14e siècles, de la bataille de Las Navas Tolosa (1212) à l'avènement du sultan mérinide Abou-l-Hassan (1331)* (Paris: PUF; Bibliothèque de l'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hispaniques, fasc. 37).

Dufourcq, C.-E. (1968) 'Les relations du Maroc et de la Castille pendant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IIe siècle', *RHCM*, 5, pp. 37–62

Dufourcq, C.-E. (1979) 'Commerce du Maghreb médiéval avec l'Europe chrétienne et maxime musulmane: données connues et problèmes en suspens', in *Actes du Congrès d'histoire et de civilisation du Maghreb* (Tunis), pp. 161–92.

Dunbar, A. R. (1966) *History of Bunyoro-Kitara* (Nairobi/London: OUP for East Afr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Duncan-Johnstone, A. C. and Blair, H. A. (1932) *Inquiry into the constitution and organisation of the Dagbon kingdom*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Reviewed in *Africa*-(L), 5, pp. 497–8.

Dupuis, J. (1974) 'La Diffusion du maïs dans l'ancien monde et hypothèse de voyages arabes en Amérique précolombienne', *CRTSASOM*, 34, 2, pp. 381–406.

Duyvendak, J. J. L. (1938) '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in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T'oung Pao*, 34, pp. 341–412.

Duyvendak, J. J. L. (1949) *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London: Probsthain).

East, R. M. (1933) *Labarun Hausawa da Makwabtansu*, 2 vols (Lagos: CMS Bookshop); 1970 reprint (Zaria: Northern Nigerian Publishing Co.)

Ehrenkreutz, A. S. (1959) 'Studies in the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JESHO*, 2, pp. 128–61

Ehrenkreutz, A. S. (1963) 'Studies in the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 2. The standard of fineness of western and eastern dinars before the crusades', *JESHO*, 6, pp. 243–77.

Ehret, C. (n.d) 'Comparative culture vocabularies of Eastern, Southern and Central African languages' (unpublished typescript).

Ehret, C. (1967) 'Cattle keeping and milking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n history: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JAH*, 8, 1, pp. 1–17.

Ehret, C. (1971) *Southern Nilotic history: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past*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Ehret, C. (1972) 'Outlining Southern African history: a re-evaluation AD 100–1500', *Ufahamu*, 3, 1, pp. 9–38.

Ehret, C. (1973) 'Patterns of Bantu and central Sudanic settlement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ca* 100 BC to 500 AD)', *TJH*, 3, 1, pp. 1–71.

Ehret, C. (1974a) 'Agricultural history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Africa (*ca* 1000 BC to 500 AD)', *TJH*, 4, 1, pp. 1–26.

Ehret, C. (1974b) *Ethiopians and East Africans: the problem of contacts* (Nairobi: EAPH).

Ehret, C. (1974c) 'Lacustrine history and linguistic evidenc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Los Angeles: UCLA seminar paper).

Ehret, C. (1976) 'Aspect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western Kenya, 1500–1800', in B. A. Ogot (ed.), *Kenya before 1900* (Nairobi: EAPH), pp. 1–20.

Ehret, C. (1980) *The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f southern Cushitic phonology and vocabulary* (Berlin: Reimer).

Elphick, R. (1977) *Kraal and castle: Khoikhoi and the founding of white South Af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Yale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miscellany, 116).

Elugbe, B. O. (1974) 'A comparative Edo phonology' (Ibadan: unpublished PhD thesis).

L'Empire du Mali (1959) *NA*, 82, pp. 1–63; 83, pp. 64–70.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913–38) 4 vols and supplement (London: Luzac; Leiden: Brill).

Encyclopaedia of Islam (1960–78) new edn, 4 vols; 1979–82, Vol. 5 in progress (Khe–La) (Leiden: Brill).

Encyclopédie de l'Islam (1913–38) 4 vols and supplement; 1960–78, new edn, 4 vols; 1979–82, Vol. 5 in progress (Paris: Klincksieck; Leiden: Brill).

Estermann, C. (1960) *Etnografia do sudoeste de Angola* (Lisbon: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Junta das missões geograficas e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memórias, serie antropologica, 4–5), 2nd edn.

Everbroeck, N. van (1961) *M'bom 'ipoku le seigneur à l'abîme: histoire, croyances, organisation clanique, politique, judiciaire, vie familiale des Bolia, Sengele et Ntomb'e njalé* (Tervuren: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Archives d'ethnographie du musée, 3).

Evers, T. M. (1975) 'Recent Iron Age research in the eastern Transvaal', *SAAB*, 30, pp. 171–82.

Evers, T. M. and Van den Berg, R. P. (1974) 'Recent mining in southern Africa with reference to a copper mine in the Harmony block, northeastern Transvaal', *JSAIMM*, 74, pp. 217–26.

Eyre-Smith, St J. (1933) *A brief review of the histor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peoples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of the Gold Coast*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Fagan, B. M. (1964) 'The Greefswald sequence: Bambandyanalo and Mapungubwe', *JAH*, 5, 3, pp. 337–61.

Fagan, B. M. (1965) *Southern Africa during the Iron Ag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Fagan, B. M. (1967) *A short history of Zambi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until AD 1900* (Nairobi: OUP)

Fagan, B. M. (1967, 1969) *Iron Age cultures in Zambia*, 2 vol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Robins series, no. 5).

Fagan, B. M. (1969) 'The Later Iron Age in South Africa', in L. Thompson (ed.), *African societies in Southern Africa* (New York: Praeger), pp. 50–70.

Fagan, B. M. and Yellen, J. E. (1968) 'Ivuna: ancient salt-working in southern Tanzania', *Azania*, 3, pp. 1–44.

Fage, J. D. (1952) 'Some general considerations relevant to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Gold Coast', *THSG*, 1, 1, pp. 24–9.

Fage, J. D. (1955) 'Some problems of Gold Coast history', *Universitas*, 1, 6, pp. 5–9.

Fage, J. D. (1956) 'Some notes on a schem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oral tradition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of the Gold Coast', *JHSN*, 1, pp. 15–19.

Fage, J. D. (1964a) 'Reflexion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Mosi-Dagomba group of states', in *The historian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 IAI; proceedings, fourth international African seminar, Dakar, 1961), pp. 177–91

Fage, J. D. (1964b) 'Some thoughts on state formation in the western Sudan befor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oston: University papers in African history, 1), pp. 17–34.

Fagereng, E. (1971) *Une famille de dynasties malgaches: Zafindravola, Maroserana, Zafimbolamena, Andrevola, Zafimanely*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Fagg, B. E. B. (1956) 'A life-size terracotta head from Nok', *Man*, 56, 95, p. 89.

Fagg, B. E. B. (1959) 'The Nok culture in prehistory', *JHSN*, 1, 4, pp. 288–93.
Fagg, B. E. B. (1969) 'Recent work in West Africa: new light on the Nok culture', *WA*, 1, 1, pp. 41–50.
Fagg, B. E. B. (1977) *Nok Terracottas* (Lagos: Nigerian Museum; London: Ethnographica).
Fagg, W. B. (1963) *Nigerian Images* (London: Lund Humphries; New York: Praeger); French transl., *Les Merveilles de l'art nigérien* (Paris Editions du Chêne).
Fairley, N. J. (1978) 'Mianda ya Ben'ekie: a history of the Ben'eki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brook).
Fall, Y. K. (1978) 'Technologie et Idéologie au Moyen Age. L'ecole cartographique majorquine et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frique' (thesis, Paris University, roneo.)
al-Fashtālī: see 'Abd al-'Azīz ... al-Fishtālī
Fernandes, V. (1506–7) 1938 French transl. P. de Cenival and T. Monod, *Description de la côte d'Afrique de Ceuta au Sénégal (1506–7)* (Paris: Larose; Publications du Comité d'études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6).
Fernandes, V. (n.d.) 1951 eds T. Monod, A. Teixeira da Mota, R. Mauny, French transl. P. de Cenival and T. Monod, *Description de la côte occidentale d'Afrique (Sénégal du Cap de Monte, Archipels)* (Bissau: Publicações do centro da Guiné portuguesa, 11).
Ferrand, G. (1891–1902) *Les Musulmans à Madagascar et aux îles comores*, 3 vols (Paris: Leroux; 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de l'Ecole des lettres d'Alger, 9).
Ferrand, G. (1921–8) *Instructions nautiques et routiers arabes et portugais des 15e et 16e siècles*, 3 vols (Paris: Geuthner).
Fiedler, R. (1978) 'Arab rock inscriptions and drawings in the Czechoslovak archaeological concession in Nubia', *Archiv Orientalni*, 46, pp. 38–45.
Filesi, T. (1962a) *Le relazioni della Cina con l'Africa nel Medio Evo* (Milan: Giuffrè).
Filesi, T. (1962b) 'Testimonianze della presenza cenesi in Africa', *Africa*–(R), 17, pp. 115–23.
Filipowiak, W. (1970) 'Niani poraz drugi in z otchlani', *Wikow*, 1.
Filipowiak, W. (1979) *Etudes archeologiques sur la capitale du Mali* (Stettin: Museum Narodin).
Filipowiak, W., Jasnosz, S. and Wolaciewicz, R. (1970) 'Les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polono-guinéennes à Niani en 1968', *MZ*, 14, pp. 575–648.
Fisch, R. (1913) 'Die Dagbamba', *BA*, 3, pp. 132–64.
Fisher, A. G. B and Fisher, H. J. (1970) *Slavery and Muslim society in Africa: the institution in Saharan and Sudanic Africa and the Trans-Saharan trade* (London: Hurst).
Fisher, G. A. (1957) *Barbary legend: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North Africa, 1415–183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Fisher, H. J. (1977) 'The eastern Maghrib and the central Sudan', in R. Oliver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3 (London: CUP), pp. 232–330.
Fisher, H. J. (1978) 'Leo Africanus and the Songhay conquest of Hausaland', *IJAHS*, 11, 1, pp. 86–112
Fisher, R. B. (1911) *Twilight tales of the Black Baganda* (London: Marshall); 1970 repub. (London: Cass).
al-Fishtālī: see 'Abd al-'Azīz ... al-Fishtālī
Flacourt, E. de (1661) *Histoire de la grande île de Madagascar* (Paris); 1905 edn (Troyes: Oudot)
Fleming, H. C. (1964) 'Baiso and Rendille: Somali outliers', *RSE*, 20, pp. 35–96.
Ford, J and Hall, R. de Z. (1947) 'The history of Karagwe, (Bukoba District)', *TNR*, 24, pp. 3–27.
Forstner, M. (1979) *Das Wegenetz des zentralen Maghreb in islamischer Zeit: Vergleich mit dem antiken Wegenetz* (Wiesbaden: Harrassowitz).
Fortes, M. (1940)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Tallensi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of the Gold Coast', in M. Fortes, E. E. Evans-Pritchard (eds),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IAI), pp. 239–71.
Franco, de (Capitaine) (1905) *Etude sur l'élevage du cheval en Afrique occidentale* (Paris) (no further details available).
Franco Silva, A. (1979) *La esclavitud en Sevilla y su tierra a fines de la Edad Media* (Seville: Diputación Provincial de Seville).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55) 'Chinese porcelain in Tanganyika', *TNR*, 41, pp. 62–5.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57) 'Coinage in East Africa before the Portuguese times', *NC*, 17, pp. 151–79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58) 'Swahili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and the archaeology of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wahili*, 28, 2, pp. 7–25.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59) 'Medieval evidences for Swahili', *Swahili*, 29, 1, pp. 10–23.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0a) 'East African coin finds and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JAH*, 1, 1, pp. 31–43.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0b) 'Historiography of the East African coast', *TNR*, 55, pp. 279–89.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2a)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2nd edn (London: Rex Collings).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62b)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the coast of Tanganyika* (London/New York: OUP).
Freeman-Grenville, G. S. P. (1981) 'Kilwa', in *Encyclopaedia of Islam* (q.v.), new edn, Vol. 5, pp. 106–107.
Frip, C. E. (1940, 1941) 'A note on medieval Chinese–African trade', *RNADA*, 17, pp. 86–96; 18, pp. 12–22.
Frobenius, L. (1912–19) *Und Afrika sprach ...*, 4 vols (Berlin: Vita).
Frobenius, L. (1925) *Dichten und Denken im Sudan* (Jena: Diederichs).
Fuchs, P. P. (1974) 'Sozio-ökonomische Aspekte der Durre-Katastrophe für die Sahara-Bevölkerung von Niger', *ASp*, 9, 3, pp. 308–16.
Fuglestad, F. (1978) 'A reconsideration of Hausa history before the Jihad', *JAH*, 19, 3, pp. 319–39.

Gaden, H. (1912) 'Légendes et coutumes sénégalaises d'après Yoro Dyao', *RES*, 3, 3–4, pp. 119–37; 5–6, pp. 191–201.
Gaillard, J. (1923) 'Niani, ancienne capitale de l'empire mandingue', *BCEHSAOF*, 6, pp. 620–36.
Galaal, Musa H. I. (n.d.) 'Stars, seasons and weather' (unpublished).
Garba, N. (1977) 'Rise and fall of Zamiara'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Zaria).
Garcin, J. C. (1972) 'Jean Léon l'Africain et Aydhab', *II*, 11, pp. 189–209.
Garcin, J. C. (1974) 'La méditerranéisation de l'empire mamelouk sous les sultans bahrides', *RSO*, 48, 1, pp. 75–82.
Garcin, J. C. (1976) *Un centre musulman de la Haute-Egypte médiévale: Qûs*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étude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Textes arabes et études islamiques, 6).
Garlake, P. S. (1966) *The early Islamic architecture of the East African coast* (Nairobi/London OUP; Memoirs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East Africa, 10); 1966 reviewed in *TNR*, 67, pp. 60–2.
Garlake, P. S. (1970) 'Iron site in the Urungwe district of Rhodesia', *SAAB*, 25, 97, pp. 25–44.
Garlake, P. S. (1973) *Great Zimbabw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New York: Stein and Day).
Gautier, E. F. (1935) 'L'Or du Soudan dans l'histoire', *AHES*, 7, pp. 113–23.
Géraud, F. (1977) 'The settlement of the Bakiga', in D. Denoon (ed.), *A history of Kigezi in south-west Uganda* (Kampala: National Trust, Adult Education Centre), pp. 23–55.
Germain, R. (1965) *Les biotopes alluvionnaires herbeux et les savanes intercalaires du Congo équatorial* (Brussels: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n.s., 15, 4.
Gerster, G. (1974) *L'Ethiopie, toit de l'Afrique* (Zurich: Editions Atlantis).
Gevrey, A. (1972) *Essai sur les Comores* (Tananarive: Travaux et documents du musée d'art et d'archéologie de l'université, 10).
al-Ghazālī (1095) *Tahāfut al-falāsifa*; 1947 edn (Cairo); 1962 edn (Beirut: Imprimerie catholique); 1927 French transl. M Bouyes (Beirut: Imp. catholique); 1958 Eng. transl. S. A. Kamali, *The incoherence of the philosophers* (Lahore: Pakistan Philosophical Congress).
al-Ghazālī (11th cent.) *Ihyā' 'ūlūm al-dīn*; 1888 edn (Cairo), 1967–8 edn, 5 vols (Cairo); 1978–9 Eng. transl. M. Fazul ul-Karim, 3 vols (Lahore: Sind Sagar Academy).
Gille, P. (1970), 'Les Navires des deux Indes: Venise et Portugal, évolution des types, résultats économiques', in *Méditerranée et Océan indien: travaux du six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1962 (Paris: SEVPEN), pp. 193–202.
Godinho, V. de Magalhães (1943–56) *Documentos sôbre a expansão portuguêsa*, 3 vols (Lisbon: Gleba).
Godinho, V. de Magalhães (1952) 'A economia das Canarias nos seculos 14–15', *RHSP*, 10, pp. 311–348.
Godinho, V. de Magalhães (1962) *A economia dos descobrimentos henriquinos* (Lisbon: Sá da Costa).
Godinho, V. de Magalhães (1969) *L'économie de l'empire portugais aux 15e et 16e siècles* (Paris: SEVPEN).
Goes, D. de, *et al.* (15th cent.) 1749 ed. R. Boache (Lisbon); 1926 ed. J. M. Teixeira de Carvalho and D. Lopes (Coimbra: Scriptorum Rerum Lusitanorum); (n.d.) ed. and French transl. in V. de Castro e Almeida, *Les Grands Navigateurs et colons portugais du 15e et du 16e siècles* (Brussels: Desmet-Verteneuil), Vol. 4, pp. 191ff.
Goitein, S. D. F. (1966)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Leiden: Brill).
Goitein, S. D. F. (1967–78) *A Mediterranean society: 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the Arab world as portrayed in the documents of the Cairo Geniza*, 3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ldenberg, S. and Belu, S. (1971) *Epoca marilor descoperiri geografice* (Bucharest: Ed. Stiintifica).

Goldziher, I. (1887) 'Materialen zur Kenntnis der Almohadenbewegung in Nord-Afrika', *ZDMG*, 41, pp. 30–140.
Goldziher, I. (1903) 'Moḥammed ibn Toumert et la théologie d'Islam dans le nord de l'Afrique au 11e siècle', preface to R. Luciani, *Le Livre d'Ibn Toumert* (Algiers).
Gomes, D. (15th cent.) 1937 Eng. transl. in G. R. Crone (q.v.); 1959 French transl. T. Monod, R. Mauny and G. Duval, *De la première découverte de la Guinée, récit* (Bissau).
González Palencia, A. (1926–8) *Los Mozárabes de Toledo en los siglos 12 y 13*, 3 vols (Madrid).
González Palencia, A. (1945)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arábico-española* (Barcelona: Ed. Labor); 1955 Arabic transl. H. Mones, *Tar'ikh al-fikr al-Andalusi* (Cairo).
Goody, J. (1966) 'The Akan and the north', *GNQ*, 9, p. 20.
Gorju, J. L. (1920) *Entre la Victoria, l'Albert et l'Edouard* (Rennes: Oberthür).
Goytom, W. M. (1970) *An atlas of Africa* (Addis Ababa) (no further details available)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15e–16e siècle: Rapports présentés au 12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par la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maritime, à l'occasion de son 7e colloque (Vienne, 1965) (1966) (Paris: SEVPEN).
Grandidier, A. (1903) 'Ouvrages ou extraits d'ouvrages portugais, hollandais, anglais, français, allemands, italiens, espagnols et latins relatifs à Madagascar: 1500–1613', in *Collection des ouvrages anciens concernant Madagascar* (Paris: Comité de Madagascar), Vol. 1.
Gray, J. (1935) 'Early history of Buganda', *UJ*, 2, 4, pp. 259–70.
Gray, J. (1963) 'The solar eclipse in Ankole in 1492', *UJ*, 27, 2, pp. 217–21.
Gray, J. M. (1950) 'Portuguese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Wasegeju', *TNR*, 29, pp. 85–97.
Gray, J. M. (1962) *History of Zanzibar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1856* (London: OUP).
Gray, R. and Birmingham, D. (1970) *Precolonial African trade: essays on trad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Africa before 1900* (London/New York: OUP).
Gray, W. (1826) *Voyage dans l'Afrique occidentale pendant les années 1818, 1819, 1820, 1821, depuis la rivière Gambie jusqu'au Niger* (Paris: Gastel).
Grebenart, D. (forthcoming) Paper presented to 1979 Seminar on the History of the Central Sudan before 1804.
Greenberg, J. H. (1947) 'Islam and clan organization among the Hausa', *SWJA*, 3, pp. 193–211.
Greenberg, J. H. (1955) *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 classification* (Bradford: Compass Pub.).
Greenberg, J. H. (1960) 'Linguistic evidence for the influence of the Kanuri on the Hausa', *JAH*, 1, 2, pp. 205–12.
Greenberg, J. H. (1963) 'The languages of Africa', *JAL*, 29, 1, (Part 2); repub. as Publication of the Bloomington Research Center in Anthropology, Folklore and Linguistics, 25.
Griaule, M. (1938) *Masques dogons* (Paris: Institut d'ethnographie).
Griaule, M. (1966) *Dieu d'eau: entretien avec M. Ogotemmêli* (Paris: Fayard).
Griffith, F. L. (1928) *Christian documents from Nubia* (Londo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4, pp. 117–46).
Grottanelli, V. L. (1955) 'A lost African metropolis: (Shungwaya)', in J. Lukas, (ed.), *Afrikanistische Studien* (Berlin: Akademie Verlag), pp. 231–42.
Grottanelli, V. L. (1965) *Pescatori dell'Oceano Indiano; saggio etnologico preliminare sui Bagiuni, Bantu costieri dell'Oltregiuba* (Rome: Cremonese).
Grottanelli, V. L. (1975) 'Su un'antica scultura in avorio della Sierra Leone', *Africa*-(R), 30, 4, pp. 475–505.
Guerrero-Lovillo, J. (1949) *Las cantigas estudio arqueologico de sus miniaturas* (Madrid: CSIC).
Guidi, I (1932)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etiopica* (Rome: Istituto per l'Oriente).
Guillain, C. (1845) *Documents sur l'histoire, la géographie et le commerce de la partie occidentale de Madagascar*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Guthrie, M. (1948)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Bantu languages* (London: IAI).
Guthrie, M. (1953) *The Bantu languages of western Equatorial Africa* (London: IAI).
Guthrie, M. (1962) 'Bantu origin: a tentative new hypothesis', *JAL*, 1, pp. 9–21.
Guthrie, M. (1967–71) *Comparative Bantu* .. 4 vols (Farnborough: Gregg International).

Hahn, C. H. L., Vedder, H. and Fourie, L. (1966) *The native tribes of South-West Africa* (London: Cass).
Hair, P. E. H. (1964) 'Christianity in mediaeval Nubia and the Sudan: a bibliographical note', *BSACH*, 1, 3–4, pp. 67–73.
Hair, P. E. H. (1967) 'Ethnolinguistic continuity on the Guinea coast', *JAH*, 8, 2, pp. 247–68.
Hair, P. E. H. (1969) 'How African is the history of the Sudan?', *SS*, 4, pp. 39–58.
Hair, P. E. H. (1974) 'Barbot, Dolpper Davity: a critique of sources on Sierra Leone and Cap Mount', *HAJM*, 1, pp. 25–54.

al-Hajj Mbaye, A. (1968) 'A seventeenth-century chronicle on the origins and missionary activities of the Wangarawa', *KS*, 1, 4, pp. 7–42.

Hājjīyāt, 'Abd al-Hamid (1974) *Abū Hammū Mūsa al-Zayyanī, hayātuhu wa-ātharuh* (Algiers)

Hallam, W. K. R. (1966) 'The Bayajida legend in Hausa folklore', *JAH*, 7, 1, pp. 47–60

Hama, B. (1966) *Enquête sur les fondements et la génèse de l'unité africaine* (Paris: Presence africaine), including 'Un manuscrit inédit de Abkal Aould Aoudar', pp. 205–15.

Hama, B. (1967) *Histoire du Gobir et de Sokoto*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Hama, B. (1968) *Histoire des Songhay*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Hamaker, H. A. (ed.) (1820) *Specimen catalogi codicum Mss. orientalium bibliothecae Academiae lugduno-batavae* (Leiden: Luchtmans).

Hamani, D. (1975)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histoire des états hausa: l'Adar précolonial (République du Niger)* (Niamey: Institut de recherches en sciences humaines).

Hamann, G. (1968) *Der Eintritt der südlichen Hemisphäre in die europaische Geschichte. Die Erschliessung des Afrikaweges nach Asien vom Zeitalter Heinrichs des Seefahrers bis zu Vasco da Gama* (Vienna: Böhlau; Veroffentlichungen der Kommission für Geschichte der Mathematik und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6).

Hamidullah, M. (1958) 'L'Afrique découvre l'Amérique avant Christophe Colomb', *PA*, 18–19, pp. 173–83.

Harinck, G. (1969) 'Interaction between Khasa and Khoi: emphasis on the period 1620–1750', in L. Thompson (ed.), *African societies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New York: Praeger), pp. 140–70.

Harris, M. F. (1974) paper presented at Bonduku Seminar (q.v.) (no further details available).

Hartwig, G. W. (n.d.) 'The Bakerebe', *CHM*, 14, 2, pp. 353–76.

Hasan, Ali Ibrahim (1944) *Dirāsāt fi ta'rīkh al-Mamālik al-Bahriya* (Cairo).

Hasan, Y. F. (1967) *The Arabs and the Sudan: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Hasan, Y. F. (ed.) (1971) *Sudan in Africa: studies presented to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Sudan Research Unit, February 1968* (Khartoum: Khartoum University Press).

Hazard, H. W. (1952) *The numismatic history of late mediaeval North Africa* (New York.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Hébert, J. C. (1958) 'La parenté à plaisanterie à Madagascar', *BM*, 142, pp. 175–216; 143, pp. 268–336.

Heers, J. (1957) 'Le Royaume de Grenade et la politique marchande de Gênes en Occident: 15e siècle', *MA*, 1–2, pp. 87–121.

Heers, J. (1958) 'Le Sahara et le commerce méditerranéen à la fin du Moyen Age', *AIEOA*, 16, pp. 247–55.

Heers, J. (1966) 'Le Rôle des capitaux internationaux dans les voyages de découverte aux 15e et 16e siècles', in *Les Aspects internationaux de la découverte océanique aux 15e et 16e siècles: Actes du cinqu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1960* (Paris: SEVPEN), pp. 273–94.

Heers, J. (1971) *Gênes au 15e siècle: civilisation méditerranéenne, grand capitalisme et capitalisme populaire* (Paris: Flammarion).

Heine, B. (1973) 'Zur genetischen Gliederung der Bantu-Sprachen', *AU*, 56, 3, pp. 164–85.

Heine, B., Hoff, H. and Vossen, R. (1977) 'Neuere Ergebnisse zur Territorial-Geschichte der Bantu', in W. J. G. Mohlig (ed.), *Zur Sprachgeschichte und Ethnohistorie in Afrika* (Berlin. Reimer), pp. 57–72.

Heintze, B. (1970) 'Beitrage zu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Kisama, Angola', *Paideuma*, 16, pp. 159–86.

Heintze, B. (1977) 'Unbekanntes Angola: der Staat Ndongo im 16 Jahrhundert', *Anthropos*, 72, pp. 749–805.

Heizelin, J. de (1957) 'Pleistocene sediments and events in Sudanese Nubia', in W. W. Bishop and J. D. Clark (eds), *Background to African evoluti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pp. 313–28.

Henige, D. P. (1974) 'Reflections on early interlacustrine chronology: an essay in source criticism', *JAH*, 15, 1, pp. 27–46.

Hennig, R. (1953–6) *Terrae incognitae; eine Zusammenstellung und kritische Bewertung der wichtigsten vorkolumbischen Entdeckungreisen an Hand der darüber originalberichte Vorliegenden*, 4 vols. (Leiden. Brill).

Hertefelt, M. d' (1962) *Les Anciens Royaumes de la zône interlacustre méridionale: Rwanda, Burundi, Buha* (London: IAI; Tervuren: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Monographies ethnographiques, 6).

Hertefelt, M. d' (1971) *Les Clans du Rwanda ancien* (Tervuren: Annales du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série in octavo, sciences humaines, 70).

Heurtebize, G. and Vérin, P. (1974) 'Première découverte sur l'ancienne culture de l'intérieur de l'Androy (Madagascar): archéologie de la vallée du Lambòmaty sur la haute Manambovo', *JSA*, 44, 2, pp. 113-21.
Heusch, L. de (1966) *Le Rwanda et la civilisation interlacustre* (Brussels: Universite libre)
Heusch, L. de (1972) *Le Roi ivre, ou l'origine de l'état: mythes et rites bantous* (Paris: Gallimard).
Heyd, W. von (1959) *Histoire du commerce du Levant au Moyen Age, 1885–1886* (Leipzig: Harrassowitz) 2 vols (Amsterdam: Hakker).
Hiernaux, J. (1968) 'Bantu expansion: the evidence from physical anthropology confronted with linguistic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JAH*, 4, 4, pp. 505-16.
Hiernaux, J. (1974) *The people of Afric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Hiernaux, J. and Maquet, E. (1968) *L'Age du fer à Kibiro (Uganda)* (Tervuren: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Annales: série in octavo: sciences humaines, 63).
Hinkel, F. W. (1977) *The archaeological map of the Sudan: a guide to its use and explanation of its principles* (Berlin: Akademie Verlag).
Hinnebusch, T. J. (1973) *Prefixes, sound change and subgrouping in the coastal Kenyan Bantu language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irschberg, W. (1931) *Die arabisch-persisch-indische Kultur an der Ostküste Afrikas; ihre Beziehungen nach dem Inneren des Kontinents* (Vienna: Mitteilungen der anthropologischen Gesellschaft, 6).
Hirth, F. (1910), 'Early Chinese notices of East African territories', *JAOS*, 30, pp. 46-57.
Hiskett, M. (1962) 'An Islamic tradition of reform in western Sudan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SOAS*, 25, pp. 577–96.
Hiskett, M. (1964, 1965) 'The song of Bagauda: a Hausa kinglist and homily in verse', *BSOAS*, 27, 3, pp. 540–67, 28, 1, pp. 112–35; 28, 2, pp. 363–85.
Historia do Reino do Congo (c. 1624) MS 8080 da Biblioteca nacional de Lisboa; 1969 ed. A. Brasio (Lisbon: Centro de estudos historicos ultramarinos); 1972 ed. and French transl. F. Bontinck and J. Castro Legovia, *Histoire du royaume du Congo* (Louvain, Nauwelaerts; Études d'histoire africaine, 4).
Historical relations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see Unesco (1980a)
Historiography of southern Africa: see Unesco (1980b)
Hodgkin, T. L. (1970, 1975) *Nigerian perspectives; an historical anthology* (London: OUP).
Hofmann, I. (1968) 'Die historische Bedeutung der Niltalkulturen zwischen Aswan und Sennar', *Saeculum*, 19, 27, pp. 109-42.
Hogben, S. J. and Kirk-Greene, A. H. M. (1966) *The emirates of Northern Nigeri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ir historical traditions* (London: OUP).
Holt, P. M. (1960) 'A Sudanese historical legend: the Funj conquest of Suba', *BSOAS*, 23, pp. 1–17.
Holt, P. M. (1963) 'Funj origins: a critique and new evidence', *JAH*, 4, 1, pp. 39–55.
Holt, P. M. (1970) 'The Nilotic Suda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Cambridge: CUP), Vol. 2, pp. 327–44.
Hopkins, J. F. P. (1958) *Medieval Muslim government in Barbary, until the sixth century of the Hijra* (London: Luzac)
Horton, R. (1971) 'Stateless societies in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Vol. 1, pp. 78–119.
Hourani, G. F. (1951) *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Oriental Studies, 13).
Hourani, A. H. and Stern, S. M. (eds) (1970) *The Islamic city: a colloquium* (Oxford: Cassir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Huffman, T. N. (1972) 'The rise and fall of Zimbabwe', *JAH*, 13, 3, pp. 353–66.
Huffman, T. N. (1974a) 'Ancient mining and Zimbabwe', *JSAIMM*, 74, 6, pp. 238-42.
Huffman, T. N. (1974b) *The Leopard's Kopje tradition* (Salisbury: Memoir of the National Museums and Monuments of Rhodesia, 6).
Huffman, T. N. (1978) 'The origins of Leopard's Kopje: an 11th century *difawuane*', *Arnoldia*, 8, 23
Hugot, H. J., and Bruggman, M. (1976) *Sahara: dix mille ans d'art et d'histoire* (Paris: Bibliothèque des arts).
Huici Miranda, A. (1949) 'La leyenda y la historia en los orígenes del imperio almohade', *al-Andalus*, 14, pp. 339-76.
Huici Miranda, A. (1954) 'El reinado del califa almohade al-Rashid, hijo de el-Ma 'mun', in *Hespéris*, 41, pp. 9–45.
Huici Miranda, A. (1956a) *Las grandes batallas de la reconquista, durante las invasiones africanas (Almoravids, Almohades y Benimerines)* (Madrid: CSIC).
Huici Miranda, A. (1956b; 1956–9) *Historia política del imperio almohade*, 2 vols (Tetuan: Editora Marroquí).

Hui Lin, Li (1960–1) 'Mu Lan p'i a case for precolombian transatlantic travel by Arab ships', *HJAS*, 23, pp. 104–26

al-Hulal al-Mawshiyya fī dhikr al-akhbār al-Marrākushiyya (1381) (?) attrib. to Abū 'Abd Allāh Muḥammad b. Abi 'l-Ma'ālī Ibn Sammāk; 1936 ed. I. S. Allouche (Rabat: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marocaines; Collection des textes arabes, 6).

Humblot, P. (1918, 1919) 'Du nom propre et des appellations chez les Malinké des vallées du Niandan et du Milo (Guinée française)', *BCEHSAOF*, 3–4, pp. 519–40; 17–23, pp. 393–426.

Huntingford, G. W. B. (1963) 'The peopling of the interior of East Africa by its modern inhabitants', in R. Oliver and G. Mathew (eds), *History of East Africa* (Nairobi: OUP), Vol 1, pp. 58–93.

Hunwick, J. O. (1962) 'Ahmad Baba and the Moroccan invasion of the Sudan, (1591)', *JHSN*, 10, pp. 311–22.

Hunwick, J. O. (1964) 'A new source for the biography of Ahmad Baba al-Tinbukti (1556–1627)', *BSOAS*, 27, 3, pp. 568–93.

Hunwick, J. O. (1966a) 'Further light on Ahmad Baba al-Tinbukti', *RBCAD*, 1, 2, pp 19–31

Hunwick, J. O. (1966b) '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Songhay empire, 1464–1591', in *Islam in tropical Africa: studies presented at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African seminar, 1964* (London: IAI), pp. 296–317.

Hunwick, J. O. (1969) 'Studies in the Ta'rīkh al-Fettach: its author and textual history', *RBCAD*, 5, 1–2, pp. 57–65.

Hunwick, J. O. (1970) 'Notes on a late fifteenth century document concerning al-Takrur', in C. Allen and R. W. Johnson (eds), *African perspectives: papers in the histor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Africa presented to Thomas Hodgkin* (London: CUP), pp. 7–34.

Hunwick, J. O. (1971a) 'A little known diplomatic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Kebbi (*c.* 1594)', *JHSN*, 5, 4, pp. 575–81.

Hunwick, J. O. (1971b) 'Songhay, Bornu and Hausaland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Vol. 1, pp. 202–39.

Hunwick, J. (1973) 'The dynastic chronologies of the central Sudan state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some reinterpretations', *KS*, 1, 1, pp. 35–55.

Hutton, J. H. (1946) 'West Africa and Indonesia, a problem in distribution', *Man*, 10, p. 134

Ibiraa (n.d.) 1970 French transl. Issaka Dakoussoul, *Histoire du Dawra* (Niamey: Centre de recherche et de documentation pour la tradition orale, 2)

Ibn 'Abd al-Zāhir, Muḥyī 'l-Dīn (12th cent.) *Tashrīf al-ayyām wa 'l-uṣūr fī sīrat al-Malik al-Manṣūr*; 1934, 1955, ed. and French transl. E. Levi-Provençal, in *Documents arabes inédits sur la vie sociale et économique en Occident musulmane au Moyen Age* (Cairo); 1961 ed. M. Kamil (Cairo).

Ibn 'Abdūn Muḥammad b. Aḥmad, al-Tudjībī (12th cent.); 1947 French transl. E. Lévi-Provençal, *Séville musulmane au début du 12e siècle: la traité d'Ibn Abdun sur la vie urbaine et les corps de métiers*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Ibn Abī Dīnār, al-Ḳayrawānī (1681 or 1698) *Kitāb al-Mu'nis fī akhbār Ifrīḳiya wa Tūnis*; 1861–2 edn (Tunis: Imprimerie du gouvernement); 1845 French transl. Pellissier and Remusat, 'Histoire de l'Afrique', in *Exploration scientifique de l'Algérie pendant les années 1840, 1841, 1842*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Vol. 7.

Ibn Abī Zar', Abu 'l-'Abbās Aḥmad al-Fāsī (before 1320) *Rawḍ al-Ḳirṭās* (*al-Anīs al-muṭrib bi-Rawḍ al-Ḳirṭās fī akhbār mulūk al-Maghrib wata'rīkh madīnat Fās*); 1843, 1846 ed. and Latin transl. C. J. Tornberg, *Annales regum Mauritaniae* (Uppsala: Litteris academicis); 1936 edn, 2 vols (Rabat); 1860 French transl. A. Beaumier, *Histoire des souverains du Maghreb* (*Espagne et Maroc*) *et annales de la ville de Fè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975 partial French transl. in J. Cuoq (q.v.), pp. 228–39.

Ibn al-Aḥmar, Ismā'īl b. Yūsuf (n.d.) *Rawḍat al-nisrīn*; 1917 transl. G. Bouali and G. Marçais, *Histoire des Beni Merīn, rois de Fās* (*Le Jardin des Eglantines*) (Paris: Leroux; Bulletin de correspondance africaine de l'Ecole des lettres d'Alger, 55).

Ibn al-Athīr, 'Izz al-Dīn (*c.* 1231) *Kitāb al-Kāmil fī 'l-ta'rīkh* ('Universal history'); 1851–76 ed and Latin transl. C. J. Tornberg, *Chronicon, quod perfectissimus inscribitur*, 14 vols (Leiden: Brill); 1876–91 reprint; 1898, 1901, partial French transl. E. Fagnan, *Annales du Maghreb et de l'Espagne* (Algiers: Jourdan); 1975 partial French transl. in J. Cuoq (q.v.), pp 189–94.

Ibn Badjdja, Abū Bakr Muḥammad b. Yahya b. al-Ṣa'igh al Tudjībī al-Andalusī al-Saraḳustī, also known as Avempace, or Ibn al-Ṣā'igh (12th cent.) *Tadbīr al-Mutawaḥḥid*; 1859 French transl. S. Munk (Paris); 1946 Spanish transl. M. Acin Palacios, *El régimen del solitario* (Madrid: CSIC).

Ibn Bashkuwāl, Abu 'l-Ḳāsim Khalaf b. 'Abd al-Malik (1139) *Kitāb al-Ṣila fī ta'rīkh a'immat al-Andalūs*; 1955, 1966, edns, 2 vols (Cairo).

Ibn Bassām al-Shantarīnī, Abu 'l-Ḥasan 'Alī (12th cent.) *al-Dhakhīra fī maḥāsin ahl al-Djazīra*; 1975 edn, 4 vols (Beirut).

Ibn Baṭṭūṭā (1357) *Tuḥfat al-nuẓẓār fī gharā'ib al-amṣār wa'adjā'ib al-asfār*; 1853–9, 1922–49, ed. and

French transl. C. Defremy and B. R. Sanguinetti, *Voyages d'Ibn Batoutah*, 4 vols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Collection d'ouvrages orientaux publiée par la Société asiatique); 1960 edn (Beirut); 1958, 1962, 1971, Eng. transl. H. A. R. Gibb, *The Travels of Ibn Baṭṭūṭa*, 3 vols, in progress (Cambridge: Hakluyt Society); 1966 partial French transl R Mauny *et al.*, *Textes et document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l'Afrique. extraits tirés d'Ibn Batuta* (Dakar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de la section d'histoire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9); 1975 partial French transl. in J. M. Cuoq (ed.), 1975 (q.v.), pp. 289-323.

Ibn Faḍl Allāh al-'Umarī: see al-'Umarī

Ibn al-Faraḍī Abu 'l-Walīd 'Abd Allāh b. Muḥammad (before 1013) *Ta'rīkh 'ulamā' al-Andalūs*; 1954 edn, 2 vols (Cairo).

Ibn Fartua: see Ibn Furṭūwa, Ahmad

Ibn al-Furāt, Nāṣir al-Dīn Muḥammad b. 'Abd al-Raḥīm (before 1405) *Ta'rīkh al-duwal wa 'l-mulūk*; 1936–42 ed. Q. Zuṛayq (Beirut: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Oriental series, 9).

Ibn Furṭūwa, Aḥmad (16th cent.) *Ta'rīkh mai Idris wa ghazawātihi lil Imām Aḥmad Burnuwi*, 1932 ed. H. R. Palmer (Kano: Amir's Press); 1926 Eng. transl. H. R. Palmer, *History of the first twelve years of the reign of Mai Idris Alooma of Bornu (1571 1583). by his Imam* (together with the 'Diwān of the sultans of Bornu') (Lagos: Government Printer).

Ibn Furṭūwa, Aḥmad (16th cent.) 'Kanem wars of Mai Idris Alooma', 1928 Eng. transl. H. R. Palmer in *Sudanese Memoirs* (q.v.), Vol. 1, pp. 15–72.

Ibn Furṭūwa, Aḥmad (16th cent.) 'Ghazawāt sultan Idrīs fī balad Bornu', ed. H. R. Palmer in *Hadhā al-kitāb huwa min sha'n sultān Idris Alawma* (Kano, 1932); Eng. transl. J. W. Redhouse, *JRAS*, 19, pp. 43-124, 199-259.

Ibn Ghalbūn: see Muḥammad b. Khalīl

Ibn Ḥawḳal, Abu 'l-Ḳāsim b. 'Alī al-Nasībī (10th cent.) *Kitāb Ṣūrat al-arḍ* (or, *Kitāb al-Masālik wa'l Mamālik*); 1938 ed. J. H. Kramers, 2 vols in 1 (Leiden: Brill; 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 2); 1964 French transl. J. H. Kramers and G. Wiet, *Configuration de la terre* (Beirut;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Collection Unesco d'oeuvres représentatives, série arabe). 1975 partial French transl. in J. Cuoq (q.v.), pp. 70-6.

Ibn 'Idhārī al-Marrākushī, Aḥmad b. Muḥammad (14th cent.) *Kitāb al-Bayān al-mughrib fī akhbār al-Andalus wa 'l-Maghrib*; 1848, 1851, 1st 2 parts ed. R. P. A. Dozy, *Histoire de l'Afrique et de l'Espagne, intitulée al-Bayano 'l-Moghrib*, 2 vols (Leiden: Brill); n.d. (1929?) 3rd part ed. E. Lévi-Provençal (Beirut: Dar Assakafa), 1930 reprint (Paris: Geuthner; Textes arab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l'Occident musulman); 1948, 1951, new edn of Dozy's text with new MSS, G. S. Colin and E. Lévi-Provençal, 2 vols (Leiden: Brill); 1961 further parts ed. A. Huici Miranda, *Hespéris*, pp. 46–59; 1972 selections ed. Iḥsān Abbās (Rabat); 1949 ed. M. S. Iryan (Cairo); 1901, 1904, French transl. of Dozy's text, E. Fagnan, *Histoire de l'Afrique et de l'Espagne*, 2 vols (Algiers: Imprimerie orientale Fontana); 1975 partial French transl. in J. Cuoq (q.v.), pp. 219–24.

Ibn al-Ḳāsim (8th cent.) *al-Mudawwana*; A. H. 1323 edn, 15 vols (Cairo); A. H. 1325 edn, 4 vols (Cairo).

Ibn al-Ḳaṭṭān, 'Alī b. Muḥammad (n.d.) *Djuz' min Kitāb Naẓm al-Djuman*; 1925 partial edn E. Lévi-Provençal, in 'Six fragments inédits ...', q.v., undated (1964?) edn M. A. Makkī (Tetuan).

Ibn al-Ḳaṭṭānī (n.d.) *Kitāb al-Tashbīhāt min ash'ār ahl al-Andalus.*

Ibn Khaldūn, Walī al-Dīn 'Abd al-Raḥmān b. Muḥammad (14th cent.) *al-Muḳaddima*; 1858 ed. E. Quatremère, 3 vols (Paris: Duprat); 1863-8 French transl W. M. de Slane, *Les Prolégomènes d'Ibn Khaldoun*, 3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34-8 reprint (Paris: Geuthner); 1958 Eng. transl. F. Rosenthal, 3 vols (New York: Pantheon; Bollinger Series, 43); 1967–8 French transl V. Monteil, *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 3 vols (Beiru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traduction des chefs d'oeuvre); 1975 partial French transl. in J. Cuoq (q.v.), pp. 328-63.

Ibn Khaldūn ... (14th cent.) *Kitāb al-'Ibār wa-diwan al-mubtada wa 'l-Khabar* ('Universal History'); 1868 edn, 7 vols (Būlāḳ); 1852–6, partial French transl. W. M. de Slane, *Histoire des Berbères et des dynasties musulmanes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4 vols (Algiers: Imprimerie du gouvernement); 1925-6 reprint (Paris: Geuthner); 1956–9, complete French transl., 7 vols (Beiru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traduction des chefs d'oeuvre); 1975 partial French transl. in J. Cuoq (q.v.), pp. 328–63.

Ibn al-Khaṭīb (1361–71) *Iḥāṭa fī ta'rīkh Gharnāta* ('History of Granada'); 1901–2 partial edn (Cairo), 1975 partial French transl. in J. Cuoq (q.v.), pp. 324–6.

Ibn Khayr al-Ishbīlī (12th cent.) *Fahrasat mā rawāhu 'an shuyūkhi-hi min al-dawāwin al-muṣannafa fī durūb al- 'ilm wa-ànwā' al-ma'ārif*, 1963 edn (Cairo).

Ibn Ḳunfudh, Abu 'l-'Abbās Aḥmad b. Ḥasan (8th/9th cent.) *al-Fārisiyyah fī mabādi' al-dawla al Ḥafṣiyah*; 1968 ed. M Nayfar, 'A Turkī (Tunis).

Ibn Madā', Ahmad b. 'Abd al Rahmān (12th cent.) *Kitāb al-Radd'ala 'l-nuhāt*; 1947 ed. S. Daif (Cairo).

Ibn Madjid al-Dīn Ahmad (1490) *Kitāb al-Fawā'id fī usūl al-bahr wa 'l-Kawā'id*; 1971 ed. and Eng. transl. G. R. Tibbetts, *Arab navig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Portuguese* (London: RASGBI, Publications of the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n.s. 42).

Ibn al-Mukhtār: see Ka'ti, Mahmūd.

Ibn Rushd (Abu 'l-Walīd Muhammad b. Ahmad b. Muhammad b. Rushd, also known as Averroes) (before 1169) *Kitāb al-Kulliyāt*; 1939 Spanish transl., *Libro de la generalidades* (Larache: Artes gráficas Bosca).

Ibn Rushd (1169–78) *Talkhīs* (short or 'middle' commentaries on Aristotle); 1977 English ed. and transl. C. E. Butterworth, *Averroes' three short commentaries on Aristotle's 'Topics', 'Rhetoric' and 'Poe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Ibn Rushd (c. 1174–8) *Fasl al-makal*; 1959 ed. G. F. Hourani (Leiden: Brill); 1972 edn (Cairo); 1948 French transl. L. Gauthier (Algiers).

Ibn Rushd (1179) *Kashf al-manāhidj al-adilla*; 1859 edn; 1859 German transl. of the *Kashf* and the *Fasl al-makal*, M. J. Müller, *Philosophie und Theologie von Averroës*; 1921 Eng. trans. M. Jamil-ur-Rehma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of Averroës* (Baroda: Widgery).

Ibn Rushd (c. 1180) *Tahāfut al-Tahāfut*; 1930 French transl. M. Bouyges (Beirut: Imprimerie catholique); 1954, 1969, Eng. transl. S. van den Bergh, *The incoherence of the incoherence* (London: Luzac).

Ibn Rushd (after 1180) *Tafsīr* ('Great commentaries' on Aristotle's *Metaphysics*); 1953 Latin edn, *Commentarium magnum in Aristotelis 'de Anima Libros'* (Cambridge, Mass.: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Ibn Sāhib al-Salāt, Abū Marwān 'Abd al-Malik b. Muhammad al-Badjī (12th cent.) *al-Mann bi 'l-imāma 'ala 'l-musta-d'afīn bi-an dja 'alahum Allāh al-a'imma wa-dja'alahum al-wārithīn*; 1964 ed. 'Abd al-Hādī al-Tāzī (Beirut).

Ibn Sa'īd, Abu 'l-Hasan 'Alī b. Mūsā, al-Maghribī (1243) *Kitāb al-Mughrib fī hula 'l-Maghrib*; 1953 ed. Z. M. Hasan, R. Dauf and S. Kashif (Cairo).

Ibn Sa'īd, al Maghribī (13th cent.) *Mukhtasar Djughrāfiyā*, sometimes called *Kitāb bast al-ard fī tūlihā wa 'l-ard*; 1970 ed. I. al-'Arabī (Beirut); partial French transl. in J. M. Cuoq (q.v.), pp. 201–19.

Ibn Taghrībirdī: see Abu 'l-Mahāsin b. Taghrībirdī

Ibn Tufayl, Abū Bakr Muhammad b. 'Abd al-Malik ... (c. 1169) *Risālat Hayy b. Yakzān fī asrār al-hikma al-mushrikiyya*; 1671 Latin transl. E. Pocock, *Philosophus autodidactus* (Oxford: H. Hall); 1905 Eng. transl. S. Ockley,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reason* (Cairo: El-Maaref Printing Office); 1910 (4th edn) Eng. transl. P. Brönnle (London: Murray); 1972 Eng. transl. L. G. Goodman, *Ibn Tufayl's Hayy ibn Yaqzan: a philosophical tale* (New York: Twayne).

Ibn Tūmart (12th cent.) *Kitāb A'azz mā yutlab*; 1903 ed. and French transl. R. Luciani, with preface by I. Goldziher (q.v.), *Le Livre de Mohammed Ibn Toumert* (Algiers: Fontana).

Idris, H. R. (1961) 'Commerce maritime et kirad en Berbérie orientale d'après un recueil inédit de *fatwās* médiévales', *JESHO*, 4, 3, pp. 235–9.

Idris, H. R. (1962) *La Berbérie orientale sous les Zirides: 10e–12e siècles*, 2 vols (Paris: Maisonneuve; Publication de l'Institut d'études orientales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de l'Université d'Alger, 12).

Idris, H. R. (1970–4) 'Le mariage en Occident musulman: analyse de fatwās médiévales, extraites du Mi'yar d'al Wanchariehi', *SI*, 32, pp. 157–67, and ROMM, 12, pp. 45–64; 17, pp. 71–105.

Idris, H. R. (1973a) 'Contributions à l'étude de la vie économique musulmane médiévale. Glanes de données chiffrées', *ROMM*, 15–16, (Mélanges le Tourneau, 2) pp. 75–87.

Idris, H. R. (1973b) 'Des prémices de la symbiose arabo-berbère', in *Actes du premier congrès d'études des cultures méditerranéennes, 1972* (Algiers: SNED), pp. 382–93

Idris, H. R. (1974) 'Les tributaires en occident musulman médiéval d'après le Mi'yar d'Al-Wansarisi', in *Mémorial Anouar Abdel-Malek*, (Brussels), pp. 172–96.

al-Idrīsī, Abū 'Abd Allāh (1154) *Kitāb Nuzhat al-mushtāk fī 'khtirāk al-āfāk* (also known as the 'Book of Roger' after its royal patron, Roger II of Sicily); 1866 partial edn and French transl. R. Dozy and M. J. de Goeje,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et l'Espagne* (Leiden: Brill); 1970ff., complete edn in progress, ed. E. Cerulli *et al.*, *Opus geographicum, sive Liber ad eorem delectationem qui terras peragrare studeant* (Rome: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 l'Estremo Oriente); 1836–40, French transl. P. A. Jaubert, *Géographie d'Edrisi*, 3 vol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975 partial French transl. in J. Cuoq (q.v.), pp. 126–65.

al-Ifrānī, Abū 'Abd Allāh Muhammad, known as al-Saghīr (before 1745) *Nuzhat al-hādī bi-akhbār mulūk al-Karn al-hādī*; 1888, 1889, ed. and French transl. O. Houdas, *Histoire de la dynastie saadienne au Maroc (1511–1670)*, 2 vols (Paris: Leroux; Publications de 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série 3, 2–3).

Iglauer, E. (1973) *Goldewinnung und Goldhandel im Raum von Simbabwe in der portugiesischen Zeit von 1497–1840* (Vienna: Institut für Volkerkunde, Universitat)
Ikime, O. (ed.) (1980) *Groundwork of Nigerian history* (Ibadan: Heinemann)
Imamuddin, S. M (1966) *Some aspects of the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Muslim Spain, 711 1492 AD* (Leiden: Brill).
'Inān, Muḥammad 'Abd Allāh (1964) *'Asr al-Murābiṭīn*, 2 vols (Cairo).
Innes, G. (ed.) (1974) *Sunjata: three Mandinka versions* (London: SOAS).
Inskeep, R. R. (1978) *The peopling of Southern Africa* (Cape Town: Philip; London. Global Book Resources); 1979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Commission on early maps (1964-)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etustioris aevi, AD 1200–1500*, eds R. Almagia and Maral Destombes (Amsterdam: Israel; Imago Mundi, supplement 4)
al-Ishbīlī: see Ibn Khayr al-Ishbīlī
Ishumi, A. G. M. (1971) 'The kingdom of Kiziba', *CHM*, 13, 4, pp. 714–35.
Itandala, B. (1978) 'Ilembo, Nkanda and the girls: establishing a chronology of the Babinza', in J. B. Webster (ed.), *Chronology, migration and drought in interlacustrine Africa* (Dalhousie: Dalhousie University Press), pp. 145–72.
Izard, M. (1965-) *Traditions historiques des villages du Yatenga* (Paris: CNRS; Recherches voltaiques, 1–).
Izard, M. (1970)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es royaumes mossi*, 2 vols (Paris: CNRS; Recherches voltaiques, 12–13).
Izard, M. (1971) 'Les Yarsés et le commerce dans le Yatenga précolonial', in C. Meillassoux (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L'Evolution du commerce africain depuis le 19e siècle en Afrique de l'ouest) Studies presented at the 10th International African Seminar, 1969* (London: IAI), pp. 214–19.
Izard, M. (1973a) 'La lance et les guenilles', *L'Homme*, 13, 1–2, pp. 139–49.
Izard, M. (1973b) 'Remarques sur le vocabulaire politique mossi', *L'Homme*, 13, 1–2, pp. 193–230

Jackson, K. A. (1972) 'An ethnohistorical study of the oral tradition of the Akamba of Kenya'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Jadin, L. (1966) 'L'Afrique et Rome depuis les découvertes jusqu'au 18e siècle', in *Acts of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Vienna: Berger Verlag; Louvain: Nauwaelerts), pp. 33–70
Jarniat, L. (1968)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hippopotame nain, subfossile de Madagascar (craniologie)* (Tananarive).
Jeffreys, M. D. W. (1953a) 'The Arabs discover America before Columbus', *Muslim Digest*, 4, 2, pp. 18–26
Jeffreys, M. D. W. (1953b) 'Precolombian maize in Africa', *Nature*, 172, 4386, pp. 965–6.
Jeffreys, M. D. W. (1953c) 'Precolombian negroes in America', *Scientia*, 88, 7–8, pp. 202–12.
Jeffreys, M. D. W. (1957) 'Origins of the Portuguese word Zaburro as their name for maize', *BIFAN*, B, 19, 2, pp. 111–36.
Jeffreys, M. D. W. (1963a) 'How ancient is West African maize?', *Africa*–(L), 33, pp. 116–18.
Jeffreys, M. D. W. (1963b) 'Milho Zaburro-Milho de Guinée = Maize', *Garcia da Orta*, 11, 2, pp. 213–26.
Jeffreys, M. D. W. (1964) 'Congo Maza = Portuguese Maize?', *Ethnos*, 29, 3–4, pp. 191–207.
Jeffreys, M. D. W. (1969) 'Precolombian maize north of the old world equator', *CEA*, 9, 35, pp. 146–9.
Jeffreys, M. D. W. (1971) 'Maize and the Mande myth', *CA*, 12, 3, pp. 291–320.
Jobson, R. (17th cent.) *The Golden Trade*; 1932 edn (London).
Johnson, M. (1970) 'The cowrie currencies in West Africa', *JAH*, 2, 1, pp. 17–49; 3, pp. 331–53.
Johnson, S. (1921) *The history of the Yoruba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British protectorate* (London: Routledge; Lagos: CMS Bookshop)
Julien, C. A. (1961)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Tunisie, Algérie, Maroc.* (Paris: Payot) 2nd edn.

K. W. (1935–7) 'Abakama ba Bunyoro-Kitara', *UJ*, 3, 2, pp. 155–60; 4, 1, pp. 75–83; 5, 1, pp. 53–68.
Kabuga, C. E. S. (1963) 'The genealogy of Kabaka Kintu and the early Bakabaka of Buganda', *UJ*, 27, 2, pp. 205–16.
Kagame, A. (1951) *La poésie dynastique au Rwanda* (Brussels: IRCB;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class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22, 1).
Kagame, A. (1952a) *Le code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u Rwanda précolonial* (Brussels: IRCB;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class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mémoires in octavo, 26, 1).

Kagame, A. (1952b) *La Divine Pastorale* (Brussels: Editions du Marais).

Kagame, A. (1954) *Les organisations socio-familiales de l'ancien Ruanda* (Brussels: IRCB;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class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38, 3).

Kagame, A. (1955) 'La structure de quinze clans du Rwanda', *AL*, 18, pp. 103–17.

Kagame, A. (1959) *La notion de génération appliquée à la généalogie dynastique et à l'histoire du Rwanda des 10e–11e siècles à nos jours* (Brussels: IRCB;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class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n.s. 9, 5).

Kagame, A. (1961) *L'histoire des armées bovines dans l'ancien Rwanda* (Brussels: IRCB;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class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n.s. 28, 4).

Kagame, A. (1963) *Les milices du Rwanda précolonial* (Brussels: IRCB;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class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n.s. 28, 3).

Kaggwa, A. (1905) *Ekitabo ky 'ekika kya nsenene* (*The history of the grasshopper clan*) (Mengo, Uganda: A. K. Press).

Kaggwa, A. (1971) *The kings of Buganda*, transl. M. S. M. Kiwanuka (Nairobi: EAPH).

Kake, I. B. (ed.) (1977)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frique*, 12 vols (Vol. 2: *L'Ere des grands empires*) (Paris: ABC).

Kake, I. B. (1980) *Les armées traditionnelles de l'Afrique* (Paris/Libreville: Lion).

Kake, I. B. (1981) 'Les Portugais et le Gabu: XVe, XIXe siècles', in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ur les traditions orales du Gabu (unpublished communication).

Kalck, P. (1959) *Réalités oubanguiennes* (Paris: Berger-Levrault).

Kalck, P. (1974) *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des origines préhistoriques à nos jours* (Paris: Berger-Levrault).

al-Kalkashandī, Ahmad (before 1418) *Şubh al-a'shā fī şinā'at al-inshā'*; 1913–19 ed. Dār al-Kutūb, 14 vols (Cairo); 1975 partial French transl. in J. M. Cuoq (q.v.), pp. 369–80.

Kano Chronicle: see Palmer, H. R. (1909)

Kanyamunyu, P. K. (1951) 'The tradition of the coming of the Abalisa clan in Buhwezu, Ankole', *UJ*, 15, 2, pp. 191–2.

Karpinski, R. (1968) 'Considérations sur les échanges de caractère local et extérieur de la Sénégambie dans la deuxième moitié du 15e siècle et du début du 16e siècle', *AB*, 8, pp. 65–86.

Karugire, S. R. (1971) *A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Nkore in Western Uganda to 189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asanga, F. (1956) *Tantaran 'ny Antemoro-Anakara teto Imerina tamin 'ny Andron 'Andrianampoinimerina sy Ilaidama* (Tananarive/Antananarivo).

Kasanga, F. (1963) *Fifindra-monina. Ny Antemoro-anakara voasoratra tamin'ny taona 1506*. (Tananarive: Iarivo).

Katate, A. G. and Kamugungunu L. (1953) *Abagabe b' Ankol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Ankole, Books 1–2*), 2 vols (Kampala: Eagle Press); 1967 edn (Nairobi: East Africa Literature Bureau).

Ka'ti, Mahmūd b. al-Hadjdj al-Mutawakkil (before 1593), completed (1654–5) by grandson, called Ibn al-Mukhtār by N. Levtzion (1971c, q.v.), who attributes whole work to him, *Ta'rīkh al-fattāsh*; 1913–14 (revised 1964) ed. and French transl. O. Houdas and M. Delafoss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5e série, 10); 1981 Unesco reprint of 1913–14 edn and transl. (Paris: Maisonneuve;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Katoke, I. K. (1971) 'Karagwe; a pre-colonial state', *CHM*, 13, 5, pp. 515–41.

Katoke, I. K. (1975) *The Karagwe kingdom: a history of the Abanyambo of Northwestern Tanzania c. 1400–1915* (Nairobi: EAPH).

al-Kattān: see Ibn al-Kattān

Kawada, J. (1979) *Genèse et évolution du système politique des Mosi méridionaux: Haute-Volta* (Tokyo: Asia Africa gengo bunla kenkyûzyo).

Keech, S. and McIntosh, R. J. (1980) 'Jenne-Jeno: ancient African city', *Times*, 1 September, p. 18.

Kent, R. K. (1969) 'Alfred Grandidier et le mythe des fondateurs d'états malgaches d'origine asiatique', *BM*, 277–8, pp. 603–20.

Kent, R. K. (1970) *Early kingdoms in Madagascar: 1500–1700* (New York: Rinehart and Winston).

Kilhefner, D. W. (1967) 'The Christian kingdoms of the Sudan: 500–1500', *The Africanist*, 1, 1, pp. 1–13.

Kilwa Chronicle, in G. S. P. Freeman-Grenville (1962a), 34–49.

Kimambo, I. N. (1969)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are of Tanzania, c. 1500–1900* (Nairobi: EAPH).

Kirkman, J. S. (154a) *The Arab city of Gedi: excavations at the great mosque, architecture and finds* (London: OUP).

Kirkman, J. S. (1954b) *Men and monuments on the East African coast* (London: Lutterworth).

Kirkman, J. S. (1957) 'Historical archaeology in Kenya: 1948–1956', *AJ*, 37, pp. 16–18.

Kirkman, J. S. (1959) 'The excavations at Ras Mkumbuu on the islands of Pemba', *TNR*, 53, pp. 161–78.
Kirkman, J. S. (1960) *The tomb of the dated inscription at Gedi* (London: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s, 14).
Kirkman, J. S. (1963) *Gedi: the palace* (The Hague: Mouton).
Kirkman, J. S. (1967) 'Les Importations de céramiques sur la côte du Kenya', *Taloha*, 2, pp. 1–10.
Kiwanuka, M. S. M. S. (1971) *A history of Buganda: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kingdom of 1900* (London: Longman); 1972 edn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Ki-Zerbo, J. (1972) *Histoire de l'Afrique noire d'hier à demain* (Paris: Hatier) 2nd edn.
Klapwijk, M. (1974)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pottery from north-eastern Transvaal, South Africa', *SAAB*, 29, pp. 19–23.
Kodjo, N. G. (1971) 'Ishaq II et la fin de l'empire Songhai'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aris).
Köhler, O. (1958) 'Zur Territorial-Geschichte des Nizerbogens', *BA*, 61, 2, pp. 229–61.
Köhler, O. (1963) 'Observations on the central Khoisan language group', *JAL*, 2, 3, pp. 227–34.
Köhler, O. (1975) 'Geschichte und Probleme der Gliederung der Sprachen Afrikas', in H. Baumann (ed.), *Die Völker Afrikas und ihre traditionellen Kulturen* (Wiesbaden: Steiner; Studien zur Kulturkunde, 34), pp. 305–37.
Kolmodin, J. (1912–14) 'Traditions de Tsazzaga et Hazzega: textes tigrana', *Aeo*, 5, 5, pts 1–3.
Krieger, K. (1959) *Geschichte von Zamfara, Sokoto-Provinz Nord-Nigeria* (Berlin: Reimer).
Kuper, A. (1975)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Sotho speaking people of Southern Africa', *Africa-(L)* 45, 1, pp. 139–49.

Labarun Hausawa da Makwabtansu: see East, R. M. (1933)
Lahatut, F. and Raharinarivonirina, R. (1969) *Madagascar: étude historique* (Paris: Nathan).
Labib, S. Y. (1965) *Handelsgeschichte Ägyptens im Spätmittelalter, 1171–1517* (Wiesbaden: Steiner).
Laburthe-Tolra, P. (1977) *Minlaaba: histoire et société traditionnelle chez les Béti du sud Cameroun*, 3 vols (Lille: University of Lille II; Paris: Champion).
Lacoste, Y. (1966) *Ibn Khaldoun: naissance de l'histoire, passé du Tiers-Monde* (Paris: Maspéro).
Lambert (Captain) (1907) 'Le Pays mossi et sa population: étude historique, économique et géographique suivie d'un essai d'ethnographie comparée' (Dakar: Archives du Sénégal, unpublished monograph).
Lampen, G. D. (1950) 'History of Darfur', *SNR*, 31, pp. 177–209.
Landerouin, M. A. (1909) 'Notice historique', in M. Tilho (ed.),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la mission Tilho*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Vol. 2, pp. 341–417.
Lang, K. (1923–4) 'Arabische Lehnwörter in der Kanuri Sprache', *Anthropos*, 18–19, pp. 1063–74.
Lange, D. (1977a) *Le Dīwān des sultans du (Kanem)-Bornu: chronologie et histoire d'un royaume africain de la fin du 10e siècle jusqu'à 1808* (Wiesbaden: Steiner; Studien zur Kulturkunde, 42).
Lange, D. (1977b) 'Al-Qasaba et d'autres villes de la route centrale du Sahara', *Paideuma*, 23, pp. 19–40.
Lange, D. (1978) 'Progrès de l'Islam et changement politique du Kanem du 11e siècle au 13e siècle', *JAH*, 19, 4, pp. 495–513.
Lange, D. (1979a) 'Les Lieux de sépulture des rois sefuwa (Kanem-Bornu): textes écrits et traditions orales', *Paideuma*, 25, pp. 145–57.
Lange, D. (1979b) 'Un texte de Maqrizi sur "les races du Soudan"', *AI*, 15, pp. 187–209.
Lange, D. (1980) 'La Région du lac Tchad d'apres la geographie d'Ibn Said: texte et cartes', *AI*, 16, pp. 149–81.
Lange, D. (1982) 'L' Eviction des Sefuwa du Kanem et l'origine des Butlala', *JAH*, 23, 3, pp. 315–32.
Lange, D. (forthcoming) 'The Chad region as a crossroads', in M. El Fasi (ed.),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Paris: Unes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Vol. III, Chap. 15.
Lange, D. and Berthoud, S. (1972) 'L'intérieur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d'après G. L. Anania', *CHM*, 14, 2, pp. 299–351.
Langworthy, H. W. (1972) *Zambia before 1890: aspects of pre-colonial history* (London: Longman).
Lanham, L. W. (1964) 'The proliferation and extension of Bantu phonemic systems influenced by Bushman and Hottentot', in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1962* (Paris/The Hague: Mouton), pp. 382–9.
Lanning, E. C. (1966) 'Excavations at Muhende Hill', *UJ*, 30, 2, pp. 153–64.
Lapidus, I. M. (1967) *Muslim cit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pidus, I. M. (1972) 'Ayyubid religious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schools in Cairo', in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ur l'histoire du Caire, 1969 (Cairo: General Egyptian Book Organization), pp. 279–86.
Larochette, J. A. (1958) 'Les Langues du groupe Moru-Mangbetu', *Ko*, 24, 3, pp. 118–35.
la Roncière, C. de (1919) 'Une Histoire du Bornou au 17e siècle', *RHCF*, 7, 3, pp. 78–88.
la Roncière, C. de (1924–7) *La Découverte de l'Afrique au Moyen Age, cartographes et explorateurs*, 3 vols (Cairo: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royale de géographie d'Egypte, 5, 6, 13)
la Roncière, C. de (1967) 'Portulans et planisphère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la succession dans les écoles cartographiques', *RHES*, 45, 1, pp. 7–14
la Roncière, M. de (1967) 'Les Cartes marines de l'époque des grandes decouvertes', *RHES*, 45, 1, pp. 15–22
Laroui, A. (1970) *L'Histoire du Maghreb: un essai de synthèse*, 2 vols (Paris: Maspero); 1977 Eng. transl. R. Manheim, *The History of the Maghrib: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tham, J. D. (1972) 'Arabic into medieval Latin', *JSS*, 17, pp. 30–67.
Lavergne de Tressan, M. de (1953) *Inventaire linguistiqu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et du Togo* (Dakar: Mémoire de L'IFAN, 30); 1972 reprint (Amsterdam: Swets and Zeitlinger).
Lavers, J. (1971) 'Islam in the Bornu caliphate: a survey', *Odu*, 5, pp. 27–53.
Law, R. C. C. (1973) 'The heritage of Oduduwa: tradition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propaganda among the Yoruba', *JAH*, 14, 2, pp. 207–22.
Lebeuf, A. M. D. (1969) *Les Principautés kotoko: essai sur le caractère sacré de l'autorité* (Paris: CNRS).
Lebeuf, J. P. and Mason Detourbet, A. (1950) *La Civilisation du Tchad* (Paris: Payot).
Le Bourdiec, F. (1974) 'La Riziculture à Madagascar: les hommes et les paysag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Aix-Marseille).
Legassick, M. (1969) 'The Sotho-Twana peoples before 1800', in L. M. Thompson (ed.) *African societies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pp. 86–125.
Le Moal, G. (1963) 'Commentaire des cartes ethniques', in G. Brasseur (ed.), *Cartes ethno-démographiques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çaise* (Dakar: IFAN), pp. 9–21.
Leo Africanus (1550) 'Descrittione dell 'Africa', in G. B. Ramusio, *Navigationi e viaggi* (Venice), Vol. 1; 1956 French transl. A. Epaulard, *Description de l'Afrique* (Paris: Maisonneuve).
Lepionka, L. (1977) 'Excavations at Tautswemogala', *BNR*, 9, pp. 1–16.
Le Rouvreur, A. (1962) *Sahéliens et Sahariens du Tchad* (Paris: Berger-Levrault).
Leroy, J. (1964) 'La Peinture chrétienne d'Ethiopie antérieure à l'influence occidentale', in K. Wessel (ed.), *Christendum am Nil* (Recklinghausen: A. Bongers), pp. 61–78.
Lesourd, M. (1960) 'Notes sur les Nawakhid, navigateurs de la Mer Rouge', *BIFAN*, B. 22, 1–2, pp. 346–55.
Le Tourneau, R. (1949) *Fès avant le protectorat: étud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une ville de l'Occident musulman* (Casablanca: SMLE).
Le Tourneau, R. (1961) *Fez in the age of the Marinides* (Oklahoma: Oklahoma University Press).
Le Tourneau, R. (1969) *The Almohad movement in North Africa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 Tourneau, R. (1970) 'Sur la disparition de la doctrine almohade', *SI*, 32 pp. 193–201.
Levaud, R. and Nelli, R. (eds) (1960) *Les troubadours*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Lévi-Provençal, E. (1925) 'Six fragments inédits d'une chronique anonyme du début des Almohades', in *Mélanges René Basset: études nord-africaines et orientales* (Paris: Geuthner;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marocaines, 10–11), Vol. 2, pp. 335–93.
Lévi-Provençal, E. (1928a) *Documents inédits d'histoire almohade* (Paris: Geuthner)
Lévi-Provençal, E. (1928b) 'Ibn Tumart et Abd al-Mumin: le "Fakih du Sus" et le "flambeau des Almohades"', in *Mémorial Henri Basset: nouvelles études nord-africaines et orientales* (Paris: Geuthner;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marocaines, 17–18), Vol. 2, pp. 21–37.
Lévi-Provençal, E. (1930) 'Notes d'histoire almohade', *Hespéris*, 10, pp. 49–90.
Lévi-Provençal, E. (1941a) *Majmu rasail muwahhidiyah: trente-sept lettres officielles almohades* (Rabat: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marocaines, 10).
Lévi-Provençal, E. (1941b) 'Un Recueil de lettres almohades: analyse et commentaire historique', *Hespéris*, 28, pp. 21–69.
Lévi-Provençal, E. (1948) *Islam d'Occident: études d'histoire médiévale* (Paris: Maisonneuve).
Levtzion, N. (1963)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century kings of Mali', *JAH*, 4, 3, pp. 341–53.
Levtzion, N. (1968) *Muslims and chiefs in West Africa: a study of Islam in the Middle Volta Basin in the pre-colonial perio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Levtzion, N. (1971a) 'The early states of the western Sudan to 1500',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Vol. 1, pp. 120–257.

Levtzion, N. (1971b) 'Mahmūd Ka'ti fut-il l'auteur du Ta'rīkh al-Fattāsh?', *BIFAN*, B, 33, 4, pp. 665–74.
Levtzion, N. (1971c) 'A seventeenth century chronicle by Ibn al-Mukhtār: a critical study of Ta'rīkh al-Fattāsh', *BSOAS*, 34, 3, pp. 571–93.
Levtzion, N. (1973) *Ancient Ghana and Mali* (London: Methuen; Studies in African history, 7).
Levtzion, N. (1977) 'The western Maghrib and Sudan', in R. Oliver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Cambridge: CUP), Vol. 3, pp. 331–414.
Lewicki, T. (1964) 'Traits d'histoire du commerce trans-saharien: marchands et missionnaires ibadites au Soudan occidental et central au cours des 8e–20e siècles', *EP*, 8, pp. 291–311.
Lewicki, T. (1966) 'A propos de la génèse de *Nuzhat al-Mūstāq fi-Htirāq al-āfāq* d'al-Idrisi', *SM*, 1, pp. 41–55.
Lewicki, T. (1967) 'Les Ecrivains arabes du Moyen Age au sujet des pierres précieuses et des pierres fines en territoire africain et leur exploitation', *AB*, 7, pp. 49–68.
Lewicki, T. (1971) 'The Ibadites in Arabia and Africa', *CHM*, 13, 1, pp. 51–81.
Lewicki, T. (1974) *Arabic external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Africa to the south of Sahara* (London: Curzon Press), 2nd edn.
Lewis, B. (1970) 'The central Islamic lands', in P. M. Hol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Cambridge: CUP), Vol. 2, pp. 175–230.
Lezine, A. (1971) *Deux villes d'Ifriqiya: Sousse, Tunis: études d'archéologie, d'urbanisme, de démographie* (Paris: Geuthner; Bibliothèque d'études islamiques), 2.
Lhote, H. (1955, 1956)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Touareg soudanais', *BIFAN*, B, 17, 3–4, pp. 334–470; 18, 3–4, pp. 391–407.
Libro del conoscimiento de todos los reynos, tierras, senorios que son por el mundo (n.d.); 1877 ed. J. Jimenes de la Espada (Madrid: Fortanet); 1912 Eng. transl., *Book of the knowledge of all the kingdoms, lands and lordship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Linschoten, J. H. van (1885) *The voyage to the East Indies*, 2 vol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Livingstone, F. B. (1962) 'Anthrop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sickle-cell gene distribution in West Africa', in A. Montagu (ed.),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man* (New York: OUP), pp. 271–99.
Lo Jung-Pang (1955)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sea power during the late Sung and early Yuan periods', *FEQ*, 14, 4, pp. 489–503.
Lo Jung-Pang (1957) 'China as a sea power: 1127–1368'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mbard, M. (1972) *Espaces et réseaux au haut Moyen Age* (Paris: Mouton).
Lombard, J. (1973) 'La Royauté sakalava: formation, développement et effrandrement du 17e au 20e siècle: essai d'analyse d'un système politique' (unpublished).
Lonis, R. (1978) 'Les conditions de navigation sur la côte occidentale de l'Afrique dans l'antiquité: le problème du retour', in *Colloque: Afrique noire et monde méditerranéen dans l'antiquité* (Dakar: NEA).
Lopes, D. (1591): see Pigafetta, F. and Lopes, D.
Lopez, R. S. (1974) *La révolution commerciale dans l'Europe médievale* (Paris: Aubier-Montaigne).
Lovejoy, P. E. (1973), 'The Wangara impact on Kano', *KS*.
Lovejoy, P. E. (1978) 'The role of the Wangara i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central Sudan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JAH*, 19, 2, pp. 173–93.
Lubogo, Y. K. (1960) *A history of the Basoga* (Nairobi: East Africa Literature Bureau).
Lucas, S. A. (1968) 'Baluba et Aruund: étude comparative des structures socio-politiques, 2 vol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aris).
Lukas, J. (1939) 'The linguistic research between Nile and Lake Chad', *Africa*-(L), 12, 1, pp. 335–49.
Lwamgira, F. X. (1949) *Amakuru ga Kiziba*; 1969 Eng. transl., E. R. Kamuhangire, *The history of Kiziba and its kings* (Kampala: Makerere University College).
Ly-Tall, M. (1972)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e *Ta'rikh el-Fettach*', *BIFAN*, B, 34, 3, pp. 471–93.
Ly-Tall, M. (1977)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empire du Mali, (13e–16e siècles). limites, principales provinc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Dakar: NEA).
Ly-Tall, M. (1981) 'Quelques précisions sur les relations entre l'empire du Mali et du Gabu', in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ur les traditions orales du Gabu, 1980* (*Ethiopiques*, numéro spécial, October 1981), pp. 124–8.

McCall, D. F. (1968) 'Kisra, Chosroes, Christ', *AHS*, 1, 2, pp. 255–77
MacGaffey, W. (1970) 'The religious commissions of the Bakongo', *MAN*, 5, 1, pp. 27–38.
McIntosh, R. J. (1980): see Keech, S. and McIntosh, R. J.
McIntosh, R. J. and McIntosh, S. K. (1981) 'The inland Niger delta before the empire of Mali: evidence from Jenne-Jeno', *JAH*, 22, 1, pp. 1–22.

MacMichael, H. A. (1920) 'The Tungur-Fur of Dar Furnung', *SNR*, 3, 1, pp. 24–72.
MacMichael, H. A. (1922) *A history of the Arabs in the Sudan, and some account of the people who preceded them and of the tribes inhabiting Darfūr*, 2 vols (London: CUP).
MacMichael, H. A. (1967) *The tribes of northern and central Kordofān* (London: Cass).
al-Madani, A. T. (1972) *Harb al-thalathmi' a sanat bayna al-Djaza'ir wa Isbaniyya 1492–1792* (Algiers).
Magalhães Godinho, V. de: see Godinho, V. de Magalhães
Maggs, T. M. O'C. (1976a) *Iron Age communities of the southern Highveld* (Pietermaritzburg: Council of the Natal Museum; Occasional publication, 2).
Maggs, T. M. O'C. (1976b) 'Iron Age patterns and Sotho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Highveld: South Africa', *WA*, 7, 3, pp. 318–32.
al-Maghīlī, Muḥammad b. 'Abd al-Karīm (c. 1490), untitled treatise written for Askiya Muḥammad of Gao; 1932 Eng. transl. T. H. Baldwin, *The obligations of princes: an essay of Moslem kingship* (Beirut: Imprimerie catholique); 1975 partial French transl. in J. Cuoq (q.v.), pp. 398–432.
Mahefamanana, M. (1965) *Ali-Tawarath sy Madagasikara 1495–1548* (Tananarive: Imp. Iarivo).
Mahjoubi, A. (1966) 'Nouveau témoignage épigraphique sur la communauté chrétienne de Kairouan au 11e siècle', *Africa* (Tunis), pp. 85–96.
Maḥmūd Ka'ti: see Ka'ti, Maḥmūd
Mainga, M. (1973) *Bulozi under the Luyana kings: political evolu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in pre-colonial Zambia* (London: Longman).
al-Makkarī, Abu 'l-'Abbās Aḥmad b. Muḥammad (17th cent.) *Nafḥ al-Ṭīb min Ghuṣn al-Andalūs al-Ratib* . . .; 1949 edn, 10 vols (Cairo); 1840, 1843 Eng. transl. P. de Gayangos,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2 vols (London: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55, 1861, French transl. R. Dozy *et al.*, *Annalectes sur l'histoire et la littérature des arabes d'espagne*, 2 vols (Leiden: Brill).
al-Makrīzī, Abu 'l-'Abbās Aḥmad b. 'Alī (before 1442) MS (a) 'al-Khbar an adjnas al-Sudan' (MSS, Arabic 1744, folio 194v–195r)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al-Makrīzī, Abu 'l-'Abbās Aḥmad b. 'Alī (before 1442) MS (b) 'al-Khbar an adjnas al-Sudan' (MSS, Cod. Or 372a, folio 339v–340r) Leiden: Rijksuniversität Bibliothek); 1820 ed. and Latin transl. H. A. Hamaker, *Specimen catalogi codicum Mss. orientalium bibliothecae Academiae lugduno-batavae* (Leiden: Luchtmans); 1979 French transl. D. Lange, 'Un texte de Makrīzī sur les "races du Soudan"', *Annales islamologiques*, 15, pp. 187–209.
al-Makrīzī, Abu 'l-'Abbās Aḥmad b. 'Alī (before 1442) *Macrizi historia regum islamiticorum in Abyssinia*, 1790 ed. and Latin transl. F. T. Rinck (Leiden: Luchtmans).
al-Makrīzī, Abu 'l-'Abbās Aḥmad b. 'Alī (before 1442) *al-Ilmām bi akhbar man bi-arḍ al-Ḥabasha min mulūk al-Islam* 1895 edn (Cairo).
al-Makrīzī, Abu 'l-'Abbās Aḥmad b. 'Alī (before 1442) *Kitāb al-Sulūk li-ma 'rifa duwal al-mulūk*; 1934, 1956 edn (Cairo).
al-Makrīzī, Abu 'l-'Abbās Aḥmad b. 'Alī (before 1442) *al-Dhahab al-masbūk fi dhikr man hadjdja* . . .; 1955 edn (Cairo); 1975 partial French transl., *Les Pèlerinages des sultans du Takrūr* in J. M. Cuoq (q.v.), pp. 390–3.
Mâle, E. (1923) 'Les Influences arabes dans l'art roman', *RDM*, ser. 13, 18, pp. 311–43.
Mālik b. Anas (8th cent.) *Kitāb al-Muwaṭṭa'*; 1962, 1967, edn with commentary, *Muwaṭṭa' 'l-Imām Mālik* (Cairo).
Malowist, M. (1966) 'Le Commerce d'or et d'esclaves au Soudan occidental', *AB*, 4, pp. 49–72.
Malowist, M. (1969a) 'Les Débuts au système de plantations dans la période des grandes découvertes dans l'ile de St Thomas', *AB*, 10, pp. 9–30.
Malowist, M. (1969b) *Europa a Afryka Zachodina w dobie wczesnej ekspansji kolonialnej* (Warsaw: Pan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Malowist, M. (1970) '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e commerce de l'or dans le monde occidental au Moyen-Age', *AESC*, 25, pp. 1630–6.
Mané, M. (1978)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Kaabu, des origines au 19e siècle', *BIFAN*, B, 40, 1, pp. 87–159.
Mané, M. (1981) 'Les origines et la formation du Kaabu,' in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ur les traditions orales du Gabu, 1980* (*Ethiopiques*, numéro spécial, October 1981), pp. 93–104.
Manessy, G. (1963) 'Rapport sur les langues voltaïques', in *Actes du 2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linguistique négro-africaine, Dakar, 1962*, pp. 239–66 (no further details available).
Manoukian, M. (1951) *Tribes of Northern Territories of the Gold Coast* (London: IAI; Ethnographic survey of Africa: Western Africa), p. 5.
Maquet, J. J. P. (1961) *The premise of inequality in Ruanda: a study of political relations in a Central African Kingdom* (London: OUP for IAI).
Marc, L. F. (1909) *Le Pays mossi* (Paris: Larose).

Marçais, G. (1913) *Les Arabes en Berbérie du 11e au 14e siècle* (Constantine/Paris: Leroux).

Marçais, G. (1950) *Tlemcen* (Paris: Renouard; Les Villes d'art célèbres).

Marçais, G. (1954) *Architecture musulmane d'Occident: Tunisie, Algérie, Maroc* (Paris: Arts et Métiers Graphiques).

Marees, P. de (1602) Dutch edn; 1605 French transl., *Description et récit historique du riche royaume d'or de Guinée* ... (Amsterdam: Claessen); 1605 abridged Eng. Transl., *Description and historical declaration of the golden kingdom of Guinea*.

Maret, P. de (1977) 'Sanga: new excavations, mode data and some related problems', *JAH*, 18, 3, pp. 321–37.

Maret, P. de and Msuka, F. (1977) 'History of Bantu metallurgy: some linguistic aspects', *Africana Linguistica*, 4, pp. 43–66.

Maret, P. de, van Noten, F. and Cahen, D. (1977) 'Radiocarbon dates from West Central Africa: a synthesis', *JAH*, 18, 4, pp. 481–505.

Marks, S. (1969) 'The traditions of the natal Nguni: a second look at the work of A. T. Bryant', in L. M. Thompson, *African societies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pp. 126–44.

Mármol Carvajal, L. del (1667) *L'Afrique de Marmol*, tr. N. Perrot, 3 vols (Paris: Billaine).

Marquart, J. (1913) *Die Benin-Sammlung des Reichsmuseums für Völkerkunde in Leiden* (Leiden: Brill; Veroffentlichungen des Reichsmuseums für Völkerkunde in Leiden, Ser. 2, 7).

al-Marrākushī: see: Ibn 'Idhārī al-Marrākushī

Martin, B. G. (1969) 'Kanem, Bornu and the Fezza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a trade route', *JAH*, 10, 1, pp. 15–27.

Martin, P. (1972) *The external trade of the Loango coast, 1576–1870: the effects of changing commercial relations on the Vili kingdom of Loango*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artini, R. (13th cent.) *Pugio fidei adversus Mauros et Judaeos*; 1687 edn (Leipzig, Frankfurt); 1872 (Paris: Sciaparelli); 1968 edn (Farnborough: Gregg).

Martini, R. (13th cent.) 'Vocabulista in arabico', MSS (Florence: Biblioteca Riccardiana).

Mashafa Senkesar (1928) *The book of the saints of the Ethiopian Church*, Eng. transl. E. A. Wallis Budge, 4 vols (London: CUP).

Mas Latrie, L. de (1866) *Traités de paix et de commerce et documents divers concernant les relations des chrétiens avec les Arabes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au Moyen Age* (Paris: Plon).

Mas Latrie, L. de (1886) *Relations et commerce de l'Afrique septentrionale ou Maghreb avec les nations chrétiennes* (Paris: Firmin-Didot).

Mason, M. D. (1970–1) 'The Nupe kingdo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political history' (doctoral dissertation, Birmingham University).

Mason, R. (1962) *Prehistory of the Transvaal, a record of human activity*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Mason, R. J. (1973) 'Early Iron Age settlements of Southern Africa', *SAJS*, 69, pp. 324–6.

Massignon, L. (1906) *Le Maroc dans les premières années du 16e siècle: tableau géographique d'après Leon l'Africain* (Alger: Jourdan).

al-Mas'ūdī, Abu 'l-Hassan 'Alī b. al-Ḥusayn b. 'Alī (10th cent.) *Murūdj al-dhahab*; 1861–77 ed and French transl. C. Barbier de Meynard and J. Pavet de Courteille, *Les Prairies d'or*, 9 vols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962–71, French transl. C. Pellat, *Les Prairies d'or* (Paris: Société asiatique); partial French transl. in J. Cuoq (q. v.), pp. 59–62.

Mathew, G. (1951) 'Islamic merchant cities of East Africa', *Times*, 26th June, p. 5.

Mathew, G. (1953) 'Recent discoveries in East African archaeology', *Antiquity*, 27, 108, pp. 212–18.

Mathew, G. (1956) 'Chinese porcelain in East Africa and on the coast of south Arabia', *OA*, n.s., 2, 2, pp. 50–5.

Mathew, G. (1958) 'The East Coast cultures', *South Africa*, 2, pp. 59–62.

Matiyela (1979) 'Port St John's Iron Age sites', *NAk*, 14, pp. 51 ff.

Matveiev, V. V. (1971) 'Zaniatiia vostochnykh bantu (zindzhei v X–XIII vv.: Les métiers des Zendjs est-africains pendant les 10e–12e siècles', in *Africana Etnografiia, istoriia, izzyki narodov Afriki*) (Leningrad; Akademiia nauk SSSR. Trudy Instituta etnografii im. N. N. Miklukho-Maklaia, n.s., 96; Afrikanskii etnograficheskii sbornik, 8).

Matveiev, V. V. and Kubbel, L. E. (1965) *Arabskie istochniki X–XII vekov*. Podgotovka tekstov i perevody V. V. Matveieva i L. E. Kubbelia (Moscow: Nauka; Drevnie i srednevekovye istochniki po etnografii i istorii narodov Afriki iuzhnee Sakhary, 2).

Mauny, R. (1948) 'L'Afrique occidentale d'après les auteurs arabes anciens', *NA*, 6, 40, p. 6.

Mauny, R. (1949) 'L'expédition marocaine d'Ouadane (Mauritanie), vers 1543–1544', *BIFAN*, B, 11, pp. 129–40.

Mauny, R. (1950) 'Les Prétendues Navigations dieppoises à la côte occidentale d'Afrique au 14e siècle', *BIFAN*, B, 12, pp. 122–34.

Mauny, R. (1957) 'Etat actuel de nos connaissances sur la préhistoire et l'archéologie de la Haute-Volta', *NA*, 73, pp. 16–24.
Mauny, R. (1960) *Les Navigations médiévales sur les côtes sahariennes antérieures à la découverte portugaise, 1434* (Lisbon: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Mauny, R. (1961) *Tableau géographique de l'Ouest africain au Moyen Age d'après les sources écrites, la tradition orale et l'archéologie* (Dakar: IFAN; Mémoires, 61).
Mauny, R. (1963) 'Poteries engobées et peintes de tradition nilotique de la région de Koro Toro (Tchad)', *BIFAN*, B, 25, 1–2, pp. 39–46.
Mauny, R. (1965) 'Navigations arabes anonymes aux Canaries au 12e siècle', *NA*, **106**, p. 61.
Mauny, R. (1971) 'Hypothèses concernant les relations pré-colombiennes entre l'Afrique et l'Amérique', *AEA*, 17, pp. 369–84.
Mayers, W. F. (1874–6) 'Chines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China Review*, 3, 2, pp. 219–331; 4, pp. 61–7, 173–90.
M'Baye, E. H.-R. (1972) 'Un Aperçu de l'Islam ou: réponses d' al-Magili aux questions, posées par Askia El-Hadj Muhammad, empereur de Gâo', *BIFAN*, B, 34, 1–2, pp. 237–67.
Médeiros, F. de (1973) 'Recherches sur l'image des noirs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13–15e siècle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aris).
Méditerranée et Océan Indien (1970) *Travaux du six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Venice, 1962* (Paris: SEVPEN).
Meek, C. K. (1925) *The northern tribes of Nigeria: an ethnological account of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Nigeria together with a report on the 1921 decennial census*, 2 vols (London: OUP).
Meek, C. K. (1931a) *A Sudanese kingdom: an ethnographical study of the Jukun-speaking peoples of Nigeri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Meek, C. K. (1931b) *Tribal studies in northern Nigeria*, 2 vol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Meillassoux, C. (ed.) (1971)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trade and markets in West Africa: studies presented at the 10th International African Seminar, 1969* (London: IAI).
Meillassoux, C. (ed.) (1975) *Esclavage en Afrique précoloniale* (Paris: Maspero).
Meillassoux, C., Doucouré, L. and Simagha, D. (eds) (1967) *Légende de la dispersion des Kusa (épopée soninké)* (Dakar: IFAN; Initiations et études africaines, 22).
Menéndez Pidal, R. (1941) *Poesía árabe y poesía europea* (Buenos Aires: Espasa-Calpe Argentina).
Merad, A. (1957) ''Abd al-Mu'min à la conquête de l'Afrique du nord, 1130–1163', *AIEOA*, 15, pp. 109–63.
Merad, A. (1960–1) 'Origine et voies du réformisme en Islam', *AIEOA*, 17–19, pp. 359–402.
Merad, A. (1962) *AIEOA*, 20, 2, pp. 419 ff.
Meyerhof, M. (1935) 'Esquisse d'histoire de la pharmacologie et botanique chez les musulmans d'Espagne', *al-Andalus*, 3, pp. 1–41.
Michalowski, K. (1965) 'La Nubie chrétienne', *AB*, 3, pp. 9–26.
Michalowski, K. (1967) *Faras, die Kathedrale aus dem Wüstensand* (Zürich: Benzinger).
Mieli, A. (1966) *La Science arabe et son rôle dans l'évolution scientifique mondiale* (Leiden: Brill).
Miers, S. and Kopytoff, I. (eds) (1977) *Slavery in Africa: histor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ille, A. (1970)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s villages fortifiés de l'Imérina ancien*, 2 vols (Tananarive: Musée d'art et d'archéologie; Travaux et documents, 2–3).
Mille, A. (1971) 'Anciens horizons d'Ankatso', *Taloha*, 4, pp. 117–26.
Miller, J. C. (1972a) 'The Imbangala and the chronology of early central African history', *JAH*, 13, 4, pp. 549–74.
Miller, J. C. (1972b) 'Kings and kinsmen: the Imbangala impact on the Mbundu of Angola'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ler, J. C. (1972c) 'A note on Kasanze and the Portuguese', *CJAS*, 6, 1, pp. 43–6.
Miller, J. C. (1973) 'Requiem for the Jaga', *CEA*, 49, pp. 121–49.
Miller, J. C. (1976) *Kings and Kinsmen: early Mbundu states in Angol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Miller, K. (1926–31) *Mappae Arabicae; arabische Welt- und Länderkarten des 9–13. Jahrhunderts in arabischer Ursschrift*, 6 vols (Stuttgart).
Millot, C. (1912) 'Les Ruines de Mahilaka', *BAM*, 10, pp. 283–8.
Miquel, A. (1967–75) *La Géographie humaine du monde musulman jusqu'au milieu du 11e siècle* (Paris: Mouton; Civilisations et Sociétés, 7, 37).
Miracle, M. P. (1963) 'Interpretation of evidence on the introduction of maize into West Africa', *Africa*-(L), 33, pp. 132–5.
Miracle, M. P. (1965) 'The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of maize in Africa', *JAH*, 6, 1, pp. 39–55.
Mischlich, A. (1903)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Haussastaaten', *MSOS*: Afrikanische Studien, 6, pp. 137–242.

Misiugin, V. M. (1966) 'Suakhiliiskaia khronika srednevekovnogo gosudarstva Pate: La Chronique swahili de l'état médiéval du Paté', in *Africana. Kul'tura i iazyki narodov Afriki*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Trudy Instituta etnograffii im. N. N. Miklukho-Maklaia. n.s., 90, Afrikanskii etnograficheskii sbornik, 6), pp. 52–83.

Misiugin, V. M. (1971) 'Zamechaniia k starosuakhiliiskoi pis'mennosti: Notes sur l'écriture ancienne Souahéli', in: *Africana. Etnografiia, istoriia, iazyki narodov Afriki* (Leningrad: Akademiia nauk SSSR. Trudy Instituta etnograffii im. N. N. Miklukho-Maklaia. n.s. 96; Afrikanskii etnograficheskii sbornik, 8), pp. 100–15.

Misiugin, V. M. (1972) 'K voprosu o proiskhozhdenii moreplavaniia: sudostroeniia v indiiskom okeane: Contribution à la question de l'origine de la navigation et de la construction navale dans l'Océan Indien', in *Soobshchenie ob issledovanii protoindiiskikh tekstov* (Moscow: Akademiia nauk SSSR. Trudy Instituta etnografii im. N. N. Miklukho-Maklaia).

Mollat, M. (1972) "Le Passage" de Saint Louis à Tunis: sa place dans l'histoire des croisades', *RHES*, 50, 3, pp. 289–303.

Mollat, M. (1980) 'Historical contacts of Africa and Madagascar with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the role of the Indian ocean' in Unesco (1980a), q.v., pp. 45–60.

Monchicourt, C. (1939) *Etudes kairouanaises: Kairouan et les Chabbia, 1450–1592* (Tunis).

Mones, H. (1962), 'Le Malékisme et l'échec des Fatimides en Ifrikya', in: *Etudes d'orientalisme dédiées à la mémoire d'E. Lévi-Provençal*, 2 vols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Monlaü, J. (1964) *Les Etats barbaresques* (Paris: PUF; Que sais-je 1097).

Monneret de Villard, U. (1938) *Storia della Nubia cristiana* (Rome; Pontificium Institutum Orientalium Studiorum Orientalia christiana analecta, 118).

Monneret de Villard, U. (1944) *Lo studio dell'Islam in Europa nel 12 e nel 13 secolo* (Vatican City: Biblioteca Vaticana; Studi e testi, 110).

Montagne, R. (1930) *Les Berbères et le makhzen dans le sud du Maroc: essai sur la transformation politique des Berbères sédentaires (groupe chleuh)* (Paris: Alcan).

Monteil, C. (1929) 'Les Empires du Mali: étude d'histoire et de sociologie soudanaise', *BCEHSAOF*, 12, 3–4, pp. 291–444; 1968 edn, *Les Empires du Mali*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Monteil, C. (1951) 'Problèmes du Soudan occidental: Juifs et Judaisés', *Hespéris*, 38, pp. 265–98.

Monteil, V. (1964) *L'Islam noir* (Paris: Seuil).

Monteil, V. (1966) *Esquisses sénégalaises: Wâlo, Kayor, Dyolof, Mourides, un visionnaire* (Dakar: IFAN; Initiations et études africaines, 21).

Monteil, V. (1968) 'Al-Bakri (Cordoue, 1068). Routier de l'Afrique blanche et noire du nord-ouest', *BIFAN*, B, 30, 1, pp. 39–116.

Monteiro, A. (1970) 'Vestiges archéologiques du cap Delgado et de Quisiva: (Mozambique)', *Taloha*, pp. 155–64.

Moorsel, H. van (1968) *Atlas de préhistoire de la plaine de Kinshasa* (Kinshasa: University of Lovanium).

Morris, H. F. (1962) *A history of Ankole* (Nairobi: East African Literature Bureau).

Mufaḍḍal b. Abī 'l-Faḍā'il (Mufazzal) (14th cent.) 1973–4 French transl. E. Blochet, *Histoire des sultans mamelouks* (Turnhout: Brepols; Patrologia orientalis, 12, 3; 14, 3; 20, 1).

Muḥammad al-Ukbani al-Tilimsānī (n.d.) *Tuḥfat al-nāẓir*; 1967 ed. A. Chenoufi, 'Un Traité de ḥisba', *BEO*, 19, pp. 133–344.

Muḥammad b. Khalīl, Ibn Ghalbūn (n.d.) *Ta'rīkh Tarābulus al-Gharb*; 1930 edn (Cairo); 1970 ed. Mahmad Naji (Benghazi).

Muḥammad Bello, M. (n.d.) *Infāḳ al-Maysūr*; 1922 ed. and transl. E. J. Arnett, *The rise of the Sokoto Fulani* (Kano: Emirate Printing Department).

Munthe, L. (1977) 'La Tradition écrite arabo-malgache: un aperçu sur les manuscrits existants', *BSOAS*, 40, 1, pp. 96–109.

Murdock, G. P. (1959) *Africa: its peoples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Musa, I. U. A. (1969) 'Tanẓīmāt al-muwaḥḥidīn wa-nuzumhum fī 'l Maghrib', *Abhath*, 33, 1.4, pp. 53–89 (dissertation,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Mworoha, E. (1977) *Peuples et rois de l'Afrique des lacs au 19e siècle: le Burundi et les royaumes voisins* (Abidjan: NEA).

Nachtigal, G. (1879, 1881, 1889) *Sahara und Sudan: Ergebnisse sechsjahriger Reisen in Afrika*, Vols 1 and 2 (Berlin: Weidmann), Vol. 3 (Leipzig: Brockhaus); 1967 reprint (Graz: Akademie Drüker); 1971, 1974 (in progress) Eng. transl. A. G. B. and H. J. Fisher (London).

Nadel, S. F. (1942) *A black Byzantium: the kingdom of Nupe in Nigeria* (London/New York: OUP for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l-Naqar, U. A. (1971)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e Sudan Road"', in Y. F. Hasan (ed.), *Sudan in Africa* (Khartoum: Khartoum University Press), pp. 98–108.
Ndoricimpa, L., *et al.* (1981) 'Technologie et économie du sel végétal au Burundi', in *La Civilisation ancienne des peuples des grands lacs; colloque de Bujumbura* (Paris: Karthala, Centre de civilisation burundaise), pp. 408–16.
Nelli, R. (ed.) (1960) *Les Troubadours*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Neufville, R. de and Houghton, A. A. (1965) 'A description of Ain Farah and of Wara', *Kush*, 13, pp. 195–204.
Nganwa, K. K. (1948) *Abakozire eby'okutangaza omuri Ankole* ... (Nairobi: Eagle Press).
Ngcongco, L. (1980) 'Problems of Southern African historiography', in Unesco (1980b), q.v.
Niane, D. T. (1960; 2nd edn 1971) *Soundjata ou l'épopée mandingu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Niane, D. T. (1975) *Recherches sur l'empire du Mali au Moyen Age*, followed by *Mise en place des populations de la Haute-Guinée*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Nicolas, G. (1969) 'Fondements magico-religieux du pouvoir au sein de la principauté hausa du Gobir', *JSA*, 39, 2, pp. 199–231.
Nicolas, G. (1979) 'La question du Gobir', Paper presented to the Zaria Seminar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Sudan before 1804.
Niven, C. R. (1957) 'Nigeria: past and present', *AA*, 56, 225, pp. 265–74.
Noten, F. van (1968) *The Uelian: a culture with a neolithic aspect, Uele Basin (N.E. Congo Republic):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Tervuren: Annales du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série in octavo: sciences humaines, 64).
Noten, F. van (1972) 'La plus ancienne sculpture sur bois de l'Afrique centrale', *A–T*, 18, 3–4, pp. 133–6.
Nougarède, M. P. (1964) 'Qualités nautiques des voies arabes', in *Océan Indien et Méditerranée; actes du six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Lourenço Marques, 1962* (Paris: SEVPEN), pp. 95–122.
Nurse, D. (1974) 'A linguistic sketch of the north-east Bantu language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Chaga history',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Nurse, D. (1979)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aga dialects: languages and history on Kilimanjaro, the Taita Hills, and the Pare Mountains* (Hamburg: Buske).
Nurse, D. and Phillipson, D. W. (1974) 'The north-eastern Bantu languages of Tanzania and Kenya: a classification'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Nyakatura, J. (1936–7) 'Abakama ba Bunyoro-Kitara', *UJ*, 3, 1, pp. 155–60; 4, 1, pp. 75–83; 5, 2, pp. 53–69.
Nyakatura, J. (1947) *Abakama ba Bunyoro Kitara* (St Justin, P.Q., Canada: White Fathers Society); 1973 edn and transl., *Abakama ba Bunyoro-Kitara: The Kings of Bunyoro-Kitara* (Garden City: Anchor Press).

L'Occidente e l'Islam nell'alto medievo (1965) 2 vols (Spoleto: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Alto Medievo).
O'Fahey, R. S. (1974) 'The Sudan papers of the Rev. Dr A. J. Arkell', *SNR*, 55, pp. 172–4.
O'Fahey, R. S. (1977) 'The office of Qadi in Darfur: a preliminary inquiry', *BSOAS*, 40, 1, pp. 110–24.
Ogot, B. A. (1967) *A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Luo*, Vol. 1: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500–1900* (Nairobi: EAPH).
Ogot, B. A. and Kieran, J. A., (eds) (1968) *Zamani: a survey of East African history* (Nairobi: EAPH).
Olbrechts, F. M. (1941) *Bijdrage tot de kennis van de chronologie der afrikaansche plastiek* (Brussels: Van Campenhout;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class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10, 2).
Olderogge, D. A. (1960) *Zapadnyi Sudan v piatnadtsatykh deviatnadtsatykh vv* (The western Sudan in the sixteenth-nineteenth centuries) (Moscow: Nauk).
Oliver, R. (1953) 'A question about the Bachwezi', *UJ*, 17, 2, pp. 135–7.
Oliver, R. (1955) 'The traditional histories of Ankole, Buganda and Bunyoro', *JRAI*, 85, 1–2, pp. 111–18.
Oliver, R. (1959) 'Ancient capital sites of Ankole', *UJ*, 23, 1, pp. 51–63.
Oliver, R. (1962) 'Reflections on the sources of evidence for the precolonial history of East Africa', in *The historian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Ibadan/Accra: OUP for IAI), pp. 305–21.
Oliver, R. (1966) 'The problem of the Bantu expansion', *JAH*, 7, 3, pp. 361–76.
Oliver, R. and Mathew, G. (eds) (1963–76) *History of East Africa*,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Ottenberg, S. (1961) 'Present state of Igbo studies', *JHSN*, 2, 2, pp. 211–30.

Ottino, P. (1974a) 'La Hiérarchie sociale et l'alliance dans le royaume de Matacassi des 16e et 17e siècles', *Tantara*, 1, pp. 52–105.
Ottino, P. (1974b) *Madagascar, les Comores et le sud-ouest de l'Océan indien: projet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s* (Antananarivo: Centre d'anthropologie culturelle et sociale).
Ottino, P. (1975) *Le Moyen Age de l'Océan indien et le peuplement de Madagascar* (Ile de la Réunion).
Ozanne, P. (1969) 'Atmospheric radiocarbon', *WAAN*, 11, pp. 9–11.

Pacheco Pereira, D. (1505–6) *Esmeraldo de situ orbis*; 1905 ed. A. Epiphanio da Silva Dias (Lisbon: Typ. Universal); 1937 ed. and Eng. transl. G. H. T. Kimble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4 ed D. Peres (Lisbon: Typ. Universal); 1956 French transl. R. Mauny (Bissau: Publicações do Centro de estudos da Guiné portuguêsa, 19).
Paden, J. N. (1973) *Religion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Kan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geard, R. (1962a) 'Contribution critique à la chronologie historique de l'ouest africain, suivie d'une traduction des "tables chronologiques" de Barth', *JSA*, 32, 1, pp. 91–117.
Pageard, R. (1962b) 'Réflexions sur l'histoire des Mossi', *L'Homme*, 2, 1, pp. 111–15.
Pageard, R. (1963) 'Recherches sur les Nioniossé', *EV*, 4, pp. 5–71.
Pagès, A. (1933) *Au Ruanda, sur les bords du lac Kivu (Congo belge). Un royaume hamite au centre de l'Afrique* (Brussels: Memoires de l'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classes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1).
Palmer, H. R. (ed.) (1909) 'The Kano Chronicle', *JAI*, 38, pp. 58–98; reprinted in H. R. Palmer, (1928), q.v., Vol. 3, pp. 97–132.
Palmer, H. R. (1914, 1915) 'An early Fulani conception of Islam', *JAS*, 13, pp. 407–14; 15, pp. 53–9, 185–92.
Palmer, H. R. (1927) 'History of Katsina', *JAS*, 26, pp. 216–36.
Palmer, H. R. (1928) *Sudanese memoirs: being mainly translations of a number of Arabic manuscripts relating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Sudan*, 3 vols (Lagos: Government Printer); 1967 edn (London: Cass).
Palmer, H. R. (ed.) (1932): see Ibn Furṭūwa, Aḥmad
Palmer, H. R. (1936) *The Bornu, Sahara and Sudan* (London: Murray).
Pannetier, J. (1974) 'Archéologie des pays Antambahoaka et Antaimoro', *Taloha*, 6, pp. 53–71.
Papadopoulos, T. (1966) *Africanabyzantina: Byzantine influences on Negro-Sudanese cultures* (Athens: Grapbeion Demosieymaton Akademias Athenon; Pragmateiai tēs Akademias Athenon, 27).
Pardo, A. W. (1971) 'The Songhay empire under Sonni Ali and Askia Muhammade: a stud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s', in O. F. McCall and N. R. Bennett (eds), *Aspects of West African Islam* (Boston: African Studies Center, Boston University, Papers on Africa, 5), pp. 41–59.
Paul, A. (1955) 'Aidhab: a medieval Red Sea port', *SNR*, 36, pp. 64–70.
Paulme, D. (1956–7) 'L'Afrique noire jusqu'au 14e siècle', *CHM*, 3, 2, pp. 277–301; 3, pp. 561–81.
Pauwels, M. (1967) 'Le Bushiru et son Muhinza ou roitelet Hutu', *AL*, 31, pp. 205–322.
Pearce, S. and Posnansky, M. (1963) 'The re-excavation of Nzongezi rock shelter, Ankole', *UJ*, 27, 1, pp. 85–94.
Peires, J. B. (1973) *Chronology of the Cape Nguri till 190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elliot, P. (1933) '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T'oung Pao, 30, pp. 237–452.
Penn, A. E. D. (1931) 'The ruins of Zamkor', *SNR*, 14, pp. 179–84.
Peres, D. (1960) *Historia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êses*, 2nd edn (Coimbra: Edição do autor).
Perez-Embid, F. (1969) 'Navegacion y commercio en el puerto de Sevilla en la Baja Edad Media', in *Les routes de l'Atlantique: travaux du 9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 SEVPEN), pp. 43–96.
Perrot, C. (1974) 'Ano Asema: mythe et histoire', *JAH*, 15, 2, pp. 199–222.
Perruchon, J. (1889) 'Histoire des guerres d'Amda Seyou, roi d'Ethiopie', *JA*, série 8, 14, pp. 271–493.
Perruchon, J. (1893) 'Notes pour l'histoire d'Ethiopie: lettre adressée par le roi d'Ethiopie au roi Georges de Nubie sous le patriarcat de Philothée (981–1002 ou 3)', *RS*, 1, pp. 71–6.
Perruchon, J. (1894) 'Histoire d'Eskender, d'Amda-Seyou II et de Na'od, rois d'Ethiopie', *JA*, serie 9 3, pp. 319–84.
Person, Y. (1961) 'Les Kissi et leurs statuettes de pierre dans le cadre de l'histoire ouest africaine', *BIFAN*, B, 23, 1, pp. 1–59.
Person, Y. (1962) 'Le Moyen Niger au 15e siècle d'après les documents européens', *NA*, 78, pp. 45–57.
Person, Y. (1968) *Samori: une révolution dyula*, 3 vols (Dakar: IFAN; Mémoire, 80 ...).
Person, Y. (1970) chapter in H. J. Deschamps (ed.),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PUF), Vol. 1.

Person, Y. (1971) 'Ethnic movement and acculturation in Upper Guinea since the fifteenth century', *AHS*, 4, 3, pp. 669–89.
Phillipson, D. W. (1968) 'The Early Iron Age in Zambia: regional variants and some tentative conclusions', *JAH*, 9, 2, pp. 191–212.
Phillipson, D. W. (1974) 'Iron Ag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Zambia', *JAH*, 15, 1, pp. 1–25.
Phillipson, D. W. (1977) *The later prehistor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Pigafetta, F. and Lopes, D. (1591); 1881 Eng. transl. M. Hutchinson, *A report of the kingdom of Congo and the surrounding countries* (London: Murray), 1970 reprint (London: Cass); 1963, rev edn 1965, French transl. W. Bal, *Description du royaume de Congo* (Léopoldville/Kinshasa: University of Lovanium; Publication du Centre d'études des littératures romanes d'inspiration africaine, 4).
Poirier, C (1954) 'Terre d'Islam en mer malgache: (îlot Nosy Langany ou Nosy Manja)', *BAM*, no. spécial du cinquantenaire, pp. 71–116.
Polet, J. (1974) 'Feuilles d'enceinte à la Séguié', in Bonduku Seminar Papers, q.v.
Polet, J. (1976) 'Sondages archéologiques en pays éothilé: Assoco-Monobaha, Belibete et Anyanwa', *Godo-Godo*, 2, pp. 111–39.
Polo, Marco (1955) *Description du monde* (Paris: Klincksieck).
Portères, R. (1955) 'L'Introduction du maïs en Afrique', *JATBA*, 2, 5–6, pp. 221–31.
Posac Mon, C. (1959) 'Relaciones entre Genova y Ceuta durante el siglo XII', *Tamuda*, pp. 159–68.
Posnansky, M. (1966) 'Kingship,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myth', *UJ*, 30, 1, pp. 1–12.
Posnansky, M. (1968) 'The excavation of an Ankole capital site at Bweyorere', *UJ*, 32, 2, pp. 165–82.
Posnansky, M. (1971) 'East Africa and the Nile valley in early times', in Y. F. Hasan (ed.), *Sudan in Africa* (Khartoum: Khartoum University Press), pp. 51–61.
Posnansky, M. (1974) 'Archaeology and Akan civilisation', in Bonduku Seminar Papers, q.v.
Posnansky, M. (1975a) 'Archaeology, technology and Akan civilization', *JAS*, 3, pp. 24–38.
Posnansky, M. (1975b) 'Redressing the balance: new perspectives in West African archaeology', *Sankofa*, 1, 1, pp. 9–19.
Poulle, E. (1969) *Les Conditions de la navigation astronomique au 15e siècle* (Coimbra: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Agrupamento de estudos de cartografia antiga: serie separata, 27).
Premier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Bamako (1975) Actes du colloque, *L'Empire du Mali, histoire et tradition orale* (Paris: Fondation SCOA pour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n Afrique noire, Projet Boucle du Niger).
Princeps, J. (ed.) (1834–9) 'Extracts from the Mohi't, that is the Ocean, a Turkish work on navigation in the Indian seas', transl. J. von Hammer, *JRASB*, 1834, pp. 545–53; 1836, pp. 441–68; 1837, pp. 505–12; 1838, pp. 767–80; 1839, pp. 823–30.
Prins, A. H. J. (1961) *The Swahili speaking peoples of Zanzibar and the East African coast: Arabs, Shirazi and Swahili* (London: IAI, Ethnographic survey of Africa, East Central Africa, pt 12).
Prins, G. (1980) *The hidden hippopotamus: reappraisal in African history: the early colonial experience in western Zambia* (Cambridge: CUP).
Prost, A. (1953) 'Notes sur l'origine des Mossi', *BIFAN*, B, 15, 2, pp. 1933–8.

Q: for Arabic names sometimes spelt with Q, see under K
Quatremère, E. M. (1811) *Mémoires géographiques et historiques sur l'Egypte et sur les contrées voisines*, 2 vols (Paris: Schoell).

Rabi, H. M. (1972)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Egypt AH 564–741/AD 1169–1341* (London: OUP; London Oriental Studies, 25).
Raffenel, A. (1846) *Voyage dans l'Afrique occidentale exécuté en 1843–1844*, 2 vols (Paris: Bertrand).
Raffenel, A. (1856) *Nouveau voyage dans le pay des nègres*, 2 vols (Paris: N. Chaix)
Rainihifina, J. (1975) *Lovantsaina*, 2 vols (Fianarantsoa: Ambozontany).
Rainitovo (1930) *Tantaran 'ny Malagasy manontolo* (Tananarive: Paoli).
Raison, J. P. (1972), 'Utilisation du sol et organisation de l'espace en Imérina ancienne', in *Etudes de géographie tropicale offertes à Pierre Gourou* (Paris/The Hague: Mouton), pp. 407–26.
Raison, J. P. and Vérin, P. (1968) 'Le site des subfossiles de Taolambiby, sud-ouest de Madagascar, doit-il être attribué à une intervention humaine?' *AUM*, 7, pp. 133–42.
Ralaimihoatra, G. (1969) 'Le Peuplement de l'Imérina', *BLPHGAM*, 1, pp. 39–45.
Ralaimihoatra, G. (1971) 'Eléments de la connaissance des protomalgaches', *BAM*, 49, 1, pp. 29–33.
Ramiandrasoa, F. (1968) 'Tradition orale et histoire: les Vazimba, le culte des ancêtres en Imérina du 16e au 19e siècl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aris).
Ramiandrasoa, F. (1971) *Atlas historique du peuplement de Madagascar* (Antananarivo: University of Madagascar).

Ramilison, E. (1951–2) *Ny Loharanon 'ny Andriana manjaka teto Imerina*, 2 vols (Tananarive).
Ramon Marti: see Martini, R.
Randall-MacIver, D. and Mace, A. C. (1902) *El Amrah and Abydos*, pts 1–2 (London/Boston: Egypt Exploration Fund).
Randles, W. G. L. (1968) *L'Ancien Royaume du Congo, des origines à la fin du 19e siècle* (Paris: Mouton; Civilisations et sociétés, 14).
Randles, W. G. L. (1975) *L'Empire du Monomotapa du 15e au 19e siècle* (Paris: Mouton; Civilisations et sociétés, 46).
Ratsimbazafimahefa, P. (1971) *Le Fisakana: archéologie et couches culturelles*. (Tananarive: Musée d'art et d'archéologie de l'Université de Madagascar; Travaux et documents, 9).
Rattray, R. S. (1913) *Hausa folklore: customs and proverbs*, 2 vols (London: OUP); 1969 edn (New York: Negro University Press).
Rattray, R. S. (1929) *Ashanti law and constitu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attray, R. S. (1932) *Tribes of the Ashanti hinter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 vols.
Rau, V. (1967) 'Affari mercanti in Portogallo dal 14 al 16 secolo: Economia e storia', *RISES*, pp. 447–56.
Rau, V. (1975) 'Notes sur la traite portugaise à la fin du 15e siècle et le florentin Bartolomeo di Domenico Marchioni', in *Miscellanea offerts à Charles Verlinden à l'occasion de ses trente ans de professorat* (Ghent), pp. 535–43.
Ravoajanahary, C. (1980) 'The settlement of Madagascar: two approaches', in Unesco (1980a), q.v., pp. 83–94.
Recueil de littérature mandingue (1980) (Paris: Agence de coopération culturelle et technique).
Redhouse, J. W. (1862) 'History of the journal of the events ... during seven expeditions ... against the tribes of Bulala', *JRAS*, 19, pp. 43–123, 199–259.
Redmayne, A. (1968) 'The Hehe', in A. Roberts (ed.), *Tanzania before 1900* (Nairobi, EAPH), pp. 37–58.
Reefe, T. Q. (1975) *A history of the Luba empire to 1895* (doctoral disser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Reefe, T. Q. (1977) 'Traditions of genesis and the Luba diaspora', *HAJM*, 4, pp. 183–206.
Reefe, T. Q. (1981) *The rainbow and the kings; a history of the Luba empire to 1891* (Berkeley: University Press).
Renan, E. (1866, 1925) *Averroes et l'averroisme: essai historique* (Paris: Calmann-Levy).
Rennie, J. K. (1972) 'The precolonial kingdom of Rwanda: a reinterpretation', *TJH*, 2, 2, pp. 11–64.
Riad, M. (1960) 'The Jukun: an example of African migrations in the 16th century', *BIFAN*, B, 22, 3, pp. 476–86.
Ribeiro, O. (1962) *Aspectos e problemas da expansão portuguesa* (Lisbon: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Richard, R. (1936) 'Le commerce de Berbérie et l'organisation économique de l'empire portugais aux 15e et 16e siècles', *AIEOA*, 2, pp. 266–85.
Richard, R. (1955) *Etudes sur l'histoire des portugais au Maroc* (Coimbra).
Rigby, P. (1969) *Cattle and kinship among the Gogo: a semi-pastoral society of central Tanzan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iley, C. L. (ed.) (1971) *Man across the sea: problems of pre-Colombian contact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Robert, D., Robert, S. and Devisse, J. (1970) *Tegdaoust* (Paris: Arts et métiers graphiques).
Roberts, A. (1976) *A history of Zambia* (London: Heinemann).
Robineau, C. (1962) 'L'Islam aux Comores: une étude culturelle de l'île d'Anjouan', in P. Vérin (ed.), *Arabes et islamisés à Madagascar et dans l'Océan indien* (Tananarive: Revue de Madagascar), pp. 39–56.
Robson, J. A. (1959) 'The Catalan fleet and the Moorish sea power, 1337–1344', *EHR*, 74, pp. 386–408.
Rockhill, W. W. (1915)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Ormuz, coast of Arabia and Africa', *T'oung Pao*, 15, pp. 419–47; 16, pp. 604–26.
Rodney, W. (1966) 'African slavery and other forms of social oppression on the Upper Guinea coast in the context of the Atlantic slave-trade', *JAH*, 7, 3, pp. 431–43.
Rodney, W. (1970) *A history of Upper Guinea coast: 1545–18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omains, J. (1963) *Donogoo* (Paris: Gallimard).
Romano, R., Tenenti, A. and Tucci, U. (1970) 'Venise et la route du Cap: 1499–1517', in *Méditerranée et Océan indien; actes du six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 SEVPEN), pp. 109–40.

Rombaka, J. P. (1957) *Tantaran-drazana Antaimoro-Anteony: Histoire d'Antemero Anteony* (Tananarive: Soarano).
Roncière, C. de la: see la Roncière, C. de
Rosenberger, B. (1964) 'Autour d'une grande mine d'argent du Moyen Age marocain: le Jebel Aouam', *H-T*, 5, pp. 15–78.
Rosenberger, B. (1970) 'Les Vieilles Exploitations minières et les centres métallurgiques du Maroc: essai de carte historique', *RGM*, 17, pp. 71–107; 18, pp. 59–102.
Rouch, J. (1953)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s Songhay', in G. Boyer, *Un Peuple de l'ouest soudanais: les Diawara* (Dakar: IFAN; Mémoires, 29), pp. 141–261.
Rouch, J. (1954) *Les Songhay* (Paris: PUF).
Rouch, J. (1960) *La religion et la magie des Songhay* (Paris: PUF).
Rudner, J. (1968) 'Strandloper pottery from South and South-West Africa', *ASAM*, 49, 2, pp. 441–663.
Rudner, J. and Rudner, I. (1970) *The hunter and his art: a survey of rock art in southern Africa* (Cape Town: Struik).
Rwandusya, Z. (1972 and 1977) 'The origin and settlement of people in Bufimhira', in D. Denoon (ed.), *A history of Kigezi in South-West Uganda* (Kampala: National Trust, Adult Education Centre).

***Sa'ad, E.** (1979) paper in *KS*, 1, 4, pp. 52–66.
al-Sa'dī 'Abd al-Raḥmān b. 'Abd Allāh (1656) *Ta'rīkh al-Sūdān*; 1898 ed O. Houdas and E. Benoist, with 1900 French transl. O. Houdas, 2 vols (Paris: Leroux); 1964 rev. transl.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Saidi, A. (1963)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almohade: une première expérience d'unité maghrébin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yon).
al-Sakhāwī, Muḥammad b. 'Abd al-Raḥmān (15th cent.) *Kitāb al-tibr al-masbuk*; 1897 edn (Cairo).
al-Salāwī, Shihāb al-Dīn ... b. Ḥammād al-Nāṣirī (1894) *Kitāb al-Istiḳṣā li-Akhbār Duwal al-Maghrib al-akṣā*, 4 vols (Cairo); 1906–7 ed. and partial transl. E. Fumey (Paris: Leroux; Archives marocaines 9–10); 1923–5 ed. and French transl., 4 vols (Paris: Geuthner); 1954–6 ed. and French transl. *Histoire du Maroc*, 9 vols (Casablanca).
Salifou, A. (1971) *Le Damagaram, ou sultanat de Zinder au 19e siècle* (Niamey: Etudes nigériennes, 27, Centre nigérien de recherches en sciences humaines).
Salmon, M. G. (1904) 'Essai sur l'histoire politique du nord marocain', *AM*, 2, pp. 1–99.
Sanneh, L. (1976) 'The origin of clericalism in West African Islam', *JAH*, 17, 1, pp. 49–72.
Sarton, G. (1927–48)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3 vols (Baltimore: Carnegie Institute).
Sayous, A. E. (1929) *Le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à Tunis, depuis le 12e siècle jusqu'à la fin du 16e siècle* (Paris: Société d'éditions géographiques, maritimes et coloniales).
Schatzmiller, W. (1977) 'Etude d'historiographie mérinide: La Nafha al-nisriniyya et la Hawdat al-nisrin d'Ibn al-Ahmar', *Arabica*, 24, 3, pp. 258–68.
Schaube, A. (1906) *Handels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Völker des Mittelmeergebiets bis zum Ende der Kreuzzüge* (Berlin: Oldenbourg).
Schefer, C. (ed.) (1892) *Le voyage d'outre-mer de Bertrandon de la Brocquière* (Paris: Leroux).
Schlüter, H. (1972) *Index libycus: bibliography of Libya, 1958–1969, with supplementary material 1915–1956* (Boston: Hall).
Schlüter, H. (1979) *Index libycus, bibliography of Libya 1970–1975, with supplementary material* (Boston: Hall).
Schofield, J. F. (1948) *Primitive pottery: an introduction to South African ceramics,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Cape Town: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handbook series, 3).
Schoonraad, M. (ed.) (1971) *Rock paintings of South Afric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supplement 2).
Schwarz, E. H. L. (1938) 'The Chinese connections with Africa', *JRASB*, 5, pp. 175–93.
Schweeger-Hefel, A.-M. and Staude, W. (1972) *Die Kurumba von Lurum: Monographie eines Volkes aus Obervolta (West-Afrika)* (Vienna: Schendl).
Scully, R. T. K. (1978a) 'Phalaborwa oral tradi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inghamton).
Scully, R. T. K. (1978b) 'Report on South Africa', *NAk*, 13, pp. 24–5.
Sergew Hable Selassie (1972) *Ancient and medieval Ethiopian history to 1270* (Addis Ababa: United Printers).
Serjeant, R. B. (1963) *The Portuguese off the South Arabian coast: Hadramî chronicles with Yemeni and European accounts of Dutch pirates off Moch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erra Rafols, E. (n.d.) 'Los Mallorquinas en Canarias', *RHC*, 7, 54, pp. 195–209.

Shaw, T. (1970) *Igbo-Ukwu: an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eastern Nigeria*, 2 vol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for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Ibadan).
Shaw, T. (1973) 'A note on trade and the Tsoede bronzes', *WAJA*, **3**, pp. 233–8.
Shaw, W. B. K. (1936) 'The ruins at Abu Sufyan', *SNR*, **19**, pp. 324–26.
Shinnie, P. L. (1965) 'New light on medieval Nubia', *JAH*, **6**, 3, pp. 263–73.
Shinnie, P. L. (ed.) (1971a) *The African Iron 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hinnie, P. L. (1971b) 'The culture of medieval Nubia and its impact on Africa', in Y. F. Hasan (ed.), *Sudan in Africa* (Khartoum: Khartoum University Press), pp. 42–50.
Shinnie, P. L. and Chittick, H. N. (1961) *Ghazali: a monastery in the northern Sudan* (Khartoum: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 Occasional Papers, 5).
Shorter, A. (1968) 'The Kimbu', in A. Roberts (ed), *Tanzania before 1900* (Nairobi: EAPH), pp. 96–116.
Siré-Abbâs-Sob (1913) *Chroniques du Foûta sénégalais*, ed. M. Delafosse and H. Gaden (Paris: Leroux; Collection de la Revue du Monde Musulman).
Skinner, D. E. (1978) 'Mande settl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ic institutions in Sierra Leone', *IJAHS*, **11**, pp. 32–62.
Skinner, E. P. (1957)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Mosi people', *TNYAS*, **19**, 8, pp. 740–50.
Skinner, E. P. (1958) 'The Mosi and the traditional Sudanese history', *JNH*, **43**, 2, pp. 121–31.
Skinner, E. P. (1962) 'Trade and markets among the Mosi people', in P. Bohannan and G. Dalton (eds.); *Markets in Africa*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p. 237–78.
Skinner, N. (1968) 'The origin of the name Hausa', *Africa*-(L), 38, 3, pp. 253–7.
Slaoui (Slāwī): see al-Salāwī
Smith, H. F. C. (Abdullahi) (1961) 'A further adventure in the chronology of Katsina', *BHSN*, **6**, 1, pp. 5–7.
Smith, H. F. C. (Abdullahi) (1970a) 'Some considerations rela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states in Hausaland', *JHSN*, **5**, 3, pp. 329–46.
Smith, H. F. C. (Abdullahi) (1970b) 'Some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Zazzau under the Hausa kings', in M. J. Mortimore (ed.), *Zaria and its region, a Nigerian savanna city and its environs* (Zaria: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occasional paper 4), pp. 82–101.
Smith, H. F. C. (Abdullahi) (1971) 'The early states of central Sudan', in J. F. A. Ajayi and M. Crowder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Vol. 1, pp. 158–201.
Smith, H. F. C. (Abdullahi) (1979)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academic ideals of the Sokoto Jihad', in Y. B. Usman (ed.) (1979a), q.v., pp. 242–60.
Smith, M. G. (1959) 'The Hausa system of social status', *Africa*-(L) **29**, 3, pp. 239–52.
Smith, M. G. (1960) *Government in Zazzau, 1800–1950* (London: OUP for IAI).
Smith, M. G. (1964a) 'The beginnings of Hausa society', in *The Historian in Tropical Africa* (London: OUP for IAI), pp. 348 ff.
Smith, M. G. (1964b)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among the Hausa', *CSSH*, **6**, 2, pp. 164–94.
Snellow, I. (1964) 'Die Stellung der Slaven in der Hausa-Gesellschaft', *MIO*, **10**, 1, pp. 85–102.
Soh, S. A.: see Siré-Abbâs-Soh
Southall, A. W. (1954) 'Alur tradition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UJ*, 18, pp. 137–65.
Stanley of Alderley Lord: see Alvares, F. (1881)
Staude, W. (1961) 'La légende royale de Kouroumba', *JSA*, **31**, 2. pp. 209–59.
Steenberghen, F. van (1946) *Aristote en Occident* ... (Louvain: Institut supérieur de philosophie).
Steiger, A. (1941): see Alfonso X, el Sabio
Stewart, J. M. (1966) 'Akan history: some linguistic evidence', *GNQ*, **9**, pp. 54–7.
Storbeck, F. (1914) *Die Berichte der arabischen Geographen des Mittelalters über Ostafrika* (Berlin, Humboldt University,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18, 2).
Stow, G. W. (1905) *The native races of South Africa: a history of the intrusion of the Hottentots and Bantu* (London: Sonnenschein; New York: Macmillan).
Strandes, J. (1899) *Die Portugiesenzeit von Deutsch- und Englisch Ostafrika* (Berlin: Reimer); 1961 Eng. transl. J. F. Wallwork, *The Portuguese period in East Africa* (Nairobi: East African Literature Bureau).
Strong, S. A. (1895) 'History of Kilwa, from an Arabic manuscript', *JRAS*, **14**, pp. 385–430.
Sulzmann, E. (1959) 'Die Bokope Herrschaft der Bolia', *ARSP*, **15**, 3, pp. 389–417.
Summers, R. (1960)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Rhodesia', *PAPS*. **104**, 3, pp. 266–92.
Summers, R. (1963) *Zimbabwe, a Rhodesian mystery* (Johannesburg/New York: Nelson).
Summers, R. (1969) 'Ancient mining in Rhedesia', *MNMMR*, **3**.
Suter, H. (1900) *Die Mathematiker und Astronomen der Araber und ihre Werke* (Leipzig: Teubner).
Sutton, J. E. G. (1972) 'New radiocarbon dates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JAH*, **13**, 1, pp. 1–24.

Sutton, J. E. G. (1976, 1977) 'Iron working around Zaria', *Zaria Archaeological papers*, no 8, and 'Addendum to No 8' (Zaria).
Sutton, J. E. G. (1979) 'Towards a less orthodox history of Hausaland', *JAH*, 20, 2, pp. 179–201.
Sutton, J. E. G. and Roberts, A. D. (1968) 'Uvinza and its salt industry', *Azania*, 3, pp. 45–86.
Sykes, J. (1959) 'The eclippe at Buharwe', *UJ*, 23, 1, pp. 44–50.
Sylla, Djiri (1975) Paper presented at *Premier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Bamako* (Paris: Fondation SCOA pour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en Afrique noire).
Szolc, P. (1977) 'Die Konsequenzen der Islamisierung in Kordofan: Bemerkungen und Beobachtungen zum religiösen Wandel', *Am*, 10, 1, pp. 51–67.

Talbi, M. (1954) 'Quelques données sur la vie en Occident musulman d'après un traité de *hisba* du 15e siècle', *Arabica*, 1, 3, pp. 294–306.
Talbi, M. (1966) *L'Emirat aghlabide 184/296–800/909* (Paris: Maisonneuve).
Talbi, M. (1973) 'Ibn Khaldun et l'histoire', in *Actas del secundo coloquio hispanico-tunecino de estudios historicos* (Madrid: Instituto hispanico-arabe de cultura), pp. 63–90.
Tamakloe, E. F. (1931) *A brief history of the Dagbamba people* (Accra: Government Printer).
Tamrat, T. (1972a) *Church and state in Ethiopia: 1270–152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Tamrat, T. (1972b) 'A short note on the traditions of pagan resistance to the Ethiopian church,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JES*, 10, 1, pp. 137–50.
Tamrat, T. (1974) 'Problems of royal succession in fifteenth century Ethiopia', in *Quarto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etiopici* (Rome: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pp. 526–33.
Tanghe, B. (1929) *De Ngbandi: geschiedkundige bijdragen* (Bruges: Walleyn).
Ta'rīkh al-fattāsh: see Ka'ti, Maḥmūd
Ta'rīkh al-Sūdān: see al-Sa'dī
Tauxier, L. (1917) *Le noir du Yatenga; Mossis, Nioniossés, Samos, Yarsés, Silmi-Mossis, Peuls* (Paris: Larose).
Tauxier, L. (1921) *Le noir de Bondoukou; Bondoukous, Koulangos-Dyoulas, Abrons* (Paris: Larose).
Tauxier, L. (1924) *Nouvelles notes sur le Mossi et le Gourounsi* (Paris: Larose).
Tauxier, L. (1932) *Religion, moeurs et coutumes des Agnis de la Côte-d'Ivoire (Indenie et Sanwi)* (Paris: Geuthner).
Taylor, B. K. (1962) *The western lacustrine Bantu* (London: OUP for IAI; Ethnographic survey of Africa, East Central Africa, pt. 13).
Teixeira da Mota, A. (1950) *Topónimos de origem portuguêsa na costa ocidental de Africa desde o Cabo Bojador ao Cabo de Santa Caterina* (Bissau: Publicações do centro de estudos da Guiné portuguêsa, 14).
Teixeira da Mota, A. (1954) *Guiné portuguêsa*, 2 vols (Lisbon: 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
Teixeira da Mota, A. (1958) 'L'Art de naviguer en Méditerranée du 14e au 16e siècle et la navigation astronomique dans les océans', in *Le Navire et l'économie maritime du Moyen Age au 18e siècle, principalement en Méditerranée: Travaux du 2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maritime, Paris, 1957* (Paris, SEVPEN), pp. 127–54.
Teixeira da Mota, A. (1963) *Méthodes de navigation et cartographie nautique dans l'Océan Indien avant le 16e siècle* (Lisbon: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Agrupamento de estudos de cartografia antiga, secção de Lisboa, serie separata, 5).
Teixeira da Mota, A. (1969) 'Un document nouveau pour l'histoire des Peul au Sénégal pendant les 15e et 16e siècles', *BCGP*, 96, pp. 781–860.
Teixeira da Mota, A. (1970) *Fulas e Beafadas no Rio Grande no seculo XV: achegas para a ethnohistoria da Africa ocidental* (Coimbra: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Agrupamento de estudos de cartografia antiga, serie separata, 60).
Teixeira da Mota, A. (1978) *Some aspects of Portuguese colonisation and sea trade in West Africa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African Studies Program).
Teixeira da Mota, A. (1981) 'Entrees d'esclaves noirs à Valence (1445–1482): le remplacement de la voie saharienne par la voie atlantique', in *Le Sol, la parole et l'écrit: 2,000 ans d'histoire africaine: mélanges en hommage à Raymond Mauny*, 2 vols (Paris: Société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mer), pp. 579–94.
Les Tellem et les Dogon Mali (1973) (Catalogue de l'exposition du 9 Juin au 23 Août 1973, Galerie Numaga).
Temple, O. S. M. (1922) *Notes on the tribes, provinces, emirates and states of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Nigeria*, (Lagos: CMS Bookshop; Exeter: J. Townsend); 1967 reprint (London: Cass).
Terrasse, H. (1949–50) *Histoire du Maroc des origines à l'établissment du protectorat français*, 2 vols (Casablanca: Atlantides).
Terrasse, H. (1958) *Islam d'Espagne; une rencontre de l'Orient et de l'Occident* (Paris: Plon).

Thoden, R. (1973) *Abū 'l-Hasan 'Alī: Merinidenpolitik zwischen Nordafrika und Spanien in den Jahren 710–752, 1310–1351* (Freiburg: Schwarz; Islamische Untersuchungen, 21).

Thompson, L. (ed.) (1969) *African societies in southern Africa: historical studies* (London: Heinemann; New York: Praeger).

Thurstan Shaw: see Shaw, T.

Tibbetts, G. R. (1961) 'Arab navigation in the Red Sea', *GJ*, 127, 3, pp. 322–34.

Tibbetts, G. R. (1969) *The navigational theory of the Arab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Coimbra: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do Ultramar; Agrupamento de estudos de cartografia antigua, serie separata, 36).

Tibbetts, G. R. (ed.) (1971) *Arab navig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Portuguese* (London: RASGBI;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n.s. 42).

al-Tidjānī (14th cent.) *Riḥla*; partial French transl. A. Rousseau, 'Voyage du Scheikh el-Tidjani dans la régence de Tunis, pendant les années 706, 707 et 708 de l'hégire (1306–1307),' *JA*, serie 4, pp. 57–208; série 5, 1, pp. 102–68, 354–424.

Tiendrebeogo, Y. (1964) *Histoire et coutumes royales des Mossi de Ouagadougou* (Ouagadougou: Naba).

Tolmacheva, M. A. (1969) 'Vostochnoe poberezh'e Afriki v arabskoi geograficheskoi literature', in *Strany i narody Vostoka* (Moscow: Nauka; Strany i narody Afriki. Akademiia nauk SSSR. Vostochnaia komissiia geograficheskogo obahchsteva SSSR, 9), pp. 268–96.

Tonnoir, R. (1970) *Giribuma: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et à la petite histoire du Congo équatorial* (Tervuren: Musée royal de l'Afrique centrale; Archives d'ethnographie, 14).

Toussaint, A. (1961) *Histoire de l'Océan indien* (Paris: PUF;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d'outre-mer, 4).

Toussaint, A. (1972) *Histoire des îles mascareignes* (Paris: Berger-Levrault).

Tremearne, A. J. N. (1913) *Hausa superstitions and custom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olklore and the folk* (London: Bale and Daniels).

Triaud, J. L. (1973) *Islam et sociétés soudanaises au Moyen Age: étude historique*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Recherches voltaïques, 16).

Trimingham, J. S. (1949) *Islam in the Sudan* (London: OUP).

Trimingham, J. S. (1962) *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London: OUP).

Trimingham, J. S. (1964) *Islam in East Af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Tubiana, M. J. (1964) *Survivances préislamiques en pays zaghawa* (Paris: Institut d'ethnologie; Travaux et mémoires, 67).

Turaiev, B. (ed.) (1906) *Vitae sanctorum Indigenarum: I: Acta S. Eustathii* (Corpus scriptorum christianorum orientalium, 32: Scriptores aethiopici, 15, Paris).

al-'Umarī, Ibn Faḍl Allāh (14th cent.) *al-Ta'rīf bi 'l-muṣṭalaḥ al-sharīf*; 1894 edn (Cairo).

al-'Umarī, Ibn Faḍl Allāh (14th cent.) *Masālik al-abṣār fī Mamālik al-amṣar*; 1924 edn (Cairo); 1927 transl., Gaudefroy-Demombynes, *L'Afrique moins l'Egypte* (Paris: Geuthner; Bibliothèque des géographes arabes, 2).

al-'Umarī, Ibn Faḍl Allāh (14th cent.), 1975 French transl. in J. M. Cuoq (q.v.), pp. 254–89.

Unesco (1980a) *Historical relations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proceedings of the meeting of experts, 1974* (Paris: Unesco;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the Drafting of a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3).

Unesco (1980b) *The Historiography of Southern Africa: proceedings of the meeting of experts, 1977* (Paris: Unesco;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for the Drafting of a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4).

Urvoy, Y. (1949) *Histoire de l'empire de Bornou* (Dakar: IFAN; Mémoires, 7; Paris: Larose); 1968 edn (Amsterdam: Swets and Zeitlinger).

Usman, Y. B. (1972) 'Some aspects of the external relations of Katsina before 1804', *Savanna*, 1, 2, pp. 175–97.

Usman, Y. B. (ed.) (1979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koto caliphate: the Sokoto seminar papers* (Zaria: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for the Sokoto Caliphate Bureau).

Usman, Y. B. (1979b)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ies: some notes on a significant dimension of the Sokoto Jihad', in Y. B. Usman (ed.) (1979a), q.v., pp. 34–58.

Valette, J. (ed.) (1964) *Madagascar vers 1750 d'après un manuscrit anonyme* (Tananarive: Imp. nationale).

Van Der Merwe, N. J. and Scully, R. T. K. (1971 2) 'The Phalaborwa story: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 of a South African Iron Age group', *WA*, 3, 3, pp. 178–96.

Van Sertima, I. (1976)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New York: Random Press).

Vansina, J. (1960) *L'évolution du royaume Rwanda des origines à 1900* (Brussels: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outre-mer, class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n.s. **26**, 2).

Vansina, J. (1966a) *Introduction à l'ethnographie du Congo* (Kinshasa: University Lovanium; Brussels: Centre de recherches et d'information socio-politiques).

Vansina, J. (1966b) *Kingdoms of the savann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Vansina, J. (1966c) 'More on the invasions of Kongo and Angola by the Jaga and the Lunda', *JAH*, 7, 3, pp. 421–9.
Vansina, J. (1969) 'The bells of kings', *JAH*, 10, 2, pp. 187–97.
Vansina, J. (1971) 'Inner Africa', in A. A. Boahen, *et al.* (eds), *The horizon history of Africa* (New York: Heritage Printing), pp. 260–303.
Vansina, J. (1973) *The Tio kingdom of the Middle Congo, 1880–1892* (Oxford: OUP for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Vansina, J. (1974) 'Probing the past of the lower Kwilu peoples (Zaire)', *Paideuma*, 19, pp. 332–64.
Vansina, J. (1978) *The children of Woot: a history of the Kuba peopl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Vedder, H. (1938) Eng. transl. (from German), *South-West Africa in early times: being the story of South-West Africa up to the date of Maharero's death in 1890* (London); 1966 reprint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Velgus, V. (1969) 'Issledovanie nekotorykh spornykh voprosov istorii morekhodstva v Indiiskom okeane: Etudes de quelques points controversés dans l'histoire de la navigation dans l'Océan indien', in *Africana. Etnografiia, istoriia, lingvistika* (Leningrad: Akademiia nauk SSSR. Trudy Instituta etnograffii im. N. N. Miklukho-Maklaia, n.s., 93, Afrikanskii etnografskii sbornik, 7), pp. 127–76.
Verhulpen, E. (1936) *Baluba et balubaises du Katanga* (Anvers: Edition de l'avenir belge).
Vérin, P. (1967a) 'Les antiquités de l'île d'Anjouan', *BAM*, 45, 1, pp. 69–80.
Vérin, P. (ed.) (1967b) *Arabes et islamisés à Madagascar et dans l'Océan indien* (Tananarive: Revue de Madagascar).
Vérin, P. (1972) *Histoire du nord-ouest de Madagascar*, *Taloha*, 5, (numéro special).
Vérin, P. (1975) *Les échelles anciennes du commerce sur les côtes de Madagascar*, 2 vols (Lille: University of Lille).
Vérin, P. (1980) 'Cultural influence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Africa to the settlement of Madagascar', in Unesco (1980a) q.v., pp. 95–116.
Vérin, P., Kottack, C. P. and Gorlin, P. (1966) 'The glotto-chronology of Malagasy speech communities', *OL*, 8, pp. 26–83.
Verlinden, C. (1955a) *L'Esclavage dans l'Europe médiévale*, Vol. 1, *Péninsule ibérique, France* (Bruges: de Tempel).
Verlinden, C. (1955b) 'Navigations, marchands et colons italiens au service de la découverte et de la colonisation portugaise sous Henri le Navigateur', *MA*, 44, 4, pp. 467–98.
Verlinden, C. (1961) 'Les Découvertes portugaises et la collaboration italienne d'Alphonse IV à Alphonse V', in *Actas do congresso internacional de historia dos descobrimentos*, 6 vols (Lisbon), Vol. 3, pp. 593–610.
Verlinden, C. (1962) 'La Crète, débouché et plaque tournante de la traite des esclaves aux 14e et 15e siècles', in *Studi in onore di Amintore Fanfani*, (Milan: Giuffrè).
Verlinden, C. (1966a) 'Esclavage noir en France méridionale et courants de traite en Afrique', *Annales du Midi*, 128, pp. 335–443.
Verlinden, C. (1966b) 'Les Gênois dans la marine portugaise avant 1385', *SHG*, 41.
Verlinden, C. (1967) 'Les Débuts de la traite portugaise en Afrique: 1433–1448', in *Miscellanea medievalia in memoriam Jan Frederick Niermeyer* (Groningen: Wolters), pp. 365–77.
Verlinden, C. (1977) *L'Esclavage dans l'Europe médiévale*, Vol. 2, *Italie, colonie italienne du Levant, Levant latin, empire byzantin* (Bruges: de Tempel).
Verly, R. (1977) 'Le Roi divin chez les Ovimbundu et les Kimbudu de l'Angola', *Zaïre*, 9, 7, pp. 675–703.
Vernet, J. (1958) 'La Carta magrebina', *BRAH*, 142, 2, pp. 495–533.
Vernier, E. and Millot, J. (1971) *Archéologie malgache: comptoirs musulmans* (Paris: Musée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catalogue du Musée de l'homme, série F, Madagascar, 1).
Viagem de Lisboa à ilha de S. Tomé, escrita por um piloto português (1940), transl. S. F. de Mendo Trigoso (Biblioteca das grandes viagens, 2, Lisbon: Portugalia Editora).
Vianes, S. and Deschamps, H. J. (1959) *Les Malgaches du Sud-Est: Antemoro, Antesaka, Antambahoaka, peuples de Faragangana* (Paris: PUF).
Vidal, J. (1924) 'La Légende officielle de Soundiata, fondateur de l'empire mandingue', *BCEHSAOF*, 2, pp. 317–28.
Vidal, P. (1969) *La civilisation mégalithique de Bouar: prospection et fouilles 1962–1966* (Paris: Firmin Didot, Recherches oubanguiennes, 1).
Vidal, P. and David, N. (1977) 'La civilisation mégalithique de Bouar', *NAk*, 2, pp. 3–4.
Vilar, P. (1974) *Or et monnaie dans l'histoire, 1450–1920* (Paris: Flammarion).

Vinnicombe, P. (1976) *People of the eland: rock paintings of the Drakensberg Bushmen as a reflection of their life and thought* (Natal: University of Natal Press).
Vogel, J. O. (1971) *Kamangoz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ron Age cultures of the Victoria Falls region* (London/New York: OUP for the National Museum of Zambia, Zambia Museum papers, 2).
Vogt, J. L. (1973) 'The Lisbon slaves house and African trade: 1486–1521', *PAPS*, **107**, 1, pp. 1–16.
Voll, J. O. (1978)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Sudan* (Metuchen: Scarecrow Press; African Historical Dictionary 17).

Wannyn, R. L. (1961) *L'Art ancien du métal au Bas-Congo* (Champles: Editions du Vieux Planquesaule).
Wansbrough, J. (1968) 'The decolonization of North African history', *JAH*, **9**, 4, pp. 643–50.
al-Wansharīsī, Aḥmad ibn Yaḥyā (15th cent.) *Kitāb al-mi'yār*; 1896–8 edn (12 vols) Fez; 1908–9, French transl. E. Amar, *La Pierre de touche des fetwas* (*Kitāb al-mi'yār*) (Paris: Leroux; Archives marocaines, 12–13).
Watson, A. M. (1967) 'Back to gold and silver', *ECHR*, **20**, pp. 1–67.
Watt, W. M. (1972) *The influence of Islam on medieval Eur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Islamic survey, 9).
Wauters, G. (1949) *L'Esotérie des noirs dévoilée* (Brussels: Editions européennes).
al-Wazīr, al-Andalusī: see Abū 'Abd Allah Muḥammad al-Wazīr al-Andalusī
Webster, J. B. (1978) *A history of Uganda before 1900* (Nairobi).
Werner, A. (1914–15) 'A Swahili history of Pate', *JAS*, **14**, pp. 148–61, 278–97, 392–413.
Westermann, D. (1952) *Geschichte Afrikas: Staatenbildungen südlich der Sahara* (Köln: Greven Verlag).
Westermann, D. (1957): see Baumann, H.
Westermann, D. and Bryan, M. A. (1970) *Languages of West Africa* (Folkestone: Dawsons; Handbook of African languages, pt 2).
Westphal, E. O. (1963) 'The linguistic pre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Bush, Kwadi, Hottentot and Bantu linguistic relationships', *Africa*–(L), 33, pp. 237–65.
Weydert, J. (1938) *Les Balubas chez eux: étude ethnographique* (Luxembourg: Heffingen).
Wheatley, P. (1954) '*The land of Zanj: exegetical notes on Chinese knowledge of East Africa prior to* AD 1500', in R. W. Steel (ed.) *Geographers and the tropics: Liverpool essays* (London: Longman), pp. 139–88.
Wheatley, P. (1959) 'Geographical notes on some commodities involved in maritime trade', *JMBRAS*, **32**, pp. 111–12.
Wheeler, A. (1971) 'Kitagwenda: a Babito kingdom in southern Toro' (Kampala: Makerere Seminar Paper, 4).
Wiener, L. (1920–2) *Africa an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3 vols (Philadelphia: Innes).
Wiet, G. (1937) 'L'Egypte arabe, de la conquête arabe à la conquête ottomane, 647–1517 de l'ère chrétienne', in G. Hanotaux (ed.), *Histoire de la nation égyptienne* (Paris: Société de l'histoire nationale), Vol. 4.
Wiet, G. (1951–2) 'Les roitelets de Dhalak', *BIE*, **34**, pp. 89–95.
Willcox, A. R. (1971) 'Domestic cattle in Africa and a rock art mystery', in *Rock paintings of southern Africa* (*SAJS*, special issue, 2), pp. 44–8.
Willcox, A. R. (1975) 'Pre-Colombian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consideration from Africa', *SAAB*, **30**, pp. 19–28.
Willett, F. (1962) 'The introduction of maize into West Africa; an assessment of recent evidence', *Africa*–(L), 32, 1, pp. 1–13.
Willett, F. (1967) *Ife in the history of West African sculptur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New York: McGraw-Hill).
Wilson, A. (1972) 'Long distance trade and the Luba Lomani empire', *JAH*, 13, 4, pp. 575–89.
Wilson, M. (1959a) *Communal rituals of the Nyakyusa* (London: OUP for IAI).
Wilson, M. (1959b)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ranskei and Ciskei', *AS*, 18, 4, pp. 167–79.
Wilson, M. (1969a)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in Southern Africa: the relevance of kinship studies to the historian', in L. Thompson (ed.), *African societies in southern Africa* (London: Heinemann), pp. 71–85
Wilson, M. (1969b) 'The Nguni People',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1969, 1971 (q.v.), Vol. 1
Wilson, M. (1969c) 'The Sotho, Venda and Tsonga' in M. Wilson and L. Thompson (eds), 1969, 1971 (q.v.), Vol. 1, pp. 131–86.
Wilson, M. and Thompson, L. (eds) (1969, 1971)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Withers-Gill, J. (1924) 'The Moshi tribes: a short history' (Accra: Legon University).

Witte, C. M. de (1956) 'Une ambassade éthiopienne à Rome en 1450', *OCP*, 22, 3–4, pp. 286–98.
Wolde-Mariam, N. (1970) *An Atlas of Africa*, Addis Ababa.
Wondji, C. (1974) 'Conclusion', in *Bonduku Seminar Papers* (q.v.)
Wright, T. (1977) 'Observation sur l'évolution de la céramique en Imérina centrale', in *Colloque de l'Académie malgache*.
Wright, T. and Kus, S. (1977) 'Archéologie régionale et organisation sociale ancienne de l'Imérina central', in *Colloque de 'l'Académie malgache*.
Wright, W. (ed.) (1877) *Catalogue of the Ethiopic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acquired since the year 1847* (London: British Museum 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ed Books and Manuscripts).
Wrigley, C. (1958) 'Some thoughts on the Bachwezi', *UJ*, 22, 1, pp. 11–21.
Wrigley, c. (1959) 'Kimera', *UJ*, 33, 1, pp. 38–43.
Wrigley, C. (1973) 'The story of Rukidi', *Africa*-(L), 43, 3, pp. 219–31.
Wrigley, C. (1974) 'Myths of the savanna', *JAH*, 15, 1, pp. 131–5.
Wylie, K. C. (1977) *The political kingdoms of the Temne: Temne government in Sierra Leone, 1825–1910* (London/New York: Africana Publications).

Yaḥyā b. Abi Bakr, Abū Zakariyyā' (1878) *Chronique d'Abou Zakaria*, transl. E. Masqueray (Algiers: Allaud).
al-Ya'ḳūbī Aḥmad b. Abī Ya'ḳūb (9th cent.) *Kitāb al-Buldān*; 1870–94 ed. M. J. de Goeje, in *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 (Leiden: E. J. Brill); 1937 ed. and transl. G. Wiet, *Les Pays* (Cairo: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textes et traductions d'auteurs orientaux, 1).
Yāḳūt b. 'Abd Allāh al-Ḥamawī (13th cent.) *Mu'djam al-Buldān*; 1866–73 ed. J. F. Wüstenfeld, *Jacut's geographisches Wörterbuch*, 6 vols (Leipzig: Brockhaus), 5, pp. 75–6, 302–699.
Yoder, J. C. (1977) 'A people on the edge of empires: a history of the Kanyok of central Zaïre' (doctoral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Young, M. W. (1966) 'The divine kingship of the Jukun: a re-evaluation of some theories', *Africa*-(L), 36, 2, pp. 135–53.
Yūsuf Kamāl (1926–51)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Africae et Aegypti*, 5 vols (Cairo).
Yver, G. (1903) *Le commerce et les marchands dans l'Italie méridionale au 13e et au 14e siècle* (Paris: Fontemoing).

Zahan, D. (1961) 'Pour une histoire des Mossi du Yatenga', *L'Homme*, 1, 2, pp. 5–22.
Zanzibar and the East African coast: Arabs, Shirazi and Swahili (London: IAI; Ethnographic survey of Africa, East Central Africa, pt 12).
al-Zarkashī, Muhammad b. Ibrāhīm (1872) *Ta'rīkh al-dawlatayn* (Tunis); 1895 French transl. E. Fagnan, *Chronique des Almohades et des Hafçides* (Constantine: Braham).
Zeltner, J. C. (1970) 'Histoire des Arabes sur les rives du lac Tchad', *AUA*, F, 3, 2, pp. 109–237.
Zouber, M. (1977) *Ahmad Baba de Tombouctou, 1556–1627: sa vie, son oeuvre* (Paris: Maisonneuve et Larose; Publications du département d'islamologie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 3).
Zunon Gnobo, J. (1976) 'Le rôle des femmes dans le commerce pré-colonial à Daloa', *Gogo-Godo*, 2, pp. 79–105.
Zurara, G. E. de (1896, 1899) *Cronica dos feitos de Guiné; The chronicle of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Guinea*, ed. and Eng. transl. C. R. Beazley and E. Prestage, 2 vols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49 edn. *Cronica dos feitos de Guiné* (Lisbon: Divisao de publicações et biblioteca, agencia geral das colonias); 1960 French transl. L. Bourdon, *Gomes Eanes de Zuraga, Chronique de Guinée* (Dakar: IFAN; Mémoires, 1).

索　引